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七卷

清代后期军事史

目　录

第十七卷　清代后期军事史（上册）

书末附图：

目　　录

第十七卷　清代后期军事史（下册）

书末附图：

绪　论

1840年（道光二十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清代历史由前期转为后期的分界线，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911年（宣统三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标志着清代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消亡。本卷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就是从1840至1911年这72年间中国在军事方面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和规律。

一

1644年（清顺治元年），东北地区的清军攻入关内，占领北京，进而镇压农民起义，击败南明势力，在整个中国建立起代表满汉地主阶级利益的新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在这时，欧洲的英国已爆发了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扉页，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8世纪70～80年代，法国和美国也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此后，又有一些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它们和英国一样，先后进行了以机器代替手工操作的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同时，对外的殖民掠夺也日益频繁。从此，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着全球，将封闭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纷纷卷入资本主义的旋涡。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垂涎的主要对象。由于清王朝以“大朝上国”自居，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闭目塞听，盲目自大，因循守旧，以致到了嘉庆年间，国势日趋衰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都处于落后状态，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呈现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穷途末路景象。于是，正积极对外进行

殖民扩张的英国，便以保护非法的鸦片贸易为借口，悍然于 1840 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继 1842 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之后，1844 年，美、法等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从此，独立自主的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前者又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 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谋求国家的繁荣富强，中国广大民众和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在空前惨重的灾难中，奋起搏击，前赴后继，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和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战争。与此同时，积极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经济，发起各种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使中华民族在屈辱沉沦与求索奋进并存的环境中，艰难而又曲折地向近代化的道路迈进。就军事而言，也正是在这波澜迭起、烽火连天的艰险历程中，逐渐弃旧图新，令人瞩目地向近代化方向发展，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武器装备不断改善

鸦片战争前，清军冷热兵器并用，一般是弓箭、刀矛六成，鸟枪、抬枪四成，火炮的数量极少，性能也很落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具有远见卓识的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武器，改变清军装备落后状态。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师承林、魏，积极购买和仿制先进的枪炮，首先用以装备淮军和八旗洋枪队。与此同时，聘请洋员，对部队实行新式操练。到了 70～80 年代，由绿营选练的"练军"和由裁剩的湘淮军改编的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2 页。

"防军"，已较多地装备了近代枪炮，刀矛、弓箭等冷兵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90年代，由袁世凯和张之洞分别编练的"新建陆军"和"自强军"，以及20世纪初全国统一编练的新军，则已完全用火器代替了冷兵器，不但武器的性能更为先进，而且形制渐趋统一。由绿营、勇营改编而成的巡防营等地方武装，虽然还是新旧武器杂陈，但也基本上过渡到了以火器为主的阶段。至于新组建的海军，其装备则主要由先进的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等组成，与旧式水师简陋的"帆篷舟楫，艇船炮划"相比，已有霄壤之别。另外，在一些重要海口修筑了海防工程，添设了较为先进的海岸炮、炮艇和水雷等新式武器装备。

（二）编制体制日趋合理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清朝制兵八旗和绿营，只有步兵和骑兵各自独立编组。在镇压太平军时组建的湘军陆师、水师，以营为基本单位，是比较典型的单一营制。19世纪60年代初组建的淮军，开始时完全承袭湘军营制，但不久就建立了炮营，成为中国近代炮兵的发轫。中日甲午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清政府开始认识到军队的单一营制已不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于是从"新建陆军"和"自强军"开始，组建以步兵为主，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为辅的合成军队。在编练新军时，进一步统一了陆军的编制。在兵役制度方面，开始由世兵制向募兵制与义务兵役制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在武装力量体制方面，规定新军由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三部分组成，由陆军部统一领导。另有地方武装巡防队。由于实行上述变革，清军的编制体制日趋合理。

另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冲击下，清军中的一些官兵受到了先进思想的熏染。特别是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投笔从戎，在新军中秘密地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终于使部分官兵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从而调转枪口，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战争，开始了由封建军队向资产阶级式军队的转变，其编制体制也更趋近代化。

（三）作战方式日益近代化

在初期的反侵略战争中，清军经常采用线式阵地防御，要塞工事和野战工事的构筑非常简陋，步兵和骑兵通常以密集队形与拥有优势火力的侵略军交锋，且又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以致遭到很大的伤亡。水师的战法则基本上停留在接舷跳帮、抛掷火罐、火攻夜袭的冷兵器时代，同样相当落后。通过战争实践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清军的作战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注意翼侧和纵深设防，队形由密集趋向疏散，并出现了攻守结合的“地营”，步骑和步炮协同也渐趋娴熟。中法战争中，由老将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之役，不仅注意在正面实行纵深设防，而且注意翼侧防御和侧后抄袭，重创法军后，又不失时机地进行追击，扩大战果，成为作战方式改进和指挥水平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至于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黄海海战，尽管中方主将在指挥上有所失误，但毕竟是较高水平的海上决战，与反侵略战争初期清军水师的战法已截然不同。组建合成军队以后，对各兵种的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既重视分练，又注意合练，并进行了接近实战的对抗性演习，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水平又有所提高。

（四）国防建设逐渐改善

清前期的设防，偏重于塞防而忽视海防。冷兵器与火器的制造主要依靠手工操作，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军报传递，主要依靠驿站，旷日持久，往往贻误战机。部队行军，依靠徒步和马车、帆船，行动迟缓。自洋务派于19世纪60年代开展自强活动以后，首先在上海、南京、天津、福州建立了仿制先进枪炮、战舰的近代军事工业，接着，许多省也纷纷效法，初步形成了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同时，还兴办了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近代采矿、冶炼工业。针对西方列强不断从海上入侵，开始注意加强海口设防：依照西式改筑坚固炮台，安设新式火炮，添置守口炮艇和水雷，实行水陆依护。70年代和80年代，经过两次海防大讨论，决定进一步加强海防建设，先后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其中的北洋海军一度居世界第六位、亚洲第一位。同时，建立了旅顺和威海卫海军基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海防体系，成为

中国海防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与此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东北、西北、西南方向的塞防建设。此外，还兴办了电报和铁路，其中电报的建设尤为迅速，至19世纪末，基本形成了遍及全国的通信网络，加快了情报传递，改善了作战指挥。随着近代军事工业和海军的建立以及武器装备的改善，培养军事技术和指挥人才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各种军事学堂应运而生。至20世纪初，全国已建立起由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等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另外，还不断派遣学生出国留学。通过教育改革，相应地提高了军事人才的素质。所有这些，标志着国防建设已得到较好的改善。

（五）近代军事思想初步形成

上述四个方面的显著进步,是以军事思想的进步为先导的。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既是中西军事思想开始碰撞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萌芽。洋务派官僚继承和发展了林、魏的军事思想，决定学习外国“长技”，“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他们认为中国要自强，必先从练兵入手，而练兵尤应“添习火器，操演技艺”。于是，购买外国先进武器装备清军，聘请洋员进行西式操练。他们又认为练兵应“以制器为先”，便着手“觅制器之器”，通过购买西方机器，创建近代军事工业，仿制外国先进武器，“以为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他们还认为，“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于是，积极筹建电报和铁路。随着先进枪炮、战船的日益增多，又意识到培养军事人才已是“当务之急”、“久远之图”，于是一面自己开办军事学堂，一面派遣学生出国留学。1874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后，清政府开始意识到筹办海防“实为今日不可再缓之举”，决定购舰和造船，着手组建近代海军。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鉴于中国因缺乏强大的海军，以致法国舰队横行无忌，于是确立了“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从而使北洋海军得以较快建成。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提出：“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先后以德国、日本的军队为模式编练新军，从而由学习西方军队的“技术”进而学

习西方军队的“制度”，开始摒弃清军的单一营制，向组建合成军队方向发展。此后，随着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的传播和维新变法思潮、民主革命思潮的相继涌现，西方的军事学术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有关阐述战争观、战略战术和近代兵役制度等内容的著作和刊物不断增多，并在中西军事思想融合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由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到学习军事制度以至军事学术，表明近代军事思想由浅层面向深层次发展，已处于初步形成完整体系的阶段。

二

清后期的军事，由于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影响和制约，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频繁的战争是清后期军事发展变化的动因

清朝统治集团虽然政治腐败，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但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不得不注意军事问题。特别是每当战败之后，便痛定思痛，程度不同地在军事领域中作些改革。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道光帝便提出：海防“总以造船制炮为要”，陆防“总以火炮为先”，从而开始改变“以骑射为根本”的建军方针。19 世纪 50～60 年代，为了有效地镇压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先后组建较有战斗力的湘军和淮军以取代不堪任战的八旗、绿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官僚决定改善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并建立“练军”和“防军”，借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19 世纪 70 年代，边境危机纷至沓来，尤其是日军跨海入侵台湾，促使清政府把目光移到海防建设方面，着意组建近代海军。至于改革陆军营制，组建“新建陆军”、“自强军”和编练新军，则是吸取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

上述情况表明，清政府在军事领域的变革带有很大的被动性，以致缺乏总体规划，往往顾此失彼。例如，重视了海防建设，却放松了塞防建设，注意了军队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和编制体制的

改革，却忽视了反侵略战争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反帝爱国思想的教育。

（二）学习西方“长技”推动了中国军事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朝野人士首先看到的是英军的“坚船利炮”，所以，林则徐和魏源及时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以求改善清军的武器装备，加强清王朝的国家机器，维护其封建统治。洋务派学习西方长技，积极购买和仿制外国枪炮、战船，开始主要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后来主要为了抵御外侮，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然而，军队一旦装备了先进的武器，必将引起其它方面的变化。如淮军装备洋炮以后，便很快建立起新的兵种炮兵。此后，清统治者虽然一度迷恋于单一营制，使军队的编制体制的变革出现了滞后性，但经过战争实践，还是向适应发挥武器装备整体威力的合成军队方向转化，并初步形成类似野战军与地方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同时，作战样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新的武器装备的引进和新的军兵种的建立，还使军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由世袭、军功和科举制度发展为开办新式军事学堂，并最终取代了世袭、科举制度。另外，新式武器装备的引进，还推动了近代军事工业以及与军事关系密切的电报、铁路的建设。由此可见，选择先进军事技术作为军事变革的突破口，虽然并非出于理性的认识，但确实是合乎规律的。

应当指出，军事变革需要发达的经济作后盾。洋务派官僚虽然重视引进先进武器，建立近代军事工业，随后又兴办轮船招商局、织布局等民用企业，企图通过求富以实现求强，确立了经济是军事的基础的正确思想，但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加上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挥金如土，因而经济发展迟缓，经费拮据，科技落后，大大制约了军事的变革和发展。

（三）在“中体”与“西用”的矛盾中曲折地前进

清后期军事的发展变化，是在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下实现的。这一指导思想的本意，就是在保持封

建专制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前提下，吸取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其它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应当承认，这一指导思想，在学习和引进西方“长技”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可以用“中体”这一前提抵挡顽固派对引进西方技术的诋毁，减少来自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阻滞力，为学习西方“长技”开辟途径。但是，在封建主义躯体上嫁接西方先进的科技，终归是不协调的。它不仅会发生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与没落的封建制度之间尖锐的矛盾和对抗，而且对军事改革的深化起着明显的障碍作用。主要表现为：长期停留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浅层面，对属于“中体”范畴的较深层面的军队编制体制的改革，却抱着消极态度，虽然早已有了步兵、骑兵和炮兵，却长期停留在单一营制阶段。至于更深层次的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则更未引起重视，因而在战略战术方面抱残守缺，甚至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以有定制无定”等战法，对付拥有优势装备和先进战法的侵略军，成为在反侵略战争中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的相继失败，“西用”对“中体”的冲击日益尖锐，于是便有新军的出现和西方军事学术的传播。但是，无论是“新建陆军”还是全国统一编练的新军，仍然把封建宗法思想作为建军治军的根本。真正冲破这种思想禁锢，则是在20世纪初部分新军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之后。由上可见，“中体西用”这一指导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保守主义色彩，从总体上讲，其消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四）在与顽固派的论争中艰难地发展

晚清的军事，是在与泥古不化、“恶西学如仇”的封建顽固派的论争中艰难地向前发展的。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会受到顽固派的诋毁和阻挠。例如，当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顽固派则称西方的“长技”是“奇技淫巧”，不合乎中国的“圣人之道”。又如洋务派主张“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培养通晓外语和自然科学人才以求“自强”时，顽固派却认为只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便“足以制敌之命”。有的甚至称

轮船为“至拙之船”，洋枪为“至蠢之器”。再如，当洋务派倡议建造与军事关系密切的铁路时，顽固派便列举 25 条理由加以反对，其中有一条认为修造铁路会惊动山川之神、龙王之宫、河伯之宅，其愚昧落后令人惊奇！不仅如此，他们还诋毁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是“用夷变夏”、“祸国殃民”。顽固派的这些思想和言论，理所当然地遭到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的有力批判。魏源理直气壮地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不仅不应反对，而且要认真学习。洋务派则针对顽固派盲目自大和“祖宗之制”概不能变的思想，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只有顺应形势，“稍变成法”，才能自强御侮，否则“战守皆不足恃”。同时，对顽固派的许多具体错误论点进行了辩驳。诚然，由于顽固派的思想和主张并不有利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因而大多没有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纳，未能最终阻挡晚清军事的发展变化。但是，他们在当时毕竟是一股颇具影响的政治势力，致使军事变革常常受制，举步维艰，更增添了腐朽没落的悲剧色彩。

（五）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明显烙印

清后期军事的发展变化，几乎在每一领域都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印记。在军事工业方面，虽然用机器代替了手工操作，但因缺乏近代工业体系作基础，因而不仅机器购自外国，技术专家聘自外国，甚至原材料和零部件都仰赖进口。另一方面，却对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工厂实行封建衙门式的经营管理，严重束缚了生产的发展。在建军治军方面，虽然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和军事训练日趋近代化，但自从湘军开了“兵为将有”的先例以后，军队的封建依附关系愈演愈烈，并削弱了中央的兵权，形成了督抚专擅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和各自为政的局面。随着统治集团政治上日益腐败，武职官员的政治素质每况愈下，加上实行愚兵政策和封建家长制管理，严重挫伤了士兵的主动性和荣誉感，使人与武器不能很好结合，从而影响战斗力的提高。在作战方面，由于军队的私属性带来了派系林立，各分畛域，各保实力，互相观

望，严重影响集中统一指挥和协调一致地作战。史实表明，不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羁绊，不发展近代民族工业和科学技术，就不可能使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展翅高飞，阔步前进。

三

清后期进行了频繁的反侵略战争，无数爱国军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奋勇杀敌，英勇捐躯，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同时，在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方面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关于制定战略方针问题

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实践表明，只要战略方针切合客观实际，加上将士英勇作战和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等条件，一般都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清军所以能够顺利地收复新疆失地，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正确方针。中法战争后期，中国之所以在军事上取得最后胜利，与清廷实行的东南沿海防御、北圻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比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有着密切关系。与此相反，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廷在战略指导上忽而高喊“大张挞伐”，忽而强调“羁縻为上”，缺乏贯彻始终的正确方针，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廷把主要兵力用于镇压太平军、捻军，而对入侵之敌实行“总以息兵为要”的方针，时刻准备与侵略者议和，自然不可能鼓舞士气，战胜侵略者。

（二）关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问题

清后期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是防御性战争。历史证明，只有积极防御，才能有效地战胜敌人。可是，清廷缺乏坚定的抗战决心，在其保守思想影响下，竟把消极防御当作法宝。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帝强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实际上是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被动应战的消极防御。消极防御，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陆战方面，清军株守营垒城堡，消极拒敌，结果营垒城堡尽失，溃不成军。海战方面，实行“保船制敌”实质是保

船避战的方针，结果使苦心经营近20年的北洋海军遭到全军覆没的厄运。

（三）关于集中兵力和机动作战问题

集中优势兵力，是战胜敌人的一条重要原则。可是，清政府在反侵略战争中常犯分兵拒敌的错误。虽然清军在一些战区内拥有优势兵力，但因分散部署，形不成拳头，以致在不少战役战斗中失去兵力优势，甚至反而处于劣势，成为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清军不重视机动作战，不懂得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相反，往往实行浅纵深的阵地防御战，结果一旦阵地被敌突破，便全线溃退，丧失了反击能力。而中日甲午战争中，扼守摩天岭的清军聂士成部，一面“露宿以守”，一面“时出截杀”，主动绕击、伏击日军，终于以少胜多，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这一战例表明，把固守阵地与机动作战结合起来，是战胜敌军的有效战法。

（四）关于全民抗战问题

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人民群众自动拿起简陋的武器，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忱，使侵略者望而生畏。然而，清统治者非但不保护人民大众的抗战积极性，反而极力予以压制，甚至声称“患不在外而在内”，“攘外必先安内”，不敢把群众组织起来，执干戈以卫社稷，武有甚者，在反对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慈禧集团先则诱使“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盲目排外，后又杀机毕露，宣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予铲除不可”。于是成批义和团员在国内外敌人共同镇压下，倒于血泊之中，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彻底失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取得民族战争的胜利；否则，必败无疑。

四

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各族人民起义战争，使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最后却都以失败而告终。造成这种历史悲

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值得深思。

（一）关于起义武装的领导问题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便形成了一个以洪秀全为首的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实行集体决策，集中兵力作战。因而所向披靡，取得了攻克南京，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胜利。1856年天京内讧以后，早期形成的领导核心陷于崩溃，战争形势也随之逆转。后期，虽然重建了新的领导核心，但因分散主义日益抬头，已不可能像早期那样实施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终于败在指挥统一、行动一致的湘、淮军和雇佣军洋枪队之手。其他起义武装，大都是在各自的首领统率下，分散作战，互不统属，各自为政。有时虽互相协同配合作战，但缺乏组织上的保证，也难于发挥整体威力。起义武装的上述弱点，正好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二）关于起义武装的建设问题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即将起义群众编组成编制正规、纪律严明的“陆营”，稍后又组建正规的“土营”和“水营”。官兵之间“寝食必俱，情同骨肉”。正是依靠这支组织严密、上下同心、斗志旺盛的军队，将八旗、绿营打得溃不成军。后期，太平军的数量虽不断增加，但伴随领导集团逐渐向封建主义转化，军队的离心倾向日益抬头，编制日趋混乱，纪律日益废弛，官兵矛盾逐渐加剧，战斗力不断下降，因而在不少战役战斗中为兵力处于劣势的湘、淮军和洋枪队所败。其他起义武装，不仅武器窳劣，而且组织松散，有的甚至处于“居者为农，出者为兵”的半农半军状态。所以，只能与散处各地或临时拼凑而成的绿营交锋，而无法抵挡武器良好、组织严密的湘、淮军的进攻。

（三）关于战略决策问题

太平军离开广西后，于1852年在湖南道州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专意金陵”的战略决策，终于取得了进军长江流域，占武昌、克南京的重大胜利。而奠都天京（今南京）以后，由于对敌我形势估计错误，贸然作出了北伐与西征同时进行的冒险主义的战略决策，结果北伐军在清军围攻下全军覆没，西征军在经过严

重挫折后虽取得了一定胜利，但也付出了水营基本丧失的重大代价。后期，太平天国又多次出现战略失误，因而在战场上日益陷于被动。其他起义武装的失败，也无不与或冒险进攻或单纯防御等战略决策失误有关。

（四）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

太平天国前期建立的皖赣根据地以及后期开辟的苏浙根据地，对于维持天京政权和支援战争起了积极作用。滇西回民军建立了以大理为中心的根据地，多次粉碎了清军的“围剿”。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武装，依托险峻山区建立小块根据地，常使清军望山兴叹。大成国起义武装建立了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占领了大半个广西。但是，由于各支起义武装的领导者，未能提出充分发动和解放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的正确纲领，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有效地发挥战略基地的作用。捻军人多势众，善于进行“飘忽莫测”的流动作战，但忽视根据地的建设，因而虽然一再重创清军，却因没有固定的立足之地，部队得不到休整补充，以致难以坚持持久作战，成为最后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

军事史涵盖军事的各个方面，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一项内容极其广泛、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理顺各个侧面、各个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清主次，把握中心环节（亦即军事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才能纲举目张，构成比较完整、清晰的体系。清后期的军事史究竟以什么为中心环节，史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应以军队建设为中心环节，有的认为应以战争为中心环节，有的认为应以战争和军队建设为中心环节，有的认为应以军事技术为中心环节，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根据我们对清后期军事领域各个侧面的探索，认为编写这一时期的军事史，以战争为中心环节，比较顺理成章。因为如前所说，尽管以武器装备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技术是晚清军事发展的突破口，但无论是武器装备的改

善，军队编制体制的变革，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近代海军的组建，还是作战方式的改变，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无一不与战争特别是反侵略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并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不断发展变化。据此，本卷的框架，基本上以战争为主轴，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分别安排军事史的各个重要侧面，力求使这一时期军事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脉络。

另外，我们还对一些内容作了如下处理。其一，鉴于战略战术与战争的关系最为密切，是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将这一侧面融合在各次战争中予以体现，而不专门列章。这样，既能加深历次战争得失的探讨，又使战略战术问题不孤不空。其二，对于作为军事领域最高层次的军事思想，着重探讨各个阶段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这样处理，虽然面显得狭窄了一些，但却能比较集中地反映军事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与其它重要侧面的相互关系也比较协调。另外，本卷的下限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但为了使读者对孙中山、黄兴的军事思想有较完整的了解，在时间上稍有后延。其三，为了避免散乱，有些侧面，如海防边防建设、军事教育、兵书与军事刊物等，不按时序分散安排，而是单列专章，集中反映，使读者对此有一比较系统的了解。

清后期的历史虽然较短，但伴随社会急剧变化而发生的军事方面的变化异常迅速，范围也相当广泛，并有许多与其它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对尔后军事的发展颇有影响，且与现代接近，值得呕心探析，以资借鉴。本卷的出版，权充引玉之砖。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与中国

自满族贵族定鼎中原至19世纪30年代，清王朝虽然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但中国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炮舰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独立的封建的中国逐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史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艰难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中国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原因的。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列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概况

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和对外侵略扩张

作为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标志，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40年代，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领导了反对封建旧制度的起义，取得了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英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对内对外的剥削与掠夺，扩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实行了以蒸汽动力和机械操作代替手工操作为主要标志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30～40年代，各主要工业部门已普遍采用机器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

法国是西欧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早较充分的国家之一。到18

世纪，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封建制度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桎梏，终于在1789年至1794年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摧毁封建制度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这是一次比英国革命更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

美国在1783年取得了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的胜利，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以后，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独立初期，经济远比英、法落后，但由于摆脱了殖民枷锁，加上领土不断扩大，资源十分丰富，欧洲移民不断涌入，又从亚非各国掠夺大批劳动力，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日益加快，逐渐成为工业强国。

19世纪30年代，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荷兰、英国、法国、美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等欧美国家，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的广泛开展，带来了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纺织、冶金、采矿、机器制造等新兴工业的不断涌现，火车、轮船等先进交通工具的相继使用，使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创造了过去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迅速暴露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弊病。资产阶级从工业革命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广大工人却遭受残酷的剥削，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丧失了劳动的机会，落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劳资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于是，资产阶级除了对内继续吮吸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血汗外，采取对外扩张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殖民地，开辟新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借以摆脱经济危机，追求贪得无厌的利润。这样，就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使古老落后的国家先后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漩涡之中。

英、法、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取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殖民主义国家，对非洲、拉丁美洲进行疯狂的掠夺，使一系列国家成了它们的殖民地。同时，把侵略魔爪伸向亚洲各地。早

在 17 世纪，英、法殖民者就在印度沿海地区建立侵略据点。后来英国排挤了法国，并加紧向印度内地鲸吞蚕食。到 19 世纪 40 年代，整个印度实际上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成为英国向东方侵略扩张的主要基地。在印度沦为殖民地的过程中，与中国毗邻的一些国家，也先后遭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威胁。在所有的侵略活动中，英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自 1816 年至 1835 年，尼泊尔、锡金、不丹，或者被英国吞并，或者受英国控制。1824 年英国武装入侵缅甸，逼使其割地、赔款、通商。同年，又侵占了新加坡。1835 年，英国迫使暹罗（今泰国）与其签订了通商条约。1839 年，又发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法国也不甘落后，它于 18 世纪 80 年代，通过帮助越南南方的阮福映政权镇压西山农民起义，乘机渗入越南，攫取特权。这样，中国的一些邻近地区和周边国家，有的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的正在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

至于地大物博的中国，则早已成为新老殖民主义者觊觎的重要对象。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更是垂涎欲滴，并早已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1793 年和 1816 年（清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年），英国先后派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为大使，到北京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提出允许英国官员驻北京，开辟天津、浙江为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1832 年（清道光十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密令大鸦片商胡夏米乘“阿美士德”号间谍船自广州北驶，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半岛、山海关等地，对中国沿海进行历时半年的带战略性的侦察航行，详细探测了港湾、水道和季风规律，实地侦察了各地驻军和炮台的数量和质量。1835 年 7 月，胡夏米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以制服清王朝。他还对舰队的编成、兵力数量、集结海域和行动季节等提出了具体建议。1838 年 7 月，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遵照英国政府的旨意，率领军舰 3 艘，窜到珠江口，再次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和侦察活动。英国之准备武力入侵中国，已昭然若揭。

二、清王朝的衰落和闭关锁国政策

清朝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王朝。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危机逐渐加深，清王朝的统治由强转弱，逐渐走下坡路，进入封建社会的末世。这种社会危机突出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土地兼并不断加剧。清朝统治者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初期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明末清初陷于崩溃的社会经济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增长。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和支配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不仅如此，进入18世纪以后，土地兼并活动又呈加剧趋势，愈来愈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数王公贵族、权臣新贵、豪绅地主和富商巨贾的手里，广大农民有的只有很少的土地，有的完全丧失了土地，成为佃农和雇农，承受苛重的地租剥削，或出卖劳动力为生。这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加上人口增长很快（从1741年至1834年全国人口由1.4亿增至4.1亿），耕地面积却增加很少，水旱等自然灾害又连年不断，以致粮棉生产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涨。这样，就使劳动人民进一步陷入少衣缺食、挨饿受冻的困境，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败。这种腐败首先表现在皇室的骄奢淫逸之风日盛一日。每遇皇帝出巡和皇室婚、丧、寿庆，都大讲排场，挥金如土。此外，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囿，劳民伤财。不仅皇室如此，文武百官也过着穷奢极欲、纸醉金迷的生活。伴随奢侈糜费而产生的另一弊病，就是整个官场贪污勒索、贿赂公行之风盛行。有句民谚说：“贪不贪一任州官，雪花银子三万三。”这是对官场贪污腐败情形的生动写照。由于大小官僚热衷于敛财纳贿，贪恋禄位，以致政治上苟且偷安，墨守成规，各项政务日

形废弛。嘉庆年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大小官员无不“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适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① 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官吏的腐败对国家的严重危害。道光朝时，有人写词讽刺说：“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毋庸，驳也毋庸。”② 鸦片战争前夕，福建著名诗人张际亮在给鸿胪寺卿黄爵滋的信中指出：“今之外吏岂惟讳盗而已哉，其贪以浚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舞文玩法以欺朝廷之耳目，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状。”③ 由这样一批尸位素餐、庸碌贪婪的官吏当政，怎能励精图治、卫国安民！

阶级矛盾日趋尖锐。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封建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阶级矛盾也就日趋尖锐，以致 18 世纪下半期至 19 世纪初，全国由边远地区到中原腹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从 1796 年（嘉庆元年）起，爆发了历时 9 年，遍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 5 省的白莲教起义。时隔 9 年，山东、河南、直隶又爆发了天理会起义，部分起义武装潜入京都，攻打皇宫，使北京城陷于一片混乱。1832 年（道光十二年），湖南、广东又发生了瑶民起义。1835 年，接连发生了山东赵城人民起义、湖南武冈瑶民起义、四川凉山彝民起义和贵州谢法真领导的起义。这些规模不等的起义，既具有反抗阶级剥削又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 1986 年版（下同），第 37 册，总第 11309 页。

② 转引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二册，第 377 页。

③ 张际亮：《答黄树斋鸿胪书》，见《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6 页。

特点，标志着社会危机的深刻化。这些起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大大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加速了它的衰亡。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促使清政府进一步采取“安内重于攘外”的政策，对于迫在眉睫的外敌入侵未予重视，最终陷入“内外交困”而又无法解脱的窘境。

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清王朝由盛变衰，除上述诸因外，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政府所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害怕国内反清势力与采取武力掠夺手段的外国殖民者结合，危及其统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则是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封建统治者滋生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乾隆帝在给英王的书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① 正是这种心态的生动写照。他们企图闭上国门，用与世隔绝的办法维持“天朝上国”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衰落，束缚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阻碍了对日新月异地变化着的外国情况的了解和对世界先进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学习。它不仅不能给中国带来进步和发展，防止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相反，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等方面拉大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最终被动挨打，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后患。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军事概况

一、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

西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对内镇压封建复辟势力，对

①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卷1435，第185页。

外争夺殖民统治，经历了频繁的战争，并随着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军队的武器装备以至编制体制、作战方式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改善，从而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一）火器取代了冷兵器

中国的火药与火器制造技术在 14 世纪传入欧洲以后，至 17 世纪 30 年代，欧洲开始进入火器时代。此后，不少国家注意对炮身、炮架、牵引工具和炮弹的研究和改进，推动了火炮的发展。至 19 世纪初，欧洲各国已能用生铁和铜铸造各种滑膛前装火炮，并依其口径与炮管长度之比例和性能特征，区分为加农炮、榴弹炮和臼炮；炮身重量从几百斤、几千斤直至万余斤；口径从几英寸到十余英寸；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燃烧弹，弹重从几磅到几十磅，野战炮一般发射 6 磅至 12 磅炮弹。火炮有效射程一般约 1000～2000米，每分钟可发射 2 至 3 发炮弹。随着炮车的不断改进，火炮的机动性也大大增强。当时，英国军队主要装备榴弹炮和加农炮，另有少量臼炮。法国军队装备了新式的轻型 12 磅加农炮。俄军则主要装备 6 至 8 磅的野战炮。从此，火炮便成为欧洲各国作战的重要武器。如法、俄两国在 1812 年的博罗迪诺会战中，法军投入 587 门火炮，俄军集中了 640 门火炮。到 19 世纪中叶，滑膛炮开始被线膛炮所代替，球形实心弹开始被榴弹和霰弹所代替，火炮的技术性能又一次得到较大改进，使用也就更加普遍。

西欧国家对步枪构造的改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先后由火绳枪发展为燧发枪。1818 年，英国研制成含雷汞击发药的火帽，用于步枪的发射装置，使击发枪机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后，欧洲步枪的发射装置又有较大的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在 1835 年研制成用击针打击点火药，引燃火药，发射弹头的机柄式步枪，亦称击针枪。它明显地提高了射速，使射手能以任何姿势（卧、跪或行进中）进行装弹射击，因而更便于实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所使用的博克式步枪，就是这种类型的击发枪，其最大射程为 220 米，每分钟可发射 2 至 3 发子弹。另外，还有少量布仑斯威克式击发枪，不怕风雨，击发灵便。

（二）军兵种建设趋向正规化近代化

随着枪炮等火器的日益改进，欧洲军队的军兵种建设也日趋正规化近代化。鸦片战争前，除英国外，其它欧洲国家已普遍实行征兵制，服役期限多数为 3 至 6 年，也有 1 至 2 年的，只有俄国长达 15 年至 25 年。有些国家还实行预备役制度，以便平时养兵较少，战时又有足够的兵员。此外，英法等国还招募外籍雇佣兵。平时，大多数国家陆军的最高编制为团，下属营、连两级。步兵一般以营为战术单位，骑兵一般以连为战术单位。战时，则有军、师、旅的合成军建制。当时，英国约有陆军 14 万，连同用于内卫的国民军，共约 20 万，已成为一支初具规模的多兵种合成的近代化军队。在编制方面，步兵团辖 3 个营，营辖 10 个连，每连有士兵 90 至 120 人。炮兵团辖 12 个营，每营辖 8 个连，每连有火炮 6 门。骑炮旅辖 7 个炮兵连、1 个火箭连。骑兵团辖 4 个连，每连有士兵 250 人（战时编制）。法国系欧洲拥有军队最多的国家之一，常备陆军经常保持在 50 万以上。步兵有 100 个基干团（其中 25 个轻步兵团），每团辖 3 个营，每营 8 个野战连（1 个掷弹兵连、1 个轻骑兵连、6 个基干连）。另有 10 个猎兵营（每营 10 个连）和专门在非洲服役的 21 个营。骑兵有重骑兵（即预备队骑兵）12 个团，基干骑兵 20 个团，轻骑兵 21 个团，和驻非洲的轻骑兵 7 个团。每团 6 个连，每连 190 人（轻骑兵连 200 人）。炮兵有专门用于攻城的步炮团、战时编入步兵师的基干团、骑炮团和架桥团，每个炮团 12 个连，每连火炮 6 门。法国军官大多受过良好的训练，具有较丰富的带兵练兵经验，是欧洲军队中的佼佼者。特别是 19 世纪初，法皇拿破仑一世着意改革军事指挥体制，改进师的编制，并把步兵、骑兵、炮兵合编到师与军的建制之中，发挥协同作战的威力。同时，改进补给制度，使军队更便于机动作战。这些改进，对法国军队以至整个欧洲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适应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加强海军的建设，其中以英国最快，法国次之。自 1807 年美国发明第一艘

用蒸汽作动力的客轮以后，英国于1811年便仿制成功，1830年又制成第一艘铁质明轮蒸汽船。这种船只受风向和水的流向影响较小，加快了航速，增强了机动性。但因蒸汽机体积庞大，机器和燃烧用煤占很大的面积和重量，以致装载火炮的数量受到限制，加以机器和划水轮都暴露在外，战时易遭敌方炮火摧毁。因此，19世纪40年代前后，蒸汽船一般用于巡航、侦察、通信和短途运输。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战列舰依然依靠帆力。即使如此，也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战舰。其船帮由表里两层组成，外包铁皮，内衬木板，底亦双层，故有夹板船之称。其排水量，大者上千吨，小者数百吨。大型舰长108米，可载六七百人；有两至三层甲板，分别装备80到120门火炮，发射32磅炮弹；舰首舰尾装有可发射56磅和68磅实心弹的加农炮，或装有可发射爆炸弹的大口径臼炮，有效射程约1000米～2000米，具有相当大的摧毁力和杀伤力。中型舰装备50～78门火炮，小型舰装备22～34门火炮，最小的装备10～22门火炮。火炮射速一般已达每分钟1～2发。大、中、小各型舰船及其火炮，可以在不同距离发扬火力优势，并互相支援作战。此外，还装设了先进的罗经导航，运用望远镜观察。1836年，英国拥有大小舰艇560艘，总吨位约50万吨，居欧洲第一位。这时，法国军舰的技术水平和战斗性能与英国军舰大致相同，其最大的战舰装有131门火炮，但舰艇数量少于英国，1815年拥有大小战舰158艘，至19世纪30年代仍无大的发展。俄国的海军编有波罗的海和黑海两个舰队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里海、堪察加三个分舰队，其实力仅次于英、法，居世界第三位。美国的海军建设较晚，但发展的速度较快，其大型巡航舰的性能优于其它国家同类型的军舰。

（三）作战方式不断适应战争的需要

资产阶级革命不仅为军队提供了新的技术装备，促进了编制体制的变化，而且为作战方式的变革创造了条件，使之更适应战争的需要。这种变革，突出地反映在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战争中。拿破仑利用由广大农民参加的人数众多、装

备良好和具有灵活性、机动性的军队，创造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法。他强调进攻，并把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放在首位。他善于集中优势兵力兵器于主要作战方向，以便各个击破敌人，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他还善于迅速地机动部队，出其不意地攻击敌方的翼侧和后方，收到奇袭的效果。他不仅重视步、骑、炮兵的协同作战，而且吸取了美国独立战争中散兵战的经验，采用了以纵队为基础，使散兵线与纵队相结合的队形，以第一线的散兵和第二线保持纵队的各营，向敌人纵深很浅的横队攻击，通常能取得良好的战果。上述新的作战方法，在 1813 年以后为欧洲各国普遍采用，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许多国家奉为经典。

英国在相继击败和削弱了西班牙、荷兰、法国和丹麦的舰队以后，便跃居世界头号海军大国的地位，掌握了世界主要海域的制海权。在长期的海战中，英国海军不仅形成了一套适应帆力舰时代的作战方法，而且积累了掠夺海外殖民地战争的经验。它首先用炮舰轰开被侵略国家的某些重要通商口岸，建立军事和贸易据点，然后逐渐向内地渗透。在抢占对方设防的口岸时，往往集中优势舰炮轰击对方的炮台和防御工事，压制岸炮火力，掩护陆战队登陆，从正面和翼侧发动进攻，占领对方的炮台，进而攻取沿海、沿江城市，在海陆协同的登陆作战方面，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战例。

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凭借武器先进、组织良好和富有实战经验的军队，到处横冲直撞，打开了一个又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大门，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条件。

二、日益衰败的封建中国的军事

与资本主义列强相反，清朝在军事方面，随着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而日趋衰落。

清王朝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在鸦片战争前，约有 80 万（其

中八旗约 20 万，绿营 60 万），数量上多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但是，军队的素质每况愈下，无法与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相比。1796～1804 年（嘉庆元年至九年），清政府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消耗白银 2 亿两，但军队畏缩不前，无法对付起义武装，不得不依靠罗思举等统率的随征乡勇（俗称“官勇”）①，代替正规军冲锋陷阵。清军的腐败和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军制十分落后

清军的军制相当落后，弊病甚多，突出反映在下列三个方面。

1、体制不统一，地位不平等，指挥不协调

清王朝为了维护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将“开国”之军八旗兵“恃为长城”，一半以上担负警卫宫阙、拱卫京城任务，其余则集中驻防于全国各战略要地，以便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同时监视绿营兵。八旗兵之在京都者由亲王统驭，在外地者由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满、蒙族将军统驭，即使负责全国军事的兵部也无权指挥调动。这样，不仅人为地造成八旗与绿营之间的矛盾，而且严重影响军队的集中统一指挥。

清政府在民族歧视思想支配下，对于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奉行既依赖又防范的方针。为了对它实行有效的控制，采取“以文制武”、“化整为散”的政策。“以文制武”，即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总督有统率所辖省区绿营之权（不设总督的地区由巡抚兼任提督），为各省区绿营的最高统帅。武职官员提督、总兵有管辖各省区绿营之权，却受督、抚节制监督，遇有战事，无调动部队之权。而督、抚又受制于中央，有关军事问题须经兵部审核，由皇帝降旨，方能施行。“化整为散”，即除由督、抚、提、镇直接统辖的亲兵（多者四五营、少者二三营）相对集中驻防外，其他则分成许多营、汛，散驻各地，以便镇慑地方，同时达到“强干弱枝”之目的，避免尾大不掉之患。此外，绿营“兵皆土籍”、“将皆升转”，将领调离时，士兵不得随将领行动。实行这些政策，固然有

① 当时的“官勇”，粮饷由公家供给，作战时归八旗、绿营将领指挥。

利于集兵权于中央，但是一旦遇有战事，只好东抽西调，零星拼凑成军，临时指派统将，不但迁延时日，而且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兵不相通，很难成为组织严密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加上指挥系统重床叠架，互相掣肘，以致往往贻误战机，并很难彼此相顾、协力作战。

2、实行极不合理的俸饷制度

八旗与绿营，不仅政治上不一视同仁，经济上也厚彼薄此。按清廷规定的粮饷制度，八旗武官的正俸银比同一级的绿营武官高出1～4倍。此外，还有相当可观的俸米、旗地和高于正俸银几倍、几十倍的“养廉”银以及皇帝临时发给的赏银。而绿营武官除正俸和“养廉”银外，一般很少特殊照顾。以赏银为例，除地处烟瘴的云南提督、总兵和孤悬巨浸、远隔重洋的台湾总兵，每年分别给予赏银500两和300两外，其它各省的提督、总兵则无此例。士兵待遇的差别也很大。八旗士兵平时的月饷银平均达5～7两。此外还有世袭土地，多者几十亩，少者十几亩。而绿营士兵平时的饷银，马兵月支2两、战兵月支1.5两、守兵月支1两，另各给米3斗，除各种惯例扣除和将弁的非法侵吞外，实际收入更少。绿营士兵由于俸饷过低，加上嘉庆、道光年间米价大幅度上涨，每石“丰岁二两，俭岁三两，荒岁四两”，根本无法养家糊口，所以只得混迹市肆，或充小贩，或作手艺，以补家用，名充行伍，实等市佣。加之绿营实行世兵制，父兄在伍，子弟充当“余丁”，遇有缺额，先从余丁中挑补。因余丁可支5钱月饷，故多以幼小羸弱者挂余丁之名，壮健者另谋生计。这样世代相承，便形成老弱残兵充斥营伍。战时，绿营虽另有“出征赏银”、“出征借银”、“月支盐菜银”、“日支口粮”等俸饷则例，而且开支巨大，但并不能有效地改变由于平时的低薪制所造成的部队素质低下的状况。此外，无论八旗还是绿营，官兵之间的薪饷差距也过大。以绿营为例，最高级军官提督与守兵之间的薪饷相差约217倍，最下级军官把总与守兵之间的薪饷相差为4倍多。这种俸饷制度，不仅人为地制造了两种军队之间的矛盾，而且制造了官兵之间的矛盾，

不利于军队内部的团结和战斗力的提高。

3、沾沾自喜于“以弧矢定天下”，忽视武器装备的改进

长期以来，清军都装备着弓矢、矛戟、刀斧、椎梃、蒙盾等冷兵器，和旧式的鸟枪、抬枪以及少量火炮，直至鸦片战争时，仍然是冷热兵器并用，技术上亦无改进。

清政府虽然在满、蒙八旗兵中成立了配有火炮的火器营（汉八旗只有40人的炮队），但始终以弓箭、腰刀、长枪、盾牌等冷兵器为主。绿营兵所配的鸟枪和抬枪，一般只占3～5成，少数边远省份约5～6成；火炮平均每1000人10门（主要是轻型炮），后又下令除沿海、沿边、城池要隘以及水师战船的火炮原封不动外，其他戍地的火炮一律撤回，存于督、抚、提、镇驻地的库内，待有战事时临时酌发。绿营兵的冷热兵器分别按队编配。如在广东，一个1000人的营，分成20队，其中马上弓箭手4队，马下弓箭手2队，鸟枪手10队，炮手1队，藤牌手1队，大刀手1队，长矛手1队。鸦片战争前夕，虽又出现重视热兵器的倾向，强调“军储利器，枪炮为先，全在提炼硝磺，精造火药，方能致远摧坚”①。绿营陆师冷热兵器的编配比例，由弓箭刀矛6成、鸟枪抬枪4成改为鸟枪抬枪6成、弓箭刀矛4成，但也只是微小的变化，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西方国家的军队相比。

清军的武器装备落后，除了思想保守外，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近代工业。首先，手工开采的铜、铁、硫、硝等矿业，不是日益发展，而是不断萎缩。其次，用手工制造的枪、炮和火药，一般都存在工艺粗糙，质量低劣的问题。例如火药的研制，因缺乏科学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很难达到最佳效能。又如手工制造鸟枪，一个工匠需30个工作日才能造出一杆枪，其有效射程只有100米左右，而且射速慢、精度差。手工制造的重炮，不仅射程短，而且装填、瞄准费时费力，还极易发生膛炸。至于后装炮，因后膛闭锁问题难以解决，加之威力不大，故没有装备部队。此外，无论

① 《清宣宗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卷290，第10～11页。

鸟枪还是火炮，种类繁多，形制不一，给使用带来极大不便。

清军军制方面的这些弊病，成了提高官兵素质、协调部队内部关系、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和加强战斗力的严重障碍。

（二）军备日趋废弛

鸦片战争前，清军的军备废弛已发展到令人震惊和难以容忍的程度。以征服者自居和养尊处优的特殊环境，使昔日剽悍骁勇的八旗兵很快变得骄横懒散，放荡不羁，游手好闲，惹事生非，徒有其表而不能征战的老爷兵。绿营兵则因“承平日久”，其营伍也日益废弛，战斗力不断下降，同样成为“虚设”之兵。

军备之所以日益废弛，首先，与政治上的腐败直接相关。虽然规定督、抚对所属部队有巡阅制度，但往往是虚应故事，敷衍塞责，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至于提督、总兵等武职大员，因权力受到种种限制，影响治军的积极性；加上耽于安乐，害怕艰苦，以致对军营事务放任不管。更有甚者，有的冒领缺额粮饷，侵吞修船造船公款，贪污自肥；有的勾结烟贩，私运鸦片，牟取暴利；有的暗设赌场娼馆，坐地分赃。遇有军事行动，则公开向地方勒索馈赠，强拉夫役车辆，扰害百姓。甚至劫掠商船，杀害良民，冒功领赏。统兵大员治军不严，本身腐化堕落，必然影响整个部队，久而久之，兵营中聚众赌博，酗酒挟妓，偷窃财物等恶习渐滋蔓生。特别是嘉庆朝以后，鸦片流毒全国，八旗、绿营官兵吸食鸦片已成为普遍现象，不少人成了鸠形鹄面的病夫。这样，就使整个部队陷入瘫痪状态。1835 年（道光十五年），监察御史常大淳奏称：“新疆、湖南、广东、四川各营伍，日久生玩，满营则奢靡自逸，汉营则粮额多虚。由于拔补之循私，操演之不实，以国家养兵之资，为众人雇役之用。请饬将军、督、抚，力除积习。遇剿匪保案，不得冒滥，以励戎行。”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营伍废弛情况和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

其次，部队训练有名无实。原来，八旗、绿营都有严格的训

---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 14 册，总第 4126 页。

练制度。如规定八旗兵每月习骑射、步射 6 次，春秋两季进行分合操练，于芦沟桥合演枪炮，皇帝亲临检阅，赏罚严明。绿营兵则定有钦差大臣和督、抚、提、镇检阅营伍制度，督促检查部队的训练。但至嘉庆以后，这些制度逐渐废弛，甚至根本不抓训练。究其原因，除了统兵大员玩忽职守外，八旗兵因懒散成性而厌恶训练，偶尔为之，也要乘车骑马出城，连路都不愿走。绿营兵则因差操不分而影响训练。由于绿营兵平时除了巡山、巡海外，还执行解送、守护、察奸、缉私、承催等本应由巡警和衙役承担的繁杂任务，终日东奔西走，加之因饷薄而不得不兼以小贩、手艺谋生，因而无暇也无心操练，以致产生了只知有差不知有操的观念。不仅如此，在执行差役过程中，还沾染了油滑取巧、钻营偷懒等恶习，丧失了作为战士应该具备的朴实坚忍、英勇果敢的性格，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当然，为了应付上司检阅，也抽些部队搞点训练，但偏重于操演冷兵器时代的两仪、四象、方圆、九进连环等阵式，搞近于演戏的花架子。由于不抓训练，武器的丢失锈蚀现象也十分严重。1835 年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亲临中、右两营军火局检查军装、甲械、弹药，发现贮存的生铁炮子均已锈蚀，全有孔眼。此外，有的弁兵还将官马变卖，盔甲典当，已毫无战备观念可言。

至于作战方法，陆上作战，往往采取“进步连环之法”，即重火器在前，次为轻火器，再次为冷兵器。交战中，距敌较远时先用火炮轰击，待敌稍近时施放抬枪，再近施放鸟枪，“三击不中，火器左右旋于后”，继以冷兵器肉搏拼杀。如敌大队继至，牌、枪不能敌，则分退于火器之后，再次施放火炮、火枪。这种战法，既不能使冷热兵器互相掩护，同时发挥作用，而且队形密集，机动困难，极易遭受敌人的火力杀伤，因而很不适应与全部装备火器的欧洲军队作战。水上作战，距离远时，先用炮轰击；稍近时，用鸟枪射击，或爬上桅杆用喷筒喷射火焰；两船靠近时，用火球、火罐等焚敌船舱，烧灼敌军，同时手持刀矛跳上敌船与敌拼杀。这种战法，只能对付武装海盗船只，而无法与船大体坚、火炮多、射

程远、威力大的侵略军战船较量。

对于训练有名无实、战法不适应实战需要等情况，清廷也有所察觉。1804 年，嘉庆帝在谕批中指出："今绿营积习，于一切技艺率以身法架式为先，弓力软弱取其拽满适观，而放枪时装药下子任意迟缓，中者十无一二，即阵式杂技亦不过炫耀观瞻，于讲武毫无实效。"① 他命令官兵习射以六力弓为度，习枪以迅速命中为度，力挽积习，不得因循玩忽。道光帝也严饬督、抚、提、镇激发天良，公勤奋勉，实力操防，一洗从前恶习。无奈，部队已经积重难返，绝非几道谕旨所能奏效。长期不讲求训练所造成的将不知分合奇正，兵不知起伏进退，陆则不能击刺、不善骑马，水则不习驾驶、不熟枪炮的状况，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三）海防异常薄弱

除军队建设外，清政府在设防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在设防指导思想上表现为防内重于防外。这一指导思想，既贯彻在边防建设方面，也贯彻在海防建设方面。

清军水师是一个附属于八旗、绿营的专业兵种，有内河、外海之分。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濒海各省均设有外海水师，但规定"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②。这一重内轻外的规定，极大地影响了水师的建设。

首先，对于战船与火炮的制造，不是考虑如何有效地对付入侵之敌，而是着重考虑利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盗船。乾、嘉年间，鉴于外海水师船只体积大，行驶不快，先后谕令把船身改小，仿照商船式样改制，结果导致水师"仅能就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出"。鸦片战争前，福建外海水师战船以同安梭船为主，最大的集字号配备重量不超过 2000 斤的火炮 8 门，炮位均安在舱面，炮手无所遮蔽，易受火力杀伤。广东外海水师有少量被称为"体势壮

---

① 《中枢政考》卷 20。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 14 册，总第 3981 页。

阔，安炮最多，屹立江中，俨若炮台”的红单船①，其实长仅10丈余，宽2丈左右，只载官兵80人，配备数百斤至1000斤火炮20～30门。另一种可勉强在外洋作战的大号米艇，每船设官兵65名，配置近千斤至二三千斤火炮12门，另有火箭、喷筒、火罐等火器。但这种米艇，全省只有51艘，堪用者仅2/3。由上可见，中国的水师战船较之英国、法国的海军舰艇，其船体结构、吨位、载炮数量以及火炮性能，都是无法比拟的。

其次，海防兵力少而分散，素质甚差；海口炮台以及防御工事的构筑，也不予重视，不仅数量少，而且十分简陋。

东北濒海地区，只在旅顺设水师一营，额兵约500人。直隶省的大沽系屏障津、京的重要海口，可是水师建制时设时撤。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大沽海口仅有守兵约800名，旧设炮台两座，距水较远，原存炮位大半生锈，不堪使用。山东有水师3营，额兵1300余名，分防胶州、成山头、登州等处汛地。配有赶缯船和红头船共14艘，但“赶缯船则船头过高，红头船则无桨橹，海面均不适用”。② 出洋巡哨，尚需另雇商船。海口炮台13座，均为砖石结构，有的已经塌废。江南水师，分外海、内河两支，设水师提督。其中外海水师有战船150多只，不少已破废不能使用，水师官兵共6894名，除防汛者外，仅有2900余名能遂行机动作战任务。海口所设的炮，除两门重4000斤外，其余均为3000余斤以下小炮。在长江与黄浦江汇合处的吴淞口，虽筑有东、西炮台，但孤立暴露。浙江沿海有水师12营，战船约300只，但单薄难御风浪，且分散在濒海6府。扼江、浙、闽、粤四省海上通道的舟山

---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下同），总第9776页。此类船原系航行外海的大商船，由海关发给牌照（红单），故名红单船。

② 丁宝桢：《整顿山东水师购造船炮折》，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下同），（二），第290页。

岛，设有总兵，下辖3营共2600余人，有艇船5艘、同安船42艘、钓船30艘，辖有陆路汛地数十处，内海、外海汛地数十处，兵力十分分散。水师的训练很不严格，“名曰水师，实皆不谙水性，每届水操，辄将战船抛锚泊定，然后在船演放枪炮，与陆路无异；按季巡洋，则虚应故事，并不前往”①。定海县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仅筑小炮台4座，未能依托山险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位于甬江入海口的镇海县系浙东重镇，但对夹江对峙的金鸡山、招宝山的设防却十分薄弱，仅在招宝山上构筑炮台一座。

1830年（道光十年）以后，英国政府不断派遣武装走私船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活动，保护鸦片走私，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特别是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以“英王使节”身份要求面见两广总督卢坤，遭到拒绝后，便命英舰两艘强行闯入虎门，进行武力威胁。清廷大为震惊，决定加强东南沿海战备。为此，福建成为重点设防省份之一，但实际上并未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当时，该省设有水师提督，约有官兵2.7万人，辖31营，战船270只，配置在绵延2500余里的海岸线上以及各较大岛屿。重要海口厦门，在北岸之白石头、安海、水操台以及屏蔽海口的鼓浪屿，均筑有炮台，安设旧式火炮，但东西两侧的青屿、浯屿、小担、大担等处均未设立炮台。所有海口“旧设炮台，大者不过周围十余丈，安炮不过四位六位，重不过千斤”②。

相对而言，广东的海防建设比其它沿海各省搞得好些。该省额设外海水师2万人，分中东西三路设防，中路以虎门为重点。自律劳卑事件发生后，道光帝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到任后，立即着手加强虎门要塞的设防。他鉴于虎门的第一道门户沙

① 裕谦：《定海等处形势并筹防守事宜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下同），（二），第912～913页。

② 祁寯藻等：《议设炮墩控制英船及奸民贩烟船只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91页。

角山和大角山之间水域宽阔，火炮形不成交叉火力，故将两山的炮台改为担负瞭望警戒任务的信号炮台，着重加强山峰雄峙、江面狭窄的第二道门户上下横档与南山（亦称武山）之间的设防：于南山的威远、镇远炮台之间增筑靖远炮台，上横档岛西端添筑永安炮台。并建议于南山和横档、饭箩排之间添设由木排承托的大铁链两条，用以拦截乘风直驶的敌舰，便于炮台火炮轮番轰击。另外，在横档以西的南沙山（亦称芦湾山）添筑巩固炮台，并在水中抛石钉桩，不使敌船从此绕越。对第三道门户的大虎山炮台也进行了加固，添设了炮位，在暗沙之上抛石下桩，不让敌船顺利行驶。他还添铸了6000～8000斤的火炮，安设于威远、镇远、靖远等炮台。在炮台的构筑方面也作了某些改进。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炮台由6座增至9座，火炮由153门增至234门，守台兵由280名增至380名，虎门要塞的设防得到了加强。

与此同时，关天培还着手整顿广东水师，撤换了一批不称职的军官，制订了明细的训练章程，抓紧部队训练。他要求炮台守兵每天在潮汐涨落时各操练一次，做到手熟眼准；要求鸟枪兵学会站、跪、卧三种姿势射击，弓箭兵能拉大力硬弓，无论枪箭，都力求命中目标。对于担任巡洋任务的水师官兵，通过分批轮训办法，使“兵技渐就精强”。还规定每年2月、8月进行近似实战的水陆合练，检验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关天培对于加强广州的设防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夷人情形尚难深悉”，因而针对性不强。其设防部署，基本上从防御少量敌舰出发，没有考虑到如何对付大规模的入侵。炮台的构筑仍未脱离古代裸露式的结构，高台长墙，既无顶盖防护，又无壕沟及掩体工事，极易被敌方炮火摧塌，守备人员也易遭敌火力杀伤。步枪和火炮的技术性能基本上没什么改进。水师的训练也不尽切合实战要求。此外，清廷规定，外国护货兵船可以直达沙角，只是不许擅入口门。这也给防御作战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当时，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主编的《中国文库》（又称

《澳门月报》）对广州的设防作了这样的描述：中国人对于武器、防御设施的改进是深闭固拒的，“在广州河岸的炮台上可以见到的大炮，耶稣会教士（指汤若望、南怀仁等——编者注）所铸的铜炮可算是最好的，……。此外，许多大炮是葡萄牙或荷兰造的，各个时代、各种长度、各种形式、各种口径都有；其中不少已陈旧不堪，百孔千疮，以致无用。名符其实的海军大炮一门也没有，安装在帆船上的是野战炮或攻城炮……。土炮是铸造的，而且我们相信一般是铁的，其炮膛不似欧洲大炮那样钻得平滑；炮架只是一种木架或坚硬固定的炮床，上面用藤把炮绑住，此炮只能直射，极难对准任何目标，除非目标紧靠着炮眼面前。虎门周围的炮台就是安装着这种光怪陆离的大炮。”“河岸上的炮都是裸露的，没有一个能够抵挡得住一只大炮舰的火力，或可以抵御在岸上与炮舰配合的突击队的袭击。”“中国的战船一般只有大炮 2 至 4 门，都安装在一个固定的炮床上……除非在平静的海面上，否则就全无用处。”“中国的火绳枪是制作粗劣的武器，子弹多是铁的。他们不知道有刺刀这种武器，燧火枪、卡宾枪、手枪和其它的火器都不用。”① 这些记载虽有不实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军武器装备低劣和海防建设落后的面貌。

以上情况表明，一方是政治、经济、军事迅速发展和侵略扩张野心日益膨胀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另一方是政治、经济、军事日益衰败和对于外国侵略缺乏准备的封建的中国，1840 年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显然，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异常严峻的考验。

---

①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66～80 页。

第二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1842 年，英国政府为了破坏中国查禁鸦片，对中国实行殖民掠夺而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通称鸦片战争，也称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英国以中国查禁鸦片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

一、广州严禁输入鸦片，英国决定武装侵华

早在 16 世纪 50 年代，就有借居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开始只作为治病的药物，后来一些人嗜吸成瘾，成了伤身耗财的麻醉性毒品，需要量也与日俱增。至 18 世纪 70 年代，输入的鸦片已从最初的 200 箱增至 1000 箱。①1773 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鸦片贸易的垄断权，便逐步取代葡萄牙将在印度生产的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至 19 世纪初，每年输入额平均 4000 多箱。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鸦片输出，不仅改变了对华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不利地位，而且获得了巨额利润。以 1817 年（嘉庆二十二年）为例，每箱公班土② 在印度的卖价为 1785 卢比，而在中国的卖价为 2613 卢比，差额为 828 卢比，折合银洋 400 余

---

① 每箱鸦片为一担，约 100～120 斤。

② 公班土为鸦片烟的一种名称，当时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品种有公班土、白皮土、金花土三种，因产地不同而得名。

元。一段时期内，“在印度的不列颠当局的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①。1834年（道光十四年），英国政府废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和管理权，英国私人企业的商船纷纷涌向中国，鸦片的输出量也就惊人地增长，其中输出量最高的1838～1839年度为3.55万箱。鸦片战争前10年共向中国输出鸦片23.8万箱，约值白银1.1亿两。鸦片贩子为了牟取暴利，除贿买清朝文武官员、勾结私贩外，还在船上配备轻重武器进行武装走私，贩卖的范围从广州的伶仃洋扩展到华南沿海各地。清政府虽三令五申，严行查禁，却无法扭转鸦片大量输入、吸食者日多的局面。

猖狂的鸦片走私，使英国政府从中获得高额收益。英印政府把在华贩卖鸦片所得现金购买茶叶去英国出售，英政府征收茶税，每年少则328万镑，多则358万镑，年平均344万多镑，占其全部岁入的1/10左右。正因如此，英国政府把肮脏的鸦片贸易作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开辟殖民市场的重要手段，用各种卑劣伎俩破坏清政府的禁烟法令，甚至不惜诉诸武力。

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机。上自贵族达官，下至隶役、绅商、百姓以至八旗、绿营官兵，吸食鸦片的愈来愈多。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② 据1835年统计，全国吸食鸦片者约在200万人以上。③这种毒品既损害吸食者的身心健康，也加速了清朝统治机器的腐化，已成为危及整个民族生存的一大祸害。鸦片输入

---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二卷，第7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下同），（一），第436页。

③ 此数字根据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有人撰文指出：1835年全国吸毒人数约为4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参见何程远：《鸦片战争前夕全国吸毒人数和吸毒阶层的考察》（载1989年4月《历史教学》）。

激增，还使中国在中英贸易中迅速由出超转为入超，造成每年五六百万两白银外流（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8～1/6），银贵钱贱，国库空虚等严重后果。而这些后果最终又都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满和反抗。道光帝面对烟毒泛滥成灾的严重形势，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于1838年采纳了严禁论者的建议，决定厉行禁烟，"为中国除此大患"。是年底，任命在两湖地区实行禁烟卓有成效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主持禁烟事宜，并节制广东水师。次年，又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章程》，令各直省遵行。所有这些措施和规定，符合民族利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对禁烟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肩负民族重任的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后，本着"拔本清源，坚决查拿"的方针，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整顿海防，加强战备，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官弁，同时晓谕外商限期呈缴烟土，出具"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在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广东迅速开展起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闻讯后，于3月24日从澳门潜入外商聚居的商馆，教唆外商拒交鸦片，并企图携通缉在案的大鸦片贩子颠地逃出广州，破坏禁烟运动。林则徐遂下令各国船只先行封舱，暂时停止中英贸易，并由广州军民严密封锁商馆，断绝商馆和鸦片趸船的联系。义律和鸦片巨商的破坏活动受挫后，被迫于4、5月间缴出鸦片2.1306万箱（袋），共237.6万斤。林则徐等根据道光帝上谕，于6月3日至23日（一说25日）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这一果敢壮举，不仅维护了民族尊严，而且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鸦片侵略的坚强决心，给了英国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既然非法的鸦片贸易是英国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和英国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他们对于中国严禁鸦片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变本加厉，决心以此为借口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1839年4月3日，义律以中国收缴鸦片为由，建议英国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

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给中国"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使英国政府"从此获得最适意的满足"。① 虎门销烟后，义律命令英国船主拒绝在"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7月7日发生英国海员在九龙尖沙嘴殴毙中国村民林维喜事件，义律又拒绝交出凶犯。此外，继续进行鸦片走私，"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恐吓抵拒"②。在此情况下，林则徐下令将英人逐出澳门，并断绝其一切接济。义律离开澳门后，即派人驰报英印总督奥克兰，请求派军舰来华。8月31日，英舰"窝拉疑"号驶抵广东海面。9月4日，"窝拉疑"号舰长士密率舰船5艘至九龙附近，以索食为名，突然向3艘清军师船开火。参将赖恩爵指挥师船及炮台弁兵奋勇还击，激战5时许，将英舰击退。从此，中英关系更趋紧张。

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赴华，并训令印度总督对于舰队司令所采取的行动予以合作。11月4日，英外交大臣巴麦尊正式训令义律和致函海军部，宣布英国政府决定派遣远征军前往中国，用炮舰政策迫使清政府屈服。在这前一日，英舰"窝拉疑"号与新从印度驶来的"海阿新"号，在虎门外的川鼻洋面阻止一艘已具结的英货船进口贸易。执行巡逻任务的清军水师前往查究，"窝拉疑"号首先炮击清军师船，水师提督关天培下令发炮还击，经1小时炮战，"窝拉疑"号被打得帆斜旗落，狼狈逃跑，"海阿新"号也随即遁走。11月3日至13日，清军又在尖沙嘴以北的官涌，依托炮台和工事，连续打退了英军6次进攻，迫使其不敢在浪静风恬的尖沙嘴洋面停泊。这些战斗的胜利，证明林则徐一手抓禁烟、一手抓战备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当以上战况报到北京后，虚骄的道光帝竟否定了林则徐既坚持禁烟又维护正当对外贸易的主张，下令永远停止同英国贸易，并

---

① 《义律致巴麦尊的密信》，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一分册，第58～59页。

② 林则徐：《会谕同知再行谕饬义律缴土交凶稿》，见《鸦片战争》(二)，第307页。

驱逐所有英船。于是，中英关系更形紧张。

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好望角海军司令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公使，并由懿律率领英军前来远东。4月7日和10日，英国议会下院和上院分别批准了政府的侵华政策。就这样，英国殖民者“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①。

二、英国的侵华战略与清政府的备战方针

（一）英国远征军的组成和战略部署

英国政府作出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定之后，即着手组织“东方远征军”。至1840年初，这支侵略军基本组成。海军舰队以驻印度海军司令伯麦为司令，由16艘军舰、4艘武装轮船、1艘运兵船和27艘运输船组成。这16艘军舰中，3艘来自英国本土，3艘来自南非开普敦，5艘来自印度，另5艘已先期开抵中国海域。陆军以布尔利为司令，共4000人，其中包括爱尔兰皇家第18团、苏格兰第26团和第49团，此外还抽调了一个印度混合营和两个炮兵连、两个工兵连。懿律为陆海军最高司令。在战争过程中，侵华英军以印度为后方基地。

关于侵华战争的战略问题，早在1832年鸦片贩子胡夏米对中国沿海进行长达半年的侦察以后，于1835年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初步构想。1839年广东开展禁烟运动以后，被迫返回伦敦的大鸦片贩子以及与对华贸易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便在幕后紧锣密鼓地出谋划策。而外交大臣巴麦尊根据他们提供的大量情报和作战方案，在1839年10月18日和11月4日给义律的密信中，就已透露了侵华战争的战略意图。迨至1840年2月20日，由巴麦尊咨送海军部的公文以及给懿律和义律的训令中，就全盘

---

①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6页。

托出了侵华战略部署。其要点如下：1、远征军到达广东海面后，

附表：英国远征军的舰船名称和载炮数量

<table>
<tr><th>类别</th><th>名称</th><th>火炮数量（门）</th><th>类别</th><th>名称</th></tr>
<tr><td rowspan="16">军舰</td><td>麦尔威厘号（旗舰）</td><td>74</td><td rowspan="2">武装轮船</td><td rowspan="2">皇后号、马达加斯加号、阿塔兰塔号、进取号</td></tr>
<tr><td>威里士厘号</td><td>74</td></tr>
<tr><td>伯兰汉号</td><td>74</td><td>运兵船</td><td>响尾蛇号</td></tr>
<tr><td>都鲁壹号</td><td>44</td><td rowspan="13">运输船</td><td rowspan="13">阿拉利维号、布朗德尔号、布雷麦尔号、克利弗童号、达维德·马尔科姆号、挑衅号、鹰号、厄德梦斯乔号、伊利萨伯·恩斯利号、爱尔纳德号、佛泰萨拉姆号、风鸢号、印度橡树号、依萨伯拉·罗伯特生号、约翰·亚当斯号、马立安号、麦都萨号、雌人鱼号、穆罕默德·沙号、拿撒勒·沙号、拉哈曼尼号、鲁斯托姆治·化林治号、斯托克阿尔特号、苏利曼尼号、维多利亚号、威廉·威尔逊号</td></tr>
<tr><td>布郎底号</td><td>44</td></tr>
<tr><td>康威号</td><td>28</td></tr>
<tr><td>窝拉疑号</td><td>28</td></tr>
<tr><td>鳄鱼号</td><td>28</td></tr>
<tr><td>拉尼号</td><td>20</td></tr>
<tr><td>海阿新号</td><td>20</td></tr>
<tr><td>摩底士底号</td><td>20</td></tr>
<tr><td>卑拉底士号</td><td>20</td></tr>
<tr><td>宁罗德号</td><td>20</td></tr>
<tr><td>巡洋号</td><td>18</td></tr>
<tr><td>哥伦拜恩号</td><td>18</td></tr>
<tr><td>阿尔吉林号</td><td>10</td></tr>
</table>

注：以上为 1840 年 6～8 月来华舰船实数，此后又不断增加。

立即封锁珠江口，扣留附近的中国船只。因广州距北京太远，先不在那里进行陆上军事行动。2、封锁珠江口之后，立即率主力舰艇北上。途中，应采取措施切断台湾和厦门之间的运输，封锁钱塘江口、长江口和黄河口，占领舟山群岛中最适于作司令站以便长期占领的岛屿，并扣押可能找到的一切中国船只。3、前往北直隶湾（即渤海湾），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以武力为后盾，与清政府进行谈判，逼迫它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关

于道歉、赔款、割地、通商等要求。4、如果清政府拒绝谈判，或者谈判决裂，海军司令就应根据他所指挥的兵力，“采取最有效的办法去进行更加活跃的敌对行动”，困扰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入黄河，在黄河与运河的交叉点切断南北诸省的交通；或派一支兵力进至长江与运河的交叉点，掳走那里的船只与货物；如果认为兵力足够，还可以占领厦门。训令强调指出：“应该给海军司令留有最充分的自行决断的余地，以便他根据自己的判断，用最有效的办法进行他的敌对行动……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签下足称满意的协定，并由皇帝诏准该协定的时候为止。”训令还给全权代表“保留广阔的自行决断的余地”。①

从上述训令中可以看出，英国政府所奉行的乃是凭借其海军优势，重点封锁少数海口，相机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沿海沿江重镇，用军事讹诈迫使清政府屈服的局部战争战略。

（二）清政府的备战方针

由于清王朝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清廷的最高决策者道光帝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以及英国的侵华意图，一概茫然无知，对复杂的时局无法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因而在收缴鸦片以后，不仅在外交斗争方面不讲策略，而且在战备问题上表现出骄妄无知，盲目轻敌。

随着禁烟斗争的发展变化，道光帝在战备方面先后发出如下指示。先是，当他看到林则徐关于在九龙洋面击退英舰挑衅的奏报后，当即批示：“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② 所谓“先威后德”，就是对敢于挑衅的英舰示以兵威，“大张挞伐”，“使奸夷闻风慑服”，然后示以“怀远羁縻”。川鼻海战和官涌之战以后，他不同意林则徐提出的“坚垒固

---

① 《巴麦尊致海军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0～72页。

② 转引自林则徐等：《义律袭击师船及葡人转圜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26页。

军，静以待之”的防御作战方针，认为实行这一方针“虽有把握，究非经久之谋”①。意思是不能只顾防守，而应主动出击，将所有英船“尽行驱逐”。稍后，得悉英船窜至福建私售鸦片，并与当地水师发生武装冲突后，他又指示“沿海各省，亦应一体严密防范，绝其去路”②，杜绝鸦片来源。由此可见，当时道光帝的海防方针只限于驱逐贩卖鸦片和保护鸦片走私的英国舰船，而不是针对英国舰船的武装入侵。迨至1840年3月底，林则徐等奏报英国大号兵船已陆续到粤，发动侵略战争的端倪已露，他却朱批：“无论虚实，总当不事张皇，严密防范，以逸待劳，主客之势自判，彼何能为也？”③

还应指出，道光帝一方面不准沿海疆吏丢失寸土尺地，另一方面又不愿为加强海防动用国库银两。例如，虎门要塞增建防御设施所需的费用，来源于历年洋商捐资的留成、动员商人临时捐献和从广东官员的养廉银中扣除，对于先由藩库垫支的款项，强调必须“按年核实扣收，不得延宕”。诚然，当时清廷的财政已相当拮据，而战船、火炮的造价又很高，按当时的例价，一艘能出海的战船造价银为4300两，一门6000～8000斤的火炮平均造价400两，一座炮台造价为1.5万两左右。即使如此，也应采取移缓就急措施，而不能如此吝啬库银。否则，怎能有效地加强海防建设。

（三）广东、福建的设防备战

清政府严禁外国商船私贩鸦片以后，东南沿海各省便成为设防的重点。但是，真正加强海防战备的，主要是广东，其次是福建。至于浙江、江苏等省，直至英军首次北犯占领定海后，才重

---

① 转引自林则徐等：《英兵船阻挠英商船具结进口并在各处滋扰击退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42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62页。

③ 转引自林则徐：《传闻英添兵船来粤饬水陆严防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87页。

视加强沿海重要海口的布防。

广东方面。林则徐在收缴外商鸦片的同时，便本着“扼要设防”的方针，采取一系列战备措施，以应付日益紧张的形势。他支持关天培、邓廷桢早年提出的在虎门要塞的第二道门户增设木排铁链，添筑靖远炮台，以利阻击敌舰的主张；同时秘密购买利于远攻的西洋火炮 200 门，分拨各炮台和装备少数水师战船，使虎门要塞的火炮由 230 多门增至 300 多门。他筹划在敌船必经的要隘尖沙嘴和官涌新建炮台两座，安炮 56 门；在敌船窥伺的澳门增调水陆官兵，加倍严防；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加强第一线兵力，使虎门的水陆兵力增至 3000 余名，澳门增至 1300 余名（后增至 2000 名），尖沙嘴增至 800 余名，总计沿海陆路防兵共达 8000 余人。他还调集、购买战船，整顿水师，加强训练，严肃军纪，以提高水师的战斗力。同时招募和训练渔民、疍户 5000 余人，组成“水勇”，配合清军作战，并亲赴狮子洋校阅水师、水勇的操练，激励士气。经过林则徐的苦心经营，广州海防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林则徐还就如何对付英军入侵问题，提出过一些具体设想：第一，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不与敌在远洋接仗，而在近海、内河或陆地歼敌。他于 1839 年 9 月奏称：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强，但英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仅能取胜外洋，只要不与它在外洋接仗，其技即无法施展。英船一旦进入内河，就会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更难转动。“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① 在 1840 年 3 月 7 日的奏折中则说：“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

① 林则徐等：《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217 页。

也。”[①] 第二，陆上组织团练、乡勇，水上招募渔民、疍户，军民结合，伺机打击敌人。他与关天培密商，决定将平时所备大小火船，即雇渔、疍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弁兵，分赴各洋岛澳埋伏，候至深夜，察看风潮皆顺，即令一齐放出，乘势火攻夷船和环护夷船之各匪船。第三，与沿海各省协力筹防，共同对敌。6月下旬，大批英船抵粤，他便飞咨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各省，饬属严查海口，协力筹防。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他到广州后，十分重视侦察研究西方列强的情况，从而确定对策。但因时间短、手段少，对敌情的了解毕竟有限，加上收缴鸦片时，“未尝烦一兵，折一矢”，此后又三次挫败英军的挑衅，因而产生了轻敌思想，对英军行动的判断不够准确，如他在1839年9月分析英军情况时，认为“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②]。1840年6月中旬，他在奏折中称：“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各船“只在外洋往来游奕，此东彼西，总无定处。……此外别无动静，诚如圣谕，(该夷)实无能为”。[③] 这些，说明他对英国大举进犯中国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实为一大失误，对东南沿海的设防备战产生了不良影响。尽管如此，他的一系列战备措施和某些作战指导思想，还是值得称许的。

福建方面。自广州收缴鸦片以后，一些英船便驶至福建沿海私售鸦片，并多次向当地水师开炮抗拒，这就引起当地疆吏的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海防建设。其具体措施：一、海口要隘，由陆师增派弁兵防守，禁绝勾结英船的奸民出海；水师则分

---

① 林则徐等：《英船被逐出口仍在外洋逗留并拿获汉奸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77～278页。

② 林则徐等：《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18页。

③ 林则徐等：《火创英船办艇等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15～316页。

作两帮，由水师提督和金门镇总兵管带，分别在北洋、南洋拦截堵御，力求“水陆交严，坚持不懈”。二、鉴于海口旧设炮台台小炮少，难于御敌，闽洋无内港可守，炮台必须建于海边，但海滩沙性浮松，炮台根脚不固，于是“易炮台为炮墩”，以麻袋实土，堆聚成墩，将火炮安于墩内，增强岸防火力。此外，还将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从广东购买的14门洋炮装备水师战船。

第二节　英军由广东北犯与中英大沽交涉

1840年6月下旬，英国“东方远征军”舰船陆续抵达广东海面，与先期到达的舰船会合，共有各种舰船48艘，陆军约4000人。侵略军按既定战略方针，于28日起封锁珠江口，由“都鲁壹”号等4艘军舰和1艘武装轮船执行这一任务。30日，懿律和义律率领大小舰船43艘离粤北上，企图夺占定海作为据点，并相机北上渤海湾，以武力胁迫清廷就范。7月2日，由军舰“布朗底”号驶入厦门青屿口投送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副本①，并留军舰“鳄鱼”号和运输船一艘，封锁厦门港（不久调往定海）。舰队继续北驶，直指定海。

一、第一次定海之战

7月4日，英印海军司令伯麦率军舰5艘（“威里士厘”号、“康威”号、“鳄鱼”号、“巡洋”号、“阿尔吉林”号，共载炮158门）、武装轮船2艘（“皇后”号、“阿塔兰塔”号）、运输船10艘，载运陆军第18团、第26团、第49团和马德拉斯炮兵队，闯入定

---

① “布朗底”号舰长派人驾小船强行登岸递交照会时，遭到岸上清军抗拒，该舰遂发炮轰击，打死打伤清军弁兵23人。后该舰又派小船将照会留在沙滩上（一说将照会装入小瓶抛入水中），即退出厦门港。

海水域。为探明英军意图，定海知县姚怀祥登上英舰讯问。伯麦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中文照会，限令次日下午2时前交出海岛、炮台，否则开炮轰击。姚怀祥离舰后，即与文武官员商讨对策。

定海县城东、北、西三面重山环抱，一面临海。前有稻桶山、东岳山为屏障，左右有青垒山、晓峰岭为辅翼；城南道头港之吉祥、竹山、大渠三口为入港门户；道头港以南有五奎山、盘峙山、渠山等岛屿罗列海中。形势险要，利于防守。此时，道头水面已集结清军大小师船21艘，共计船炮170余门，兵丁约940名；道头岸上有陆路兵丁600名，配炮20余门。另有旧设炮台4座，每座安红衣炮8门，配守兵50名。总的看来，清军是有一定准备的。但是，文武官员对于如何进行防御作战意见不一。游击罗建功认为英军所长在于船坚炮利，宜将水陆各兵一半撤至离城一里的半路亭扼要堵御，一半撤至城中防守；姚怀祥主张撤兵入城，坚守待援；水师总兵张朝发认为水师只管巡防洋面，无守城之责。由于意见纷歧，莫衷一是，只好水陆分守：张朝发将城外各营及水师战船齐集港口防堵，姚怀祥率兵1000人守城。姚、张还约定："在外者主战，战虽败不得入城；在内者主守，守虽溃不得出。"①实则各自为战，互不协同。

7月5日下午2时，伯麦见清军无献城迹象，便令"威里士厘"号等军舰发炮轰击。张朝发率水师迎敌。交战不久，清军水师损失惨重，张朝发左腿受伤，被送往镇海，水陆官兵也纷纷内渡镇海。英军乘势登陆，彻夜攻城，于6日凌晨攻破东门，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定海遂告失陷。（参见附图1）

定海失守后，清廷于7月24日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和提督祝廷彪革职留任。8月6日，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浙江主持军务。

---

① 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考订》（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英军攻陷我国南北航道要冲定海后，委任管理军民事务的官员，张贴布告，引诱逃匿民众回城，企图长期占领，以便在军事上作为立足点，并切断南北海上交通，直接威胁中国最富庶的沿海各省。同时，派出军舰“鳄鱼”号及轮船1艘，封锁甬江口；另派军舰“康威”号、“阿尔吉林”号及运输船3艘，前往长江口进行测量侦察；其余舰只进行北犯渤海湾的准备工作。

二、英军陈兵渤海湾与中英大沽交涉

1840年7月28日，懿律和义律率军舰“威里士厘”号、“布朗底”号、“窝拉疑”号、“卑拉底士”号、“摩底士底”号，武装轮船“马达加斯加”号和运输船2艘离舟山北上，8月6日侵入渤海湾，9日进泊大沽口拦江沙外。

道光帝在定海失陷后，立即谕令福建提督余步云酌带弁兵，驰赴浙省会剿；令闽浙总督邓廷桢选派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会同浙江水师，合剿英舰。他在7月26日的上谕中称：“此次英吉利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经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① 8月3日，接到林则徐的奏报，得知英舰可能北犯天津。他根据直隶总督琦善以前所奏天津海口“严密防范，果有夷人驶入，自可有备无虞”等情况，谕令琦善：英舰“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② 可见，他虽然立足于战，但盲目轻敌。可是，当8月9日接到琦善的复奏，得悉天津炮位陈旧、不堪使用，守兵只有800人的实情后，对英态度马上由硬变软，当日即改谕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③ 琦善接旨后，于8月15

---

① 《上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28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37～338页。

③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9页。

日派千总白含章前往英舰取回《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并立即呈送北京。

巴麦尊的照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林则徐的禁烟措施说成是对"实信之英人，向之强行残害"，并"凌辱国主特命领事"，"亵渎大英国威仪"；扬言"大英国家决讨昭雪"，威胁说：如"大清国未善妥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①其强盗面目暴露无遗。对禁烟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认识的道光帝看到巴麦尊的照会后，对外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偏信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琦善等人的谗言，便不分青红皂白，将"办理不善"的责任强加于林则徐、邓廷桢身上。8月20日，谕令琦善向英方表示："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② 完全屈从于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也是他抗战决心的第一次动摇。

8月30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他奴颜婢膝地向义律表示，英方"所诉之冤，已奉旨准为昭雪"，劝说侵略军尽快"返棹南还，听候办理"。③ 同时，道光帝给沿海疆吏下谕：设或夷船再至，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英国侵略军头目在所提条件未获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于9月15日率舰队起碇南返。其所以同意南下广东，主要由于当时"季节的将近终期，北季候风的到来，岸上部队和舰中水手间流行的病疫等"原因，使懿律等"认为在春季之前，采取任何积极的敌对行动，是不聪明的"。④

但是，道光帝竟认为大沽谈判是中国外交上的一次胜利，他

---

① 《巴麦尊照会》，《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82～386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92页。

③ 琦善：《晓谕英人暨其登答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25－426页。

④ 《巴麦尊子爵致驻华全权公使函》，〔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下同），第一卷，第720页。

洋洋自得地说："英夷在天津海口投递呈词，甚觉恭顺，吁恳恩施"①；"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②。对琦善的屈膝外交，表示"朕心嘉悦之至"。9月28日，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前往广东"查办"。10月3日，将对禁烟和加强海防作出重要贡献的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指望通过惩办林、邓博取英人宽恕，以避免与英人接仗，并通过"和谈"方式促使英国退兵。道光帝还不顾英军仍霸占定海，且大批集结于广东洋面的情况，下令沿海各省酌量撤裁防兵，以节饷糈。同时提出"总要上不伤国体，下不开边衅"。③他根本不懂得备战方能言和，裁军撤防，专意求和，非但不能避免战争，相反只会助长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且最终必然伤及国体。

第三节　广东军民的抗英作战

（参见附图2）

一、广州谈判破裂

英军侵占定海后，逃匿的居民拒绝回城，附近人民积极打击外出购买、抢掠食物的英军和汉奸、买办，使侵略军供应奇缺；加上水土不服，军中疫病流行，死亡人数日增，英军处境相当困难。定海、慈溪、余姚等县军民先后俘获英海军少校得忌剌士、炮兵上尉安突德等官兵23人，给了侵略军以应有的打击。懿律率舰队驶离大沽来到定海后，即与伊里布交涉释放被俘人员问题。清廷

---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66页。

② 转引自伊里布：《续接懿律来文及现在筹议酌办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513页。

③ 转引自伊里布：《续接懿律来文及现在筹议酌办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515页。

以释俘为条件，要求英方归还定海，谈判未获结果。11 月 6 日，伊里布背着清廷与懿律签订了地方性“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在舟山岛及附近小岛划界为守，当地政府不阻止群众供给定海英军所需物资。伊里布签订这一协定，使盘据定海的英军改善了处境，却束缚了中国人民的抗英手脚，实属卖国行径。

“停战协定”签字后，懿律于 11 月 14 日率军舰“威里士厘”号、“摩底士底”号、“麦尔威厘”号、“伯兰汉”号及一些辅助船离开定海南下，20 日抵达澳门。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对大沽谈判的结果十分不满，责令懿律等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琦善于 10 月 3 日离京赴穗。他在途中就扬言：“现在办理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①，“英夷强横，非中国所能敌”②，只准备通过谈判解决问题。11 月 29 日，琦善到达广州，12 月 4 日即与义律开始谈判（懿律因病回国，全权代表由义律接任，远征军总司令由伯麦接任）。义律遵照奥克兰的指示精神，坚持其赔烟价、还商欠、偿兵费、开商埠、割土地等无理要求，并一再以开战相威胁。琦善慑于英军的船坚炮利，不敢以武力为后盾与侵略者谈判，“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③。他在奏折中称广东“船炮不坚，兵心不固”，“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④，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企图以此争取道光帝同意他在谈判中所持的妥协求和态度。

正当义律与琦善谈判之际，英国继续向中国增兵。至 1840 年底，先后来华的舰船有“加略普”号、“萨马兰”号、“路易莎”号、“司塔林”号、“硫磺”号、“丘比特”号，陆军有马德拉斯步兵第

---

① 《会审琦善亲供》，《鸦片战争》（四），第 212 页。

② 高人鉴：《琦善将白含章鲍鹏带往粤东或至别构事端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645 页。

③ 仁寿等：《审讯琦善按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1117 页。

④ 琦善：《照复英人并筹办防守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655 页。

37团。12月上旬，英军舰船20余艘驶近虎门口，向琦善施加压力。琦善见形势紧急，不得不把义律要求割让土地和另辟通商口岸等事上报清廷。道光帝“览奏愤恨之至”，认为“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命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倘逆夷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并称“朕志已定，断无游移”。[①]同时，令四川备兵2000人，湖南、贵州各备兵1000人，听候调遣；令伊里布相机收复定海。由于道光帝由“羁縻”转向“攻剿”，琦善不得不抽兵1950人，加强虎门及省城以东江岸的防御，“借此虚张声势”。但他仍然表示“不惮颖脱唇焦，或堪智取术驭”。[②] 可是，义律已获悉清廷态度转趋强硬，便通知琦善“交战后尚可再商”[③]，决定中断谈判，向虎门要塞进犯。侵略者的大炮，宣告了琦善顽固坚持的“柔远”政策的破产。

二、虎门清军浴血奋战

（一）英军初犯虎门和沙角、大角之战

虎门要塞的第一道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分别安有旧式火炮12门和17门（后略有增加），炮台围有石墙，并有外壕环护，有些地方埋设了地雷。两台防兵甚少，虎门形势紧张时，才由副将陈连升率兵600余名，加强两台防御，总兵力约1000余人，分扎于主炮台和侧后工事之中。

1841年1月7日上午8时，英舰船载英军1500余名及临时招募的流氓、游民数百名，分左右两支队，向沙角、大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

---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32页。

② 琦善：《义律以开战要挟并约定晤谈及给复文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87页。

③ 琦善：《接义律伯麦等来书要交战后再商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92页。

英军以右支队为主攻，由“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尼”号3艘军舰（共载炮62门）及“皇后”号等4艘轮船运载登陆部队1461人，进攻沙角炮台。首先，“加略普”号等3舰用舰炮向炮台猛轰，以吸引清军主力。同时，在川鼻湾登陆的1400余人，抄袭炮台侧后，攻占了清军防御薄弱的制高点，用野战炮俯击沙角炮台。守军遭敌水陆夹击，伤亡甚众。不久，英军突入炮台，守台清军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大部伤亡，陈连升父子也壮烈牺牲，沙角炮台遂被英军占领。泊于沙角附近晏仁湾、三门口的清军战船11艘亦被英舰击毁。

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左支队，由“萨马兰”号、“哥伦拜恩”号、“都鲁壹”号、“摩底士底”号4艘军舰（载炮106门）组成。它们用舷侧炮对炮台进行近距离猛烈射击，使驻守炮台的清军难以驻足。尔后，英军从南北两侧登陆，包抄炮台。在炮台即将被敌攻占之际，清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中，突围撤退，大角炮台随即失陷。

（二）英军霸占香港与清廷对英宣战

沙角、大角炮台失陷后，琦善畏敌如虎，一再奏称英军船坚炮利，胡说什么虎门地势无险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与敌交锋实无把握，想以此动摇道光帝的抗战决心。与此同时，他按照侵略者所定“战后再商”的步骤，恢复谈判。1841年1月中旬，他照会义律，表示愿意“代为奏恳”，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并非全岛）供英人居住（并非割让）。然而，义律不等琦善奏请，便于1月20日单方面发布“公告”，诡称“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① 1月26日，英军便强行占领了香港。此后，琦善与义律的两次会谈中，均未同意将香港全岛割让给英国，当然也谈不上经道光帝批准。英国殖民者声称义律和琦善签订了《川鼻草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纯属讹诈。

---

①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05页。

1月27日，道光帝得知沙角、大角炮台已被英军攻占，甚为恼怒，当即决定对英宣战。他一面命令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将英国侵略行径“通谕中外知之”，一面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命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进攻英军；并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加意巡查，来则攻击”。① 1月30日，又令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驰赴广东，办理夷务。除催促湖南、四川、贵州、江西各省所派之兵共6000人迅速启程赴粤外，又增调四川兵1000人、湖北和贵州兵各1500人、云南和湖南兵各500人，兼程开赴广东。2月26日，道光帝接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与义律“说定让给”香港的奏报，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押解回京，严行讯问。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埙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

（三）英军再犯虎门，守军英勇奋战

英军攻占沙角、大角炮台后，一面强占香港，一面派出舰船探测上横档以西水道，作再次进犯虎门的准备。2月中旬，义律在获悉清廷向广东调兵遣将和对英宣战的消息后，决定先发制人，进攻虎门和广州。2月19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25日前，英军完成了再犯虎门的临战准备。

沙角、大角炮台失守后，虎门要塞的第二道门户、分别设于横档、武山和芦湾山的6座炮台，便成为英军攻击的主要目标。这时，6座炮台的大小火炮已增至300余位，守军约3000人。其中水师提督关天培镇守的靖远炮台有弁兵253人，总兵李廷钰镇守的威远炮台有弁兵327名、雇勇91名，其余各台守兵均有数百名。另在武山后山驻有兵丁雇勇5000名。

2月24日，英军司令伯麦向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横档以上、大虎山以下各处炮台，俱交英军“暂为据守”。关天培不予理睬。25日下午，英军派出炮兵分队，携带臼炮3门，在150

---

①《上谕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712页。

名步兵掩护下，由“复仇神”号轮船拖运至清军未设防的下横档岛登陆，选择阵地，安设炮位。

26日晨，占据下横档的英军炮兵向上横档岛的横档炮台和永安炮台发炮轰击。由伯麦指挥的英舰“威里士厘”号、“萨马兰”号、“加略普”号、“摩底士底”号、“前锋”号、“鳄鱼”号和“硫磺”号，乘潮水盛涨时由西航道上驶，包抄上横档岛，轰击横档、永安两座炮台。下午1时30分，“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加”号轮船运载部队在永安炮台附近登陆。中国军民奋起抗击。经过激战，守军伤亡350多人，其余一部被俘，一部突围，上横档岛遂被英军占领。

在上横档岛激战同时，英舰“伯兰汉”号、“麦尔威厘”号（各载炮74门），轮船“皇后”号及3艘小型火箭船，于上午11时30分驶抵武山水域，分别于距威远炮台360米和540米处下锚，以舷炮向威远、靖远炮台轰击。关天培等指挥炮台守军沉着应战，但由于英舰停泊过远，靖远炮台仅有部分火炮能够发挥作用，镇远炮台基本无法参加射击，因此守军的火力处于劣势，未能予敌以重大杀伤。相反，炮台受损失严重。不久，英军从炮台翼侧登陆，威远、镇远、靖远3台守军在后山兵勇带领人畏敌不援的情况下，坚持抗击1小时30分钟，终因势寡力单溃退。年逾花甲的关天培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后与数十名官兵一起，光荣地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成为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英军攻占横档和武山各炮台后，用轮船载员拔除水中木桩，破坏木排铁链，疏通航道，以便溯江上犯广州。当日下午4时，部分英军攻占芦湾山下的巩固炮台。至此，虎门要塞最关键的门户已被英军攻破。英军乘势发展进攻。

2月27日，英舰“加略普”号、“先锋”号、“鳄鱼”号、“摩底士底”号、“硫磺”号（共载炮104门）和轮船“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加”号，溯珠江而上。因虎门要塞最后一道门户大虎山炮台的守军先已撤退，故未遇抵抗便直达离广州城仅60里的乌涌。该处有炮台1座，设重炮7门，临江一线筑有工事，安炮44

门，由署湖南提督祥福等率湖南兵900名和广东兵700名驻守。附近泊有安炮39门的战船“截杀”号（由林则徐购买的外国商船“甘米力治”号改装而成）和数十只小木船。由于仓促布防，工事尚未就绪，加之江水暴涨，炮位多没于水中，只有东南角的大炮可以射击，但不能调整射角和射向，很难命中目标。英军一面发舰炮轰击，一面换乘舢板登陆，直扑炮台。祥福等率部抗击，毙敌200余人。后因火药将罄，且战且退。英军乘势占领炮台。祥福以下官兵446人英勇献身，战船“截杀”号被焚毁。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3日，不战而据定功炮台。广州省城已处于侵略军的严重威胁之下。

三、广州清军的反攻作战

（一）英军调兵遣将，清军布防广州

虎门失陷后，道光帝复派四川提督齐慎为参赞大臣，增调广西、湖南、湖北兵4800人星驰赴粤，命令于3月5日抵达广州的杨芳会同怡良立即发兵进剿，指出：“逆船驶进内河，即属深入重地，若能抄出该夷船背后，断其归路，前后夹攻，可期一鼓作气，聚而歼旃。”①

杨芳等因奕山、隆文尚未到粤，各省援兵也未到齐，不敢贸然发动反攻。而英军也需增加兵力，才敢进攻广州。这时，适值贸易旺季，停泊在珠江口外英美等国的商船迫切要求开市贸易。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需要，达成临时休战协议，从3月20日起广州恢复贸易。

在恢复贸易前后，英军一面调集兵力，一面进行小规模的进攻行动，积极为扩大侵略，进攻广州作准备。为了增加入侵广东的兵力，2月25日，驻定海的英军舰船8艘和陆军1700余人，遵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60页。

照义律的命令撤离南下，于3月初抵达广东。① 这时，新任英国远征军陆军总司令郭富也率兵700名赶到。英军得到加强后，遂“派遣分队攻陷并毁坏了广州城邻近的（沿江）各要塞”②，进一步改善了进攻广州城的态势。即使这样，英军能参战的人员仍不过3000余人，不敷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为此，侵略军总司令伯麦于3月31日离粤前往印度，向奥克兰报告广东军情，争取援军。

杨芳等“先通商暂作羁縻”以待大军的主张，明显违背道光帝立即攻剿，“日夜盼望捷音”的意愿，因而受到严厉斥责。道光帝命令奕山等到粤后，“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逆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倘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等是问”③。4月14日，奕山、隆文、祁𡎴抵达广州，进一步部署了广州的防务。

广州城分新城和老城（或称外城、内城），北依越秀山，南濒珠江，沿江傍山筑有大小炮台15座。奕山与隆文、杨芳等认为“逆夷进攻，必由东南、西南两路而入。东南一带，水面较窄，中流亦浅；西南由白鹅潭直接大黄滘，水面宽阔，中流水深三四丈不等，此路最当贼冲，而近岸民居鳞次，河面距城仅止数丈，不能安营”④。据此，对广州城防作了如下部署：除原广东兵仍分守城垣及各炮台外，派江西、湖南、广西兵共1100名在城上分段协防；派四川兵600名扎于外城西南靖海门外，以固西炮台后路，并在城南之东西炮台安设新铸8000斤大炮2门，控制江面；于城北

---

① 英军侵占定海后，道光帝多次命令钦差大臣伊里布集兵进攻。特别是英军进攻虎门时，道光帝命伊里布不失时机地进攻定海，使英军首尾不能相顾。但伊里布认为从海上反攻绝无可能，因而按兵不动。英军撤离定海除为了增加广东英军兵力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水土不服，疫病流行，1840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病死者就达448人。

②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17页。

③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957页。

④ 奕山等：《官兵渐次到粤分守要隘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03页。

之东西得胜炮台等处布置四川、江西等省兵4000名，以为犄角；以贵州、湖北兵4100余名分置于城东北与西北两处，以策应东、西、北三面的作战；以湖南等省兵1200名扎于城北保厘炮台，联络内城北面守兵，以壮声威；截留广西兵1500名保护佛山粮台，并负责接运木排、炮位。同时，从广西购买大木，在韶关、肇庆制造木排，从江西、广西催造大炮，在香山、东莞一带招募水勇二三千人。此外，尚有两湖、四川、广西兵共约4000余人正在赴粤途中。十分明显，上述设防部署，是以陆为主的单纯防御，缺乏水上作战的充分准备，没有采纳林则徐提出的御敌措施。①

（二）清军三路反攻，英军转守为攻

由于道光帝一再严令催促，奕山等在战备工作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决定于5月10日以后对英军发起反攻，企图以夜袭取胜，进而收复沿江各炮台。因连降大雨，河水盛涨，清军未能"克期进剿"，而英军舰船却乘机自大黄滘、二沙尾两路驶进，谋攻省垣。奕山等"不敢坐失机宜，遂决计先发以制之"②。

5月21日，奕山等令陆路弁兵"加意防堵"，令都司胡俸伸、守备孙应照、千总杨泽等率领熟悉水性的义勇1700余名，分伏三处：一伏西炮台为中路，一伏东炮台为左路，一伏城西北之泥城为右路。约定三更后一齐出动，利用夜暗乘驾小快艇靠近敌船，火攻泊于二沙尾和白鹅潭一带的英军舰船，"力攻其左右，先抄其后路"。英军对清军的行动早有察觉，21日白天，义律即通令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于日落前秘密离开广州。当晚11时许，清军快艇发起攻击，西炮台和东炮台亦发炮轰击江中的英舰，使英军受到一定

---

① 林则徐向奕山提出六条御敌措施：一、堵塞水道要口；二、洋面船只查明备用；三、炮位验演拨用；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战船分别筹办；六、夷情宜周密探报。参见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同），第65页。

② 奕山等：《乘夜焚剿省河英船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29页。

损失。但是，整个战斗的战果不大，英舰未沉一艘，而中国民船却被烧毁不少。当晚冲入商馆区搜捕义律等人的清军，也一无所获。次日黎明，英军转守为攻，以舰炮对西炮台进行猛烈轰击，守军溃退。接着，英军进攻泥城，数十只民船、木筏及大批造船材料被毁。至此，广州清军的反攻作战，终因谋划不周而宣告失败。

（三）英军围攻广州，迫签《广州和约》

清军三路反攻失利后，英军决定乘势进攻广州城，并确定如下作战部署：以左纵队任主攻，在清军防守薄弱的泥城、缯步一带登陆，直插城北越秀山，夺取山上炮台，控制瞰制全城的制高点，尔后从城西北进攻。其兵力编成：步兵大队由英军第49团、马德拉斯步兵第37团和孟加拉"志愿军"各一部组成，共646人；炮兵大队由皇家炮兵、马德拉斯炮兵和印度工兵各一部组成，共417人，携野战炮13门；水兵大队由"威里士厘"号、"布朗底"号、"宁罗德"号军舰上的水兵组成，共430人；预备大队由皇家海军陆战队和英军第18团组成，共900人。4个大队的总兵力为2393人。以右纵队任助攻，进攻城西南的商馆区，吸引清军兵力，保证主力部队的行动。其兵力编成为：英军第26团，配属炮兵20人和工兵30人，共360人。

5月24日下午3时，英军右纵队在商馆区附近登陆，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商馆区。1小时后，左纵队分乘30只船在"复仇神"号拖带下溯江而上，于下午6时到达登岸地点。当晚，步兵大队和炮兵大队一部先后登岸，遭到当地壮勇阻击。但担任应援任务的湖南兵为了争功，竟在后面乱放排枪，引起前面守军慌乱。英后续部队趁势大批登岸，占领附近一座庙宇和一些高地。次日凌晨，英军全部上岸，经西村、流花桥，直扑北门外各炮台。

广州城北的越秀山一带，筑有炮台6座，自西至东分别为拱极、保极、耆定、四方和东西得胜炮台，由贵州、湖北兵4100人防守。25日上午9时，英军开始炮击最西端的拱极、保极炮台。10时，步兵发起进攻：第49团负责袭取炮台北侧的高地，第18团迂回到炮台侧后，以切断上述两台后路，水兵大队则由正面进攻。

清军依托工事，顽强抵抗，经1小时激战，拱极、保极炮台失陷。英军继续发动进攻，防守四方炮台的总兵长春率兵勇冲出，与敌肉搏，因伤亡过重，不支而溃。各炮台守兵便纷纷撤入城内。英军占领城北各炮台和山冈后，居高临下，俯制全城。

26日，英军准备攻城。时广州城内尚有清军近万人，但奕山等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便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次日，与义律达成了屈辱的停战协定，即《广州和约》。条约规定：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全部外省军队，6日内撤至离广州城60里以外的地方；于一周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全部撤至虎门外。

奕山对于广州之败不敢如实上奏，竟编造谎言，诡称英军乞和，“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① 等等，欺骗清廷。原来颇有灭此朝食气概的道光帝只好打肿脸充胖子，于6月18日下谕，以“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② 为词，默认了《广州和约》。

四、三元里人民痛击侵略者

英军侵入广州地区后，四出烧杀淫掠，激起广州人民的极大义愤。城郊人民纷纷拿起刀矛等武器，勇敢机智地打击侵略者。广州北郊三元里附近100余乡村民，在社学领导人、爱国士绅李芳、何玉成、王韶光等联络号召下，团练御侮。他们以北帝庙中的三星旗为“令旗”，相互约定，一乡有事，各乡支援，共同抗击侵略者。

5月30日凌晨，郭富率领英军第26团和马德拉斯第37步兵

---

① 奕山等：《英船攻击省城并请权宜准其贸易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4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46页。

团约600人，分左右两路向三元里一带进犯。附近各乡义勇闻讯，迅速于牛栏冈、唐夏村一带集结。义勇采取诱敌入伏之计（英军停止时，鸣锣击鼓而进，英军前进时，佯败而退），将敌诱至牛栏冈附近时，伏众四起，杀声震天，将英军重重包围。下午2时许，雷电交加，大雨如注，英军火药尽湿，枪炮无法施放，被迫后撤。义勇立即追击，刺死刺伤敌人14名。在追击过程中，有一路义军将英军第37团的一个连（共60人）包围于水田中，毙伤敌34名。后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前往增援，这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连队才得以狼狈逃回营地。此战，共毙伤英军近百名。

在三元里一带人民痛打英军的同时，广州周围各地人民也纷纷打击侵略者。三山村人民毙伤另路英军多人，缴获火炮2门及枪械一部。佛山镇义勇围歼占据龟冈炮台的英军，伤敌数十人，击毁舢板数只。新安县武举庾体群等组织民众，夜袭泊于横档的英船，烧毁其大船1艘。广州人民英勇打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成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抗敌御侮的先声。

5月31日，英军头目以进攻广州城相威胁，迫使奕山派知府余保纯出面诱骗和威胁抗英群众，解散了义勇。6月7日，英军根据《广州和约》的规定，撤至珠江口外。

中英广州之战，清军之所以屡战屡败，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主观方面：一误于琦善一意主和，以致懈军心，颓士气，从而加速了经营多年的虎门要塞的失陷。二误于奕山等不懂得慎战之道，仅以少数部队仓促反击，企图侥幸取胜；战败之后，马上同敌缔结城下之盟，缺乏坚持抗战的决心。三误于临时从各省抽调之兵，兵将互不熟悉，彼此互不协同；统兵将领，智勇双全者少，畏怯无能者多。四误于只靠正规军株守城池和既不坚固又不隐蔽的炮垒，不善于机动作战。客观方面，英军船坚炮利，进退自由，能集中优势舰炮轰击清军炮台，造成台毁人亡。即使如此，仍有以关天培为代表的部分爱国官兵在战争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牺牲精神，特别是三元里等地人民，义愤填膺，痛打敌人，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第四节　英国扩大侵华战争与闽、浙军民的抗战

一、英国换帅备战，中国撤军弛防

1841年4月，英外交大臣巴麦尊获悉所谓《穿鼻草约》的具体内容以后，对义律大为不满，认为他违背了政府的训令，在军事行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尤其不该撤出舟山。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召回义律，改派殖民侵略老手亨利·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巴麦尊在给璞鼎查的训令中，重申了原给义律的训令仍然有效，并要他抵达中国后，第一项任务就是重新占领舟山；同时强调在中国皇帝对英国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包括割让香港、赔款、开辟通商口岸等）完全无条件地依允以前，就不停止远征军的军事行动。

璞鼎查于6月5日离开伦敦，途经印度孟买，会同新任海军司令巴加，于8月10日抵达澳门，立即进行作战准备。8月21日，他会同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率领10艘军舰和运兵船（军舰“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布朗底”号、“都鲁壹”号、“摩底士底”号、“卑拉底士”号、“巡洋”号、“哥伦拜恩”号、“阿尔吉林”号，运兵船“响尾蛇”号，共载炮320门），4艘轮船（“西索斯梯斯”号、“弗莱吉森”号、“复仇神”号和“皇后”号，共载炮16门）及1艘领航测量船，22艘运输船，分载陆军官兵2519人和大量辎重，驶离香港，开始了英军的第二次北犯。以陆军1300余人及“海阿新”号等军舰6艘、轮船2艘留守香港。

英军退出虎门，清廷误以为“夷氛已靖”，于7月28日通谕沿海将军督抚，酌量裁撤调防官兵，以节糜费。8月上旬，专办浙江军务的江苏巡抚裕谦接奕山、祁埙等咨文，获悉英军即将再犯闽、浙，乃奏请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兵。道光帝竟于8月19日对裕谦的

奏折作了如下批复："如果逆夷别有思逞，断无先行传播透漏之理。著裕谦仍遵前旨……于镇海、定海紧要处所，酌量暂留弁兵外，其余调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归伍。其江苏防堵官兵，亦著会同程矞采、陈化成酌议撤回，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① 23日，又对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折中所提待探明英军确无来浙情况后再行撤军的建议，斥责为"所见尤为迂谬"②。但是，时隔3日，英国军舰的大炮在厦门轰鸣这一严酷的事实表明，并不是裕谦为"浮言所惑"，也不是刘韵珂"所见迂谬"，而是道光帝自己忽视战略侦察，且又刚愎自用，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策，给抗战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厦门清军的抗登陆作战

厦门远控台湾，近接金门，为闽省咽喉。该处防务自1840年7月英军第一次侵扰以后有所加强：位于厦门东西两侧的青屿、峿屿、大担、小担以及峿屿以北的白石头、水操台、安海等处，均安设炮位，驻扎防兵，以便夹击敌舰；白石头至沙坡尾一带改囊沙为石壁，共长500丈，每5丈留一炮洞，共安炮100门；复于濒海之会厝坡、河厝乡、高崎汛等处增加了炮位和兵力，以防敌人登陆。通向厦门的咽喉要地鼓浪屿，有石砌炮台数座，安炮76门，并环以沙墩炮台，以加强主炮台的防御能力。英军再次进犯前，厦门及其附近地区共安设大小火炮400多门，有水陆防兵约5000人，并有近万名水勇、乡勇协防。事先还制定了水师与岸炮协同配合，夹击敌舰，歼敌于近海的作战方案。

8月25日黄昏，英舰队驶抵厦门南之青屿附近碇泊，并向水师提督窦振彪发出献出厦门的最后通牒。这时，窦振彪"以广东甫经议抚，现当无事，恐盗踪未灭，仍行出洋巡缉，逾月未归"③，

---

①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29、1136页。

③ 颜伯焘：《厦门失守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51页。

因而水陆夹击敌舰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于是，闽浙总督颜伯焘便督同道员刘耀椿，传令清军据守各要隘，依托既设阵地抗击敌人。

26日晨，英军先以火轮船数艘对鼓浪屿和厦门实施火力侦察，接着，大队兵船从青屿乘潮蜂拥而入。白石头、水操台、安海汛、鼓浪屿等炮台守军，以猛烈炮火三面环击，击伤击沉敌船多艘。英军随即采用集中七八艘舰船的二三百门火炮各个击破的战法，逐一轰击炮台，使清军炮台遭受严重毁坏。下午1时，英舰"摩底士底"号、"布朗底"号和"都鲁壹"号逼近鼓浪屿，向该岛及内港入口处炮台继续轰击，掩护一部英军登陆。守军稍事抵抗，即行溃散，鼓浪屿遂于下午3时落入敌手。与此同时，英船"西索斯梯斯"号、"皇后"号和"班廷克"号进攻厦门以东长列炮台，守军坚决抵抗，副将凌志、总兵江继芸等相继牺牲。下午4时，白石头及其以西各炮台被击毁，英军乘势登陆。由于清军缺乏纵深设防和机动兵力，因而无法击退登陆之敌。随后英舰延伸火力，轰击厦门城，守城清军向虎山退却，颜伯焘、刘耀椿等退守同安。27日晨，厦门被英军占领。

9月5日，英军撤出厦门，以军舰"都鲁壹"号、"卑拉士底"号、"阿尔吉林"号及运输船3艘、士兵550人驻守鼓浪屿，牵制福建清军，其余舰船全部北驶，遂行其重占定海的计划。

道光帝接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才意识到战争并未结束，便于9月13日下令浙江、江苏、山东、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各省将军、督抚停止撤兵，悉心筹划，加强战备。他还指出："逆夷习于水战，向来议者，以彼登陆后，即无能为患。乃今占据厦门，逆焰仍然凶恶，是陆路亦能用兵，不可不加防备。"[①]这是对英军陆战能力在认识上的一个提高。此后，江苏、浙江、山东、直隶等省开始注意作陆上击敌的准备。

---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57页。

三、第二次定海之战

早在1841年2月10日，道光帝以定海未能及时收复，命伊里布回任两江总督，以江苏巡抚裕谦接替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镇海，办理浙江军务。裕谦是旗人中主张坚决抗英的大员。他到浙江后，督饬文武官吏采取措施，加强定海、镇海等要地的防务。他督令定海守军在道头以东的东岳山顶筑炮城1座，周长131丈，并于南面接筑半圆形月城1座，长21丈；东自青垒山经东岳山、道头至西部的竹山脚，沿岸横筑土城一道，长1436丈，土城上设土牛，配置火炮；又在青垒山、晓峰岭等山择要安设炮位。英军再次进犯前，定海城附近各山共有铜铁大炮22门，城垣周围有大小火炮41门，土城之上有火炮80门。另拨给兵船铁炮10门、抬枪100杆。守军共5600人，由三总兵指挥分段防御：郑国鸿率部守竹山，王锡朋率部守晓峰岭，葛云飞率部守土城和东岳山。此外，还招募水勇580名，造买各种船100余只。定海的设防虽较前有明显的加强，但只注意防守海岸土城一线，未能利用县城外围山岭构筑防御阵地，正面御敌的土城既不坚固，又不便集中火力打击敌舰，且又不注意构筑防炮掩蔽部。这些，都严重影响防御作战的稳固性。

9月23日，璞鼎查、巴加和郭富率领英舰6艘、测量船1艘、轮船4艘、运输船19艘，装载陆军约2000人，到达舟山附近海面，进行登陆作战准备。26日，轮船“复仇神”号和“弗莱吉森”号乘潮闯入竹山门，窥测形势。葛云飞督军发炮，断其大桅一根，英船由吉祥门窜出，旋又从大渠门绕入，复被土城守军击退。28日，英舰“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及轮船“复仇神”号连樯驶入，炮击晓峰岭，并派兵乘舢板登陆，被王锡朋率兵击退。29日，英军携臼炮3门，登上靠近道头港的大小五奎山，构筑炮兵阵地。

10月1日上午，英舰队连樯驶进，用舷炮向土城西端之竹山、

东岳山的炮城和土城东段阵地轰击，大小五奎山上的英军炮兵也发炮配合。随后，英陆军在炮火掩护下，分左、右两纵队强行登陆。

左纵队由第55团、第18团及炮兵队、工兵队、来复枪队组成，约1500人，在道头港以西至竹山一带登陆，进攻竹山和晓峰岭。右纵队由第49团、海军营等组成，辅攻土城东段之东埔港。首批登陆之第55团向晓峰岭发起进攻，王锡朋指挥清军对登陆之敌进行顽强抗击，士兵所用抬枪因连续施放，枪膛发红，不能装打，仍进行白刃格斗，舍命死战。英军依靠优势火力，抢登晓峰岭。王锡朋中炮牺牲，弁兵伤亡甚众。英军遂攻占晓峰岭。第二批登陆的第18团从间道进攻竹山，郑国鸿督军死战，亦壮烈殉国。18团占领竹山后，沿土城向东进攻。土城清军在葛云飞指挥下顽强抗击，葛不幸中炮牺牲。不久，18团占领了东岳山。右纵队在道头以东登陆后，在第18团支援下，击溃了土城东段的清军。至此，定海城东、西前沿阵地全被英军攻占。

10月1日下午2时，英军进攻定海城。署定海知县石浦等婴城守御，负伤殒命，守军不支而退，该城再次沦入敌手。

舟山本岛面积较大，大部为山地，即使县城失守，仍可利用有利地形牵制和袭击侵略军。第一次定海之战后，裕谦曾有这方面的建议，但他到浙以后，却没有在各岙部署部队，先事绸缪。三总兵阵亡后，已无人招集溃散兵勇继续与敌周旋，致使英军得以迅速转移兵力，进犯镇海等处。

四、镇海、宁波的抗英作战

英军攻占定海后，供应非常困难，急谋进窥镇海、宁波，作为过冬营地。

镇海与定海一衣带水，东濒甬江，北临大海，上溯甬江可直达宁波。甬江口西岸之招宝山与东岸之金鸡山夹江对峙，为镇海之天然屏障。这时，镇海的防务，在裕谦等指导下，已有所加强。

在招宝、金鸡两山加筑了炮台和工事，增设了炮位，各炮台共安设大小火炮 86 门。在甬江口填塞巨石，暗钉木桩。共有守兵约 5000 人，其部署是：提督余步云率领 1000 余人防守招宝山及其以西之东岳宫，总兵谢朝恩率 1500 余人防守金鸡山，总兵李廷扬率数百人防守东岳宫以西的拦口埠炮台，构成犄角之势。沿江两岸停泊火攻船只，凡可登陆之处，均挖掘暗沟，密布蒺藜，分驻兵勇。裕谦率 1000 余人坐镇县城指挥。战前，他向道光帝表示，誓与镇海城共存亡，"盖因镇海地方稍有疏虞，则逆胆愈张，兵心愈怯，沿海一带，必将全行震动"①。

10 月 9 日，集结在镇海外海黄牛礁的英军完成了临战准备。其作战部署是：以舰炮摧毁金鸡、招宝两山的炮台和工事，并阻止镇海县城清军增援，掩护陆军登岸，攻占上述两山，尔后水陆并进，夺取镇海城。登陆部队分 3 个纵队，共 2293 人。左纵队由步兵第 55 团、第 18 团及部分炮兵、工兵组成，共 1061 人，携山炮 4 门、臼炮 2 门，由郭富指挥，进攻金鸡山。中央纵队由步兵第 49 团及炮兵、工兵等 465 人组成，携榴炮、野战炮各 2 门，由马利斯中校指挥，协助左纵队夺占金鸡山。右纵队由水兵、海员以及炮兵、工兵等 767 人组成，携臼炮 2 门，由荷伯特船长指挥，进攻招宝山。

10 日黎明，英轮船"复仇神"号载中央纵队步、炮、工兵，由军舰"巡洋"号掩护，在甬江南岸登陆；轮船"弗莱吉森"号载左纵队步、炮、工兵及来复枪手，由金鸡山后的小浃港登陆。两路夹攻金鸡山，守军虽腹背受敌，仍顽强抵抗，终因伤亡过多，不敌而退，总兵谢朝恩受伤落海牺牲，金鸡山遂为英军所占。与此同时，共载炮 192 门的英舰"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布朗底"号，以绝对优势的炮火对招宝山实施猛烈轰击。余步云贪生怕死，率先弃台逃往宁波。上午 11 时许，英军右纵队在招宝山

① 裕谦：《筹防镇海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 1226 页。

西北麓登岸，旋即占领招宝山炮台，居高临下，俯击镇海县城，掩护步兵缘梯攻城。当日下午，镇海城失陷。裕谦为实践其与城共存亡的誓言，在县城危殆之际，投泮池自尽，经兵丁救起，仅存微息，次日死于余姚城附近。

英军侵占镇海后，海军司令巴加于13日率“摩底士底”号等军舰4艘和轮船4艘，载兵700余人，直犯宁波。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所部清军2000余人弃城逃往上虞，英军唾手而占浙东重镇宁波。此后，清军慌忙在曹娥江一线设防。

英军侵占定海、镇海、宁波，随后又骚扰余姚、慈溪、奉化，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其罪恶行径激起浙东人民强烈反抗。宁波、镇海等地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神出鬼没地打击侵略者。宁波“黑水党”屡出奇计，“四散隐伏，两月之中，擒斩数百”，引起“英人大恐”。①人民群众的英勇抗英斗争，与余步云之流拥兵不战，望风溃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五、浙东清军三路反攻

英军第二次北犯以来，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于是江苏、山东、直隶、奉天纷纷告急。朝廷内外交章奏议，有的主张调兵堵剿，有的散布妥协乞和论调，众说纷纭。道光帝为维护其统治利益，决定再实行一次“大张挞伐，聚而歼旃”的大反攻，以挽回败局，显示“天朝兵威”。早在10月18日和22日，先后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同时，下令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甘肃抽调部队，迅速开赴浙江，听候调遣。他要求奕经等严明部队纪律，做到赏罚必信，并事先下发翎顶、赏品和用银7万两制作的武功牌750张，激励部

---

① 汪洵：《光绪定海直隶厅志》，见《鸦片战争》(四)，第384～385页。

队“锐意图功”。

早在厦门失陷以后，道光帝就命令奕山等督率兵勇对留驻香港的英军，“痛加剿洗，使彼首尾不能相顾”①。定海、镇海和宁波失守后，他在命厦门守将“乘机整旅，痛加攻剿”的同时，又严催拥有兵勇3万余名的奕山集兵攻剿，使浙江的剿办易于成功。但奕山害怕“一经剿办，则该逆大帮夷船，必致窜回广东，再图滋扰”②，因而始终按兵不动。福建方面也毫无行动。这种只图苟安一隅，不顾战争全局的行径，使英军得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专意对付浙江的清军。

至于奕经，自离京以后，也以各种借口蓄意迁延，直至1842年1月21日才到达嘉兴，筹划反攻事宜。他认为浙江河渠港汊纵横，陆地多为水田，积水泥泞，道路狭窄，“势不能纯用正兵大队攻剿”，应“以正兵明攻其前，以奇兵暗袭其后，同时并举”。③当时，他的幕僚臧纡青建议：从山东、河南招募勇士万人，于沿海及本地招募渔、疍、盐民2万人，分伏宁波、镇海、定海，袭扰敌人，使其“步步疑忌惊惶，所在皆风声鹤唳，俟其魂飞气馁，然后蹙以大军，伏舟港口，内外交逼而尽歼之”；同时，派当地绅士各率兵勇分伏于定海、镇海、宁波三城，“预为内应”。④奕经对这一建议，只采纳了“里应外合”之法，而摈弃了“散战疲敌”之策。

2月10日，奕经等移驻省城杭州。3月上旬，各省援兵1.1万人及水勇、乡勇2万余人，抵达浙东前线。奕经等决定本着“明攻暗袭”方针，实施反攻作战，收复失地。具体部署如下：水路

---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172页。

② 奕山等：《省河要隘亟须填塞并现在防堵英军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522页。

③ 奕经等：《兵勇布防情形及行营移驻嘉兴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580页。

④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01页。

（即东路）以乍浦为基地，由已故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指挥水勇、义勇及火攻船只，陆续渡海，潜伏于定海城外、舟山岛各岙以及敌船必经要道六横山一带，候期举动。陆路（即南路）分为两支：一由总兵段永福率兵勇 2300 余人，在距宁波 30 余里的大隐山集结，准备进攻宁波；一由副将朱贵率兵勇 1900 人，在慈溪西门外的大宝山集结，准备进攻镇海。此外，还在宁波、镇海之间的梅圩预伏壮勇 3900 人，准备截击援应之英船。另由余步云率兵 2000 余人驻奉化防堵；文蔚率兵 2000 人进驻慈溪西北之长溪岭督战；奕经率兵 1350 人驻绍兴以东的东关居中调度；特依顺率兵 1200 余人驻杭州城南万松岭，作为后路援应，兼顾省城和乍浦等地。

当奕经等得知“内应壮勇，均已安插妥协”，而“兵勇距敌较近，惟恐稍迟，致有漏泄”，便决定于 3 月 10 日夜发起反攻。① 其实，清军的行动英军已有所察觉，并作了相应的准备，所以反攻作战已不存在出敌不意的条件。

10 日夜，从大隐山出发进攻宁波的一路，分头进攻南门和西门。都司李燕标带领前锋义勇 400 余人，潜赴南门，在内应配合下，冲进城内，于直奔府署途中，遭英军阻击，不支后退。稍后，段永福率领的大队赶到西门，爬墙而入，沿街进攻。英军从楼房上抛掷火球、火箭，清军进攻受阻。次日天明，清军全部撤出战斗，反攻宁波遂告失败。

从大宝山出发进攻镇海的一路，分攻镇海西门和招宝山炮台。进攻西门的都司刘天保部数百人遭到英军顽强抵抗，加上由朱贵率领的后续大队因走错道路未能及时援应，便于天色微明时撤出战斗。进攻招宝山的部队，进至炮台附近时，突遭守台英军和英舰炮火轰击，不支而退。反攻镇海的战斗也告失败。

渡海进攻定海的义勇，或因风潮不顺，或因英军已有戒备，一再推迟行动。直至 4 月 14 日，才由郑鼎臣组织了一次夜袭，围攻

---

① 奕经等：《剿袭宁波镇海未能即时克复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1663 页。

泊于道头港的3艘英船，虽使其受到一定的损坏，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清军反攻失败后，主力集结于慈溪大宝山及长溪岭一带。英军决定由防御转入进攻。

3月15日晨，巴加和郭富率领“皇后”号、“复仇神”号及“弗莱吉森”号3艘轮船和数十只舢板，载兵1200余人，携火炮4门，自宁波溯江上犯。慈溪守军不战而逃，英军穿城而过，分路进攻大宝山清军营地。防守大宝山左侧的刘天保部500人，稍事抵抗即行溃散。防守大宝山右侧的朱贵父子率兵400余人，与敌鏖战竟日，坚守阵地。因驻长溪岭的文蔚畏敌怯战，不及时派兵增援，最后朱贵父子壮烈牺牲，所部官兵大部阵亡。英军攻占大宝山后，于次日中午向长溪岭进攻。文蔚拥兵数千，竟不敢与敌交锋，于当晚逃往曹娥江以西的绍兴。17日，英军撤回宁波。

20日，奕经以应援靠近省城的尖山为借口，率部退守杭州。他在奏折中称：“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① 诚然，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无论广东还是浙江，确有一批见利忘义、为虎作伥的汉奸，给英军充当向导、提供情报、接济食品，给清军的作战造成了困难。但是，把作战的失利说成完全是汉奸造成的，显然与事实不符。清军反攻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奕经等战役指导上的严重失误。他们既不采纳臧纡青的伏勇散攻之计，又不采取集中兵力各个破敌之策，却以不足其所部一半的兵力，分成三路，同时进袭各有1000余英军（当时英军已从印度新调来2个团的兵力）驻守的浙东3城，且在具体部署上只有奔袭一手准备，而无强攻的准备，如此轻率用兵，焉能取胜！宁波、镇海反攻作战失利后，尚有6000多清军未受损失，如果奕经、文蔚等身先士卒，激励士气，严明纪律，战事尚有可为。无奈，奕经远离前线，文蔚率先逃跑，这

① 奕经等：《接仗不利长溪岭等营盘被焚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669页。

就丧失了扭转败局的最后希望。

浙东反攻失败后，道光帝开始认识到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战，而且陆上也不能战，“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一见逆夷，辄即纷纷溃散”①。于是，抗战的决心再次发生动摇。他在奕经的奏折上朱批：“前番布置，似乎确有把握，一经动作，受亏退步，又欲俟数千里之外续调之兵到齐，再图进剿，无论旷日持久，必能保其成功乎？”② 同时，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害怕出现“外患未除，内讧又起”的局面，也促使他希望尽快结束对外战争。但是，他仍然希望能够在军事上出现转机，以保持王朝的体面威风。为此，作了战与和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增兵浙东，令奕经激励士气，“相机攻剿，收复郡县”；令牛鉴等严防吴淞海口；并继续催促奕山等伺机反攻，收复香港，“以扬国威”。另一方面起用投降派，于3月底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署理杭州将军，会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赶赴浙江前线，办理“羁縻”事宜。而此时英军已决定进行新的军事行动，对清廷的乞和予以拒绝。

第五节　英军调整战略部署与吴淞、镇江之战

一、英军调整战略部署和扩充兵力

璞鼎查等指挥英国侵略军于1841年8月开始北犯中国闽、浙两省的军事行动，主要是遵循巴麦尊的训令，实施其既定的战略方针。但是，英国新任外相阿伯丁于同年11月4日致璞鼎查的信表明，英国的侵华战略已作了某些调整。该信指出：“虽然女王陛下的军队可能已奏肤功，可是并不见得战争会宣告结束……女王

---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1553页。

② 转引自奕经等：《英人递书暂示羁縻并请调劲兵攻剿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693页。

陛下政府已决定作必要的准备，以便继续从事于强有力的和决定性的战役。”他要璞鼎查在与清政府谈判时，坚持要求开辟商埠，并勒索赔款，但不能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或使战争延长。信中还透露，除霸占香港外，英国政府拟改变原训令关于长期占领舟山等沿海岛屿的打算，因为“把这些占有地永久保留在英国国主领域之内，却会使庞大而固定的开支随之而来”，而且会使英国人“在政治上同中国人发生更多全无必要的接触”。[①] 英国政府虽然侵略中国的野心不小，但又害怕陷入中国人民长期抗英斗争的困境之中，从而暴露了它的既贪婪又虚弱的本质。

基于以上战略构想，英国政府决定从英国、印度增派陆、海军来华，以期通过“决定性的战役”尽早结束战争。与此同时，英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情况，作进一步调查研究，以便寻求尽快实现其侵略目的之途径。他们认为：北京为京师要地，已集结重兵，若直攻北京，会遭到顽强抵抗，如清政府内迁，届时难以找到谈判对象，势必迁延时日；但华北地区比较贫瘠，清政府所需的物资钱财主要仰给于南方各省，并经由运河输送；如果英军沿设防相对薄弱的长江下游进攻，占领南京，控制大运河，阻断漕运，清政府就无法拒绝英国的各种要求，这样，“不但所有作战的实际目标可以迅速达到，而且可以产生同等深刻的精神效果”。[②] 根据上述分析，英军决定待援军到达后，沿长江西进，封锁运河口，夺取南京（参见附图 3）。发起进攻的时间，选在漕运旺季春夏之交。

方针既已确定，英军的主要任务便是集结兵力。印度殖民当局根据英政府的训令，派遣军舰 7 艘和陆军约 7 个团于 1842 年上

---

① 《阿伯丁伯爵致亨利·璞鼎查爵士函》，〔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 755～756 页。

② 〔英〕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扬子江战役及南京条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下同），第 145 页。

半年陆续来华，从而使侵华英军共“拥有军舰二十五艘，载炮六百六十八门，轮船十四艘，载炮五十六门，医院船、测量船及其他船舰共九艘，运输舰还没有计算在内。地面部队，除了炮兵以外，有步兵一万余人”①。为了集中兵力，英军还于 1842 年 5 月上旬主动撤出宁波，并将镇海守军减至军舰 2 艘、陆军 200 人，主要控制招宝山，与定海守军遥相呼应，牵制浙东清军。

二、英勇的吴淞阻击战

1842 年 5 月 13 日，英军舰队离开甬江口外黄牛礁海域，开始向长江口进犯。18 日，以“皋华丽”号等 7 艘军舰、“皇后”号等 4 艘轮船和运输船多只，载兵 2200 余名，分 3 个纵队，向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乍浦发起进攻，付出了 1 名上校和 1 名上尉死亡、1 名中校和 5 名上尉中尉受伤、50 多名士兵伤亡的代价，于当日占领乍浦城。英军对该城大肆烧杀抢掠后，于 28 日全部登船北驶，6 月 8 日在长江口外的鸡骨礁一带集结。13 日，该舰队驶泊于吴淞口外约三四里的江面上。14、15 日，派出轮船测量吴淞水道的深度，并安放浮标，为进攻舰队指明航道。

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存在着严重的轻敌思想。在英军舰队正向长江口开进途中，他还奏称：“惟夷目性多畏慎，又不志存疆土，故江省海防，止须扼定吴淞一口，由吴淞而入扬子江，逆夷虽有内犯之言，然相距数百里水程，亦不过虚词恫喝，臣反复体察，逆夷不犯内河，竟属确有把握。”② 前敌统帅如此麻木，势必影响长江下游的防御作战。

吴淞位于宝山县境黄浦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为长江第一道门户。西岸为宝山县城，县城东六七里为杨家嘴，建有炮台一座，称

---

①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 331 页。

② 牛鉴：《江苏洋面静谧现仍严防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1877 页。

西炮台。炮台东南为一条小河的出口，名蕰藻浜。吴淞镇即在蕰藻浜的北岸。从宝山县城东起，经西炮台至蕰藻浜，沿江堤筑有高约 2 丈的土塘，上筑土牛，缺口处安设大小火炮，连同西炮台的火炮在内，共有 134 门。吴淞口东岸，筑有一略呈圆形的炮台，称为东炮台，也筑有土塘，共安炮 20 余门。另在蕰藻浜北岸江堤上修筑了新月堰炮台，安炮 10 门。兵力部署如下：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率兵 1000 余人守西炮台、新月堰炮台和土塘；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率兵 700 多人守宝山县城西北 3 里许长江边的小沙背；川沙营参将崔吉瑞等率兵 1000 余人守东炮台；牛鉴率兵 2000 余人驻守安设火炮 50 余门的宝山城。吴淞口内江面有大小师船 16 艘和以齿轮带动明轮的轮船 4 艘，分由守备田浩然和游击刘长管带。另在吴淞与上海之间的东沟设炮数十门，驻兵四五百名，防止英军进窥上海。上海则有守兵 1300 余人。

英军经过详细侦察，于 6 月 16 日晨向吴淞发起进攻。针对清军的设防情况，确定实行以正面进攻为主、辅以侧后夹击的作战方针：以“皋华丽”号、“布朗底”号和“北极星”号 3 艘重型军舰（共载炮 140 门）组成主力舰队，由轮船“谭那萨林”号和“西索斯梯斯”号拖带，从正面进攻西岸土塘和西炮台；以“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克里欧”号和“阿尔吉林”号 4 艘小型军舰（共载炮 58 门）组成轻型舰队，由轮船“复仇神”号、“佛莱吉森”号、“伯鲁多”号拖带，进攻蕰藻浜口的新月堰炮台和江面清军船只，并掩护登陆部队于吴淞镇附近登陆，威胁清军侧后。参战的登陆兵力为步兵第 26 团、49 团、18 团、炮兵四五个连队及海军陆战队等。

当重型军舰进入西炮台附近作战水域时，陈化成指挥守军以猛烈炮火进行阻击。激烈的炮战达两个多小时，英旗舰“皋华丽”号及其它军舰被击中多次，死伤 20 余人。陈化成虽年近古稀，在近两年的备战中，无论寒冬酷暑，始终坚守阵地，与士卒同甘共苦。在此次炮战中，他奋不顾身地亲自操炮轰击敌舰，以激励士气。牛鉴 3 次催令陈化成退避宝山，均遭拒绝，不得已从宝山

率兵增援吴淞。英舰发炮轰击，炮弹落在牛鉴身旁，这位信誓旦旦地声称与“陈化成戮力同心，激励将士，有进无退”[1]的前敌统帅竟惊慌失措，扭头就逃，一直跑到嘉定，驻守小沙背的王志元也随之率部逃跑，严重影响了西岸守军的士气。当英主力舰队与西岸守军激烈炮战之时，“摩底士底”号等4艘英舰逼近吴淞镇南的蕴藻浜，以猛烈炮火轰击新月堰炮台，掩护登陆兵上岸，企图攻占吴淞镇，由北向南绕击西岸土塘清军的侧背。吴淞镇守军多次以近战肉搏进行反击，予敌以杀伤，迫使其后撤。这时，西炮台正面已被英军突破。陈化成面对敌军前后夹击，仍率兵100余人坚守炮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英军占领西岸土塘和西炮台后，随即占领了宝山县城。吴淞东岸的东炮台，因守将畏敌，兵勇溃散，被英军两艘轮船“西索斯梯斯”号和“谭那萨林”号上的武装人员攻占。

吴淞要塞虽有陈化成那样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但因炮台和土塘构筑简陋，火炮质量低劣，尤其是分散配置于土塘上的火炮不便集中火力攻击敌舰，而敌舰却能集中火力攻击炮台，加上土塘和炮台之后，没有配置预备队，以致容易被敌突破。牛鉴、王志元等贪生怕死，当陈化成等与敌苦战之际，竟率部逃跑，更加速了西炮台的陷落。

16日晚，侵华英军又得到从印度派来的2500人的增援。19日，英军分水陆两路向上海进犯。由于该处守军先已撤退，英军未遇抵抗就侵占了上海。上海制炮局新铸的171门铜、铁炮和1.8万吨火药以及大批存粮均落入敌手。21日和22日，部分英军两次进犯松江，均被总兵尤渤率领的2000名陕甘兵击退。23日，英军退出上海，集中于吴淞口外，扬言北上天津，实则准备溯江西犯。

---

① 牛鉴：《英船连艅驶至海口尚未开仗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1913页。

三、悲壮的镇江保卫战

长江下游沙线曲折，荻港纷歧，苇洲林立，又有福山、鹅鼻嘴、圌山、焦山、象山、金山等，或陡出江滨，或屹立江心，成为天然屏障。但在牛鉴“江南防海要地，不能不聚精会神，全注于宝山之吴淞一口”① 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不仅不注意因险设防，反而将镇江城内的大炮也调往吴淞。英军攻陷吴淞后，清廷听信“逆夷有北赴天津之谣”，继续调兵遣将，加强天津、大沽、山海关等地的防务，对于长江下游，仅由浙江调兵 3000 多人（后又陆续增调），协助江苏驻军防守沿江要隘。同时，催令耆英、伊里布由浙江驰赴江苏，会同牛鉴加紧议和，准备接受割地、赔款、开埠等无理要求。

7 月初，英军援兵全部到齐。7 月 6 日，璞鼎查、巴加和郭富率领 11 艘军舰、9 艘轮船、4 艘运兵船和 48 艘运输船，装载陆军 1 万余人，驶离吴淞口，乘江水盛涨之机，溯长江上犯。所有舰船编组成先锋舰队和 5 个纵队，每个纵队有 8～13 艘运输船，由 1 艘战舰率领（第 3 纵队由 1 艘运兵船率领），并接受该舰舰长的指挥。各队编成情况如下：

队　　名	战舰（艘）	轮船（艘）	运兵船（艘）	运输船（艘）
先锋舰队	7（“司塔林”号等）	5		
第一纵队	1（“加略普”号）	1		8
第二纵队	1（“布朗底”号）	1		10
第三纵队			2	9
第四纵队	1（“安度明”号）	1		13
第五纵队	1（“戴窦”号）	1	2	8

① 牛鉴：《吴淞海口紧要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 1475 页。

每纵队之间，保持3～5公里距离。沿途以测量船为先导，边测量，边开进。另外，英军在吴淞口留下军舰“北极星”号和“阿尔吉林”号，用以封锁长江口，保障后路安全。英军舰队在西犯过程中，只遇到福山、鹅鼻嘴、圌山等处少量清军的微弱抵抗，于17日驶达镇江江面，随即封锁瓜洲运河北口，阻断漕运通道。

镇江城雄峙长江南岸，地当长江和运河的交会处，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南京的屏障。城西北有金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拱卫。战前，由副都统海龄率八旗兵和少数青州兵共1583名防守。英军侵占吴淞后，参赞大臣、四川提督齐慎带江西、四川、广西兵1730人、湖北提督刘允孝带湖北兵1000余名仓促赶到城外，协助防守。海龄将全部旗兵收缩城内，登陴据守，而对金山、北固山等制高点却不派兵控制；对于来援之兵则“拒不延入，但使御贼城外”①，形成将领之间互不协同，各自为战。

英军进犯镇江，主要由陆军负责，总计6900多人，由第1、2、3旅和炮兵旅编成。第1旅，军官83名，士兵2235名，由萨勒顿少将指挥。第2旅，军官60名，士兵1772名，由叔得少将指挥。第3旅，军官68名，士兵2087名，由巴特雷少将指挥。炮兵旅，军官32名，士兵570名，由蒙古马利中校指挥。其作战部署：由第1旅、第3旅和炮兵旅担任主攻，负责攻占城西南高地及镇江西门；第2旅担任助攻，指向镇江东北，牵制和分散清军兵力，尔后攻取北门。

7月21日晨，英军开始进攻。第1旅和炮兵旅从金山附近江岸登陆后，直指城西清军营地。经数小时激战，清军不支，齐慎、刘允孝率部退往丹阳以北的新丰镇。第3旅由金山附近登陆后，沿着西城根，直指西门。与此同时，第2旅在北固山一带登陆，直扑北门，爬梯登城。守城旗兵拼死抵抗，有的把敌人推下城去，有的扭住敌人一起跳下城墙。上午10时许，大队英军从北门冲入城内，向西门方向进攻。这时，进攻西门的第3旅正遭清军顽强抗击，城门久攻不下；中午，由爆破队用火药包将瓮城炸开。与此

①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17页。

同时，由北门冲向西门的英军已将内城门打开，于是大队英军蜂拥入城。守城清军与敌人展开巷战，许多旗兵宁死不屈，有的先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与敌人拼死厮杀，直至牺牲。海龄督战到最后时刻，也自焚身亡。英军破城后，进行灭绝人性的奸淫烧杀，繁华的镇江城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镇江保卫战，是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所进行的最英勇悲壮的一次战斗。它表明只要将领和士兵具有敢于牺牲的精神，即使兵力处于劣势，武器装备落后，仍然能够给侵略者以应有的打击，使其付出较大的代价（英军共死伤中校以下官兵 165 名）。这种勇敢抗击，使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具有伟大精神的行动”①。但同时也表明，单凭勇敢精神而不着力改变武器装备和作战指挥的落后状态，则不仅牺牲巨大（旗兵伤亡 503 人、失踪 156 人），而且难以打败凶恶的侵略者。

英军侵入长江后，沿江一带人民和东南沿海各地人民一样，对入侵者进行了英勇的回击。英军侵占宝山、上海等地后，曾多次派遣小分队向内地探路搜索，当地人民自动组织起来，袭击侵略者。太仓皋桥一带农民曾预设埋伏，以锄头击杀登陆之敌。靖江人民用抬枪袭击英舰，迫使其慌忙撤走。镇江、扬州、瓜洲、仪征等地的盐民、渔民，也纷纷拿起武器，狠揍入侵之敌。所有这些，再次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

四、南京“城下之盟”

镇江失守后，道光帝决定“专意议抚”，不仅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而且令奕经所率之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事多掣肘”。② 道光帝还在

①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 333 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2133 页。

赛尚阿建议清军凭借南京天险，与英军决一雌雄的奏折上朱批："无人，无兵，无船，奈何！奈何！"① 透露了不得不和的苦衷。然而，英军仍然不理睬清政府的"羁縻"，他们决心打到南京，逼签城下之盟。

8 月 3 日，英军由少将叔得率第 2 旅及部分炮兵约 2000 人留守镇江，舰队向南京开进，于 9 日驶抵南京仪凤门外草鞋峡江面。11 日，英军在观音门附近登岸，军舰摆开了轰城的架势。当天，耆英从无锡赶到南京，在英军大炮的威胁下，派人与英方进行和谈，14 日即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苛刻条件。接着，道光帝先后发出了"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计"和"各条均准照议办理"的谕旨。② 29 日，耆英、伊里布、牛鉴在侵略军旗舰"皋华丽"号上与璞鼎查签订了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 2100 万银元。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等国也趁火打劫，于 1844 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第六节　战略失误是中国战败的直接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军民反对外国入侵、维护民族尊严的正义战争。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抗英战争中，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可能动用的武器装备，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结果还是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与英方签订屈辱的条约，成为千古遗恨。抗英战争的实践表明，清王朝的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和武备废弛，乃是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正由于此，使中国所具有

---

① 转引自赛尚阿：《沿江攻剿机宜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 2143 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 2277、2307 页。

的兵力雄厚、以逸待劳、有人民支持等有利条件不能充分发挥，所存在的武器装备落后、部队素质低劣等弱点无从改变；同时，也就无法抵消和减杀英军船坚炮利等优势，扩大其兵力不足、远离后方、补给不便等困难；从而也就丧失了战胜敌人的可能性。当然，作战失利的最直接原因，则是由于战争指导上的战略性失误，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明敌情，盲目指挥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又有对中国情况经过长期侦察而制定的具体战略方针。此外，在战争过程中，还继续调查研究，不断完善既定的方针，以便既能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又能缩短战争的进程。英军还十分重视战役、战斗侦察，及时获取清军的情报，确定对策，或先发制人（如进攻虎门），或先行防范（如对付广州和浙江清军反攻），从而争取主动，避免被动。

清王朝则相反。由于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因而对西方列强的情况茫然无知，对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缺乏预见和准备。战争爆发后，仍然不了解英军的战略意图，所以只能提出“沿海各省一体严密防范”、“大张挞伐”之类笼统的不切实际的方针。另外，道光帝往往根据假象和有关将军、督抚的虚假奏报，制定错误的决策。1840 年秋，英军因季节和疫病等原因自大沽南返，道光帝却认为“夷情恭顺”，下令沿海各省裁撤调防官兵，但时隔不久，英军进犯虎门，只好再次调兵加强海口防务。1841 年 6 月，进犯广州的英军撤至虎门口外，道光帝认为“夷氛已靖”，再次下令酌量裁撤调防官兵，不几天，英军便攻陷厦门。1842 年 3 月，清军浙东反攻失利后，道光帝一面增兵浙东，防敌进犯杭州，一面继续加强直隶沿海防务，防敌进犯天津，而英军的进攻方向则是长江下游。正因清廷不明敌情，盲目指挥，所以清军着着被动，而英军着着主动。同样，由于不明敌情，时而轻敌，时而畏敌，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对整个战局造成不利影响。

二、打击抗战派，重用投降派

主持广东禁烟的林则徐、邓廷桢，抗英决心坚定不移，设防备战周密有序。英军开始不直接进攻广州，固然主要由于执行英政府制定的战略方针，但与广州戒备森严也不无关系。遗憾的是随着道光帝抗英态度的变化，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革职，发配新疆。此后，一些有识之士奏请重新起用林则徐，均遭道光帝拒绝，甚至受到批评，致使抗战派受到沉重的打击。此后，道光帝任用的琦善、奕山、伊里布、奕经、耆英、牛鉴等，不是屈服于英军淫威的主抚派，就是怯懦无能之辈。琦善、伊里布、耆英和牛鉴，畏敌如虎，一意乞和，致使关天培、陈化成等爱国将领处于孤掌难鸣的困境，对于广州和长江下游的作战失利，负有重大的罪责。奕山、奕经虽各统兵数万，却胸无韬略，因而既不能“靖逆”，又不能“扬威”。他们身为皇亲贵胄，却贪生怕死，不愿为大清帝国效命疆场。英军北犯闽、浙，继犯长江，他俩竟置道光帝的命令于不顾，不敢身先士卒，率部袭击留驻香港和浙东的少数英军，带头破坏了清廷的集中统一指挥，使清军无法协调一致地作战，从而也影响了道光帝的抗战决心，最后发出了“无人，无兵，无船”的哀叹。用兵之道，择将为先，不选用智勇双全的将帅，而欲争取战争的胜利，乃缘木求鱼。

三、只知调兵堵御，忽视改进战法

清王朝长期奉行防内重于防外的方针，沿海要地兵微将寡，遇到外敌入侵，只好从内地各省零星抽调部队，临时拼凑成军，千里赴援。这些部队，士兵与将领之间互不熟悉，在未经训练的情况下，仓促投入战斗，结果，既乏锐气，又少协同，往往一触即溃。另外，由于交通不便，往往援兵未到，而守军已溃。这种弊

病，战争初期即已暴露，但清廷没有及时总结教训，采取改进措施，即一面就地选募精壮农民和渔民、疍户，充实戍边部队；一面在重要海口附近分别调兵组建战略预备队，统一领导，严格纪律，强化训练，改变号令不齐、散漫无纪、技艺生疏、胆气不壮等状况，以便一旦有警，就近开赴前线，配合作战，即使前沿阵地已被敌突破，尚可在纵深地域继续抗击敌人。这样，既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又可避免贻误战机，增强防御作战的韧性。无奈，不论是浙东反攻，还是长江下游抗战，始终用零星抽调、仓猝应敌的老办法，因而重蹈前期作战的覆辙。

清军在抗英作战的初始阶段，因为不了解近代化英军的作战特点，打些败仗在所难免。正如林则徐所说："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① 问题在于为何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始终一败再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清廷既不及时严惩畏敌怯战的将领，严肃军纪，激扬士气，又不认真研究敌人的作战特点，着力探索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有效战法，而是主观地认为英军长于海战、短于陆战，并且始终依托筑城技术十分落后的炮台和土城等工事，拘泥于阵地防御战，不辅以必要的运动战和广泛的游击战，以致不但不能予进攻之敌以有力的打击，而且一旦要塞或城池失守，便丧失了扭转被动局面的能力。至于诱敌深入，不断分散和消耗敌人，以至最后战胜敌人的战法，则更不敢实行。因为，诱敌深入，必然会暂时丧失一些土地和城镇。可是清律规定，凡丢失城池者，不论是何原因，都将受到严厉的处分，所以统兵将领谁也不愿冒这个风险。何况，当时最高统治集团和前敌将领能有几人懂得只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存城池的道理？另外，这种灵活战法之不能实行，还与前敌将领轻视人民、部队扰害百姓，不能和不敢依靠群众密切相关。奕山之解散三元里抗英义勇，奕经之不采纳臧纡青的"散战疲

---

①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见《鸦片战争》（二），第569页。

敌”之策，就是明证。因此，也就失去了战胜敌人的最有力最可靠的保证。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正当清军与太平军以及其他农民起义武装激烈搏斗之际，英、法两国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新的侵略战争，其目的在于迫使清政府屈服，签订新的条约，攫取比《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更多的殖民特权。这次战争实质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故称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和沙俄极力支持这次侵华战争，以便从中渔利。英、法两国在入侵中国的同时，还在欧、亚、非地区穷兵黩武，所以只能集中有限兵力，进犯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中等规模的战争。战争爆发后，和与战多次反复，共历时四载，因而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

一、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强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0余年间，中外关系虽非剑拔弩张，但资本主义列强并未放松对中国的侵略，而是步步紧逼。首先，英国不以霸占香港为满足，还企图强行进入广州城和在城外租地，经广州民众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迫使其暂时放弃侵略图谋。其它国家也相继展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活动。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葡萄牙在英、法、美支持下，悍然霸占了我国领土澳门。1850～1853年（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沙俄非法侵占我黑龙江省的庙街和库页岛等战略要地，并将其侵略魔爪伸入我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西北边疆。1854年开始，英、法、美三国在上海先

后建立了被称为“国中之国”的租界，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此外，大批冒险家前来中国，在驻华领事庇护下，进行拐卖华工、抢劫商船、偷运毒品等罪恶勾当，损害中国的权益，危害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它们迫切要求向外扩张，以便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中国实行五口通商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运来大量棉纱、棉布和其它商品，向中国倾销，企图获取巨额利润。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很低，以致外国商品经常滞销。同时，英、美等国对华鸦片走私贸易有增无减，也直接排挤了其它商品的销售。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①。然而，贪婪的外国资本家既想尽量扩大鸦片贸易，又想大量倾销其它商品，因此迫切要求中国增辟商埠，开放内地贸易，减轻税收，为其倾销商品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1853年，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今南京），建立起与清廷对抗的农民革命政权，清政府的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英、法、美等国为了静观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暂时打起“中立”的旗号。1853～1854年，上述三国驻华代表与太平天国领导人进行多次接触，发现他们毫无媚外的表示，并坚决拒绝输入鸦片，这就使他们的政府深信，只有跟正处于困难境地的软弱的清政府打交道，才能取得更多的殖民特权。为此，它们在1854年和1856年向清政府进行了全面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的交涉，企图通过外交手段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实现其扩展在华经济、政治特权和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目的。

1854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勾结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麦莲，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其内容包括开放中国沿海

---

①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4页。

和内地各城市，长江自由通航，鸦片贸易合法化，修改税则和免除厘金，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在交涉过程中，他们利诱与威胁兼施，表示："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指太平军），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①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虽然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畏惧，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不愿让外国势力深入中国内地，更害怕公使驻京有损天朝威严，对于他们是否真心帮助镇压太平军也持疑虑态度，因此决定采取"坚守成约"的方针，拒绝了"修约"要求。英、法、美未达目的，便叫嚷要诉诸武力。但当时英、法正倾全力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没有力量单独发动侵华战争，"修约"活动遂暂时中止。

1856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巴驾勾结英、法驻华公使，再次要求清政府"修约"。这时，咸丰帝从法、英军队协助清军镇压上海小刀会和广州天地会起义的事实中，看到外国侵略者确有援助清廷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意向，因而态度有所松动，但仍坚持原订条约的"大段断无更改"，"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以示羁縻"。② 英、法、美鉴于外交讹诈无法取得满意的结果，决心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而这时克里米亚战争已以英、法获胜而告结束，于是决定调集部分兵力，与中国兵戎相见。

二、清政府忽视沿海设防备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临近结束时，道光帝鉴于海口既无坚固的炮台，洋面又无堪与英舰交锋的战船，以致到处被动挨打，便谕令

① 怡良：《接见美使麦莲据云如准其赴扬子江一带通商即助清攻太平军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一），第286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466页。

广东省尽快修复被敌摧毁的炮台，同时制造坚固适用的大战船，其它沿海各省也应“安不忘危”，切实加强海防建设。1842年10月26日，又颁发“加意防范各海口，并妥议善后防守章程”上谕，明确指出：“现在英夷就抚，准令通商，各海口仍应加意防范。”同时，提出了几个应该注意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大小战船及所配器械，无庸泥守旧制，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度；二是各口岸炮台及驻防兵丁，平时如何安排，战时如何层层接应，旁抄夹击，出奇设伏；三是江海要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四是如何训练水陆部队。他要求沿海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① 于是，开展了一次海防讨论，并对加强海防建设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由于受封建统治阶级保守落后思想的影响和官僚腐败等原因，无论是海口炮台的构筑，还是水师战船的制造，均无明显的改进，海防战备始终处于松懈状态。

关于海口炮台的构筑。广东于1843年春修复了虎门要塞炮台，除在原址修复和扩建了威远、靖远、镇远、大虎炮台外，还将横档和永安两台扩建成一座大炮台，在巩固炮台遗址添建了南北两台，在下横档岛新建了横档炮台，在镇远、威远炮台的左右侧各添建了一座山腰炮台。加上新涌、蕉门炮台，共有炮台14座，火炮600门。另外，在省河一带修复和新建了炮台22座。虽然炮台和火炮的数量有所增加，但炮台的构筑仍然是暴露式的长墙高台，只是在炮台周围挖了壕沟，炮墙两侧开了炮洞、枪眼，以便对付从两侧包围之敌。火炮的质量也没有提高，仅将木制炮架改为能使炮身转动的磨盘炮架，并安装了推拉火炮灵便省力的辘轳滑车。其它沿海省份的海口炮台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进，福建、江苏甚至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状态。控扼津京门户的大沽炮台，每座仅安铜铁炮五六门或七八门，另在炮墙内安设一些炮位，都是固定的木制炮架。所有火炮仍然用火绳点火发射，射速慢，射程小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390页。

（最远不过1000米），命中率低。简陋的鸟枪、抬枪也丝毫没有改进。

关于水师战船的制造。1842年，广东在籍郎中潘仕成仿照美国兵船制成样船一艘，不但坚实适用，而且能出洋作战。道光帝命令将造船图说分送沿海督抚，并拟由潘仕成统一监造，然后分拨各省水师使用。但浙江巡抚刘韵珂、两江总督耆英、盛京将军禧恩等均认为福建的同安梭船比较适用，拒绝使用新造的大战船。山东巡抚梁宝常则奏称："旧有战艍各船，弁兵习用已惯，且与北洋相宜，今造新船，长短广狭，似宜悉循旧制。"①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在"北洋形势，不宜水战"的思想支配下，不主张恢复天津水师，认为只要在岸防部队中将熟悉水性的兵丁编成水队，平时加以训练，战时即可应敌。至于战船，则称"度其最灵而北人便于操驾者，莫如本地之商船"。② 这样，道光帝的"无庸泥守旧制"，制造能在海上作战的大战船的计划，除广州制造了10余艘外，其它各省就完全落空了。另外，广东绅士潘世荣雇请外国匠人制造火轮船一艘，因系试制，行驶不甚灵便。奕山等将这一情况奏报清廷，并提出"将来或雇觅夷匠，仿式制造，或购买夷人造成之船"③。道光帝指示："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著即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④ 这样，就扼杀了造船新技术的探索，延缓了战船更新的时间。

关于海防战备思想。19世纪50年代初，一些封建官僚鉴于英国在要求进入广州城的交涉中，一再以武力相威胁，气焰甚为嚣张，认为"英夷之和不可恃"，因而奏请清廷重视沿海战备。清廷

---

① 梁宝常：《酌议托浑布原议善后章程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633页。

② 讷尔经额：《筹议天津各海口善后章程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433页。

③ 奕山等：《查明丁拱辰演炮图说及造船配药各缘由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470页。

④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471～2472页。

一方面认为应“于无事之时，为有事之备”，一方面又提出“总期不动声色，慎密筹防，断不可稍有泄漏，致启疑衅”。[①] 闽浙总督刘韵珂甚至认为：备战“风声一播，夷人定启猜疑，将来首先张皇之地，即为首先纷扰之地，是防夷而适以招夷，未免失计”[②]。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则把广东水师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风涛耐于惯习，炮火熟于点放，船只长于驾驶，器械、火药在在极于精良”[③]，认为外国侵略者不敢进攻广州。上述畏敌和轻敌思想，都严重影响了海防战备的加强，不仅水师战船和海口炮台依然十分落后，而且也没有针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陆师不堪御敌的现实，改进沿海陆师的装备和训练，以提高其作战能力。

当时，英、法等国军队的数量和编制体制，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军队的武器装备却有了明显的改进。其步兵已装备带刺刀的米涅式、李恩飞式和兰开斯特式线膛步枪，有效射程达 1000 米，并提高了射速和命中精度。火炮方面，英国已改用后装线膛阿姆斯特朗炮，法国改用新式的拿破仑炮。这些火炮的炮身轻、射程远（2000 米以上）、精度高、杀伤力强。海军舰艇已有相当部分改成铁壳蒸汽动力舰，并已制成螺旋推进器战列舰，排水量、航速、续航力、攻击力都有所提高。此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还制成了一种适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泛使用。

由此可见，由于刚刚兴起的加强海防的活动，被昏庸的清朝君臣所扼杀，中国的海防建设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在战船、火炮、枪械的性能方面，与英、法相比，更加拉大了差距。

不仅如此，清朝的封建政权愈发腐朽，财政入不敷出，各族

---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第 45 页。

② 刘韵珂等：《陈福建海口防务情形片》，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第 85 页。

③ 徐广缙等：《广东海防情形片》，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第 102 页。

人民的起义方兴未艾，清廷正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这样，就给反侵略战争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而为英、法侵略者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

第二节　广州军民抗击英法军队的入侵

一、英国制造借口，首先挑起战争

（一）“亚罗船事件”真相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以所谓“亚罗船事件”为借口首先发动的。1856 年 10 月 8 日，广州水师营千总梁国定等 40 余名官兵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逮捕了窝藏在“亚罗”号船上的 2 名海盗和 10 名有嫌疑的水手。英国代理广州领事巴夏礼为挑起事端，声称“亚罗”号是英国商船，中国官兵到船上抓人是对英国权利的侵犯，扯落船上的英国国旗是对英国尊严的侮辱，要求广州当局送还全部被捕人员，向英方书面道歉，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事实的真相是，“亚罗”号是中国人苏亚成于 1854 年 8 月建造的商船。苏亚成买到一张港英执照，并雇用一个名叫亚罗的外国人在船上工作，便称“亚罗”船。1855 年，该船卖给另一中国人方亚明。方又取得一张自当年 9 月 27 日起有效期为一年的港英执照，并雇用一英国人为挂名船长。该船雇用的水手中混有在海上抢劫货物和贩运鸦片的海盗。广州水师官兵上船捕人时，港英执照已经过期失效，英方已无权对该船进行保护，至于扯落英国国旗，则纯属谎言。因此，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然而，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和巴夏礼竟无理取闹，纠缠不休，并蓄意以此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二）英军进犯广州

1856 年 10 月 21 日，巴夏礼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限 24 小时内对所提要求作出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报复行动。当时，广

州城内外共有清军1.3万人，其中防守虎门、广州至佛山珠江沿岸各炮台的守军约2000人。但是，叶名琛倨傲轻敌，“亚罗船事件”发生后，未采取任何备战措施，接到最后通牒后，仍不命令清军及时转入临战状态。

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一说少将）西马糜各厘率小型军舰“科罗曼德尔”号、“桑普森”号、“梭子鱼”号（共载炮17门）及划艇10余只、海军陆战队数百人，向虎门口开进，揭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虎门要塞守军因未获开炮拦击的命令，以致坐视英舰在炮口下穿越而过，直达内河。当天上午，英军占领猎德、中流沙炮台。在校场阅看“乡试马箭”的叶名琛得知上述情况后，仍漫不经心地说什么“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并传令“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① 24日，英舰进攻广州河南凤凰冈炮台，守军“遵令走避”，炮台被占，大炮被毁。这时，叶名琛根据部属建议，派兵1500名加强北门外四方炮台的防御，25日又调近郊乡勇5000人，分驻城东、城西。是日英军又攻占了广州城南的海珠炮台，兵临广州城外。

英军攻占珠江沿岸几座主要炮台后，便从10月27日起，用舰炮和海珠炮台的火炮轰击广州外城，并以督署为主要目标，企图迫使叶名琛就范。28日，海军陆战队在炮火掩护下登陆，纵火焚烧靖海门外的民房，延及城楼。29日中午，英军以猛烈炮火将外城轰开了一个缺口。下午，部分英军进扑外城，抚标中军参将凌芳率部英勇抗击。凌芳亲自发射火枪，毙敌数名，不幸中弹牺牲。驻守万寿宫一带的乡勇主动配合清军作战。叶名琛传令：杀敌一名，赏给百金。进入外城的侵略军不满100人，伤亡近30名，在中国军民打击下，不敢久留，便将督署抢掠一空，并将靖海门、五仙门点燃后，慌忙撤回船上。是日，叶名琛从总督衙署迁至内城的巡抚衙门办公。此后，英舰不断炮轰广州城墙和衙署。

---

① 华廷杰：《触藩始末》，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下同），（一），第165页。

11月6日，英舰“加尔各答”号、“南京”号、“大黄蜂”号会同“科罗曼德尔”号、“梭子鱼”号和原泊于商馆前的“英康特”号（共载炮179门），炮击位于竹横沙的东定炮台。该处守军七八十人，在23只水师战船配合下，奋勇还击，击伤敌舰一艘，毙敌100余人。终因弹药不济，水师战船又先后被敌舰击毁，东定炮台陷入敌手。10日，英军再次攻占猎德炮台。12日，英舰从侧后袭击虎门要塞的横档岛炮台，守军400余人与敌展开炮战。约1小时后，登岛英军从西、北两侧向炮台进攻，守军不支而退。英军占领横档炮台后，又分别向武山的威远、靖远、镇远炮台发起进攻。上述三台的火炮数量虽略占优势，但质量处于劣势，加上水师提督吴元猷借故擅离职守，严重影响守军的斗志，以致虎门要塞的三座主要炮台均轻易地被敌攻占。至此，英军控制了从虎门至广州的珠江水域。

在英军进犯广州的同时，包令和西马糜各厘多次照会叶名琛，要求进入广州城谈判，企图迫使叶名琛在侵略军的炮口下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叶名琛以英军炮击广州已激起群众公愤为由，拒绝英方代表入城谈判，使侵略者以战胁和的图谋未能得逞。

（三）广州军民勇袭侵略军

对于英军的入侵，尽管叶名琛不积极组织抵抗，但清军中不少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却满怀义愤，决心痛打侵略者。富有反侵略斗争传统的广州人民更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他们发挥熟悉地形、人多势众等优势，开展广泛的袭击战。11月15日凌晨3时，一队清军战船乘大雾弥漫之际，悄悄驶近两艘英舰，接战20分钟后，迅速消失在浓雾之中。12月22日，英国邮轮“提斯特尔”号，尾系一只满载从广州抢来的珍宝的拖船，在虎门停泊。半夜，200多只中国划艇突然向该邮轮发起攻击，迫使其遗弃拖船，突围而逃。30日，该轮又从广州驶往香港，化装潜入船上的17名义勇，于途中杀死船主等11人，将船开至岸边捣毁。1857年1月4日下午，300多只清军战船从各港汊驶出，围攻3艘英舰，战斗持续了1小时多，清军战船才分头退入河汊之内。与此同时，陆上军民也

积极打击敌人。1856 年 12 月 3 日，一群英军从广州城东的河上登岸，千总邓安邦率东莞勇据守街角和房屋奋勇迎战，毙伤敌数十名，英军狼狈逃回船上。14 日夜，义民纵火焚毁了西关外的商行，迫使侵略者全部退至船上。

爱国军民的英勇作战，特别是出没无常的水上游击战，打得侵略军心惊胆战，惶恐不安。1857 年 1 月下旬，英舰被迫撤至虎门口外，等待援兵。

英军在后撤待援期间，仍不时派出舰船溯珠江游弋，并于 1857 年 6 月 1 日集中舰船 17 艘、官兵 2600 名，与大黄滘附近三山江面的 100 多只清军战船展开了一场激战。当英舰驶近时，清军总兵黄开广挥令水师战船以密集炮火向敌舰还击。结果，有的英舰被击沉，有的受重创，英军官兵死伤 80 余人（一说每 10 个英军就有 1 人被击中），遭受不小的损失。以上战例表明，只要清军官兵具有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精神，加上指挥得当、战法灵活，是可以给船坚炮利的侵略军以应有打击的。

二、抗击英法联军对广州的进犯

（参见附图 4）

（一）清廷的御外方针和英法的侵华战略

在清廷面临农民起义的烽火已成燎原之势的情况下，英、法又发动了侵华战争，这就使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面对复杂的矛盾和严峻的形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决定实行重“安内”、轻“攘外”的战略总方针。在“攘外”方面，实行只要不过多地损害“天朝”国体和尊严，则力争议和的方针，以便尽快结束对外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这一方针，最早反映在咸丰帝接到叶名琛“两战获胜”的谎报后，于 1856 年 12 月 14 日给叶名琛的谕令中。他说：“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倘该酋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自可设法驾驭，以泯

争端。如其仍肆鸱张，亦不可迁就议和，致起要求之患。”① 1857年6月15日，正当英国远征军源源向香港集结的时候，咸丰帝在叶名琛《密陈近日英人情形折》上批示：“惟犬羊之性，诡谲百端，仍当密为防范，勿存轻视之心。俟新酋（注：指额尔金）到后，设法妥办，总宜息兵为要也。”②

叶名琛在上述方针影响下，加上他本人虚骄轻敌，因而自英军撤至虎门口外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广州地区的设防。守军没有增加（仍约1万人），乡勇反被大量裁撤，被打垮的内河水师没有恢复，毁坏的虎门炮台未及重建，仅修复了珠江沿岸的几座炮台和添置了一些火炮，并在临战前夕抽调少数部队布防于珠江沿岸要隘和城北炮台，在城头堆积了沙袋、石块和石灰包。至于部队的临战训练和作战预案等，则根本没有考虑。

以巴麦尊首相为首的英国政府，为了实现其向中国攫取新的权益的目的，决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1857年4月20日，巴麦尊任命原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驻华全权代表，同时从英国本土、毛里求斯、新加坡、印度等地抽调部队组成远征军，开赴中国。英国还照会法、美等国，约其联合出兵。法国欣然同意，以所谓“马神甫事件”③ 为借口，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男爵为全权代表，由海军中将阿希伯纳姆率法远征军来华。美国因国内局势不稳，不能直接出兵，却同意它的全权代表与英、法代表一致行动。沙俄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出使中国，要求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交涉失败后，普提雅廷便与英、法代表同恶相济，合谋侵华。

---

①《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499～500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535页。

③ 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激起当地群众极大愤慨。1856年2月29日，新任西林知县张鸣凤逮捕马赖及不法教徒20余人，后判处马赖死刑。这就是所谓“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

额尔金启程前，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颁发书面训令，赋予他中国之行的具体任务。基本方针是以实力为后盾，前往大沽与清政府代表直接谈判，如谈判破裂，则采取更激烈的军事行动。谈判的要点是：赔偿英国臣民在战争中所受的损失；修订原有的各种条约；允许英人入广州城；增加通商口岸，英国航只进入各大江沿岸城市。军事行动的要点是：1、封锁白河；2、占领扬子江上大运河的入口处；3、占领舟山群岛；4、封锁芝罘（一说乍浦）和其它中国口岸；5、切断大运河通过黄河的出入口；6、在广州上游登陆，控制城市的制高点，并切断其供应；7、在广州城的上方驻扎一支部队。①5 月 9 日，法国政府把内容基本相同的训令交给葛罗和印度支那舰队司令里戈·德热努依里。显然，英、法政府已准备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广州至天津沿海几省。

7 月初，额尔金抵达香港。因葛罗尚未到来，无法一起前往白河，同时得悉印度爆发士兵起义，额尔金便于 7 月 16 日率部分海军陆战队赶往印度。9 月下旬、10 月中旬，额尔金与葛罗先后抵达香港，英、法舰队也相继前来。英法代表和双方海军司令经过商谈，认为北上大沽的季节已晚，因而决定首先攻取广州，尔后北上白河。此时，在华英舰已增至 49 艘，共载炮 549 门，官兵 6400 多人，加上在香港的部队 4000 人，总兵力已逾万人，舰队大部集结于香港至广州一线江面。法国在华舰艇 12 艘，共载炮 216 门，官兵 1400 多人，主要集结在香港、澳门地区。

（二）广州城保卫战

1857 年 12 月 12 日，英、法公使分别向叶名琛递交照会，限 10 天内答复。其主要内容是：两国公使入广州城面见叶名琛；索取广州城外珠江南岸地方；赔偿被焚洋楼货物银两；继续通商贸易。叶名琛复照除同意继续通商外，其余均予拒绝。其实，英法公使在 15 日就已派遣英舰 9 艘、法舰 2 艘，掩护登陆兵 730 名抢

---

① 参见《克拉兰敦勋爵致函额尔金勋爵》，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 84 页。

占了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建立起攻城作战的后勤基地。24 日，英法联军确定了进攻广州的作战计划：

1、27 日至 28 日夜间，工兵连和爆破连先行登陆，并占领二沙尾岛靠航道的登陆点。

2、28 日拂晓开始，联军舰队的 120 门大口径炮同时向城墙轰击，在正南和西南角、东南角打开缺口，并以持续而缓慢的射击压制守城清军。

3、28 日晨，海军陆战队登陆，分三路进攻广州城。中路由斯特罗本泽少将指挥英军和一部分法国水兵，主攻东固炮台，占领后派出云梯队乘夜抵近城墙的护城河，架设好云梯。左路由里戈·德热努依里海军上将指挥法军，阻击从东门和郊区增援的清军。右路由西马糜各厘海军上将指挥英国水兵，阻击从城北各炮台支援的清军，并攻取城北炮台。

4、29 日晨，全部大炮集中轰击城墙，摧毁城上工事，尔后攻城。同时攻取瞰制全城的城北高地。

在侵略军兵临城下，战争迫在眉睫的紧急时刻，叶名琛仍然若无其事，不采取应急措施。他轻信谣传，说什么英国女王已命令其驻华官员“务使好释嫌疑，以图永久相安，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断不准妄动干戈”。① 当僚属与他商量战守问题时，他满不在乎地说：“彼第作战势来吓我耳，张同云（注：英领事馆通事，叶名琛收买的内线，实为汉奸）在敌中，动作我先知之，我不与和，彼穷蹙甚矣。”② 番禺县令李星衢、南海县令华廷杰建议招募乡勇数千人进城防守，叶竟说“谁添兵，谁给饷”。他还迷信扶乩，宣称乩语告知，十五日（12 月 30 日）后便可无事。

12 月 28 日晨，英法联军 20 多艘（一说 32 艘）舰艇的几百门

---

① 叶名琛：《英法二使递来照会已据理回复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 618 页。

②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8 页。

火炮同时轰击广州城和督署，将城墙轰开几个缺口，督署几成灰烬。叶名琛走避粤华书院。随着舰炮的延伸射击，英法联军 5719 人（英军 4729 人，法军 990 人）分别从二沙尾以及猎德炮台与东固炮台之间登陆。驻防东门外的清军千总邓安邦率东莞勇 1000 人，分散隐蔽在灌木丛和坟茔后面，用鸟枪、抬枪和箭簇射击敌人。东固炮台的 70 名守军也发炮击敌。附近村庄的居民也配合作战，杀死敌中尉 1 名及随从多名。联军付出不小的代价后，于傍晚占领东固炮台。

29 日晨，联军登陆部队一部进攻城北炮台。坚守四方炮台的副都统来存指挥八旗兵发炮抵御，毙伤不少敌军。联军进攻炮台受挫，便转而攻城。不久，联军中路主力攻入小北门，旋又占领越秀山。叶名琛调潮勇 1000 人仰攻越秀山，被敌军击退。接着，联军右路和左路部队相继攻占大北门和东门。清军与敌展开巷战，继续打击入城之敌。在两天的广州城保卫战中，爱国军民以劣势的装备，奋勇拼搏，共毙伤联军 130 多人。

30 日，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竖白旗投降。联军占领广州后，组成“联军委员会”，柏贵等在侵略军的刺刀下继续“任职”，为敌效劳。1858 年 1 月 5 日，叶名琛被联军俘获，押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 4 月 9 日绝食而死。

（三）广东军民继续痛击侵略者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城内市民及郊区军民继续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三元里一带民众扩大社学组织，并联络南海、番禺两县民众，在佛山成立团练总局，集义勇数万。广州城外军民，于夜晚潜至城下，鸣锣呐喊，施放火箭，惊扰和打击侵略者。城内市民经常伏于暗处，出其不意地袭杀敌人。6 月 3 日，侵略军 1000 多人分路进攻榕树头的东莞勇和三宝墟的新安勇，结果死伤 100 余人，狼狈逃回。随后，东莞军民贴出挑战布告：“我东莞勇，现驻榕树头，尔外人敢到此与我打仗，定杀尔片甲不回。”① 6 月 6

① 华廷杰：《触藩始末》，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 194 页。

日，巴夏礼率英军1000多人前往，结果遭到伏击，死伤枕藉，巴夏礼也差点被俘。此后，广州军民不断痛打盘踞广州城的侵略军。1858年6月，东莞勇和新安勇先后毙伤出城骚扰之敌100余人。8月10日，新安兵勇又密切配合，将侵入县城之敌杀退，毙敌100余名。1859年1月4日，三元里一带壮勇鸣锣对仗，击退烧房、杀人的侵略军1000人，毙敌10余人。对于广东军民的杀敌壮举，恩格斯早在1857年就曾指出："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①。

两次广州之战，清军在数量上虽占优势，但武器装备落后，军队的组织力差，海防设施简陋，这是败于侵略军之手的重要原因。更主要的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受清廷"总宜息兵为要"指导思想的影响，在敌人进攻之前，不积极进行战守准备，终于为敌所乘。正如御史许其光所指出的："人知叶名琛之咎在不和，而不知叶名琛之咎在不战，其所以不战之故，在误信夷人之求和。"② 此外，水陆统将，怯懦畏敌，战守无策，以致形成"将不勇，则三军不锐"的局面。特别是穆克德讷，非但不组织旗兵抗战，反而于联军攻城次日，竖白旗、开城门投降，更加速了广州城的失守。尽管如此，仍有部分爱国官兵和广大民众戮力同心，奋勇杀敌，予侵略军以应有的打击，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垂史册。

第三节　抗击英法联军对大沽的进犯

一、第一次大沽之战

（一）联军北上大沽与清军设防备战

英法联军虽然侵占了广州，但未能达到"修约"的目的。为

---

①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页。

② 许其光：《再陈广东当时和战之失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263页。

此，额尔金、葛罗密谋策划，决定联军舰队先开往上海，胁逼清政府签订新约，如所愿未遂，即北上白河，威胁畿辅重地，迫使清政府屈服。美、俄公使赞同上述行动计划。1858年3月，英、法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3月底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谈判。清政府令两江总督何桂清通知他们返回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谈判。侵略者未达目的，遂决定前往白河。4月20日，四国公使齐集大沽口外。24日，英、法公使分别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全权大臣与他们在北京或天津进行谈判。美、俄公使打着"调停"的旗号，劝说清政府尽快举行谈判。随后，英舰15艘（共载炮192门、官兵2054人）、法舰11艘（共载炮164门、官兵600人）分批驶达大沽口外。英法联军派出侦察船和奸细，测量附近海域及大沽口入口处的水深，窥探大沽一带的地形和炮台位置及兵力部署，并在水边立标打靶，进行入侵大沽的各种准备。

早在3月3日，清廷接到两江总督何桂清关于英、法公使将赴沪谈判，如不与谈判，即直赴天津的奏报。迟至3月21日，咸丰帝始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天津系畿辅重地，商贾辐辏，亟应严为之备，以免疏虞。……于海口各要隘，不动声色，严密防范。"①谭廷襄认为"夷长于水，而不长于陆"，大沽"设防仍以水路为主，兼备炮台后陆路"。② 据此，由直隶提督张殿元率标兵驻北炮台之后，游击沙春元率部守北岸炮台，署天津镇总兵达年、大沽协副将德魁等率部守南岸炮台，使4座炮台（北岸1座、南岸3座）的守军增至近3000人。谭廷襄率督标兵驻南岸炮台以西之海神庙，庙前用船搭架浮桥，沟通南北两岸联系。为加强大沽防务，清廷委派刑部左侍郎国瑞、护军统领珠勒亨、副都统富勒登泰，督带京营马步队以及火器营、健锐营官兵2000人，分扎白河两岸，作为炮台后路应援。总计大沽一带守军8000多人，壮勇2000人，归

---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67页。

② 谭廷襄：《筹办天津海防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70页。

谭廷襄统一指挥。

与此同时，清廷委派谭廷襄及仓场侍郎崇纶、内阁学士乌尔棍泰、直隶布政使钱炘和在海口与外国公使谈判，劝说英、法、美公使返回广东与两广总督黄宗汉接谈，俄使则由海路至黑龙江与黑龙江将军奕山接谈，并驳斥了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同时在诸如减税等问题上作了某些妥协。但四国公使一再节外生枝，英、法代表气焰尤为嚣张。5月17日，咸丰帝接到谭廷襄等《各国贪得无厌宜拒之以兵》的奏折，即谕令谭廷襄："如果该夷先开枪炮，断无不行还击之理，若我先用武，则彼更有所借口，必致肆其鸱张，愈难了结。……慎勿轻听带兵将士之言，意在邀功，而不思后患也。"① 他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尽量避免重开战端。孰料时隔3天，联军的舰艇就向大沽开炮了。

（二）大沽守军的抗登陆作战

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联军向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以清廷未派全权大臣与其谈判，又不准英、法使节进京为借口，限令在两小时内将大沽炮台交给联军把守，以便护卫公使进京。否则，用武力占领。在这以前，联军进行了战斗编组：以英舰"鸬鹚"号、法舰"霰弹"号、"火箭"号（共载炮20门），登陆部队457人（英军289人、法军168人），攻击北岸炮台；以英舰"纳姆罗"号、法舰"雪崩"号、"龙骑兵"号（共载炮18门），登陆部队721人（英军371人、法军350人），攻击南岸炮台；以"弗姆"号、"斯莱尼"号等6艘英军炮艇载运登陆部队，并以炮火支援战斗；以"斯莱尼"号为指挥艇。

当日上午10时，联军两队舰艇同时向南北两岸炮台发炮轰击。面对敌人的进攻，尽管达年、德魁等将领临阵脱逃，各台守兵仍然奋起还击，击沉敌舢板2只，击伤敌炮艇4艘。法舰"霰弹"号的舰长被击毙，11人被击伤，"火箭"号的副舰长被炸成两段。因当时正值落潮，而固定在木质炮架上的火炮不便随潮变调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787页。

整射程，各炮发射的炮弹大多成为从敌舰上空呼啸而过的远弹，影响了对敌舰的打击。相反，敌舰的火炮却能准确地击中炮台。在敌军舰炮的猛烈轰击下，北炮台的三合土顶盖被击毁，南炮台的护墙被轰塌；木制炮架被火箭击中而燃烧，火炮随之滚落地上，无法继续射击；守台官兵因缺乏掩蔽工事，伤亡甚多。11 时，联军的两支登陆部队从侧翼登岸，向炮台接近。守军与敌展开白刃格斗。这时，谭廷襄、张殿元等贪生怕死，竟弃军而逃，致使士气受挫。后路援军，有的抛弃火炮不战自退，有的一触即溃，有的见危不救。炮台守军只得孤军作战，游击沙春元、都司陈毅等官兵 300 余人先后壮烈牺牲。敌军先占北岸炮台，后占南岸炮台。是役，英法联军共死伤 130 多人。

清军大沽抗登陆作战之所以失利，除了炮台不坚固、火炮性能低劣外，还由于前敌将帅畏敌怯战、后援部队见危不救。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守台官兵表现出了不怕牺牲、勇于杀敌的可贵精神。游击沙春元亲自发炮，击沉敌船一只，在炮台顶盖被轰塌之后，仍坚守阵地，指挥作战，最后中炮牺牲。不少炮位一人倒下，另一人立即替补，发炮击敌。当时的香港报纸作了如下描述："其坚守炮台之人，三次为英人炮弹所中，三次去而复返。又有一弁，于英人逼近炮台时，单身从炮台上跳跃而下，前来迎战。……此等武弁忠勇异常，我外国人亦心慕焉。"①

（三）联军直逼天津，迫签《天津条约》

大沽炮台失守，清廷震惊，急忙派头等侍卫托明阿驰往天津部署防务。同时，从京城和华北、东北调集兵马，一扎南苑，一扎通州（由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指挥），以防联军北犯。5 月 24 日，谭廷襄等率余部退守天津。他上疏清廷，声称炮台既失，营盘被焚，利器悉为敌据，目前形势战守两难，仍宜用抚。26 日，联军炮艇 7 艘乘潮驶抵天津城外。不久，四国公使也随舰艇赶来，宣称如清廷不派全权大臣前来谈判，就先取天津，再进北京。咸丰

---

① 转引自夏燮：《中西纪事》，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190 页。

帝认为“天津设备全不足恃”，于是，摒弃了工部尚书许乃普提出的由军队坚守天津府城，由团练袭击敌人，“必能战而后能抚”的建议，采纳了谭廷襄的“仍宜用抚”的主张，于28日任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前往天津议和。

从6月4日起，在20多天谈判过程中，咸丰帝和不少大臣不愿全部接受侵略者所提出的苛刻条件，尤其反对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由吏部尚书周祖培、工部尚书许乃普、刑部尚书赵光等24人联名上奏的《京师传闻设立夷馆沥陈八害折》中指出：“（公使）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即欲为生聚教训之谋，不可得矣。”①但是，在联军的武力威胁和桂良等坚主“对外不可战”的情况下，清廷被迫于6月26日、27日分别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改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允许英法船只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经商；允许外国兵船在中国沿海及内河游弋；允许英法人员到中国内地经商、游览；传教士可到内地自由传教；对英赔款4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以“调停人”邀功的俄、美公使，则抢在英、法之前，诱逼清廷分别于6月13日、18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半个月，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胁下，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也夫签订了《瑷珲条约》。通过这一条约，沙俄侵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7月8日，英法联军舰队离开天津、大沽南返。

二、第二次大沽之战

（一）清廷加强津沽沿海的设防

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453页。

英法联军南撤后，咸丰帝感到在敌军枪炮威胁下签订的《天津条约》对于维护其封建统治十分不利，于是命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提出修改公使驻京、内河通商等条款。[①] 与此同时，他根据巡防王大臣、惠亲王绵愉关于“夷情反复无常，深恐其贪得无厌”，“天津海口一带，急应妥为布置，以防后患”[②] 的建议，任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统一筹划津沽海口一带的设防事宜。僧格林沁受命后，会同礼部尚书瑞麟、新任直隶总督庆祺等，对以津沽为中心的沿海设防备战，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恢复天津水师。将大沽额设两营 1600 人扩编为 3000 人，从粤、闽两省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 2 艘，配齐器械，派员管带来津，以备操演。

重建大沽炮台，新建双港营垒。经过重建的大沽炮台，由 4 座增至 6 座，南岸 3 座，北岸 2 座，另在北岸石头缝地方添建 1 座作为后路策应。各炮台共装备火炮 60 门，其中有 1.2 万斤大铜炮 2 门，1 万斤大铜炮 9 门，5000 斤铜炮 2 门，西洋铁炮 24 门。各炮台围墙均加高加厚加宽，以增强防护能力。沿炮台坚筑堤墙，循墙修盖土堡，密布炮门枪眼，以备近击。堤墙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栅，以阻敌人接近。另在海口设置 3 道拦阻铁链，配置铁戗、木栅，以遏止敌舰闯进海口。此外，还在天津以南 30 里地势较高、河身狭窄的双港，设兵营 9 处，筑炮台 13 座，安设 1.2 万斤以下大小铜铁炮 81 门。这样，就形成了以大沽为“前敌门户”，双港为“后应藩篱”的纵深防御体系。

从大沽至山海关一线，择要布防。经派人勘察，决定在宁河的北塘口、丰润的涧河口、滦县的刘家河、乐亭的清河口和臭水

---

① 谈判结果，仅将公使驻北京改为公使驻于北京以外的地点，可定期或按公务需要前往北京，其它条款均未改动。

② 绵愉等：《酌裁前路官兵天津海口可否令僧格林沁布置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 1052 页。

沟、昌黎的浪窝口和蒲河口、抚宁的洋河口以及山海关，修复炮垒，部署相应的兵力，以防敌军滋扰。

调兵遣将，加紧训练。清廷应僧格林沁之请，分别从京师、直隶、盛京、吉林、黑龙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等地抽调八旗、绿营兵至天津、大沽、山海关等地驻防，共集中兵力1.4万余名。其中大沽一带7000名（驻南北炮台4000名，其余分驻新城、新河、草头沽等地），北塘约2100名，山海关一带约5000名。僧格林沁还重视部队训练，要求水师战船逐日出海操演，炮兵经常进行实弹射击，做到技艺娴熟。此外，还适当增加了士兵的饷银，使他们安心操防而无后顾之忧。

上述周密的设防部署，为争取防御作战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英法联军再次北犯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政府仍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各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1858年11月，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的弟弟普鲁斯为驻华公使。英政府在给普鲁斯的训令中指出，应拒绝中国人可能提出阻止公使进京的任何计划。1859年4月26日，普鲁斯抵达香港，得知中国的钦差大臣已在上海等候和英、法代表谈判换约问题，并在大沽加强了防卫设施的信息后，决心以武力为后盾，进京换约。英国新任侵华海军司令贺布少将支持这一计划，并令舰队先行驶往上海。6月6日，普鲁斯抵上海后，即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密谋，一致同意拒绝与等候在那里的桂良、花沙纳等会晤，直接北上大沽，“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①。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也决定随同英、法公使北上，进京换约。

6月20日，三国公使抵达大沽口外，与先期到达的英法联军会合。联军舰队由贺布统一指挥，共计舰船22艘，其中英舰20艘

① 《布尔布隆致函外交大臣》，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191页。

（载炮 145 门、官兵 2000 余人）、法舰 2 艘（官兵约 100 人）。另有美国舰艇 3 艘，停泊于附近海面。早在三国公使抵达大沽以前，贺布等就于 6 月 17 日派人知照清军将安设在海口的铁戗、木筏等尽行撤去，以便联军舰队护送公使“完成和平的使命”。这种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清军的拒绝。贺布等遂拟订了作战计划：以部分浅水炮艇驶抵大沽炮台上方河面，配合深水舰艇轰击大沽炮台，然后组织登陆部队攻取南北两岸炮台。以英军为作战主力，共投入舰艇 11 艘（载炮 39 门）；法军配合作战，派出舰艇 2 艘。①

（三）大沽守军痛歼入侵之敌（参见附图 5）

早在 1859 年 3 月，僧格林沁就接到咸丰帝关于外国公使意欲进京换约，天津海口应“扼要严防，毋令片帆驶入”，同时由直隶总督派人“曲为开导”，令其返回上海换约的指示。② 据此，僧格林沁提出了如下建议：“倘夷船一二只驶进海口，谨遵训示，由地方官派员迎至拦江沙外，与之理论”，“设三五只以上蜂拥而至，是决裂情形已露，自未便专恃羁縻。……设竟闯入鸡心滩，势不得不慑以兵威，只可鼓舞将士，奋力截击，开炮轰打”。③ 咸丰帝基本同意这一建议，令僧格林沁“相机酌办”。后僧格林沁又建议让公使由北塘登岸进京。咸丰帝也表示同意。6 月 22 日，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奉命照会英、法公使，让他们由距大沽 30 里的北塘海口登岸，进京换约。可是，侵略者不予理睬，骄横地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④ 这时，大沽炮台的守军荫蔽而又严密地监视着敌军的动向，“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白昼不

① 参战的 11 艘英舰为“欧掠鸟”号、“杰纽斯”号、“鸻鸟”号、“鸬鹚”号、“庇护”号、“茶隼”号、“巴特勒”号、“纳姆罗”号、“负鼠”号、“佛里斯特”号、“高贵”号；2 艘法舰为“诺尔扎加拉”号和“迪歇拉”号。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 1292 页。

③ 僧格林沁：《复陈筹备机宜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 1337 页。

④ 转引自恒福：《洋人骄傲寻衅请派大员办理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 1456 页。

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①,侵略军也始终摸不清大沽的设防底细。

6月25日拂晓，13艘联军舰艇向海口开进，炮艇停泊在离铁戗不远的水面，登陆部队已换乘从海湾抢劫来的木船。在完成开进任务后，贺布便派英舰“负鼠”号和几艘炮艇强行拆除铁戗和木栅，开辟通道。僧格林沁命令守军“隐忍静伺，以慭该夷之骄，而蓄我军之怒”②。下午3时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拆除，贺布立即令“负鼠”号导航，旗舰“鸻鸟”号及其余艇船随后跟进，向横锁海口的铁链进逼，并发炮轰击两岸炮台。僧格林沁命令守军掀开炮帘，开炮还击。由于“围墙深厚，尚足抵御”，且“各炮台口门，适当夷船，与之相对轰击”③，守军炮火得以充分发挥威力。史荣椿、龙汝元指挥南北炮台守兵集中火力轰击在铁链前徘徊的联军旗舰“鸻鸟”号，将该舰舰长拉桑上尉、参谋官凯南上尉等多人击毙，贺布也腰部负伤，改乘“鸬鹚”号继续指挥战斗。

激战至下午4时，参战的联军舰艇大部被击伤，“鸻鸟”号被击毁，舰上的40名水手仅1人跳水逃脱。炮艇“茶隼”号和“庇护”号被击沉，“鸬鹚”号等几艘炮艇搁浅，贺布被迫逃到法舰“迪歇拉”号上。史荣椿、龙汝元又指挥守军集中火力轰击搁浅的炮艇，将“鸬鹚”号击沉，而他们自己也不幸相继中弹阵亡。

当战斗激烈进行之际，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乘快艇前往战区，看望受伤的贺布，并派美舰“托依旺”号去拖曳搁浅的炮艇，以便重新投入战斗。他还命令美军水兵登上英军炮艇参战，从而完全撕下了“调停人”的假面具。

在联军舰艇基本上已丧失战斗力的情况下，贺布仍不认输，于

---

① 僧格林沁等:《英人等到津后两方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39页。

② 僧格林沁等:《洋船先行开炮我军回击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45页。

③ 僧格林沁等:《查明接仗击毁英船俘获人物并守军伤亡各情形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103页。

下午 5 时下达登陆作战的命令。英军勒蒙上校率联军陆战队 1100 余人（一说一千五六百人），分乘舢板 20 余只，由美舰“托依旺”号和联军的两艘炮艇拖曳，在稀疏的炮火掩护下，从南岸登陆。但一靠近浅滩，就遭到清军的炮火攻击，很多陆战队员从船尾跳入深水中，致使弹药受潮，无法使用。当登陆部队在没膝的泥泞地中向前行进时，僧格林沁立即调集火器营的抬枪队和鸟枪队进入阵地，一齐打击敌人，北岸炮台也发炮支援。联军登陆部队人员纷纷中弹倒地，不敢前进，残军蜷伏于沟壕中和土堆后面，等待增援。之后，登陆部队利用夜幕“伏地抢进”。炮台守军施放火弹、喷筒，借着亮光瞄准射击，又杀伤不少敌人。最后，联军只有近百人进至炮台下第一道壕沟边，但步枪已塞满泥浆，运来的便桥又太短，无法架设，云梯也大都折断，无法攀登，完全丧失了攻取炮台的能力。半夜，负伤的勒蒙带着大批伤员和疲惫不堪的官兵，陆续爬上舰艇，狼狈退却。在撤退时，又有不少官兵在清军的焰火照耀下，被狙击手一个一个地打倒。

经一昼夜鏖战，英法联军遭到惨败。参战的 13 艘舰艇中，有 3 艘被击沉，3 艘遭重创，死伤官兵 484 人。清军共投入兵力 4494 人，仅伤亡 32 人，大沽炮台只遭到轻微的破坏。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7 月上旬，英、法公使以及遍体鳞伤的舰艇先后离开渤海湾，折回上海。

在第二次大沽之战中，英法联军之所以战败，清军之所以获胜，各有其原因，值得研究。

联军之败，主要由于贺布骄傲自负，低估了清军的作战能力。战前，“他满脸得意洋洋，神气非凡”，“认为他已稳操胜券”。[1] 他企图重温第一次大沽之战的旧梦，即联军舰炮一阵轰击，清军便弃阵而逃，炮台、营垒唾手可得。正是受这种思想支配，在作战

---

① 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 217 页。

部署方面犯了重大错误：既不认真侦察清军的设防情况，又没有投入足够的兵力、兵器（兵员约占清军的1/3，火炮约占清军的1/2），且在河中障碍物尚未破除的时候，作战舰艇便贸然开进战区，以致在清军炮火急袭下，进退两难，成了挨打的“靶船”。此后，又在缺乏有效火力掩护的情况下，令陆战队登岸，强攻炮台，结果死伤枕藉，彻底失败。

清军之胜，首先，清廷作了谈判与备战两手准备。备战方面，不仅动手较早，而且对大沽的设防布置周密：既加固了炮台，又增设了各种副防御；兵器的配备，大小火炮及枪械兼用，既能致远摧坚，又能近战杀敌，从而收到了守固攻锐的效果。对此，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开始学会了怎样打仗，至少在筑堡防守和火炮操作方面，近年来他们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①其次，僧格林沁、史荣椿、龙汝元等将领，勇猛果敢，指挥得当；部队经过训练，“各营军士，无不奋勇出力”②，形成了压倒敌人的气势。另外，当地群众在战斗打响后，“均各欢欣鼓舞，馈送饼面食物，于矢石交下之时，运赴营盘，络绎不绝”③，给浴血奋战的将士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不具备这些条件，即使敌方指挥有误，也是难于战胜拥有坚船利炮的侵略军的。

清军和联军一胜一负的事实表明，哀兵必胜，骄兵必败，是一条不可忽视的战争规律。

三、第三次大沽之战

（一）英法扩大侵华战争，清廷力图息兵议和

---

① 《布尔布隆致函外交大臣》，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19页。

② 僧格林沁等：《数日与英军相持情形并酌保打仗出力人员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111页。

③ 恒福：《天津民团办理情形片》，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80页。

联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立即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必须对中国政府进行应有的惩处”。英、法两国政府经过协商，决定再次出兵，扩大侵华战争。1859 年 11 月，英、法政府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全权公使，并分别任命格兰特中将、孟托班中将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组成一支新的侵华联军。其中英军约 1.8 万人，法军约 7000 人。至 1860 年 7 月底，英海军在华各种舰艇达 79 艘，地面部队总兵力 2 万多人，其中有骑兵 1000 名，皇家炮兵近 2000 名，工兵 400 名；法海军在华各种舰艇达 40 艘，陆军总兵力 7632 人，其中炮兵 1200 人。从兵力编成来看，明显地增加了地面作战部队。这次侵华的战略意图是：再次北犯白河，进军津京（参见附图 6），迫使清廷对联军在白河所受到的“侮辱”进行“赔礼道歉”，互换和履行《天津条约》，勒索战争赔款和其它权益。

清军大沽告捷后，咸丰帝命僧格林沁督饬所部严守海口，防敌卷土重来。同时，命直隶总督恒福和“接办夷务”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照会英、法公使，仍由北塘登岸换约，“以敦和好”。他指出：“从来驾驭外夷，未有不归于议抚者，专意用兵，如何了局。……今幸得此胜仗，稍挫凶锋，趁此时与之开导，当易有转机。”①他希望乘胜即和，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国内农民起义。1860 年 6 月，英法联军封锁渤海湾，战争已迫在眉睫。咸丰帝却认为联军去年进攻受挫，“未必不心存畏忌”，此次再来，“实则以兵胁和”而已。因此，谕令僧格林沁、恒福等“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虽图快于目前，而贻患于将来”。② 这既表明他对海口设防盲目乐观，也表明他把对付外敌的重点放在“抚”上，而不是立足于“战”。

僧格林沁则认为必须立足于战。他在奏折中指出：“二十五日之战，力挫凶锋，该夷怀愤必深，仍将调集兵船以图报复。若得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 1458 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 2053 页。

中国兵力，使受一二次巨创，该夷虚骄之气，不堪再折，必立见颓挫，可保中国数十年无事。”① 为此，他督饬所部修复大沽营垒，增添炮位，鼓励军心，昼夜严防。大沽一带守军增至1万多名，除防守南北炮台外，其余分驻新城、草头沽、新河、塘儿沽、于家堡等处，作为炮台援应。但随着大沽设防的日趋坚固，他也滋长了轻敌情绪，认为“即使该夷舍命报复，现在营垒培厚加高，密布大炮，各营官兵无不奋勇，足资抵御”②。特别是为了让英、法公使从北塘登岸，进京换约，竟将北塘所设炮位防兵撤至北塘河以北30余里的营城，并在大沽以北之新河派马队驻守，准备待敌登陆后与它进行“野战”。他提出：“夷船驶入北塘，不妨听其停泊，一经上岸，即督马队各兵前往堵截，以防袭我后路。该夷既失船炮之险，我兵又可施驰骋之力，（较之）北塘设防，更有把握。”③ 他的主观愿望在于避长击短，殊不知英法联军不但长于海战，而且长于陆战，特别是增加了陆战兵力、兵器，因而撤守北塘，为侵略军的登陆作战造成了可乘之隙。

（二）联军从北塘登陆，大沽天津陷落

1860年春，联军舰队在北上途中，于4月21日占领舟山的定海，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湾，6月8日法军占领山东芝罘，作为进犯大沽的后方基地。7月19日，英、法公使和两国侵华陆海军总司令在芝罘召开会议，确定联军舰艇“于七月二十八日在北塘河左岸入口处宜于停泊的地方会齐；二十九日对河内可能有的障碍物进行侦察，然后再决定登陆和入侵的方式”④。7月26日，

---

① 僧格林沁：《英法船已全开并送美使进京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99页。

② 僧格林沁：《办理抚局当刚柔相济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522页。

③ 僧格林沁等：《数日来相持情形及北塘防务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465页。

④ 〔法〕布隆代尔：《一八六〇年远征中国记》，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69页。

英、法舰队于渤海湾会齐后，向北塘方向开进，共有舰船 100 余艘，地面部队 1.7 万余人。29 日，联军舰队在北塘与大沽之间距海岸约 13 公里的海面集结，并完成了对北塘海口登陆地点的选择。

8 月 1 日，联军舰船 30 余艘，运载登陆部队 5000 人，于北塘河口登陆，并占领附近的村落。联军的登陆行动进行了一个星期，因僧格林沁执行咸丰帝“以抚为先”的谕令，故没有组织部队对立足未稳之敌进行反击，而是“饬派马队遥为屯扎”，并下令“不得先行迎击，使该夷有所借口”。① 北塘被占后，咸丰帝急令恒福妥善筹办和议。8 月 7 日，恒福照会英、法公使，仍由北塘进京议和换约。额尔金、葛罗复照拒绝，并无理要求清军交出大沽炮台。

8 月 12 日凌晨，联军万余人，携火炮数十门，分左右两路，从北塘出发，一攻新河，一由新河以北向通往军粮城的大路进击。9 时，驻守新河的清军马队 2000 人，分两路迎击敌人。联军集中炮火轰击，清军战马受惊，马队难以近战杀敌，但仍英勇奋战，毙敌多名，俘敌 10 余名。终因众寡悬殊，且伤亡多达 400 余人，被迫后撤，退守距大沽 8 里的塘儿沽。

塘儿沽与大沽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北岸炮台的后路屏障。该处筑有高墙，上开炮洞、枪眼，由副都统克兴阿等率部驻守，连同从新河撤回的马队，总兵力约 3000 人。14 日凌晨 4 时，联军五六千人，携炮 100 余门，从新河出发，于 6 时进抵塘儿沽近郊。停泊在塘儿沽附近河面上的清军水师船只立即开炮阻敌。双方炮战半小时，水师战船被迫撤退。7 时半，联军炮轰塘儿沽，守军发炮还击。9 时，联军一部凫水从苇塘迂回至塘儿沽侧后。守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不得不退守大沽北岸炮台。此战，清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不少官兵壮烈牺牲。法军司令孟托班巡视战场后，曾发表如下感想：“一旦他们将更好地武装起来，而且我们在痛打他

① 僧格林沁等：《英法兵轮驶至北塘情形并照会美使转约英法二使入京换约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 448 页。

们的过程中又教会了他们如何作战的话，那末这些家伙真不知会干出怎样的事来！”①

塘儿沽失守，大沽炮台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僧格林沁由轻敌转为畏敌，向咸丰帝奏称：“大沽两岸危在旦夕”，“能否扼守，实无把握”。② 但他仍然表示要“竭尽心力，设法严防”。咸丰帝闻塘儿沽失守，即于 8 月 15 日调京兵往通州、河西务一带防堵，并调北方各省援兵急驰通州。同时，他给僧格林沁寄去亲笔朱谕：“惟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倚赖之身，与丑夷拚命，太不值矣。……朕为汝思之，身为统帅，固难言擅自离营，今有朱笔特旨，并非自己畏葸，有何顾忌？若执意不念天下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殊属有负朕心”③。军机处王大臣也致函僧格林沁：“该夷如再来攻扑，似无妨我军先竖白旗”，将部队撤至天津，“断不可计较一时之胜败”。④ 他们之所以要僧格林沁离开大沽，一是不让这位被视为“国家柱石”的王爷“轻于赴难”，以致津郡和京师重地无人统兵督战；二是怕这位王爷节节抵抗，影响议和。但是，当清廷命恒福知照英、法公使，大皇帝已派大员前来北塘，伴送他们进京换约，“以期永敦和好”时，英、法公使竟狂妄声称必须占领大沽炮台，使抵津河道畅通，并答应以前所提出的各项条件，方能罢兵息战。

8 月 19～20 日，联军经多次激战，完成了从塘儿沽架桥渡河的任务。21 日晨 5 时，联军集中所有野战炮和舰炮火力，猛烈轰击大沽北岸炮台，掩护步兵进攻，首要目标为石头缝炮台。北岸

---

① 〔法〕德里松：《翻译官手记》，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 275 页。

② 僧格林沁等：《塘儿沽失守大沽危在旦夕现竭力支持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 465 页。

③ 《朱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 2083～2084 页。

④ 《怡亲王载垣等致僧格林沁兵退府城与恒制军熟商守御之策函》，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 469～470 页。

炮台总指挥、直隶提督乐善督率炮台守军开炮还击。双方炮战持续到上午8时，石头缝炮台的弹药库中弹爆炸，联军步队乘势发起进攻。乐善督率守军用鸟枪、抬枪和弓箭、长矛奋勇杀敌。9时许，乐善阵亡，守军大部牺牲，石头缝炮台陷落。其它两座炮台的守军也进行了抵抗，直至炮台陷落为止。这次战斗，清军伤亡近1000人，联军死伤400余人。

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失守，认为南岸炮台已"万难守御"，便按咸丰帝的旨意，于当晚尽撤南岸守军，向天津退却。恒福随即在南岸炮台挂起免战白旗，把三座炮台拱手交给了侵略军。

联军控制大沽炮台后，便由贺布率炮艇5艘、海军陆战队80余人为先头部队，溯白河驶往天津。这时，退至天津的僧格林沁又认为必须与敌军"野战"，"断不可株守营垒，转致受敌"①，故令双港及天津一带防军一律撤退，加上从大沽地区撤出的清军，总计约马队7000人、步队万余人，退至马头、张家湾、通州一带。8月24日，联军不战而踞天津。

清军这次作战失利，固然与北塘撤防，对联军陆战能力估计不足有很大关系，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清廷以和为主的错误决策，动摇了前线统帅的抗战决心。此外，武器装备特别是轻武器落后和战术呆板，也是不能挫败进攻之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第四节　京师外围的阻击战

一、外交谈判的破裂

大沽失陷，天津弃守，咸丰帝极为惊恐，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与英、法公使议和。英、法

① 僧格林沁：《英法军占踞炮台现将官兵撤退布防通州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503页。

公使提出必须全盘接受1858年的《天津条约》、增加赔款、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等先决条件，方可议和。桂良等被迫答应上述要求，从9月2日起与英、法代表巴夏礼等开始谈判。侵略者得寸进尺，又提出停战的主要条件：天津立即开市贸易；赔偿军费，先付给两国现款各三四百万两；撤走通州守军，以便两国公使各带兵1000人进京换约，并由巴夏礼带数十人先入京察看房屋。清廷拒绝了这些"大出情理之外"的条件，谈判宣告破裂。9月7日，咸丰帝朱谕军机处和王大臣等，表示要与侵略军"决战"，并提出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①同时，令军机大臣等增调部队驰赴通州，"以资攻剿"。9日，又发朱谕，表示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② 实际是"扣车调马"，准备逃往热河，以致传言四起，"众怨沸腾"。他只得谎称征调车马原为军事需要，并无离京之意，并下令发还扣调的车马，人心得以稍定。

9月10日，咸丰帝获悉英、法公使欲带兵径赴通州，联军先头部队3000人已自天津向通州开进，便急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再次与英、法公使议和，并告诫僧格林沁断不可轻率用兵，以免影响"抚局"。额尔金等考虑到联军进攻北京，尚需补充军需物资，因而表示愿意谈判，以便争取时间，进行作战准备。9月14日，联军先头部队抵河西务，建立兵站。与此同时，派巴夏礼等到通州与载垣等谈判。巴夏礼除坚持原先提出的条件外，又增加了互换条约时须面见皇帝亲递国书，以及将张家湾一带的清军全部撤退等使清廷无法接受的条件，以致通州谈判完全破裂。于是，僧格林沁按照载垣的通知，将巴夏礼等一行39人扣押送京，作为人质，以利尔后谈判。9月18日，咸丰帝再次下谕，如侵略军胆敢越过张家湾，僧格林沁等"即督兵迎截"，并令恒福等"广集民团，多方激励"，"一闻张家湾开仗，即令津郡

---

① 《朱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233页。

② 《朱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第2254页。

民团截其后路，痛加剿洗”。① 这时，联军已作好了北犯的准备。

二、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9月18日，联军近4000人自河西务经马头进至张家湾附近，敌我双方呈现短兵相接状态。当时，清军在张家湾一带的部署是：僧格林沁的指挥部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由他统率的马步队1.7万人，分散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赴通州及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其中张家湾驻步队1000人，张家湾以东、以南驻马队3000人，准备迎击从正面进攻之敌；另派马队2000人分驻张家湾西南的马驹桥和马驹桥东南的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直接西进，绕道趋京。张家湾的后方，由署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4000人进驻通州，原驻通州的礼部尚书瑞麟所统京营8000人及副都统伊勒东阿所统马步队4000人移防八里桥，作为僧军后援。另由副都统胜保率京营5000人驻齐化门（今朝阳门）以东的定福庄，以便声援僧、瑞两军。以上部署的缺点是：其一，兵力前少后多，且将不适于固守作战的众多马队配置在第一线；其二，没有掌握机动作战的预备队；其三，没有构筑多层次的野战工事。这些，都影响防御作战的稳固性。

18日中午，联军向张家湾清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挥军抵抗，枪炮齐放，予敌以杀伤。正当他分拨马队准备抄袭敌军时，联军炮队突然向马队发射火箭数百枚，以致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清军阵势顿形混乱，马步自相践踏，纷纷溃退。僧格林沁率所部退守八里桥一带，驻防通州的绿营兵也慌忙随僧军撤走。联军占领张家湾，并乘胜追击，一举占领郭家坟和通州城。

联军于张家湾获胜后，稍事整顿，即向通州城西8里、扼通向京师的咽喉要地八里桥推进。其兵力部署分东、西、南三路：东

---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18页。

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指挥的英军；南路为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担负主攻八里桥的任务。由孟托班任总指挥，总兵力五六千人。

驻守八里桥一带的清军总兵力约3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由僧格林沁统一指挥。战前，清廷给僧格林沁作了两次重要指示。一是在9月18日的谕令中指出："该夷所恃火器猛烈，总须以奇兵抄袭，挫其前锋"①。二是在19日的谕令中指出，据拿获的奸细供称："逆夷用兵，马队在前，步卒在后，临阵则马队分张两翼，步卒分三层前进。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前层先行开枪，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针对这种作战特点，清军应派马步劲旅3000人绕至马头一带，以牵其后，"并用暗袭之法，于夜间更番出击，使其自相惊扰"，正面则分兵三路，坚决阻击，用奇正结合战法，使其进退两难。最后强调，"军情变幻靡常，总在出奇制胜"。②上述指示，有利于对敌避长击短，比较切合以弱敌强的实际。但是，僧格林沁没有"遵谕办理"，而是令手执冷兵器的马队首先出击，尔后以瑞麟部迎击东路联军，僧部迎击西路联军，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兵力最少的胜保部迎击南路联军，仍然只用正兵，不用奇兵。

20日，联军马队数百人直奔八里桥附近的咸户庄（今咸宁侯庄），作试探性攻击，为僧格林沁所部击退。21日，三路联军对八里桥阵地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即令步队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内，马队则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击。清军马队大声喊杀，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有的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给敌人造成重大威胁。但是，遭到了据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霰弹的轰击，造成大量伤亡，被迫后撤。联军将清军马队击退后，便乘机进击。南路法军第2旅将大量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使胜保部遭受重大伤亡，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23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27～2328页。

但前者倒下，后者马上替补，指挥官一手舞旗，一手执剑，始终站在最前面，寸土不让地保卫石桥。当第2旅两个前卫连冲到桥上时，守卫石桥的清军与敌展开肉搏战，全部壮烈牺牲。胜保亲督抬枪队向前策应，身受重伤，遂率队退守定福庄，后又退至北京。

在胜保部与南路敌军拼杀的同时，僧格林沁和瑞麟部也与敌展开了激战。僧格林沁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并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之敌。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包围南路之敌的企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之英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甚众。正在相持之际，英军一部向于家卫（今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甚为惊恐，“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队而逃”①，以致军心动摇，纷纷退至齐化门以东的皇木厂。迎击东路敌军的瑞麟部与敌激战约两小时后，先行溃退，后与僧军一同退至齐化门。法军第1旅顺利占领八里桥以东的几个村庄，并协同法军第2旅攻占八里桥。中午，联军占领八里桥附近的咸户庄、三间房、于家卫一带村落后，便停止进攻。

张家湾、八里桥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军与外国侵略军第一次进行较大规模的野战，也是关系到京师安危的关键性一战。英法联军由海口孤军深入，战线拉长，兵力相对分散，粮弹供应困难，人地生疏，存在许多不利因素。清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地形熟悉，又有大量马队便于在通州平原纵横驰骋，具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但战斗的结果，却是清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究其原因，首先，由于僧格林沁囿于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就在不少将领中存在的片面认识，即侵略军专恃坚船利炮，陆上作战非其所长，对其陆军拥有优势的武器装备视而不见，因而沿袭冷兵器时代的战法，对付近代化武器装备的敌军。他之所以置清廷的“总在出奇制胜”的指示于不顾，而将马队用于正面冲击，原以为只要马队勇往直前，将敌军的队形冲乱，步队再上前

---

① 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10页。

一阵砍杀，就可结束战斗。而其结果，正像一个侵略分子所说的："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① 这种背离"知己知彼"原则的作战指导，焉有不败之理！其次，清廷忽战忽和，朝令夕改，也影响前线将士的抗战决心和作战准备。另外，僧格林沁自张家湾作战失利后，已丧失了抗击侵略军的坚定信心，他在给载垣等人的信中说："马步各队经此挫失之后，恐难复振，能否扼截，实无把握。"② 以致在八里桥之战中，一闻英军将抄其后路，便弃军先逃，从而使斗志本不坚定的部队纷纷溃退，导致战斗的迅速失败。

三、联军侵入北京，逼签《北京条约》

清军在张家湾、八里桥败北后，咸丰帝立即撤去载垣、穆荫钦差大臣的职务，以其六弟恭亲王奕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并谕僧格林沁竖立白旗，知照英、法"停兵待抚"，他自己却于9月22日带着皇妃、皇子和一批大臣逃往热河。

奕䜣畏夷如虎，认为战守均无把握，只有屈膝求和。他照会英、法公使，要求停战谈判。联军经张家湾、八里桥战斗，伤亡很大，兵员粮弹均需补充，因此同意恢复谈判。谈判的重点是巴夏礼等人的释放问题，英、法要求先释放后议和，清政府要求先撤军后释俘，谈了近半个月，并无结果。联军却争取了休整时间，做好了进攻北京城的准备。10月5日，其先头部队向城北安定门、德胜门附近逼进。6日，近千联军于德胜门土城外向僧、瑞余部抄

① 〔法〕吉拉尔：《法兰西和中国》，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3页。

② 僧格林沁：《致怡亲王载垣等请于京师妥为布置函》，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93页。

袭，僧、瑞部不战而逃，退至圆明园。坐镇圆明园的奕䜣急忙逃往长辛店。联军由黄寺、黑寺直趋西北，进攻当时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中心圆明园。僧、瑞部向西南溃逃，守园的官兵约 2000 人稍事抵抗，不支而退。侵略军进入圆明园后，大肆抢劫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放火焚烧殿宇及附近民房。

故都北京城墙高厚，外城、内城均挖有宽深的护城河，城上安设大小火炮数千门，城内尚有满汉守军 13.3 万余人，城外另有马步万余人，仓谷钱粮均有储积，存在着防御作战的许多有利条件。当时，只要文武大员具有誓死坚守的决心，激扬士气，稳定人心，凭坚固守，等到各省“勤王”之师赶来之后，实行内外夹击，持久作战，使联军滞留于坚城之下，进退维谷，有可能在严冬到来之际迫其后撤。法军指挥官孟托班就承认：“对这样的城市进行围困，特别是在全然没有攻城大炮的情况下，就很可能旷日持久。而严寒即将来临，我们所得到的全部情报均不允许我们在十一月一日后仍停留在城前。”① 无奈，留守京城的大臣们均认为“城不可守”，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根本不进行固守的准备。10 月 8 日，在联军的威胁下，释放了巴夏礼等人。10 日，侵略者照会清廷，限于三天内将安定门交给联军把守，否则即行攻城。城内的大臣们不敢违抗，如期开门揖盗。联军遂不折一矢，不损一兵，安然进入北京外城。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外城后，随即于安定门城墙上安设大炮，对准内城、紫禁城，摆出攻城姿态。10 月 17 日，英、法公使再次照会清廷，要求于 23 日签约。而联军于 18 日再次闯进圆明园，在大肆抢掠后，竟放火将这世界闻名的“万园之园”焚烧殆尽，对人类文明犯下了滔天罪行。10 月 24 日和 25 日，清廷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同时互换《天津条约》的批准书。条约规定赔偿英、法的军费各增至银 800 万两，将九龙割让给英国，增辟

① 《孟托班将军，八里桥伯爵回忆录》，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 296 页。

天津为商埠，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建教堂，准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拐骗、收买人口出洋做苦工，等等。英、法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已达，联军遂于11月间先后撤出京津地区，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威逼清廷签订新约后，沙俄公使声称“调停”有功，逼迫清廷与之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瑷珲条约》的内容，还强占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美国也趁火打劫，利用“利益均沾”条款，获取了《北京条约》中列强所勒索到的各种特权和利益。

第五节　清政府的重大战略失误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等国利用中国政局不稳之机，以有限的兵力在我国局部地区进行的一次不义的战争。它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尽量扩大在华殖民特权，同时保存清政府为其效力。通过4年的战争，英、法等国终于实现了上述目的。至于中国，不仅丧失了大量领土和主权，大大损害了民族利益；而且自1861年11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继任的同治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勾结奕䜣等人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最高统治权以后，竟公开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起义，从而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进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

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在南方，富有斗争传统的广州地区的民众，不畏强暴，以各种手段，巧妙地袭击敌人，使侵略军龟缩城中，寝食难安，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在北方，由僧格林沁指挥的清军取得了第二次大沽抗登陆作战的重大胜利，打破了拥有坚船利炮的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由于清王朝政治上腐朽反动，思想上保守落后，因而导致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和战役、战斗的一再失利，最后被迫签订屈辱的和约。清政府的战略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研究敌情，缺乏警惕，疏于战备

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犹如一声炸雷，使正做着“天朝上国”迷梦的清朝统治集团突然惊醒了一下。但是，《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他们却把它称之为“万年和约”，以为从此以后便太平无事，又可高枕无忧了，而不是痛定思痛，励精图治。因而，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及其侵略本质始终没有认真研究，在认识上长期停留在所谓“夷性狡诈”、“性等犬羊”、“贪得无厌”等初始认识阶段。当时，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重视研究“夷情”，并提醒清廷注意整军经武，加强战备，防止列强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并提出了不少颇有远见的战略思想；道光帝也曾发布过加强海防的谕令。但是，由于整个统治机器已腐朽不堪，绝大多数封建官僚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改弦更张，因而对于落后的军队、薄弱的海防，始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整顿和加强。同时，也没有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认真研究英军的编制、装备和作战特点，以及清军作战失利的主要原因，借以探索克敌制胜的新战法，而是故步自封，死抱着落后的战法不放。正因为如此，当英法联军打上门来时，便惊惶失措，畏敌怯战，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即使被迫应战，也因缺乏扬长避短的战法而为敌所败。

二、实行重“安内”、轻“攘外”的错误战略方针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不仅民族矛盾趋于激化，国内阶级矛盾也异常尖锐。这就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面临着以抗击外敌入侵，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还是以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私利为重的抉择。换言之，就是以“攘外”为主，还是以

“安内”为主。而咸丰帝却确定了以“安内”为主、“攘外”为次的战略总方针。

依据这一总方针，他把主要兵力用于对内战场，次要兵力用于对外战场。据粗略统计，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用于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其他起义军的兵力约40万人，而在抗击英、法侵略军的广州、津京地区只有27万人，其中直接与侵略军交锋的为数更少。以广州战场为例，1856年，广东约有清军7.36万人，而驻守虎门、广州至佛山珠江沿岸的清军仅2万人。第一、第二次广州之战，广州城的守军加上团勇，只有一万四五千人，而叶名琛非但未从省内抽调部队加强省城的防卫，相反，却把部队分散在广东各地镇压天地会起义军余部。1857年底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清政府未派任何援兵收复广州，却把大批军队集结在太平军占领的南京周围，重建江北、江南大营。1860年，津京地区的清军总兵力约20万人，而用于对英法联军作战的机动兵力不过5万多人。在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除咸丰帝北逃热河后命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曾国藩、袁甲三、官文等酌量抽调“勤王”之师外，没有从对内战场抽调过一兵一卒，相反，却于1859年7月从僧格林沁所部中抽调马队2000人分赴山东、安徽，镇压捻军。

由于用于抗击英法联军的兵力不足，除第一次广州之战和张家湾、八里桥之战清军兵力数倍于侵略军外，其它各次战斗，清军的兵力均不占明显优势。第三次大沽之战时，塘儿沽和石缝炮台的守军还少于侵略军。清军的武器装备低劣，加上数量又少，这是许多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清朝统治集团在“攘外”方面，还实行以和为主、以战求和的消极方针。所谓以战求和，就是企图通过有限度的抵抗，争取在和谈中增加些讨价还价的筹码，“体面”地结束战争。这一方针贯穿于战争的始终，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坚决抗击侵略军的决心和统筹全局的战略部署，而是采取应付主义。也就是侵略军在哪里进攻，就在哪里抵挡一阵，而不是积极主动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当时，英法联

军有少数舰船分泊在上海、舟山、宁波等地，后又分别在大连、烟台等处集结。而这些地方的清军却与之“和平共处”，清政府也不下攻击的命令。尤有甚者，正当北方战事方兴未艾之际，上海的买办官僚竟向英法侵略军求援，并雇用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枪队”，联合进攻太平军。此外，当英法联军第一次攻占大沽以后，咸丰帝竟下谕两广总督黄宗汉，不许兵勇进攻广州，因为广州“一经用兵，彼必驶往他处，肆其报复，设被另占一处，更多掣肘”①。他根本不懂得只有到处打击敌人，才能分散敌人，使其顾此失彼，不能专攻一地。二是时战时和，朝令夕改，严重影响官兵的抗战决心和作战准备。这种情况，在第三次大沽之战开始后表现尤为突出。从 1860 年 8 月 14 日英法联军攻占塘儿沽到 9 月 21 日清军在八里桥作战失利，短短 37 天内，战与和竟变了 5 次。如此出尔反尔，怎么能激发前线将士的抗战积极性？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之战后，曾对咸丰帝的和战不定提出过意见，他说：“用兵之道，贵乎鼓作士气，不宜稍有游移，心无专主。……若今日言和，明日言抚，兵丁与该夷虽有不共天地之心，将领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难再收拾。”② 事实正是如此，张家湾、八里桥之战的失利和京师的有险不守，与咸丰帝的“心无专主”，以致将领畏首畏尾和军心懈怠有很大关系。

三、不敢依靠群众，实行全民抗战

在这次战争中，凡遭到侵略军铁蹄蹂躏的地区，当地的人民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奋起抗敌。但是，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一样，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不但得不到清政府的充分支持，反而受到指责和压制。

---

①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 801 页。

② 僧格林沁、恒福：《遵筹海防布置事宜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第 1729～1730 页。

在战争期间，咸丰帝虽然没有公开下令镇压抗敌御侮的民众，相反多次下谕组织团练，配合清军作战，但他主张将团练置于封建官僚或豪绅地主的控制之下，在行动上必须服从于以和为主、以战求和的方针。这就大大束缚了群众的手脚。例如，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他一方面谕令在籍户部侍郎罗惇衍等调集各乡兵勇，进攻广州，将侵略者驱逐出城，另方面又令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作为“局外人”从中“调停”，甚至要黄照会联军，说明进攻广州之事“与官无涉”，公然导演了一出双簧戏。罗惇衍等得知上述情况后，马上表示他们所办的团练只能用于防御，不能用于进攻。这样，所谓将侵略者驱逐出广州城就成了一句空话。

在津京地区，民众的反侵略斗争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直隶总督谭廷襄公开叫嚷“从来御外以防内为先”。钦差大臣桂良等对天津的一些铺户、船民、蛋户要求彼此联络、共御外侮的正义行动诬蔑为“民情汹汹”、“盗贼四起”，主张进行镇压。1860年8月天津陷落后，咸丰帝令光禄寺少卿焦祐瀛等在天津附近举办团练，袭击北犯之联军。焦祐瀛等用3万两银子，凑集了团勇1000人，但公开声称所办团练“可以保卫乡间，未必即能打仗”。后来，当联军北犯时，上述团练武装没有任何袭扰牵制敌人的行动。

毛泽东指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① 清朝统治集团不但不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反而束缚群众的手脚，扼杀群众的抗战热情，这是导致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①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第四章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军事思想

在总结中国于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原因时，都涉及到敌情不明、海防废弛、清军武器装备低劣和战法落后等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指导军事活动的军事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清王朝长期奉行的以“骑射为满洲之根本”为基本特征的军事思想，既受没落的封建政治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又是满族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和“以弧矢定天下”的军事活动的特有产物，同时基本上适应“防内重于防外”的国策，因而长期以来被统治阶级奉为圭臬，不予更改。但是，当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闭锁的大门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爱国志士，面对着旷古未有的巨变，从维护民族独立和清王朝的统治出发，认真探索“善后之策”和“御夷之方”，有的从建军、作战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高度思考问题，从而触动了固有的军事思想，萌发了力求与反侵略战争相适应的新的军事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形成的开端。而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则是林则徐和魏源。由于他们的立场、观点和观察问题的方法基本相同，因而他们的军事思想也就同多于异。

第一节　林则徐、魏源的军事思想

林则徐、魏源都主张坚决抵御外侮，是坚定的抵抗派。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亦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

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① 他不仅在广州禁烟期间积极备战，坚决反击英国的武装挑衅，而且在蒙冤受屈遣戍新疆途中，仍时刻关注着前线的抗英斗争，及时总结反侵略战争的经验教训，在建军、作战的指导思想方面提出了许多创见。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出身进士。他曾充任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和两江总督陶澍的高级幕僚。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度参加浙东的抗英斗争。后辞归扬州，发奋著书，于 1842～1843 年先后完成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先为 50 卷本，1847 年增订为 60 卷本，1852 年扩编为 100 卷本）两部重要著作，充分阐发了他的整军经武、抗敌御侮、“以战止战”的指导思想。林、魏军事思想的精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

林、魏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国家寻找富国强兵之策的先驱者。林则徐在广东时就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②魏源则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③ 他们通过对西方列强的研究，不仅认识到“夷性无厌”，“兵贾相资”，“唯利是图，唯威是畏”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特性，而且发现这些国家制造机器和战船、枪炮的技术已远远超过中国，从而意识到只有向西方列强学习，把它们的“长技”变成中国的“长技”，才能有效地抵御外国的侵略。于是，先由林则徐大胆地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战略思想，接着

① 林则徐：《密陈洋务不能歇手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531 页。

② 林则徐：《密陈驾驭澳夷情形片》，见《鸦片战争》（二），第 195 页。

③ 魏源：《海国图志》，咸丰二年古微堂重刊本（下同），卷 2，第 4～5 页。

魏源也提出了相同的思想，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对这一著名的战略思想进行了具体阐述。①

林则徐在广州一面查禁鸦片，一面购买西洋火炮，仿制外国战船，用以加强广州海口的设防。同时，注意收集外国制造战船、火炮的书籍和图纸。以后，在浙江镇海“随营效力”期间，把绘制的外国战船图样交给兵器专家龚振麟参考，制成了中西技术结合、行驶甚便的车轮战船。这些行动表明，林则徐不但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倡导者，而且是这一战略思想的最早实践者。魏源则用朴素的辩证观点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② 把学不学外国“长技”提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他比林则徐具有更多的开放意识，提出学习的重点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建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聘请外国技师传授制造战船、火炮的技术，聘请外国“舵师”传授驾船、演炮的方法，把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战术学到手。他认为有了造船厂和火器局，不仅可以制造战船，还可以制造陆师所需的军械以及火轮船、风锯、龙尾车等民用产品。“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这种军品制造与民品制造相结合的思想，表明他开始意识到近代工业与近代海防的密切关系。他还主张在自己制造的同时，向外国购买先进的武器，使自造与引进相结合，以便尽快改变清军武器装备的落后状态。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对闭关锁国政策的巨大冲击，也是对“以骑射为根本”的传统军事思想的公开挑战，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到各种非议。当时，那些唯祖宗古训是遵的顽固派，把西方先进

---

① 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称：“先是林则徐奏言：‘自（道光二十年）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正可以敌攻敌。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则在1843年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37，第1页。

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声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将“坏我人心”。魏源理直气壮地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①，不仅不能反对，而且应该认真学习。他还以俄国的彼得大帝为例，说明学习外国“长技”的必要性。他说：彼得大帝因国内技艺不如西洋，便微服游历于他国船厂和火器局，学习工艺，回国传授，结果所造器械甲于西洋，从而使俄国成为欧洲强国。他还满怀爱国激情，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是富有人力、物力、财力和创造智慧的民族，认为只要“励精淬志”，善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因其所长而用之”，就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使中国成为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强国。

林、魏的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的战略思想，不仅有别于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也有别于害怕“坚船利炮”、在侵略者面前屈膝妥协的投降派，而是对拥有先进武器的侵略者所作出的最积极的回应，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的标志。因而在政治上成了晚清洋务派“自强”活动的先导，在军事上成为变革旧制、促进国防建设近代化的正确指导思想。

二、以守为主、寓攻于守的战略防御思想

在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实行战略防御，是林、魏着力探索的一个问题。正如魏源所说：“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②他们的战略防御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守为主、寓攻于守。据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体方针、原则。

（一）在近海、内河或陆地歼敌

林则徐在广州期间，就具有明确的海防意识。他通过对英国海军和清军水师对比分析，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不与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18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1页。

敌在远洋接仗，而在近海或陆地歼敌的方针。他认为英军船坚炮利，长于乘风破浪，但“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伎于内港”①。而清军水师船小炮少，木料不坚，难于与敌在“洪涛巨浪，风信靡常”的海上交锋，只有“坚垒固军”，扼守海口，待敌舰驶至近海、内河或敌军登陆以后，再行接战，使其难于发挥舰炮火力的优势。另外，英舰队远涉重洋，“粮饷军火安能持久”；而清军在本土作战，地形熟悉，兵员、物资补给便利，可收“以逸待劳”之利。与此同时，他还实行“静则严防，动则进剿”②，“守险攻瑕，皆得随机应变”③ 的作战方针。1840 年 6 月，英军舰队主力首次北犯时，林则徐便调集广州师船，加紧操练，准备在风潮顺利的情况下，整队出洋，袭击封锁广州的敌舰。8 月 31 日，广东水师伺机出击，败英分舰队于矾石、赤湾洋面，击伤英舰“都鲁壹”号，取得了“小挫其锋”的胜利。当时，他虽然对海口炮台的防护能力和火炮攻击能力都很差还缺乏认识，同时低估了英军的陆战能力，认为英军“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若至岸上，更无能为”④。但是，他的在近海、内河或陆地歼敌的方针，仍然体现了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思想；他实行的“守险攻瑕”方针，更是体现了寓攻于守的积极防御思想。

魏源根据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水师无法与敌舰在海上交锋，要塞炮台的火炮也难于击中敌舰等情况，本着“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

---

① 林则徐：《致莲友》，见《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下同），第 49 页。

② 林则徐等：《英国趸船及应逐英人现均已驱逐并饬取切结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236 页。

③ 林则徐等：《拟将洋商行用茶叶银两捐充防英经费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305 页。

④ 林则徐等：《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 217 页。

口不如守内河”①,“以纵为擒”的方针,主张将敌舰放进内河来打,使其不能随意行驶,互相援应,而我则可以发挥拦首截尾,“两岸兵炮,水陆夹攻”的优势,痛击入侵之敌。他把这种战法形象地比喻为“设阱以待虎”,“设网以待鱼”。魏源承认,这种战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仅适用于比较狭窄的江河,如在宽阔的大江大河,就难以收到大量歼敌的效果。尽管如此,这种战法还是体现了利用有利地形,水陆协同,歼敌有生力量的思想,在没有强大水师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御敌之策。因此,诱敌深入,“以纵为擒”的战略防御方针,也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需要指出的是,为了诱敌深入,魏源主张对“孤悬海外”的香港、定海和某些沿海军事要地如宝山均可弃而不守,这显然是错误的。

(二)组建强大的水军,与敌战于海上

早在1839年秋,林则徐就向清廷建议,用广东海关税收的1/10制造极精极坚的战船与火炮,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水军,与敌战于海上。他强调指出:船炮“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②。后来,他根据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等沿海城市和要塞相继被英军攻占的情况,便改变了“专守于陆”的作战指导思想,进一步强调建设水军的重要性。他希望清政府迅速组建一支拥有大船100只、中小船50只、船炮1000门、水兵5000人、舵工和水手1000人的一支水军,与英军舰队进行近海作战,以改变陆师被动挨打的状态。他发现英军舰队在海上机动快速,忽南忽北,来去自由,以其无定攻我有定;而清军陆上支援十分缓慢,加上海口众多,防不胜防,即使设防的要塞,也是以有定之炮击无定之舰,无法争取主动,从而得出了“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③的结论。

---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1页。

② 林则徐:《密陈洋务不能歇手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531页。

③ 林则徐:《致吴嘉宾》,见《林则徐书简》第182页。

他认为如有一支“往来海中，追奔逐北”的水军，就能遏制侵略军的嚣张气焰，迫使其不敢随意离船，攻城掠地。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十分肯定地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建设强大的水军，实为“海疆久远之谋”。①

魏源“师夷长技”的首要目标，在于建立一支拥有中号战船100艘、火轮船10艘、官兵3万人，号令简明、指挥统一的水军，以便“驶楼船于海外”，“战洋夷于海中”。他预测将来海战不可避免，因为：其一，外国侵略者“贪恋中国市埠之利”，必然会卷土重来；其二，外国侵略者如果知我内河有备，便不敢冒险深入，即使深入内河，也只能歼其一部。所以，“战船火器，乃武备必需之物”。② 有了水军便能断敌供应之路，或伺机夹击敌舰，使其不敢随便活动，肆意逞狂，而我在防御作战中就能“以主胜客”，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林、魏的上述言论表明，他们不仅具有水陆协同以御外侮的战略防御思想，而且有了创建近代海军以争夺制海权和防御作战主动权的思想萌芽，指明了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方向。

1842年，清廷发出造船御敌之议，文臣武将纷纷献计献策。有人提出当敌舰进入海口时，只须用捆缚的巨木顺流放下，借助水力冲击，就能使其破碎。有人主张捆扎木筏，在筏端钉上“签锥”，将敌舰签住，使其不得走脱。有人建议仿造古代的子母舟、联环舟、楼船、蒙冲、走舸等船，与英舰抗衡。这些古色古香的建议，与林、魏建设近代水军的思想比较，有天壤之别。

诚然，林、魏对建设近代水军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还缺乏认识。但是，对于有绵长的海岸线，许多城市濒临海边，且有台湾、海南岛等重要岛屿孤悬海上的中国来说，建设近代水军，加强海上防御力量，实为保卫海疆所必需。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伊始，林、魏即有此建议，并把它提到关系反侵略战争胜利的高度，不能不

① 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见《林则徐书简》第193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9、18页。

说是远见卓识。

（三）就地征募训练部队，加强海防力量

林、魏十分关注海防部队建设。林则徐从鸦片战争的实践中发现，清政府从内地各省零星征调“客兵”，临时拼凑成军，仓促调往海防前线，不仅筋力已疲，而且不习水土，不识道途，很不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认为“即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仅供临敌之一哄”①。魏源针对调往广东、浙江、江苏的“客兵”均一败涂地的状况，明确提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②，主张由沿海各省就地招募壮勇，组建海防部队。他认为就地募练“土兵”有三利：适应气候水土，熟悉地形道路，能为保卫身家而英勇作战。他还指出，沿海的渔民、疍户，不仅熟悉水性，而且性格强悍，将他们选入水师或编成团练，一定能够依靠本省的精兵捍卫本省的疆土，最多从邻省调兵增援，便能应付裕如，避免一省有警，便从内地各省纷纷征调部队，造成全国紧张的局面。

林、魏关于就地募兵，建立海防部队的思想和主张，对于加强海岸防御作战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当时交通运输工具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种措置尤为必要。同时，这种主张还蕴含着对清王朝轻视海防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海防建设有深远的影响。当然，如果完全以“土兵”、“水勇”代替正规的陆师和水师，则是片面的，不足取的。

（四）军民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结合

林则徐到广州不久，便敏锐地察觉到广东沿海民众对英国侵略者满怀义愤，具有很高的抗战积极性，“不但正士端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③。于是，非常注意依靠民众加强海防。他除了在广州海口要隘修筑炮

① 林则徐：《致吴嘉宾》，见《林则徐书简》第182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1页。

③ 林则徐等：《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19页。

台、添置火炮、操练水师，以实现水面舰船和岸防工事相配合外，还号召民众购买武器，聚合丁壮，组织团练，人人持刀痛杀敌人。与此同时，招募渔民、蛋户，编成水勇，在弁兵带领下，于夜晚驾船出海，火攻敌船，仅1840年2月29日凌晨在长沙湾的一次袭击战中，就焚毁英方大小船只23艘，取得了辉煌战果。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他的军民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结合的全民抗战思想。正是这种思想和行动，使他得到了广州人民的钦佩和信赖，增强了抗敌御侮的信心和决心，并使侵略者一夕数惊，处境艰难。

魏源称沿海民众为“义民”、“义勇”，并用“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①的诗句，赞扬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他还用广州民众捐战船、斩敌酋，台湾民众擒拿英舰，南澳民众火烧英船等事例，驳斥琦善、奕山之流污蔑群众为“顽民”、“汉奸”，进而主张“防民甚于防寇”的无耻谰言。他的就地招募渔民、蛋户组成海防部队的主张，就是建立在依靠群众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

林、魏看到人民群众对外国侵略者的民族仇恨，意识到“民心可用”、“民力可恃”，敢于号召和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开创了近代中国民众反侵略战争的先河，这是他们的思想高于同时代封建官吏的难能可贵之处。当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已经站到了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只能说在反侵略这一点上与人民群众有共同的愿望，能够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俩把组织民众抗战说成是“以毒攻毒”，就充分显露出剥削阶级的偏见。

三、“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建军思想

加强军队建设，改变清军的腐败落后状态，是林、魏关注的另一重要问题。1842年，林则徐于遣戍新疆途中，在给友人的信

① 魏源：《寰海》，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下同），下册，第806页。

中提出了战胜侵略军的“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①。这既是他对中国军民抗击英国侵略军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的建军思想的高度概括。魏源则提出军队应该做到“心灵胆壮，技精械利”②。尽管提法不尽相同，但内涵基本一致，而且都注意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加强军队建设。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具体阐发了上述思想，并为此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为使清军装备精良的武器，林则徐除率先向外国购买火炮、战船外，还积极建议自己制造，改进铸造工艺。他在广东时，曾捐资仿造“底用铜包，篷如洋式”的双桅战船两艘。他非常重视岸炮的改进和使用，认为岸炮落后是抗英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强调“今若接仗，非先筹炮不可，而炮之得用与否，非先演放不可”③。他在浙江镇海期间，与龚振麟一起研制成四轮炮车，使原来只能固定射击的火炮能够“俯仰左右，旋转轰击”。后在扬州又把铸法炼法皆与外国相同的《炮书》刊刻传播，供制炮单位使用。当他途经西安，得悉陕西省准备铸炮时，便主动提出恳切建议：“此器不可不备，尤不可不精……其大要总在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④他虽然缺乏制造先进火炮的科技知识，但基于“各种火器最利行军”的认识，因而对火炮铸造孜孜以求，这种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魏源除了提倡设局、办厂，在外国技师帮助下制造先进武器外，还在《海国图志》中用将近1/5的篇幅，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的兵器专家和能工巧匠在仿制外国战船，改进鸟枪、火炮、火药、水雷等制造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得到人们的重视。

林、魏都强调部队必须进行严格的训练，并且认为部队训练

---

① 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见《林则徐书简》第193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34页。

③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66页。

④ 林则徐：《致马辅相》，见《林则徐书简》第191页。

的好坏，关键在于各级官长。林则徐在广州时，曾“面谕在省营员，以弁兵技艺之短长，定将备各员之贤否”①，要求带兵将弁切实抓好部队训练，必使一兵得一兵之用。为了加强水师官兵的技术、战术训练，他专门购买了英国船“甘米力治”号，供“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②。他还亲赴虎门和狮子洋校阅水师演习。魏源用鸦片战争中沿海设置的火炮由于士兵施放不熟而很少击中敌舰的实例，说明加强部队训练的重要性。他严肃地指出，如不加强训练，即使有先进的武器，也只能资敌而不能制敌。他针对清军外海水师终年停泊，不常驾驶，巡洋会哨徒具虚名的弊病，创造性地提出由水师保护海上粮运，使训练与护航结合，在惊涛骇浪中检验战船的质量，提高水师官兵的海上作战技能。他明确指出，“兵无强弱，强弱在将”，有了优秀的将领，就能“一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把整个部队带动起来。他还主张将领应多读兵书，力求对前人的用兵韬略做到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使“纸上”之功变为“马上”之功，不能因为出了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就因噎废食，连兵书也不学了。

林、魏强调军队必须具有勇于杀敌的胆气。林则徐提出了“破敌首重胆气，胆大气盛者必胜”③的名言，并认为部队有无胆气与统帅的勇怯关系极大。他痛斥琦善到广州后，畏敌怯战，一意求和，以致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导致虎门作战的失利。魏源则认为只有赏罚严明，才能振奋士气。他批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对清军赏罚不严，尤其是对不战而逃的将领不能及时绳之以法，以致士气不振，官兵不能用命。他还强调指出，无论正兵、奇兵，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才能将士一心，臂指呼应，具有与敌拼杀的勇气和决心。林、魏认识到军队的战斗力，除了拥有精

---

① 林则徐：《校阅在省营标及因公至省各官兵情形折》，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79页。

②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见《魏源集》上册，第174页。

③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37页。

良的武器和技艺精熟这些因素外，还源于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的齐心协力。林则徐抵广州不久，便查办了包庇鸦片走私、收受贿赂的绿营督标副将韩肇庆，撤换了一些克扣兵饷、欺压群众和年老体衰、技艺不精、巡防不力的将弁，从而使“军民大悦”。魏源则以“器利不如人和”的名言，强调搞好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他还指出，只有将帅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才能军行所至，秋毫无犯，从而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林、魏主张只有切实整顿军队，才能挽颓风、振士气。林则徐在关天培支持下，对腐败的广东水师进行了一番整顿，严禁吸食鸦片，收受贿赂，玩忽职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水师的腐败状况，使士气有所提高，从而取得了在九龙湾、川鼻、官涌击败英军的胜利，在鸦片战争的序战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魏源主张通过汰冗兵、练精兵、慎选将、严节制，改变清军的腐败状况。他认为老弱太多、虚额太多、薪饷过低是清军的主要弊病，主张大刀阔斧地裁减冗兵，杜绝冒领，改善士兵待遇，进行严格训练，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用“冗兵明减十万，精兵暗增十万”的辩证观点，阐明部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反映了他的“精兵”思想。他对琦善、奕山、奕经、牛鉴等清军统帅的怯懦无能深恶痛绝，辛辣地讽刺他们“生长承平听画筝，几闻铁马金戈声”①，根本不懂得战争为何事。他反对唯宗室、贵族是亲的用人路线，主张从部队中考核选拔技精胆壮、奉公守法、善于管理和懂得用兵韬略的官兵，分别担任高、中、初级指挥官，以适应带兵作战的需要。

林、魏的上述建军思想虽然没有超出治标的范围，但如能付诸实施，仍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清军的面貌。应当指出，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建军思想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如何对官兵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思想教育，就未曾涉及；如何做到“心齐”也论述甚少。在魏源的思想中，还明显地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例如，他主张部队“宜散不宜聚”，因为聚则易生变

① 魏源：《秦淮灯船引》，见《魏源集》下册，第726页。

乱，散则便于控制。而实践已经证明，绿营兵实行“化整为散”的方针，十分不利于反侵略战争。又如，他一方面强调军队应有严格的纪律，另一方面却说“有时欲鼓士气，则虏掠而亦捷”①。此外，还宣扬“帝王之师，恒有天助”②等唯心史观。这些，都是应该摒弃的糟粕。

四、海防与塞防并重的设防思想

林、魏通过研究“夷情”，觉察到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虽然主要来自海上，但也威胁着我国东北和西北边境的安全。因此，主张加强海防的同时，重视塞防。

林则徐在广州时，就已略知沙俄觊觎中国的野心，所以他在流放伊犁途中，虽然心情沉重，但仍表示愿当一名“荷戈西戍之老兵”。1842 年 12 月到达流放地后，便悉心研究新疆的备边御敌方略，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了兴修水利、屯田实边的建议。1843 年秋至 1844 年夏，他协助布彦泰办理阿齐乌苏废地的开发工程，并捐资承修龙口水渠工程。1845 年春，他不顾风雪严寒，道路崎岖，历勘了南疆八城，又转赴吐鲁番、哈密一带，仆仆风尘，行程 2 万里。在查勘过程中，推广坎儿井和纺车，并把垦地拨给维族农民耕种，还把固定的屯兵制改为由当地驻军分期分批轮流进行耕种和训练的“操防制”，使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生产与练兵相结合，既发展了生产，又加强了边防建设。他曾写下“乱吹戈壁龙沙起，桃杏花开分外红”③的诗句，表达他对建设西北边陲的深情。他不仅躬行实践，而且呼吁有关方面重视边防建设。当他的朋友开明阿就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时，便在临别赠言中提醒其不

①② 魏源：《武事余记》，见《圣武记》，中华书局 1984 年版，下册，第 510、523 页。

③ 林则徐：《回疆竹枝词》，见《云左山房诗钞》，光绪丙戌福州本宅藏本，卷 7。

要为“三载无边烽，华夷悉安堵”的现象所迷惑，而应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积极做好边陲的战备工作，以期“将士坚一心，讵不扬我武”①。

1845年，林则徐被清廷重新起用。1850年，于云贵总督任上因病告假，回到已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的福州原籍。他和福州的一些士绅据理力争，迫使违约迁入城内的英国人退居城外。为了防止英国舰船骚扰破坏，他亲乘扁舟出海观察海防，进而向福建地方当局提出了调兵、演炮、募勇以加强海防的建议。林则徐身居东南沿海，心系西北边陲。他根据在新疆时的所见所闻，以及自1848年以来沙俄多次胁迫清政府开放伊犁、塔城为通商口岸等动向，于1850年秋发出了“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②的预言。此后，沙俄蚕食鲸吞我国西北和东北领土的事实，完全印证了他的战略预见。

魏源把《海国图志》的前4卷名为“筹海篇”，顾名思义，可以看出他对海防的重视。其实，他对塞防也是相当重视的。早在1822年，他在直隶提督杨芳家当教师时，就开始研究西北的地理和边疆防务，撰有《西北边域考》及《答友人问西北边事书》等著作，倡言新疆改设行省。此后，在《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中，又揭露了沙俄侵略我西北和东北的野心，提醒人们重视塞防建设。他主张允许内地居民到边疆定居，开垦荒地，开发矿藏，发展生产，充实边储；动员在京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的旗人，迁回东三省原籍，屯垦戍边，自食其力，加强边疆建设。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③林则徐、魏源带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军事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大变动时代，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列强敏锐观察

---

① 林则徐：《送伊犁领军开子捷（开明阿）》，见《云左山房诗钞》卷7。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8册，总第11494页。

③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121页。

和对鸦片战争实践综合分析的思想结晶，也是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反映。唯其如此，不仅富有时代的特征，而且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并在某些方面冲破了传统军事思想的束缚，为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奠基作用。遗憾的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苟且偷安，抱残守缺，以致林、魏的军事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1858年，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建议咸丰帝刊印魏源的《海国图志》，“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虽）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①。对此，咸丰帝竟置若罔闻，毫无反应。但是，一切适应时代要求的先进思想，即使暂时受到冷落和埋没，最终总会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林、魏的军事思想也不例外。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被称为洋务派的官僚，开展了“师夷长技”以求“自强”的活动。他们倡导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用洋枪洋炮装备清军，用外国操典训练部队，并组建近代海军，建设近代海防，从而使林、魏的军事思想成为当时军事活动的理论指导，并随着军事活动的发展而继续发展，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起了某些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作用。

第二节　其他主战人士的军事思想

历史表明，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既有某些思想家作为杰出的代表，同时也凝聚了许多人的思想成果。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救亡图存已成为众多爱国志士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他们和林则徐、魏源一样，努力探索抗敌御侮之策。尽管他们的动机不过为衰微破败的封建统治“炼石补天”，并且其思维能力仍然受到

① 王茂荫：《治法治人之本在明德养气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1049页。

传统军事思想的束缚，但是毕竟程度不同地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功夫，迸发了一些适应军事变革和有利于反侵略战争的思想火花。

一、以和议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曾督带水勇参加抗英作战的广东士绅林福祥，于战后撰写的《平海心筹》中，呼吁当局切实加强战备，以便抗击西方列强新的入侵。他在论述战、守、和三者的关系时指出：“必能战能守而后可以言和，不能战不能守而言和，是掩耳盗铃，自欺而并受欺于人也，是图苟安于目前而贻巨患于后日也。”他进而阐述了和议不可久恃，必须切实作好新的反侵略战争准备的理由：其一，英国所以同意签订“和约”，目的在于“利我之资财，贪我之码头”，但它“贪得靡厌”，“一不能饱其所欲，必至借端败盟”。其二，我国“所给之码头，华夷杂处，良莠不一，使该夷作奸犯科，有滋扰淫掠我汉人等事，若不按之以法，是法不行于中国，若按之以法，彼又借辞开衅”。其三，“与英夷以资财码头，则开门揖盗之渐也”，试思与我通商之国如法兰西、美利坚等，皆效尤而来，又将何从应之？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林福祥明确提出：“以和议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若既和之后，仍任其武备废弛，则祸患又安有极哉！”①

二、欲制敌必须先审敌之虚实

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要有效地抗击侵略者，必须认真研究外国的情况。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即注意分析敌我形势，与总兵达洪阿一起，

① 林福祥：《平海心筹》，见《鸦片战争》（四），第588～589页。

切实加强台湾岛的战备，于1841年9月至1842年3月，指挥台湾军民两次重创入侵的英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但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投降派耆英等竟诬告姚莹“冒功欺罔”。姚莹被贬至四川。姚莹虽蒙受不白之冤，但仍满怀爱国激情。为了研究外国和了解我国边区情况，以对付外敌入侵，他将早在嘉庆年间就开始陆续收集的关于我国西藏和外国情况的资料加以整理，并进一步收集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等国以及英殖民地印度的情况，编著成《康辅纪行》一书，供朝野人士阅读。他在致友人书中说：“中国书生狃于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又说：“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瞶瞶从事而不败者也”，今日“喋血饮恨”编撰《康辅纪行》，目的在于使“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于胥沦鬼域”。① 他讥笑那些以拒谈夷事为清高的顽固守旧派为“坐井观天”，“平居大言谓一事不知为耻，乃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② 他在欲“制驭外夷”必先从“熟悉夷情始”方面，与林、魏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因而也是难能可贵的。

当时，出于与姚莹相同的目的，还有福建巡抚徐继畬于1848年编著了《瀛环志略》一书，这是继《海国图志》之后，又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外国史地的重要著作。另外，还有一些专门介绍英国和美国的著作，如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汪文泰的《红毛蕃英吉利考》，梁廷枬的《兰仑偶说》和《合省图说》等。这些书籍的刊行，反映了睁眼看世界的思潮正在封闭的中国涌动，对于中国知识阶层探索世界新知，开阔视野，破除盲目自大思想，进而有的放矢地考虑御敌方略，以至改革弊政，都起了积极作用。晚清军事将领左宗棠，就是在读了《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等

① 姚莹：《东溟文后集》，见《鸦片战争》（四），第531页。
② 姚莹：《康輶纪行》，同治元年刊本，卷12，第22页。

著作后，冲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滋生了认识外部世界、探求救亡图存之策的思想，进而成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实践家的。

三、沿海有警则战场在水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和林则徐、魏源一样，积极主张制造新式战舰，对付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监生方熊飞鉴于“夷船在水进退自如”，而我岸上守军“常受其制”，因而提出“夫边疆有警则战场在陆，沿海有警则战场在水”。① 他建议制造坚实的战船 150 艘，驻防于天津、虎门、厦门、上海等重要海口，随时准备与外国侵略者的海军作战。他认为制造新式战船虽耗资颇巨，但以“防守无益之费作造船练兵之资”，则“日后之所省甚大”。

在此前后，广东道员衔行商潘仕成延揽美国人壬雷斯仿造二桅帆力舰 4 艘，并制成攻船水雷。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利用美国军舰模型，自造三桅帆力舰一艘。广州绅士潘世荣雇用中国匠人，试造火轮船一艘，成为中国自造蒸汽船的发轫。这些仿制和自造的新式战舰，虽因道光帝和江苏、浙江、山东、直隶等省的封疆大吏思想保守而未得到及时推广，但当时出现的那股着意改变中国水师的落后状态，加强海上防御力量的思潮，是值得肯定的。

四、拒敌于海上不如拒敌于内河与陆上

与主张海上有警则战于海上的人意见相左，一些疆吏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对比船脆炮小、训练废弛的清军水师，都感到难于与敌在海上交锋，因而有的主张在内河击敌，有的主张在陆上

---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 84，第 1 页。

击敌，总的指导思想是避敌之长、击敌之短。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裕谦，即主张实行“舍水就陆”、“以御为剿，以守为攻”之策。具体战法是：“该夷船倘敢驶近口岸，度量炮力能及，即开炮轰击，或诱令登岸，更可大加剿洗。”① 江南道监察御史黎光曙认为定海、镇海之所以失守，是由于兵阵单薄，未能层层设伏。为此，他建议天津海口应分三层设防，第二层坚于第一层，第三层坚于第二层；并在天津之西、通州之东，择要驻扎劲旅，以便节节阻击入侵之敌。署理漕运总督李湘棻认为，御敌之法，“拒之于水不如拒之于陆”，因为“夷人船坚炮利，人与船习，运棹灵敏，内地现在水师，固难与之角胜，即赶造大船大炮，尚须督兵演驾，非一二年不能精熟”。② 为此，他建议于长江两岸相度地势，构筑炮台，每台安设铜铁大炮数十门，选练兵丁，演习精熟，待敌舰闯入时用岸炮阻击，既迎头拦阻，又绝其后路，使其进退两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不久，湖南巡抚骆秉章提出了“制夷宜于内河，宜于陆战”的主张。他说：“西洋诸夷，恃其炮利船坚，横行海上……其船炮利于海面，用之内河，则畏礁畏浅畏焚也；夷兵习于水战，用之陆战，则畏抄截畏伏兵，胜不能深入，败不能善归也。”③

在当时战争实践中，由于中国的海口和内河的炮台构筑落后，火炮质量低劣，守备部队的战斗力差，即使采取以上这些战法，也难于有效挫败英军的进攻。尽管如此，其避长击短的作战指导思想，仍有可取之处。

---

① 裕谦：《定海等处形势并筹防守事宜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913 页。

② 李湘棻：《筹议江防添铸炮位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 2565 页。

③ 骆秉章：《密陈英人侵入广州胁迫官员情形并摘抄粤省来函呈览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 644～645 页。

五、持久作战以老敌师

外国军队入侵中国，远离后方，补给困难，水土不服，故力求速战速决。清军武器装备虽差，但人数众多，既有坚城可守，又有人民支援，利于持久作战。持久战的思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已出现。安徽巡抚程楙采在《筹办防堵事宜折》中提出："以远隔数万里之英夷，敢恃孤军深入内地者，其意盖利于速战也。今我不与之决战，而与之久持，我持愈坚，彼力愈困，进有所扼，而退难自全，路绝无援，一蹶而同归颠覆矣。"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某些官吏也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具体建议。如山西道御史朱潮在《筹思破敌之策九条折》中，提出了"坚守以老其师"的方略。他说："闻夷人性畏寒，朔风凛冽，不耐久居，向来各处滋扰，多在夏秋，其明证也。"现英法联军已孤军深入津京地区，我军应实行坚守"以老其师"，待其被迫南撤时，再出奇兵击之，便可转败为胜。② 兵部尚书沈兆霖指出：侵略军"利在速战"，我应以"持久对之"。他建议由僧格林沁、瑞麟和胜保所统各队，分头驻扎，成犄角之势，"皆宜深沟高垒，勿轻与战，严为之备，使敌至不能骤拔。若奉调各路之兵陆续而来，亦饬令分择要地扎驻，俾由潞至津，处处均能联络接应。……正兵厚集其势，持重养威，而以奇兵乘其敝，复以疑兵惑其心，彼（受）种种牵制，必将徘徊而不敢进。……与之相持一月有余，而朔风大作，海河将冰，其所带之饷亦将罄尽，自必急图遁归矣"。③ 尽管当时因清军在大沽战败之后，士气十分低落，上述"坚守疲敌"之策难于实施，但这种以己之持久对敌之速决的作战指导思想，在我国的反侵略战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332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48～2349页。

③ 沈兆霖：《当今宜缓攻坚持勿轻与战又巴夏礼切勿释放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353页。

争中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六、兵有数而民无数，抗战应依靠民众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凡是主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求和的官吏，几乎都与林则徐、魏源一样，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民众的抗战积极性，是战胜侵略军的重要条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以身殉国的裕谦曾说："唯制敌之道，首重体察民情，因其势而利导之，勿事张皇以摇惑民心，勿因军需而扰累民力，勿夸敌强以沮伤民气，勿任弁兵之攘冒民功；则民志坚定，乐为我用，何敌不克？"他提出御敌不能"专恃兵力"，而应同时依靠民力，因为"兵有数而民无数"。①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在江苏、浙江海防前线，大量招募义勇配合清军作战。他还准备把武器发给民众，后因道光帝不同意而中止。姚莹认为台湾人民勇于战斗，"胆气较优，若晓以大义，优其爵赏，尚有可为"。据此，他在台湾招募乡勇水勇数千人，配合清军防守各重要海口。同时，号召各乡组织团练，做到"家自为守，人自为兵"。这些组织起来的义勇，在抗击英舰入侵的战斗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工部尚书许乃普在奏折中指出："说者谓必能战而后能抚，固属不易之理。然该夷船坚炮利，不独水战难以必胜，即使舍舟登陆，而该夷专恃火器，亦不值以京营劲旅轻试其锋。"那末，如何对付侵略军呢？他认为"该夷之畏民，甚于畏兵"，"方今之计，莫如将各兵移驻天津府城内外，坚壁清野，以逸待劳，既不遽抚，亦不轻战；一面密谕绅富设团募勇，或劫夷船于水中，或击夷人于岸上"，使"该夷内则无汉奸之导引，外则有民团之夹击，深知众怒难犯，必且悔罪乞和，然后从而抚之，

① 裕谦：《复陈审度江苏防堵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948页。

则其势易矣”。① 翰林院侍讲学士潘祖荫提出："议抚不如议战，用兵不如用民。”他建议清廷重赏募勇，剀切晓谕，激以大义，克期环攻，或诱之登陆，以展我陆路之长，或待其近城，以断其归舟之路，“以众击寡，以逸待劳，以主御客，以顺剿逆，何患国威之不扬，何虑凶锋之不挫”。②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建议咸丰帝将英、法侵略者的各种无理要求，“明降谕旨，剀切宣示，使百姓闻之，人人愤怒，然后加温谕以拊循之，加恩赏以鼓舞之，自然民争效命”。他还说："该夷兵极多不过数万，安能攻我百万众之城哉?”③

以上事实表明，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确有部分官吏注意依靠民众抗敌御侮，这种思想应予充分肯定。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对广大民众保家卫国的热情缺乏全面的认识，而是把民众说成是“重利轻生”，为了贪恋钱财而“舍死忘命”；有的还害怕民众“聚成大邦”，“恃众滋事”，因而主张多派官吏，分头招募，编成小队，以便控制。这些，必然影响民众抗战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七、远调“客兵”不如就地募练部队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一些官吏士绅鉴于从内地各省临时调赴海防前线的部队，不是缓不济急，就是一触即溃，因而和林、魏一样，主张沿海各省就地招募壮勇，编练成军，或组成团练，不必从内地各省千里迢迢抽调“客兵”。安徽巡抚程楙采在1841年

① 许乃普：《天津宜设团练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823页。

② 潘祖荫：《议抚不如议战用兵不如用民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827～828页。

③ 王茂荫：《请还宫严守备广保举激人心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842页。

3 月的奏折中提出："今海疆要着，莫亟于募练水勇，酌减客兵。"①他认为"客兵"有不便者三：奔驰远道，精力已疲，一也；水土异宜，难耐潮湿，二也；月粮不饱所欲，势必抢掠民财，驭之严则激起事端，抚之宽则愈形骄纵，三也。水勇有可恃者五：一则海滨生长，惯习风涛；二则熟知路径，可借差探；三则自卫乡间，乐于效命；四则缓急可用，贼至编之入队，贼平散之还乡；五则节省物力，以客兵之费，为团练之资，有赢无绌。同年 9 月，福建巡抚刘鸿翱奏称："外省之兵，人地素不相习，望洋气沮，兼之水土不服，易生疾病，多调徒滋糜费。闽省泉、漳民气刚强，素习武艺，尚属可用。现经督臣函商，飞饬各府州县，广为招募，作为民兵，优给口粮，重悬赏格，协同堵御，相机进剿，较之远省调遣，可期迅速得力。"②

另外，在英军入侵广州期间，曾向广东军政当局多次提供御敌之策的举人张杓，主张守汛兵丁应于炮台附近的乡民中挑募，平时除坚持操练外，就近开荒种地，借以改善生活。与此同时，将番禺、香山、新安等沿海各县的壮勇编成团练，使其"咸知君国大义"，并授以作战技艺，每届夏秋，与水师会同操练，以便战时协同配合。他认为实行这种编练制度，即使警起仓猝，也能朝呼夕至，远胜"借才异地，劳师远涉"。张杓的建议已触及武装力量体制的改革，是古代寓兵于农的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

八、建设水师既要修战具又要练精兵

在英军入侵期间即苦苦思索御敌方略的知县夏燮，在他上呈两江总督陆建瀛的《私议六事》稿中提出："今闽、粤有水师而不

① 程楙采：《陈攻防事宜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841 页。

② 刘鸿翱：《招募民兵协同防堵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第 1170 页。

修战具，与无船同；有水师而不习水战，即予以外洋之兵船而不克善其用，亦与不用同。故既治战舰，即须练水师。”为了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水师，他主张实行“汰兵不汰饷”的方针，即对现存水师裁汰老弱虚冗一半以上，给技艺娴熟的精壮弁兵发双饷，其中勇谋兼备者另加奖赏，使留营者安心服役，乐于效命，然后配以战舰，进行严格训练，从而成为能守能攻的精兵。他还强调指出：“兵无选锋曰北，未闻其以众胜也。训练士卒，少则愈精，综核名实，约而可守。”①夏燮言简意赅地阐述了他的兵精、器利、技熟的建军思想，对于战船落后、冗员充斥、训练废弛的清军水师来说，实为切中要害的有识之见。

九、升拔弁缺重在察其是否谙熟火器

通过战争实践，不少疆吏对于使用火器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参加广州抗英作战的林福祥，于1841年捐资购买洋枪洋炮，以期“借彼之矛，攻彼之盾”，“以逆夷之物，还逆夷之身”。②裕谦则认为“防堵海疆，首重大炮”。可是，他发现浙江水路各营的将弁能知放炮之法者为数甚少，有些将弁在演放火炮时，由于装药比例不当，多次发生膛炸伤人事故。为此，他决定将“督率无方”和“练习不精”的将弁分别给予交部议处和降职处分。同时，他向清廷提出：“沿海营分，练习大炮，系目前第一要务。……应请嗣后沿海各营升拔弁缺，不论原习何艺，俱试以大炮，如不谙练，即不准升拔。并由督抚臣随时拣派不避嫌怨之司道大员，周历各营，会督演放，倘仍不能谙练，即将该管将备，据实揭参。庶冀人人精熟，以重海防而昭核实。”③ 裕谦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清

① 夏燮：《中西纪事》第288～289页。

② 林福祥：《平海心筹》，见《鸦片战争》（四），第603～604页。

③ 裕谦：《参演放大炮炸裂伤毙兵丁之镇将备弁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25～1026页。

廷的同意。这样，就在实际上改变了擢升将弁首重马步箭射的传统观念。

从总体上观察，以上这些官绅有关军事方面的思想，虽然不如林则徐、魏源的思想系统、深邃，但无不有感于昧于敌情，军队腐败，战备废弛，战法落后而阐发，无一不是时代思想的折光，有些还是林、魏所未能虑及的。所以，同样具有现实感和针对性，并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孕育和催生的作用。

第五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终于导致了19世纪中叶在广西桂平县爆发的、由洪秀全领导的反对清王朝的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战争历时16年，纵横18省，其规模之浩大，战斗之激烈，斗争水平之高超，都达到了旧式农民起义战争的最高峰。

第一节　从金田到金陵

一、金田起义

1851年（咸丰元年）广西桂平县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伟大开端。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在广东花县福源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两年后，他家迁到官禄㘵村。洪秀全16岁时，到广州考秀才不第，便在村里当塾师。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他最后一次到广州应考又失败，从此便断绝了科举仕途的念头，开始探索救世济人的新路。他研究了传教士散发的《劝世良言》，利用基督教教义和仪式，加以附会解说，创立了"拜上帝会"，并开始传教活动。1844年5月，他与密友冯云山一起到广西贵县（今贵港市）、桂平等地传教。同年底，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从事拜上帝会理论的著述，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诗文，奠定了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础。这些诗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些关于基督教的说教，但在宗教的掩盖下，却包含着要求平等、

反抗压迫的思想，为尔后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与此同时，冯云山则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地区利用教书之便，从事反清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发展了2000多名拜上帝会信徒，其中韦昌辉、杨秀清和萧朝贵等人后来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者和骨干。1847年夏，洪秀全再次到广西与冯云山会合，两人积极传教，发展会员，进行起义准备。拜上帝会的活动，很快引起清朝地方政府和豪绅们的注意，冯云山一度被捕，在拜上帝会中引起了动荡。杨秀清、萧朝贵利用"天父"、"天兄"附身传言的办法，稳定了会众的情绪。到1850年中，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850年夏，各地拜上帝会首领会集桂平金田村，洪秀全下令"团营"(集中结营之意)。8月，韦昌辉率领金田地区会众首先附义，被地方当局发觉，洪秀全、冯云山即转移到鹏化山区，设总部于花洲，指挥"团营"活动。各地会众纷纷响应，临行前都变卖田产屋宇，打造军械，突破清军、团练的拦截，向金田村进发。到年底，前来参加"团营"的有：杨秀清、萧朝贵率领的紫荆山区2000余会众；石达开、秦日昌（后改名秦日纲）率领的贵县地区千余会众；谭要率领的象州地区上千会众；赖九、黄文金率领的博白、陆川地区数千会众；蒙得恩、胡以晃率领的鹏化山区的会众。总人数约2万人。

当时广西全省驻有绿营兵2.2万人，大部星散于各营、汛，能机动作战的部队很少。清廷为了镇压广西各地起义，至1850年底，先后从广东、云南、湖南、贵州调兵1.2万人，使广西的总兵力达3万余人。同时，命两广总督徐广缙带兵前往广西，调湖南提督向荣接替闵正凤为广西提督；调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赶赴广西督剿。由于林则徐在赴任途中病殁，清廷又改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同时又任命漕运总督周天爵接替郑祖琛署广西巡抚。当时，广西各地天地会起义军多达二三十股，吸引了广西当局的注意力，这对洪秀全等从事起义准备工作是一种绝好的掩护，但随着拜上帝会力量的壮大和活动的加紧，便逐渐引起了

当局的注意，开始派出官兵进行搜剿。1850 年 12 月底，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等率部进至平南思旺，并派出哨卡，深入鹏化山区，使洪秀全、冯云山的驻地——平南县花洲山人村受到威胁。杨秀清在金田得知后，立即派蒙得恩率会众 3000 前往救援，击退了清军，将洪秀全、冯云山等接至金田村。1851 年 1 月 1 日，清总兵周凤岐派副将伊克坦布率军进攻金田村。洪秀全、杨秀清在离金田五六里的蔡江村附近三路布防，设伏迎敌，大败清军，并阵斩伊克坦布。

洪秀全等在进行了大量起义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又打了两次胜仗，于是在 1851 年 1 月 11 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高举起推翻清朝、武装夺取政权的义旗。金田是广西省浔州府桂平县城北 50 里的一个小山村，地处大瑶山脉紫荆山区东麓，后负紫荆，前扼浔江，东南 20 余里为浔江边上的大湟江口。举义后的第三天，起义部队就占领了大湟江口的江口墟，准备向东南平川地带发展。

金田起义引起了清廷和广西当局的震惊。1 月 17 日，广西提督向荣奉钦差大臣李星沅之命，率兵抵达桂平，对太平军实行“围剿”，妄图乘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1851 年（咸丰元年）2 月 16 日，向荣督兵勇万人，自东、西两个方向向大湟江口进逼。东路由向荣亲率总兵李能臣、周凤岐，驻营鱼鳞塘、马鹿岭，西路由候补知府刘继祖率领，驻营石咀。2 月 18 日，向荣率部分三路进攻牛排岭。太平军地雷轰发，伏兵四起，清军大败。西路清军也被太平军击退。此战共毙清军守备以下 300 余人。太平军虽挫败了清军的进攻，但被包围的态势并未解除，加之久处一隅，粮食、弹药发生困难，便于 3 月 10 日撤出江口墟，经金田、紫荆山区向武宣县之东乡一带转移，前锋抵达三里墟、东岭、台村一线。3 月 23 日，洪秀全在东乡被推举为天王，并分封了五军主将：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不久，又授杨秀清为军师，萧朝贵为又正军师。

4月3日，清军分四路进攻：刘继祖率部攻东岭村；候补知府张敬修攻台村；向荣与总兵秦定三南北合攻三里墟。中午，战斗开始，东岭之敌被太平军围困，迫使向荣改援东岭。太平军与清军展开近战肉搏，大败清军。之后，清军改取“坐战之法”，不敢轻易进攻。

5月12日，钦差大臣李星沅病死于武宣。16日，太平军乘机突围北上象州，设大营于中坪，并进驻百丈、新寨等村墟，准备打开北进柳州、桂林之路。

太平军突围至象州境后，清军又陆续尾随而至，广西巡抚周天爵驻象州，新从广东调来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部驻罗秀，向荣部驻桐木，企图堵截太平军北进之路。6月7日，周天爵率部进据寺村，乌兰泰前出至距中坪5里之独鳌山、梁山村，向荣部进据界岭，准备对太平军三路合击。太平军先发制人，首先击败西南一路，迫使周天爵部退回象州，接着猛攻乌兰泰军，毙敌参将马善宝以下数百人，迫其退回罗秀。6月25日，太平军猛攻界岭，未能取胜。因北进之路受阻，加之粮盐缺乏，便于7月2日由中坪经原路南返。7月6日，洪秀全、杨秀清率军由象州地区返抵桂平紫荆山、金田地区，设大营于茶地，暂驻休整。

李星沅病死后，清廷命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并派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随同前往。7月初，赛尚阿到达桂林。这时，太平军正自象州地区退回紫荆山。赛尚阿即派巴清德、达洪阿率部赶赴紫荆山地区。

清军进攻紫荆山区的部署是：向荣部扎营武宣东乡，进攻紫荆山西北路；乌兰泰则率部绕至大湟江、南渌水一线，自东南方向堵截太平军。

7月25日，乌兰泰兵分四路向太平军发起进攻。太平军迎战不利，退守新墟。8月6日，乌兰泰又兵分五路进攻，太平军顽强抵抗，将敌击退。8月11日，西北路的向荣部攻陷双髻山猪仔峡隘口。28日，风门坳又告失守，太平军已被压缩在以新墟为中心的狭小范围内，处境空前危急。9月11日夜，太平军向东经鹏化

山区突围，占领70余村，设大营于花洲。

太平军自紫荆山区突围后，乌兰泰于第二天率部尾随追击。向荣率部由南路平行追击，前队进至官村，企图拦截太平军南下。这时，萧朝贵、冯云山已在此设下伏兵，乘向荣部扎营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因天下大雨，清军的火药尽湿，枪炮不能点放，在太平军的猛烈冲杀下，四处溃逃，军械辎重尽失。向荣哀叹说："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① 遂入平南县城，托病不出，太平军得以从容地向永安（今蒙山）转移。

官村大捷和顺利向永安转移，标志着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胜利和清军就地歼灭起义军图谋的失败。太平军起义之初，清军妄图一举将其扑灭，总的方针是：围困追堵，断绝接济，力求就地全歼，不使蔓延扩大。太平军的领袖们认识到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不与敌正面作战，力求摆脱遭敌围困的被动处境，而向清军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进军，并伺机设伏歼敌。总的看，太平军在此期间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和战法是恰当的。

二、永安保卫战

官村大捷之后，太平军即北上大旺，分水陆两路向永安州进发。沿途不少贫苦农民踊跃参军，太平天国后期的优秀将领李秀成就是在这时参加的。9月25日，太平军攻占永安城，这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占领的第一座城市。永安城位于南北长20余里、东西宽10余里的平坝上，四面崇山峻岭，濛江流经城西，其支流通文江越城东而过。太平军进占永安后，即分军防守城外各要隘：南守水秀（俗名水窦），北守上阳村、龙眼塘，并于各险要处竖木栅，

①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下同），第六册，第11页。

筑土垒，掘壕沟，建炮台，埋地雷，构筑了一道外围防线；在外围防线与城墙之间，还构筑了一道长墙，准备长期固守。这时太平军的队伍已达 3 万余人，其中较能作战的约五六千人。

太平军占领永安之次日，乌兰泰即追至城南 20 余里之文墟，28 日扎营佛子村一带。向荣自官村受挫后，即移营平南，不久称病赴桂林，所部 5000 余人在都统巴清德统率下于 11 月初经荔浦绕抵永安西北 10 余里之新圩，扎营古排，堵截太平军北上桂林之路。后清廷在永安外围不断增兵，总数达 4 万余人。

清军围攻永安之初，先后组织了 5 次南北协同进攻，均被太平军击退。太平军利用间隙进行军政建设。12 月 17 日，洪秀全下诏分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并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①]。此外，还加强了纪律教育，重申了圣库制度，打击了内奸周锡能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太平天国革命力量，粗具立国规模。

太平军在桂平、武宣、象州等地与敌转战 8 个月之后，暂时停留下来进行休整是必要的。但是，将数万之众长期屯驻在四面环山的“蕞尔小邑”永安，这在军事上是不足取的。如清军利用永安四周的有利地形，严密封锁各隘口，太平军就有被围歼或困死的危险。

11 月初，钦差大臣赛尚阿在清廷严责下自桂林移驻阳朔。12 月 17 日，向荣复职，出任清军北路指挥。向荣与乌兰泰在桂平时即已失和，这时分任永安南北路指挥，对如何攻城，意见不合。乌兰泰主张“围而击之”，向荣则主张“纵而掩之”，即所谓“宜开一路，放贼使走，我兵以追为剿”[②]。而主帅赛尚阿是个“未历行阵”的贵族，优柔寡断，缺乏主见。因此，南北两军未能采取一

---

①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下同），（上），第 122 页。

② 姚莹：《查复禁绝贼营接济状》，见《中复堂遗稿》，清同治丁卯年安福县刊本，卷 4，第 3 页。

致行动。太平军则采取以逸待劳、以守为攻的正确作战方针，死守营盘不出，待敌疲惫之时，相机主动出击，消耗敌人。因此，清军虽频繁进攻，太平军的防线始终未被突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得以在永安停留半年，安然无恙。

1852年2月中旬，赛尚阿在咸丰帝督令下由阳朔赴永安前线督师，令南北两路清军同时进攻，北路清军用大炮向城内滥轰，城墙、房屋多有毁损。太平军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加之“粮草殆尽，红粉（火药）亦无”①，只好决定突围。

永安四面皆山，南北大道有清军重兵把守，城东十余里之古苏冲有一小道通昭平，仅有千余团勇驻防，是清军包围圈中的薄弱环节。4月1日，太平军前锋罗大纲部进至富豪，分兵两路，一路袭击古苏冲口，一路翻越金鸡岭，抄敌侧背，一举踏平清军防守的玉龙关。4月5日大队人马开进古苏冲，翻越龙寮岭，设大营于昭平六内村。乌兰泰、向荣闻讯督部追赶，截杀太平军后队2000余人。为了摆脱追兵，太平军选择平冲至干冲、崩冲的谷地埋伏重兵，待机歼敌。8日上午，清军进入伏击圈，太平军乘着大雾弥漫，突然从两侧山顶向敌发起攻击。清军“径仄地滑，人马拥挤，不能排队，枪炮亦不能施放”；而太平军将士“赤脚短刀，前后围裹，肉搏鏖战”②，半日之间，击毙清总兵4人，歼灭清军四五千人，为胜利突围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清军未能在永安围歼太平军，反在三冲遭受惨败，赛尚阿受到降四级处分，向荣、乌兰泰被革职留任。

三、攻桂林，占全州

太平军取得三冲伏击战胜利后，取道山间小径，翻瑶山，出

---

①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第520页。

② 汪堃：《盾鼻随闻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358页。

马岭，经高田，抵六塘，于1852年4月17日晚乔装清军，奇袭广西省城桂林未果，乃驻营五里墟、头塘、将军桥、花园里、阳家背，从东、南、西三面围攻桂林。桂林是广西的首府，时城内守兵仅千余人。向荣自三冲之败后，判断太平军将进攻桂林，于是带领清军千余人日夜兼程，赶在太平军抵桂林之前半日进入桂林城内，督同守城兵勇、团练布置城防。4月19日，乌兰泰也率前队数百人驰抵南门外将军桥（今南溪公园），乌兰泰被太平军炮火击伤，5月8日死于阳朔。之后，各处援军陆续赶到，使桂林城内的清军由原来的千余人增至二万余人。太平军占领有利地形，对桂林城展开了艰苦的攻城战，或用云梯缘城而上，或以重炮轰击，或制作吕公车登城，但均未能奏效。后又发觉桂林"城内仓库空虚，粮草匮乏。……即令暂行解围，别作良图，以谋进取"①，乃于5月19日夜撤围北上。太平军围攻桂林33日，大小24战，终未能克，但也积累了一些攻城拒援的经验。

5月23日，太平军取兴安，24日弃兴安抵全州。时全州由署知州曹燮培率兵勇700人守卫，提督余万清、总兵刘长清率部自桂林驰援，屯兵鲁班桥，畏惧不进。太平军遂合围州城，于西门外掘地道，置炸药，轰塌城墙2丈余，将士们乘势冲入，于6月3日占领全州城，斩杀知州曹燮培以下千余人。在攻城过程中，南王冯云山受伤，不久牺牲，使太平天国过早地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6月5日，太平军撤出全州，得船200余艘，装载辎重和老弱，沿湘江北上，7日通过全州北10里之蓑衣渡。这一带重峦迭嶂，树木参天，河床狭窄，江水湍急，是湘江上游桂湘两省的一个险隘要道。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为扼太平军北上之路，在这里伐木作堰，钉塞河道，并在西岸埋下伏兵。太平军船队过此受阻遇伏，与敌鏖战两昼夜，最后被迫弃船登岸，向东岸撤退，辎重尽弃，阵亡将士、家属近千。太平军蓑衣渡之败，由于船队贸

---

①《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第521页。

然先行，前无侦察探路，陆上又无部队掩护，以致在险隘之地，遭到敌军预有准备的伏击。这既是轻敌思想的表现，也系缺乏行军作战经验所致。

四、奔袭长沙

太平军于蓑衣渡受挫后，登湘江东岸，由陆路抵达湖南永州（今零陵）城外，因潇水阻隔，未能克城，乃挥师南向，取道双牌，于 6 月 12 日占领道州城。不久，总兵和春率清兵 1.5 万人尾随而至，企图继续对太平军进行围堵。7 月下旬，太平军突破清军堵截，连占江华、永明县城，摆脱了孤守道州的处境，并在此“大封有功，增修战具，补益军目，制备军火”①，征集铜铁，冶铸火炮，军事实力较前有很大增强。

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开始了一个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早在广西全州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进军方向问题就有各种议论，迨至道州，便进行了较充分的讨论。讨论中，有的主张南下广东，有的主张东出湖南，有的主张北入四川，还有一部分将领主张回广西活动。最后决定进军湖南、湖北，“专意金陵”。《贼情汇纂》就太平军领导层的这次争论情况写道：“群贼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秀清独谓非计，曰：‘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②这就是有名的太平军“道州决策”。

太平军明确了战略进攻方向之后，即开始向湖南、湖北进军。8 月 10 日弃道州，经宁远、蓝山、嘉禾、桂阳，于 17 日攻占郴州。太平军在这一带又扩军二三万人，并将其中数千挖煤工人集中编

---

①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290～291 页。

组为“土营”，专门担负挖地道、埋地雷、掘堑壕、筑墙垒等任务，在以后的作战特别是“穴地攻城”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军占领郴州后，和春、江忠源率清兵2万多人尾追而至。太平军探悉长沙守兵较少，乃决定由西王萧朝贵率2000余人奔袭长沙。8月26日，西王率部自郴州出发，经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于9月11日抵长沙南门外石马铺，突破清军防线，阵斩总兵福诚等700余人，兵锋直抵妙高峰一带。这时长沙守城兵勇约4000人，太平军到达时，城门已闭，并未收到奇袭的效果，只得转为强攻，在12日的攻城战中，萧朝贵中炮受伤，不久牺牲，太平天国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领袖。萧朝贵“勇敢刚强，冲锋第一”，但由于不察彼己力量，轻率强攻坚城，终于遭到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不幸。

萧朝贵牺牲后，部将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等急报郴州，洪秀全、杨秀清等乃于9月25日率大队人马驰援长沙。当10月13日赶到长沙时，清军各路援军也已相继抵达，麕集长沙城内外的有钦差大臣赛尚阿（不久革职由徐广缙取代）、湖广总督程矞采、湖南巡抚张亮基、提督鲍起豹、向荣以及总兵和春等十数员，总兵力达3万余人。太平军大队驻扎南门外，北阻坚城，西滨湘江，东有和春、江忠源部清军，南有赛尚阿援军，态势十分不利。10月14、15日，太平军连遭江忠源、邓绍良部袭击。17日，洪秀全、杨秀清派石达开率二三千人渡过湘江，控制西岸鱼网市、龙回潭等要地和江中的水陆洲（今桔子洲），并在江上搭造浮桥，东西声势联络，初步改变了兵力集结城南一地，难以展开的被动态势。20日，向荣也率部过江，并于31日进犯水陆洲，企图截断太平军的东西联系，结果遭到太平军的伏击，死伤千余人。湘江东岸的太平军主力，先后于11月10日、23日和29日采用穴地攻城法，三次轰塌长沙南门附近的城墙，但攻城部队均被守军击退，长沙终未能破。太平军在长沙城郊旷日持久地与敌相持，军中火药、油盐又缺，形势日趋不利，乃于11月30日乘雨夜主动撤围北上，结束了81天的攻城战役。

太平军进攻长沙，是不符合道州决策中“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要求的。萧朝贵仅率2000余人，远离主力部队，企图用奔袭的办法一举攻克湖南省会长沙，是一种孤军犯险的轻敌行动，结果损兵折将，一无所获。主力部队抵达长沙外围后，又对兵力已得到很大增强的长沙城进行了一个半月的攻城战，结果仍劳而无功。所有这些，反映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轻敌冒进和急于占领大城市的思想。

五、攻占武汉

太平军自长沙撤围后，于12月3日占领益阳，获船数千只，并吸收许多船户、水手参军。9日，太平军出湘阴临资口，越洞庭湖，于13日占领岳州（今岳阳市），又获船5000余只，以及大批粮饷、军火，军需装备更为充实。这时，太平军不仅有较多的步军，而且有了大批船只，人数扩大至十余万。12月17日，太平军撤离岳州，分水陆两路向武汉挺进，“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计数日驻营鹦鹉洲”①。

武汉三镇是长江中游重镇，武昌是湖北的省会（湖广总督也驻节于此），它西枕长江，东依洪山，城高墙厚，形势险要。当时武昌守军仅3000余人，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以城内兵单，将城外的兵勇全部调入城内。12月21日，总兵常禄、王锦绣率2700人自岳州来援。常大淳、双福也令援军全部入城，准备坚壁固守。为了防备太平军挖地道攻城，常大淳、双福下令尽毁城外民房，大火延烧7昼夜，引起人民极大愤恨。

12月22日，水路太平军抵鹦鹉洲，23日占领汉阳，29日又占领汉口。陆路太平军经蒲圻、咸宁，于23日迅速占领了洪山、小龟山诸要隘，包围武昌城。典水匠唐正才于24日在汉阳、武昌

---

① 李汝昭：《镜山野史》，见《太平天国》（三），第5页。

间以船只相联，架起两座浮桥，一由汉阳鹦鹉洲至武昌白沙洲，一由汉阳南岸嘴至武昌大堤口，迅速沟通了汉阳、武昌间的联系。29日，太平军占领汉口，洪秀全进驻关帝庙，杨秀清驻万寿宫，指挥进攻武昌。

12月24日，向荣率万余援军赶到武昌外围柏树岭，于1853年1月2日扎营卓刀泉一带。7日，向部攻占洪山，毁太平军营垒15座。太平军在长春观、双峰山、小龟山、阴骘阁、田家园一带构筑防御工事，抗击清军的进攻，保障攻城太平军的侧后安全。

进攻武昌城的太平军，从12月25日开始，先后使用了大炮、火箭和云梯等器具，均未奏效。旋又采用“穴地攻城法”，在近城处挖地道。清军则在城内挖洞，置空瓮于地下，用人伏听，一旦发现城外有挖地道声，即于城内挖壕，用水灌注，企图破坏太平军的地道。1月12日凌晨，文昌门附近的地雷轰发，城墙被轰塌20余丈，太平军先头部队冲入缺口，大队相继突进，其余方向的太平军则缘梯而上，纷纷攻入城内。守城清军丢下武器，四散逃跑，常大淳、双福等丧命。武昌遂为太平军占领。

太平军占据武汉后，声威大振，便在此论功封赏，度岁休兵，扩充军队，建立水营。这一胜利表明，太平军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能够攻克坚城，并拥有陆营、土营、水营的强大的农民革命武装。

太平军进军湖北，特别是攻克“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使清廷大为震惊，湖北各邻省的督抚也纷纷告急。咸丰帝接连任命三名钦差大臣来对付武汉的太平军：以向荣代替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指挥二三万清军盘踞武汉周围；任命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指挥直隶提督陈金绶等，赴河南南部的南阳、信阳、商城一线，由北向南堵截太平军北上；任命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统筹苏、皖、赣三省军务，自金陵率部3000人赴九江，防堵太平军沿江东下。此外，还命令南北各省普遍组织“团练”，纠集一切封建势力镇压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

此时，在太平军内部，对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也产生了分歧和

争论。据现有史料来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洪秀全为代表，主张北据中原，“欲取得河南为业”①，或建都武昌，“遣兵道襄樊”，北进中原②。另一种以杨秀清为代表，主张坚持进军金陵，“踞为根本，徐图进取”③的既定方针。这两种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最后杨秀清“遂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南”④，才结束了争论，决定了进军方向。

进军金陵是杨秀清的一贯主张，在道州时就提出过“专意金陵，据为根本”，并得到洪秀全的赞同；占领武汉后，决定全军沿江东下，进军金陵，这与道州决策是一致的。从当时清军的部署来看，无论太平军“北走信阳，东下九江，西上荆襄，南回岳州之路，(清军)俱属空虚”⑤；但相对而言，河南方向兵力较强，长江下游兵力较为空虚。从太平军本身而言，由于在益阳、岳州、武汉一带取得了数以万计的船只，并已编组成“水营”，如顺江东下，则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北上中原，就不能充分发挥水营的特长。由此看来，太平军东下江南、夺取金陵的决策是较为稳妥可取的。

六、进 占 金 陵

1853年2月9日，太平军放弃武汉，以号称50万之众(兵力约10余万)，船万余艘，水陆并进，东下江南。陆路军由东、北、翼三王率领，天王洪秀全则由水路东下。

当时，长江下游，清军兵力十分薄弱。1月23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率兵3000自金陵西上防堵，于2月9日抵九江。

---

①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第486页。

②③ 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3页。

④ 汪堃：《盾鼻随闻录》，见《太平天国》(四)，第367页。

⑤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

2月15日，先锋秦日纲、罗大纲率太平军水师于广济县的老鼠峡一带，大败清江防军。清总兵恩长沉江而死，陆建瀛慌忙由九江只身逃回金陵。太平军长驱直进，18日占领九江，24日占领安徽省城安庆，杀巡抚蒋文庆，并缴获大批军械物资。接着又连克池州、铜陵、芜湖，败清军于东梁山，毙总兵陈胜元。继下安徽太平府（今当涂）及和州，3月8日兵临金陵城下。

金陵时称江宁（即今南京市），是江南的名城大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金陵城垣高厚，周围70里，西北两面濒临长江，东依钟山，附近丘陵环绕，形势险要，向有“龙盘虎踞”之称。江苏全省共有绿营兵3万余名，八旗兵数千人，但能调之兵不足万人。太平军攻占武昌后，陆建瀛从全省抽调4800名，除将3000名带赴上游防堵外，其余1800名留守金陵。清朝在金陵设有江宁将军，辖旗兵3000余人。太平军进攻时，金陵城内共有旗兵、绿营兵5000余人，另由布政使祁宿藻临时募勇八九千人，协助防守。

2月25日，陆建瀛自上游逃回金陵后，数日不理政事；不久，江苏巡抚杨文定借口防守镇江，弃城而去，全城人心更加惶惑。对此，江宁将军祥厚、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等上奏参劾，清廷决定对陆建瀛拿问治罪，杨文定革职留任。可是未等朝廷的谕旨到达，太平军的先锋部队已进抵城下，陆建瀛、祥厚乃尽撤城外兵勇闭塞城门，依城防守。

3月8日，太平军陆路前锋部队在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下，抵达南郊善桥一带，占领雨花台、报恩寺。9日，水师亦至，围攻仪凤门（今挹江门东）。12日，水陆大队继续赶到，占领江浦、浦口等江北要地，包围金陵。金陵城垣南北略长，太平军将攻城的重点选在南北两端，陆师攻南端的聚宝门（今中华门），水师攻北端的仪凤门，充分发挥水陆两军的优势，迫使清军分散兵力。清军则一面由江宁将军祥厚率旗兵守北门，由陆建瀛率兵勇守南门，负城顽抗，一面呼吁清廷火急增援。清廷获悉金陵被围，大为震恐，催促向荣、琦善分率清军兼程急进，南北夹击，以解金陵之围；下

令山东、河南加强黄河各渡口防务，严格控制公私船只，防止太平军北上；加紧举办团练，对付各地起义武装的活动。

太平军包围金陵后，选定仪凤门为突破口，并采用行之有效的“穴地攻城法”。仪凤门外有静海寺，距城约半里，太平军以此为掩护，挖掘地道，埋设炸药，准备攻城。与此同时，聚宝门外的太平军将炮安置于报恩寺塔上，猛烈轰城，夜间则搬出寺内500罗汉，以为疑兵，诱使清军彻夜打炮而不得休息。其它城门的太平军则派小部队进行袭扰，掩护北门挖掘地道。

3月19日拂晓，仪凤门地雷轰发，炸塌城墙二丈余，数百太平军将士冲入城内，分成两支，一向鼓楼方向进攻，一循金川门、神策门，经成贤街直指小营。路遇陆建瀛，太平军战士一跃而前，将其杀死。此后，攻入城内的太平军由于遭到旗兵的堵截和反击，纷纷由原路退出城外。但是防守南城的清军得知北城已破，总督被杀，遂纷纷逃遁。攻南城的数千太平军在林凤祥、赖汉英率领下，纷纷缘梯登城，并打开聚宝门、水西门、汉西门，大队人马突入城内，直奔满城（旧时明代内城，今城东南部），与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率领的旗兵、满人激烈拼杀，终于攻破满城，杀死祥厚，占领金陵城。

太平军攻占金陵后，迅速肃清了城内的残敌。然后，对金陵的防卫工作，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在全城遍设望楼，派兵日夜观察警戒，日间以旗帜为信号，夜间以灯火为信号，一方有警，城内指挥机构能迅速得知，随时调兵遣将。城上分兵驻守，各垛口置有“先锋袋”（火药包）和砖石，备敌进攻时抛掷；各段设有巡守将军，日夜巡防。在城外建立营垒，墙上开枪炮眼，营外挖有一至数道深壕，内竖竹签木栅。在城外一里半左右设有警戒哨，战士携带兵器、海螺守卫，并规定有口令，每日更换。

为了拱卫金陵，太平军于3月底发兵二支：一支由指挥罗大纲、吴如孝统率，于3月31日占领镇江。另一支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领，于4月1日占领扬州。镇江、扬州的占领，既屏蔽了金陵的东面、北面，又切断了南北漕运，予

清王朝以严重威胁。

太平军攻占金陵后，很快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北王韦昌辉、东王杨秀清先后进驻城内。3 月 29 日，天王洪秀全也进入金陵，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并决定改金陵为天京，定为都城，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在金陵驻止下来，并定为都城，这一决策原则上是可取的。因为太平军自上年 8 月 10 日撤离道州以来，七个月之内，占郴州，攻长沙，克武汉，沿江东下，势如破竹，一举攻下金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使革命武装空前壮大。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向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军事上，要求从以往的无后方流动作战，进到有后方依托的作战阶段；迅速壮大起来的军队，也有待整顿提高。政治上，要求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革命政权，制订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以支持革命战争，为实现"开创新朝"的政治目标创造条件。这一系列重大问题，都需要太平军驻止下来，逐一加以解决。因此，在这时决定于金陵定都立足，在原则上是正确的。金陵城大而坚，形势险要，利于坚守；它地处江南富庶之区，物产丰富，粮饷充足；它傍靠长江天险，交通便利，利于水军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宜于建都立足的有利条件。

清廷对太平军占领金陵后的军事行动，一时无法判明。既怕太平军东下苏、浙，占领其财富之区，更害怕太平军北上豫、鲁，进而威胁其京畿根本重地。在此情况下，咸丰帝严令向荣、琦善率所部迅速东下，防堵太平军向外蔓延。3 月 28 日，向荣部赶至金陵城南之板桥，31 日绕至城东沙子岗，4 月 7 日移营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有兵勇万余人。3 月 30 日，琦善的先头部队抵达江浦，4 月 4 日陷浦口；16 日，琦善、陈金绶率部进至扬州城外，扎营雷塘集、帽儿墩一带，建立"江北大营"，也有兵勇万余人。清军建立江南、江北大营的目的，意在阻扼太平军向东、向北进军，并威胁金陵。

太平军占领金陵后，队伍号称百万，实际上能战之兵在 20 万

以内。以这样一支部队对付金陵周围的江南、江北大营，在兵力上无疑处于压倒优势。但如果与全国 90 万清军相比，则太平军仍处于劣势。其次，这时清王朝仍控制着全国政权，人力、物力和财力均归其支配。而当时太平天国仅仅控制着金陵一隅，无论人力、物力或财力都极其有限。因此，对太平天国来说，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被“围堵攻剿”的处境仍未打破。

可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被从广西到金陵一路上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过分夸大自身的力量，低估了清方的实力，对敌我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在天王洪秀全正式颁布的《贬妖穴为罪隶论》中，就认为“方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我天王奉天伐罪，除暴救民，迅扫群魔，妖氛几尽，而乃余烬犹存，匿迹燕省”①。

正是在对全国敌我态势的错误估计下，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这时作出了一个十分错误的战略决策：一方面，对近在咫尺、日夜威胁天京安全的江南、江北大营不予摧毁。另一方面，却先后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以 2 万之众，北伐京津；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以二三万之众，西征两湖。这样一来，在天京周围对清军本来具有明显优势的一支战略打击力量，就被分散地置于从天京到直隶、到两湖的广阔战场上，无论在天京周围，还是在北伐、西征战场上，兵力都不占优势，以致在战略上越来越被动。

第二节　北伐

（参见附图 7）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决定建都金陵后，遂部署北伐和西征。约在 1853 年 4 月中旬，东王杨秀清命镇守扬州的天官副丞相林凤

---

① 《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442 页。

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带领部分部队回天京，领受“扫北”任务后，于5月13日会齐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等部，共9个军的番号，约2万余人，从天京出发，开始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直隶进军。

北伐军进军的战略目标是清王朝的首都北京。是年5月，杨秀清在给北伐军领导人的一份诰谕中说：“尔等奉命出师，官居极品，统握兵权，务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胆灵变，赶紧行事，共享太平。……谕到之日，尔等速急统兵起行，不必悬望。”并在另一诰谕中提及“到北京之日”① 等语。从中可以看出，北京确是北伐军的进军目标。另据《清史稿·洪秀全传》载：北伐军出发前，“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縻时日。”后来李开芳被俘后也说：洪秀全“打发我们过黄河，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② 由此可知，林凤祥等率领的这支部队，系北伐军的先遣队。

一、挺进华北

鉴于清军加强了山东和江苏接合部的防御，林凤祥等便取道安徽、河南北上。5月13日，北伐军自浦口出发，16日克安徽滁州后，长驱北进，连克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于6月10日克亳州。蒙亳地区是捻党活动的中心地带，北伐军路过这里，推动了捻党的起义，并吸收许多劳苦群众参军。6月12日，北伐军撤离亳州，进入河南。河南巡抚陆应谷率5000兵勇扎皖豫边境之宋家集堵截。北伐军进至宋家集后，一面与陆应谷接仗，一面分军于13日袭取归德府（今商丘），北上刘家口，打算从这里渡过

①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5页。

② 《李开芳又供》，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五辑，第167页。

黄河①，取道山东北上。由于山东巡抚李僡已在沿河布防，并将大小船只一概集中北岸，太平军无法北渡，只得循河西走，连克宁陵、睢州、杞县、陈留，逼近开封，于22日抵达中牟县之朱仙镇。林凤祥等在这里给北王韦昌辉一份禀报，报告了归德战况及未能渡河的原因，并说："自临怀（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将兵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谷米一事。……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② 从中反映出北伐途中所遇到的吃不上米谷、通信不便等困难。但北伐军将士们决心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北伐军在向皖豫进军途中，破城过邑，所向无阻，清廷调兵遣将，始终追赶不及。及至北伐军进抵蒙亳地区，清军才察知北伐军将渡河北上。清廷于是命令各路清军驰援河南：由河南巡抚陆应谷率兵3000余至永城地区阻截，江宁将军托明阿率兵2000余由江苏清江浦驰赴河南，由都统西凌阿率滁州的残兵败将尾随追赶，同时命山东、直隶督抚查禁河防，防堵太平军北渡，并继续从山西、陕甘等地调兵，开赴河南。清廷仍感到不足以阻止太平军前进，又命江北大营帮办军务胜保带兵北上追击。胜保迟迟于6月18日才自扬州附近的司徒庙启程。这时，北伐军已攻破归德，正沿黄河继续西进。6月23日，北伐军离朱仙镇进占中牟，经郑州、荥阳境，于26日到达汜水、巩县地区。这里是洛河归黄入口处，停有不少运煤船，北伐军利用这批船只，从27日起开始抢

---

① 当时的黄河河道系由开封以东之兰阳（今兰考）与铜瓦厢之间东下，经归德以北之刘家口、徐州、宿迁、清江浦、安东（今涟水）流入东海。1855年夏，黄河改道，由兰阳之铜瓦厢入山东境内，注入大清河，流经济南，东入渤海，大体上即今日黄河河道。

② 《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回复北伐战况上北王韦昌辉禀报》，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18页。

渡黄河。7月1日，托明阿等率盛京、吉林马队赶到汜水。北伐军一面阻击敌军，一面继续抢渡。7月3日，主力渡过黄河。担任阻击和掩护任务的2000余人未及渡河，南下豫南，经鄂东北，入安徽境，沿途抗击清军，损失大半，最后并入西征军。

北伐军主力渡过黄河后，于7月2日克温县，8日围怀庆府（今沁阳）。怀庆是黄河北岸重镇，城内仅有清军300人，连同团勇壮丁，总共不过万人。怀庆知府余炳焘及河内县知县裘宝镛据守待援。北伐军本想迅速攻克怀庆，补充粮食弹药后继续北上，不意屡攻不下，于是将怀庆城团团围住。不久，江宁将军托明阿部4000人，总兵董占元、双禄部2300人，理藩院尚书恩华部1000余人，山东巡抚李僡部2000余人，江北大营帮办军务胜保部1600人，先后赶到怀庆外围。太平军为了阻击清军援兵，于怀庆城外建营立寨，加筑木城，挖掘深壕，一面攻城，一面阻援。

太平军北渡黄河，引起了清廷的极度震惊，立即任命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以恩华、托明阿帮办军务，所有黄河南北各路清军，统归节制。讷尔经额由河南彰德（今安阳）移营怀庆外围的清化镇指挥。

由于怀庆城被围日久，城内粮食将尽，守军屡次派人潜出求救。于是，清援军加紧进攻，但战斗力极为有限，每每在200步外以枪炮轰击，等到太平军发炮和出木城反击时，即慌忙败退。在7月中旬到8月底的一个半月期间，太平军先后打退了清军10次较大的进攻，并给敌以一定杀伤。

北伐军进围怀庆，久攻不下，非但未能补充到粮食、弹药，反而消耗了不少，加上增援的清军越聚越多，形成了对北伐军的反包围。为了摆脱被动，北伐军不得不于9月1日主动撤围西进。

北伐军的战略目标是挺进京津地区，结果在怀庆徒然滞留了两个月，使清廷得以在黄河以北厚集兵力，加紧布防，给北伐军尔后进军京津地区带来了很大困难。

北伐军自怀庆撤围后，便绕道济源进入山西，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今临汾），进至洪洞以北地区。因胜保率部赶到

太原以南的霍县一带堵截，太平军乃自洪洞转而向东，经屯留境，克潞城、黎城，复入河南，占涉县、武安，于9月29日进入直隶境，败钦差大臣讷尔经额军于临洺关（今永年），继而连下沙河、任县、隆平（今隆尧）、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于10月9日占领深州。

北伐军绕道山西直插直隶的行动，使清廷举朝震动，咸丰帝立即将讷尔经额革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随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僧格林沁带领京营禁兵、察哈尔及东蒙马步军4500名屯驻涿州，护卫京师，并策应胜保军。

林凤祥、李开芳等在深州稍事休整后，于10月22日弃城东走，占献县、交河，下沧州，经青县，于29日占领天津以南的静海县、独流镇，前锋直抵天津城西10里的稍直口村。由于受到知县谢子澄所率雁户的袭击，遂退据静海、独流镇。

时天津驻军不多，总兵特克慎与知县谢子澄办团练，招募壮勇，以固防守。北伐军占领静海的当天，胜保即率队赶到，并于11月4日进入天津；僧格林沁则移营天津西北之杨村，防御北伐军进逼京师。

二、静海、独流防卫战

静海、独流镇均位于子牙河以东的运河线上，两地相距18里，附近多沼泽港汊，夏秋季节，周围一片汪洋。太平军到达这里以后，遂驻扎下来，同时报告天京①，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他们在这里构筑木城，挖堑壕，建望台，埋地雷，树木桩，坚守待援。

北伐军自1853年5月13日从浦口出发，到10月29日占领

---

① 北伐军出发前，洪秀全曾有“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的交代。李开芳被俘后在供词中说：“我总未接得洪秀全来信。后我给南京贼营中寄信三次，亦未见回信。”这三次信中，当有到达静海后寄的。

静海、独流，为时不到6个月，途经5个省，行程四五千里，一直打到清王朝的心腹地区——京津一带，队伍也由2万余人扩充到四五万人。自浦口到静海，北伐军一直对敌军保持着进攻姿态，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拖得清军疲于奔命，吓得清廷惊慌不安，北京城内的官僚富户纷纷逃散。但这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沿途却未能消灭任何围追的清军，到静海、独流后，在远离后方接应的情况下驻止下来，从而陷入越来越多的清军的包围之中，战场的主动权也就随之丧失。这是北伐军进军中的一个转折。

太平军抵达静海、独流之后，胜保率领的两万多清军先后赶到，设大营于梁（良）王庄，以主要兵力围困独流镇；另由都统西凌阿带领少量部队，围困静海县城。僧格林沁则于11月6日自杨村移营独流镇以北30余里的王庆坨，以为声援，同时堵塞太平军进袭北京之路。此外，在天津及附近各县还组织了2.7万余名地主团练武装，参加围攻。

太平军面对清军的重兵围攻，并不气馁，于12月23日实施反击，击毙副都统佟鉴、天津知县谢子澄，夺获神威炮4尊，胜保由此受到降四级的处分。清廷鉴于静海、独流久攻不下，于1854年1月27日命僧格林沁自王庆坨统兵前进，与胜保会合，并力进攻。

北伐军由于被围日久，粮食、弹药均感困难，援军又无消息，不得已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走。太平军在静海、独流凭借临时构筑的工事，忍受严寒和饥饿，抗击三四万清军兵勇的不断围攻，整整坚持了100天，充分地表现出这支革命军队的顽强战斗精神。

三、南撤束城、阜城

北伐军自静海、独流突围后，沿子牙河西岸南走，于2月7日到达河间府之束城镇，并占据附近的辛庄、陈官庄等5个村庄。这一带村落稠密，树木丛杂，太平军就地取材，建造土垒木城，抗

击清军。

自太平军撤离静海、独流后，僧格林沁、胜保带领马队，紧追不舍，于当天就追到束城。不久，大队清军纷纷赶到，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包围。清军在四围挖掘深壕，设置鹿角、木栅，并不时发起攻击。太平军凭垒固守，一俟清军攻近墙外，便施放枪炮，投掷火罐、火球，杀伤清军。

束城是个小镇，粮草有限，太平军在这里驻留一个月后，便于 3 月 7 日乘大雾再次突围，经献县，于 9 日抵达阜城。

阜城是一个小邑，城内积水很多，房屋甚少，太平军除据有全城外，还占领城外的一些村落，并在村外密布鹿角、树栅，准备坚守。

太平军到阜城后，很快又被清军包围。13 日，城北的连村、对村和杜家场均落入敌手。23 日，太平军夜袭杜九村，击毙清军参领慕纳春。北伐军统帅之一平胡侯吉文元也在战斗中受伤牺牲。幸好这时北伐援军已过黄河北上，清廷为不使其与北伐军会合，即命胜保带领部队万余人（内马队 2000 人）进入山东，阻击北伐援军。这就减轻了对阜城的压力，使北伐军得以在此坚守两月。

5 月 2 日，北伐军主动出击，焚毁东南方向的清军营盘。5 日夜，林凤祥、李开芳等突围东走。太平军以一部分阻击尾追的清军，另一部分迅速占据东光县之连镇。及至清军赶到，运河上的桥梁、船只均已被太平军破坏，僧格林沁只得从连镇以北 20 里之东光县渡过运河，包围太平军。

四、援军的北上及其覆灭

1853 年 11 月，天京当局得悉北伐军于 10 月底到达天津以南的静海县和独流镇后，由于天京及西征战场战事紧张，未能立即抽调兵力北上增援。

1853 年底至 1854 年初，太平天国所面临的军事形势是：西征军占领安庆、九江后，正北攻庐州；江北大营清军正围攻扬州；江

南大营的清军也不断向天京城进攻。上述情况表明，要从天京和西征战场抽调兵力组织北伐援军是很困难的。因此，天京当局于万不得已之中，决定弃守扬州，腾出部队北上增援。但这时扬州正被江北大营所困，守军难以撤出。于是决定由天京派出夏官副丞相赖汉英，带兵前往扬州外围接应扬州守将曾立昌部。12 月 26 日，曾立昌部放弃扬州，留兵一部退守瓜洲、仪征，主力则前往安庆，会合其他部队共 15 个军约 7500 人，准备北援。

北伐援军由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率领，于 1854 年 2 月 4 日从安庆出发，经桐城、舒城、六安、正阳关、颍上、蒙城，在这一带吸收了大批捻党、义民入伍。3 月上旬，入河南境占永城、夏邑，中旬转至江苏砀山（今属安徽）以东的丰工河坝一带，就地取材扎木筏渡过黄河，并占领丰县，19 日入山东境。但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三千人未能渡河，经永城，入安徽，归入庐州。此时山东清军正集结于北部地区防堵北伐军南下，鲁西南地区兵力空虚，故援军进入山东后如入无人之境，连下金乡、巨野、郓城、阳谷、莘县、冠县，于 31 日直逼临清城下。这时援军已扩充至三四万人，距阜城 200 余里。

奉命阻击太平军北伐援军的胜保自阜城率部出发后，经故城入山东，于 4 月 4 日到达临清外围。于是，北伐援军一面阻击胜保军，一面猛烈攻城，于 12 日用地雷轰塌西南城墙两处，攻入城内，占领了临清。但城内粮秣、弹药已被焚毁，仅得一座空城。在援军攻临清期间，清廷调兵遣将，很快集结兵力一万六七千人，内马队四千多名，加上团练等约有二三万人，对临清又形成合围，并不断用数千斤的重炮猛轰援军营垒及城垣。援军屡战不利，曾立昌等于 18 日放弃临清，南退至李官庄、清水集一带。

此时，关于援军的行动问题，在领导层中展开激烈的争论。曾立昌认为清军已经疲乏，又屡胜而骄，主张“乘势趋阜城，僧营不虞后路之变，此转败为胜事也！”但许宗扬等置北伐军数万将士的安危于不顾，迁就部队中新成员留恋乡土、不愿北上的情绪，说什么“众心欲南趋，北行恐多逃亡。我则深入，不如南行，明旦

迅发，官军未能追也。”① 结果南返的主张占了上风。4 月 27 日，援军南退冠县，在胜保部的追击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下，全军溃散，曾立昌渡黄河时淹死，陈仕保在安徽境内战死，许宗扬逃回天京，被治罪投入东牢。这支援军非但未能达到驰援北伐军的目的，反而先于北伐军而覆灭。

援军的任务是接应北伐军，在进军途中理应尽量避开重要城镇和清军主力，乘虚夺路北上，尽快与北伐军会合。但是当其进至临清时，竟在清军已经逼近的情况下，强攻州城，不仅劳师费时，而且吸引更多清军的集结，使自身陷入被动的境地。撤出临清后，援军仍有二三万人（内骑兵千人），但为清军三千多骑兵的追击所震慑，产生逃跑情绪，特别是许宗扬等置“搭救旧兄弟”的重大使命于不顾，迁就新成员中的乡土观念，怕死逃命，终于招致全军败亡，使北伐军失去支援，难以摆脱清军的围困。北伐援军的覆灭，助长了清军以长围久困的手段消灭北伐军的信心和反动气焰。

1854 年 5 月，天京方面又“封燕王秦日昌（纲）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②。此后，北伐军只得依靠本身的力量作最后的奋战。

五、坚守连镇

北伐军于 5 月 5 日突围至连镇。连镇横跨运河，分东西两部，分别由林凤祥、李开芳据守。太平军在河上架设浮桥两座，将两岸连为一体。北伐军抵达连镇的当天，僧格林沁即率马队赶到，不

---

① 《山东军兴纪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下同），(四)，第 17 页。

②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543 页。关于秦日纲未能北援事，《贼情汇纂》则记为：“杨贼再令北犯，日纲往扰凤阳、庐州一带，不愿北行，禀奏杨贼云，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

久步队也赶到，又将连镇紧紧包围。

北伐军抵达连镇后，“始知南京续派十三军，已到山东临清州”①，但还不知援军已在一个月之前覆灭，便商定由李开芳率领经过挑选的600余骑健卒突围南下，迎接援军。5月28日，李开芳率队自连镇突围成功，过吴桥，入山东境，经陵县、恩县，袭占了高唐。歼灭北伐援军后于5月19日返抵连镇外围的胜保，得知北伐军突围南下，即率马队跟踪追击。

留守连镇的太平军，这时尚有六七千人。僧格林沁拥有二三万清军，在连镇四周挖掘壕沟，构筑土城，壕沟深宽各二丈余，土城高一丈五六，厚八九尺，上安抬枪、大小炮位，每隔一丈支帐篷一座，设兵十名，企图将太平军困死。可是围了10个月，清军屡受挫败，僧格林沁不断受到清廷的申斥。林凤祥部久据连镇，粮食匮乏，仅以黑豆充饥，及至年底，粮食几尽，“各军先杀骡马、次煮皮箱刀鞘充饥；或掘沙土中马齿苋、当归、一切野菜者；亦有剥榆树，取皮研末，造作面食者；甚至捉获官兵逃贼，无不割肉分食”②。僧格林沁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乘机开展“诱降”活动。太平军在饥困交迫和僧格林沁的引诱下，前后出降者达3000余人。1855年2月17日，林凤祥放弃西连镇，集中力量防守东连镇，并针对僧格林沁的诱降政策，于18日派萧凤山（原系清朝县丞）、钟有年（原系清朝文生）等90余人诈降清军，以便联络降众为内应，配合守军出击，打破清军的围困。但这项计划被清军识破，90多人全部被杀。3月7日，清军对东连镇发起总攻，集中炮火轰击木城；2000多北伐军将士拚死抵抗，林凤祥在督战时受重伤，士气大受影响。随着木城的被攻破，清军纷纷扑入，双方展开白刃战，清军死伤不少，北伐军将士也大多阵亡，其余或被俘，或从运河潜逃。林凤祥受伤后，藏于一个很深的地道内，最后被清军搜获，解送北京，3月15日慷慨就义。

---

① 陈思伯：《复生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第43页。

② 陈思伯：《复生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第46页。

六、坚守高唐、冯官屯

1854年5月28日，李开芳率领600多人及沿途扩充的近千人占据高唐。当天，胜保先率马队300名赶到，不久大队清兵集结于高唐城外。李开芳鉴于高唐城高池深，粮草尚多，遂组织居民在城外立棚筑垒，开掘壕沟，城内挖掘地道多处，通至城外，准备依城固守。这时，胜保拥兵万余，先用云梯，后制吕公车攻城，均未得逞，乃雇匠人铸造1.5万斤的大炮，轰塌城墙，又被太平军击退。10月16日改取挖地道、埋地雷轰城，也未能将城攻破。太平军则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于夜间出击，前后凡30余次，杀死不少清军。

高唐久攻不下，胜保受到咸丰帝的严词申斥和拔去花翎、革职留任的处分。1855年3月7日，连镇失陷，清廷乃命僧格林沁移师进攻高唐，胜保被解京问罪。

僧格林沁于3月11日选精兵8000余名，抵达高唐外围，使清军增至2万余。他改变胜保围城强攻的做法，采取“纵而舍之”的诡计，于17日夜密令城南官兵分开队伍，故作疏防之势，诱使太平军突围。当日午夜，李开芳果然率兵突围，向南急走。僧格林沁马队500余名，衔尾紧追。李开芳部遂入据距高唐50余里的茌平县属之冯官屯。

冯官屯由三村相连，外有高墙。李开芳部进据之后，又掘壕树栅，布置防守。3月18日，僧格林沁率马队赶到，首先夺占了西边二村，然后在四面安放火炮，向村内轰击，房屋均被轰塌。太平军遂在村内掘挖纵横交错的壕沟、地道和地窖，以避炮火；同时在壕沟上以木板木材被覆，开挖射孔，伏于壕内，待清军近至鸟枪射程内时，开枪射击。清军非但不能攻入屯内，反而遭到不少伤亡。

僧格林沁虽拥有万余军队，但对仅有几百名太平军据守的冯官屯却久攻不下，最后采用恶毒的水灌计，从东昌三孔桥引运河

水至冯官屯石桥，然后灌入冯官屯。河道全长120余里，征集当地大批民夫，施工一个多月方竣工。4月20日，开始引水浸灌，致使全村平地水深达数尺，壕沟地洞不能藏身，粮草火药尽湿。这时，僧格林沁一面用大炮向村内轰击，一面对太平军展开诱降活动，先后又有200多人出降。5月31日，清军围攻益急，太平军弹尽粮绝，陷于绝境，李开芳乃率80余人出村，被清军俘获。李开芳等9人被解送北京，于6月11日遇害。

至此，这支由数万精锐组成的北伐军，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全军覆没。

七、北伐军失败的教训

北伐军及其援军的全部覆没，这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军事上所遭到的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对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所带来的影响至深至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战略决策错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既已定鼎金陵，又决定同时派兵北伐、西征，致使兵力屡分而单。而北伐军仅以2万之众，远离后方，进军数千里，深入清王朝的心腹地区，冀图待后续部队到达后，一举攻下北京。当时，清王朝尚控制着全国政权，京师驻兵达10万以上，并拥有数十万马步军可资调遣。在这种情况下进攻北京，必然会遭到清军重兵的围攻与夹击。因此，对于北伐军来说，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对于太平天国领导者来说，完全是一种轻敌冒险行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于占领金陵后，没有认识到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尚未改变，而主观地认为清王朝已经到了行将覆灭之时，从而作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战略决策一旦失算，纵使前方将士英勇善战，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北伐军的覆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后续梯队（即援军）派出过迟。本来，先遣部队出发之后，就应尽快组织和派出后续部队，以便及时策应，对付不测情况，完成进攻任务。洪秀全等在北伐前夕对林凤祥、李开芳说：

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这样安排后续部队的出发时间，显然过于迟缓。如果后续部队迅速北上，合六七万之众，就能互相声援配合，同清军周旋，即使攻不下京师，仍有可能转战各地，与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反清武装相结合，建立革命基地，与清军作长期斗争，决不至于被清军各个歼灭。可惜，由于援军派出过于迟缓，加之援军的领导不力，认识不统一，部队又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结果先于北伐军而失败。这就使陷于重围、孤军奋战的北伐军，最终丧失了摆脱困境的希望。

第三，林凤祥、李开芳等过于机械地执行洪秀全的指令，于抵达天津外围之后，即在静海、独流驻止下来，坐待援兵，从而使这支以流动作战见长的起义军，失去了根据实际情况机断行事的主动性，结果在静海、独流遭到清军的重重包围和北方严寒的侵袭，逐渐陷入困境。另外，从静海到冯官屯的 15 个月的节节南撤过程中，犹时时企望天京派来援军，以致在思想上丧失了独立自主地对敌作战的能动性，进而陷入了消极被动的困境。如果北伐军领导者能根据前线的实际情况，机断行事，充分发挥自身流动作战的特长，纵横驰骋于华北平原，一面等待援军，一面寻机歼敌，就不至于一再陷入被围攻的不利处境，有可能长期坚持斗争。

第四，作战指挥上的失误。北伐军渡过黄河后，在怀庆停留过久，结果既未能攻克城池求得补给，又延误了时日，使清军得以从容集结，给尔后的进军带来了很多困难。北伐援军也在中途贪攻临清，结果延误了北上的进程。此外，北伐军无论在北上或是南撤过程中，均未着眼于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虽然行军数千里，作战数百次，但消灭敌军十分有限。特别在南撤过程中，只顾突围逃跑，未能发扬早期行之有效的伏击战法，有计划地选择有利地形，对尾追之敌组织若干次伏击战，以挫伤敌军的气焰，打破敌军穷追不舍和一围再围的伎俩。若能这样，全部或部分南撤，仍然是可能的。

北伐军在内乏军火粮草，外无救兵，地形、气候、民情不熟的情况下，与优势的清军特别是优势的骑兵进行了两年余艰苦卓绝的奋战，绝大部分将士最后英勇战死、慷慨就义，发扬了农民起义军的英雄气概，在太平天国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英雄们的鲜血也没有完全白流，北伐军的长驱北上，在政治上扩大了太平天国的影响，推动了捻军、幅军等起义武装的兴起，牵制了数万清军南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京周围和西征战场的军事压力。但这支精锐部队的丧失，实在是太平天国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三节　西征

北伐军出发后，太平天国又于1853年6月初派出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领战船千余艘、步军二三万人由天京溯江西征。西征的目的，在于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并解决天京军民的粮饷供给问题。在这个战略意图下，西征军经太平（今当涂）、池州（今贵池），于6月10日占领安庆。此后，赖汉英率殿左一检点曾天养、殿右八指挥林启容以下万余人进军江西，于6月13日占彭泽，接着连克湖口、南康府（今星子）、吴城镇，前锋于24日直抵南昌城下。

一、围攻南昌

时江西巡抚张芾驻守南昌，城内有兵勇万余人，太平军围城前夕，帮办江南军务、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自九江率楚勇1300人先期增防南昌，与张芾共同据城守卫。清军烧毁城外民房，防止太平军“穴地攻城”，并于城上逐段分派兵勇驻守。

赖汉英等到达南昌外围，泊船于七里街、周公亭、盐仓、司马庙等处，并于德胜门外北兰寺、章江门外文孝庙，立栅筑营，准备攻城。6月29日、7月9日、7月28日，太平军先后三次用地

雷轰塌城墙，但均未能突入城内。

太平军攻南昌因兵力所限，未能合围，因此，江忠源等得以多次出城猛扑太平军阵地。太平军英勇反击，予敌以杀伤，并击毙总兵马济美，从而保住了自己的阵地。

8月上旬，国宗石贞祥、石凤魁率援军万人、船只千艘，自天京抵达南昌外围。太平军的兵力加强后，决定一面围城，一面进攻外围各州县，孤立南昌清军。由曾天养率领的一支部队，于8月5日至9月17日，先后攻占南昌外围的丰城、瑞州（今高安）、饶州（今波阳）、乐平等州县，沿途征集了不少粮食支援进攻南昌的太平军和接济天京，并于8月7日在瑞州击溃了自湖南来援的训导江忠淑部湘勇2000余人。

8月中下旬，清军各路援兵陆续到达，主要有江南大营派来的由总兵音德布率领的云南兵1200名，帮办湖南团练、侍郎曾国藩从湖南派来的由知州朱孙诒、训导罗泽南等率领的湘勇3600名。8月28日，清援军在南昌守军的配合下，妄图对攻城的太平军实施内外夹击。太平军予以迎头痛击，斩营官谢邦翰以下五六百人。

由于清军援兵源源而来，太平军在兵力上渐处劣势，便于9月24日撤南昌之围，转攻皖北和湖北。

西征军自南昌撤围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石贞祥率领，西取湖北；一路由曾天养率领，折回安庆，准备进攻皖北。由于未能攻取南昌，赖汉英被解除职务，调回天京。

进取湖北的石贞祥军，于9月29日占领长江南岸的半壁山要隘，15日大败清军于田家镇，旋又乘胜攻克蕲州、黄州（今黄冈）、汉口、汉阳等地。后因集中力量攻皖北，主动撤出汉口、汉阳，以一部守黄州、蕲州，主力加入进攻皖北的队伍。

二、攻克庐州

（参见附图8）

东王杨秀清为加强西征军事的领导，派出翼王石达开率军西

援。9月25日，石达开到达安庆，主持西征军务，遂组成一支万余人的大军，由胡以晃率领，进军皖北。11月14日，太平军占桐城，29日占舒城，帮办安徽团练、工部侍郎吕贤基自尽。接着，太平军直逼庐州（今合肥）。庐州是安徽的临时省城，城垣周围30余里，守城之兵不满300、勇不满5000。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带勇2700名急驰庐州，于12月10日进入城内。同时，清廷还从河南陈州（今淮阳）、江苏徐州、安徽定远、东关等地调兵万余增援。江忠源入城后，按照防守南昌的办法布置城守，但兵力、物资均不及南昌充足。

太平军于12月12日合围庐州。18日，已革按察使张印塘、寿春镇总兵玉山自巢县东关率兵2200名来援，太平军迎击于拱辰门外，毙玉山，使其他各部援兵裹足不前。直到1854年1月4日，陕甘总督舒兴阿所部5000人才迟迟进到城西北的冈子集，江南提督和春部1000人于12日赶到城东北的梁园，均不敢逼近城池，因此，太平军得以从容攻城。围城之初，太平军占据城外高地，在护城河上搭架浮桥接近城根，连日用枪炮频繁轰击，利用夜暗架设云梯攻城，都未能奏功，乃改用“穴地攻城”法。12月28日、1月9日，太平军曾两次轰塌城墙，但攻城部队均被守军击退。14日，太平军针对清军破坏穴地攻城的特点，改掘双层地道，分两次引爆火药。1月14日深夜，大雾弥漫，咫尺不辨，水西门附近的地雷轰发，毁城墙五六丈，守军连忙抢堵，不一会，下层地雷又发，毁城十余丈，堵口兵大部死伤，太平军乘势由缺口冲入城内。与此同时，在小南门、小东门外的太平军也缘梯而上，攻入城内。战至天明，庐州全城为太平军占领。署庐州知府胡元炜投降，江忠源投水自杀。清廷对援救不力的舒兴阿给以革职处分。之后，庐州城外各路援军全归和春统带。

太平军攻占庐州，确是一个重大胜利。但西征军的领导者翼王石达开等没有乘胜在庐州附近继续歼灭清援军，扩大战果，仅留胡以晃近万人驻守庐州，将曾天养部调往湖北战场，急于开辟新地区，致使清军逐渐集结了3万兵力，对庐州进行久困长围。这

不能不说是西征军作战指挥上的一个失策。

三、进军湖北

1853年底，湖北方面的太平军自汉阳、汉口退守黄州后，暂取守势。1854年1月29日，湖广总督吴文镕自率4000兵勇进驻黄州以北25里的堵城，妄图攻占黄州。这时，曾天养部已由庐州到达黄州，太平军守军兵力稍壮。2月初，正值太平天国天历新年，黄州城里举行祝贺活动，吴文镕以为有机可乘，遂督兵进攻，并初获小胜。时清军“滨江临壑，三面皆水，大营十一座，排比屯扎”①。太平军乃派出部队，绕至清营之后，荫蔽埋伏。2月12日，黄州城内太平军全部出动，猛攻堵城清军；同时伏兵齐起，纵火焚烧清军营寨。清军前后受敌，纷纷溃逃，总督吴文镕、副将德亮、知府蔡润深等皆被杀。

太平军取得堵城之捷后，乘势沿江发动进攻，于2月16日第三次攻占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同时，又分兵两路，向湖南、鄂北进军：南路由石贞祥和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指挥，直指长沙；北路由曾天养指挥，进逼荆襄。

北路太平军在曾天养率领下，连下孝感、黄陂、云梦、安陆、随州、钟祥、荆门，因攻荆州不下，折而向西，克宜昌、宜都、枝江，再逼荆州，又未果，乃南下进入湖南境。

围攻武昌的太平军，在汉阳、汉口驻兵，并在上游60里之金口和下游70余里之白湖镇驻兵，断敌接济。但太平军历时4月余，未进行近城进攻，贻误时日。后杨秀清严令限期攻取，国宗韦俊（又名韦志俊，韦昌辉之弟）等才从梁子湖西攻，破洪山清营，逼近武昌。6月26日，以水师从汉口攻塘角，从鹦鹉洲攻鲇鱼套，左四军正典圣粮陈玉成率勇士500人缒城而上，大声呼啸，城内守

---

①《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同治十一年排印本（下同），卷79，第24页。

军即惊溃逃窜，太平军遂第二次攻占武昌。

四、进军湖南与湘潭失利

当曾天养部太平军北攻鄂中诸城时，石贞祥、林绍璋等所率南路太平军向湖南水陆并进，2月27日攻下岳州，3月4日占湘阴，7日占靖港，11日占宁乡，距长沙仅五六十里。

这时，曾国藩编练的湘军业已编成陆师15营、水师10营，拥有战船331只、官弁勇丁及长夫等共1.7万人。2月25日，曾国藩督率湘军自衡州启程，到湘潭集结，准备堵击太平军。

3月上旬，陆路湘军自长沙出动，开赴靖港、乔口，阻截南下的太平军。由于湘军陆续北上，太平军一度放弃岳州，撤回湖北。4月初，西征太平军加强了力量之后，重新向南发起进攻，7日再克岳州，追使湘军南退。22日击败湘军水师，占领靖港，得知长沙防守较严，乃留石贞祥扼屯靖港，由林绍璋率万余人取道陆路绕经宁乡，疾趋湘潭，夹击长沙。

林绍璋军于4月22日路过宁乡，歼湘军营官伍宏鉴以下500余人。当参将塔齐布率湘军1300人驰援宁乡时，太平军已由间道抵达湘潭，并于24日占领湘潭城。林绍璋军占领湘潭后，即于城北赶筑木城木栅，防敌进攻；又收民船数百只，编为水营，控制湘江水面。

4月25日，塔齐布率队赶到湘潭城北，营官江忠淑等率军2600名继至。塔齐布认为：太平军“每用以守为战、反客为主之法，若不及时速剿，俟贼垒既定，攻克为难”①，于是立即对太平军展开猛攻。太平军出城迎击，双方在湘潭北郊连日激战。塔齐布命兵勇“闻炮即伏，炮止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在湘军的疯

---

① 曾国藩：《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下同），第129页。

狂进攻下，太平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因初到湘潭，扎营未稳，又遇此顽敌，渐有难以招架之势。

4 月 27 日，曾国藩又派知府褚汝航等率水师 5 营自长沙驰援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展开激战。湘军水师凭借拥有洋炮的优势，往返冲击。由民船临时组成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3 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伤亡逾千人。

林绍璋鉴于连日接战不利，乃留一部守城，自率大部向湘江上游转移。29 日，在击退了湘军的进攻并阵斩守备张万邦之后，立即集中船只，装载财物，乘风上驶，次日午间抵达下摄司，不意为湘军水师追及，因拒战失利，乃弃船登岸，由陆路折回湘潭。这时，湘军已在湘潭城外设下伏兵。5 月 1 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缘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将其砍死，乘势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冲入城内。自下摄司折回的太平军见城已失守，只得分道撤退，林绍璋北返靖港，另一部经醴陵东走，入江西境，最后折返湖北通城，与西征军会合。

曾国藩得悉湘潭水陆初胜，即于 4 月 28 日自率水师 5 营（大小战船 40 余只）、陆师 800 人，进袭靖港。当天中午，南风陡发，水流迅急，战船顺风闯入靖港，遭太平军岸上炮火猛烈轰击，哨船（指挥船）被击伤，各水勇连忙降下风帆，到靖港对岸之铜官渚躲避。太平军出动 200 余只小划船，对湘军战船发起攻击，顿时毁船 10 余只。湘军水勇不支，纷纷弃船上岸。这时，坐镇白沙洲（距靖港 20 里）指挥的曾国藩，急饬陆营向靖港方向进援，但陆勇见水勇失利，又见陆路太平军大批出动，便纷纷后退，曾国藩执剑督战，也不可遏止。靖港一役，湘军水陆皆败，“战船失去三分之一，炮械失去四分之一”，曾国藩于沮丧忧愤之余，两次投水自尽，皆被属员救起，狼狈逃回长沙。

太平军在靖港虽获胜利，但难以抵消由于湘潭失利所造成的影响。湘潭失利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凶顽的湘军缺乏了解，在思想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准备，再加上扎营未稳就遭敌猛攻，特别是临时编组起来的水营，抵敌不住经过训练的湘军水师，以致连

战失利，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影响。即使如此，太平军在数量上仍占优势，如果林绍璋沉着果断地组织反击，完全有可能稳住阵脚，战胜敌人。可惜，由于指挥不善，战斗连连失利；组织撤退时，又迷恋于获取的物资，竟取道水路向湘江上游转移，结果被湘军水师追歼，造成很大损失。

西征军自 1853 年 6 月自天京出发，到湘潭受挫，前后不足一年。在此期间，先后攻占了安庆、庐州、九江、汉口、汉阳、岳州等重镇，控制了大片地区，有效地保障了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粮食物资的供应，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战线太长，兵力过于分散。将总共五六万兵力分布在北到庐州、随州，西至宜昌，南到南昌、湘潭广大地区，横跨 5 省，纵横数千里，这就难以有效地打击敌人。尤其是攻克汉口、汉阳之后，在武昌尚未攻克的情况下，再度分兵两支，北攻随州、荆州，南攻岳州、湘潭，兵力一分再分，加之于湘潭骤遇强敌湘军，终于遭到大挫。

湘潭挫败是西征作战的一个转折，自此之后，西征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节节后退，几至不能遏止。

五、岳州争夺战

曾国藩的湘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后，于 7 月上旬以 2 万之众，自长沙大举北上，对太平军发动攻势。此次进攻，水陆并进，以水路为主。7 月 7 日，知府褚汝航等率水师 2000 余人自长沙进泊岳州南 60 里之鹿角，同时增派知州罗泽南率陆师 2000 人，加强驻新墙的塔齐布部。

早在 6 月下旬，曾天养、林绍璋已由常德越洞庭湖退集岳州。7 月 16 日，塔齐布率陆师向岳州进发，曾天养率队迎战不利，仍退守岳州。23 日，湘军水师在东洞庭湖设伏，大败太平军水师于君山、雷公湖一带。在湘军水陆进逼下，太平军于 25 日放弃岳州，退守岳州以北 20 余里之城陵矶。

湘军进占岳州之后，太平军乘其立营未稳组织反击。7月27日，曾天养等督战船400只，在陆军配合下反攻岳州，出战不利，失战船76只、炮50余尊，伤亡近千人，不得已退守临湘。29日，韦俊等自武昌率水陆大军来援，合曾天养、林绍璋等率战船五六百只，再次反攻岳州。湘军水师迎击于城陵矶，激战数时，太平军战船被焚数百只，死伤千余人。

清水师总兵陈辉龙率广东水师400余人前来助战，8月8日抵岳州。9日即带队进击太平军。当天南风大作，水流迅急，顺流而下，进易退难。曾天养见此情况笑道："谁谓曾妖知兵!"即令大队战船埋伏于旋湖港，另出小舢板诱战。清军陷入重围，进退不得，陈辉龙座船笨重，激战中搁浅滩头，太平军将士蜂拥而上，当即阵斩陈辉龙。褚汝航见陈辉龙陷入重围，率军来救，也被太平军击毙。此次被歼的还有营官夏銮、游击沙镇邦、千总何若澧以下数百人。陈辉龙一营船炮尽失，其余各营亦损失战船20余只。曾国藩闻报"伤心陨涕"，哀叹经营多时的船械一天之内损失将半。

8月11日，曾天养率兵3000由城陵矶登岸，准备据险扎营，牵制湘军北上。不意塔齐布率兵猝至，来势凶猛，曾天养单枪匹马冲入敌阵，大声喊道："塔妖，我来取尔命!"直奔塔齐布，塔连忙躲避，只伤及坐马，而曾天养反为湘军所伤，落马牺牲。太平军因统将阵亡，且战且走，从水路撤回。

曾天养阵亡后，太平军在韦俊率领下，在城陵矶一带与敌相持10余日，接仗5次，因败多胜少，遂于25日撤离城陵矶，退守武汉。

六、武汉三镇失守

太平军退守武汉之后，湘军水陆并进。水师于9月4日占嘉鱼，15日进抵距武昌60里之金口。陆师由塔齐布率领，9月5日从岳州出发，由于沿途受太平军阻击，进展稍缓，25日占崇阳，30日占咸宁，10月6日抵武昌南60里之纸坊。曾国藩于10月2日

抵金口，塔齐布、罗泽南也于8日赶到，共同商定了进攻武汉三镇的计划：先以水师由大江冲击，控制江面，隔断武昌与汉阳之间的联络；陆师罗泽南部4000人进攻花园，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部4300人进攻西岸虾蟆矶，威胁汉阳、汉口。

太平军于6月攻占武昌后，在外围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在花园一带掘深沟宽2丈，长约3里，引入江水，沟内立木城，实以沙土，中开炮眼；沟外设2尺许木桩，交互连钉，桩外密布竹签，环以荆棘。木城之内，又有砖城、内壕，安炮百余尊，工事十分坚固严密。

10月12日，清军开始总攻。湘军分水师为两队，前队由中流直冲鹦鹉洲，绕越至停泊于盐关附近的太平军水师之后。当太平军回船救援时，湘军水师后队继至，前后夹击，先后烧毁太平军船300余只。金口的罗泽南部陆师，分三路扑向太平军营垒，太平军不支，焚营而退。当天，魁玉所统的荆州清军也攻至汉阳虾蟆矶，并破鹦鹉洲太平军营垒。

10月13日，湘军水师攻占武昌鲇鱼套附近太平军营盘6座。在汉阳方向，魁玉、杨昌泗部击毁太平军晴川阁木栅、大别山（即蛇山）木垒。至此，武汉江面无太平军船只，城外无太平军营垒，武汉三镇暴露在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14日晨，太平军弃守武昌、汉阳，退向下游。15日，泊于汉江中的太平军数千船只，于杨林沟、罗家墩一带被湘军焚烧，汉口随之弃守。

武汉失守，对西征战局影响甚大。自曾天养阵亡后，西征战场前线缺乏适当的军事统将，负责守武昌的国宗石凤魁，“粗通文墨，不谙军务”。石达开虽派来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协助石凤魁防守，但黄系办文案出身，亦不长于军事，结果于事无补。武汉失守后，石、黄二人被调回天京斩首。

七、清军三路东犯

湘军占领武汉之后，曾国藩遂与新任湖广总督杨霈商定了一

个三路东犯的计划，以夺取九江为主要目标。其兵力部署是：南路湘军由湖南提督塔齐布率领，进攻大冶、兴国（今阳新）；北路由固原提督桂明率绿营兵进攻蕲州、广济；水路由参将杨载福率水师船只百余艘顺江而下。

太平军方面，自放弃武汉后，杨秀清即将湖北军事委托给秦日纲统理，并命在湖北田家镇、半壁山一线设防。太平军在田家镇至蕲州40里之江岸建筑了一些土木城，安置炮位；在田家镇与南岸半壁山之间的江面横安铁链二道，铁链之下排列小划（小船），并配以枪炮；在南岸的半壁山，扎大营一座、小营四座，山下挖掘三四丈宽的深沟，沟内建立木栅、炮台，沟外密钉竹签木桩，为了加强防御，杨秀清还专门派人从天京送来一座木簰（木簰外有木城墙，中搭板屋、望楼，密架枪炮，簰上铺沙，以防火攻，实际上是一座水上活动堡垒），设防可谓坚固严密。

湘军于11月初自武汉出发，南路分为两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经武昌县（今鄂州市）趋大冶，一支由罗泽南率领，经金牛镇趋兴国（今阳新）。11日，两路湘军分别陷大冶、兴国后，罗泽南扎营于半壁山下，塔齐布扎营于半壁山以东10里之富池镇。

曾国藩计划“先攻田镇对岸之半壁山，夺其要隘，则铁锁一岸无根，当易拔去”①。半壁山位于田家镇东南，孤峰峻峭，俯瞰大江，北麓尤陡绝，是太平军重点守备之地。11月20～24日，双方在此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太平军初战不利，半壁山营垒被毁，南岸铁链被砍断。适韦俊、石镇仑、韦以德等自芜湖率援军赶到，于24日与秦日纲自田家镇分三路渡江增援，鏖战竟日，两路俱败，石镇仑、韦以德阵亡，半壁山失陷，太平军退守北岸田家镇。

湘军水师东下，被检点陈玉成阻截于蕲州，后由于南岸半壁山被湘军攻陷，陈玉成乃于29日后撤至田家镇。12月1日，湘军水师参将杨载福与塔齐布等商讨攻田家镇之策，确定将战船分为四队：一队专管砍断江中铁链；二队专管攻击炮船；三队于铁链

---

①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08，第20页。

破除后直趋下游，焚烧船只；四队负责坚守老营，防太平军袭击。12 月 2 日，湘军战船出动，踞守南岸之塔齐布、罗泽南陆师 6000 人，排列江岸，以助水师之声威；水师第一队则沿南岸急桨而下，直至铁链之前。太平军炮船前来护救，湘军水师第二队随即上前炮击，毁太平军炮船 2 艘。第一队先锥断铁链下小船上之铁码，船即自链下脱出，继而毁断铁链。因铁链被毁，太平军阵势遂乱，纷纷驾船下驶。湘军水师第三队穿过太平军的民船，直追至武穴、龙坪一带，从下游纵火延烧。恰值东南风大作，上游之船被焚烧不少。当天湘军报称：共烧船约 4000 余只，缴获 500 余只。太平军苦心经营的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被湘军突破，蕲州之太平军遂撤往广济，秦日纲、韦俊东退黄梅。

八、九江湖口之战

湘军突破田家镇、半壁山防线后，水师前队在知府彭玉麟率领下，于 12 月 8 日进至九江江面。这时太平军的主力大部在长江以北，清军仅凭魁玉、桂明的部队无法取胜，曾国藩乃命南路之塔齐布、罗泽南陆师于 12 月 9 日北渡田家镇，曾国藩亦于次日抵达，指挥北岸的作战。12 月 10 日，太平军冬官正丞相罗大纲也由江西饶州渡江至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抗击清军的进攻。12 月 20 日战于双城驿，23 日战于黄梅，26 日战于濯港，31 日战于孔垅驿，太平军连战不利，主力退入安徽境内之宿松、太湖。

1855 年 1 月 2 日，罗大纲率部渡江，退守南岸梅家洲。这时，翼王石达开已自安庆抵湖口镇，坐镇督战。曾国藩也由田家镇抵九江城外。

曾国藩为南攻九江，于 1 月 6 日调塔齐布部自江北渡琵琶亭，驻九江南门外；1 月 9 日调罗泽南部渡白水港；湖北按察使胡林翼带勇 2000，从田家镇渡江，分扎要隘；副将王国才所部 3000 余人为预备队。清军围攻九江的总兵力达 1.5 万人。

九江北枕长江，东北有老鹳塘、白水湖，西南有甘棠湖，西

有龙开河，湖汊纵横，唯东南多山。太平军于城四周严密设防，东南尤其坚固。塔齐布、胡林翼于1月14日督军攻西门，结果三攻三败。18日，湘军发起全面进攻，塔齐布部攻西门，胡林翼部攻南门，罗泽南部攻东门，王国才部攻九华门。进攻西门的塔齐布军遭到太平军顽强抵抗，参将童添云战死。进攻其余各门的湘军，也因城上枪炮木石交施，不能得手，曾国藩轻取九江的计划遂告失败。

曾国藩攻九江不下，改取“舍坚而攻瑕”的方略，派胡林翼、罗泽南率部进驻梅家洲南8里之盔山（今灰山），准备先攻取梅家洲，扫除九江外围要点。守将罗大纲在此“立木城二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较之武昌田镇更为严密；掘濠数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①。1月23日，清军分三路向梅家洲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借工事打击清军，击毙守备杨玉芳等。24日，罗大纲以7000余人分作三路自梅家洲向围攻的湘军发起反击，驻姑塘的太平军4000余人攻敌营之背。由于姑塘太平军遭湘军炮火猛烈阻击，夹击未成，先行撤退，其余各路太平军亦收队。

曾国藩因围攻梅家洲不下，又改攻湖口，以搜剿内河太平军水营，切断九江外援。

湘军水师是曾国藩手中的一张“王牌”，自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江防，焚毁太平军船只数千之后，便在这一带长江水面横冲直撞，猖狂无忌。1月3日，当湘军陆师尚在江北与太平军交战之际，李孟群、彭玉麟即率水师进至湖口，分泊鄱阳湖口内及梅家洲、八里江等处。8日夜，罗大纲组织小船百余只，以二三只或四五只联结一起，堆积柴草，内装硝药，灌上膏油，乘着风顺流急，从上游纵火下放，并于岸上派兵千余人，呼喊助威，施放火箭火球，对湘军水师实施火攻。由于湘军预有准备，未能取得多

① 曾国藩：《浔城逆党两次扑营均经击败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367页。

大战果。15日，湘军水师进攻湖口城边的太平军船只，被击退。此后，太平军每夜以陆师千余，持火箭火球，袭扰敌营，弄得湘军彻夜戒严，不敢入睡。23日，湘军水师乘陆师攻梅家洲之机，击毁太平军设于湖口的木簰。太平军将计就计，连夜将大船数只载以沙石，凿沉江心，堵塞航道，仅在靠西岸处留一隘口，拦以篾缆，封锁湖口。29日，湘军水师在陆师配合下发起进攻，水师营官萧捷三等率舢板轻舟百余只冲入内湖，直驶姑塘以上。待其回驶湖口时，太平军已用船搭浮桥二道，连结垒卡，断其出路。这样，湘军水师轻舟遂被堵于鄱阳湖内，留于长江内者，"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①。当晚，太平军以小船几十只，围攻泊于长江内之湘军大船，同时派船进入湘军水师老营八里江，焚烧船只；岸上太平军也施放火箭、喷筒，配合进攻。湘军水师大船因无小船护卫，难以抵御，结果被毁战船40余只，其余败退九江以上江面。太平军乘胜于当晚进攻梅家洲湘军陆营，并于2月2日进占九江对岸之小池口。

2月11日夜，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自小池口出动轻舟百余只，袭击泊于官牌夹的湘军水师，火弹、喷筒齐发。湘军战船、民船二三十只被焚，其余船只纷纷逃至武穴以上。曾国藩的座船也被太平军缴获，曾只身逃入罗泽南陆营，于愤愧之余，又要寻死，被罗泽南等劝止。

太平军湖口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直逼金陵的狂妄企图，使西征战局转败为胜。西征军自弃守岳州，武汉受挫，到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被突破，在此期间丢失了大片地盘和许多城邑，损兵折将，战船损失大半，形势十分不利。但太平军的领导骨干与基本队伍（即所谓老兄弟）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而且，由于清军的进攻，太平军步步后退，被迫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改变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相反，

① 曾国藩：《水师三胜两挫外江老营被袭文案全失自请严处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377页。

湘军方面虽然取得了节节胜利，却预伏着危机：由于掳获太多，“饱则思飏”；由于屡胜，骄傲轻敌；由于胜利进军，离后方供应基地（湖南）越来越远，运输补给日益困难。在此情况下，石达开等机智地抓住了湘军水师轻舟冒进的有利战机，果断地将它分隔于内湖，然后水陆配合，集中力量攻击泊于长江内之大船，因而取得了重创湘军水师的重大胜利。这些，都是太平军在湖口获胜和湘军在湖口失败的基本原因。

九、太平军乘胜反攻

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胜利后，便在长江南北展开全线反攻。2月12日，罗大纲自小池口遣军进占龙坪、武穴。16日，秦日纲、陈玉成等自皖西宿松、太湖再返鄂东，进克黄梅，乘胜西进，败湖广总督杨霈军于广济，接着连占蕲州、黄州、汉口、汉阳。韦俊率部自田家镇渡江，25日进占兴国，旋占通山、崇阳、咸宁，与秦日纲部南北合攻武昌。4月3日，太平军第三次克复武昌，杀湖北巡抚陶恩培。清廷任命胡林翼署湖北巡抚。

湘军水师自遭太平军打击之后，又于2月20日遭大风袭击，沉船22只，毁坏21只，曾国藩令其余70余只战船全数撤至武汉，“名为速剿上犯之贼，实则修整已坏之船”，于是武汉以下江面，无湘军水师的踪影。在太平军的反击和进攻之下，曾国藩的湘军被迫分割为四：水师之一部分开赴上游整修，一部分困在鄱阳湖内，彼此相距数百里。陆师之塔齐布部5000人继续围攻九江，罗泽南部3000人调赴赣东，也相距数百里。这样一来，湘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由陈玉成率兵一部进军鄂东北，5月12日占德安府，湖广总督杨霈退守随州。17日，西安将军扎拉芬及副都统常亮在清廷的一再督促下率援军自河南抵随州。31日，陈玉成攻随州，大败援鄂清军于随州东南之五里墩，歼灭数百人，阵斩扎拉芬，杨霈逃往枣阳。6月11日清廷下令将杨霈革职，湖广

总督由荆州将军官文接任；14日命察哈尔都统西凌阿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

胡林翼署湖北巡抚后，驻扎金口，伺机进攻武昌。6月10日，胡林翼率部三路攻武昌。秦日纲派太平军袭金口，抄胡林翼部后路，胡被迫回援。9月12日，武昌太平军在通城、崇阳等地太平军配合下，攻占金口，清军退守新堤（今洪湖）。18日，汉阳太平军八路围攻胡林翼部于汉阳西北奓山，清军大溃，胡林翼的巡抚关防也丢失。

活动于安徽、江西边境之范汝杰部太平军，于4月后连占弋阳、德兴、兴安（今横峰）、上饶、玉山。原在九江城外的湘军罗泽南部3000人，受命驰援赣东，于5月12日攻陷上饶，在这一带与太平军周旋。7月18日，罗泽南部奉命西援湖北，8月28日占义宁（今修水），10月中旬入湖北境，16日占通城，24日占崇阳。

10月中旬，石达开、胡以晃、黄玉昆率2万余人自安庆西上，增援湖北。11月1日在武昌县樊口登岸，经金牛镇抵咸宁，阻截罗泽南进援武昌。4日大败罗军于壕头堡，并克崇阳。14日破通城。24日入江西义宁境，连占新昌（今宜丰）、上高、瑞州（今高安）、新喻（今新余）、临江、樟树镇（今清江）、峡江、万载、南康，对南昌取包围之势。

石达开以敌军主力集中进攻武昌，江西后路空虚，遂决计进击江西，迫使湘军回救，以缓解武昌之围。11月，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因石达开部逼近，急调围攻九江之周凤山（负责围攻九江的塔齐布于8月30日暴病而死，由副将周凤山接任）率部回援南昌，调鄱阳湖水师防守赣江。被困几近两年之九江至此解围。

石达开部在江西继续进攻南昌周围各府县，连占新淦、奉新、分宜、袁州（今宜春）、吉水。1856年1月10日，湘军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2月9日，道员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师赶到樟树镇。3月24日，石达开四路围攻樟树镇，尽破周凤山营垒，斩获千余，周凤山及溃勇奔南昌。南昌人心大震。

太平军进军江西腹地，不仅解了九江之围，缓和了武昌之困，而且夺回了战场的主动权。但就在这时，洪秀全、杨秀清决定调集西征主力回援天京，进攻江南、江北大营。石达开根据天京命令，率兵3万经丰城、抚州、进贤、东乡、安仁、万年、乐平、德兴、浮梁，于4月3日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援天京。石达开走后，江西军务由卫天侯黄玉昆主持，基本停止了对湘军的攻势，给了困处南昌城内“魂梦屡惊”的曾国藩以绝路逢生的机会。

太平军的西征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十、西征的得失

太平军历时近3年的西征，控制了天京上游的安庆、九江、武汉等重镇，占领了安徽、江西、湖北的一部分地区，并建立起了革命政权。这不仅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而且保证了天京的粮食供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西征的预期目标。

以上胜利成果，是经过同清军反复争夺而取得的。西征军于1854年1月攻占庐州之后，即挥师西向，占汉阳，攻武昌，下岳州，取湘潭，逼长沙，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然而，不久便遭到湘军的阻截。湘军在取得湘潭之战胜利后，下岳州，占武汉，破田家镇，直抵九江城下，气焰颇为嚣张。但九江久攻不下，水师又在湖口大败，局势又为之一变。太平军反败为胜后，接着克武汉，控制长江中游，进军江西，威胁南昌，使湘军兵分四处，屡遭进攻。从太平军和清军的这些胜败之中可以看出，湘潭之战和湖口之战是对西征战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次交战。太平军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而急转直下，又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而出现了新的局面。在这一败一胜之中，既有其客观的规律性，也与双方前线统将的作战指导密切关联。西征之初，太平军以三四万兵力进军湖北，武昌未下即北攻荆襄，南下湘岳，兵分三支，力量分散；在湘潭遇上兵力集中、较有训练的湘军，终于遭到挫折。反之，湘军自取得湘潭大捷之后，节节胜利，进展

甚速，由此而产生了将士志骄气溢，轻敌冒进，战线延长，供应困难，终于招致湖口之败。

太平军在西征战场作战指导方面所产生的一些失误，是与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存在着骄傲轻敌、分兵冒进的思想分不开的。一方面，西征战场跨越五个省，纵横千余里，西征军以数万兵力，分布在如此广阔的战场上，怎能集中兵力战胜敌人呢？另一方面，西征战场的总指挥部设在安庆，远离前线，不能及时了解情况，实施正确有力的指挥，使多路分兵的后果更为严重；再加前线指挥员如林绍璋等，缺乏独挡一面的指挥才能，因而自湘潭战败后便节节败退。由于以上种种失误，以致未能在湖南、湖北、江西给尚处于初建阶段的湘军以歼灭性的打击，终于让这支极端凶狠的地主武装得以不断壮大，成为尔后置太平军于死地的一支主要力量。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憾事。

太平军在西征战场上的另一战略性失误，是水营的基本丧失。太平军自建立水营之后，最高领导对水营使用多，建设、培训少；而水营船只的来源，多系征用民船，船户水手即为水兵，装备十分简陋，用之于运输、巡逻尚能胜任，用之于作战则嫌不足。因而在西征过程中屡败于湘军，船只被毁万余。相比之下，湘军水师的各型船只虽仅四百余艘，但均系专门设计建造的战船，船上装有洋炮，水师兵勇又经过挑选和训练，有严密的组织，战斗力较强，因而在交战中屡屡获胜。后来，太平军虽由于湖口之捷而扭转了不利战局，但水营再也未能重建和振兴。太平军水营丧失，长江水道逐渐为清军所控制，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天京的安全和供应，而且对整个革命战争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四节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由于精锐部队分别调往北伐、西征战场，天京附近兵力减弱，以致对围困天京、镇江之敌一直采取守势，并经常受到清军江北、江南大营的进攻和威胁。

1853年冬，扬州危急，加之北伐军在天津待援，天京当局决定放弃扬州，腾出兵力，组成北伐援军。

1854年，北伐、西征战场的军事形势都很严酷，天京周围的军事形势也对太平军不利。7月，清廷从广东所调的50只红单船① 开抵镇江江面，一半归江北大营指挥，另一半直驶天京上游，归江南大营指挥，对天京水上运输威胁甚大。

1855年形势更为严重。5月，北伐军全军覆没；8月，清军攻陷了天京西翼重镇芜湖；11月，皖北重镇庐州失陷。天京的东方屏障镇江及其对岸的瓜洲，也受到清军的进攻，对天京的威胁日益严重。幸好自1855年初起，西征战场转败为胜，太平军又重新夺回了武汉以及湖北、江西大片地区，湘军陷入分割数处、被动挨打的局面。就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杨秀清于1856年初作出决定，从西征前线的安徽、江西、湖北战场抽调大军回援天京，摧毁江北、江南大营，以图打破天京长期被围的局面。

一、东 援 镇 江

清军于1853年5月就开始围攻镇江。1855年4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率领清军七八千人到达镇江外围，加强对镇江的围攻。镇江城内米粮、军火渐感缺乏，形势十分严重。因此，太平军从西战场调兵回援后，首先东援镇江。

镇江城内有太平军约三五千人，守将为殿左五检点吴如孝。此时围城清军约万余人，分别驻扎于城西之九华山和城东之京岘山一带。临战前夕，吉尔杭阿派提督余万清带2300人移驻下蜀街，总兵虎嵩林带1600人驻高资，以阻截由天京东援之太平军。

1856年1月29日，燕王秦日纲率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

① 红单船，原系广东航行外海之大商船，由海关发给牌照（红单），故名红单船。此类船大者安炮30余位，小的20位，可在左右弦和船头三面轮放，射程较远。其战斗性能优于太平军之水营船只。

丞相李秀成等数万人自天京分两路东援：一由观音门沿江至栖霞一带，直趋镇江；一由神策门至仙鹤门，以为掩护。清军则一面在仙鹤门一带迎战，一面由镇江方面派兵防堵。双方连日接战，相持于龙潭、下蜀之间。镇江守将吴如孝得知天京派兵东援，于2月2日派兵数千出西门接应，被清军阻于宝盖山。2月20～23日，镇江太平军又连日向西出击，均被清军堵回。

高资方面清军兵力较多，但军无统帅，号令不一，作战不力。2月26日，向荣遣提督邓绍良率兵2600名前往高资六里店，总统诸军，指挥前线战事。但邓绍良意见偏执，调度不合军心。3月26日，向荣改派总兵张国梁接替邓绍良，总统下蜀、高资清军。

为了打破敌我相持的僵局，秦日纲等商定由陈玉成率精干小分队乘坐小船，取道长江，于夜间“舍死直冲”镇江，与守将吴如孝相约，东西一致行动，内外夹攻清军。3月18日晨，秦日纲等率大军向东直进，清军迎击。至午间，战斗正酣，李秀成率领3000精锐，绕道仓头岔河，从清军后路冲出。清军腹背受敌，阵势大乱。这时，陈玉成、吴如孝也亲率镇江守军由东向西攻来，两支太平军胜利会师。次日，再次出战，大败清军，连破营盘16座，镇江之围得以缓解。

二、攻破江北大营

瓜洲是太平军在江北的唯一据点。这一带地势平坦，全恃木城、重壕，引水环绕防守。清军为防止太平军的进攻，在瓜洲以北，西自仪征的新城，东至施家桥，构筑长墙一道，南距瓜洲约20里。后又在长墙以南，从八里铺向西经土桥延至江边，八里铺向东经新桥延至江边，加筑土墙一道，绵延40余里。土墙筑成后，江北大营前移至八里铺，并沿土墙构筑营盘、炮台各20余座，防堵瓜洲太平军北出。

秦日纲等进入镇江后，稍事休整，即于4月2日利用夜幕，渡江至瓜洲，留周胜坤部驻守仓头，保持镇江至天京的通道。之前，

吉尔杭阿曾向江北大营通报了太平军行将渡江北上的情报，但并未引起江北大营方面的重视。4月2日夜，清军营中张灯结彩，大宴宾客，为江北大营帮办军务雷以諴祝寿，托明阿等文武官员均去祝贺，戒备松懈。太平军乘机胜利渡江。次日黎明，秦日纲等即率众袭击西线濒江的重要据点土桥的清军，突破土墙，乘胜猛进，连破朴树湾等营盘。东路太平军则自瓜洲北进，猛攻中路八里铺清营。清军望风披靡，争相逃命，炮械旗帐尽弃。4日，太平军又自朴树湾、八里铺进击，大败清军于三汊河，托明阿部清军退守蒋王庙一带，旋又逃往邵伯镇。东线陈金绶各营则经沙头逃往仙女庙（今江都），120座大小清营作鸟兽散。5日，太平军乘清军败溃、扬州城防空虚之机，兵不血刃地再克扬州。

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占领扬州后，便四出征集粮食，转运瓜洲、镇江，却没有乘胜追歼逃敌，扩大战果。4月17日又主动弃守扬州。

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后，本欲自瓜洲南渡，因得悉据守仓头的周胜坤部被清军所败，镇江至天京之路又被切断，乃于4月14日西进，准备从浦口渡江南返。

4月16日，向荣派总兵张国梁率兵2400人由南岸栖霞附近之石埠桥渡江，于23日陷浦口，27日陷江浦。太平军南渡之路又被阻断，于28日自仪征折而东返三汊河，在此休整了20余天。5月27日，经瓜洲渡江，屯驻金山。大江以北仍仅留瓜洲一桥头堡。

因扬州之败，托明阿、陈金绶、雷以諴均被革职查办，清廷任命副都统德兴阿为钦差大臣，统率江北诸军。

三、攻破江南大营

（参见附图9）

秦日纲等率太平军南渡之后，5月31日攻占黄泥洲，并乘胜猛攻高资烟墩山清营，拟打通回京之路。吉尔杭阿闻警，自九华山大营率队往援，被太平军包围。6月1日，太平军大败清军，吉

尔杭阿和副都统绷阔毙命。3 日，太平军围攻九华山大营，清军兵勇见主帅已死，不战自溃，30 多个营盘全部瓦解，镇江解围。提督余万清负伤逃往镇江城东的京岘山大营。太平军又三面围逼，6 日夜间从地道攻入西营，清军兵勇早已溃逃。由于镇江方面告急，向荣乃派署江宁将军福兴和总兵张国梁带领马步 3000 人自龙潭出发，经上塘、河阳绕至镇江以东之丹徒镇，向京岘山太平军进攻。秦日纲等见防守龙潭的清军主力前来镇江，即尽弃九华山营垒，经高资、下蜀、龙潭回抵天京城外的燕子矶、观音门。

当秦日纲援救镇江的时候，石达开自江西带回的 3 万余部队途经皖南，于 5 月 2 日占领安徽宁国府（今宣州），10 日克芜湖，18 日进抵秣陵关，威胁江南大营后路。

这时形势对太平军十分有利。江南大营原有清军被迫分布于孝陵卫、镇江、溧水、宁国、芜湖等宽广的地区，各处兵力都十分薄弱。向荣诉苦说："臣军精锐，尽已调出，存营不满五千，除去疲病守营，出队仅一千余人"①。可见大营兵力之空虚。

6 月 14 日，秦日纲等率军回抵天京，屯扎燕子矶、观音门，东王杨秀清严令，必须攻破孝陵卫向荣大营后方准入城。陈玉成、李秀成等进京当面向杨秀清申述："向荣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东王大怒，厉声说："不奉令者斩"。陈玉成等"不敢再求，即而行战"。②

太平军进攻江南大营，选定大营东北之尧化门、仙鹤门为主攻方向，龙脖子（地保城）为助攻方向。6 月 17 日晨，秦日纲部（含陈玉成、李秀成所部）七八千人自燕子矶移营仙鹤门，旋推进至神策门、太平门外，是晚至尧化门西北里许之冯家边一带筑垒。18 日，北路石达开部也赶到尧化门、仙鹤门一带，筑垒数十座，前锋抵达黄马群，扼大营通向石埠桥大道。

向荣见太平军大举来攻，十分慌张，连忙调回张国梁，从丹

---

① 向荣：《派兵赴高资严防内犯并请派兵助剿折》，见《太平天国》（八），第 623 页。

②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494 页。

阳、秣陵关调兵 1300 名赶回大营，并在青马群筑垒 20 余座，以阻挡太平军进攻大营之路。

19 日晨，太平军围困仙鹤门清营。张国梁回抵孝陵卫，带兵至青马群连夜筑营三座。

20 日，各路太平军发起总攻，仙鹤门方向的太平军多路齐出，猛攻青马群敌营。另一路翻紫金山而下，直插青马群清营之后。与此同时，天京城内派数千人出聚宝门、通济门，直插七桥瓮敌营。向荣亲自带领大营所剩 1200 人，赶赴七桥瓮，名为抗击，实则为逃跑作准备。这时紫金山上又一支太平军四五千人自灵谷寺下山，攻破满洲马队营盘，纵火焚烧；同时，洪武门（今光华门）、朝阳门（今中山门）等门太平军亦分路出击，连下清军营寨 20 余个，进而攻破孝陵卫大营。清军大溃，向荣、张国梁等连夜败走淳化镇，旋经句容退往丹阳。是役共毙清副将以下 1000 余人，张国梁也被击伤。威胁天京达 3 年之久的江南大营被摧毁。

摧毁江南大营之后，天朝上下热烈庆祝，休息数天。东王即令燕王秦日纲统军追击残余清军，27 日占句容。7 月 3 日进抵丹阳城外，与向荣部清军相持月余。向荣因惨败而愧愤交加，8 月 9 日死于丹阳营中。

四、一破江北、江南大营的得失

太平军先后打破了清军对镇江的围困，攻破江北、江南大营，拔掉了威胁天京的两个钉子，击毙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歼灭了一部分清军，大大改善了天京的处境。事实表明，太平军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决心进攻，江南、江北大营是不难攻破的。

太平军一破江北、江南大营之战，前后历时 4 个多月。整个作战过程，大致可分为打通镇江至天京通道、攻破江北大营、重创镇江围敌和攻破江南大营等四个阶段。其中打通镇江至天京通道是一场攻坚战，双方都集中了主力，相持了两个月，打了些硬仗，在镇江胜利会师后，旋又北渡，决心果断，行动迅速。但太

平军北渡的目的，主要是征集粮食，结果于击破江北大营之后，未能追歼溃敌，致使扬州得而复失，江北清军溃而复聚。进攻镇江外围之敌时，于攻破敌九华山大营、击毙吉尔杭阿后，亦未能乘胜扩大战果，歼灭更多的敌人，就急于返京，致使镇江守军虽暂时减轻了压力，但被围处境未能根本改变，这在作战指导上是不明智的。秦日纲率大军返抵观音门时，又急于想入城休整。后因杨秀清严令务必攻破江南大营后方准入城，结果经过 4 天战斗，就摧毁了围困天京 3 年多的江南大营。事实表明，这个决心下得是对的。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是集中了各战场的主力进行的。它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胜利，若从战争全局来看，在进攻时机的选择上是不适当的。在江南大营尚未严重威胁天京生存，而西征战场正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之际，突然将主力抽走，致使湖北、江西战场停止了对敌人的进攻，特别是放过了处于垂败状态的湘军，这不能不说是战略指导上的失策。其次，这次作战行动缺乏严密的计划，天京最高统帅部与前方将领认识不甚一致，行动不够协调，以致像进攻江南大营这样重大的作战行动，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高级将领都心中无数。再者，虽然打通了天京与镇江之间的通道，攻破了江北、江南大营，但打的都是击溃战，歼灭敌军不多，特别是在击溃江北大营和在解镇江之围的作战中，都丧失了追歼逃敌的有利战机，致使江北大营不久得以复建，镇江仍处于敌军的包围之中，并于次年 10 月被敌攻陷。稍后，江南大营也得以重建，再度威胁天京。

第五节　石达开远征

一、天京内讧与石达开离京出走

1856 年初，太平军继西征战场转败为胜之后，又先后攻破了逼攻天京数年之久的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天国革命重又出

现了十分有利的形势。可是，天京形势的暂时缓和，却促进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以及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而总揽宗教、政治、军事大权、专擅跋扈的杨秀清则成了上述诸矛盾的焦点。8月底，韦昌辉在洪秀全默许下（一说受洪秀全之命），率领部队3000人从江西战场秘密赶回天京，于9月1日深夜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将杨秀清及其家属、近臣全部杀害，不久又对杨秀清的部属进行大屠杀。9月中旬，石达开自湖北战场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妄杀许多无辜兄弟，不料韦昌辉又要谋害石达开。石达开得知信息，连夜逃出天京，其家属则被韦昌辉全部杀害。石达开在安徽、湖北调集大军，于11月8日自安庆渡江，过池州、青阳、太平、泾县抵宁国，准备回京讨韦。在此情况下，洪秀全下诏将韦昌辉处死，并召石达开回京主政。11月底，石达开率大军回到天京。

这时，石达开是天王以外首义五王中的仅存者，由他辅政最为合适，因而受到天京臣民将士的拥护和欢迎。但内讧的阴云尚未全部消散。洪秀全从中错误地记取了教训，自此之后，专信本族，不信外姓。他在委托石达开辅政后，不久又加封他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并命他们与石达开同主朝政，以牵制和监视石达开。在共事过程中，洪仁发、洪仁达对石达开事事掣肘，最后竟有图害之意。在此情况下，石达开被迫于1857年5月底离开天京，在苏皖交界处的铜井镇渡江，途经无为，于6月16日抵安庆；一路上他到处张贴告示①，说明其被迫出走的原因，并表示要继续忠于太平天国的事业。

二、进军江西

石达开出走时，整个西线的形势是：湘军于占领武汉后节节

① 《翼王石达开出走告示》，全文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3页。

东下，围攻江西九江、瑞州，威胁临江、吉安。活动于江北鄂皖交界处的陈玉成部正遭到湖北巡抚胡林翼的阻截；李秀成部在捻军的配合下，转战于六安、舒城一带。

石达开离天京后，天王洪秀全曾派人将“义王”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的表章送往安庆，争取石达开回朝辅政①，但未能使石达开回心转意。此时，如从太平天国的全局利益出发，石达开应协同江北的陈玉成部，对清军进行反击，或进军江南，打击围困九江、湖口的清军，以扭转天京上游的不利态势。但石达开却决定南进江西腹地。

江西本是石达开的根据地，他的部队大多驻扎在这一带，如守瑞州的赖裕新，守临江的黄玉昆，守吉安的傅忠信，守抚州的余子安，都是他的部属。石达开进军江西，目的是招集其所属各部。

9月底，石达开过江西景德镇，后经乐平、万年、安仁、东乡，于11月底到达抚州。在此停留一段时间后，于12月初派出援军西上，经进贤、丰城、新淦，拟西援临江、吉安。12月13日，援军抵樟树镇，谋援临江，因被敌水师所阻，不得渡江，乃改援吉安。吉安位于赣江西岸，与吉水隔江相望，1856年冬即被湘军曾国荃部围困。石达开部到达之前半月，吉水已落入湘军手中，故要解吉安之围，须先攻下吉水。12月20日石达开部抵达吉水外围后，先后发起三次进攻，均为知府张运兰、王开化部湘军所败，以致援救吉安的计划受挫。这时，石达开听信元宰张遂谋的意见，放弃了西援吉安的计划，转而东袭浙、闽。1858年1月4日，石达开部经永丰、新淦退回抚州，2月26日离抚州经东乡、贵溪、弋阳、铅山，于3月19日败清军于上饶后，进围广丰，因久攻不下，遂于4月14日经玉山入浙江。

石达开南进江西之初，太平军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如坚持

---

① 参见何桂清：《通筹各路军务片》(1857年8月20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藏革命运动类第1092卷第7号。

西援，首先歼灭赣江东岸吉水之敌，然后相机进援吉安、临江，江西大局仍有挽回之望。无奈石达开轻率地放弃西援计划，东进浙江，吉安守军解围无望，江西的局势也随之急转直下。

三、长驱浙、闽

1858年4月14日，石达开统率大军进入浙江，占领江山。20日攻衢州，旋又分兵连占常山、开化、龙游、汤溪、遂昌、松阳、处州（今丽水）、缙云、永康、武义、云和、宣平等县。石达开部由江西东入浙江，似与配合天京解围战事有关。时和春的江南大营正猛攻天京，石达开部入浙，危及浙江粮赋，威胁江南大营后路，清廷连忙从各地调兵2万余人进援浙西，从而减轻了对天京的压力。后来，由于各路清军增援，衢州守城兵力达2万人，加以太平军未能合围，攻克愈难，石达开部便于7月14日南撤，沿浙赣边界南入福建。

石达开部于8月16日进入浦城，9月初自浦城沿江西、福建边境继续南进，经崇安、建阳、邵武，入江西新城，复入福建建宁、宁化，于10月中旬占领汀州，18日占江西瑞金，进向会昌。此时，石达开部将石镇吉率部自汀州走连城，单独行动。后经广东、湖南入广西，1860年于百色被清军消灭。

石达开自离开浙江进入闽赣边区之后，在军事上完全自成局面，与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的军事活动，无战略协同可言，实际上成了一支到处流动不定的孤军。

由于石达开部由江西入浙，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复受命统兵援浙，他于1858年7月中旬离湖南湘乡，8月底到江西南昌，9月中旬抵赣东铅山之河口镇大营，指挥浙江军事。随着石达开向南推进，曾国藩又于10月中旬移驻建昌（今南城）。

12月2日，石达开部由瑞金进会昌、安远、信丰，并于1859年1月3日克南安（今大余），设指挥部于池江镇，在此大会诸将，商讨下一步战略。据记载，石达开"当踞南安时，景德贼要之取

道赣、吉，合赴皖、鄂。石逆以为皖、鄂无足图，用伪二旗军略萧发胜等计划，由楚而鄂，进图西蜀，占上游之势，入完善之区。”①可见直到这时，石达开才决定脱离天京周围，远征四川。

此时，活动于长江北岸的陈玉成、李秀成两支太平军主力，先后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和三河歼灭战的胜利，在长江南岸的杨辅清部正围攻景德镇，长江南北又出现了对太平军较为有利的形势。而石达开部却愈趋愈南，愈去愈远，而且“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其战斗力已大不如往年。② 于是，曾国藩命道员张运兰部由赣东之南城驰援景德镇，仅由道员萧启江部4000余人继续尾随，监视石达开的行动。萧部于1859年2月7日抵赣州，18日至南康，追逐石达开部。26日，石达开弃南安，进入湖南境内。

四、围攻宝庆

石达开部于1859年2月底由江西进入湖南境，连占桂阳县（今汝城）、兴宁（今资兴）、宜章、郴州、桂阳州城、嘉禾，准备经永州（今零陵）、宝庆（今邵阳市），取道湘西，进图四川。

湖南是湘军的后方，石达开部由江西大举入湘，不仅震动了湖南，也影响了各地湘军的军心。湖南巡抚骆秉章除从本省各地征调兵勇赶赴湘南防堵外，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还从湖北调来水师3营（炮船36艘）、马队200，企图依托湘江，凭险阻击。

石达开部攻占郴州、桂阳后，于4月6日经嘉禾、宁远攻永州。时永州城由总兵侯光裕、知府杨翰据守。当日，道员刘长佑自祁阳赶来增援，与石达开部将赖裕新展开激战，太平军连连受

---

① 李滨：《中兴别记》卷42，见《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二册下，第682页。

② 曾国藩：《石逆踪迹不明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1987年版（下同），第922页。

挫，大将萧发胜（又名萧华）、萧高麟战殁。石达开乃撤永州围，分兵两路，北趋宝庆。

宝庆位于资江东岸，是湘南重镇。太平军抵达时，清军已进行布防：城东由总兵周宽世和道员赵焕联防守，城南由副将田兴恕驻守，城西为资江，由水师巡防。

石达开抵达后，驻于城南10里之澄水桥，傅忠信部驻城东12里之泥湾，赖裕新部驻资江西岸之神滩渡，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宝庆，只有北路驻兵较少，城内尚可与外界相通。

6月初，太平军开始进攻外围要点。城东之太平军于3日、6日先后在长冲口、高桥一带发起进攻，均被清军击退。17日，太平军从马鞍山、佘湖山、五里牌绵延10余里之战线上发起攻击，切断了宝庆北面之通道，完成合围。

6月下旬，清军各路援军开始抵达宝庆外围。25日，知府刘岳昭率军抵达城东40里之洪桥；7月4日，道员刘长佑率军绕至城北30里之严塘。两路援军自东北方向节节推进，先后进至城东北之柳家桥、高家冲和半壁街一线。

官文、胡林翼鉴于宝庆形势紧张，各路清军又无大将节制，遂从湖北黄州调道员李续宜率湘军5300人增援宝庆，于7月24日抵达宝庆外围之水竹。至此，宝庆地区的清军总数已达4万人。李续宜抵达后，即与刘长佑等讨论解围之策，认为“东路势厚，且岩壑幽邃，不可用武”，“乃定计由北路进攻”。①

石达开得知清援军大至，乃于7月25日督率各军，由蓝江铺、短陂桥、清水塘、长茅冲对清军发起猛攻，连日激战，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27日，李续宜趁东路鏖战之际，率所部自高家冲西渡资江，并在水师配合下，攻毁了太平军在田家渡一带的营垒和哨卡。

驻守宝庆城西的赖裕新部太平军是比较薄弱的一路。28日，该部对敌发起反击失败，遂撤至资江东岸。

---

①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光绪元年浴谷堂刊本（下同），卷8。

8月10日，清军开始对东路太平军发起攻击，前锋推进至贺家坳、龙安（王）桥一线。石达开鉴于清军兵力已厚，攻占宝庆无望，乃于14日晚率部撤离宝庆外围，后经白仓、芦洪镇南走新宁、东安，18日进入广西境内。

宝庆之战是石达开自天京出走以来所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作战，最后劳师费时，毫无结果。究其原因，一是兵力部署欠妥。石达开将重兵置于城东城南，而没有将一定的兵力配置于城北方向以打敌援兵，结果李续宜援兵一到，西北的包围圈即被突破，宝庆城内外声息相通，攻取更加困难。另一原因是没有及时发起进攻。石达开部于5月初就抵达宝庆外围，但迟至6月初才发起攻击。这时，不仅守军加强了防御工事，而且援兵开始赶到，较之初期进攻更为困难。及至7月下旬李续宜大队援兵赶到，太平军不仅不能攻克宝庆，就连原占的外围要点也难以守住，不得不撤围他去。

石达开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本属过境性质，理应不攻坚、不恋战，力争行动迅速，以求早日入川。当时，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军正自滇蜀边境向四川中部发展，如果石达开能取道湖南迅速入川，在战略上将能与李、蓝起义军协同配合，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可惜，由于贪攻永州、宝庆，结果不仅损兵折将，迁延时日，而且使清军得以集结兵力，堵塞了由湘入川的通道，从而丧失了进军四川的良机。

五、回 师 广 西

石达开部退入广西后，经全州、兴安、龙胜、义宁、永福、永宁、融县，于10月15日到庆远（今宜山），并在此驻留了半年。这一带是地广人稀的贫瘠山区，加之连年战乱和地主豪绅武装的抗拒，使石达开沿途扩大起来的几十万人马的军需给养发生了困难，士气低落，军心离散，于是发生了一次大分化。1860年1月，部将郑乔等率花旗部（即原天地会起义武装加入太平军后未经整

编者）脱离石达开进入广东。同年春，后旗宰辅余忠扶部下将余杀死，率部西入贵州。同年夏，部将彭大顺、童容海、朱衣点等又率部重归天朝，史称“万里回朝”。

1860年5月下旬，石达开弃庆远南下，经忻城、迁江至宾州，辗转活动于上林、宾州间。由于众叛亲离，良将精兵尽去，手下仅剩万余人。幸好这时广西清军正集中兵力进攻陈开、李文茂起义军①。8月2日，大成国的京城秀京（即桂平）失陷，陈开被俘遇害，其余部三四万人即投归石达开。队伍得到扩大后，石达开决定重新打起远征四川的旗号，于1861年10月率领号称10万大军北上，经庆远、罗城、融县、怀远，再入湖南境，准备入川。

六、转战入川

1861年10月下旬，石达开率部由广西进入湖南，沿湘黔边境北进，于1862年（同治元年）1月底经龙山进入湖北来凤，2月17日由利川进入四川境，队伍再次扩大。

对于石达开部的行动，清廷总的方针是不令其进入四川境内，除要求四川总督骆秉章饬令川东镇道督率兵勇严密堵剿外，还责令湖南、湖北和贵州督抚派兵兜剿，并力夹击，将其歼灭于湘鄂川黔边界，不使他窜。但清军并未能阻止石达开部进入四川。

石达开进入四川境后，因北有大江阻隔，只好沿着长江南岸向西推进，于1862年2月20日占领川东石柱，4月下旬攻涪州不下，5月上旬攻綦江又不下，乃入贵州仁怀，复折入四川，占叙永，经兴文占长宁。不久，各地清军赶到，北进之路受阻，不得不折而东走，于8月中旬再入贵州仁怀境，旋绕遵义，围攻大定未克。石达开部将李福猷、曾广依南走水城、郎岱；石达开则率部自大

① 陈开、李文茂是天地会首领，1854年在广东东莞、佛山起义，1855年转移到广西，攻占浔州府（今广西桂平），成立大成国。

定西走毕节，经镇雄北进四川，占领筠连、高县，进驻横江镇和双龙场，准备北渡金沙江。这时，四川总督骆秉章调集各路清军前来堵剿：云南提督胡中和、总兵何胜必、萧庆高由犍为驰援屏山，参将杨发贵由叙州（今宜宾）前进到安边铺，川东镇总兵唐友耕由江安疾趋庆符，臬司刘岳昭由綦江驰赴长宁、珙县，并命沿江所有船只全行撤离，以防太平军北渡。12 月底，各路清军先后抵达高县、庆符前线。1863 年 1 月，清军开始合攻横江镇、双龙场太平军营地。由于叛徒内应，太平军连连失利，损失惨重，最后分东西两路撤离庆符地区。西路由石达开亲率，沿金沙江西走，伺机渡江北上。东路由李福猷率领，准备绕道北上。

七、石达开部的覆灭

1863 年 1 月底，石达开自四川叙州入云南境。与此同时，派赖裕新部先行入川，意在吸引清军北趋，为自己渡江北上打开通道。5 月 12 日，石达开率部自云南昭通米粮坝抢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宁远府境。

骆秉章为防堵太平军进入四川腹地，依托大渡河布防：由总兵唐友耕一军驻大渡河北安庆坝、万工汛；买通松林地土司千户王应元扼守松林河，以防太平军取道进攻泸定桥；又买通邛部土司岭承恩，带领土兵截断越嶲北上的各大路口，迫使石达开进入山间小道。骆秉章还在化林坪、泸定桥、打箭炉（今康定）一线部署了机动兵力。

石达开渡金沙江、过宁远之后，得知越嶲大路有清军堵截，遂由小路行军至大渡河边之紫打地。这一带群山壁立，隘口险窄，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有老鸦漩。此时河水陡涨，对岸又有清军扼守，渡河更加困难。太平军面对严酷的环境，一面盖棚驻扎，一面赶造船筏，准备渡河。5 月 21 日，太平军出动四五千人抢渡大渡河，遭对岸清军猛烈炮火的轰击，船筏全部被毁，人员损失惨重。

太平军渡河受阻，乃转而西进，企图越过松林河，取道泸定桥，再过大渡河。但土司千户王应元等据河力拒，太平军仍不得过。24日，土司岭承恩又率土兵由后路抄袭，进至新场一带，并于29日夜袭占了太平军马鞍山营垒。太平军后退之路又被切断，处境更加困难。在此情况下，石达开曾致书王应元，许以重金请其让路，但遭拒绝。这时太平军的粮食已经告罄，只得杀马而食，以桑叶、草根等充饥，完全陷于绝境。6月3日，太平军分作两队，一队抢渡大渡河，一队抢渡松林河，但由于河水湍急和敌军炮火的阻击，都没有成功。6月11日，清军都司谢国泰会同王应元越过松林河，参将杨应刚会同岭承恩自马鞍山冲杀而下，同时进扑紫打地，焚毁太平军的营垒。太平军四散逃奔，复遭山顶清军的木石滚击，死伤不少。石达开携家属及数千部众东奔老鸦漩，又被阻于宰罗河。全军进退无路，实已山穷水尽。最后，石达开从保全部属生命的愿望出发，幻想"舍命以安三军"(即以他个人的生命来换取清方赦免他的部属)，经与清方约定后，便带领幼子石定忠及宰辅曾仕和等4人到洗马姑投入参将杨应刚营垒"献死"。但石达开等一进入敌营，即被清军执缚；他的几千部众，也被清军在大树堡寺庙内集体处死。石达开等后被解至成都，于8月6日从容就义。

八、石达开部覆亡的原因及教训

石达开于1857年5月自天京出走，至1863年6月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前后凡7年，途经15省，行程数万里。像石达开这样一位率领过数十万军队的太平军名将，最后竟陷入大渡河绝地，被少部清军和地方土司的部队所困死，是有其深刻的原因和教训的。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深受太平军将士爱戴、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天京内讧之后，出而主政，人们对他遭到洪秀全的疑忌和洪氏兄弟的挟制，深表同情。但他分裂出走，带

走了十余万太平军将士，使太平天国继内讧之后，又一次遭受严重的损伤，这就失去了人心。

石达开被迫分裂出走以后，虽然保持了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方向，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制度，但实际上已完全脱离了天京的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独树一帜，另搞一套，使太平天国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并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最后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石达开进军途中，由于其分裂革命队伍的错误行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也由于在进军途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广大将士看不到前途，因此分化投敌事件层出不穷，直至于广西境内发展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有20余万队伍“万里回朝”，重新回到了洪秀全的旗帜下，跟随石达开的一度仅万余人。历史表明，一个不顾革命全局的人，是无法维系其内部团结的。

石达开到了赣南以后，选定四川作为进军的战略目标。四川民富地险，易守难攻，自古即为理想的割据之地。石达开果能占领四川，当然可以作为根据地。但当时石达开及其部队尚在江西，与四川远隔数千里，特别是中间有湘军盘据的湖北、湖南，难以飞越。此时选定四川作为进军的战略目标，无疑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盲目性。特别是经过广西大分化，石达开的老部队所剩无几，而清廷已调骆秉章及万余湘军加强了四川的防御，这时理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修正战略，放弃进军四川的计划。但他仍死抱着原定的目标不放，不顾清军的严密堵截，再三再四地企图攻入四川腹地，似乎只要一进入四川腹地，就可据为根本。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即使渡过了大渡河，仍然是孤军作战，因而也未必能站稳脚跟。

石达开是太平军的一位著名战将，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曾率领千军万马，打过不少胜仗，攻下过不少名城大邑，使他的敌人闻之胆寒。但自他脱离天京之后，孤军急进，没有后方的支持，没有友军的配合，粮食要临时征集，弹药要随军携带，完全成了一支流寇式的部队。尽管石达开拥有号称数十万大军，却既没有

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也没有攻下过几个名城大邑，一直摆脱不了被动的处境，最后终于陷入绝地，被为数有限的清军和土司部队所歼灭。石达开这位“绝世英物”，竟成了清军的俘虏。这决不是什么“恶运使然”，也不是什么偶然发生的不幸，而是政治上脱离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大局，分裂出走，军事上丢弃根据地，实行流寇主义，战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然，石达开的出走是被迫的，作为太平天国的元首洪秀全对此有直接责任。在本章末节探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基本原因时，还将谈到这个问题。

第六节　二破江北、江南大营与东征苏常

一、天京内讧和石达开出走后的军事形势

1856年9月爆发的天京内讧，和1857年5月石达开率部出走，这接连发生的事变，导致太平天国在各个战场上停止了攻势，从而使清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并很快组织力量对太平军进行反扑。

在湖北战场，太平军于1856年12月放弃武汉，所占沿江各州县也随之全部丧失。清军夹江东下，直薄江西九江城。

在江西战场，1857年9月，瑞州（今高安）失守。1858年，临江、九江、吉安，又相继陷落，江西全省陷入清军之手。

在天京周围，1857年，清军陷溧水、句容。同年12月，太平军弃守镇江、瓜洲。1858年初，清军复建江南、江北大营，掘壕筑垒，围困天京。

在安徽战场，情况则有所不同。内讧之后，除皖南各州县迅速被清军占领外，安庆及其周围地区基本上仍在太平军控制之下。由于成天豫陈玉成、合天义李秀成所统部队的积极进击，顶住了清军沿江东下的势头。先是被困于桐城一带的李秀成，势孤力单，

于1857年1月初与陈玉成在枞阳商定了破敌之策。1月中旬，陈玉成自宁国渡江北上，占无为，下运漕，取巢县，攻庐江，与李秀成部夹击桐城外围之敌，大败清军秦定三、郑魁士部，并乘胜克舒城、六安。3月初，太平军出六安北上，与张乐行、龚得树等部捻军胜利会师，势力更盛。3月18日，在捻军配合下，攻占霍丘，即交给捻军作为根据地，成为太平天国的北部屏障。与此同时，陈玉成率大军进入湖北东北部，与湘军转战经年，虽未能守住九江，但稳住了皖北的根据地，使得湘军不能与江南、江北大营相配合，对天京发动更大的攻势，从而使太平天国领导者有可能重新整顿内部，从内讧的创伤中逐渐恢复过来。

石达开出走后，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掌握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但由于他们毫无能力，朝内文武大臣不服。1857年10月，洪秀全改以其宫内爱臣蒙得恩为正掌率①，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代替安、福二王执政。之后，洪秀全又提拔了一些年轻将领，恢复了早期的五军主将制度，“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②。这些措施，对加强太平天国的领导，扭转严峻的军事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二、枞阳会议

为了解除天京之围，李秀成于1858年3月请命出京，经芜湖与其堂弟李世贤商定，“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③。李秀成自率部将陈坤书等5000余人，由芜湖及东梁山渡至江北，齐集含山，于5月初克和州，并连占全椒、滁州、来安。

---

① 《蒙时雍家书》载：“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掌握重权，总理国事”。见《太平天国》（二），第756页。

②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3页。

③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8页。

由于天京被围日紧，南郊板桥、大胜关被攻陷，七桥瓮、印子山、雨花台已在敌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李秀成日夜焦虑，在全椒逐日操演人马，准备先扫清江浦、浦口，以安天京人心。6 月 5 日，李秀成率部抵江浦大刘村，取道桥林进攻江北大营。但初战失利，损失官兵千余人，13 座营垒尽失。这使李秀成意识到，要解京围，单凭他一军之力难以成功，因而行文各路镇将，于 8 月初在庐江县枞阳镇举行会议，陈玉成也主动与会。众将领“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共同制订了解救京围的计划：陈玉成、李世贤由潜山过舒城攻庐州，然后由吴如孝在定远一带活动，以吸引胜保的兵力，陈玉成则率主力速进全椒，会同李秀成部进攻江北大营。

8 月 11 日，陈玉成部由潜山、舒城经三河镇向庐州逼近。时庐州城内有兵勇数千，由副都统麟瑞督率驻守，布政使李孟群带勇万人驻守南郊。23 日晨，太平军两万余人从西、南两个方向进击，在二十里铺击败副将余应彪部，在十八里冈又败副都统麟瑞部，大队直逼城垣，在城南毙副将萧开甲，在城西南再败麟瑞部，于当天中午进占庐州城。25 日，陈玉成部抵店埠、梁园。

太平军再克庐州，清廷为之震动。咸丰帝立即决定任命都统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节制皖境各军。并谕令湖广总督官文从沿长江东下的湘军中分派劲旅，赴援庐州；谕令德兴阿从江北大营中酌拨马步官兵，前往庐州协剿；要求胜保及各路将领，务必将庐州即日克复。

太平军的主要进攻目标不在占领庐州，因此未等江北大营的清军赶赴庐州，陈玉成即于 9 月 9 日令吴如孝会同捻军龚得树部攻定远，自率大军取道界牌直下滁州，与自和州、全椒而来的李秀成部在乌衣会师。

三、二破江北大营

钦差大臣德兴阿的江北大营，扎于浦口、江浦间之陡冈、安

定桥、小店（今永宁镇）一带。所部清军 1.5 万余人，分驻于西至江浦石碛桥、高旺，北至来安、施官集，东至瓜洲、三汊河一带地区，绵延 200 余里；长江内则由水师巡船轮替梭缉，兼资接应。战前，德兴阿得意地说："各路马步兵勇或多或少，择要分布，有警则奋勇向前，贼多则添拨援应；海全一军驻扎石佛寺，无论何处紧急，皆可策应。"①

9 月 17 日，陈、李联军大败前来进攻的江北大营清军于乌衣，毙伤敌三四千人，并占领西葛、东葛。18 日，江北大营派兵增援小店，江南大营派来的 5000 援兵也到达前线，企图凭借有利地形，遏止太平军继续进击。双方在此连日激战，结果清军大败，小店防线全面崩溃。太平军扫清了江北大营的外围据点后，即确定由陈玉成、李秀成部从东西方向合击大营，命九洑洲的太平军协同作战。9 月 26 日，太平军发起总攻，陈玉成部先由东路抄袭，首先突破陡冈；西路和九洑洲之太平军也同时合击，将浦口一带的清军营垒全部烧毁。清军见后路被袭，阵势大乱，纷纷夺路溃逃。德兴阿取道长江水路，败走六合、扬州。江北大营再次被摧毁，被歼近万人。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之后，天京与江北的通道得以恢复。清军南北合围天京的努力，又遭挫败。

浦口大捷之后，陈玉成、李秀成即分路进兵，追歼溃敌。李秀成部经天长、仪征，于 10 月 9 日占领扬州，德兴阿败走邵伯镇。15 日，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张国梁率 6000 余人由镇江渡江北援，李秀成以兵力过单，弃守扬州、仪征。陈玉成部由浦口北攻六合，由于道员温绍原据城死守，直至 24 日才攻克。

由于江北大营惨败，清廷将德兴阿革职，并决定撤去江北大营建制番号，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统帅和春统一节制。

①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 200，第 24 页。

四、三河歼灭战

（参见附图 10）

1858 年 5 月，湘军李续宾部攻陷九江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即拟订“东征计划”，准备乘胜派兵东援安徽。同年 8 月，太平军攻克庐州，官文（时胡林翼因母丧回籍守制）根据咸丰帝的谕旨，命令“李续宾迅速进兵，攻克太湖，即乘势扫清桐城、舒城一路，疾趋庐州，会图克复，兼扼贼匪北窜”①。所以，当陈玉成、李秀成部挥师东向，进攻江北大营时，江宁将军都兴阿、浙江布政使李续宾即率兵勇万余人自湖北东犯皖境，9 月 22 日陷太湖，然后分兵为二：由都兴阿率副都统多隆阿、总兵鲍超进逼安庆，李续宾率湘军 8000 人北指庐州。

李续宾部于 9 月 27 日陷潜山，10 月 13 日陷桐城，24 日陷舒城，11 月 3 日进抵舒城东北 50 里之三河镇，准备进犯庐州。

三河镇位于丰乐河、杭埠河、马槽河交汇处，东濒巢湖，是这一带的水陆交通要冲。该镇原无城垣，太平军占领后，于 1855 年 10 月新筑了城墙，添筑砖垒 9 座，凭河设险，广屯米粮，接济庐州、天京，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居重要地位。时太平军守将为吴定规。

10 月 24 日，陈玉成刚攻克六合，即接到吴定规“一日五文，前来告急”报告，得知湘军大举东犯，前锋已抵舒城，便毅然决定回兵援救，并启奏天王，调李秀成部同往。

11 月 3 日，李续宾率 5000 余众进抵三河镇外围。他视察地形后，决定三路分进，先破城外 9 垒：由义中等 6 营进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夹一带之垒；由左仁等 3 营进攻镇东北迎水庵、水晶庵一带之垒；由副右等 2 营进攻镇西面储家越一带之垒；李续宾则亲

①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 201，第 39 页。

率湘中等3营为各路后应。11月7日，湘军分途并进发起进攻。太平军依托城外砖垒顽强抵抗，激战竟日，给敌以重大杀伤，自己也有较大牺牲。由于众寡难敌，最后决定放弃城外砖垒，退入城内拒守。

在湘军进攻三河镇外围9垒的当天，陈玉成率大队赶到，扎营于三河镇西南30里之金牛镇一带，连营数十里，并分派部队切断了李续宾部通往舒城之路。11月14日，李秀成也率部赶到，驻营镇东南25里之白石山。太平军兵力更厚，军势更壮。

在太平军强大援军的威慑之下，李续宾的部将曾建议退守桐城，但李一意孤行，不听建议，并说："军事有进无退，当死战！"①11月15日深夜，他派兵7营，对驻金牛的陈玉成部太平军营垒实施偷袭，当行至镇南15里的樊家渡、王家祠堂时，即与陈玉成部遭遇。太平军一面迎战，且战且走，一面布置伏兵，准备包抄、伏击敌人。次日晨，大雾弥漫，咫尺莫辨，鼓角相闻，敌我难分。太平军首先击溃了湘军的左路，并将中路和右路湘军层层围裹于烟筒（墩）岗一带。湘军反复突围，皆不得出，被太平军往返掩杀，死伤过半。李续宾闻报，亲自率队来救，冲击数十次，均不得入内。这时，驻于白石山的李秀成闻金牛镇炮声不绝，即率队赶来参战；吴定规部也出城合击。李续宾见势不妙，逃回大营，并传令各部严守营垒，企图坚守待援。可是，这时守垒的湘军有的已经逃散，有的已无守志，有的被太平军阻截在外，未及回营，因此，湘军的7个营垒迅速被太平军攻破，其余营垒也被太平军四面包围。这一带地势平坦，河港交叉，太平军挖开河堤，断敌去路。当李续宾及其残兵败将冲出营垒时，即陷入泥淖之中，被太平军击毙于胡寄疃附近。之后，太平军继续围攻负隅顽抗的残敌。至18日，湘军米粮、弹药俱尽，全部被歼。太平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

① 李滨：《中兴别记》卷41，《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下，第663页。

陈玉成、李秀成取得三河大捷之后，即乘胜南进。舒城之敌闻三河之败，已弃城走桐城。陈玉成部遂由舒城出大关，李秀成部经庐江，共同进逼桐城，并于24日攻克该城，27日复潜山、太湖。

另一支犯皖清军都兴阿部在太湖与李续宾分军后，即经石牌进逼安庆，10月15日占安庆北面门户集贤关，在杨载福水师配合下，围困安庆。及至李续宾大败于三河，接着舒城、桐城又失，都兴阿恐被太平军抄袭，遂于11月27日撤安庆之围，经石牌、太湖地区退驻宿松。

湘军三河之败，主要原因是孤军犯险。李续宾奉命自湖北东犯，仅带兵勇8000人，入皖之后，连陷4城，节节分兵驻守，结果“兵以屡分而单，气以屡胜而泄”，前无牵制太平军增援之兵，后无彼此犄角之势，以致“覆于一旦”①。而统将李续宾刚愎自负，当太平军大队援兵赶到时，拒绝部将退守桐城的建议，决定“死战”顽抗，结果遭到全军覆没。

太平军之所以能打这样漂亮的歼灭战，主要由于决心果断，兵力集中，战术灵活。当湘军进抵舒城、三河时，太平军主力尚在江苏六合、扬州一带。陈玉成闻讯后，当即决定兼程回援，行军迅捷，在湘军猛攻三河之际，及时赶到，断敌退路，使敌措手不及。当陈玉成回援时，又奏调李秀成部同往，这就保证在兵力对比上处于优势地位。在战斗中，采取正面迎战与抄敌后路相结合的战法，利用大雾弥漫的气象条件，插入敌营之间，勇猛冲杀，打得敌人前后左右不能相救，终于将湘军悍将李续宾及其所部精锐一举歼灭。

李续宾部全军覆没，清廷朝野震动。咸丰帝闻之“陨涕”；曾国藩“哀恸填膺，减食数日”；胡林翼则哀叹说：三河败后，“军气已寒，非岁月之间所能复振”。可见此战对清廷和湘军打击之沉

---

① 胡林翼：《恭报起程赴鄂日期并先驰往营中疏》，见《胡林翼全集·奏议》，上海大东书局1935年版（下同），卷31，第149页。

重。

对太平天国来说，三河之捷，挫败了湘军东犯的计划，保卫了皖西根据地，稳定了江北战局，从而得以重整军旅，坚持反清作战。

五、二破江南大营

（参见附图11）

由于三河之败，湘军元气大伤，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恢复和整顿；由于石达开部围攻湖南宝庆，官文、胡林翼遣道员李续宜率兵前往救援，也分散了湘军的兵力。这在客观上于太平军是有利的。迨至1859年8月，石达开攻宝庆不下而南返广西，清廷命曾国藩统率湘军改援安徽。不久，曾国藩便与官文、胡林翼等共同制订了“四路图皖”的计划。同年底，曾国藩移营安徽宿松，胡林翼移营安徽英山，准备向皖西太平军根据地实施四路并进，安徽战场再次面临严峻形势。

在天京北岸，当1858年冬陈玉成、李秀成回师三河之际，受命留守滁州、全椒的李秀成部将李昭寿（原系捻军，后加入李秀成部），受清钦差大臣胜保招抚，于11月1日献城降清。1859年2月，江浦、全椒、滁州、天长等州县重新落入清军之手，天京之北路通道又断。为了打通天京与皖北的联系，陈玉成、李秀成于3、4月间曾先后两次企图夺回江浦、浦口，结果都未得手。此后，陈玉成、李秀成率部转战于六合、仪征、扬州、天长、盱眙、来安、滁州间，企图诱使清军分兵，乘机夺回浦口、江浦。直到11月间，陈、李两军才大败提督周天培（被击毙）、总兵冯子材部，占领浦口，围攻江浦，稍解天京之围。此后，李秀成留守北岸，陈玉成返回皖西战场。

在天京方面，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由香港抵天京，深得洪秀全的欢心，不久即封他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仁玕知识广博，对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潮流有

所了解。他总理朝政后，提出了《资政新篇》，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洪仁玕的被重用，也引起一些老兄弟的不满。为此，洪秀全不得不封前军主将陈玉成为英王。由于李秀成的部将李昭寿、薛之元相继投清，引起了洪秀全对李秀成的怀疑，一度扣留李秀成的家属为人质，不准李秀成的人马渡江进京，后见李秀成并无通敌之举，遂改取笼络手段，封他为忠王，使矛盾得到了缓解。同年10月，还发生了右军主将韦俊于皖南池州投清的事件，幸其部将纷起反对，被他带走的人马不多。

综观1859年形势，太平天国既出现了新的希望和转机，也产生了新的困难，总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面对上述形势，忠王李秀成一再"强请"出京，解救京围。这一要求最后得到洪秀全的应允。关于解救京围的战略，李秀成与洪仁玕进行过三次面商，最后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反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① 这一战略的基本思想，是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我国历史上"围魏救赵"的战法，攻取清军必救之财富要地浙江杭州，以吸引和分散江南大营的兵力；尔后立即放弃杭州，回师围攻江南大营。同时，由英王陈玉成执行"虚援安省"的任务，在皖西实施战略佯动，以掩护江南的作战行动。整个计划由李秀成负责组织实施。

1860年1月28日，李秀成将镇守浦口的任务交予部将黄子隆、陈赞明后，即前往芜湖召集在皖南活动的各路将领，说明天京被围的危急形势，宣布攻杭救京的计划，明确了进军路线和各将领的任务。2月10日，李秀成率陈坤书、谭绍光、陆顺德等部2万余人到达南陵，后路过青弋江镇和马头镇，绕过宁国府（今宣城），经高桥、水东，于24日攻占广德，留陈坤书、陈炳文守城。为了掩护李秀成主力的进军，李世贤则率部由南陵经泾县，进占

---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3页。

旌德、太平、石埭，留右军主将刘官芳在这一带活动，自率所部东入浙江，与李秀成会合，于29日占安吉，3月2日败总兵李定太部于梅溪镇，次日又在泗安镇击溃参将周天孚部，下虹星桥。4日进占长兴后，分军为二：由李世贤佯攻湖州，威胁和牵制北路清军；李秀成则率领六七千人，乔装清军，日夜兼程，进袭杭州。

正当各路援浙清军部署南下之际，李秀成部于3月11日进至杭州城外。杭州城方圆36里，除满营外，仅有旗兵2100名、兵勇2800名防守。19日，太平军轰塌清波门城垣，由1350人组成的先锋队冲入城内，杀死了浙江巡抚罗遵殿等，攻占杭州，惟杭州将军瑞昌踞守的满城未能攻下。

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对太平军入浙的意图曾有所察觉①，故对援浙并不积极。但咸丰帝为了保全浙江这个财富之区，屡下谕旨，要和春从江南大营抽调劲旅赴援，不久又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和春由于责任在身，不得不从江南大营陆续抽调兵力，增援浙江，先后调出的兵勇达1.3万余人。江南大营援兵在总兵张玉良带领下，于李秀成攻陷杭州之后4天，到达杭州城外。

1860年3月23日，李秀成发现江南大营的援兵抵达杭州，便于次日一面在杭州城头遍插旗帜以为疑兵，一面连夜撤出杭州，返旆回救。太平军退出杭州一日一夜之后，清军始敢入城。

李秀成主动撤出杭州后，经余杭、临安，循天目山麓趋孝丰，不分昼夜，疾驰北返，于4月4日抵达安徽广德。8日，于建平（今郎溪）大会各路将领，共同商定了解救天京之围的详细计划。会后，即分东西两路进援天京。

西路由杨辅清率领，从安徽宁国府之洪林桥一带出发，于4月11日占东坝，12日占高淳，18日占溧水，23日占秣陵关。29日分军两支，左路由黄文金率领进向雨花台，右路由刘官芳、陈坤

---

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四中记载："庚申（咸丰十年）正月，我兵围江宁急，城中逆首洪秀全四出救援，令由池州进攻徽、宁、浙境以牵我师，为围魏救赵之计。俟大军调援空虚，即俟隙进兵。此檄为我所得。"

书率领进逼高桥门。

东路由李秀成、李世贤率领，从广德出发，于4月13日占领溧阳，然后分兵二路：左路由李秀成率领，出溧阳，经赤山，23日克句容。右路由李世贤率领，攻宜兴，威逼常州，以牵制东面清军，掩护主力进攻，23日至句容会合李秀成部，败总兵张威邦部，28日占领淳化镇。

当李秀成部进袭杭州之际，担任战略佯动任务的陈玉成部回军皖西，与东下的湘军相持于安徽潜山、太湖间。3月初，陈玉成率部自皖西经庐州东返，6日攻滁州，14日攻全椒，下旬渡江南下，经江宁镇抵板桥、善桥一带，准备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作战。这时，各路大军已经扫清了江南大营外围各据点，完成了对大营的反包围。

清军江南大营自1856年被攻破后，于1858年初重建，统帅为和春，张国梁帮办军务。是年冬，于天京城外挖掘长濠，“自城北之上元门至西路之三汊河乐心寺江干止，共长一百三四十里，大小营盘约一百三十余座，兵勇约四万有奇”①。大营总部设在沧波、高桥门之间的小水关。

各路太平军抵达天京外围后，遂分兵五路，准备总攻江南大营：李世贤部绕至天京东北之洪山、燕子矶；李秀成部绕至天京东北尧化门攻紫金山尾；刘官芳、陈坤书部攻高桥门；杨辅清部攻雨花台；陈玉成部自善桥方向进攻江东门。天京的太平军则由城内出击，与援军内外夹攻。

总攻自5月2日开始。是日天气晴朗，但从当晚开始，连日风雨交加，时有冰雹，太平军冒雨猛攻。

5月4日，陈玉成部于上河镇、毛公渡一带搭造浮桥数道，突破清军营垒的外墙。城内太平军见外援已到，也分路出击。太平军抛掷的火罐落入清副将雷安邦的营内，引起火药轰发，声震四野，清军遂纷纷外逃，一时人声鼎沸，乱作一团，附近清军闻之，

---

①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5，第5页。

也纷纷撤至营外。城内城外的太平军乘机加强攻势，半日之内，江南大营西半部的50余座营垒全行攻破，总兵黄靖、副将马登富等被击毙。张国梁闻西路有变，便赶来救援，见营盘已失，西部防线已溃，只得从原路退回，破坏上方桥，准备固守大营东北半壁。太平军突破敌西南长壕，内外会师，重围已解，士气更高，攻势更猛。这时，清军兵勇已大半溃逃，大营势危，和春的幕僚们建议暂退镇江。和春不许，说："今上方桥以南既为贼有，我军驻扎小水关，地面不宽，守之尚易，既可进剿，何必退往镇江？""如贼来扑我，惟有一死而已，不必多言"。① 未几，太平军攻至孝陵卫街口，钟山南麓也到处起火，幕僚们忙把和春从床上唤醒，狼狈逃奔，于6日晨至石埠桥，搭船逃往镇江。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清军江南大营又被摧毁，太平军缴获了大量枪炮、火药、铅子，以及白银十余万两。

二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成功、最典型的一个战役，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洪仁玕、李秀成选择杭州作为"攻敌必救"的目标，既可分散江南大营的兵力，又可从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反置敌于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被动地位。这个计划之巧妙，还在于完全出于清朝统治者的意料之外。当李秀成率军进抵杭州城下时，两江总督何桂清还自作聪明地判断说："逆匪大股屯聚湖州府属，仅分一股扑犯杭州，显系湖州援兵渐集，故作此狡狯伎俩，使我分兵援救杭州，彼得逞志于湖州也。"② 远在北京的咸丰帝以及军机处的高级官僚们，也不比何桂清高明，他们斥责浙江巡抚罗遵殿只知固守杭州，而忘记了"保障苏常，兼顾湖州"③。他们都没有看到这是太平军的分兵计谋，目的根本不限于取得苏常、湖州。江南大营统帅和春虽然获得了太平军入浙意

---

① 萧盛远:《粤匪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第54～55页。

②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32，第20页。

③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32，第23页。

图的情报，但也将信将疑，在咸丰帝的一再催促下，仍先后从江南大营抽出了 2 万多兵勇。

这一战役，太平军不仅有高明的全盘计划，而且有周密的措施。在各个作战阶段实施之前，分别召开参战将领会议，研究具体作战计划，明确各部队任务，因而打起仗来，万众一心，密切协同。确如李秀成所说："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①

这一战役的成功之处，还在于集中了优势兵力。江南大营筑有号称"万里长壕"的工事，防守坚固，即使在分兵入浙之后，仍拥有 4 万多人。为打击这股清军，太平军集中了天京周围可能集中的全部兵力，约 10 余万人，再加陈玉成率部从江北赶来参战，使攻击的兵力更壮，因而只用了四天时间，即摧垮了和春、张国梁苦心经营两年多的营垒。

太平军在作战指导上，也有许多长处。在兵力部署上，注意主攻、助攻、掩护、佯动相结合。同时注意伪装和荫蔽，力求行动的突然性，如奔袭杭州时，穿戴敌军的缨帽号衣，撤离杭州时，在城头遍插旗帜，延缓了清军的进城时间。在返旆回救时，注意派出一支部队进占金坛，摆出东攻常州的架势，切断江南大营与苏南敌军之间的联系，从而确保进攻江南大营之战的顺利进行。

当然，在作战实施过程中也有不足之处。如在攻破江南大营的过程中，兵力部署不够严密，组织指挥不够果断，既未能切断敌军的退路，又未能在敌退却时及时组织阻击或追击，致使和春等得以逃脱。太平军虽然攻破了大营，但仅歼敌三五千人，基本上打了个击溃战②，这是此次作战的最大缺憾。

---

① 许瑶光：《谈浙》，见《太平天国》（六），第 594 页。

② 《李秀成自述》中记载说："和、张军死者三五千人，散者多也。"萧盛远在《粤匪纪略》中则说"官兵死者数万人"。后说恐不确。

六、东征苏、常

1860 年 5 月 11 日，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一起登朝，庆贺天京解围，并商议下一步进兵之策。陈玉成主张救安庆，李世贤主张取闽、浙，洪仁玕、李秀成主张先取长江下游。洪仁玕申述说："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四（西）距川、陕，西（北）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① 这是洪仁玕对下一步作战行动的全盘设想，即乘胜先取下游，然后再争上游。

洪仁玕、李秀成的主张，得到了天王洪秀全的"旨准"，但只让李秀成率本部人马去取苏、常，并限一个月肃清回奏。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洪秀全没有要李秀成去攻上海，并在时间上作了限制（要在一个月之内攻下苏、常并攻占上海是不可能的）。

和春、张国梁等自江南大营逃往镇江后，连日收集残兵败将，共得 2 万余人，除将其中万余名交总兵冯子材防守镇江外，其余则带往丹阳。

李秀成会同李世贤、杨辅清等，于 5 月 15 日开始东征。19 日大败清军于丹阳城外，并攻占丹阳城，清军死伤万余人。从广西到金陵一直与太平军为敌的张国梁，在逃跑时于丹阳南门外落水溺死。

太平军攻克丹阳后，继续追歼残敌。5 月 22 日败清军于常州

---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553～554 页。

② 参见《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508 页。

城外，26日克常州。和春败退至浒墅关，愧惧交集，自杀身亡。提督张玉良率残兵退守无锡。5月30日，太平军经一日一夜战斗，大败张玉良军，占领无锡。6月2日进抵苏州城下，在内应和群众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该城，收降清军五六万人，获洋枪洋炮甚多。

太平军占领苏州后，李秀成派陆顺德等继续东进，于6月间连占昆山、太仓、嘉定、青浦，7月1日克松江府；派李世贤由吴江南进，于6月14日攻占浙江嘉兴府，准备进军杭州。

太平军自5月15日从天京出发，在一个半月内，即占领了长江三角洲除上海以外的大部地区，取得了开辟苏、常根据地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将这一地区置为苏福省，建立起地方政权，鼓励和发展生产，成为尔后数年间供给天京财粮的重要基地。

七、第一次攻上海

李秀成部太平军攻取苏、常之后，遂准备进图上海。但进攻上海，与进攻其它重要城镇不同，不仅有军事问题，而且有外交问题，情况十分复杂。由于上海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所列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虎门附加条约》又规定，英国可在上海设“居留地”，即所谓“租界”。其后，美、法租界也相继设立。租界自设“工部局”，不受中国当局治理，俨然成为“国中之国”。至19世纪50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外贸易的繁华商埠和外国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因此，当李秀成率军东征苏、常，军锋渐渐逼近上海时，立即引起英法侵略者的惊慌。1860年5月下旬，英、法驻上海公使以维护商业为名，公然宣布“保卫”上海。

与此同时，以苏松太道吴煦和上海巨商杨坊为首的一批买办官僚，一方面向英、法积极求救，一方面雇用美国流氓华尔招募外籍水手、流氓、无赖，组织“洋枪队”，以对抗太平军。7月16日，洋枪队200人在7000名清军的配合下，攻陷了松江，接着进犯青浦。

李秀成决定自苏州亲自率军赴援，先解青浦之围。8月9日，

洋枪队和清军再犯青浦，守军兵分两路，进行包抄，打得洋枪队丢弃大炮，狼狈逃回松江。太平军乘胜追击，于12日夺回了松江。

在进攻上海之前，李秀成致书英国驻华公使，阐明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表达了愿与各国友好的愿望，并邀请他来苏州面商。洪仁玕也致书上海英国领事麦迪乐等，告知他将亲赴苏州，准备与他们会晤。但此时英法公使已决心勾结清军，以武力阻止太平军接近上海，因而对李秀成、洪仁玕先后发出的照会竟未拆阅，不予理睬。

1860年7月上旬，李秀成曾接前线将领禀报，"尚（上）海有两粤兵勇三千余人，情愿投诚前来"①。因此，便不顾英法侵略者的威胁，于8月16日自松江、青浦两路进兵上海，前锋于17日抵达七宝、虹桥、法华镇、闸北一带。18日，李秀成再次致书上海各国公使，声明太平军到上海，不扰外人，并请悬挂黄旗，以便识别。当天，太平军抵徐家汇，占罗家湾，逼近上海县城之西门和南门。

这时的上海，人口30余万，驻有清军万余，英法军约1200人。此次李秀成进攻上海，原寄希望于内应，故仅带兵3000人，实际上是准备去"接收"上海。

8月18日，太平军击败了驻扎县城外的清军，当抵近城门时，却遭到英法军的猛烈射击。太平军并未还击，只是向城上的侵略者摇手，示意不要放枪，要求对话。但侵略者射击如故，太平军只得后撤。20日，太平军再次抵近县城，又遭英军射击，依旧未予还击。不久转向跑马场，又遭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英舰发炮射击。在此情况下，太平军只得后撤至徐家汇。

太平军经过两次"进攻"，发觉内应无望（其实，当太平军进抵上海外围时，清军兵勇准备内应的图谋已被江苏巡抚薛焕发觉，他们的首领余义政已于8月10日被杀），乃于24日撤离上海，改

---

①《忠王李秀成给宿卫军大佐将陆顺德荷天安麦冬良谆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86页。

援正遭清军攻击的嘉兴。

洪仁玕、李秀成决定进攻上海，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在外交上缺乏周密的考虑，在军事上也未作充分的准备，把攻取上海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中立和清军的“内应”上，结果二者都未能如愿以偿，只好半途而废，撤离上海。

第七节　二次西征与安庆会战

一、严酷的西线军事形势

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的重大胜利后，来自天京东面的威胁基本解除，军事上出现了自内讧以来的最好形势，但是，来自天京西面的威胁却越来越严重。

江南大营的崩溃，迫使清王朝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进一步寄托在曾国藩及其湘军身上。1860 年夏，清廷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统归其节制。并命曾国藩“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建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①。但曾国藩认为，要保江南，必须先控制上游，因此对咸丰帝一再催促其进援江南的谕旨，总是强调兵力不敷而消极拖延，实际上仍贯彻其围攻安庆、节节东犯的既定计划。到 9 月底，湘军五路东犯，其前锋分别抵达下列各地：在长江以北，道员曾国荃率湘军万余人进入集贤关，围困安庆；副都统多隆阿率鄂军万余人，进扎桐城西南之挂车河，担任打援任务；在长江沿岸，提督杨载福率湘军水师破枞阳、攻池州，控制安庆一带长江水道；在长江以南，道员张运兰率湘军 3000 人攻旌德，总兵鲍超部湘军 6000 人攻泾县。湘军五路东犯，构成了对太平天国的严重威胁。

①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 238，第 6 页。

曾国藩进攻安庆蓄谋已久，他总结历年来清军镇压太平军的经验教训，统筹全局，认定安庆是个要害。他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① 1860年夏，由于苏、常危急，咸丰帝曾屡次谕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赴援苏常"，但曾国藩分析利弊，反复申述理由，坚持不撤安庆之围。为了应付咸丰帝，他将围攻安庆的任务交予其弟曾国荃，自率万人赴长江南岸，立大营于皖南祁门，并分兵三路东进，摆出一副东援苏、常的架势。其实，曾国藩身在江南，心在江北，他把湘军的主力和战将都留在安庆周围，并由胡林翼驻扎太湖，就近指挥。

二、太平军决定二次西征

早在1860年5月，太平军各路将领在天京会议上就对西征作过初步讨论。会上，陈玉成积极主张及早进攻安庆外围之敌，洪仁玕、李秀成主张东征苏、常后回师西征，结果洪、李的主张得到了天王的"旨准"。洪仁玕关于西征的总体设想是："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②

4个月之后，湘军已完成了以围困安庆为重心的战略部署。这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才决定调动东战场上的各路人马至西战场，以对付湘军的威胁。但对西征的方针和具体实施计划，未能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做进一步的研究和修订。作为西征的两员主将陈玉成和李秀成，曾于9月下旬在苏州会商过，但内容如何，没有留下史料。

关于西征的进军路线，据曾国藩缴获的太平军文件透露：陈玉成、李秀成由北岸庐州、六安一带西进，杨辅清、李世贤由南

① 曾国藩：《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146页。

②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4页。

岸徽州、池州一带西进，急救安庆。① 另据英国参赞巴夏礼在黄州访问英王陈玉成的报告中记载："英王由江北前进，他们的目的是在三月（西历 4 月）会师武昌。忠王由南昌以下横过江西，经瑞州至洞庭湖上的岳州，进攻武昌南面。辅王取道湖口、九江；如可能，用船运军队溯长江而上，攻打武昌东面。英王的军队攻北面。"② 以上两则记载之间的不同点，在于李秀成的进军路线。按照洪秀全的计划，是要李秀成走江北的。《李秀成自述》中也说：天王原要他领军去扫北，后来为了招集江西、湖北的义民，他不得不"逆主之命，信友之情，从师而上江西、湖北"③。而陈玉成对巴夏礼所说，当是根据李秀成已走南路的既成事实而言的。由南路进军，显然没有体现洪秀全的意图。

太平军此次西征的主要目的是解安庆之围，所取方略，仍如二破江南大营那样，采取"围魏救赵"之策，攻湘军后路之要害武昌，迫使其分军回救，然后进击安庆围敌，以解安庆之围。史学界对太平军此次军事行动，称之为第二次西征。

三、陈玉成部太平军的进军

英王陈玉成是二次西征的积极倡议者和执行者。他于 1860 年 9 月下旬到苏州与忠王李秀成会商之后，即回天京，并于 30 日率部渡江北进，经定远炉桥，围寿州，攻六安，逼舒城，后会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部，于 11 月中旬进至桐城。

桐城是安庆的北面屏障，当曾国荃部于 7 月初进围安庆时，副都统多隆阿也率军围攻桐城。因此，陈玉成欲救安庆，必先扫除桐城外围之敌。陈玉成抵达桐城后，即在桐城西南之挂车河、望

---

①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 254，第 7 页。

② 王崇武译：《英国参赞巴夏礼报告在黄州访问英王陈玉成的经过》，《历史教学》1957 年第 4 期，第 34 页。

③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513 页。

鹤墩一带筑垒40余座，准备进击多隆阿部。12月5日，双方交战，不分胜负。10日，多隆阿、李续宜分别自挂车河、新安渡上下夹攻，并由都司雷正绾率步队、副都统温德勒克西率马队抄袭陈部后路。陈部遭敌围裹，40余营垒皆陷，死伤甚众，陈玉成率部北走庐江。次年1月初，陈玉成又派万余人自庐江南下攻枞阳，复被湘军水陆师击退。

1861年3月上旬，陈玉成率兵数万，自桐城绕道霍山、英山，于17日占湖北蕲水（今浠水），18日袭占黄州府。新授安徽巡抚李续宜自桐城外围青草塥率万余人上救，彭玉麟也率湘军水师上援。22日，陈玉成会见了英国参赞巴夏礼。① 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的商业利益，“劝告”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②

陈玉成因受巴夏礼的威吓，停止向武昌进军，除留赖文光驻守黄州外，主力北出，连占黄安（今红安）、黄陂、孝感、云梦、应城、德安、随州。4月下旬，陈玉成放弃进攻武昌的计划，经湖北广济、黄梅入安徽境，驰援安庆。

四、江南三支太平军的进军

太平军的主力部队于攻克苏、常之后，逐渐转移至西战场。杨辅清部于6月23日占领广德州，李世贤部于9月中旬入皖南，会

---

① 巴夏礼于2月间随英国海军司令贺布乘战船西上汉口，调查开埠事宜（中英天津条约规定汉口是通商口岸之一），事毕后东返，过黄州时上岸见英王陈玉成。

② 巴夏礼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我“劝告他（指陈玉成）不要计划攻汉口，因为无论叛军占据哪个我们设立租界的大商埠，没有不严重地损坏我们的商业的，因此他们的军事行动必须不与我们的商业活动相冲突。”“汉阳是彼此相关的武汉三镇之一，三镇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场……太平军夺取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难免不损坏整个大商港的贸易，因此，我奉告你们必须远离该埠。”（全文见《历史教学》1957年第4期。）

同杨辅清部于26日攻占宁国府城。接着，李世贤部于10月初自宁国南下，连占绩溪、徽州和休宁。

1860年10月初，李秀成因天王严诏屡颁，将苏福省的军民事务交与求天义陈坤书接任，亲自率队回天京受命。10月底，李秀成违抗洪秀全的命令，不走北岸，自天京出发后，经太平府、芜湖、繁昌、南陵、石埭，于12月初越羊栈岭入黟县，遭湘军鲍超、张运兰部的阻截。双方于黟县北之芦村、柏庄岭一带展开激战，太平军受挫，阵亡数百人。李秀成既受阻于黟县，乃改道徽州，过屯溪、婺源，折入浙江境，在常山过年。

1861年2月12日，李秀成率部入江西玉山，连攻广丰、广信府（今上饶市）不下，乃西南趋金溪，攻建昌、抚州又不下，旋向崇仁、宜黄、乐安，占新淦、樟树镇。19日，自吉水渡过赣江，占吉安府。复挥师北上，占奉新、瑞州（今高安）、武宁、义宁。6月上旬，分兵三路进入湖北境。以上各地的义民纷纷投效太平军（约30万），李秀成部兵力大增，号称50万。

当时，武昌城内旗、绿兵勇不满3000，即使其他各路太平军不会攻武昌，仅李秀成部也可能将其攻克。无奈，李秀成对“合取湖北”的西征计划本来就不积极，故当6月15日接到杰天义赖文光自黄州来信，得悉陈玉成早在两个月前已回师东救安庆，再加上他将自皖北增援武昌的鄂军成大吉部误为湘军精锐鲍超部，便决定撤出武昌外围，取道江西，东返浙江、江苏。

由于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部队先后放弃进攻武昌，而转战于皖南的李世贤、杨辅清两支部队，虽曾先后多次进逼曾国藩祁门大营，但没有统一的进攻计划，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结果既未能攻破祁门大营，又未能西上湖北，遂使江南江北合取武昌的西征计划全部落空，给正与围城湘军紧张对峙的安庆太平军增加了更为沉重的压力。

五、安庆会战

1861年4月，当陈玉成放弃进攻武昌，李秀成合取湖北误期，太平军二次西征计划行将落空时，天京当局即决意采取直接进攻安庆围敌的办法，以解安庆之围。4月下旬，陈玉成自湖北返回安徽，扎营集贤关内外；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也率兵自天京来援，扎营于桐城新安渡、横山铺至练潭一带。各路太平军集结安庆外围，准备向围城之湘军发动总攻。

面对太平军西援，曾国藩决心投入更大的兵力进行决战。他说：太平军“以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①。于是一场与太平天国命运攸关的安庆会战开始了（参见附图12）。

由于安庆形势紧张，曾国藩确定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就近指挥，同时自景德镇调鲍超部6000人赴江北。坐镇太湖的胡林翼也从湖北调成大吉部5000人速赴安庆。

对于陈玉成和洪仁玕、林绍璋两路援军，胡林翼提出了“南迟北速”的作战方针。他说：“打璋（林绍璋）、玕（洪仁玕）宜速，打狗（对陈玉成的诬称）宜迟、宜持重，（集贤）关内外无米粮，迫而蹙之，彼必求战，彼求战而我应之，必大捷。”②

4月29日，陈玉成率军到安庆城外东北郊之菱湖北岸，构筑营垒13座；安庆守将叶运来也于菱湖南岸筑垒5座，并用小船以通往来。曾国荃为了截断城内外太平军的联系，咨请水师提督杨载福将炮船开入菱湖。太平军的划船被截，城内外联系又告中断。为了对付湘军水师，陈玉成又在湖东筑垒，抵近湘军水师营盘，威胁出入菱湖的湘军水师船只。湘军水师一面抵御太平军的逼攻，一

---

① 曾国藩：《救援安庆及江皖军事布置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461页。

② 胡林翼：《致沅圃曾观察》，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41，第192页。

面抢筑营垒，与太平军相对峙。

5月3日，定南主将黄文金自芜湖率7000人来援，扎营于桐城东南之天林庄。6日，黄文金会同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及捻军一部，分兵两路，一路南趋，一路进攻挂车河清营。副都统多隆阿派游击蓝斯明率5营由高河铺出新安渡，派副都统金顺率马队出香铺街，阻扼太平军南进。双方发生激战，清军“马步并击，枪箭齐施”，太平军不得进，只得退回天林庄。进攻挂车河之太平军，也被协领穆图善、副将石吉清截回。黄文金等部为多隆阿所阻，无法与集贤关内陈玉成部相会合，决定撤出天林庄，退至孔城镇。

陈玉成部在菱湖一带与安庆城内之太平军夹攻曾国荃围师。曾国荃部在安庆城外掘壕两道，前壕围城，后壕拒援，并会同水师拼死抵抗。5月13日，陈玉成得知桐城太平军进援受挫，又闻湘军援军将至，乃于19日留菱湖13垒和集贤关外4垒与湘军相持，自率马步五六千人，由冷水铺（今凉亭）取道马踏石（今马石咀）赴桐城。多隆阿闻讯，即派温德勒克西等统带13营清兵，自磨山出发追击。太平军前临大敌，后隔溪河，处境十分不利，于是一面对敌进行反击，一面越水而走。负责断后的黄金爱部被多隆阿军伏兵拦杀，损失千余人。

陈玉成于5月20日抵达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共商对策。23日，陈玉成会同洪仁玕、林绍璋、黄文金以及捻军孙葵心部二三万人，拟分三路进攻挂车河之敌：陈玉成率5000人出挂车河之左，洪仁玕率7000人自江家桥由中路进攻，林绍璋、孙葵心等率万人由棋盘岭出挂车河之右。多隆阿根据俘供，得知了上述情报，便决定“乘其布置未定，先发制人”①，派出马队多起，分路设伏。24日黎明，太平军发起进攻，多隆阿亲率马步各营，分兵五队迎击。正酣战间，清军埋伏之马队从太平军后方冲出，焚烧营垒。太

① 胡林翼：《奏陈楚军剿退安庆援贼疏》，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46，第98页。

平军见后营被袭，阵脚遂乱，纷纷后退。清军乘势进击，太平军新筑营垒尽失，部队亦遭损失，陈玉成等即率队退回桐城。

陈玉成撤离集贤关后，湘军对太平军菱湖13垒，由曾国荃负责筑长壕围之；对关外4垒，则由鲍超部担任主攻，分兵四路，每路各攻一垒，并由成大吉部负责掩护，力求速决。

5月20日黎明，鲍超督饬所部，向赤冈岭发起进攻，遭到守垒的太平军顽强抗击。湘军速胜不能，只得改变战法，在赤冈岭四周修筑炮台，从6月2日开始，不断对太平军各垒实施轰击。6月8日，太平军第二、三、四垒被攻破，守将李仕福、朱孔堂以下千余人或战死或被俘，惟靖东主将刘玱琳所在的第一垒犹顽强抵抗。9日午夜，刘玱琳等冒死向北突围，因受阻于泛涨的溪水，大多被追兵擒杀，刘玱琳则被湘军俘获，“肢解”处死。

时太平军在菱湖北岸的13垒，与安庆城北门外的5垒，仍互为犄角，声气贯通。关外四垒被鲍超、成大吉部攻毁后，曾国荃派兵6营直逼安庆北门外，切断城内外太平军的联络和接济。7月7日，安庆城内外的太平军，出动数千人，进攻北门外新立之湘军营垒，结果被击败。当晚，菱湖北岸13垒之太平军纷纷从菱湖泅水入城。湘军陆师乘势发起进攻，北岸13垒大乱，太平军四五千人缴械投降，后全部被杀。不久，南5垒也被湘军攻破，又有千余太平军将士被杀，平西主将吴定彩率余部退入安庆城内。太平军菱湖南北之18垒瓦解后，安庆便成了一座孤城，解围的希望更加渺茫。

当鲍超、成大吉部攻陷集贤关外太平军赤冈岭四垒时，忠王李秀成部正自江西三路攻入湖北，威胁武昌。曾国藩、胡林翼急忙从安庆外围调军回救。6月9日，成大吉部回援湖北，22日，鲍超部往援江西，湖北巡抚胡林翼也于19日离太湖回武昌。这样一来，安庆周围的压力相对减轻。

陈玉成等援救安庆，连遭挫败，特别是赤冈岭刘玱琳等部被歼，使陈玉成部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援救安庆更感困难。在此情况下，天京又调辅王杨辅清自皖南宁国来援。8月初，杨辅清率部

自皖南渡江，经无为州西进，会合陈玉成部，绕道舒城、霍山、英山、宿松，攻太湖不下，取道小池驿、黄泥港、清河、三桥头、高楼岭，8 月 7 日至马鞍山，由南面威胁挂车河多隆阿营垒。与此同时，章王林绍璋、前军主将吴如孝率六七千人，自桐城西进攻多隆阿部；定南主将黄文金率五六千人，自吕亭驿绕至桐城以东之姬公庙、麻子岭一带，以为策应。对于林、吴军的进攻，多隆阿自率马队各营迎击，并派总兵雷正绾率队赴东路，迎击黄文金部。双方鏖战多时，太平军不支，退入桐城城内。

太平军进攻挂车河之敌失败后，转而直接进攻安庆围敌，以一部驻桐城牵制多隆阿部，以大部趋安庆攻湘军围师之背。

8 月 24 日，陈玉成、杨辅清部四五万人，陆续进入集贤关，在关口、茅岭、十里铺一带扎营四十余座，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也列队于西门一带遥遥相应。25、26 日，陈玉成、杨辅清督率太平军分十余路向曾国荃部之后壕发起进攻，轮番冲锋，西北方向进攻尤为激烈。曾国荃督率各营坚守营壕，待太平军逼近时，即以枪炮轰击，致使太平军将士死伤不少。8 月 27 日至 9 月 2 日间，太平军犹每夜都对敌营进行袭击，并在菱湖北岸建起十余座营垒。9 月 3 日夜，又发动猛烈的进攻，同时用小船运米入城，但全被湘军水师抢夺。安庆城中米粮枯竭，守军饥饿难忍，军心涣散，逃亡日增。

9 月 5 日凌晨，湘军于北城用炸药轰塌城墙，多路攻入城内，会合长江水师，南北夹击，滥肆屠杀。守城太平军全军覆没，叶芸来、吴定彩殉难，张朝爵"坐舟逃生"，不知所终。至此，太平军解救安庆的努力完全失败。

六、二次西征失败和安庆失陷的教训

安庆失守，标志着自 1860 年 9 月开始的太平军二次西征的最终失败。太平军在与清军长达一年的较量中最后招致失败，其主要教训有以下几点。

其一，1860年夏，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后，由于歼敌不多，进而组织东征苏、常的战役是必要的。但在敌军主帅先后毙命，江南大营清军大多投降、溃散的情况下，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没有及时调集各路主力对付西线节节东侵的湘军，而由洪仁玕、李秀成率部继续东进，进军上海、杭州，从而贻误了发动二次西征的时间，使湘军得以从容准备，扩充兵力，完成了围困安庆的部署，从而给尔后二次西征增加了严重困难。

其二，太平军二次西征所采取的方针，与二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之策相似。但此时清方对江南大营之败记忆犹新，特别是老奸巨猾的曾国藩一眼就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他说：“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围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对陈玉成的诬称）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① 二次西征的方针，确如曾国藩所说，是“抄写前文”，简单重复二破江南大营的一套战法，未能根据新的情况，制订出新的行动方针，因此在作战指挥上不是胜敌一筹，而是逊敌一筹。这就注定不可能取得像二破江南大营那样的胜利成果。还应指出，虽然曾国藩不管武昌能守与否，决不撤安庆之围，但如南北两路太平军均按计划攻克武昌，肯定可以调动安庆外围部分敌军回救，从而有利于解救安庆之困。无奈陈、李两支主力又未能坚决执行既定方针，先后撤离武昌外围，致使调动安庆围敌的计划全部落空，剩下的只有强攻安庆围敌一途了。

其三，二次西征之所以失败，还在于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这时，清廷将大江南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实行统一指挥。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之间，经常交换情报，协同作战，江南与江北，湖

① 曾国藩：《致沅弟季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51页。

北与安徽，清军配合得较为密切。而太平军内部的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却在迅速发展。一方面，天京当局对各路将领未能实施及时的指导，南北战场不能协同配合。另一方面，各路将领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即使在江南战场，对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各支太平军，也没有指定前敌统帅，各部队自由行动，互不协同，以致丧失了攻取曾国藩祁门大营的良机。在江北战场，后期集中了较多的部队，也都各自为战，如林绍璋部与陈玉成部不能协调行动，“酌议军机，反复无定，将官不能用命”，“一战未开，即行自退”，“轻举妄动，自惑军心”。① 这样一支既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又缺乏整体观念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实施统一指挥的敌军的。

其四，太平军于 1861 年 5 月和 8 月间，对阻援和围城的敌军进行过两次大的进攻，结果都未能得手。究其原因，就湘军方面而言，它早已深沟高垒，并规定了一套稳扎稳打的战法，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太平军方面，由于安庆被围日久，陈玉成等救援心切，采取了不适当的速战之法。太湖、潜山未下，就攻桐城挂车河之敌，桐城外围之敌未除，又直接进攻安庆围敌，结果徒耗兵力，一处也未能攻下。另外，太平军没有稳固的后方，粮源没有保障，因而不能持久作战。而湘军正看准了这一点，“深沟高垒，姑作如不欲战之状”，“待其逼近求战，而后从容应之”②，即通过严密围困、持久坚守、伺机反击，挫败急于解围的太平军。即使如此，太平军的领导者如能凭借优势兵力，逐次围歼安庆外围之敌，先下潜山、太湖，再歼挂车河阻援之敌，或可打乱敌军的围攻部署。但是陈玉成等迫不及待，多次直接进攻安庆围敌，由于不能得手，只好转入筑垒自守，结果援军屡屡被歼，安庆守军也终因弹尽粮绝而城陷军亡。以解救安庆为目标的二次西征，也随

---

① 《英王陈玉成望章王林绍璋仍照前议万勿移营书》，《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249～250 页。

② 胡林翼：《复多都护》，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 41，第 193 页。

之宣告彻底失败。

第八节　天京保卫战

一、安庆失守后的西线军事形势

湘军攻占安庆，便基本控制了天京上游，取得了沿江东下的主动地位。1861 年 9 月 11 日，曾国藩进驻安庆，筹划以金陵为主要进攻目标的围歼太平军的准备事项。

10 月初，安庆湘军陆师在水师配合下，沿江东下，先后攻陷了池州、铜陵、无为，以及运漕、东关等要地。由于兵力不足，遂暂停进军。

对进军金陵，曾国藩采取了“欲拔本根，先剪枝叶”的稳妥方针。他在奏折中申述其理由说：“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老无功而复退，何如先清后路、脚根已稳而后进。”①为此，在 1861 年冬，命曾国荃回湖南招募湘军，命李鸿章于皖北招募淮勇，休整扩充部队，调整部署，为进兵金陵进行充分准备。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此危险面前完全束手无策。在从安庆失守到湘军全线东犯的半年多时间内，听任湘军从容准备而毫无作为。

在江北，陈玉成部自安庆失守之后，即退守庐州。桐城、舒城、庐江迅速陷入敌手。由于安庆失守，陈玉成遭到了革职处分，从此“心繁（烦）意乱”，“坐守庐城”②。为了“广招兵马，早复皖省”③，他派出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祜王蓝

---

① 曾国藩：《遵旨统筹全局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 2072 页。

②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521 页。

③ 《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558 页。

成春等率部远征河南、陕西，使皖北本已不多的兵力更形单薄。

陈得才等远征军派出不久，荆州将军多隆阿即会同钦差大臣袁甲三等围攻庐州。在此情况下，陈玉成于2月23日连连发出书信，约请陈得才、马融和以及捻军首领张乐行等与他“面议进取之机”。可是，这时陈得才等已入河南，张乐行、马融和等正在围攻颍州（今阜阳），特别是所发之信全部被清军截获，未能到达上述各将领手中，以致无兵回救庐州。

陈玉成因粮食渐罄，便于5月13日放弃庐州，北走寿州，打算依靠苗沛霖再作良图。苗沛霖原是安徽凤台县的一个落第秀才，太平军兴以后，受清政府命督办团练，一方面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另一方面为逃避繁重的赋税，又常常对抗清朝地方政府。清政府对他虽很不满，但为了拉拢这支地方势力，又给他封官升爵，致使其兵力不断发展，号称数十万众。1861年初，苗因与官绅不睦，10月攻破寿州城，声势大盛。这时，太平军失安庆，处境困难，乃派人与苗联络，并封其为奏王。苗假意表示愿与太平军、捻军合作，但私下却与清方仍有来往，并于1862年3月被钦差大臣胜保所招抚。及至庐州被困，苗沛霖即派人佯请陈玉成弃庐州去寿州，共同进攻开封。陈玉成为其所惑，不顾部属的劝阻，径赴寿州，结果被苗诱捕，并解往胜保军营，6月4日在河南延津被害，年仅26岁。陈玉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之一，他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使敌人为之胆寒。他的牺牲和庐州的失陷，遂使太平天国的西部防线完全瓦解。

二、太平军第二次攻上海和东线军事形势

在江南，太平军另一主力李秀成部于1861年7月中旬从湖北全线后撤，经江西义宁、武宁、瑞州、临江，于8月中旬在樟树镇附近渡过赣江，进围抚州。由于李秀成回军江西，曾国藩调鲍超部7000人自皖北宿松援赣，在丰城渡过赣江，直逼抚州。9月8日，李秀成撤抚州围东走，16日在铅山河口镇一带会合自广西

石达开部分离出来的天将汪海洋、孝天豫朱衣点、观天燕童容海部及天地会众约20万人，带着号称70万的大军东走浙江。

李秀成进入浙江后，10月5日围衢州府不下，11日撤围东走，过兰溪北上严州，与同年5月即入浙活动的侍王李世贤会晤后，由李世贤部攻温州、台州、处州和宁波，自率大军连占新城、临安、余杭，进逼杭州。与此同时，分遣陆顺德及李容发（李秀成之子）、李容椿（李秀成之侄）及吉文元等分别进攻杭州外围各据点，连克萧山、绍兴。

李世贤部自严州分兵之后，乘势向浙东发展，连占嵊县、新昌、上虞、天台、奉化、慈溪、镇海、仙居、台州、黄岩、太平等府县，对宁波形成包围之势。宁波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的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太平军进逼宁波，引起英、法等外国人的注视，他们多方进行干预与阻挠。12月9日，太平军分南北两路向宁波推进，由于守城清军纷纷溃逃，故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宁波府城。

当李世贤部进军浙东时，李秀成部则于10月20日占领余杭，进逼杭州。11月4日，李秀成督同陈炳文、童容海攻占城外之馒头山，连破望江、候潮、凤山各门外清军营盘，合围杭州城。12月10日，武林、钱塘、清波门外的各营清军投降。29日，太平军各部缘梯入城，占领杭州。

这时摆在太平天国领袖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就是集中力量，阻止并粉碎湘军的东犯，以挽救危局。可是，太平天国最高当局非但没有采取对付湘军的军事措施，反而赞同李秀成再次进攻上海，将几十万有用之兵，用之于对改变当时严酷的军事态势并无重大意义的上海，在东线开辟第二战场。这样，不仅于西线的军事毫无补益，而且对整个战局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

在攻克杭州8天之后，即1862年（同治元年）1月7日，李秀成即率谭绍光、郜永宽、李容发等部向上海进军。与此同时，原驻苏州一带的太平军也在刘肇均率领下，经嘉定进逼宝山、吴淞。截止1月20日，各路太平军分别占领了青浦、奉贤、南汇、川沙，

西路前锋抵达宝山县之吴淞镇一带，东路前锋抵达吴淞口南岸之高桥镇，基本上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

对清廷来说，上海的经济意义大于军事意义。清廷认为，“该城僻处一隅，于用兵固为绝地，而海关为饷源所出，自应亟筹保护”①。当时，上海由江苏巡抚薛焕统带 4 万兵勇驻防，但多系从苏南败退的残兵败将，战斗力不强，无力守卫上海。因此，清廷寄希望于英法军队和雇佣军洋枪队，命令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声称“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② 这时，上海有英军 2500 人、法军 900 人，另有雇佣军（华尔的洋枪队）1200 人。2 月 15 日，英法军根据与清方的协议开始布防，确定由英军防守英美租界，法军防守法租界和上海县城。

1862 年 2 月中旬，英法公然以太平军进军上海，影响租界的供应和贸易为借口，撕破“中立”假面具，明目张胆地与清军相勾结，向太平军发起进攻，首先企图肃清距上海百里之内的太平军据点。这样，就使太平天国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形势更趋严峻。

三、湘军对天京的战略合围

1862 年春，湘军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遂分兵 8 路，开始对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军占领区发起向心攻击。这 8 路敌军由北而南分别是：安徽巡抚李续宜自湖北进驻六安，督率提督成大吉、总兵萧庆衍部自河南固始进攻安徽颍州，以图控制皖北；荆州将军多隆阿部进攻庐州；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 2 万人沿长江北岸东进；同知曾贞干率 5000 人由池州、铜陵攻芜湖；兵部侍郎彭玉麟率水师顺江东下，配合两岸陆师的进攻；提督鲍超部由江西入皖南，经

①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 294，第 9 页。

②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 287，第 5 页。

青阳攻宁国（今宣城）；浙江巡抚左宗棠部由江西攻浙江；道员张运兰部则固守徽州，并作为“游击之师”；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6500人于5月初抵上海，会同英法侵略军和洋枪队进攻上海周围的太平军，尔后西进。

分布于西线各地的太平军，在湘军的全面进攻下，节节后退。截止5月底，北路的庐州及长江两岸的巢县、含山、和州、繁昌、南陵等地相继陷入敌手；皖南的青阳、石埭、太平、泾县也被鲍超部攻占，宁国受到威胁；浙西的江山、遂安被左宗棠军攻陷。

5月18日，曾国荃率15营自西梁山渡江，会同水师和曾贞干部攻占当涂、芜湖，26日进驻江宁镇板桥，旋占秣陵关、大胜关、三汊河。30日，彭玉麟督水师8营占头关、江心洲、蒲包洲，进泊金陵护城河。曾国荃督陆师直逼雨花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已处于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四、十三王回救天京

曾国荃率湘军迅速进抵天京城下，使洪秀全等颇感意外，大为惊恐，因为他们“从未准备彼等能突如其来如是之速”①。于是一日三道诏旨命李秀成回援。李秀成只得撤松江之围，回到苏州，召集各将领商讨回救天京之策。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此次湘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水路难以抵敌；近来湘军常胜，其势正锐，立即迎战不利。于是决定：暂不起兵回救，等24个月之后，其兵久而懈怠之时，再与其决战。② 同时，李秀成派遣其弟李成明率兵一部回天京加强防务，并从苏州将米粮、军火解送天京，以利固守。

1862年7月，天京周围的形势更趋严重。11日，西南屏障宁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6页。

② 参见《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4页。

国府城为鲍超部攻陷。16日，保王童容海于袭取广德后宣布降清①。洪秀全遣使严催李秀成迅速回救天京，并进行严责："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② 李秀成在洪秀全严诏催逼之下，于8月6日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回援天京，其兵力部署为：由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等攻宁国府城，牵制敌援；护王陈坤书等攻金柱关，威胁敌粮道，阻敌增援；李秀成将苏、杭军务分别交由谭绍光、陈炳文负责，于9月14日率部由苏州动身，经宜兴、溧阳回援天京，专攻曾国荃围师。

这次回救天京的共有十三王，总兵力约二十万，在东坝会齐之后，分路进扎方山、板桥一线。大战于10月13日开始，李秀成援军与天京城内太平军相配合，连日对曾国荃湘军之东西两翼发起猛攻。曾军坚壁固守，俟太平军攻近，突以排炮轰之；太平军则闻炮即伏，炮声绝而杀声又起，日夜进攻不休。

10月15日，西路太平军数千人冲上江心洲，抄敌营后路，拟截断敌之运道。曾国荃令连夜构筑十余垒，与太平军对峙于洲上，确保运道畅通。

18～21日，东路太平军集中洋枪洋炮猛攻，湘军固守营垒，抛掷火球，死命抵拒。22日，太平军"负片板蛇行而进，直薄副后诸营。濠外开花蹦炮横飞入营，烽燧蔽天，流星匝地"，"束草填濠，岌岌欲上"。③ 曾国荃见势危急，亲自督战死拒，被飞子击伤左颊。

23日，侍王李世贤率援军赶到，加强了东路太平军的攻势。太

---

① 童容海本石达开部将，1861年脱离石部"万里回朝"，于江西铅山归隶李秀成。1862年初，童擅杀统将，复与杨辅清有隙，遂向鲍超洽降。因遭部将反对，最后只带走万余人。

②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4～525页。

③ 曾国藩：《缕陈金陵鏖战四十六日得解重围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五》，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779页。

平军“用箱箧实土于中，排砌壕边，明防炮子于上，暗凿地道于下”[1]。湘军则以火箭喷射，或挑“锐卒”突出反击，以破坏太平军挖掘地道。与此同时，湘军发现太平军西线营阵散漫，遂于27日实施三路反击。太平军猝不及防，被毁营垒12座，兵员伤亡不少。

正当东路太平军猛攻、湘军十分吃紧之际，驻防扬州的钦差大臣都兴阿派来的5营援军、驻防芜湖的湘军王可升派出的3营援军，以及曾国藩自安庆派出的400名援军，于28日前后赶到，使湘军的力量得到了加强。11月3日，太平军在雨花台曾国荃大营附近新掘地道数处轰发，太平军乘势冲杀，纷纷冲入缺口。但湘军早有准备，等尘土落毕，即从营中冲出，并力抢堵。如此往返冲杀达五六次之多，太平军终不得入。

11月4日，西路太平军决长江之水，淹湘军通道，企图断敌粮运。湘军水师出动舢板，驻守双闸，与陆军相配合，保护运道畅通。东路太平军则继续挖掘地道，向敌进攻。曾国荃以迎挖的办法进行破坏，地道挖穿之后，或熏以毒烟，或灌以秽水，或以木桩堵洞口，使太平军的地道战连连失效。

10月下旬，杨辅清、黄文金所部开始进攻宁国府之敌，并于28日克宁国县，牵制了鲍超部湘军，但未能予以重创。与此同时，陈坤书部也积极进攻金柱关，但于11月上旬为彭玉麟、杨岳斌（即杨载福）的水师所败，不久即撤出太平府境。

11月21日，湘军又从芜湖调到两营部队，加强金陵外围湘军。曾国荃以兵力稍厚，便从西路再次反击，击败太平军，直追至板桥、牛首山一带。东路太平军见西路溃退，一部退至秣陵关，另部则自城东撤回天京。李秀成等围攻曾国荃雨花台营垒，历时46日而未能攻下，回救天京的作战遂告失败。

曾国荃所部湘军直逼天京城下，显系孤军深入。当时，鲍超

---

① 曾国藩：《缕陈金陵鏖战四十六日得解重围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五》，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780页。

部被阻于宁国，左宗棠部远在浙江，多隆阿部为对付入陕的太平军，正调赴陕西途中，对曾国荃部都不可能起到直接支援的作用。对此，曾国藩也曾忧心忡忡地说："陆路孤军深入，旁近无劲旅援应，颇为可虑。"① 再加当时湘军中疫病流行，曾国荃营中死亡三成，久病不愈者四五成，能出阵打仗的仅二三成。这对太平军来说，确是歼敌的好机会。如果太平军早有戒备，不待湘军站稳脚跟，即予以打击，全歼或重创此股顽敌是有很大可能的。但由于天京当局事先没有准备，一直等到湘军抵达雨花台后，才从各地调兵，及至各路援兵赶来，已经过了4个月，而这时曾国荃部已深沟高垒，以逸待劳。

李秀成带领十三王20万人回援天京，在兵力对比上占压倒优势。就兵器而言，曾国荃说：太平军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二万杆。"② 其言未免有些夸张，但太平军的火器优于湘军则是无疑的。所不足者，湘军拥有水师，能控制长江水道，而太平军则无奈其何。整个而言，太平军的有利因素多于湘军，但太平军为何久攻不克呢？李秀成说：湘军壕深垒坚，木桩迭迭层层，且营规分明，是以攻数十日而未能成功。又说：亦因九十月天冷，未带冬衣，兵又无粮，故未能成事。③ 这些客观原因，固然给太平军带来了不利影响，但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李秀成根据一破、二破江南大营的老经验，不想马上进攻天京城外的湘军，打算待其师老兵疲而后击之，这就贻误了回救天京的时机；后当洪秀全严诏屡颁，李秀成被迫起兵回救时，又未能审察敌势，采取正确的战法，而是一到天京外围，就连日轮番进攻，企图速胜，结果碰了不少硬钉子，造成许

---

① 曾国藩：《近日李鸿章杨载福曾国荃鲍超各路军情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2371页。

② 曾国荃：《致郭崑焘书》，见《八贤手札》，世界书局影印本，第248～249页。

③ 参见《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6页。

多伤亡。其次，太平军攻击的主要方向选择不当。曾国荃湘军立营于江边至雨花台之间的狭长地带，其西面是水师与陆军的接合部，也是粮运孔道，李秀成如能将主要攻击方向放在西路，首先切断敌水路与陆路的联系，有可能将其击破。但李秀成却把主攻方向放在东路，虽在西路也曾发起过一二次进攻，终因兵力不足，攻势不猛，未予敌以沉重的打击，反而一再为敌所败。加之护王陈坤书在芜湖方向阻援不力，致使曾国荃能不断得到兵力和物资的增援，这也给进攻增添了困难。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太平军解围天京未获成功，又一次丧失了扭转颓势的机会，致使战局越来越不利。

五、“进北救南”战略佯动的落空

由于李秀成未能解天京之围，洪秀全对他进行“严责革爵”，并要他“进兵北行”。

洪秀全之所以令李秀成北进，是企图“接陈得才之军，收平北岸”①。另据曾国藩缴获的太平军的文件中透露：太平军打算过江之后，由舒城、六安趋英山、霍山、麻城、宋埠，然后分兵，一出黄州，一出汉口，调动南岸湘军北援，下游之兵上援，以解金陵之围。② 受曾国藩宠信的赵烈文分析太平军“进北”的企图是：“以扯动南岸官兵，使南岸之贼进攻得以顺手，谓之‘进北攻南’。”③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太平军的基本指导思想，仍是“围魏救赵”之计。但这时的形势既与1860年二破江南大营时大异，也与第二次西征时不同，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是不会轻为所动的。

---

①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8页。

② 参见曾国藩：《汇报近日各路军情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89年版（下同），第3222页。

③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268页。

李秀成先派章王林绍璋、对王洪春元、纳王部永宽及忠二殿下李容发（士贵）于1862年12月1日率领数万人先行。8日，林绍璋等率部自天京下关渡至九洑洲，一面围攻提督李世忠（即叛将李昭寿）大营，一面连夜冲过浦口、江浦西行，18日占安徽含山，19日占巢县，21日占和州，又连占铜城闸、运漕镇和东关等要地，并在此等待主帅李秀成的后续部队的到来。正在这时，苏南局势不稳，常熟守将正酝酿叛变。李秀成赶回苏州料理军务，直到1863年2月22日才自常熟西返，因此耽误了北进的时日。

曾国藩为了阻截太平军西进，从芜湖调总兵李昭庆5营渡江进援无为，并从安徽霍邱、河南固始调提督萧庆衍8营、毛有铭7营取道舒城，开赴无为。1863年1月28日，萧庆衍攻陷运漕镇，与太平军相持于运漕河一线。

1863年2月27日，忠王李秀成、护王陈坤书、顾王吴如孝等率第二批部队数万人渡江。陈坤书等绕江浦西进和州、含山。吴如孝部则进攻李世忠大营，并于3月22日占浦口，4月3日占江浦，以确保天京与江北之间的通道。

3月31日，李秀成进抵巢县，准备取道无为州西进。但三个多月来曾国藩已从各地调集了万余湘军，加强了这一带的兵力。4月19日起，太平军围攻盘踞石涧埠的毛有铭、刘连捷部，数日未下。5月4日，便撤围西上，先后进攻庐江、舒城、六安城，均未得手。19日，李秀成撤六安围，经寿州境东返，于6月2日入天长县境。皖北广大地区，本是鱼米之乡，但由于多年战乱，已呈一片荒凉景象，太平军无法获取粮食，一路上以野草充饥，官兵饿死不少。

天京当局在命李秀成北进的同时，又命江南的太平军三路西进：襄王刘官芳等由徽州宁国出发，奉王古隆贤等自太平、祁门出发，堵王黄文金等自青阳、石埭出发，分头并进，以与北进的李秀成部互相策应。应该说，太平军在此时决定以主力威胁湘军后路，对解天京之围是有利的。可惜，由皖南西进的太平军对敌军打击不狠，威胁不大，致使曾国藩仍得以从皖南抽兵至皖北，对

付李秀成部。加上李秀成进至六安之后，遇难即退，半途折回。这样，就使曾国藩松了一口气，他于得悉这一消息之后说，太平军“悉数东趋，并未西犯鄂疆，即属大局之幸”①。

正当李秀成自六安折回天长之际，留守和州、含山、巢县一带的对王洪春元部，抵挡不住湘军的水陆合击，于6月上旬退守江浦、浦口。

李秀成部自六安折返天长后，纷传将回援苏州。正准备围攻苏州的江苏巡抚李鸿章乃函商曾国荃，促其力攻上游，以牵制李秀成部。曾国荃则认为：李秀成回援苏州固属可忧，但直犯里下河尤为可虑，于是决定猛攻天京，以使李秀成既不能回援苏州，又不能东下里下河地区。

6月13日，曾国荃部攻占了雨花台及聚宝门（今中华门）外各石垒。果然，洪秀全惊慌起来，马上差官捧诏到天长，召李秀成速回天京。李秀成离天长后经六合趋浦口，于20日由九洑洲南渡，回到天京。随征的太平军在九洑洲炮台的掩护下，冒着清军的炮火逐日南渡，在江中被击毙不少。统计12天中，共渡过官兵1.5万余人。25日，湘军攻陷浦口、江浦，30日陷九洑洲，太平军又损失2万多人。至此，长江北岸全为清军所占。

李秀成率领北渡的太平军，是当时太平军中的精锐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进北攻南”的计划未能实现，非但没有达到解救天京的目的，反而损失将士数万人，使太平军的实力遭到进一步削弱，解救天京的希望也就更加渺茫。

六、苏南战场节节失利

当李秀成率太平军进军江北之际，江苏巡抚李鸿章即督率淮

① 曾国藩：《近日大江南北防剿忠酋苗党军情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六》，第3242页。

军，在“常胜军”（由“洋枪队”改称）的配合下，于1863年5月20日攻占太仓，6月1日占昆山，并准备进攻太平天国苏福省之首府苏州。李鸿章分析：苏、常为金陵根本，物产丰富，太平军必死守力争；江南水多，进攻不易；加之自身的兵力仅四万余人，且分布于自常熟至金山卫绵延数百里地区之内。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决定采取“规取远势，以翦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①的方针，并于7月初拟定了三路进攻的计划：中路从昆山直趋苏州，由总兵程学启部担任；北路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由同知李鹤章、总兵刘铭传部担任；南路经泖淀湖攻吴江、平望入太湖，切断浙江太平军的支援，由总兵李朝斌率太湖水师担任。另外，提督黄翼升率淮扬水师往来策应，“常胜军”则在昆山专备各路后援。

7月上旬，北路淮军李鹤章、刘铭传部分三路进攻江阴，太平军护王陈坤书部在江阴、常熟之交的顾山、北涸、长泾一带节节阻击。8月下旬，淮军进抵江阴城下，9月13日攻占该城。

7月24日，中路程学启部开始向吴江进攻，29日进抵吴江城下，太平军守将开门出降。吴江失陷，苏州的南路援绝。

北路淮军既得江阴，刘铭传驻扎青阳镇，乃派副将周盛波部进扎无锡以北之芙蓉山，总兵郭松林部进扎无锡东北之堠山（吼山），道员张树声部进扎张泾桥以为后援，准备集中力量攻取无锡，以配合中路、南路军合击苏州。9月24日，郭松林部进占无锡东北之东亭镇，前锋抵达无锡南门外。

由于苏南形势日益恶化，经李秀成再三恳请，洪秀全允许其离天京赴苏州，但限40日回京。9月23日，李秀成抵苏州，调集纳王部永宽等部，进驻苏州、无锡交界处，以确保苏州后路畅通，并与无锡郊外的侍王李世贤部连成一片。自10月底至11月初旬，李秀成率部连日向围攻无锡的刘铭传等淮军发起进攻，交战于大桥角、后宅、梅村、坊前、安镇一带。面对太平军的进攻，淮军

---

①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346，第17页。

“先以坚壁勿战挫其气，继以滚营并进扼其锋”①。李秀成部在向淮军进攻时，曾写信给常州守将陈坤书、无锡守将黄子隆，约他们率部前来会战，但陈、黄均未发兵，从而使淮军得以“稳扎稳进”地对付太平军。而围攻苏州的淮军，则由浒墅关一带从侧后袭击李秀成部，使其不能集中力量进攻围困无锡之敌。因此，李秀成部非但未能击败苏州、无锡外围之敌，反而损失不少兵力，苏州解围就更加困难了。

苏州城四面环水，太平军凭河修筑长墙，枪眼炮台层层密布，长墙之内又筑石垒、土营数十座，南自盘门，北至娄门，联络一气；城内又穴地为屋，其上覆板堆土，以御炮击，设防相当坚固严密。因此，程学启淮军及戈登“常胜军”攻城两月，进展甚微。11 月 26 日，程学启、戈登在护城河上偷架浮桥，调集炸炮，水陆配合，越河齐进。经过激战，城外南、东、西三面的防御工事全被攻破，淮军直薄城下。李秀成见苏州城危，于 11 月 30 日撤离。面对敌军的围攻，慕王谭绍光坚守危城，毫不动摇。但纳王部永宽等发生动摇，私下与敌议降。淮军以擒李秀成或斩谭绍光为条件。12 月 4 日，纳王部永宽、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宁王周文佳以及天将汪有为等 8 人将慕王谭绍光杀害，携首级开城降清。苏州城遂为淮军占领。3 天之后，这 8 员叛将也都被李鸿章杀死。

12 月 12 日，无锡失守，潮王黄子隆被俘，不久被杀。淮军攻陷苏州、无锡后，分兵两路：一路进窥浙江嘉兴，一路准备进攻常州。

12 月 15 日，李鸿章到达无锡，对进攻常州作了部署，决定由东北、东南两个方向向常州进逼。19 日，提督刘铭传率部抵常州西北之郑陆桥、羊头桥、西施桥，前锋直抵孙村，与常州城仅一河之隔；与此同时，总兵周盛波、张树声率部从无锡出发，经戚墅堰进抵常州城东 15 里之播鼓桥、白家桥，前锋抵三里桥一带。至此，常州城之南、东、北三面已被淮军包围，仅西门可与外界

①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 355，第 27 页。

相通。不久，常州西北奔牛镇的太平军守将邵志纶投敌，西路交通也受到很大威胁。尽管淮军重兵围攻，但太平军在常州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坚守达四个多月之久。

1864年2月初，戈登的“常胜军”自昆山出发，经无锡攻宜兴，以截断浙江太平军的援路。3月2日宜兴失守，8日溧阳守将降敌，常州南路被敌截断。

3月8日，护王陈坤书曾会合自句容、丹阳来援之章王林绍璋、英王叔陈承琦等部，对奔牛镇之敌进行反击，结果作战失利。英王叔陈承琦、忠二殿下李士贵等乃率部自常州循江东进，深入敌后。这支太平军经武进之夏港、青山、江阴之南闸，占领周庄、华墅、杨舍等地，7日攻常熟，18日占福山，20日攻无锡。李鸿章大为震动，不得不从金坛前线急调提督郭松林部和“常胜军”回救，并从常州外围调李鹤章回守无锡，调张树声等率3000人驻扎江阴之青阳，从嘉兴前线调郑国魁水陆3营驰援常熟。

3月下旬，清援军赶到常熟外围的顾山、王庄一带，与太平军激战。太平军被迫撤常熟之围，退回江阴境内。31日，陈承琦部于江阴华墅袭击回援的“常胜军”，歼敌800余名，缴获洋枪400余枝，迫使其逃往无锡。

4月11日，李鸿章督率各路援军对华墅太平军进行反扑，太平军予敌以重大杀伤后退回常州、丹阳。

淮军于肃清深入江阴、常熟、无锡境内的太平军之后，又聚集于常州外围，全力攻城。4月19日，淮军攻占了常州以西的新闸，22日又水陆协同攻取了常州西南的陈渡桥，切断了太平军西通金坛、丹阳之路。23日，常州城外的要点尽失，太平军全部退入城内。李鸿章当即分派各将从四面向常州城进行攻击。27日，大南门、小南门和北门城墙被淮军轰塌数处，太平军顽强抵抗，城墙随塌随堵，多次击退淮军的攻扑。后淮军在城壕之外构筑长墙，移近炮位，并在晚间于护城河上暗搭浮桥。5月10日，淮军发起总攻，以大炮对准旧缺口猛烈轰击，南城、北城各被轰塌十余丈，淮军纷纷由缺口冲入。太平军与突入之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淮军

付出了重大代价于11日攻占了常州城。护王陈坤书被俘，后遭杀害。

4月25日，提督鲍超部陷金坛。5月13日，提督冯子材部陷丹阳。至此，苏南各城全部被清军攻陷。

七、浙江战场的失利

当各路湘军节节东犯、曾国荃部兵临天京城下时，镇守浙江的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等部，也受到来自东、西、北三面敌军的夹击：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部于1862年2月由江西进入浙江，5月31日入驻衢州，并进至龙游、汤溪、兰溪、寿昌一线，威胁金华。与此同时，浙东清军勾结英、法侵略军于5月10日攻陷宁波。8月2日，洋将马惇率"常胜军"一队自上海到宁波，会同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训练之"常捷军"进犯余姚，威胁绍兴。9月，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对敌发起反击，进占慈溪，威胁宁波；"常胜军"统领华尔奉李鸿章之命，率1000人赴宁波，于21日占慈溪。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伤丧命。

1862年6月，李世贤部在龙游、汤溪、兰溪一线，对左宗棠所部湘军开始了顽强阻击。9月，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率湘军万人由广西到浙江，增强了左宗棠的兵力。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曾国荃部围困天京，李世贤奉命回援，留浙的太平军兵力减少。于是，左宗棠乘机对浙西太平军发起新的攻势，10月5日陷寿昌，1863年1月2日陷严州（今建德东），2月28日陷汤溪，3月1日陷龙游、兰溪。3月2日，太平军弃守金华。接着，旬日之间，湘军连陷武义、永康、东阳、义乌、诸暨、桐庐。3月24日，兵锋直抵杭州西南之富阳。与此同时，浙东的中外反动联军也于3月15日占领绍兴，20日占萧山，前锋直薄杭州城下。

富阳是湘军进攻杭州必经之地。3月下旬，蒋益澧部开始进攻富阳，屡为太平军守将汪海洋部所败，直至9月20日，才在"常捷军"协同下攻占了该城。

湘军既占富阳，便沿钱塘江直逼余杭和省城杭州。余杭是杭州太平军的后路通道，湘军只有攻占余杭，才能切断太平军援路，合围杭州。因此，双方在余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2月20日，左宗棠亲临督攻，也无济于事。

1863年10月7日，蒋益澧部湘军抵达杭州凤山、清波门外，开始对杭州的进攻。太平军凭借预筑的垒卡，频频抗击。

这时，淮军于攻下苏州、无锡之后，分兵一支南入浙江，进窥嘉兴，从而使浙江太平军的作战更加困难。接着，杭州外围的乍浦、澉浦、海盐、海宁、桐乡等地的太平军守将纷纷叛变投敌。1864年3月25日，杭州东北的重镇嘉兴失守，给坚守杭州的太平军以极为不利的影响。

3月28日，湘军在"常捷军"的配合下，对杭州发起猛攻，"常捷军"用大炮轰塌凤山门城垛3丈余，清军乘势涌入，被太平军全部逐出。30日，敌军向武林、钱塘、凤山、望江、清泰等门发起猛攻。太平军予敌以重大杀伤后，由听王陈炳文等率领撤出杭州，北走德清。同日，康王汪海洋也弃余杭北走。杭州、余杭遂陷。

4月14日，侍王李世贤以及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戴王黄呈忠、来王陆顺德等，自德清抵浙西昌化，拟入皖南。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等留守湖州。至此，浙江全省基本上为清军攻占。

八、湘军攻陷天京

1863年6月，杨岳斌、彭玉麟率湘军水师会同鲍超部陆师攻占了下关、九洑洲、七里洲、燕子矶。鲍超部过江后，扎营神策门（和平门）外，切断了天京北路通道。9月，曾国荃部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11月初，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中和桥、双桥门、七桥瓮、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以及秣陵关，天京城"东南八隘"全部失守。中旬，湘军又攻占了淳

化、解溪、龙都、湖熟、三岔镇以及天京东南重镇高淳、东坝；溧水太平军举城降清。至此，天京城东南百里内无太平军。

11 月 25 日，曾国荃督军进扎城东孝陵卫。这时，天京 13 门仅有太平门、神策门尚可与外界相通。

12 月 4 日苏州失守后，李秀成于 12 月 20 日由太平门入城，第二天上殿启奏天王洪秀全：京城不能保守，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我内无粮草，外救难来，不如“让城别走”。对于李秀成的奏谏，洪秀全非但不加采纳，反而予以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具（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与（于）水，何具（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尊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①当时，天京尚未被合围，摆在洪秀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或者死守天京，与孤城共存亡；或者让城别走，摆脱被围困境，收集各支太平军，另谋出路。应该说，这两种选择中，后者才是太平军的唯一出路。因为，当时散布在各地的太平军尚有几十万，在洪秀全号召下，把他们集中起来，经过一番整顿，实行灵活机动的战法，是有可能打出一个新局面来的。可是，由于洪秀全迷信愚昧、刚愎自负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程度，武断地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致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丧失了最后的一线生机。

1864 年 2 月 28 日，湘军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3 月 2 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合围天京，实行水陆严密封锁，不让粒米入城。天京水陆交通断绝，城内米粮日缺，饥民日增，嗷嗷待哺。洪秀全诏令全城臣民俱食“甘露”②，并说此物可以养生。

---

①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527～528 页。

② 甘露，也叫“甜露”，是基督教所称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据李秀成说，洪秀全将其宫中地上所长百草之类，制成一团，名为“甘露”或“甜露”，送出宫来，要合朝遵行备食。

5月中旬，天王洪秀全患病，6月1日逝世，终年51岁。此后，天京人心愈加不安。5天之后，全朝文武扶幼主洪天贵福即位，一切军政事务统归忠王李秀成执掌。

湘军合围金陵之后，于3月14日用云梯攻城，未能得手。4月，在朝阳、神策、金川门外挖地道30余穴，准备轰塌城墙。太平军一面从城内对挖，进行破坏，一面附城构筑月城，以备一旦敌人轰塌城墙后继续组织抵抗。

7月3日，湘军攻占紫金山龙脖子旁的地保城，从而得以居高临下监视城内的动静，同时利用这一有利地形，作为攻城的主要出击阵地。湘军在龙脖子山麓修筑炮台数十座，对城内日夜轰击，压制太平军的炮火，掩护其攻城准备工作的进行。同时，在龙脖子山麓与城墙间大量填塞芦苇、蒿草，上覆沙土，高与城齐，为攻城铺平道路；还在附近距城十数丈处日夜开掘地道，准备轰城。半个月后，挖掘地道等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李秀成见湘军攻城在即，乃于7月18日深夜，选派千余人伪装湘军，冲出城去，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结果被湘军识破，退回城内。

7月19日晨，湘军担任攻城任务的部队齐集太平门外。午刻，地雷轰发，城墙被轰塌20余丈，湘军随之蜂拥而入。太平军纷纷以枪炮抗击，虽给敌以一定杀伤，但终未能堵住缺口。湘军冲入城内后，兵分四路向纵深推进：中路由总兵朱洪章等率领，直插天王府；右路由记名按察使刘连捷等率领，直插神策门，与由神策门缘梯而入的朱南桂部会合后，趋向狮子山，夺取仪凤门；中左路由道员彭毓桔率领，直插通济门；左路由提督萧孚泗等率领，分途夺取朝阳门、洪武门。及至朝阳等门失守，驻守西南各门的太平军开始动摇，提督罗逢元等率部乘势自聚宝门攻入，总兵胡松江等率部自通济门攻入。此时，提督黄翼升也率水师各营夺攻中关，乘胜猛攻滨江之垒，会同道员陈湜等夺取了水西、旱西两门。至傍晚，金陵全城各门均为湘军夺占。

李秀成于19日凌晨自太平门败退后，即回到天王府，带领幼

主一人，由数千文武护送，奔向旱西门，企图突围出城，结果为陈湜部所遏，只得转上清凉山。入夜，折回太平门，于四更时分，伪装湘军，由缺口冲出，向孝陵卫方向突围而去。不久，李秀成与幼主失散，便分道而逃。

曾国荃听说有部分太平军外逃，即派700名马队追捕。21日，在淳化镇俘获列王李万材，在湖熟镇一带追杀章王林绍璋、幼西王萧友和等。22日，李秀成也在方山附近被俘。28日，两江总督曾国藩自安庆抵金陵，令李秀成书写供词。8月7日，李秀成写完供词，即被杀害，年40岁。

湘军于大肆抢劫之后，将城内建筑物付之一炬，以消灭罪迹。未能突围的太平军，也本着“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的想法，放火将一些建筑物焚烧。因此，金陵全城一片火海，一直延烧到26日。城内所有太平军将士，或在战斗中牺牲，或遭湘军杀害，或聚众自焚，数万人无一降者。湘军围攻天京两年有余，前后死于疾病者万余人，战死者八九千人，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九、太平军余部的继续奋战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失败。但太平军的力量并未被完全消灭，余部还在长江南北战场上，分别与清军进行了为时二至四年的英勇奋战。

从天京突围的幼主洪天贵福与忠王李秀成失散后，即在数百人护卫下经句容进至溧水东坝，正遇上干王洪仁玕自皖南广德率兵来迎①。7月24日，干王带幼主等到广德，29日由堵王黄文金等迎入浙江湖州。后因湖州危急，干王便于8月4日带幼主等回到广德，29日入浙江到昌化，8日至遂安，20日至开化，继由常

① 洪仁玕于1863年12月奉命出京，到各地催兵以解京围，先后到了丹阳、常州、湖州等地，后因各城相继失陷，未能完成任务，自己也就未回天京。

山入江西，企图与已进入江西的侍王李世贤、听王陈炳文和康王汪海洋的队伍会合。这时，李世贤等所率部队已到赣南南安，于是继续寻赶，由玉山经广丰、铅山、泸溪、新城、广昌至石城。10月9日受到按察使席宝田部的围堵，幼主与干王又被冲散。干王等北走广昌，在白水镇被俘。幼主则落荒而逃，于25日在石城荒山中被捕。干王、幼主先后被解到南昌，分别于11月18日和23日遭杀害。

远征豫、陕的扶王陈得才、祜王蓝成春、遵王赖文光等部，是天京失陷后尚存的另一支太平军余部。1864年2月，他们在陕西得知天京危急的消息后，除留启王梁成富部于陕西继续活动外①，陈得才等即率主力东下，进援天京。这支队伍于6、7月间进抵湖北黄安、麻城，受到湖北提督成大吉部的阻截，未能进援天京。同年11月间，与清军战于安徽霍山黑石渡，为僧格林沁部所败，天将马融和率众数万降清，祜王蓝成春被叛徒出卖殉难，扶王陈得才见大势已去，服毒而死。余部在遵王赖文光率领下，与张宗禹、任化邦所部捻军合编，世称新捻军。部队经过整顿，战斗力有所提高，与清军坚持战斗至1868年（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一节）。

1864年9月17日，侍王李世贤部放弃江西南安府水城，越梅岭入广东；攻南雄州不下，复入江西攻龙南、走定南。一部入广东和平、龙川、兴宁境，东走嘉应州（今梅州市）；李世贤则经江西安远、长宁，进占广东平远，10月4日弃平远，占镇平、大埔，旋入福建，于14日占漳州府。李世贤在此布告农商，各安所业，照常完粮纳税，并致书英、美、法领事，申述太平天国的主张，企图重振革命事业。

这时，天将丁太阳等攻占福建武平；来王陆顺德等攻占龙岩；康王汪海洋部也由江西瑞金入闽，攻克汀州。各太平军余部会集闽南，闽浙总督左宗棠以职责所在，于11月26日自杭州启行，亲

---

① 启王梁成富在陕西坚持斗争，1865年6月6日在甘肃守阶州，城破被俘牺牲。

自督军分三路入闽：西路由帮办福建军务刘典率部万余人，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由提督黄少春率部4000余人，由衢州经江山，取道浦城南下；东路由提督高连升率部4000人，由杭州赴宁波乘轮船取海道抵福州。

12月中旬，刘典部自连城南下，汪海洋部败之于新泉隘，毙副将卢华胜等。1865年1月初，刘典率部再次来攻，2月22日战于新泉，汪海洋部大败，精锐丧失几半，遂转移至龙岩、南靖、永定一带。

清廷为加强镇压福建太平军的兵力，又从江苏调派提督郭松林率淮军8000人由海道去福建，4月上旬抵漳州外围。李世贤部添筑营垒，协力坚守。5月15日，各路清军联合进攻，分截太平军南靖援军，并扼北尾桥以牵制楼内寨。太平军马头门14垒被毁，伤亡颇众。清军攻破漳州南门，太平军巷战不胜，启西门退出，漳州遂为清军攻占。

侍王李世贤自1864年10月攻占漳州，在此坚持了7个月。撤出漳州后，又于1865年5月26日败于永定，损失二三万人，李世贤只身逃走。

由于漳州失陷，李世贤连连失败，康王汪海洋也于6月初旬撤出上杭，由武平入广东镇平。8月19日，李世贤逃至镇平，汪海洋迎之入城。李世贤在营中得悉其叔李元茂已被汪的部下杀害，意甚不平。汪海洋恐其责己，并怕夺其军权，乃于8月23日派人将李世贤刺死（时年32岁）。

漳州失守后，来王陆顺德也弃龙岩，南入粤，占镇平，走平远，据长乐，9月20日为天将林正扬擒缚，连同长乐城一起降于清军。

9月28日，镇平为提督高连升等部攻占，汪海洋率部经平远入江西，在定南、龙南又为席宝田所败，10月17日复折入广东，连占和平、连平。12月初经龙川抵兴宁，8日攻占嘉应州。

早在1865年10月，由于太平军进入广东，清廷命左宗棠赴广东督师，并节制各路清军。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抵广东大

埔，令鲍超自福建上杭、武平从北面进攻嘉应州，提督高连升部攻其西，刘典部攻其东，左宗棠亲率黄少春、王德榜部攻其东南。1月28日，汪海洋等督精锐猛烈反击，刘典、王德榜战败。后清军高连升、黄少春部合力猛攻，在激战中汪海洋中弹受伤牺牲，余部由偕王谭体元统领。2月7日，谭体元率部弃嘉应州西南走，被清军追及，遂与敌死战，谭体元力竭坠崖牺牲，部众万余人战死，四五万人投降。至此，进入江西、福建、广东的江南太平军余部，被清军歼灭。

自1851年初金田起义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经历了英勇、悲壮而曲折的斗争历程，至此最后失败。

第九节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基本原因

持续16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作战水平最高的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组织了强大的革命武装，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实行了各种革命措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并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成为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革命的前驱，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早在两个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于18世纪中叶进行了产业革命。可是19世纪中叶的中国，仍是一个闭关自守、腐朽没落的封建帝国。资本主义的因素虽早已萌芽，但发展异常缓慢。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中国，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本质上依然是一场旧式的农民革命运动。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不可能提出科学彻底的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资本主义民主革命范畴内的任务，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们是不可能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共同归宿。

但是，这次较之历史上任何一次规模更大、纲领更完备的农民革命，竟连改朝换代的目标都未能达到，最终被清军镇压，这是为什么呢？它失败的基本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是很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

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失败，从客观原因说，当时清王朝的力量还比较强大，它控制着全国政权，有几十万军队，不仅拥有较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内也有较大的优势；尤其到了后期，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从外国取得先进的武器装备，直至“借师助剿”，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面临着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未曾遇到过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其革命的任务变得更艰巨、更复杂。对此，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一直缺乏认识，视外国侵略者为“洋兄弟”，或为其“中立”幌子所迷惑。结果，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遭到了失败。

当然，历史上任何一次人民起义，在开始时，它的力量总是弱小的，它所面对的反动势力总是强大的。但是，强和弱是相对的，而且是可以转化的，如果起义的客观条件成熟，起义的领导者主观指导又正确，就能逐渐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并最终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敌人的强大并不足惧，关键在于革命力量是否能做到不犯或少犯大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下面着重从主观方面探讨太平天国失败的基本原因。

一、早期所形成的坚强领导核心未能保持始终

起义之初，太平天国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由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所组成的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但为时不久，冯云山、萧朝贵相继牺牲，后来杨秀清、韦昌辉在

内讧中丧命，石达开又分裂出走，严重削弱了原有领导核心。加之洪秀全进入金陵之后，享乐日甚，他既缺乏领导革命斗争的雄才大略，又不能团结和重用贤能，尤其在内讧之后，他宠信本族，不信外姓，对石达开不予信任，在一段时间内，天京军政大权实际上操在洪仁发、洪仁达等无能之辈的手里；后期即使起用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洪仁玕也从香港到天京，参与中枢政事，但由于多种原因，再也未能形成一个像早期和前期那样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到了晚期，洪秀全又滥封诸王，使各王之间彼此牵制，朝中既无人运筹军政大计，各地将领的分散主义也随之抬头，致使上下离心，各行其是。这种状况，是难以战胜逐渐加强集中统一指挥的清军，引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

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还由于宗教迷信而变得更加无能和腐败。早期，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以"拜上帝会"来号召和组织群众，对准备和发动金田起义，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客观世界进行虚幻、歪曲反映的宗教迷信，它根本不可能给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提供正确分析形势、制订政策策略和总结经验教训的科学的思想武器，它甚至也不能战胜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和礼教的抵抗。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腐化享乐思想，以及农民政权的迅速封建化，就是经受不住封建思想侵蚀的具体表现。

二、在政治上没有形成一套适合时宜的政策和策略

19 世纪 50 年代，中国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中小地主阶级，与以满汉地主阶级上层为主体的清王朝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全国革命形势业已成熟，因此，当金田起义的义旗一举，就得到各阶层群众的热烈响应与广泛支持。但在革命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太平天国只提出了"正"与"邪"、"人"与"妖"之类抽象笼统的概念，没有把革命的矛头集中指向清王朝以及依附于它的满汉

大地主大官僚阶级身上，而是对满族实行无区别的杀戮政策，对中小官僚以及清军中的中下级官弁和士兵，也没有区别对待，争取他们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而是一概地把他们列为“妖”类。因此，整个革命斗争过程中，清朝中下级官吏、将弁投向太平军的为数极少。真正具有远见卓识、胸怀韬略的有识之士，真心实意地为太平天国服务的，尤为少见。

为广大农村制订的体现绝对平均主义要求的《天朝田亩制度》，在城镇实行的实际上取消商品交换的商业政策，过激的宗教、文化政策，以及拆散家庭、男女隔离的社会政策，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脱离了广大群众，吓跑了中下层人士，从而给清方，尤其是像曾国藩、胡林翼等这些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反对太平天国的恶意宣传提供了可乘之隙。

三、不重视军队的巩固与提高

在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杨秀清等十分重视军事问题，在组建军队和筹备武器等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因而在金田起义前后，就能接连打破清军的围攻，保证了起义的成功。

起义后，按照《周礼·夏官司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原则，编组太平军，并规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而且执行得极严，偶有违犯，即严厉制裁，虽“老兄弟”也不例外。太平军还创设了圣库制度，规定一切缴获归公库，不得据为私有，这既保证了太平军的后勤供给，也保证了太平军将士的清廉。太平军内部还有一套教育制度，经常结合政治军事形势给部队“讲道理”。早期在永安和道州居留期间，都及时对部队进行整训，从而保证部队素质的不断提高。

早期的太平军，还不断注意组建新的军兵种，如在道州一带吸收了一大批挖煤工人参军后，适时地将他们组建为“土营”，在尔后的攻城、守城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到了两湖之后，由

于缴获了大量船只，并有不少船民参军，便及时地组建“水营”，在进军金陵的作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足的是，当水师遭受重大损失后，未能及时吸取教训，加以重建，给后期的战局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天京内讧后，一些身经百战的著名将领，有的死于自己兄弟的刀下，有的随石达开远走他乡，太平军受到极大的削弱，后来虽有陈玉成、李秀成等著名将领支撑局面，但军队的士气和声威远远没有恢复到前期的程度。由于天京当局的政治日趋腐败，再加洪秀全滥封诸王，分散主义与地方主义日益抬头，因而对各地将帅的指挥调度越来越不灵。太平军的数量虽继续有所扩大，但缺乏严格的训练，纪律松弛，圣库制度形同虚设，军队素质逐渐下降。

由于太平军的素质下降，战斗力也随之下降。如在安庆会战中，太平军的兵力占压倒优势，但屡战不能取胜；在十三王回救天京的作战中，太平军以 20 余万的压倒优势，仍攻不破曾国荃的 2 万湘军的营垒。这除了作战指导方面存在的问题外，也与太平军战斗力下降直接有关。

随着军事形势的逐渐恶化，太平军内部不断发生成建制的大部队哗变。自 1859 年韦志俊在池州投降清军开始，到天京陷落之前，叛降事件层出不穷，这对太平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很大的削弱和冲击。在上百万的太平军中，英勇抗击清军、战死疆场的固属不少，但确有相当一部分向湘、淮军投降，其中有的甚至为虎作伥，卖力地进攻太平军。这与太平天国后期放松对军队进行严格的军政训练有直接关系，也是太平天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战略决策一再失误

通观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在战略决策上曾一再出现失误，其中主要有两次大的失误，直接关系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一是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金陵并定为都城后，对分别在天京和扬州外围建立起来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未能乘其扎营未稳之际迅速予以摧毁，而采取了置天京城外的清军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京津和西征两湖的错误战略决策。

这个决策违背了集中使用兵力的军事原则。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真正能战之兵不过十余万人。这十余万人用之于歼灭江北、江南大营（两个大营各有一万七八千人），无疑是处于优势地位，但在建都天京的情况下，又分兵北伐、西征，这支队伍就不得不一分为三。这样，以之对付当地的敌军，就都不占什么优势，甚至处于劣势了。特别是北伐、西征，都是孤军远征，作战地域遍及9省，与天京相距千里之外，既难实施统一指挥，更谈不上实行战略协同，这无异于在全国范围内给了尚处于优势的清军对太平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经过3年的战争实践，由太平军的精锐所组成的北伐军，遭到了全军覆没的结局。西征军在经过严重挫折之后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在此期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不断对天京及周围据点发动进攻。扬州、芜湖先后弃守，镇江日益危急，长江粮道受阻，天京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到了1856年初，太平天国领导者不得不从西征战场抽调部队回攻江北、江南大营，以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威胁。这样，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当初就决定首先歼灭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尔后再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稳步向外扩展，那末，整个战争形势定将完全不同，其结局要好得多。

另一个关键的战略决策是第二次西征。1860年夏，太平军取得了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后，又胜利地进行东征苏常战役，重新出现了内讧后的大好形势。然而，正在这时，曾国藩、胡林翼率湘军五路东犯，构成了对太平天国的严重威胁。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毅然决定从东战场调集人马，实行二次西征，以对付湘军的威胁，这个决心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正确的决心未能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首先，由于李秀成等于东攻苏、常后

又贪攻上海，延误了二次西征发起的时间，从而使湘军得以从容进行围困安庆的战略部署，使太平军从一开始在战略上就陷于被动。其次，在兵力部署上由于李秀成的固执己见，使洪秀全集中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于北岸的意图未能得到贯彻，其结果是陈、李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西趋，从而分散了兵力。再次，陈、李两支主力部队抵达武昌外围后，又都先后放弃合攻武昌的既定计划，致使"攻敌所必救"，以求从安庆外围调动敌军回救的企图又告落空。又次，李秀成部以及活动于皖南的杨辅清、李世贤部，未能进行有计划的协同作战，从而放过了围歼曾国藩祁门大营的良机。最后，陈玉成等急于救援安庆，又未能对敌取大包围之势，而是采取直接进攻安庆、桐城地区之敌，从而陷入了湘军预设的"围城打援"的陷阱，一次又一次地为湘军所重创，精锐损折大半；而李秀成部却置安庆于不顾，扬长东走，终于导致了安庆的陷落和太平天国西战场防线的瓦解。特别是李秀成部撤离西战场、回军江浙后，又决定再次进攻上海，开辟另一战场，这就使本已被动的太平军陷于东西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更加被动的地位。

1862 年春，湘军多路分兵，彼此协同，从西、南、东三个方面，向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此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天京当局，又束手无策，未能提出任何积极的战略指导，致使各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迅速恶化。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说，太平天国前期战略上的失误，使太平军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和夺取更大胜利的机会，那末，后期战略上的接连失误，则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败亡。

五、作战指导简单呆板

在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鉴于敌强己弱（不仅总的力量对比，而且在具体战场上也是如此）的基本态势，采取了流动作战的方式，避免遭敌围困，或与敌进行正面的、拼消耗的作战，只是在

有利时机，伏击敌人，或攻取敌军防守薄弱的城镇据点。这种作战指导，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太平军力量的壮大，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权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建都金陵，有了一个立足之地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太平军在作战指导上未能完全适应改变了的客观形势，仍然采用忽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动作战的方式。在前期，太平军几乎打遍了半个中国，但除了天京、安庆等少数几个城市外，没有建立起几处巩固的根据地和稳定的革命政权。在后期，这种状况略有改变，如李秀成在苏南、李世贤在浙江，都比较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但在战场上未能大量地歼灭敌人，因而根据地也就无法巩固。另外，边打边丢的流寇主义的影响，在远离天京的石达开部和远征西北的陈得才部中始终表现得非常明显，结果这两支数量可观、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最后都被敌人消灭了。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战役的指导，要比战略指导稍为成熟一些。他们运用历史上的“围魏救赵”战法取得了一些战役，特别是二破江南大营战役的胜利。但是，太平天国将领们的战役指导过于单一，缺乏创新精神，多次重复使用“围魏救赵”战法，因而被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一眼识破，从而成为二次西征等重大战役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领袖们作战指导思想中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注重攻取和守护大城市，较少进行野战，不注重歼灭清军的有生力量。尤其到了中后期，长期围绕着几个主要城市与敌人反复争夺，特别是把天京作为一个大包袱背了起来，为保卫天京，常常不适当地从各地调兵遣将，终于造成战略上越来越陷于被动的局面。

总之，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不够成熟，在一些决定革命命运的关键问题上失措，诸如政治上过早地封建化，组织上不能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队建设上缺乏巩固提高的有力措施，军事战略上的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的天真幼稚等，终于未能将这场千百万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引导到达胜利、成功的彼岸，其经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第六章　太平军军制

军队编制体制是否科学合理，人与武器能否紧密结合，各种军事法规和制度是否完善等等，直接关系到军队机制的优劣和战斗力的强弱。19世纪50年代初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所以能够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给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并坚持长期的斗争，是与它在起义之初建立了一支制度相当完备和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太平军分不开的。而其最后失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军队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1856年（咸丰六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于天京（今南京）发生内讧以后，军事制度方面的变化和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尤为明显。据此，本章以1856年为界线，将太平军的军制分为前期和后期，分别进行叙述和探析。

第一节　前期军制

一、军队的编成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初十是洪秀全生日），两万多名参加“团营”（集中结营）的拜上帝会会员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时，按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制度编组太平军，以军为最高编制单位。其具体编制为：5人为伍，设伍长1人，辖伍卒4人；5伍为两，设两司马1人，辖伍长5人，伍卒20人，共26人；4两为卒，设卒长（又名管长、营长、百长）1人，辖两司马4人，伍长20人，伍卒80人，

共105人；5卒为旅，设旅帅1人，辖卒长5人，两司马20人，伍长100人，伍卒400人，共526人；5旅为师，设师帅1人，辖旅帅5人，卒长25人，两司马100人，伍长500人，伍卒2000人，共2631人；5师为军，设军帅1人，辖师帅5人，旅帅25人，卒长125人，两司马500人，伍长2500人，伍卒1万人，共1.3156万人。军中卒长、两司马皆设副职，加上副卒长125人、副两司马500人，合计1军有军官1281人，伍长、伍卒1.25万人，共1.3781万人。军中军帅以上另设有监军、总制。

太平军除正职官员外，每军尚有办理军需、军械、医务、刑律、文书等事务的不同级别典官。计有宣诏书2人（主管全军册籍）、典圣库2人、典买办2人、典圣粮2人、典油盐2人、典旗帜2人、典炮2人、典铅码2人、典红粉2人、典硝2人、典铁匠1人、典竹匠1人、典木匠1人、典绳索1人、巡查1人、典刑罚2人、典罪囚2人、疏附（司递文书）1人、掌医（主治外科）1人、内医（主治内科）1人、拯危急（负责战场伤员急救）1人、理能人（负责管理伤病员的茶饭汤药及能人馆，能人系指伤病残人员）1人、功臣（司药料）1人，共计23种35人。正职官和典官均按不同级别配有属官。

为了加强对官兵的管理和考查，以及便于领发钱物，每军编有“军册”（亦称“兵册”）、“家册”。由两司马至师帅，将所属官兵的职务、姓名、年龄、籍贯、入伍时间（家册尚有家庭成员姓名、职务等），分别编造成册，逐级上报，由军帅合5师帅军册，汇造一式4本，分送本管监军、总制及天京诏书衙，如人员有增减，随时改正呈报。另外，还给在外统军的重要将领颁发“将凭”，授予先斩后奏之权。伍卒及典官属下人员均发给“腰牌”，随身携带，以验证其身份。

太平军陆营各军的番号按“前、后、左、右、中”、“一　二　三　四　五……”编排，军帅称为前一军军帅或后五军军帅之类。1853年建都天京后，从前一军至中十九军共有陆营95军。每军辖5师，每师辖5旅，均按“前、后、左、右、中”编号。师

帅称为后五军前营师帅、左八军右营师帅之类。旅帅称为左八军右营师帅中营旅帅、中十军左营师帅后营旅帅之类。每旅辖 5 卒，卒用“前、后、左、右、中”和“一　二　三　四　五……”编号，卒长称前一军后营左营左一卒长、后二军前营中五中营中五卒长之类，其中的后营、前营乃是师的番号，左营、中营乃是旅的番号，也可简称为前一军后营左左一卒长、后二军前营中中五卒长。每卒辖 4 两司马，两司马用“东、西、南、北”编号，东两司马即某卒所辖的第一两司马，余类推。每两司马辖 5 伍长，伍长用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词编号，刚强伍长即某两司马所辖的第一伍长，余类推。每伍辖 4 伍卒，伍卒用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词编号，其全称如前一军前营师帅前营旅帅前一东两司马威武伍长冲锋伍卒王某，也可简称为前一军前营前一东威武冲锋伍卒王某。

前期太平军编制表

前一军军帅

前营师帅	后营师帅	左营师帅	右营师帅	中营师帅
前营旅帅	前营旅帅	前营旅帅	前营旅帅	前营旅帅
后营旅帅	后营旅帅	后营旅帅	后营旅帅	后营旅帅
左营旅帅	左营旅帅	左营旅帅	左营旅帅	左营旅帅
右营旅帅	右营旅帅	右营旅帅	右营旅帅	右营旅帅
中营旅帅	中营旅帅	中营旅帅	中营旅帅	中营旅帅

前一军军帅前营师帅

前营旅帅	后营旅帅	左营旅帅	右营旅帅	中营旅帅
前一卒长	后一卒长	左一卒长	右一卒长	中一卒长
前二卒长	后二卒长	左二卒长	右二卒长	中二卒长
前三卒长	后三卒长	左三卒长	右三卒长	中三卒长
前四卒长	后四卒长	左四卒长	右四卒长	中四卒长
前五卒长	后五卒长	左五卒长	右五卒长	中五卒长

前一军军帅前营师帅前营旅帅

前 东两司马　前 东两司马　前 东两司马　前 东两司马　前 东两司马

一 西两司马 二 西两司马 三 西两司马 四 西两司马 五 西两司马
卒 南两司马 卒 南两司马 卒 南两司马 卒 南两司马 卒 南两司马
长 北两司马 长 北两司马 长 北两司马 长 北两司马 长 北两司马

前一军军帅前营师帅前营旅帅前一卒长

东 刚强伍长 西 刚强伍长 南 刚强伍长 北 刚强伍长
两 勇敢伍长 两 勇敢伍长 两 勇敢伍长 两 勇敢伍长
司 雄猛伍长 司 雄猛伍长 司 雄猛伍长 司 雄猛伍长
马 果毅伍长 马 果毅伍长 马 果毅伍长 马 果毅伍长
威武伍长 威武伍长 威武伍长 威武伍长

前一军军帅前营师帅前营旅帅前一卒长东两司马

刚 冲锋伍卒 勇 冲锋伍卒 雄 冲锋伍卒 果 冲锋伍卒 威 冲锋伍卒
强 破敌伍卒 敢 破敌伍卒 猛 破敌伍卒 毅 破敌伍卒 武 破敌伍卒
伍 制胜伍卒 伍 制胜伍卒 伍 制胜伍卒 伍 制胜伍卒 伍 制胜伍卒
长 奏捷伍卒 长 奏捷伍卒 长 奏捷伍卒 长 奏捷伍卒 长 奏捷伍卒

太平军起义时，各地会众是由一村一乡一县的大小头目带领来到金田村“团营”的，因此编组军队时，为了适当照顾农民的家乡地域观念和原有的各村各乡的统率关系，在中下级单位可能由同一县、乡、村的人所组成，所以在反映太平军编制序列的《太平军目》中，有标有县名的旗帜，并有“旗分五色，各有地名”的说法。但就一个军或一个师来说，则是采取混合编组的方式，即使师下的旅或旅下的卒，也不全由同县的人编成。从1851年7月19日洪秀全在茶地所下的突围诏令中看，已用前后左右中及数字编军，而当时起义的地区不广，人数不多。1852年6月，太平军出广西，占湖南道州（今道县），此后攻长沙，克武汉，占金陵，太平军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在军队编组上保留地域的区别已无必要。太平军按地域编组痕迹的消失，更有利于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

二、军兵种建设

太平军的正规部队，除上述陆营外，尚有水营、土营和部分骑兵。此外，还有辅助作战的女营和童子兵。

水营 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主要活动于丛山僻野，原在水面活动的罗大纲及其部属，也都舍水就陆。至湖南后，经“道州决策”，确定了“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方针①，水战和水营的建设才开始提上日程。1852 年 11 月底，太平军从长沙撤围北上，于 12 月 3 日攻占益阳，获船数千只，并吸收许多船户、水手参军。13 日占岳州(今湖南岳阳)，又有 5000 余船户带着船只参军。东王杨秀清遂将船户进行编组，任命唐正财②为“典水匠”，职同将军，统辖船队。这是太平军建立水营的准备阶段。12 月，太平军自岳州分水陆两路东下，攻克汉阳、汉口。这时，杨秀清决定将已编组的船队升格为水营，并升唐正财为指挥，总统水营船户。此后，太平军在沿长江东下，攻占金陵的过程中，水营担负运输和作战任务，起了重要的作用。定都天京后，水营船只多达万艘，“乃升唐正财为殿前丞相，即以被掳船户水手为水兵，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旋增至九军，每军以军帅领之。其下所属师帅至两司马，亦如旱营之制。惟师帅多至六百人”③。由此可知，水营与陆营的编制基本相同，以军为最高单位，下设师、旅、卒、两、伍，分别以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统之。军以上有监军、总制统帅。所不同者，水营师帅多于陆营。按编制，自军帅以下各级军官、典官、属官，每军有 1715 人，9 军共有 1.5435 万人。伍卒每军 1.25 万人，9 军共有

---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291 页。

② 唐正财,湖南祁阳人(一称广西人),素以水运木材为业,兼贩米粮,在岳州为杨秀清收用。唐擅长维修船只、搭造浮桥等事,但不谙军事。

③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141 页。

11.25 万人。9 军合计共有官兵 12.7935 万人。太平军水营大多集中于天京，遇有情况，由杨秀清直接下令调派各地。地方统帅除得到中央加强的水营战船外，尚可征用地方民船，故客观上仍有天京水营与地方水营的区别。

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以后，太平军的水营除了配合陆营作战外，主要担负运输任务，经常动用数百艘、千余艘船只，将安徽、江西等地的粮食和军用物资运至天京，以保障天京的军需民食。正因为运输任务十分繁重，加上未能及时将运输船队和作战船队分别编组，有效改善作战船队的武器装备，提高水营官兵的战术、技术水平，因而战斗力未能得到应有的加强。太平军的水营虽于 1854 年 4 月在湖南靖港、1855 年 1 月在江西湖口取得了击败湘军水师的胜利，并在一段时间内控制着长江中下游航线，但毕竟不是编制合理、装备良好、训练有素的湘军水师的对手。在连续不断的作战中，太平军水营屡遭败绩，战船损失惨重。仅在 1854 年 10 月的田家镇战役中，就有 9000 多船只被湘军水师焚毁、击沉，从此元气大伤，并最终丧失了长江水域的控制权，给天京的军需民食带来了极大困难。

土营　1852 年 8 月，太平军途经湖南道州、桂阳、郴州时，扩军二三万人，并将其中数千挖煤工人集中编组为“土营”，共两个军。其编制与陆营基本相同，但于总制之上设有将军、指挥。“初仅指挥一人，将军分一二正副四人，后又封指挥至三十余人，将军六百余人。其总制、监军、军帅至两司马俱备。至江宁封土营师帅至七百六十二人，其实所辖并无一万三千一百之数。因穴地有功，故悉封师帅之职，非皆统五百人也（系 2500 人之误）”①。土营“总制则分土、炎、金”②，与陆营略有不同。

土营是太平军的正规部队，类似现在的工兵，在“穴地攻城”方面屡建奇功。如在进攻武昌、金陵、杭州等城的战斗中，土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138 页。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107 页。

营都立了大功。在太平军内部，尊称土营的战士为“开垅口兄弟”。土营的“穴地攻城法”，主要是在距城墙一定距离的隐蔽处开一洞口，挖地道至城墙之下，而后放置火药，用竹管引出导火线，点燃轰塌城墙，为陆营攻城创造条件。用此方法，使敌难以判断太平军的进攻方向，且可大大减少进攻部队的伤亡，所以敌人怕得要命，惊呼其法“掀翻巨城，如揭片纸”，咒骂“地道之计殊恶”，“此事为至可恨”。① 太平军将挖煤工人的挖坑道和爆破技术用于攻城作战，可谓一大创举。但“穴地攻城”受土质影响很大，技术要求也相当高，地道要挖得恰到好处，方能奏效。为此，在太平军土营中专设土司一职，负责测量方位及土壤分析等。

骑兵 骑兵在太平军中数量不多，但在一些重要战役战斗中，多用骑兵冲锋陷阵，少者数十骑，多者数百骑。1855 年的江西湖口之战中，数百名太平军骑兵向清军搦战，使曾国藩颇感惊恐。1858 年的三河之战中，太平军、捻军有大量骑兵配合步兵一举歼灭湘军 6000 余人。太平军的骑兵从战场使用情况来看，似是单独编队，但史料中没有“马营”、“马队”之类记载。

太平军前期共有陆营、水营和土营 106 军，按编制计有正职军官 13.5998 万人，伍长、伍卒 132.5 万人，合计共有官兵 146.0998 万人，超过当时清方全国八九十万人的总兵额。根据太平天国当时所占的地区以及拥有的财力物力判断，绝不可能有这样庞大的兵力。太平军每军的实际人数，史料记载不一。据《贼情汇纂》记载：“大抵自江宁配调出扰各处，每一军诚确有一军之数，其余盘踞各处之贼，歼逃无定，一军数千人、数百人皆有之，损多益寡，每一军以四千人……为断”②。如果按一个军 4000 人估算，则 106 个军共有 42 万余人。既有这么多的军队，为什么派往北伐、西征战场的军队仅有几万人，而且对仅有 1.7 万余人的威胁天京安全的清军江南大营不能及时予以摧毁，甚至连战略要地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138～139 页。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287 页。

扬州都不能守住呢？由是观之，一军有4000人之说不足为凭。据罗尔纲考证，太平军一个军的实有人数约为2500人①。其实，有些军的实际人数还不足2500人。《张继庚遗稿》称：防守天京朝阳门的陈桂堂一军仅有900余人。②《金陵杂记》则说：每军帅名下仅数十人，亦有百余人者。③在太平天国文书中也有记载太平军人数的，如《后二军军帅刘玱得请领大钱上总制敬禀》中说："计统下兄弟一百七十余人"④。《中五军前营旅帅刘亚二求发封船条上中五军军帅覃敬禀》中说："今奉天命出师，统下兄弟四十余人"⑤。以上情况表明，太平天国前期各军的缺额相当严重，徒有军、师、旅的架子，而实际兵员少得可怜，因而总兵力也就十分有限，能战之兵约有10余万人⑥，不足编制数的1/10。正因为兵力有限，所以当太平天国的领导者贸然决定同时进行北伐和西征时，在战场上自然就显得捉襟见肘，穷于应付了。另外，根据罗尔纲的估算，当时用于西征和保卫天京的太平军总兵力约7.1万人，却有71个军的编制单位。这种建制多、兵力少的情况，对于作战和指挥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女营　金田起义时，拜上帝会会员大多变卖家产，举家相从；加上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支持妇女投身革命，因而在太平军中出现了将妇女单独编成女营的特殊组织。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发布的第一道命令中即规定："别男行女行。"⑦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天情道理书》中讲得非常明白："我们兄弟荷蒙天父化醒心肠，早日投营扶主，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举家齐来，固宜侍奉父母，携带妻子。但当创业之初，必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

---

① 罗尔纲：《太平军每军实数及后期编制考》，《文物》1984年总第21期，第155～163页。

②③ 参见《太平天国》(四)，第772、613页。

④⑤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30页。

⑥ 太平天国底定天京时，太平军的实际人数，史料说法不一，有说"不下十万众"，有说"近十五万人"，有说11万至14万人。

⑦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第63页。

私；况内外贵避嫌疑，男女均当分别，故必男有男行，女有女行，方昭严肃而免混淆”①。

起义初期，在太平军处于无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将家属分别男女，单独编组，随军行动，应当说对于安定军心，解除战士后顾之忧，严格军纪，提高战斗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当攻占金陵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自己可以夫妻同居，并可纳妾，而对于全军官兵仍实行男女隔绝制度，虽夫妻也不能同居，就不合时宜了。太平天国的领导者还把这种制度推广于城市居民之中，将所有妇女集中编入女馆，其中善女红的编入绣锦营，其余编入女营，设女官管理。女官的最高职务为军师，有左辅正军师、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后护又副军师各1人。女军师之下，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女丞相，各相正副各1人，共12人。设女检点36人，女指挥72人，女将军、女总制、女监军、女军帅各40人。军帅以下不设师帅、旅帅，直辖卒长25人、两司马100人、女兵2500人。女营自前一军至中八军，共40军，据称有女兵10万人。女营、女馆基本按太平军正规军的编制编组，不同之处在于一军的人数仅及正规军一师的人数，其基层组织的人数也多寡不一，有以25人为一馆的，也有五六十人甚至一二百人为一馆的。每馆设两司马管理（亦称馆长），4馆设一卒长（亦称百长），但一个卒长也有管理十余馆的。1855年春初，太平天国领导者允许全军和天京人民恢复家庭制度，女兵的人数也就大为减少。

女兵的年龄参差不齐，故女营并非担任作战任务的部队，但有时亦参加战斗。1852年2月，洪秀全在永安时曾诏令“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②。后来攻桂林攻武昌，皆有女子参战。据《贼情汇纂》记载：“贼素有女军，皆伪王亲属……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官军或受其衄。”③ 建都

①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第384页。

②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第68页。

③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11页。

天京后，女兵还参加过守城、挖壕、筑垒、送竹签、打更守夜等战勤工作，在紧急情况下亦曾出城拒敌。夏官丞相赖汉英救援扬州时，也曾调女兵参加。太平军主力调至北伐、西征战场以后，镇江的守卫任务也多由女营担任，并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女兵除担任作战任务外，还是一支劳动大军，担负挑砖、挑水、割稻、砻稻、背米、运盐等各项工作，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童子兵 太平天国起义时，许多儿童随父母叔伯、兄长从军，在进军途中又有大量儿童自动加入革命队伍。有的史料记载，“初陷武昌掳幼童以数千计”①，从水路至金陵“幼童约一万”②。这些儿童，根据性别和年龄大小，分别被编入男营、女营。按太平军军制规定：壮丁为牌面，老少为牌尾。一般16～50岁为牌面，余为牌尾。童子兵大多杂于军中，编入牌尾，并未独立成伍。但也有单独组织童子兵的记载，如1862年底，江苏太仓守将陈玉文麾下成立了一支叫“破敌军”的童子兵，共500人，分前、后、左、右、中5队。每人皆裹红巾，身穿绿衣。③这种单独组织的童子兵只存在于个别单位，并不是普遍的现象。太平军中各级将领及老战士对童子兵极为爱护，有的将他们收为义子，干些力所能及的勤杂工作。为了培养后代，太平天国还专门编写了“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对他们进行教育。

童子兵在军事上主要是辅助太平军作战。如《武昌纪事》中说：“贼每战，各营正牌二十五人居前当锋，牌尾老幼辈助声呐喊，方战，大呼杀者三，势殊凶猛”④。有时童子兵也直接参加战斗，据《金陵杂记》载：在战斗紧急打四通鼓时，“各馆牌尾（老年逾六

---

①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三。

②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见《太平天国》（四），第650页。

③ 《上新报中的太平天国史料》，转引自郭存孝：《太平军编制述略》，《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④ 陈徽言：《武昌纪事》，见《太平天国》（四），第600页。

十者并孩童十六岁以内者）并各馆书使，均须起身预备拒敌”①。《贼情汇纂》称："凡临阵攻城，亦惯用童子为倡”。这是因为童子皆不畏死，且手足灵便，登高涉险如履平地，“更有捷若猿猱之童子，倏忽至前，为人所不及防，转瞬而去，为人所不及追”。童子兵参战还有鼓舞士气的作用，“贼每用以为导者，使在后之贼自计童子尚威猛如此，我辈退缩，竟童子不若矣”。在追击战斗中，童子兵“每追魁梧兵勇，知力不敌，则绐之曰弃刀跪降绝不杀若，及掷刀长跪，举手決之，毫不费力，是兵勇何其愚，童子又何其巧也”。② 事实证明，太平军的童子兵不仅直接参加过战斗，而且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机智。经过战斗的洗礼，不少童子兵成长为太平军的骨干，有的还成了著名的年轻将领，如英王陈玉成、慕王谭绍光等。

此外，童子兵在文书及情报的传递、帮助维持革命秩序、查禁洋烟、搜查窖金藏粮等工作中，也都作出了贡献。

三、领导核心与指挥体系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由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和石达开组成领导核心，并设各级属官。他们既管政务又管军务，因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又以处理军务为主。所以，这个领导核心实际上也是军事统帅集团，或称指挥中枢。

1851 年 3 月，洪秀全自封“天王”，并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分统所编各军。同年 12 月 17 日，又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

① 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见《太平天国》（四），第 632 页。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307～308 页。

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①。并实行军师负责制，被称为天国“朝纲之首领”。带兵将领每有奏议，先禀请军师，军师裁定后，直启天王决断，由天王旨准颁行。这种制度表明，军政大权虽渐由杨秀清所掌握，但洪秀全仍握有最后决断之权，同时尚能体现某种程度的集体领导的原则。1852 年 6 月和 9 月，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先后牺牲于湖南战场，指挥中枢受到严重削弱，而杨秀清的权力也就日益增大。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 1854 年 4 月至 5 月，先后加封秦日纲为燕王、胡以晃为豫王，由东王总理军政事务，而辅以北、翼、燕、豫诸王。实际上，已由东王杨秀清独揽大权。因为，其一，为时不久，秦日纲降为顶天燕，胡以晃降为护天豫，已无参与中枢决策的资格。其二，凡军政事务奏章，即使呈给北王和翼王的，亦必须转呈东王核定，然后由三人会衔具呈天王，而天王无不核准。其三，定都天京初期，杨秀清还每日或隔数日朝见天王议事，后来朝见的次数日渐减少，军政事务往往直接由他发布诰谕分令遵办，最后竟发展到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杨秀清有出众的军事、政治才能，办事雷厉风行，众将领也能服从命令听指挥，所以整个军事机器能够正常地运转。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殊权力，此后权力欲望不断膨胀，“自恃功高，一切专擅”，从而成了统帅集团内部矛盾的焦点，终在 1856 年爆发了韦昌辉袭杀杨秀清及其家属近臣，进而企图杀害石达开，洪秀全又下诏处死韦昌辉等人的天京内讧事件。杨秀清的被杀和统帅集团的瓦解，给以后的起义战争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太平军的指挥系统比较繁琐，也不尽合理。首先，作为一军之长的军帅，只有操练士卒、条分队伍、屯营结垒、接阵进师之权，而作战指挥则另派监军负责，即“平时辖军，军帅独任，至

---

① 据郦纯考证，杨、萧、冯、韦封军师的时间早于封王，但究竟封于何时，尚难断定。参见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上），第二次修定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下同），第 132 页。

出师，乃以监军统之”。监军之上又设总制，“自监军以下，悉受节制”①。当时各军均处于战斗环境，所以军中往往设有总制，每军的最高长官实际是总制。另外，监军以上尚有检点、将军、指挥、丞相、国宗和侯，其中的侯虽系爵号，但当时职爵不分，这些人都可以奉命指挥一个军或几个军。有时则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亲自出任统帅，指挥一个方面的作战。以上指挥体系，不但使军一级的管理权和作战指挥权分离，而且军以上的指挥层次叠床架屋，临时派员去指挥自己不熟悉的部队，不利于争取战役战斗的胜利，甚至会贻误战机，因此可以说弊多利少。

四、武器配备

太平军的武器配备状况，史籍缺乏完整的记载。大体上起义初期以刀、矛、叉、斧、钯镗等冷兵器为主，也有少量土枪、土炮等热兵器。后来，热兵器的比例日益增大，新式枪炮的数量也逐渐增多，部队的装备状况不断有所改善。至于冷热兵器的具体比例以及在部队中如何编配，史籍中鲜有反映，甚至连太平天国初期编印的专门记载太平军编制的《太平军目》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仅在《行军总要》中有这样的记载：所用大小炮必须预先派定，即于名牌上注明某人用某炮，譬如两司马，该管下兵有 25 人，则规定使长龙（抬枪）两条，管枪（鸟枪）五条。至于各典官衙亦须计其统下人数多寡，变通铺派，人多则炮宜多，人寡则用炮宜寡。从中大致可知冷热兵器的比例。太平军前期武器的来源，主要靠自制和战场缴获。金田村起义前夕，桂平、平南、陆川等地的拜上帝会会众即秘密打造刀矛，铸造土枪土炮，但生产数量很少，只有金田村生产规模较大。据说在韦昌辉家曾开炉 12 座，日夜赶制刀、矛等兵器。又称石达开率众自贵县龙山赴金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106 页。

田团营时，途经“桂、贵交界之白沙墟，竖木为东西辕门，开炉铸炮，月余乃去”①。据称，太平军在起义初期，便已拥有500斤铁炮、600斤铜炮和800斤炮，炮身上还铸有“太平左右军”、“前军先锋大炮”铭文。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在广西转战期间，又缴获了清军的一些枪炮，并继续自制火炮，还从民间搜集了一些鸟枪、抬枪。1852年6月至1853年3月，太平军出广西、战两湖、克金陵，在此期间又缴获和自制了不少枪炮。如1852年7月，在湖南江华、永明就制炮300余门装备部队。同年，12月13日占领岳州时，又缴获清初吴三桂部所遗大批火炮，进一步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定都天京以后，有了自己制造武器的优越条件，便专门配备了主管武器生产的官吏，设置了制造枪炮的“典炮衙”，制造铜炮的“铜炮衙”、制造铅弹的“铅码衙”、煎熬硝磺的“典硝衙”、制造刀矛等铁兵器和铁器的“典铁衙”、制造战船的“战船衙”和制造弓箭的“弓箭衙”等机构。刀矛、枪炮、火药、战船等的制造，对于改善部队的装备起了积极作用。

太平天国十分重视火炮的制造和使用。从对全国有关单位收藏的66尊太平天国的火炮情况来看，有如下特点：1、制造的时间从1855年至1863年，几乎年年都在制炮。2、制炮的地区不限天京一地，遍及江西、湖北、江苏、浙江，监督铸炮的官员上自王爵，下至检点、将军，说明各地区、各级将领都重视制炮。3、火炮的结构，沿袭明清旧制，前弇后丰，左右有耳轴，均为用火绳点火发射铅丸和铁弹的前装炮。其重量最重者为1000斤，最轻者为30斤，其中以便于携行的重300～500斤者为最多。4、上述66尊火炮中，1855年至1856年制造的就有18尊②。由此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前期所制和给军队配备的火炮当不在少数。另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在天京还生产过一种“九龙索子炮”(亦称九子炮)，“其法连环叠放，无片刻歇。每管炮子约下百余粒，如龙眼

---

① 光绪二十年《贵县县志》卷6，民国九年《桂平县志》卷33。

② 参见郭存孝《太平天国火炮研究》，《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核大，每开放时，则四面横飞，亦利器也”①。

太平军前期，一个军究竟装备多少火炮，无法统计。但从作战中丢失的火炮情况来看，可以说明已具有相当的数量。如1854年，太平军在岳州受挫，一次丢失火炮50余尊；1855年在武昌沌口被夺火炮60尊；1856年在武昌又被湘军水师夺去大炮100余尊。

太平军不仅将火炮用于野战，而且守城池要地，以火炮为中心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四周高处筑大炮台，复密设众多的小炮台；环筑土墙、土壕，密安枪眼炮孔；还“穴墙安炮，排列数层”。清军之所以经常用长围久困之法对付由太平军据守的城镇，与太平军拥有较多的火炮，重视发挥火炮的威力有一定的关系。

太平军水营装备的船只多系征用的民船，故大小不一，无统一的制式。如太平军在岳州所获之民船，“半多湖南炭船，名曰小拨，其舟身长而窄，棚矮而坚，首尾木板斜耸，高与棚齐，冲风破浪，驶迅如矢”②。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在水西门外及下关大王庙前设立船厂，“打造八桨快船，约二三丈长，上有布篷，船旁画龙，每船能容二三十人，船系敞口，上无顶席，大约乘以巡江者，未能远行”③，但极轻便灵活。各地太平军在艰苦的条件下亦曾设厂制造快船，由于船身小，一般每船只能装载轻型火炮1～2尊。因其火力不及湘军水师战船，故力求以数量众多、轻捷灵便取胜。在1855年初的湖口之战中，太平军水营就是用这种小船击败湘军水师大船的。

此外，太平天国还制作了一种攻防两用的“木排水城”。其构筑方法，系“以大木簰数架，外树木城，中搭板屋，起瞭楼为营垒。木城上开炮眼，密架枪炮，以向外击”④。也有的“上堆泥垛，

---

① 《张继庚遗稿》，《太平天国》（四），第763页。

②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第35页。

③ 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见《太平天国》（四），第635页。

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37页。

枪炮遮列四面，战船不能及前，火攻不能透内；又有连环小簰，遇敌军可以围裹；又用木簰铺板，上覆厚土，接连两岸，可以遏遮上游之师，若坦途然”①。清方史料中也有称其为龟船的。周长森的《六合纪事》中称：1854 年太平军援镇江时，“联巨筏为四牌，上施楼橹，建瞭台，中载粮糗，四围障以牛皮，巨桨数十，名曰龟船”②。这种“木排水城”，实际上是一座浮动堡垒，在湖口之战中，太平军曾用它封锁鄱阳湖口，多次击退湘军水师的进犯。

诚然，太平军水营船只的数量多于湘军水师，但其技术性能逊于湘军水师，这是太平军在江湖作战中胜少败多、损失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军事纪律

太平军不仅有严密的组织，而且有严格的纪律，执法森严，赏罚分明。太平军兴起之初，洪秀全即颁布了五条简明军纪：“一遵条命③；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④

1852 年，太平天国刊刻了《太平条规》，作为正式的军纪文件颁发全军。其内容如下：

定营规条“十要”

一要恪遵天令。

二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

三要练好心肠，不得吹烟、饮酒，公正和傩。毋得包弊徇情，顺下逆上。

四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不得隐藏兵数及匿金银器饰。

---

① 转引自：《向荣奏稿》卷 1，《太平天国》（七），第 53 页。

② 《太平天国》（五），第 155 页。

③ 条，指《十款天条书》，命，指上级命令。

④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第 63 页。

五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

六要谙熟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号令。

七要无干不得过营越军，荒误公事。

八要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

九要各整军装枪炮，以备急用。

十要不许谎言国法王章，讹传军机将令。

行营规矩“十令”

一令各内外将兵，凡自十五岁以外，各要佩带军装粮食及碗锅油盐，不得有枪无杆。

二令内外强健将兵，不得潜分干名，坐轿骑马，及乱拿外小①。

三令内外官兵，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中间。

四令号角喧传，急赶前禁地听令杀妖，不得躲避偷安。

五令军兵男妇，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及搜操（掠）药材铺户并州府县司衙门。

六令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及瞒昧吞骗军中兄弟行李。

七令不许在途中铺户堆烧②困睡，耽阻行程，务要前后联络，不得脱徒。

八令不得焚烧民房及出恭在路并民房。

九令不得枉杀老弱无力挑夫。

十令各遵主将有司号令分发，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后。

《太平条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太平军的内部纪律和群众纪律，体现了革命军队的本质。在其它太平天国文书中，亦随时申明军纪，用以教育官兵。如《原道救世歌》、《千字诏》、《醒世文》、《天情道理书》、《天条书》及天王诏旨等，均反复强调不准奸淫妇女，不准欺压百姓，不准抢掠，不准滥杀无辜，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另外，

---

① 外小，指民众。

② 堆烧，指点灯，此处也可理解为烧火取暖。

还有爱护士兵的规定："譬如行营，沿途遇有被伤以及老幼人等，遇有越岭过河不能行走者，必须谕令各官，无论何人所有马匹，俱牵与能人（伤员）骑坐；如马匹不敷，总要令兵士抬负而行，庶无遗弃。"对巡更把卡士兵，"若见其衣裳单少，或被褥不敷，即当传令各官，如有多余，即当挪出，分散（给）兵士。倘各官亦无多袍裳，即令各官夜间将皮袍裳与把卡兵士穿着"①。

太平军执法极为严格，不徇私情，且功罪分明，赏罚公正，从而使官兵心悦诚服，不敢以身试法。在团营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博白来的人多了，妇女洗身时都是黄昏时到竹蔸根去洗，金田的韦十去偷看妇女洗身，被妇女发觉，跑去报告首领，立刻集队认人。最后查出是韦十，立即拉去砍头示众"②。"又有一次在桥头村扎营，一个士兵拿了老百姓一条绳子去绑马，被当众打了50杖屁股，并向群众认了错"③。由于太平军纪律森严，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备受百姓爱戴和拥护，百姓主动供给军需，纷纷要求参军，使太平军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太平军铁的纪律与清军的暴行形成鲜明的对照，就连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写道："逮逆党由长沙陷武汉……不但不虏乡民，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以致富者坐视城中困守，不肯捐助一钱，贫者方幸贼来，借可肥己。……甚至贼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为尤甚。"④ 曾国藩在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信中亦哀叹说："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⑤ 从这些反面言论中亦可看出，太

---

① 《行军总要》，《太平天国》（二），第428～429页。

②③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下同），第206、211页。

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271～272页。

⑤ 《曾文正公全集·书牍》，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三册，第13页。

平军纪律严明乃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另外，当时亲自到过太平天国境内的一些外国人，尽管他们对太平天国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但是对太平军的纪律一般均能给予公允的评价。如1853年曾到过天京访问的英国上海领事馆翻译麦迪乐在他所著《中国革命》一书中就说："另有显著事实，现确已证明为真者，即是：在所占的城市中，凡强奸与和奸者皆处死刑无赦。由各难民之谈话（他们本最恨太平军），当问及此一点时，均异口同声嘲笑凡有指责太平军容许强奸之观念。反之，人人均同声赞美他们之克己节欲，如不表示敬佩，则啧啧称奇。"①香港维多利亚主教则说："太平军在1500英里的长途进军中，经过了人烟稠密的富饶地区。在亚洲战争中所常见的奸杀掳掠，太平军是用死刑来严加禁止的。……他们严守基督教的十诫，并且加以更严格的解释。丢邪眼、唱邪歌，以及一般激起淫佚放纵的事物，都被禁止和铲除。饮酒、吸烟、赌博、说谎、咒骂，尤其吸鸦片烟，都是以一种丝毫不苟的道德决心予以禁止的。"②此外，英国人在上海主办的《华北先驱》周刊亦曾多次发表通讯和社论，反映了太平军执行纪律之严格。这些，都有力地批驳了内外敌人对太平军的污蔑。

太平军的严格纪律，对维护军队内部团结，加强军民关系，增强战备观念，提高战斗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与历代农民起义军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但是，由于受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和缺乏先进的理论作为执法的基础，因而到了后期，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执行纪律的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从早期颁发的《太平条规》等一些文件中，就已经暴露出森严的等级观念和繁文缛节，这不仅有悖于"人人平等"的宗旨，而且十分不利于军队内部的团结。

---

① T.T.Meadows：《Chinese & Their Revolution》，第242页。

② 〔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上），第68～69页。

六、教育与训练

太平军在前期所以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和坚毅的战斗精神，是与注重经常的政治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分不开的。

太平军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太平天国崇拜的上帝教教义紧密相联。它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人间美好幸福的“小天堂”为宗旨。它提倡国与国平等，人与人平等，男与女平等，贫与富平等，反对私有，反对压迫，并把清朝皇帝比作阎罗妖，号召群起除妖。它劝人要作正人，戒除淫乱、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赌博、食洋烟（鸦片）等不正当行为。这些都是对官兵进行教育的重要内容。此外，还有一部太平军将士必读的《天条书》。该书包括宗教仪式与十款天条两部分。十款天条的内容是：一崇拜皇上帝，二不好拜邪神，三不好妄题（提）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五孝顺父母，六不好杀人害人，七不好奸邪淫乱，八不好偷窃劫抢，九不好讲谎话，十不好起贪心。它是教徒和军人的行为规范，要求全军将士日夜背诵，切实遵行。

太平军政治思想教育的方式，除与宗教仪式相结合（即每星期要做礼拜）外，尚有临时召集的宣讲大会，叫做“讲道理”。例如，对新编的军队要讲道理，执行军纪、处决罪犯时要讲道理，仓促行军、临时授令时要讲道理，鼓舞将士完成艰巨任务时要讲道理，动员人民群众支前时要讲道理，等等。据有的史料记载，参加讲道理大会的军民有时多达万人。此外，还有利用上帝教的宗教节日，对会众进行宗教和历史传统教育。上述这些教育和活动方法，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在当时对于鼓舞太平军的革命意志，严格军纪，巩固部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太平军对军事训练要求也十分严格，在诸条禁律中即明确规定：“除练习天情（指政治思想教育）外，俱要磨洗刀锚，操练武

艺，以备临阵杀妖，不得偷安，妄食天父之禄。”① 太平军的军事训练分个人技艺训练与集体操演两种。个人技艺方面，要求“精练弓刀炮烧”；刀矛击刺，军中“间有能者”，则应相互学习；对于“抛火球放喷筒，人人优为之”；战士打靶，要求以隔三间屋打灭油灯为准。值得提出的是，太平军中每个官兵皆以“能耐劳苦忍饥渴为技”。在集体演练时，每以“大旗数面各领一队，牵线急趋，以捷疾不脱落为合式”，做到迅猛敏捷，队形整齐。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有这样的描绘：太平军“打仗亦有熟习之技，每遇我兵枪炮齐施时，皆伏贴于地，候弹稍稀，雀跃而猱进，转晌已至枪兵之前，甚至举刀矛伤我一二人，此时我之火器已属无用，若刀矛兵退缩，鲜有不败者”②。这段描述，不仅说明了太平军具有英勇果敢的精神，而且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太平军还根据自己的编制、装备和地形等情况，注意继承我国古代的阵法演练，比较常用的有牵线阵、螃蟹阵、百鸟阵、伏地阵等。

此外，太平军也注意构筑营垒，进行阵地战的训练。利用城外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防御工事，屯驻精兵，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致人而不致于人，因此被清军将领称为“能战能攻而能守”的部队。

对于水营的训练，按《行军总要》规定，船只分前、中、后三队依次行进，船队之前派有小船导航。佐将居中指挥，白天以旗帜为号，夜间以梆、锣、鼓为号。如敌在前，中队、后队各催赶水手摇船前去助阵，或分兵上岸配合前队夹攻敌人。如敌人在后，前队、中队除派兵镇守船只外，“其余兵士概行装身速即登岸，跟定大旗护阵诛妖”③。

---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228页。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59页。

③《行军总要》，《太平天国》（二），第420页。

七、后勤保障——圣库制

太平天国对平时战时的后勤保障十分重视。奠都天京后，中央设有诸匠营和百工衙，并置专门官员进行管理，军中设有各种典官负责军需供应。物资供应的品种主要有粮秣、服装、军械、火药等。其来源主要靠战场缴获和就地筹措，自已亦生产一小部分。具体做法有：纳贡（向地方摊派的物款）、打先锋（向地主官绅强迫索取）、购买（以银钱向人民交换各种商品）、贸易（通过开办商店等手段获取钱物）、查封官府库藏（没收攻占城镇一切官府物资）、税收（在建立政权的地方实行税收制度）。

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平时战时特有的后勤保障制度。圣库就是公库，之所以称圣库，是指万物皆归于上帝，再由上帝平均分配之意。它渊于上帝教的平等思想，也是根据太平天国“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基本纲领建立的。

这一制度，在金田起义前，即已建立。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载：起义前“秀全立即通告各县之拜上帝会教徒集中于一处。前此各教徒已感觉有联合一体共御公敌之必要。彼等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①。金田起义后，正式建立私人财物一概缴库，全军官兵及其家属的生活用品由公库供给的圣库制度，并用军事纪律予以保障。1851 年 9 月 25 日，太平军攻克永安后，洪秀全即下令“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② 次年秋，

①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六)，第 870 页。

②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第 65 页。

在进攻长沙时，又发布诏令："通军大小兵将，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尽缴归天朝圣库，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①。同年刊行的《太平条规》，也有不得藏匿金银器饰的规定。1853 年 3 月定都天京后，进一步规定"凡私藏金银剃刀即是变妖，定斩不留"②。这说明太平天国前期执行圣库制度是相当坚决的，同时也遇到了一定的阻力。据时人记载，当时仍允许私人藏有少量金银，其标准以金一两、银五两为限，超过者才予定罪。对于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基本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但官兵上下亦有等差。粮米、油、盐的定量，在正常情况下规定："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给米二百斤，油七斤，盐七斤"③。肉食供应规定："天王日给肉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④。其余每逢礼拜日吃肉一次，由各军向宰夫衙领取。⑤ 另，每人每日给买菜钱 11 文左右。衣着亦统一供给，也可依照规定服制自行制备，费用由公款开支。除此之外，官兵还发给礼拜钱。据中四军前营前一卒长覃瑞容禀文称：缘明天 19 日房宿礼拜之辰，弟统下四两司马，共带兄弟 135 名，内牌面 98 名，每名领钱 21 文，共领钱 2058 文，牌尾兄弟 37 名，每名领钱 14 文，共领钱 528 文⑥，二共应领钱 2586 文。又两司马四员，每员领俸钱 35 文，共领钱 140 文。小弟俸钱 70 文。统共实领礼拜钱 2796 文。"理合具禀，恳求师帅善人⑦ 发下，以便分与众兄弟同沾天恩，兼办供物，虔诚祭告天父"⑧。这一禀文说明，礼拜钱是买菜钱之外另外发给的津贴费，且有一定差别。将买菜钱与礼拜钱加在一起，官兵的费用还是比较充裕的。

---

①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第 69 页。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231 页。

③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277 页。

⑤ 参见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四），第 709 页。

⑥ 按 37 名，每名 14 文，共计应为 518 文，但禀文原文为 528 文。为与其总计数相符，此处仍保留原文。

⑦ 《太平礼制》规定师帅至两司马均称善人。

⑧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216 页。

太平军在革命初期的特殊环境中实行圣库制度，反映了贫苦农民摆脱饥饿、追求平等幸福生活的良好愿望，对于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加强军队内部团结，保证军队供给，防止贪污掳掠，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社会生产的发展观点来看，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太平军的供给制度不仅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而且只能适应某一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不能认为是一种可以固定不变的制度。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予以适当的、合理的改革，且不受封建特权和享乐腐化思想的侵蚀。太平天国自奠都天京以后，特别是到了后期，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处理好的。

除了重视解决物资保障外，还十分重视医疗保健工作。太平军不仅禁绝有害身心健康和影响战斗力的酒和鸦片，还非常重视医疗防护工作，以减少非战斗减员。各军中设有随队医生和护理人员；天京设有总药库、功臣衙，以管理药物，收容伤病员，其职同军帅至指挥的内外科医生多达160余人。太平军对老弱病残人员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对于战斗中负伤的人员，明文规定不准遗弃。扎营以后，“谕令拯危官员将所有能人，每逢礼拜之期，务要查实伤愈者几名，伤未愈者几名，一一报明，令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又令掌医（注：指外科医生）内医格外小心医治，拣选新鲜药饵，不可因其脓血之腥臭而生厌心。其为将佐者当公事稍暇，亦必须亲到功臣衙看视，其有亲属者，看其远近，酌量令其前来照料；无亲属者，本营兄弟总要小心提理，念同魂父（注：指天父）所生，视为骨肉一样”①。从上述谕令中，既可看出太平军将领对受伤兄弟的关心爱护，也可看出当时已初步建立了照顾伤病员的医疗系统和规章制度。

① 《行军总要》，《太平天国》（二），第428～429页。

八、地方武装——乡兵制

太平天国的地方武装是在建立地方政权之后产生的。太平军在金田起义以后的两年中，始终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在两湖以及自武汉东下金陵作战期间，对于已克之地均未设防固守。1853年定都天京后，太平军回师西征，始于克复之地建立地方政府，设官治理。地方官分守土官、乡官两级。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各级，因由群众公举本乡人充任，故称乡官。乡官以上称守土官，分三级：州县以监军治之，府郡以总制治之，省以总理民务官（或文将帅）治之。以上各官由天朝中央政府任命，领导各乡官，管理地方行政。

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治制度，体现了军政合一、兵农合一的原则。其基层组织，以居民户为基础，仿照太平军编制进行编组。按编制规定，军帅统辖1.3156万户，下辖5师帅，各统辖2631户；师帅下辖5旅帅，各统辖526户；旅帅下辖5卒长，各统辖105户；卒长下辖4两司马，各管26户；两司马下辖5伍长，各管5户。实际上，各乡官所管的户数常因当地人口、地理条件不同而多寡不一。各州县的军数亦不相等，有一县三五军者，有县中一乡即有二三军者。

乡官除办理地方政务外，还负责统率地方武装，维持地方治安。当时的地方武装称乡兵，是一种不脱产的武装力量。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上。""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子女约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则出一人为兵。"① 这里的"兵"即指乡兵。据《贼情汇纂》中说：乡官军帅"得发民为兵。所辖为伍卒，有冲锋、勇敢之名，家备戎装，人执军械，盖寓兵

①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一），第321、326页。

于农，令军帅兼文武之任也。”① 燕王秦日纲在《海谕县四民告示》中说：“各郡县业已团集乡兵，即有些少残妖拦入，何难一时扑灭。”②说明乡兵制度在太平天国前期是比较普遍的。

乡官领导乡兵的办事机关称局，下设若干办事人员。乡兵建有兵册、家册制度，以两为单位统计，记载官兵（或每户成员）的姓名、籍贯、年龄、性别、入营日期及地点等，逐级上报至中央天官丞相府。

乡兵除负担耕战任务外，还协助地方政府清查户口、征收赋税、安置难民、惩办贪污分子，并为太平军提供军事情报、供应军需物资等，对于巩固基层政权，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节　后期军制

太平天国后期，在军制方面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乃是伴随着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迅速封建化，和受封建主义思想严重侵蚀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总的趋势，不是向有利于军队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方向发展，而是恰恰相反。正因为如此，后期军制的变化，成为导致反封建反侵略战争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领导核心与指挥体系的变化

天京内讧前，由于总揽军政大权的杨秀清有魄力、有威望，因而太平军将士服从命令听指挥，协力同心，奋勇作战，进退有序。天京内讧后，前期所封诸王仅剩翼王石达开一人，“合朝同举翼王

①② 《太平天国》（三），第109、223页。

提理政务，众人欢悦”①。但是，洪秀全错误地汲取了天京内讧的教训，认为异姓王均不可靠，想把权力集中于洪氏家族手中，故在石达开辅政后，又加封他的长兄和次兄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对石达开进行挟制。次年5月，石达开被迫出走而安、福二王又不能服众，洪秀全不得不将他俩改封为天安、天福，增设正、副掌率以理政务。此时，实际上已无军事方面的统率权威可言。迨至1858年夏，又恢复了五军主将制度，以正掌率蒙得恩兼中军主将，总统全军；以在外统兵的大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俊（亦称韦之俊、韦志俊，于1859年10月降清）分任前、后、左、右各军主将，初步恢复了军事统帅权威。1859年4月，天王族弟洪仁玕从香港到达天京，不到一个月，洪秀全就封他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委以总理朝政重任。因功臣不服，洪秀全乃于同年先后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参与军事决策，形成了一个新的军事统率集团。1860年至1861年间，陈玉成、李秀成为实际上的军事主帅，陈玉成牺牲后，李秀成为最高统帅。但是，洪秀全对握有重兵的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仍心存疑忌，于是采取滥封诸王的措施，以分散他们的兵权，防止尾大不掉之势。

1860年，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南大营前，封李世贤为侍王；击溃江南大营后，又封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至1861年，已封了16个王（一说11个王）。1862年（同治元年）开始，封王益滥，漫无标准。如1862年初春，李秀成部下苏州守将陈坤书违法犯纪，恐忠王治罪，竟“使钱买作护王”②。据昭王黄文英说：“天朝的王有五等：若从前的东、西、南、北四王，翼王，现在的干王，执掌朝纲，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

---

①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第792页。

②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21页。

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① 又据《李秀成自述》称，列王之外，还有“王加头上三点以为坐字之封”的。由此可见封王之滥。

滥封诸王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其一，诸王建王府增部属，造成经济上大量浪费，政治上日益腐化。其二，如李秀成所说，“无功偷闲之人，各有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不服，战守各不争雄”②。破坏了选贤任能的干部政策，造成上下离心，战斗力下降。其三，严重削弱了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由于各王职爵相等，拥兵自重，因而往往各自为战，互不协同配合。这种现象在1860年～1861年的安庆保卫战中已有明显的暴露。此后，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日益抬头，不顾大局，不听指挥，各自为战，互不支援，“散慢不可制”的状况更趋严重，以致后期的太平军虽多达百余万，却被指挥统一、兵力集中的近20万湘、淮军各个击破，直至全军覆没。

由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领导集团的生活奢侈腐化，等级制度异常森严，影响所及，使文臣武将的名位观念日益滋长，一直发展到“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③ 的地步。深居幽宫、锦衣玉食的洪秀全为了笼络部属，稳定军心，维系向封建化下滑的农民政权，除滥封诸王外，还乱添官爵，致使官吏多如牛毛，军队指挥体系混乱不堪。

太平天国前期，军队的指挥体系已经出现重叠现象，到了后期，这种现象更为突出。约于1857年，在前期所设燕、豫、侯三爵的基础上，增设了义、安、福、燕、豫、侯六爵，位居主将之次。因如前所说，太平天国的官职与爵阶不分，故即使仅有爵号者，同样可以指挥军队。至1860年，在五军主将之外又增设了四

---

① 《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57页。

②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30页。

③ 洪仁玕：《立法制喧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4页。

方主将和佐将，其地位仅次于主将和后来的王。是年冬，复于主将之上、王之下增设天将、朝将。天将又分有特号者、无特号有数字者、无特号无数字者，共有几百人。朝将只分有特号与无特号两种。

1862年以后，军中高中级带兵官大体上由王（军师）、天将、朝将、主将以次相承，另加六爵，杂以神将、神使、大佐将、正副总提等组成。此外，在太平天国的“名册”、“清册”中尚列有文武军政司、参军、参政、护军、经历、通传、宣传、奉宣、议政司、总尹、副军、校阅、按柬、提牌、参尉、监尉、武尉、骁勇校尉、威武车骑将军，等等。其层次之多，名目之繁，令人咋舌。前期所设的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这时已降为低级带兵官，军队基层指挥官的官价大幅度上升，燕、豫、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已取代了前期军帅至两司马的位置，成为新的基层指挥官。军队基层军官的名称也五花八门，极不统一。

乱添官爵的结果，不但助长了官兵追名逐利的私欲，削弱了斗志，涣散了军心，而且使官高位低、官爵与职务不符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层层叠叠的官阶，必然造成各自为政，互相掣肘，指挥体系混乱不灵的局面。

二、军队编制的变化

太平天国后期，不仅军队的番号名目繁多，而且军队的编制也由单一变成了多种类型。

后期军队的番号主要有：李秀成的忠义宿卫军、陈玉成的忠勇御林军、李世贤的忠正京卫军、林绍璋的忠敬陛卫军、蒙得恩的忠贞朝卫军、杨辅清的忠壸都卫军。此外，还有前期已经设置的殿前军、殿后军、殿左军、殿右军、殿中军。1861年，天王下诏改国号为“上帝天国”，称军为天军，称兵为御林兵，又有襄天天军、受天天军、对天天军、见天天军、扶朝天军番号出现。后来又有按京内京外、春夏秋冬雷电、东西南北而定的番号，如殿

前京内统率天军、殿前京外统率天军、殿前东方统率天军至殿前北方统率天军、殿前春季统率天军至殿前冬季统率天军、殿前京内电察天军、殿前东方电察天军至殿前北方电察天军、殿前京内雷震天军、殿前东方雷震天军至殿前北方雷震天军、靖东军、定南军、平西军、征北军。另外，还有堂卫军、征讨军、讨逆军、招讨军，以及从宿卫军分出的殿左东破忾军、殿前南破忾军、殿后北破忾军等，番号之繁，不可胜数。

后期军队编制的变化，因文献不足，尚难了解全貌。但从现存的太平天国“兵册”、“名册”及清方所辑的《伪官执照清册》、《伪印清册》等资料中，亦可窥其大略。太平天国后期因事权不一，制度纷更，各王所统部队的编制多有变化，但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前期军制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大致可分三种类型：队营之制、旗队之制和五行数字之制。

队营之制。比较典型的是英王陈玉成的部队。1861 年 4 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伪英王统下，有五大队，五小队。五大队：前大队，则天义梁成富；左大队，吁天安卜占魁；右大队，量天安唐正才；中大队，格天义陈时永；后大队已散。五小队：前队，裁天福黄；左队，监天安马；右队，浩天安刘玱林（即精忠主将）；中队，涵天安罗正举；后小队已散。”① 又据曾参加过英王部队的赵雨村说：“英王自带中队中，十万；中队左、中队右、中队前、中队后，各队五万，皆系上将管带。前营八大队，后营八大队，右营八大队，中营八大队，无一不立功者。”② 上述两个材料及其它材料的记载，说明英王所统部队实行的是队营编制。队分前、后、左、右、中，有大队小队之别，互不统属。随着队伍的扩大，又以方位、数字排列。队之下分前、后、左、右、中 5 营。中队 5 营称：中队前、中队后、中队左、中队右、中队中。队前

---

①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 1987 年版，第 599 页。

② 刀口余生：《被掳纪略》，见《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下同），第 207 页。

冠以“英府”、“英殿”二字。至于营以下又如何编组，尚无文献可查。

又据护王陈坤书部下兵册记有《护殿前一队理天义右营嶟天安泮天安属下年名菁（清）册》，说明陈坤书的部队也是实行队营编制。1859年11月的《忠王李秀成致伦天燕韩碧峰肅天燕韩绣峰书》中说：“所虑五河张家沟之事，内中军机，纸上不便谈兵，业已排齐兄之次子并朗天福，仍命巍天豫带同三大队官兵前来明光、池河等候。”① 1862年3月的《忠王李秀成给忠逢朝将刘肇均谆谕》中说：“已饬六王宗与忠佑朝将黄弟一面扎队兵进泗泾，一面会带各队合兵力攻七宝。……忠孝朝将之队饬赴吴淞口相地安营……然弟队兵士虽多，颇形散漫，须要留心整饬，以肃戎行”②。说明忠王李秀成的部队亦早有队的编制。又如先随石达开出走的童容海，后脱离石达开“万里回朝”时，仍然使用军营编制。该部于1861年在江西归隶李秀成，童后封保王，其《清册》中记有“保府后大队哨务”，“保殿大前队巡查”等官照，说明该部后来也改作队营制了。

另外，从《鉴天豫涂命殿前右六十二丞相曾在本队宣讲道理照会》中可以看出，早在1857年，有的部队即已按队进行编组。该照会说：“兄愚思军规不整，队伍紊乱，是以兄派分队伍：吁天侯卜弟分为前队，羡天侯倪弟分为后队，但弟统带之官兵，分为右队，如兄与丞相蒙弟共为中队。凡行军之节，各归各队行走，各归各队驻扎。凡遇诛妖之时，务要各归各队迎剿……以免紊乱。”③不难看出，队营制是后期太平军最早也是比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编制。

旗队之制。旗队编制实际上是队营编制的变种。1862年以前辅王杨辅清的部队多采用这种编制。据《清册》记载：有杨辅清以东殿主将衔签发的“左旗参卫将军”的官照，以辅王衔签发的“辅殿中旗左队队旗丞相”、“辅殿前旗后队持旗检点”、“辅殿后旗

①②③《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45、202、181页。

后队前营监尉”、“辅殿左旗后队右营后武尉”等官照。杨辅清部将杨雄清曾以晤天义衔签发了“本阁后旗中队右骁勇校尉”的官照，以卫王衔签发了“卫殿左旗中队右骁勇校尉”等官照。从这些官照所列的番号，可知辅王杨辅清的部队有前、后、左、右、中5旗，每旗辖前、后、左、右、中5队，每队辖前、后、左、右、中5营监尉，每营辖前、后、左、右、中5个武尉。这样，辅殿共有5旗，25队，125营，625武尉。各级主管官：旗为参卫将军，队为骁勇校尉，营为监尉，其下为武尉。其中队旗丞相、持旗检点并非主官。这些官衔都是杨辅清部所特有的。根据官印的大小比照，监尉与侯爵相当，武尉与丞相一样，均属基层军官。

另外，翼王石达开出走后，亦曾用旗队之制，其主管官有“后旗宰辅”、“右一旗大军略”和“中旗中制军”等称号，均冠“翼殿”二字。

五行数字之制。实行这一编制的主要有侍王李世贤及其部将阙天义马桂功的部队，忠王李秀成、辅王杨辅清的部队也曾使用过。它曾是太平天国后期一度通行的军队编制。其番号以五行（金、木、水、火、土）、数字、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正副、前后、左右编排。见于《清册》的官照有“土一百二十三己官培天豫”、“土二十一戊官副恒天侯”、“木三十五甲官副前旗丞相”、“土二十一戊官正后旗右检点”、“金四十一辛官正前旗左猛勇指挥”、“木三十五甲官正前旗左威武车骑将军”等。其中的土二十一、木三十五、金四十一等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编制单位，相当于前期的军，多以燕爵以上官员统之，豫、侯、丞相、检点等官仅相当于前期的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的职位。据此，以土二十一为例，可推出下列编制系列简表：

土二十一(燕)	戊官(豫)	正(侯)	前旗(相)	左(检点、指挥、将军)
	己官(豫)	副(侯)	后旗(相)	右(检点、指挥、将军)

由上可知，太平军后期的编制已很不统一，队营、旗队、五行数字之制既相互交叉，又同时并存。那末，太平军的编制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对此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从某些史实中可以

大致了解其变化的原因。罗尔纲在《太平军每军实数及后期编制考》一文中所作的分析是较有说服力的，在此再作一些补充。归纳起来，有下述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如前所述，前期太平军按编制长期不满员，而且缺额十分严重。这种架子甚大而兵员甚少的情况，于作战、指挥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有改变编制的实际需要。二是《行军总要》明确规定，行军时部队应按前、中、后三队编组，在驻扎、迎敌时，亦应按队分派任务。每军的兵员缺额如此严重，又要求按队行动，这就进一步提出了改变编制的必要性，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将临时编组的队逐渐变成了固定的编制。因为作这样的变动，既利于平时集中管理，又利于战时进行兵力部署和作战指挥，只要分析一下向横方向扩展的队营制的编制，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优点。因此，也可以说这种变化是战争实践的结果。不过，当时的组织纪律已相当松弛，因而编制的改变，并不一定就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三是这种变化是在中枢领导不断削弱，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日益抬头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军队的编制很可能不会发生变化，即使变化，也不会出现多种形式的编制。正因为编制不统一，在同一战场出现几种不同编制和互不统属的部队，以致同样十分不利于集中统一指挥。不仅如此，编制的多样化，还与军队私属性的倾向日趋严重密切相关。为此，洪秀全曾下令严禁统兵将领把部队“称为我队之兵”，而一律改称“天军”，反映了在军权问题上的尖锐斗争。

三、圣库制与军纪的变化

太平军实行圣库制度，如前所述，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即使在前期，从天王屡次下达严禁私藏私带金银的禁令来看，这一制度也未能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迨至奠都天京以后，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生活奢靡，器用豪华，予取予求，毫无约束，仅专门管理各王府生活起居的典官，都在1000人以上。其他将领上行下效，聚敛钱财，挥霍浪费，已无清廉自奉可言。在这

种情况下，建立在人无私财和近乎平等供给基础之上的圣库制度，势必受到重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原来规定的各种严格的军事纪律，有不少也逐渐成为一纸空文。两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太平天国后期，圣库制度遭到破坏的程度更加严重，主要是人无私财的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史料记载中可以发现以下一些事例。例如，一部分官员颇爱吸烟饮酒，而《太平条规》规定“不得吸烟饮酒”，圣库也不供应这些物品，试想如无私财，怎能经常买烟买酒？私财的来源有以下途径：一是破坏一切缴获要归公的原则，私吞财物，贪污受贿。有的史料记载：“凡搜括货财，第一次皆献其主，由贱奉贵，层叠以进于伪王；伪王又择其多且珍、嘉且旨者，以贡于伪天王，而辇运于所谓天京者。……第二次便准入己，或所统之主见而爱之，硬索无厌，故往往两三人为一路，各搜各物，乖巧刁恶者辄多所获”①。有的史料记载：“其所得之银，巨数悉归贼目，以次递上，归之贼首，总解金陵。……间或亦有私蓄者，寄藏奸民家”②。还有的史料称：太平军“打先锋”所得银钱衣服，均“各自收藏”③。这些史料难免有诬蔑不实之辞，但缴获归公制度已遭到破坏则是无疑的。二是通过经商和出售物资获取私财。后期太平军在各城镇所设店铺，既有公营的，也有私营的，其私营所得利润，自然装进了个人的腰包。关于出售物资的记载也很多，有的甚至“沿街货卖”。在缴获归公制度已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卖货所得钱款，自然不可能全部上交。三是利用权势，牟取暴利。据李秀成说，1860年他赴湖北接兵前，曾在天京邀集合朝文武会议，劝大家“凡有金银，概行要多买米粮”。后因天王两兄仁发、仁达乘机作弊，强令买票缴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④从中可以看出，正是洪氏集团带头以权谋私。

①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见《太平天国》（五），第277页。

② 柯超：《辛壬琐记》，见《太平天国资料》第190页。

③ 顾深：《虎穴生还记》，见《太平天国》（六），739页。

④《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13～814页。

其实，当时上自洪氏集团下至各王，都已拥有巨额私财。就连支撑天国大厦的忠王李秀成也是“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①。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后，李秀成将现银150万元及无数宝物尽入私囊。② 1863年，苏州、无锡军情紧急时，李秀成在天京要求回苏州坐镇指挥，天王和朝臣要他助饷银10万两，方准出城，李秀成“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③。天京陷落后，李秀成出逃时，尚将许多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又如，叛徒郜永宽刺杀苏州太平军主将慕王谭绍光，向“洋枪队”头子戈登及李鸿章乞降时，“只要求带着全部财产告退还乡”④。常熟守将叛徒钱桂仁广收金器，打成金狮一对、金凤一对献给李秀成，立即受到加官晋爵。⑤“章王林绍璋内外阴结而务财用私设……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⑥。

事实说明，后期圣库制度的破坏是与太平天国领导者政治上渐趋腐败直接相关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有利于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更合理更完善的后勤保障制度，相反，只能是每况愈下。

尽管如此，圣库制度并未完全废弃。主要表现在太平军广大官兵的日常生活用品仍然采用供给制的方式，粮、油、盐和副食费的定量，有的与前期相同，有的略低于前期。服装也仍由公家供给。1863年以后，由于领土日蹙，物资日缺，有些部队的供应定量不得不有所降低。最后，困守天京的部队，枵腹与敌作战，这是战略决策失误所致，与供给制度本身无直接关系。

太平军后期由于人数不断增加，官兵成份相当复杂，加之将

---

① 《陈文英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58页。

② 参见《华北先驱》周报，第564号。

③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26页。

④ 《戈登发表的苏州杀降的经过》，《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下同），第88页。

⑤ 参见顾汝钰：《海虞贼乱志》，见《太平天国》（五），第373页。

⑥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二），第847页。

领的思想日趋腐化，放松了部队的管理教育，对于维护军纪起很大作用的圣库制度已日益遭到破坏，因而违法乱纪事件屡见不鲜。即使如此，仍有不少将领重视整饬军纪，改善军民关系。1861年，襄天军主将黄等颁发布告宣布："军令整肃森严，禁止奸烧等项。不论官兵人等，犯之立斩法场。"① 1862年底，驻守浙江的一百六十二天将林彩新也公开宣布："倘有不法官兵，下乡奸淫掳掠，无端焚烧者，准尔民捆送卡员，按依天法，轻则枷号杖责，重则枭首游营。"②天京失陷后，太平军余部处境极为困难，但一些领袖仍强调维护军纪。1864年9月，李世贤在福建漳州"厘定规章，重修条律"，重申"不准一兵一卒下乡扰民"，严令士兵须"和善待民"。这些事例，反映了农民起义军对待人民群众的正确态度，也是能坚持战斗到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乡兵制的变化

太平天国前期，在其所控制的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比较健全，乡兵制度也比较普及，对于巩固根据地和支援太平军作战起了积极作用。到了后期，江西、安徽的根据地逐渐缩小，乃至最后全部丢失。虽于1860年新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但乡官制度不如前期完善，少数地区未设低级乡官，有的乡官竟由豪绅地主的爪牙充当。至于乡兵，据郦纯先生考证："后期是否普遍组织乡兵，更成问题。""所见记载1860年以后江、浙太平军事迹诸书，没有关于组织乡兵的明确材料。"③ 有些地区即使有地方武装，也是地主武装转化而来和临时招募的。如《吴江庚辛纪事》说："镇天侯费设保卫局，用枪船数十号。""钟监军设局斗坛，招乡勇30名，昼夜巡防。"④《辛壬琐记》说："尚有伪乡官亦招健儿于幕下，作自

---

①②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42、159页。

③ 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下），第409页。

④ 《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46～48页。

卫计。”① 显然，这些地方武装已不同于普遍设立的乡兵组织。

乡兵制度的废弃，十分不利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太平军的作战。以苏福省为例，当太平军守将熊万荃在苏州主持民务期间，苏州、无锡一带“各路乡镇白头团勇四起，其尤著者，永昌徐氏、周庄费氏，扼守最固。熊皆致书与之约，各不打仗，仍各自团练，并亲至面订要约，实欲预留地步”②。后来熊万荃等密谋降清，这个永昌徐氏就起了牵线搭桥作用。1863 年，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叛降淮军首领李鸿章，慕王谭绍光等率队往攻时，永昌团练居然袭击太平军。后来淮军进攻苏南，“亦借民团未散之力”③。由此可见，不用乡兵取代地主团练武装，实属战略性失误。

第三节　对军制的评价

一、军制的优点

综观太平军的军制，确实具有明显的优点。对此，即使与太平军敌对的势力，也不乏赞美之词。《平定粤匪纪略》的作者杜文澜认为，太平军所以能“支梧十余年，则其军制有足恃者”④。《北华捷报》在“1860 年回顾”一文中也承认“太平叛军有出色的组织”，“使他们显得比敌方高明得多”。⑤ 其优点主要表现在：

（一）编制正规，组织严密。在这方面，前期的编制，十分明显。后期的队营制和旗队制，也基本上保持了层层节制，分合咸宜的特点。这种正规化的编制，是太平军得以坚持长期斗争的重要条件。

（二）纪律森严，赏罚分明。由于太平军不仅规定了严细的纪

① 《太平天国资料》第 191 页。

②③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见《太平天国》（五），第 301 页。

④ 《平定粤匪纪略》“附记三”，第 5 页。

⑤ 《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23～424 页。

律，而且突出反映了“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和“秋毫无犯”的精神，加上执法甚严，又注意“讲道理”，因而既增强了内部凝聚力，又深得民众拥护，使其成为颇有战斗力的武装集团。太平军后期，虽然纪律松弛，但在群众纪律方面，仍然好于公开纵兵抢掠的后期湘军和由湘军衍生的淮军。

（三）重视后勤建设。后方设有诸匠营和百工衙，组织军需和军械物资的生产；军中设有职同监军的各种典官及其属官，负责物资供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军还非常重视医疗保健工作，因而减少了非战斗减员。如此健全的后勤组织，实为农民起义武装所罕见，对于保证战斗任务的遂行起了重要作用。

（四）注意在根据地内建立非正规武装乡兵，以与正规军协同配合，形成比较完整的武装力量体制。尽管乡兵制没有贯彻始终，但作为农民起义军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

二、军制的缺点

太平军军制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中央没有设立负责作战、军训和纪律检查等任务的专门军事机构。前期，东王杨秀清总理朝政，仅以王府所设二部综理军政事务。在政繁事杂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专门处理军务的机关，无疑对建军、作战都是不利的；在天京内讧以后，便出现了人亡政息的现象，使日常军务工作前后脱节。后期，李秀成虽封为“真忠军师”，但也没有一个专门的军事机关，何况他还经常亲自统兵征战，更不能处理全局性的军务。加上洪秀全封王过滥，山头林立，实际上无法建立最高指挥权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机关。

（二）指挥层次重叠，机关属员臃肿。作为一军之长的军帅只有统军之权而无指挥之权，甚至负责后勤的典官也不归军帅节制，从而造成部队管理与作战指挥、后勤供应脱节。军帅之上设有监军、总制，总制成为一军全面负责的最高长官。这样，不论平时

战时，遇有情况，军帅均须逐级向上请示，公文往返，迁延时日，影响及时决策，乃至丧失稍纵即逝的战机。各级官署的属员，不是按任务繁简而是按主官官阶高低配备，从而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既增加军费开支，又不利于行军作战。

（三）编制缺乏灵活性。陆营、水营、土营，装备不同，任务各异，却一律按军、师、旅、卒、两编组，未照顾各自的不同特点。加上兵员始终没有按编制配齐，而且缺额相当严重。这两方面的缺点，都影响到兵力的调配与使用，影响到部队战斗力的充分发挥。

（四）官制文武不分，往往让一些缺乏军事斗争经验的文官、宠臣出任军中要职。后期官阶庞杂，指挥系统相当混乱。这也是造成许多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

第七章　湘军和淮军军制

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兴起以后，作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主要工具——军队，除原有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外，又相继成立了被称为“勇营”的湘军和淮军。这两支新建的军队，逐渐取代八旗和绿营，成为镇压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各族人民起义的“劲旅”。此后，在收复新疆之战、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又充当清军的主力。湘、淮军的军制，在晚清延续了三四十年，对近代中国军制的变革和发展以及对内对外战争都有重大的影响。

第一节　湘军军制

一、建立湘军的起因和组建方针

1852 年（咸丰二年）5 月，太平军出广西向两湖进军。奉命追堵太平军的绿营兵，畏缩不前，纷纷溃败。清政府慌了手脚，一面继续征调各省绿营堵截，一面袭用嘉庆时镇压川楚白莲教的故伎，下谕“邻贼”各省兴办团练，以助“攻剿”。1853 年 1 月 8 日，清政府命在家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① 办理湖南团练事宜。接着，在安徽、江苏、河南、直隶、山东等 10 省大举办团，先后任

① 曾国藩（1811～1872），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历任内阁学士，礼、兵、刑、吏等部侍郎。1852 年因丁母忧回籍。次年借办团练之机组建湘军，抵抗太平军。1860 年授两江总督。1864 年因指挥湘军攻占金陵有功，封一等侯爵。1865 年，奉命“剿捻”，师久无功。1865 年回两江总督任，旋授大学士。1868 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 年，再任两江总督。1872 年病死。

命团练大臣 45 人。曾国藩深知绿营固然不可恃，但团练这种非正规武装也不是英勇善战的太平军的对手，因此萌生了组建新的地主武装的思想。但咸丰帝只让他帮办湖南团练，没有赋予他编练军队的任务。为此，他于到达长沙任所的第二天（1 月 30 日），向清廷上了一道奏疏，首先肯定办团练“诚为此时急务”，同时委婉地提出了难于向“小民”捐集经费等困难；接着说明因湖南标兵多半外调，长沙城内兵力单薄，因而已将招募的乡民“于省城成立一大团”；最后提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① 咸丰帝在这一名为办团练实欲重起炉灶办正规军的奏折上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钦此。”于是，曾国藩便打着办团练的旗号，放手组建被称为湘军（又称湘勇）的正规武装。1853 年初，曾国藩将 1000 余人的团练编成左、中、右 3 营，每营 360 人，是为组建湘军之始。至 1854 年初，已编成陆师 10 营、水师 10 营。同年 2 月 25 日，曾国藩率湘军水陆两师及长夫等共 1.7 万人自衡州（今衡阳市）起程，开始与太平军西征军接仗。后又不断扩充，至 1856 年发展到 6 万余人，1864 年进攻金陵时多达 12 万人。此后，曾国藩虽将由其直接统辖的湘军大量裁撤，但仍保留了由左宗棠、鲍超等节制的湘军。他本人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而成为“中兴名臣”，其他一些重要将领也陆续爬上了总督、巡抚等高位，形成了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军事集团。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确定了以下基本方针：一是仿照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束伍成法”；二是以勤王忠君和维护封建礼教为根本宗旨；三是变革绿营的“调遣成法”和各种积弊，总的目的是使其成为一支领导集中、指挥统一、组织严密、能遂行机动作战任务的武装。上述原则，分别体现在湘军军制的各个不同侧面。湘军的另两个统帅胡林翼和左宗棠，对湘军建设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

① 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 21 页。

二、选将、募兵的标准和办法

（一）将领的选择

曾国藩在奏折中所提出的“改弦更张”，主要指重新组建一支革除绿营各种积弊的军队。他非常痛恨绿营在作战时“败不相救”、“胜则深妒”的恶劣行为，进而提出应建立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①，“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②的军队。而组建这样的军队，必须先从选将募兵入手，尤其是把选将作为首要任务。正如曾国藩所说，没有优秀的统领、营官，即使有百练的精兵，也未必能克敌制胜。关于将领的标准，集中体现在下面一段话中。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③ 对于高级将领，曾国藩还强调要知人善任，善观敌情和善用谋略。由此可见，曾国藩心目中的将领必须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即所谓的“忠义血性”。

曾国藩所指的“忠义血性”之人，主要是既受封建礼教熏染

---

① 曾国藩：《与王璞山》，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东方书局 1935 年版（下同），卷 2，第 31 页。

② 曾国藩：《与文任吾》，《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2，第 33 页。

③ 曾国藩：《与彭筱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3，第 38 页。

又少官场恶习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其次是绿营中有“诚朴忠义之气”的“末弁”（下级军官）。曾国藩通过广求博访、优礼相待等办法，终于网罗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少数绿营末弁，成为湘军的骨干。经过战争的实践，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将帅，后又擢升为督、抚重臣。据不完全统计，官至督抚者多达26人，官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者不下100余人。

湘军的将领中，不但知识分子占多数，而且大多为湖南籍人，不少人还有师生、亲戚关系。对封建礼教的虔诚和乡里、师生、亲戚的私谊这两根纽带把湘军将领拴束在一起，结成患难相扶、荣辱与共，坚决与起义农民为敌的“死党”，并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绿营“败不相救”、“胜则深妒”的弊病。当然，这种“近亲繁殖”的将领结构，只能收功于一时，不能见效于久远。后来，湘军的派系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将领之间演出了不少互相争权夺利、彼此攻讦的闹剧，就是明证。

（二）士兵的招募

曾国藩鉴于实行世兵制的绿营，不但羸弱的士兵充斥营伍，而且在执行差役的过程中沾染了取巧、偷懒、钻营、逢迎、吸毒等不良习气，以致几无战斗力可言。于是，决定改行募兵制，在兵员条件和募兵手续等方面，借鉴了戚继光编练抗倭军的一些规定和办法。

关于兵员的条件，曾国藩承袭了戚继光的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而用乡野老实之人的主张，提出：“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① 另外，绿营士兵也不收录。他认为山乡农民犷悍壮健、朴拙少心窍，便于教育训练，因此湘军创建之初，主要招募湘乡、宝庆（今邵阳市）等山区的农民，尤以湘乡人为多。

关于募兵手续，曾国藩也承袭了戚继光的保甲之法，主张

---

① 曾国藩：《营规》，见《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世界书局1936年版（下同），第51页。

"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以便清查"①。其目的是为了使士兵受到地方官吏和军营官弁的双重控制，为了家室的安全，不敢擅自离队；即使开了小差，也可按籍查找。

曾国藩还主张将士兵以县、乡为单位进行编组，利用地域观念维系内部团结。他还认为湘籍士兵具有"可以理喻感情"，"不肯轻弃伴侣"的优点，所以，即使在外省作战，仍由统兵将领回湘省募兵，成为名符其实的湘军。后来，因招募过多，出现了兵源匮乏的现象，才不得不在湖北、江西、安徽等作战省份就地招募少量士兵，补充缺额。

根据上述条件和手续招募的士兵，其素质无疑优于绿营士兵，因而也就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是，用乡土观念和保甲制度约束士兵的思想和行动，不可能真正达到巩固部队的目的。湘军后期，不但逃亡现象无法杜绝，而且士气日益涣散，最后只好大量裁撤，便是明证。

三、部队编组与武器配备原则

由于清廷对绿营实行"化整为散"的方针，将部队分散驻防于各汛地，用以"治民"，虽分标、协、营、汛，却无统一定额，战时则东调西抽，临时拼凑成军，统兵之将又由朝廷临时简任而非本营之官，以致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习。曾国藩认为，正是这种"调遣成法"，造成绿营在战时缺乏整体观念，难收统一指挥之效。有鉴于此，他决定承袭戚继光的"舍节制不能成军"和应由私人选拔将弁兵勇的主张，编组湘军，做到编制固定，员额固定，平时成建制训练，战时成建制调遣，并归固定的统领、营官指挥。其编组的基本原则是：士兵由什长挑选，什长由哨弁挑

① 曾国藩：《营规》，见《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第51页。

选，哨弁由营官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统领则由统帅委任。如果统领、营官易人，其所属营、哨同时解散，由新的统领、营官重新选募编组。这一编组原则，固然有利于加强内部节制，密切上下关系，从而顺畅地遂行作战指挥；但同时也使上级与下级、官长与士兵之间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封建私属关系，军队不归兵部掌管，地方督、抚也无权过问，而只听曾国藩等人调度指挥，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将为帅有”的私兵制先例，进而导致清朝的兵权开始下移，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

湘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归统领节制，统领则听命于统帅。初期，统领所辖的营数不多，尚便于管理和指挥。后因营数日增，乃由湘军另一统帅胡林翼率先于1860年在其所指挥的部队中设立了分统，统率3至5营。此后，湘军中便普遍设立了分统。这样，就形成了统帅、统领、分统、营官编制序列。营以下又设哨、队两级。营的编制和武器配备情况如下：

（一）陆师营制

湘军初建时，陆师每营定额为360人，约于1853年底1854年初改为505人。1860年11月1日，曾国藩在皖南祁门时，参照左宗棠、胡林翼、李续宾、王鑫所定之制，对湘军营制又作了核定，以后再无变更。其具体编制如下：

一营下辖亲兵6队，前、后、左、右4哨。每哨下辖8队。全营有营官1人，哨官4人，哨长4人，什长38人，护勇和正勇416人，伙勇42人，共505人。①

亲兵6队中，一、三队配劈山炮，二、四、六队配刀矛，五队配小枪。每队什长1名，亲兵10名，伙勇1名。6队共计72名。

一哨设哨官1名，哨长1名，护勇5名，伙勇1名。每哨8队，一、五队配抬枪，二、四、六、八队配刀矛，三、七队配小枪。每

① 除定额为505人外，营官还聘有帮办、军装（管帐目）、医生、书记、工匠等，无定额。

队什长1名，伙勇1名，正勇10名（抬枪队正勇12名）①。一哨合计108人。前、后、左、右4哨合计432人。

上述营制，体现了简化组织层次，便于指挥的原则。将冷热兵器间隔配置，利于相互支援、掩护。

为了既能保证后勤供应，又革除绿营强拉夫役的弊病，湘军专设"长夫之制"，规定各营配长夫180名。计营部78名，亲兵队14名（劈山炮队各3名，刀矛、小枪队各2名），每哨22名（哨官4名，抬枪队各3名，刀矛、小枪队各2名），4哨共88名。其主要任务为搬运子药、火绳和军需物资，构筑营垒。②长夫制的设立，还能减少士兵的杂役，使其得以专心练习战守，以便"募一兵得一兵之用"。因长夫不配武器，故行军时需战斗部队掩护。

湘军行军作战，驻扎各地，设"帐棚之制"。每营配有各式帐棚98架（夹帐棚18架，单帐棚80架）。计营部10架（夹帐棚8架，单帐棚2架），亲兵队共12架（夹、单帐棚各6架）；每哨19架（夹帐棚1架，单帐棚18架），4哨共76架（夹帐棚4架，单帐棚72架）。曾国藩建立"帐棚制"的目的，一是便于对部队进行管理和训练，便于对付敌方的偷袭；二是不让部队像绿营那样挤占民房，骚扰百姓。从实际效果看，前者比较明显，后者只能相对减少扰民事件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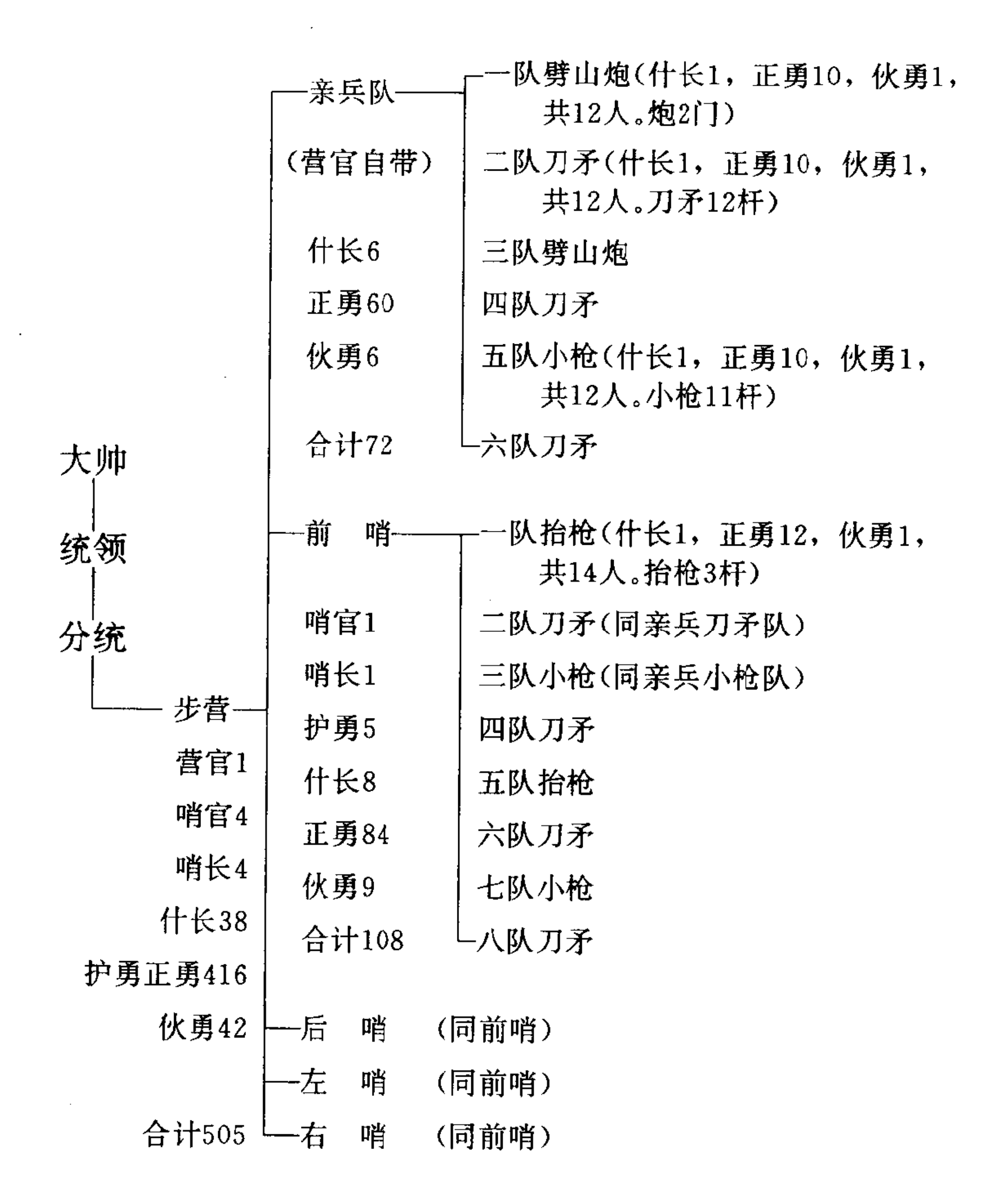
湘军的武器配备，基本上是冷热兵器各半。以一营为例，全营共有38队，其中枪炮19队（劈山炮2队，抬枪8队，小枪9队），刀矛19队。全营有枪、炮共127件，其中劈山炮4门，抬枪24杆，鸟枪99杆。劈山炮多为300斤以下的前装滑膛炮，以铜铁铸成，炮弹为群子，每放一炮可装100余粒或三四百粒，依

---

① 抬枪在道光时为2人一杆，后改为3人一杆，湘军成立时又改为4人一杆。

② 曾国藩在衡州组建湘军时，曾雇募挖煤工500人，以为开挖地道之用。1854年4月，湘军在岳州战败后，挖煤夫役散去。此后，长夫中再无此种专门组织。

湘军陆师一营编制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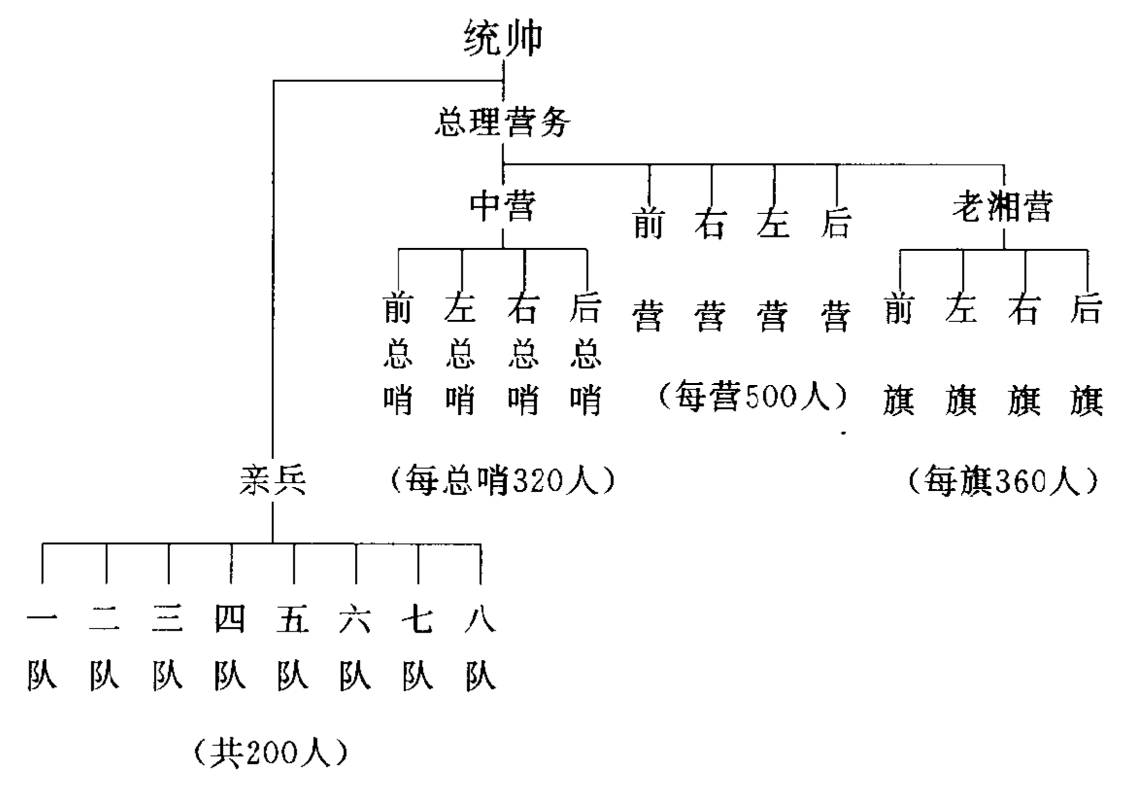


装药多少可远可近,最大射程可达1000余米,数分钟始能施放一次。小枪队装备的鸟枪,重约8斤,前装药,火绳发火,有效射程在120～150米之间,射速每分钟约1～2发。抬枪实际是一种大型鸟枪,重20余斤,威力较鸟枪为大,有效射程约二三百米。火器队每个士兵还配有腰刀,以备短兵接仗之用。刀矛队主要使

用长矛和长刀。此外，还配有火罐、火箭、喷筒等燃烧性火器。从总体上看，湘军陆师火器持有者的比例，略大于八旗、绿营，即由 30～40%提高到 50%，因而相应地提高了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后湘军陆续装备了部分洋枪洋炮，水师从一开始就配备了洋炮。但就数量和质量而言，并不优于太平军后期的某些部队，而且明显差于后起的淮军。

湘军军制，以陆师的营制影响最大，不仅水师、马队的营制脱胎于此，而且以后的淮军、练军、防军、巡防队的编制无不以此为蓝本。

顺便指出，胡林翼在组建属于湘军系统的"鄂军"时，与曾国藩所定的编制略有不同。他规定每营的员额少则 500 人，多则 700 人，统领还可另招二三百人作为亲兵。1860 年夏，左宗棠奉命组建属于湘军系统的"楚军"时，既参照了曾国藩所定的编制，又保留了由王錱统率的"老湘营"的编制，还有他自己的独创，因而与曾国藩所定的营制差异较大。详见下表。



上述编制的特点是，与曾国藩所定的营制一样，组织层次少，便于指挥调度和信息传递，但营以下既有总哨，又有旗、营，不

仅名称不同，而且兵员定额各异，因而在战斗部署时，不如曾国藩所定的营制简便。上述营制，为陕西、甘肃、新疆的军队所袭用，直到清末编练新军时才改变。

（二）水师营制

湘军水师的创建稍晚于陆师，大约在 1853 年 9 月曾国藩从长沙移驻衡州后始定营制。水师营制仿效陆师，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其人数依各营编配的战船多少而定。快蟹船配 45 人，其中桨手 28 人，橹工 8 人，舱长 1 人，头工 1 人，舵工 1 人，炮手 6 人；长龙船配 24 人，其中桨手 16 人，橹工 4 人，头工 1 人，舵工 1 人，炮手 2 人；舢板船配 14 人，其中桨手 10 人，头工 1 人，舵工 1 人，炮手 2 人。督阵舢板略为长大，配 20 人，增设桨手 6 人。最初一营水师有快蟹 1 艘，由营官领之，为指挥船，长龙 10 艘为正哨，舢板 10 艘为副哨，但各艘战船未设统一指挥的哨官。全营共计 425 人，营、哨官除外。1854 年 4 月，曾国藩所率湘军水师在靖港战败，战船损失 1/3。5 月，在长沙整军时，每艘战船始添设管驾者 1 人，名曰哨官。次年 1 月，在湖口之战中，湘军水师被太平军水师分割为二，轻舟陷入鄱阳湖内，留在长江的大船运转不灵，被太平军水师焚毁数十艘，损失甚重。此后，遂将快蟹船裁撤，改水师营制为：长龙船 8 艘，舢板船 22 艘，全营有战船 30 艘，共 500 人（营、哨官不计在内）。与此同时，曾国藩还规定在各船桨手中指定数人为火弹手。至此，水师营制略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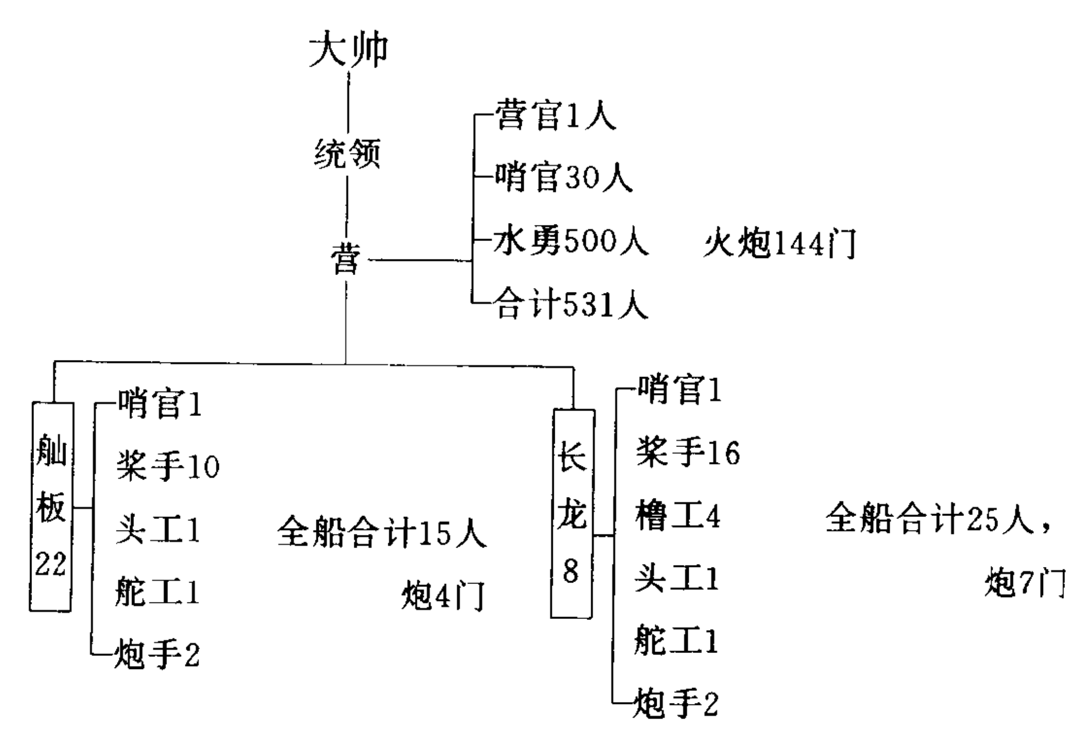
各式战船的形制及武器配备情况如下：

长龙船底长 4 丈 1 尺，底中宽 5 尺 4 寸，中装窗槅。船头置炮 2 位，重 800 斤、1000 斤不等，边炮 4 位，梢炮 1 位，各重 700 斤。桅杆和船梢各挂旗帜一面，以别营、哨。

舢板船底长 2 丈 9 尺，底中宽 3 尺 2 寸，船头置炮 1 位，重 700 斤、800 斤不等，梢炮 1 位，重 600 斤、700 斤不等，两边有转珠小炮 2 位，重四五十斤不等。旗帜同长龙船，略小。舢板船无篷板，配有夹帐棚一顶覆船。因弁兵长年住船上，不许登岸，遂另造长龙船载辎重，称为公船。

各船所配之火炮均系洋装①，为前装滑膛炮，有效射程在1000米左右，其质量略优于绿营内河水师所配的火炮。此外，每条战船尚配有鸟枪、刀、矛、火箭、喷筒等武器，以备近战之用。

湘军水师一营编制表



（三）马队营制

湘军建成之后，先在一些陆师中组建少量马队。1859年2月，曾国藩又奏请在陆师中添建马队（2000余骑）。其统一营制的制订，则在同年11月曾国藩令李鸿章派人在安徽颍、亳一带招募马勇之时。规定4名马兵为1棚，6棚为1哨，10哨为1营。全营有哨官10名，正勇240名，由营官率领。营官尚有帮办、字识②各1名，亲兵8名。另有先锋官5名，作为一棚；设步队亲兵1棚，由什长1人、亲兵10人组成，专负接受营官差遣以及看守营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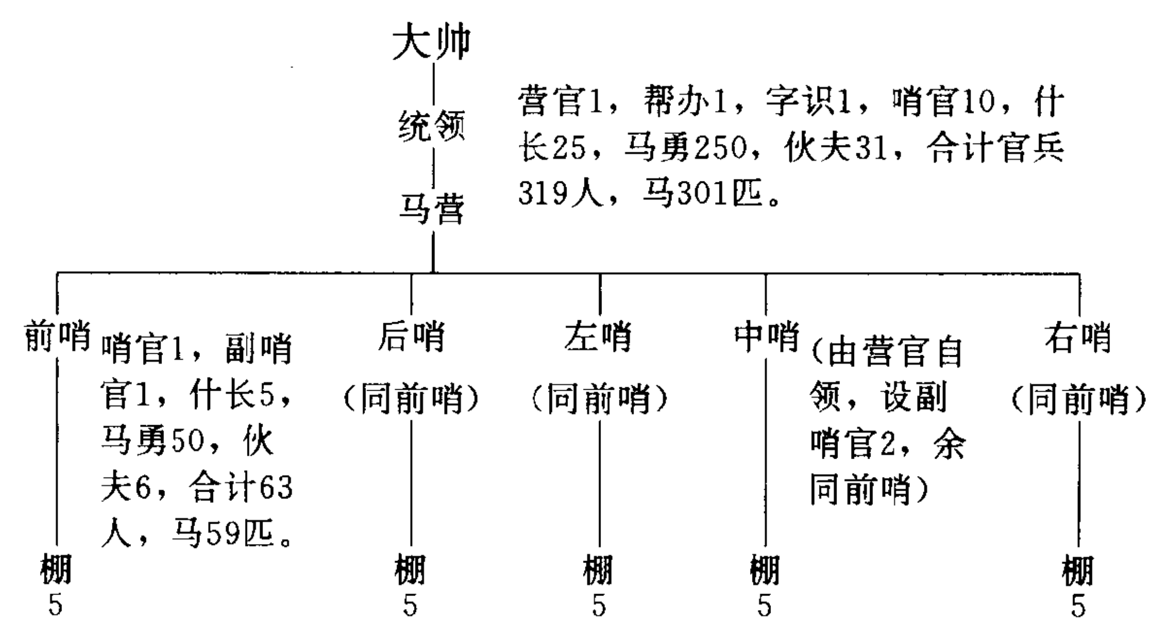
① 洋装，系西方火炮的统称。其来源一是通过广东的外商购买，一是仿照洋式自己鸠工制造。其火药、铁子、铅弹，由湖南、湖北、江西等省接济。

② 字识，为军中办理文书的人员。

任务。总计全营 277 人。另有公用长夫 40 名（负责搬运军械、草料），单夹棚帐 69 架，马圈棚 72 个。1865 年（同治四年），曾国藩率部“进剿”捻军时，又改定马队营制如下：

每营设营官 1 名，帮办、字识各 1 名，分前、后、左、中、右 5 哨。营官掌中哨，设副哨官 2 名，其它 4 哨设正、副哨官各 1 名。哨分 5 棚，每棚什长 1 名、马勇 10 名。营官及两副哨官、帮办、字识共用伙夫 2 名，4 哨之正、副哨官共用伙夫 4 名，每棚各用伙夫 1 名。全营共计 319 人。另有兽医、铁匠若干名。营官配马 4 匹，帮办、字识各配 1 匹，正、副哨官各配 2 匹，什长、马勇各配 1 匹，全营共配马 301 匹。为解决马匹的更新补充，每年准报倒毙 36%，如数进行换补。马队使用的武器有鸟枪、弓箭、马刀等，具体配备情况不详。为了保证物资搬运，每哨准雇（或购买）大车 1 辆。南方不便使用大车，全营准另雇长夫 40 名。

湘军马队编制表



（四）营务处与粮台

湘军的机关设置，有营务处与粮台。

营务处类似现在的司令部，分设于水师与陆师。其职能为：根据统帅的意图，负责作战计划的制定、军队部署的调整、发布号

令、书写作战文书和执行军法。湘军的营务处与其它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还是培养人才的场所。曾国藩把延揽来的或主动投靠他的一批儒生，作为幕僚，先安置在营务处，让他们学习与军事有关的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以后，根据需要和各人的才能，分别委以各种不同的职务。营务处没有固定的编制人数，通常被称为主事的只有一至三人，另有若干办事人员。后来，随着湘军的不断发展和作战的需要，凡独当一面的统领，均辖有前敌营务处，由智勇兼备的亲信总理营务。

粮台，类似现在的后勤机关，主要担负粮饷、军械的收发任务。其机构较营务处复杂，共设 8 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 1 人，以总其成，每所设委员若干人，各司其职。粮台主管官员由主帅亲自委任，集兵权、财权于主帅一人手中，实现后方供应与作战指挥的统一，改变了绿营将帅的作战指挥权与后勤管理权脱节，以致往往影响作战的状态。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初期，粮饷军械以水运为主，粮台多设于水次。稍后，在长沙、岳州设后路粮台，又在汉口设转运局。1855 年，又在江西南昌设后路粮台，1860 年又设总粮台。1861 年湘军攻占安庆后，又在安庆设立粮台。但前线部队所需的粮饷子药仍靠水师运输，陆师营盘一般都靠近水师。湘军的粮台实际是后勤补给站，其钱粮军械均来自有关省份的转运局、支应局和火药局、炮局，再由粮台分发各部。湘军的后勤供应，虽自成体系，但被兵省份的督抚也负有供应责任，如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等，都曾是湘军后勤的主持者。特别是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以后，湘军的后勤供应系统便与有关省份的藩司、粮道、盐道直接结合起来。曾国藩利用总督之权，把地方财政之权揽在手中，以供应湘军。

左宗棠用兵西北期间，由于粮饷军火的筹运比在南方困难得多，因此更加重视粮台等机构的设置，注意选调廉洁能干的官员从事后勤工作，调集足够的部队保护粮道，使用车、驼等各种运输工具，实行节节转运，并号召部队“且耕且战”，终于克服了后

勤供应的困难，保障了前线作战的需要。

四、薪饷章程及筹饷措施

湘军的饷章是针对绿营兵平时“坐粮”太薄，不能安心操防，战时“行粮”虽厚，却无益于提高战斗力的教训而制定的①。曾国藩初到长沙时，地方兵勇的饷银各不相同，如张国梁的勇营每兵月饷5两8钱，江忠源的勇营每兵月饷4两5钱。1853年夏，内阁学士、帮办军务胜保奏请给予陆勇月饷4两5钱，得到户部议准。从此江南大营募勇即照章办理，定为奏销常例。曾国藩参照上述饷章，制定了不区分平时战时的湘军水师、陆师的粮饷章程。1859年添练马队时，复定马队饷章。

（一）陆师饷章

营官月给薪水银50两、办公费150两，均不扣建②。凡帮办、军装（管帐目的）、书记、医生、工匠的薪粮，以及置办旗帜、号衣等费用均包括在内，由营官酌量开支。

哨官日给银3钱，大建月月薪9两。哨长日给银2钱，大建月月薪6两。什长日给银1钱6分，大建月月薪4两8钱。亲兵、护勇日给银1钱5分，大建月月薪4两5钱。正勇日给银1钱4分，大建月月薪4两2钱。伙勇日给银1钱1分，大建月月薪3两3钱。长夫日给银1钱，大建月月薪3两。

全营每月共需银，大建月2890多两，小建月2800余两。在镇压捻军时，因部队流动性大，每营每月又增柴草银160两、油烛银30两。

---

① 绿营士兵的月饷，马兵2两，步兵1两5钱，守兵1两，另每月给米3斗。战时，加上盐折、夫价、余丁等款，每兵月支银则在5两上下。实践证明，由于平时饷薄，已严重影响部队的训练，战时临时加饷，也无补于战斗力的提高。

② 夏历，月大称大建，月小称小建，不扣建即小建月不扣一天的薪水。

统领、分统的薪水及办公费，以营官的薪水及办公费为基准，依所统带的人数多少从优酌加。凡统 3000 人以上者，每月加银 100 两，加夫 10 名（夫价银 30 两）；统 5000 人以上者，每月加银 200 两，加夫 20 名（夫价银 60 两）；统万人以上者，每月加银 300 两，加夫 30 名（夫价银 90 两）。为了限制军中浪费和冒领军饷，又规定统带 1000 人者月支饷银不得超过 5800 两，统带万人者不得超过 5.8 万两。总的看来，湘军的军费开支还少于绿营兵，绿营每用兵 1000 人，其"行粮"加"坐粮"每月约需银 7000 两，而湘军 1000 人，每月开支只有 5700 余两。不过湘军的包干制度，正好为营官、统领压减各项必要开支，将公款纳入私人腰包开了方便之门，导致贪污腐败之风日益发展。

饷章中还专门规定对战时阵亡、伤残者实行"恤赏之制"，凡阵亡者，每人恤银 30 两。受伤者的恤银分为三等，一等 15 两，二等 10 两，三等 5 两。因伤致残者，另加赏银。

（二）水师饷章

营官月给薪水银及办公费 200 两，不扣建。

哨官日给银 4 钱，大建月月薪 12 两。舵工日给银 1 钱 5 分，大建月月薪 4 两 5 钱。头工、炮手日给银 1 钱 4 分，大建月月薪 4 两 2 钱。桨手日给银 1 钱 2 分，大建月月薪 3 两 6 钱。① 此外，还有其他人员的薪水。

全营每月共需银，大建月 2400 多两，小建月 2300 多两。

统领的薪水和办公费同陆师。

（三）马队饷章

营官月给薪水、马干银 50 两，办公费 100 两。帮办月给银 16 两。字识月给银 9 两。

正哨官月给银 18 两，副哨官 15 两，均不扣建。什长日给银

① 据曾国藩在《会议长江水师营制事宜折》中称：厥后因银价日贱，米价日贵，桨手加为每月 3 两 9 钱。（见《长江水师全案》，清光绪十三年刻本，卷 2，第 9 页。）

2 钱 6 分，大建月月薪 7 两 8 钱。马勇日给银 2 钱 4 分，大建月月薪 7 两 2 钱。伙夫日给银 1 钱 1 分，大建月月薪 3 两 3 钱。

全营每月需银，大建月 2400 多两，小建月 2300 多两。在镇压捻军时，每营每月增发柴草银 80 两、油烛银 20 两、雇车银 20 两。

统领的薪水及办公费同陆师。

由于湘军不属国家经制兵，因而保举之官很少能得到实缺，有的虽衔列总兵、参将，而实际职务仍为哨官。为了控制军费开支膨胀，曾国藩规定：营哨各官论功则随时保擢，领饷则从不加支，即使从千把保至提镇，而薪粮如故。即所谓“专论差使，不论官阶”。

上列三种饷章，在当时无论对士兵或将弁都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兵的饷银较绿营兵多 1～3 倍，与农民相比，一个湘军正勇的年收入不仅远高于一户佃农的收入，而且相当或优于一户自耕农的收入。① 所以，不少青壮年乐于投军，安心服役。将领的收入更为丰裕，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② 与绿营将弁相比，湘军一个营官的月饷相当于绿营参将的月饷（平均 61.9 两）3 倍多，相当于绿营守备的月饷（平均 24.2 两）约 8 倍。湘军实行厚饷制，固然调动了农民、儒生从军的积极性，有利于巩固部队和战斗力的提高，但也存在着困难和问题：一是给筹饷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虽然多方张罗，也难满足需要，故有“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的说法，甚至因饷粮不支而影响一些作战计划的实施。为此，曾国藩等经常采取给部队发半饷以至故意欠饷（少者数月多者半年以上）的办法，前者为了缓解筹饷不及的矛盾，后者为了防止士兵拿到饷银后即离营而去。二是湘军官兵除了优厚的正常收入外，还

---

① 一名湘军正勇年收入白银 45 两以上，而当时一户佃农的年收入白银约在 5～30 两之间，自耕农的年收入白银约在 33～50 两之间。

② 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 1983 年版），第 163 页。

通过攻占城市后进行抢掠等获取非法收入，从而日益滋长了贪利享乐的思想，成了战斗力的腐蚀剂。如1854年10月，湘军攻占武汉后，水陆弁勇抢获许多财物，便“颇有饱则思飏之意”。三是曾国藩原以为给予优厚的待遇，可以培养军官廉洁的风气，其实不然，他们照样克扣粮饷，滥行摊派，中饱私囊，影响士兵的实际收入，从而使官兵矛盾日趋尖锐。湘军后期多次发生的索饷哗变事件表明，优厚的薪饷，并不能解决封建军队中固有的矛盾和弊病。

由曾国藩直辖的湘军，从1853年招募到1864年大批遣散，历时12年，其军费开支约计银3000万两。① 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1853年国库存银不足235万两），无款可拨，如此巨大的开支完全依靠“就地筹饷”解决。曾国藩等先后采取的筹饷办法大致有七种：一办捐输，二运饷盐，三兴厘金，四拨丁漕，五请协济，六提关税，七收杂捐。其中又以办厘金收入为大宗，大约占其军费的一半，故称之为“养命之源”；其次为饷盐、捐输、丁漕、关税、协济等。曾国藩对筹饷有功者大加褒奖，认为他们的功劳“不在前敌猛将之后”。“就地筹饷”固然解决了湘军的燃眉之急，但带来的恶果也是明显的。它破坏了清代各省岁入由户部掌握，军饷由户部调拨的定制，造成了督、抚专擅地方财政的局面，致使国库更加空虚。同时，削弱了清政府通过掌握饷权以控制军权的能力，并进一步加重了这支军队的私属性，因为官兵所得的饷银完全决定于统帅之能否筹到款子，形同私惠。

五、军政训练制度

湘军的战斗力之所以高于绿营，除了上述几方面的改革之外，

① 不包括刘长佑、田兴恕等军用款。胡林翼、左宗棠任巡抚以后所统部队的军饷亦不包括在内。

注意军政训练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曾国藩非常重视湘军的训练，建军之初，他常亲自给官兵训话，后又亲自制订了训练的方针和规章制度。

湘军的训练内容分两大部分：一是“训”，即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纪律和封建伦理道德等内容；二是“练”，即战术技术教育，主要有营规、技艺、阵法等内容。他说：“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士兵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① “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

湘军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抓的是纪律教育。它不仅是提高战斗力的需要，也是争取民心的需要。当时，太平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称赞，而清军及新募潮勇肆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有鉴于此，曾国藩“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②。在编练湘军之初，即规定了严格的军律，如禁止吸洋烟、赌博、喧哗、奸淫、谣言、结盟拜会、异服等。违犯军律者，轻则训斥，重则革除、斩首。曾国藩还利用每逢三、八日操演的机会，招集诸勇进行说教，中心是不扰害百姓。他还亲自编写了通俗易懂的《爱民歌》，令士兵背诵执行，“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③。当然，作为笃信程朱理学和决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曾国藩，尤为注意以“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和“忠信”、“仁礼”等儒家思想教育官兵，借以树立与“犯上作乱”的农民起义军顽抗

---

① 曾国藩：《批韩参将进春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第54页。

②③ 曾国藩：《与张石卿制军》，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36页。

到底的思想，维护军队中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从而有效地控制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曾国藩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他所统率的部队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虽屡败而不溃散，这与重视教育训练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官兵的养成教育，曾国藩强调一个“勤”字。他认为“军勤则胜，惰则败”①，如果平时不养成早起、习劳、忍饥和耐寒等习惯，战时就难以适应紧张艰苦的环境和有效地战胜敌人。为此，他对湘军的每日操课极为重视，并亲自制定了七条日夜常课之规：

1、五更② 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③ 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

2、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3、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点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4、日斜时，演晚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

5、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6、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二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约每月四五次。

7、每夜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者，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上述规定，一能约束士兵的行动，养成紧张的习惯；二能勤于操练，精于技艺；三能做到常备不懈，临敌不乱。在操课中，曾国藩特别强调将领要起表率作用，即使统帅也要亲自点名、看操。

湘军每日出操的内容，主要是练习技艺、阵法，每日都有明

---

① 曾国藩：《致宋滋久》，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第238页。

② 旧时一夜分五更，每更约二小时。

③ 湘军扎营时所筑的营墙称墙子，站墙子即守卫营墙。

确的规定，共计五条：

1、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曾国藩亲下教场，看练技艺、演阵法。

2、每逢一、四、七日午前，看本管官下教场演阵，并看抬枪、鸟枪打靶。

3、每逢二、八日午前，看本管官带领赴城外近处跑坡、抢旗、跳坑。

4、每逢五、十日午前，在营中演连环枪法。①

5、每日午后，在本营练习拳、棒、刀、矛、钯、叉，天天坚持，不得间断。

对于各项技艺及阵法的演练亦有具体要求，如士兵要能翻越7尺高的墙子，跳过8尺宽的壕沟，抛掷火球、石子要能打中10丈远的靶子，枪能命中击远，拳棒刀矛要精熟。阵法，初练的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及《握奇经》中的八面相应阵，其后又练一字阵、二字阵及方城阵等②。就一营而言，应区分为一正，两奇，一接应，一设伏，四者相互协同配合。

湘军除演习阵法以外，还特别注意扎营、拔营、看地势、明主客的训练。

扎营。扎营训练，乃是湘军因初期不谙扎营之法，屡被太平

---

① 为前装火器时代的一种射击方法。即六人分三对，重叠排列，第一对卧射，第二对跪射，第三对立射，六枪齐放后退至队尾，另六人前出如前法施放，轮番更替。

② 一字阵、二字阵，为进攻战斗队形。各营按一列横队排阵为一字阵，按二列横队排阵为二字阵，各列均按长短兵器梯次配置。曾国藩认为：打仗用二字阵最好，前一层打冲锋，后一层排立不动，最易取胜。若被敌围，可将二字阵变成四方阵，前一层换成前左两方，后一层换成后右两方。

四方阵（四面相应阵），为防守或退却时的战斗队形。前者向敌，后者面向归路防敌抄尾，左者排列枪炮防敌包左，右者排列枪炮防敌包右。曾国藩认为此阵极为稳妥，足以自保。他还认为，除一字阵外，只要练好二字阵、四方阵就可以了。

军所破，遂汲取教训，向太平军学习的结果。曾国藩亲定扎营之规八条，提出了选择营地的条件（占山、旁险、近水源等）；规定每到一地，无论风雨寒暑，必先筑营墙，营墙没有筑成，部队不准休息，也不准搦战。要求墙子需高8尺、厚1丈，上筑枪炮眼，下筑子墙为站立之地；壕沟最好有2～3道，深1.5丈；花篱5～6层，三者缺一不可。全营开两门，前门要正大，后门要隐僻。亲兵居中，前、后、左、右4哨分扎四方。曾国藩还要求即使军队在某地只住一夜，也要深沟高垒，坚不可拔。这是因为当时战争双方争夺营垒的阵地战多于野战，故先求自固，而后伺机出击。

拔营。拔营时，规定以七成队准备打仗，以三成队掩护辎重。其行进序列，依敌情而定。敌在前，则七成队在前，锅帐担子在中间，三成队殿后。敌在后，则反之。多营同时开拔，不准相互参杂。拔营前，应选派善看地形、善察敌情的将领带七八人在本队10～20里前探路，树木、村庄、叉路、桥梁均需一一探明，以防敌人伏击。这些规定，目的在于保持临战队形，以便一旦与敌遭遇，不致造成被动。湘军的行军速度偏慢（多者日行40里，少者仅二三十里），虽然有利于蓄养精力，却不利于捕捉战机。

看地势。曾国藩特别重视勘察地形的训练。要求对战区的道路、地势，以至小径小溪、一丘一壑，都要细细察明，绘在图上，做到一目了然。他不仅以此作为考核将领才能的重要标准，而且要求士兵也能辨认。在战时，他特别强调将领要亲赴现地勘察，并不得多带队伍，以免被敌人发觉。

明主客。曾国藩特别强调将领要善于辨明主客，提出“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张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他认为如果敌来攻营，则凭墙坚守，避其锐气，待敌气衰力竭之时，然后出战，可一举胜之。如果我为客敌为主时，则应反客为主，即不可强攻坚城，必筑坚垒、长壕以困敌，使敌来求战。

对于水师的战术训练，分为结营、行军、接仗三种。结营，要求小舟依洲，大舟横流，相距要疏，以避风浪撞损。行军，则乘逆风逆流，其次顺风逆流，最忌顺风顺流，能进而不能退。接仗，

以舢板当先，快蟹、长龙进行掩护。

为了增强军政训练的效果，曾国藩还把平时战时对将弁士兵的要求，编写成易读易记的歌诀，名为《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令将领讲解，士兵背诵。其内容有平时的着装、军纪，武器的保管、保养，训练的要求、方法，行军时的顺序、侦察，营地的选择方法和营墙的构筑规格，作战时的兵力部署、指挥要领和各种情况的处置，几乎包罗无遗，起到了相当于条令和条例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曾国藩组建湘军，从官兵选募、编制体制、武器配备、薪饷待遇和教育训练等各方面，都改弦更张，另立新规，别开生面。它虽然开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恶劣先例，同时存在着封建军队所不可避免的一些弊病，但就总体而言，远比八旗、绿营的军制优越，对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明显的作用。无可讳言，湘军的建立，是晚清军制变革的先导，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湘军的军制，在不少方面也优于太平军的军制。例如，它的组织指挥层次远比太平军少，官少兵多，前期基本上保持满员，不存在太平军那种官多兵少、士兵缺额严重的现象，因而更便于指挥、利于作战。又如，水师的战船形制、火器配备、战船和运输船的分别编组以及平时的训练等方面，均超过太平军的水营，从而得以战胜太平军的水营，实现控制长江江面，有力地支援陆营作战的目的。这也足以说明，湘军军制的优点和特点，是其成为取代绿营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得力工具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当指出，由于湘军以“兵为将有”为主要特征，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又屡立“战功”，自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以后，其他一些重要将领也逐渐由单一统兵者变为集地方军、政、财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吏，形成了一个颇有势力的湘系集团。这样，就破坏了原来各省事权互相牵制、权归中央的局面，开创了督抚专擅地方事权的先例。此后，各省督抚与中央的关系，逐渐处于游离状态。

可以这样说，湘军的崛起，虽然暂时挽救了清政府的垂危统

治，但清王朝的最后覆亡，与湘军制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节 淮军军制

一、淮军的由来及其发展

（一）淮军的由来

1860年5月，太平军李秀成、陈玉成等部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拔掉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外围的清军据点。接着，李秀成率部东征，连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昆山、太仓、嘉定、青浦等地，开辟了苏、常根据地。此后，又乘胜进攻上海。清廷因苏南失守，严重影响到财赋的收入，因此亟谋恢复。但江南大营的覆灭，表明再也不能指望绿营与太平军作战，于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同年6月，清廷改变抑制湘军集团的政策，下谕由长期“客寄虚悬”的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8月，实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在此期间，清廷一再催促曾国藩派兵东进，规复苏、常。而已获军政大权的曾国藩为贯彻其先占安庆、再攻天京的既定方针，继续集中兵力进攻安庆。1861年9月，湘军攻占安庆之后，曾国藩即积极进行进攻天京的部署，本着“先剪枝叶，后图根本”的作战方针，除直接进围天京外，还分兵进攻浙江、苏南，对天京的太平军取大包围态势。

1861年10月16日，上海官绅鉴于江苏巡抚薛焕治兵无状，上海岌岌难保，便派户部主事钱鼎铭至安庆见曾国藩，请他派兵援沪。这时，太平军已攻占浙江的绍兴、宁波、镇海，进围杭州，湖州、上海受到威胁。11月4日，清廷谕令曾国藩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并迅速派兵收复苏、常。曾国藩原定由其弟曾国荃率部援沪，但曾国荃欲争立进占金陵的首功，拒不从命。曾国藩便决定由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招募淮勇，另立一军援沪，控制“筹饷要区”。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庐州（今合肥）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捻军。1855年，因从战有功，记名以道府用。1856年，加按察使衔。后因所率之团练败溃，便于1858年入曾国藩幕襄办军务，备受曾国藩赏识和器重，并在政治上、军事上受到了严格的锻炼。李鸿章接受募兵任务后，即将与他素所熟识并已接受曾国藩领导的庐州、庐江的张树声、张树珊、吴长庆、潘鼎新、刘铭传所部团练，汰弱留强，补充新勇，按湘军营制分别改编成树字营、庆字营、鼎字营、铭字营，加上原有的春字营①，共2500余人。1862年（同治元年）2月，所募各营陆续抵安庆城外集中训练。曾国藩鉴于新募之军兵力不足，又拨一部分湘军作为骨干力量，计有韩正国统带的亲兵营两营，程学启统带的开字两营，陈飞熊统带的熊字一营，马先槐统带的恒字一营，滕嗣林、滕嗣武兄弟统带的林字两营，共8营4000余人。这样，初建的淮军共有13个营头，6500余人。3月4日，曾国藩、李鸿章检阅了这支部队，是为淮军成立之始。②由于无论是淮北的团练，还是拨归淮军的湘军各营，都长期与太平军、捻军交锋，因而淮军组建伊始，即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和对付农民起义军的经验。其中程学启部战斗力最强，被称为“淮军之冠”。

关于淮军的进军方式，曾国藩与李鸿章商定，拟于3月初随曾国荃所部湘军攻取巢县、和州、含山，尔后“傍城冲过”，进驻镇江，再派兵数千去保卫上海。当时，正是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上海官绅希望淮军尽快抵沪对抗太平军，乃由苏松太道吴煦

---

① 春字营的统领为张遇春，原为李鸿章在皖北办团练时的部将，李鸿章离开后，张遇春所部改隶湘军，当时即称春字营，成立淮军时，又改隶李鸿章。

② 因所募各营成员大多来自淮河流域，故称淮军，亦称淮勇。另据李鸿章奏称：咸丰十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命安徽桐城县儒生马复震带震字一营，名曰淮勇，是为淮军的发轫。（参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9，第23～25页。）

倡议，由绅商筹银18万两，雇英轮7艘，将淮军由水路分批直运上海。淮军的作战任务，也就变为先保上海，再攻苏南，逆取金陵。4月6日至5月3日，李鸿章及驻安庆的淮军全部抵达上海。与此同时，李鸿章之弟李鹤章在皖省所募亲兵1000人和部分战马，以及周盛波、周盛传所率之盛字营、传字营，从陆路绕江北至沪，使淮军增至8000余人。4月25日，清廷根据曾国藩的"密荐"，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12月实授）。成为集政、军、财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吏。

（二）淮军的发展

当时，上海有四种武装力量：一是由原江苏巡抚薛焕所统率的绿营兵约4万余人，二是以维护商业为名宣布"保卫"上海的英法侵略军，三是受雇于上海地方官绅并受外国侵略势力操纵，由美国流氓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后改称"常胜军"），四是团防局所属的团练。李鸿章抵沪后，鉴于淮军兵力尚单，便一方面抓紧淮军的训练，一方面筹措粮饷，裁汰旧营，组建新营，扩充实力。先收编了薛焕派人回两淮招募的首批到沪的700人，成立了奇字营（统带刘士奇），继将南汇城的太平军降众编为建字营（统带吴建瀛）、玉字营（统带刘玉林）、有字营（统带方有才），又将上海一部分绿营改编成升字营（统带覃联升）、松字营（统带郭松林）、云字营（统带周士濂）、勋字营（统带杨鼎勋）、常字营（统带况文榜）。从5月起，淮军联合英法军队和"洋枪队"与进攻上海的太平军作战。6月，曾国藩又派总兵黄翼升率淮扬水师战船200艘约4000人到达上海。9月，黄翼升任江南水师提督，节制松江、上海水师，协同陆师作战。10月，李鸿章又派魏承樾及鼎、铭、树、开各营官回皖募勇9营（时因金陵上游防务吃紧，被曾国藩抑留防守无为、庐江，于1863年春归建），后又从里下河招募5营，使淮军的实力渐增。

1862年秋，淮军在英法军、"洋枪队"配合下，向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发起进攻，至1864年5月，占领了整个苏、常地区。在此期间，淮军又先后成立了志字营（统带张志邦）、桂字营（统带张

桂芳）、介字营（统带符信）、良字营（统带周良才）、胜字营（统带李胜）、昌字营（统带周寿昌）、忠字营（统带骆国忠）、荣字营（统带骆金荣）、群字营（统带余拔群）、义字营（统带董大义）、芳字营（统带张士芳）、华字营（统带吴毓芬）、濂字营（统带杨宗濂）、得字营（统带徐得胜）、虎字营（统带梁安邦）、会字营（统带周志鸿）、护军营（统带郑海鳌）、护卫营（统带曹仁美）以及抚标亲兵营、恩字营、德字营、振字营、学字营、聘字营、鹏字营等。至1863年夏，人数达四五万人。1864年8月，淮军已发展到水陆140营，约7万人。稍后，李鸿章鉴于淮军过于庞杂，加之欠饷较多，便裁减了22营，保留118营，近6万人，每月仍需饷粮军火银50万两。①

1866年12月，李鸿章奉命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军务。淮军的营头又略有增加，如成立了忠朴营（统带为李鸿章之弟李昭庆）、凤字营（统带董凤高）、仁字营（统带唐仁廉）等。以后，兵力虽续有增加，却很少设立新的营头。当时，增加最多的是马队，约30余营，马7000多匹。镇压捻军期间，淮军处于全盛时期，全军约10万人。西捻军被镇压后，淮军于1868年12月裁撤马步50营，3万余人。后裁撤至4万余人，驻防直隶、山东、江苏、湖北各要地。淮军除马步队外，还有一支配有长龙船4只、舢板83只的小型水师，分驻直隶天津、山东济宁和江苏清江、瓜洲、扬州一带，用以梭巡护运。李鸿章凭借这支武装，为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于1870年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高位，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人物。此后，淮军还参加了中法、中日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长达30年时间内，它始终自成一系，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军事力量。

---

① 淮军攻占苏南各县后，李鸿章计划只保留淮军3万人。后接受曾国藩大量裁撤湘军、保留淮军的建议，仅裁撤了少量淮军。

二、装备编制的变化和军队的特征

淮军初建时，悉仿湘军军制，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粮饷待遇、军政训练，均以湘军的制度、规定为依据。何况，淮军初建时的13营中，有8营原来就属于湘军。所以，淮军脱胎于湘军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李鸿章也自称："湘淮营制，同一家法。"①

但是，当李鸿章率淮军抵达上海后，在与装备洋枪洋炮的英法军队和"洋枪队"接触以后，就萌生了改善淮军武器装备的思想，并随着武器装备的变化，淮军的编制、训练等方面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同时，由于李鸿章急于扩充实力，因而在选将、募兵等方面，也有悖于曾国藩所确定的原则，并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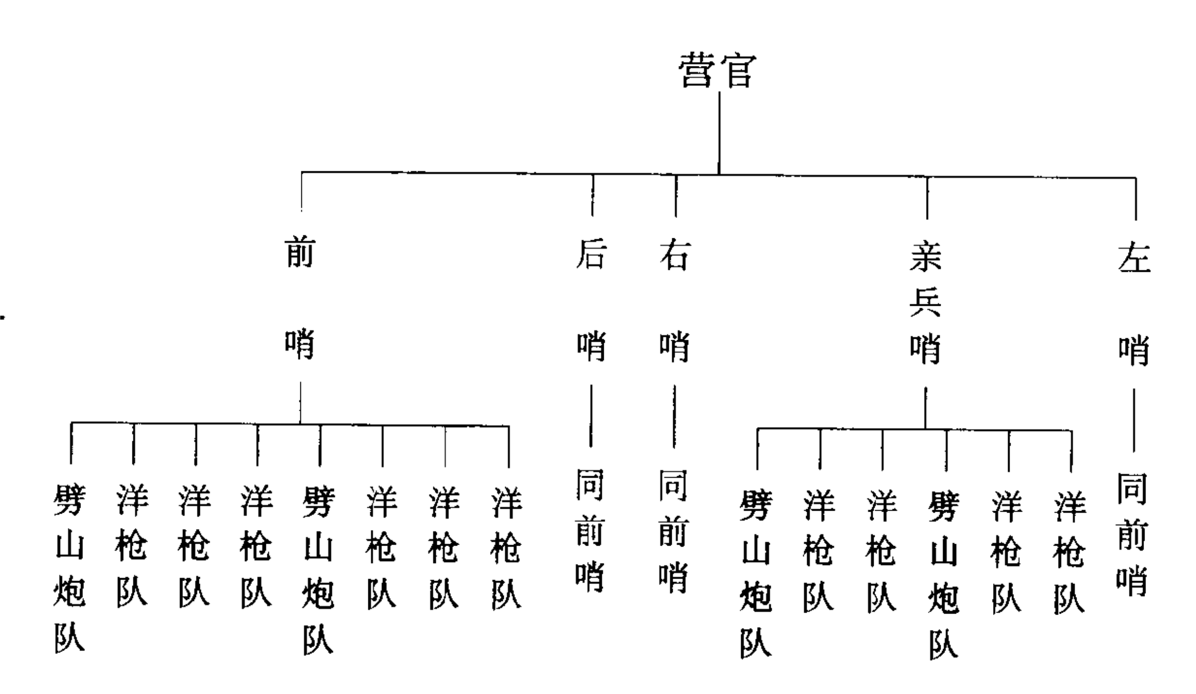
（一）改用新式枪炮，组建新的兵种

淮军初建时，其武器装备的配置悉如湘军，半为刀、矛等冷兵器，半为传统的鸟枪、抬枪和劈山炮。但当李鸿章指挥淮军伙同"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时，即发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1862年5月，他在给曾国藩的报告中称："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② 他在参观英、法两国的军舰后指出：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精，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振，实非中国所能及。为了提高淮军的战斗力，李鸿章决定用洋枪洋炮装备部队。同年7月，首先将韩正国所率的亲兵2营改为洋枪队，并于8月的七宝街、北新泾之战中获得大胜，从而增强了使用洋枪的信心和决心。9月，开始将各哨之刀矛、鸟枪队改为洋枪队，每哨编2个劈山炮队。最先改装的是程学启部。其编配情况见下表：

---

① 李鸿章：《寄江督曾》，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891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1905年金陵付梓（下同），卷1，第20页。



改装后的淮军，一营共有 28 个洋枪队，10 个劈山炮队。每营洋枪多者 400 余枝，少者 300 余枝，为湘军陆营的 2.2～3 倍；劈山炮 40 门，为湘军陆营的 10 倍。就质量而言，当时的洋枪虽然还是前装枪，但已使用铜帽装火药，后嵌铜火引，扣动扳机击发，比用火绳点火的鸟枪、抬枪既简便而又不受风吹雨淋影响。另外，洋枪一般每分钟可发射子弹 2～3 发，远达二三百米，在射速、射程等方面均优于鸟枪。

淮军换装洋枪的进程是比较快的。据李鸿章于 1863 年 9 月给曾国荃的信中称，已拥有洋枪一万五六千枝。1864 年 7 月，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 1.5 万人，有洋枪万余枝；刘铭传所部 7000 人，有洋枪 4000 枝。镇压捻军时，淮军陆师 5 万余人，约有洋枪 4 万枝。至 1868 年 8 月"剿捻"结束时，淮军已全部更换洋枪，率先完成了由冷热兵器并用到全部使用热兵器的过渡。与此同时，洋枪的质量也不断提高。19 世纪 70 年代，淮军逐渐淘汰前装枪，换上更为先进的后装针发枪，主要有美式林明敦枪、英式士乃得、马梯尼枪。这些枪每分钟可发射子弹 6～7 发，有效射程达 300 米。至 80 年代，又装备了部分连发枪，如哈乞开司、毛瑟枪等，每分钟可发射子弹 10～12 发。

淮军换装洋炮的时间晚于换装洋枪。1863 年初，开始在张遇春的亲兵营中设立洋炮队，共 200 人，是为中国军队新式炮队的

发轫。同年8月，淮军进攻苏州城时，刘铭传部、程学启部专门设立了炸炮队，对于摧毁苏州城外太平军的工事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又用炮队的火炮轰塌嘉兴和常州城墙，支援步队从缺口冲入城内。由于初建的炮队在作战中显示了威力，因此，1864年5月苏常战事结束后，清廷将“常胜军”裁撤时，李鸿章特留洋炮队600人交罗荣光管带。这时，淮军共建有4个开花炮营，各营的劈山炮已逐渐被淘汰，改用法国小铜炮，以利“山战陆守”。

淮军装备的洋炮，亦称炸炮、开花炮，又依其身管长短分长炸炮和短炸炮两种。长炸炮类似现在的榴弹炮、加农炮，其身管长度一般约为口径的16～25倍，其规格多以炮弹重量来区分，有12磅、24磅、32磅等多种。12磅以下的属轻炮，多用于野战，有效射程1000米，最大射程3500米。24磅以上的为重炮，多用于攻城或装备要塞。当时，淮军所用之炮，大多为12磅轻炮，只有刘铭传部配有32磅炸炮3门。短炸炮又名“田鸡炮”，炮口朝天，又称“天炮”，即现称的迫击炮。这种炮身管短，口径大，当时尚无调整角度和方向的装置，发射时多固定于45度角，用加减装药来定射程之远近。由于炮身短、重量轻，便于携带，故多用于野战。由于弹道弯曲，对遮蔽物后的目标有较大的威胁，也可用于攻城，缺点是命中精度较差。这些前装炮的炮弹分实心弹、榴弹、霰弹等多种，弹体为圆形，表面光滑，大小合膛。在当时，由于榴弹对目标的破坏力和杀伤力较大，故淮军乐于使用。

迨至1871年以后，李鸿章在组建开花炮队的基础上，又添置了最新式的德国克虏伯后膛4磅钢炮114门，并仿德国炮营之制成立了新式炮队19小营。其具体营制为：每营配钢炮6门，每门炮编官兵24名；配正副车2辆、马13匹，另有铁工车、木工车、伙食车、行李车7辆，连同营官、哨官、号手、鼓手、医生等，全营共计170余人，车19辆，马130匹。① 这时的淮军炮营已成为

① 为节省费用，平时每炮仅用马7匹，行李车、伙食车也暂不配备，并减少营官备换之马1匹。

可以独立受领作战任务的新的兵种。

在步队装备洋枪和成立炮营的同时，马队也装备了适于骑兵使用的双响短洋枪，后又改用十三响、六响快枪，使火力得到明显的加强。另外，还把长夫的职责扩大为参加修筑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已类似早期的工程兵。这些都表明，淮军的编制装备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淮军所装备的洋枪洋炮，除直接从外国购买外，还自己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进行仿制和自制（参见第十二章）。

（二）用西法训练部队，培养近代军事人才

淮军采用西法操练，是与部队装备洋枪洋炮同步进行的。李鸿章到达上海后，在筹购洋枪的同时，便密令其将弁学习外国军队的“临敌布阵之法”。1862年11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强调了采用与洋枪相适应的训练方法的必要性。信中说：“洋枪实为利器，和（春）张（国梁）营中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敝军现择能战之将，其小枪队悉改为洋枪队，逐日操演，洗刷子路，有较抬炮更远者。”①

淮军采用西法操练，除了李鸿章的主观认识外，还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李鸿章抵沪不久，英国海军提督贺布即向他提出调3000中国兵交英人代为训练。李鸿章初未允诺，后从薛焕旧部中拨1000人交给贺布，选派英国军官在松江九亩地进行训练。这部分人后来编成会字营。接着，法军也要求代训。李鸿章又拨当地练勇600人，交法国参将庞发在徐家汇（后移高昌庙）进行训练，后编成庞字营。但法国公使居心叵测，向总理衙门提出由法国军官达尔第福和庞发分任江苏总兵和副将，总理衙门推给李鸿章处理。李鸿章因事关军权问题，予以拒绝。同时，他感到将中国士兵交给外国军官训练，时受外人掣肘，指挥不能如意，并非善策。但是，采用西法训练势在必行。于是，改取雇请洋将的办法。1862年12月，首由刘铭传部聘请法国军官毕乃尔，教练施放洋枪。1863

---

① 李鸿章：《上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第26页。

年初，李鸿章便令各部雇觅洋人，讲授使用洋枪、炸炮方法和西式操法。这些洋人，多数来自“常胜军”，少数来自英、法军队，有据可查的约有二十四五人。

西法训练的内容，主要是队列、体操、行军、测绘、战阵和枪炮施放之法，与曾国藩所定的“练”的内容已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难度更大，所以训练的时间也较旧法操练要长，约需半年左右。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教官用外语发号施令，而部队没有配备翻译，致使士兵难于理解，甚至发生不堪忍受鞭挞而逃亡的事件。后来，将各种教令译成中文，印发部队使用，这一矛盾始得缓解。

随着部队装备和训练的重大变化，李鸿章深感培养掌握先进军事技术、战术人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一方面派人出国学习，一方面开办军事学堂，培养人才（参见第二十五章）。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装备洋枪洋炮和采用西法练兵的情况下，李鸿章丝毫没有忽视对官兵（包括出国留学人员）进行封建纲常伦理观念的教育，着力贯彻其“中体西用”的方针。

（三）官兵成份复杂，部队私属性浓厚

曾国藩组建湘军，在官兵的组成方面，强调“以儒生领山农”，禁用绿营士兵；扩充部队必须回原籍招募，“兵必自招，将必亲选”。淮军初建时，从淮南所募的几营部队，均由团练改编而成，士兵并非全为朴实的农民，统领则只有潘鼎新、张树声为儒生。因此，严格地讲，已不尽符合曾国藩所定的原则。淮军进驻上海后，急需扩充部队，以与太平军抗衡。但当时的上海外围已被太平军占领，如返至两淮募勇，确有不少困难。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诉苦说：“敝部太单，须由上游选募，来往半年，既恐误期，亦费财力。”① 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就地募勇的变通办法。综览李鸿章到沪以后扩编部队的办法，确如某些论者所说，实为“广收杂揽”，“兼容并蓄”，其成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薛焕招募的湘淮兵勇，一是驻守上海的部分绿营和团练，一

① 李鸿章：《上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29页。

是太平军投降的官兵，一是派人回皖招募的团练（其中杂有化名应募的绿营士兵）和从徐州招募的马队，一是交给英法军队代训的部队。最后，还收容了“常胜军”遣散后的部分洋枪、洋炮队。当淮军奉命镇压捻军时，又采取“随地募补”的方式，士兵的成份也比较复杂。

在将领的选择方面，李鸿章也没有恪守“忠义血性”的原则，而是不拘一格，只要有指挥才能或有一技之长，肯为他卖命的，就大胆使用拔擢。如原曾国荃部属郭松林，贪财好色，“性情暴戾”，但奋勇能战，1862年投靠李鸿章，就令其精选绿营兵成立松字营，予以重用。

淮军的成份复杂所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乃是军纪败坏，扰民害民之事层出不穷，不仅为人民所痛恨，甚至遭到某些官绅的斥责。

应当指出，尽管淮军的成份较复杂，但其封建私属性却与湘军一样浓厚，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湘军。首先，淮军的主要将领中安徽籍的占多数，其次是湖南籍。据《淮军志》的作者王尔敏统计，有据可查的淮军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432人中，安徽籍的279人，约占64%；湖南籍的41人，约占10%。另外，李鸿章于1878年在《考察堪胜专阃各员折》中所列的记名提督、总兵20人，其中安徽籍的14人，湖南籍的3人，江苏、四川、湖北籍的各1人。在安徽籍的14人中，合肥县的占11人。淮军兵源虽然来自各个方面，但李鸿章尽量选留皖、湘籍士兵。如在绿营中首先吸收由薛焕招募的湘淮兵勇；在收编太平军降众时，也注意吸收两淮子弟。诚如李鸿章所说：“敝乡人陷在忠党最多，来归者相望于路。”① 其次，淮军将领之间存在着亲属、师友关系，而兄弟、子侄相依的情况尤为普遍。如李鸿章与弟李鹤章、李昭庆，张树声与弟张树珊、张树屏，周盛波与弟周盛传、周盛长、周盛朝、

① 李鸿章：《复曾沅浦方伯》，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42页。文中所说的“忠党”指忠王李秀成部。

周盛鼎，郭松林与弟郭芳珍、郭文武，刘铭传与侄刘盛藻、刘盛休、刘盛枫、刘盛瑺，潘鼎新与弟潘鼎立及侄潘永常、潘永胜，骆国忠与子骆金荣，等等。除了兄弟子侄关系外，有的还有姻亲关系。再次，淮军将领大多是行伍出身，儒生出身的远少于湘军将领。这些人离开军队便难以发迹，因此，他们视军队为进身的阶梯，不愿轻易离开，并尽量维护这支军队的特殊利益和李鸿章的统帅地位。正是这种乡土观念、亲属关系和个人私利，使他们盘根错节地纠合成一个唯李鸿章马首是瞻的患难相顾、荣辱与共的死党，形成了一个与湘系集团双峰并峙的淮系集团。军队浓厚的私属性，必然产生强烈的排他性。例如，1870 年，刘铭传部调往陕西镇压回民军，其武毅马步 20 营，交给原多隆阿部将曹克忠统带，由于上下之间“恩信未孚”，便发生哗变事件，不得不改派“为铭军将士所悦服”的刘铭传之侄刘盛藻前往统带。

综上所述，如果认为湘军的建立是对清朝军事制度的某种变革，那末，淮军的建立及其军制的发展变化，无疑是一种更具重要意义的变革。因为，它是晚清诸军向西方学习的先导，是中国军队向近代化转变的中间环节，为尔后军队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当然，也不能忽视其封建私属性对尔后的军制变革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淮军之率先向西方学习，是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分不开的。首先，自 1860 年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官僚，以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开始实行“师夷长技”为中心的自强活动，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 1861 年 1 月，奕䜣等就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①]1862 年，以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曾两次函令李鸿章用外国之法练中国之兵。这是淮军进行近代化建设颇为有利的政治条件。其次，李

① 《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 441 页。

鸿章在上海对洋枪洋炮的威力和洋兵“队伍之严整”有亲身的体会，而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的首领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愿意帮助他购买洋枪洋炮和训练部队。再次，李鸿章可以利用他江苏巡抚的职权，接管厘捐总局，搜括钱财，用于武器装备的更新。这就给淮军进行近代化建设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最后，淮军的近代化，与李鸿章的思想比较开放、决心比较果断密切关联，当他与“洋枪队”和英法军队接触后，便产生了“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的思想，并“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① 两相比较，湘军的近代化之所以晚于淮军，一方面由于其所处的环境与淮军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与曾国藩的“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的指导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

附：“常胜军”的沿革及其军制

淮军在苏南地区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得到雇佣军“常胜军”的卖力支持；同时，淮军之迈向近代化，也受“常胜军”的影响甚大。为此，下面附带将“常胜军”的沿革和它的编制作一简要介绍。

1、“常胜军”的组建与遣散

1860 年 5 月，太平军攻克苏、常地区，兵锋直指上海，使上海的中外反动势力惊恐不安。当时，有个叫华尔的美国流氓，通过上海四明公所董事、前苏松粮道杨坊的介绍，向署江苏布政使兼上海道吴煦表示，由他充当领队，另两个美国人白齐文、法尔思德充当副领队，雇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协助清军作战。吴煦和上海官绅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意建立一支雇佣军，军费由上海官商供给。开始只募吕宋人（马尼拉人）100 人②，在

---

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46 页。

② 另据李鸿章称：华尔“经吴煦雇令管带印度兵随攻嘉定、太仓”。（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 第 15 页。）

广富林（上海城西 40 里）进行训练。7 月初，华尔率“洋枪队”进攻松江，大败而回。旋即重新募兵，增至 200 人。7 月 16 日，“洋枪队”在清军配合下，攻陷松江。8 月，进犯嘉定、青浦、太仓，均遭惨败，在太平军反攻下，松江也得而复失。

此后，“洋枪队”改为由外国人充当军官，募华人充当士兵，至 1862 年初，部队发展至 1200 人。华尔率队在松江、天马山接连获胜，清政府接受华尔入中国籍的要求，并赏给四品翎顶。2 月 14 日，江苏巡抚薛焕将“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并派杨坊会同管带，“以潜消其尾大不掉之患”。这时，英国海军提督贺布给“常胜军”提供大批军火，以便进行控制。1862 年 2 月至 4 月，“常胜军”接受英法军队指挥，向上海郊区的太平军发起反击，先后占领了高桥、七宝、王家寺、泗泾等据点。5 月，又配合淮军攻占嘉定、青浦等地。这时，“常胜军”已有 4500 人。数月后，又扩大到 6500 人，已远远超过薛焕所奏募足 3000 人之数。

1862 年 9 月，华尔奉江苏巡抚李鸿章之命赴援宁波，在进攻慈溪的战斗中丧命。华尔死后，英美双方经过激烈争夺，最终确定由白齐文继任“常胜军”管带。同年 10 月，太平军十三王与进围天京的湘军曾国荃部发生激战，李鸿章命吴煦、杨坊及白齐文率“常胜军”4000 人前往支援曾国荃部，1600 余人留守松江。白齐文不听调遣，迁延不去。复于 1863 年 1 月 3 日在松江率众关闭城门抢劫，次日又带数十人到上海索饷，殴打会同管带官杨坊，抢走饷银 4 万多元。当时，白齐文已入中国籍，授三品顶戴。李鸿章认为白齐文的行动已构成叛逆罪，下令拘拿严办。但英国海军及美国领事馆以白齐文先后经办的军火帐目尚未算清为借口，将他留在兵船上，拒绝交出。李鸿章鉴于“常胜军”日益骄横，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且每月耗银多达七八万两，遂乘机提出整顿“常胜军”的计划，与英国领事麦华佗、陆军司令士迪佛立反复谈判，达成统带“常胜军”16 条协议。其中有如下内容：将部队裁减为 3000 人，如将来关税短绌，饷银无出，尚可裁减；外国管带归巡抚节制调遣；规定长夫定额，每月每名给银 3 两，删除各种

浮滥之款；由中国官员经管口粮，发放军装火器；松江城内外地方事宜，外国管带官不得干预，如有开路及筑炮台等事，须先与地方官商定；购买军火须经巡抚批准，管带官不得私购，惩办勇丁，须听取会同管带官意见。① 这些条款，使李鸿章对这支军队取得了一定的控制权。但是，仍然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操纵，如规定该军“远在百里以外攻打城池，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外国军官的任用、解职，亦须由双方共同审理。②

白齐文解职后，“常胜军”一度由英国派遣的现役连级军官奥伦（亦称哈伦）代管，李鸿章则派他的亲信、抚标中营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1863 年 3 月，士迪佛立派他的亲戚、英军工兵指挥官戈登接统“常胜军”。此后，戈登率该军配合淮军进攻苏、常地区的太平军。1864 年 5 月，淮军攻占常州以后，李鸿章因“常胜军”不仅开支巨大，月需 10 万元，而且戈登气焰嚣张，飞扬跋扈，常常使他难堪，遂奏请清廷同意后，共花银 10 万两，于 5 月 30 日将其遣散，留炮队 600 人、洋枪队 300 人编入淮军序列，后归潘鼎新统带。

2、“常胜军”的军制

“常胜军”的军制完全仿效西方军队，但在不同的时期，其编制等情况亦有差异。

编制装备。1862 年夏，华尔将“常胜军”编成 5 个步兵团，1 个狙击手团。每团有军官 16 名。团下辖数目不等的排③，多者 10 余排，少者六七排，每排 80 人。步兵团主要配备滑膛毛瑟枪，狙击团配备恩菲尔德来复枪。另有攻城重炮 4 个中队（相当于连），野战炮 2 个中队，配有 24 磅榴弹炮 3 门、12 磅过山炮 18 门、32 磅榴弹炮 4 门、8 英寸口径大炮 2 门、臼炮 12 门，火箭筒若干具。

---

① 参见《吴煦档案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下同），第一辑，第 97 页。

② 《吴煦档案选编》第三辑，第 17 页。

③ 团下是否设连一级组织，尚待考证。

此外，还有工兵队和内河舰队。内河舰队有轻便战船300余艘，船首配6磅或9磅炮1门，船员包括军官2人、士兵10人；铁甲汽轮32艘，船首配32磅炮1门，船尾配12磅炮1门。船长、大副、机师和炮手长为外国人，水手、炮手、伙夫为中国人。

1863年，戈登接统"常胜军"期间，其编制与前略有变化，装备则大同小异。步兵团改为下辖6个连，炮兵连无变化，轻便战船减至50艘左右，铁甲汽轮的数量亦有所减少。此外，增设攻城炮船2艘，大型弹药船4艘，大型帆布篷顶船8艘。

一个步兵团共有537人，计有上校或中校1名，少校1名，上尉兼副官1名，上尉、中尉各6名（以上均为外国人），旗手军曹6名，军曹12名，伍长24名，士兵480名。使用的枪械主要是英制滑膛枪。

炮兵连的人员编配，依装备火炮的种类而定，一般在144～174人之间，通常包括正副连长各1名、上尉2名、军曹1名（以上为外国人）、旗手军曹1名、军曹6名、伍长12名、炮手120～150名（以上为中国人）。所配火炮的形制与前无大变化，数量略有增加。因在江南水网地区作战，故火炮的运输一般使用船舶，有16艘专门载运火炮和弹药的船只，并载有浮桥器材。

"常胜军"的大本营，除领队、副领队外，尚有副官长、军需长、首席医官、主计官各1人，副官2人，宪兵司令官1人，随从参谋1人，医官及助理若干人，军用仓库管理员及助理若干人。

此外，还有一个工兵队，两个兵工厂，一个医院及军需仓库。

薪饷制度。"常胜军"实行薪金制，按月发饷。华尔初建洋枪队时，因招募外籍人员困难，便实行高薪制，士兵月饷达100美元，军官月饷达600美元。攻城时，按城镇大小另发"奖金"，如攻下一座较小的城镇，可得四五万美元，大的城镇可得10余万美元①。1862年夏，重定薪饷制度，规定上校月支薪饷400美元，中

① 当时比价，一美元约等于中国一块银元；纹银一两约等于一美元六美分。

校 350 美元，少校 300 美元，大尉 220 美元，中尉 150 美元，副官 250 美元，曹长 20 美元，军曹 15 美元，伍长 12 美元，士兵 8 美元。平时的伙食费全部由个人自理；战时则由公家负担，每人每天供应 2 磅大米、1 磅猪肉或 2 磅咸鱼和蔬菜、食油等。

戈登接统“常胜军”后，取消了攻占城镇的定额奖金，改为由巡抚酌情奖赏。同时，调整了官兵的薪饷待遇，略低于华尔所定的标准。如步兵团上校或中校，月支饷 75 至 85 英镑①，少校 60～70 英镑，上尉兼副官 50 英镑，上尉 42 英镑，中尉 30 英镑，旗手军曹 4 英镑，军曹 3 英镑，伍长 2 英镑 10 先令，士兵 1 英镑 17 先令 6 便士。炮兵连连长 50 英镑，副连长 45 英镑，伍长 3 英镑，炮手 2 英镑。大本营领队 160 英镑，副领队 80 英镑，副官长、军需长、宪兵司令官各 70 英镑，首席医官 80 英镑，医官 60 英镑，军需官及助理、军需仓库管理员及助理各 60 英镑，副官 60 英镑，随从参谋 40 英镑。

训练制度。“常胜军”比较重视训练，新募兵勇一般要求经过半年的训练才参加战斗。训练内容依据外国（主要是英国）操典，同时注意从实战需要出发，强调行动的速度而不苛求队形的整齐划一。步兵的训练，注重洋枪的使用、实弹射击以及攻防战术。炮兵主要演练轰击坚固的城堡和掩护步兵冲击。

除上海的“常胜军”外，在浙江还有“常捷军”和“常安军”，配合左宗棠所部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该两军的军制与“常胜军”相似，故不赘述。

“常胜军”和“常捷军”、“常安军”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中国人民的产物，是清政府奉行“借师助剿”政策所孕育的一个怪胎。由于其主要成员嗜杀抢掠成性，不受任何纪律约束，因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尽管它对淮军的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绝不能因此而掩盖它的罪恶史实。

---

① 当时比价，一英镑约等于银元四块半，纹银二两七钱。

第八章　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军事思想

太平天国于起义之初就着手创建一支强大的太平军，并与清军、外国侵略军进行了长达16年的战争。这些军事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本章拟对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战争观以及建军治军和作战指导等方面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分别进行扼要的论述。

第一节　战争观

在洪秀全早期著作中，就有关于战争问题的一些言论。如1837年（道光十七年）的一首诗中说："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①，反映出他主张运用暴力手段来解救广大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群众的志向。在1845年的《百正歌》中又提出："汤武天应人顺，乃以正伐不正；楚汉项灭刘兴，乃以正胜不正。"②初步树立了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观念。但这时洪秀全的战争观尚处于矛盾中，如在同一年著的《原道救世歌》中说："第三不正行杀害，自戕同类罪之魁。……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自古杀人杀自己，谁云天眼不恢恢？"③在这里，似乎又有反对一切杀戮、一切战争之意。这种模糊观点，迨至1859年（咸丰九年），洪秀全在批阅洪仁玕《资政新篇》"刑刑类"中才作了明确的澄清。他说："爷令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④ 经这样说

①②③ 《洪秀全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7～8页。
④ 洪仁玕：《资政新篇》，见《太平天国印书》（下），第691页。

明，洪秀全的战争观就比较清晰了。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之所以在金田起义之前就确定了走武装反清的道路，在思想上主要受到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极端野蛮，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无一不是从一开始就“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拿起武器，向封建统治阶级造反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自然也继承了我国农民起义这一优良传统。另一方面，19 世纪 40 年代，全国各地武装反清斗争出现高潮。在 1845～1850 年（道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期间，仅广西一省就发生天地会起义 77 起。这些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不能不给太平天国领袖们以积极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从一开始就摒除一切幻想，把武装斗争作为反抗清朝压迫、推翻清朝统治的主要手段。

太平天国领袖们起义前的武装斗争思想，始终是在宗教的掩盖下阐发的。早年，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中，出于隐蔽斗争和启蒙群众的需要，把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对立，幻化为宗教上神和妖的对立，把统治者比之为“阎罗妖”，提出对阎罗妖“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①。到了广西以后，洪秀全则把统治者比之为妖魔，他借天父之口声言：“朕是天差来真命天子，斩邪留正”②。金田起义之后，在永安时则宣传“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号召“通军男将女将，千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③ 直到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入湘南，杨秀清、萧朝贵联名发布的三篇檄文中，才公开打出“奉天诛妖，救世安民”的旗号，宣称：“今满妖咸丰，原属胡奴，乃我中国世仇。兼之率人类变妖类，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④ 第一次把武装斗争的矛头，直

① 洪秀全：《原道觉世训》，见《太平天国印书》（上），第 17 页。

②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上），第 41 页。

③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上），第 122～123 页。

④ 《颁行诏书》，《太平天国印书》（上），第 107、110 页。

指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咸丰帝。关于太平天国武装斗争的宗旨，檄文中正式宣告："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① 太平天国领袖们的以上言论以及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革命战争论者，武装反清的思想是很明确的。

这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武装斗争思想，在金田起义前后，虽曾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武装起义，英勇杀敌等方面，起过很好的作用。然而，定都天京之后，尤其到了后期，洪秀全没有能够随着斗争的深化而提高认识水平，仍抱着宗教迷信不放，这非但不能再很好地起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反而贻误大局。如当天京行将被湘军合围，李秀成向洪秀全建议"让城别走"时，洪秀全仍一味信天，执迷不悟，声言"朕之天兵多过于水"，终于导致了城破国亡。这是洪秀全军事思想的最大局限。

1860 年后，英法列强公开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太平军对于侵略者的武装进攻，虽也曾进行过不少英勇的抗击，但由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长期认为与西方列强同信上帝，"始终坚决不信并无兄弟之谊的所谓'外国兄弟'会怀有这种毫无理由的残暴的意图。他们醒悟得太晚"②。直到太平天国失败后，李秀成才得出"要防鬼反为先"③ 的结论。可见太平天国对反侵略战争是认识不足、准备不充分的。

第二节　建军治军指导思想

太平军从一开始就在从严治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组建，具有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并注意对士兵进行思想灌输等特点。

---

① 《颁行诏书》，《太平天国印书》（上），第 110 页。

② 〔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 406 页。

③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544 页。

一、严密军队的编组

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冯云山等就仿照《周礼》中军、师、旅、卒、两、伍的序列，制定了太平军的编制序列表《太平军目》，将分散的起义群众编组成组织严密、下上统属有序的步兵，以后陆续组建的“土营”和“水营”也基本上按步兵的编制进行编组（具体编制参见第六章）。这种在农民起义武装中绝无仅有的独创性的编组方法，既体现了太平天国领袖们一开始就重视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从严治军的精神。

诚然，太平军存在着兵员缺额多，指挥层次重叠，机关属员臃肿等缺点，以及到了后期又出现队营制、旗队制、五行数字制等不同类型的编制，但始终保持着比较严密、正规的组织形式。这种编制，较之清朝经制武装绿营兵的营汛星散，临战抽调，互不相习的编制办法，要优越得多。对于这点，清朝的地主文人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的编制“大小相制，视众如寡，臂使指应，颇能联络一气，分合咸宜”，又说太平军之所以“旋败旋炽，仍未见其穷蹙，所恃无他，盖始定军目，不衍于法，有以启之也”。①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和建立根据地之后，又把这种编制推广到乡镇，建立乡兵，反映了太平天国领袖们注意吸取我国古代寓兵于农、兵农结合的思想。

二、严格后勤供应制度

太平军前期比较严格地实行了圣库制度，凡官兵家财、作战所得钱物，尽交圣库，官兵所需钱粮等生活必需物资，由圣库按定制发给。这种后勤供应制度对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曾起过重大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08、119页。

作用。因为，实行这种供给制度，在无根据地依托的极端艰苦的战斗环境中，能够保障军队的供给，使官兵的生活基本公平，有利于部队内部的巩固。这种制度，把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揉合到一起，集中地反映了太平天国领袖们“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经济思想。太平天国中后期，这种后勤供应制度之所以逐渐废弛，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本身存在弱点以外，其直接原因，则是由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政治上趋于封建化，思想上贪图享乐，生活上奢侈腐败。因而上行下效，奢糜享乐之风日盛一日，致使集中统一、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日益遭到破坏。历史经验表明，制度的兴废，与最高领导者的思想行为关系极密极大。

三、严明军纪和重视教育

太平军从一开始就规定有严格的军纪。洪秀全、冯云山早在广西传教时，就规定有“十款天条”，作为信徒们的生活准则，尔后即成为太平军军纪的基础。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发布命令，宣布五条军纪：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后来在向金陵进军途中，充实发展为《太平条规》，其中包括“定营规条十要”和“行营规矩”（十条）等20条纪律（详见第六章）。建都天京之后，又根据形势的发展，陆续作出新的补充规定。据《贼情汇纂》载，律令达62条之多①，要求也更为严厉，其中论斩者就有47条。《李秀成自述》中也说：“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法律严，故癸丑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② 太平军军纪之严，在历代农民起义武装

---

① 参见《太平天国》（三），第227～232页。

②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6页。

中也是比较罕见的。在前期，这些军纪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因而军队士气高昂，战绩辉煌。就连太平军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起事之初，“禁掳掠，禁奸淫，禁杀戮……故所过郡县，迎附者有之，犒献者有之，愿充向导者有之”①。只是到了后期，由于队伍迅速扩大，成份起了很大的变化，加之将领的私欲日趋膨胀，军纪也就随之松弛和败坏。但就太平军整体而言，军纪严明仍不失为其建军思想一大特征。

太平军不仅有严明的纪律，而且注意对士兵进行思想灌输和生活体贴。经常运用“讲道理”的方式灌输上帝教教义，对将士进行宣传教育。一是宣扬“万事皆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千祈莫慌”，“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由己得成人”，“尔若贪生便不生，怕死便会死”。以此动员和鼓励士兵舍生忘死，勇敢作战。二是提倡“越受苦，越威风”，“总要人人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并声言：“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②以此鼓励将士不畏艰苦，英勇杀敌。另外，还用中国古代的英雄、名将来激励士气。被经常提及的有姜子牙、孔明、关羽、张飞、赵子龙、岳飞等，如说：“功盖周家姜子牙”，“英雄胜比汉关张”，“绝胜常山赵子龙”，“岳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灭绝该！”③太平天国就是这样运用中国的文化传统来为己所用。

特别可贵的是，杨秀清及时总结军事实践经验，将太平军的军事生活加以条令化，于1855年制订出《行军总要》，其中共规定有九大号令，即陆路号令、水路号令、点兵号令、传官号令、查察号令、防敌要道、禁止号令、体惜号令和试兵号令，对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行军总要》的序言中还说：“从

---

① 李元度：《致石达开书》，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第1313页。

②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18～121页。

③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第528～537页。

来行军之善无他，亦曰好整以暇而已矣。”① 主张通过严明的军事纪律和切实的军事训练，做到“好整以暇”，从而达到“万战万胜而无敌于天下”的目的。这就鲜明地反映了严格治军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思想。

太平军除进行思想灌输外，还从生活上体贴士兵。《行军总要》“体惜号令”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规定，如行军时将马让给伤病员骑坐，天寒时将皮袍给夜间守卡的战士穿着等，充分体现了官长爱兵如子的思想。洪仁玕在《兵要四则》中谈到为将之道时，也说：“兵不在多而在得力，然所以得人力而人肯听令者，在主将有以服之耳。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必平日有恩于人，如士卒死吴起之怜病，众人遮余阙以身先，马谡虽死而不怨，李严见黜而无词也。”② 洪仁玕在这里通过讲述战国吴起平时关心士兵病痛，士兵愿为之死战，元末将领余阙遇险，士卒以身体护之，三国时蜀将马谡与魏战兵败，被诸葛亮按军法处死而无怨，蜀将李严因过错被诸葛亮罢黜而服罪的历史故事，强调将帅在平时要秉公办事，以恩服人。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太平天国军事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人民性的特点。

四、注重选将育才

太平军军兴之初，各级将领都从实际斗争中选拔。建都天京以后，除继续实行上述方法外，开始采用武科举的方式选拔和培育将领。

1861 年旨准颁行的《钦定士阶条例》中，规定各级武士子除考试马箭、步箭及弓刀石技外，还要“攻习真圣主钦定《武略》及正总裁所颁《兵要四则》等书，讲明而熟识之，以广见闻，以增谋略”③。

---

① 《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552 页。

② 《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703 页。

③ 《钦定士阶条例》，《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755 页。

同时提出："我天朝钦定《武略》一书暨真圣主诏明大小兵法水旱战法与干王颁谕《兵要四则》，均为武士所宜习。"①

所谓《武略》，是经洪秀全删改过的《孙子》、《吴子》和《司马法》（未收录"用众"篇）等三部古兵书的汇集，于1858年正式颁印。在早期，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军事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他在起义之初曾说："孙膑、吴起、孔明等及其他古代历史中之娴于韬略战术者，亦不值得我之一赞"②。后来，太平天国正式颁印《武略》，表明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对中国古代兵书中所蕴含的丰富军事遗产已有所认识和重视。而洪秀全对上述三书进行的多达289处的删改（其中删46处，约500余字），则又反映出他对待古代军事典籍的武断轻率态度。从中既可看出洪秀全反对一味崇拜古圣先贤、主张顺应时代潮流的革命精神，也可看到洪秀全删掉"诸侯"或改"诸侯"为"各省"所反映出的中央集权思想。洪秀全改《孙子》"九变"为"八变"，并删掉了"君命有所不受"，又在"地形"篇中全部删去了"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名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一大段。孙武这些关于前线将帅可以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处置，机断行事，不必机械地执行君命的论述，是富于辩证思想的民主性的精华，却为洪秀全所不容，可见洪秀全专制集权思想之甚。这将有助于理解太平天国对将领的培育方针以及许多错误军事决策之所由产生的思想根源。

所谓《兵要四则》，是洪仁玕论述用兵之法的一篇短文，也是太平天国领袖们留下的仅有的一篇全面论述为将之道的文章。该文从为将之学问、道德、法律以及"蓄锐之方"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将帅所必备的修养和条件。在谈论为将之学问时，强调要懂

① 《钦定士阶条例》，《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47页。文中提到的"真圣主诏明大小兵法水旱战法"未发现过。

②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六），第873页。

得天候、地理、兵情和智仁勇义；在谈论为将之道德时，强调将领在平素要有恩于士兵，做到以恩服人；在谈论为将之法律时，强调“器使群材，赏罚严明”；在论及为将要知蓄锐之方时，列举了古代名将孔明、关羽、张飞、赵云、岳飞等人的用兵特点，以及当代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罗大纲“蓄万心为一心”的奥秘。① 洪仁玕所著《兵要四则》，通篇注重继承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思想传统，发扬太平天国前期将帅的光荣业绩，其目的则在改变当时“人心冷淡”、“锐气减半”的现实。

太平天国用将崇尚德才兼备，认为“才德兼备者为尚（上），德有余而才不足者次之”。因为：“若夫武士类皆绌于德而优于才，顾才亦不可误用也，德亦不可不讲也。武士之才在强，有德则强者和矣；武士之才在练，有德则练者精矣。”② 这些主张，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是太平天国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说，太平军严密的军队编制，严明的军纪，经常的思想灌输和平时的生活体贴，加上日臻完备的选将育将之法，充分反映了太平天国领袖们建军治军的基本思想。

应当指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建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和问题。例如，没有在“水营”中着重编练专门从事作战任务的部队，后来也未能及时重建作战中遭受重大损失的“水营”，没有随着马匹和火炮的增多，及时组建“马队”、“炮队”。这些都表明他们还没有牢固确立因敌、因地、因时制宜地建设军队，提高军队作战水平的思想。又如后期的步兵由统一的编制变成多种类型的编制，以及圣库制度的破坏，军队纪律的日益废弛，则反映了将领中的分散主义思想和享乐腐化思想对军队建设的严重侵蚀，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

① 参见《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703～704 页。

② 《钦定士阶条例》，《太平天国印书》（下），第 745、747 页。

第三节　作战指导思想

太平天国在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所进行的大小战役战斗，难以数计。综观战争的全过程，太平天国的领袖和将士们，在战术运用方面，灵活多变，得心应手，呈现出一幅瑰丽多彩的画卷。在战役指导方面，虽有得意之笔，但从总体上来看，显得机械呆板，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在战略指导方面，则缺乏驾驭能力，重大决策屡屡失误，终于导致战争的最后失败。战争既是物质力量的竞赛，也是敌我双方主观指导能力的较量。一般地说，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胜者必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导的失误。本着上述精神，分别对太平军的战术、战役和战略问题进行扼要叙述，并进而探讨其指导思想的得失。

一、灵活多变的战术及阵法

基本战斗队形和基本战术　太平军的基本战斗队形分为前、中、后或左、中、右三队，一处遇敌，遂变换队形，由其余两处护卫和支援，以保证战斗的胜利。《行军总要·陆路号令》中说："行军须分为前、中、后三队。……如沿途前队遇有妖来，胜角喧传，前队大旗麾动，中队后队兵士听得胜角由前队传来，大旗麾动在前，中队后队兵士速即装身，赶赴前队护阵。如后队有妖跟来，胜角喧传，后队大旗麾动，中队前队兵士听得胜角由后队传来，大旗麾动在后，前队中队官兵知是后队有妖，各各速即扎定，各执军装，一旗还一旗，听后队诛妖如何情景。如后队妖魔十分作怪，要点兵前去护阵，总听佐将号令，必俟杀灭后方准起行。"①"水路号令"中关于水路行船队形和遇敌处置之法，与陆路基本相

① 《行军总要》，《太平天国印书》（下），第555页。

同。以上这种战斗队形和战术，《贼情汇纂》中名之为“牵线阵”。太平军“凡由此城乡窜彼城乡，必下令作牵线阵行走……一军尽一军即续，宽路则分双行，狭路则单行，肩相挨，足相蹑，鱼贯以进，斩然不紊……但有官兵迎剿追击，首尾蟠曲钩连，顷刻坌集，可以相救”①。太平军所采用的牵线阵，体现了《孙子兵法·九地》中所说的“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的战法。

若与敌军对峙，太平军则以“螃蟹阵”应之，其基本战斗队形是左、中、右三队。螃蟹阵者，“乃三队平列阵也。中一队人数少，两翼人数多。其法视敌军分几队，即变阵以应之。如敌军仅左右队，即以中队分益左右，亦为两队。如敌军前后各一队，则分左右翼之前锋为一队，以后半与中一队合而平列，为前队接应。如敌军左右何队兵多，则变偏左右翼以与之敌。如敌军分四五队，亦分为四五队次第迎拒。其大阵包小阵法，或先以小队尝敌，后出大阵包之，或诈败诱敌追，伏兵四起以包敌军，穷极变化”②。太平军以此三队平列阵，因敌而变，应付各种情况，确是一种有效的战斗队形和战法。

伏击进攻战术　这也是太平军常用的战术，通常有两种形式，即待伏与诱伏。所谓待伏，即事先察明敌人行踪，在敌必经之路，设下伏兵，待其进入伏击地域，即向敌人出击。《贼情汇纂》中说：“贼中一味讲求埋伏，有剪尾、冲腰诸法，贼每出队，或预伏一军于我兵之后，我兵之左右，当酣斗时，非潜出剪我之尾，即突出冲我之腰，我兵惊顾，亦每致挫。”③ 1852 年 4 月太平军自广西永安（今蒙山）突围后，于三冲地方痛歼尾追之清军，毙敌总兵以下数千人，用的就是待伏战法。

所谓诱伏，就是想方设法引诱敌人进入预设的伏击地域，然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128 页。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 42 册，总第 12869 页。

③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 155 页。

后对其进行攻击。太平军中有所谓伏地阵，又名卧虎阵，其打法是："敌兵追北至水穷山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皆伏地不见。敌军见前寂无一卒，诧异徘徊。贼伏半时，忽一旗立，千旗齐立，急趋扑敌，往往转败为胜"①。以上所说的伏地阵，与事先埋下伏兵，诱敌入伏，然后群起攻之的战法，基本上属于同一战术思想。另外，太平军还常用"回马枪"战术。其打法是：与敌兵交战时，约十余合之后，故退二三十步，复一拥而进。视敌兵稍败，则左右之军追上，后军随后一围，用长矛与敌混战。② 这种战术，陈玉成在湖北运用得最为娴熟，故当地有"三十检点（陈玉成当时官衔）回马枪"之谚。

穴地攻城战术 所谓"穴地攻城"，就是在攻城时开掘地道至城墙下，埋装炸药，引信引爆，轰塌城墙，士兵乘势破城。穴地攻城法古已有之，太平军继承了这种方法，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太平军在广西时，就首次运用此法攻占了全州城。出广西入湖南道州，成立"土营"以后，穴地攻城成为土营首要任务，曾运用此法攻占了武昌、南京、庐州等大城市。最初攻城，只需要在近城以房屋作掩护，开挖地道，工程量较小。后来，清军为防御太平军攻城，尽烧城外民房，太平军不得不于一里甚至数里外开掘地道，埋设引线，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防止守军防堵，太平军不断研究改进穴地攻城之法。在进攻安徽庐州时，太平军的地道遭守军破坏，乃"于南门月城之旁，另掘数处，形如曲突，又叠为上下层。戒曰：初发时，闻声不必相应，俾其用力堵之；堵而后发，则无及矣"③。1854 年 1 月 14 日夜，上层地雷轰发，毁城墙五六丈，守军连忙抢堵，正在这时，下层地雷又发，轰开缺口，太平军乘势攻入城内，占领了庐州。随着战局的变化，太平军由攻势转为守势，穴地战术在破坏敌军的攻城战中继续发挥作

---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 42 册，总第 12869 页。

② 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 24 页。

③ 夏燮：《粤氛纪事》，同治八年刊本，卷 8，第 6 页。

用。在艰苦卓绝的天京保卫战中，守城太平军用迎挖地道的办法破坏湘军的地道，使湘军在城外所掘的地道，大多半途而废。

误敌、疲敌战术 太平军为了争取主动和打击敌人，常常采用一些伪装和欺骗举动，借以迷惑敌人。如在二破江南大营战役中，李秀成奔袭杭州时，就曾打着清军的旗帜，穿着清军的号衣，欺骗敌人，达成了袭击的突然性。撤出杭州时，李秀成又率太平军将士在杭州城上遍插旗帜以作疑兵。清总兵张玉良果然中计，太平军退出一日一夜，清军未敢入城。另外，太平军撤出某些城镇时，往往于城寨内留盲人、残废人击鼓吹角，在城墙土墙上树立木桩、草人，上顶草笠，昼则遍插旗帜，夜则虚张灯火，欺骗敌人，以致有太平军撤出数日而清军尚不知觉的事例。此种迷惑敌人的做法，北伐的太平军在河南怀庆（今沁阳）运用得最为神奇。据《复生录》载：太平军撤出怀庆时，"因城外扎有多兵，恐被追袭，密令各营县（悬）挂羊犬，使脚击鼓，并焚草入灶，俾官兵远望有烟，然后拔队北窜。贼去数日，官军始探知，已偷越八百里太行山矣"①。

太平军还常采用"惊营"战术疲惫敌人，打击敌人。《贼情汇纂》对此作了具体叙述："如惊旱营，必遣数骁贼乘马，各怀火球数枚，密藏火种，更以剽贼百人随之，携带鼓角旗械，衔枚急走，约距我营数里，则伏于暗陬，俟三更后，数骑贼直驰，抵我土墙，踩鞍攀登，各撒火球，烧我帐房，必有四五处燃着。当阖营惊扰之时，数里外百贼遥见火起，则鼓角齐鸣，飞奔我营，昏夜不知贼之多少，往往致溃。"② 1853年，西征的太平军夜袭湖北黄州堵城清军大营，阵毙湖广总督吴文镕，采用的大致就是这种战术。另《贼情汇纂》中所提到的"百鸟阵"，亦具有惊营战术性质，不过用于平原旷野而已。惊营战术若用之于水师，则用大船数只，点燃苇柴，渐渐向敌船逼近，诱其炮船抵击，另用无灯黑划多只，绕

---

① 陈思伯：《复生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第39页。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57页。

至敌炮船及辎重各船之后，抛火球，放喷筒，焚烧敌船，敌船于黑夜之中受此惊扰，不得不退。或于岸上每40步置一二兵，专放喷筒，相间排列至十余里，敌舟师翘望江岸，见火筒如流星相继不绝，众心疑惧，纷纷退驶。① 西征的太平军在九江湖口之战中，就采用这种惊营疲敌战术，每夜出动陆师千余，手持火箭火球，大呼惊营，使得湘军彻夜戒严，不敢安枕，这对尔后连败湘军水师，取得九江、湖口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太平军所采用的各种战术，既继承了我国古代丰富多采的阵法、战法，也在战争实践中有新的创造，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战术的灵活运用，充分显示了广大太平军将士的智慧和才能，也是我国古代著名兵家所倡导的“审势度力”、“避长击短”、“奇正相生”、“兵不厌诈”、“出奇制胜”等思想在战斗中的生动体现。诚然，太平军也进行过不少失利的战斗，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或者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或者由于士气低落（这在后期较为明显），或者由于部署失当，等等。即使如此，还是应当从总体上肯定其相当高明的战斗艺术和战术思想。

二、过于单一的战役指导思想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战役指挥上，经常使用历史上的“围魏救赵”战法，它体现了兵法中所强调的“声东击西”、“攻其必救”、“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原则和基本指导思想。如1856年上半年，清方集中湖北、江西两省湘军的兵力，猛攻武昌。翼王石达开奉命率部赴援，难以解围，遂率部由鄂南挺进江西腹地，迫使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弃围九江，并从武昌外围抽兵回救，使武昌之围得以缓解。1857年底，清军秦定三部万余人围困安徽桐城，李秀成约陈玉成自皖南来援，陈玉成率部东攻巢县、无为，然后回

① 参见《太平天国》（三），第157页。

师取庐江，绕桐城之北，与李秀成内外合击，桐城之围遂解。当然，运用得最为成功的，当推1860年二破江南大营之役（详见第五章第六节）。

需要指出的是，从总体上观察，太平天国将领们的战役指导思想过于单一和呆板，除了“围魏救赵”之法外，似乎不知道还有其它有效的战法。因此，1860年冬，当太平军发动二次西征时，又袭用“围魏救赵”战法，千里行军，南北“合取湖北”，被曾国藩一眼识破，讥之为“重抄前文”。曾国藩、胡林翼部署重兵围困安庆，即使南北两路太平军进入湖北，也拒不自安徽撤兵回救，迫使太平军改变计划，直接救援安庆，终于坠入其“围城打援”的圈套，屡屡为湘军所败，安庆最终为湘军攻陷。特别是1862年（同治元年）冬，太平军从各地调动十三王数十万部队开抵天京外围，企图将2万余名湘军逐走。当时，从各方面讲，优势都在太平天国方面，太平军完全可以对陆上湘军进行反包围，隔断其与湘军水师的联系，然后部署重兵，准备打援，而无需对其展开强攻。若能这样，无论是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或将其围死（曾国荃湘军备粮无多，全靠水师接济），其结果都能将湘军打败。然而，太平军急于求成，一到天京周围，就对敌展开强攻，使湘军“反客为主”，从容抵抗，加之又未隔断其与水师的联系，湘军能不断得到粮械补给，而数十万太平军屯聚一地，又无长期作战的准备，粮饷不继，不得不于猛攻不下之后被迫撤出战斗。当十三王回救天京失利之后，洪秀全又命李秀成率部“进北攻南”，取道江北，进袭湖北后方，企图诱使湘军回救，用的仍是早为湘军所熟悉的“围魏救赵”战法，自然难于奏效。太平天国领袖们战役指导思想的贫乏单调，确实是一些重要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

三、尚欠成熟的战略指导思想

（一）战略方针及其演变

太平军在广西奋战年余之后，为摆脱清军的重兵“围剿”，决

定打出广西。1852年夏，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湖南道州作出了“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① 的战略进攻方针。不久，太平军进军长江流域，连占武昌、南京。事实表明，这一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太平军占领南京并定为都城后，军事力量迅速壮大，而清军在太平军打击下，溃不成军，几无招架之力。在此情况下，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形势作了分析，认为“方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②。太平天国占领金陵之后的战略决策，就是在这种过高估计军事胜利成果和过高估计自身力量的过分乐观的情绪中作出的。关于太平天国领袖们如何作出全面的战略决策，目前尚缺乏准确的史料记载。《清史稿·洪秀全传》中说：“既都金陵，欲图河北，罗大纲曰：‘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至皖、豫一出。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徐、扬席卷山左，再出山右，会猎燕都。’”③从其中的内容存有若干矛盾来看，太平天国领袖们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置天京周围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派出两支部队，北捣京师，西征两湖，实行了一条战略上的冒险主义和战役战斗上的保守主义方针。其结果：由于以2万余人北伐京、津，又未及时组织后续部队增援，致使北伐军在优势清军的“围剿”下全军覆没。西征军在经过严重挫折之后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水营基本丧失的沉重代价，给尔后的战局带来了严重影响。由于没有对江南、江北大营实施进攻，不仅错过了支援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有利时机，而且使天京日益陷于困境，最终不得不从西征战场抽调部队进攻江南、江北大营，以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威胁。

---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见《太平天国》(三)，第290～291页。

② 《贬妖穴为罪隶论》，《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42页。

③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2册，总第12872页。

太平天国在取得一破江北、江南大营的有利形势下，天京却爆发了一场内讧，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军事形势也随之严重恶化，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但太平天国领袖们对军事形势的变化认识得并不自觉和明确，虽然果断地放弃了湖北和镇江，以缩短战线，但仍然死守着江西（也许与石达开有关），最后被湘军逐个攻破。正在这时，洪秀全及时起用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并与捻军实行联合，从而稳住了安徽战场，并以此为契机，进行战役战斗上的局部进攻，夺回了庐州，攻破了江北大营，在三河镇全歼了湘军精锐李续宾部，接着又取得了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

这时，太平天国的将帅们又是如何分析形势的呢？洪仁玕回忆说：攻破江南大营之后，大家登朝庆贺，并议进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省，侍王意取闽、浙，忠王与他主张先取苏、杭、上海，俟下游既得，再水陆并进，沿江上取（参见第五章第六节）。从这次全面分析战略形势和确定战略方针的会议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将帅存在着重下游、轻上游的思想，对来自鄂、赣西线的湘军威胁的严重性，除陈玉成外，普遍缺乏足够的认识。而洪秀全则采取调和折衷的态度，同意东征苏、常，但限李秀成“一月肃清回奏”。这样，就没有及时将作战的重点从东线转移到西线，听任湘军节节东侵，在安庆周围从容部署兵力。直到1860年秋后，才由洪秀全下令陆续从东线转移兵力，开始第二次西征，整整丧失了半年时间。

第二次西征，在战略上是必要的、正确的。然而，由于参战各路将领在认识上不统一，天京当局在战略指挥上又不及时果断，致使合取武汉的计划半途而废，随后转取直接解救安庆之围的方针，从而陷入湘军“围城打援”的圈套，一次次的救援行动均告失败，安庆落入湘军之手。

安庆陷落后，天京当局仍然麻木不仁，未能及时采取有效对策。特别是李秀成、李世贤两支太平军撤离西线，东下浙、苏，再攻上海，在本来无事的东线开辟第二战场，促使英、法列强立即

撕去“中立”的幌子，协助清军对太平军作战，使天京陷入了受东西夹击的困难境地。而太平军另一支主力陈玉成部，于安庆会战中元气大伤之后，又遭敌暗算而陷于瓦解，使得战局更为严峻。不过，当时太平军还有几十万部队，在数量上对湘军尚具有优势，如果天京当局指挥得当，调集兵力挫败其一路或几路，逐步从被动中解脱出来，局势仍有转机。然而1862年冬，“十三王”几十万部队云集天京南郊，进攻二万余湘军，苦战四十余日而竟以失败告终，遂使太平军丧失了扭转被动困境的机会。随后所进行的“进北攻南”行动，就更无取胜的希望了。随着江、浙根据地和天京周围据点逐渐丧失，天京行将被合围。这时，李秀成提出的“让城别走”，实行战略转移的积极建议，却遭到洪秀全的严词拒绝。于是，太平军丧失了绝处逢生的最后机会，天京孤城于1864年7月19日被湘军攻破，标志着太平军战略防御方针的彻底失败。

（二）战略指导思想的主要失误

太平天国领袖们战略指导思想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注重攻取和守护城市，不注重歼灭清军的有生力量。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当时军队的武器装备还以冷兵器为主，城堡在一定意义上仍是一时难以攻破的堡垒。城市又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中心，攻下城市，既可扩大政治影响，又能获得粮饷军械的补给。但也不能不指出，过于重视攻城与守城，正是他们作战指导思想的一个明显局限。在广西期间，相对弱小的太平军曾打过官村夜袭战、三冲伏击战等胜仗，但从撤出永安之后，即以全力进攻桂林、长沙、武汉、南京；北伐军也强攻怀庆，并准备攻取北京；西征军则强攻南昌、庐州、武昌。在太平天国战争史中，像堵城之战和九江、湖口之战那样机动灵活作战的战例为数甚少，因而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也十分有限。

到了后期，太平军在全国战场上已处于防御态势，其主要兵力用于防守天京、九江、安庆等大城市，绝少打像三河之战那样的歼灭战。尤其是保卫天京，成了后期太平军的中心任务，二破

江南、江北大营，甚至安庆保卫战，也都是围绕着保卫天京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因此，虽然也取得了二破江北、江南大营的胜利，但在战略上越来越被动，尤其是二次西征失败后，形势急转直下，天京迅速陷入湘军的战略包围之中。

如果太平天国的将帅们具有明确的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思想，大可不必死守一些城市；二次西征过程中也不必合取武昌，可以在皖南与敌周旋，围住祁门大营，对敌进行“围点打援”，不断消耗湘军有生力量；在江北，也不必急于进援安庆，而对桐城或太湖外围之敌实行反包围，同样采取“围点打援”的方针，不断歼灭前来救援的敌军。果能如此，则不仅安庆可保，而且战局将会有大的改观。可惜，太平天国的将帅们始终以夺取、守卫大城市为主要目的，没有着眼于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甚至到了最后时刻，洪秀全仍不舍得离开天京，宁可与孤城共存亡。由此可见，洪秀全等的作战指导思想的保守性与片面性。太平天国的将帅们似乎不甚懂得，攻取或保卫某个城市，不应该成为主要目标，只有不断地歼灭、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己的根本转变，方能有效地夺取、保卫城市，否则只会使自己陷于越来越被动的境地，最终一个城市也保不住。

第四节　军事思想的渊源

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既吸收已有的思想营养，又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太平天国的军事思想也是如此，它既土生土长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的现实生活，又有深远广泛的思想渊源。综观太平天国的全部文献与领袖们的军事实践，其军事思想渊源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二是基督教教义。其基本特征，仍以继承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为主流，同时带有浓重的基督教宗教色彩。

一、来自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

如前所述，太平天国仿照《周礼》进行军队编组。《周礼》，也称《周官》或《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它搜集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的制度，添附儒家的政治思想，排比汇编而成。全书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篇。其中的《夏官司马》，记载着周代军队编制、军官官制、军事制度、军事训练、军事演习和校阅方法等。洪秀全、冯云山等都自幼阅读古代史书，当然有机会接触到《周礼》，故太平军的军制官制，受《周礼》的影响颇大。太平军的"军"的编制，完全以《周礼》为蓝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而军帅、师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的称谓，也完全与《周礼》相同。一般认为，《太平军目》的作者是冯云山，清方在1851年春，即金田起义后不久就获得此书，可见成书时间当更早。太平天国官制中的"丞相"，有天、地、春、夏、秋、冬之分，当也是参照《周礼》的结果。

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出于宗教狂热的偏见，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采取彻底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①。一时间在天国上下出现了一股焚毁经籍的狂潮。当时有一首诗记叙其情景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② 但是，无论对何种文化，用烧和禁的办法是不可能使其湮没的。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更不可能用此种方法加以否定。大概是

① 《诏书盖玺颁行说》，《太平天国印书》（下），第464页。

②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见《太平天国》（四），第735页。

当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无数现实生活的教育，使太平天国的领袖们逐渐醒悟过来，到了1854年，洪秀全就下诏设立“删书衙”，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按照太平天国教义的标准进行删改，经洪秀全“御笔钦定”后，允许继续颁行，让人们接触和阅读。与此同时，洪秀全也改变了对中国古代军事典籍的态度，将《孙子》、《吴子》和《司马法》三本兵书，经删改后，取名《武略》于1858年“旨准颁行”。尽管这三本兵书被删46处、被改243处之多，但洪秀全等毕竟承认了这些兵书仍有其现实意义，并规定为武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

实际上，除《孙子》、《吴子》和《司马法》以外的其它兵书，太平军将帅们也经常阅读，从中获取智慧。清代杭州人张鼎元写的《前敌居行》诗中，曾透露李秀成于戎马倥偬之际，仍抓紧时间阅读戚继光所作的著名兵书《纪效新书》。诗中说：“八珍罗列穷水陆，锦绣横陈灿珠玉；案头一卷未卒读，纪效新书戚公作。案旁生系呦呦鹿，朵朵梅花映毛角；旁堆伪札与伪牍，九门御林列头目，始知忠逆此托足。”① 另据《贼情汇纂》记载：“往晤战士，谈及贼之营垒，动辄铺张，所指诸法，皆金汤十二筹、洴澼百金方各书中名色。”②《金汤十二筹》，又名《金汤借箸十二筹》，明代李盘撰，内容涉及练兵、制器、设防、扼险、方略、制胜、水战诸方面内容；《洴澼百金方》，明清之际成书，是一部汇辑历代战略防御的兵书。可见这些兵书，对太平军也有影响。

《贼情汇纂》中还提到，“贼安知兵法，专寻花样于小说中”，“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③遍阅《太平天国印书》，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等出现的频率最高，如说“英雄胜比汉关张”，“绝胜常山赵子龙”，“豪雄胜愈蜀黄忠”等，可见太平军将

---

① 张鼎元：《前敌居行》，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729页。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32页。

③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54～155页。

士们重视从古代英雄人物身上吸取思想营养，激扬士气。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中国古代的兵书典籍和优秀的军事传统是太平天国军事思想的主要来源。

二、来自基督教教义

洪秀全、冯云山等信仰基督教，崇奉皇上帝，在日常生活中，早晚跪拜，食饭谢恩，灾病求免，生日满月，婚丧嫁娶，乃至作灶盖房，堆石动土，都要敬告皇上帝。至于“讲道理”，更是满口“天父权能”，“天兄担当”，以此鼓舞士气。在这些方面，基督教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而在军事思想方面受基督教直接影响的，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圣库制度。在军队中实行圣库制度，这是太平军的独创。究其思想渊源，系来自《新约·使徒行传》。该书第二章中写道：“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着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该书第四章中还叙述了信徒们将财产归公的情况：“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① 太平天国在金田团营时，要求拜上帝会众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看来，太平军所实行的圣库制度，其思想资料，系来自《新约全书》。

二是“十款天条”。《天条书》是太平天国的祈祷书，其中的“十款天条”平时是太平军将士的生活规则，战时则是太平军将士

① 《新约·使徒行传》，转引自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第97～98页。

的军事纪律。太平军的军纪中有许多严明的规定，而“十款天条”则是军纪的基础，许多纪律都由此演化引申而来。而“十款天条”则是仿自《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摩西十诫。“十款天条”基本内容则是本着摩西十诫的教义和精神，结合中国的国情，改造原文，修正条款而成，从而更加适应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道德需要。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发生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当时的西方列强如英、法、美等国，都已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军队的武器装备、军事制度等也有很大的改进，已是一支近代化的资产阶级军队，同时已有诸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著作出版传播。如上所述，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从外来的圣经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营养，那末在军事思想方面是否也受到西方的影响呢？回答是否定的。洪仁玕是太平天国领袖中对西方了解得最多的一位，他在香港住了近10年，有机会接触西方各种知识，他到天京后，给洪秀全上了一本《资政新篇》，其中就政治、经济、社会、外交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实行资本主义的建议，唯独没有军事方面的内容。在他所写的《兵要四则》短文中，也寻觅不到有关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一丝信息。1860年秋，干王洪仁玕曾接见了前去天京拜访的我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容闳曾向他提出了实行新政的七项建议，其中头三项就是“组织一个合乎科学原则的军队”;“设立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为海军设立一所海军学校”。据容闳说：“第二次会晤，讨论了前次所提出的七项建议的积极意义及其重要性。干王的见闻较之其他诸王和领导人广阔些，甚至超过了洪秀全，他很了解英国及欧洲列强所以强盛的奥秘，所以他很赞赏以上七项建议的重要意义。但是他是孤立的，没有人支持他来付诸实施。”①容闳的建议，可以视为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信息，但因受制于整个

---

① 容闳：《我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追忆》，《太平天国史译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辑，第208页。

太平天国的环境，而毫无反应和作为。洪仁玕尚且如此，其他领袖中当然也就既不可能有关于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信息，更不可能见之于行动了。

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太平天国军事思想，仍以继承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为主流，但带有浓重的以基督教教义为内容的宗教色彩，而当时欧美各国早已产生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则未见有所反映和吸收的印迹。

第九章　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

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于血腥镇压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起义过程中，在建军、治军和作战指挥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的军事思想，主要是承袭我国传统的军事思想，但也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有所发展，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他们的军事思想，不仅在晚清影响颇大，而且在民国以后仍然受到重视。由民初爱国将领蔡锷摘编的仅部分地反映他俩军事思想的《曾胡治兵语录》，多次翻印出版，并被用作军校和部队的教材。本章对曾、胡的军事思想作一扼要论述。至于湘军另一统帅左宗棠和淮军统帅李鸿章，鉴于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期的军事思想与曾、胡大同小异，而在“师夷长技”以求“自强”的活动中，则各有突出表现，对此，本书将另作论述，至于左、李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思想，则将其别具特色的内容纳入本章的有关部分，以与曾、胡的思想进行对比研究。同样，关于曾国藩在“自强”活动中的军事思想，则在论述左宗棠、李鸿章在“自强”活动中的军事思想时捎带予以论述。

第一节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始见于1851年（咸丰元年）向清廷上《议汰兵疏》之时，形成较完整的体系则在镇压太平军、捻军期间。由于他笃信程朱理学，其军事思想具有明显的儒家思想的印记。

一、建军指导思想

关于曾国藩的建军指导思想，在本书第七章第一节中已多有涉及，为避免重复，下面仅就几个问题进行扼要的论述。

（一）改弦更张，另建军队，革除积弊

曾国藩在1851年4月10日的《议汰兵疏》中，就陈述了绿营兵积弊深重、不堪任战的情况，提出了裁减员额，加强训练，实行精兵的建议。迨至1853年初奉命办理湖南团练时，面对绿营兵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溃逃的情景，他对绿营的腐败无能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认为这样的部队，即使孔子复生、岳飞再世，也难改变其营伍恶习，成为有战斗力的部队。而非正规武装的团练，更不是英勇善战的太平军的对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打着办团练的旗号，改弦更张，另建一支能与太平军相抗衡的军队——湘军，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曾国藩另建军队的主张，虽在给清廷的奏折中闪烁其词，但在私人通信中却直言不讳。例如，在给湖南县丞王鑫的信中就说："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务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① 又如，他给当时在安徽办团练的李鸿章的信中表示，另建的湘军，"须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②。类似内容的书信还有多封，其要点是：揭露绿营兵的各种

①②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0年版（下同），第186、364页。

弊病；表明改弦更张另建军队的决心；阐述建军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

曾国藩改弦更张、另建军队的首要措施，是在选将募兵方面独辟蹊径，“特开生面”。他选用有“忠义血性”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军队的骨干，招募“朴拙少心窍”的山乡农民作为军队的基础，通过改变官兵的成份和素质，使军队能做到“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赴火同行，蹈汤同往”，革除绿营“败不相救”、“胜则相忌”等恶习。

曾国藩深知选将的重要性，认为，“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①。他选将的标准很高，除第七章第一节中提到的以“忠义血性”为根本，必须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外，还要求“廉明为用”、“知人善任”、“兼娴韬钤之秘”，等等。具备这样条件的将领在当时百难挑一，何况主要的选择对象又是未经战阵的知识分子。他也深感选将的困难，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添营甚易，得统领之才千难万难。”② 尽管如此，他还是抱着积极的态度选择和培育将领，具体办法是：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延揽；把营务处作为“陶熔”人才的场所；对部属进行谆谆教诲；注意在实践中择优选拔。通过这些办法，终于在湘军中涌现出一批主要由儒生出身和少数由行伍出身的武有韬略、文能治政的将领。从而使“书生从戎”成为一时风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

曾国藩鉴于绿营兵丁在作小贸营生和执行差役的过程中，比较普遍地沾染了投机取巧、懒散油滑等不良习气，市井之民同样浮滑不实，不耐劳苦，因而在组建湘军时，确定绿营的散兵和城市居民一概不收。他认为山区农民“犷悍壮健”、“朴拙少心窍”。其用意十分清楚，“犷悍壮健”，能够适应繁重的操练和残酷的战

---

① 曾国藩：《叠奉谕旨缕陈各路军情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627页。

② 曾国藩：《与胡宫保》，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第122页。

争环境；“朴拙少心窍”，便于灌输封建伦理纲常和宗法思想，将士兵塑造成替封建统治阶级卖命的驯服工具。至于募兵实行保甲连坐之法，在于通过组织手段对士兵进行严格控制；招来的士兵以县、乡为单位进行编组，意在利用乡土观念维系内部的团结。诚然，上述措施确实起到了巩固内部、增强战斗力的作用。但是，因为带有强制性和落后性，所以只能收功于暂时而不能见效于久远。例如，士兵的逃亡现象不但未能杜绝，而且日趋严重。曾国藩于1863年（同治二年）写给左宗棠的信中就说：上年三次派人回湘募勇万人，结果旋募旋逃，且病且死，今已不满七成。

曾国藩改弦更张的另一重要措施，在于继承戚继光的“舍节制不能成军”和“勇以亲手招募者为佳”的思想，实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原则，编组湘军。他把自统领至勇丁逐级自选的优点概括为：“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① 他的亲信幕僚王定安也认为，这样做能使“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②。由此可见，实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原则，固然改变了绿营平时分散驻防，战时零星抽凑，以致“卒与卒不相知，将与将不相习”等弊端，能够密切上下关系，齐心合力地进行作战，但实行上述选募编组原则，却使这支军队形成了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兵为将有”、“将为帅有”的私家军的组织保证。

曾国藩改弦更张的又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厚给薪饷和广施保举。他针对绿营平时实行薪饷低微的“坐粮”制、战时实行耗资甚多的“行粮”制的弊病，制定了不分平时战时，实行固定的比较优厚的薪饷制度（详见第七章）；与此同时，每战必保举一大批

---

① 曾国藩：《复议直隶练军事宜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875页。

② 王定安：《湘军记》第338页。

"有功之人"，予以升官晋爵，以名利为诱饵，驱使官兵效命疆场。无可否认，在"以投营为名利两全之场"的封建乱世，采取上述措施，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固结军心、激励士气的作用，湘军之战斗力强于绿营，与上述措施不无关系。但是，其在湘军中产生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其一，实行厚饷制，不但没有实现曾国藩所期望的"以养将士之廉，而作军士之气"的目的，反而助长官兵贪恋财富的私欲，以致官长克扣兵饷的事件禁而不止，士兵则通过抢劫手段积聚钱财，一旦私囊充盈，便"饱则思逸"，不愿再过艰危的军营生活，有的部队甚至发生索饷哗溃事件。其二，经过连年征战，勇丁被保举为高、中、初级职官的不计其数。然而，僧多粥少，能实补遗缺的机会甚少，因而绝大多数徒有保举之名，却永无履任之实，从而出现了名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实际上俸银丝毫未增，且仍受营、哨官节制的不正常现象。这就使不少人产生了埋怨厌战情绪，成为难以解决的矛盾。

（二）适时组建水师、马队，适应作战需要

我国古代的一些著名统帅，很重视因敌因地制宜地组建不同的兵种，用以克敌制胜。湘军统帅曾国藩，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

曾国藩于1853年初在长沙组建湘军时，主要是建设陆师。稍后，他接获湖北按察使江忠源从南昌寄来的信，告诉他太平军在长江中船只甚多，绿营水师根本不敢与其作战；并要他注意"筹备炮船，先击水上之贼"。不久，他侦知太平军西征军"以舟楫为巢穴，千舸百艘，游弋往来，支湖小汊，横行无忌"，认识到"办船一节，万不可以刻缓"①。于是，在续建陆师的同时，把重点移至组建水师方面。经过近半年的紧张工作，终于建成一支拥有战船200余艘、洋炮570多门、官兵5000人的水师，于1854年2月与陆师一起从衡州（今衡阳市）起程，迎战进入湖南的太平军西征军。经过与太平军几次交锋，使曾国藩进一步认识到："是荡平

① 曾国藩：《与陈源兖》，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369页。

克服，固重在陆军，而断其勾结，制其死命，终非水军莫济。”①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加强水师建设，尽管湘军水师在靖港、湖口之役中先后遭到重大损失，但都能及时进行整顿扩建，恢复和提高其作战能力，并终于变劣势为优势，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了长江水域的控制权。1860 年 7 月，曾国藩接受胡林翼的建议，又奏请清廷组建淮扬水师，以保里下河的米、盐和“协剿”江淮的太平军、捻军；组建宁国水师，以便与长江水师夹攻金陵；组建太湖水师，以便收复四面皆水的苏州等城。于此可见，湘军水师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确实起了重大作用。此后，在遏阻捻军抢渡襄河、运河、黄河等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相比，太平军的作战失利，与忽视水营的合理编组和船、炮建设以及军事训练，也有很大的关系。

曾国藩在一段时间内，对于组建马队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后来随着对敌方情况的了解不断深入，开始把组建马队提上议事日程。1859 年 2 月，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提出：“近闻粤匪常以马队冲锋，捻匪则马匹尤多，李续宾三河之败，即系马贼数千，为湘军向来所未见。昨吴国佐景（德）镇之挫，亦为贼马所眩。今欲整顿陆军，不得不添设马队。”② 他建议从安徽颍、亳地区招募马队 2500 骑，由他亲自负责训练。此后，湘军中的马队逐渐增多。例如，鲍超和曾国荃于 1863 年（同治二年）专门派人去张家口、古北口分别购买战马 1800 匹和 600 匹，扩充马队。曾国藩还多次致函胡林翼、李鸿章等，建议他们尽快组建马队，以便将来与拥有众多骑兵的捻军作战。1865 年，曾国藩奉命率部镇压捻军时，又指定专人筹组马队 2000 人，并从僧格林沁所部八旗兵中挑选骑兵 1888 人，作为“游击之师”。诚然，湘、淮军的马队数量有限，战斗力也弱于步队，未能完全起到如曾国藩所期望的“以壮步军之

① 曾国藩：《常德府城失守正筹水陆进剿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 150 页。

② 《通筹全局仍请添练马队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 930 页。

气，而寒贼党之胆"① 的作用，但同样反映了他善于因敌、因地、因时制宜地组建各兵种的思想。当然，更反映出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良苦用心"。

与组建各兵种密切关连的问题之一，是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曾国藩对此是相当重视的。在初建湘军时，就把"精器械"作为建军的主要内容之一，对洋枪洋炮的优越性也予以肯定，认为水师在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洋枪的铜帽自来火，费钱有限而妙用无穷，尤远胜于中国鸟枪的引药。在围攻金陵时，他将购买的洋枪、洋炮、洋药、铜帽源源运往曾国荃军营，并曾设想由淮军派开花炮队配合攻城。在人与武器的关系方面，他明确指出："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②他告诫曾国荃不要专在增添洋枪洋炮方面下功夫。他对使用新式武器确实存有保留的思想。例如，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说："洋枪洋药，总以少用为是。……凡兵勇须有宁拙毋巧、宁故毋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弟莫笑我为老生迂谈也。"③他还把劈山炮、抬枪、鸟枪比作书生必读的经书八股，而把开花炮、洋枪比作书生兼工的诗赋杂艺，并称"我军仍当以抬（枪）、鸟（枪）、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这种既承认洋枪洋炮的优越性却又不愿放手使用的状况，乃是曾国藩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方面处于矛盾心态的一种反映。

顺便指出，左宗棠、李鸿章在因敌因地制宜组建兵种方面，与曾国藩的指导思想完全一致，在实践中则各有所长。左宗棠早在湖南幕府时，就主张大办水师，控制长江。1862 年，奉命率部向地多水泽的浙江进军时，单独组建了一支内河水师，虽然规模不大，但在配合陆师作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在陕甘镇压捻

① 《通筹全局仍请添练马队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 930 页。

②③ 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 868、869、876 页。

军、回军时，又添建马营，用火力较强的马营对付捻军、回军的骑兵。李鸿章不仅参与了淮扬水师的组建，而且在淮军中率先组建了洋枪队和炮营，在攻取苏州、常州等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奉命接替曾国藩“剿捻”以后，又及时扩建马队。至于引进和使用洋枪洋炮，他们的思想比曾国藩更开放，态度更积极。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就购买了德国造后装线膛炮和七响步枪；在围攻回军堡寨时，强调应多用火炮攻城，以减少人员伤亡。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很快用洋枪洋炮替换旧式的刀矛和鸟枪、抬枪，使淮军最早实现了装备近代化。不过，后来由于过分迷信新式武器的作用，忽视其它的制胜因素，因而面对武器装备优于自己的外国侵略军时，便产生了畏惧心理，丧失了战而胜之的决心和信心。就思想方法而言，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三）灌输勤王忠君和捍卫封建名教思想，强化军队的阶级属性

曾国藩不但重视从组织上而且重视从政治上加强湘军的建设。其根本措施，就是向官兵灌输勤王忠君和捍卫封建名教的思想，借以强化军队的阶级属性，使其成为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

曾国藩的上述政治建军思想，最早体现在1854年2月奉命从衡州出师时所颁布的《讨粤匪檄》中。他针对太平天国宗教信仰独尊上帝，政治上主张平等，经济上主张平均，思想和行动上反对孔孟儒学和鬼神迷信，大做文章。说什么“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然而，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进而声称这次出师与太平军作战，“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①

①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下同），第232～233页。

诚然，这篇反动檄文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动员地主阶级参加反革命战争，争取深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的群众，特别是受儒家思想熏染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也阐明了他的政治建军的宗旨。因为，不仅战争的目的和建军的宗旨通常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而且他对将领的选择、士兵的招募、部队的管理教育，以至协调军队内外的关系，几乎都渗透着上述思想。其中有些内容已在前述的选将、募兵问题中有所涉及，更多的内容将在治军部分展开论述。

由上可知，曾国藩建军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敢于冲破“祖宗成法”，重新组建一支能适应当时战争需要的军队，从而为尔后清军的不断革新提供了先例，开辟了道路。

二、治军指导思想

治军与建军密切关联，不可能严格区分。这里所说的曾国藩的治军指导思想，主要是探析他用什么思想教育官兵，对军队实行政治控制，采取什么方针、原则训练军队，提高其军政素质，制定哪些规章制度管理部队，求得令行禁止，从而实现其“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① 的最终目的。

（一）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的基本思想

如果说曾国藩重视以儒家思想建军，那么，他在治军方面显得更为突出。他在日记中写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② 他倡导“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之目的，系要求湘军将士恪守“君仁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封建秩序，绝不犯上作乱。同时，在军队内部形成一种被称为“辨等明威”的“军

---

① 曾国藩：《与罗萱》，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 551 页。

②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 391 页。

礼”，以便与组织上的“节节相制”相适应，从思想上维系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曾国藩鼓吹“仁礼”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发挥孔子“仁者必有勇”的思想，煽动湘军将士抱着“杀身成仁”的志向，顽固地抗击把封建礼教打得落花流水的太平军。他在谈论带勇方法时指出：“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①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他强调“用仁”、“用礼”的目的，在于使将士“知恩”、“知威”，以便从政治思想上有效地进行控制。

与此同时，曾国藩提倡“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②，并把“忠”字作为处理军队内部上下关系的主要准则，强调指出：要使军队成为国家的干城，“第一教之忠君”，而“忠君必先敬畏官长”③，士兵对长官，下级对上级，不能有任何抗旨违令的思想和行为。至于“信”，主要作为处理同级关系的准则，即“信以施于同列”④，希望同级将领之间互相信赖，协同作战。

曾国藩还把“忠信”归结为一个“诚”字，申言“诚便是忠信”⑤。强调：“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⑥ 他要求书生出身的将领与行伍出身的将领相处时，必须“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改变水火不能相容的状况。他对绿营中的巧饰、浮滑之风十分反感，希望湘军“以诚字为本”，养成一种诚朴求实的风气。他认为争取民心，镇压农民起义，应

---

①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 391 页。

②⑤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33、362 页。

③ 曾国藩：《批潘鼎新、刘铭传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 2，第 50 页。

④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 1011 页。

⑥ 《曾文正公全集·治兵语录》，世界书局 1936 年版（下同），第 4 页。

具备“精诚所至，金石亦开”的精神。他在给安徽蒙城县吏的一件批文中指出：“蒙城习于从捻，溺已深有，非法令所能止。全赖该员等不惮烦劳，苦心访察，苦口开导。明之极而才略生焉！诚之极而感化见焉！即多杀匪党，亦须自明字诚字中做去”①。

曾国藩大讲“仁礼”、“忠信”，大讲其“诚”，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目的在于陶冶湘军将士具备忠于封建秩序的政治素养，使他们忠诚不贰、同心协力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

（二）以“勤恕廉明”、“谦慎”作为将领的行为准则

曾国藩认为带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并把上述四字概括为：“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②。进而又对如何遵行四字中的每一字，作了具体阐释。

他非常强调“勤”字，指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③。他要求统领、营官首先以勤劳自励，每天亲自点名、看操、查墙子（即查哨），养成早起和忍饥耐劳的习惯，以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同时，强调管理弁兵也应以“勤字为本”，刻刻教督，处处查察，事事体恤，做到口勤、脚勤、心勤。

他认为“仁即恕也”，并说懂得了“恕”道，就能“识大量大”，反之，就“识小量小”。④还说凡事留有余地，功不独居，过不推诿，这是待人处事的“恕”道。他强调两军相处时，统领应“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⑤这样，统领与统领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就能融洽相处。

他告诫统领、营官要严格守一个“廉”字，不要克扣、剥削士兵的银钱。因为只有廉洁自奉，才能在士兵中树立威信。不仅

① 曾国藩：《批委办蒙城圩务桂令中行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第92页。

② 曾国藩：《批管带护军喻参将吉三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第39页。

③ 曾国藩：《致宋滋久》，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第238页。

④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384页。

⑤ 《曾文正公全集·治兵语录》第11页。

如此，还应常使部下多得些“小款小赏”，弁勇多占些“实惠”，从而使部属人人心悦诚服。

他说：“明”就是“智”，“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我见其细，曰精明。”[1] 对于将领来说，“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省明，而又证之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2]。由此可见，“明”字的核心，在于要求统领、营官对部属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正确地使用人才，指挥作战。

曾国藩鉴于湘军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骄矜之气，并由此而影响到部队的管理日趋懈怠，所以他还特别重视用“谦慎”二字教育部属，严肃地指出：“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3] 而医治骄、惰的有效药方，就是树立“谦慎”的风气。他对湘军悍将鲍超说：“第一戒个骄字，心根之际若有丝毫骄矜，则在下之营官必傲，士卒必惰，打仗必不得力矣。”[4] 他还谆谆教诲其他将领务必守个“谦”字“慎”字，用以医骄医惰，从而避免打败仗，招灾祸。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用心，在于通过“勤”，达到严格训练和管理部队的目的，通过“恕”和“廉”，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协调军队内部关系，增强聚合力，通过“明”，正确地选拔使用部属，处理内部事务，通过“谦慎”，使部队保持“临事而惧”的风气，不致因骄惰而打败仗。用以上几个字作为将领的行为准则，可谓颇具匠心，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湘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远胜于绿营，就是明证。当然，作为封建军队的将领，

---

①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4页。

② 曾国藩：《批吴廷华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第36页。

③ 曾国藩：《致李申夫》，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9，第165页。

④ 曾国藩：《批统领霆字营鲍提督超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第47页。

以个人利害为取舍，能全面达到上述要求者极为罕见。因此，曾国藩虽然用以上几个字谆谆告诫部属，但将领中贪婪、骄惰等不良风气仍然日渐滋蔓而无法禁绝。对此，曾国藩只好用下面两段话自我解嘲。他说："军中乃争权絜势之场，又实非处约者所能济事。求其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驱使群力者，颇难其道尔。"① 又说："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② 从中可以看出，他既欲力挽军队颓靡之风但又无能为力的矛盾心理。

（三）以"勤训精练"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

湘军初建时，曾国藩抽调未经认真训练的湘勇1000人，仓促赶赴江西参战，结果损兵折将，溃败而回。从此，他接受教训，反复强调军队必须经过"勤训精练"，方能参战；如果不加训练，即使"勇士云集，饷项应手，军器皆备"，仍然是"驱市人而御虎狼，至则溃耳"。③ 1862年4月，当淮军抵上海后，他告诫李鸿章应先抓部队训练，不要轻易出战。他在日记中写道："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④ 这些言论，反映了他把训练作为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的思想。

曾国藩除了承袭我国传统的练兵思想外，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概括地说就是："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所谓"大处着眼"，就是把封建纲常名教作为训练的前提；所谓"小处下手"，就是训练内容力求简明扼要，具体实用，不讲高深的理论，不搞花架子，但要求十分严格。

他首先把"训"和"练"区分开。在"训"的方面，又分为"训营规"和"训家规"两部分。把"训营规"的内容归纳为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四项，日夜常课七条，和营官定期点名、看操。

①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44页。

② 曾国藩：《致澄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36页。

③ 曾国藩：《与骆秉章》，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218页。

④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80页。

其目的有二：一是使官兵勤而不怠，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二是借以监视弁勇的行动，并树立营、哨官的威信，以便临阵之际兵勇能服从命令听指挥。把“训家规”概括为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四句话。同时强调：“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① 这些要求看似简单，却含义较深。禁嫖赌、戒游惰，可以达到严肃军纪、提高战斗力的目的；慎语言、敬尊长，使营、哨官与弁勇的关系成为父兄子弟的关系，以保证组织上的层层节制和对士兵的控制；“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的宣传，虽然带有虚伪性，但可以使部分士兵以至他们的家属产生感恩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官兵之间的矛盾。总之，用这些办法控制部队，比单纯用棍棒、皮鞭更为巧妙，也更为有效。蔡锷在他摘编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就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② 于此可见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对后世之影响。

在“练”的方面，分为“练技艺”和“练阵法”两种。对于“练技艺”，要求达到刀矛能保身，枪炮能命中、击远。这些要求，符合当时湘军冷热兵器并用的特点，体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他重视练阵法，指出：“将多人以御剧寇，断不可无阵法也。”③ 但又主张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并要求部队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及时变换阵法。他还推广满族骁将多隆阿“专择翻山越岭、过沟跳涧之处”训练部队的方法，认为在这种地形上进行训练，如果队伍不发生紊乱，那末接战时也就不会乱了。这体现了他的练兵应接近实战的思想。

此外，他还强调练兵要练到“极熟”的程度。指出：“技艺极

---

① 曾国藩：《劝诫营官四条》，见《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438 页。

②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3 页。

③ 曾国藩：《与王鑫》，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 341 页。

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① 为此，他把他所推崇的凡事须从“铢积寸累”下功夫的理学思想运用到练兵之中，要求营官从早到晚以训练为事，“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宜须臾稍离”，并认为只有这样，“乃可渐几于熟”。②

由上可见，曾国藩把自己说成是“训练之才”，不完全是自我吹嘘。湘军之所以比较有战斗力，与贯彻执行他所制定的训练方针、原则和方法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他不注意通过战争实践，总结经验教训，改进训练方法，借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而是对于打了败仗的部队，往往简单地采取先解散再组建，也就是所谓“抽帮换底，整旧如新”的办法，这是不足取法的。

（四）以“立法行令”、“宽严相济”作为管理部队的主要方针

曾国藩认为：“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③ 他告诫部属，部队必须“立法行令”、“规矩森严”、“进止画一”。反复强调：“待勇不可太宽，平日规矩宜更整严，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④ 他不仅制定了湘军营制，还制定了营规，希望通过严格的管理，使其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

应当指出，曾国藩虽然强调治军要严，但不是一味从严，而是继承了我国古代统帅“宽严相济”的方针，并且涂上一层中庸之道的色彩。他把“宽严相济”的内涵解释为“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⑤。并说只要四者兼备，即使骄兵悍将，亦能有效地统驭。他还对“礼”和“义”赋予明确的含义和具体的要求。

这里的“礼”，主要是指军队内部“辨等明威”的等级规范。他主张统领、营官对待弁勇既要关心体贴，视之如子弟，使他们

---

① 曾国藩：《劝诫营官四条》，见《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8页。
② 曾国藩：《复刘蓉》，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326～327页。
③ 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见《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59页。
④ 曾国藩：《与唐桂生》，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7，第58页。
⑤ 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24页。

知恩，又要庄重自持，有“凛然难犯之象”，使他们知畏。他编写《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对官弁兵勇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自觉遵守营规、营法，达到知“礼”知“义”的目的。同时通过赏律和戒律，一方面使兵勇为得重赏而不惜卖命作战，另一方面使兵勇因害怕惩处而不得不循规蹈矩。实行这些办法，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效果。被称为直笔叙述湘军史实的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指出："至今湘军尊上而知礼，畏法而爱民，犹可用也。"①这段话可以作为一个佐证。但是，曾国藩在处理严与宽这对矛盾时，未能做到恰如其分，对于违犯营规、营法的将弁，往往劝诫多于惩处，失之过宽，结果造成营伍日趋废弛。对此，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敝处近年驭将失之宽厚"，以致“危险之际，弊端百出”。②

这里的“义”，主要是指处理军民关系所应遵守的规范。在筹建湘军时，他对由于清军和潮勇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以致民间流传“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的说法十分反感，发誓要把湘军练成一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以挽民心，而塞民口”。他反复用“以爱民为第一要义，庶为仁义之师”，“爱民则造福，扰民则造孽”等道理教育部属，还专门编写了《爱民歌》，要官兵熟唱。同时，确定了“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③的原则，要各级将领遵行。正因如此，湘军早期的群众纪律确实比较好。曾国藩自我吹嘘说："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④

曾国藩强调“爱民”，主要是为了与农民起义军争夺群众，减少敌对力量，改变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事实上，他所爱的“民”是

---

① 王闿运：《湘军志》第159页。

② 曾国藩：《复左制军》，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1，第139页。

③ 曾国藩：《与吴竹庄》，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9，第162页。

④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281页。

有严格政治标准的。他在家书中说："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① 凡是积极参加和支持镇压农民起义的豪强地主和不敢犯上作乱的"良民"，那是要爱护的；至于参加和同情农民起义军的"刁民"和"劣绅"，不但不爱，还要大加杀戮，即使"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②。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暴虐、嗜杀的狰狞面目。

此外，正因为曾国藩主张"应宽者，名也，利也"，因而他对湘军的抢掠行为，虽然常用"总以禁止掳掠为第一义"等冠冕堂皇的话加以训诫，实际上却是睁一眼闭一眼．后来竟采取容忍放纵的态度，以致湘军"扰民被控之案层见叠出"。迨至湘军攻占金陵时，竟大肆烧杀淫掠，使金陵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事实表明，任何剥削阶级的军队都是不可能成为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的。

综览以上论述，不难发现，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对于有效地统驭湘军和提高其战斗力，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治军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封建伦理纲常作为"软"管理，把规章制度作为"硬"管理，把二者结合起来，通过"软"管理达到"硬"管理的目的。但是，他的主观愿望仍然与客观效果发生明显的矛盾。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封建剥削阶级军队所存在的那些痼疾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任凭主观上如何努力，也是无法根除的。还由于他的治军思想，有些内容如"应宽者，名也，利也"等，属于传统军事文化中的消极层面，对于湘军来说，只能起兴奋剂或麻醉剂的作用，而不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他不遗余力地对部队灌输"忠君"思想，也不可能因此而缓和固有的阶级矛盾，在后期的湘军中，就出现了秘密的反清会党组织，至于被遣散的官兵，参加会党者为数更多。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

① 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369 页。

② 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 45 页。

三、作战指导思想

曾国藩的战争观，从总体上看是唯心主义的。他宣扬："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① 但是，他把"尽其在我，听其在天"② 奉为圭臬，着重在"人谋"方面下功夫。他所强调的人谋，主要表现为注意把中国古代用兵方略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制定了基本符合客观实际的作战方针、原则，成为晚清统治阶级中善于运筹帷幄的军事统帅。他在作战指导方面有以下特点。

（一）以"稳慎徐图"、"致人而不致于人"作为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曾国藩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而慎战则是其突出的具体表现。他在 1856 年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兵犹火也，易于见过，难于见功。"③表明他意识到指导战争的复杂性。因此，他反复强调与太平军作战，"宁失之慎，毋失之疏"，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步步谨慎，只有"稳慎徐图"，不敢稍涉大意，方能致人而不致于人。

曾国藩的慎战思想，首先体现在战略方面，并突出地表现为尽管军情紧急，但如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绝不贸然出战。他曾多次抗拒清帝令其迅速出师的命令，为朝野所瞩目。

先是 1853 年 11 月至 1854 年 1 月，他先后三次以船炮尚未备齐和必先扫清湖北江面为理由，拒绝出师湖北"会剿"和救援安徽庐州。咸丰帝为此大为恼怒，斥责他"偏执己见"，"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他上疏坚持必须等到船炮备齐后方能出师，

---

① 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 1057 页。

② 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92 页。

③ 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329 页。

并申辩说："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① 直至太平军攻占岳州、湘阴、靖港，湖南形势已"急如星火"，他才于1854年2月25日率水陆所部于衡州"起程东征"。其次，1859年6月，清廷为防止太平军石达开部由湘入川，命令曾国藩率部由长江乘船赶赴四川夔州扼守防堵。曾国藩则以需待调回援湘部队，添调水陆各营，凑足3万人方能成行为理由，迟不应命。最后是1865年5月23日，清廷下谕曾国藩前往山东一带督兵"剿捻"。曾则以湘军已大部裁撤，需另招新勇，与捻军作战，必须添练马队，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需编练黄河水师，用以阻遏捻军北渡等理由，说明虽然"朝廷责臣讨贼至切且速"，"山东官民亦望臣星速北上"，但因准备需要时间，所以实难迅速出师。以上事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慎战思想，体现了他所说的"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② 的主张。

曾国藩的慎战思想，还表现在战役、战斗方面。1857年，他写信给正在吉安前线的曾国荃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③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曾国藩运用战争双方强弱、胜负、攻守、主客等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观点，在作战形式方面，早期主张"深沟高垒"、"以主待客"，通过坚守防御达到挫败敌人进攻的目的。后发展为："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使贼之锐气不得遽逞，待其饥疲惰归，而后击之。"④ 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先防守后进攻。稍后又提出："嗣后每立一军，则修碉二十座，以

---

① 曾国藩：《沥陈现办情形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86～89页。

② 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33页。

③ 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48～349页。

④ 曾国藩：《批余参将际昌禀》，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第38页。

为老营，环老营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来梭剿，庶几可战可守、可奇可正。”① 也就是攻防结合，以攻为主。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以主待客”思想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发展的，并不是一贯强调“结硬寨、打呆仗”。

顺便指出，左宗棠与李鸿章也都主张慎战。左宗棠说：“慎之一字，战之本也。”② 李鸿章声称：“敝军家法，以稳慎为主。”③ 他们在确定战略方针和指挥战役、战斗方面，都充分体现了“稳慎”的思想。如左宗棠强调用兵作战，要像古代兵家所说的“每发一兵，须发皆白”那样谨慎。李鸿章则说：军事须细针密缕，不可慌张操切。但比较起来，左、李在作战指导上，要比曾国藩大胆果断。

（二）以着眼全局、“审机度势”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出发点

战争实践证明，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较之太平军、捻军的某些统帅确实要高出一筹。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他确定了制定战略方针的一些正确原则：1、注意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即：“论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晰微茫”④。2、强调“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⑤。“审势”，主要指地势和敌势。地势方面，要求把城市要隘、平原旷野、深山穷谷、河湖小溪、大道小径，都认真调查清楚。敌势方面，应做到：“不特知贼首之性情伎俩，而并知某贼与某贼不和，某贼与伪主不协”⑥。3、重视“审力”。声称：“审机审势犹在其后，第一先贵审力。”所谓“审力”，就是要做“知己知彼之切实工夫”⑦，弄清敌我双方的兵力兵器对比。4、与人共谋。他欣赏和推广老湘军统领王鑫在战

---

① 曾国藩：《复左季高》，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第242页。

② 左宗棠：《李道辉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见《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下同），第168页。

③ 李鸿章：《复郭筠仙》，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11页。

④⑥ 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23、352页。

⑤⑦ 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17、878页。

前召集营官开会，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的办法。他的结论是：“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法而无功；或今日致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惟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① 重视运用这些原则，是他制定战略方针比较切合实际的根本原因。

这里，对曾国藩所拟定的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略方针的依据、内容和特点作些剖析，以便进一步了解他的作战指导思想。

关于镇压太平军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争上游、争要地，“节节攻剿”，“先剪枝叶，后图根本”，最后夺取金陵。这一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实施，大致可分两个时期：从衡州出师到安庆会战为第一个时期，重点在于先争武昌，进而争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为夺取金陵创造条件。进军苏、浙，威逼金陵，为第二个时期，重点在于规复苏、浙，包围金陵，最后夺取金陵。

1854 年初，太平军西征军进入湖北，威胁武汉。曾国藩针对太平天国在长江中游开疆拓土和攻取沿江重要城镇的战略企图，就向清廷提出了与太平军争上游、争要地，由上而下节节进攻的方针。他在 1854 年 1 月 19 日的奏折中，针对咸丰帝要他率部直接救援安徽的谕旨，明确指出：“论目前之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并说：“目今之计，宜先合两湖之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乃为决不可易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间，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服犹可支撑。”② 这些意见，清楚地表述了他集中兵力与太平军争夺武昌，进而由上而下争夺沿江各重要城镇的思想。这种根据地理形势，以上制下、逐步推进的思想，应该说

---

① 曾国藩：《再议练军事宜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 881 页。

② 曾国藩：《沥陈现办情形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 88 页。

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也是比较稳妥的。1854 年 10 月湘军攻占武汉以后，接着进攻九江、湖口，就是上述战略思想的初步实践。

由三路图皖到争夺安庆，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战略方针的进一步发展。

1859 年春，太平军石达开部转战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陈玉成部在捻军配合下活跃于皖北战场，而清政府的作战方针举棋不定，没有重点。曾国藩与胡林翼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以湖北为根本，进窥安徽的战略方针。先是于 1859 年 2 月 12 日提出："惟安徽贼党，其氛甚恶，其患方长"。"诚使大江两岸，各置重兵，水陆三路，鼓行东下，剿皖南则可分金陵贼势，即可纾浙江之隐忧；剿皖北则可分庐州之贼势，即可纾山东、河南之隐忧"。① 同年 10 月，又提出四路进军之策："南则顺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则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② 他把作战重点放在皖北，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取得皖北，可以确保湖北。其缺点是兵力分散，缺乏战役主攻方向。时隔一月，他把坐镇金陵的洪秀全和据有安庆等地的陈玉成诬为"窃号之贼"。并指出："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③ 这就明确地提出了以进攻安庆为中心的作战方针，避免了分兵作战的缺点。实践表明，安庆战役的胜利，使湘军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为进攻金陵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里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在安庆战役中，曾国藩亲

---

① 曾国藩：《通筹全局请添练马队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 928 页。

② 曾国藩：《遵旨会商大略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 1023 页。

③ 曾国藩：《遵旨会筹规剿皖逆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 1025 页。

率万人进驻皖南祁门，对此究应如何评价？全力争安庆，是曾国藩始终坚持的主张。但是，当 1860 年 6 月 17 日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奉命督办江南军务后，清廷便急如星火地命令他率部援苏、援浙。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从安庆撤围，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悬军深入，进行无后方的作战，这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另一是既坚持围攻安庆，又不完全抗拒清廷的命令。曾国藩正是选择了后者。他一方面向清廷陈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① 强调绝不能撤安庆之围。一方面亲率万人进驻皖南祁门，并向清廷表示，等到厚集兵力之后，即分兵三路，一由池州进规芜湖，一由祁门至旌、太进图溧阳，一分防广信、玉山以至衢州，作出向下游进攻的许诺。分兵皖南，实非曾国藩本意，而且有相当的危险性。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只有如此部署，方能保证围攻安庆的既定方针不致夭折。因此，不能视为失策之举。

如果说攻占安庆是曾国藩战略方针的重大胜利，那末，攻占金陵，则是其战略方针的最终实现。

金陵战役与安庆战役的相同之处，在于集中兵力攻占由太平军所据的要地。不同之处，在于"先取远势"，即先对金陵实行大包围态势，节节夺取金陵外围的战略要地，逐步收缩包围圈，最后夺取金陵。也就是"欲拔本根，先剪枝叶"②。在作战部署上，实行三攻、一保、一阻。三攻就是：一由曾国荃所部湘军沿长江两岸进击，于 1862 年 5 月底进驻金陵城外的雨花台；同时调多隆阿部由庐州取浦口、九洑洲，以便南北对进，对金陵城形成合围之势；水师则配合陆师作战，并负责粮运。二由左宗棠率所部湘军（后又增加蒋益澧部）于 3 月由江西入浙，与太平军李世贤等部争

---

① 曾国藩：《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 1145～1146 页。

② 曾国藩：《遵旨统筹全局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 2072 页。

夺浙江。三由李鸿章率新组建的淮军雇外轮于5月初由安庆运抵上海，在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的配合下，与太平军李秀成部争夺苏南。一保，就是由曾国藩亲自指挥鲍超、张运兰等部湘军，与太平军争夺宁国（今安徽宣城）、广德、芜湖、巢县、含山、和州、运漕、东坝等要地，确保曾国荃部后路安全和粮运畅通，并策应进攻浙江的湘军。一阻，就是由李续宜所部湘军和其它清军扼守皖北，阻击陈玉成余部和捻军，保障侧后的安全，并兼顾战略后方湖北。曾国藩认为实行这样的作战部署，就能使金陵、苏、杭的太平军同时告急，备多力分，顾此失彼，便于将其各个击破，最后达到攻占金陵的目的。这种远势包围、彼此协同、向心合击的作战部署，给太平军的作战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随着李鸿章、左宗棠所部在苏、浙战场节节获胜，曾国荃所部的兵力日益增厚和九洑洲的攻占，于1864年3月实现了对金陵城的合围，并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在7月19日攻占金陵，使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得以全部实现。

曾国藩镇压捻军的战略方针，尽管在具体作战部署方面前后有所变化，但都是以捻军骑兵多，惯于流动作战，湘军骑兵少，行动缓慢等情况以及地形等条件作为依据的。其主导思想就是“以静制动”。他接受了僧格林沁由于“与贼俱流”致遭惨败的教训，企图以湘军的“静”来制捻军的“动”，从而摆脱被动，争取主动。他诬称善于流动作战但又依恋家乡的捻军为“流贼”，认为对付这种军队，应采取“豫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①，“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②的战略方针，在捻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实行重点“防剿”，以防为主，攻防结合。从作战的角度探讨，这一方针虽然不属于消极保守、被动应付，但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因为既然实行重点“防剿”，就只能集中兵力于有限的地区和有限的要点，以致仍然留有很大的空隙，捻军则可在湘、淮

① 王闿运：《湘军志》第55页。

② 曾国藩：《钦奉谕旨复陈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八》第4945页。

军的设防区内往返穿插；如果捻军避开这些地区，则湘、淮军不得不把“迎头拦击”改成“跟踪追击”，既疲于奔命，又收效甚微。

随后，曾国藩改行“聚兵防河”的方针，企图把捻军遏制在黄河、运河以及沙河、贾鲁河之间的三角形地域，不致“此剿彼窜”。不难看出，“聚兵防河”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以静制动”。实行这一方针，虽有河流天险可作屏障，但毕竟防线太长，兵力过于分散，易被捻军突破。尽管如此，曾国藩“剿捻”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仍然被接替他的李鸿章所因袭，并进而实行“扼地兜剿”，终于将捻军置于死地。由此可见，曾国藩在血腥镇压捻军起义中以争取战场主动权为目的的“以静制动”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比较切合实际。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捻军不犯分为东捻、西捻的错误，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敌的方针，那么“扼地兜剿”就将难于奏效。

以上事实说明，湘、淮军之所以能打败太平军和捻军，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曾国藩等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比较切合实际，部分地体现了在战争指导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绝不是说曾国藩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的唯心主义思想在战争指导上还是时有表现的。例如，湘军水师在湖口战败之后，曾国藩不顾湖北形势危急，仍然率少数部队驻守南昌等地。他主观地认为太平军进攻湖北，乃攻湘军之所必救；湘军坚持进攻九江、湖口，也是攻太平军之所必救。结果使自己处于“梦魂屡惊”的危险境地。如果不是石达开部过早地撤离江西，他所率的近万人湘军很可能全军覆没。

（三）将巩固后方、保障粮运视为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曾国藩总结历史的经验，懂得进行战争必须有巩固的后方。他说：“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粮必有责成之人。”① 稳定的战略后方，可靠的粮饷保障，是曾国藩慎战思想的又一具体体现，也是他制定战略方针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

① 曾国藩：《通筹滇黔大局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八》第4752页。

在镇压太平军时，为了实现建瓴而下，节节进击，攻取金陵的战略方针，曾国藩明确提出：“力固两湖江西三省，以为恢复下游之根本。”① 为此，他在作战部署方面，对于如何保障两湖、江西的安全费尽了心机。

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它的安危直接影响湘军的士气，所以必须全力保护。1859 年 5 月，石达开部太平军由江西进入湖南，围攻宝庆。当时，曾国藩所部湘军兵微将寡，并且正在景德镇等地与太平军激战。但他还是毅然抽调主力张运兰部驰赴宝庆“会剿”。而湖南这一战略后方对湘军的支援，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但兵源绝大部分出自湖南，而且武器、军饷等也依赖湖南甚多。为了供应湘军饷银，除按常规抽收厘金外，还在长沙另设“东征局”，“重抽半厘”。曾国藩在奏折中提到：“咸丰十一年，安庆垂克之际，粮饷罄尽，赖东征局解银七万，立慰军心。厥后进兵雨花台，孤军深入，时虞饥溃。……每当万分危迫之际，臣弟曾国荃飞书乞饷于东征局，无不立时应付。”②

曾国藩指出：“鄂省为各路用兵之枢纽，自古有事于大江南北者，必争此上游形胜。湖北但有重兵，即足以制贼死命。”③ 又说：“欲保湖广，必先保江西”④。曾国藩在保护湖北、江西这两大战略基地方面，虽有失败的教训，更多的是成功的经验。

1854 年，当湘军攻占武汉以后，便循江而下，进攻九江、湖口，因后方兵力空虚，以致湖北大片土地及武汉重镇再次被太平军占领。值此危险之际，曾国藩虽在开始时不愿从九江撤围，回救湖北，企图坚守江西一隅，牵制太平军兵力，以扭转湖北的被

① 曾国藩：《复官中堂》，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1，第 191 页。

② 曾国藩：《陈明清停湖南东征局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八》第 4764 页。

③ 曾国藩：《请毋再抽调鄂省兵勇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 1166 页。

④ 曾国藩：《复胡官保》，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1，第 190 页。

动态势，后因湖北形势日趋严峻，胡林翼、罗泽南又竭力主张湘军回援武昌，他才勉强同意由罗泽南率5000人主力回援，而他自己率少数部队仍然屯驻九江外围和南康等处。诚然，曾国藩在当时确有左右为难的苦衷，因为如果湘军陆师全部撤走，则被闭锁于鄱阳湖内的水师便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有被歼灭的危险。但是，他企图用劣势兵力围攻九江，吸引太平军主力回救，以解湖北之危，则是不现实的，后曾国藩从中汲取了教训，更加重视保障战略后方的安全。

曾国藩把争夺安庆既看成是攻取金陵的关键，也看成是保障湖北、江西安全的重要措施。他认为安庆如能迅速克复，便可次第进攻被太平军所占的湖北之黄州、德安，江西之瑞州三府暨各县城，使后方更趋稳固，而金陵亦可徐图。他对太平军会攻武汉的企图洞若观火，明确指出："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① 为此，他一方面奏请清廷，以后如他省吃紧，不要再抽调鄂省兵勇，以使官文、胡林翼得以勉力支持，不致重蹈金陵大营的覆辙。当李秀成部逼近武昌时，又让成大吉、李续宜部和部分水师及时回救湖北。另一方面，始终把作战重心放在围攻安庆方面。他写信鼓励其弟曾国荃、曾国葆要坚定围城的决心。指出："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注：对陈玉成的诬称）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②他在致友人书中也明确表示："皖围弛，则江北之贼一意上犯鄂境；祁、黟退，则江南之贼一意内犯抚、建，故始终仍守原议。"③ 他把攻占安庆作为转变战略形势的枢纽。事实证明，湘军夺占安庆之后，对于改善湖北的局势，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曾国藩认为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孤军无助，粮饷不继，乃必败之道。因此，在重视战略后方的同时，还十分重

---

①② 曾国藩：《致沅弟季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51页。

③ 曾国藩：《复万篪轩》，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6，第44页。

视战役后方的稳定。

1854年春，湘军在向湖北进军途中，他首先派陆师“进剿”崇阳，水师遍搜湖河港汊，在后路无牵制之患，饷道无中梗之虞的情况下，再集中兵力进攻武汉。1855年冬，湘军困处南昌等处时，他接受了进攻九江时没有在武昌留驻重兵、保护后方的教训，便想方设法防守东北部，“力保饶（州）、广（信）、抚（州）、建（昌）四府，庶钱粮有可征之处，奏报有可通之路”①。1856年4月，石达开部撤离江西战场，形势向着有利于湘军方面转化。但曾国藩仍然谨慎地提出：“目前剿办之法，惟当力保广、饶以通苏、杭之饷道，先剿抚、建以固闽、浙之藩篱。”② 这些事例表明，曾国藩从与太平军为敌之日起，就比较注意战役后方的安全。他的这种思想，在安庆战役和金陵战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安庆战役中，不仅湘军粮饷的相当部分仰赖于江西，而且赣东北又是驻守皖南湘军的直接后方。所以他提出：“保江西即所以为图皖南之本也。”③ 为使赣东北成为“完善之区”，他命令左宗棠部和鲍超部，与太平军反复争夺咽喉要地景德镇。后又命左宗棠在该镇周围筑垒自固，同时四出“雕剿”，确保皖南湘军的后方安全。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终于使祁门大营与皖南的湘军，得以在数量占优势的太平军的进攻中，渡过了危机，立稳了脚跟。

在金陵战役中，赣东北和皖南不仅是进围金陵的湘军的后方，而且也是进军浙江的湘军的后方。所以，当湘军向浙江发起进攻前夕，曾国藩便致函左宗棠，要他拨出部分兵力驻守江西饶州、广信、徽州三处，确保粮路畅通。同时上奏清廷，建议湘军进入浙江后，将驻扎在广信、饶州的部队仍归左宗棠节制，以便“步步顾定江西门户”，使左军无后顾之忧。当然，曾国藩更加重视的是

---

① 曾国藩：《新昌万载逆匪攻陷瑞州临江并条陈处置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554页。

② 曾国藩：《江西近日军情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686页。

③ 曾国藩：《与饶枚臣》，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0，第182页。

皖南。他指出："欲办苏、浙之贼，必自力图皖南始。"[1] 为此，先后集中了四五万兵力与太平军反复鏖战，力求控制宁国（今宣城）、湾沚（今芜湖县）、广德、徽州（今歙县）等要地，以保障进围金陵湘军的后路安全，粮运不致中断，同时吸引浙江的太平军，借以对左宗棠部湘军起有力的策应作用。

为了保障后方的安全和战役的胜利，曾国藩把湘军区分为围城、守点和游击三部分，并把"为贼所惮"的鲍超部作为游击之师，随时派往最紧急的地方。例如，在安庆战役中，鲍超部时而奉命进攻宁国，时而配合左宗棠部围攻景德镇，时而又被调赴安庆外围与成大吉部强攻赤冈岭太平军营垒。在金陵战役中，该部一度进驻秣陵关，后又与太平军激战于宁国府，接着又令其攻取句容、溧阳，保障曾国荃部侧翼安全。当李鸿章部淮军攻占常州后，又令李部接防东坝、句容，抽出鲍超部援江西。曾国藩把这支凶悍的部队作为预备队，随时机动作战，对于稳定战局，保障后方安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与曾国藩相比，左宗棠更加重视巩固后方，保障粮运。他在镇压陕甘捻军和回军时，把后路布防与前敌作战视为同等重要，指出："至战阵之事，非前敌摧锋陷阵不能成功，非后路防守护运严密稳固，前敌亦不能放心猛打，两者相需，劳绩相等。"[2] 据此，他在作战部署方面，一般都将部队分为主战之军、且剿且防之军和防军三种，使前线和后方首尾相应，有效地保障后方的安全和粮运畅通。

综观曾国藩的作战指导思想，似可用稳慎、求实、善谋、坚忍八个字加以概括。这与他的为官之道与处世哲学是一脉相承的。他曾对其部属说："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

---

① 曾国藩：《遵议安徽省城仍建安庆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2095页。

② 左宗棠：《梅提督开泰禀会合番兵进扎三关相机进取由》，见《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52页。

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① 他始终以“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命，以“心力劳苦”自励，重“力行”，勤思考。他还躬行“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精神，认为办任何事情总会有波折，只要坚忍不懈，自会有志竟成。他对封建官场中的相互猜忌、尔虞我诈有切身之感，因而总的来说比较小心谨慎。早在京宦时期，他在家书中就说：“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② 当他成为封疆大吏以后，又对其弟曾国荃说：“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③ 这些言论，反映了他一生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对于他的作战指导思想的形成，无疑是有直接影响的。

第二节　胡林翼的军事思想

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是在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至1853年（咸丰三年）参与镇压贵州少数民族起义、1854年至1861年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的军事思想与曾国藩的军事思想相比，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其自己的特色。

一、建军、治军指导思想

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时期，就发现绿营兵的积弊已深，即使加以整顿，也未必能成为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与曾国藩不谋而合，主张仿效戚继光的“束伍成法”，重新募勇练兵，并亲自编练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1855年，胡林翼由道员擢升湖北布政使，旋

①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15页。

② 曾国藩：《禀祖父母》，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4页。

③ 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321页。

署湖北巡抚。此后，便组建和统率部分湘军（又称鄂军、楚军）转战于鄂皖地区。他的建军、治军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原则，对于提高湘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

（一）先选官后募兵，贵精不贵多

胡林翼继承戚继光的建军思想，强调“凡勇须自招募者，乃可战，非如兵之可以派官统带者也”①。提出建军应在“提纲挈领”方面下功夫，即首先选择营官、哨官、什长，然后由他们分头募勇，编组成军。他要求挑选“至勇至廉”的营、哨官，因为“不十分勇，不足以倡众人之气，不十分廉，不足以服众人之心”。②士兵则不用市民而用乡农，认为市民油滑、恶劳、怯弱，乡农则朴实、耐苦、有胆量。他反复强调，无论官长还是士兵，都必须慎重挑选，贵精不贵多。同时，实行厚饷制，使官兵乐于从军，安心服役。饷章与曾国藩所拟定的大致相同。

在营制方面，他主张实行营、哨、队三级制。每营的员额，最少 500 人，最多 700 人，统领还可自招二三百人作为亲兵，与曾国藩所定每营 500 人的营制略有不同。他也主张将一县一乡之人编在同一营内，以便性情相孚，言语相通，心力易齐。他还率先在统领之下增设分统，以利管理教育和作战指挥。兵器方面，他也主张冷热兵器相间配置，以便互相依护，但比较重视火器的作用，他认为抬枪系军中利器，劈山炮可以仰攻对方营垒。他曾设想将火炮装在车上，每营 20 门，以便“行则摧坚及远，居则设卫自藩”。

胡林翼重视实行“抽帮换底，整旧如新”的方针，即对于作战不力的部队，必先行解散，再由营官、统领从中挑选健壮善战的官兵，重新组建。他说：凡勇营只有撤后另挑，弁勇才能服从

① 胡林翼：《致多都护》，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 24，第 152 页。

② 胡林翼：《管带智营禀陈严防贼探批》，见《胡林翼全集·批札》卷 3，第 36 页。

管束。他之所以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既着眼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着眼于强化“兵为将有”的私兵制，因而受到曾国藩的赞赏。

（二）从儒生中选择统兵将领

胡林翼特别重视选择能独当一面的统兵将领。认为将得其人，弱者可强，将不得人，虽强易弱。没有得力的统领，即使有数量众多的队伍，还是要打败仗。那末，得力的统领从何而来？其标准又是什么？他和曾国藩一样，认为首先应从优秀的儒生中选择，因为“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①。他说：“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② 又说：“将材难得，上驷之选未易猝求，但得朴勇之士，相与讲明大义，不为虚骄之气、夸大其词所中伤，而缓急即云足恃。”③ 这里所说的“良心”、“血性”、“大义”、“勇气”，概而言之，就是要有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拼命精神，与曾国藩所说的“忠义血性”同一含义。他反复强调统兵将领必须“智勇相兼”，有智无勇，有勇无智，都算不上称职的将领。他尤其反对怯弱的将领，认为骄将尚能驾驭，怯将则毫无作为。由此可见，胡林翼的选将标准是“德”、“智”、“勇”兼备，与曾国藩的以“德”为主略有不同。

（三）因地制宜组建部队

胡林翼说：“天下兵事，南以舟师为要，北以骑兵为要。”④ 对于湖北来说，要保卫北部边境，进而出兵河南“剿捻”，就应组建马队。虽然马队的饷银倍于步队，但1000人马队可抵三四千人步队之用，因为马队既可驰后抄袭，又可乘胜追击，进退迅捷，能

---

① 胡林翼：《复李少荃观察鸿章》，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3，第92页。

② 胡林翼：《与余会亭》，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5，第35页。

③ 胡林翼：《复皖抚翁祖庚同书》，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24，第144页。

④ 胡林翼：《复卫静澜侍讲》，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1，第73页。

有效地配合步队作战。他发现步队在追击作战时，走不多远便力竭气衰，因此曾设想实行马步合编，战时由步队在正面抵拒，待对方退却时，即以马队乘势掩杀，扩大战果。他虽然未能组建起强大的马队，但反映了善于从战争实践中改善军队建设的思想。

胡林翼在加强湘军水师建设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855年2月，由曾国藩统率和指挥的湘军水师在江西湖口大败，部分战船上驶沌口。胡林翼一方面咨请湖南巡抚骆秉章添造大小战船300余艘补充水师，另一方面本着“水师器用，利在炮位”的指导思想，咨请广东巡抚叶名琛先后购买洋炮1600门，装备各式战船，使水师的规模日益扩大，火力明显加强，从而在以后进行的湖口、九江和安庆等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认为长江下游为水网地区，只有加强水师建设，才能击败太平军。于是上疏清廷，建议由曾国藩分别在江苏淮安、安徽宁国和太平、浙江衢州组建三支水师，以便配合陆师“进剿”。这一建议被清廷采纳，并在尔后的作战中发挥了作用。他还别具匠心地提议组建一支“水陆相兼”的部队，即在水师官兵中，以一半兼习陆战之法，以便水师能够独立作战，机动灵活地袭击太平军，使其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这一设想虽因遭到曾国藩和杨载福、彭玉麟的反对未能付诸实施，但联系上述步马兵合编的设想，可以看出他在因地制宜地组建军兵种方面的大胆探索精神和组建合成军队的思想萌芽。

（四）立法宜严，用法宜宽，贵在得人心

胡林翼重视部队的管理教育，指出：“不教之兵，将有不戢自焚之势，遑问杀敌致果耶？”① 他治军的指导思想是：“立法宜严，用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庶几畏威怀德，可成节制之师。”② 简言之，就是继承传统的“宽严相济”、“恩威并用”的思想。

---

① 胡林翼：《致魏将侯》，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第12页。

② 胡林翼：《复曾事恒贞干茂才》，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7，第53页。

他的所谓“显以示之纪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要求营官服从统领的调度，不得违令。其二，不准虚报冒领，克扣兵饷；不准讳败为胜，虚报战功。其三，严禁声色烟赌，不准夜不归营。其四，坚持每天点名、操练。在操练方面，要求火枪手和刀矛手刻苦精练，以便战时互相护卫、互相壮胆。其五，要求官兵体恤民艰，不扰害百姓。强调指出：“养兵所以为民，兵不爱民，何乐有兵？”① 当然，他要求湘军所爱所卫的，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至于敢于犯上的“乱民”，则“乱者必斩，不可姑息”。他的所谓“隐以激其忠良”，一是用“忠义”、“仁爱”等封建礼教教育官兵忠于封建君王，官兵之间应互敬互爱，亲如家人，二是在奖励、升擢、抚恤等方面从宽从优。通过以上办法，激发官兵的“志气”，防止“暮气”和“怨气”。由于他对宽与严的分寸掌握得比较适度，因而在巩固部队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五）爱人以德，待人以诚，协调将帅之间的关系

胡林翼在致友人书中说：“事之成败，不争贼之强弱多寡，而在我辈之和与不和，慎与不慎耳！”② 在奏疏中又说：“盖必主将一心，则士卒乃能联为一体。”③ 把将帅之间的和衷共济视为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他认为要实现将帅之间和睦相处，关键要有“让美”之心，不争功诿过，要“爱人以德”、“待人以诚”，以“友谊”为重。本着这些原则，他在协调湘鄂军将帅之间的关系方面，作出了比较明显的成绩。

湖广总督官文庸碌无能，胡林翼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这一共同事业，对官文采取尊重、忍让的态度。官文对他也就深相倚重，无所疑忌。湖北的军政吏治，由巡抚主稿，总督画行，不仅在募

---

① 胡林翼：《致鲍春霆并寄蒋之纯》，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9，第80页。

② 《胡林翼全集·语录》第26页。

③ 胡林翼：《条陈楚军水陆东征筹度疏》，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30，第136页。

兵、筹饷、部署防务等方面很少遇到掣肘，相反还能通过官文这一清廷宠臣，在奏请起用将领、请求协饷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胡林翼认为曾国藩系“忠义冠时”的济世之才，加上他到湖北任职后受到曾的提携，所以对曾十分敬重，每当曾遇到困难时，总是鼎力相助。他俩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彼此之间始终互谅互敬，结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胡林翼死后，曾国藩表示：“可痛之至！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①

胡林翼与部将的关系也很融洽。初期，他在湖北赖以与太平军作战的主力部队，主要是由罗泽南统带的陆师和由杨载福统带的水师。他对罗、杨都十分尊重。1855 年冬，罗泽南部由江西义宁回救武汉时，身为巡抚的胡林翼不顾别人劝阻，亲率三千多人前往蒲圻迎接，配合罗部作战。他说：我是主人，以难事诿诸客兵，廉耻安在？1856 年 4 月罗泽南在武昌城下毙命后，他对接统罗部的李续宾也十分敬重，“亲若同胞”。而罗、李、杨三人也尊重胡的调度指挥，为攻取武汉，恢复湖北失地，协力同心地作战。事后，他在给安徽巡抚翁同书的信中不无自豪地说：“林翼自问，五六年间（注：指 1855 年～1856 年）所处之境，为军兴以来所未有之奇，然自得迪庵（即李续宾）而兵乃强，得厚庵（即杨载福）而水道已通。”②

胡林翼在安徽先后指挥多隆阿、鲍超、李续宜、成大吉、唐训方、蒋凝学、彭玉麟、杨载福、曾国荃等部作战。他与这些统领相处得也比较融洽，并能注意协调各统领之间的关系。例如，多隆阿“有胆有识”，但“才高意忌”，为此，他多次规劝多隆阿不应炫耀自己的长处，指责别人的短处，注意搞好与其他统领的关系。多隆阿听从他的劝告，在 1859 年冬进行的太湖战役中，各统领之间基本上做到了协同一致地对付太平军。此后，在安庆战役中，他鉴于多隆阿与李续宜关系融洽，而对鲍超怀有忌心，但曾

① 曾国藩：《致沅弟》，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772 页。

② 《胡林翼全集·书牍》卷 13，第 15 页。

国藩却十分赞赏鲍超的骁勇，于是将多、李留在皖北，由他直接指挥，将鲍超调往皖南，归曾国藩直接指挥。同时，他写信给鲍超，历述曾国藩对他的种种“恩情”，要他“一心敬事”曾国藩，并以“师克在和”的古训教育鲍超，要他搞好与其他统领的关系。鲍超也就不仅尊重曾国藩的领导，而且能主动配合其他部队作战。

摘编《胡林翼语录》的崔龙说：“世称楚将协和如骨肉，有布衣昆弟之欢”，这都是胡林翼“倾身结纳，苦心调护之功也”。① 这些话虽有溢美的成分，但胡林翼在协调湘军将帅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曾国藩也自称他在这方面不如胡林翼。另外，左宗棠、李鸿章与胡林翼相比，在这方面也未免逊色。

（六）组织团练，配合主力作战

曾国藩认为办团练弊多利少，因而不予重视。胡林翼则不同，他承认团练确有许多弊病，但认为不能不办。因为湖北地域广阔，兵力不足，不可能处处设防，有了团练，既可配合军队作战，又可镇压“乱民”，收一举两得之效。他在湖北、安徽所兴办的团练，没有也不可能杜绝欺压勒索、劳民伤财等弊病，但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他奏称，在攻取武汉之战中，江夏（今武昌）、汉阳二县的团练，配合湘军作战，杀死太平军二千多人。黄梅、广济、罗田、麻城等县的团练，在护送军粮、守卫关隘、阻击太平军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潜山知县叶兆兰于天堂组织的团练，在太湖战役中，先是扼守要隘，后又配合主力袭击太平军之侧背，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

胡林翼在“专恃兵力，围剿必难得力”，“不如用士用民，可以安反侧、杜滋扰”② 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地主豪绅的欺骗宣传，驱使部分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配合湘军镇压农民起义，这是颇为毒辣的一手。

---

① 《胡林翼全集·语录通论》第 3 页。

② 胡林翼：《致湖广总督程晴峰》，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 2，第 25 页。

诚然，胡林翼的建军治军思想，没有超出传统军事思想的范围。但是，他和曾国藩一样，毅然摒弃八旗、绿营的积弊，善于吸取和发展传统军事思想中有生命力的内容，重起炉灶，建设勇营，改善营制，强化管理教育，因地制宜地组建兵种，从而使湘军成为一支组织严密，内部关系比较融洽，武器装备不断改善，具有较高战斗力的部队。这种不泥于旧制，敢于革新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有启示作用的。

二、作战指导思想

胡林翼非常注意研究地理形势和敌我情况，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同时，本着“以兵略为本”的原则，组织有关人员从《左传》和《资治通鉴》中摘录古代帝王、名将的用兵方略，编辑成《读史兵略》，潜心披阅，以史为鉴。他从战争实践和历史经验两方面吸取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作战指导思想，在战略和战役指导方面都有所创新，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方针、原则。

（一）战略指导原则

胡林翼在战略指导上，先后提出了以下主要原则。

1、军旅之事谨慎为先，但不宜过于谨慎

胡林翼承袭我国古代兵家的慎战思想，强调“军旅之事，谨慎为先”①。他的慎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军队必须蓄气养锐，保持高昂的士气。据此，防御时，先深沟高垒，敛兵据险，坚忍相持，待对方气将衰、志已懈、队将散时，再并力反攻。进攻时，步步为营，节节扫荡，通粮道，设后援；不强攻坚城，避免重大伤亡，挫伤士气。二是继承《孙子》的“知彼知己”思想，善于审机审势，不轻举妄动。他针对太平军人多势众，

① 胡林翼：《札霆营鲍副将喻都司》，见《胡林翼全集·批札》卷1，第11页。

既能以优势兵力围城，又善于乘虚蹈隙，使数量居于劣势、运动又较迟缓的湘军往往顾此失彼的情况，及时提出“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①。主张集中兵力，机动作战，以争取主动。稍后，他总结了李续宾部于1858年9月连攻安徽太湖、潜山、舒城、桐城，每占一城都有不少伤亡，最后于11月在三河镇全军被歼的教训，和1859年冬湘军在太湖战役中先在外围大量杀伤太平军，进而攻取太湖、潜山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了“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② 的著名作战原则。

由此可见，胡林翼慎战思想的核心，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固然，这种指导思想反映了他镇压人民起义的凶残性，但却为传统的慎战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因而被蔡锷誉为“所见尤为精到卓越”。

战争情况复杂多变，不可能完全预测，即使谨慎从事，也难免会有失误。据此，胡林翼提出：“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③ 又说：兵事怕不得许多，只要有五六分把握，便应放胆放手去干。这一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一味求稳，很可能丧失战机，甚至造成被动。但是，他在具体作战指导方面曾提出过不切实际的意见。那就是1860年6月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于7月率万人进驻皖南祁门以后，胡林翼认为曾国藩提出的一由池州进规芜湖，一由祁门进至旌德、太平，进图溧阳，一分防广信（今上饶市）、玉山的三路进兵之策，不过是“内三路，小三支”，还应另筹二大支，一出杭州，一出扬州，取大包围态势，方能对大局有济。根据当时情况，这样的部署，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湘军兵力有限，且安庆又是两军必争之地，只有集中兵力先占安庆，才能顺江而下，对金陵采取包围作战。退

---

① 胡林翼：《复李香雪太守》，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4，第19页。

② 胡林翼：《复多都统》，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0，第58页。

③ 胡林翼：《复蒋文若》，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5，第121页。

一步说，即使如他所说的“再添兵四万人”，在数量上仍然居于劣势，以有限的兵力深入太平军腹心之地，进行无后方作战，用三个拳头打人，不仅失去争夺安庆这一战局重心，而且极易被太平军各个歼灭。如果说曾国藩分兵皖南已带有冒险的成分，那末胡林翼的上述主张就更加冒险了，所以未被曾国藩采纳。

2、审察机势，次第进军

胡林翼强调指导战争的关键在善于审察“情理”与“机势”，认真研究作战双方的各种情况。他继承孙武“地形者，兵之助也”的思想，把研究地理形势作为“决胜运筹”的“第一要义”。当然，作为战略指挥员，首先要研究带全局性的形势，正如他颇为形象地指出的：“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① 在审察全局形势方面，他与曾国藩堪称伯仲，在此基础上所制定的战略方针，也大同小异。他对太平军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可以概括为先取湖北作为后方基地，尔后循江而下，逐一攻取沿江重镇，最后夺取金陵。

胡林翼指出，湖北“居天下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与太平军作战，必须先夺取湖北，据为根本。而争夺湖北，必先争夺武汉。只要将武汉重镇控制在手，成为牢固的后方基地，则东征将士便无后顾之忧，军火粮饷可以源源前运，伤病人员可以后送治疗，作战部队可以轮番休整，水师船只可以进坞修理。基于以上认识，加上他身为湖北巡抚，本有守土之责，因而虽然兵力不多，仍一次再次地进攻武汉。最后，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石达开率部东返的情况下，于 1856 年 12 月攻占武汉，随之占领鄂东各州县，基本上控制了湖北全境，实现了战略计划的第一步，也是举足轻重的一步。

胡林翼明确指出，九江“西扼武昌，东引皖口，襟带中流，实吴楚之腰膂”，只有攻取九江，才能保障武汉的安全，控制江西的门户，打通长江的水道，为东下作战创造有利条件。为此，在湘

---

① 胡林翼：《复多都护》，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 36，第 139 页。

军攻占武汉以后，即于1857年初兵锋直指九江，用长濠围困达16个月之久，终于在1858年5月19日攻占九江城，取得了东征作战的第一个胜利。

胡林翼鉴于“皖省地居水陆要冲”，“安庆为长江上下之关键”，不进图安徽，不仅湖北不能安枕，而且金陵永无克服之日，便与官文商定图皖之策，并于1858年8月分兵两路，一由都兴阿率领进攻安庆，一由李续宾率领救援庐州。不料，李续宾部五千余人在三河镇全军覆灭，都兴阿部也被迫退守宿松。三河大败之后，胡林翼意识到只有厚集兵力，多路“进剿”，方能奏效。他与曾国藩等于1859年10月拟定了“四路图皖”之策，并发起太湖战役，于1860年2月18日至20日相继攻占太湖、潜山。接着胡林翼根据“蓄势审机，驻兵于贼所必争之地，使贼欲不战而不得”①的指导思想，又与曾国藩等确定了围攻安庆的决策，经过精心筹划，艰苦鏖战，终于在1861年9月5日攻占安庆，取得了东征作战第二次重大胜利，并为攻取金陵奠定了基础。

3、“欲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

胡林翼对湖北与邻省的关系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湖北系“四战之地”，防不胜防，不能“闭房闼以拒盗”，必须主动支援邻省“剿灭逆贼”，方能使湖北“免于忧患”。于是他从“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传统思想中演化出“欲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②，“以剿为守”的作战方针。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武汉未占之际，即抽兵前往江西，救援困守南昌的曾国藩部。武汉既占，便集中兵力攻取湖口、九江，分兵救援瑞州，改变江西湘军的被动不利局面。九江甫下，又提出“图皖以保楚”，挥兵进攻皖西。虽然初战失利，湘军损失惨重，仍“不惮征缮，尽力谋饷”，再次增兵入皖作战，经过潜山、太湖、安庆等战役，终于使皖西、

① 胡林翼：《与各帅论兵事》，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1，第126页。

② 胡林翼：《致官揆帅》，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5，第33页。

皖南尽入湘军手中，并有效地保障了湖北的安全。

1859年3月，太平军石达开部进入湖南，5月围攻宝庆，湖南当局大为震惊。胡林翼鉴于两湖唇齿相依，一旦湖南被太平军占领，则湖北便成“腹背交困之势”，而且会大大影响在湖北作战的湘军的士气。于是，分批抽调军队援湘，并派悍将李续宜亲往参与指挥，终于挫败了石达开部的进攻。时人和后人对胡林翼不分畛域，主动派兵、筹饷，支援邻省，深表赞誉。曾国藩说：督抚以全力援剿邻省，自湖北始也。从中既可看出胡林翼坚决镇压太平军的反革命决心，也可看出他确实是个胸有战略全局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统帅。

既然胡林翼主动支援邻省作战，特别是把进攻安徽作为重要的战略决策，那末是否重视湖北的防守呢？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他对支援邻省和保卫湖北有比较辩证的认识，在提出“欲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的同时，强调“必保楚然后能谋皖”①。因而每次决定出省作战时，必同时筹划本省的防务，做到攻防兼顾。从进攻九江开始，他就发现“官军重于前”，太平军“必转袭其后”，于是在鄂省的设防方面确定了以下原则：

一是在重点地区部署兵力。例如，在九江战役后期，确定以能对鄂东“四路策应”的黄州（今黄冈）为设防重点，并亲率6000人驻守该地。此后，始终把黄州作为重点设防地区。

二是在与豫皖湘毗连的要隘设卡建碉，改善边境城市的防御，由正规军和团练分别固守，“静以待之，整以御之”。他预见到湘军进攻皖西，太平军和捻军将会从六安、商城、固始进袭罗田、麻城、黄安（今红安）、德安（今安陆）等地，以调动湘军回援，因而要求鄂东北各县，尤其是地当要冲的罗田、麻城两县，切实加强设防，依托城池、碉堡顽强固守。

三是掌握预备队，进行机动作战。1859年春，他在总结前期

---

① 胡林翼：《遵旨复奏行军进止机宜疏》，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33，第165页。

作战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湘军人数不算太少，但因缺少一支“置于活着”的部队，所以“机局总滞”。此后，他就非常注意掌握机动部队，并把“多蓄兵力，预留活着”作为用兵的重要条件。例如，在部署安庆战役时，就让李续宜部万人驻于机动位置。1861年3月，当太平军陈玉成部为调动围攻安庆的湘军，西进入鄂并攻占鄂东不少州县时，胡林翼便派李部驰回，协同鄂省守军进行防堵。又如，当安庆外围吃紧时，便从湖北调成大吉部5000人往集贤关，配合鲍超部进攻太平军赤冈岭营垒。当太平军李秀成部进入鄂南，威胁武昌时，又令成大吉率部驰回武昌。这些机动部队，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保障战役计划的顺利实施。

事实证明，胡林翼在前方与后方、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方面是处理得比较恰当的，尤其在后方防御方面，比曾国藩考虑得更为周密。因此，不能因为他主动支援邻省作战，“助剿于境外”，就片面地得出他只顾前不顾后的结论。

4、“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二三而败”

胡林翼十分重视作战的统一指挥。他说：“凡军事无论多寡，总以能听号令为上。不奉一将之令，兵多必败，能奉一将之令，兵少亦强。”① 又说：“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二三而败。……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② 他为实现对各部湘军的统一指挥，做了不少努力。

1858年7月，湘军攻占湖口、九江以后，胡林翼便奏请清廷重新起用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因为，当时湘军水陆统领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等彼此之间“落落寡合”，只有湘军的创建者曾国藩才能统率他们。1859年冬，发起太湖战役时，他发现总兵鲍超与副都统多隆阿互有短长，究竟以谁为前敌指挥，颇伤脑筋，考虑再三，决定由多隆阿担任。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事权不一，

---

① 胡林翼：《致余会亭》，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6，第128页。

② 胡林翼：《起复水师统将以一事权并密陈进剿机宜折》，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21，第50页。

兵家所忌”，多隆阿虽有妒嫉别人的缺点，但临阵机智过人，而鲍超虽勇少谋，还是以多隆阿为前敌指挥为宜。持不同意见的曾国藩也就改变主意，尊重他的决定。

事实上，无论是进攻武汉，还是进攻九江、太湖，总指挥都是胡林翼。因他善于“克己以待人”，谦虚谨慎，讲究领导艺术，在作战部署上，善于提出几种方案与统领们商议，最后择善而从，因而颇为将领所信服。至于安庆战役，他虽然直接指挥长江北岸部队作战，但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所以他甘当“第二提琴手”，尊重曾的意见，体谅曾的困难处境。为了不使驻于皖南祁门的曾国藩在指挥上顾此失彼，他不顾自己咯血不止，坚持在皖北指挥调度。后经曾国藩多次劝说，加上太平军李秀成部已进至武昌外围，才离开前线，不久死于武昌。他为实现湘军统一指挥进行了最大的努力。对此，曾国藩公正地指出：安庆之克，应推胡林翼为首功。

必须指出，胡林翼所强调的集中统一指挥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湘军必须由曾国藩和他节制调度，不容他人染指。当湘军开始征皖时，他便与官文联衔上奏清廷，提出：“嗣后楚军无论入皖界入江南境，其粮饷军火及调度机宜，均归臣官文及臣胡林翼一手经理，实因相处日久，深悉将士之心，较归各省大臣节制呼应得灵也。”① 由此可见，他所强调的集中统一指挥，因囿于湘军“兵为将有”的制度，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

5、吏治与兵事始终相因，二者必须兼顾

胡林翼认识到吏治腐败是引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从而得出了“吏治之与兵事固始终相因者也”②，“吏事尤为兵事之本”③

---

① 胡林翼：《遵旨复奏孤军未可深入疏》，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34，第3页。

② 胡林翼：《恭谢天恩并附陈楚北吏治兵政疏》，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1，第1页。

③ 胡林翼：《复李希庵方伯》，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36，第134页。

的结论，进而主张统兵大员应兼任封疆大吏，以便兵事与吏事互相协调配合。

胡林翼任湖北巡抚以后，始终一面带兵作战，一面整顿吏治。1856年湘军攻占武汉以后，就着手加强保甲制度，强化地方治安，镇压群众的反抗斗争。同时，撤换腐败无能的道、府、州、县官数十人，强调要用霹雳手段严惩贪官污吏，以争取民心。1857年，他一面指挥进攻九江之战，一面整顿湖北漕政，革除浮收勒索等积弊，增加厘金税额，充实军储。实行这些措施，使湖北成为湘军稳固的战略后方，起了积极作用。

当时，抓吏治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就是给军队筹措粮饷。用胡林翼的话说："兵之强弱，视饷之丰歉为转移。"由于湖北留省和出征的部队相当多，筹饷任务也就特别重。1859年在九江、安徽作战的部队约5万人，月需饷银30多万两。1860年增至六七万人，月需饷银40多万两。如此巨大的款额，对于仅有九府一州的湖北来说，确实是沉重的负担。由于筹措不及，经常发生欠饷现象，仅1860年冬就积欠160余万两。胡林翼非常担心部队因此而哗变溃散，曾发出"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的哀叹。但他并不气馁，命令各司、道粮台精心筹划，把征收盐课、厘金作为"楚省之大政"，专济军饷，并采取缓缴漕粮和请求外省协济等办法，多方筹措，终于基本上解决了饷糈不足的困难。

必须指出，胡林翼的上述指导思想，对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有利的，但同时也是督抚专擅地方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削弱中央集权的滥觞。

（二）战役指导原则

胡林翼不但善于运筹帷幄，而且还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在战役指挥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适应当时情况的指导原则，有些原则被后来的军事家所称道和袭用。他的战役指导思想，归纳起来，有以下主要特点。

1、以静制动，先求稳固，然后进剿

胡林翼和曾国藩一样，都主张以静制动，以主待客，以守为

战。他在 1855 年因急于图功，竟不顾武汉城坚垒固，督率部队一味强攻，结果 3 个月中死伤水陆弁勇 3000 多人。不久，便改用水陆长围久困之法，终于夺城告捷。在九江战役中，采取同样办法，陆路以长壕 6 道三面合围，水路以水师 10 余营封锁江面，终于再下坚城。此后，他便一再告诫部属不应强攻坚城，因为从城下仰攻，“我动彼静，我劳彼逸”，容易丧失主动；以血肉之躯与炮石相抗，更易损伤精锐，影响士气。只有敛兵自固，“先求稳固不败，然后相机防剿”①，才能减少伤亡，保持士气，争取主动。在防御时，胡林翼更加强调以静制动，以守为战。他指出，与兵力上占优势的太平军作战，只有“择险设防”，“深沟高垒，静以待之，整以御之”，才能有效地实施防御。当太平军石达开部围攻宝庆时，他写信给左宗棠，要湘军集中兵力，先“扼险自固，坚壁养锐”，待援兵到后再进行反击。湘军基本上按照这一原则进行防御作战。石达开因久攻宝庆未下，不得不撤兵他走。

上述指导原则，反映了胡林翼的慎战思想，是符合湘军兵力不足和火力不强这一客观情况的。至于长围久困战法，虽然欧洲于 19 世纪已基本摒弃不用，但对缺少攻坚火器的湘军来说，仍不失为一种有效战法。当然，这种战法容易出现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加以改进。而湘军在这方面的改进，首先归功于胡林翼。

2、围城打援，先打援敌，再打守敌

胡林翼在兵事以“善战多杀贼为上，攻坚城斯下”的作战思想指导下，先后在太湖和安庆战役中，运用围城打援战法取得了成功，在战役指挥上写下了最得意的一笔。

当湘军围攻太湖，并获悉太平军陈玉成部和捻军张乐行、龚得树部前来救援时，胡林翼与曾国藩研究决定，以战斗力较强的多隆阿部和鲍超部担负打援任务，以蒋凝学、朱品隆、李榕部担负围城任务。在兵力部署上，他明确指出：“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

---

① 胡林翼：《致训霆二营》，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 11，第 128 页。

贼，其余尽作战兵、援兵、雕剿之兵。”① 即以打援为重点，只要击败“援贼”，就不难攻破“城贼”。与此同时，他派金国琛、余际昌率9营驻扎于地通潜山、太湖、桐城、舒城的险峻要地天堂（属潜山县），以便对太平军形成拊背扼吭之势。此外，还在扼湖北罗田、蕲春、蕲水、黄冈门户的陈德园驻扎6营部队，以屏蔽湖北。由于部署周密，湘军协同苦战，在大量杀伤和击退太平军援军之后，即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太湖、潜山两城。

安庆战役，虽然既要瞻前，又要顾后，战况复杂多变，但曾、胡始终坚持围城打援的战法：曾国荃部在水师配合下围攻安庆；多隆阿部在桐城外围挂车河一带打援；胡林翼则率部驻太湖，与安庆、桐城外围的部队声势联络，兼顾前线与后方的指挥；并于一开始就将李续宜部作为“活兵”，以便既能援应前线部队，又能在必要时回救湖北。胡林翼还明确指出，太平军意在速战，湘军应以缓战待之。他要求曾国荃部不断加固壕垒，作长期围城打算；多隆阿部预留马队于空旷之处，以便充分发挥马步协同作战的优势。在历时一年的战役过程中，虽然险象环生，但由于围城部队“坚不动摇”，打援部队顽强抗击，终于化险为夷，取得了安庆战役的胜利。

事实证明，围城打援，确实是相当高明的战法，它不仅发展了长围久困战法，而且使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作战指导思想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提到了一崭新的高度。这种战法，使进攻与防御紧密结合，既可大量歼灭对方有生力量，又可趁势攻占城池，因而在攻城火器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曾得到普遍的运用。

3、“先期合力，必求其厚”，“临阵分枝，不嫌其散”

正确地使用兵力是争取战役、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指挥水平高的标志之一。对此，胡林翼有比较精当的见解。他说：“鄙人之意，向以并力为主，不愿零星分拨，致使一事无成。”② 无

① 胡林翼：《致李方伯多都护》，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28，第27页。

② 胡林翼：《复李香雪》，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13，第6页。

论进攻还是防御，他都主张先集中兵力。1859 年 2 月，当石达开部由江西进入湖南时，他立即写信提醒左宗棠，必须“专意集兵，慎勿分防”，如处处设防，即使拥有 10 万精兵，也难收尺寸之功。1860 年，在第二次图皖时，他强调必须集中四五万精兵，三路同进，声势联络，方能奏功。此后，他对担任驰援湖北任务的李续宜说：太平军分六七路来攻，湘军最多只能分二路对付他，绝对不能分散自己的兵力，被动应付。他在主张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的同时，在具体部署上则主张各部队应有明确分工，一般应分围城之兵、打援之兵、雕剿之兵，力求部署周密。他非常注意保护后路，强调临阵之时，必须派部队分布侧后要隘，防敌抄袭。他把以上用兵原则概括为“先期合力，必求其厚”，“临阵分枝，不嫌其散”。① 这就正确地处理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因而被蔡锷评价为，“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其实，左宗棠在这方面与胡林翼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经常将部队分成三路，分进合击，并说这种部署“虽系暂分，终归于合”。

另外，胡林翼还重视奇正结合的用兵方法。例如，1855 年夏秋，湘军在武汉外围屡为太平军所败，为了从被动中争取主动，他支持杨载福提出的用水师从汉水支流出其不意地绕击太平军的主张。经过 10 天战斗，共攻破太平军营垒 10 余座，夺获战船数十只、火炮 30 余门，焚毁粮船数百只，取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又如，在 1858 年进攻湖口时，李续宾与杨载福事先密商，以陆师 5000 人由九江北渡，摆出进攻宿松、太湖的姿态，当夜又回驶至湖口以东，部队舍舟登岸，潜行至湖口后山。当水师从正面进攻时，陆师突然从山上呼啸而下，太平军猝不及防，被迫撤走。胡林翼赞扬此战深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用兵原则。他还指示部属，在据险防御，遭到敌人猛烈进攻，处境危急时，也可分兵“趋间道击之”，打乱进攻者的部署。这些，都反映了他灵活用兵的思想。

---

① 胡林翼：《致曾钦使》，见《胡林翼全集·书牍》卷 34，第 108 页。

胡林翼伙同曾国藩等组建、扩充湘军，用以镇压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武装，使腐朽的清朝统治集团在一段时间内摆脱了岌岌可危的处境，其政治上的反动性是十分明显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将他们的军事思想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军事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并从中吸取值得借鉴的东西，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第十章　捻军与天地会起义战争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苦难深重的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其中，斗争规模较大，坚持时间较长，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有兴起于豫皖苏鲁边的捻军起义战争，两广天地会领导的大成国起义战争，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云南回民起义战争，川滇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战争和陕甘回民起义战争。这些起义战争，对太平天国革命战争起了直接和间接的配合作用，有的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仍然坚持着斗争。对于这些起义战争的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在本章和下一章中，分别进行叙述和探讨。

第一节　捻军起义战争

捻军起义战争前后历时16载，战场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陕西、山西、直隶等省，声势甚大，且与太平军关系密切，因而清政府将其与太平军统称为“发捻交乘”，同样视为“心腹大患”，必欲“剿灭之”而后已。正因为如此，捻军与清军之间的战争也就既频繁而又激烈。

一、捻军的兴起及其初期战争

（一）捻军的兴起与雉河集会盟

捻军的由来和崛起　捻军是由“捻”① 发展变化而来的。据史料记载，在嘉庆年间，皖北和豫东地区的一些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为饥寒所迫，自发地结成许多分散的小集团，进行反抗封建压迫，寻求生活出路的斗争。“每一股谓之一捻，小捻数人、数十人，大捻二三百人。”② “每大会，则聚集首领，或数十，因曰此一捻也，彼一捻也，如以指捻物使之聚而不散也。捻子之称，盖由此起。”③

“捻”之所以在皖北豫东地区形成和发展，除了该地区经常遭受黄河决口等严重自然灾害外，还由于清政府的地方官吏以及豪绅地主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以及被裁撤的兵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纷纷结捻而起，开展“打粮”、“吃大户”、抗粮抗捐和杀富济贫的斗争。由于皖北的亳州、雉河集（今涡阳）、蒙城、寿州（今寿县）、宿州（今宿县）以及河南的永城、夏邑位于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地区，属于“三不管”的地方，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这就为“捻子”在这些地区的活动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

1851 至 1852 年（咸丰元年至二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并向两湖胜利进军，影响所及，使“捻子”的活动更趋活跃。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开始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当时，比较著名的起义武装，有河南南阳的乔建德和李大、李二部；安徽合肥的高四八和寿州的程六麻子等部。在豫皖交界处，张乐行、龚得树（又称龚得）等于 1852 年 11 月以雉河集为中心聚众起义，而与张乐行有联系的永城冯金标、亳州朱洪占、蒙城胡元众、寿州刘洪立、宿州李殿元等 18 人也各自率众起义，号称“十八铺”，并推张乐行为总首领。

---

① 对“捻”的解释，史料记载不一。一说是“明火劫人，捻纸燃脂，因谓之捻”（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一），第 1 页）；另一说是“每一股谓之一捻”，“如以指捻物使之聚而不散也”（见《捻军》（一），第 309 页）。本书从后一说。

②③ 《捻军》（一），第 378、309～310 页。

1853年夏，太平天国北伐军先后占领凤阳、蒙城、亳州，进而占领豫东重镇归德府。当时，安徽、河南和江苏北部又有一批“捻子”举旗起义，和蒙、亳地区的起义武装一起配合太平军作战。其中声势较大的有：永城的苏添（天）福、李月部，夏邑的王贯三、宋喜元部，固始的任二皮、刘疙瘩部，阜阳的李士林部，霍丘、固始边界的李昭寿、薛之元部，确山的雷六部等。此外，山东的曹县、城武（今成武）、菏泽、嘉祥、郓城等地的“捻子”也都爆发了起义。这些起义武装，有的参加了太平军，有的单独攻城夺地，从而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捻军反清战争的序幕。

当时，捻军的斗争还处于初始阶段，其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战略目标。各支捻军即使在同一地区，也互不统属，分别由“趟主”（首领）带领，各自独立行动。“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处于半农半军状态。另外，不少地区的捻军，有的为时不久即被清军镇压（如雷六等部），有的叛变投敌（如李士林等部），有的时降时反（如李昭寿、薛之元等部），而豫皖交界地区的张乐行①、龚得树、苏添福等领导的捻军，则逐渐发展成为坚持反清斗争的主力。

捻军的初步联合与雉河集会盟　捻军的迅速崛起，引起了清廷的严重不安，清政府强调“宜及早歼除”②，企图将捻军扼杀在摇篮里。但是，这时清军的主要兵力被牵制在太平天国战场上，难于抽调重兵镇压捻军。尽管清廷命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并起用前广西巡抚周天爵为安徽巡抚，但因兵微将寡，也无法对付日益发展的捻军。10月，周天爵“忧郁”而死，吕贤基则在舒

---

① 1853年2月，张乐行和“十八铺”的首领，曾受安徽巡抚周天爵招抚，并镇压过定远捻军陆遐龄部，这是一个洗刷不掉的过错。但张乐行自1853年4月脱离周天爵节制后，便积极领导捻军进行反清斗争，并坚持和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正确方针，直至1863年被俘就义。从他的一生来看，无疑是功绩大于过失。

②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清同治十一年铅印本（下同），卷3，第7页。

城被太平军击毙，旋由给事中袁甲三负责“剿办”安徽捻军。袁所统兵力很少，只能加紧筹办团练，驻守临淮关一带。河南方面，巡抚陆应谷所部清军在商丘宋家集被太平军北伐军打得溃不成军，陆被革职，由山东按察使英桂继任。英桂接任后，既要防止进至湖北的太平军北上，又要镇压豫北的“联庄会”①军，也无法集中兵力攻捻。捻军正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发展自己的力量，向团练武装频频发起进攻，并通过战争实践逐步认识到实行联合的必要性，出现了安徽颖州捻军五十八股合为一股、山东曹州府属合十三捻为一捻和江苏徐州各股捻军合为一股的局面。皖北雉河集的捻军张乐行、龚得树部则与河南永城、夏邑的捻军苏添福、王贯三部实行跨省区的联合。此后，又实现了更大规模的联合。

1855年秋，豫皖边的捻军首领齐集亳州的雉河集，举行了著名的“雉河集会盟”②。会上，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并决定建立五旗军制，推举了各色旗的总首领：黄旗由张乐行自兼，白旗龚得树，红旗侯士维，黑旗苏添福，蓝旗韩奇峰（又称韩老万）。五旗之外，还有各种镶边旗和八卦旗、花旗、绿旗等。会后，张乐行发布告示，痛斥清政府地方官吏“视民如仇”，残酷搜刮民脂民膏，阐明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愤”，并宣布了群众纪律，制定了行军作战条例，以严明军纪。

雉河集会盟，对捻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会盟，多少改变了一部分捻军互不从属，各自为战的局面，为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提供了条件。但这时的捻军没有固定的编制，内部组织十分松散，武器装备也很简陋，除少量鸟枪、土炮外，主要是刀矛等冷兵

---

① 联庄会原为豫北一带豪绅地主为对抗太平军而组织的团练，其成员多系农民。该会成立后，仍受清政府地方官吏征粮、派差和苛捐杂税等压榨，于是开展“抗官杀差”、“聚众抗漕”等斗争，致遭清军镇压。

② 关于雉河集会盟时间，《涡阳县志》、《亳州志》、《永城县志》、《湘军志·平捻篇》等所记各异。据《同治涡阳县志》记载：“咸丰六年正月，张烙行（乐行）伪称盟主，分五旗。”另据罗尔纲考证，应为1855年秋。此处从罗说。

器，加之各旗捻军还不是脱产的专门武装，缺乏必要的训练，因而战斗力不强。由于皖北地势平坦，适于战马驰骋，所以捻军在作战时，往往以步兵在正面冲阵，骑兵从两翼包抄。这种作战形式，当时对付装备较差、数量不多的清军和团练，尚能奏效。

（二）雉河集争夺战

清军屡攻雉河集　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发展到五六万人，而这时皖北、豫东的清军兵力仍较薄弱，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便率捻军3万余人乘机发起进攻作战。先于9月27日败颍州知府陆希湜所部清军于庙集，继败道员张维翰部于亳州以东的泥台店。随后挥师入河南，破夏邑，进围归德府城，后闻河南巡抚英桂派兵前来增援，即转旗南返雉河集。

清廷对于捻军的进攻行动深为不安，遂擢曹州总兵武隆额为湖南提督，令其从山东南下，率所部清军攻捻。这时，捻军正围攻亳州，河南按察使余炳焘率乡团万余人，于12月7日乘虚袭占了雉河集。张乐行等为调动敌人，即由亳州转攻永城，迫使余部回救，遂收复雉河集。17日，捻军再次北上，与武隆额部战于麻种集，获大胜，复乘胜攻占夏邑，进围归德城。武隆额被清廷革职，由英桂督办豫、皖、苏三省剿捻事宜。同时，清廷命江北大营遣侍卫伊兴额、协领德昌率马队入豫，命总兵朱连泰统带兖州、徐州清军千余人进驻亳州，均归英桂调遣。英桂还调南阳总兵邱联恩部及都司保英部约3000人驰援归德，使豫皖边的清军总兵力增至万余人。张乐行等得悉清军援兵纷纷赶来，便率部返回雉河集。此后，捻军再次进围归德，又未克。旋即转兵东向，配合宿、怀、凤地区的捻军进攻怀远城，因蒙城等地清军赶来增援，即撤围返回雉河集。

1856年3月下旬，清政府令袁甲三随同英桂剿办河南捻军，并进攻雉河集。英桂认为："雉河周围三四百里皆贼党屯踞，须渐次疏通，免为所袭。"① 据此，他确定了分进合击、稳步前进的作

---

① 尹耕云等：《豫军纪略》，见《捻军》（二），第305页。

战方针。其部署是：以袁甲三、邱联恩等部为主力，从亳州以北向东南进攻，以傅振邦、伊兴额等部从永城、宿州向西南进攻，夹击雉河集。由于捻军事先缺乏防御作战的准备，因而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不利的境地。

4 月 25 日，清军傅振邦部 4000 余人和伊兴额马队 1000 余人，从宿州向永城东 40 里的茴村发动进攻。捻军 6000 余人迎战，激战数小时，损失 2000 余人，向南败退。初战失利后，张乐行命韩奇峰、苏添福等部三四万人进至宿州西北的濉溪口（今濉溪）和永城茴村桥一线阻击清军。4 月 30 日，清军傅振邦、伊兴额部奔袭濉溪口北面的丁家楼，捻军损失 2000 余人。接着，茴村桥方向的捻军也被清军击溃。清军乘胜占领了宿州的铁佛寺、临涣集等捻军据点。

随后，亳北方向的邱联恩等部清军亦向南推进，于 5 月 31 日与驻亳州的袁甲三等部会合后，沿涡河向东进攻。6 月 8 日，捻军二三万人在亳州东南的翟村寺阻击邱、袁等部，激战半日，不支而退。其后，捻军主力又在翟村寺东南 40 里之白龙庙一带沿涡河两岸列阵阻敌，遭袁甲三派出的马队抄袭后路，腹背受敌，不得不再次撤退。清军乘胜推进，于 6 月 19 日攻占雉河集。

捻军南占淮河重镇三河尖　雉河集失守后，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为了调动敌人，采取敌进我进战法，毅然率部南下，于 7 月 16 日乘虚袭占了淮河流域的商业重镇和皖豫交界的军事要地三河尖（今颍上西），获得了大量物资，并补充了大批人员。英桂害怕捻军西占河南的固始、光山，即移营陈州，就近调度，并令邱联恩部由雉河集移驻固始，袁甲三部移驻颖州，准备拦截捻军西进。张乐行等乘清军南调，蒙、亳一带守备空虚之际，于 8 月 24 日重返雉河集。清军邱、袁等部再次北趋雉河集。9 月 10 日，在亳州西南十八里铺作战中，捻军黑旗首领王贯三不幸牺牲，部众伤亡 2000 余人。11 月 28 日，雉河集再次为清军攻占。接着，庙集、尹家沟、赵旗屯等捻军据点先后陷入敌手。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鉴于已无法扭转被动局面，除留部分捻军就地坚持斗争

外，率领主力再次南下淮河流域，于1857年2月中旬重占三河尖等地。此后，捻军开始了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新时期。

捻军从雉河集会盟到再次南下淮河流域，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随着参战清军的兵力由少变多，经历了由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的变化。在进攻作战期间，由于清军兵力薄弱，捻军“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①，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部队也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但这一时期的作战，除给少数清军以歼灭性打击外，多数打的是击溃战和力不能克的攻坚战，故清军的有生力量没有受到重大损失。更为失策的是，由于没有着意消灭团练武装，建设巩固的根据地，以致在淮北出现了捻军占领区与地主武装所控制的圩寨犬牙交错的局面，一些实力不大的捻军圩寨反而不断遭到地主武装的进攻。另外，在防御作战中，只有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几支捻军主力从正面阻击清军，其余分散的各支捻军只顾据寨自保，极少协同作战。这些，都是导致雉河集失守的重要原因。张乐行等在未能阻止清军进攻的情况下，没有死拚硬打，而是跳出包围圈，进攻三河尖等清军必救之地，从而调动了敌人，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是捻军初期作战中的成功之处。

二、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与太平军并肩战斗

（一）淮南捻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

会合太平军，发起攻城战　张乐行、龚得树等捻军首领在雉河集失守后，率部南下三河尖，希望取得太平军的支持和帮助。②而太平天国自1856年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也迫切需要团结友军，共同对敌。因此，洪秀全决定实行联

---

① 《涡阳县志》，《捻军》（二），第100页。

② 捻军第一次占领三河尖时，曾与太平军商谈过联合作战问题，因敌人进逼，捻军很快回师北上，故未能实现。

合捻军的方针，使其“能掌北门锁钥”，成为“南国之屏藩”。[1] 正是这种共同需要，促成了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合作。1857 年 3 月初，捻军自三河尖南围霍丘，在击败道员金光箸所率清军后，即由龚得树、苏添福率部南下迎接太平军。而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在解桐城之围并乘胜占领了舒城、霍山、六安后，也就北上会合捻军。两军在霍丘、六安交界处胜利会师后，经过协商，捻军以“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为条件，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其他捻军将领也各有封号；部队蓄发易帜，但仍然保持原有的领导系统和制度。为适应联合作战的需要，双方互派代表，随时联络会商。

两军会师后，太平军和捻军各有 10 万左右，立即在淮河沿岸发起攻城作战。太平军薛之元[2] 等部和捻军张乐行部围攻河南固始城；太平军陈玉成部和捻军韩奇峰等部于 3 月 11 日攻占霍丘东北的正阳关，13 日东进包围寿州城；太平军李秀成、李昭寿[3]部和捻军龚得树、苏添福部于 3 月 18 日占领霍丘城，后又北渡淮河，围攻颍上城。

清廷得悉捻军南下后，授予因围攻北伐太平军不力而被革职的胜保副都统衔，并署理河北镇总兵，令帮办攻捻事宜。胜保抵达亳州后即与英桂、袁甲三等会商，确定了首先防止捻军主力重返雉河集，“再行相机节节进剿”的作战方针。据此，由袁甲三督饬总兵朱连泰部约 3000 人及亳州地方团练于亳州一带进剿留驻淮北的捻军；胜保以颍州为基地，率马步 3000 余人进攻南下的捻军，另有王庭兰、金光箸等部约 2000 人归其统辖，在淮河流域配合作战；负责三省剿捻事宜的英桂率河南清军 1000 余人驻太和等地，策应胜保部，并保护清军后方粮道。3 月下旬，胜保率部南下，

---

① 《张乐行传》，《安徽史学通讯》1959 年第 6 期，第 60 页。

②③ 薛之元、李昭寿原为霍丘、固始边界地区的捻军首领，1854 年投降清道员何桂珍，1855 年 12 月在安徽英山杀死何桂珍后，归附太平军李秀成部。

利用太平军和捻军正三路出击、兵力分散之机，首先集中兵力解了固始之围，然后率部回救颍上。面对清军的进攻，各路攻城的太平军撤围退守六安，捻军则撤至三河尖、正阳关和霍丘等地。至此，捻军和太平军第一次联合作战，未能取得理想的战果而告结束。

三河尖、正阳关防御战　由于安徽战场上的太平军既要抵御从湖北东进的湘军，又要牵制天京外围的清军，经常流动作战，而捻军基本上战斗在淮河流域一带，因而出现了捻军与太平军时而联合作战，时而单独作战的情况。为了阻击从湖北东进的湘军，陈玉成于5月12日率数万太平军和部分捻军进入鄂东地区作战（9月中旬才折回皖境，驻太湖、潜山一带）。李秀成部则驻六安、霍山一带，随时准备东进，对付天京外围之敌。于是，在淮河沿岸的捻军便采取守势，收缩兵力，集中力量防守三河尖、正阳关、霍丘等据点，迎击进攻之清军。

太平军离开淮河沿岸后，胜保乘机向三河尖的捻军发起进攻，实行长围久困之策，并开展政治攻势。捻军坚守了60余日，因粮弹不济，于6月16日撤出三河尖，退守正阳关。其时，由韩奇峰率部驻守正阳关，张乐行、龚得树驻守霍丘。胜保占领三河尖后，即向正阳关、霍丘发起进攻。当清军猛攻正阳关时，张乐行、龚得树率主力往援，留守霍丘城的张金桂被胜保收买，致使该城先被清军占领。正阳关的捻军虽坚守了4个多月，终因清军严密围困，加上河水暴涨及瘟疫流行，不得不弃关突围，于10月12日与李秀成派来的援军一起撤至六安。

10月下旬，驻守镇江的太平军遭到清军围攻，天京外围形势紧张，李秀成率部离六安东进救援。张乐行率捻军一部配合太平军打通进军通道，待太平军绕过庐州（今安徽合肥）后，便又返回六安。这时，捻军中的地域观念和宗派观念抬头，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蓝旗旗主刘永敬、刘天台等主张返回淮北家乡；张乐行、龚得树等则主张继续留在淮南，配合太平军作战。前一种意见对于联合抗清的大局显然是不利的。但张乐行、龚得树

在处理内部分歧时，采取了错误的做法，竟于12月间将刘永敬、刘天台杀害，致使矛盾激化。不久，蓝旗首领刘天福、刘天祥、刘天月等擅自率部由六安返回淮北，其他旗首如孙葵心、任乾、陆连科等也率部北返。从此，捻军便分别在淮南淮北两个战场作战。

与清军争夺淮河中游要地　1858年4月，胜保和袁甲三分别率部由固始、正阳关向六安方向集中，伙同安徽布政使李孟群部围攻六安。5月24日夜，六安捻军正同清军激战时，早被胜保收买的捻军头目许原如、杨邦本等偷开城门，清军蜂拥而入。张乐行、龚得树等率守军勇猛拚杀，突围出城，沿淠河北上，渡过淮河，在先行到达淮北的捻军配合下，于6月2日攻占淮河北岸要地怀远城。接着，沿淮河东进，于14日攻克临淮关，15日攻占凤阳府县两城。9月，捻军协同太平军吴如孝部围攻定远城，牵制了部分清军，使陈玉成、李秀成部太平军取得了击破清军江北大营的胜利。11月，捻军又配合太平军取得了在三河镇全歼湘军主力李续宾部的重大胜利。1859年7月，捻军在太平军吴如孝部配合下，围攻定远城。驻定远的安徽巡抚翁同书在"待援不至，待饷不来"① 的情况下，弃城逃往寿州。捻军占领定远城，扩大了淮南控制区。

捻军控制淮河中游，与太平军庐州辖区联成一片，引起清廷的震惊。1859年10月底，清廷命袁甲三署理钦差大臣，接替胜保督办安徽军务，并告以"怀远一城居凤、颍之交，久为贼踞，亟宜迅图攻克，与翁同书一军合而为一，以便进攻淮南，兼顾北路"②。在袁甲三还未收到清廷谕旨前，胜保乘捻军主力集中于淮南，怀远守军薄弱之机，派兵3000余人攻占了该城。1860年1月上旬，袁甲三乘捻军配合陈玉成部太平军在潜山、太湖一带与湘军作战之机，督率水师炮船和马步队进攻临淮关，守关捻军与清军激战两昼夜后，于1月10日南撤定远。袁甲三占领临淮关后，

---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61，第17页。

②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69，第11页。

又督军围攻凤阳。张乐行率部往援，在凤阳南梁家冈遭苗沛霖团练和清军马队袭击，损失五六千人。2 月 13、14 日凤阳府县两城先后落入清军之手。

重返淮北　清军攻占怀远、临淮、凤阳后，隔断了淮北捻军和淮南捻军及太平军的联系，张乐行、龚得树等在淮南只据有定远一个孤立据点，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此后，由于太平天国的战略要地安庆遭到湘军围攻，为解安庆之围，龚得树、孙葵心率数万捻军随陈玉成南下。12 月 10 日，太平军和捻军与敌战于桐城西南之挂车河一带，孙葵心不幸牺牲。1861 年 3 月，龚得树也在湖北罗田松子关中炮身亡。孙葵心在脱离张乐行领导期间，率淮北捻军转战于河南、山东，屡败清军；返回淮南后，重与太平军协同作战，最后把鲜血洒在太平天国战场上。龚得树是捻军中仅次于张乐行的重要首领，不仅作战勇敢，而且较有政治头脑，是坚持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核心人物。他们的牺牲，是捻军的重大损失。

1861 年 9 月安庆失守后，陈玉成率部退守庐州，旋又遭清军围困。捻军在定远的孤立据点也难于长期坚守下去。而当时淮北捻军的力量还相当强大，河北、山东等省人民起义此伏彼起，陈玉成为了“广招兵马，早复皖城”，再援天京，先派太平军马融和部北上，继派捻军首领张乐行等率部北渡淮河，后又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等率部向西北远征。张乐行和苏添福等将定远据点移交给太平军后，于 12 月间率全部人马返回颍上地区。至此，捻军和太平军在淮河沿岸的联合作战宣告结束。

（二）淮北捻军向河南、苏北、山东出击

张乐行、龚得树等率捻军主力于 1857 年春南下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后，淮北只有少数捻军就地坚持斗争。1858 年初，蓝旗等捻军从六安返回淮北，兵力骤增，声势复振。负责江苏、安徽、山东三省“剿匪”事宜的袁甲三向清廷建议，由河南、山东出兵南下，与皖北清军联合攻剿淮北捻军，清廷表示同意。但未待清军

行动，淮北捻军便开始分道出击了。

北舞渡、马埠、野猪冈歼灭战　1859年3月上旬，捻军二三万人在孙葵心、刘添福等率领下，向河南进发。驻鹿邑的清总兵邱联恩立即率兵跟踪追击。3月中下旬，捻军攻占宁陵、睢州（今睢县）两城，旋又南下围攻西华城。邱联恩率部追至，捻军又撤围西走，一部驻郾城东南的五沟营，主力驻舞阳以北的北舞渡。邱联恩命参将穆特布率部分清军往击五沟营捻军，自率3000人赶往北舞渡。捻军在该地沿沙河两岸设防，严阵以待。29日下午，邱部向吃虎桥进攻。捻军步队正面抵抗，马队两翼包抄，将被称为"邱老虎"的邱联恩杀死于吃虎桥头，其部将20余人同时毙命，所部人马大多被歼。捻军携带大批胜利品，经西华、商水、项城等地返回淮北。1860年春，孙葵心、刘天祥、王怀义等率淮北捻军三四万人再次向河南出击。5月4日，在柘城、太康交界的马埠（今马铺）将奉命拦截的总兵王凤祥、副将王庆长等所部3000余人大部歼灭，王凤祥、王庆长等被杀。捻军重返淮北。清廷将"剿贼不力，畏葸无能"的胜保调回北京，改由巡抚庆廉督办河南军务，副都统关保仍为帮办。1860年8月21日，捻军首领刘玉渊、雷彦、宋喜元、苏添才等率4万余人，由亳州挺进河南，9月20日在汝阳城南35里的野猪冈，与总兵承惠所率的清军8000余人展开激战。结果，承惠等十余名将佐及大部士卒被歼。河南清军受到三次歼灭性打击，元气大伤，清廷因无正规军可派，只得命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整顿和加强地方团练。

袭占苏北重镇清江浦　1860年2月，捻军首领李大喜、魏希之、张宗禹等率步队2万余人、马队万余人，在江苏萧县（今属安徽）宝安山集中后，佯攻砀山，摆出北进山东的架势，忽又挥戈东进，在徐州越过黄河故道，经邳州（今邳县北邳城）长驱南下，于18日占领桃源（今泗阳南），然后直趋苏北的政治中心和商业重镇清江浦（今清江市）。当时，河道总督庚长、漕运总督联英等正置酒观戏，闻捻军将至，才仓皇派兵堵御。2月21日，捻军击败都司德兴部清军300人，乘胜进抵清江浦，庚长等逃往淮

安。清廷闻清江浦失守，急忙调兵往攻。捻军在获得大量钱粮物资后，于3月5日撤离清江浦，返回淮北。

进军山东，三败僧格林沁军　捻军在出击河南、苏北的同时，还不断深入山东境内，用机动灵活的战法，三次击败被清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军。

1860年11月5日，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清廷害怕捻军由山东进入直隶（今河北），危及京畿安全，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统带马步万余人，由直隶开赴山东剿捻，命文渊阁大学士瑞麟以侍郎衔帮办军务。清廷规定僧军的任务是：“前往剿办北路各匪，先由河间一带，次及山东、河南，权其缓急，以次进剿。”①12月17日，僧格林沁率部进驻济宁。

僧军进驻山东不久，捻军4万余人在刘玉渊等率领下，进入山东的鱼台、金乡。僧格林沁率骑兵2000余人前往追击。时值大雪，军行甚疲。12月26日，僧军在巨野东南50里的羊山集与捻军接战。僧格林沁率主力从东面进攻，瑞麟部从西南面进攻。捻军分路抵御，首先将僧部击退，进而包围瑞麟部，将副都统格绷额等击毙，瑞麟突围逃到汶上。僧格林沁败退济宁后，参劾瑞麟突围后“不在巨野扎营，复越过嘉祥、济宁退至汶上……以致后路官兵涣散，实属怯懦无能”②。清廷革去瑞麟职衔，饬令回旗，改由镶蓝旗蒙古都统西凌阿、工部右侍郎国瑞帮办军务，并将原革职的副都统伊兴额和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的步骑兵3000人交僧格林沁调遣。不久，清廷又将陕西巡抚谭廷襄补授山东巡抚，令其率步骑1500人增援山东。

僧格林沁在羊山集战败后，下令从河南的考城（今兰考东北）至山东鱼台的南阳湖长470余里地段，浚壕筑垒，由曹县、单县、菏泽、成武四县民团分段扼守，郓城、巨野、济宁、金乡、嘉祥、鱼台六县民团闻警协守，企图遏阻捻军北上。但捻军向山东

---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84，第30页。

②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90，第3～4页。

的进攻并未因此受阻。1861 年 1 月底，捻军首领赵浩然、张敏行、李成等率黑、蓝、白三旗 4 万余人，由砀山、虞城进入山东，接着分兵两路：一路向曹县的南部游动，一路进入巨野东南 50 里的羊山集。2 月 2 日，僧格林沁及副都统舒通额分率骑兵包抄羊山集南麓的捻军，捻军即北上嘉祥之纸坊，又南下至金乡以西、成武以东地区，后又北上菏泽东北之关李家庄，筑垒布阵，准备抗击追击的清军。2 月 20 日，僧格林沁不顾部队连日奔驰和饥饿疲劳，下令分南、北、中三路进攻。捻军以逸待劳，步队居中，马队从两旁抄袭，奋勇迎敌。清军南路的黑龙江马队及陕甘步队首先溃退，接着中、北两路也纷纷败逃。此战，捻军歼灭清军近千人，缴获枪炮马匹甚多。

僧军败讯接连传到京城，清廷斥责僧格林沁未能持重待敌，告诫他“总不宜轻进，再蹈覆辙”。同时，命袁甲三委派得力将领与田在田、伊兴额等“合力兜剿，牵制后路”，使捻军“有所顾忌，不敢径行北趋”。① 但是，捻军很快又深入山东腹地，迫使僧格林沁不得不再次率部迎战。同年 3 月，数万捻军突入曹县、巨野、郓城境，由东平之戴家庙、安山等处渡过运河。僧格林沁令副都统伊兴额及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率 2000 余人追击。捻军在汶上、东平之间的杨柳集利用村落布置伏兵，待机歼敌。3 月 17 日，先在卧虎山与清军接仗，佯装败退，待清军追至杨柳集时，捻军伏兵四起，将其层层围裹。伊兴额、滕家胜几次突围，均未得逞，终被捻军斩杀，所部伤亡惨重，溃不成军。

捻军在不到 3 个月的时间里，三败僧格林沁军，狠狠打击了僧军的嚣张气焰。僧格林沁无可奈何地对其部下说：“不能再与野战，惟当严固直北藩篱。”便命西凌阿回军济宁，力扼北路，自统全军扼东平之安山，凭河而守。② 于是，捻军在山东的活动区域日益扩大，一度进逼省城济南，山东巡抚谭廷襄龟缩城内不敢出战。

---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91，第 25 页。

② 佚名：《山东军兴纪略》，见《捻军》（四），第 60 页。

捻军又转至胶州半岛，到达福山、烟台沿海地区。外国侵略军以军火接济清军，英、法海军还在烟台地区参与了屠杀捻军的勾当。

淮北捻军挺进河南、苏北、山东，推动了当地人民的武装起义，使上述地区先后爆发了捻首陈大喜领导的汝宁起义，郜永清领导的商丘金楼寨白莲教起义，苏皖边的幅军起义，菏泽地区的长枪会起义，曲阜、邹县、泗水等地的文贤教起义，鲁西的白莲教起义（其中宋景诗的黑旗军发展最快）。这些起义武装和淮北捻军互相配合，给清军和地方统治机构以沉重打击，客观上支持和配合了淮南的捻军和太平军。但是，由于淮北捻军向外出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虽然歼灭了相当数量的敌人，但主要是击退敌人的追击和堵截，没有有计划地寻歼更多的敌人。特别是由于一再外出作战，致使淮北的基地反而有所缩小。在这期间，一些重要捻军首领如宋喜元、任乾、陆连科、李大喜等的圩寨，相继被清军和苗沛霖的团练攻占，任乾、陆连科、李大喜等先后牺牲，这就给尔后进行的保卫淮北基地的作战造成很大困难。

（三）退出淮北，与西北太平军会合

皖南、淮北形势恶化　1861年底，张乐行率领捻军自定远返回淮北后，进驻颍上。1862年（同治元年）1月中旬开始，与太平军马融和部、原在颍州的捻军姜台凌部以及苗沛霖的团练共同围攻颍州城，将安徽布政使贾臻困于城中。不久，胜保（1861年春奉命驰赴直隶、山东督办防剿事宜）奉命由豫入皖，以解颍州之围，苗沛霖接受招抚，配合清军袭击太平军和捻军。腹背受敌的捻军、太平军于4月中旬撤离颍州，退入太和境内。5月中旬，陈玉成撤守庐州，率太平军3000余人北走寿州时，被苗沛霖诱捕，解颍州胜保营。张乐行、马融和率部往救，被清军击败，未能成功。后清廷得悉陈得才、赖文光等率领的西北太平军已兼程前来搭救，遂于6月4日将陈玉成杀害于河南延津县。陈玉成牺牲后，马融和率部西走河南，投奔西北太平军；张乐行则率部返回雉河集。当时，由于庐州失守，陈玉成牺牲，太平军在安徽的根据地丧失殆尽，致使淮北捻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面临着遭清军合

围的严峻形势。

清军围攻雉河集，捻军余部退出淮北　1862年6月，僧格林沁率军南下，攻占了河南商丘县马牧集以南的金楼寨，镇压了白莲教起义军。8月2日，清廷命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安徽的清军和团练大举进攻淮北捻军。其部署是：僧格林沁部马步2万余人和李续宜部湘军万余人，南北对进，夹攻雉河集；袁甲三因病开缺后，所部2万人由李续宜派员统领，从怀远向北进攻；吴棠扼守江苏清江、淮安，并由僧格林沁调拨部分兵力，并力扫荡邳州、宿迁、海州（今连云港市西南）、沭阳一带；由僧格林沁派员接统总兵田在田所部，防守南北要冲徐州、宿州地区；郑元善出新蔡，毛昶熙出归德，配合僧军向东进攻；官文、严树森派兵深入豫境，由正阳、息县援应；皖、豫等省的团练，分别协同各路清军进攻。8月20日，清廷把各路攻捻清军统交僧格林沁指挥，同时告诫他"务宜逐渐进取，步步为营，不可孤军深入"①。张乐行等捻军首领在清军发动大规模进攻面前，未能避实就虚，把捻军主力转移到山东、河南，结合当地农民起义军，袭击清军的后方，或攻敌必救之地，以调动和分散敌人，而是"悉其五旗首，集众二十万，陈雉河"②，依托圩寨打阵地防御战，从而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

10月18日，僧格林沁由河南夏邑移大营于黄仲集（今商丘南），随即分兵攻占了亳州以北的庙集、邢大庄、丁花园、颜集、五马沟、岳楼、八里庄等圩寨。11月，僧军进攻亳东地区，相继攻占刘集、蒋集、韩楼、马村桥等圩寨。1863年2月，捻军退守雉河集。一系列战斗的失利和圩寨的丢失，引起少数捻军首领如宋喜元、赵浩然、刘天祥等动摇投敌，充当清军鹰犬。但是，绝大多数捻军将士没有被清军的猖狂进攻所吓倒，仍奋不顾身地与敌拚杀。张乐行在清军重兵围攻的艰危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和

---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160，第14页。

② 张瑞墀：《两淮戡乱记》，见《捻军》（一），第287页。

分散敌人的兵力，命张宗禹率部突围，由太和、颍州入豫东南与陈大喜等部会合；自己则率部东走宿州，拟北上与早已进入山东、苏北一带的李成、任化邦（又名任柱）等部会合，因在符离集遭清军阻拦，便又折回雉河集。

1863年3月16日，僧格林沁移大营于亳州涡河北岸的庙集，随即命舒通额、苏克金等部向捻军发起进攻，于19日占领尹家沟、雉河集。张乐行等率部南走。20日，张村堡（今利辛西北）一战，捻军阵亡1000余人。21日，再次失利，又伤亡2000余人，韩四万、刘玉渊、苏添福、苏添才等被俘遇害。3月23日夜，张乐行仅率20余人逃至蒙城、宿州交界的西洋集，为叛徒李勤邦等出卖，不幸被捕，押往僧格林沁军营。不久，张乐行及其子张喜等被清军杀害。

捻军在这次防御作战中，由于实行消极防御，结果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不仅丧失了蒙、亳基地，而且张乐行等许多捻军重要首领以及将士2万多人牺牲，蒙、亳一带的捻军圩寨几乎全被摧毁。但是，捻军并没有被完全消灭，突围出去的张宗禹、任化邦等部以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坚持斗争。

转战豫、鲁、皖，调动、打击清军　张宗禹、李成、任化邦等部捻军从蒙、亳地区突围后，分别转战河南、山东等地，联合当地起义军积极打击清军。1863年5月26日，张宗禹和豫东南捻军陈大喜部在正阳县方寨设伏，重创跟踪追击的豫军，毙总兵余际昌及游击以下官弁39人，使该部清军伤亡过半。任化邦、李成等部捻军，在山东的幅军、教军等配合和支援下，活动于兰山、费县、沂水、蒙阴、泗水等地，并进入曲阜、泰安，逼近省城济南。当时活动于鲁西堂邑、冠县、馆陶、临清、高唐等地的宋景诗黑旗军，也威胁着清廷畿辅重地，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急调僧格林沁由淮北返回山东。僧军北返山东后，蒙、亳地区潜伏的捻军又纷起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苗沛霖也因僧格林沁攻占雉河集后，令其“散练归农”而不满，再次反清，占领颍上、怀远、寿州，围攻蒙城。张宗禹、陈大喜等乘机率军从豫南经颍州

回到雉河集，惩办了出卖捻军领袖的叛徒，并夺取了敌人的粮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蒙、亳一带捻军的重新活跃以及苗沛霖团练的反清，使正在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曾国藩颇有后顾之忧，急忙上奏清廷，请求僧军再次南下进攻淮北。1863年11月9日，僧格林沁在镇压了山东各支农民起义武装后，遵旨由直隶大名率军南下，再次占领雉河集，并消灭了苗沛霖团练。清廷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把雉河集改为涡阳县，在县北的龙山镇驻扎一营清军，以防捻军再起。

与西北太平军会合，继续坚持斗争　张宗禹等得知僧格林沁再次率军南下，即主动撤离雉河集，西走河南，准备进入陕西，与西北太平军会合。这时，由扶王陈得才统率的西北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正在东返途中。1864年4月下旬，捻军张宗禹、陈大喜、任化邦等部和西北太平军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乡等地会师，众达数十万，随即分四路向东南进发。清廷为阻止西北太平军和捻军援救天京，令僧格林沁军及鄂、豫、皖清军竭力拦截。太平军和捻军尽管在东进过程中给了拦截的清军以有力的打击，但当得知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于7月19日失陷之后，人心离散，士气大挫。11月5日，安徽黑石渡一战，西北太平军和捻军损失惨重，扶王陈得才服毒自杀。其后，赖文光、邱远才等部太平军和张宗禹、任化邦等部捻军先后进入河南。

1857年到1864年，是捻军反清战争的关键时期。由于实行了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正确方针，张乐行、龚得树等部捻军主力得以控制淮河中游，镇守淮河腹地；淮北捻军的积极出击，也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从而使淮南战场保持相对稳定，陈玉成、李秀成部得以在湖北和天京外围的往返征战中不致有后顾之忧。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这一时期，由于清军在安徽以及河南、山东等省的兵力比较薄弱，这就为捻军进一步壮大自己和扩大占领区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但是，为什么时隔不久，捻军在淮南、淮北战场的作战均遭失利，最后不得不撤离蒙、亳基地突围他走呢？从作战指导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各支捻

军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难于集中兵力，协调一致地对付进攻之敌，相反，给了清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二是淮南捻军在淮河中游占领几座城市后，便分兵守点，消极防御，结果为敌所败。淮北捻军则热衷于向外出击以获取生活资料，没有重视消灭盘踞淮北的清军，建立稳固的后方，以致当僧军向雉河集等地大举进攻时，便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三是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蒙、亳地区的各支捻军仍据寨自保，各自为战，致被清军逐一击破。张乐行等退守雉河集后，企图以装备低劣、组织松散的捻军与清军打堂堂正正的阵地战，而不是及时跳出清军的包围圈，又是很大的失策。后来在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决定张宗禹等部突围出走，终于保存了部分有生力量，得以继续坚持斗争。

三、与太平军余部合编，坚持反清战争

（一）新捻军的产生与高楼寨歼灭战

捻军、太平军余部合编成新捻军　1864年11月下旬，遵王赖文光和淮王邱远才两部太平军二三千人在豫南地区与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牛宏升、李允、张禹爵等部捻军二三万人会合，扶王陈得才余部及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军、捻军将士，也陆续前往集中。接着，他们将部队进行了合并和改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新捻军。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赖文光为最高领袖。赖文光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称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李允为魏王、牛宏升为荆王、张禹爵为幼沃王。军队沿用捻军的编制，仍以五色旗区分。

通过整编，部队的军政素质有所提高：政治上，明确以复兴太平天国为斗争目标；组织上，实现了集中统一指挥，并根据捻军骑兵较多和北方地势平坦等特点，决定“易步为骑”①，增加骑

① 尹耕云：《豫军纪略》，见《捻军》（二），第172页。

兵，减少步兵，加强部队的机动能力；作战方式上，发展了盘旋打圈以疲敌，声东击西以误敌，设伏围裹以歼敌等灵活的战术，成为一支“善战善走”的部队。但是这次合编，没有解决部队主要行动方向和建立革命基地等重大问题，对于尔后的作战影响甚大。

清军方面，自黑石渡之战后，某些将领滋长了骄傲情绪，认为太平军、捻军已是“屡败之众”，只要“僧格林沁就近调度，必能就地殄除”①。同时，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军与僧格林沁的满蒙旗兵之间的派系矛盾日趋突出。黑石渡作战之前，僧格林沁连吃败仗，清廷为了支撑这支“王牌”军队，调两江总督曾国藩及其湘军前往湖北东部参战。曾国藩以“大帅三人（按：指曾国藩、僧格林沁、官文）屯驻四百里内，恐群盗轻朝廷”② 为由，拒不应命，只愿派部分湘军归官文调遣。黑石渡之战后，清廷下令调部分湘、淮军（湘军刘连捷部和淮军刘铭传部）给僧格林沁，以加强攻捻兵力。曾国藩、李鸿章都以种种借口拖延部队的调动。而盲目自大的僧格林沁则认为所调之湘、淮军“守则有余，战则不足”③，拒绝接受支援，仍然妄想独吞攻捻的“胜利果实”。捻军正是利用这种有利条件，采取“打圈”战术，连败穷追不舍的僧军（参见附图 13）。

邓州、鲁山两败僧军　12 月初，僧格林沁亲督翼长恒龄、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部进抵湖北枣阳，旋即西进。12 月 7 日，赖文光等督军败僧军于襄阳，然后挥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今邓县）西南的唐坡，挖壕筑垒，待机击敌。12 日，僧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捻军将士首先打败僧军右路步队，然后从侧后抄袭其中、左两路，大败僧军。僧格林沁仅率数十骑退入邓州城。1865 年 1 月 28 日，捻军又在鲁山布阵待敌。当僧格林沁挥军向捻军阵地冲锋时，捻军佯败，将僧军诱过滍水（今沙河），然后回军猛击，

---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223，第 32～33 页。

② 王闿运：《湘军志·平捻篇》，第 7 页。

③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224，第 18 页。

并以马队从后抄袭，阵斩翼长恒龄、副都统舒伦保等多人，又一次大败僧军。

高楼寨全歼僧军　僧格林沁两吃败仗，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决心猛追捻军，寻机报复。捻军则采取盘旋打圈，先疲惫敌人，然后伺机歼敌的方针。两个月中，僧军尾随捻军之后，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部队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僧格林沁自己也“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①。清廷曾告诫僧格林沁“未可一意跟追”②，但他刚愎自用，不听朝廷告诫，不顾士卒疲劳，继续尾追捻军。

1865 年 4 月初捻军进入山东后，先活动于曹县、定陶、成武、嘉祥、汶上、宁阳、曲阜、东平等地，复北上东阿（今东阿南）、平阴、肥城，威胁省城济南。僧格林沁率军追至东平，布政使丁宝桢部进抵泰安北面的张夏镇。捻军见敌有备，便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今枣庄市南），旋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沭阳。5 月 3 日，又由邳州返回山东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阳、汶上。5 月 10 日由汶上以西的袁家口渡过运河，在范县、郓城汇集了当地起义武装，驰抵菏泽西北的高楼寨地区。这一带地处黄河南岸，附近河堰纵横，柳林密布，捻军决定在此设伏，与敌决战（参见附图 14）。

5 月 17 日，僧军追至菏泽以西、高楼寨以南的解元集地区。捻军先以小队前出迎敌，且战且走，引诱僧军步步向高楼寨地区深入。僧格林沁不知是计，分兵三路进击：以翼长诺林丕勒等马队、总兵陈国瑞等步队居左；翼长常星阿等马队居中；翼长成保等马队、总兵郭宝昌步队居右；僧格林沁在后督战。中午，僧军进入捻军设伏地域，捻军号角齐鸣，伏兵四起，亦分左、中、右三路

---

① 佚名：《山东军兴纪略》，见《捻军》（四），第 85 页。

②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226，第 27 页。

向敌突击，鏖战 2 时许，先击退左路敌军，继击败中路马队，随即转兵西向，配合左路捻军夹击右路敌军。僧军不支，纷纷溃退。僧格林沁收集马步残兵逃往高楼寨南的郝胡同，企图负隅顽抗。不久，捻军大队赶到，将僧军包围，一面在圩外掘长壕防堵，一面向寨内施放枪炮。入夜，僧军从东北方向冲出长壕，向一片柳林中逃窜。捻军早已在此设下伏兵，将敌层层围裹。僧格林沁在枪声不绝、号角频吹声中，不辨东西，盲目乱窜，逃到菏泽西北十余里的吴店（今吴庄）时，被捻军战士张凌云用大刀砍死。同时被击毙的还有总兵何建鳌、内阁学士全顺等。

高楼寨之战，共歼灭僧格林沁以下官兵 7000 余人，是捻军在抗清战争中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也是运用运动战取胜的一个典型战例。捻军发挥快速机动的特长，牵着僧军盘旋打圈，使其精疲力竭，同时伺机反击，消耗敌之兵力，挫伤敌之士气，最后在地形和群众条件都有利的地区设伏，一举全歼穷追之敌，其作战指挥是相当高明的。

（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僧格林沁军覆灭后，清廷深恐捻军渡过黄河，北攻直隶，威胁京畿，遂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统领湘、淮军，前赴山东"督剿"，继又令其督办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军务，所有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其节制。又命直隶总督刘长佑驻军大名一带，扼守黄河天险；催调提督刘铭传所部淮军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门户"；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领天津洋枪队进驻景州（今河北景县）堵截；命署两江总督李鸿章拨派精锐若干，由上海乘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隶；命醇郡王奕譞统领京城旗、绿各营，"密筹布置"，守卫北京。

曾国藩的攻捻方略　曾国藩接旨后，为避免仓促上阵，重蹈僧格林沁全军被歼的覆辙，向清廷申述了不能迅速北上的理由。同时，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并确定了攻捻方略。他认为捻军骑多步少，行动迅速，飘忽靡常，而湘、淮各军主要是步队，以步追骑，实难制胜。因此，主张重点设防，"以静制动"，即在捻军"必经

之途，驻扎重兵”，“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① 据此，他提出如下具体方案：由他负责捻军经常出没的4省13府州（即安徽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河南归德、陈州，山东兖州、沂州、曹州、济宁，江苏淮安、徐州、海州）的攻剿事宜，4省的其它地区则由各省巡抚负责。他还分别以临淮、周家口、济宁、徐州为老营，驻扎重兵，多储粮草，以为重镇。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做到“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各军首尾相应，不致疲于奔命。②

曾国藩的攻捻方略，其用心虽然狠毒，但并不能解决地广兵少的矛盾。因为清军重兵集结于主要城市，广大地区的兵力就相对薄弱，且不说捻军可以避开13府州的重点设防区，即使在重点设防区内，仍然可以在乡村穿梭往返，摧毁地方团练，伺机伏击由城市出援之清军。此外，奉调参战的湘军、淮军与各省防军之间矛盾重重，不能密切协同配合。因此清军之“静”实难遏制捻军之“动”。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在清廷一再催促下，离开金陵，沿运河北上，踏上了镇压捻军的反革命征途。

曾国藩攻捻方略的破产　高楼寨之战后，山东清军兵力空虚，仅有丁宝桢所部3000人扼守济宁，“能守而不能战”，而捻军新胜，士气高昂，兵强马壮，“纵横自便”。如果捻军此时不失时机地挥军北上，不但济南指日可下，而且可以更加沉重地打击清军，开创新局面。但是，由于捻军首领们对进军方向意见不一，有近半个月时间徘徊于黄河以南、运河以西的菏泽、曹县等地区，失去了乘胜进攻的良机。此后，决定南下恢复蒙、亳一带的捻军基地。殊不知自捻军退出雉河集后，清廷在蒙、亳等地强化了反动统治，驻扎了重兵。所以，尽管捻军于6月21日包围了雉河集，但围城月余未克。而抵达江苏清江浦的曾国藩即命湘、淮军及皖、豫、苏、鲁清军纷纷前来救援，对捻军形成反包围态势。捻军在各路清军

①② 曾国藩：《钦奉谕旨复陈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717页。

步步逼近的情况下，不得不于7月25日撤围，西走河南。

捻军撤离雉河集后，时分时合，先后转战于豫、鲁、皖、苏、鄂等省。曾国藩先是坚持其专办13府州攻剿事宜的方针，但因湘、淮军一般只守据点，不积极攻剿，各省清军兵饷两绌，根本不是捻军的对手，以致“剿捻”毫无成效。12月14日，清廷谕令曾国藩“未可株守一隅，致误事机”①。于是，曾国藩一面仍于济宁、徐州、临淮、周家口驻扎重兵，以备“迎头截击”，一面命淮军李昭庆、刘铭传部作为游击之师，与捻军“纵横追逐，使之不得休息”。②这种作战部署的改变，虽然使捻军的流动作战增加了困难，但仍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此后，捻军一直在曾国藩所节制的清军防区内往返穿插，流动作战。

1866年5月，捻军在山东抢渡黄河、运河均未成功，遂南下周家口渡过沙河，于6月进入豫西南地区。这时，曾国藩接受了刘铭传的建议（有说接受襄办军务刘秉璋的建议），向清廷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方略，经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面商，确定了运河、黄河的设防部署；捻军渡过沙河进入豫西南后，清军又设沙河、贾鲁河防线，防军分别为湘、淮军及有关各省的清军。为了防中有攻，将部分湘、淮军作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捻军。曾国藩“聚兵防河”的主要目的，先则企图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江苏；在捻军渡过沙河以后，则企图将其遏阻于豫西南多山地区，使之不能发挥骑兵的优势，然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这种设防的最大缺点是战线太长，兵力分散，防线脆弱。

就在曾国藩紧张地部署河防时，捻军发觉了清军的诡计。9月中旬，分散活动的捻军在河南禹州、许州一带集中后，侦知朱仙镇以北堤墙尚未筑成，随即经尉氏、中牟北上，决定跳出河防圈。9月24日，捻军先示形于开封以北的黑堽，佯作抢渡黄河的态势，

---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46，第21页。

② 曾国藩：《宁陵扶沟等处胜仗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731页。

然后急速南下，进至开封南的芦花冈，乘夜击溃豫军，再次突入山东境内，使曾国藩的“以静制动”攻捻方略彻底失败。

沙河、贾鲁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曾国藩不得不承认“防守沙河、贾鲁河，本系策之至拙者”，但又声称“无奈马队远不如贼……专恃步队追剿，断不能制流寇，不得已乃出于防河之下策”。①不管曾国藩如何巧言辩解，事实是由他主持攻剿捻军近一年半时间，竟毫无成效。为此，清廷于12月7日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军务。曾国藩则回任两江总督。

两年以来，捻军纵横驰骋于苏、鲁、豫、皖、鄂数省，先后取得了歼灭僧格林沁军和挫败曾国藩“以静制动”方略的重大胜利。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一，捻军、太平军余部合编后，成为一支领导统一、组织比较严密的军队，并发扬了“誓同生死，万苦不辞”②，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其二，坚持灵活机动的“打圈”战术，从运动中消灭敌人。曾国藩对此种战法颇感头痛。他说：“捻匪势极猖獗，善战而不肯轻用其锋，非官兵与之相逐相追，从不寻我开仗。战则凶悍异常，必将马步层层包裹，困官军于垓心；微有不利，则电掣而去，顷刻百里。故我有大挫之时，而贼无吃亏之日，其难办有数倍于长毛者。”③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捻军打了不少胜仗，但因缺乏可靠的战略后方作依托，因而十分不利于坚持持久的战争。

四、东捻军转战湖北、山东及其最后失败

（参见附图15）

（一）捻军分为东西两支

---

①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见《捻军》（一），第46～47页。

② 翦伯赞等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5年版，近代部分，上册，第249～250页。

③ 陈昌：《霆军纪略》，见《捻军》（一），第253页。

捻军冲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山东后，因抢渡运河未成，便于10月中旬进入豫东地区。由于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部队得不到休整，粮弹补充十分困难，同时又得不到友军的支援，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①。为改变这一不利态势，捻军领袖们决定将全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那里的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敌周旋，称为东捻军。

（二）东捻军转至湖北与李鸿章的“扼地兜剿”方略

东捻军入鄂与李鸿章的攻捻方略 1866年10月21日，东捻军3万余人在赖文光等率领下，由河南中牟进入山东，拟攻破运河防线，进入较为富庶的运河东部地区，以扩充兵员和筹集粮饷。后因几次抢渡运河均未成功，而清军的追兵又至，遂放弃上述计划，决定向湖北转移，拟渡过汉水，进占荆州、宜昌，然后主力入川，并留一支部队于湖北以为声援，以一支部队入陕西与西捻军取得联络。“倘各路皆不得手……则共趋秦中”②，联合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建立基地。1866年12月，东捻军由山东经河南进入湖北。清军方面，李鸿章吸取了曾国藩的“聚兵防河”计划因地段太长，人力难齐，终难成功的教训，提出了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的“扼地兜剿”方略，并准备用“离间”、“招抚”等伎俩，从内部瓦解捻军。③ 1867年1月，李鸿章调集10万清军，分“堵击之师”和“兜击之师”，分驻于鄂、豫、皖三省接壤处，妄图一举消灭东捻军于鄂东地区。

罗家集、杨家河、尹隆河之战 东捻军进入鄂东不久，即由

---

① 《赖文光自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250页。

② 陈昌：《霆军纪略》，见《捻军》（一），第257页。

③ 李鸿章：《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0，第57页。

麻城南下至滠口，威胁武昌。复折而西向，围攻德安府（今安陆），又入京山，占天门县。提督郭松林率9营湘军尾追，捻军用兜圈子战术疲惫敌军，并于钟祥以东的罗家集设伏以待。1867年1月11日，郭松林不顾士卒疲劳，分兵三路向罗家集进攻。东捻军首领任化邦率部正面接战，李允统领马队从两侧包抄，赖文光率部击敌后路。激战半日，歼敌2000余人（有说4000人）。郭松林被捻军生擒，因伤重不能行走，被弃掷路旁，始得免于死。1月26日，捻军在德安府杨家河东岸屯扎。淮军总兵张树珊率所部6营渡河进击，捻军佯装败退，张树珊盲目轻进，被捻军分割包围。战至深夜，捻军阵斩张树珊及副将刘登朝、郭有容等数百人。

东捻军两败敌军后，为了实现西进川陕的计划，先后在旧口、丰乐河、流水沟及王家集、霸王山等处抢渡汉水，历时半月，但均为清军所阻，被迫退驻旧口地区。此时，清军各部已分别向旧口方向集中，准备围歼东捻军于旧口地区。其部署是：湘军彭毓橘、谭仁芳、熊登武、刘维桢等部驻九里冈、永兴、皂市、天门一带，屏蔽东路；豫军蒋东才等部驻茅茨畈，扼守北路；淮军刘秉璋、周盛波等部扼守京山；李昭庆部由信阳移驻宋河镇；以淮军主力刘铭传部万余人由北而南，湘军主力鲍超部1.6万人自西向东，夹击捻军。赖文光等见清军来势迅猛，便率军退守尹隆河（今永隆河）一带，准备与清军决战。

2月19日拂晓，刘铭传为了争功，自行改变与鲍超军共同进攻的计划，提前由下洋港向尹隆河捻军发动进攻。他见捻军扎营于司马河（今天门河）对岸，便留2营兵力护卫后路辎重，以18营兵力渡河攻击。捻军以步队正面阻击敌军，以马队1000余人向北绕袭敌军后路。刘铭传恐辎重难保，便抽出步队、马队6营加强后路，自率12营分三路进攻。捻军亦分三路迎击：任化邦敌左路，牛喜敌右路，赖文光、李允敌中路。刘铭传见任化邦部全力围攻刘盛藻的左路军，急忙从中路抽3营往援。在捻军的猛攻下，刘盛藻部过河溃逃。任化邦即挥军支援牛喜部，将右路淮军一举消灭。接着，捻军左、右两路协同赖文光等全力围攻刘铭传的中

路军。淮军一败涂地，退至司马河彼岸。刘铭传失魂落魄，与其部将、幕僚“俱脱冠服坐地待死”。可是，由于捻军首领事先没有派出部队对近在旧口的鲍超部进行警戒，以致正当捻军追过司马河歼击刘铭传所部淮军时，鲍超率所部湘军从旧口由西向东侧击杨家浲捻军侧背。赖文光没有仔细侦察敌情，仓促率领中军步队向鲍军冲锋。激战两小时，捻军中军步队受挫，后路又为鲍军马队截断，于是军心动摇，阵势大乱，由胜转败。尹隆河之战，捻军虽然歼灭了刘铭传所部淮军半数以上，但自己也伤亡万余人，被俘 8000 多人，元气大伤。

（三）东捻军进入山东及其最后失败

放弃入川计划，进军山东半岛　东捻军在尹隆河战败后，便在鄂、豫两省流动作战。3 月 23 日在鄂东六神港歼灭湘军彭毓橘部 3000 余人，击毙统领彭毓橘以下营哨各官 30 余名。5 月 14 日，在黄安（今红安）的王家冈设伏，大败淮军杨鼎勋部。此外，还两次抢渡汉水，但均未成功，而湘、淮军始终紧追不舍，捻军处境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捻军首领们决定放弃西渡汉水进入四川的计划。但对于究竟向何处转移，却意见不一。赖文光、任化邦等本来主张向西北转移，但从郓城、梁山地区参军的将士认为山东连年丰收，粮食充裕，而陕西连年战乱，粮食匮乏，极力主张东进山东。赖、任等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包围，同时“恐西路山多，难以翻越”①，也就改变主意，采纳了东进山东半岛的意见。6 月上旬，东捻军由考城进入山东曹县，于 12 日晚直逼运河，以一部强攻沈口，吸引附近各段守河清军驰援，以另一部袭击清军守备薄弱的戴家庙防线。次日黎明，捻军三四万人从戴家庙一带，涉水过河，进入运河东部地区。19 日，东捻军东走章丘，后经邹平、寿光等地进入胶东半岛，6 月底兵锋直指烟台。

李鸿章坚持“扼地兜剿”方针，东捻军突破胶莱河防线　东捻军突入山东半岛后，李鸿章立即布置清军三路兜截：以刘铭传

---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277，第 14 页。

部由济宁、泰安、莱芜径趋青州（今益都）为中路，以潘鼎新部由潍县（今潍坊市）、昌邑赴莱州（今掖县）为北路，以总兵董凤高、沈宏富马步15营由郯城、兰山进莒州（今莒县）为南路，将捻军“扼之于胶莱河一带，使其不能复出”①。他还决定“先固守局而后进兵”②。其具体部署是：以运河为外圈，胶莱河为内圈，进行布防。决定调皖、豫、鄂、苏和直隶的清军，分段防守运河，在西岸修筑长墙，并以部分兵力就东岸旧墙修缮炮台，“犄角护守”。鉴于胶莱河为扼捻军西突的咽喉，决定配以重兵，在300里的地段上以一营守3里，共部署兵力近100营，由淮军主力刘铭传、潘鼎新、董凤高、沈宏富、王永胜等部及豫军宋庆等部和丁宝桢的山东军划段防守，并筑长墙壕沟于河西。同时，以黄河为北部防线，由崇厚和刘长佑负责防守；以江苏北部的六塘河为南部防线，由漕运总督张之万和由浙江北援的部队共同防守。此外，另派部队跟踪追剿。

1867年7月中旬，东捻军正在福山、宁海（今牟平县）一带就粮，当得知清军在胶莱河西岸修墙筑垒、分段扼守时，急忙回军西向。7月31日，捻军自即墨向胶莱河南部的麻湾口发起攻击，但未能突破，只得转兵北上。8月6日，又向由淮军潘鼎新部驻防的新河突击，仍未成功。后侦知潍河北段自下营至海口一段只有已革山东军总兵王心安部2000余人驻防，且“营垒初成，河墙未筑”③，便于8月19日向这一地段的海神庙等处发动进攻，歼灭了王心安所部清军，进入潍县、昌乐，然后由安丘、临朐疾驰南走。李鸿章费尽心机策划的“扼守胶莱之策”竟成画饼。

胶莱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李鸿章将防守胶莱河的各部清军

---

① 李鸿章：《行抵济宁筹防运河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1，第45页。

② 李鸿章：《陈明办贼大致暂难亲赴前敌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1，第48～49页。

③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见《捻军》（一），第161页。

调至运河防线，并将大营由济南移至台儿庄，居中调度。当时，多数清军将领对防守运河丧失信心，特别是山东巡抚丁宝桢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今胶防隳守，运河之防非独无补于事，抑恐有碍大局。"① 曾国藩也悲观地说："胶莱三百余里尚难堵御，沿运千有余里更觉毫无把握。"② 清廷也明确指出"河防不可恃"。李鸿章认为扼守运河虽没有十分把握，但舍此别无良策。他在 9 月 19 日的奏折中说：捻军"正急欲出运"，"若先撤运防，是示贼以弱也。守运各军早夜修防，尚无疲倦，较穷年追逐者劳逸饥饱略殊。忽令守，又忽令不守，是使军心惶惑也。""今使罢运防而另有制贼之法，臣必速罢，若更无可制贼，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战即战，尽人力以待事机。"③ 他坚持加固河防，还组织了三支各拥有万人以上的"游击之师"，紧追捻军。

东捻军的最后失败　东捻军虽然突破了胶莱河防线，但仍局处于运河与胶莱河之间，由于地域狭小，无从发挥流动作战的长处，粮食也日益匮乏。赖文光、任化邦等虽决心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缺乏明确的方向，行动慌乱。先是由莒州、日照南下江苏赣榆、沭阳等地，企图抢渡运河和六塘河。由于清军防守严密，进军受挫，于 10 月初复入山东。11 月初，东捻军突至章丘，准备北渡黄河，又被清军水师所阻，只得东走乐安（今广饶）、寿光、潍县就粮。11 月 12 日，东捻军在潍县松树山与刘铭传部仓促接战，损失惨重。赖文光、任化邦等率军南下江苏，拟再次抢渡运河和六塘河。11 月 19 日，当刘铭传部尾追至赣榆时，捻军进行反击，遭淮军抄袭后路，再次大败。此战，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贵升枪杀。任化邦是后期捻军重要首领之一，擅长指挥骑兵作战，为清军所畏惧。他的牺牲，是东捻军的重大损失。

赖文光在任化邦牺牲后，率部折回山东，因连遭失利，力量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282，第 18 页。

② 曾国藩：《复李少荃宫保》，见《捻军》（五），第 333 页。

③ 李鸿章：《不罢运防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2，第 9 页。

大减，加上饥寒交迫，人困马乏，士气日益低落。12 月，当捻军在寿光、昌邑、潍县避敌就粮时，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又相继追来。24 日，东捻军在寿光的北洋河与弥河之间的滨海地带与清军背水决战，伤亡近 2 万人，被俘近万人，精锐丧失殆尽，首王范汝增等壮烈牺牲。之后，赖文光率余部四五千人由昌乐南下诸城、日照，走江苏赣榆、宿迁。31 日，在抢渡运河失败后，即转兵东向，前队于 1868 年 1 月 1 日夜由沭阳城南张家湾突破六塘河防线，进入清江浦境内，但后队未及渡河即被清军歼灭。渡过六塘河的捻军由于不断遭到清军堵击，减员愈来愈多，余部千余人于 1 月 5 日在扬州东北的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击败，赖文光不幸被俘。至此，东捻军最后失败。赖文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领导捻军继续坚持反清战争，被俘后严词拒绝敌人的劝降，英勇就义于扬州城外，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

五、西捻军转战陕西、直隶等地及其最后失败

（参见附图 16）

（一）进军陕西，与回军联合作战

十里坡大捷　1866 年 10 月，捻军分为东、西两军后，西捻军约有 3 万余人（一说五六万人）在张宗禹、邱远才、张禹爵等率领下，由豫东经许州、洛阳、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绕过潼关，于 11 月 9 日进入陕西华阴县境。西捻军入陕，陕甘回民起义军深受鼓舞，在甘肃的宁州（今宁县）、泾州（今泾川）等地袭击清军，配合西捻军在陕西的作战。这时，原陕西巡抚、留陕督办军务的刘蓉正率 1.4 万余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军。当他得悉西捻军入陕后，即向清廷告急说：“西回东捻，两路同窜，欲防则无迎击之旅，欲剿则无守隘之兵。”① 请求速派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261，第 15 页。

援军。清廷在西捻军入陕前，已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乔松年为陕西巡抚，西捻军入陕后，又命鲍超率所部湘军入关追击。可是，左宗棠正在湖北调集部队，筹备粮饷，难于迅速入陕；抢掠成性的鲍超部因西北地瘠民贫，不愿前往，清廷只得改令提督刘松山部老湘军替代。清军援兵不能很快入陕，为西捻军的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刘蓉在援兵未到之前，不得不将清军东调，对付西捻军。11月14日，提督刘厚基率兵3000余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一触即溃，败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成三路再次发动进攻，又被设伏于华州敷水以东的捻军击败。西捻军乘胜西进，于12月14日前锋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待各路清军纷纷回顾省城时，捻军又折向东南，占领蓝田县属的泄湖、蓝桥等地。为调动疲惫跟追的清军，复东趋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旋又北走渭南，迅速西进。1867年1月21日，前锋迫近西安的韩生冢，以主力二三万人埋伏于西安以东的十里坡附近村堡，并派部分兵力东出灞桥诱敌。刘蓉以捻军再次兵临西安，便驱军猛追，于23日抵灞桥。捻军与敌稍一接战，即向十里坡后撤。湘军紧追不舍，提督杨得胜部首先抢占十里坡，总兵萧德扬等继至。当湘军进入捻军设伏地域后，捻军诱敌部队立即回马反击，伏军步队从两旁杀出，马队从两翼包抄，将敌四面包围。时值风雪交加，湘军士卒冻饿难忍，无心作战，火药又被雨雪沾湿，影响点放。捻军勇猛冲杀，不到半天时间，阵斩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和总兵萧德扬等湘军将领，歼敌3000余人，收降数千人，取得了入陕以来的一次大胜利。

捻军与回军联合作战　十里坡之战后，清廷将刘蓉革职，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并催促刘松山部湘军和总兵郭宝昌部皖军兼程入陕。当时，西捻军已乘胜包围了西安城，甘肃东部的陕甘回军亦东进陕西，与西捻军声势联络。巡抚乔松年固守西安待援。西捻军围城月余未克，打援又失利，遂撤离西安，沿渭河南岸西走，3月24日在郿县（今眉县）以西渡过渭河，进入

扶风、岐山交界的益店，与由凤翔东进的回军取得联系。但正当捻、回军准备分路东进之际，皖军郭宝昌部已从三原向咸阳西进，湘军刘松山等部亦已渡过渭河，向捻军、回军逼近。4 月 19 日，临平镇（今乾县西南）一战，捻、回军失利。5 月初，捻、回两军扎营于同州北的许庄一带，将前来进攻的刘松山部包围，毙伤湘军甚众。接着，捻、回两军又挥师西进，从兴平南渡渭河，再次进攻西安。5 月 27 日，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援兵赶到，捻军在西安城南的山门口、木塔寨等处作战失利，损失较大。张宗禹等遂率军东走蓝田，继又转战于临潼、渭南、华州一带。

（二）左宗棠镇压捻、回军的方略与西捻军的对策

左宗棠的进攻方略与作战部署 1867 年 2 月 22 日，清廷授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专办陕甘军务，以按察使刘典为帮办。左宗棠在清廷一再催促下，率楚军近 2 万人，从 6 月中旬开始，分三路陆续入陕：左宗棠亲率 1.1 万人由樊城北上，西入潼关，以防西捻军东返河南；刘典率 3000 余人由樊城进荆紫关，经商州进入蓝田，阻拦西捻军南下湖北；提督高连升率 4000 人由樊城溯汉水西上，于蜀河口登陆，防止西捻军由陕入川。早在入陕之前，左宗棠就确定了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他认为“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①。从左宗棠的入陕兵力有限，西北地瘠民贫，粮饷运输补给困难，捻军、回军又缺乏紧密联系等情况来看，左宗棠的上述作战方略，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7 月 19 日，左宗棠抵达潼关，所部诸军也先后入陕，即以主要兵力对付西捻军，以部分兵力对付回民起义军。其具体部署如下：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高连升所部楚军共 2.1 万余人，为“剿捻之师”（高连升部为回民起义军所牵制）；以帮办刘典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 8000 人驻陕甘边界，为“剿回之师”；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

---

① 左宗棠：《答杨石泉》，见《捻军》（六），第 108 页。

凤翔、宜君、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上述各部清军共约4万人，装备洋枪洋炮。当时，西捻军虽有数万之众，但除老弱妇孺外，能战之兵仅万余人，武器装备也处于劣势。

西捻军转至陕北，东渡黄河　8月，西捻军盘旋于蒲城、富平、三原、泾阳一带。这一地区南有渭水，西有泾水，东有洛水、黄河，北面则是山区，不利于捻军骑兵纵横驰骋。当左宗棠正与其所部将领策划将捻军消灭于渭河北岸的泾、洛两水之间时，西捻军为了摆脱清军的包围，决定向陕北转移。10月24日，由蒲城东南一带北上白水，向中部（今黄陵）、洛川进军，进入陕北地区。

左宗棠估计进入陕北的西捻军可能由甘泉折向东南，然后“南趋韩城出山，否则俟冰桥结成，渡河犯晋”①。其侧重点仍是防止捻军“南趋韩城出山”。为此，他命令刘厚基率部结营于宜川甘草坪，堵扼西捻军南下韩城；命刘松山、郭宝昌各率所部由洛川北进，跟踪追击。当得悉西捻军进至宜川、延长一带时，左宗棠预感到捻军“北窜延长、延川一路，渡河犯晋，实为大局攸关”②。为此，立即作了如下部署：以刘松山、郭宝昌、刘厚基等部沿黄河西岸进行堵截；以刘典、黄鼎等部扼守同官（今铜川市北）、宜君、洛川等地，既防捻军由西南出山，又防回军东进联合捻军；以高连升等部在鄜州、甘泉、延安、绥德一线堵截捻军北进；黄河河防由山西按察使陈湜负责；企图将西捻军围歼于黄河西岸的狭长地带。

11月14日，刘松山、郭宝昌部由中部东渡洛水，向宜川进发。刘部后队在中部大贤村突遭回军截击，迫使刘、郭率部回援。西捻军乘机北占延川，进向清涧，并于22日配合回军攻占绥德。各路清军遂纷纷北上绥德、榆林、神木和山西的保德、河曲等地，致使宜川一带黄河沿岸的设防空虚。这时，气候骤冷，黄河结冰。张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87，第22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咨札》，清光绪十六年刊本，卷9，第59页。

宗禹乘机率西捻军急速南下，于12月17日进至宜川境内的黄河西岸。当晚，由张禹爵率500人为先锋，张宗禹率大队随后，在宜川东面壶口一带履冰过黄河，顺利进入山西，打破了左宗棠围歼捻军于陕北的计划。

（三）挺进直隶，转战鲁、豫

由山西进入直隶　西捻军突破清军黄河防线后，乘胜占领山西吉州（今吉县）、乡宁，接着南下河津，围攻稷山县城。这时，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已过河跟踪追击。西捻军于12月24日撤稷山之围，由绛州（今新绛）北进临汾、洪洞。当刘、郭等部清军追来时，突然转兵南下，途经曲沃、绛县，于1868年1月初越过中条山，进至河南济源城下，然后经修武、新乡、汤阴、临漳渡过漳河，进入直隶境内。接着，经磁州（今磁县）、鸡泽、隆平（今隆尧）、新河北上，于2月1日在束鹿所属的周家庄渡过滹沱河，复经定州（今定县）、望都北进至保定、满城一带。

西捻军突然出现在直隶南部，使清廷慌了手脚，连下谕旨，调兵遣将，防卫京师。于是，各地“勤王”之师接踵赶来：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军进入直隶雄县一带；河南巡抚李鹤年率部抵磁州；左宗棠率部于2月15日抵达直隶获鹿，接着扎大营于定州，被清廷任命为前线总指挥。李鸿章因未能总揽攻捻大权，军行迟缓，经清廷严诏催促，才命潘鼎新、周盛传、周盛波、善庆、郭松林、杨鼎勋等部先后进入直隶景州（今景县）、安平。此外，安徽清军也进入直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枪队布防天津；直隶总督官文率部往援保定；连警卫圆明园的马队也调往涿州防剿。集结在直隶中部、南部的清军共约10余万人。为了弥合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矛盾，清廷于2月底命恭亲王奕䜣为大将军，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各路统兵大臣及督抚等均归恭亲王节制，以一事权。

西捻军的上述行动，虽然震惊了清廷，却使自己陷入了被清军重兵包围、孤军作战的困难境地。2月5日，西捻军于满城为道员余承恩部所败，东南走祁州（今安国）、饶阳。3月16日，因连

日奔驰，疲惫不堪，疏于戒备，在饶阳东北一带遭清军袭击，伤亡很大，淮王邱远才、幼沃王张禹爵牺牲，使士气大受影响。

转战豫鲁　为了摆脱清军重兵围困，张宗禹率军南走，于3月18日从晋州西南的桃园、相古村等处渡过滹沱河，经宁晋、新河、巨鹿，于3月23日在成安渡过漳河，进入河南，然后经滑县、新乡、获嘉进至清化镇（今博爱）。在这里，捻军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把步兵全部改为骑兵，使部队行动更加迅速，同时补充了军械物资。

这时，淮军已赶到豫北，李鸿章正想北依太行山，南据黄河，实施其围困计划，幸好张宗禹等及时察觉到“怀、卫一带，阻山（太行山）面河（黄河），地势至狭，恐被围困”①，便很快撤离清化镇，东出延津平原。4月1日，在封丘大败湘军刘松山部、皖军郭宝昌部，重伤郭宝昌，毙记名提督周盈瑞。4月12日，又与潘鼎新、杨鼎勋、郭松林等部战于滑县，杀淮军提督陈振邦、副将刘正同等。之后，经浚县、内黄、直隶清丰、南乐之交进入山东莘县。活动于东昌府（治今聊城）一带的沧州下洼、高家口盐民起义军数千人，在其首领高岩率领下，参加了捻军，并充当向导，引导西捻军于4月17日从东昌府南李海务渡过运河。4月下旬，经德州、沧州，兵锋直指天津。

西捻军逼近天津，恭亲王奕䜣即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枪队加强防卫，命绥远将军定安、副都统富和、提督郑魁士各率所部增援天津；命侍郎恩承、副都统玉亮所部赶赴武清（今杨村）设防；并指使崇厚通知英、法等国炮艇协同防守天津。西捻军在独流镇、杨柳青等处用船搭桥抢渡运河，因遭洋枪队密集炮火封锁，无法前进，遂于4月末南下山东就食。

（四）在直隶最后覆没

西捻军领导麻痹轻敌　西捻军进入山东海丰（今无棣）、阳信、武定（今惠民）地区后，虽然便于解决粮饷问题，但这一地区东

---

①《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306，第29页。

濒大海，南有黄河，西有运河，易被敌人围困。当时，西捻军应及时率部跳出清军重兵集结的直、鲁边区，向敌人守备薄弱而又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区转移。张宗禹等之所以虑不及此，除了急于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外，主要是轻敌思想作怪，认为清军虽“千里连营”，但指挥不统一，等到“秋高马健”时，只要振臂一呼，就可突破清军的河防。① 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早突围，脱离险境，结果造成悲惨的结局。

李鸿章实行“就地圈制”之策　这时，清军各部共十余万人，先后到达运河东部的直、鲁地区。清廷命李鸿章为前线总指挥，调度各军。李鸿章按照其“设长围以困之”的“就地圈制”计划，作了如下部署：北面，将沧州以南的捷地坝挖开，引运河水入捷地减河，并沿河兴筑长墙，由崇厚洋枪队和潘鼎新部防守，阻扼捻军再次北上，威胁津京；西面，于张秋一带引黄河水入运河，并沿运河赶筑长墙，由河北、山东、安徽等省清军分段负责，附近州县的民团协防，又调总兵丁长春部水师炮船进驻德州，加强水面巡逻，严密防守；南面，封锁黄河各渡口，将船只一律调至南岸，由山东地方官吏带队把守；东面，严禁渔船下海，防止西捻军渡海而走。同时，调战斗力较强的湘、淮军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

5 月中旬，张宗禹由于不知沧州捷地坝已被挖开，且有重兵把守等情况，仍然企图强渡捷地减河北上，结果受阻而返。下旬，张宗禹又率军抢渡临清、东昌等处运河，又为驻防清军所败。为了摆脱追军和出敌不意，捻军东进海丰。5 月 29 日，疾驰至直隶东光的下口镇再次抢渡运河，由于丁长春部水师及该处清军把守严密，仍然无隙可乘，不得已再次南返山东。

陷入重围，惨遭覆没　西捻军被围困在方圆六七百里的地区内，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几次抢渡运河均遭失败，虽然把清军拖得疲累不堪，甚至李鸿章、左宗棠等也因未能完成清廷下达的

---

① 《涡阳县志》，《捻军》（二），第 107 页。

一个月内消灭捻军的任务而被“交部议处”，但整个形势对西捻军愈来愈不利。由于连续下雨，河水猛涨，道路泥泞，以骑兵见长的捻军行动更加困难，而清军的炮船却更便于行驶，配合步队围攻捻军。同时，李鸿章又实行“缩地围扎”的方针，把捻军压缩在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的高唐、商河、惠民等地的狭长地带，并进一步施展“招抚”伎俩，加上当地地主豪绅实行坚壁清野，强迫村民搬入堡寨，使捻军的食宿发生困难。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捻军士气日益低落，以致接连发生投敌事件。

7月16日，西捻军在直隶吴桥（今吴桥东）遭周盛波、周盛传部伏击，伤亡1000余人。26日，与郭松林、潘鼎新部战于山东商河东北的沙河镇，被杀被俘三四千人，张宗禹也中弹受伤。31日，在济阳玉林镇、鸿福寺与豫军张曜、宋庆部和淮军潘鼎新部发生激战，因地处黄河弯曲部，骑兵行动不便，结果又遭惨败，将士阵亡六七千人，损失马匹上万，辎重丢弃殆尽，张宗禹率余部突围。威震一时的西捻军，至此已成强弩之末。

8月4日，西捻军余部在德州的桑园、二屯、老君堂等处抢渡运河，均未成功。8月15日，在东昌的李海务口再次抢渡，又被清军所阻，退往茌平西南广平镇。8月16日，在向东北方向转移途中，与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袁保恒、张曜、宋庆等部遭遇。经激战，张宗禹的爱子张葵儿、兄张宗道、弟张宗先等数千捻军将士全部英勇牺牲。被称为“沉静好谋”的新捻军重要首领张宗禹，率领18骑突围而出，来到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①。

西捻军在徒骇河边的覆没，标志着坚持16年的捻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六、捻军的战略得失评析

捻军之所以能坚持长期的战争以及最终惨遭覆没，固然有多

① 《涡阳县志》,《捻军》(二),第108页。

方面的原因，但都与捻军领导者的战略指导密切关联。这里，对捻军的战略得失作一简要的评析。

（一）关心群众疾苦，纪律严明，得到人民支援

捻军的基本成员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怀有刻骨的仇恨，因而不仅具有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而且非常关心民众的疾苦。捻军纪律严明，军行所至，不扰民害民，还将地主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所以深得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不但可以“因地为粮”，而且一些著名的战役战斗，如高楼寨、十里坡、罗家集之战，都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取得胜利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竭力推行保甲制度和坚壁清野政策，千方百计隔绝捻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捻军和群众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捻军之所以能坚持长期的战争，是与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

（二）实行与太平军联合作战以至合编的正确方针

自 1859 年开始，张乐行、龚得树等所部捻军与陈玉成、李秀成所部太平军实行联合作战。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捻军来说，当雉河集等地被清军占领后，由于得到太平军的支援，得以在淮河沿岸重新立定脚跟，继续坚持斗争。对太平军来说，捻军在淮河沿岸的活动，牵制了自淮北南下的清军，使陈、李两部得以比较放手地分别对付由湖北东进的湘军和天京外围的清军。正是由于互相配合作战，使安徽战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张宗禹、任化邦等部与赖文光、邱远才的太平军余部实行合编，组成统一领导的新捻军，这一决策也是非常适时和正确的。如果仍然各自为战，将很难继续坚持斗争达 4 年之久。

（三）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新捻军，实行合围兜剿，而捻军武器装备低劣，且又孤军作战。在这种不利情况下，捻军领导者决定“易步为骑”，实行大规模的运动战，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使清军的枪炮优势难以发挥，同时也弥补了捻军武

器装备方面的劣势。实行运动战的结果，使捻军在战略被动中取得了战役战斗的主动权，打了不少漂亮的歼灭战，消耗了清军的有生力量，挫伤了清军的士气。捻军的这一作战形式，与同时期的农民起义军偏重于城市攻防作战相比较，确实是谋高一筹。尽管后来东、西捻军先后被围失败，但是，如果不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而是打堂堂正正的阵地战，无疑将会失败得更快。

以上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捻军得以坚持长期战争的重要条件。

（四）眼光短浅，组织松散，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捻军的领导者政治眼光比较短浅，没有明确提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农民政权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捻军“装旗”出征，主要是为了获取钱粮物资，目的既达，便返回故乡，各自归家。这种“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军队的组织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此外，捻军的成员既受小生产者的无组织、无纪律性的影响，又受宗族和地域观念的束缚，因而各种不同旗色的捻军，长期“各统其众，各居其巢”①，独立战守，互不统属。雉河集会盟，反映了部分捻军首领认识到联合作战的必要性，对于改变分散状态起到了一定作用，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几支不同旗色的队伍长期共同行动，协同作战，实属难能可贵。但是，作为盟主的张乐行却提不出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效措施，甚至在处理内部矛盾时简单从事，以致始终未能把淮北的各支捻军统一起来，在统一的部署下，协调一致地行动。雉河集的失守，以至最后无法在淮北家乡立足，都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迨至后期，虽然统一了组织和领导，但仍然存在时分时合，松散不团结的旧习。至于与陕甘的回军，则由于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更难实行亲密无间的联合行动。

（五）忽视战略基地的建设

捻军虽然经常活动于皖、豫、苏、鲁边地区，但始终没有使这些地区联成一片，建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基地。由于

---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127，第 17 页。

捻军领导者受流寇主义思想的影响，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致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尤为失策的是，捻军首领们对淮北家乡反动团练武装的日益发展和捻军所占地区不断缩小的严重情况，竟熟视无睹，仍然不断“装旗”出征，顾外而不顾内，结果在僧格林沁军和团练的联合进攻下，遭受重大损失，被迫离乡他走。在后期，捻军实行流动作战，虽然歼灭了僧格林沁军，并屡败湘军、淮军，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部队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必要的休整补充，使自己陷入日益被动的境地，终于在优势敌人的围堵下遭到失败。

（六）东、西捻军分兵作战，难以实行战略协同

赖文光、张宗禹等决定将捻军分为东、西两支，是战略指导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当时，捻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处于优势清军的围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分出一支部队前往远离中原战场的西北地区，使两支部队之间无法实行协同作战，既分散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又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捻军应该集中兵力对付清军，最多只能实行近距离的分兵，即以部分兵力用于牵制据守点、线的清军，主要兵力用于寻找机会，逐一歼灭尾追之清军。坚持实行这种战法，积以时日，尚有可能改变战场上的被动不利局面。如不用此策，则应集中兵力及早入川，利用当地的山险、人民的支援和清军薄弱等有利条件，开辟一个新的地区。这样，坚持斗争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赖文光曾率太平军到陕西活动，当清军围攻天京时，终因距离过远而无法救援。但他没有接受这一教训，仍然决定分兵入陕，而且还认为这样可造成“犄角之势”，实在是战略眼光短浅的表现。

上述战略失误，是导致战争失利和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

七、捻军的军制

萌发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兴起于 19 世纪 50 年代，转战于皖、豫、鲁、苏、鄂、陕等地的捻军，在军制方面虽有其自己

的特点，并在战争实践中有所变化，但就正规、严密程度而言，则远逊于太平军。

（一）军队的编制体制

19 世纪 50 年代初，在太平军北伐军的影响下，捻军发展迅速，活动频繁。但是，仍处于“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状态，甚至连相对固定的编制都没有。捻军之真正具有军事组织形态，则是在雉河集会盟以后。当然，也还是相当松散的。

1855 年（咸丰五年）秋，豫皖边的许多捻军首领齐集亳州（今亳州市）的雉河集（今涡阳县）山西会馆，举行了在捻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史称“雉河集会盟”。会上公推张乐行为“大汉盟主”①，立国号为“大汉”，祭告天地，颁行布告，并确立了五旗军制：

盟主之下设立总旗，以黄、白、红、蓝、黑五色旗来区分队伍，其中以黄旗为最尊，依次为白旗、红旗、蓝旗、黑旗。每一色旗设一总旗头，称大趟主。黄旗由张乐行自兼，龚得树领白旗，侯士维领红旗，韩老万（又叫韩奇峰）领蓝旗，苏添福领黑旗。五色旗之外，尚有八卦旗（旗主为杨兴泰）、大花旗（旗主为雷雁）、小花旗（旗主为李延彦）、绿旗（旗主为尹如清）。这些杂旗由于人数有限，都称不上总旗。

总旗之下设有大旗，为捻军的独立单位，可单独进行活动，旗主称为趟主。大旗的数量及编制人数均不固定，有时人数特多的大旗旗主也有称大趟主的。为使各大旗便于识别，在每色旗外镶以五色旗边，或在旗中镶以五色圆心，旗形有长方形、方形、三角形等，此外还有不同颜色的飘带。有时，趟主可以自己改变旗形旗色，如涡阳北的程炳宏，原属白旗，因与旗主闹意见，即自行在白旗上加了一道红边。也还有在此地打黑旗，在彼地打花旗的。

---

① 《张乐行自述》称“大汉永王”，《豫军纪略》称他为“大汉明命王”，据已发现的布告应是“大汉盟主”。

大旗之下为小旗，是捻军的基层单位。小旗的数量及人数也不固定，自十余人至数百人不等。小旗大多是步骑兵混编，步兵多，骑兵少。有时抽调各小旗的骑兵，集中编组，抄袭敌人。淮北捻军还有水营组织，但具体编制不详。

总之，捻军的编制无定额，人员不固定，组织十分松散，各大旗有很大的独立性，张乐行名为盟主，但无任命大趟主之权，亦很难行使统一指挥之权。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捻军各旗多以同族同姓人组成。如张乐行的黄旗官兵都是张姓同族，号称“九里十八张”。龚得树一族号称“九里十三龚”。侯士维一族号称“九里十三侯”。苏添福是河南永城人，同族人即有100多个村子。这种由同族同姓之人组成的部队，一方面以陈旧的宗族观念为纽带维系内部团结，实行族长、家长制统治；另一方面与异姓部队之间容易产生排外性，彼此互不合作，难于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捻军一般都未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张乐行驻扎雉河集期间，他的周围有几十人，大多是他的同族、亲戚和故旧，统称为枪手或打手，负责警卫和传达命令等工作，个别办理文书的则称之为先生。另据《豫军纪略》说：捻军除分五色旗外，尚“僭称王号，伪刊玺文，设伪军师、司马、先锋名目”①。其附录名单中，还有“左营总目”、“前哨总目”等名称，“司马”又分左、右，“军师”实为谋士。如此说属实，则有些捻军的组织机构是比较健全的。

1856年冬，雉河集等地被清军攻占，捻军首领张乐行等率部南下重占淮河流域的商业重镇三河尖，旋于1857年3月初与太平军会师，并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封号，如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龚得树被封为征北正总提，韩老万被封为扫北侯。捻军在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时，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特制度，并未按太平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大部分捻军仍然打着五色旗号。

1863年春，清军僧格林沁部攻占淮北，捻军损失惨重，张乐

---

① 《豫军纪略》，《捻军》（二），第300～303页。

行等许多捻军首领牺牲，在张宗禹等领导下突围而出的部分捻军，于 1864 年 11 月与赖文光等率领的太平军余部合并改编，组成了一支新捻军。这时，捻军的组织有了一些变化。一是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二是在编制方面作了若干变更。有的史料记载："同治六年（1867 年），捻首任柱、赖文光等复率众 20 余万东窜。其部伍旗分五色，更互进退。共 12 大旗，每大旗辖 50 小旗，每小旗统众 500，分为 10 馆，每馆 50 人，而数不尽拘。"① 还有的史料记载：清军在战斗中曾"擒管带外五营捻首王凤池……张九等"②，"生擒任逆（即任柱）外五营贼目潘债一名，并其党十余人"③，又有"伪内五营头目李宗诗率马贼五百余名降"④。诚然，这些史料未必完全真实可信，但仍然可以说明，捻军在 1864 年以后确实进行了整顿，实行了定编定额制，组织上较前正规和严密了。同时，也能说明合编后的新捻军，仍然没有改变五旗军制，史料中所称的内五营、外五营，可能是一部分小旗的别称，或是小旗内划分的组织形式，其带兵官有可能称为管带或带队。

捻军与太平军合编后，在兵种建设方面，主要是减少步兵，增加骑兵。与此相适应，在作战形式方面，进一步发挥了流动战的特长。时人曾记载说："昔日之捻，装旗有时，众皆乌合，今则飘忽不定，习于斗争，其难一。昔日之捻，多属徒行，又鲜火器，今日熟于骑战，且多洋枪，其难二。昔日之捻，尚恋乡井，饱掠则归，今则不据巢穴，流窜靡已，其难三。"⑤ 由此可见，捻军加强骑兵建设，实行流动作战，其方向是正确的。

现将《捻军旗表》转载于后⑥。

---

① 《莱阳县志》，《捻军》（三），第 479 页。

② 《豫军纪略》，《捻军》（二），第 438 页。

③ 《淮军平捻记》，《捻军》（一），第 174 页。

④ 《求阙斋弟子记》，《捻军》（一），第 66 页。

⑤ 潘骏文：《平定捻匪策》，见《捻军》（一），第 395 页。

⑥ 参见《安徽师大学报》1985 年第 2 期载，池子华：《试论捻军旗制》。

捻军旗表（简）

旗　色	旗　主	别　号	住　址	备　注
黄　旗	张乐行	老　乐	张老家	捻军盟主，太平天国封沃王，1863年被僧格林沁杀害。
同　上	张敏行	老　闯	同上	张乐行次兄
同　上	张宗禹	小阎王	张大庄	太平天国封梁王
黄旗白边	尹自兴		尹家沟	
黄旗红边	杨玉山		石弓山	降清
黄旗蓝边	张慎德	头号雪	曹市集	降清
黄旗黑边	张胜选			
白旗黄边	龚得树	瞎　子	公吉寺	太平天国封征北正总提，1861年在松子关战斗中牺牲。
白　旗	江台陵	老　台	江集	降清
白旗白边	程大伟	大老砍	同上	1863年雉河集保卫战中战死
白旗红边	孙葵心	老　葵	孙老家	1860年在挂车河战斗中牺牲。
白旗蓝边	葛树宾	大　牛	西阳集	
白旗黑边	王怀义		孙　集	捻军叛徒，为张宗禹处死。
红旗黄边	侯士伟	老　士	侯老营	为张敏行所杀
红　旗	张振江	正　江	张单楼	
同　上	王万一	胡椒大王	王大庄	1856年被杀于龙山集
红旗白边	田　献		永　城	
红旗红边	邹焕林	邹　万	邹志楼	
红旗蓝边	王大位		同　上	
红旗黑边	周名甲		同　上	
蓝旗黄边	韩奇峰	老　万	大韩庄	据说到天京封为扫北侯
蓝　旗	任　柱	化　邦	檀城集	太平天国封鲁王，1867年被叛徒杀害。
蓝　旗	赖文光		广　西	太平天国遵王，东捻领袖
蓝旗白边	杨瑞英	杨　二	高炉集	降清
蓝旗红边	葛春元		西阳集	
蓝旗蓝边	张　龙	元　龙	龙亢集	太平天国封钟天福，降清

旗　　色	旗　主	别　号	住　址	备　　注
蓝旗黑边	刘天福		顺河集	降清
黑旗黄边	苏添福	老　天	苏平楼	1863年为僧格林沁所杀
黑　　旗	赵浩然		永　城	1863年为僧格林沁所杀
黑旗白边	李如梅		西阳集	
黑旗红边	邓作仁	老　作	赵屯集	1863年为僧格林沁所杀
黑旗蓝边	王贯三		王　楼	1855年战死于三河尖
黑旗黑边	刘玉渊	二老渊	义门集	太平天国封殿前指挥，1863年在张家堡战死。
绿　　旗	尹如清	二大王	尹家沟	据称被张乐行封为扫北燕
八 卦 旗	杨兴泰		下张桥	1862年战死
大 花 旗	雷　彦		雷　寨	
小 花 旗	李延彦		芦家庙	

（二）军队的纪律

捻军的组成人员相当庞杂，除贫苦农民、矿工、船夫、渔夫、手工业工人外，尚有白莲教徒、乡勇、变兵、衙役、捕役、盗贼。这些人大多被生活所迫参加捻军，但也使捻军沾染了不少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和散漫习气。加之捻军组织比较松散，并有浓厚的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要求捻军制订处理对内和对外关系的严格的纪律，方能遂行战斗任务。在这方面，作为捻军主要首领的张乐行，应该说是注意到了的，并为此作了一定的努力。1855年，张乐行被推为盟主后不久，即发布告示宣称："本盟主每次出兵，必传集各旗主，谆谆诰诫，禁止抢掠，严缉奸淫。贫民衣粮，不准扒运。到处出示，有犯必诛。又虑防疏，致遭扰害，现派数百巡查，时刻严稽，凡我兄弟，已经各遵约束，料无违犯。"①与此同时，张乐行还发布了《捻军行军条例》②，具体内容如下：

1、兵到之处，污淫妇女立斩。

---

①②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2～245页。

2、强奸幼童立斩。

3、掳掠妇女幼童，隐藏不献者立斩。

4、不遵号令约束者斩。

5、小卒无理持械敢拒首领者斩。

6、临阵故意漏下，支吾打粮，私自下乡找寻财物，淫人妇女者斩。

7、无号令私自打粮者斩。

8、对敌时私自逃走者斩。

9、起身听三声号炮齐集，未放炮而先行（者）斩，既放炮而后行者斩。

10、营中私自放火者斩。

11、行路时故意下路者斩。

12、行路各守分队炮车，先行后行者杖四十。

13、扎下营盘，外更、门更，排班轮流，有错更者杖四十。

14、营中无故伤人命者一人一抵。

15、借宿朋友家，本宅非吃食物件妄取一物，杖四十。

16、私造谣言者斩。

17、虚报军情，酌议定罪。

18、守营妄动者斩。

19、打胜仗得枪炮子药，分派公用；私为己有者，酌律定罪。

上列布告及行军条例说明，捻军的纪律是相当严格的。从实践中观察，捻军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是比较好的，所以能在残酷的反清战争中，在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打了不少胜仗。但在内部纪律方面，虽有“不遵号令约束者斩”等规定，实际上不服从指挥调动，各自为战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与太平军余部合编以后，各自为战的现象有所减少，但也没有完全解决。

（三）军队的武器装备

捻军使用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有少量鸟枪、抬枪。从行军条例中“行路各队分守炮车”的记载来看，已配备有土炮或旧式火炮。到了后期，捻军的火炮和洋枪逐渐增多，但少于后期的

太平军。另外，从后期捻军重点发展骑兵，进行快速流动作战来看，其重武器的数量也不会太多。至于究竟占多大比例，如何编配，至今尚未发现这方面的史料。

捻军的武器种类繁多，冷兵器有大刀、齐头镨、长矛、盾牌等，火器有鸟枪、抬枪、火箭、火枪、洋枪等，攻城器械有云梯、吕公车。此外，还有水战用的战船。

齐头镨是淮北农民割麦用的一种农具，其刃较锋利，且备此农具者甚多，故起义时即将它当作武器。长矛，捻军叫竹杆标，也称苗杆。“所谓苗杆者，即一丈数尺之青竹，竹根极秒，粗细均匀，外绕夏布，加漆，杆端有极锐之利刃，俗称为苗子，盖即古之丈八蛇矛也。”① 这种竹杆标在捻军中使用最为普遍，其特点是在矛头的后部有两个向后弯曲的倒钩，刺入敌人腹部后，再向后一拉，即可钩出肠子，致其死命。捻军在战场上发号司令的号角，用的是“海螺”，约一尺长，四寸粗。捻军使用的火器几乎全部是作战中缴获的，未见有自造的记载。水上作战用的炮船、炮划，也是从敌人处缴获的。据说炮划可容数十人，首尾 8 楫，上装火炮，进退便捷，是一种轻型的炮船。另外，还有一种名叫舴艋的战船，上装抬枪，行驶亦较便捷。但与装有洋炮的湘军战船比较，则相差甚远。捻军的武器装备与清军尤其是与淮军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是最后受制于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军队的物资供应

捻军所需的枪炮、粮秣、衣物、银两等，主要是从战场缴获和迫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不法巨贾缴纳。捻军行军条例规定：“打胜仗得枪炮子药，分派公用；私为己有者，酌律定罪”，“临阵故意漏下，支吾打粮，私自下乡找寻财物，淫人妇女者斩”。从中可以看出，捻军在战斗中缴获的一切物资，都先交公然后统一分配。打粮亦必须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前期，捻军每次出征完成打

① 顾恩瀚：《竹素园丛谈》，见《捻军资料别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48 页。

粮任务后，即将所获物资运回家乡，再行分配，分配的原则是：骑兵二份，步兵一份。一般情况下集体不储备军粮。由于捻军各自为政的现象相当突出，军械和粮秣等物资的收缴和分配，是否切实按照《条例》的规定执行，是值得怀疑的。后期的捻军，由于长期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作依托，且始终处于清军追围堵截的情况下，因而粮秣等物资的补给，发生了很大困难。东捻军甚至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竟误入淮军重兵设防又不利骑兵作战的胶东半岛，最后全军覆没。古人云："用兵制胜，以粮为先。"后期捻军未能着意解决军粮这一带战略性的问题，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第二节　天地会起义战争

天地会系清代民间的秘密结社之一，相传始创于1674年（康熙十三年），最初活动于福建、台湾等地，后来逐步扩大到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地区。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名天地会；广东、广西又称"三点会"、"三合会"。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对内又称"洪门"。其支派有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等名称。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统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天地会在两湖、两广曾多次发动起义。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各地天地会纷纷响应，发动武装反清斗争，如1852年朱洪英、胡有禄领导的广西天地会起义（后在灌县建立升平天国），1853年黄威和黄德美领导的福建小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年陈开、李文茂等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后在广西浔州建立大成国）等。本节就其中在军事方面较有特色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和大成国反清战争分别予以叙述。

一、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

（一）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英、美等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我国产土纱、土布的销售日益受到排斥。上海开市3年以后，松江、太仓的土布市场削减大半，某些以纺织为业的农村，甚至陷入无纱可纺的境地。长江和沿海一带，由于外国轮船逐渐排挤木帆船的航运，使大批船夫失业。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填补鸦片战争的巨大消耗和大量赔款，满足封建官僚的挥霍浪费，不断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上海一带的漕赋，鸦片战争以后竟增加了二三倍，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也不断加重，农民每年的收获除缴纳租税以外，已所剩无几，终岁过着啼饥号寒的悲惨生活。

面对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劳动人民不断开展反抗斗争。在上海，掀起了反对外国侵略者为开马路、造洋房、建跑马厅而强迫人民迁移的斗争；青浦、嘉定、太仓、松江、南汇等县人民，则不断掀起抗粮、抗税、拒差和焚毁仓衙等斗争。这种日益高涨的反抗斗争，成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先声。

武装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上海小刀会由广东、福建、浙江和上海等7个帮联合组成，会员以小刀为标志，对外用“义兴公司”为代号，首领有刘丽川等，其成员由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船夫、搬运工人、城市贫民和游民组成。当上海及附近各县农民和失业水手等展开反抗斗争时，小刀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1853年（咸丰三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官僚、豪绅惊恐万状，刘丽川等便趁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一方面组织小刀会众加紧练习枪棒，一方面乘苏松太道吴健彰等通过福建、广东、宁波、上海等7会馆联名捐资和招募团练之机，派会

员打入内部，在反动武装中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青浦、嘉定一带农民反抗斗争的日益发展，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条件也就日趋成熟。

1853年8月17日，嘉定县南翔农民在该地小刀会首领徐耀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一度占领县城，捣毁县署，驱逐知县，放出被监禁的群众。9月5日，嘉定县的小刀会在周立春领导下，发动第二次起义，再次占领嘉定县城。当时，刘丽川等得知吴健彰企图把40万两白银运走，作为进攻太平军的军饷。上海小刀会首领便毅然改变原定于冬季起义的计划，决定于9月7日乘上海城内举行祭孔大典的机会，提前发动武装起义。当日清晨，头包红巾，腰缠红带，手持武器、旗帜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在守城卫兵的内应下，以突然行动从北门冲入城内，与城内会员会合，经过短暂战斗，即攻入县衙，杀死知县袁祖德。接着，又占领炮台，包围了苏松太兵备道衙门。吴健彰“像一只哀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拿出了他的官印”①，成了起义军的俘虏。但不久，在美国领事金能亨的帮助下，吴健彰乔装逃出上海县城。

起义军占领上海后，即以文庙为总指挥部，依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建立了“大明国”，年号“天运”。公推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林阿福为右元帅，潘起亮为飞虎将军。其他首领也封以将军、先锋等名号。起义军发布告示，揭露清朝官吏的种种罪恶，表明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同时，严申军纪：“不听号令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②起义军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群众的拥护，不少人自带刀矛参加革命队伍。

起义军为了巩固革命政权，扩大革命势力，立即由上海、嘉定分兵出击。至9月17日，先后占领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

---

① 〔法〕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0页。

② 《平胡大都督李示》，《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页。

等地，并一度进攻太仓，拟与太平军取得联络，后为清军所阻，退回嘉定。

为了取得太平天国的领导与支持，刘丽川等决定遣专使前往金陵，要求洪秀全速派大员前来上海主持军政大事，或遣大军前来接应。同时，宣布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革命政权“奉行太平王的法令”①，并于9月下旬改用太平天国年号，竖立太平天国旗帜，刘丽川也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但上述愿望未能实现，而清政府却纠集兵力开始对起义军发动进攻。

（二）上海城保卫战

起义军退保上海　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等县城后，不仅影响江南漕粮的海运和清军江南大营军饷的供应，而且使江南大营清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因此，清政府急忙从江南大营和江苏各地抽调兵勇2万人，命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率领，向上海及附近各县的起义军发动进攻，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1853年9月20日，清军一部由太仓向嘉定进逼，潜伏在嘉定城内的地主豪绅乘机纠集反动武装充当内应，配合进攻，起义军不得不于22日撤离县城。之后，一部分在嘉定以西农村坚持斗争，一部分经南翔退入上海。22日至27日，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的起义军也在清军和地主武装的进攻下撤离县城，退守上海。许乃钊随即率领各路清军进逼上海，北面推进到苏州河，在新闸一带建立北营，南面推进到黄浦江上游的卢家湾、小马桥一带，建立南营，以钳形攻势夹击上海城。另由吴健彰调遣广东红单船多艘，扼守吴淞口，并在黄埔江游弋。

这时，起义军虽然已由万余人减至数千人，困守孤城，但上海城垣高厚，并储有一定数量的粮弹，因而决心固守待援（等待太平军的到来），与清军斗争到底。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他们先

---

① 《北华捷报》第164、163期，《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62、57页。

后采取了如下措施。政治上，反复宣传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和铲除贪官污吏的革命主张，拘捕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和混进城内的奸细，以鼓舞和安定士气民心。经济上，宣布豁免地方捐税，动员各铺户照常贸易，并派人秘密从常熟一带购运米粮进城，实行配给制度，保障军需民食。军事上，大力动员群众参加战斗，并设女将军和“孩兵局”；在高大建筑物上开凿枪眼，各要地增设炮台，于城外深挖陷坑，设置铁蒺藜，并控制城东黄浦江及城郊的水陆要道；用土法自制火药、子弹，并通过购买和动员散勇上缴等办法多方补充枪支弹药。外交上，严正宣告起义军“与太平军已属一体，今日之中华实已与外邦并驾齐驱”，并斥责美国侵略者暗助清军，要求各国恪守中立。①

挫败清军的水陆夹攻　1853年10月初，围城清军连日从陆上水上向上海城内发炮轰击，并不断发起进攻。结果，均被起义军击退。11月9日，吴健彰以战船一队，混在外国军舰中间，发炮轰击东门外董家渡炮台。起义军不动声色，待敌船驶离外国军舰后，突然发炮还击，击沉战船1艘，重创两艘。这时，另一队清军战船开到，集中火力炮击起义军的5艘战船，将其全部击毁。随后，敌战船上的清兵登陆，企图占领东门外的炮台。起义军英勇抵抗，将其击退。在城东作战的同时，清军约3000人向上海县城的北门发起攻击。起义军沉着应战，待敌人缘梯登城时，突然开火，重创清军。

清军进攻失败后，便在城北宁波会馆墓地筑起一高与城齐的炮台，整天开炮轰城。同时，在城西秘密挖了一条通向城脚的地道，于1854年2月6日晨引爆火药，轰塌西面城墙，2000余清军从缺口冲入。起义军立即点燃火药袋和火罐，并用喷筒喷射火焰，封锁缺口。清军一片混乱，纷纷后退。飞将军潘起亮率200人乘势冲出城外，追杀清军，缴获大炮12门和许多抬枪，胜利返回城内。3月至4月，起义军多次主动出击，摧毁清军的营垒、炮台，

① 《刘丽川致各国领事函》，《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17页。

杀伤不少敌人，迫使其全部退出南郊，初步改善了防御态势。5月25日凌晨，清军又将小南门城墙炸开一个缺口，200名清军尾随几名外国兵冲入城内。起义军奋起反击，毙敌40人，将敌军逐出城外。配合清军进攻的外国战船，也被起义军击伤一艘，击沉两艘。以后，清军又多次挖地道攻城，均未得逞。

抗击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　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标榜“中立”的英、美、法侵略者，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挟清政府对他们在上海的侵略特权作出更大的让步，然后帮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军。当时的外国租界位于县城以北的洋泾浜地区，英、美、法领事以避免清军和起义军的炮火毁坏租界建筑物为由，曾禁止清军从北面进攻起义军，并对清军采取威胁态度。1854年4月4日，英、美军队以清军侮辱、袭击租界外侨为借口，向驻于泥城浜（今西藏中路）的清军发起进攻，清军不战而退。事件发生后，许乃钊立即派员向英、美领事求和，作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6月29日又与三国领事签订“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从而开创了出卖中国海关主权的先例。外国侵略者通过“泥城之战”，在租界地位、海关控制权等问题上获得了满意的结果，随即撕下“中立”的假面具，公开与清军勾结起来，镇压上海的起义军。

7月，清廷以“许乃钊督师上海，日久无功”，将其革职，吴健彰也被拿问，由吉尔杭阿升任江苏巡抚，节制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吉尔杭阿接任后，多次挖地道攻城，均以失败告终。后征得外国侵略者的同意，于10月至11月底，筑成一道东起黄浦江边、中经陈家木桥直至洋泾浜北岸护界河的围墙，隔绝县城与租界的交通，使起义军无法假道租界得到粮食与军火的供应。接着，法国舰队司令辣厄尔蓄意寻衅，借口起义军的炮火将危及外国人的安全，竟要起义军拆除洋泾浜南岸的炮台。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起义军的严词拒绝。12月14日，法国侵略者正式向起义军宣战。1855年1月6日晨，法国侵略军400人伙同清军一部向上海北门发动进攻，法舰“高尔拜”号和“贞德”号以及领

事馆附近的大炮同时猛轰，将城墙打开一个缺口。接着，250名法军首先突入城内。英勇顽强的起义军在潘起亮率领下，立即发起反击，使敌人前进受阻。法军慌忙打开北门，数千清军蜂拥而入，同样被起义军击退。此战，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共毙伤法军数十名、清军2000余名，取得了反击中外反动派联合进攻的辉煌胜利。从此，法军不敢力攻，惟配合清军加紧围城。

弃城突围与最后失败　起义军虽然粉碎了敌军多次进攻，但由于长期困守孤城，兵员、弹药的补充越来越困难，粮食问题更难解决，军民饥饿而死者与日俱增。2月16日，清军轰塌小南门城墙，冲入城内，法军也发炮助战。起义军忍着饥饿奋勇拚杀，虽迫使清军退走，但终因内无粮弹，外无援兵，势难继续坚守。于是，起义军决定弃守上海，于2月17日（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日）夜分路突围，约定到镇江与太平军会师。

起义军出城后，有的被清军截杀，有的散入租界。刘丽川率部由城西南冲出后，次日黎明到达上海西郊虹桥附近，与清军遭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潘起亮和少数起义军突出重围，到达镇江，参加了太平军。① 另一部分突围后，于1855年冬参加了江西天地会起义军。还有部分起义军散入南翔、浦东等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

（三）起义的意义与战略失误

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鼓舞下掀起的一次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比较有名的城市武装起义。它发生在我国沿海的重要商业城市和资本主义列强主要侵华据点之一的上海，不仅使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困难，而且使外国资本家的经济侵略受到严重影响。

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坚持奋战17个月，迫使清廷不得不

① 1861年底太平军攻克宁波，潘起亮以功封“衡天安”，任海关主官，后随太平军余部转战赣、闽，1866年在广东牺牲。

从江南大营先后抽调清军数千人，参加围攻上海的战斗，这就减轻了对天京的压力，间接配合了太平军的作战。他们在抗击清军围攻的同时，还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军的进攻，又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革命精神。

起义军的最终失败，从军事上看，主要是长期困守孤城的结果。上海县城虽然城墙比较高厚，但东濒黄浦江，北有外国租界和苏州河，西、南多河浜，地势低洼，无高山屏障，地理条件十分不利。在兵力对比上，清军数倍于己，外国侵略军也近在咫尺。处于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和条件下，起义军长期坚守孤城，显然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刘丽川等所以坚守上海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寄希望于太平军的援助，认为“纵本城面临困难，我南京太平天王决不忍坐视不救”①。但事实上，太平军占领金陵后，由于同时分兵北伐、西征，还要对付江南、江北大营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根本无力东顾，不可能给小刀会起义军以及时有力的支援。刘丽川等在待援无望，而自己的实力尚较雄厚的时候，本应毅然弃城突围，迅速转移到围城清军的侧后，以及清军兵力薄弱的苏南农村，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开辟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或主动向南京方面靠拢，与太平军密切配合作战。这样做，无疑地要比困守孤城主动得多，有利得多。这次起义的教训说明，城市的起义，如果没有附近农村的起义武装配合作战，是难于取得胜利的。

二、大成国反清战争

（一）广东各地的天地会起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

---

① 《刘丽川致各国领事函》，《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17页。

内加紧压榨人民，社会危机更趋严重。广东在鸦片战争中受害最深，战后分担的战争赔款又最重，因而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更为残酷。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许多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船民和无业游民，纷纷加入天地会组织，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尤其是1853年攻克金陵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东天地会会众，终于在1854年（咸丰四年）夏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854年6月10日（一说6月8日），东莞天地会首领何六等率众在石龙镇起义，17日占领县城，揭开了广东天地会起义的序幕。7月5日，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在石湾附近的大雾冈发动起义，随即占领南海县属的佛山镇（今佛山市）。接着，李文茂、甘先、周春等在广州北郊的佛岭、陈显良等在城东燕塘、林光隆等在省河（珠江）南岸纷纷聚众起义，关巨、何博奋等率领珠江船户起而响应，迅速形成了对广州的包围。起义者头裹红巾，或腰缠红带，自称“洪兵”，又称“红兵”、“红巾军”。

随着广州城郊天地会的起义，武装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广东全省，数月之内，攻克了40余座府、州、县城，并先后形成了几个中心地区。在广州附近地区，除上述起义外，还有花县、三水、清远、顺德、龙门、新会、鹤山等县的天地会起义。在西部的肇庆地区，由陈荣、伍百吉等率众起义，于8月5日在水勇内应下，一举攻占肇庆府城（今肇庆市）。在北部的韶州地区，首先由英德县的陈义和、乐昌县的葛耀明发动起义。后与其他起义军一起，三次围攻韶州府城（今韶关市）。在东部的潮州、惠州地区，由陈娘康、郑游春、吴忠恕、翟火姑等领导的起义军，积极活动于惠来、潮阳、澄海、普宁、揭阳和归善（今惠阳市）、博罗等地。此外，嘉应州、高州、廉州府属各县也有规模不等的起义。各地的起义军，大股有数万人，小股有数千或数百人，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和缺乏作战经验，为时不久，多数被清军和地主豪绅组织的团练各个击败。之后，有的起义军转移至湖南、江西，参加了太平军；有的转战于湘、粤、桂边境地区。而陈开、李文茂等领导的起义军，

先则围攻广州，后转移至广西，建立起“大成国”政权。在广西天地会起义武装配合下，坚持了较长时间的反清战争，成为当时遍布全国的各族人民起义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反清武装力量。

（二）围攻广州之战

双方作战部署　1854年7月，陈开、李文茂等率领广州天地会起义军围攻广州城。其部署是：陈开部以佛山镇为据点，由南向北进攻；李文茂部以佛岭市为主要据点，以萧冈、龙潭观等为辅翼，直逼北门；陈显良部以燕塘为主要据点，以三宝墟为后应，进攻东门；林光隆部驻省河南岸，牵制清军；关巨、何博奋的水军截击清军内河水师，断绝其水上交通。各路起义军的总兵力号称二三十万，实际约有10余万人，没有统一和正规的编制。部队除装备部分鸟枪、火炮外，大部分为刀矛等冷兵器。

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州城被包围形势下，一方面组织旗、绿各营和募勇添练，防守各城门、炮台和水陆要隘；另一方面奏请清廷速从福建、湖南等省调兵来粤会剿。为了打破起义军的封锁包围，叶名琛还无耻地乞求港英当局出兵救援。

广州城外的激战　7月18日，叶名琛为了先发制人，派出副将崔大同、游击洪大顺等率绿营兵3000余人，进攻北路起义军的据点江村。李文茂等闻讯，以一部兵力引诱清军，大部兵力依托佛岭市周围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当清军进至佛岭市前时，诱敌部队佯败后退，埋伏在周围的起义军突然冲出，与清军展开白刃格斗，阵斩崔大同、洪大顺等，歼灭大量清军。起义军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取得了初战的胜利。7月26日，叶名琛又派出兵勇约5000人再次对北路起义军的据点牛栏冈发起进攻。李文茂一面组织起义军进行正面阻击，一面派1000余人绕至清军背后，袭击敌人。经过激战，起义军再次将清军击退，毙伤不少清军。此后，起义军乘胜转入进攻，兵锋直逼广州城下。叶名琛不得不采取“以守为战，严密设防”的方针，并坐镇越秀山镇海楼指挥作战。

从8月初至9月初，东、北、西三路起义军分别发起攻城作战，企图先占外围炮台，进而攻入城内。但由于清军拚死抵御，起

义军又缺少威力大的火器，因而进攻一再受挫。起义军在连续攻城作战中，既不能正确估量主客观条件，又不讲求战术，一味盲目硬攻，结果，不但没有攻占一座炮台、一个据点，反使自己遭到不少的伤亡，攻击能力日益减弱，给尔后作战带来了困难。

起义军被各个击破　广州清军虽然击退了起义军的多次进攻，但叶名琛仍感兵力不足，“攻剿则兵分而见寡，堵守则路歧而难防，策应维艰，战守非易”，遂决定采取集中兵力“专注一处，先行扫荡”，然后并力进攻他路的作战方针。①

清军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是东路起义军。其部署如下：参将卫佐邦率所部绿营及部分团练为中路，出东门直攻燕塘；千总马超亮率城东团练乘船至东涌登岸，先占簸箕村，然后从右侧进攻燕塘；把总黄镛和县丞郑锡琦分率东莞、潮州兵勇从左侧进攻燕塘；外委赖永清率安邑团练为后应。各路清军于9月7日晨突然向燕塘发起攻击。起义军仓促应战，力不能支，只好突围外撤，一部分由陈显良率领从瘦狗岭撤至新造，另一部分撤至佛岭市。

李文茂在东路义军战败后，估计敌人必将进攻北路，便决定由进攻转入防御，并采取如下防御措施：加强北路各据点间的联系，相互主动配合作战；在主要据点周围挖壕筑垒，配置火炮、抬枪，在山坡、田埂、交通要道插上竹签，撒布铁蒺藜；在有树林的山坡暗设火炮，布置伏击阵地。叶名琛则根据北路义军数量多，据点密布等情况，采取“先分其势，复截其援”，“逐一剿洗”②的战法，使起义军顾此失彼，无法固守据点。9月下旬到11月上旬，北路起义军的据点被清军逐一攻占，余部退向西路的石井、石门等处。1855年1月中旬，清军又向西路发动进攻，将石井、石门以及附近各乡的义军击败。起义军首领李文茂部转移至南海县的

① 叶名琛等奏：《剿办近省东北两路匪徒获胜并扑灭东路匪巢等由》（咸丰四年闰七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② 叶名琛等奏：《省城北路获胜焚毁贼巢多处等由》（咸丰四年九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九江。

正当清军疯狂进攻北路义军之际，英国侵略者接受叶名琛的请求，于12月13日公开派遣舰队闯入珠江，充当清军镇压起义军的后援。叶名琛有恃无恐，便立即进攻省河以南的起义军。起义军水军利用省河众多的港汊，出没无常，袭击敌军，曾于大黄滘、新造等处大败清军水师，使清军的“堵剿倍形吃紧”①。这时，候补道沈棣辉提出了先破佛山的建议，认为佛山是起义军的辎重和精锐集结地，佛山一破，其余便可一战而定。叶名琛接受了这一建议，便命沈棣辉统一指挥陆路兵勇近万人，战船100余只、水勇3000人，连同原驻佛山附近的兵勇4700余名，向佛山进攻。

驻佛山的陈开部五六万人，在围攻广州时，竟被南海县的大沥、梯云、扶南、太平4堡96乡的团练堵住了北进的道路，以致偏处佛山，无所作为。1855年1月14日，清军沈棣辉部将佛山起义军的外围据点全部攻占后，便兵分13路同时进攻佛山镇。起义军首尾不能相顾，纷纷突围。陈开率部向南海九江退却，与李文茂部会攻三水县不克，遂一齐西进肇庆，与伍百吉及由广西东下至肇庆的梁培友部会师，进行休整。至此，长达半年多的围攻广州之战，以起义军失败而告终。

广州解围后，各部起义军分头撤至粤、桂、湘、赣地区坚持斗争。叶名琛下令“凡昔通匪者，吏民格杀勿论”②，对广东人民进行血醒屠杀。全省被害者约在100万以上，仅广州一地就有10万余人惨遭杀害。英国军舰也参与围捕退到海上的起义军。

广州天地会起义军于起义不久，就进攻炮台环列、城高墙厚的广州城，结果，不仅使自己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而且丧失了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革命势力的有利时机，显然不是明智

① 叶名琛等奏：《沙湾等处匪船叠剿获胜由》(咸丰四年十一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②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228页。

之举。

（三）转移广西，建立大成国，开辟根据地

占领浔州城，建立大成国　陈开、李文茂等部到达肇庆不久，就面临清军从西江上、下游夹击的不利形势。1855 年 4 月 13 日，广西按察使张敬修部攻占了德庆城。5 月中旬，广东盐运使沈棣辉率水陆师溯西江西上，于羚羊峡外击败起义军的水军，抢占羚羊峡炮台，直驶肇庆。面对上述险恶形势，陈开、李文茂等接受对广西情况比较熟悉的梁培友的建议，决定放弃肇庆，向广西转移。5 月下旬，起义军战船千余艘，在德庆冲破张敬修部水师的堵扼，越过封川，进入广西，于 6 月 5 日直薄浔州城（今桂平）。浔州城三面临水，是广西东南重镇，进出云、贵、湘、粤的水上交通枢纽。在起义军围攻下，浔州知府刘体舒督率清军、团练闭门坚守。起义军一面派兵控制交通要隘，阻击清军援兵和断绝对城内的粮饷接济，一面在城外筑墙设垒，实行长期围困。广西巡抚劳崇光因无兵可调，只得就近从贵县派勇练增援，但为起义军所阻；张敬修及叶名琛派往支援的水师又被扼守大黄江口的起义军击败。9 月 27 日，起义军乘浔州城内的清军粮尽援绝、士气低落之际，全力发起总攻，一举攻入城内，俘杀了刘体舒和桂平知县李庆福等人。

起义军占领浔州城后，陈开等宣布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改浔州城为“秀京”，开始进行政权建设。为了防御清军进攻，在城外修筑土墙二道，东门外的三角咀修筑炮台，沿江两岸筑垒设营。

开辟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大成国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散布广西各地的天地会起义军。10 月初，当起义军攻占浔州西南的贵县县城后，当地起义军首领黄全义、黄鼎凤和活动于横州、永淳一带的李文彩率部参加大成国起义军。于是，起义军兵力大增，声势益振。接着，起义军分路进攻，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先后占领了武宣、象州、平南等地，初步开辟了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开始在广西立定脚跟。

1856 年 10 月，陈开召开起义军将领会议，分封诸王：李文茂为平靖王兼陆路总管，梁培友为平东王兼水路总管，区润为平西王，梁昌为定北王。陈开自称镇南王，不久又改称平浔王。此外，还分封了公、侯、元帅等职官。这次会议还确定：由李文茂率部北攻柳州，梁培友率部向东发展，区润、梁昌率部向西发展，陈开则坐镇浔州。部署既定，各王便分别率部向北、东、西三个方向发起攻城作战，以便进一步扩大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北路，平靖王李文茂率水陆两军由象州北上，于 11 月 12 日包围了柳州。驻守柳州城的游击韩凤所部 2000 余人及右江道孙蒙、参将汤遇珍所率之少数部队固守待援。劳崇光一面调兵防守桂林，以防积极活动于兴安、灵川、永福地区的广西天地会起义军威胁省城，一面催令道员张凯嵩由庆远（今宜山）率部驰援柳州。12 月 3 日，张凯嵩率兵勇和团练 3000 余人进驻与柳州隔江相望的二都。21 日，提督惠庆也由石陇率绿营兵近 1000 人赶到该处。张、惠二部因受到柳江南岸起义军的牵制，不敢渡江作战。1857 年 1 月 8 日，在劳崇光催促下，惠庆才率部渡江。这时，柳州被围已 4 个月，城中粮食几尽，兵丁饥饿难忍。3 月 14 日，韩凤率亲兵 200 余名企图突围逃跑，刚出城门，就被起义军击散，韩凤仅率少数人逃往桂林。15 日，李文茂挥军冲进城内，击毙孙蒙、汤遇珍等，胜利地攻占了柳州城。惠庆见柳州已失，慌忙向桂林撤退。起义军乘胜攻占了柳城、罗城、庆远、融县（今融水），打开了通向贵州的道路，并与贵州苗民起义军取得了联系。

东路，平东王梁培友计划首先肃清平南县属的地方团练，保障后方安全，然后东攻梧州。1857 年 4 月 3 日，当率部从平南县大乌墟出发往攻廖洞村团练时，不幸中炮牺牲。起义军失去了一名得力将领。之后，陈开亲自统率梁部继续东进，在占领藤县后，于 6 月 22 日将驻守梧州城内的按察使黄钟音、知府陈瑞芝、副将蒋福长等统带的兵勇、团练 3000 人紧紧围住。叶名琛得到梧州被围的消息，即派广东陆路提督昆寿率绿营兵 5000 人、水师守备苏海率战船 90 余只，增援梧州。起义军一面发炮攻城，一面积极打

援。7 月 28 日，起义军水军在都城（今广东郁南县）江面歼灭了苏海率领的水师，同时给昆寿率领的绿营兵以有力的打击，迫使其向肇庆溃退。这时，梧州城内粮食已颗粒无存，每天饥饿而死者达数百人。陈开得悉这一情况后，命令部队奋勇攻城，于 9 月 27 日夜一举攻入北门，歼灭清军千余人，除陈瑞芝乘乱逃脱外，黄钟音、蒋福长等都当了俘虏。起义军胜利占领了梧州。

南路，定北王梁昌、平西王区润、定国公李文彩率领起义军占领永淳、横州后，于 5 月 27 日水陆并进，往攻南宁。驻守该城的左江镇总兵色克精阿等慑于起义军的声威，率文武官员事先出城走避，起义军不战而得南宁城。在此前后，隆国公黄鼎凤率部攻占了宾州（今宾阳东北）、上林等城，活动于容县、岑溪地区的荣国公范亚音率部攻占了北流，进围郁林（今玉林），在南线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起义军经过两年的鏖战，占领了东到梧州，南到北流，西到南宁，北至融县的大半个广西，攻克府、州、县城数十座，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起义军在这一时期的攻城作战，克服了起义初期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强攻的缺点，在广西清军缺乏机动力量的情况下，改用长期围困的方针，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反映出作战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四）清军增援广西，大成国根据地日蹙

清军增援广西　正当起义军胜利发展之际，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太平天国经过 1856 年天京内讧以后，元气大伤，使清政府得以腾出较多的力量去镇压其他各族人民的起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巡抚骆秉章应劳崇光的请求，派候选知府蒋益澧等率湘军 3600 余人，进驻广西桂林，加强了广西的反动力量。其次，广东当局在起义军占领梧州后，加紧添制和改造战船，抽调部队，雇募壮勇，积极进行进攻梧州、浔州的准备。再次，南宁城于 1857 年 10 月 3 日被色克精阿纠集的数千团练所攻占。

起义军错打桂林，丢失柳州　在敌我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起义军未能及时由进攻转入防御，相反，作出了以陈开为

东路、李文茂为西路，会攻广西省城桂林的错误决定。

1858年1月，李文茂由柳州率部北上，占领永福。2月，起义军进至桂林西南60里的苏桥镇，便停止前进，等待沿桂江北上的陈开部的到来。可是，陈开部于4月抵达平乐时，由昆寿指挥的粤军已由肇庆向梧州开进。5月，该部又遭到已经占领平乐的湘军的攻击，前进受阻。陈开不得不率部南返，保卫梧州。这样，进攻桂林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李文茂部身上。

当时，由蒋益澧所率之湘军虽已增至5000余人，但桂林守军仅有2000余人。为防止李文茂部进攻，蒋益澧采取不时调换部队防地、布设疑兵的诡计，迷惑起义军。同时，由右江道张凯嵩纠集团练进攻庆远，牵制起义军。李文茂因不知湘军虚实，万余人长期滞留苏桥，丧失了进攻良机。陈开率部南返后，蒋益澧便命令驻平乐的湘军折回桂林，并秘密调动1500人绕到苏桥后面，于5月下旬开始对李文茂部实行前后夹击。李文茂不幸负伤，率部撤出苏桥，退守柳州。湘军乘胜前进，于6月24日攻占柳州。李文茂率部退入贵州，不久又折回广西融县，于11月病死于怀远（今融安县北）山中。起义军进攻桂林的计划遂告落空。

起义军再失梧州　当李文茂从桂林前线败撤时，在梧州与粤军作战的陈开部也节节失利。此次进攻梧州的粤军，由广东巡抚江国霖和提督昆寿亲自编组。他们依据必待“西水未涨，东风当令之时，水陆并进，步步为营，方能得手”① 的作战方针，将调集的外海、内河水师，根据战船大小、火炮轻重、行驶快慢，分别编为前、中、后三队：以装载四五千斤火炮的红单等大型船六七十艘为前队，装载二三千斤火炮、桨多人众、转棹方便的扒船50艘为中队，装载1000斤火炮、行驶快速的湖南麻阳舢板100只为后队。前队主要发挥火炮射程远的优势，便于先发制人，摧毁对方战船；中队既可掩护前队，又便于进退；后队可以在前队、中

① 江国霖奏：《广西剿匪获胜克复梧州由》（咸丰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队的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对方，实行近战。陆路方面，兵力增至万余人，一半掩护水师溯江前进，一半专门进攻陆上起义军的据点。此外，还督令沿江各县团练于西江两岸配合作战。

起义军对粤军的兵力和进攻部署缺乏了解和研究，仍然袭用过去的老办法，在封川江面集中战船二三百艘，直冲敌阵。4 月 29 日，当起义军战船驶至德庆的春牛坪江面时，预有准备的广东水师前队首先发炮，击沉起义军战船数艘，中队扒船立即向两翼展开，后队麻阳舢板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起义军战船，岸上的兵勇也配合作战。经过激战，起义军不少战船被击沉、击伤，人员伤亡甚众。5 月 30 日深夜，陈开不得不率部撤出梧州，退守浔州。

（五）大成国都城浔州沦陷，反清战争宣告失败

反攻梧州失利　梧州、柳州等地相继失守以后，大成国起义军受到很大削弱，根据地也缩小了很多，原来的五王只剩下陈开一人，形势已非常不利。但当时大成国尚据有十多个州、县，拥有水陆军十余万人。此外，还有陈金刚和罗华观等起义军分别活动于贺县和苍梧下郢一带，构成犄角之势。这时，蒋益澧所统湘军由于炎夏酷暑和水土不服等原因，病员日益增多，不得不分驻柳州、庆远一带治疗休整，就地清剿起义军余部。昆寿所率粤军在攻占梧州以后，因梧州至浔州 300 余里的浔江滩多流急，原有的战船过大，难以上驶，需换船，同时需要添兵，筹措军费。所以，湘、粤两军都停止了进攻，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战争间隙。

1858 年 11 月，蒋益澧率湘军主力进攻贺县的陈金刚起义军。陈开乘柳州守备空虚之际，率部一举袭占了柳州，并恢复了柳城、融县等地，收容了李文茂余部。这一行动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攻占柳州等地之后，陈开没有及时转旗东向，配合陈金刚起义军夹击正在回援柳州的湘军，却率主力南下，返回浔州，东攻梧州。当时，陈金刚拥有数万之众，湘军不过 5000 余人，如两军实行左右夹击，完全有可能消灭敌之一部或大部。而梧州一带的粤军有兵勇万余人、战船 300 艘，水陆防御都比较坚固。1859 年 4 月 2 日，陈开率战船 300 余艘，在罗华观部 1000 余人配合下，进攻梧

州，结果战船和兵员遭到不少损失，不得不退回浔州。上述作战行动说明，陈开没有认清当时决定广西战局的主要环节，因而不能正确选定打击对象和作战方向，从而丧失了扭转被动局面的有利机会。

起义军被各个击败　1859年7、8月间，石达开率所部太平军几十万人返回广西，于10月中旬占领庆远城，与驻柳州的大成国起义军形成犄角之势。尽管湖南巡抚骆秉章立即抽调正在湖南休整的广西布政使刘长佑率湘军1.2万人进入广西，但湘军在数量上仍居于劣势，如果大成国起义军与太平军密切协同，联合作战，仍然有可能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可是，这两支起义军未能联合对敌，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因而给湘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12月，刘长佑一面命令蒋益澧再次率部对付贺县的陈金刚部起义军，保障湘军的翼侧安全；一面自率湘军主力趁江水未涨之际，进攻柳州。守卫柳州的起义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顽强抵抗，固守待援。陈开几次从浔州派水军北上援救，无奈水浅滩多，沿途又遭团练堵击，始终未能抵达柳州城下。1860年1月31日，湘军炸开东北城墙，攻入城内。起义军牺牲2000余人，损失战船200余艘，柳州再次失守。3月，陈开率部再次进攻柳州，与敌苦战30余日不克，遂退守浔州。7月，湘军败陈金刚部于贺县、怀集。9月，又败罗华观部于下郢。据有荔浦、永安（今蒙山）的张高友部则向清军投诚。这样，陈开起义军便成了孤军，而湘军却打通了桂林至梧州的水陆交通，与粤军联成一气，造成了进攻浔州的有利条件。

浔州落入敌手　1861年2月，已经升任两广总督的劳崇光与刚升任广西巡抚的刘长佑策划了进攻浔州的部署：命总兵李扬升率广东水师溯浔江上驶，蒋益澧率湘军7000人沿浔江两岸西进，作为进攻浔州的水陆主力；命候补道刘坤一率湘军一部从柳州由北而南，配合进攻浔州。陈开对清军的进攻，虽作了一些防御准备，但仓促从事，为时已晚。4月，刘坤一率湘军攻占了象州、武宣，接着向浔州进军。8月初，蒋益澧率湘军攻占了藤县。8月19

日，李扬升率广东水师驶抵平南城东20里的丹竹。陈开率大队战船迎战，“结队而来，纵横满江，炮声震动山谷”①，击伤敌船二三十艘，毙伤不少水勇。但当战斗正酣之际，忽然东风大作，起义军战船处于逆风顺流、进退两难的不利地位。清军战船乘势挂帆上驶，进行近战，抛掷火箭、火罐、火弹，起义军伤亡近万，战船大部被俘被毁。与此同时，支援水军作战的陆路起义军也遭到湘军和团练阻击，伤亡惨重。蒋益澧、李扬升率水陆两军乘胜前进，直抵浔州城下。8月21日夜，陈开因军心涣散，已无固守决心，便率余部撤离浔州，向贵县退却。9月2日夜，当陈开等泊舟于横州东北的大滩时，不幸被当地团练俘虏，后英勇就义于浔州城。此后，起义军余部在隆国公黄鼎凤率领下，在贵县一带继续坚持反清战争，直至1864年败亡。

（六）起义失败的军事原因

大成国反清战争，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了清政府与当地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在军事上牵制了两广地区的数万清军和许多战船，先后毙、伤、俘清军万余人，击沉、击毁和缴获战船五六百艘，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和其他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

但是，这次起义战争终于失败了。就军事而言，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作为秘密会党的天地会，向来具有山堂分立、互不统属的弱点。这种弱点反映在军事上，就是各支起义武装自成系统、各自为战，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作战。如围攻广州之战，既无统一的指挥，又无统一的作战行动，以致被清军各个击破。建立大成国后，各王之间也不是和衷共济、协力同心，而是各有打算。李文茂打下柳州后，就自行封官设吏，开炉铸钱；柳州失守后，不向浔州退却，而拉着队伍远走贵州。梁昌、区润

---

① 劳崇光奏：《官军复浔州府城出力请保由》（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占领南宁后，因个人利害关系，竟互相残杀。原在广西的各支起义武装，有的虽然接受了大成国的封号，但实际上只是松散的联盟关系，并不服从统一的指挥。这样，就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其次，起义军领导者缺乏审时度势，适时转换进攻与防御，以争取主动的能力。起义军围攻广州失利后，能够适时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西转移，趁该省清军兵少饷绌之际，不失时机地实行进攻作战，建立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这是明智之举。但是，当全国起义高潮开始低落，湘军进驻广西，广东又集结水陆清军准备进攻梧州，形势发生了不利于起义军的变化时，陈开、李文茂没有及时转入防御，而是冒险进攻桂林，这无疑是很大的失策。此后，南宁、柳州、梧州相继失守，敌情日趋严重。陈开非但不进行充分的防御作战准备，而是继续进攻，企图收复柳州、梧州，结果兵日减、地日蹙，最后在湘、粤、桂军联合进攻下，完全丧失了还手能力而败亡。

再次，不注意根据地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尽管起义军建立了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占领了大半个广西，但打的是陈旧的“反清复明”旗号，难于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起义军打击、瓦解为虎作伥的团练武装，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以致占地虽广，却很不巩固，在对付清军进攻时，不能有效地发挥战略基地的作用。起义军的数量相当可观，最多时达数十万。但是，组织松散，缺乏正规的编制和严格的训练，因此多而不精，战斗力不强，不仅在与比较凶悍的湘军作战时很少取胜，就是与战斗力很差的绿营对阵中也多有败绩，甚至有些城池竟被团练武装所攻占。起义军战斗力之所以不能有效地提高，还与缺乏善于治军、勇谋兼备的将领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十一章　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战争

第一节　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

一、起义的爆发和胜利发展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有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等十多个民族。清初实行“改土归流”① 后，贵州名义上废除了土司统治，实际上形成了“土流并存”的局面，各族人民遭受流官和土司、汉族地主和本民族地主的双重压迫。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良田被屯军侵占，农民失去土地，被赶进深山老林。所耕之田，皆山角地头，收获很少，往往劳累一年，全家不得温饱。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把巨额战争赔款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增收赋税，连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的贵州也不能免除，这对生活艰辛的各族人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残酷的封建统治和剥削下，贵州各族人民已经难以生活下去了。为了生存，只有起而反抗。1854 年（咸丰四年）3 月，布依族人杨元保领导本族农民在独山的丰宁上司起义。起义军因遭清军和团练围攻，退往广西南丹。5 月，在南丹昔里山战斗中，杨元保被俘遇害，起义失败。9 月，汉族斋教（白莲教支派）领袖杨龙喜、舒裁缝领导群众在桐梓九坝起义，攻占桐梓县城，建立起“江汉”政权，改九坝为赛波府。10 月，起义军攻占仁怀、绥阳、正安、黔西，围攻遵义，威逼贵阳。1855 年 1 月，四川提督万福

① 改土归流系明、清两代在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改行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

率川军入黔，占领起义军根据地赛波府。起义军南走黔西，于4月22日在石阡葛彰司战斗中，杨龙喜身负重伤，自刎而死。不久，舒裁缝也战败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杨元保和杨龙喜、舒裁缝领导的两次起义虽告失败，但在贵州点燃了革命的火种，推动了各族人民的起义。从1855年起，贵州全省先后爆发的苗、水、侗、汉、回等各族农民起义，汇成一股洪流，冲击着清王朝在贵州的反动统治。

（一）黔东南苗民的起义和胜利发展

1855年4月30日，苗族农民张秀眉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乘台拱等地农民抗粮斗争高涨之机，在台拱掌梅尼首举义旗，各地苗民闻风响应，起义烽火很快扩展到黔东南苗民聚居地区，其首领有潘老冒、江老拉、九大白、金干干、蒙阿保等。张秀眉主动联合各地起义军，采取扫除敌方小据点，孤立大城镇的作战方针，先后占领了岩门司（今榕江）、施洞（今镇远南）、重安驿等清军汛堡，使占踞城市的清军陷于孤立，粮饷补给线被切断，以致"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孑余之众，骨立菜色，守既无力，逃亦无路"①。于是，各地苗军乘机进攻困守孤城的清军。从1855年9月至1856年10月，起义军先后攻占了丹江、下江、永从、凯里、施秉、清江（今剑河）、台拱、黄平、清平等厅州县城和军事要地，歼灭了一批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

1857年初，苗军分东、西两线出击。在西线，杨大六、金干干、柳天成率领的苗军与罗光明、潘新简领导的汉族、布依族、水族起义军活动于都匀、麻哈、独山一带，迫使"督办全省军务"的贵州提督孝顺困守都匀城，一筹莫展。3月，起义军数万人会攻丁家山营，孝顺亲自督战，兵败自杀。1858年3月7日，苗军金干干和柳天成部攻入麻哈城，歼敌2000余人，革职留用的贵州提督佟攀梅等被击毙。起义军乘胜南下，于3月14日攻占黔南最大的

① 罗文彬：《平黔纪略》，贵阳文通书局1928年版（下同），卷2，第8页。

城市都匀，兵锋直至贵定瓮城桥，于是龙里告急，省城贵阳震动。在东线，苗军在镇远府附近与援黔川军参将蒋玉龙部对峙。1858年10月5日，苗军趁川军因饷乏向思南溃逃之机，一举攻占湘、黔大道上的军事要地镇远府卫二城，控制了镇阳江、清水江等水路交通。

至1858年底，以苗军为主力的起义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黔边、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

早在1855年4月18日，侗族人姜应芳率众于天柱县执营乡起义，先后占领天柱、锦屏、青溪三县和邛水司，与苗民起义军密切联系，协同作战，体现了苗、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反封建斗争精神。1862年姜应芳被俘就义后，李恒吉、陈大六领导侗族起义军继续坚持斗争。

（二）黔北号军建立根据地

号军是以汉族为主的白莲教支派灯花教组织的起义武装，因用不同颜色的头巾裹头（号褂和旗帜颜色亦各不相同），有红号、白号、黄号、青号等名称。1855年春，毛大仙在石阡率众起义，同年11月，铜仁府举人徐廷杰、梅济鼎聚众起义，突入铜仁府城，刘世美和田宗达等也分别起义于江口和印江，是为红号。1858年1月，白莲教教主刘仪顺和油匠何冠益等在思南府城北面的鹦鹉关率众起义，称为白号。1857年6月，何德胜率众在都匀府麻哈州起义。次年3月，杨和风、贺济泮、胡胜海在安化（今思南）、婺川（今务川）一带分别起义，称为黄号。红号军先后攻克松桃、思南、石阡、印江、玉屏等地，并前出至湖南凤凰和四川秀山。毛大仙、徐廷杰、梅济鼎在战斗中先后牺牲，起义受挫。此后，田瑞龙、包茅仙等继起，在梵净山、伏魔山建立根据地，坚持斗争。白号军在刘仪顺等领导下，占思南、印江等地，推举冒充明代皇帝后裔（冒名朱明月，一作朱民悦）的张保山为秦王（又称朱王），继续采用杨龙喜的“江汉”年号，以为各部号军的共同首领。此举，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号军各自为政的局面，但各部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支援配合。1859年11月，白号军攻占偏刀水

(今凤冈南琊川)，增修营垒，据为根据地。11 月 17 日，克湄潭县城，进捣三渡关，兵锋直指遵义城。黄号军成立后，攻占了婺川，并与白号军并肩活动在乌江两岸。1861 年 4 月，黄号军占领形势险要的荆竹园，据为根据地。此外，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也成为该军的重要据点。

1863 年（同治二年），罗光明部起义军占都匀，苗军潘名杰部据贵定，号军何得胜部占开州（今开阳），彼此联合作战，围困贵阳。12 月，潘、何联军在贵阳以北黑石头大败清军，进逼贵阳城。“附郭一带，烽火相望，阖城皆惊”①。但贵阳城池坚固，又有重兵防守，起义军数次攻城，均未得手。在此期间，号军活动地区逐渐扩大，除黄号何得胜部在贵阳附近活动外，白号势力发展到遵义、大定（治今大方）二府的广大地区。1864 年和 1865 年，先后攻下桐梓、仁怀、黔西、大定、正安等城。活动在桐梓、遵义、仁怀、湄潭等处的青号军，经常与白号协同作战。这样，整个黔北地区成了号军的势力范围。

（三）黔西南回民和黔西北苗民起义军发展壮大

1858 年 12 月，黔西南普安厅（治今盘县）回民在张凌翔、马河图等领导下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兴义府（治今安龙）的回、汉、布依、苗等族民众纷纷起义响应。1859 年 11 月，张凌翔联络回、汉、布依和苗族起义军攻占三面环山、形势险要的新城（今兴仁），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大元帅府。张凌翔为大元帅，马河图为副元帅，总理全局。张凌翔、马河图一面派人与太平军和云南回民起义军领袖杜文秀联系，一面在新城扩建城垣，修碉挖壕，囤积粮草，准备长期坚守。1861～1862 年，回军先后控制了黔西南兴义府和普安厅所属广大地区。

当黔东南、黔北和黔西南各族起义军蓬勃发展之际，黔西北也爆发了起义。1860 年 5 月，苗族农民陶新春利用苗、彝、布依族 1.4 万余群众在韭菜坪（今赫章县境）举行降仙大会的机会，发

---

① 罗文彬：《平黔纪略》卷 10，第 25 页。

动起义，一举摧毁三个土司衙门，攻占要隘七星关，控制了黔、滇、川三省的交通咽喉。1861 年 2 月，黔、湘清军进犯七星关，陶新春率苗军坚守月余后，主动撤向毕节县西北的猪拱箐。猪拱箐地处滇黔边界，地势险峻，苗军在此修建房屋，开荒种地，在险要关隘修筑营垒，派兵据守。清军多次进犯，均未得逞。同年夏，太平军石达开部将曾广依率部经大定府北上，围攻毕节，陶新春率苗军配合作战。后曾广依率部入川，苗军便退回猪拱箐。1863 年，石达开部将李福猷率太平军经过黔西北，陶新春将其迎至猪拱箐休整。在太平军的帮助下，苗军整顿了队伍，逐步建立起各种制度，加强了军事训练。这样，黔西北苗军逐步壮大，猪拱箐根据地日益巩固，并经常活动于大定、黔西、威宁、毕节以及云南镇雄、彝良、大关、昭通和四川边界地区，与各族起义军互相配合，不断打击清军。

至此，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全省，使当地的统治阶级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清政府也为之忧心如焚。

二、起义军转入防御作战

（一）粉碎湘军三路“进剿”计划

1866 年初，太平军余部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一带最后失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但是，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各族人民起义仍在蓬勃发展。是年初，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早在 1865 年 4 月提出的川、湘两省各谋一方，“谋黔当以湘为根本”①的方略，一面令一年前率湘军援黔的新任云南巡抚刘岳昭向黔西、大定、毕节一带进攻，一面令湖南巡抚李瀚章筹划进黔事宜。李瀚章从已裁撤回籍的湘军官兵中挑选 2 万余人，分三路向

① 曾国藩：《通筹滇黔大局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传忠书局 1876 年版，卷 22，第 8 页。

贵州“进剿”：新授贵州布政使兆琛负责黔东军事，于湖南辰州府（治今沅陵）、沅州府（治今芷江）招集旧部5000人，进驻贵州镇远，与黔军分途进攻，是为中路；已革浙江按察使李元度与总兵王永章等率湘军6000人，由湘西麻阳（今麻阳西南）进驻贵州铜仁，向号军进攻，是为北路；总兵周洪印率湘军万余人防守湘黔边界，待李元度等进至铜仁后，即由天柱趋清江、台拱，与中路湘军合攻黔东南苗军，是为南路。

面对清军的进攻，苗、号等起义军互相支援配合，一面利用当地山深林密的自然条件，节节阻击，迟滞和打击敌人；一面由苗军采取“深入疾归”的战法，插入湘西敌后，袭扰湘军后方城镇，迫使湘军回援，终于粉碎了湘军的三路“进剿”计划。

（二）猪拱箐保卫战与黔西北苗军的失败

1866年4月，清政府令贵州当局厚集兵力，与新任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领的滇军约期“会剿”猪拱箐。

猪拱箐纵横数十里，三面峭岩绝壁，仅北面由青松梁子可登山顶。其下为吴家屯，附近有二龙关和大溜口两个要隘，间道可通威宁州海马姑（今赫章县境）。海马姑距猪拱箐80里，地势险峻，是苗军的另一重要据点。为对付清军的进攻，陶新春领导的苗军收缩兵力，添筑营垒，扼守要隘；附近地区的号军、苗军也纷纷派兵支援猪拱箐和海马姑。

1867年春，岑毓英到达贵州毕节，随即派兵一部牵制海马姑的苗军，以主力进攻猪拱箐。3月下旬，滇军攻占吴家屯，旋占二龙关、大溜口等要隘，迫使苗军退守山项。其后，滇军在猪拱箐半山腰扎营，准备发动总攻。这时，云南巡抚刘岳昭率所部湘军一面进攻平远（治今织金）牛场苗军，以断绝猪拱箐苗军外援，一面将军火粮饷源源运往滇军阵地。6月21日，滇军攻占红岩尖山，切断了海马姑与猪拱箐的联系。

苗军与清军对峙数月之久，不但军火、粮食极度匮乏，而且以往迫于革命形势参加起义的土目这时大都动摇投敌。岑毓英还编写瓦解起义军斗志的歌词，让清军中的苗、彝族士兵“遍山环

歌”，使起义军士兵“闻歌而逸去者万余人”。①

7月20日晨，清军发动总攻。潜伏在起义军内部的投敌分子“导官兵自其守处入”，清军大队攻入起义军阵地，陶新春率领起义军余部退至山顶继续抗敌。清军发射火箭，焚烧山顶的房屋和棚帐。起义军与敌展开最后的肉搏战，大部壮烈牺牲，陶新春等被俘遇害，猪拱箐苗军根据地终于陷入敌手。8月16日，海马姑也被清军攻占。至此，黔西北农民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

（三）黔北号军的失败

1867年11月，湘军三路入黔作战受挫后，清政府命湘军将领席宝田代替兆琛总理湖南援黔军务，命候补知府唐炯督办川军援黔军务，并接受一些官吏的建议，实行“川楚合力”、“先黔后滇”、先号后苗的方略。

1868年1月初，席宝田率湘军到达贵州铜仁，以一部留防湘黔边界，自率7000余人驰赴荆竹园。1月17日，与李元度部湘军会师于距荆竹园8里的三道水，以步步为营战术，从北侧进攻荆竹园。号军多次出卡反击，遭到湘军洋枪洋炮的密集射击，伤亡很大。27日夜，席宝田部攻北卡，李元度部攻东卡，于次日黎明冲进荆竹园寨卡。号军顽强抵抗，黄号军首领肖继盛、何瑞堂等牺牲，仅有二三千人突围转移到罗家岩。湘军乘胜进占罗家岩，守寨号军伤亡殆尽。

2月21日，席宝田部攻陷黄号军据点轿顶山。不久，因苗军攻入湘西沅州，席宝田被迫率部回援，轿顶山复为号军占领。与此同时，李元度部湘军向乌江西岸的白号军进攻。由于军事上接连失利，一部分号军首领动摇受抚，致使湘军逐渐攻占了偏刀水的外围据点。3月24日，湘军在号军叛降者孙洪顺接应下，攻占了距偏刀水4里的觉林寺，称为嗣统皇帝的号军领袖朱明月突围时被俘。4月初，唐炯等率川军到达偏刀水，与李元度一面派兵阻击来援的黄号军，一面乘虚攻占了黄号军的重要据点水源沟等地。

① 《贵州通志》，清乾隆六年刊本，前事志32，第15页。

清军逐次攻占了偏刀水周围的据点，挖壕树栅，派兵昼夜守护，使偏刀水白号军愈形孤立。5月26日，川军、湘军会攻偏刀水，秘密投敌的号军首领向成高暗中打开寨门。在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下，偏刀水终于失陷。

川军继续向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等地的黄号军根据地进攻。7月27日，川军渡过清水江（乌江支流）。8月6日至8日，分别攻占瓮安玉华山、余庆轿顶山和瓮安县城。8月16日，平越尚大坪的黄号军及青号军余部，在清军四面围攻下，投降清军，刘仪顺等数十人由小道突围被俘，后在成都惨遭杀害。至此，坚持了14年之久的号军起义最后失败。

（四）黔东南苗军顽强抗敌和黄飘、楼山口奏捷

黔西北苗民起义和黔北号军起义的失败，使黔东南苗军面临着独立对付湘、川、黔三路清军进攻的险恶形势。但苗军不畏强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防御作战（参见附图17）。

节节抗击湘、川、黔军的进攻　1868年5月，席宝田由湘西至贵州邛水（今三穗），于19日围攻邛水西南的苗军重要据点寨头。苗军守将甘保玉率部坚守前哨阵地钉耙塘。湘军正面进攻受挫后，改用前后夹攻战术，占领寨头。其后张秀眉、包大度等率苗军数次反攻寨头，均未奏效。后席宝田请假回湘，湘军便以酷暑为由，暂停进攻。

唐炯在攻占尚大坪黄号军根据地后，即率川军南下，进攻苗军。1868年8月25日至12月7日，先后攻占平越州城、麻哈州城、黄平旧州城和新州城。

与此同时，贵州巡抚曾璧光遣提督张文德率黔军由贵阳东进，连陷龙里、贵定，威逼都匀。都匀地区苗军首领潘名杰投降。余部于11月27日撤离都匀。

11月初，席宝田回到寨头湘军大营，继续向苗军进攻。处于清军包围之中的苗军，一面依托山险节节抗击，一面派兵绕袭敌人，牵制湘军。金干干则率5000苗军深入川军后路，袭击其补给线。席宝田、唐炯均感后路空虚，兵力不足，屡请增兵。湖南巡

抚刘昆遣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湘军入黔，于12月4日攻占侗族起义军根据地江口屯。1869年1月，席宝田令黄润昌沿镇阳江西进，令记名提督荣维善由寨头北上，夹攻镇远。湘军于3月10日攻占镇远府卫二城后，又于4月9日和30日，先后攻占清江厅城和施秉县城，苗军向西撤退。

黄飘、楼山口大捷　湘军攻占施秉后，为了打通驿道，并与业已占据黄平、重安、清平等地的川军会合，便乘胜向黄平前进。1869年5月1日和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湘军1.8万人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20余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40余里）。瓮谷陇至黄平，中有黄飘（黄平东南20里）等苗寨，地势奇险，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当时有人建议停止前进，但黄润昌、荣维善等因胜而骄，决计乘胜追击。5月3日，湘军分为前队、二队、三队和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苗军首领张秀眉令部将包大度率军万余人，在黄飘一带山上设伏，而以小部队前出诱敌。当湘军进入伏击区时，苗军突起，前阻后截，山上木石如雨而下。湘军争相逃命，但因道路狭窄，人马拥挤，乱作一团，自相践踏，死伤甚众。苗军趁势由山上冲下，喊杀之声响彻山谷。黄润昌为“飞炮”击中头部，顿时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200余人突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为苗军包围聚歼。仅苏元春率数千人逃出重围。苗军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

黄飘大捷之后不久，苗军又在楼山口取得了重创黔军的胜利。1869年5月初，贵州提督张文德指挥黔军三四千人分五路从都匀向八寨进犯。苗军奋起阻击，并由金干干率数千人绕至黔军侧后，袭击敌人，阻截敌人粮道，将黔军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7月中旬，张文德率部向独山转移。苗军早在楼山口埋伏重兵，当黔军从高寨坡登上楼山口时，伏兵突起，黔军顿时乱作一团，三四千人全行溃灭，张文德仅带亲兵20余人经独山逃回贵阳。苗军乘胜于7月19日收复都匀府城。

苗军两次大败清军，形势极为有利。如果各部力量团结一致，

乘胜进攻，有可能进一步变被动为主动。可惜苗军满足于已有的胜利，除了几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外，无所作为，从而失去了继续歼敌的良机，给了敌人以休整和恢复的时间。

三、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一）湘、川军继续向苗军进攻

湘军于黄飘战败之后，湖南巡抚刘昆极力为席宝田开脱，并继续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援。1870 年 4 月上旬，席宝田率新募湘军进抵镇远以南的塘头，连同原在黔湘军共 30 余营，随即部署向苗军进攻。湘军继攻占清水江北岸的金钟山后，于 4 月 15 日偷渡清水江，袭占苗军重要据点施洞口。5 月，攻占新城、瓮板、蓑衣坡。6 月上旬，又占领施秉城南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和岩门司。

与此同时，唐炯指挥的川军相继攻占了黄飘、白堡、瓮谷陇等苗军堡寨，迫使苗军数千人退守叫乌硐。川、黔军用烟火熏灼办法，将洞内苗军 5000 余人全部杀害。接着，川军与湘军在瓮谷陇会师。至此，清水江和重安江以北地区全被清军控制，苗军只得退守江南。

1870 年 10 月，席宝田率湘军向台拱地区进犯。已有十余年没有遭受清朝官兵和地主豪绅压迫的台拱苗民，为了保卫家园，与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张秀眉等率苗军节节阻击。但湘军用洋枪洋炮射击苗军坚守的山寨，给苗军造成很大伤亡。不久，台拱周围的据点相继失守，张秀眉见无险可守，便主动退出台拱城。11 月 17 日，台拱为湘军占领。

1871 年 2 月，贵州提督周达武所部 5900 余人，向苗军进攻。连占都匀、麻哈、清平、黄平等城。4 月，席宝田指挥湘军攻陷丹江厅城。5 月，占领苗军的最后一座城市凯里，并向苗军占据的雷公山进逼。张秀眉率苗军撤出雷公山，退守丹江、凯里之间的山区。由于天暑瘴发，湘军停止进攻，战争暂处间歇状态。

（二）乌鸦坡之战与苗军的失败

1871 年 11 月，清军再次向苗军进攻。张秀眉等苗军将领率苗

族军民 20 万人，齐集乌鸦坡（今雷山境）。乌鸦坡虽然“冈峦环抱，叠隘重关”，形势险要，但 20 万人据此弹丸之地，不但没有回旋余地，而且缺乏粮食，形势极为不利。据此，李文彩(原广西天地会起义军首领之一，后投奔石达开)建议“广集苗船，乘春水涨发，引众浮清江东走，径指洪江，下趋常德，以扰湖南腹地”①。但张秀眉等拒绝了这一建议，主张就地坚守，与清军决一死战。

1872 年 4 月 19 日，清军向乌鸦坡发动进攻。苗军用古老的武器与装备洋枪洋炮的清军接战 10 昼夜，清军每攻占一寨，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30 日，乌鸦坡失守，张秀眉等率余部四五百人走雷公山。5 月 7 日，清军开始搜山。张秀眉、杨大六等被俘，后于湖南长沙就义。其他起义军将领则先后或牺牲或被俘。至此，为时 19 年的苗民起义战争在湘、川、黔军联合镇压下最后失败了。

（三）新城之战与回民军的失败

当黔东南苗军在乌鸦坡等地与湘、黔军苦战时，黔西南回民军也正在兴义府城和新城与滇、黔军浴血奋战。

早在 1864 年 10 月，兴义府代理知府孙清彦策动驻守兴义府城的回民军都督马忠叛变。张凌翔、马河图率军讨伐，马忠弃城逃跑。此后，马忠引导清军向兴义城反扑，张凌翔、马河图在战斗中牺牲。1866 年 4 月，回民军再克兴义府城。张、马牺牲后，起义军失去了核心领导，力量逐渐衰弱。

1871 年 11 月，驻守盘江北岸的安义镇总兵何世华率 7 营黔军越过铁索桥，向回民军进攻，占领安南县城，进至贞丰州城下，于 12 月 19 日夜攻占该城。接着，何世华指挥黔军和团练向据守兴义府城和新城的回民军进攻。起义军顽强抵抗，何世华久攻不下，请求增兵。贵州巡抚派记名道吴德溥、总兵文德盛率黔军赴援；云贵总督刘岳昭和云南巡抚岑毓英派云南盐法道沈寿榕、总兵吴奇忠（即吴元彪）等率滇军入黔，与黔军“会剿”起义军。

1872 年 3 月，吴德溥至普安厅，即通知何世华以一部兵力牵

---

① 徐家干:《苗疆闻见录》，光绪四年菊秋抄本，卷下，第 15～16 页。

制新城回民军，集中力量先攻兴义府城。4 月，吴奇忠率滇军赶至兴义，扎营于城南铜鼓山，随即与黔军合力攻城。张福禄、张福荫率回民军婴城固守，并伺机出击，屡败清军。清军施离间计，使中郎将马宗连等人互相猜忌，并暗中投敌。5 月 31 日夜，在马宗连等人内应下，清军攻入城内。回民军 2400 余人战死，张福禄、张福荫投水自尽，兴义府城陷入清军之手。

滇、黔军攻占兴义府城后，便集中兵力向回民军占据的最后一座城市新城进攻。新城虽城坚粮足，但回民军采取单纯守御的方针。清军因攻城未能奏效，便沿城挖长壕作久困之计。回民军被围城中，外援断绝，处境十分困难，但在经略大臣金万照领导下，仍英勇作战，使清军“动辄受创”。1872 年 10 月底，贵州提督周达武抵达新城前线。他认为尽管滇、黔军多达数十营，团练数万人，但强攻伤亡太大，便下令进行“招抚”，派人潜入城内，诱降了一贯动摇的回军首领张定中。11 月 5 日，张定中将金万照骗出城外，让清军捉获，然后回到城中，命令起义军放下武器。清军随即入城，将起义军将士及其家属残酷地加以杀害。金万照被囚送贵阳，英勇就义。至此，黔西南的回民军也最后失败了。

黔西南回民起义被镇压以后，就贵州全省而言，较大规模的起义战争至 1872 年底即基本上结束了。这次由贵州各族人民组成的数十支起义武装，经过长达 19 年的战争，不但控制了广大的村寨，而且先后攻陷府、厅、州、县城 50 余座，摧毁反动政权机构，惩办贪官污吏，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及其在贵州的封建统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和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第二节　云南回民起义战争

一、起义的爆发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境内多山，土地瘠薄，各族人民在清朝

政府、地方官吏、土司头人和地主豪强的重重剥削压迫下，生活异常困苦，以致“聚众抗粮”、“闭门拒赋”等事件时有发生。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之一，有汉、回、彝、白、哈尼、壮、傣、苗、景颇等 20 多个民族，其中回族人数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二。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回族和汉族之间不断发生纠纷，并愈演愈烈。这种情况，使得云南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1855 年（咸丰五年）冬，云南临安府（治今建水）的汉族地主恶霸和楚雄府（治今楚雄）回民为了争夺楚雄府南安州（治今楚雄南）石羊厂银矿，发生纠纷。楚雄知府崔治中等乘机施展挑拨的伎俩，“见临人（按：即临安府汉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①，导致矛盾激化，从争吵发展到械斗。

1856 年春，临安汉族恶霸煽动汉人入南安州和楚雄府捕杀回民。楚雄府的汉族官绅也残暴地屠杀回民。临安汉族恶霸等在广通（今禄丰县广通镇）、罗川（今禄丰县西南）、禄丰等地逞凶之后，拟前往省城昆明屠杀回民，回众起而自卫。新兴（今玉溪）回民首领马凌汉率回民 1000 余人，在距昆明 20 里的小板桥，将临安汉人恶霸打败。这本来是正当的自卫行动，却被统治阶级污蔑为“纠众谋逆”、“阴谋作乱”。云南巡抚舒兴阿和团练大臣黄琮竟“饬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署布政使清盛也下达了对昆明回民“格杀勿论”的命令。②

统治阶级策划的对云南回民的野蛮屠杀，终于迫使回民群众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1856 年 6 月，姚州（今姚安）回民首先起事，7 月攻占州城。各地回民相继响应。在滇西，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蔡发春起于顺宁（今凤庆），杨荣、虎应龙起于鹤庆、丽江；在滇南，马德新（字复初）起于新兴，马如龙起于临安北

---

①② 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下同），（一），第 293、294 页。

面的曲江，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今晋宁），徐元吉起于澂江（今澄江）；在滇东，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回民起义的烽火遍及云南全境。与此同时，汉族和彝、哈尼、白、壮等民族也纷纷起义。哀牢山区李文学领导的彝族人民起义队伍，一开始就同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并肩战斗。其他起义队伍也或者单独作战，或者与回民起义军彼此支援配合，有的则直接参加了回民起义的行列。这时，虽然民族仇杀事件在不少地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以杜文秀为代表的各族人民群众，通过斗争实践，逐步认识到封建官吏和地主武装才是回汉仇杀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从而摒弃民族相仇的偏见，走上了共同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武装斗争道路。

二、滇东、滇南起义军的反清斗争

以回民为主体的云南各族人民的大起义，使清廷大为震惊。咸丰帝立即令正在贵州镇压人民起义的云贵总督恒春折回云南，“痛加剿洗”。但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云南驻军大量外调，剩下的不敷派遣，顾此失彼。回民起义军正是趁此有利时机，迅速发展力量，积极开展反清斗争。

滇东、滇南的多股起义军由各自为战或互相支援发展到联合行动；由对付前来“围剿”的清军和团练武装，发展到主动围攻清军盘踞的城市。1857年夏，马如龙、马德新、徐元吉等率领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2万人，经晋宁（今昆明市晋城）、呈贡向昆明进发。当时昆明城中清军很少，团练也纷纷溃散，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等束手无策，只得紧闭城门，等待援军。7月12日，起义军占据离城5里的江右馆为大营，依托城外村寨，发动对省城的围攻。云贵总督恒春无计可施，自缢而死；巡抚舒兴阿也“引疾乞假”，藏匿家中。

清廷调四川总督吴振棫为云贵总督，带川兵2000人赴任。吴振棫施展拉拢收买回民军首领的伎俩。滇东、滇南起义军的主要

领导人马德新和马如龙都是回族上层分子（马德新是云南回民的总掌教，马如龙则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清朝武生），他们公开声明，起兵"止欲报仇，不敢为逆"①，只要当局惩办"倡首灭回者，以服众心，即行解散"②。由于他们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因此在统治阶级的利诱之下，于1858年春与官方订约，承诺"永不滋事"，并将围攻省城的起义军撤离，散归各地，滇东、滇南起义军第一次围攻省城遂告结束。

三、滇西起义军的胜利发展

（一）大理革命政权的建立

当滇南、滇东回民起义军由于马德新、马如龙等人的妥协遭受挫折的时候，滇西回民起义军在杜文秀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

杜文秀（1828～1872），字云焕，号百香，云南永昌府保山县金鸡村人，回族。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永昌府汉族地主团练组织"香把会"，在官府的支持和纵容下，大肆残杀回民。杜文秀以家属被杀，未婚妻被掳，于1847年上京控诉，但冤仇终不能申。失望之余，他逐渐认识了清政府的腐败，激发起反抗清廷的革命思想。回到云南之后，便在云州（今云县）、蒙化等地暗中组织回民，酝酿起义。

1856年8月，杜文秀在蒙化率众起义。9月7日，杜万荣、蓝金喜在大理府城起义。杜文秀闻讯，立即率起义军前往大理，于9月16日（一说15日）占领大理城。由于杜文秀"精力强壮，忠直廉洁，素为众人所敬仰"③，遂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以原提督署为大元帅府，组织大理革命政权。授蔡发春为扬威

① 《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5，《回民起义》（一），第322页。

② 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见《回民起义》（一），第295页。

③ 〔法〕罗舍：《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李耀商译），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印（下同），第8页。

大都督，总各路军事，其他文武官员也各有职称。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召号，革命满清”，并通令“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①，以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决心。

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杜文秀领导制定了各种法律法令，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革命事业的方针政策，主要是：

第一，平等对待各族人民，改善民族关系。起义之初，杜文秀就提出了“重用汉人”的主张，大理政权建立以后，即实行“不分汉回，一体保护”的方针，对其他民族也采取同样的政策。杜文秀制定的《管理军政条例》规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② 这种平等的民族政策，改善了大理政权控制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第二，减轻人民负担，努力发展生产。大理政权规定废除丁银（人口税）和其它苛捐杂税，田赋只征粮米，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农业方面，发放耕牛、农具，招民垦荒，奖励农耕。对工商业，采取保护和促进的政策，严禁文武官员“以官压市，轻价估买”③，积极发展纺织、采矿、制盐等工业生产。随着生产的发展，不但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使起义军有充足的军饷，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进行。

第三，制定军事制度，严格组织纪律。起义初期，凡属回民青壮年都要当兵。大理政权建立后，规定回族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则分派一定的数额，由其各自出兵。由于起义军具有比较正规的编制，实行统一的指挥，规定严格的军纪，因而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并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

（二）粉碎清军的多次“进剿”

大理背靠苍山，面向洱海，以上下两关为咽喉，地势极为险要。大理革命政权建立之后，杜文秀领导起义军利用良好的地理

---

① 周宗麟等：《大理县志稿》卷 8，见《回民起义》（一），第 29 页。

②③ 杜文秀：《管理军政条例》，见《回民起义》（二），第 118、113 页。

条件，修筑营垒，屯积粮草，进行防御敌人进攻的准备，从而使处于劣势的起义军，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剿”，保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并使起义武装和控制地区不断发展扩大。

宾川团练头目董家兰与太和县逃亡地主豪绅赵云寿、李根香等人组织“义兴营”团练军，联合败退鹤庆的千总张正泰和屯扎姚州的提督文祥所部清军，企图摧毁大理革命政权。1857年夏，文祥指挥清军进攻下关东南的赵州。时值滇东、滇南起义军围攻昆明，滇西起义军便乘机袭击文祥部后路。文祥败退镇南州(今南华)，弥渡和云南县(今祥云)为起义军占领。1859年2月，董家兰指挥团练军水陆两路袭击大理。潜伏在大理城下的数百名练勇利用夜暗，用棺材装火药将城墙炸开，夺占了东门城楼，但从洱海进攻的团练主力因遇到大风浪，未能按期到达，以致对大理的袭击又遭失败。不久，董家兰被起义军击毙，张正泰为其部下杀死，所部团练军陆续被起义军消灭。于是，滇西起义军声威大振，乘机向外发展。

1860年1月，新任云贵总督张亮基奏请以总兵褚克昌护理云南提督，办理滇西军务。褚克昌于3月至镇南州接任。他一面分兵进攻姚州、大姚，一面率主力西进。起义军主动收缩兵力，退守云南县城。褚克昌指挥所部清军进攻云南县城和弥渡、红岩(弥渡西北)等地。面对清军的进攻，杜文秀一面派人发动滇东、滇南各族人民起义，以牵制清军，一面催调正在进攻缅宁(今临沧)的蔡发春率军回援。同时，致书因个人目的未达再次反清的澂江马德新，请求派兵支援，切断褚克昌的后路。马德新命马如龙率部西援，于4月底与李芳园部会合，共万余人，由南安州直逼楚雄。5月3日克广通，5日在广通西南回镫关大败楚雄援军，8日又在小腰站歼清军1000人。21日包围楚雄府城，6月11日攻入城内。清军一部投降，大部被歼。

起义军攻占楚雄，不但切断了清军的后路，而且由于清军官兵的亲属多寓居该城，使许多清军官兵因心系其亲属的安危而无意作战，以致军心瓦解。而此时滇西起义军又从西面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大都督蔡发春于1860年4月底攻克缅宁后，即率领云州、顺

宁、蒙化、缅宁起义军2万余人东下，杨德明等也率大理、蒙化起义军8000余人与之会合，联合向已被清军占领的弥渡、红岩等地进攻。清军粮尽兵溃，游击张玉柱、守备孙占魁率部投降，红岩、弥渡再次为起义军占领。起义军随即进攻云南县清军大营，并分兵一路北攻宾川。这时，马如龙率领的滇东、滇南起义军也先后攻占了南安州、镇南州和定远（今牟定）县城，控制了楚雄府全部州县。褚克昌见云南县清军大营危在旦夕，便以往援宾川为借口率部撤离，仅留守备周士杰等防守。蔡发春便集中兵力猛攻云南县清军大营，全歼守敌，接着又转攻宾川。9月9日，攻破宾川清军大营，再次全歼守敌，并杀死褚克昌。

这时，马如龙自谓有功，不愿居杜文秀之下，竟率滇东、滇南起义军返回澂江。不久，马如龙等第二次围攻昆明，仅10日即被迫撤围。

滇西起义军迅速扫清了大姚、姚州等地的残余清军，各将领乘胜向滇西各地清军发起进攻。至1861年10月，先后攻占了禄丰、安宁、鹤庆、剑川、丽江、永北、永昌、云龙、龙陵、腾越等城，夺回了被清军一度占领的广通等城。至此，西达龙陵、腾越、云龙、永昌，东至楚雄、广通、元谋、禄丰，南至缅宁、顺宁、云州，北抵剑川、鹤庆、丽江、永北，滇西20余厅州县都在大理政权的控制之下。

（三）杜文秀拒绝劝降，坚持反清斗争

1861年底，马如龙联合昆阳杨振鹏和新兴田庆余部回民军，开始对省城的第三次围攻。1862年（同治元年）初，云南府所属各州县大都被起义军占据，昆明成为一座孤城。当时，兼署云贵总督的云南巡抚徐之铭迫于形势，派署提督林自清和署澂江知府岑毓英到起义军中“议和”，用高官厚禄引诱起义军将领投降。马如龙认为机会难得，立即拜倒在敌人面前，声言“世受皇恩”①，“志在报效，历年汉回仇杀，不得已铤而走险，非敢叛逆，今愿率众投诚”②。

① 《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13，《回民起义》（一），第356页。

② 岑毓英：《云南通志》，1948年铅印本（下同），卷109，第25页。

1862 年 3 月，马如龙、马德新、杨振鹏等正式投降，将昆明周围的昆阳、新兴、晋宁、呈贡、嵩明、罗次、易门、富民等城拱手献给清军。清廷授予马如龙“署理总兵”的官职，授予马德新以“二品伯克”之衔。

马如龙、马德新降清后，在云南督抚大臣的授意下，接二连三地对杜文秀进行诱降活动。1862 年夏，马如龙写信给杜文秀，并派杨振鹏前往大理，一面以高官厚禄诱劝杜文秀投降，一面以军事进攻相威胁。杜文秀既不为官禄所动，也不理睬马如龙等的恐吓。在给杨振鹏的信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的所谓和议，“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① 6 月下旬，杨振鹏到达大理，杜文秀严词拒绝，“坚执不从”。1863 年夏，马如龙又派他的亲信马负图到大理劝降，杜文秀斩钉截铁地回答：“马云峰（马如龙号云峰）做马云峰的官，我杜文秀造我杜文秀之反。想我杜文秀归顺，除非黄河水清。不然，万万不能。”② 1864 年，马德新亲自出马，前往大理游说。杜文秀仍然拒绝讲和，并说自己“看不起那些身为革命领袖，倒反去接受压迫者手下的一点官职”③ 的人。这些铿锵有力的言词，表现了杜文秀与清廷势不两立的坚定立场，粉碎了统治阶级的招降阴谋。

四、滇西起义军东征昆明

(参见附图 18)

(一) 东征前的形势

1863 年 6 月，清廷调前两广总督劳崇光为云贵总督。劳崇光

① 杜文秀：《复杨振鹏书》，见《回民起义》(二)，第 105 页。

② 马负图：《马负图私记》，见《回民起义》(二)，第 376 页。

③ 〔法〕罗舍：《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第 31 页。

令署云南提督马如龙防守省城，筹集粮饷军火；令署理布政使岑毓英率军进攻滇西。8月，岑毓英率清军从昆明出发，于11月20日占领楚雄。此后，岑毓英以楚雄为基地，分兵向大理进犯，逼近大理的南北门户上下两关。1864年2月，起义军在上关大败清军，并收复邓川、浪穹（今洱源）、鹤庆、丽江；不久，又败敌于下关，收复云南（县）、赵州、弥渡。杜文秀乘胜派马得才率军从弥渡、三街间道插到镇南清军侧后，突然发起猛攻。清军大败，狼狈逃回楚雄。

粉碎岑毓英部清军进攻之后，杜文秀领导滇西起义军乘胜向外发展，南面达于镇沅，北面达于维西。至1866年初，起义军控制了滇西23座城市，对清廷在云南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云贵总督劳崇光认为"当以征剿迤西为急"①，积极部署对大理的进攻。

1867年2月，署云南提督马如龙率兵练8900人由昆明出发，并指挥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楚雄协副将李维述、参将杨先芝、游击合国安、昭通镇总兵杨盛宗、腾越镇总兵田仲兴、普洱镇总兵李锦文等部清军和地方团练，分数路向滇西进攻。起义军除在各地坚守外，杜文秀又派出部队袭击清军后路。清军惊慌失措，李维述败于镇南，杨振鹏溃于宾川，杨先芝、合国安溃于姚州，楚雄、大姚两地清军告急。杨盛宗、田仲兴等也因粮饷不继，分别从永北、蒙化、威远等地败退。马如龙见败局已定，遂托病从定远撤军，逃回省城。回民起义军占领定远、大姚之后，进而包围了楚雄。

在马如龙进攻滇西之前，杜文秀虽然拒绝了马德新、马如龙等的诱降，但由于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与他们撕不破脸皮，反而与之达成协议，以楚雄、镇南东西分界，"各守疆界，各行其是"②，"不相侵犯，仍通互市"③。为恪守协议，杜文秀主张首先

① 《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27，《回民起义》（一），第408页。

② 杜文秀：《复杨振鹏书》，见《回民起义》（二），第107页。

③ 岑毓英：《云南通志》卷110，第37页。

巩固滇西，必要时向川、黔发展，以避免与二马发生冲突。迨至马如龙进攻滇西，首先毁约，杜文秀才感到如果仍遵前约，无异于作茧自缚，加上这时云南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劳崇光病死后，新任云贵总督张凯嵩托病逗留四川，新任云南巡抚刘岳昭所率湘军尚在贵州，布政使岑毓英率所部清军赴贵州镇压猪拱箐苗民起义未归，仅马如龙率1.5万人龟缩省城。因此，杜文秀提议趁机东征昆明，并为绝大多数起义军将领所接受。

为大举东征，杜文秀发布了《帅府布告》、《誓师文》、《兴师檄文》等文件。在《誓师文》中说："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发明宗旨。但得汉回一心，以雪国耻，是为至要。"① 同时，传檄全省："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可恶妖官"置苍生亦〔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② 这些文告，控诉和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制造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仇杀的罪行，进一步阐明了以反清为主要目标的革命立场，提出了团结回、汉等各族人民共同进行斗争的方针政策，有利于从政治上打击敌人，动员和争取各族人民积极参加东征昆明的战争。

（二）进围昆明和昆明外围的激烈争夺

粉碎马如龙对滇西的进攻后，杜文秀调集起义军10万人（一说20余万），由18大司统率，分兵4路，于1867年夏向省城昆明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其部署如下：北路由大司衡杨荣、大司阃马旭、大司勋米映山率领，从定远出发，占领琅、黑、白等盐井及罗次、武定、富民后，进攻昆明城北；西路由大司政刘诚、大

---

① 杜文秀：《誓师文》，见《回民起义》（二），第127页。

② 杜文秀：《兴师檄文》，见《回民起义》（二），第131页。

司令马清、大司藩安长兴、大司隶刘纲率领，在占领禄丰、易门、安宁、碧鸡关后，进攻昆明城西；东路由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等率领，从大姚出发，攻占元谋、禄劝、柯渡、杨林等地后，攻昆明城东；南路由大司戎马国春等率领，在占领楚雄、南安、广通等地后，攻昆明城南。杜文秀坐镇大理，指挥各路大军。

防守昆明的清军，是马如龙所部残兵败将，无法与起义军相抗衡。正在贵州与起义军作战的云南巡抚刘岳昭，令业已镇压了贵州猪拱箐苗民起义军刚回到云南的布政使岑毓英“严扼曲靖，控制省城”①。岑毓英驻军曲靖，派出1.1万余清军赴援昆明、楚雄等地，企图阻挡起义军向昆明的进军。起义军分路并进，于1867年9月至12月，连陷广通、禄丰、南安、元谋、武定、禄劝、楚雄等城，控制了滇西全境，军锋直指昆明。

1868年2月19日，杨荣等部北路军攻陷富民，西路军占领安宁。20日，上述两路起义军进至昆明城郊：北路军由富民进占昆明西北的团山、大普吉、梨烟村、夏家窑一带；西路军由安宁攻占昆明西面的碧鸡关、高峣、梁家河、普坪等村寨。28日，南路军攻陷易门。起义军东征的节节胜利，使清军中的许多回族将领备受鼓舞，昆阳杨振鹏、新兴田庆余、澂江张元林、曲靖马天顺、寻甸马世德等，“悉举所据地方响应”②，杜文秀均授予大司之职。3月9日、10日，在杨振鹏、田庆余等配合下，南路起义军袭占了晋宁、呈贡，随后进占昆明城南的西岳庙、五华寺等处。至此，起义军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昆明城。但是，兵力居于优势的起义军不是一鼓作气向昆明城发动猛攻，而是列兵城下，筑墙挖壕，企图凭借坚固的营垒“坐困”清军。这种持久围困的方针，使清军争得了时间，以调整力量、调派援军向起义军反扑。无疑，这对于远离根据地的起义军是极为不利的。而且，起义军对城东金

① 《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30，《回民起义》（一），第420页。

② 周宗麟等：《大理县志稿》，见《回民起义》（一），第36页。

马寺至宜良的通道没有完全截断，城内清军仍可由此得到粮食接济以苟延残喘。

1868年3月6日，岑毓英督率3万余清军，由曲靖赴援昆明：游击杨玉科率兵一部绕道四川会理，出奇兵抄袭起义军后路；岑毓英自率主力，进攻昆明城外的起义军。为了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岑毓英扬言师出陆凉（今陆良），实际取道马龙、宜良，于3月14日秘密地进至离昆明70里的七甸，进而占领了大小石坝、小板桥、官渡等地，切断了呈贡和江右馆起义军大营之间的联系。在击退起义军对小板桥要隘的进攻后，清军又攻占了昆明城东金马寺、古庭庵、大树营等地。这样，就打通了省城东面的通道，保证了城内外清军的粮饷供给。

岑毓英指挥清军继续向江右馆、石虎冈等起义军据点进攻。为了牵制进攻的清军，并重新控制滇东通道，驻守晋宁的大司治张元林在击败临安兵练之后，乘胜进攻呈贡清军；蔡廷栋、李芳园联合寻甸、嵩明等地起义军猛攻杨林清军。岑毓英“以杨林为东路咽喉”，只得“先其所急”，于5月7日率部增援杨林。

5月上旬，新任云贵总督刘岳昭率2万余清军由贵州毕节到达曲靖，他认为“必须进攻寻甸，方可早解省围，兼保东路”①，因而决定亲率所部湘军往攻寻甸，令新任云南巡抚岑毓英配合马如龙解昆明之围。岑毓英在解了杨林之围后，于7月初回到昆明城外距城12里的响水闸大营，继续向昆明城郊起义军据点进攻，占领了地处呈贡、宜良进省要道上的石虎冈和另外几个据点，但由于寻甸、澂江、新兴等地起义军不断供应粮米弹药，围城起义军仍可以凭借工事长期固守。于是，岑毓英决定由马如龙坚守昆明，以一部兵力牵制围城起义军，而以主力围攻昆明外围州县的起义军，企图先“去其羽翼”，然后集中力量消灭孤立无援的围城起义军。这样，清军在昆明外围东、南、北三个战场上，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

① 《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33，《回民起义》（一），第434页。

呈贡、晋宁之战　岑毓英到昆明以南的呈贡前线时，正值晋宁和昆阳起义军前来援救呈贡，他趁晋宁城内起义军兵力薄弱之机，令署总兵梁士美部偷袭晋宁。梁士美遣其弟梁士伟率军绕过起义军营垒，于8月20日凌晨前抵达晋宁城外，夺门而入。大司治张元林率起义军英勇反击，驻扎城外的起义军也入城作战，挫败了敌人一举夺占晋宁城的阴谋。以后，岑毓英又派兵攻城，并切断了晋宁城守军的援路。但张元林仍率部在城内与敌人相持。

岑毓英见晋宁一时难以攻下，便令清军猛攻呈贡。9月29日，清军架梯登城，冲入城内。起义军与清军展开巷战，大将军马开义等3000余人英勇牺牲，呈贡失守。

清军攻占呈贡后，岑毓英即令一部清军攻澂江，一部清军助攻晋宁。在击退起义军援军后，于11月3日夜对晋宁发起总攻。经一天一夜激战，起义军将士千余人壮烈牺牲，张元林仅率少数人突出重围，转移至澂江。11月27日黎明，在暗中向清军乞降的张元林接应下，清军攻入澂江，中郎将张鹏程等千余人在战斗中牺牲。

清军在南面战场上的胜利，打通了由省城通滇南的通道。起义军由于丢失了呈贡、晋宁、澂江，昆明城下部队的侧后暴露在敌人面前，处境十分不利。

富民、武定之战　为了牵制起义军的兵力，截断围攻昆明起义军的后路，杨玉科奉岑毓英之命，率清军数千人由东川绕道四川会理州，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于1868年3月相继攻占了大姚县的苴却（今永仁县城）、元谋等地；4月、5月，又占领武定、禄劝、罗次。随后，杨玉科率清军向富民进攻。

杨玉科部的迂回行动，威胁着起义军的后路。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杜文秀派大司卫姚得胜等率军数万由大理东援。6月中，起义军由大姚、禄丰、富民三路齐进，分攻元谋、罗次、武定。杨玉科连吃败仗，退守罗次。驻守富民城的大司衡杨荣率起义军尾追敌人，与禄丰起义军一起进攻罗次城。杨玉科率部退守武定，修筑土城碉楼，妄图扼险顽抗。起义军以湿木柴堆积成比

城楼还高的柴楼，上面架设枪炮，轰击城内清军。柴楼遭清军破坏后，起义军又挖掘地道，埋设地雷炸城，于11月1日占领了武定州城和禄劝县城。

寻甸之战 1868年3月，当滇西起义军进至昆明城郊时，马如龙部将杨先芝、马天顺、马文成等率部倒戈响应，随即东进占领了昆明东北的门户寻甸和嵩明州城，与围攻昆明的起义军相互呼应。当时，因清军兵力不足，无力顾及寻甸、嵩明。

刘岳昭于5月7日率军到达曲靖后，经过3个多月的准备，于8月督率所部湘军和新募黔勇2万余人，向寻甸进攻。其部署是：总兵李家福率部自马龙进，总兵谢景春率部自沾益进，总兵全祖凯率部自功山进。8月9日，李家福部占领了寻甸东北的七星桥。接着，谢景春、全祖凯等部也相继夺占了清水沟、金所等要隘。清军扎营于近城的文笔山、凤凰山、望城坡等处，用大炮不断地向起义军轰击。起义军固守城内，顽强抵抗，清军久攻不下。12月，四川候补道刘岳曙（刘岳昭之弟）率领湘军2800名由贵州赶至寻甸增援，但仍无进展。

大司卫姚得胜、大司衡杨荣于攻占武定之后，即转旗东向，于1869年1月21日进至寻甸城下。30日夜，起义军突袭望城坡清军，敌营中大火突起，全祖凯部四处逃散。次日黎明，总兵谢景春部仓皇撤退，副将贺连璧也弃营逃窜，起义军乘胜占领七星桥、草坝等地。2月1日，起义军向文笔山清军大营发起攻击，清军纷纷败退，寻甸随之解围。

（三）东征的失败

昆明外围东、南、北三个战场的激烈争夺，起义军和清军各有胜负，总的形势是双方处于相持状态。岑毓英进驻昆明后，即派总兵李维述、参将张保和等配合杨玉科部向北线进攻，从1869年1月中旬到3月上旬，先后占领了富民、禄劝、武定、罗次等地。同一时期，杨荣、姚得胜率所部起义军在东线作战。当杨玉科率部进攻武定等地时，杨荣、姚得胜为牵制清军，由滇东向昆明进军，于3月一举攻占省城东北重镇杨林，旋又乘胜占据城东

小偏桥、十里铺、羊房凹、牛街、兴福寺等地。4月，由马周率领的一支回民起义军也乘澂江空虚袭占了该城。

岑毓英慌忙调集杨玉科、张保和、吴永安、徐联魁、李廷标诸部救援省城。起义军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部之间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因而没能趁此有利时机打击敌人，特别是屯兵昆明城下一年有余，粮弹时缺，疫病流行，部队减员很大，士气开始低落。岑毓英利用这一时机和起义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向小偏桥一带猛攻。清军采取分割战术，将起义军隔为数段，然后各个击破。至6月初，小偏桥、十里铺、长坡等要地均被清军攻占，起义军伤亡万余人。清军攻占小偏桥、长坡等地后，即向杨林进攻。6月11日，起义军撤出杨林。接着，岑毓宝由杨林、杨玉科由昆明合攻嵩明。在清军威逼之下，守将大司寇李芳园、大司平马兴堂挟持杜文秀派到前线监军的女儿蔡杜氏（蔡廷栋之妻）于6月13日不战而降。在此期间，刘岳昭部湘军向寻甸进攻。留守寻甸的大司理马天顺等于6月20日率部投降。至此，清军完全控制了昆明以东地区。

岑毓英和马如龙调集大量清军回昆明，准备向城外起义军实行全面反攻。1869年7月，清军首先进攻城南起义军阵地。至8月初，先后攻占了李家地、老鸦营、大营寺等地，切断了城西起义军和江右馆大营的联系。岑毓英一面派清军分别进攻昆阳、安宁、广通、元谋、易门；一面施行离间计，使起义军将领之间互相疑忌。大司疆段成功粮尽，求借于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和大司令马清，蔡、马都不借给。9月18日，段成功遂向清军投降，将城南西岳庙一带20余处营垒全部献给清军。清军乘机向城南、城西、城北起义军进攻。起义军营垒多被攻破，仅存城南江右馆、城北马村、城西土堆三处。9月20日，清军合攻江右馆，起义军总理内阁大监军杨崇章被俘，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徒安文义退守棉花行。马如龙亲临喊话，要求起义军首领“自相擒献”。在敌人的威逼下，蔡廷栋竟将安文义出卖给清军，向敌人屈膝投降。9月21日夜，驻守马村的大司勋米映山率5000名起义军突围，转移至

城西土堆，与大司政刘诚率领的2000名起义军共同坚守，但其后路已被切断，对省城不再有多大威胁。这样，滇西回民起义军从1867年开始的东征宣告失败。

东征昆明是杜文秀起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云南以回民为主体的包括汉、彝各族人民在内的反清斗争的最高峰。它的失利，是云南回民起义战争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五、大理保卫战

（一）战前形势

滇西起义军东征昆明失败之后，云南清军和起义军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军已逾10万，而起义军的力量则大大削弱了。占滇西起义军总兵力一半的10万东征大军，是最精锐的部队，几乎完全损失在东征战场上。形势已越来越有利于清军而不利于起义军，因此，岑毓英决定进军滇西。

为了进攻滇西，岑毓英一面派清军扫清土堆等残存的起义军据点，并向南安、楚雄、定远等地进攻，以稳定省城局势；一面派人分赴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地，催调协饷。总督刘岳昭也于10月7日由曲靖进驻昆明，留总兵谢景春部分防曲靖、马龙、寻甸等处，保护粮道。

在攻占南安、楚雄、定远等地之后，岑毓英即指挥清军分三路向滇西大举进攻。其部署如下：南路由迤南道张同寿、署普洱府知府许继衡等率领，由普洱进攻威远（今景谷）、缅宁，以牵制大理以南各地起义军；北路由永北厅同知刘昌笏等进攻永北厅城，署维西协中军都司张润等率部自维西进攻丽江府城，以阻止鹤庆、丽江、邓川、浪穹等地起义军南援大理；中路是主力，由杨玉科率部进攻姚州，都司张士进率部进攻镇南，都司钱大川等率部进攻云南县，守备陈定邦等率部进攻宾川，都司王钟祥等率部进攻弥渡，署镇沅州同知尉迟品玉等率部进攻镇沅与景东接壤之马街一带，待姚州得手后，直攻大理。

为了保卫大理，阻止清军长驱直进，杜文秀采取重点防守姚州、镇南等地，以一部兵力节节阻击的方针。

（二）大理外围的激战

姚州是起义军最早占据并大力经营的城市之一。它东界定远，北接大姚，南连镇南，有大理屏藩之称。1869 年 10 月，杨玉科率部包围了姚州城。大司军马金保和大将军蓝平贵、大都督契有明率领起义军依托环城修筑的碉楼营垒，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12 月中旬，清军攻占禄丰后，岑毓英增调总兵李维述部与张士进部合攻镇南。镇南为大理门户，起义军全力据守。由于起义军在姚州和镇南顽强抵抗，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杜文秀组织兵力阻击清军在其它方向的进攻赢得了时间。

1870 年初，南路清军占领缅宁，北路清军占领丽江、剑川，中路助攻部队刘兴、王钟祥、丁跃龙、段瑞梅、钱大川、陈定邦等部，突出冒进，先后占领了弥渡、浪穹、邓川、红岩、云南驿和宾川等地，逼近大理。为了保卫大理，杜文秀派大司衡杨荣率部赴援云南县，并分兵进攻孤立冒进的清军，收复了邓川、浪穹、弥渡等失地。4 月初，杨玉科部挖地道炸开姚州城墙，进入城内，5 月 1 日全部占领该城。起义军将领马金保、蓝平贵被俘，契有明自焚而死，部众 6000 余人壮烈牺牲。在镇南，尽管岑毓英调派开花炮队支援，但仍无进展。

岑毓英认为，清军西进缓慢并屡次失利的原因，一是滇东南尚未肃清，不能集中全部兵力进攻滇西，特别是“澂江、新兴两城，围久不下”，“实为省城肘腋之患”；二是军队纪律不严，诸将各不相下。因此，决定由马如龙亲率兵练与总兵田仲兴部合攻新兴；岑毓英亲率兵练往攻澂江。进攻滇西的各部清军则区分任务，各专其责：委杨玉科署鹤丽镇总兵，督办大理、丽江军务；委总兵李维述负责蒙化、赵州、云南军务。杨玉科派段瑞梅、蒋宗汉、徐联魁、冯长寿等各率所部分援邓川、浪穹、宾川、云南县等地清军。起义军和清军在上述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各处得而复失，数易其手。

1870年9月3日，北路清军占领了永北厅城。9月15日，杨玉科联合北路清军攻占鹤庆，接着率军南下，于10月底11月初夺占浪穹、邓川，进攻上关。至此，大理以北各州、县城尽为清军占领。

在大理东南，起义军和清军的争夺战也很激烈。1870年9月21日，李维述部占领镇南，随后向云南县进攻。弥渡等地数次为清军占领，起义军又几次夺回。1871年5月，徐联魁等部进攻下关，也为杨荣部击败，退回宾川。刘岳昭、岑毓英鉴于以上情况，令杨玉科部清军转攻为守，待秋收以后继续进攻。

在大理西南，起义军坚守腾越、永昌。鉴于永昌为大理西南屏障，杜文秀令东征时投敌后又逃回的蔡廷栋、段成功各率所部往援。但蔡廷栋竟派人刺死段成功，兼并其众，于1871年6月25日占领永平，置永昌于不顾。在此期间，杨玉科却派蒋宗汉等率军1万增援围攻永昌的参将李凤祥部，于9月7日攻占永昌城。

1871年秋，岑毓英复令各部清军同时向起义军发起进攻。于是，杨玉科部围攻永平，李维述、杨国发部急攻云南县，企图进而东西夹攻下关。11月，清军在攻占云南驿之后，李维述令参将李栋材率部进攻弥底（蜜滴）、瓦录、天生营等处。这一带是彝族聚居区，彝族起义军领袖李文学接受杜文秀授予的“大司藩”称号，负责镇守哀牢山区。清军攻瓦录逾月不下，李栋材中伏而死。起义军因胜而骄，遭清军袭击，弥底、瓦录、天生营一带遂于12月失陷，李文学突围他走。

1872年春，杜文秀派杨荣、蔡廷栋率援军由南涧、古郎一带攻云南驿等地，欲截断清军后路，但在小桥一带作战失利退回。5月初，清军攻占弥渡、红岩、南涧等地之后，李维述、杨国发遂率清军合攻云南县，于22日占领县城。杨玉科部清军已于3月4日攻占曲硐（永平南），4月21日占领漾濞。当得知李维述等已占领云南县城时，杨玉科立即赶至云南县，部署向赵州进攻。6月8日，赵州陷落，清军进逼下关。

6月9日，杨玉科指挥清军同时向上下两关发起进攻。上关和

下关各距大理数十里，是大理的南北门户。起义军在上下关均筑有石城，城外又筑起数道长垣。驻守上关的是马国玺、马锡晋，驻守下关的是蔡廷栋。由于起义军防守严密，清军几次进攻均遭失败。后杨玉科侦知驻守下关清风桥和天生桥的董正兴、鲁达不是回民，便派人“招其来降，约期内应”。同时，派出兵士扮作盐贩，混入关内，收买居民，以配合清军的进攻。6 月 12 日，清军又发起进攻，蒋宗汉部翻越点苍山斜阳峰，鲁达投降，清军抄入关后。幸大司勋马荣耀率援军赶到，截其归路，清军狼狈逃窜。杨玉科急派 1000 余人渡过洱海攻起义军营垒。驻守下关外关的董正兴投降，清军夺占清风桥，进入内关。蔡廷栋、马荣耀退守大理，下关遂为清军占领。同日，上关也被段瑞梅、李应举等部清军攻占。

（三）大理失陷与起义的最后失败

进入上关、下关的清军达十余万人，大理城内的起义军连同家属老小仅五六万人，力量相差甚大。尽管如此，杜文秀和起义军将士仍然毫无畏惧，决心与清军战斗到底。

1872 年 6 月 12 日，清军乘胜从南北两面向大理发起进攻。当南路清军进至离大理城仅一里左右、北路清军经喜洲进至湾桥时，杜文秀命杨荣等率起义军主动出战，予敌以迎头痛击。清军大败，蒋宗汉等率南路退至太和村，段瑞梅等率北路退至喜洲。正在这时，进攻蒙化的李维述部清军告急，杨玉科率 2500 人往援。大理起义军随即出击，大败清军蒋宗汉、徐联魁部。

6 月 22 日，清军攻占蒙化城，杨玉科回到下关，继续部署进攻大理。清军采取步步为营战术，对大理周围村寨和起义军营垒逐点攻击。起义军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但终因兵力不足，武器不如敌人，城外百余碉楼营垒陆续失守。11 月初，清军进至城下，包围了大理城。

起义军在城周围挖有壕沟，壕边修有隐蔽的地下工事数十座，并有地道与城里相通。清军进至壕边时，隐藏在工事里的起义军通过工事的暗孔向敌人射击，清军屡进屡却，死伤颇多。后清军引苍山溪水淹灌地下工事，迫使起义军退回城里。清军随即越过

城壕，筑起高过城墙的炮台数座，用大炮不断向城内轰击，同时开挖地道，准备炸城。

12月10日，清军地道挖成，炸开东南角城墙，攻入城内。起义军顽强抵抗，清军死伤甚众，被迫退出。以后，清军又多处挖地道炸城，攻入城内，起义军拚死反击。至17日，清军终于占领了城内校场、莲花池一带，起义军退至西北半城。20日，清军又到援军5000余人，杨玉科改单从东南一个方向进攻为四面同时进攻，将开花炮20门排列城上，昼夜轰击。起义军营垒碉堡大半被毁，形势十分危急。杜文秀决心与清军决一死战，至万难固守之时再弃而他走，或率全家老小投洱海以殉。但杨荣、蔡廷栋思想动摇，暗中向清军求降，并力劝杜文秀出城投敌。杜文秀考虑到“与其陷万人于锋镝，曷若捐一驱〔躯〕以救生灵”，遂决意出城“请罪伏诛”，以求“过咎归某一人，法律休波万姓”。①12月27日，杜文秀服毒后乘轿子到达杨玉科大营。杨玉科将其头割下，向岑毓英报功。岑毓英从离大理120里的红岩赶到大理，纵兵血洗大理城。

大理陷落后，岑毓英移兵攻顺宁、云州、腾越。1873年3月至5月，上述3城先后被清军攻陷。至此，坚持了18年之久的云南回民起义完全失败了。

六、滇西回民起义军军制

在中国近代农民起义武装中，除太平军的军制最正规、严密，捻军的军制虽然松散却有一定的特点外，滇西回民起义军的军制也有某些值得重视的特点。

（一）指挥体系及军队编成

① 《杜文秀的两件文稿》（宋文熙辑），《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1期，第20～21页。

1856年（咸丰六年）9月，云南滇西回民起义军领袖杜文秀率部攻陷大理，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10月，建立革命政权，号“平南国”，厘定官制，职分文、武。文职最高官员为总理军机大冢宰，其下依次有：总理军机大参军、总理军机正参军、总理军机左参军、总理军机右参军，军机大参军、军机正参军，大参军、左参军、右参军，吏科参军、户科参军、礼科参军、兵科参军、刑科参军、盐科参军、参议、参谋、行参、承审司、主治、主政、从事、主簿、总理书、司务、硝局、兵营官庄、兵营税务等官职。武职最高官员为大经略，其下依次有：大都督、大司、大将军、将军、都督、中郎将、大翼长、监军、冠军、领军、都指挥、指挥、都尉、监尉、校尉、翼长、先锋、忠翊卫、骁卫、都统制、统制等官职。其中大都督有的冠以不同名号，如扬威大都督、总理赵州大都督、干勇大都督、仁信大都督等。被任命为大都督的数量较少。大司按字编排，如大司徒、大司军、大司农、大司戎、大司寇、大司马、大司令、大司衡等，据现有史料统计约有40余人。大将军一般都冠以不同名号，如彪旗大将军、前凝大将军、前军大将军、辅军大将军、东卫大将军、征北大将军等，有史料可查的约有六七十人。将军，有冠以名号的，如龙威将军、振武将军、惠敏将军、宣仁将军、铁骑将军，以及左将军、右将军、前将军、后将军、二将军等。都督，也有冠以名号的，如镇军都督、二都督、四都督等。凡冠以名号的比未冠名号的职位要高。上述文、武各职，基本按职位高低排列。由于史料不全，很难做到完全精确。

就军事体制而言，分中央、地方、行营三级。

中央帅府设精悍的军政决策机构。一般选调“见识宏大，老练谨慎官员数员，无论文武，凡有军机大小事件，元帅传集商酌，并先会议妥当，或可或否，请元帅钧裁施行”①。这个机构，实际担任中央司令部的职能。参加这一机构的成员，一般为大冢宰、大

① 杜文秀：《管理军政条例》，见《回民起义》（二），第111页。

参军、大经略、大都督等。

地方分设将领镇守。军队每攻占一地，即派将军、中郎将等镇守，其属员有参谋、参军等，均归大将军统率。重要地方则派大司镇守。据1866年（同治五年）10月云贵总督劳崇光对35个州县及要地调查，由杜文秀分派各地的守将计有：大司13人，将军15人，都督5人，中郎将1人，参军1人。

行营战斗部队。一般派都督指挥，属官有都指挥、都尉、监尉、校尉等，统归大都督统率。

军队的具体编制，以10人为什，什有什长；10什为棚，棚有参军或参谋；每三五棚由统制或都统制统率；10棚以上由将军或都督统率；将军、都督以上则有大将军、大司，再上则有大都督、元帅。凡遇重大军事行动，由中央派出统带官，作为大元帅的代表，所有带兵官均受其节制。如10万大军围攻省城昆明时，杜文秀即派其女蔡杜氏到前线监军。

杜文秀对军官的选拔、晋升要求比较严格，规定："保举官员，须审查才能，酌量功勋。果然堪授此职，方可保举前来。亦须循序渐进，勿得越级滥保。若有不论才能功勋，或私自受贿，或亲故滥行保举，实属不重名器。一经查觉，本人罢职，该保举官滥保一员，降一级，二员降二级，如至十员以上，罢职。"①

（二）军事纪律条例

杜文秀在起义后发布的《管理军政条例》，对地方官吏和军队官兵提出了具体而又严格的要求，体现了他希望地方官吏做到清廉自奉、勤于政事，军队官兵做到上下同心、令行禁止、勇敢杀敌、秋毫无犯的良苦用心。现将军队纪律条例抄录如下。

关于军令执行28条：

1、发兵征讨地方，须委统带官一员，即如元帅亲临。所有各将官，无论何职，务须听号令，勿得违抗。如违，准管带官按所订军令认真惩办，而统带官亦须秉公提调，量能委派，不得于所

① 杜文秀：《管理军政条例》，见《回民起义》（二），第111页。

喜之人委以平顺之事，故意使之成功；亦不得于所恶之人，委以凶险之事，故意使之获罪。如违，实属存心偏袒，有负委托至意，应参处拿问。

2、各将官奉统带官差委，或出扎先锋营，或出外巡风，或攻打接应，或接应子药粮草等项，务须札到即行，勿得抗拗推诿。如违，无害于事，罢职；有害于事，拟斩。

3、发兵征讨贼匪，无论何员，统带官所请赏号银两银牌什物各项，须择委公正廉明干员，以两员随营管理。如官兵有功者，或应赏银牌，或应赏银两以及什物，亦或负伤官兵应赏药料银两等项，由统带官酌定数目给飞，向该管官处请领。该管官须问明给赏原因，登明簿记，俟凯旋之日造册呈报，以凭核算，悬榜晓谕。

4、将官奉委出扎先锋营，被敌人围攻，由卯至戌，而无援应，或坚守数日而无救援，亦或营中子药粮米缺欠，水道被阻，一旦失守，免议，仍饬随营立功。如子药等项不缺，不待援应兵至，倏然退让，无害于事，带兵官杖一百，罢职，仍饬随营立功赎罪，其余将官分别议处。如系紧要营垒，有关大局，无故退让，以有害大局论，带兵官斩首示众，其余将官概行罢职。

5、带兵官发给赏号，须论功大小，秉公赏给。如有徇私偏赏，以及挟仇不赏等弊，一经查觉，降一级。至该管奖赏官员，如有私吞或与统带官串通鲸吞等弊，一经查觉，分别治罪。自十两以至五十两者，除追缴外，罢职；自五十两至一百以上者，拟斩。

6、将官奉札调遣，札上限定日期，须按期立至。如违期不到，无害于事，违一日，降一级；违至两三日者，罢职。如札委攻打接应，或援应别处，达时不至，使营垒失守，有害大事，带兵官斩首，其余罢职。

7、带兵官奉委扎营，被敌人围攻，势至危急，不能坚守，意欲退让。其余将官严督兵丁努力保守不让，保全营盘。无论先锋翼长等职，准其越级加升，带兵官罢职。

8、带兵官攻打敌人营盘，无论将官兵丁，如有奋勇立功，带兵官须认真详报。若隐瞒不报，使众兵生怨，查觉，带兵官降一

级。如官兵本属无功，而带兵官或因亲故，冒报有功，希图奖慰，查觉，降一级。

9、带兵官攻破城池村寨，所得银钱货物多寡，无论银钱在数百数千数万，货物至十驮百驮千驮，须禀报统带官归入大公，以充军需。对于禀报官兵，量银货多寡奖赏。若官兵不报，私自瓜分，或以多报少，一经查觉，除追缴外，官责五十军棍，兵责一百，插耳游街。倘若官已报入公，而统带官又私自肥己，不报帅辕，或以多报少等弊，一经查觉，自五十两以上至一百者，降一级；自一百至二百以上者，除追缴外，倍罚，罢职。

10、带兵官攻开城镇村庄，但得粮草，必须禀报统带官查封。（违者）一经查觉，官则罢职，兵则插耳游营。

11、带兵官攻破城池营垒，所得子药硝磺军需等项，必须禀报统带官，运入大营保存。对于禀报官兵，量所得多少，以便奖赏。倘若不报，任意糟踏焚烧，一经查觉，官则罢职，兵则插耳示众。

12、带兵官攻破城池，三日内招抚流离，不准奸淫抢掳，焚烧民房，亦不准擅自杀人，借故复仇等情。（违者）一经查觉，不论官兵，按军法斩首。

13、带兵官经过（敌）投诚地方，如有揿① 入村寨，妄动一草一木，奸淫吓诈等情，查出，不论官兵，均枭首示众。

14、带兵官发兵征讨地方，必须随地办粮，派钱粮官二三员，管理粮草收支等事。如有盗卖糟踏等情，该管粮官应得斩罪。至于各营有冒支多领，盗卖粮草等弊，亦应得斩罪。

15、带兵官凡遇敌人前来投诚，不论何营官兵相遇，须禀明统带官，问明虚实，毋得阻拦惊吓妄杀。违者枭首。

16、带兵官攻破紧要营垒一座，统带官奖银百两，加升。其余官兵，论功大小奖赏。带兵官给银百两，大小兵丁均论升赏。

17、带兵官对敌阵亡，每兵恤赏银五十两，官则分品级高下，

---

① 音争 zheng，引的意思。

从优抚恤。负伤官兵由统带官派员查验，果系头部血伤，重则赏银三十两，轻则赏银二十两，各记一功。若是退缩背伤，勿论受伤轻重，概赏钱三千文。

18、带兵官不论何职，应带兵若干，须先事禀请元帅核示分拨，毋得擅自调用。若事处紧急，有刻不容缓之势，准先调后禀。如违，参处拿问。

19、军官犯令，不论官阶大小，轻则由统带官按军法治罪，重者禀请元帅钧裁施行。若是兵丁犯法，轻则由带兵官分别惩究，重则禀请统带官严办。

20、文武官镇守地方，出阵防敌，须先禀元帅调遣，不得借故趸回，亦不得借端请假。若请假，须待回文批准，然后离职。若不待回文准否，擅自趸回，如无害于事，罢职；如去后，地方生变，营垒有失者，立即枭首示众。

21、带队各军官及大小兵丁，设有紧急事务，请假回籍，须向统带官请假，俟批准方得回家。若系不准，私行者，官则罢职，兵则斩首。

22、带兵官沿途需用夫役，带兵一百名，准其用夫二十名；每千名，准其用夫二百名。而带兵官务须将所管兵丁，共有若干，从实造册呈报统带官，以便沿途按数派夫。如有不遵军令，多用至十名或二十名，或经地方官禀报，或被人民具控，统带官降一级，其余军官罢职，兵丁首晋者拟斩。所有军装、大炮、铺盖、子药，用夫抬送。其余枪刀杖矛，必须个人佩带，不准离身。若带兵官放纵不问，任其行动者，官罢职，兵丁分别拟斩。

23、军官兵丁，如遇对敌交锋，破获首级，夺获旗帜，舍身扑栅，抵住敌人，应着统带官查明，官则加升，兵则授职，不论资格，只论勇敢。

24、带兵官攻夺城池地方，无论官兵，分作三股或四股下坝。头一股逼近省（城）垣，而他股不到者，住扎三日而他股不续进者，实属害于大事，带兵官罢职，其余军官降级。

25、带兵官办理招抚、捐输、投诚，各军官必须遵统带官酌

数分派，不得各逞意见。受民私贿者，查明斩首。

26、带兵官出阵，必须官兵平分两半，一半守营，一半出阵。若遇战败，统带官不督队，降二级。如统带官奋勇争先，而各军官畏缩退后，恐遭不测，（以致）尸首暴露者，不论大小，官兵立即正法。至将军、都督、都指挥、都尉、监尉、校尉、翼长，以及先锋、忠翊卫，骁卫、都统制，恐领兵上阵，有负伤捐躯，以及抛去尸首不顾者，拟斩。

27、文武军官，为数较多，难以枚举。如不在阵前，砍得首级，夺获旗帜，不能加升官职。若破开营垒，砍获首级三颗者，记功一次。倘能挤扎营垒于敌人后方者，或截住敌人营盘者，不论何官，按功升赏。

28、两军对敌，须先分别明白，不准希图升赏，将我兵之首级砍取来营领赏。查觉，不论官兵，均枭首示众。①

关于行营执行 23 条：

1、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

2、军官不论官职大小，有随营效力，不辞劳苦者，论功奖赏。

3、官兵攻破城池营垒，但获有军用物品，毋得擅行毁坏，亦不准私买盗卖。违者，治罪。

4、军官奉委带兵，攻取地方，但得公款，不准隐瞒肥己。如违，拿问治罪。

5、军官所过地方，有毁拆庙宇，扰害民房者，斩。

6、统带官以下，不遵军令，擅敢私树党羽，动辄恃强斗龙，点队闹事，倡首者斩。

7、军营中有私议军情，妄造谣言，播弄是非，慢散军心者，查出立斩。

8、兵丁有口角争执，妄动军器，伤人见血者，立斩。

9、兵丁有无故下乡，滋扰良民者，从重治罪。

---

① 参见《回民起义》（二），第 114～118 页。

10、兵丁有盗卖粮草军装者，斩。

11、官兵有临阵退缩，擅离营垒，私逃外面者，斩。

12、官兵有（如）经过文武庙宇，不准驻扎。违者，治罪。

13、官兵若有以下犯上者，立斩。

14、官兵若有以上凌下者，从重治罪。

15、兵丁有纵放牲口，践踏田间粮食，或事出无意，将牲口充公，人治罪。若系故意纵放牲畜，践踏田禾者，立斩。

16、官兵有强买估卖者，从重究惩。

17、官兵若有纵放兵丁，沿途拉夫者，立斩。

18、官兵若有倚势占奸，强夺民女为妻者，立斩。

19、官兵酗酒赌博，妄生事故者，从重治罪。

20、营中有出入口令，言语宜轻，如有大惊小怪，有害于军事者，斩。

21、兵行在道，有队伍不齐，致误军机者，带兵官革职问罪。

22、带兵官，有勒扣兵饷者，斩。

23、带兵官有私通敌人，按兵不动者，立斩。①

上述条例，可谓细致周密，赏罚分明，严字当头，难能可贵。不过，由于起义军的官兵主要来自具有散漫性和自私性的农民小生产者，因而在执行纪律过程中打些折扣甚至公然违犯，个别人贪生怕死以至叛变投敌，也是难免的。尽管如此，这支起义武装在执行纪律和英勇作战方面，还是值得称道的。

（三）武器装备及军费来源

滇西回民起义军的武器装备，与其他农民起义军一样，最初以冷兵器“揭竿而起”，尔后通过战场缴获不断得到改善。回民使用的冷兵器主要是刀、矛。其中有一种刀称“缅刀”，系与缅甸通商购得，此刀柔韧而富弹性，刃极锋利。热兵器主要是从清军手中或攻占城池后从敌人军械库中获得的，大部是鸟枪、抬枪、将军炮之类旧式火器。后从缅甸购进一种用火石打火的燧发枪，使

① 参见《回民起义》（二），第118～120页。

部队的装备有所改善。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抽调一部分使用洋枪洋炮的部队入滇，滇西回民军由于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劣势，因而更增加了作战的困难。诚然，其最后失败主要由于战略上的失误，但军队缺乏先进的武器也是原因之一。滇西回民起义军由于建了拥有众多州县的根据地，因而军费的主要来源为赋税，一部分来源于外出作战时就地筹款。起义军每攻占一地，均征收投诚银，如攻占腾越后，和顺一地即交纳银20万两，其余各练（即乡镇）交纳银10万、8万、5万两不等。另一来源是依靠对外贸易。大理盛产黄石（制造火药的一种原料），一驮黄石成本银仅一两，运至缅甸，可换回一驮棉花，值银六七十两，所获甚丰。

为了保障军队的供给，杜文秀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财务制度。中央设有两个机构：一是上府，管储藏；一是银库，管出纳。《管理军政条例》规定："府、厅、州、县，及各盐井各军营解来银两，数有若干，先向银库挂号，交入上府。如银库支用，又向上府请领。一年至年终，银库共请领若干，共用出若干，铜钱若干，逐一造册申报元帅。又将一年至年终所收各府、厅、州、县、盐井、军营解来银两若干，银库请领出费用银若干，逐一核算，有无余存，悬榜晓谕，并知会各处。"① 这样，一切财务收支，不仅上府与银库可以互相监督，并张榜公布于众，实行财务民主，接受广大人民和全体官兵的监督。时人称誉杜文秀政权政治清明，很少贪污中饱。从上述规定中，亦可窥见一斑。

第三节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战争

一、起义云南，进军四川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输入量逐年增加，国内种植者亦

① 杜文秀：《管理军政条例》，见《回民起义》（二），第111页。

为数不少。云南是种植鸦片比较多的地方，烟土运往四川等地，“贩者有什佰之利”①。滇川交界地区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被裁兵勇和游民等，无以为生，便结为“烟帮”，由管带、队长等率领，携带武器，为烟贩护运走私鸦片。他们既受烟贩的剥削，又受官吏的敲诈。1857年以后，清政府为了筹措军饷，对鸦片实行“听商贸易”，“征收税厘”的政策。1859年，四川省设立厘金局，沿川滇边界设立关卡，对过往货物课以厘金。贪官污吏乘机巧立名目，任意敲诈勒索，以饱私囊；诈取不遂，则诬良为盗，逮捕入狱，施以酷刑，甚至杀害。烟帮因受官吏苛索和迫害，与官府的矛盾日益加剧。当时，石达开部太平军进军西南，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正在蓬勃发展，这就为滇川边境地区的烟帮和其他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1859年秋，烟帮首领李永和、蓝朝鼎在云南昭通府大关厅所属的牛皮寨举旗起义，揭开了滇川农民起义战争的序幕。10月初，李、蓝率起义军六七百人进入四川，连克筠连、高县、庆符。起义军以“打富济贫，除暴安良”为号召，受到广大群众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千人。10月11日，起义军渡过金沙江，占领安边镇。15日，进攻川南重镇叙州府（今宜宾市）。起义军虽在城外多次击退清军援兵，但府城久攻不克，便于12月8日夜主动撤围。李永和率部进入宜宾县青山地区。蓝朝鼎率部沿岷江北上，直趋位于乐山、犍为交界的五通桥、牛华溪、马踏井三角地带的犍乐盐场。

川盐收入为清王朝重要财源之一，也是当时四川省“协济”湘军军饷的主要来源。为了不让起义军占领犍乐盐场和富顺的自流井、荣县的贡井等产盐区，清政府一面抽调准备用于镇压太平军的萧启江部湘军6000人由湘入川，一面谕令新任四川总督曾望颜对犍为、乐山、荣县、富顺等地几十万盐工“妥为安置，严防勾结”。接着，由甘肃提督郭相忠和陕西副将连庆率领的陕、甘标兵，

---

①《邛崃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卷4，兵事志，第4页。

由四川提督皂升和按察使蒋征蒲率领的督府标兵和重庆镇营兵，川北镇总兵占泰、前湖北宜昌镇总兵虎嵩林、湖北郧阳镇左营游击张万禄、陕西候补知府田良、建昌道鄂惠等人统率的兵勇和地方团练数万人，先后赶到叙、嘉两府和犍乐、自贡盐场一带，防堵李、蓝起义军。

但起义军行动迅速，一举攻占了犍乐盐场，获得大量资财，并吸收大批农民、盐工参军，队伍扩大到2万余人。为了避开清军的追剿，蓝朝鼎率起义军西渡岷江，南下宜宾县芗州一带。1860年1月7日，蓝朝鼎与李永和合军，突袭犍为县东南的箭板场，全歼清军2500人。1月中旬，进攻犍为县城失利，乃东渡岷江，进至罗城场附近的铁山地区。

1860年1月23日，正是咸丰十年正月初一，雨雪交加，起义军乘清军疏于戒备，隐蔽地进至富顺、荣县，并于26日突然占领了自流井、贡井，获得大量物资，盐工、农民纷纷参军，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

为摆脱清军围攻，起义军于3月7日夜撤离自贡盐场，向川西转移。新任四川提督占泰急令各路清军堵截。8日黎明，起义军在秀才坡豹子山下围歼“拦头截剿”的游击张万禄所部清军后，沿桥头铺、李子桥西进，到达五通桥。为调动和分散清军兵力，李永和率部坚守犍乐地区，在附近活动；蓝朝鼎率部沿岷江北上，相机向成都进军。蓝朝鼎率军先攻马踏井占泰大营，败该部清军，然后经白马埂进至青神城下，于3月28日一举占领该县城。

四川总督曾望颜深恐起义军攻成都，早就下令附省州县实行坚壁清野，并将通往成都的各条小路“一概节节挖断，重重塞关”，大路和各隘口，则“层叠筑起高原土关，其门只可容一人一马一轿出入”。① 起义军占领青神后，曾望颜“以省垣为根本重地”，急令占泰“迅率所部全军，由井研、仁寿星夜绕道兼程赴

① 四川雅安档案馆藏《巴县档案》。

省”①。

蓝朝鼎部行动神速，未待占泰赶回成都，即攻占距成都约百里的彭山。次日，分兵两路，攻邛州（今邛崃），占蒲江，克名山，陈兵百丈场、夹门关、平落坝、大塘铺一带，切断了成都与雅州府（今雅安）的通道。4 月 25 日，蓝朝鼎部撤离名山，夺取金鸡关，进围雅州府城，因久攻未克，便转攻洪雅、夹江、峨眉。清军将领以为蓝朝鼎欲南下与李永和合军，急忙派兵拦阻。起义军出敌不意地挥军西向，于 6 月上旬克荥经、天全城。8 月，驻军于离成都 70 余里的崇庆元通场，后进入温江、郫县、崇庆、新津、彭县、什邡、汉州（今广汉）等地。11 月，起义军攻金堂不克，遂进入川东。

蓝朝鼎部转战于川西、川北，发展了队伍，调动了大量清军，减轻了清军对李永和部的压力。但没有建立一个可资立足的根据地，歼灭的敌人也不多。

同一时期，李永和驻军五通桥，分兵在附近活动。1860 年 5 月起围攻井研，久攻不克，于 9 月初撤围。部将张第才（又名张国福）率部进入富顺、宜宾、南溪、隆昌。随后游击于川东南荣昌、大足、铜梁、永川间。李永和屯兵五里浩，分兵转战于川南富顺、宜宾、威远、荣县、仁寿、资阳、南溪、隆昌、泸州等地。11 月，活动于各地的起义军二三十万人齐集富顺、隆昌交界的牛佛渡，连营百余座，活动于百里之外。12 月 23 日，张第才部占领永川，与进入川东的蓝朝鼎部会师。

此后，起义军又分散活动。李永和、卯德兴率部活动在横亘于井研、犍为、荣县、威远一带的铁山地区，周绍勇、曹灿章率部活动于川东地区，蓝朝鼎率部北上，围攻绵州。

① 曾望颜奏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第 3466 号卷，第 5 号。

二、绵州之战

绵州（今绵阳）在成都东北270里，为省城门户。城东、北两面依涪江，南临安昌河。1861年4月29日，蓝朝鼎自潼川撤围，于5月4日进至绵州城下，围困州城。同时，分兵袭占安县、彰明（今江油南）等地，获取大量物资，运至绵州前线。

当时，蓝朝鼎部有十余万人，而绵州城内清军甚少，团练也为数不多。但绵州城垣坚固，城东紧靠涪江，北、西、南三面有宽深的壕沟，壕沟近城一侧筑有壕墙，壕外置梅花桩。城内储粮甚多。知州唐炯采取紧闭城门，凭险固守，静以待援的方针。蓝朝鼎部从5月初至9月初百计攻城，均未得手。在7月的一次伏击战中，起义军曾大败从罗江来援的清军，擒杀已革四川提督占泰；但没有乘胜扩大战果，仍然倾全力攻城。

5月26日，奉命督办四川军务的前湖南巡抚骆秉章率湘军5000余人溯长江到达四川万县。① 这时，李永和部将张第才、何国梁、何兴顺等率3万余人正围攻顺庆府城（今南充市）。骆部主将黄淳熙奉命率湘军3000余人由万县经梁山、大竹直趋顺庆。起义军闻讯，由顺庆沿嘉陵江而下，转攻定远（今武胜）。6月18日，起义军在离定远城15里的姚家店被湘军击败，何国梁牺牲，余部退往二郎场与另部起义军会合。21日，黄淳熙率部追过四山壁立的二郎场，遭起义军伏击，湘军一败涂地，黄淳熙也被击毙。起义军随即转移至绵州，与蓝部会合。

骆秉章率后队湘军于6月30日行抵大竹，得悉前线失利，便滞留顺庆，扩编队伍，为进援绵州做准备。他鉴于蓝朝鼎正率十

① 1860年8月，骆秉章奉命督办四川军务后，迁延观望，迟至1861年3月才督率湘军9000余人由长沙出发，经水路分批赴蜀。当时，太平军陈玉成部正在湖北活动，骆应湖广总督官文之请，留刘岳昭部4600人于鄂，自率黄淳熙等部5100人由沙市溯长江入川。

余万人围攻绵州，李永和正率十余万人围攻眉州等地，并认为蓝部“最为剽悍”，于是制定一个由北而南、先蓝后李、各个击破的方针。在此以前，骆秉章还针对起义军“散而不聚”、“剽而不留”的特点，和以往清军“锐欲进攻而不能专向一处”，“此剿彼窜，莫收聚歼之功”的教训，确定了“诱归一处”、“合围会剿”的作战原则。① 在作战部署上，他决定以新任四川提督蒋玉龙所部，在川南眉州一带牵制李永和部起义军，不使北上，而以湘军为进援绵州的主力：总兵胡中和等率原萧启江部湘军6000余人由中江县黄鹿镇经杨家店进扎朱家桥，骆部湘军由三台县葫芦溪进扎丰谷井，从南面进攻起义军大营；副将唐友耕所部川军与州判颜佐才新招“黔勇”从西面配合进攻；唐炯则从城里配合湘军行动。另外，在东、北两面加强防守，以防起义军入陕。

8月31日，骆秉章亲率后队湘军由顺庆进驻潼川府城。这时，围攻绵州城的蓝部起义军的精锐集中于南门外。蓝朝鼎率主力分驻于东岳庙一带，左军都统吴维之等部驻塔山，前龙军都统徐元柱等部驻榜山，右七营都统卯老伍等部驻十贤堂，“联营六七里，前后相属”②。此外，前营副帅訾洪发和左帅营都统戴老幺驻西门西山观一带，蓝朝鼎从兄前军副师蓝朝柱（蓝大顺）驻北门桑林坝、龟山一带，水军战船控扼涪江水路。

9月5日，清军1.9万余人分数路向起义军进攻（主战场在城南）。护军营1600余人进攻塔山，果毅营3000余人进攻榜山、十贤堂，湘果营6000余人进攻东岳庙。起义军奋勇反击。湘果营总兵胡中和部纷纷败退，起义军趁势奋力追赶包抄。但由于塔山、榜山、十贤堂等处的起义军战败，湘军果毅营赶至东岳庙助战，胡中和部才免于被歼。经过激战，起义军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损失甚大。战后，为了集中兵力，蓝朝鼎率军从东岳庙转移至西

① 骆秉章：《川省军务疏》，见《骆文忠公奏稿》（四川稿），清光绪十七年刊本（下同），卷2，第5～7页。

② 骆秉章：《绵州解围疏》，见《骆文忠公奏稿》卷2，第30页。

山观一带，蓝朝柱从北门龟山、桑林坝一带转移至西门青衣坝，与訾洪发等共同据守。

9月18日，湘军渡过安昌河，分三路向起义军进攻：右路为护军营和颜佐才所部黔勇，沿涪江支流直上，牵制青衣坝蓝朝柱部义军；中路为果毅营，从正面向西山观进攻；左路为湘果营，绕攻西山观侧后。起义军在蓝朝鼎指挥下，奋勇杀敌，有时冲下山坡，与敌人短兵相接，有时退回山顶，以火力杀伤敌人。后左路湘军湘果营绕至西山观后，并攻上山梁，向起义军营垒施放喷筒火箭，抛掷火蛋，终于攻占西山观。蓝朝鼎、蓝朝柱被迫率部退往绵竹、什邡、彭县一带。

绵州之战，是李蓝起义战争至关重要的一战。蓝朝鼎以一支缺乏攻坚能力的部队顿兵于坚城之下，围城数月之久，这在作战指挥上显然是错误的。清军的兵力虽处于劣势，但其主力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湘军。骆秉章对围城的起义军采取“合围会剿”的方针，集中兵力，发动强攻，速战速决，因而取得了胜利。蓝朝鼎在强敌进攻面前，没有果断地率军转移，反而与敌进行阵地决战，结果损失七八万人，使战场形势顷刻逆转。从此，起义军在战略上由进攻转入了防御。

三、眉州之战

眉州城东临岷江，西接丹稜，南通青神，北连彭山，为省城南面的门户之一。1861年4月，李永和、卯得兴部起义军先后攻占仁寿、青神，接着便围攻眉州城。此前，蓝朝鼎、何崇政部数万人已攻占丹稜县城，与进攻眉州之李永和部成犄角之势。

李永和部十余万起义军屯驻于眉州城西南的象耳寺、快活山以至黄中坝、张家坎一带，与丹稜、青神声势相联。主力集结于虎皮塘、松江口及其附近的铁门坎、石灰窑等地。李永和设大营于距松江口不远的刘家祠堂。岷江东岸，由卯得兴率部据守王家场、洪庙一带，并向北发展，控制了水陆交通，切断了米粮出入

之道。

骆秉章认为，李永和部围攻眉州府城，威胁成都，“亟宜迅筹围剿，迳捣老巢，以收聚歼之功”①。于是令四川提督蒋玉龙派川军一部牵制丹稜蓝朝鼎部，防其东援眉州，北走蒲、邛；以全部湘军和部分川军进攻眉州地区起义军。其部署如下：湘军湘果营6000余人由崇庆州取道将军庙、多悦镇进扎眉州西北的顺和场；果毅营3000余人、护军营2000余人以及副将朱桂秋等3营由彭山进扎眉州以北悦兴场、金鱼山一带，与湘果营联络声势，向眉州西南一带进攻。此外，唐友耕部川军4000余人和总兵黎德盛部2000余人由太和场渡过岷江，进攻东岸起义军，候补知县陈绍惠统带水师炮船沿江下驶，进攻起义军水寨，水陆配合，阻止眉州起义军渡河东走。

11月初，川、湘军各部陆续到达指定地点。李永和即将岷江东岸的起义军调至河西，加强张家坎、黄中坝的防守，并放弃象耳寺阵地，以加强松江口一带的防守。7日和8日，湘军由顺和场、悦兴场进至眉州城西，准备会剿松江口起义军。这时，蓝朝鼎派出何崇政、谢大德之妻率2万余人由万盛场一带进至东瓜场，威胁清军后路。骆秉章决定分兵数路先打援军。11日，何崇政等部被迫弃场退走。

13日，骆秉章令黎德盛、唐友耕会合陈绍惠之水师炮船，由河东王家场进攻张家坎；以果毅营由黄中坝渡河进攻松江口，护军营和朱桂秋等3营与湘果营左右配合，向起义军发起总攻。起义军顽强抵御，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清军实行迂回包抄，前后夹击，终于占领了松江口，冲入李永和大营，纵火烧毁刘家祠堂和硝药局，数万斤火药爆炸。李永和率部退却，沿路又遭清军截杀，伤亡3万余人。当夜，城外各处起义军皆退据青神。

李永和虽撤眉州之围，但起义军仍西据丹稜、南占青神。骆

---

① 骆秉章：《剿办略坪获胜蓝逆并趋眉州疏》，见《骆文忠公奏稿》卷3，第31页。

秉章决定以唐友耕部进驻青神城北，牵制李永和部，防其渡河而东；令湘果、果毅、护军诸营由眉州西进，与川军联合，围攻丹稜。1861 年 12 月初，清军向丹稜发起进攻，起义军四五万人据垒坚守。清军强攻失败后，改用围困战术。起义军于 12 月 12 日夜从西门突围北走。13 日晨，川军追至麻柳沟与起义军接战。蓝朝鼎率后队掩护，且战且退，抢登插旗山，扼险抵御。清军四面围攻，并从山后爬上山头。蓝朝鼎率众突围，在冲下山时，不幸被清军刺中额部，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由蓝朝柱等率领，经蒲江北上。骆秉章一面令湘军继续追击，一面令蒋玉龙率川军回扎思濛场和莲花场，与唐友耕部合攻青神。

李永和自眉州退至青神后，与原留守该处的周庭光共同据守，拥有六七万人。围攻青神的清军共约万人左右，其部署是：川军蒋玉龙部驻城西、城南，与城北唐友耕部声势联络，黎德盛等部防守岷江东岸，水师炮船则在附近江面昼夜巡哨。12 月下旬，骆秉章急令湘军舍蓝朝柱、訾洪发余部于不顾，回师青神，“以为合围聚歼之计”。1862 年 1 月 17 日，李永和在湘军尚未进抵青神时，组织起义军突围。当晚，先由数千人手持灯笼火把从南门冲出北走，吸引围城清军；李永和、卯得兴亲率数万人由西南门潜出，以少量兵力攻刘家场清军，大队沿山边小路悄悄行进，从宋家坝、观音滩、象鼻滩等处抢渡岷江。李永和、卯得兴突围成功后，率部返回犍为东北的铁山地区，周庭光则率万余起义军继续留守青神。

李永和等率起义军余部进入铁山地区后，骆秉章一面令嘉定、叙州两府所属州县派团练防守通向铁山的道路和隘口，断绝起义军的粮食来源，一面令湘军围攻起义军。起义军深沟高垒，凭险固守，同时，分军万余人（由李长毛等率领）驻毛家寺，与铁山相犄角。但由于粮道断绝，起义军无法继续坚守，被迫转移。1862 年 3 月 30 日，驻守毛家寺的万余起义军经竹根滩、牛华溪、河坝场前往青神。次日夜间，李永和、卯得兴趁机率部撤离铁山。4 月 6 日，周庭光亦率部从青神突围，不久战败被俘遇害。李永和部起义军为清军所阻，被迫分军：李永和率八九千人暂驻富顺、隆昌间之天洋坪；卯得

兴率万人扎宜宾属之八角寨。八角寨距自贡盐场仅100余里，对其威胁较大。因此，骆秉章以全部兵力围攻八角寨；对天洋坪李永和部，则仅令泸州、富顺、隆昌、荣县等州县的团练进行围攻。5月13日夜，李永和率3000余人离天洋坪，沿途遭团练截杀，损失很大，最后仅率100余人入八角寨，与卯得兴会合。

八角寨林深径仄，山径陡险。李永和、卯得兴恃险坚守，以致湘军围攻数月，毫无进展。后因起义军粮断，决定突围，于9月9日折回铁山地区龙究场。龙究场四面环山，南面为黑虎台，东、北、西三面为环龙山，环龙河流经其西。李永和率军到达该处不久，即遭清军严密包围。起义军“人人有必死之心，困而犹斗，俨然劲敌”①。清军围攻月余，未能得手，派人前往诱降，也遭拒绝。清军无计可施，竟将环龙河闸断，阻水灌场，使起义军陷入绝境。10月18日，李永和、卯得兴等10余人于猪市坡被俘。次日晚，訾洪发等4700余人惨遭杀害。李永和、卯得兴被解往成都后英勇就义。

四、起义军余部转战陕西

绵州、眉州之战，起义军首领蓝朝鼎、李永和先后牺牲，部队损失极大。起义军余部难以在四川立足，便相继进入陕西。

当1861年底蓝朝鼎牺牲后，蓝朝柱、訾洪发等率余部继续北上，在彭县分军：訾洪发等经川东入川南富顺、隆昌等地，与李永和部会合；蓝朝柱则率部经汉州（治今广汉）、德阳、安县进入江油（治今江油北）、石泉（治今北川西北）交界的太华山中。另部由邓天王率领进入平武山中，因遭清军围剿，东走进入陕西宁羌州（今宁强）境内。

---

① 骆秉章：《进攻龙究场首逆就擒疏》，见《骆文忠公奏稿》卷5，第19页。

蓝朝柱率百余人离开太华山后，经南部入达县、东乡（治今宣汉），与张第才、郭富贵等部起义军会合。1862 年 2 月 8 日，攻克新宁（今开江），3 月 5 日入垫江县境，与曹灿章部义军合攻垫江城。因湘军赶至，张第才、郭富贵、蓝朝柱等退往涪州（今涪陵）北面的鹤游坪，继经丰都、忠州（今忠县）、万县进入云阳县云安盐场。湘军由夔州（今奉节）来攻，蓝朝柱率部折往开县，5 月 24 日攻占太平厅（今万源），6 月初经烟灯垭进入陕西境，一举占领定远厅城（今镇巴），获得大批物资，部队亦得到补充。6 月 18 日攻占西乡，又乘胜向洋县进军。7 月 5 日，洋县群众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入城。

郭富贵部 3000 余人在云安盐场与蓝朝柱分兵后，东走大宁（今巫溪），于 8 月初进入陕西平利县之八仙街。后又转入湖北，连克竹溪、竹山。不久，复折回陕西，攻破砖坪城（今岚皋），缴获一批火药，队伍亦发展到 3 万余人。郭富贵原准备沿汉江西上与蓝朝柱会师，因得知回民起义军正围攻西安，遂挥军北上，直趋西安。9 月 17 日，在长安附近的子午峪为清军胜保部所败，遂西走鄠县（今户县）。这时部队仅剩二三千人，经盩厔（今周至）黑水峪进入郿县（今眉县），在高店镇再次战败，余部千余人向宝鸡、凤县（治今凤县东北）山中撤退。后进入甘肃，攻陷两当，复转入陕西，克略阳，准备东走洋县，与蓝朝柱会师。中途为清军所阻，遂由宁羌州入川。1863 年 1 月 3 日，郭富贵于巴州（治今巴中）鼎山铺被俘，全军覆没。

蓝朝柱攻取洋县后，改县名为靖川，建立政权，自称“大汉显王”，封蔡昌龄（蓝二顺）① 为怡王，并在四乡设官，下令安民。活动于川东的部分起义军在曹灿章率领下，于 1862 年 10 月 28 日经太平厅入陕与蓝朝柱会合。从此，蓝朝柱成为李、蓝起义军后期的最高领袖。

1863 年初，扶王陈得才率 20 余万太平军再度入陕，连克平

① 蓝朝鼎于丹稜突围时牺牲，蔡昌龄袭“蓝二顺”名号。

利、兴安（今安康）、紫阳、石泉。蓝朝柱派人前往欢迎。双方协议，蓝部义军让出汉中盆地，以洋县西 20 里之谢村为界，东归蓝朝柱部起义军，西归太平军。接着，太平军与蓝部共同围攻汉中府城。同年 10 月，连克汉中府城和城固县城。之后，蓝朝柱率军退出汉中盆地，回扎洋县。不久，蓝朝柱分兵攻占佛坪、留坝、华阳镇等地，设官理事，以稳定后方；自率部分起义军北上，于 11 月 19 日占领盩厔城。

盩厔系关中重镇，离西安仅百余里。统治者非常害怕蓝朝柱与已遭严重挫折的回民起义军结合，使关中地区的革命烈火重新燃烧起来。因此，西安将军多隆阿急忙从正在镇压回民起义军的清军中抽调穆图善、姜玉顺等马步 16 营，由兴平赶至盩厔。多隆阿本人也亲至盩厔指挥清军围攻。蓝朝柱一面向汉中太平军请援，一面组织力量坚守。

多隆阿扎营于盩厔东门外的沙河岸上。清军将盩厔城团团围住，所挖地道被起义军破坏，遂改为强攻。时值隆冬，起义军在城墙上放置棉花包，浇水成冰。清军不但难以攀登，而且炮弹落到结冰的棉花上，效力大减。清军攻城数十次，伤亡 3000 余人，仍不得入。

盩厔被围期间，驻留坝的太平军接到蓝朝柱求援信后，曾答应派兵救援，但因与留驻洋县一带的蓝部起义军发生冲突，终未往援。正在甘肃两当、徽县一带活动的太平军郑永和部（由四川北上的石达开旧部）赶来援救，因在凤县黄牛堡为清军所败，未能到达。从宁陕北上的曹灿章部义军因遭敌军阻截，救援计划亦未能实现。

1864 年 3 月 30 日，清军再次用地雷炸城，千余人从缺口处抢登，被起义军击退。多隆阿见清军败退，亲登炮台指挥。起义军枪炮齐射，弹中其目。当晚，蓝朝柱率起义军从预先挖好的地道撤出盩厔。城内百姓继续战斗，4 月 1 日凌晨清军才得以进城。不久，多隆阿因伤重丧命。4 月 11 日，蓝朝柱于安康紫溪河遇伏身亡。

由于天京危急，陕南太平军撤离陕西，加之新任陕西巡抚刘蓉率领湘军由川入陕，占据汉中，陕西的革命形势逐步恶化。蓝朝柱牺牲后，曹灿章率部转战于镇安、安康一带，屡遭清军和团练袭击，损失甚大。5月22日，曹灿章在鄠县玉皇庙被俘牺牲。转战于陕、鄂、豫三省交界地区的蔡昌龄，得知蓝朝柱牺牲，自湖北郧西入陕报仇，因遭清军阻截，游击于镇安、郧西交界之大小心川一带。这时，太平军郑永和部仍留在陕西、湖北边境，太平军启王梁成富部亦折回郧西，梁、郑便率部赴小心川与蔡部会师，总数达四五万人。因“附省一带，新麦方登，防兵又少”①，遂由镇安北趋孝义（今柞水），6月6日出大峪口，占领西安以南的尹家卫（引驾回）。因清军极力防堵，遂转战而西，经鄠县入盩厔县境。陕西巡抚刘蓉调集清军，采取“东西夹击，节节逼紧”、“布列长围，绝其粮道”的战术，企图将起义军“一鼓聚歼”。② 与此同时，大搞招降活动。不久，天京陷落的消息传来，起义军士气低落，一部分人滋长了妥协动摇情绪。7月底至8月上旬，蔡昌龄部都统王洪兴、梁成富部王克昌、彭学进、罗启发以及郑永和等先后率部投敌，使起义军人数锐减。但蔡昌龄、梁成富顶住逆流，坚持战斗，使刘蓉“不过五六日可期一鼓聚歼”起义军的美梦破产。8月13日夜，起义军冒雨从盩厔焦家巷突围，越秦岭，经洋县、城固、沔县（今勉县）、略阳，于9月初进入甘肃境内。

五、阶州保卫战和起义的最后失败

蔡昌龄、梁成富所部接近陕甘川边境时，仅有4000余人，后有湘军萧庆高、何胜必两部以及参将龚良臣等部20余营追击，刘

---

① 刘蓉：《复陈查明伪扶王窜扰情形疏》，见《刘中丞奏议》，思贤讲舍校刊本1885年（下同），卷4，第42页。

② 刘蓉：《会奏官军攻克坚堡逆匪败窜南山疏》，见《刘中丞奏议》卷5，第21页。

蓉又飞咨四川总督骆秉章严防四川广元、剑州（今剑阁）各处隘口，并通知甘肃巩秦阶道林之望派兵防守徽县、成县、礼县等地。

1864年9月初，蔡昌龄、梁成富经白马关入甘肃阶州境。阶州地处甘、陕、川边界，三省统治者各有打算，不全力对付起义军。萧庆高、何胜必等部被调回四川防守，龚良臣部被派往甘肃河州（今临夏），其余各部分防陕边。由于清军各部迁延观望，起义军得以摆脱追兵，并于9月18日一举攻克阶州城。

蔡昌龄、梁成富以阶州为据点，积极发展力量，很快达到3万余人。起义军在阶州修制器械，广储粮食，增高城墙，并在周围三四十里内修筑数十座堡垒，派精兵扼守各隘口。蔡昌龄等还与盐关回民起义军取得联系，遥相呼应。

陆续前往围攻阶州的清军约计二三万人。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有的迟至1865年1月上旬才到达。战斗首先在阶州外围诸垒进行。虽然起义军中绝大多数是新兵，武器又差，但作战极为英勇。当清军小部队单独活动时，起义军以迅捷的行动给敌以突然袭击；如遇强敌进攻，则凭城据垒深匿不出；清军逼近城垒，则枪炮齐发杀伤敌人。清军的进攻屡屡失败，不得不改变战术，一面扼守粮道，诱使起义军出战，一面大搞诱降活动，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1865年4月17日，旧城山守军粮尽援绝，先锋杨兴华率100余人投敌，22日，又有三官殿两垒守军600余名投降。清军逐渐攻占城外各垒，并由北山挖地道直通城边。6月6日黎明，清军用地雷炸塌城墙数丈，趁势冲入城内，起义军与敌展开巷战。蔡昌龄和梁成富率百余人从起火的堡垒中冲出，与敌人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蔡昌龄受伤倒地，为清军杀害；守城起义军也全部壮烈牺牲。梁成富受伤被俘，不久在成都英勇就义。

阶州保卫战的失败，标志着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持续6年之久、活动范围遍及滇川鄂陕甘5省的李、蓝起义战争的最后结束。

第四节　陕甘回民起义战争

一、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一）陕西回民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1862年（同治元年）在我国西北的陕甘等地爆发了以回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烽火遍及陕西、甘肃的大部地区，时间长达12年之久，成为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标志的全国轰轰烈烈的反清革命洪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起义的历史背景　清王朝为筹集浩繁的军费，镇压太平天国及其影响下的各族人民起义，加紧了对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所谓“完善之区”的搜括。陕西除每月向京师解饷银数万两外，还要协济用兵各省的大量军饷，而这些负担全部落在陕西各族人民的头上。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人民群众无以为生，被迫“聚众抗官”。

陕西是回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全省回族人口约100万，主要分布在泾水和渭水流域。当时回族人民不但遭受封建剥削，而且遭受统治阶级推行的民族压迫。清朝统治集团，一方面笼络回汉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的上层分子，另方面挑拨民族间的关系，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统治集团采取所谓“护汉抑回”、“以汉制回”的政策，回族人民政治、经济地位低下，备受歧视、排挤和侮辱。这样，在当时回民中逐渐形成一种仇视汉人的心理。回人积怨既久，起而仇杀汉人，清朝统治者便借口保护汉人，动兵杀戮回人。结果，在两个兄弟民族之间埋下了不和的种子，以致演成回汉械斗和仇杀事件。

太平军入陕，起义爆发　由于原驻陕西的清军大多调赴外省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陕西当局令各县大办团练。这些地方武装一般都掌握在汉族地主手里，成为他们肆

虐乡里，屠杀回民的工具。1862年5月，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直逼西安，蓝朝柱起义军也由四川进入汉中，全陕震动。陕西巡抚瑛棨和团练大臣张芾慌忙调集各地团练往南山堵御太平军；同时，加紧了对回民的迫害。

太平军入陕，给深受剥削和歧视的回民群众带来了希望。当年5月，训导赵权中所属团练中的数百名回勇，不愿和太平军作战，杀死带队的恶霸地主赵炳堃，散归渭南家乡。途中，部分回勇因砍购竹竿与汉人发生争执，被当地团练打死两人。回勇赴华州（今华县）衙门控诉，冤不能申，便避居城外秦家村。不久，华州、华阴团练突然将秦家村及附近回民村庄抢劫一空，又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的传帖。渭南、大荔、耀州（今耀县）、富平、同官（今铜川市西北）、高陵等地团练亦纷纷效尤。由于矛盾激化，华州回民首先起义，渭河两岸的回民争相响应，未经旬日，各处回民俱行激变。

面对迅速发展的回民起义，陕西巡抚瑛棨因“筹剿无兵”，只好派遣官绅分赴各地“安抚”。6月4日，团练大臣张芾等在临潼油坊街和回民谈判时，无理要求交出回民起义首领任武。回民甚为气愤，将张芾押往仓头镇，于6月9日处死。这一行动，沉重打击了陕西当局的“招抚”阴谋，显示出回民群众与清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同州府地区回民起义军以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仓头镇为据点，向清军展开进攻。6月17日至25日，起义军围攻同州城9昼夜不克，遂撤围西进。29日，各地回民军联合逼攻西安，次日即攻占城西金胜寺，歼灭大批团练。7月21日，起义军又攻占团练的根据地、距西安仅20里的六村堡。从此，西安附近的团练武装精锐皆尽，守城清军（陕西提督孔广顺所部3000余人）更形孤立。稍后，凤翔回民三十六坊起义，形成了渭南、凤翔两个抗清中心。

回民起义的烽火迅速遍及八百里秦川，起义队伍扩大至20余万。当时陕西回军主要首领为任武、洪兴、赫明堂，另外，还有

马正和、崔伟、马四元、白彦虎、马长顺、禹得彦、马生彦、余彦禄、孙玉宝等。其中有的是富甲一方的地主、商人和阿訇等上层分子。起义军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手中，虽然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廷派兵镇压，起义军向甘肃转移 陕西回民起义的迅速发展，严重威胁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清廷急命直隶提督成明率京兵从山西驰援。1862 年 8 月 25 日，成明率京兵和豫勇共 5000 人由朝邑“进剿”，在洛水南岸为起义军所败。清廷催钦差大臣胜保率军入陕。9 月上旬，胜保率军由潼关西进时，不断遭到回民起义军的袭击，只得缩回临潼，后绕道进入西安。当时，西安附近的回民军集中于咸阳渭河沿岸，以苏家沟、渭城为根据地。11 月上旬，胜保“派兵勇及百姓马步兵共 4 万余人，大战于苏家沟……及与回民战，望风逃窜，兵马自相践踏，死者数万”①。与此同时，回民军乘胜保军集中于西安，东部兵力空虚之机，于同州一带发动进攻，在敷水镇（华阴西）生擒署潼关协副将哈连升，夺取其营垒军械，并进逼澄城、郃阳（今合阳）、朝邑等地。胜保奉命赶回潼关，与新授西安将军穆腾阿等督军镇压同州一带起义军。由于粮道被起义军切断，军食不足，清军不敢出战。

清廷以胜保连战皆败，将其革职问罪，改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1863 年 1 月中，多隆阿率部由河南入陕，击退围攻同州的起义军后，入同州接受关防，连同胜保诸部，共有 2 万余人。接着，清军集中力量进攻回民起义军的重要据点王阁村和羌白镇。起义军采取游击战袭击敌军，并用骑兵截击清军运输线，使其饷械皆缺，进攻受阻。多隆阿一面筹备军火粮食，一面派人至王阁村“招抚”。起义军内部组织很松散，领导人之间彼此争权，遇敌“招抚”，矛盾加剧，以致相互攻杀。清军乘机攻占了羌白镇和王阁村。5 月 19 日，另一重要据点仓头镇也被清军攻占，

---

① 《秦难见闻记》，转引自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东方书社 1951 年版，第 111 页。

回军遭到巨大挫折。

仓头镇失守后，陕西东部地区的回军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阳、高陵、咸阳一带。他们与西安地区回军互相配合，围攻西安。甘肃提督马德昭和陕西提督孔广顺等率7000余人，困守西安，不敢出战。8月15日，清廷以陕西巡抚瑛棨“但知株守省垣，一筹莫展”①，下令将其革职，由四川布政使刘蓉接任。9月初，多隆阿到达西安，再次施展“招抚”伎俩，派人到起义军中诱降。瑛棨也利用西安城中的回绅频繁地在回军首领中进行“招抚”活动。孙玉宝等经不起利诱，向敌投降。

1863年10月13日，多隆阿部攻占高陵县城。接着，新任陕西提督雷正绾部由泾阳渡泾而南，总兵曹克忠部渡渭而北，共同扼守咸阳，阻截回民军西退；多隆阿自率主力从高陵渡泾，逼近苏家沟。回军“自渭达泾，纵横十余里，排列旌戟若林，严阵以待”②。22日，清军分两路发起进攻。起义军拚死抵御，终因伤亡甚众，从苏家沟和渭城撤退。白彦虎、马生彦、禹得彦、余彦禄率部向西北经醴泉（今礼泉）、乾州（今乾县）退至邠州（今彬县）。其后，一部南下凤翔，与崔伟领导的当地回军联合作战。未几，凤翔、邠州分别为新任甘肃提督陶茂林和总兵曹克忠所部攻占，回军大部退至陇东的董志原。其他回军在赫明堂等率领下，经武功、郿县、凤翔、陇州（今陇县）进入甘肃东部地区。从此，陕甘回民起义的中心由陕西转到甘肃，陕西回民起义斗争转入低潮。

（二）甘肃回民起义

陕甘回民军联合作战，形成几个起义中心　陕西回民起义前后，曾派人前往甘肃，联络各地回民共谋起事。待陕西回民起义发展到陕甘边境时，甘肃各地回民即纷纷起而响应，在很短时间内，起义就扩展到甘肃全境。1864年初，陕西回军陆续进入甘肃，

---

①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清光绪二十二年铅印本（下同），卷47，第15页。

② 雷正绾：《多忠勇公勤劳录》，见《回民起义》（四），第299页。

甘肃回民起义的声势更加壮大。清统治者惊呼："现在甘肃之平凉、静宁、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巩昌（今陇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平罗、灵州（今宁夏灵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蚁聚，滋蔓难图，绵延地方数千里。"①

1864 年 3 月 30 日，多隆阿指挥清军进攻由蓝朝柱起义军固守的盩厔城时，为起义军击伤头部，不久死去。5 月、6 月间，清廷调福建水师提督杨岳斌任陕甘总督，刘蓉督办陕西军务，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陕西提督雷正绾帮办甘肃军务，率同甘肃提督陶茂林及总兵曹克忠等"专讨"甘肃回民军。同年 7 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后，清王朝得以把镇压太平军的清军抽调到西北来镇压回民起义军，以致"甘肃一隅之地，而统兵大员专折言事者，已至八员之多"②，兵勇则达七八万人。但这些统兵将领派系不一，意见分歧，而且各保实力，不愿与回军打硬仗。所以，清军虽曾攻陷起义军占领的固原、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平凉等地，而起义军的实力却未受到大的损失。陕西、甘肃回军互相配合，采用避实趋虚、飘忽靡常的游动战法，仍打了不少胜仗。

9 月中旬，雷正绾率 30 营清军进攻甘肃莲花城（秦安东北）。回军利用莲花城附近沟壑纵横的有利地形，用伏击战法，歼敌千余人。直至 11 月上旬，雷部才攻下莲花城。其后，雷正绾回军平凉，向固原前进；曹克忠部由莲花城南下，迫使正在围攻秦州的回军撤围南走；陶茂林部则向西进军，于 12 月中旬攻下金县（今榆中），进入兰州。

1865 年 1 月中旬，回军计取灵台，雷正绾急忙由开城（固原南）回军东向，夺回灵台。其后，雷部仍北攻固原，于 2 月 26 日得手。6 月，雷正绾部与曹克忠部会攻吴忠堡（今宁夏吴忠）西南的金积堡。回军在马化龙领导下，阻截清军运道，并将沿途井泉

---

①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 54，第 3 页。

②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 101，第 19 页。

水窖填塞。清军在金积堡南50里的强家沙窝等地被阻将及半月，吃喝艰难，为摆脱困境，乃于7月29日分东西两路发起进攻。回军以一部兵力从正面阻击敌人，另以马队万余人绕至敌后。清军腹背受敌，狼狈逃窜。回军乘胜追击，毙敌三四千人，并缴获大批军需器械。雷、曹分率残部退至预望城（今宁夏同心东南）和盐茶厅。

甘肃回民起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一个是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包括宁夏府和陇东在内的地区；一个是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回、撒拉、东乡族地区；一个是先后由马文义、马桂源和马本源领导的以西宁为中心的地区；一个是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地区。陇东的董志原，则是陕西回军的根据地。起义军不断向清军进攻，使其文报梗塞，粮饷奇绌，省城兰州孤立无援，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力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捻军、回军协同作战　1866年11月，张宗禹率西捻军3万余众自河南进入陕西华阴、渭南境内。清廷害怕回军与西捻军联合，急令湘军援陕。曾国藩派提督刘松山统老湘军18营由河南入陕。留陕帮办军务的前陕西巡抚刘蓉一面奏调防守中卫（今宁夏中卫）的穆图善部移驻甘陕交界的泾州（今甘肃泾川），防止回捻合势，一面率30营清军从陕西西部的陇州、邠州一带东下，专力攻捻。1867年1月23日，西捻军在西安以东的十里坡大败刘蓉部清军后，乘胜包围西安。在甘肃境内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为西捻军入陕及其胜利所鼓舞，也在甘肃发动进攻，六七万回民军在庆阳将清军围困达一月之久，雷正绾部只得杀骡马为食。回民军在甘肃拖住大量清军，并乘刘蓉率部东下之机，由陇东分数路向陕西进军。其中张家川回民李得仓领导的一支回军，从甘肃华亭进入陕西凤翔府；另一支回军从甘肃宁州（今宁县）宫河镇进至陕西三水（今旬邑）、淳化、宜君一带；马长顺等率万余回军由董志原、庆阳经洛川进至澄城、韩城、郃阳、朝邑一带。陕北的回军和董福祥等领导的饥民武装也积极活动，牵制和打击清军。

回民起义军由甘肃进入陕西以后，与西捻军协同配合，共同打击清军。他们还为西捻军当向导，并为其购买新式枪炮，从物质上给予帮助。1867 年 5 月初，回、捻两军在同州许庄将尾追其后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包围，予以重大杀伤后，即挥师西向，进逼西安。5 月 27 日，刘松山等率军赶到，西捻军与清军接战 10 余次，终于失利。此后，回军与西捻军虽然各自为战，但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二、左宗棠入陕及其作战方略

由于杨岳斌对陕甘回民起义束手无策，清王朝不得不另调闽浙总督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1867 年 1 月，左宗棠从福州到达汉口，随即进行各项准备工作。2 月，清廷又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催其迅速北上，督办陕甘军务。

制定“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方略　左宗棠深知回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清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① 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关键则是“不令捻回合势”和确保饷道畅通。

7 月，左宗棠所部楚军近 2 万人由湖北樊城分 3 路到达陕西。按照其“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新到的高连升部楚军共

① 左宗棠：《敬陈筹办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21，第 20 页。

2.1 万余人进攻捻军，以帮办刘典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8000 余人驻陕甘边界，对付回民起义军。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凤翔、宜君、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当时，活动于蒲城、富平、三原、泾阳地区的西捻军识破了左宗棠的阴谋，迅速跳出包围圈，向陕北挺进。与此同时，陕甘回民起义军仍不断从甘肃进入陕西，与西捻军共同抗清。

10 月至 11 月间，西捻军和回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左宗棠智穷力竭，不得不上奏“自请严议”。可是，由于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回民起义军和捻军一直处于“时离时合”的松散状态，既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集中的领导，也没有共同作战的长远计划。更由于统治阶级施行分化离间政策，个别回军首领利用一部分群众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有意挑起回民与西捻军之间的不和，严重地破坏了这两支起义队伍的联合，致使左宗棠“不令捻回合势”的方略得以逐步实现。同年 12 月中旬，西捻军由宜川东南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虽然这时左宗棠率清军主力入晋追击西捻军，陕西清军大大减少，但由于回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在清军节节进逼下，转取守势，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失陷。

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　1868 年 11 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他以陕西大局已定，遂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

第一，整顿部队。驻陕清军，除左宗棠所部楚军外，还有刘松山部老湘军、郭宝昌部皖军、黄鼎部川军等；驻甘清军更为庞杂。这些部队不但待遇差别很大，而且编制很不统一。为此，左宗棠下令一律按楚军的编制加以整顿。同时，在陕甘就地招募新兵。到 1869 年时，左宗棠和刘典直接统辖的楚军就有步队 55 营、马队 15 营，共 3 万人左右。

第二，诱降饥民武装。在西捻军退出陕西、回军大部转入甘肃以后，董福祥领导的饥民武装仍在陕北一带活动，且与金积堡

和董志原的回军有联系，是清军进攻甘肃的一大障碍。于是，左宗棠在榆林、绥德、延长各驻一军，截断董福祥东渡黄河之路；又派刘松山率部从山西渡过黄河，由绥德西行，直逼董福祥的根据地镇靖堡(今陕西靖边南)。刘松山通过收买董福祥的父亲董世有，诱使董福祥投降。刘松山收其众十多万人，从中挑选精壮，按楚军编制编为“董字三营”，由董福祥、张俊和李双梁各带一营，充当进攻甘肃回军的前驱。

第三，占据董志原。董志原在甘肃宁州境内的马莲河西岸，纵约 150 里，横约 280 里，“地平旷饶沃，可耕可牧”，且“北通灵州，南达陕疆”①，扼陕甘两省关键。1864 年以后，陕西回民起义军主要以董志原为根据地。他们按原来的村寨或教坊关系择地而居，一个大的居住区叫做一营，既是生产单位，又是作战组织。每营人数不等，多至数万，少则几千，共有 18 大营。其活动范围广袤三四百里。1869 年 3 月，左宗棠派兵向正活动于正宁（今正宁西南)、邠州的回军进击，回军作战失利，退回董志原。由于重兵压境，加上伤亡很大，回军决定将原来的 18 大营合并为 4 大营，并退出董志原根据地，撤往金积堡。4 月 3 日，回军一部护送家属辎重，分两路向驿马关、北汉河北撤，崔伟、马正和等率领万余人埋伏在董志原阻击清军，掩护撤退。清军事先得到了情报，待起义军开始撤退时，即分路猛扑。回军损失三四万人，由环县、固原两路经下马关退往金积堡地区。清军占据了董志原一带，打通了进军金积堡的通道。

第四，兴办屯田，安定后方。左宗棠认为：“陕甘之事，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②他吸取胜保、多隆阿、杨岳斌等人一味增兵猛进，结果后方不稳，兵多饷绌，粮运不继，屡遭失败的教训，决定首先把既占地区巩固起来，就地

---

① 曾毓瑜：《征西纪略》，见《回民起义》（二），第 28～29 页。

② 左宗棠：《料理西征就绪即行赴京陛见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28，第 24 页。

兴办屯田（分兵屯、民屯两种），作为解决军粮困难，稳定后方的一个重要措施。

第五，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左宗棠决定分3路向甘肃进军：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名义上进攻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实际上指向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3路之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南路暂取守势，目的是牵制河州（今临夏）、狄道（今临洮）的回军，切断其与金积堡之间的联系，并作进攻河州的准备；中路则以协助北路为主，照顾南路为辅。

三、金积堡之战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左宗棠开始向甘肃回军大举进攻，矛头首先指向金积堡。

回军积极备战，抗击清军　金积堡在灵州西南50余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枕黄河。当地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是伊斯兰教新教的首领，在回民中有较高的威望。1862年他领导当地回民起义之后，陕甘回民纷纷投奔金积堡，以致声势大振，多次击败进攻的清军。1865年，原多隆阿部将穆图善接任宁夏将军，督办甘肃军务。他采取招降政策，瓦解宁夏起义回民。马化龙虽然也接受了“招抚”，但仍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地方公事及征收钱粮等皆由他主持，拥有委任参领、协领以至知州等大小官吏和管理军政事务之权。当然，马化龙知道清王朝决不会允许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因此，他一方面向清朝地方政府输粮输款，表示“恭顺”；另一方面在金积堡地区修仓储粮，筑寨建堡，购马造械，加紧进行防御清军进攻的准备，并与河州、西宁、肃州等地的起义军保持联系。陕西回军退入甘肃后，马化龙不断在物质上给予帮助。因此，“自灵宁西达西宁，南通河狄，各回民无不仰其鼻

息"①。

1869 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刘松山一面宣称"官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恐"②，一面派兵于 9 月 8 日攻占吴忠堡东面的郭家桥。中路清军则由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也由泾州进驻平凉。

宁夏与陕西回军奋起抗击清军的进攻，将刘松山部阻于吴忠堡一带。灵州回军还阻断刘松山部的后方运输线，并趁虚攻占了灵州城。马化龙则派马万春率军一部前往预望城一带，阻击清中路军的进攻。在此之前，白彦虎、杨文治等已率陕西回军从金积堡地区回到预望城、黑城子等地。当清中路军雷正绾部进攻上述地区时，回军作战失利，先后失掉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陈林、马正和、余彦禄等部退回金积堡；白彦虎、禹得彦、崔伟、马成彦等部则相继撤离固原地区，退往河州。陕西回军撤离以后，马万春部孤军作战，无法阻止清军前进，以致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的回民大部向清军投降。中路清军打开金积堡的南面门户以后，于 11 月中旬先后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十余里。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的策应下，又夺取了灵州城，打通了后路。至此，清军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

12 月初，刘松山和金运昌所部在北，雷正绾等部在南，会攻金积堡。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主动出击。12 月 11 日，大败突入回军阵地的清总兵简敬临部，并将简敬临击毙。

峡口、永宁洞争夺战　金积堡有两个险要的地方：一是西面的峡口（今宁夏青铜峡南），它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

---

① 左宗棠：《复陈查明刘松山各情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3，第 15～16 页。

② 左宗棠：《北路官军连获大胜现筹办理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2，第 29 页。

的渠口；一是东面的永宁洞，它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处会合，北流入黄河。峡口控制着进水口，永宁洞则控制着出水口，这两个地方对金积堡的安危关系甚大。清军一到金积堡地区，首先抢占了这两个要口。1870 年 2 月 12 日，回民军从河西履冰而过，一举夺回峡口。雷正绾、周兰亭、张福齐等率部往攻，有的败退，有的被围，伤亡惨重。回军乘胜攻占河西广武营堡，并阻截清军粮道。

与此同时，回军在永宁洞一带也积极行动。2 月 9 日晚，回军千余人从金积堡东南的胡家堡突然进至秦渠南，占领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石家庄在吴忠东南四五里，扼秦渠之要，与下桥永宁洞水口紧接，为双方必争之地。刘松山得知后，连夜率部往攻，回军退至马五寨继续抗击。2 月 14 日，刘松山中弹，伤重而死。

清军先失峡口，继丧统领，加之军中缺粮，士气顿挫，逃亡现象不断发生。回军遂乘机反攻：一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一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 80 里），继又在甘泉会合，东攻韩城、郃阳，一时陕西吃紧，警报频传。与马化龙有关系的河州、狄道回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左宗棠坐困平凉，受到清廷“严旨斥责”。

这时的形势对回军甚为有利，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部署，各自为战，以致未能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相反，再次进入陕西的回军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下，有生力量遭到很大损失，最后纷纷败退甘肃。在金积堡地区，由于兵力分散，几次争夺永宁洞水口均未得手，因而虽然控制了峡口，多次放水淹灌，都未能对清军造成大的威胁。

金积堡失守　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左宗棠一面调集兵力截击进入陕西的回军，并奏调郭宝昌部进攻花马池、定边（清廷以山西河防吃紧，改调金运昌前往），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令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力量向金积堡进攻。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派兵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

护河西运道，逐渐稳住了清军的阵脚。同时，乘回军出击陕西之际，重新发起进攻，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的堡寨逐一攻占，并夺取了金积堡北面秦渠上的蔡家桥水口，放水淹灌金积堡。9月，刘锦棠和金运昌部又攻破东关和南门外回军寨卡数十处。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了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20余座回军垒卡，直逼金积堡西南洪乐堡。清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随后，清军在金积堡四周挖掘长壕二道，由金运昌、刘锦棠、雷正绾、黄鼎和徐文秀分段防守，一防堡内回军突围，一防堡外回军来援。

回军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先是陈林于1870年12月31日率众向黄鼎、雷正绾"求抚"。6天之后，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56门，各种枪1000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等地回军劝降。1871年3月2日，清军攻占王家疃庄。左宗棠按清廷谕旨，将马化龙等处死。

清军虽然镇压了金积堡回民起义，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仅刘松山所部老湘军，营官损失4/10，官兵死亡1000余，因伤致残者2000余人。左宗棠不得不承认"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①。

四、河州之战

河州回军伺机出击，清军切实备战　河州在兰州西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除回族以外，还有撒拉、东乡等民族。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爆发时，河州地区的回民起而响应，次年9月攻克狄道城。1864年，马占鳌领导当地回民起义军攻占了河州城。1867年9月，河州回军假降，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出省受降，几被生

① 左宗棠：《答王子寿比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5页。

擒。从此，河州一直在回军控制之下。

1871年初，河州回军乘驻甘肃清军范铭部兵变之机，出击会宁、通渭、秦州、清水、两当等地。清廷命左宗棠进攻河州，但由于清军在金积堡之战中死伤甚众，左宗棠不敢贸然进兵。

为进攻河州，清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第一，加强和整顿甘南部队。甘南清军冗杂，战斗力很差，屡为回军所败。左宗棠入甘时即派吴士迈等率部由陇州趋秦州，以加强甘南防军的力量。1869年底，又派周开锡以翼长名义总统南路诸军。后周开锡病死，南路诸军由总理营务处陈湜接统。第二，准备渡河器材。河州在洮河以西，从狄道、陇西、安定等地用兵，须渡过洮河，所以，左宗棠令清军先准备好渡河用的船只和架桥器材，同时，整修道路，以利部队调动和转运军需、传递文报。第三，筹集粮秣。清军进兵时，须经过一片荒芜、无处筹粮的渭源属境。左宗棠便派出部队专事转运，令清军在静宁等地储存3个月粮草，并把进军时机选定在收获季节，以便就地取粮。

1871年7月底，左宗棠令40余营清军分三路进犯河州：中路傅先宗率鄂军从狄道渡河，左路杨世俊率楚军取道狄道南面的南关坪进峡城（狄道南90里），右路刘明灯率部由马营监经红土窑进康家崖（狄道北55里）。为防止回军袭击，规定中路以一半兵力留驻东岸，一半渡过洮河修筑堡垒，左右两路则待中路在河西扎稳脚跟以后再行渡河。此外，令提督徐文秀统领后路由静宁进会宁，策应右路。同时，派5营清军分驻河州东南的岷州（今岷县）和洮州（今卓尼东北）两城，并调土司杨元带“番勇”分驻各隘口，均受左路杨世俊节制。又调总兵徐占彪步队8营、马队3营，由中卫经靖远进至会宁西北和安定东北一带，防止河州回军北进，并兼顾兰州。左宗棠则在1871年9月中旬由平凉经静宁、会宁抵达安定。

河州回军加紧准备抵御清军的进攻。洮河东岸的康家崖和狄道，是河州回军的两个出入口。自1870年6月狄道为清军所占之后，回军便着重加强康家崖对岸一带的防御。

太子寺大败清军，起义军首领竟乘胜乞降　1871年9月18日，刘明灯、徐文秀部从安定出发，分两路直插康家崖。清军“每进一处，各派队分支包扫而前”，企图将正在洮河东岸分散活动的回军一并驱往康家崖，迫其背水一战，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① 回军在洮河东岸进行了必要的阻击，予敌以杀伤后，即撤往河西，驻扎于离洮河西岸10里的三甲集一带。

刘明灯、徐文秀占领康家崖后，左宗棠令中路傅先宗部和左路杨世俊部在狄道用渡船搭造浮桥，派12营清军过河结垒，以牵制回军，掩护右路清军渡河。回军以部分兵力在黑山头、高家集等地筑垒驻守，监视西坪、三岔河、陈家山顶的清军，防其偷袭；主力仍驻三甲集，以对付康家崖清军的进攻。康家崖近岸洲渚纵横，水深流急，人马难越，清军多次抢渡都被回军击退。11月中旬，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率左宗棠亲兵等马步5营，由康家崖东南60余里的站滩间道过狄道浮桥，与中路、左路清军配合，猛攻黑山头等处。徐文秀、刘明灯部乘机在康家崖、新添铺（康家崖南20里）等地搭造浮桥，渡过洮河。

清军渡河后，从几个方向会攻河州的第一重要门户三甲集。为了诱敌深入，回军有意放弃三甲集，退至太子寺（今广河）。太子寺在三甲集西南30余里，为河州总要关隘。马占鳌领导回军环绕太子寺挖掘长壕一道，并在险要处设置了许多垒卡，与广通河北岸的回民村堡互为犄角。1872年1月，清军经大东乡和董家山直逼太子寺。回军在火红等处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退清军数次进攻。清军损失惨重，转而从南面进攻。回军又在太子寺寨外挖掘深壕二道，并派出小股部队渡至河东，袭击清军运粮部队，截夺军粮。清军断粮，只得宰牛马为食。

进攻太子寺的清军40余营密布于太子寺南面20余里的新路坡。马占鳌亲自侦察，发现坡上有个稍低的山头无清军驻守，便

---

① 左宗棠：《分路进剿大胜夺据康家崖要隘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0，第1页。

于2月12日晚派马海晏率回军优秀射手数百人乘夜暗潜入新路坡，占领山头，又密派1000人挑运水和土坯上山，连夜浇水砌墙。时值隆冬，滴水成冰，一夜之间就筑成光滑坚硬的堡垒3座。次日，清军发现回军堡垒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阵地中间，大为震惊。傅先宗立即调派部队亲自督攻，企图拔掉这些钉子。马海晏指挥枪手沉着应战，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14日，傅先宗亲掌大旗督兵猛攻，被回军击毙。防守烂泥沟的回军乘机出击，抄至敌人后面。清军两面受敌，纷纷弃垒逃跑。徐文秀企图挽回颓势，也被回军击毙。

太子寺一战，清军损兵折将，全线溃退30余里。面对这一辉煌胜利，多数起义军将领主张乘胜反攻，扩张战果。有的还提出了进攻左宗棠安定大营的具体计划。但是，马占鳌听说左宗棠正在调动军队，又听说西宁回军已降，便决定借起义军浴血奋战争得的胜利作为投靠清廷的资本。他否定了其他将领的意见，力主向清军投降。他认为即使打败了左宗棠，也终难与清军抗衡，并以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最后被湘军打败为例，声称“今日之事，舍降别无生机”①。随后，马占鳌派他的儿子马安良等人前往安定向左宗棠乞降。因兵败而焦虑不安的左宗棠对马占鳌的这一举动喜出望外，但又颇感疑惑，害怕“其中或有别故”②。马占鳌又亲向左宗棠“请罪”，并交出骡马4000匹、枪矛1.4万余件，终于取得了左宗棠的信任和赏识。马占鳌投降后，将部队按楚军的编制改编为3旗马队，转过头来镇压西宁等地的回民起义军。

---

① 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23，第31页。

② 左宗棠：《叠攻太子寺屡胜两挫逆回乞抚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9页。

五、西宁之战

西宁在清代是甘肃的一个府治，管辖西宁、碾伯（今青海乐都）、大通3个县和贵德、循化、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丹噶尔（今青海湟源）4个厅。1862年11月，碾伯县地主武装“民团”杀死巴燕戎格回民3人，并扬言要尽洗米拉沟（今青海民和西）回民。巴燕戎格和米拉沟回民联合循化撒拉族，在撒拉族人马文义的领导下起义，多次打败“进剿”的清军和民团，占领了碾伯至享堂（今青海民和北）的大道，截断了兰州至西宁的交通。西宁办事大臣玉通以所谓“以贼攻贼”的方法，保举循化回绅马桂源署理循化厅同知，其兄马本源署循化营游击，后又保举马桂源署西宁知府，马本源署西宁镇标游击并代行总兵职务，企图利用马桂源、马本源与马文义的亲戚关系，缓和回民的反抗。但是，形势的迅速发展，把马桂源兄弟也卷入了反清斗争的行列。西宁一带名义上仍属清王朝管辖，实际上是在马文义和马桂源的控制之下。马文义死后，马桂源、马本源即成为西宁回民的首领，西宁周围完全被回民军所控制。

甘、陕回军联合作战　1872年8月，左宗棠从安定移驻甘肃省城兰州，调刘锦棠所部老湘军进攻西宁。9月初，刘锦棠率步队18营从平凉进抵碾伯。他为了离间“土回”(指当地回民)和“客回”(指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率领的陕西回民)的关系，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遂出示晓谕：土回安堵无恐，以便直捣陕回巢穴”①。

当时，西宁回军首领以及从河州来到西宁的陕西回军首领，在是否联合抗击清军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金积堡失守后，一些领导人的思想开始动摇。当河州之战正在进行之际，马永福就有

---

① 左宗棠:《进攻西宁土客各回叠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2，第12页。

投降之意。后经马桂源密约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召开紧急会议，一致主张西宁回军和陕西回军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并推举马本源为大元帅，统一指挥各部起义军。

西宁城在湟水南岸，起义军在城东小峡至大峡之间的高山上构筑坚固的堡垒，驻兵防守。刘锦棠率清军刚出碾伯不远，就遭到回军的迎头痛击。回军利用有利地形，一面坚守要点，一面派队偷袭敌人，阻断粮道，使清军穷于应付。从9月中旬到11月中旬，清军与回军接战50余次，损兵折将，无法前进。左宗棠只得增调刘明灯率马步6营驻碾伯西南，专司护运；调杨世俊、吴隆海率马步11营增援刘锦棠部。同时，加紧策降活动。

起义军内部分化，西宁失守　当马桂源出西宁指挥回军作战时，留在城中的马永福遂勾结西宁道郭襄之等汉族官绅闭城据守。马桂源、马本源没有分清主次，用相当大的力量去围攻西宁城。刘锦棠指挥清军用开花大炮猛攻起义军堡垒。回军因两面作战，兵力分散，阻挡不住清军的强大攻势，以致大峡至小峡一段隘路逐渐失守。11月19日，刘锦棠部进至西宁，当地回军大部瓦解，陕西回军首领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也率部投降，只有白彦虎率领的一部退至大通，与马寿领导的当地回军一起继续坚持斗争。刘锦棠令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所部回军为前导，北攻大通。马寿率回军坚守大通南面的向阳堡。1873年2月1日，清军经过恶战，攻占了向阳堡。随后，刘锦棠部又攻占了大通县城。白彦虎率2000余人北走，出扁都口（今民乐县南），向肃州退却。

西宁失陷时，马桂源、马本源曾率三四千人退至巴燕戎格。左宗棠命陈湜等率军从河州进攻，同时派马永福前往“招抚”马桂源、马本源的部众。3月2日，在马占鳌的策划下，马桂源、马本源在巴燕戎格东山被俘，后在兰州遇害。陈湜所部清军占领巴燕戎格城后，不久又攻占循化，西宁之战遂告结束。

六、肃州之战

肃州是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最后一个基地。1865年初，陕甘回民起义的浪潮波及河西走廊，凉州（今武威）回民首先起义，接着马文禄在肃州起义，占据嘉峪关和肃州城。肃州邻近嘉峪关，是连接内地与新疆的边关重镇。新疆回民在前一年即已起义。清政府为镇压新疆回民起义，便命正在甘肃的新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先率兵攻取肃州。由于马文禄的力量不断加强，加之肃州形势险要，清军的“进剿”被回军击败。1868年，成禄和甘肃提督杨占鳌在“招抚”的名义下，与马文禄“媾和”，把肃州交给马文禄管理。

清军逐次增兵肃州　1871年7月，沙俄突然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声言还要“代收”乌鲁木齐。清政府催促成禄迅即出关，并命左宗棠派兵驻防肃州。当时清军正进攻河州，左宗棠为了先清后路，然后一意西指，只抽派驻在靖远的徐占彪部先赴肃州。

徐占彪率12营川军从靖远出发，于1872年初进至肃州高台。马文禄得知大队清军前来，便再次起义反清，据城为守。徐占彪留兵一部保护运道，主力继续向肃州城前进。3月，清军夺占了肃州城南30里的红水坝，并以此为据点，向塔尔湾（肃州西南20里）和肃州外围的其它回民军堡垒进攻。从7月初至8月初，近城的回军寨堡基本上被清军攻占，回军退入城内坚守。因徐占彪所部兵力不足，故未能对肃州形成合围。后来，西宁之战渐近结束，左宗棠派陶生林率马步5营于1873年1月到达肃州。适清政府派往新疆的金顺军20营也来到肃州，参加围攻作战。这样，清军完成了对肃州的合围。

开始，清军的合围并不严密。起义军在城西礼拜寺和北稍门一带修筑了堡垒，与城内互相联络，并能突破清军的防线，取得新疆回民起义军的人员和粮食支援。以后，清军攻破了这些堡垒，占领了礼拜寺，并在肃州城外挖长壕，筑炮墙、木栅，在几个要点修筑了炮台，控制了肃州城的出入通道，使其完全成为一座孤

城。4 月初，白彦虎部进入塔尔湾，从外面袭击徐占彪大营，马文禄也率部出南稍门夹攻。但清军防守严密，白、马部无法突破清军的防线。随后，白彦虎率部出嘉峪关西走新疆。

起义军突围未成，被逼投降　这时，西宁之战已经结束。除肃州外，甘肃各地的回民起义均已失败。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马文禄为突围西行，出兵攻夺清军重兵驻守的城西礼拜寺，经过 10 昼夜连续攻击，有生力量损失很大，不得不停止进攻。7 月，东关为清军攻占，马文禄再次组织突围。由于清军兵多围紧，又装备有洋枪洋炮，起义军的突围终未成功。

肃州城墙高厚，外环城壕，围城清军虽增至 60 余营，仍久攻不下，左宗棠便亲至肃州督战。清军在城外所筑炮台高出城墙，上安新式后膛炮。金顺部还在城东北角挖了地道，准备炸城。1873 年 10 月 6 日，清军发起总攻。由于长期被围，城内粮食极度缺乏，起义军只得杀骡马充饥，但仍英勇不屈，严守城防。为防止清军从地道炸城，他们沿城横挖地道进行破坏。又在城上加砌横墙，伏兵墙下。当清军越过城壕登至城腰时，城上石块纷如雨下，登城清军纷纷抱头回窜。10 月底，刘锦棠奉命率湘军 5 营和西宁投降的回民部队到达肃州。清军利用崔伟、毕大才等在城下喊话，告以“死期已至，善自为谋”①。马文禄终于经不起清军的威逼利诱，于 11 月 4 日开城投降。左宗棠将马文禄等 9 名回军首领和千余名起义军施以酷刑。肃州之战就这样以马文禄的投降和回民大量被残杀而告终。至此，坚持了 12 年之久的陕甘回民起义战争以失败而结束了。

第五节　值得重视的几个战略性问题

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和推动下爆发的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

---

① 左宗棠:《克复肃州尽歼丑虏关内肃清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4，第 7 页。

义，是当时全国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起义，与太平军、捻军的起义战争，在战略上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配合与支援作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坚持斗争的时间都比较长（少则六七年，长则19年）。之所以能够如此，首先是由于各次起义都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各族贫苦农民的斗争都比较坚决；其次，太平军和捻军等的积极作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牵制了清军的主要力量，使起义武装得以乘机发展；再次，西南、西北地区地形复杂，交通闭塞，人稀粮少，气候恶劣，不便于清军“进剿”。各次起义战争之所以失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王朝还掌握着全国的政权，并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而起义诸军则未能也难于联合起来，形成集中的领导和统一的战略部署，终被清军各个击破。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战争的实践表明，起义武装要坚持长期的斗争，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战略性问题。

一、必须实行联合各族人民共同战斗的政策

西南、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统治阶级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极力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各个民族在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也各不相同，因此，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同舟共济，一致对敌，便成了发展起义力量和坚持起义战争的首要条件。

杜文秀是清王朝“护汉抑回”反动民族政策的直接受害者。由于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回汉仇杀的罪魁祸首是清朝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回汉两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则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因此，他率众起义之后，致力于改善民族关系，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包括重用汉人在内的团结各族人民的政策和措施，积极引导回汉等各族人民消除隔阂，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所以，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战争，实际是由回、汉、彝、白、傣、景颇等各族人民共同参加，联合反抗清王朝的起义战争。这正是

它能够不断发展，并取得一系列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样，活跃于贵州高原上的数十支起义武装，也都是以某一民族为主体，又有其他民族参加的多民族的战斗集体。各族起义军相互应援，密切配合，以至并肩作战，乃是贵州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得以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上述情况相比，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个问题上就有明显的不足。起义军的领导权多数掌握在回族上层分子手里，他们既没有提出明确的反清政治纲领，也没有提出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共同行动的口号，反而常常把回民群众的反清斗争引导到宗教教派之争和民族纠纷上来。这样，既影响了回民起义军内部的团结，更妨碍了各族反清力量之间的合作；而统治阶级则正好利用矛盾，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反清力量。

二、必须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革命军

要战胜拥有强大武装的封建统治阶级，起义者必须首先武装自己，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并不断提高其战斗力。云南回民起义之后不久，杜文秀即对各地集合起来的部队认真进行整顿，确定部队的编制，建立各级军事组织，制定规章制度，严格军事纪律。经过整顿，提高了滇西回民起义军的战斗力，特别是防御作战能力。起义军围攻昆明时在城外设置的营垒，有的只有数十人防守，却能屡挫敌锋，使清军“动损精锐，破一垒难于拔一坚城”①。晋宁之战，起义军守城六七个月，粉碎了清军的多次进攻，并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在城内与敌相持两月有余。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李、蓝起义军入川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拥有 30 余万人的起义大军，但只顾发展，忽视整训，战斗力没

① 张涛：《滇乱纪略》，见《回民起义》（一），第 276 页。

有相应地提高。因此，进攻时不能战胜少于自己的敌人，如绵州和眉州都久攻不下；而遭到清军进攻转入防御时，则一败而不可收拾。再如陕甘回民起义军，组织很不严密，平时与老弱妇孺同住一起，行军作战时家属也随同行动，极不利于战斗。贵州各族起义军则多采取“亦兵亦农”的政策，这对于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起了积极作用。但起义军没有脱离生产的基干队伍，以致军事行动经常受到农业生产季节性的影响，往往丧失有利的作战时机，且因平时缺乏必要的训练，战斗力得不到提高，因而难以抵挡像湘军这样训练有素而又有实战经验的军队的进攻，致遭失败。

三、必须依据主客观条件采取灵活的战法

起义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武器装备一般都劣于敌人的起义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总是不断地受到敌人的“围剿”。因此，起义战争的领导者必须根据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采取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灵活的战法，才能逐渐改变这种敌强己弱、敌主动己被动的客观形势，进而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西南、西北各支起义军，都采取过一些适合当时当地情势的战法。如初期的陕甘回民起义军，进攻时一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马队在敌阵中“来往冲突”，使以步兵为主的清军难以招架；退却时转入山径僻道，“飘忽靡常”，使清军不知起义军的去向。贵州起义军则能利用山陡沟深、溪多林密、路径纷歧的地形条件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与敌人周旋。清军进攻时，起义军或分散避入山林，或入险塞固守，尔后利用有利时机，袭扰敌人；清军被迫撤退时，则出兵追击，或绕出敌前，设伏以待。特别是当湘军向苗区进攻时，苗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向湘军后方和清军占领区进军，迫使其回援，更是起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作用。李、蓝起义军在强敌临境“非万不得已不可与战”的原则指

导下，以高速流动来摆脱敌人或寻求战机，“往往百里突至”，“所入无不大获”。陕甘和贵州各族起义军还出奇兵袭击清军的运输队，阻断清军的粮道，使其粮匮援绝、军心动摇，有力地配合了正面部队的作战。

但是，不少起义军对采取和创造趋利避害的灵活战法缺乏明确和自觉的认识，不善于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着眼，积极寻机在野战中歼击敌人，常常注重攻城和守城，以致损精耗锐，陷入被动。李、蓝起义军围攻绵州之战和滇西回民军围攻昆明之战，都导致了战争胜败的根本转折。甘肃回军各自据城而战，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四、必须有统一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西南、西北各次起义战争，由于民族、宗教、地域等方面的原因，一般都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各支起义军之间或同一支起义军的各部之间，虽然有时能够互相配合作战，但缺乏组织上的保证，因而基本上是在各自首领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地区内单独活动，形成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据一方、各自为战的局面。

这种情况，在起义初期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进攻之敌数量不大，战斗力较弱，又各分畛域，起义军各自为战，往往能使敌人顾此失彼，难以应付，有利于自己发展壮大。但在起义军力量壮大以后，清政府又调集重兵进攻的形势下，不及时改变分散的状态，就无法统一部署，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相反，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的后期，清军首先切断了苗军和号军的联系，集中力量进攻号军。号军失败，苗军失去了北方强大的友军，内部又不统一，结果在优势清军的进攻下归于失败。李、蓝起义军也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不能把各支起义队伍团结和统一起来，终于被敌人各个击破。

第十二章　中国近代国防工业的兴办

第一节　自强活动与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

一、自强活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农民起义风暴冲击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已无法按照老办法继续统治下去，急需调整步伐，总结经验，以重新巩固封建营垒。在此形势下，一些王公大臣纷纷上奏朝廷，要求变法自强。从1861年（咸丰十一年）开始，“自强”一词在一些奏章、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不久，便掀起了以“师夷长技”为中心的自强活动，成为清后期历时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的先导和主要组成部分。

自强活动首先是从军事改革和兴办军事工业开始的。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蒙受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耻辱，朝野上下受到极大的震动。不少人认为中国屡吃败仗，主要是由于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器械精良。因此，当时提出“自强”的内容，主要是引进西方技术，制造枪炮舰船，以求改善清军的装备，达到抵御外侮的目的。然而，清统治者最初倡导自强，主要还是为了应付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其时，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起义方兴未艾，动摇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于1861年1月奏称：“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

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① 奕䜣等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代表了清统治者的态度，即在外部民族矛盾和内部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情况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针，把镇压农民起义放在首位。不过，在农民起义风暴业已平息，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民族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变法自强的目的也随之转移，抵御外侮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自强活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即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谓“西学”，主要指西洋的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制造枪炮的技术。通过向西方学习，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倡导“自强”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前期在中央的有奕䜣和文祥，在地方的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后期代表人物则有张之洞等。恭亲王奕䜣是洋务派的核心人物；曾国藩是自强活动的首创者；李鸿章经历自强活动之始终，时间最长，作用最大，成为洋务派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自强活动是先从购买洋枪洋炮，尔后设厂制造，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曾国藩即通过两广总督叶名琛购进洋炮千余门，用以装备湘军水师。他看到“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②，亲自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1860年12月（咸丰十年十一月），曾国藩在《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明确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认为此举“可期永远之利”。③ 他在一篇日记中还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④。他认为“今日和议既成，中外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2675页。

② 曾国藩：《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见《曾文正公全集》（二），第55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二），第370页。

④ 《曾文正公全集》（三），“日记”第37页。

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①。从单纯购买洋枪洋炮到大胆提出“师夷智”自造炮船，是曾国藩由旧式地主官僚转化为洋务派的重要标志，也是他对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学习“洋人长技”以为我用的问题上，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态度是相同的，而且更为积极。1862 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去上海后，目睹西洋枪炮的威力，视之为“神技”。他致书曾国藩称：“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他表示：“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②李鸿章在上海大开眼界，看到了洋人的先进技术，痛感中国的落后，为其倡导洋务、坚持军事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清廷重臣奕䜣、文祥等人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看到了中国与外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因而也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自强活动，希望在力保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们一面向朝廷建议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面申述自强之法，认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③ 1861 年 7 月，奕䜣等人在请购外国军火折中说：“外忧内患，至今已极……是以上年曾奏请敕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

---

①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见《曾文正公全集》（二），第 417 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46～47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 2700 页。

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①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缓和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举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条件逐渐成熟。1864 年，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提出了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② 这一主张立即得到奕䜣等人的赞同。奕䜣上奏朝廷：“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③ 经过清廷批准，以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先导的自强活动迅速在全国掀起了热潮。

二、近代军事工业的萌芽

在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之前，为应付战争的需要，已有一些近代武器制造的尝试，首创者为曾国藩。

曾国藩不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也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实干家。早在 1862 年，曾国藩便在刚刚从太平军手里夺过去的战略要地安庆创办了著名的安庆内军械所，罗致了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制造枪炮弹药。不久，经李善兰等人推荐，曾国藩又招容闳入幕。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学识渊博，思想开化，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创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向曾国藩建议：“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④。曾国藩当即采纳了容闳的意见，同时委派他赴美国采购机器。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 2913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第 10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第 1 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见《洋务运动》（四），第 509 页。

曾国藩急于要看到自造的轮船。他在派容闳出洋访求“制器之器”的同时，命徐寿等人加紧研制轮船。徐寿是江苏无锡人，系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和著名科学家。他曾经自制过指南针、象限仪等仪器，但研制轮船还是第一次。徐寿凭借曾在一只小轮船上见过轮机运转的记忆，并参照《博物新编》一书的略图，经过3个月的琢磨，即制造出轮机的模型。不久，由我国科学家自行研制的第一部蒸汽轮机问世，曾国藩极为振奋。他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① 1865年，我国历史上第一艘自己设计和施工的轮船——“黄鹄”号终于研制成功。该船重25吨，航速逆行每小时8公里，顺行14公里。这艘中国蒸汽机轮船的诞生，虽然比英国生产第一艘轮船（1811年）晚50多年，而且还存在不少缺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它毕竟是中国自造轮船之始。

继安庆内军械所之后，李鸿章于1862年委派英人马格里设立了“上海洋炮局”。1863年，发展为分别由马格里、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三所洋炮局。同年底，淮军攻占苏州，不久，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由松江迁往该处，改称“苏州洋炮局”。

上述事实反映了洋务派急于建立本国军事工业的迫切心情。但是，当时正处在军需紧缺时期，洋务派在来不及买到“制器之器”的情况下仓促推动军火工业上马，因而设备比较简陋，生产方法仍以手工为主，产品粗糙，有些远未达到实用水平。因此，这一时期的军火生产只能视为清政府经营近代军事工业的雏形和前奏。

三、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

使用大机器生产的中国近代军事工业，肇始于19世纪60年

① 《曾文正公全集》（三），“日记”第38页。

代中期。直至清王朝灭亡前，包括中央和省办的大大小小军火工厂多达 30 余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也称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汉阳枪炮厂等。

（一）江南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或沪局，是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一手筹办的第一个近代化兵工厂。

李鸿章在 1864 年以前创设的三个炮局，虽然生产了一些短炮和炸弹，在镇压太平军的作战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些简陋的炮局仅是应急之作。其后，在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的支持下，李鸿章派丁日昌在上海大力访购“制器之器”，计划建设一个大型的兵工企业。

1865 年 6 月，经丁日昌努力，用 6 万两白银买下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据丁日昌称，该厂“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实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①。李鸿章买下铁厂后，将原设在上海的分别由韩殿甲、丁日昌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并入该厂，改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于同年 9 月 20 日奏请成立，命丁日昌任总办，韩殿甲、冯焌光分别为会办和襄办。

江南制造总局成立之初，仅有美国人科尔（原旗记铁厂经理）等 8 名外国技师和 50 余名中国工人，“仍以铸造枪炮借充军用为主”②。同年，容闳从国外购买的机器运抵上海，曾国藩令归江南制造总局，大大提高了该局的生产能力。后因“机器日增，厂地狭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间，乃于上海城南兴建新厂，购地七十余亩，修造公所”。至 1868 年秋，“其已成者，曰汽炉厂，曰机器厂，曰熟铁厂，曰洋枪厂，曰木工厂，曰铸铜铁厂，曰火箭厂，曰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暨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

---

① 转引自《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9，第 32 页。

②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9，第 34 页。

屋颇多，规矩亦肃。其未成者，尚须速开船坞，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储木料，另立学馆，以习翻译”。[1]以后规模日益扩大，到1875年，据李鸿章奏称：“综前后营造计之，局以内工艺正副各厂及库房、画图、方言馆、公务厅共十七座，局以外船、炮、弹药各厂及洋楼、舆图局共十五座，大船坞一区。”[2] 1876年统计，共占地400余亩，有工匠2000余人。该局以后又陆续增建了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等，到1891年，已发展成为拥有13个分厂和一个工程处、各种工作母机662台、蒸汽动力机361台（总马力4521匹）、大小汽炉31座（总马力6136匹）、厂房2579间、员工总数达3592人的大型综合性军工企业。其附设的方言馆、工艺学堂、翻译馆、炮队营、巡警营等，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翻译出版了许多军事书籍，并不断为其它新建的军工企业输送技术和人才，成为当时中国军工生产的中心和洋务派用以推动近代工业发展的基地。

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主要项目有枪、炮、弹药、水雷、兵轮等。枪有林明敦枪、黎意枪、快利枪、毛瑟枪等。炮有大炮（口径15～30厘米）和快炮（口径4.7～15厘米）两种。最重的要塞炮达52吨，弹重800磅。可生产黑色药、栗色药、无烟药及各式枪弹、炮弹、水雷。还可生产炮舰和舢板等（1876年以后，基本停止造船）。据该局总办刘麒祥1895年5月致张之洞的电报透露，当时的军火生产能力是：“小口快枪每年造成一千五百杆，计每日五杆，每月百十五杆。专造四十磅子快炮，每年可造成十二尊，约每月一尊。专造百磅子快炮，每年可造六尊。若大小各种并造，则难计成数。快枪弹每日可造成五千颗，栗药每日出八百磅，无烟枪炮药每日共可出四百磅”[3]。该局从1867年至1904年生产的主

---

① 曾国藩：《新造轮船折》，见《曾文正公全集》(二)，第840～841页。

② 李鸿章：《上海机器局报销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6，第14～15页。

③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同），第297页。

要军火数量为：各种枪 6.436 万支，各种炮 742 门，火药 667 万磅，各种炮弹 160 万发，各种枪弹 860 万发，地雷水雷 1500 具。此外，江南制造总局还自制各种工作母机 249 台，起重机 84 台，抽水机 77 台，汽炉机 32 台，汽炉 15 座，各种机器零件 110 余万件。

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开端。它所生产的武器，供应范围遍及全国，多达七八十个单位，包括南北洋系统的军队及军械所，各地炮台、军舰及各行省的军队，对加速清军武器装备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

（二）金陵制造局

金陵制造局是继江南制造总局之后创设的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其前身是苏州洋炮局。1864 年，被遣散的“阿思本舰队”回航英国，马格里怂恿李鸿章买下一批该舰队用以修造军火的机器设备，使苏州洋炮局这个小军械所扩充起来。1865 年，李鸿章由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赴南京就任，苏州洋炮局随迁南京，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建厂，改称金陵制造局。

金陵制造局的经费远逊于江南制造总局，因此在规模和发展速度上，无法与之相比。最初，金陵制造局只能生产一些枪弹、炮弹、药引、自来火等，1869 年才开始制造多种口径的火炮。后经逐年扩充，至 1879 年，该局已拥有 3 个机器厂，翻砂、熟铁、木作各两个厂，还有火箭局、水雷局、火药局等。另外，1874 年创办的乌龙山机器局亦于是年归并金陵制造局。1881 年 11 月，署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在金陵制造局内添设一“洋火药局”，其理由是：“江防各炮台及留防各营每年需用洋火药为数甚多，上海制造局虽兼造洋火药，尚难接济，历系购之外洋，价值昂贵，运到仍难刻期。……必须自行仿造，就近兴办，则价值既廉，取用甚便，尤可就此研究，精益求精”。① 该局经批准于翌年动工兴建，1884 年夏竣工投产。全部设备购自英国，年产枪炮粗细各类洋火药 20 余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35 页。

万磅。

金陵制造局是李鸿章一手操办起来的，因此该局生产的军火最初只供应淮军。1867 年，李鸿章调任湖广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该局军火不得不同时供应湘、淮两军，但湘军仅占一小部分，大部送往天津，装备大沽炮台和李鸿章的淮军。1875 年，金陵制造局为大沽炮台制造的大炮在演放时一再炸膛，使全部产品成为废物，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不得不将马格里撤职。1884 年春，曾国荃调署两江总督，他趁中法战争急需大量武器之机，扩充金陵制造局，花银 10 万两添造厂房，并购置制造枪炮子弹的机器 50 余台。经过扩建、改造，金陵制造局的生产能力显著提高。据刘坤一奏称：到 1899 年，金陵制造局每年可造后膛抬枪 180 支，两磅后膛炮 48 门，1 磅子快炮 16 门，各种炮弹 6.58 万发，抬枪自来火子弹 5 万发，毛瑟枪子弹 8.15 万发。①

金陵制造局是一座中型兵工厂，生产项目比较庞杂，所造枪炮制式比较落后，且质量不佳，但火药生产能力较强，1904 年以后曾因生产过剩，被迫减产五六成。此外，该局也曾造过 2 艘小轮船，用于牵引江中运船。

（三）天津机器局

天津机器局创建于 1867 年（1895 年改称“总理北洋机器局”），而试制军火早在 1862 年就开始了。

1862 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雇请英人在天津训练洋枪队，同时“试铸英国得力炸炮，加工精造炸炮子，并鸟枪致远子，又仿造俄国群子炮群炮子”②，一个月内陆续制成 10 门炸炮，但未形成规模。

1865 年 5 月，僧格林沁被捻军围歼于山东曹州，清廷惊恐，迭谕署两江总督李鸿章派军由海道赴津，援护京师；同时命其派丁日昌带领熟谙制造火器之役匠随军北上制造炮弹。李鸿章明白，清

① 参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34 页。

② 《通商大臣崇厚等奏》，《洋务运动》（三），第 449 页。

廷此举之目的，一方面想动用淮军镇压捻军，一方面借机分割淮军的军火生产能力，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工企业。他为应付清廷，即回奏表示，除“派得力镇将统带劲旅北援”外，拟“饬商丁日昌酌派该局熟练之员，带领匠役器具，由轮船赴津，开局铸造炸弹，以资应用”①，但又一直拖着不办。此后，清廷连发谕旨催逼，直到同年9月，李鸿章仍奏称：“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②。显然，李鸿章是以此搪塞清廷，借以保存江南制造总局的役匠和机器。由于李鸿章左右推诿，天津设局一事不得不搁置起来。

1866年秋，洋务派掀起了聘请洋人训练军队的热潮，于是在天津设立军火制造局的问题，再次由恭亲王奕䜣提了出来。10月6日，奕䜣等专折具奏，建议在天津设局，由崇厚筹划办理，妥立章程，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该奏称：“练兵之要，制器为先。中国所有军器，固应随时随处选匠购材，精心造作。至外洋炸炮、炸弹与各项军火机器，为行军要需，神机营现练‘威远队’，需此尤切。中国此时虽在苏省开设炸弹三局，渐次著有成效，惟一省仿造，究不能敷各省之用。……臣等公同商酌，拟即在天津设立总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③。清廷批准奕䜣建议，派崇厚主持筹建，并同意提取津海、东海两关四成关税作为常年经费。

崇厚筹建津局主要依靠英国商人兼充丹麦领事密妥士，所用机器也主要由密妥士向国外购买，另由江南制造总局制造一部分。1867年，先在天津城南海光寺建成一枪炮厂，称为“西局”，1869

---

① 李鸿章：《筹调洋枪炮队赴津兼筹制造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8，第54页。

②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33页。

③《奕䜣等折》，《洋务运动》(四)，第231页。

年又在城东贾家沽设立火药局，称为“东局”。清政府设想津局开始以制造火药为主，以供给全国军队的需要，待整个制造局设备齐全，走上正轨后，再转入制造枪炮。但是，由于“该局规模粗就，机器向少”，加上“局内所购机器料物，来自西洋，名目互异，笔难尽译，其制造诸法，随时与洋匠讲求改变，费工费料较多”①，故生产能力极其有限，只能试制铜炸炮、炮车和炮架，日产洋火药仅三四百磅，不及江南制造总局的1/3，根本达不到清政府所设想的生产规模。

1870年秋，清廷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天津机器局从此打开局面。李鸿章决定整顿该局，一面加修厂房，添置机器，一面派人加强督导。他调沈保靖（原任江南制造总局督办）总理天津机器局事务，解除了洋总管密妥士的职务，并选调大批南方工匠到津局工作。

经李鸿章大力经营，天津机器局迅速扩充，1872年建成了铸铁、熟铁、锯木等厂，1873年添置机器十余部，续建了机器房和第二碾药厂，1874年又建成第三、第四碾药厂，购买了制造林明敦枪和制中针枪子的机器，成立洋枪厂和枪子厂。到1876年，津局的军火生产能力已较前增加了三四倍。此外，还可承修军舰、轮船和小型机器船，1877年又试制出了电气水雷。以后，津局续购机器，扩建厂房。1887年新建的栗色火药厂，时人认为是“世界最大火药厂之一”②。1893年，又从英国买进全套设备，建成一座炼钢厂。这样，天津机器局随着规模的扩大，其地位与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它不仅以火药、铜帽供应北方各省军队，而且还为海军制造了一些小轮船、布雷艇和各口炮台所需的各类弹药。李鸿章称津局为“洋军火之总汇”，并视之为“北洋水陆各军取给之源”③。其主

① 李鸿章：《奏报机器局经费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第13页。

② 《天津之今昔》，《捷报》1888年11月23日。

③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四)，第275页。

要产品年产量，以1881年为例，计制成各种洋火药103.98万磅，铜帽3075万颗，各种后膛洋枪子393.84万颗，大小炮弹2.75万发。①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天津机器局（时称“总理北洋机器局”）惨遭破坏，无法恢复。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决定重建津局，遂于山东德州外花园择定新址，于1903年开工建造，次年落成投产，厂名仍用“总理北洋机器局”，但企业的规模和生产能力已远不如前。

（四）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是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于1866年主持创办的以造船为主的军工企业。它不仅以规模大、设备全见称于全国，而且所聘外国技术人员之强，行政管理人员之多，企业工人实力之雄厚，都居全国军工企业之首。

1862年，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在镇压太平军的作战中，结识了法国洋枪队帮统日意格和德克碑。在他们的帮助下，左宗棠在杭州试制了一条小轮船。虽然行驶不速，未获成功，但通过这次实践，使他开阔了眼界，坚定了自造轮船的信心。

1866年6月，左宗棠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创办船政局的建议。他指出：“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因此，“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② 在同一奏折上，他还就选择厂址、购置机器、约请洋匠和筹集款项诸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7月14日，清廷就左宗棠奏折发布上谕，认为其主张“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陈各条，均著照议办理”。③ 于是，福州船政局开始正式筹办。

---

① 参见《洋务运动》（四），第266页。

② 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2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4页。

8月中旬，左宗棠经与日意格等商议，选定福州东南罗星塔地方为厂址，在马尾山下建立船槽、铁厂、船厂及办公室，一切均由日意格与上海中外商人定议包办，订立合同，并由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来尼签字担保。

同年秋，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认为："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遂向清廷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总理船政。①旋又任命通晓汉字的日意格为船政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②

根据最初规划，福州船政局主要由铁厂、船厂、学堂三部分组成。机器和原材料均由日意格等向国外购买。基建工程费用约需银24万两。左宗棠与日意格签订的合同规定：自铁厂开工之日起5年之内，外国技师和工匠应保证教会中国工匠能够按照图纸自造轮船，并能自行驾驶；5年内造出大小轮船16艘；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在5年内培养的学生亦应分别学会制造和驾驶。

1867年9月，马尾船坞工程基本竣工，10月开始兴建船台，为第一号轮船动工作准备。此后，日意格等从德国购买的各种轮机、工作母机及雇用的法国工匠相继到达，先后建成转锯厂、大机器厂、制缸厂、木模厂、铸铁厂、仪表厂、铜厂、储材厂等。

1869年6月，福州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竣工下水。该船为木体暗轮，580匹马力，载重1370吨，上装4门钢炮、2门铜炮，航速10节。据称，该舰"在大海之中，冲风破浪，船身牢固，轮机坚稳"，从管驾官至舵工，"无一洋人在内"。③

---

① 左宗棠：《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第27页。

② 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4页。

③ 《三口大臣崇厚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台北艺文印书馆1957年版（下同），第199页。

这说明福州船政局从一开始就贯彻了左宗棠“自造”、“自驾”的方针，在利用外国技术、发展近代工业和航海造船事业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从 1869 年至 1874 年，福州船政局在日意格监督期间，共造成大小轮船 15 艘，其中最大的是“扬武”号兵轮，有 1130 匹马力，载重 1560 吨。福州船政局成立后，发展速度不能说不快，但由于各种人物对中国自造轮船议论纷纭，褒贬不一，因此，到 19 世纪 70 年代初，围绕福州船政局的生存问题，清政府内部展开了一场重大争论。内阁学士宋晋建议清廷将包括江南制造总局在内的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其每年额拨之款，即以转解户部，俾充目前紧急之用”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坚决予以反驳，认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苟或停止，势必前功尽弃，后效难图。在洋务派的争辩下，清廷终于同意福州船政局继续兴办。

1874 年，雇用日意格等的合同期满，船政局辞退了日意格及大部分外国技师和工匠，由船局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主持设计生产。截止 1880 年，又制成兵轮 8 艘，其中部分兵轮改为铁肋木壳，功率亦有所加大，但基本还是模仿日意格等所传授的方法和图式。所造船只成本高，不适用，“只可载运而不足备战阵，殊与设立船政之初意未符”②。于是，福州船政局又成为主张撤厂停办的某些保守大臣的攻击对象。

为了摆脱窘境，新任船政大臣黎兆棠于 1880 年 5 月上疏清廷，请造巡海快船。他认为：“巡海快船制精而行速，利于冲击，与铁甲船相辅而其用过之，固中华所未曾有之巨舰，海防必不可少之利器，非寻常轮舶可比”③。经批准制造的第一艘铁胁快船“开济”号于 1883 年 1 月正式下水，黎兆棠称，该船“机件之繁

① 《内阁学士宋晋片》，《洋务运动》（五），第 105～106 页。

②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10 页。

③ 《督办船政黎兆棠奏》，《洋务运动》（五），第 266 页。

重，马力之猛烈，皆闽厂创设以来目所未睹"①。这是我国造船技术人员依照外国最新技术建造出来的大型兵轮。它的问世，称得上是我国造船史上的重大突破。

在1884年的中法马江海战中，福州船政局遭到严重破坏。经修复后，到1895年为止，又造出10艘兵轮。其中1885年和1886年相继下水的两艘巡洋舰"镜清"号和"寰泰"号（均为2200吨、2400匹马力），被编入南洋舰队。1891年刘坤一对南洋舰队的主力军舰评价说："此次来江，则有新增之寰泰、镜清、开济、保民、南瑞、南琛兵轮六号，内惟寰泰、镜清、开济三号工料坚致，驾驶甚灵，保民次之，南琛、南瑞又次之"②。"南琛"、"南瑞"都是1883年购自德国的巡洋舰，说明当时外国舰船并不都比国产的强。1889年制成的我国第一艘钢甲巡洋舰"龙威"号（后改名"平远"号），归入北洋海军调遣，"甲午之役与日人交战，屡受巨弹"③，仍能作战，经受了实战的考验。

福州船政局开办时，由闽海关结余拨解40万两银，以后由闽海关每月拨银5万两作为常年经费，1873年又由茶税项下每月增拨2万两，但实解数量远远不足，最少时每年尚不及30万两。甲午战后，船局经费更加困难，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1897年，复高薪聘请法人杜业尔为正监督，直至1902年，仅建成"建威"、"建安"两艘鱼雷快艇（均为850吨、6500匹马力、航速23节）和"建翼"号鱼雷艇。其后，船局财源枯竭，终于从1907年起停止制造船只。

（五）汉阳枪炮厂

前述几个大型军工企业，都集中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其后，各省督抚以解决地方特殊需要为由，纷纷自筹资金，创建省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3页。

②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第80页。

③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152页。

办军工企业。截止 1895 年，陕西、福建、甘肃、广东、山东、湖南、四川、吉林、浙江、云南、台湾、湖北等省，相继兴办了机器局或枪炮厂。由于受资金、技术和原材料的限制，其规模和生产能力都不很大，有的只能生产少量的火药、枪弹或修理损坏的武器。唯一开办长久，形成较大生产规模，并对近代军事工业产生较大影响的省办军工企业，则是汉阳枪炮厂（后改名湖北兵工厂）。它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一手创办的。

张之洞曾任两广总督，通过中法战争，亲身感受到购买外国武器存在种种弊端。战后，他即动员广东文武官绅及盐埠各商踊跃捐款，以便购器建厂，仿造新式枪炮。1889 年，他在筹建枪炮厂的专折中指出："水陆各军需用枪炮，概系购自外洋，不但耗蚀中国财用，漏卮难塞，且订购需时，运送遥远，办理诸多周折；设遇缓急，则洋埠禁售，敌船封口，更有无处可购、无路可运之虑。"为此，他坚决主张"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①。在此以前，张之洞已通过驻德公使洪钧向德国订购制造枪炮的机器，并得到海军衙门的核准。

正当枪炮厂加紧筹办之际，清廷调张之洞为湖广总督。经张竭力争取，清廷准其将购买的各类机器运往湖北。1892 年，汉阳枪炮厂建于汉阳大别山麓，占地 237 亩。按原与德国机器制造厂家商定，所购制枪炮机器每天可生产新式连珠十响毛瑟枪 50 支，每年可生产 75～120 毫米的克虏伯过山炮 50 门。若达到此设计能力，则常年经费约需银 75 万两，如生产一半，亦需银 40 余万两。经张之洞在湖北范围内多方筹措，最多只能得银 30 万两，致使枪炮厂建设进展缓慢，迟迟不能投产。另外，当时汉阳铁厂和枪炮厂同时兴建，最初几年，常将"枪炮厂之款移缓就急，匀拨铁厂应用"②，这也严重影响了汉阳枪炮厂的建设。更不幸的是，1894 年枪炮厂刚要开工生产时，因故失火，损失严重，不得不又用一

---

①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洋务运动》（四），第 383 页。

②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555 页。

年多的时间“改造铁料厂屋，修补伤损机器”①，耗费甚巨。直至1895年，枪炮厂才正式投产。

枪炮厂投产后，由于经费不足，每年仅能造枪3000～7000支（每枪配弹500发），造快炮60～100门（每炮配弹500发）。几年后，所产枪炮就已落后，张之洞不得不再次筹集款项，向国外订购新式机器，并扩建厂房，又在汉阳赫山麓兴建炼钢厂和无烟火药厂。1905年，汉阳枪炮厂已是拥有八九个分厂的联合企业，成为与江南制造总局并驾齐驱的大型军工企业之一。

汉阳枪炮厂生产的步枪，主要仿造德国7.9毫米口径的1888年式毛瑟枪，自1896年至1910年，共生产13.6万余杆。火炮生产以57毫米口径的陆路快炮为主，因受财力限制，平均每月只造8门。1906年，因统一全国枪炮口径问题争执不决，该厂火炮的生产曾一度停工，至1909年，共生产各类后膛钢炮988门。

汉阳枪炮厂是清末生产新式轻型武器的最大兵工厂，对改善清军的武器装备起了重要作用。其规模和影响不仅居于当时省办军工企业之首，而且就其产品的质和量而言，比起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也有后来居上之势。张之洞曾颇为自豪地说：“湖北制造厂所造快枪、快炮，为新式最精之械”②，“皆系南北洋、广东、山东、四川等省制造局所无者”③。

现将晚清兴办的军工厂局列表如下：

晚清兴办的军工厂局一览表

厂局名称	所在地	创办年代	创办人	主要产品
安庆内军械所	安　庆	1862	曾国藩	子弹、火药、炸炮
上海洋炮局	上　海	1862	李鸿章	子弹、火药
苏州洋炮局	苏　州	1863	李鸿章	子弹、火药
江南制造总局	上　海	1865	曾国藩 李鸿章	子弹、火药、枪炮、水雷、钢材、舰船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41页。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154页。

③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141页。

厂局名称	所在地	创办年代	创办人	主要产品
金陵制造局	南　京	1865	李鸿章	子弹、火药、枪炮
福州船政局	福　州	1866	左宗棠	舰船
天津机器局	天　津	1867	崇　厚	子弹、火药、枪炮、水雷、钢材
西安机器局	西　安	1869	左宗棠	子弹、火药
福州机器局	福　州	1870	英　桂	子弹、火药、枪炮
兰州机器局	兰　州	1872	左宗棠	子弹、火药
广州机器局	广　州	1874	瑞　麟	子弹、火药、小轮船
广州火药局	广　州	1875	刘坤一	火药
山东机器局	济　南	1875	丁宝桢	火药、子弹、枪炮
湖南机器局	长　沙	1875	王文韶	火药、枪、开花炮弹
四川机器局	成　都	1877	丁宝桢	子弹、火药、枪炮
吉林机器局	吉　林	1881	吴大澂	子弹、火药、枪
金陵火药局	南　京	1881	刘坤一	火药
浙江机器局	杭　州	1883	刘秉璋	子弹、火药、水雷
神机营机器局	北　京	1883	奕谭	枪炮
云南机器局	昆　明	1884	岑毓英	洋火药、子弹
杭州机器局	杭　州	1885	刘秉璋	火药、枪弹
广东枪弹厂	广　州	1885	张之洞	子弹、枪炮
台湾机器局	台　北	1885	刘铭传	子弹、火药
汉阳枪炮厂	汉　阳	1892	张之洞	子弹、火药、枪炮
陕西机器局	西　安	1894	鹿传霖	枪弹、机器修理
盛京机器局	沈　阳	1896	依克唐阿	子弹、火药
河南机器局	开　封	1897	刘树棠	子弹、火药、抬枪、小铜炮
山西机器局	太　原	1898	胡聘之	子弹、火药、枪
新疆机器局	乌鲁木齐	1898	饶应祺	枪弹
黑龙江机器局	龙　江	1899	恩　泽	枪弹
贵州机器局	贵　阳	1899	陈明远	子弹、火药
北洋机器局	德　州	1903	袁世凯	子弹、火药
江西机器局	南　昌	1903	夏　时	子弹、枪
安徽机器局	安　庆	1907	冯　煦	子弹、火药

四、洋务派对军工企业的经营管理

洋务派兴办军工企业，无疑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首先，它采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某些条件。其次，通过大量生产近代武器，逐步改变了中国军队武器落后的状况，一度缩短了与世界军事强国的差距。再次，近代军工企业的建立，不仅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还促进了旧式教育向新式学堂的演变，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翻译了大量西方军事科技著作，传播了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

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军工企业过程中，不仅能大胆地冲破传统的封建观念，坚持革新立场，引进西方技术，而且在管理上也能正视现实，承认落后，敢于聘用洋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江南制造总局等大型军工企业，在初创时期几乎全都聘用洋人参加经营管理，这在当时无疑是必要的。在聘用的外籍人员中，难免有一些平庸无能之辈，但就多数而言，都学有专长，并能尽职尽责，恪守合同，对发展中国近代军事工业起了重要作用。在雇请外国人督办军工企业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不仅积极主张学习西方“长技”，而且始终坚持“权自我操”的原则。他认为与洋人共事，必立合同。在船政局创立之初，左宗棠即与日意格等签订了“保约”和“合同”。“保约”规定，外国工匠要负责采购外国机器，保证在5年内教会中国工匠制造轮船，所设学堂要使每个学生达到能监造、驾驶的程度等等。“合同”条规多为对外国员匠提出具体要求，诸如外国员匠应安分守法，不得懒惰滋事，不准私自擅揽工作和越权干涉厂务，若有不受节制，不守规矩，办事不力，工作取巧草率，打骂中国官匠，

滋事不法者，可随时令其回国，所立合同一概无效等等。① 这就促使日意格等在任期内严于职守，认真执法。1868 年，船厂洋铁匠白尔思拔“骂詈匠头，不遵约束”，日意格便按合同办理，“撤令回国”。② 其后，船局总监工德国人达士博骄横懒惰，拒绝上“万年清”号试航，并煽动外国工匠罢工，也被日意格禀请开除回国。福州船政局最初雇用外国科技和管理人员共 52 人，合同期满时，除留 3 名教师和 1 名工程师外，全部按约解聘回国。5 年内如期造成轮船 15 艘，并帮助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技术人才和工匠。

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工企业，虽然多少有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但毕竟是清政府直接投资的官办企业，在经营和管理上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以致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和困难。

一是资金短缺。几个大型军工企业，除汉阳枪炮厂主要靠湖北省自筹资金外，其它都是由清政府拨款兴办的。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清政府财政更加空虚，各省饷源同一支绌，对兴办军事工业的资金缺乏保证。江南制造总局开办较早，常年经费约需银 40 万两，最初几年尚能如数拨给，以后一年不如一年，稍一更新产品，或想扩大生产规模，则帑项支绌，无所筹措。福州船政局的经济状况更逊于江南制造总局，规定的常年经费为每月 7 万两银，实际解银尚不到半数。截止 1879 年，闽海关共欠福州船政局经费 60 万两，而且“旧欠者杳无可指，新欠者日且递增”③。汉阳枪炮厂则处境更加困难，按设计能力减半生产，每年仍需银 40 余万两，全靠“鄂省财用自行筹画腾挪”④。因此，该厂的产量只能达到生产能力的 1/3 左右。

二是经营不善。由于企业采取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事无

① 参见《洋务运动》（五），第 44～46 页。

②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 181 页。

③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36 页。

④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550 页。

巨细，大至设厂定点、官员选派，小至工匠提升和奖罚等等，都要层层呈报。如此繁文缛节的公文传递，费时费力，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和经营管理。同时，洋务派大员们虽有改革的热情，却缺乏科学的头脑。他们在创办企业时，往往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常凭自己的一知半解，或听信洋员的一面之词，就主观决定问题。如李鸿章轻信马格里的计划，在金陵制造局生产国外早已过时的生铜炮，其中6门装备大沽炮台，试放时竟炸掉5门。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之初，盲目引进，甚至连木料、煤炭也要从缅甸等国采买，而洋匠“择材务精，稍不中绳墨即弃而弗收”①，造成很大浪费。再如张之洞筹建汉阳铁厂，主要是为枪炮厂提供原材料，以改变钢铁依赖进口的状况，可是向英国订购机炉之前，根本没有考虑冶炼钢铁的原料和燃料问题。承办机炉的英国梯赛特机器厂曾提出:“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竟答复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②这充分反映洋务派官僚创办企业的盲目性、随意性，也注定了洋务企业必然遭受挫折和失败。

三是机构臃肿。由于封建官僚掌握企业大权，徇私舞弊，培植亲信，排斥异己，贪污腐败等官场积弊自然会渗透到企业中来。如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左宗棠即安插许多湘军部下，一些地方士绅也因裙带关系相继入局。沈葆桢受命为船政大臣之日，“荐书盈箧，户为之穿”。后任的几届船政大臣更是“各路荐书难于拒绝，厂员皆系本地绅衿，尤觉碍于情面”，遂“滥收滥委”，来者不拒。③又如天津机器局的员工，开始多为北方人，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

① 《总理船政沈葆桢奏》，《洋务运动》（五），第153页。

② 《洋务运动》（八），第526页。

③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20页。

后，安插了大批南方人，全局几乎为李鸿章的亲信所把持。由于不少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和地方士绅混入军工企业，造成管理机构臃肿庞杂，人浮于事，企业不仅虚糜薪费，而且管理混乱，腐败丛生。

四是效益甚低。军工企业都属官办，生产过程中极少讲究经济效益，而只注重使用价值。各个企业的产品由朝廷无偿调拨，“并不索取原价分文”，完全与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原则背道而驰。由于不是从事商品生产，企业无法进行资金积累，不能靠自身力量更新设备，更新产品，扩大再生产。以福州船政局为例，最初几年尚能按合同组织生产，其后由于不计成本，不顾客观需求，“明知外洋轮船日新月异，而我拘守故常，以致所造轮船，均不合用”①。因此，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闽局竟被起步较晚的日本造船业抛到了后面。

第二节　近代武器的生产与影响

一、近代武器装备的生产

清政府建立的军工企业所生产的近代武器，几乎全部是仿制西方的。由于科技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制造武器的机器和主要原材料大都要依靠进口。直至清王朝灭亡前，这一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尽管如此，中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发挥了聪明才智，在仿制和自制近代武器装备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火药的制造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我国的火药生产，长期以来采用手工配方，难以保证质量。时至近代，由于大量使用欧洲枪炮，对火药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设立机

---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24页。

制火药局越来越迫切。各地兴建的军工厂局大多设有火药厂，生产机制黑色火药，其中规模较大、产量较高的有：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等。黑火药是由硝酸钾、硫和木炭按一定比例组成的粒状火药，通常有两种配方，即：硝、硫、炭的比例分别为 75％、10％、15％和 75％、12.5％、12.5％。

黑火药的能量较低，威力较小，且燃烧时有烟和固体残渣。随着后装线膛枪炮和长形钢弹的出现，黑色火药已无法满足要求。1882 年，德国人海德曼发明一种能降低膛压、加大弹丸初速、便于点火、出烟轻淡易散的新型火药。由于它的炭化程度低，还能见到栗色的木质纤维，故称栗色火药。其后不久，欧洲又研制成功两种性能更好的火药：一种是硝化棉无烟火药，一种是硝化甘油无烟火药。前者是由法国工程师维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 1884 年研制成功的；后者是由瑞典工程师诺贝尔经过多年研究改进后，于 1888 年创制的。

为了研制新式火药，中国近代火药专家们做出了积极贡献。栗色火药问世不久，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便从德国引进有关机器，于 1893 年仿制成功。对无烟火药的研制也比较早。1885 年，李鸿章便奏称："仿造棉花火药已有成效"①。他当即建议设厂制造，但拖至 1892 年，江南制造总局才从德国洽购制造硝化棉无烟火药的全套设备，于 1895 年仿制成功。该局至 1904 年总计生产无烟火药 40.6 万磅。汉阳枪炮厂也为研制无烟火药做出了贡献。1901 年，我国军事技术专家徐建寅即为此而殉职。

（二）枪的生产

清代最早建立的近代军工厂，首先仿制的是西洋前装枪，如英国的李恩飞式、法国的米涅式等，种类十分庞杂。由于这些枪的口径大，枪身重，射速慢，不久即停止生产而着手仿制后装枪。江南制造总局于 1871 年向国外购得生产林明敦后膛枪（口径 13 毫米）的全套设备，并开始仿制。至 1890 年，共生产林明敦步枪

---

①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四），第 270 页。

4 万杆、骑枪 700 余杆。① 但由于这种枪“多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未肯领用”，致使该局积压 1 万余杆（金陵制造局积压数千杆）②，乃于 1890 年停止生产。1883～1892 年间，江南制造总局还仿制过口径为 11 毫米的美国黎意式后装枪，共 1700 余杆。其它军工厂局也先后仿制过英国 1867 年式李恩飞、斯涅德及 1871 年式马梯尼一亨利、德国 1872 年式老毛瑟等单发后装枪。

19 世纪末，欧洲各国先后研制成功连发枪。其主要改进是：钢质更加坚韧，枪的口径缩小，刻线深，采用活动枪机及弹仓，子弹使用筒形弹壳和尖形弹头，减轻了枪重，增大了射程，提高了杀伤威力。连发枪最早是由美国人温彻斯特于 1867 年创制的，在 1877 年俄土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于是各国纷纷生产。我国最早研制连发枪的是江南制造总局。该厂于 1891 年以奥地利曼利夏连珠快枪为模式，研制成 5 连发快利新枪 6 支，翌年即进行批量生产。1893 年，汉阳枪炮厂又仿制成功 1888 年式德国连珠十响小口径毛瑟枪，称“汉阳式”毛瑟枪。该厂“出枪既快亦多，为当时军中最精利器”③。1906 年以后，其它军工厂局如广州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等，还仿制过 1898 年式毛瑟枪、1895 年式曼利夏枪等。

为了进一步提高射速，增大火力密度，欧美一些国家于 19 世纪后期研制成功机关枪。最早出现的机关枪为多管式，系美国加特林少校在 1862 年创造的。它用 6 支口径为 14.7 毫米的枪管安装在同一枪架上，转动曲柄，6 支枪管依次发射。该种枪在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 年）中起了很大作用，以后逐渐为各国所采用。1884 年，金陵制造局仿制加特林机枪成功，当时称“格林炮”。其口径为 11 毫米，膛线 12 条，枪管 6～10 支，发射速度为 350 发/分，射程 2000 米。

① 据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七“历年仿造各枪表”统计。

② 《洋务运动》（四），第 133 页。

③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 135 页。

枪械发展史上突出的飞跃，是英籍美国人马克沁于19世纪80年代发明能够自动装填和自动连发的马克沁机关枪。它是第一种成功地以部分火药燃气为动力的自动火器，理论射速可达600发/分。不久以后，又相继出现了利用类似原理制成的其它自动化枪械，如法国的哈齐开斯机枪、丹麦的麦德森机枪、美国的勃朗宁机枪等等。实战证明，机关枪对于集团有生目标有很大的杀伤作用，至今仍是步兵分队有力的武器。晚清官吏也曾认识到此种武器的重要作用，虽然不少人认为耗弹太多，价值昂贵，但还是在国内进行了仿制。直至清末，金陵制造局、广州机器局等军工企业先后制造了一定数量的马克沁重机枪和麦德森轻机枪。

（三）火炮的生产

清代仿制西洋火炮是从前装炮开始的，在技术上已采用了欧洲先进的整体铸炮，再用镟床挖成炮筒的方法，使炮管内壁更加光滑。1878年起，江南制造总局先后仿制发射40～250磅炮弹的各种钢膛熟铁箍英国阿姆斯特朗式前装炮。此种炮使用了先进的装箍方法，增强了炮管的强度；其各部机件有严格的比例，设计更加科学；炮管内刻有膛线，配以长弹，提高了命中率和杀伤力。

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后装炮。与前装炮相比，后装炮具有许多优点：从尾部装弹，进一步提高了射速；有完善的闭锁机（炮闩），解决了漏气问题，增大了射程；采用附有弹带的长形炮弹，发射时弹带嵌入膛线，提高了命中率。早期后装火炮属于架退炮，使用的是炮架结构，发射时炮架连同炮管一同后坐，操作不便，射速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以后逐渐被管退炮所替代。管退炮发射时炮架不后坐，仅炮管后坐至一定距离，然后利用驻退复进机自动将炮管恢复到原来待发的位置。1897年，法国制成使用水压气体式驻退复进机的管退75毫米野炮，每分钟可发射20～28发炮弹，射程达6～8公里。由于管退炮性能良好，各国竞相仿制，并不断加以改进。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后装炮陆续输入我国，主要有英国阿姆斯特朗式、德国克虏伯式和格鲁森式几种。1884年，金陵机

器局率先仿制成德国格鲁森式后膛小炮，口径为37毫米，发射2磅重的炮弹。1890年，江南制造总局仿制成功发射800磅炮子的阿姆斯特朗式后膛钢大炮,两年后又仿制成功发射40磅炮子的后膛钢快炮。关于这两种炮的有关情况，薛福成在1893年的日记中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载："江南制造局……试放之炮计两种，一为八百磅弹子之后膛大炮，一为四十磅弹子之快炮。大炮，则长式者重五十二吨，口径十二寸，长三十六尺；短式者重四十八吨，口径十二寸，长三十尺。每试一次，食六角一孔栗色火药三百磅，弹出口时每一秒行二千尺，如于相去一千码远近，可击穿十九寸厚之铁甲，弹力所到，可击三十余里。若近海炮台置一二尊，无论何等铁舰，皆将望而气沮。快炮重二吨有奇，长十六尺二寸，口径四寸七分，食黑色火药十二磅，食无烟火药仅五磅半。……弹力能击十八里之远。此项快炮最利于兵船……一二分时内能放二十余出，每兵船安置三四尊，则雷艇万不能近逼矣"①。1896年以后，汉阳枪炮厂亦陆续生产德国格鲁森式后装炮，其中有口径为37、53、57毫米的山炮，口径为75～120毫米的野炮。1905年，江南制造总局仿制成功第一门管退山炮，口径75毫米，弹重5.3公斤，初速280米/秒，射速10～20发/分，有效射程4000米。这门火炮除复进弹簧购自美国外，其它部件全部是江南制造总局自制的，这说明该局已掌握了从炼钢到制造管退炮的技术。不久，其它较大的军工厂局亦相继具备了仿制管退炮的能力，但生产数量极少。

（四）舰船的制造

我国近代造船工业肇始于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成立之后，并经历了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在推进方式上，由明轮发展到暗轮（螺轮）；在船体材料上，由木壳、铁肋木壳发展到全部使用钢铁；动力由单机发展到三机联装；马力从几百匹提高到6000余匹；排水量从600吨提高到2800吨；航速从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02～303页。

8 节提高到 23 节；火力也逐步完善配套。总的看来，其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868 年秋，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木质明轮兵舰“恬吉”号（后改为“惠吉”号）下水，并试航成功。该舰长 185 尺，宽27.2 尺，马力 392 匹，排水量 600 吨，航速 9.5 节，配炮 9 门。这是我国自造的第一艘能用于实战的蒸汽动力兵舰。由于明轮在战争中易遭破坏，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同时进行暗轮兵舰的研制工作。1869 年，两局分别制成“操江”号、“测海”号和“万年清”号兵舰。尽管这些舰船在马力、航速等方面没有明显的提高，但从明轮改成暗轮，在我国造船史上是一大进步。它只比欧洲使用螺旋桨的暗轮舰晚 20 年左右。在制造木质螺轮舰方面，反映当时水平的代表作是 1872 年福州船政局下水的“扬武”号和 1873 年以后江南制造总局先后下水的“海安”号和“驭远”号。“扬武”号长 190 尺，宽 36 尺，马力 1130 匹，排水量 1560 吨，航速 12 节，配炮 11 门。“海安”和“驭远”号长 300 尺，宽 42 尺，马力 1800 匹，排水量 2800 吨，航速 12 节，配炮 18～20 门，有 3 桅 4 层，可载士兵 500 人。这些兵舰的大多数设备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在马力、航速和军舰的战斗性能方面，较前有了长足进步。如与当时的日本造船业相比，我国的造船技术还是走在前面的。试列表如下：

年代	国别	造船厂	舰名	舰长（尺）	舰宽（尺）	马力（匹）	排水量（吨）	配炮（门）
1873	中国	江南厂	海安	300	42	1800	2800	20
1884	日本	横须贺	海门	193	27.5	1300	1429	8
1885	日本	横须贺	天龙	201	27.5	1162	1547	7

1876 年以后，江南制造总局由于经费困难，造舰任务主要由福州船政局承担。这时的福州船政局已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和工匠，步入了独立造船时期。1876 年 7 月，中国第一艘铁胁木壳舰“威远”号开建，次年 5 月即建成下水。该舰长 217.1 尺，宽31.1

尺，马力 750 匹，排水量 1268 吨，航速 12 节，配炮 7 门。该舰采用英国 1870 年最新卧式蒸汽机，舰体强度较木质舰跃进了一大步。

19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仿造巡海快船（即外国早期的巡洋舰）。70 年代末，福州船政局即向法国地中海船厂购买制造巡海快船的图纸及设备，因经费无措，迟至 1881 年 11 月，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才动工建造，1883 年 1 月下水。该舰长 265.8 尺，宽 36 尺，马力 2400 匹，排水量 2200 吨，航速 15 节，配炮 13 门，较第一艘铁胁木壳舰“威远”号在吨位、马力、航速等方面又有了提高。而且，该舰采用双层夹板，不虞渗漏，每门火炮都可旋转射击，舰头装有碰船尖锋，可用以冲击敌舰，故战斗性能有了很大增强。接着，福州船政局又建成同型快速巡洋舰“镜清”号和“寰泰”号，大大提高了造舰水平。1886 年春，福州船政局派员出国购买制造钢甲舰的材料，年底动工建造。经 3 年奋战，我国第一艘钢甲巡洋舰“龙威”号下水。该舰长 195.2 尺，宽39.5尺，马力 2400 匹，排水量 2100 吨，航速 14 节，配炮 17 门（其中有口径 260 毫米克虏伯重型后装舰炮 1 门、口径 150 毫米克虏伯中型后装舰炮 2 门及速射炮等），另有鱼雷发射管 4 具。钢甲舰的建成，标志着晚清造船技术达到了相当水平。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原因，我国造船工业在此以后不仅没有新的突破，而且逐渐走下坡路。相反，新兴的日本造船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了迅速发展，至 90 年代末，已造成马力 8400 匹、载重 3100 吨、航速 19 节的重型巡洋舰，把一度领先的中国造船业抛到了后面。

尽管清朝末年造船工业不太景气，但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仍是不可忽视的。从木质明轮舰“恬吉”号下水，到“龙威”号钢甲舰建成，仅用了 22 年时间，发展速度相当可观。它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和军事指挥人才，也为我国近代海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将晚清江南、福州厂局所造舰船列表如下：

晚清江南、福州厂局所造舰船一览表

序号	年代	舰名	舰种	舰质	长(尺)	宽(尺)	马力(匹)	排水量(吨)	航速(节)	备炮(门)	承造厂局
1	1868	惠吉(恬吉)	炮舰	木	185	27.2	392	600	9.5	9	江南
2	1869	万年清	运输	木	238	27.8	580	1370	10	6	福州
3	1869	操江	炮舰	木	180	27.8	425	640	9	8	江南
4	1869	测海	炮舰	木	175	28	431	600	9	8	江南
5	1870	威靖	炮舰	木	205	30.6	605	1000	10	14	江南
6	1869	湄云	炮舰	木	162	23.4	320	550	9	6	福州
7	1870	福星	炮舰	木	162	23.4	320	550	9	4	福州
8	1870	伏波	运输兼通报舰	木	218	35	580	1258	10	7	福州
9	1871	安澜	炮舰	木	200	30	580	1266	10	5	福州
10	1871	镇海	炮舰	木	166	26	350	572	9	6	福州
11	1872	扬武	炮舰	木	190	36	1130	1560	12	11	福州
12	1872	飞云	炮舰	木	208	32	580	1258	10	7	福州
13	1872	靖远	炮舰	木	166	26	350	572	9	6	福州
14	1873	振威	炮舰	木	166	26	350	572	9	6	福州
15	1873	永保	运输船	木	208	32	580	1353	10	3	福州
16	1873	海镜	运输船	木	208	32	580	1358	10	3	福州
17	1873	济安	炮舰	木	208	32	580	1258	10	7	福州
18	1873	海安	炮舰	木	300	42	1800	2800	12	20	江南
19	1874	琛航	运输船	木	208	32	580	1358	10	3	福州
20	1874	大雅	运输船	木	208	32	580	1358	10	3	福州
21	1875	元凯	通报舰	木	208	32	680	1258	10	9	福州
22	1875	驭远	炮舰	木	300	42	1800	2800	12	18	江南
23	1876	金瓯	炮舰	铁甲	105	20	200	195	不详	5	江南
24	1876	艺新	炮舰	木	119	17	200	245	9	5	福州
25	1876	登瀛洲	炮舰	木	204.4	33.5	580	1258	10	7	福州
26	1877	泰安	炮舰	木	204.4	33.5	580	1258	10	7	福州
27	1877	威远	炮舰	铁胁木壳	217.1	31.1	750	1268	12	7	福州
28	1878	超武	通报舰	铁胁木壳	217.1	31.1	750	1268	12	7	福州
29	1879	康济	炮舰	铁胁木壳	217.1	31.1	750	1300	12	15	福州

序号	年代	舰名	舰种	舰质	长（尺）	宽（尺）	马力（匹）	排水量（吨）	航速（节）	备炮（门）	承造厂局
30	1880	澄庆	炮舰	铁胁木壳	217.1	31.1	750	1268	12	6	福州
31	1883	开济	巡洋舰	铁胁木壳	265.8	36	2400	2200	15	13	福州
32	1884	横海	巡洋舰	铁胁木壳	217.4	31.1	750	1230	12	10	福州
33	1884	镜清	巡洋舰	铁胁木壳	266	36	2400	2200	15	7	福州
34	1885	保民	巡洋舰	钢板	225.3	36	1900	1477	10	12	江南
35	1887	寰泰	巡洋舰	铁胁木壳	265.8	36	2400	2200	15	7	福州
36	1887	广甲	巡洋舰	铁胁木壳	220	33.7	1600	2300	14	3	福州
37	1889	平远（龙威）	巡洋舰	钢甲	195.2	39.5	2400	2100	14	17	福州
38	1889	广庚	炮舰	钢胁木壳	144.8	19.2	440	316	14	3	福州
39	1890	广乙	炮舰	钢胁钢壳	229.3	26.4	2400	1030	14	9	福州
40	1891	广丙	炮舰	钢胁钢壳	229.3	26.4	2400	1030	13	11	福州
41	1893	福靖	炮舰	钢胁钢壳	229.3	26.4	2400	1030	13	11	福州
42	1894	通济	练习舰	钢胁钢壳	252.7	24.1	1600	1900	13	7	福州
43	1897	福安	运输船	钢胁钢壳	238	32.2	750	1700	12		福州
44	1898	吉云	拖船	钢胁钢壳	110.4	18.5	300	135	11	2	福州
45	1898	建威	快雷艇	钢胁钢壳	258	26.5	6500	850	23	10	福州
46	1900	建安	快雷艇	钢胁钢壳	258	26.5	6500	850	23	10	福州
47	1900	建翼	雷艇	钢胁钢壳	86	10	550	50	21	3	福州
48	1908	甘泉	炮舰	钢胁铁骨	119	20	300	305	10	3	江南
49	1908	安丰	炮舰	钢甲	120	18	350	145	12		江南
50	1910	联鲸	炮舰	钢甲	173	24	800	500	13		江南
51	1911	澄海	炮舰	钢甲	100	17	850	150	11.5		江南

说明：上表中有少数舰船后改作其它舰种使用，有的经修理、改装，某些技术性能和装备有变。

二、国产军械对清军装备的影响

晚清近代军工企业兴办之时，正处于中国军事大变革时期。在洋务派的积极推动下，朝野上下掀起了整修炮台、编练新式陆军、

筹建海军等军事改革的热潮。应该说，当时军工企业生产的军械，对增强清军的战斗力，加速军事大变革，起了重要作用。

向以陆军为主的中国军队，在同治、光绪年间，额兵及各省所募练勇合计不下百余万人①。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从使用冷兵器为主到使用火器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其中军工企业是出了大力的。这些企业从建成投产那天起，其产品就一直供不应求。天津机器局的产品以供应淮军和直隶练军为主，兼及北方其它各省；江南制造总局的产品主要供应江苏全省及沿江、沿海炮台，一部拨归北洋大臣支配；汉阳枪炮厂的产品供应范围最大，遍及全国各省各军。据不完全统计，江南制造总局和汉阳枪炮厂从建厂至1910年，共生产新式后膛枪约20余万杆，各式后膛钢炮1700余门，占整个清军需求量的20%。若加上各省兴办的军工厂局产品，则可满足清军需求的一半左右（其它仍需购自外国）。但其中火药的生产，足敷当时清军使用。

国产军械在清朝末年保卫国防、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兰州机器局生产的枪炮“制作灵妙”，“较洋炮有准而更可致远”，前往参观的外国人“赞好不绝”。在收复新疆的作战中，清军“深得其力”。② 国产舰船在反侵略战争中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在中法马江海战中，福州船政局制造的“扬武”号巡洋舰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用尾炮准确地还击法军旗舰“窝尔达”号，首发命中舰桥，毙敌多人。“振威”号炮艇在中弹起火的情况下，仍以最后一发炮弹重伤敌舰舰长和两名士兵。在镇海之战中，南洋舰队的“开济”等舰在岸炮配合下，重创法军孤拔舰队。上述情况说明，国产舰船并非全是弱不经战的陶犬瓦鸡，只要扬长避短，指挥得当，是可以发挥一定威力的。又如中日甲午海战中，“平远”号巡洋舰在距敌舰“松岛”号3200米的距离上，一炮击中敌舰中央水雷室，毙敌水雷射手多人。该舰后

---

① 参见《洋务运动》（三），第435页。

②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45～447页。

于威海被日军俘虏，在1904年日俄海战中又“颇著战绩”。时人认为，“平远”舰较之外购之“超勇”、“扬威”、“济远”似有过之，即较之“镇远”、“定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舰，亦无不及。①

然而，清末的军事工业毕竟是步人后尘，与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落后很多。尽管有些军械、舰船达到了一定水平，但不能不看到其中的差距。中法马江海战中，清军所以战败，除清廷妥协求和及指挥官缺乏敌情观念外，武器装备落后，舰只多系铁胁木壳结构，战斗力不强，抵御不了敌舰的猛烈炮火轰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供应舰队使用的弹药，实心弹多，爆炸弹少；弹药质量低劣，许多榴弹导火索不导火，有的炮弹铜箍不合规格，临战时须用锉刀锉小，才能装填，大大影响了发射速度。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深受其害。此外，由于各地军工厂局彼此互不联系，清廷又缺乏统一指导，致使各厂局购进的机器五花八门，所生产的武器名目繁多，型号不一，给清军的战斗使用以及后勤供应造成极大的混乱。

上述种种弊端，严重影响了晚清军工企业的实际效能，削弱了洋务派为“防海”、“御侮”而兴办军工企业的主旨。在反侵略战争中，国产军械不得不屈居于从属地位，如北洋舰队中国产军舰大都充作运输、通讯等辅助船只使用，只有少数充作战斗舰只。这说明国产军械对清军装备的影响是有限的。然而，近代军工企业的建立，毕竟对发展我国近代工业，促进军事改革起了积极作用，其历史意义是不容抹煞的。

第三节　中国近代航运、铁路和电报的建设

中国在自强活动中兴建了大批军工企业，由于缺乏雄厚的经

① 参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152页。

济实力作基础，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随着对向西方学习的认识逐步深化，洋务派又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从70年代起，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又先后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为军工企业和建立新式陆海军提供资金和原料。其中，近代航运、铁路和通讯的建设，是与军事直接相关的门类。研究清后期军事史，不能不涉及中国近代航运、铁路、电报的发展脉络及其对军事的影响。

一、近代航运事业的兴起

（一）近代航运业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帆船航运业（包括远洋航运）早在明代就很发达。到了清代，尽管有过两次短暂海禁（1655～1684年和1717～1727年），海外航运业仍有较大发展。但是，总的看来，中国航海技术和航运能力已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迨至近代，随着清王朝的衰败，特别是西方殖民者的东侵，中国的航运业遭到严重摧残，不仅远洋航运业逐渐衰落和萧条，连19世纪上半叶以前一直持续发展的沿海和内河航运业，也不断遭到排挤、破产和受制于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国家对华贸易由广州一口扩展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它们的轮船随之侵入中国东南沿海水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外国侵略者又从中国夺得在北方沿海及长江通商与航行的特权。不久，一批挤入上海的外国洋行，纷纷在长江行驶轮船。于是，中国的江海主要航道，完全成了外国轮船自由驰驱之所，中国旧式的木船运输业首当其冲地受到严重打击。“千百只木船闲置，大批船民因此而流离失所。而木船业的凋零衰败，又连带影响到某些相沿已久的传统商品贸易，甚至构成对京师漕粮运输的威胁。”①

① 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这种严峻局面，不能不引起包括清朝封建统治者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忧虑。舆论极力要求收回权利，建立和发展自己的轮船航运事业。不少封疆大吏还从军事需要方面强调发展轮船事业的极端重要性。1866年夏，左宗棠指出：英法"之所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此微臣所为鳃鳃过计，拟习造轮船兼习驾驶，怀之三年，乃有此请也。"① 李鸿章也早怀此意。他称赞丁日昌关于设厂制造轮船和"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调遣"的主张"识议闳远"。并且指出："各国洋人，不但臻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②上述主张，反映了洋务派在兴办军火工业的同时，对于发展与军事密切相关的民用轮船运输业是很关注的。日益迫切的漕运困难，也促使清政府逐步推行购造轮船、发展中国近代航运事业的政策。

1867年秋，清政府颁布了由总税务司赫德起草、李鸿章经手修订的《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其中规定："凡有华商夹板等船请领牌照者，准赴外国贸易，并准在中国通商各口来往。"但又规定："不得私赴沿海别口，亦不得任意进泊内地湖河各口"。"凡船所装货物，均照洋商税则纳税"。③ 这表明当时清政府对华商购买轮船、发展我国近代航运业仍未采取真正扶植和保护的政策，反而作了种种限制。不过，闸门既已开启，兴办近代轮运，便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了。

（二）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与发展

在推动华商购造轮船的同时，洋务派还开始了官办轮船业的酝酿。曾国藩早在1867年就提出了"轮船招商"的主张，总理衙

---

① 左宗棠：《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洋务运动》（一），第18～19页。

②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3～5页。

③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879页。

门“亦经与议”，惟当时所议，“系由官办，或就官厂轮船承领”。①日久因循，迄未有成。1870 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清廷决定裁撤原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洋务归总督经管，并令其着手整顿海防。李鸿章深知：“各国通商以来，火轮夹板日益增多，行驶又极迅速，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且海防非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② 同时，“必须商船日盛，方冀饷源渐旺，可为筹备兵船之计”③。这表明洋务派已认识到仅仅“师夷之长技”制造枪炮，不能达到富强的目的，还必须像英法等国那样兴办民用企业，通过“求富”以求“自强”。吸收商人资本，创办轮船招商局，正是洋务活动由专办军用工业向兼办民用工业转变的第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重要企业。李鸿章曾明确指出：“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微臣创办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④ 除了应付漕运、加强海防、开源裕饷以外，发展本国轮船事业，“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⑤，也是洋务派创办轮船招商局的重要动机之一。

李鸿章对筹办轮船招商局非常积极。1872 年曾国藩死后不久，他就商令浙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等酌拟章程。朱其昂承办海运已十余年之久，“于商情极为熟悉，人亦明干”⑥。受命筹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后，立即拟定雩船招商章程 20 条，“其大意在于官商合办，以广招徕”⑦。章程设想：以所领闽沪两局船只为“官股”，其余由殷商认购，每股 100 两。后因官厂无商船可领，“且待造成再行招商，亦断不能以一二船取信于众，而争先承租”，

①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 927 页。

②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六），第 8 页。

③ 《洋务运动》（六），第 82 页。

④ 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9，第 33 页。

⑤⑥ 《李鸿章折》，《洋务运动》（六），第 6 页。

⑦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 919 页。

朱其昂等建议先行试办招商，"先招华商将素所附搭洋行之船只资本，渐渐拆归官局"，"一则为领用官船张本，一则为搭运漕粮起见"。[①] 李鸿章表示同意，当即饬派朱其昂回沪设局招商，并且指出："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②] 1873 年 1 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

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历程是相当艰难的。招商局诞生伊始，旗昌、太古两洋行立即联合把运费降低一半，甚至减少 2/3。接着，其它外国轮船公司也在各航线对招商局"并力相敌"，企图把招商局挤垮。国内一些守旧势力也曾对招商局大肆攻击，多方挑剔，有的主张把招商局改为官办。为了维持招商局的生存，李鸿章多方采取措施：一是筹拨官款接济；二是增拨漕运及承运官物；三是延期归还官款。通过这些办法，使招商局渡过了难关，初步站住了脚跟。1877 年，以旧式木质轮船为主的旗昌轮船公司已无法招架，面值 100 元的股票跌至 60 元左右，急于出让。清政府为了减少一个竞争对手，扩充招商局实力，便以 220 万两银的高价购买了旗昌洋行所有的轮船、码头、栈房，使招商局轮船由 12 艘增至 31 艘，净吨数达 2 万余吨，约与当年在华航行的全部外资轮船相近。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招商局日渐扩大，股本由 100 万两增至 200 万两，航运业务亦有所发展。1877 年至 1883 年，招商局共新购轮船 16 艘，约 1.6 万吨。同期损失亦有 22 艘，两者相抵，总吨位基本上不增不减。中法战争期间，招商局一度卖给旗昌洋行，1885 年又收回自办。自此以后，轮船招商局不断受到外债高利贷的盘剥，面临激烈竞争，一再让利妥协，与外轮公司订立"齐价合同"，共同垄断中国航运，本身无力再求发展。尽管如此，轮船

---

①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 919 页。

② 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第 40 页。

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确实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也收回了被外国航运侵略势力掠夺的部分权利。1876 年，太常寺卿陈兰彬奏称：“招商局未开以前，洋商轮船转运于中国各口，每年约银七百八十七万七千余两。该局既开之后，洋船少装货客，三年共约银四百九十二万三千余两。因与该局争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八百十三万六千余两。是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①。1887 年李鸿章奏称：“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手者，奚止数千万，此实收回利权之大端”②。此外，招商局为反侵略战争也作出了一定贡献，如：1874 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招商局“承载铭军赴台湾，转运粮饷，源源接济，均能妥速无误”③；清军收复新疆后，沙俄仍拒绝退还伊犁，并派军舰至我国沿海进行恫吓，招商局奉命装运湘淮军前往山海关一带进行防范；1882 年，日本在朝鲜制造事端，招商局奉命派船自山东登州运兵东渡援朝；1894 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招商局多次派船运兵赴朝和我国东北。总之，正如时人指出的那样：“轮船招商局集股开办以来，装运漕粮、军火、防军，莫不迅速蒇事，历有成效。”④ 尽管招商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做到把全部外国航运势力逐出中国水域，但它取得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

二、铁路的修建

1863 年 7 月，上海 27 家洋行（大半为英商）联名致函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许其兴造上海至苏州间铁路，并拟成立苏沪铁路

① 《洋务运动》（六），第 9～10 页。

② 李鸿章：《轮船修费请免追缴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9，第 39 页。

③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六），第 8 页。

④ 《余思诒片》，《洋务运动》（六），第 74 页。

公司。①李鸿章当时对铁路的重要作用缺乏认识，更害怕外国势力借此深入内地，难于控制，故对洋行的请求坚决予以拒绝。次年，上海怡和洋行主动雇请斯蒂文生（英国工程师）来华，向清政府提出一个在全国修筑铁路的综合计划。其后，总税务司赫德和英使馆参赞威妥玛也相继上书清政府，建议推行铁路、电报等“新法”。清政府对此先是置之不理，后经不住洋人的频繁催请，只好于1866年4月谕内外大臣筹议奏复。清朝重臣对兴办铁路一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结果“朝野上下，强半有异议。其中有畏事者，有为身家计者，有谓虽造亦属无用者，有谓危险堪虞者，有谓无利可图者”②。就连积极倡导洋务、主张学习西方技术的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也无不陈词力阻。于是，清政府以“妨碍风水”为由，拒绝了俄、英、法、美等国在中国筑铁路的请求。

外国资本家之所以急于在中国筑路，决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生产力和求富图强，而是为了输出资本，开拓商品市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清朝统治者并没有从这一根本问题上揭露列强的阴谋，也没有看到这一先进的交通手段既可以被侵略者用作掠夺中国财富的工具，也可以用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因此，没有采取积极的对策，一面引进资金修建铁路，一面保持对铁路的主权，使其为我所用。

外国侵略者在所提要求屡遭拒绝后，便自行筑路，想以既成事实，迫使清政府就范。早在1865年，英商杜兰德即在北京宣武门外试设一条一里多长的小铁路，旋被步军统领下令拆毁。1876年，上海怡和洋行在上海吴淞至江湾镇间偷偷修筑了一条窄轨短程铁路，同年6月通车试行。上海道得知消息后极力反对，沿途百姓也纷纷拦车破坏。于是，清政府以“民众反对，恐启事端”为由，几经交涉，最后以28.5万两银的代价收买后拆毁。

---

① 参见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1963年版（下同），第1册，第3～4页。

②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第16页。

吴淞铁路虽被拆毁，但毕竟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后，修建铁路的讨论日趋热烈。最早觉醒并积极倡导在国内修路的清政府大员，是洋务派骨干李鸿章。早在1874年12月，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就从军事角度提出了修路的好处。他说：“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灵通。惟地段过长，事体繁重，一人精力断难兼顾。……何况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① 与此同时，李鸿章在进见恭亲王奕䜣时，“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②。奕䜣虽赞同李鸿章的见解，但也惧怕舆论反对和“两宫”驳斥，不敢出面主持此事，李鸿章只好不再谈及。

1877年1月，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长折，报告孤岛台湾的设防状况，陈述了防守台湾的十大困难，同时列举了在台湾修筑铁路和兴办矿务的十大好处，并驳斥了时人对修铁路的种种顾虑。他尖锐指出：“目下台湾疫重兵疲，民穷变亟，防广则营皆散扎，勇不练而岂能精；口多则敌易纷乘，险无定而何能扼？饷将竭而备仍虚，寇已深而谋未定。日本及小吕宋皆逼近台疆，蓄锐养精，机深意险。若不未雨绸缪，速将轮路（即铁路）、电线、练兵、购器、开矿各事分投速办，诚恐该二岛猝然有变，非仅止于虚声恫喝而已”③。丁日昌再开筑路倡议，李鸿章等立即赞同。奕䜣也乘机进言说：“轮路一事，虽系创举，惟台湾海岛孤悬，迥非内地可比……是举办轮路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尤属目前当务之急”④。经洋务派大臣内外交章，两宫终于谕准总理衙门所请，并饬丁日昌一手

---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22页。

② 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3页。

③ 《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洋务运动》（二），第353页。

④ 《总理衙门奕䜣等奏》，《洋务运动》（二），第358页。

经办，同时准拨洋税100万两归丁日昌支配。但是，丁日昌经反复斟酌筹划，又认为修铁路与买兵舰相较，还是应以先买兵舰为上。6月，丁日昌上奏清廷，提议移办铁路经费于购买兵舰，并用少量款项在台湾修一马车路，以利运兵。清廷批准丁日昌所奏，于是筹办台湾铁路之事就此搁置下来。此事虽然未果，但通过洋务派大臣们的反复进言，使清廷最高统治者认识到了铁路并非洪水猛兽，而是有利于国防与生产的先进交通工具，开始允准于台湾修造，为尔后内地铁路的建造开了先端。

1876年，开平矿务局成立，主持人唐廷枢认为，要想把煤炭源源外运，必须修建铁路。此议立即得到李鸿章的赞同，遂由矿务局出资，自唐山至胥各庄建一运煤铁路。几经周折，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在1881年建成我国历史上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唐胥路"，全长18里。由于唐胥路靠近陵寝地区，朝廷禁止使用机车，只好用驴马拖拉。直至1882年，才使用一自制机车牵引，但马上又以"震动东陵"而勒令停驶，后经唐廷枢极力斡旋，始被谕准照常行驶。

就在唐胥路修建的同时，洋务派和顽固派又围绕着修筑铁路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880年12月，原直隶提督刘铭传上疏清廷，请于内地建造铁路。他首先分析了列强欺凌，日、俄环伺的形势，指出"不出十年，祸将不测"，认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① 刘铭传还建议首先修筑由苏北清江浦经山东至北京和自汉口经河南达北京两条干线。清廷按照惯例，将刘铭传的奏疏转发大臣们讨论奏复。内阁学士张家骧首先上疏反对，他认为内地造铁路有洋人借端生事、贻害民间、筹款维艰三大弊端，建议朝廷"置之不议"。李鸿章则从用兵、收厘金、拱卫京师、赈务、漕运、通讯、交通等方面论证了修筑铁路的好处。谈到对军事的作用时，李鸿章指出："从来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

---

①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第86页。

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如无铁路，则虽增兵增饷，实属防不胜防”。① 他同时建议由刘铭传督办铁路公司，商借洋债，与外国合资经营。对此，顽固派又群起反对，以致清朝最高统治者诏罢刘铭传奏折，不复再议。

中法战争期间，“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②。1887 年 3 月，海军衙门王大臣奕譞等奏称：“铁路之议，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自经前岁战事，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调兵运械，贵在便捷，自当择要而图”③。奕譞曾反对修造铁路，他的思想转变，对晚清铁路的修建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固有保守观念的影响，同时慑于朝廷顽固势力的反对，奕譞等还不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修筑铁路，仅从拱卫京师着眼，根据军事上的需要，有限度地修筑。经权衡利弊，奕譞等决定先建津沽铁路。他认为“近畿海岸，自大沽、北塘以北五百余里之间，防营太少，究嫌空虚。如有铁路相通，遇警则朝发夕至，屯一路之兵，能抵数路之用，而养兵之费，亦因之节省”④。清廷同意了奕譞的计划，谕令海军衙门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妥为办理。

奕譞、李鸿章决定由开平铁路公司一手经办津沽铁路，所需款项 100 万两以招股集资方法解决。但社会反应非常冷淡，经开平铁路公司百般动员利诱，最后只筹集商股 10.85 万两。李鸿章见筹措无着，只得举借外债，向英国怡和洋行和德国华泰银行共借款百余万两。1887 年底，津沽铁路正式开工兴建，至翌年 11 月

① 李鸿章：《妥议铁路事宜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9，第 21 页。

②③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 16 册，总第 4429 页。

④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 1 册，第 131 页。

竣工，全长 90 公里。

李鸿章见津沽铁路建成，大为振奋，于是又致函奕譞，建议“就势接做”天津至通州一段铁路。奕譞转奏朝廷，竟获谕准，但又遭到贵族廷臣群起反对，御史余联沅等先后上书，谓修建津通铁路有百害而无一利。李鸿章、奕譞等据理力争。他们说：“臣等创兴铁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有铁路则运兵神速，畛域无分，粮饷煤械，不虞缺乏，主灵而客钝，守易而攻难。首善腹地，有三五支精练大军，直与沿海逐处皆屯重兵者无异”。进而强调修造铁路系“御侮之长策，亦持久之良图”。① 正当李鸿章等与廷臣顽固派争执不下时，两广总督张之洞乘机另辟蹊径，主张放弃津通铁路，改建芦汉铁路（芦沟桥至汉口）。他认为建芦汉铁路，一可开通腹地物产，二可以内地之兵应援四方，即便“近畿有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檄一传，不崇朝而云集都下”。②清政府予以批准，并调张之洞为湖广总督，主持修路工程。于是，津通铁路被搁置一旁，其争论也随之偃旗息鼓。

但是，修芦汉铁路事也未能付诸实行，原因是沙俄此时正在加紧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意在侵略中国东北。1890 年初，总理衙门提出加强东北防务措施，其中以“整顿武备、兴办铁路为先”③。清廷认为“整顿练兵、兴办铁路两条，均合机宜”④，令移芦汉铁路款先建关东铁路，派李鸿章一手督办。

1891 年，李鸿章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官铁路局”，着手筹建关东铁路。“拟由林西造干路，出山海关至沈阳达吉林，另由沈阳造

---

① 李鸿章：《海军衙门军机处会奏底》，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 3，第 26 页。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 16 册，总第 4432 页。

③《清实录·德宗实录》，中华书局 1987 年版（下同），（四），第 764 页。

④《清实录·德宗实录》（四），第 757 页。

枝路以至牛庄、营口，计二千三百二十三里，年拨银二百万两为关东造路专款”①。1892年开始修建，到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时，已铺轨至关外中后所（今绥中），旋因战争停工。

与此同时，台湾铁路也在加紧修建。该路修建计划，早在1877年由丁日昌提出，后因购买铁甲舰而被搁置。中法战争后，台湾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以加强防务，开展商务为由，重提造路计划，所需经费100万两，计划招商集股筹集，奉谕允准。1887年春，台湾铁路动工，拟先由基隆修至淡水。但是，台湾山峦起伏，地形复杂，修路工程艰巨，开工不久，即因经费不足②而告急，刘铭传不得不上疏请求改商办为官办，由户部拨款。终因经费不继，至1893年，铁路修至新竹后即行停建。基隆到新竹一段全长150余里，耗资129万余两。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无论是以张之洞为骨干的洋务派，还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都积极寻求救国图强的办法。他们都把修建铁路作为“中国新政第一大宗”，看作是拯救清王朝的“至急至要之图”。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也决心“蠲除痼习，力行实政”③，并把修建铁路放在推行新政的重要地位。他认为：“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朝廷定议，必欲举行”④。他决定先修已搁置多年的南北干线芦汉铁路，并指出：“芦汉铁路，关系重要，提款官办，万不能行，惟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以冀速成”⑤。为了维护铁路的主权，他特别强调“不得有洋商入股为要”⑥。然而，这时的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争夺铁路修筑权成了列强相互争夺和巩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因而限制洋商入股以维护铁路

---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6册，总第4434页。

② 刘铭传计划招股集资100万两，因“各商观望”，实际只集资30余万两。

③ 《清实录·德宗实录》（五），第838页。

④ 《清实录·德宗实录》（五），第944页。

⑤⑥ 《清实录·德宗实录》（六），第50页。

主权的方针，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

1896年6月，俄国胁迫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夺去了横贯黑龙江、吉林两省的铁路修筑权；同月，法国迫使清政府签约，夺得了广西龙州至云南南关的铁路修筑权；同年冬，列强又围绕芦汉铁路的修筑展开了激烈竞争，最后由俄法控制的比利时银行团与清政府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1898年，德国攫取了山东胶济铁路的修筑权；美国夺取了粤汉铁路贷款权和修筑权；英国夺取了津镇（天津至镇江）、苏杭、广九（广州至九龙）、浦信（浦口至信阳）等铁路的修筑权。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共获得8次贷款权，共取得铁路修筑权长达万余公里。

清朝铁路主要建成于光绪年间，个别线路完成于宣统年间。到1911年（宣统三年）共建成8条铁路干线，6条支线，全长约4497公里。

清政府出于军事目的修筑铁路。铁路建成后，对增强沿海军运能力，改善海陆联防态势，的确起了不小作用；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军事上的颓势。甲午战争时，由于只有津沽、台湾两条铁路，未成网络，还不能有效地支援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时，由于大沽海防迅速被敌突破，天津迅陷敌手，以致津沽铁路不但没有来得及为清军服务，反而成了侵略军进攻京师的工具。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由京汉铁路运送北洋军赴汉口镇压革命军。从军事角度看，中国真正利用铁路迅速集结军队，使铁路成为运送军队的主要交通工具的，还是由辛亥革命战争时期北洋新军开了先例。

三、电报的建设

19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列强在怂恿清政府修筑铁路的同时，还提出了在沿海各口架设电线的要求，都遭到了清政府的严词拒绝。于是，列强采取强加于人的办法，背着清政府偷偷铺设海底电线。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首行其事，于1870年把海底电线从日本的长崎敷设到香港，又从香港偷偷地延伸到上海租界。同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宣称，拟由广州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到上海敷设海底电线，并要求允许将线端一头在通商口岸洋房内安放。清政府慑于英国势力，“通融准办”，但要求线端不牵引上岸。英国便暂将海底电线接在吴淞口外的船只上收发电报。丹麦、英国创始于前，法、美等国接踵于后，不过数年，各通商口岸海底已是缆线往复，形近蛛网了。

外国电报业纷纷创设于沿海，使清廷部分官员（特别是洋务派）大开眼界。他们认识到电报迅捷，不仅利商利民，而且便于迅速调遣军队，于边海防建设大有裨益。于是，南洋大臣沈葆桢于1874年上奏清政府，着重从军事角度陈述电报的积极作用，请求在福建、台湾间架设电线，并建议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承办架线工程。因当时正发生日本侵台事件，台湾军务紧急，清廷当即允准。但由于福建巡抚对架设电线意见并不一致，兼之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讹诈勒索甚巨，闽台架线工程因而搁浅。

1879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出于军事需要，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到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陆路电线。这是中国最早创设的电报线路。

1880年9月，李鸿章上疏清廷，以电报有利防务，便利通讯为由，奏请敷设天津、上海间电线。他强调指出：“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轮船、火车之外，又有电报之法。“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①经清政府批准，李鸿章遂于当年开始筹建，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承办，于1881年12月全部完工。该线全长约3000余里，从天津

---

① 李鸿章：《请设南北洋电报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8，第16页。

出发，循运河，越长江，经镇江达上海，是贯穿大江南北的第一条通信大动脉。为培养人才，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电报学堂，雇用丹麦人教授电学和收发报技术等。

1882年，盛宣怀等人将津沪电线各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线路由专供军用改为官、军、商共用，并制定了电报收费章程，以所得赢利缴还架线费用。这样，不仅大大提高了电线的使用效率，而且还偿还了清廷的架线投资，并解决了平时维护检修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为尔后国内电报事业的迅速发展打开了一条通路。

因电报线路占地少，耗资低，架设简便，效益明显，故津沪线建成后，并未引起朝廷顽固派的强烈反对，这使洋务派大为乐观。1883年7月，总理衙门采纳了曾纪泽的建议，决定将天津电线延设到北京通州，以方便京城对外联系。李鸿章奉命筹办，于同年9月中旬建成并交付使用。其后，总理衙门又授意李鸿章将电线延伸到北京城内。这段线路为双线形式：一条引入总理衙门，专供官用，另一条则供民用。自此，北京电报局遂分为官局和商局，但官局员工的薪俸统由商局负担。

京通电线的架设，加强了清廷的对外联系，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方面的活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京城电线的设立，对全国影响甚大。“自时厥后，各省咸知电报之利。或本无而创设，或已有而引伸。其尤要之区，则陆线、水线兼营，正线、支线并设，纵横全国，经纬相维”①。到1894年，全国共敷设陆路电报线40余条，总长2.3万多公里，基本上沟通了京师和全国省城间的电报联系，结束了以往专靠驿递马传的落后通讯状况。

电报一经建立，在军事上立即发挥了作用。如1881年建成津沪电线后，翌年7月朝鲜汉城发生“壬午兵变”，中国驻日使臣黎庶昌得知日本乘机派兵赴朝，立即给朝廷发电，建议“速出援师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6册，总第4465页。

为先发制人计"①，清廷马上作出反应，及时派兵援朝，使日本侵略者未敢轻举妄动。正如两广总督张树声事后在一份奏折中所说的那样："遣将调兵，处分军事，虽悬隔山海，而如指掌，则尤以电报为之枢也。……上年夏间，臣在天津遇朝鲜内乱，调集南北洋水陆各军，刻日东渡，得以迅赴事机，实赖电报灵通之力"②。

1883 年底，中法战争爆发。这时已有英国大东公司敷设的海底电线由上海达于香港，并与广九电线接通。翌年夏初，清政府又架通了苏浙闽粤陆路电线，因而主要靠电报对前线部队实施指挥。但是，由于广西境内未设电线，朝廷电报发往广州顷刻可达，而由广州至广西镇南关外，还得靠驿站传递，虽水陆兼程，急如星火，"非半月不得达，非月余不得往还"③，仍属缓不济急，贻误战机。经两广总督张树声建议，清廷急派盛宣怀兴建广州至广西前线电线。此线由广州经梧州、南宁直达龙州，全长 2000 余里，1883 年 12 月开始兴建，翌年 6 月竣工，仅用半年时间。它的建成，大大加快了战场军情的传递速度，提高了中央对前线部队指挥的效能。可以说，清军之所以取得中法战争陆路作战的最后胜利，电报的畅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全国电线已经纬相错，形成网络，清军作战已普遍采用电报通信，加之航运的开通和铁路的铺设使用，使清军指挥更加灵便，机动更加快捷。所有这些，标志着中国军事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 41 册，总第 12482 页。

②③ 《两广总督张树声奏》，《洋务运动》（六），第 353 页。



第十三章　清后期军制的初步改革

19世纪50年代湘军的兴起，开了晚清军制变革的先河。在此基础上，清政府于60～7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对军制作了一次改革的尝试，一是抽调部分八旗、绿营兵丁加强训练，以改善经制兵制，加强中央军权；二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国内人民起义之后，以湘淮勇营留防要地，以维持封建统治。故有练军、防军之制。清后期军制的这种初步改革，虽然进一步冲击了绿营积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但成效并不显著。

第一节　制兵的编练

一、练军产生的背景与经过

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军队，臃肿庞杂，既有八旗、绿营兵，又有湘、淮军和各省勇营。八旗兵早已形同虚设，绿营兵也已颓废不堪。1860年（咸丰十年）5月，清军“江南大营”再次被太平军摧毁，4万余众死伤逃遁。同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0余万禁军一触即溃。这两次军事上的严重失败，使咸丰帝及满朝文武触目惊心。他们见朝廷一向倚重的八旗、绿营和满蒙宿将，已经衰败，不得不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所募湘、淮军来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致使湘、淮军（包括各省招募的勇营）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然而，湘、淮军系由私人招募，“兵为将有”，不归朝廷直接统辖。清廷出于“居重驭轻”的传统思想和狭隘的民族偏见，对汉族督抚所招募的勇营一直存有戒心，不予信任。同治初年以后，兵消勇涨之势更加厉害，

使一向由中央掌握的财权、军权逐渐外移，形成内轻外重之势。相比之下，绿营兵系国家经制之兵，兵为土著，将由铨补，兵丁不以将领的去留为转移，不会出现兵为将有之弊端，符合清廷中央集权的政策。所以，清廷虽然看到绿营兵疲弱不能再战，但为了牵制湘淮勇营，平衡内外权力，仍一心设法补救，而不愿将其彻底革除，因而采取抑制勇营与扶植绿营并举的政策。早在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摧毁以后，清廷即令长江南北各省于本籍挑补绿营缺额，不得任其废弛。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又在一份谕旨中说：“军兴以来，各省均添募勇队，以辅兵力之不足。惟勇粮浮于兵饷，以致勇强兵弱，而司兵柄者，遂谓兵不如勇，洵为近来通弊。诚能鼓舞而奋兴之，人同此心，岂有不可振作之理？”① 可是，由于绿营积习已深，即使按缺额补齐，也无济于事，于是清政府又想出一个新的办法，命各省以勇丁补充绿营兵。清廷谕称：“军兴日久，因各路官兵不敷剿办，更复招募勇丁，乃近来各路军营官兵则往往缺额，勇丁则征调纷繁，兵日少而勇日增，不可不豫为之计”，此后，勇丁“如有技勇精娴、战阵出力者，各该统兵大臣督抚即于存营缺额兵数挑选充补。一俟军务告蒇，该勇丁有愿归农者，即妥为遣散，如仍愿效力行间，即分隶各标营挨补兵额”。② 从中可以看出清廷整顿、扶植绿营的决心。接着，内外大臣在易勇为兵方面大作文章，以求贯彻清政府的意图。

易勇为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裁撤勇营，强化绿营，但其作用难于持久，且执行起来相当困难。因为以勇补兵，无改于绿营积弊，反使精壮之勇补入绿营后变成疲弱之兵。何况当时勇营食饷厚，升迁快，不少绿营兵弃兵就勇，易勇为兵自然难上加难。因此，整顿绿营采取易勇为兵的办法不可能取得预期成效。为了

---

① 《清实录·穆宗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下同），（一），第1136～1137页。

② 《皇朝政典类纂》，双璞斋藏版，上海图书集成局1903年铅印本（下同），“兵二”，第7页。

改变制兵面貌，改弦易辙之法在于加强军队训练。正如后来兵部所言："夫兵之穷变而为勇，勇之撤仍归于兵，此必然之势也。国家经制之兵，垂二百余年，不敢轻议纷更，惟期实力整顿，所恃在练耳。"① 为使军队重新振作，清朝统治者出于"固本之图"，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昔日的八旗劲旅。1860 年，胜保即建议"将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及圆明园八旗官兵，专派知兵大员加以训练，以期悉成劲旅"②。与此同时，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在英法联军自北京退驻天津后，拟定了筹议大局"章程六条"③，旋又提出"练兵"动议，内称："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他们还对练兵对象和训练内容提出了初步设想，指出："八旗禁军，素称骁勇，近来攻剿，未能得力，非兵力之不可用，实胆识之未优。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因此，建议将京城"有技艺各营，并习枪炮；其仅习弓马者，加习枪炮，并习技艺。并加挑选各旗营闲散余丁，另立营伍，专习技艺抬枪，认真操演"。④ 不难看出，奕䜣等倡导练兵的基本方法是改善装备，操练洋枪洋炮；训练对象是八旗禁军和京营，其着眼点是巩固京师根本。奕䜣等人的动议与朝廷的意图完全吻合，很快得到谕准实行。当时，沙俄政府提出赠送枪支 1 万杆、炮 50 门装备清军。奕䜣等决定待这批枪炮运抵恰克图后，由库伦办事大臣验收，并从京城圆明园、健锐营、火器营中挑选士兵 60 名、章京 6 名，赴恰克图接受俄人训练。但当第一批枪炮运抵恰克图时，因库伦办事大臣色克通额不谙西洋操法，且疑俄人以此为贸易交换条件，遂奏称在此操演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 9641 页。

②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 9545 页。

③ 参见《洋务运动》（一），第 5～9 页。

④ 《钦差大臣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折》，《洋务运动》（三），第 441～442 页。

“实无裨益”，建议设法撤回。于是，此项练兵计划就此废止。后俄国所送枪炮全部运京拨给神机营存用。

1862年2月，英法联军准备退出天津，拟招募广勇保护洋行。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广勇难于驾驭，易生事端”①，遂劝说洋商募本地兵勇交英国军官训练。鉴于天津郡营兵不多，又建议挑选京兵赴津会同受训。奕䜣等认为合津京两处营兵交外国人训练，不仅需饷较轻，而且“将来教演得力，固可杜洋商募广勇之心，并可收畿辅屏藩之效，且即此查看外国营伍虚实，于事亦属有裨”②。于是，由总理衙门出面，在京城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中，挑选兵丁120名、章京6名，作为首批接受洋式训练的旗兵派赴天津。另由直隶总督文煜在天津、大沽两处营兵内挑选兵丁620名，随同京兵参加训练。于是，首批接受洋式编练的清兵共有746名，由英国军官斯得弗力等11人进行教练，所用武器系俄国赠送的第一批枪支。同年4月，斯得弗力提出“练兵尤需练官”，建议清廷再挑年在30岁以下的军官360名赴津参练。经总理衙门同意，又从八旗汉军中如数挑选赴津。这样，在津受训的清军总数逾千，是为清政府在八旗、绿营的基础上编练的第一支使用洋枪洋炮的部队。显然，由于客观因素的促使，清廷在练兵之始就打破了强化禁军的“固本”政策，训练对象由京兵健锐营等扩大到直省绿营，训练手段由自习枪炮到接受洋人教练，向西化迈出了第一步。

使清政府始料不及的是，这种聘用洋教官的练兵方式，在天津刚刚试行，还没有看到它的效果，就在沿海各省迅速推广开来。促成这种结局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1862年5月12日，普鲁斯就清廷要求英法海军协同防守各通商口岸一事照会总理衙门，指出：南方沿海各城清军士兵向乏训练，充数虽多，毫无裨用，实难与英法军队“协同相助”。他要求清廷在沿海各口练兵，并提供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44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45页。

充足的火器；否则，英国海军只防守各口城外国洋行地界，其它城中各地概不负责。语近恐吓要挟。① 其后不久，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也写信给总理衙门，声称英国军官贺布和斯得弗力“俱有愿在上海出力练兵之意”，并说贺布愿练兵6000人，年需饷约100万两，斯得弗力则要求自己募兵定饷，饷项多寡均由中国负担。② 这些要求使清政府左右为难。为了笼络洋人，集中力量对付国内农民起义，经反复斟酌，奕䜣等决定先令上海、福建两处仿照天津练兵之法，酌情试办，如此，“则既不没外国献策之忱，而中国不致过耗财力”③。不久，东南沿海各口岸城市迅速掀起了聘请洋人练兵的热潮。

江苏巡抚李鸿章挑选弁勇1000人交英人贺布训练，以600人交法人训练。

福州将军文清等从旗、绿营中选派官兵80余名，交英国驻闽轮船弁兵训练。次年又分别请法国人美理登和英国翻译官有雅兰各训练一批官兵。

两广总督劳崇光咨会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在驻防满汉八旗中先后派拨兵丁200名，复于督抚提协标中共选派绿营兵丁250人，延请英国军官1名、教练官3名、弁兵42名至广州帮助训练。第一批旗绿官兵操练渐形娴熟后，又根据英国领事的建议，加派官兵参训，共有旗营官12员、旗兵300名，绿营官20员、绿营兵560名。④ 不久又有法国驻广州领事主动派武弁1名、兵丁15名，要求帮助广东练兵，新任两广总督刘长佑等鉴于已有英国官兵教练清军官兵的成案，又增兵添练。

与此同时，奉天、吉林等地大员也纷纷呈请编练新式军队，以加强地方防卫力量。

---

① 参见《洋务运动》（三），第454页。

② 参见《洋务运动》（三），第452页。

③ 《总理各国事务奕䜣等奏》，《洋务运动》（三），第453页。

④ 参见《洋务运动》（三）第459、465页。

在口岸聘请洋人练兵，似与清廷的“固本之图”不尽相符，但却与整顿旗绿营伍以强化清廷统治的意愿相吻合。1862年底劳崇光的奏折很能代表清政府的思想。他说：“此等教练之法，似止可施之于营兵，不宜施之于壮勇。绿满汉八旗官兵皆国家世仆，休戚相关，断无他虑。即各省绿营兵丁，虽与八旗官兵有间，然皆系招募良民，编入行伍……亦可以无他虑。若壮勇一项，临时仓促招募，初不问所自来，事竣概行遣散，亦不问其所往。若辈本多游手无赖，从征日久，习惯强梁，散遣之后，截止口粮已难保其不滋事，若精练火器之法皆能透彻，窃恐流弊不可胜言”①。

正值沿海各省掀起练兵热潮之际，上海发生了“常胜军”首领接替问题。1862年9月21日，常胜军首领华尔在浙江战死，法、英两国公使争相推荐本国将领接替，清廷担心主权旁落，饬薛焕、李鸿章设法阻止。经薛、李与英法公使反复磋商，议定将“常胜军”交给副领队美国人白齐文统带。此事的发生，引起清统治者诸多顾虑。清廷认为，“白齐文能否胜任？将来能否就我范围？不可不豫行筹及，恐稍涉迁就，日后转成尾大不掉之势，徒糜饷项，不如交中国大员管带易为驾驭”②。由此联想到聘请洋人训练军队，权力不在中国统帅一方，容易出现越俎代庖甚至干涉中国内政等弊端。所以，清廷不久就改变了态度，推行用华将自练军队的政策。

1862年秋，恭亲王奕䜣等即专折上奏，提出了“自强以张国势，练将以固兵心”的原则，他们指出：“中国教演洋枪队伍，练兵必先练将，将来即用中国之将，统带中国之兵，则权不外假，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③“练将”政策的提出，是清廷洋式练兵思想的深化，对维护主权和统一各省练兵思想起了积极作用。

1862年10月，江西巡抚沈葆桢提出了一个整顿江西绿营的

---

① 《两广总督劳崇光奏》，《洋务运动》（三），第460～461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第13页。

③ 《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洋务运动》（三），第470页。

计划，不仅触及了绿营疲弱的本质，而且朦胧地萌发了建立“练军”的思想。他奏称：“谋江省自立之策，莫如先练额兵。议者咸谓兵不可用，以目前而论，兵之与勇，强弱悬殊”。“夫兵不可用，非兵之过也，其月饷不及勇营四分之一，其升途有终身求拔一外委而不可得者，名利俱穷，无怪稍有所长者皆辞兵就勇”。“诚能鼓舞而奋兴之，人同此心，岂有不可振作之理”。他提出将本省绿营兵“严汰老弱，增补精锐，分作两班，一班调省及两镇操演，一班留本营汛弹压，半年一换。除在本营汛者照旧领饷外，其调赴操演者，酌加练费以资津贴”。他认为如此则有五利：一是“所费少而所成就者多”；二是“尺籍伍符按户可稽”，“钤束较易”；三是“营汛可恃”；四是“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五是“行伍精强，将来军务肃清，散勇有所惮而不敢滋扰，永杜后患”。① 清廷对其大加赞赏，谕令“即著照议，妥为办理”。但是，沈葆桢练兵却未见成效，此后江西倚以战守的仍是其所募勇营和奉调来赣的湘军。然而，沈葆桢提出的具体做法，为后来刘长佑于直隶练兵所借鉴。

正式提出在绿营之外别树规制，另立营伍（即建立“练军”）的是新任直隶总督刘长佑。1863 年 6 月，刘长佑鉴于直隶兵勇临时征调出征，大都“营制未定”，“号令不齐”，严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上奏清廷提出用湘淮军军制来改造绿营。他说：“臣历事戎行，转战数省，所恃以战胜攻取者，固由士卒之用命，也实营制之合宜”，故拟以曾国藩所定湘军营制为基础，“审酌南北情形，量为变通”，统一兵勇营制。② 时隔半月，刘长佑再次上奏，将所要选练的直隶兵勇定名为“练军”。清廷同意刘长佑的意见，令其赶紧办理，但对他用南省营制改造绿营的意图仍有保留，强调“南

① 沈葆桢：《请整顿额兵折》，见《沈文肃公政书》，清光绪六年刊本，卷 1，第 29～30 页。

② 刘长佑：《直东肃清撤留兵勇折》，见《刘武慎公遗书》，清光绪二十六年刊本，卷 5，第 56 页。

北情形不同，总在因地制宜，期于尽善”①。

恰在此时，署礼部左侍郎薛焕在《筹饷练兵》折中也提出了在京师直隶练兵的意见，旋又具折上奏，主张在直隶设立4镇，每镇练兵1万，并将京师神机营兵丁增添2万，分派4处操练，饷项由各省督抚合筹。②薛焕强调于京师直隶两处练兵，与两年前奕䜣提出的固本政策基本一致，因而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谕交户部议行。户部提出由18省分担此项经费，定名为“固本京饷”。清廷谕令各省督抚按时筹集，这就引起东南各省督抚的不满。李鸿章指责薛焕“殊不自量”，并鼓动安徽巡抚乔松年不予协饷。未几，两广总督毛鸿宾上奏公开反对。他认为骤设4镇，招募和约束皆难，筹饷尤为不易，主张取消这个计划。清廷令直隶总督刘长佑“通盘筹画”，承办练兵事宜。

刘长佑接旨后左右为难，乃于同年11月提出了一个“抽练营兵，酌募勇丁”的折中方案，意在把薛焕单独设镇练兵的想法与清廷夙欲整顿绿营的意旨结合起来。他建议简练7军，即在直隶绿营4万余人中挑选精壮步兵1.25万名、马兵2500名进行编练。具体编制是：以500人为一营，5营为一军，每军配马队500人，共组成前后左右中5军；另于湖南或直隶募勇5000人，分为2军。以上7军，均集中保定训练，练成后分驻保定、河间、正定、大名、威县、宣化、天津等地。这一方案是以抽练绿营精壮为主，同时招募勇丁为骨干，在原有兵勇之外，另设“练军”7军，择要驻扎。这标志着晚清建立练军思想的正式形成。

1866年8月，恭亲王奕䜣等以“饷既虚縻，兵仍无用”为由，奏请“变通筹饷练兵”，建议将直隶原拟编练之7军改为6军，“分驻于遵化、易州、天津、河间、宣化、古北口等处，就地团练，仍以直隶总督统之，重京师而严拱卫”。③这一方案得到朝廷谕准，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6，第5页。

② 参见《清实录·穆宗实录》(二)，第388页。

③ 转引自：《胡家玉折》，《洋务运动》(三)，第484页。

令刘长佑照此执行。但时隔不久，清廷权贵又纷呈奏章，提出不同看法。某些满汉大臣主张只练皇室亲军，反对更练别军。如大学士倭仁认为：练兵应取“固本”政策，只练京师旗营，以“强干弱枝，无尾大不掉之患”。① 兵部左侍郎胡家玉则认为：“与其练京外之兵以辅京师，何如练京内之兵以实京师？”否则，京师一旦有事，势必舍近求远，缓不济急。他建议“仿神机营办法，挑选八旗营、护军营、巡捕营兵各五千，共一万五千人，分作三军，每军以一千人为洋枪队，一千人为马队，三千人为步队，名曰神武营，择城外空闲地而训练之，与神机营互相策应，静资镇压，动备非常，成效必有可睹”。如此，“则根本益固而外侮永保无虞矣”。② 清廷将此议饬下各部“妥议具奏”。10 月，总理神机营事务醇亲王奕譞、吏部尚书文祥、户部侍郎崇纶、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贾桢等 11 人联名具奏，认为添练京兵与直隶练兵“均可并行不悖”，“盖无直省练兵，不足固畿辅屏藩，非添练京兵，无以益神京拱卫”。③ 清廷同意上述意见，当即谕知刘长佑，先责其练兵数年毫无成效，继而警告：嗣后“毋得视为具文，敷衍塞责。所练各营，朝廷当随时简派大员前往校阅。倘有训练不精、军实不齐之弊，必当从重惩处”④。不久，刘长佑在户兵两部会奏直隶练军办法 17 条的基础上，拟定了畿辅练兵营规 15 章，对 6 军的营制、器械、粮饷、操练、行军、禁约等，都详加论述，共计 150 余条。“营规”规定直隶练军从绿营营汛中独立出来，单独成军。至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练军制度。此后，刘长佑按章抽练，半年之内 6 军全部成军，“颇有震动鼓舞之气”⑤。

---

① 葛士浚：《经世文续编》，上海久敬斋 1901 年铅印本，卷 62，第 10 页。

② 《胡家玉折》，《洋务运动》（三），第 485～486 页。

③ 《总理神机营事务奕譞等折》，《洋务运动》（三），第 488 页。

④ 转引自《刘武慎公遗书》卷 10 第 23 页。

⑤ 刘长佑：《遵旨入觐顺阅练军折》，见《刘武慎公遗书》卷 11，第 20 页。

1867年，沧州盐民起义，在张六等领导下，以数千之众，逼近京畿，练军抵抗不力，刘长佑以此被革去官职，由大学士官文署理直隶总督。

1868年8月，捻军起义彻底失败后，清廷调两江总督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上谕告诫曾国藩：前此直隶选练6军，岁糜帑金巨万，迨"捻匪"北窜直隶，打仗仍不得力，养此无用之兵，实堪痛恨！"此时贼匪既平，亟应将前定练军章程，从新整顿。曾国藩久谙戎事，应如何因时变通之处，著于到任后，详慎妥筹，悉心经理，务期化弱为强，一洗从前积弊，以卫畿疆"。① 此后几次上谕都强调要曾国藩把练兵作为"第一件大事"来抓。曾国藩深知不对绿营旧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仍会走刘长佑练兵的老路。1869年6月，他在《复议直隶练军事宜折》中重新提出仿照湘淮军营制进行练兵的主张。尽管在统领权限及"调南人战将练北人之新兵"等问题上遇到某些权贵的反对，但在曾国藩的坚持下，竟得到清廷的默许。这表明清廷也看到了变革旧有军事制度的必要性。1870年李鸿章接任直督后，对直隶练军的营制再未作大的更动。

兵制事关重大，诚如李鸿章于1864年所言："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②。整顿绿营属于全国性的问题，自直隶始建练军之后，各省纷纷效法。清廷也有意在全国范围内加紧对额兵进行编练，以图转弱为强。1870年，清廷谕称："年来各督抚曾有裁兵增饷及酌调额兵训练之奏，然为政不在多言，而在实力奉行"，"总期实事求是，变疲弱为精强"。③ 于

① 转引自曾国藩：《复议直隶练军事宜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874页。

② 李鸿章：《复陈筱舫侍御》，见《洋务运动》（三），第591页。

③ 王先谦：《同治东华续录》，清光绪十五年刊本，卷88。

是，练军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

二、练军的营制与饷章

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练军制度，但对练军的营制与饷章，却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制度，往往规定由各省督抚酌情办理，而各地条件不同，因而不仅各省之间互有差异，即使一省之内前后亦不相同。而沿海各口岸聘请洋人练兵时，教练官来自不同国家，训练兵额数量不等，以致与后来改用华将自行练兵时的营制、饷章，差异更大。

首批聘请洋人训练的京兵，据崇厚奏称：兵丁以12人为一队，或习枪，或习炮，每日操练两次。除带队官外，另选守备、把总各1人，文委员2人，负责管理和办理操练事宜。军官薪饷与绿营相同，即守备月俸银18两，把总12两，文委员18两；士兵饷银则大大高于绿营，每月给银6两。外国教练官待遇较为优厚，总教官2人，每人每月给洋银30元（后改为75元），分教官15人，每人每月给洋银7.2元，翻译3人，每人每月给洋银60元。① 嗣后，各省洋式练兵基本均按崇厚所订营制与饷章执行。

清政府改以华将自行练兵以后，直隶练军创制最早，效果与影响也最大。直隶练军先后经过刘长佑、曾国藩、李鸿章经营，制度较为完善。1863年6月，刘长佑提出用湘淮军制改造征调之绿营时，清廷虽表示赞同，但仍谕令其所练之军“当一切俱从标兵规制”②，说明尚未定下改变绿营祖制之决心。1866年，奕䜣等为加强京师四壁防护而提出参照神机营章程改直隶练军7军为6军，并移其驻地。接着户兵两部会奏直隶练军办法17条，刘长佑据此重订练军详细营规15章，使练军制度趋于完善、具体，并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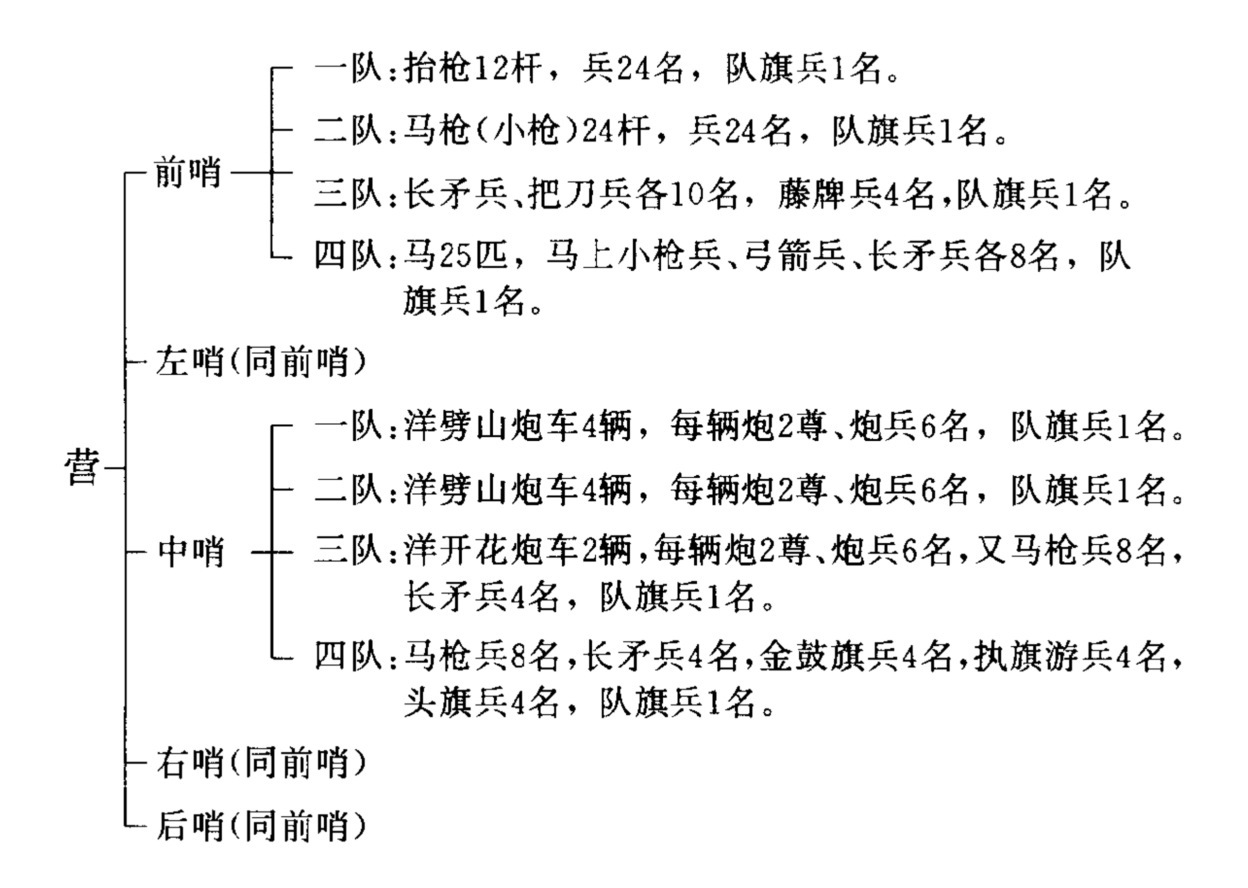
① 参见《洋务运动》(三)，第444～445页。

②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9635页。

确规定直隶练军从绿营营汛中独立出来，单独成军。

刘长佑所拟练军营规（以下简称“刘章”）的营制基本仿照湘淮军制，同时又参照绿营设镇的营制，在营以上设置了军的编制。每军下辖5营（共2500人），设总统官1人，文武翼长各1人（又称“帮办”）。每营下辖5哨（共500人），设管带官和帮带官各1人。哨辖4队（共100人），设哨官1人。队辖5伍（共25人），设队长1人。5人为伍，设伍长1人。

“刘章”练军营制表



“刘章”练军饷章：除保留绿营七成底饷外，加发练饷，步兵每人每月加发银2两，马兵5两（含马干），亲兵3两5钱，步队长3两，马队长6两，哨官10两，帮带15两，管带20两。此外，管带有公费银60两，军总统薪水公费银180两，文武翼长薪水公费银120两。

由上可以看出，“刘章”练军制度主要是参照湘军制度修改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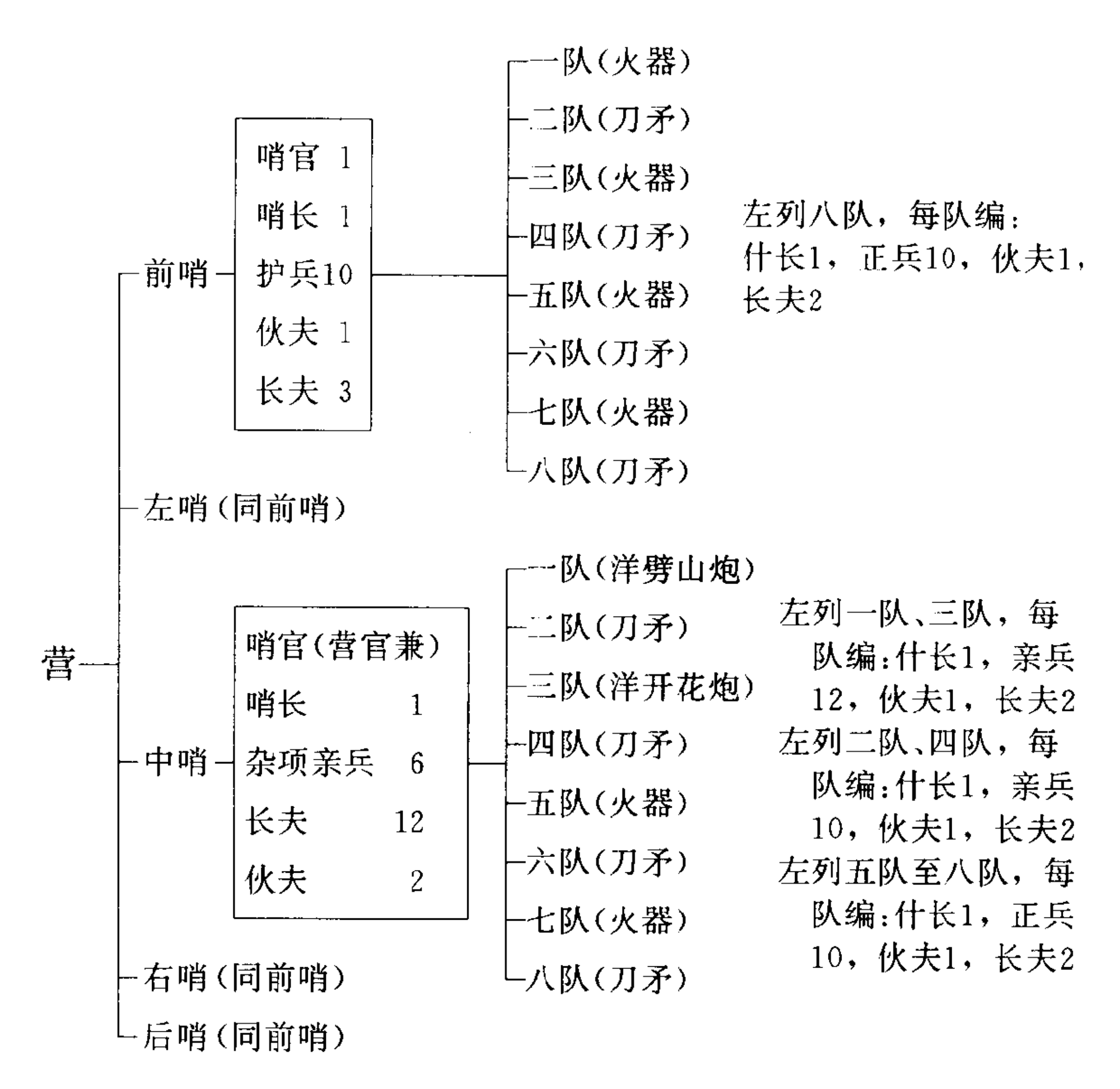
成的，其不同之点是：（一）“刘章”练军营以上设立军一级组织，其所辖之营有固定数目，较湘军统领之下无固定营数前进了一步。（二）哨分4队，队下分伍，增加了一级组织，不如湘军哨下分8队简练。（三）“刘章”练军火力比湘军大大增强，每营有火炮20门，抬枪48杆，小枪144杆。湘军每营只有火炮4门，抬枪24杆，小枪99杆。（四）“刘章”练军马步不分，每营均有马兵100名，分属于4哨，且武器混杂，有马枪、弓箭、长矛，很难组织协同，不如湘军马队单独成营，易于发挥突击、迂回的特长。（五）“刘章”练军饷章较湘军为低。

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后，在“刘章”的基础上，进一步用湘淮勇营的营制和治军精神，改造直隶练军。他于1870年5月提出的直隶练军新营制取消了军一级机构，仍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上设一无固定营数的统领。每步营定额仍为500人（不含伙夫、长夫），设营官1人，哨官4人（中哨由营官直辖），哨长5人，什长40人，正兵360人，营官亲兵50人，哨官护兵40人。营分5哨，哨分8队，前后左右哨每队正兵10人，什长1人，伙夫1人，长夫2人（拔营时雇用，平时不配）。中哨配有亲兵，详见下表。马队独立成营，下辖5哨，哨分5棚，全营员弁兵夫316人，计有营官1人，帮办2人，字识1人，哨官4人（中哨由营官直辖），督队官5人，什长25人，兵225人，伙夫31人，马夫22人。马队每营配马272匹，一律由官马改为私马，由兵勇自带或由官马扣银后改为私马，每月发给马粮，以使兵勇自知珍重爱惜，蓄养膘壮。① 根据上述编制，曾国藩计划在直隶练兵1.2万人，其中步队20营，马队6营，分驻宣化、古北口、保定、正定等地。

曾国藩所订直隶练军饷章：统领、营官、哨长、长夫饷银数量及领取使用方法与湘淮军同，只有哨官略高于湘军，月支饷银10两。其他官兵则略薄于湘淮军而高于绿营，如什长月支银4两

① 参见曾国藩：《试办练军酌定营制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909～9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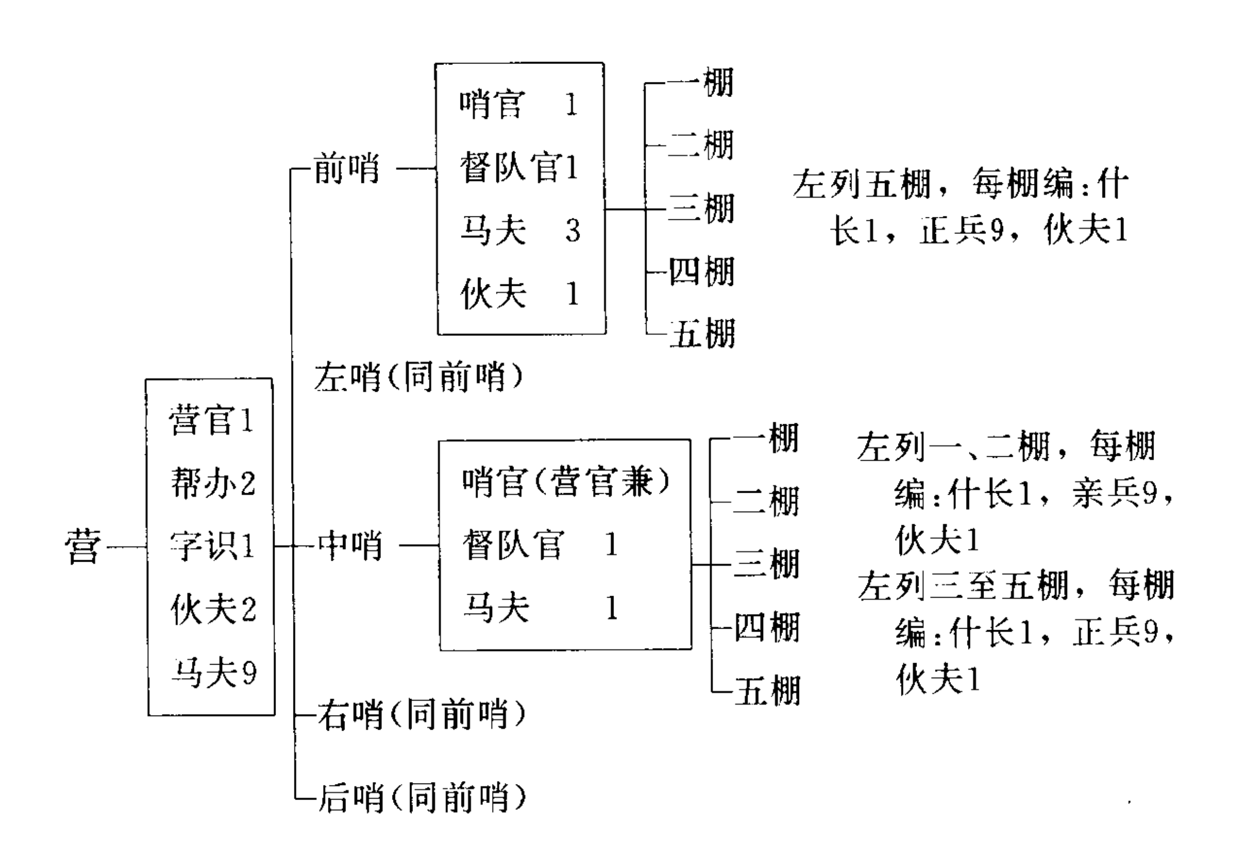
曾国藩所订直隶练军步队营制表



注：火器队暂用抬枪或马枪，有条件时再改为洋枪；洋劈山炮、洋开花炮队每队配炮4门；各队长夫拔营时雇用，平时不配。

2 钱，亲兵、护兵月支银 3 两 9 钱，正兵月支银 3 两 6 钱，伙夫月支银 3 两。为防止兵勇逃避训练和冒领饷银等流弊，曾国藩改绿营底饷与练饷合领之制。为鼓励兵勇出征作战，还制定了加饷制度，省内出征，兵勇、什长月加银 4 钱，出征省外，月加银 6 钱。练兵饷银，由户部练饷局按月拨给。

曾国藩所订直隶练军马队营制表



直隶练军与绿营、湘军饷章比较表

		绿营兵	"刘章"练军	"曾制"练军	湘军
马兵		每月3两	每月6两4钱	每月7两	每月7两2钱
步兵	战兵	每月1两5钱	每月3两5钱5分	每月3两6钱	每月4两2钱
	守兵	每月1两	每月3两2钱		
注：马兵月饷数中均含马干粮。					

曾国藩拟制的直隶练军营制，更接近于湘军营制。与刘长佑所订练军营制相比，其优点是：（一）营规简练，便于遵行；（二）闲散官员减少，利于管理统带；（三）武器装备整齐划一，利于操练作战；（四）马队单独成营，便于平时管理和战时运用；（五）饷银略有增加。其不足之处：首先是取消了"刘章"中有固定营数的军的建制，不利于战时指挥；其次在武器装备上，半数

使用刀矛，半数使用火器，特别是火炮配备的数量，虽较湘军增加了一倍，但较“刘章”减少过半，对支援步兵战斗不利。曾国藩过于迷恋湘军固有编制，但他以湘军规制改造绿营的决心，给直隶练军带来了转机。从1869年开始，曾国藩按照新章逐次抽练直隶练军，同时将其前任遗存下来的数千练军一律改从新章。

1870年6月，曾国藩奉命赴天津处理“教案”，旋改任两江总督，直督由李鸿章接任。李鸿章督直20余年，从海防需要出发，大力加强直隶练军建设，购买了大量洋枪洋炮，并抽调淮军将领担任教习，使直隶练军的战斗力得到较大提高。但对直隶练军的营制章程，李鸿章未作大的改变，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所以，曾国藩改订的直隶练军章程最后被定型下来，并得到较好的贯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直隶以外各省奏设练军的时间虽然先后不一，而其营制则均以直隶练军章程为蓝本，在基本方面都是相同的。但各省条件不尽相同，各督抚奏设练军的目的也不完全一样，因而在练军规制上互有差异也是自然的。

在营制方面，多数省的练军都是马步单独成营，集中驻操。练军营的规模，江苏、河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山西、四川、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步队都以500人为1营，马队以250人为1营。营下设哨、哨下辖队的办法也与直隶基本相同。只有山东、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几省的情况有些区别。山东步队以400人为1营。云南初练时以370人为1营，1884年改为每营220人，1889年又改为每营427人。贵州步队以250人为1营，后改为每营300人。甘肃和陕西省的练军步队均以370人为1旗，马队以125人为1旗。与直隶练军营制相比，这几个省的练军营的规模都比较小。

在饷章方面，各省练军亦互有差异，就是同一省内，先后也有变化。除安徽、湖南两省未见记载外，其它各省实行时间较长的练军饷章如下表所示。

省份	正兵月饷（含底饷）			资料来源
	马兵(含马干)	步战兵	步守兵	
山东	5两5钱4分	3两3钱	1两8钱	《丁文诚公奏稿》卷7、卷9
河南	7两	3两6钱	3两6钱	《钱敏肃公奏疏》卷6第45页
浙江	4两5钱	2两5钱	1两5钱	《同治朝实录》七年正月壬子
福建	5两3钱	3两3钱	2两8钱	《皇朝政典类纂》兵三第4页
广东	4两8钱	3两3钱	2两8钱	《谭文勤公奏稿》卷19第7页
广西	4两5钱	3两	2两5钱	《李忠节公奏议》卷3
甘肃	5两7钱	3两	3两	《谭文勤公奏稿》卷10第33页
陕西	同甘肃			同上
江苏	除底饷外，一律加发3600文			《皇朝政典类纂》兵三第10页
湖北	同江苏			《湖北通志》卷64第1680页
江西	除底饷外，一律加发3000文			《刘坤一遗集》(一)第327页
贵州	约合2两4钱5分			《贵州通志·武备志》兵制一
云南	一律发4两			《岑襄勤公奏稿》卷23第27页
四川	一律发4两			同上
山西	一律发3两			《山西通志》卷78
奉天	同湘淮军			《洋务运动》(三)第561页
吉林	同湘淮军			同上
黑龙江	同湘淮军			同上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河南练军月饷与直隶练军完全相同外，其它各省都不如直隶练军饷银高，且很不统一；只有少数几省练军不分马步、战守兵，饷额一律相同；多数省的练军马兵饷额偏高，北方省份更甚，说明各省督抚在建立练军时对马队的重视；各省练军饷额平均为3两多，虽较湘军低，但较绿营提高了一倍以上，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果各级官员不予克扣，士卒尚可养家糊口，维持一般生活水平。

三、各省练军编练情况

各省奏设练军的时间先后不一，其规模也各不相同。练军之制大的发展是在光绪年间。1875 年（光绪元年）5 月 30 日，清廷谕令各省督抚"各就地方形势，量更旧汛，合营并操，画一训练，限一年内办理就绪"①。于是，各省进一步掀起练兵热潮。各省练军初次奏设时间大致如下表所示。

省份	初次奏设时间	奏设督抚	资料来源
奉天	1862（同治元年）	玉　明	《奉天通志》卷 171 第 11 页
直隶	1863（同治二年）	刘长佑	《刘武慎公遗书》卷 5 第 56 页
福建	1866（同治五年）	左宗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20
浙江	1867（同治六年）	马新贻	《马瑞敏公年谱》第 63 页
湖北	1867（同治六年）	曾国荃	《湖北通志·武备志》
吉林	1868（同治七年）	富明阿	《吉林通志》卷 5 第 14 页
山东	1868（同治七年）	丁宝桢	《丁文诚公奏稿》卷 6
江苏	1869（同治八年）	丁日昌	《丁中丞政书·抚吴奏稿》卷 5
安徽	1870（同治九年）	英　翰	《洋务运动》（一）第 58 页
广东	1870（同治九年）	瑞　麟	《刘坤一遗集》（一）第 390 页
江西	1870（同治九年）	刘坤一	《刘坤一遗集》（一）第 230 页
山西	1871（同治十年）	鲍源深	《皇朝政典类纂》兵四第 6 页
湖南	1872（同治十一年）	王文韶	《皇朝政典类纂》兵四第 13 页
河南	1873（同治十二年）	钱鼎铭	《钱敏肃公奏疏》卷 3 第 29 页
云南	1875（光绪元年）	岑毓英	《续云南通志稿·武备志》
黑龙江	1875（光绪元年）	丰　绅	《光绪朝东华录》（一）第 101 页
四川	1876（光绪二年）	丁宝桢	《丁文诚公奏稿》卷 26 第 23 页
陕西	1878（光绪四年）	谭钟麟	《谭文勤公奏稿》卷 12 第 6 页
贵州	1879（光绪五年）	黎培敬	《贵州通志·武备志》
广西	1880（光绪六年）	张树声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 1014 页
甘肃	1883（光绪九年）	谭钟麟	《谭文勤公奏稿》卷 11 第 35 页

① 《军机大臣密寄》，《洋务运动》（一），第 154 页。

各省练军的实际规模大小不等，且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复，时增时减，大致情况如下。

奉天：早在1861年初，奕䜣等即提出东三省练兵问题，获清廷批准。次年，盛京将军玉明由八旗中挑选精壮2500人，编成练军，加练火器。1866年，继任盛京将军都兴阿又奏请添练营口洋枪队500人。至1880年，共编成"奉"字练军前后左右中马队5营，"奉"字中营步队1营。1885年，清政府为加强东三省边防，命福州将军穆图善为钦差大臣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不久，穆图善仿照吉林防军章程拟定练兵应办事宜12条，计划每省挑练马队4起（每起250人）、步队8营（每营500人），合计5000人。1886年5月，穆图善行抵奉天，随即从省城已练正兵中挑选马步各500人，又从八旗西丹内挑选精壮3470人，从北洋和神机营抽拨教习20人，另选营兵10人，共计4500人，分左右两翼，以护军统领丰升阿为总统，溥英为帮统，组成"盛字营"练军（以与"奉字营"练军相区别）。不久，穆图善病故，新任东三省练兵大臣定安奏请变通办法，"将各省步队八营，改为八起，仍仿旧制，每队以二百五十人为率，每省各练二千人。原有马队二起，添练二起，合成一千人，作为常练之兵，满三年后，察看地方情形，撤练归旗，再调一班接练。遇有征调，仍将撤练之兵按册编队"①。随着时间的推移，积久弊生，此等练军逐渐有名无实。

直隶：1863年冬，直隶总督刘长佑在直隶首先开始设立练军，到次年春共抽练7000人，1866年秋练成1.02万人。1867年初始，刘长佑按照户兵两部会奏直隶练军办法抽满6军（每军2500人），共1.5万人。至此，直隶练军正式成军。1868年，官文任直督时，对直隶练军大加裁减，仅剩下4000人。曾国藩任直督时恢复到5000人。李鸿章督直后，直隶练军得到迅速发展，1885年约有1.4万余人，甲午战争时达1.6万余人。1895年被裁去一成左右，仍存步队16营（包括天津海防练军6营）、马队21营，合计1.425

① 《清实录·德宗实录》（四），第1021页。

万人。1899年，新任直督裕禄对直隶练军实行整编，计存1.125万人。1900年，直隶练军规模又重新扩大，并将部分淮军改编为练军，共约47营1.8万余人，达到直隶练军官兵人数的最高峰。此后，李鸿章和袁世凯相继加以裁减，1903年时仅存24营3哨4队（其中有14营缺额二成），但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时，也未最后裁完。

福建：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等设立督标练军3000人，提标练军1200人。此后，其它各镇亦相继设立，人数不详。

浙江：1867年，新任闽浙总督马新贻始行奏设8营4000人。中法战争时添练2营1000人，战后复裁去6营3000人。

湖北：1867年，湖北巡抚曾国荃奏设2营1000人，1877年增至3520人（含洋枪队500人）。甲午战争时达3800人。

吉林：1865年，署吉林将军皂保始发练军之议。1868年，吉林将军富明阿奏准就省内外各城额兵、西丹选练马队1000人，是为吉林练军之始。1877年，吉林练军"规制始备"，共计官弁兵夫3500余人。1886年，钦差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穆图善从奉天到达吉林时，吉林已练之兵存城无几，余皆分防各要隘，乃抽拨右路步队1营，左路马步队各1营，练军马队1起，计1500人，又于食饷未练之额兵及八旗台站、西丹内挑选精壮2970人，从北洋和神机营抽拨教习25人及营兵10人，编入归伍，合计马队4营，步队6营，共4505人，立"吉字营"练军。定安接替穆图善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后，将步队的营改为起，吉林练军总数也减为3000人，其后逐渐有名无实。

山东：山东巡抚丁宝桢于1868年首练步队500人，次年又设马队3营750人，1872年，设立文登水师练军2营800人。1884年，巡抚陈士杰抽练马队1营400人。1891年后，福润再设步队2营800人。甲午战争时，山东练军共有3500余人，战后被李秉衡先后裁去1900余人。

江苏：1869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两江总督马新贻先后奏设练军8营4000人，以后逐次扩练，至1885年底达6930人。1891

年刘坤一再任两江总督后开始裁减，1897年后仅剩2960人。1900年一度恢复到4400人，翌年又被裁去1495人。

安徽：1870年，英翰任巡抚时开始设立练军，1885年达4320人，1887年裁剩为3042人。

广东：1870年，两广总督瑞麟奏设练军，至1875年时计有8营4000人，1879年编成步队10营5000人，另有水师练军数千人。甲午战争时期，广东水陆练军共达9850人。1898年被谭钟麟裁为1850人，义和团运动后全部被裁改。

江西：1870年，巡抚刘坤一奏设4营2000人（称为“选锋队”），1874年增至3400人。1883年被潘霨裁为1200人。1895年一度增为2100人，1897年再次被裁为1278人。

山西：1871年，山西巡抚鲍源深奏设马步3营1000人，1879年因山西旱灾，巡抚曾国荃奏准撤练。1885年复增至1400人，中日甲午战争时达4690人。1900年，当山西军务紧张时，新任巡抚锡良将太原镇标练军2营1000名改为防军。以后，其余各部被裁改为常备军和续备军。

湖南：1872年，湖南巡抚王文韶奏设练军2营1000人，其后基本保持此数。1903年以后，湖南练军逐年裁汰。

河南：1873年，河南巡抚钱鼎铭奏设练军步队4营、马队3营，合计2750人。此后，长期未再扩充。1902年，新任河南巡抚锡良裁去步队1营500人。1905年，巡抚陈夔龙又添练马队1营。翌年，全部练军改编为巡防队。

云南：1875年，云南巡抚岑毓英奏练7380人，次年被新任云贵总督刘长佑裁为12营4500人，1879年又添设2营750人。中法战争时，云南练军增至1万余人。战后，云贵总督岑毓英奏准易勇为兵，重新编组边关练军9600余人，至1888年更扩大到77营1.5万余人。1895年，新任云贵总督崧蕃奏裁一成，到1900年时仍存27营1.04万人。

黑龙江：1875年，黑龙江将军丰绅抽练在伍八旗兵和西丹兵丁共1万人，组成黑龙江练军。1880年，奉天、吉林边务初具规

模，署理黑龙江将军定安仿行之，从各城额兵、西丹中选练马队1000名（编为2营）、步队9000名（编为18营），马队常年训练，步队分两班轮换调操。1882年，将军文绪奏准将步队进行裁并，增加呼兰马队、兴安步队，共练马队3营1300人、步队8营3950人。1886年，负责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的穆图善在奉天、吉林编成练军后到达黑龙江，从西丹中选练4500人，立为“齐字营”练军。不久定安变通办法，东三省各省练军均减为3000人。后因边防吃紧，1890年黑龙江练有“镇边军”马步17营（约5500人），甲午战争中顽强御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1899年又练有“镇边新军”15营，次年在抗击沙俄侵略的战斗中做出了贡献。

四川：1876年，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奏设练军，至1885年有10营5000人。1903年川督锡良奏改为续备军。

陕西：1878年，陕西巡抚谭钟麟奏设马步14旗4200人，此后长期维持未变。1902年，巡抚升允奏改为巡警军。

贵州：1879年，巡抚岑毓英改勇为兵，以兵为练，共约1.6万余人。1898年，巡抚王毓藻奏裁为36营9000人。1901年经巡抚邓华熙裁并为24营7200人。1902年改编为常备军5营、续备军16营、巡警军3营。

广西：1880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设广西练军6营3000人。中法战争时期，巡抚倪文蔚等以广西军饷吃紧，奏明一律裁撤，战后又恢复原额。至1901年，广西尚有练军1400人。

甘肃：1883年，陕甘总督谭钟麟奏设练军马步26旗，次年成步队8旗2920人，至1885年马步共约3700人。

各省练军规模最大时的人数与绿营存营兵比较表

省　名	年　代	练军最大数目	同期绿营存营数
奉　天	1886	6250	*
直　隶	1900	18200	28500
福　建	1866	4200	31214

省　名	年　代	练军最大数目	同期绿营存营数
浙　江	1884	5000	22576
湖　北	1895	3800	15427
吉　林	1886	8000 余	*
山　东	1895	3500	12256
江　苏	1885	6930	25070
安　徽	1885	4320	10242
广　东	1895	9850	47340
江　西	1874	3400	11984
山　西	1895	4690	21252
湖　南	1872	1000	22823
河　南	1873	2750	13097
云　南	1888	15479	17532
黑龙江	1880	10000	*
四　川	1885	5000	29700
陕　西	1878	4200	19662
贵　州	1879	16662	16492
广　西	1880	3000	15723
甘　肃	1885	3700	26092
* 东三省制兵仅有八旗而无绿营。			

由上表可以看出：（一）各省练军的发展规模是极不平衡的，直隶最多时达 1.82 万人，而湖南仅有 1000 人。（二）多数省的练军是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发展到最大规模的，此后便开始逐渐裁减。据此可将练军的发展历史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同治初年至光绪初年为创建时期；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为发展时期；甲午战争以后为衰落时期。（三）各省练军的最大人数与同期绿营存营人数相比，贵州约为 1∶1，比例最高，其次为云南约 0.88∶1，再次为直隶约 0.64∶1。就全国各省的平均值而言，不到 1∶3，可见晚清练军数量与存营的绿营兵比较仍属少数。

四、练军的构成、装备与训练

练军士兵的主要来源有二：一是从绿营中抽选精锐，这是大多数省份练军士兵的基本来源，如直隶练军就从督标中抽选了马步 1950 人，从古北口提标中抽选了 2410 人，从宣化镇标中抽选了 1480 人，从正定镇标中抽选了 1754 人。二是“易勇为兵”，将勇营改编或招纳为练军兵丁，如云南、贵州两省的练军士兵就主要来自勇营，江苏、广西、直隶等省练军也收纳了部分勇营士兵。三是来自八旗，如东北三省的练军都是从八旗额兵或西丹中抽练的。

练军的官员来源与士兵稍有不同，来自勇营者多于来自绿营者。一般都以副、参、游、都、守等为营官，以都、守、千、把等为哨官，不分实缺与候补，但须久历战阵，熟悉营规，实际多是勇营出身。练军统领须由各省在职提督、总兵兼任，而晚清提、镇等官多由战功升迁，因此实际上也大部分出身于勇营。据对义和团运动时期直隶练军统领、营官的调查统计，在有记载可查的 39 人中，大部分都出身于湘淮军。①

晚清练军装备的主要特点是新旧混杂。各省在创设练军初期，基本都是以旧式冷热兵器为主要装备。刘长佑初定直隶练军营制时，拟每营装备洋劈山炮 16 门、开花炮 4 门（前装散弹）、抬枪 48 杆、鸟枪 112 杆、马枪（前装铅丸）32 杆、长矛 80 杆、弓 32 张、刀 56 口、藤牌 16 面，合计有 300 人使用火器，约占全营人数的 60%。这比曾国藩在咸丰年间所定湘军火器装备比例有所提高，但这个变化仍属旧式装备系列内部的变化。曾国藩改订的直隶练军营制，规定半数使用刀矛弓箭，半数使用火器，其火器比重反比“刘章”有所削弱。其它各省练军多仿效直隶办法，虽然

① 参见杨凤翰：《武卫军》第 309～323 页。

装备部分洋枪洋炮，但多数仍为旧式冷热兵器。

在各省练军中，建立初期即以近代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有：1868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登州所设的练军500人，一律装备洋枪，随同崇厚从天津派来的洋枪队训练。1869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设立的抚标练军2营1000人，主要使用洋枪和开花炮。直隶练军在天津教案发生前后开始改装近代枪炮，由于李鸿章高度重视，更新速度非常快，不到两年时间，保定、正定、大名等镇练军基本上都装备了洋枪。紧接着，由洋枪队改编的天津镇练军成立，共计4营3哨，中营为炮队，配洋开花炮30门，其余各营哨一律装备洋枪。到19世纪90年代前后，直隶练军又装备了新式毛瑟枪和克虏伯炮，成为当时全国练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江西练军于1874年有6营3000人装备了洋枪。贵州练军于1879年成立时即全部装备近代枪炮。云南练军也于1885年全部装备洋枪炮（其中有克虏伯炮和哈齐开斯连发枪）。河南、山西、湖北、广东等省练军在80年代以后，枪炮比例也逐渐加大。但就全国练军总的情况而言，直到甲午战争以后，也并未全部改装近代枪炮，多数仍是新旧装备混用，有的甚至一直以旧式冷热兵器为主要装备。

与上述装备情况相适应，晚清练军的操练也有两种类型。以旧式兵器为主要装备的练军，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操练方法。旧式操练除了按部颁阵图演习大阵分合进退之法外，各省还多实行湘淮勇营的操法。刘长佑在直隶规定练军以营为单位，集中筑垒团扎，每日按时集操，或打靶习技，或列队操阵。其阵有一堵墙、两翼阵、三才阵、四方阵、五形阵等。阵成之后再鸣号应敌，先发大炮，次放抬枪、鸟枪，最后以刀矛接敌。曾国藩为了训练士兵的吃苦精神和达到坚壁自固的目的，规定练军士兵要学习湘军拔营之法，每月一次，行二三百里，抵达目的地后，安营支帐，埋锅造饭，修垒浚濠。曾国藩强调："斯乃古来之常法，并非勇营之新章，终未可弃而不讲也"①。各省练军中或有仅仅装备少量近代

① 曾国藩：《再议练军事宜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881页。

枪炮者，除了练习瞄准打靶外，还要参加旧式阵操。以近代枪炮为主要装备的练军，则采用洋法操练。练军的洋式操练主要来源于淮军。丁日昌于 1869 年设立江苏抚标练军时规定，每日操演洋枪两次，暇时加演开花炮、洋火箭。他将洋人教练淮军洋枪操阵的方法绘图注说，编成《一哨操演图说》、《一营操演图说》、《一军操演图说》各一卷，作为江苏练军练习洋操的依据。据李鸿章奏称，上述各书的内容就是有关演练各种前装枪炮的口令、阵法，它同时为淮军所使用。① 李鸿章在直隶操练洋枪也是借用淮军的办法。他在直隶练军各营设立正教习 1 名、帮教习 4 名，全都从淮军中调派。其它各省练军学习洋操又多是参用直隶、江苏的办法，如 1871 年刘坤一就从直隶、江苏咨取教演枪炮阵图口令章程，刊发江西练军各营，并从江苏雇募谙练弁勇 5 名充当教习。当然，各省的操章并不完全一致，就是同属一省，各营练军的装备操法也不尽相同。同时，各省督抚和统兵大员对练军操练的认真程度因人而异，所以各省练军的操练效果各不相同，如湖南、湖北两省练军的操练就很差，"不过沿袭故套"，"有名无实"。②

制度不尽相同，规模大小不等，官兵构成不一，装备和操练也不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晚清各省练军的作战能力必然存在着差异。比较而言，直隶练军战斗力最强，其次则为云南、贵州、浙江、江苏、河南等省练军。

练军与同期存营绿营兵相比，战斗力无疑要高一些。因为清政府注重建立练军，不少绿营精锐被抽调，留营者渐少，且粮饷不足，训练又差，战斗力越来越低，自难与练军竞比。而练军在进行缉捕和镇压中小规模农民起义时，一般都是比较得力的。练军与同期的湘淮防军比较，战斗力也不甚悬殊。李鸿章布置北洋防务时，平时以淮军守海口，练军守内地各重镇，一旦形势紧张，练军也被大量调往沿海各重镇，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时期都

① 参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2，第 9 页。

② 《皇朝政典类纂》"兵四"，第 13 页。

是如此。在对外作战中，练军颇有能冲锋陷阵、杀敌致果者。如中法战争时的浙江练军，在镇海保卫战中表现较好。在抗击八国联军之役中，直隶练军大部参战，也表现出一定的战斗力，涌现出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迹。例如，在攻打天津租界以及保卫天津城的战斗中，总兵何永盛率所部练军 5 营 2000 人英勇作战，冲入日军炮兵阵地，俘日军 11 人，夺大炮 3 门。战事最激烈时，何部守天津西南城墙及城内各巷道，与联军巷战，营官余正清、宋春华皆以身殉国。但就全国练军进行考察，其对外作战能力还是不高的。除直隶练军外，其它各省练军都没有大规模地参加对外敌的作战。当前方战事紧张之时，清廷也曾下令从内地各省征调部队，而各省督抚往往以勇营防军相应，有时宁可临时招募勇营，也不调派练军，或者将练军改为勇营，然后再派其出征。① 偶有小规模的练军出征，亦多败逃。在抗击八国联军之役中，记名总兵江起龙率山西练军马队参加对通州的防守，“并未冲锋接仗，辄先逃回晋省”，所部弁兵“纷纷溃散，枪械子药大半无存”。② 总的来说，晚清练军的战斗力并未达到防军的水平。

五、练军制度的衰落

练军兴起后，清政府对其比较重视，通常以其驻守京畿各口和边塞要地，防守战略性交通枢纽。但练军也和八旗、绿营一样，日久无事，渐至骄惰，成为裁汰的对象。

甲午战争以前，各省练军偶有被裁者，但大规模地裁减是在其后开始的。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廷内外普遍感到练军、防军难当重任，纷纷要求裁减兵勇，更练新军。清廷也一再下谕要求各省裁减兵额，“汰除练兵冗数”。各省督抚更因财政紧张，兵饷

---

① 参见《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 14，第 9 页。

② 《锡良遗稿·奏稿》，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7 页。

无着，对裁减练军相当积极。从1895年至1899年，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广东、云南、贵州、甘肃等省先后各裁2500人以上，占当时全部练军的1/4弱。

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之役以后，清廷进一步认为练军战斗力甚弱，除继续下令大加裁减外，又于1901年9月谕令各省将防军、练军和绿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①。于是各省练军继续被裁，或被改编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巡警军。至清王朝灭亡前夕，仅有直隶等少数几省尚有练军存在，而且数量都不大。

练军被裁改，标志着练军制度的失败。其所以未能获得预期的成功，大致有如下原因。

从客观上讲，主要是受到财政困难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政府财政匮乏，兵饷多有积欠，各省在设立练军之初，无不为饷源无着而犯难。裁汰绿营与抽练练军并举，正是为了解决练饷问题。②可是绿营分汛设塘，有缉捕守护之责，未可多裁，腾出的粮饷有限。因此，各省只有另辟饷源，才能扩大其练兵的规模。直隶练军得天独厚，有部拨练饷60万两，所以它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其它各省往往因粮饷难筹，成营凑数，兵丁并未抽练；或因财政困难，中途撤练。有的督抚明知练军当用近代枪炮，由于经费困难，仍用刀矛、弓箭凑合。晚清全国练军达10余万人，每年约需粮饷近千万两，各省为之精疲力竭，可是以此数目而欲练成一支全国性的强大军队，是远远不够的。

从主观上讲，各省督抚敷衍塞责，提镇营官营私取利，也是晚清练军制度失败的重要原因。1870年两广总督瑞麟奏设广东练军，各营人数多少不等，畸零散漫，不能成军。后因各处缉捕巡防，纷纷调拨，以练丁为巡丁，以练饷为捕费，练军自然有名无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下同），（四），总第4719页。

② 参见《皇朝政典类纂》“兵三”，第3～4页。

实。许多提镇营官统带练军，往往缺乏兵额，冒支粮饷，对练军的操练并不认真讲求，一营练军中有时竟有数十人被派往衙署当差。因此，有些练军在由勇营改编来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经过几年“优游坐食”，遂与绿营无别，战斗力反比初时减弱。

此外，晚清练军制度失败的原因还在于制度本身并未得到彻底实施。练军制度的实质是绿营制度与勇营制度的结合。练军创始人“参制兵、营勇之制而用之”①，企图用湘淮勇营的某些办法来改造绿营，实际上是想“化兵为勇”。但各省练军借用勇营制度的程度大不相同，有的虽在形式上采用了勇营的规制，实际并未真正实行，或徒有形式而无精神。李鸿章等人主张“变易兵制，讲求军实”，所以直隶练军对勇营规制的借用比较认真，从营制、饷章、装备、训练到治军精神，都能移植，因而效果较好，达到与同期湘淮军不相上下的战斗力。相反，那些成效很小的练军，大都与其很少真正采用勇营的制度与精神密切相关。当然，勇营制度的本身也有不少缺陷，它不可能适应中国军事制度近代化的要求，难以担当起近代国防的重任。因此，练军制度的失败是必然的，尤其在新军出现以后，练军退出历史舞台就很自然了。

尽管练军制度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毕竟具有40余年的历史，并对晚清军制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晚清军制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兵到勇，再由勇到兵。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撇开绿营兵而另设湘淮勇营，增强了地方武力。但清廷始终视勇营为“权宜之计”，可暂不可久。于是，从同治初年起，又开始由勇到兵的发展进程。到20世纪初，以新军建立为标志，才算完成了这一发展过程。正如时人所言：“兵之穷变而为勇，勇之撤仍归于兵，此必然之势也”②。练军就是由勇到兵这后一个发展过程中的中间形态和环节。由于练军的建

---

① 张之洞：《筹改营制折并单》，见《张文襄公全集》，民国戊辰仲春刊本，卷8，第18页。

② 《皇朝政典类纂》“兵四”，第6页。

立，清朝的军制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大约40年间持续着兵勇并存的局面。练军对于勇营制度是一种抑制，起到了削弱勇营力量的作用。各省对勇营的大量裁汰以及“易勇为兵”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与练军的建立与发展有关。练军对于绿营制度是一种改造。一方面，它用湘淮勇营制度对腐朽的绿营制度进行了一次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它又给绿营制度注入了一定活力，使咸丰年间就已无法维持的绿营兵制以一种变化了的形态继续存在了40多年。

第二节　勇营的留防

一、防军产生的背景与经过

防军也称防勇、防营，以其驻防要地而得名。它不同于八旗、绿营和练军的驻防兵，后将其范围不断扩大，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乎将绿营以外招募的勇营都称为防军。

19世纪60年代以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统率的湘淮军不断发展，渐有代替制兵之势。曾国藩等人不仅手握军权，同时掌握了清朝部分财权和行政管理权，明显地形成一种举足轻重的地方势力，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面对这种外重内轻的局面，清廷在镇压大规模农民起义后，决定裁撤各地勇营，但事实上又很难办到。这除了遭到依靠勇营起家的某些督抚大臣的抵制以外，还有许多具体原因：其一，制兵未复旧额。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回、苗军起义过程中，清朝制兵被起义军打得溃不成军，缺额严重，而清政府财政枯竭，无力恢复制兵，所以各省在镇压农民大起义过后，制兵存营人数多不及原额之半，单靠他们难以担当“弹压地方”之责。其二，练军又不得力。清政府为了提高制兵的战斗力，希图以湘淮勇营的某些办法改造绿营，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建立练军制度。但如前节所述，这一改革成效甚微，练军同样不

可能完全代替勇营。其三，缺少遣散勇营的经费。裁勇首先要偿还欠饷，而各省勇营欠饷甚多，或数百万两，或数千万两，清政府无力筹措，只能逐渐清还，陆续遣散。其四，已遣散的勇营不安于乡里，威胁着清朝的统治。散勇归乡，生活无着，或聚众闹事，或加入会党与官府为敌。清统治者对此深为不安，不得不对裁撤勇营持慎重态度。其五，列强威胁日重。在制兵未复，练军又不得力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保留一部分勇营，以增强抗击外敌入侵的能力。

在农民大起义过后，国内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逐步暴露，中央政权与地方实力派、满族权贵与汉族督抚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几经争斗，清朝最高统治者终为客观形势所迫，不得不做出让步，保留部分勇营驻防要地。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868 年以前，仅有少数省份提出留勇驻防问题；1868 年以后，经过畿辅防守问题大讨论，始成定论。

1862 年，清政府同意曾国藩的建议，确定将湘军水师改为长江经制水师，实际上开创了勇营留防的先例。此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裁勇练兵”之议，清廷也一再强调募勇系一时权宜之计。1864 年 7 月，河南巡抚张之万更提出“练兵代勇，裁勇养兵”① 的主张。江宁将军富明阿则奏请于“军务肃清”后用屯田办法安置散勇。② 清廷便抓住时机，迅即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乔松年、吴棠等人妥筹章程。一向办事谨慎、深恐朝廷疑忌的曾国藩不得不顾及清廷的态度，感到湘军势在必裁，所以在攻陷太平天国天京以后，立即表示要大量裁撤湘军。不久，广东佛山等处连续发生由苏州回乡的散勇进行抢劫的事件，番禺等处则有散勇千百成群，纠众攻打花埭情事。③ 清政府感到不宜急于撤勇，立即令曾国藩慎重从事，指出“裁撤兵勇一节，虽为节饷起

① 《清实录·穆宗实录》(三)，第 320 页。

② 参见《清实录·穆宗实录》(三)，第 286 页。

③ 参见《清实录·穆宗实录》(三)，第 395 页。

见，然骤撤至三四万人，恐此辈久在戎行，不能省事，必致随处啸聚为乱。从前川楚善后，积至数年方始肃清，可为殷鉴。不若先汰老弱，而以精壮各军分赴江楚，俟江楚一律肃清，再议裁撤归农，或挑补各营兵额，俾不致复生枝节，方为尽善”①。8 月 21 日，曾国藩奏称：“与臣弟国荃商定，将金陵全军五万人裁撤一半，酌留二万数千人，分守金陵、芜湖、金柱关各要隘，其余作为游击之师，进剿广德等处”②。酌留二万数千人分守金陵等处，事实上成为勇营留防的先声。同年 9 月 23 日，李鸿章在《陈明苏省兵饷片》中提出：“臣军暂守境土，如一两月后贼无回窜信息，当分别裁撤，酌留洋枪炸炮队三万人，以备海防而资控守”③。这是李鸿章对曾国藩勇营留防意见的附和。1865 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奏称：“左宗棠率师入闽以后，其留存浙省及分防各府县要隘者，水陆马步楚军约计万人，湘军合计一万七千余人”④。1866 年左宗棠奏称：“酌留（楚军）水陆各营分驻闽省上下游”⑤。可见左宗棠也是赞成勇营留防的。

应该指出的是，湘军由于暮气太深，曾国藩还是遣散了大部分。太平军余部与捻军汇合后，湘淮军又投入了镇压捻军的战争，真正留防各地的勇营还是少数。这表明防军能否确立，当时尚难断定。直到 1868 年西捻军失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勇营留防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才算有了定论。

这次讨论是由安徽巡抚英翰建议清政府酌留勇营驻扎畿辅和安徽、山东、河南各地引起的。在讨论中，对勇营留防安徽、山东、河南、直隶问题没有反对意见，清政府也明确表示同意，而

---

① 《清实录·穆宗实录》（三），第 402 页。

② 曾国藩：《近日军情拟裁撤湘勇片》，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 663 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7，第 29 页。

④ 《马瑞敏公奏议》，光绪二十年闽浙督署校刊本，卷 1，第 7 页。

⑤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20，第 6 页。

争论多、分歧大的是客勇留防畿辅问题。

1868年8月22日，安徽巡抚英翰在“善后章程”各条中提出：“一请裁撤直隶练军，另选精锐，以卫畿辅也。查直隶创练六军，原以备缓急之用。惟练军平日所习者，不过操演阵式，从未经临大敌，猝遇紧急，一无足恃，似可裁撤归伍，畿辅重地，另简精兵，以资拱卫，为长驾远驭之计。查淮、皖、豫各军，精锐可靠，臣愚以为，可就此数军内选择劲旅一万八千人，仍分为六军”；“一请酌留皖省防兵，以靖地方也。查剿捻之军，皖勇居其大半，一经遣撤，以皖人回籍者为最多。非独皖军皆颍亳人也，即如淮军初起之时，勇皆募自六安、合肥，今则颍亳之人十居其七，豫军亦十居五六。而各军收降之众，又皆系皖北土著，安插既定，尤非以重兵镇之不可。应请于皖军内挑留一万二千人，分为四大枝，每枝三千人，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分驻要地。……其东、豫两省应行酌留兵勇镇抚地方，亦请饬下东、豫两省抚臣一并察核办理具奏”。①清廷深感勇营留防问题事关重大，便发布上谕说：“英翰奏善后章程各条，其请撤直隶练军留勇扼扎一节，都兴阿、左宗棠、李鸿章、官文俱久历戎行，目睹畿辅情形，崇厚在津年久，亦深知其得失，即著该大臣等会商良策，以昭核实。皖省应留重兵……自系权宜办理。李鸿章籍隶皖省，都兴阿亦久在江南，情形自必熟习，并著会商复奏。其东、豫两省应如何酌留兵勇镇抚地方之处，著丁宝桢、李鹤年一并妥筹奏明办理”②。

8月27日，直隶总督官文首先复奏说：“直隶为京畿屏翰，不可不求自强之计。……与其留客兵而别开生面，莫若循旧制而汰弱留强”。“保定、河间、正定等处，拟即于本省各勇队内择其精强、素经行阵者酌留数营，分扎东西大道”。在直、东、豫三省交界处则“酌留客兵数队，俟留驻一半年后，察看地方情形，再行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317，第23～25页。

②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317，第28～29页。

分别办理”。① 显然，官文基本上不同意英翰的意见。他主张直隶自强，不借助外省的帮助，但同意留一部分本省勇营驻防，并在省边地区暂留少数客勇。

8月28日，盛京将军都兴阿复奏，不同意英翰关于裁撤直隶练军而代之以南勇的意见，主张改造练军，但同意在山东、河南等地留勇驻防。

8月31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复奏说：“至淮、皖各军，百战之余，原皆精锐可用，但南北人情迥异，此次南军北上，与民间几成仇衅，若将大枝勇队留于直省，必致民不相安”②。崇厚反对英翰关于用南勇拱卫近畿的意见，但建议选择本省勇营“留镇要隘”。

9月2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毛昶熙奏称：“畿辅紧要，宜派久经行阵之武职大员，自率所部驻扎近京一带，以壮声威而固根本。查直隶提督刘铭传，谋勇兼优，威望久著，其所部勇丁，亦皆素娴纪律，可否饬该提督迅回本任，并带所部万人留直驻守。”③

9月9日，左宗棠复奏说：“直隶武备究不可荒，今拟概行裁撤，无论额兵情颓意涣，难望振作有为，窃恐因觖望而耦语纷呶，难于禁约，此练军未宜尽撤之实情也。远军入卫近畿，虽与唐代府兵之意略同，然彼用制兵，此用募勇，制兵多有身家，募勇半无根著，客兵与土著杂处，难保耕市无惊，且一万八千人分为三路，每路各设一统将，无论用非其材，难资钤束，亦恐彼此未能和协，贻误机宜，是客军未宜久驻直隶之实情也。……至练军未经更定之先，各军概经裁遣，直隶须得劲军，为缉捕枭匪、游勇之用。本任提督刘铭传战功久著，在淮军中纪律颇严，应否饬下该提督精选六七千人，驻扎保定、河间之中，暂资弹压，责成该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318，第27～29页。

②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319，第8页。

③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319，第9页。

提督将练军归其整理，俟练军有效，即将该军陆续裁撤。”① 左宗棠不同意英翰的意见，他建议整顿直隶练军，在“练军未经更定之先”，由本任提督刘铭传精选所部铭军六七千人驻扎保定、河间之中，“暂资弹压”。

同日，李鸿章奏称：“臣愚以为，兵丁之不得力，非独直省为然，盖由绿营习气太深，兵丁大半骄惰，将弁又不一心。……目下军事大定，勇丁逐渐裁撤，各省绿营必须及时整顿。畿辅拱卫，关系尤重，若专用本省兵勇，人地自较熟悉，防务亦可经久，惟须将领得人，认真简练耳！”他还声称：淮军“久役思归，若留驻北方，勇与民素不相习，久亦未必相安”。李鸿章明确表示不同意英翰关于裁撤直隶练军而留客勇驻防畿辅的意见，但赞成留勇营驻防安徽之颍亳宿蒙、江苏之徐海、山东之曹沂、河南之归汝等地。②

11 月 13 日，神机营王大臣等对历时近 3 个月的讨论作出总结，奏称：“臣等谨就各该大臣所议，互证参观，非特留勇有弊，即练军亦未尝无弊。然天下无无弊之事，要在明其弊之所在，可治与不可治，能经久与不能经久，而别择以定其指归。留勇之弊，各大臣固已言之凿凿，而犹有未尽者。……臣等公同商酌，英翰所请留勇扼扎一节，应毋庸议。至练军一事……英翰谓其有名无实，洵属不诬，然前此练尚未成，不妨再加精核，尚非终不可用，且亦未能舍六军而别求奇策。……惟是练军有利亦有弊，知其弊而设法整顿，即是经久良图。……现在大学士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于练兵一事责无旁贷。……应请饬下曾国藩于履任后，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部臣会议练兵各条暨刘长佑推广变通办法，左宗棠、李鸿章等现议各节，斟酌损益，悉心筹画，妥议举行。直隶甫经安定，土匪游勇恐未绝迹，练军未成之先，直隶、山东、河南各交界应否暂拨勇队扼扎，统由该督一并酌定，奏明办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319，第 25～27 页。

②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319，第 27～29 页。

理"①。清廷接受了这一建议，谕称："英翰所请留勇扼扎（畿辅）一节，著毋庸议。……此时贼匪既平，亟应将前定练军章程从新整顿。曾国藩久谙戎事，应如何因时变通之处，著于到任后详慎妥筹。……倘因直境甫就敉平，毗连东、豫一带应暂拨勇队，以资弹压，一并由该督斟酌奏明办理"②。

曾国藩于1869年2月27日奏称："直隶近岁以来，北有马贼，南有教匪，东南与齐省接壤，则枭匪出没之区，而降捻游勇，亦多散处其间。伏莽堪虞，一旦窃发，旬日啸聚，动以千计，非有数千劲兵，星速剿捕，即恐酿成大变，此内患也。其无形之外患，陕回现尚猖獗，宣化固宜严为置防。洋务虽曰安恬，天津亦宜暗为设备。综计数者，必须练兵二万有奇，乃足以敷调遣。目下刘铭传一军万余人，驻扎张秋。该军精劲冠时，应请敕下李鸿章即以铭军长作拱卫京畿之师。……此外尚须练兵万人，或专就原议之六军调省城而合练之，或兼用湘淮之营制募北勇而练之"③。曾国藩主张留淮军刘铭传部长期拱卫京畿，实际上肯定了英翰关于酌留勇营驻扎畿辅的建议，这与他几年前欲留湘军驻扎金陵、芜湖等要隘的想法是一致的。清廷在直隶练军未成的情况下，为了畿辅地区的安全，被迫准其所奏，使勇营留防之制成为定论。

二、各省勇营留防情况

如前所述，在勇营留防大讨论中，对客勇驻扎畿辅问题争论激烈，而对勇营留防各地并无大的分歧。清政府也一再下令地方督抚妥筹具奏。于是，军务肃清的省份纷纷复奏酌留勇营驻防各地。

山东：1868年9月11日，巡抚丁宝桢奏称："东省武定、东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320，第25～28页。

②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320，第29～30页。

③ 曾国藩：《略呈直隶应办事宜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867页。

昌、临清三府州与直境毗连，素为盐枭教匪出没之所；而曹、沂两属接壤豫、徐，又为幅匪、长枪会匪所伏匿。数年以来，经臣随时剿办，渐就安谧。当此巨寇初平，若无兵勇镇压，恐难免奸民煽惑之虞。臣拟将东军各营于月内渐次清撤，酌留七八千人，分驻武、东、曹、沂各属，借资镇抚，仍随时查看情形，如地方日久相安，尚可依次遣撤。"①清廷表示同意，令其将所有善后一切事宜"迅速筹办，实心经理"。不久，丁宝桢再次奏称："陆续撤去三十八营，现在尚留二十营，以资分布镇压。其利捷水师各营，亦经裁撤，因本年黄水泛滥，濮范水套向不安静，必须弹压，臣酌留炮船二十只，令其前赴该处梭巡。……仍令王心安、刘时霖等分扎东昌、临清各属，王正起分扎济、武各属，莫组绅分扎武定各属……。至济宁一带，现有藩司潘鼎新所部（鼎字营淮军）移扎该处，俟该军将来酌定撤留后，臣再当酌匀一二营前往分扎"②。

河南：1868 年 10 月 17 日，巡抚李鹤年奏称："臣伏思捻股荡平，库款正当支绌，各项勇丁自应亟为遣散，以归撙节。惟查豫境毗连七省，西路现尚设防，直、东寇患甫平，民气未复，各省遣散勇丁，率多皖产蒙亳，素称强悍，尤须慎固边陲，居中控驭，仍不能不借资兵力。因与宋庆、张曜等再三筹议，除提臣马德昭六营已赴潼关防所，候补道段广瀛精锐四营已经裁撤外，拟于嵩武、毅字两军内挑选归并，各留十营，共计二十营，酌令宋庆驻扎归德府，张曜驻河南府，分资控扼，其余马步各起，概行裁汰"③。

安徽：1868 年 12 月 6 日，巡抚英翰奏称："皖省留防各军，除郭宝昌卓胜军业已统带西征外，现经挑留既定，应即择要分扎。查皖北凤颍一带，风俗强悍，蒙亳尤为捻匪故巢，既派重兵弹压，尤贵人地相宜。臣与吴坤修商酌，分饬程文炳、黄秉钧、牛师韩、张

---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319，第 38 页。

② 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 6，第 15～16 页。

③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320，第 13～14 页。

得胜四军分驻亳州、宿州、颍州、三河尖四处，徐登善、方长华所部分扎凤台、太和一带。……至水师炮船，亦均令各认地段，分泊淮、沙两河，上自豫境，下至洪湖，往来梭巡，以期有备无患”①。

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勇营留防事宜，已奉命筹办于前，至此清廷只好照准。

江苏：湖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马新贻、江苏巡抚丁日昌与直隶总督曾国藩等会商之后，于1868年12月31日奏称：“通筹大局，佥以淮勇只可酌裁，不可尽撤。各省经粤捻诸逆扰攘几二十年，艰苦经营，始克奏绩。现在兵氛甫靖，而降众散勇无业可归，会匪游民时虞勾结，若非慑以军威，实不足以资镇抚。臣等公同筹酌，铭军马步人数较多，纪律素严，暂令臬司刘盛藻统带驻扎河北东昌、张秋一带。曾国藩以直隶练军尚未定议，北路不宜太空，俟履任有期，再行酌核办理。济宁居南北要冲，潘鼎新所部仅留七营两哨驻防，该藩司到任后，随时禀商山东抚臣相机酌办。江苏徐州毗连东、皖、豫边界，土匪出没无常，最为重镇，除该镇弁兵分汛巡防外，所有马步勇队四营，仍嫌单薄，拟暂留提督吴长庆步勇八营、马队三营，会同徐州镇道择要驻扼。又苏境沿江千余里，伏莽殊多，空虚尤甚，拟令道员段喆俟撤遣就绪，带勋字两营分要扼扎，与长江水师联络巡缉，稍壮声威。金陵为东南关键，城大兵单，现经曾国藩留湘勇三营驻防城内。臣鸿章拟留总兵刘玉龙开花炮队一营，仍扎下关江口，均交臣新贻等酌量调遣。臣鸿章将赴湖广本任，该省居上游四战之地，游匪肆行，防勇尚未尽撤，非有重军驻守，难资钤制，拟将提督郭松林裁剩步队五营，总兵周盛传裁剩步队九营、马队三营，并亲兵枪炮队二营，调令随往，如江皖稍有蠢动，即调回策应，以顾全局”②。清廷表示同意，发布上谕说：“李鸿章等奏，分别遣撤留防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320，第30～31页。

②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320，第34～36页。

各军，所筹均属周密。李鸿章以湖北为四战之地，游匪尚多，拟带郭松林等裁剩各营前往，借资镇慑，如江皖稍有蠢动，仍可调回策应，自系老谋深算，且沿江一带难保无游勇滋事，亦可以资弹压，即著照所请行。以上留防各军，马新贻、丁日昌均当相度机宜，随时酌量调遣，务令地方安敉，永绝乱萌。”同时明确指出：“各营本食苏饷，自应仍由苏省供支，著马新贻、丁日昌分别筹解，源源接济，毋令缺乏。俟善后事宜大定，再由李鸿章等酌度情形，次第裁撤，以节饷需”。① 此后，淮军分防于直隶、山东、江苏、湖北等省，成为留防勇营的大支。

贵州：1872 年，贵州苗民起义将败，8 月 16 日，巡抚曾璧光、提督周达武奏称：“下游各军尚有二万七千数百名。苗疆甫定，营伍未复，非重兵不能镇抚，而境内跬步皆山，硐深林密，更恐搜剔未尽，拟酌留精兵一万五千名，分扎沿途大道及紧要地方，以资镇定。……上游兴义府城，经总兵何世华等约会滇军克复，惟新城孤巢未下，无须再议添军。所有下游各营，一俟协饷解到，即酌撤一万二千数百名，以节糜费”②。1875 年，新任巡抚黎培敬奏称：“总计通省留防营勇，为数已二万五千有奇”③。次年，黎培敬全面规划防务后奏称：“通盘筹算，除省城重地驻扎复字、平字各营由臣操阅，以资镇压，提臣驻守安顺，自带亲兵一营，亦可随时策应。此外，上游则以统领玉字营四川候补道刘岳曙总管兴义、普安各防营，以督带平字营提督陶茂林专管大定各防营，以督带和字营提督毛际惠专管遵义各防营。下游距省城较远，应以署贵东道易佩绅总办防务，各营均归节制调遣，并派候补道罗应旒会同襄办，联络楚军搜捕伏莽，举办保甲团练。其各营将弁由臣严饬振刷精神，相与更始。一俟欠饷清给，保甲办妥，再行体察情

---

①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 320，第 36～37 页。

② 《钦定平定苗匪方略》卷 36，第 20 页。

③ 《黎文肃公（培敬）遗书·奏议》，清光绪十七年湘潭黎民刊本，卷 3，第 3 页。

形，或撤练归农，或改勇入伍，庶几后患可弭，而军务全清矣”①。

甘肃、新疆：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户部奏请裁减新疆勇营，清廷令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与陕甘总督谭钟麟、甘肃布政使杨昌浚悉心会商，将关内外现有马步若干营，如何裁减，迅速酌核，奏咨办理。谭钟麟奏称："臣当即咨会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酌夺办理，并往复函商关外，当合金顺、张曜两军通盘合算，酌定撤留。臣锦棠以金顺一军现将拔驻伊犁，交涉纷纭，百废待举，张曜一军驻防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系极边要隘，均难遽撤。湘楚各军，北路自哈密至精河，驻防三千里而遥，南路自哈密至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处，驻防七千里而遥，地势袤延，兵单不足分布。现拟于乌什、叶尔羌、阿克苏等处裁减三四营，而找发欠饷需银二十余万两，关内外同时并举，窃恐饷项不敷周转。……关内马步防勇二万余人，臣钟麟与臣昌浚再四斟酌，先将辅字营五百人、开字营三百人遣散，其余酌量防地之广狭疏密，改旗者十四营，共裁勇丁二千六百余名，各营减去伙勇一千四百余名，合计正勇、伙勇四千余人，应找发饷银十万余两，系将欠数最少者先行裁汰。现存防勇十二营二十八旗，马队十二起，尚有欠饷一百四十余万之多，欲再裁而饷 力不继，只能随时酌遣。……臣揣度关内情形，如西宁、河州、平凉、固原、秦州等处，番族回族及安插之众，种类各别，性悍难驯，一旦将防营全撤，专恃制兵，恐不足以资镇压。臣拟将现存之勇陆续裁减后，酌留防勇三十旗、马队数起，分布要地，合计勇饷兵饷较甘省原额饷数不甚参差，三五年内撤一旗勇，增一营兵，庶饷力可行，而营制得以渐复。”② 关外新疆勇营留防情况，1883年刘锦棠奏称："现在微臣所部共只马步六十营旗，约计二万五千余人。上年（1882年）冬间，臣曾函商乌鲁木齐提臣金运昌，就所部卓胜

① 《钦定平定苗匪方略》卷40，第6页。

② 谭钟麟：《裁减关内营勇并酌留防营情形折》，见《谭文勤公奏稿》，清宣统三年刊本，卷9，第3～4页。

军酌量裁并。现拟先裁步勇四营、马勇两营，并分行湘楚各军将领，视其防务稍松、兵力略厚者，先撤马队四营、步队两营。”①至该年5月止，刘锦棠所部防勇计有马步队行粮48营旗、坐粮10旗，实存额设弁勇2.3517万名、额外营哨官150名、额外伙夫460名、额外长夫马夫1.1765万名。

上述各省均为太平军、捻军、苗军、回军起义地区，事后，各省为形势所迫，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勇营驻防各地。其它一些省份，或为了支援邻省，或为了保卫本地，也编练了数目不等的勇营，事后，也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部分驻防要地。

湖南：湖南为湘军发源地，曾不断派出湘军增援各省，事后留防勇营较多。1871年，湖广总督李瀚章奏称："保卫地方之法，莫善于清查保甲、分设防营两端。……查省城内外，现扎总兵于高胜、长沙协副将韩殿甲所带锐右、巡防等营兵勇二千三百余人。省城附近之平塘、金盆岭及省东之醴陵、茶陵，省南之湘潭、永州、道州、安仁暨省西之安化、益阳等处，已饬贵州补用道李光燎将所统锐中等营勇三千余人，择要分扎。西北之常德、龙阳、沅江等处，已饬提督王永章所带振字营勇一千三百人，分扎巡防。西南之衡州、宝庆、宜临一带，现有直隶委用道杨澍、候选知府颜锡蕃、候选同知魏鼎薰分带广武、宝安等营勇一千余人，分别扼守。至水路要隘，洞庭湖及沅江等河，系长江水师汛地，原有炮船分驻，其内河上游之靖州、辰州、常德一带，则有总兵周礼濂、知府吴大安、都司刘斌所带水师船勇一千二百余人，下游之省河岳州、湘益澧安等处，则有副将陈海鹏、参将廖楚胜、黄德、游击罗德煌所带水师船勇二千二百余人，衡永河内则有副将廖德茂水师船勇五百余人，节节分巡。似此水陆各处棋布星罗，即偶有土匪窃发，征调既便，剿办亦易，不致蔓延为患"②。

---

① 刘锦棠：《遵旨复陈裁撤营勇并挑选标兵改坐粮折》，见《刘襄勤公奏稿》，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下同），卷3，第24页。

② 《合肥李勤恪公政书》，清光绪末年石印本，卷5，第23～24页。

湖北：湖北为四战之地，勇营留防较多。1872年，湖广总督李瀚章奏称："湖北地当冲要，从前军兴傍午，水陆营勇不下六七万人。迨发捻荡平，防务渐松，经各前督抚臣陆续遣散多营。……目前鄂省防营，步队则有忠义八营、升字三营，共七千九百余人，水师则有健捷等营，大小炮船二百四十号，共三千七百余人。……其湖北提臣郭松林所统武毅步队五营、马队二营，计四千二百余人，现扎襄樊，系直隶督臣李鸿章旧部淮军，饷归后路粮台发给，不在楚军之列。统计鄂省防营，为数虽尚不少，然陕甘回氛犹炽，贵州苗逆未平，各路军营勇丁过境者络绎于道，深恐游勇混杂勾结土匪滋事，湘省会匪伏莽时虑蠢动，必须择要扎营，方足以资镇压"①。

江西：江西为太平军长期活动地区，有客勇湘军长期驻扎，故本省勇营较少。1868年，巡抚刘坤一奏称："江西自肃清以后，共留水陆兵勇一万三千有奇，嗣经陆续酌裁千余人，留防尚属逾万。盖以地方辽阔，界于闽粤湘鄂皖浙六省之中，四境时虞风鹤。如同治五、六年，捻逆屡扰湖北黄、麻，九江即须设备。……而本省之义宁、万载、永新、铅山等处，各匪徒亦不时萌动，筹防筹剿，无岁无之。兼以游勇络绎过境，劫杀频仍，地方刁民，动辄抗官拒捕，在在均需巡防弹压。……请俟明岁开正以后，拟将陆勇祥字营再撤一千三百人，仍留一千五百人，以为吉、南、赣、宁有事调遣；其昌字、藻字、衡勇等营，各撤二百人，仍各留三百人，与亮字营三百人共成一千二百人，以备省城左近数郡随时派拨。……至于水师，则将江军、内河两军所有船身颇大、人数较多之长龙，一律裁撤，余亦酌撤数营，仍留三千余人，配带舢板、飞划，分布东西两河，以资巡缉。统共水陆各勇，裁撤六千数百名，酌留五千数百名。"②

---

① 《合肥李勤恪公政书》，清光绪末年石印本，卷5，第34～35页。

② 刘坤一：《筹议来年裁减防师添解陕甘协饷折》，见《刘忠诚公遗集·奏疏》，清宣统元年刊本，卷5，第33页。

四川：四川幅员辽阔，勇营留防势在必行。据四川总督丁宝桢奏称："查咸丰十年川省军兴以后，节次招募勇营，虽时有裁减，亦时有增添，大抵裁者少而增者多。至同治七、八年，共计楚、黔、川勇多至六万余名……嗣经前督臣吴棠斟酌情形，陆续裁撤，截至光绪三年止，仅存营勇一万五千余名"，或驻省城，或扎内地各要隘。①

陕西：为镇压陕西回民起义，陕西曾大量招募勇营，事后留防的也不少。据陕甘总督谭钟麟 1878 年奏称："查陕省用兵日久，库款奇绌，饷力本属难支。……惟关外军务虽已底定，而散勇游匪往来充斥，防营尚未便悉予裁撤，且自三年办赈后，各营饷项未能按期开支，积欠累累，容俟库款稍能周转，即当陆续遣撤。现在合计省城抚标、城守、延绥、陕安、汉中镇标各营，仁胜、律武两军，尚存马步勇丁一万八千三百八十八员名，又延、榆、绥、鄜、邠五府州属城防勇丁二千四百五十八员名，渭南上涨渡、咸宁草滩、华阴三河口、咸阳等处，看守水师炮船勇丁一百五十二名，连前统计，官弁马步勇丁长夫二万零九百九十八员名。"②

山西：太平军、捻军先后攻入山西，客勇纷纷涌入，西捻军失败后，陕西回民起义方兴未艾，亦须筹防。据陕西巡抚李宗羲 1869 年奏称："查已革臬司陈湜所部十七营均已遣撤回楚，沿河一带经前署抚臣郑敦谨照会太原镇总兵王巨孝派带南镇官兵一千六百余名填扎河保等处，并留精锐忠字两营防守。……惟自吉州之龙王讪以迄河津之禹门渡，每届冬令冰结成桥……已饬署臬司李庆翱赶紧招募晋勇四千，立为八营"③。次年，张树屏又招募淮军新树字 6 营，驻防河曲等地，山西全省留防营勇合计 8000 余名。

广西：广西会党十分活跃，太平天国失败后，会党纷纷退至中越边境，冯子材率部追剿，1873 年基本肃清，清廷下令收兵，以

---

① 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清光绪二十二年刊本，卷 19，第 2 页。

② 谭钟麟：《查核各营勇丁数目请缓裁撤片》，见《谭文勤公奏稿》卷 6，第 23 页。

③《开县李尚书（宗羲）政书》，清光绪乙酉年刊本，卷 5，第 4 页。

防为剿。据巡抚刘长佑奏称："越南海（阳）、太（原）永告肃清，前经臣等遵奉谕旨，会商旋师，以防为剿，臣子材即将全军就防简汰，挑留精壮四千名，并作十营。……随调挑留之镇、柳中左右三营，回扎关外驱骡、文渊、芃封等处，选字左右两营、捷字一营，回扎关外索红、大岭、通携等处，以备援应，英字左营、常胜右营及勇字、立字两营于龙州、归顺州择要分扎，以资镇防，均交总兵刘玉成统辖调遣节制。……至督办边防候补道覃远琎，前据禀报，行抵太平府城，即饬元字中右两营分驻镇安要隘，专防保乐白苗，新胜一营分驻归顺，专防越南铁厂、大岭各隘，新中、新前、新右三营分驻下冻、凭祥各土州，专防镇南、平而、水口各关，新左一营分驻土思州，新字捷勇一营分驻下雷土州……覃远琎自率新后与亲兵两营往复警巡，兼资策应。……此防剿越南各军裁并布置……之实在情形也"①。又据巡抚马丕瑶后来奏称："兵燹后，伏莽未净，时有窃发，内地（防勇）向有水师五营，陆军十八营"②。

据统计，19世纪60年代末期，全国防军共约20余万人，其中湘淮军将近一半，是防军的骨干力量。

各省防军大致情况表

省份	年代	约计人数	主要成分
浙江	1865	27000	楚军、湘军、新湘及亲兵
福建（含台湾）	1866	5000	楚军
广东	1866	5000	楚军
直隶	1868	18000	淮军铭字营
山东	1868	13700	淮军鼎字营等

① 刘长佑：《驱除西隆等匪裁并越南防军折》，见《刘武慎公遗书》卷13，第77～79页。

② 《马中丞（丕瑶）遗集》，清光绪二十四年马氏家刊本，"奏稿"卷1，第20页。

省　　份	年代	约计人数	主　要　成　分
河　　南	1868	13000	毅军、嵩武军
安　　徽	1868	12000	淮　　军
江　　苏	1868	9750	淮　　军
贵　　州	1875	25000	楚军等
甘肃、新疆	1882	49000	湘楚军、嵩武军等
湖　　南	1871	11600	锐右巡防营等
湖　　北	1872	15800	淮军等
江　　西	1868	5700	祥、昌、藻、衡、亮字营
四　　川	1877	15000	楚、黔、川勇
陕　　西	1878	20998	仁胜军、律武军等
山　　西	1870	8000	淮军新树字营、晋勇等

防军属于地方性的军队，它独立于制兵之外，是清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妥协的产物。它的存在，对清王朝的统治存在着某种威胁，所以清朝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裁撤防勇，加强制兵。

1873年，清廷曾下令"改勇为兵"，云南巡抚岑毓英积极响应，所以云南当时无防军。然而，两江总督李宗羲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则极力予以抵制。李宗羲奏称："改勇为兵一节。查滇省兵额久未募补，勇丁全系乡民，或者因地制宜尚易措置，至各省情形迥不相同。溯自东南肃清后，议者咸谓改勇为兵，则兵丁皆已熟娴战守，勇丁不致游荡无归，似属两全之道，不知兵与勇判然两途，其情各不相属，其势断难强同。兵则向系土著，勇则招自他省，此主客之不同也。兵则分设塘汛，数极畸零，勇则合驻营盘，气皆团结，此聚散之不同也。兵则常有护饷、押犯、缉捕等差，不能时时操练，勇则专习枪炮、刀矛、盾牌各件，必须日日练习，此勤惰之不同也。以上各节种种不便，若欲改勇为兵，即使勉强从事，恐收效甚难，而流弊更多。臣尝谓养兵养勇各有利弊，大率承平之世利用兵，艰难之时利用勇。自粤匪倡乱，捻回继起，各省改兵募勇已感积重难返之势，今日改勇为兵，恐有缓急难恃之虞。此各营勇丁碍难改为额兵之实在情形也。……目今各省勇丁

只宜减而不宜撤，或就防勇最多省份酌减一二成，以节縻费，其余应俟海疆无事，内地大定后，再行从容裁撤，熟筹安插之方。……其绿营未足之兵额，不必遽行募足，以冀稍节饷需”①。显然，李宗羲的上述奏请，其意在于以勇代兵。但清廷决心并未动摇，此后又不断下令裁减防勇。如：1875 年 7 月，“户部奏请将各直省留防兵勇酌量裁汰，从之”②。1878 年 6 月，清廷又批准兵部、户部议奏，同意“于文到一月内迅将所有防勇陆续裁汰，以半年为限，统裁十成之一”③。1880 年 3 月，清廷发布上谕：“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营，设立各局，原属权宜之计。事平以后，留防各营迭经谕令裁减。现在水陆勇数尚多……除直隶、陕、甘等省须办边防，云南、广西营勇无多，均无庸议减外，其余各省将军督抚，务将该省勇营详细斟酌，大加裁减。某处裁去几营，某营归并某营，即令分晰具奏。”④

由于清政府再三下令裁减防勇，全国各省防军数量逐渐减少。但当列强加紧侵略我国边疆，民族矛盾上升时，防军人数又有所增加。如 1880 年中俄伊犁问题交涉期间，沙俄对我国施加军事压力，清政府被迫布防，两江、直隶和浙江、广东等省防军人数均有增加。清廷还发特旨，令早已称病乞归的湘军老将鲍超编练霆军马步 27 营共 1.3 万余人，驻防直隶乐亭一带。⑤ 另外，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东三省也建立了防军。总之，各省防军人数依形势变化而变化，各个时期均不相同。据兵部、户部统计，1898 年时，全国各省防、练军共计 36 万余人，岁需饷银 2000 余万两。“其后绿营兵屡加裁汰，各省卫戍之责，遂专属于防、练军。光绪中叶后，防、练军改为巡防队。光、宣之间，又改为陆军。至宣

---

① 《开县李尚书（宗羲）政书》卷 6，第 38 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 90 页。

③ 转引自《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2，第 21 页。

④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 861 页。

⑤ 参见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 1100 页。

统三年，各省巡防队犹未裁尽也。”①

三、防军的营制、饷章与装备、训练

防军非国家制兵，分别隶属于各省督抚或统兵大臣，故无统一的营制饷章，而是各自为政。同治年间（1862～1874年），各省防军营制饷章大体沿袭湘、淮军旧制。马步队均以营为单位。步队每营505人（营官在外），另有长夫180人；马队每营277人（长夫在外）。勇丁日给银1钱4分，伙勇1钱1分，长夫1钱。各省视当地物价和本省财政收支情况，略有出入。一省之中因成军时间不同，虽同属一个派系，饷章也各有差异。至光绪年间（1875～1908年），由于财政困难等原因，清廷多次下令裁减防勇，各省执行情况不尽相同，以致防勇的营制变得复杂起来。

甘肃关外新疆防军，仍沿袭左宗棠的楚军营制，既有营的编制，又有旗的编制。步队每营以500人为定额（营官、副哨官、长夫在外），计有正哨官4员、什长38名，亲兵60名、护勇20名、正勇336名、伙勇42名，外设长夫188名；每旗以370人为定额（副哨官、长夫在外），计有旗官1员、正哨官3员、什长28名、亲兵40名、护勇15名、正勇252名、伙勇31名，外设副哨官3员、长夫123名。马队每营以250人为定额（伙夫、长夫、马夫在外），计有营官1员、正哨官4员、副哨官4员、先锋5名、领旗20名、亲兵20名、护勇16名，马勇180名；每旗以125人为定额（伙夫、长夫、马夫在外），计有旗总1员、哨官2员、先锋4名、领旗11名、亲兵27名、护勇8名、马勇72名。②

两江总督刘坤一于1897年奉旨裁减防勇，将江南一部分防军改行旗制。“凡每营五百人者，一律改营为旗，按营裁去前后二哨，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3931页。

② 参见《刘襄勤公奏稿》卷5，第44～45页。

共裁勇丁二百十四人，只留中左右三哨，仍沿旧制，中哨七十二人，左右二哨各一百七人，外加管带官一员、哨官二员，合计每旗二百八十九员。……各该营原设长夫一百二十名，减去五十名。……至苏州留防各军，为数本属无多，臣(赵)舒翘与臣坤一往返电商，饬将苏防五营及沪军一营，每营各裁勇丁一百名，长夫二十名，共裁勇夫七百二十名，按哨挑选匀汰，营制悉仍其旧。"①

除营制、旗制之外，广东、湖北等省还有所谓"底营"之制。"凡所改之底营，系以二百五十人为一营，五十人为一哨，营哨各官照常留用，惟勇丁及伙勇、长夫概裁其半"②。

值得提出的是，防军营制中出现了近代兵种炮营的编制。淮军自 1863 年建立炮营以后，不断扩充，至 1871 年，淮军铭字、盛字及亲兵中已建立炮队 19 营。随后，左宗棠统率的楚军和驻防江南的淮军庆字营、湘军合字营、新湘军等也陆续建立了炮队营。北洋淮军炮队营的编制，李鸿章系"仿照德国营制，参酌淮军向章量加变通"③，每营炮六尊，平时每炮一车，六马拉之，另炮目坐马一匹(具体编制详见第七章第二节)。江南炮队营，据刘坤一奏报，系"仿照淮军改编，章程量为变通，凡统领五营以中营专操炮队者，前后左右四哨每哨分练六尊，照章给炮二十四尊，教习辛工洋七十元。如统领五营分营操练者，每营四尊，给炮二十尊，教习辛工洋六十元。统领四营分营操练者，亦每营四尊，给炮十六尊，教习辛工洋五十元。均每尊照章月给炮费洋四元。……挑选炮队，只就原营训练，并不另募勇丁。"④防军建立炮队营，特别是江南炮队营的建立(中营专操炮队，其它营仍操枪队)，具有重大意义，反映出步马炮兵之

① 刘长佑：《酌裁兵勇折》，见《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 27，第 24 页。

② 张之洞：《调募各营次第裁竣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41，第 24 页。

③ 李鸿章：《创办克鹿卜炮车马干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9，第 7 页。

④ 刘长佑：《湘军新旧各营改编炮队片》，见《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 20，第 54 页。

间的配合更趋紧密，已开始向合成军队过渡。

防军营制的另一变化，是个别地区出现了水陆兼习的编制。189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实际情况出发，变通营制，建立水陆兼习的防军，实现了胡林翼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主张。他奏称："查鄂省水陆交冲，均资控驭，陆勇需用固多，而荆州、宜昌地据上游，最为吃重，南则重湖浩渺，北则襄河绵长，伏莽均多。长江、襄河虽有水师，然系按汛分驻，地阔船稀，不能多有移调。……惟有变通营制，为水陆兼顾之举。现拟将新募勇丁，令其水陆兼习，编为三营。每营设长龙船一号，每号勇丁二十名；舢板二十号，每号勇丁十三名，以四号为一哨，分为五哨；每船设哨官一员；每营设领哨官五员、营官一员。三营设统领一员，因系水陆兼用，统领未便兼带中营，应另募亲兵四十名。……合计三营共勇丁八百四十名、亲兵四十名。"①

各省防军营制因地制宜，略有不同，但饷章变化不大，只是有的省份仿效绿营之制，在平时实行《坐粮章程》，如甘肃省在军务肃清以后即将一部分防勇改行坐粮。步队营官月支薪水银50两照旧，而公费银由月支150两改支40两，哨官由日支薪粮银3钱改支2钱4分，什长由日支口粮银1钱6分改支1钱3分，亲兵、护勇由日支口粮银1钱5分改支1钱2分，正勇由日支口粮银1钱4分改支1钱1分，伙勇由日支口粮银1钱1分改支9分，长夫由日支口粮银1钱改支8分。马队营官月支薪水银50两，公费银80两照旧，哨官由日支薪粮银3钱2分改支2钱4分（原月支杂费银1两2钱停支），先锋由日支口粮银2钱改支1钱4分（月支杂费银6钱改支1分），领旗由日支口粮银1钱6分改支1钱3分（月支杂费银6钱改支1分），亲兵、护勇由日支口粮银1钱5分改支1钱2分（月支杂费银6钱改支1分），马勇由日支口粮银1钱4分改支1钱1分（月支杂费银6钱改支1分），伙夫由日支

---

① 张之洞：《添募勇营变通营制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1，第17～18页。

口粮银1钱1分改支9分，长夫由日支口粮银1钱改支8分，每匹马由日支草干银1钱改支8分。①而驻江南的湘、淮军和北洋的淮军则仍照原来的章程发饷，但欠饷情况比较严重。

防军存在的30多年间，正处于洋务运动时期，各省陆续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新式武器，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各省军队的需要，仍不得不继续以高价从国外购进大批武器装备。由于各省自行与外商订购，以致规格式样参差不齐，给训练、作战带来极大的不便。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各省防军使用的武器仍非常庞杂，既有前膛枪，也有后膛毛瑟、黎意、马梯尼、林明敦、哈齐开斯、士乃得等。据当时外国人统计，“中国所用的来福枪就有十四个不同的种类”②。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士兵使用鸟枪、抬枪和刀矛等旧式武器。大体上淮军及北洋防军装备近代化程度较高，楚军次之。淮军及北洋防军在中法战争前已完成了以后膛枪代替前膛枪的换装过程。1884年1月，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查西洋火器愈出愈精，同治初年敝军在苏沪与洋兵合力剿贼，其时洋人与我军所用者皆系前门枪炮，尚无后膛名目，然淮军平粤捻率借此项前门枪炮之力，而各省兵勇仍持抬枪、线枪，自谓无敌也。中原肃清以后，兵事既少，讲求利器更甚少过问，是以二三宿将沿袭制梃挞兵之旧说，执而不化，疆吏阃帅相与惜费因循，未遑考究。而西洋军实日新月异，各国尽改用后膛新式枪炮，操练精熟，中国若为弗知也者，殊为愧叹。鸿章每与西将及出使诸君探访讨论，略知端倪，逐渐购置，近年所部各营一律操用克虏卜、阿摩士庄等炮，云者士得、哈乞开思（亦译哈齐开斯）、毛瑟等枪”③。其中驻天津小站的盛字营淮军，“利器足与西洋相埒，遂为各省防军之冠”④。“湘军营坚战勇，而于洋式军火，

① 参见《刘襄勤公奏稿》卷5，第44页。

② 〔美〕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见《洋务运动》（八），第466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5，第23页。

④ 李鸿章：《查复盛庆两军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17页。

每多不屑深求”①，直至中法战争，有些部队仍沿用旧式枪炮和刀矛。②

防军的思想教育，30多年间未发生大的变化，但在军事技术的教练上却有了明显的改进。

防军思想教育的内容仍然沿袭湘、淮军思想教育的内容，以“忠义”为中心，即教育官兵为朝廷勇敢作战，做“忠臣义士”，将来可以“封妻荫子”。1871年周盛传编撰的《盛军训勇歌》，要求官兵做到：第一莫结哥老会，第二切莫闹粮饷，第三切莫出怨言，第四切莫混出营，第五切莫吸洋烟，第六切莫贪嫖赌，第七技艺要勤操，第八同伴要和好，第九买货要公平，第十你要学礼貌。最后说：“兵勇照我十条行，到处传出好声名，荫子封妻皆有分，只要大家肯归正，班师奏凯罢远征，同沐皇家雨露恩”③。1880年，鲍超招募新勇，对霆军官兵“亲加训练，教以忠义，以作其敢死之气”④。鲍超对勇“平日训以义命，谓既受国家豢养之恩，义当效死。命当生，虽亲冒矢石仍生，命当死，虽退缩不前仍死”。“凡训一人，教之临阵各自奋勇，毋计同队之若何。训一队，教之各自奋勇，毋计同哨之如何。以至为哨为营为军，皆自挟其可恃而毋恃人，则无所牵待而心一矣！”⑤ 直至1899年刘坤一在整顿江南防军时，仍坚持“忠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每接见各将领，必恭述诏旨严切，宵旰忧劳，勖之以忠义，晓之以利害，务须加紧训练，悉成劲旅”⑥。这类思想教育，无不反映了防军的封建性

---

① 张之洞：《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1，第25页。

② 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下同），（四），第221页。

③ 《周武壮公遗书》“外集”，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下同），（一），第52页。

④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021页。

⑤ 《霆军纪略》卷14，第7页。

⑥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407页。

本质。

19 世纪 60 年代，由于各省防军装备均以旧式刀矛、土枪、土炮和少量的洋枪相间搭配，所以军事技术的操练，仍沿袭湘、淮军成法，如扎营、行队、接战、练胆、练心、练耳等等。连近代化程度较高的盛字营淮军，当时也仍用旧法操练。《盛军训勇歌》中有：

“第七技艺要勤操，操了矛杆又操刀。

洋枪磨得明晃晃，耀眼金光如雪亮。

早晚两次不可少，进退连环打得巧。

平时操得好刀枪，免得临事上阵慌。

任他冲突我不怕，贼匪自然难招架。”①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沿海沿江各省防军陆续采用洋枪洋炮，军事技术训练内容发生了显著变化。李鸿章在淮军改装洋炮后即聘有洋教习，后来马步炮各营均改练德操。盛字营统领周盛传曾发布一系列条令，如《操枪程式》、《操枪章程》、《严定枪程谕》、《严操悬靶谕》等，对枪枝保管维修、枪药存储、操练手法及打靶要诀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操枪程式》十二条，经李鸿章批准在北洋各军中推行。李鸿章称：“盛军弁勇于西洋后膛枪炮，用法尤极娴熟，足为各省防军之冠”②。中法战争以后，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认识到：“今日行军要务，如施放各种后膛枪炮、鱼雷、水雷，以及测绘地图、建造各种炮台、急就土垒、行军电线、安设地雷、修整军器诸事宜，将士皆当通晓。……查各国武备，近以德国为最精……故军事需用西人，惟该国人尚为可信，当经电致出使大臣李凤苞与德国海部密商，选派艺优性稳之德弁四员（即雷芬、郎概、赖格、马驷）……分别派充各项教习”③，教

---

① 《周武壮公遗书》“外集”（一），第 51 页。

② 李鸿章：《周盛传丁忧开缺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3，第 48 页。

③ 张之洞：《雇募德弁片》，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11，第 26～27 页。

练广胜军。这是广东防军聘请洋将教练洋操的开始。江南防军也纷纷改用洋枪，进行西式操练。内地各省防军装备陈旧，故军事技术训练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如四川总督奎俊于1899年奏称："川省僻处偏隅，与沿江沿海省分情形迥别，防营勇丁向习中国阵法，从未讲练洋操"①。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江南自强军、北洋新建陆军练洋操颇有成效，清廷乃于1898年发布上谕称："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著。惟须选教习以勤训课，核饷力以筹军实。现在天津新建陆军、江南自强军，均系学习洋操，北省勇队，著由新建陆军酌拨营哨之学成者分往教练，南省则由自强军酌拨。营规口号，均须一律。各直省将军督抚，统限六个月内将并饷练队及分扎处所妥议复奏"②。此后，一些内地省份如陕西、湖北、四川等省防军亦普遍练习洋操。不过，诚如张之洞所言："向来各省所习洋操，不过学其口号步伐，于一切阵法变化应敌攻击之方，绘图测量之学，全无考究，是买椟而还珠也"③。

由上不难看出，防军的军事技术训练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善，逐步由中国传统型向西法操练过渡。在学习西法过程中，一般多注重队列及施放枪炮技能的训练，对战术训练则注意不够，各省统兵大员多拘泥于湘、淮勇营旧法，按照阵图操演。淮军则比较地注意了散兵战术的运用，如周盛传称："近日西洋军火猛利，若成紧队，则枪炮所及，伤损必多，故必须用散开行走法"④。防军战术训练另一不足之处是注重合练不够。因为防军仿效湘、淮军以营为建制单位，营以上无固定编制，以致战术训练局限于一营数百人之内，而无几个营相互协同的训练，这势必给作战带来极大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386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098页。

③ 张之洞：《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8，第2～3页。

④ 《洋务运动》（三），第628页。

的危害。之所以如此，缺乏这方面的军事人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早就认识到培养新式军事人材的必要性。左宗棠于1874年就指出："泰西新式(武器)愈出愈奇，以此角胜取利。……战阵之士多系粗才，难望其细意研求，用其所习"①。1885年李鸿章说："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② 各省防军高级将领多系文员出身，中下级军官则多出自行伍，勇丁多系农民或无业游民，素质较差。为了提高官兵的军事技术，李鸿章从70年代开始便采取措施：一是派淮军将弁出国学习；一是在国内设立军事学堂，聘请外国教习，讲授西洋后膛各种枪炮、土木营垒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各法。张之洞也在广东和江南陆续设立陆师学堂，培养军事干部，对防军军事素质的提高同样起了重要作用。

四、防军的衰落

各省勇营留防要地之后，不久即有人反映防军日渐腐败。1875年，曾先后充当过曾国藩、李鸿章幕僚的薛福成即指出："今之勇营已稍不如前矣。若使积年屯驻，不见大敌，久而暮气乘之，又久而积习锢之，恐复如绿营之不振"③。1880年，淮军将领、湖北提督郭松林奏称："咸丰以来，军事迭兴，全资义勇平贼。厥后因制兵难期得力，不得不暂留防勇，以备征调之用。今内地安谧有年矣，无用之兵，帑藏既归虚掷，有用之勇，流弊又复渐生，一有事故，无以应敌，大局将虞决裂，诚不可不亟为筹画也。"④ 为

---

① 左宗棠：《与总理海防沈幼丹大臣》，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20页。

② 李鸿章：《创设武备学堂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3，第42页。

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64页。

④ 《湖北提督郭松林奏折》，《洋务运动》(三)，第513页。

此，他建议清政府整顿防军。其后，又不断有人揭发防军弊政，诸如统领营官不理营务，克扣粮饷等。1881年有人揭发称："周盛传、周盛波所带盛字营克扣干没米盐等物，悉由该统领转贩分派各营领受，勇丁含怒蓄怨，群思得而甘心。又吴长庆、唐定奎等军刻待勇丁，分驻江南一带，鼓噪时闻"①。由于居功自傲，将骄勇惰，防军哗溃之事时有发生。以大支留防淮军为例：1869年，潘鼎新所部鼎字营索饷，鼓噪于东徐交界之韩庄；1872年，刘铭传所部武毅铭军戕害营官于陕西乾邠一带；1877年，周盛传所部盛字营哗溃于天津小站；1880年，吴长庆所部庆字营调驻山东，行至清江，一哄而散。此外，防勇纪律不严，特别是淮军纪律之差，更是人所共知。如1882年吴长庆率部赴朝代平兵变，纪律松弛，"奸淫掳掠，时有所闻"②。

总的来看，各省防军在中法战争以前即已日趋衰落。1881年7月，清廷曾发出上谕称："各省防军岁需饷项甚巨，著各督抚统兵大臣，将所部各营，严行稽核，选派得力将弁管带，随时申明纪律，汰弱留强，俾成劲旅。倘有不加训练，不讲营规，虚报空额吞蚀口粮诸弊，一经发觉，定即重惩。"③ 中法战争以后，防军情况更糟，因而清廷又多次发出上谕要求整顿防军。1889年11月，清廷谕称："近闻营中恶习，往往虚冒额数，克扣饷项，统领营官养尊处优，并不时时操练，一切废弛情况，几与从前绿营积弊相等，殊堪痛恨。著各该将军督抚将该省现有各营随时验查，如有前项情弊，即行严参治罪"④。至中日甲午战争时，防军在前线大多数一触即溃。淮军"盛军则平时威德不行，士卒不服，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杀之不止，责其统将亦徒涕泣伏罪。

---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260页。

②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民国三年铅印本（下同），卷1，第5页。

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1118页。

④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668～2669页。

是该军虽有如无，尚须防其骚扰，非重加整顿不可临敌。……总之，防营平时废弛大抵皆然，一经战队，官则惊惶失措，勇则四散奔逃，不独盛军然也。”① 战后清政府虽饬令各省防军练习洋枪洋炮，但收效不大。八国联军进犯津京时，北洋防军一再败北，溃不成军。为此，浙江巡抚恽祖翼、江西巡抚李兴锐等人建议清廷改革军制。1901 年 9 月，清廷发布上谕：“前因各省制兵防勇，甚为疲弱，业经通谕各督抚认真裁汰，另练有用之兵。……著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②。此后，各省防军和练军一样，或进行洋式操练，编练新军，或被改为常备军、续备军，不久又多被改为巡防营（队）。

五、防军的作用与历史地位

防军从产生到被改编为巡防营（队）为止，一直是清朝的临时武装。光绪年间修纂的《大清会典》“兵部”并未收录防军的情况，足以说明它一直处于制兵的辅助地位。事实上，防军虽非经制之兵，但其战斗力却远远超过了八旗、绿营，是晚清支撑国防的主要武装力量。如 1874 年日本派兵侵略中国宝岛台湾，李鸿章奉命派驻防江苏徐州的淮军武毅铭军 13 营前往台湾备战，扎于凤山一带。“凡台南防抚事宜，屹然倚以为重，于是南去凤山三十里进营东港，以援前驻枋寮台军，直刺桐脚倭营之冲”③。日本侵略者“外怵公论，内慑兵威，乃渐帖耳就款”④。在中法战争中，广东、广西、湖南等省防军在冯子材的正确指挥下，取得了镇南关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三），第 187 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 4718～4719 页。

③ 《续修庐州府志》，清光绪十一年冬刊本，卷 100，第 6 页。

④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第 10 页。

大捷，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鉴于防勇在中法战争中发挥了较好作用，战后清廷不再一意裁撤勇营，有人则提出应该裁减额兵。1885 年 10 月 5 日，清廷发布上谕："各省勇营靡费甚巨，已钦奉懿旨，令各将军督抚汰弱留强，核实办理。惟向来撤勇一事，流弊滋多，不可不谋之于豫。且此次撤勇，固贵节省饷项，移作要需，尤在整饬营规，练成劲旅。"① 不难看出，镇南关大捷为防军的继续存在提供了转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聂士成等率领淮勇防军防守辽东摩天岭一带时，也创造了不朽战绩，粉碎了日军于奉天度岁的狂妄计划，其历史作用也是不容抹煞的。除了参加过反侵略战争外，防军还参加了镇压各地人民起义的行动，起了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作用。可以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 20 年间，中国陆军主要是防军的时代，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从军制角度来看，防军的不少制度优于当时的制兵，清政府在改造制兵时吸收了防军特别是湘、淮军的制度，所以防军起到了推动制兵改造的作用。1873 年，两江总督李宗羲曾从主客、聚散、勤惰等方面阐述了勇营与制兵的区别，指出"兵与勇判然两途"。1875 年，薛福成上奏，在指出绿营的种种弊端之后称："绿营之不可复恃者，时势然也。自楚军淮军相继并起，勇丁月饷，倍于绿营之战兵，其得力尤在法令简严，事权专一。自统领以至营官什长，莫不情意相洽，谊若一家，而又可撤可募，随募随练，用其方新之气，故能奋建殊勋。"② 综合时人看法，防军制度具有如下优点：其一，防军集中驻防，集中训练，革除了绿营兵的分散性和散慢性；其二，防军以募兵制代替世袭兵制，提高了兵员质量；其三，防军饷章待遇较制兵优厚，利于士兵安心服役；其四，防军事权专一，法令简严，提高了指挥效能；其五，防军继承了勇营的层层挑选制度，官兵关系较为密切，避免了绿营兵将互不

---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 2007 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 64 页。

相习的弊端。正因为如此，防军的战斗力较制兵有了较大提高。也正因为如此，一些督抚非但主张以勇代兵，而且建议参照防军之制。如收复新疆以后，谭钟麟函商刘锦棠称："改勇为兵，仍当束以防营之制，令其团扎一处，以便训练征调。"① 1886 年刘锦棠奏称："新疆自遭回乱，迄乎底定，十余年来，所恃以防卫地方者，皆为客勇。边疆瘠苦，勇丁远从征役，饷糈难以骤减，至今犹发行粮。揆以度支有常，勇非经制，原应改设制兵，以规久远。然他省之勇，势不能强使为本地之兵。再四思维，惟有因勇设标，以官带勇，先设定员缺，以期渐就规模。臣锦棠于光绪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具奏遵旨统筹新疆全局折内，请将标营员弁参用勇营章程，如副将作营旗官，即以中军都司为总哨，千、把总、经制外委为正副哨长；参将、游击作营旗官，即以中军守备为总哨，千、把总、经制外委为正副哨长；都司、守备作营旗官，即以中军千总为总哨，把总、经制外委为正副哨长。经部臣议奏，奉旨允准"②。可见防军之制对制兵的影响是不小的。此外，防军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练军所采用。如 1869 年曾国藩在整顿直隶练军时奏称："惟养勇虽非长策，而东南募勇多年，其中亦尽有良法美意，为此间练军所当参用者，臣请略言数端：一曰文法宜简。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则编籍入伍，伺应差使，讲求仪节，即有一种在官人役气象。及其出征，则行路须用官车，扎营须用民夫，油滑偷惰，积习使然。而前此所定练军规务，至一百五十余条之多，虽士大夫不能骤通而全记。文法太繁，官气太重，此当参用勇营之意者也。一曰事权宜专。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

---

① 转引自《刘襄勤公奏稿》卷 4，第 57 页。

② 刘锦棠：《新疆应设抚标及城守等营员缺拟办情形折》，见《刘襄勤公奏稿》卷 11，第 53 页。

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近年江楚良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材，纵横如意，皆由事权归一之故。今直隶六军，统领迭次更换，所部营哨文武各官，皆由总督派拨前往。下有翼长分其任，上有总督揽其全，统领并无进退人材、综管饷项之权，一旦驱之赴敌，群下岂肯用命？加以总理衙门、户部、兵部层层检制，虽良将亦瞻前顾后，莫敢放胆任事，又焉能尽其所长？此亦当参用勇营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今练军之兵，离其本营本汛，调入新哨新队，其挑取多由本营主政，新练之营官不能操去取之权，而又别无优待亲兵、奖拔健卒之权，上下隔阂，情意全不相联，缓急岂可深恃？此虽欲参用勇营之意，而势有所不能者也。”① 曾国藩坚持以防勇制度对直隶练军进行整顿，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

防军制度虽有一定优越性，但其缺点也是较为明显的。其一，防军源于勇营，系由地方督抚大员招募成军，兵随将转，私属性极强。尽管有事权专一之利，但就全局而言，并不利于集中指挥。皇帝虽有调拨指挥军队之权，但各省督抚出于自身的利害，往往各行其是，影响最高决策的贯彻执行。同时，相互之间互不统属，势必影响战场上的协同。其二，防军基本建制单位为营，上设统领，所统营数并无定额，少者仅数营，多者十数营数十营不等，既不利于平时训练，又不利于战时指挥，特别是需要集中兵力进行大兵团作战时，更难于做到相互配合。其三，防军实行募兵制，对保证兵员质量有利，但由于长期驻防要地，不募不撤，无法更新，承平日久，“方新之气”锐减，暮气渐增。加之士兵受雇而来，使

① 曾国藩：《复议直隶练军事宜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874～875页。

命感不强，爱国心不切，打起仗来必然积极性不高。且平时未实行后备兵役制度，战时仓卒招募成伍的新兵，缺乏训练，临阵往往一触即溃，有类乌合。其四，防军设有营务处，类似今天的司令部，其规模依任务而异，并无定额，少时二三人，多时十余人。这种无固定编制和明确分工的参谋机构，对平时训练和作战指挥都是不利的。其五，防军后勤机构不健全。防军承湘、淮军制，设有粮台，在粮饷发放方面依靠统领、营官层层主持，往往层层克扣，勇丁怨声载道，自难期其继续效命疆场。在武器供应方面，更是上下全无章法，各自为政，新旧相杂，型号各异，给供应、作战带来极大困难，甚至造成坐失战机，导致战争失败。

上述种种弊端，正是防军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也是晚清同光之际实行军制初步改革未获成功的症结之一。当然，清廷自始至终把勇营之留防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从未真正从军制改革的高度去改善和发展防军制度，这更是防军之制最终失败的症结所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充分暴露练军、防军均不足恃，这才使清政府中某些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在军事制度上有一个根本的变革，于是，战后纷纷条陈时务，要求更练新军。此后，中国近代军事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防军之制也和练军之制一样，退出了军事历史舞台。

第十四章　收复新疆的战争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激化，对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1865年1月（同治三年十二月），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军事头目阿古柏① 在英国支持下，率兵侵入新疆，不久自立为“汗”，建立反动政权，实行殖民统治。1871年7月，沙俄出兵侵占伊犁地区（今伊宁市一带）。我国领土新疆面临被肢解侵吞的危险。1876年7月至1878年1月（光绪二年六月至三年十一月），清军在左宗棠的正确指挥下，逐灭阿古柏侵略军，收复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参见附图19），接着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外交谈判，向沙俄索还伊犁地区，从而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侵吞我国西北领土的阴谋，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一节　边疆危机与塞防、海防之争

一、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强占伊犁

19世纪下半叶，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列强争夺世界殖民地的斗争空前激烈。在远东地区，英、美、俄、法、德、日等国加紧侵略朝鲜、越南等国，进而侵略中国，使我国边疆地区进一步出现了危机。其中，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和争夺中国领土新疆，对我国西北边疆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

① 阿古柏（1820～1877），真名穆罕默德·亚库普，浩罕国安集延人，塔吉克族（一说乌兹别克族）。

英国于1849年完成其吞并印度的计划以后，急于向北扩张，企图占领中亚，并妄想把我国新疆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俄国也极力争夺世界霸权。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遭到失败，它企图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受挫，遂把扩张的矛头转向中亚及中国东北、西北地区。1858～1864年（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俄国先后胁迫清政府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领土140多万平方公里，并进而企图侵吞我国的新疆。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古称西域，为中国通向中亚的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全境四面环山，天山由西向东横亘中部，形成准噶尔、塔里木两大盆地。新疆以天山山地为中轴，分为南、北疆。南疆（南路）气候干燥，终年少雨，沙漠居其大半，人口聚居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富饶地区，主要城市有喀什噶尔（今喀什市）、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统称南疆八城。北疆（北路）气候湿润，多雨雪，水草丰盛，农业发达，主要城市有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玛纳斯、伊犁（今伊宁市西惠远）、塔尔巴哈台（今塔城）等。哈密和吐鲁番盆地一带习惯上称为东疆（东路），为通往内地的咽喉要道。

新疆幅员辽阔，约占我国总面积的1/6，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塔塔尔、锡伯、达斡尔、满、蒙、回、汉等10多个民族。同治初年，新疆人口约100余万，其中维吾尔族约占2/3。居民以畜牧业为主，羊、马、牛为大宗，骆驼次之。由于民族习惯、宗教信仰不同，各种矛盾较为复杂。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之后，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宣布西域改名新疆。3年后，清政府在伊犁设将军，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管辖。

1864年（同治三年）夏，在各族人民起义特别是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地区爆发了回、维吾尔等族人民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大规模起义，先后占领了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玛纳斯、库尔喀喇乌

苏（今乌苏）、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由于起义的领导权多被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把持，逐步改变了起义的性质，他们乘机实行封建割据，为了争夺地盘而进行混战，有的甚至不惜勾结外国侵略者，引狼入室，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当时，新疆地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封建割据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和卓（黄和卓）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妥得璘）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马福迪、哈比布拉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迈孜木杂特政权；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金相印、思的克政权等。

1864 年秋，金相印、思的克等因久攻仍由清军坚守的喀什噶尔汉城（今疏勒）不下，遂向中亚的浩罕国① 请兵援助，并要求浩罕统治者把匿居于该国的新疆宗教贵族首领的后裔布素鲁克送回，到喀什噶尔为王。浩罕摄政王阿里姆·库里为排除政敌阿古柏，遂派其率军以“护送”布素鲁克为名，于 1865 年 1 月侵入我国新疆。阿古柏进入喀什噶尔回城疏附（今喀什市）后，赶走了思的克，夺取了统治权。同年 4 月，阿古柏派兵攻占英吉沙尔。9 月，又用重金收买困守喀什噶尔汉城的清军绿营守备何步云，全部占领喀什噶尔。次年秋，阿古柏侵略军攻占叶尔羌。年底，用阴谋手段诱杀哈比布拉而占据和阗。英勇的和阗维吾尔族人民进行了顽强的反抗，“甚至连妇女们都采用各种器具武装起来，同他们的丈夫一道并肩战斗”②。1867 年，阿古柏逼走布素鲁克，自称“毕条勒特汗”（意为“洪福之汗”），并悍然宣布成立“哲德莎尔国”③。同年夏，阿古柏率军东侵，攻占了乌什、阿克苏、库车、库尔

---

① 浩罕（又作霍罕），中亚三汗国之一。它是 18 世纪初乌兹别克人在费尔干纳盆地建立的封建汗国，首都为浩罕城，信奉伊斯兰教，与新疆喀什噶尔有密切商业往来。1864 年，俄国向中亚扩张，于 1876 年将浩罕吞并。

② A·H·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俄文本第 141 页。转引自《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第 3 期第 94 页。

③ “哲德莎尔”，意为七城，故“哲德莎尔国”又称“七城汗国”。七城说法不一，一般指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一说有喀喇沙尔而无乌什。一说有喀喇沙尔、吐鲁番而无英吉沙尔、乌什。

勒等地。1870年,阿古柏军先后攻占了达坂城、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妥明投降。后又袭取了玛纳斯。阿古柏在其占领区内划区置官,俨然以全疆统治者自居。

1873年秋,陕甘回民起义军首领白彦虎逃到新疆,不久在吐鲁番投降了阿古柏,为虎作伥,更加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

阿古柏为了镇压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除积极扩充其常备军外,还在各地组织团练。其军队总数达四五万人,主要由骑兵(称“吉杰特”)、步兵(称“沙尔巴兹”)、炮兵(称“托普奇”)组成,此外,还有一部分抬枪兵。轻武器主要有火绳枪和燧石枪,以后换装了一大批撞针枪及部分连发枪。炮兵主要使用克虏伯和阿姆斯特朗等较先进的火炮。这些武器主要来自英国,一部分来自俄国。阿古柏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还在各要地修筑了许多城堡。其兵力部署大致如下:

喀什噶尔4800人,叶尔羌及英吉沙尔4000人,和阗3000人,阿克苏1200人,库车1500人,库尔勒2200人,达坂城900人,吐鲁番1.85万人(其中团练1万人),托克逊6000人,乌鲁木齐6000人,山地卡伦及各地城堡2000人。总计约5万人。

阿古柏的军队就武器装备来说还是比较精良的,骑兵约占1/3,因而火力和机动能力较强。但兵卒多数为强征入伍的农牧民,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不同,战时很难协同一致。由于欠饷严重,部队纪律很坏,特别进入寒冬季节,御寒衣物及燃料供应不足,士气低落,逃亡现象时有发生。

阿古柏侵入新疆后,深感力量不足,急欲寻找主子,为其撑腰。英俄两国则都想利用阿古柏达到侵占新疆的目的,因此极尽拉拢之能事。抢先下手的是俄国。早在1866年,俄国就和阿古柏私订“协议”,约定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并可入境追捕逃犯等等。1868年,俄国又先后派遣使者和军官至喀什噶尔,要求阿古柏步中亚诸汗国后尘,向沙俄称臣纳贡,以便把新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的贪欲,引起了阿古柏的猜忌,于是他转而靠拢英国。同年夏,阿古柏派人到印度旁遮普谋求英国援助。接着,

英国驻拉达克官员沙敖以旅行者身份窜到喀什噶尔，向阿古柏赠送来福枪等“礼物”，加紧相互勾结。1869年，阿古柏又派人去印度接受了英印总督给予的一大批枪支弹药。1870年，英国以外交部官员道格拉斯·福赛斯等为特派使团，携带女王维多利亚的亲笔信至喀什噶尔，由于阿古柏正率军进攻吐鲁番而未相遇。不久，阿古柏派人前往印度“答礼”，双方关系更加密切。

俄国害怕英国插手新疆，又担心阿古柏进军北疆对己不利，遂积极图谋用武力强占伊犁地区。当时，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上奏沙皇，“列举各种理由，说明必须对伊犁进行占领，以保障边境安全和对抗阿古柏的意图”①。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沙皇的批准。

伊犁是我国西北边陲重镇，位于伊犁河谷中心，为通往中亚交通要冲，亦是新疆西部联系南北两路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870年秋，俄国派兵控制了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谷，侵占天山穆札尔特山口，扼住伊犁通往南疆的交通要道，同时派兵占领了博罗呼济尔(赛里木湖西)，对伊犁形成夹击之势。1871年夏，考夫曼以科尔帕科夫斯基为“伊宁远征军”长官，率兵近2000人向伊犁地区大举进犯。伊犁人民与俄国侵略军苦战50余日，给敌以沉重打击。俄军兽性大发，几将该区维、回、汉等族人民“剿杀一半”②。由于粮尽弹绝和割据政权上层人物的叛降，伊犁九城③先后失陷。同年冬，俄国侵略军从伊犁东侵，企图夺占乌鲁木齐。其先头部队伪装成商队，行至玛纳斯以西的石河子时，被

---

① 茨楚勒：《土尔克斯坦》第2卷，第168页。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1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3，第31页。

③ 九城指：惠远（今霍城南，伊犁将军驻所）、惠宁（今伊宁市西北）、宁远（今伊宁市）、绥定（今霍城）、广仁（今霍城北）、熙春（今伊宁市西北）、瞻德（今清水河子）、拱宸（今霍城）、塔勒奇（今霍城西）。

当地人民识破。民团领袖徐学功设伏邀击，大破俄军，歼敌数十名，缴获驼马 2000 余匹（峰），迫使俄国侵略军逃回伊犁，从而制止了沙俄的进一步侵略。

俄国强占伊犁，既是趁火打劫，也是向阿古柏施加军事压力。1872 年 6 月，阿古柏被迫与俄国非法签订了《喀什噶尔条约》。俄国承认“哲德莎尔”为独立王国，阿古柏则同意俄国在南疆自由通商和旅行，并可在七城设立商馆和代表，只征收 2.5%的进出口税，从而扩大了俄国在新疆的侵略特权。

英国为了抵消俄国的影响，于 1873 年底再次派遣道格拉斯·福赛斯率领一个 300 人的庞大使团到达喀什噶尔，向阿古柏转交了女王的信件和英印总督送给的 1 万支步枪和若干大炮。经过双方密谋，于次年春签订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阿古柏同意英国有在新疆驻使、通商、低税和领事裁判等特权，英国则承认阿古柏反动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之后，阿古柏先后两次派人去英国觐见女王，又获得了大量军火和修理厂设备。

阿古柏在英俄支持下侵占新疆广大地区，俄国又乘机侵占伊犁，清军仅仅控制着塔尔巴哈台、古城、巴里坤、哈密一线狭窄地区，于是整个新疆几乎成为异域。新疆各族人民为反抗阿古柏和沙俄的黑暗统治，不断进行各种斗争。他们殷切盼望清政府早日出兵赶走侵略者，光复失地。

1873 年，清政府将陕甘回民起义镇压下去后，便加紧进行收复新疆的准备。将逗留甘肃不进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革职，改派原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率军出关。1874 年 9 月，清政府任命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帮办大臣；又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以侍郎袁保恒为帮办。正在此时，西北边塞危机未解，东南沿海防务又紧张起来。

二、日本出兵侵犯台湾

日本自明治维新① 以后，急于向外扩张，并把侵略矛头首先指向朝鲜、琉球、台湾等地。1871年底，发生了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杀害的事件。日本于第二年得知此事，便以之为借口，大肆鼓噪“征台”。原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② 也积极参与策划。正是在美国的支持、唆使下，1874年5月，侵台日军3000人于美军曾经登陆过的地点——琅玡登陆，发动了侵台战争。面对敌人的野蛮进攻，台湾高山族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据险抵抗，给侵略者以重大杀伤，使其无法继续前进。尽管这样，日军还是不断地从本土向侵台占领地区输送人员和物资，作殖民久踞的打算。

清政府得到日本侵台的消息后，一面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和交涉，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并令福建布政使潘霨帮办台湾事宜。沈葆桢等随即东渡台湾，了解敌情，部署防务。沈葆桢针对侵台日军兵力和部署情况，奏 请从大陆抽调精锐淮军唐定奎部6000人（13营），驻扎于台湾南部的凤山、东港、枋寮一带，以对付侵台日军；奏派福建提督罗大春率部驻扎于台湾北部的苏澳等地，防守东海岸；对原驻台湾15营班兵进行整编，分驻于台湾北、中、南部的

---

①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1868年1月，日本倒幕派发动政变，迫使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天皇睦仁，推翻了统治日本200余年的江户幕府。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② 1867年，美国借口失事船只“罗佛”号水手在台湾遇害，公然出动军队在台湾南部的琅玡（今恒春）登陆。台湾高山族人民奋起抵抗。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趁赴台与高山族领袖谈判之机，刺探情况，搜集大量资料，俨然成了“台湾通”。

有关要地；在安平、旗后、澎湖等重要海口修筑炮台，并派日意格赴欧洲采购新式武器，以加强台湾海防能力。①当时，福建船政局制造的轮船一度“派迎淮军，并装运炮械军火，往来南北，殊少旷时”②。经过一番备战，台湾兵勇骤增，声势颇壮。当时，日本羽毛尚未丰满，中日国力悬殊，驻日各国使节大都料定日军“征台”难以得逞，加之登陆日军不断遭受疾病的威胁和高山族人民的袭击，减员和伤亡日重，使其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正因为这样，日本发动侵台战争后不久，便派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随后于8月初又任命内阁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企图通过外交讹诈取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9月10日，大久保利通偕李仙得等到达北京。他故作姿态，勒索甚巨。清政府无法接受，谈判陷入僵局。后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斡旋”下，中日于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约》（又称“台事专约”），规定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承认日军侵台“原为保民义举”，并“赔偿”日本50万两银。清政府的苟安软弱，既纵容和助长了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边境的野心，也为日本吞并琉球创造了条件③。

三、“塞防”与“海防”之争

清政府对日本侵台事件的错误处理，作为中国谈判代表的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明知侵台日军实力单薄，却力主

---

① 参见《福建论坛》1982年第1期第66页、《历史教学》1986年第12期第8页。

② 《洋务运动》（五），第149页。

③ 日本于1872年10月追封琉球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列入日本华族。侵台战争之后，它加强了对琉球的压力，从1875年起，公然阻止琉球向中国“入贡”。在用武力镇压琉球人民的反抗之后，于1879年4月4日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

妥协退让。事后，清朝统治者没有认真汲取教训，而把原因单纯地归之于“海疆备虚”，致有“切筹海防”之议。总理衙门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恭亲王奕䜣也提出要购买铁甲舰等筹备海防的建议。筹办海防需要巨额经费，西北用兵开支亦极浩繁，而清政府的财政又十分困难，于是命南北通商大臣及滨海沿江各省督抚、将军详细筹议，限一个月内复奏。于是，在清政府中掀起了一次海防大讨论（参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并伴随出现了一场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究竟何轻何重的大论争。

“塞防”与“海防”之争主要是由李鸿章正式挑起的。1874年底，李鸿章在奏陈《筹议海防折》中，论述了国防形势，认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但自鸦片战争以来，战争多在沿海，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一国生事，各国构煽，防不胜防，故练兵制器，购买铁甲舰，成立舰队，实为当务之急。他公然抛出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主张对已出关或准备出关的军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他还强调：新疆各城过去收复异常艰难，“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① 由于李鸿章系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地位显赫，山西巡抚鲍源深、前江苏巡抚丁日昌等，皆上奏支持他的主张。连光绪帝的生父奕譞也认为李鸿章之请罢西征为最上之策。刑部尚书崇实亦奏称：“前大学士曾国藩有暂弃关外之谋，今大学士李鸿章亦有划守边界之请，洵属老成谋国之见。惟求立予宸断……节省物力，专备海防。”②于是，一时“停兵撤饷”之声充斥于朝廷内外。

---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

② 《防务档》，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崇实奏疏。

当时主筹西征军饷的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复信中极力告诫："若沿海各省因筹办防务，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① 在地方督抚中，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也力陈抗俄的重要性。湖南巡抚王文韶更主张"以全力注重西征"。他强调指出："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②

1875 年 3 月 10 日（光绪元年二月初三日），清廷密谕左宗棠"通盘筹划，详细密陈"。左宗棠针对李鸿章等人的论点，继续据理力争。他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指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当务之急则是立即出兵收复新疆。"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③后来，左宗棠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一见解，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④

左宗棠等人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对朝政颇有影响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文祥认为，新疆作为边疆的屏障十分重要，"以乌垣为重镇，居中控制，南钤回部，北抚蒙古，借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因而"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⑤清廷在全国舆论要求抵御英俄及其走狗阿古柏侵略的压力

---

①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4，第 52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99，第 61 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6，第 36 页。

④ 左宗棠：《统筹全局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50，第 75～76 页。

⑤ 李云麟：《西陲述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97～298 页。

下，终于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主张，于1875年5月3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颁布谕旨，称赞左宗棠“所见甚是”，并任命他“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新疆军务。同时，调景廉、袁保恒回京，从而使左宗棠掌握了收复新疆的最高指挥权。景廉调京后，所部各营由金顺接统。

第二节　收复新疆的战争准备

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军、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但对外敌入侵，一贯采取坚决抵抗的鲜明态度。为了保卫领土完整，他不顾年老体弱，毅然挑起了收复新疆的重任。由于长期在甘肃工作，他对新疆的情况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经过认真分析，左宗棠认为：阿古柏已与白彦虎、马人得（原妥明政权军事头目）等勾结在一起，占据了新疆大部地区，是当前的主要威胁。沙俄虽居心叵测，但在侵占伊犁不久，曾向清政府假惺惺地表示“并无久占之意”，声称“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①，估计不会大动。于是，左宗棠决定“先阿后俄”，即把逐灭阿古柏侵略势力作为第一期战略目标，把驱逐伊犁地区的俄国侵略军作为第二期战略目标。

为了实现第一期战略目标，左宗棠根据敌我态势及新疆的地理特点，提出了一个“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并围绕这一方针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一、“缓进急战”、“先北后南”战略方针的确定

关于“缓进急战”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远离内地，交

---

①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交涉志二》，宣统三年石印本（下同），第2页。

通运输异常困难。经过长期的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陕甘地区粮食十分缺乏；新疆地区也由于连年战乱，户口凋敝，田地荒芜，粮食同样短缺。因此，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①。又因新疆幅员辽阔，城与城之间的距离数百里以至上千里之遥，部队长途跋涉会遇到种种困难。鉴于这种情况，规复新疆不能急于求成，而要采取“缓进”的方针，以充分做好兵员的调集，军饷的筹措，粮食的采办、转运和屯集，以及军火的购置和补给，并使部队养精蓄锐。在战前准备充分的基础上，遇战又要力求速决，避免旷日持久，师老耗粮。

关于“先北后南” 在作战方向上，是先北后南，先南后北，还是南北并举，开始在清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景廉在1874年曾有对天山南北同时发起进攻的三路并进方案；1875年春，清廷又发出“张曜、宋庆两军，或北至古城，合兵进取，或由南路进攻吐鲁番”② 的谕示。左宗棠受命后，认为“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③。这一决策，是他通过对敌情的判断得出的正确结论。“大抵新疆贼势，北路轻而南路重”。南路是阿古柏的老巢和主力屯驻之所，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经营。北路由白彦虎、马人得等踞守，其能战之兵不过六七千人，且与阿古柏离心离德，不耐大战，仅长于绕袭、奔窜。因此，左宗棠主张先攻北路，对控制整个战局是十分有利的：一可避实就虚，在突破敌人薄弱防线后，再行决战，易于夺取全胜；二可分散敌人的兵力，当北路进兵时，阿古柏有可能督师北援，经过几次较大的战斗，就可重创离巢之敌，“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

---

① 左宗棠：《金军未能迅速出关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3，第68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续录》“光绪一”，第21页。

③ 左宗棠：《新疆贼势大概片》，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34页。

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①；三可创造有利的前进基地，解除后顾之忧，并可形成从东、北两面夹攻南疆之敌的有利态势。诚如左宗棠所言：从新疆地理条件看，“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②。当时，清军尚控制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今吉木萨尔）等要点，可以保障新疆与内地的交通。尤其是天山东部的哈密，系新疆通往内地的咽喉，东北与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相呼应，西可直趋吐鲁番、乌鲁木齐。只要收复了乌鲁木齐，就可扼其总要，驻守有地，然后加兵南路，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另外，左宗棠还考虑到，先攻北路，占领乌鲁木齐，对制止伊犁俄军东窥，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以筹集粮饷和整军为主的战前准备

左宗棠为了贯彻规复新疆的战略方针，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以筹集粮饷和整军为主，进行了充分的战前准备。

（一）军饷的筹集

进军新疆需要浩大的军费。经过整顿的西征军约有 130 余营，七八万人，年需饷银 600 余万两，外加出关粮运经费，总计一年军费约需实银 800 余万两。这个数字仅是正常的开支，其它如整编军队，汰弱留强，偿还被裁遣官兵的连年欠饷和给予回籍路费等等，都需要巨大的开支。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极为紊乱，库帑空虚。西征军如此庞大的军费，主要是继续使用原陕甘军费中的各省关协饷，即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协饷和上海、福州、广州、汉口、宁波 5 个海关的关税，以及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江苏、安徽 7 省的厘金。上述各款总计约 900 余万两，但左

---

① 左宗棠：《新疆贼势大概片》，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8，第 34 页。

② 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6，第 35 页。

宗棠实际只能收到500万两。截止1875年秋，各省拖欠西征饷银已达2600余万两之多。左宗棠派人到各省“婉恳谆催”，协饷“延缓如故”，不得不上奏清廷，请求允借洋款1000万两，“仍归各省、关应协西征军饷分十年划扣发还……以便迅赴戎机”。[①] 清廷只好命户部从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银200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之数”[②]。至于外债借款，左宗棠亦费不少周折。据统计，自1875年4月至1881年5月，由他承借的“西征借款”即达1375万两之多。[③] 尽管筹集军饷异常艰难，经过左宗棠等人的努力，仍然保障了规复新疆的需要。

（二）军粮的采运

进军新疆，粮食的采买和运输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此，左宗棠组织了庞大的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经过细心调查研究，最后确定分为南北二路分别进行采运。

南路在肃州（今甘肃酒泉）设立粮局，主要负责采购凉州、甘州、肃州一带的粮食。运粮路线自凉州始，经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安西至哈密，全长2400余里。安西以东以车运为主；安西至哈密计程11站，途经戈壁，无水草，故用驼运。左宗棠还在肃州、安西和哈密各建能存粮2万石的仓库，采取短途节节转运的方式，以节畜力，且稽核迅速。

北路在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设立西征采运总局，并在包头、宁夏（今宁夏银川市）设立分局，主要负责采购归化、包头、宁夏一带的粮食；同时，大力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附近进行采买，分途运往巴里坤和古城。北路运

---

① 左宗棠：《饷源涸竭拟续借大批洋款权济急需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第49～53页。

②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一），总第8265页。

③ 参见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9）》，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同），第6页。

粮路线大致有三条：一条从乌里雅苏台经科布多至巴、古；一条由归化经包头、射台、大巴至巴里坤；一条自宁夏经定远营、察罕庙至外蒙边境的巴尚图素庙与归巴线会合至巴里坤。北路运粮各线主要使用驼运，采取直达方式运输。最短的归巴一路约30余日（驼行一日为一站，约七八十里）即可到达。

除了内地筹粮向前转运外，左宗棠还在新疆就地筹办粮草。他深知塞外用兵全部靠内地筹粮是不行的，“非力行屯田不可”。仅驻哈密部队即屯垦2万余亩，年产粮八九十万斤，可供当地驻军食用两个月。此外，在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等地亦可采粮四五百万斤。

通过俄商采粮，是左宗棠筹粮的另一途径。“俄商”索斯诺夫斯基（沙俄陆军上尉）承办从临近新疆布伦托海的桑诺尔（斋桑湖）采粮500万斤，包运至古城；后来另一“俄商”又承包1000万斤粮食，由西湖（今乌苏县）送至昌吉。这批粮食实际是伊犁地区出产的小麦。俄国之所以准许出售粮食给清政府是有其阴险目的的。它企图利用军粮问题，坐观局势变化，寻找机会干预和梗阻清军的行动，迫使清政府作出让步。后由于阿古柏反动政权迅速瓦解，俄国的上述阴谋未能得逞。

左宗棠在采购粮食中还十分注意执行政策。他认为“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因而尽量让人民留下口粮和种子，收购余粮“皆给价收买”，并严惩哄抬粮价、抗拒粜出余粮的绅富恶霸及贪官污吏。在办理运粮过程中，采取官办与民办结合的方针，并责令官兵保护商队，从而使军粮的采运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截止1876年夏，哈密已积储粮食2000余万斤，古城、巴里坤各积储粮食1000万斤。这些粮食保障了入疆部队开进和战争初期的需要。

（三）军队的整顿

左宗棠认为，要使进疆部队成为劲旅，统兵大员必须同心协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统一意志，统一指挥，克敌致胜。因此，

他对进疆部队的整顿，从选拔将领入手。开始，在新疆的统兵将领大多是清政府倚为心腹而又并不认真负责的满族显贵。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左宗棠早在受命之前，就严劾了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清政府曾多次命令成禄赴援新疆，但他以种种借口滞留甘肃高台不进。左宗棠参奏其畏葸成性，视朝廷命令如敝屣，并截留景廉所部粮饷。结果，成禄被清廷革职拿问。又如乌鲁木齐都统景廉，自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后，苟安目前，不求进取，且与左宗棠"同役而不同心"，遇事龃龉掣肘。1874 年，当清廷向左宗棠征询关外现有统帅及现有兵力能否胜任时，左直言不讳地指出：景廉"泥古太过，无应变之才"。同时认为，金顺虽非佳选，但尚敢于搏击疆场。因此，建议景廉内调，由金顺暂管关外军务，后被清廷采纳。左宗棠对自己的部属，亦能知人善任，作了统一调整，配备了能征善战的将领。

左宗棠还认识到："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①清军历来空额不少，加之当时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肃州之战刚刚结束，"各军劳乏过甚，损折亦多，亟需整理……若于各营中零星抽拨，凑合成营，则兵将两不相习，恐难骤收实效"。因此，左宗棠主张在进军新疆之前，"酌量汰撤，稍节虚糜"。② 截止 1875 年初，各路楚军及原在甘肃的部队陆续裁遣 40 余营（2 万余人），只存 141 营。仅此一项，即可节省常年饷银 200 余万两。其中金顺所部原来号称 30 营，成禄旧部号称 17 营，经过整顿，两部合并为 20 营，减少了 27 营。原在新疆的景廉旧部号称 37 营，由金顺接统后，汰弱留强，归并为 19 营。左宗棠对部队的精简整编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即使是自己的旧部，也决不宽容。所有淘汰勇丁，一律资遣回籍，不许逗留甘肃。其它在疆部队也都先后逐加甄别裁并，加

① 左宗棠：《官军出关宜分起行走并筹粮运事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4，第 45 页。

② 左宗棠：《请敕张曜额尔庆额带所部出关并简重臣总司粮台片》，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4，第 25 页。

强了战斗力。

在精简部队过程中，左宗棠还十分注意提高军队的素质。他命令所部将领，凡官兵不愿出关者，一律不可勉强，并准资遣回籍，以保证西征军维持饱满的士气，为驱逐外国入侵者而一往无前。他严令所有将领一律不准克扣勇丁粮饷，并向官兵宣布，如发生此等事情，准许勇丁“呼诉”，上级定然代为作主。

西征军经过左宗棠一番整顿，进一步统一了事权，而且更加精悍，不但节约了粮饷，纪律也有了加强。

（四）装备的改善

鉴于阿古柏及沙俄军队武器比较精良，左宗棠十分注意改善进疆部队的武器装备。当时，清政府在自强活动中兴办起来的军事工业已陆续投入生产，虽然数量有限，但也为改善清军装备提供了一定条件。可是，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大型军工厂主要为李鸿章所控制，产品大部供所部淮军和海防部队使用。为此，左宗棠在接任陕甘总督以后，先后在西安、兰州创设制造局，就地制造军火，并在上海、汉口、西安等处设立采运军需军火的专门机构。这些固然是为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服务的，但在尔后收复新疆的战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至 1874 年，兰州机器局已能制造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以及仿造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并改装中国旧有劈山炮，使用开花子，由 13 人操作改为 5 人操作；改造后的抬枪由“一人擎放，心手相印，较洋枪有准而更可致远”①。此外，左宗棠还从德国购买了部分火器，从而使进疆清军的装备得到了较大改善，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筹措，左宗棠排除了各种干扰，战胜了重重困难，做好了较充分的战前准备，为西征军收复新疆铺平了道路。1876 年夏，一场胜利进军新疆、反击外敌入侵的战争终于开始了。

---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下同），第一辑，第 445～446 页。

第三节 收复北疆失地

一、双方作战部署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就近指挥部队向新疆开进。从肃州至哈密全程1580里，人烟稀少，水草缺乏，行军十分困难。肃州至安西一段660里，清军的开进方法是，先将甘州、凉州的粮秣运至肃州，再由肃州运至玉门，然后第一批部队开至玉门就食，接着把玉门存粮用私驼运至安西，腾出官车官驮回肃州转运第二批粮食，第二批部队再随之出发。余均仿此办理。部队到达安西后，稍作停顿，再分批前赴哈密。安西至哈密一段920里，一路戈壁，每个宿营地的水源仅够千人百骑之需，故每批只限1000人，裹粮而行。

左宗棠到肃州后，与老湘军统领、总理行营营务刘锦棠"熟商进兵机宜"，随即令其率主力马步24营（步队17营、马队7营）分4批出星星峡，向哈密进发。刘锦棠令记名提督汉中镇总兵谭上连率部先行，然后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谭拔萃、记名提督陕安镇总兵余虎恩率部相继出发。4月底，刘锦棠亲率余部启程。其后，提督陶生林又率马队1营由肃州向古城进发，于是出关老湘军总数达25营。不久，记名提督徐占彪率所部蜀军马步5营出关继进。左宗棠限令各军于7月下旬赶至古城集结待命。当时，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部河南嵩武军马步14营和总兵桂锡桢的马队1营1起（1起相当于半个营），驻于哈密；金顺所部马步39营（包括归其统辖的景廉旧部马步19营）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的马队1营1起，驻于巴里坤、古城一带。刘锦棠等部顺利完成开进和集结任务后，出关各军总计有80余营，加上原驻新疆的伊犁将军荣全所部8营（驻塔尔巴哈台）、哈密办事大臣文麟所部4营（驻哈密），总兵力约六七万人。此外，在星星峡以东，左宗棠尚

部署有20余营担任警戒，并起战略预备队作用。左宗棠自率亲兵数营在肃州坐镇指挥。“其前路进止机宜，悉委总统湘军刘锦棠相机酌度”①。根据“先北后南”的既定方针，为收复乌鲁木齐，左宗棠作了如下具体部署：

（一）令张曜率军防守哈密，阻止吐鲁番之敌东犯。左宗棠特别提醒他不要分散使用兵力，应于险隘之所深沟固垒，多掘梅花形陷马坑，错落布置，彼此联络，以助其险。如敌窜入哈密境内，应立即痛剿，不许其残部窜入甘肃，以确保后方安全。

（二）令徐占彪率所部5营扼扎木垒河、奇台、古城一带，保护粮道，并防白彦虎回窜哈密。

（三）令总兵徐万福率军3营，中军副将尚北嘉领兵1营，驻扎安西、玉门，万一敌军残部窜入，立即痛剿，不使漏网。

（四）令刘锦棠与金顺负责攻占乌鲁木齐，并令金顺分兵一支防止乌鲁木齐之敌败窜玛纳斯。

乌鲁木齐位于东西天山接合部的北麓，三面环山，北部与西北部较为开阔，但有古牧地（今米泉）作为屏障，南面有天山作为依托，形势比较险要。左宗棠认为：“官军必先攻古牧地，撤乌垣、红庙②之藩篱，乃可成捣穴犁巢之举。”③

阿古柏得知清军西进的消息后，急忙从阿克苏赶到托克逊，调兵遣将，部署防御：命妥明余党马人得、马明和白彦虎分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古牧地等地，企图以天山为依托，以乌鲁木齐为支柱，控制南北疆的交通要冲，阻止清军南下；以重兵防守达坂城及其东南狭窄河谷，防止清军从乌鲁木齐向吐鲁

---

①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清光绪二十五年铅印本（下同），卷2，第8页。

② 红庙，指乌鲁木齐汉城，即迪化州城，位于乌鲁木齐城东南3里。该地山色皆赤，上建玉皇庙，以赤土涂壁，故名。

③ 左宗棠：《出关诸军进至古城留防要隘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61页。

番、托克逊方向进攻；以一部兵力控制胜金台、辟展（今鄯善）、七克腾木（今七克台），防止清军从哈密、巴里坤向吐鲁番进攻。阿军主力部署于吐鲁番、托克逊。阿古柏本人在托克逊亲自督战。上述各地的阿军兵力总数约4万人。

二、古牧地之战

1876年7月上旬，刘锦棠率部进抵古城，侦知马人得踞乌鲁木齐，白彦虎踞红庙，马明踞古牧地。根据当面敌情，刘锦棠于7月21日亲赴济木萨，与金顺筹商进军事宜，并察看地形。28日，金顺与刘锦棠两军进驻阜康城。此时，阿古柏因怀疑马明私通清军，已将其逮往南疆，古牧地改由王治、金中万率兵数千防守；白彦虎等则由红庙移防古牧地。阿古柏又派出部分侵略军前来助守，使古牧地的防御兵力有了增强，但工事构筑尚不坚固。刘锦棠根据敌情变化，且考虑到当时正值麦豆收获季节，有粮可因，“虽后队尚未到齐，然师期不宜再缓”①，便毅然决定提前进攻古牧地。

阜康至古牧地相距百里，有路两条：一条是大道，由阜康向西20里至西树儿头子，有废渠可引县西之水饮用，但再西行50里至黑沟驿，中途仅甘泉堡有井一口，可供百人一日之需，余均戈壁，无水供应；另一条是途经黄田的小道，水源充足，但敌军已在此筑卡树栅，严密防守。显然，敌人企图引诱清军沿大道前进，跨越50里戈壁，陷入前阻坚城，人马渴乏的困境，然后乘隙而攻之。

刘锦棠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将计就计。8月8日，他率军一部进至阜康城西10里处，修浚沟渠，将水引至西树儿头子，就地筑垒。翌日，又派出马步各队于甘泉堡掘井挖渠，佯装要从大道进

---

① 左宗棠：《会师古牧地坚巢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大概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73页。

攻。驻黄田之敌以为清军中计，疏于防守。10日夜，刘锦棠和金顺所部突然沿小道偷袭黄田，于次日凌晨抵达后，迅速抢占附近制高点。接着，金顺军从右路，刘锦棠军从左路，向据守黄田卡栅之敌发起猛烈进攻。守敌突遭袭击，阵势顿时大乱，纷纷向古牧地狂奔。刘锦棠等率部追击至古牧地，鉴于城池坚固，无法一鼓而下，便率部回驻黄田。西征军打响了进疆后的第一仗，首战告捷。

8月12日，清军逼近古牧地，分扎城东及东北。次日清晨，阿古柏派往北疆的数千骑兵从红庙来援，古牧地守敌则已在城东及东北山地筑垒，加强了外围防御。据此，刘锦棠决定先扫外围，而后再攻坚城。他当即命余虎恩、黄万鹏等率骑兵奔赴山前监视敌人；命步兵分别攻取山垒和南关；命炮兵筑造临时炮台，配合步兵轰击据守山垒和南关之敌。战斗打响后，清军步骑兵在炮兵配合下，勇猛冲入敌阵，很快占领了山垒和南关，扫清了古牧地外围据点。守敌退入城中，阿古柏派来增援的骑兵则向南逃窜。

刘锦棠与金顺策马巡视古牧地，知敌守备甚严，必须强攻，遂令各营四面包围敌人。同时，抽派兵勇在四周赶修炮台，并要求炮台必须高过城墙一丈。8月15日，炮台全部竣工，刘锦棠令谭拔萃率千总庄伟等用开花大炮轰塌东北面城墙，并对准缺口连续轰击。次日，将开花大炮移至正东，又轰开另一缺口，继以开花小炮及劈山炮连续轰击，防敌堵塞缺口。8月17日黎明，炮兵轰开南门，攻城部队冲入缺口，向敌投掷火药包。后续部队迅速挖土填沟，涌入城中，与敌展开巷战。这时，金顺部亦从城东北入城，两军对进攻击。守敌大部被歼，少数由缺口逃出者，亦被预伏之清军歼灭。守城头目王治、金中万及阿古柏部将多人被击毙。白彦虎未在城中，幸免一死。

这次战斗，共歼敌近6000人（包括阿古柏兵358人），缴获战马200余匹以及火药、硝磺数千斤。清军亡158人，伤450人。

三、乌鲁木齐之战

清军攻克古牧地后，缴获了王治、金中万给乌鲁木齐的求救信一封，上有马人得的批复："乌城精壮已悉数遣来，现在三城（指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妥明所筑之伪王城）防守乏人，南疆之兵（指阿古柏军）不能速至，尔等可守则守，否则退回乌城，并力固守亦可"①。刘锦棠得此重要情报后，当机立断，决定抓住时机乘虚蹈隙，除留下两营扼守古牧地外，率领大军于8月18日黎明急速向乌鲁木齐挺进，途中不战而下七道湾堡。行至距乌城10里处，侦骑探报乌鲁木齐守敌正纷纷向南逃窜。刘锦棠当即命余虎恩率骑兵3营、谭拔萃率步兵4营由左路追击；命黄万鹏率骑兵一部、谭上连率步兵4营由右路追击；命谭慎典等率步兵3营向乌城疾进。白彦虎、马人得没有料到清军来得如此神速，一闻炮声，即弃城向达坂方向逃跑，因而清军轻而易举地收复了乌鲁木齐。阿古柏所遣援军5000骑行至达坂时，闻乌城已失遂止。

乌鲁木齐收复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部驻守该城，搜捕残敌，处理善后事宜；命金顺挥军西进，攻取乌鲁木齐以西各城。盘踞于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北城之敌闻风丧胆，未等清军到达即弃城先逃。惟玛纳斯南城之敌，凭借城垣坚厚，地形有利，负隅顽抗。9月2日起，金顺督军从昌吉向玛纳斯南城进攻，久围不克。10月4日，刘锦棠派罗长祜、谭拔萃、董福祥等率部增援。10月13日，伊犁将军荣全亦率部前往合攻。直至11月6日，才将玛纳斯南城拿下。至此，天山以北除伊犁地区外，所有敌占据点全部收复。这时，冬季来临，大雪封山，不便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于是，清军一面继续肃清残敌，征集粮秣，设立采运机构，一面就地整训

---

① 左宗棠：《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3页。

部队，为进军南疆做好准备工作。

清军收复北疆，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乌鲁木齐的光复，大大改善了清军在新疆的战略态势，解除了敌军窜犯内地的后顾之忧，为尔后进军南疆创造了有利条件。诚如左宗棠所说："不得乌鲁木齐，无驻军之所，贼如纷窜，无以制之，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若停军巴、古以东瘠区，兵少无以扼奔冲，兵多徒以耗军饷……断难为持久之计"①。北疆的收复，充分证明了左宗棠"先北后南"、"缓进急战"方针的正确。

第四节　进军南疆

一、进军南疆的曲折斗争

正当清军在北疆胜利进军之际，与阿古柏相勾结的俄英帝国主义者，惶恐不安，极力加以阻挠。1876年秋，俄国总参谋部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带着"探险队"前往阿古柏占领区收集情报。他一到南疆，就迫不及待地为阿古柏政权出谋划策。据阿古柏心腹扎曼在写给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中透露："您关于如何同中国人进行战争的良策，都转达给可汗殿下了。可汗完全赞同，极为满意。"② 与此同时，另一个以库罗巴特金为首的俄国官方代表团也到达南疆，其使命是胁迫阿古柏政权与之订立一个"边界条约"，企图在其覆亡之前攫取一些重要战略据点。普尔热瓦尔斯基于翌年春声称，对俄国来说，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阿古柏伯克现在对于我们的任何要求都一定会同意"。"现在最好是把我们的疆界从纳喇特岭移到达兰达坂"③，即从伊犁地区向东南延伸。由于

---

① 左宗棠：《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6页。

② 尼·费·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俄文版，第231页。

③ 尼·费·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俄文版，第576页。

阿古柏政权的迅速崩溃，沙俄的扩张阴谋才未能得逞。为了挽救阿古柏覆灭的命运，英国政府更是公开跳出来为其撑腰。在清军收复乌鲁木齐以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一面阻挠英商向清政府贷款，一面威胁说，中国收复南疆，驱逐阿古柏，结局必然两败俱伤，而俄国将乘机占领新疆全境。他表示英国愿意出面“调停”，条件是保存阿古柏政权，“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①。左宗棠据理驳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英人代为请降，非为安集延，乃图保其印度腴疆耳”②。在外有俄英阻挠，内有饷绌之虞的形势下，清政府中停止向南疆进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曾在“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中追随李鸿章的山西巡抚鲍源深上奏清廷，提出：“自乌鲁木齐、玛纳斯二城克复，天威已足远震，似规取南路之举尚可缓进徐图”③。李鸿章更是四处煽风点火，声称左宗棠进军南疆乃是“崇尚一切虚诞以为正义”，“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④ 左宗棠针对上述种种论点，进行了坚决反驳，除再次重申新疆战略地位重要以外，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中国进军南疆，乃是“收复旧疆，兵以义动”，不怕俄英从中干涉。即使发生意外的国际纠纷，“在我仗义执言，亦决无所挠屈”。二是天山南路比较富饶，解决新疆饷源困难的根本办法是迅速收复南疆。“若全境收复，经画得人，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不致如前此之拮据忧烦，张皇靡措也。”左宗棠向清廷坚决表示，南疆“地不可弃，兵不可停”。⑤ 正由于左宗棠等人一再据理力争，才使向南疆进军得以顺利进行。

---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6，第28页。

②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31页。

③ 《防务档》，光绪三年三月八日鲍源深奏疏。

④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3页。

⑤ 左宗棠：《统筹全局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7页。

二、进军准备和作战部署

攻克乌鲁木齐后，左宗棠立即着手进军南疆的准备。当清军围攻玛纳斯南城之际，左宗棠即上奏清廷，提出让金顺部（当时已增至 40 余营）留守北疆各城堡要隘，办理善后事宜，“调张曜、徐占彪会同刘锦棠进规南路，并增派马步各营及枪队炮队赴前敌助剿”。①

根据当时形势，左宗棠作了正确估计：“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处”，“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② 为使胜利确有把握，他根据当时敌我情况，用较长时间进行了如下准备工作。

继续筹措军粮、军饷。西征大军耗粮甚巨，继续大力筹措军粮，事关大局。刘锦棠部在攻取乌鲁木齐时缴获敌粮 100 万斤，左宗棠下令各营封存储备。鉴于甘肃连续两年粮食丰产，左宗棠指令采粮人员把重点放在甘肃，并裁撤了设在宁夏、包头的采运机构，以节约饷银运费。为了筹措军饷，他多次催收各省协饷，争取户部拨款和对外借款，从而为进军南疆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左宗棠还考虑了进军南疆后的就地筹粮问题。他告诫刘锦棠、张曜：一定要做到“进兵时秋毫无犯，居民安堵，庶采粮容易，运价可省，而善后又易办”③。

继续整顿军队，充实一线兵力。左宗棠考虑到，“师行日远，留防之兵日增，进战之兵日减”，“况转战数千里，士卒之伤亡疾

---

① 左宗棠：《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9，第 5 页。

②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7，第 31 页。

③ 左宗棠：批复《湘军总统会克吐鲁番各情由》，见《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 6，第 55 页。

病又在所不免，额数有缺，则士气易堕”。[1] 因此，从兰州防营中挑选近千名士兵补充湘军缺额。令参将侯名贵率炮队护后膛开花大炮2门、车架开花小炮4门及后膛七响枪300杆[2]，赶赴乌鲁木齐。续调肃州镇总兵章洪胜、方友升所部马队2营及总兵桂锡桢马队1营，加强刘锦棠部；令副将秦玉盛率马队1营出关，加强徐占彪部；令副将武朝聘率马队1营、游击陈文英率开花炮队1营，加强张曜部。鉴于金顺部主要担任北疆防守任务，号称40余营，月耗饷银达22万两，实与营制规定数字相差悬殊，左宗棠上奏清廷批准，将该军裁并成20营。

巩固后方，防敌窜扰。1876年底，敌人为遏制清军的攻势，不断骚扰清军的运输线，一度使巴里坤与古城之间的运道中梗20余日。为此，左宗棠令刘锦棠从乌鲁木齐分兵2营，会同徐占彪部分道入山搜索残敌；另从乌鲁木齐抽兵南下，搜索达坂方向的盐池、小东沟、金口峡一带。同时，奏调驻防包头的记名提督金运昌所部10营出关，分屯古城至乌鲁木齐一线要隘，以接替湘军的防务；调驻守安西的总兵徐万福等所部5营至巴里坤，以接替徐占彪部的防务；并调新授哈密办事大臣明春所部4营接替张曜部的防务。经过调整，既加强了后方的防护，又集中了进攻的兵力。

西征军在北疆的胜利，使阿古柏十分恐慌。他一面请求英国出面“调停”，一面加紧部署防御，妄图凭借天山之险，负隅顽抗。由于达坂位于乌鲁木齐通向南疆一条隘道的中间，东南行约200里为吐鲁番，南行100余里为托克逊，阿古柏下令在该处另筑一新城，以大通哈（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率步骑5000人防守，作为天山北面的防御要点。吐鲁番原有满汉两城，阿古柏又令日役万夫，修筑雄阔坚固的伪王府，以布素鲁克的侄子艾克木汗率步

---

① 左宗棠：《筹调客军以资厚集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40页。

② 侯名贵著《陟屺清吟录》中记载为“后膛炮十二具，弁勇百有十六人”。

骑 8500 人、携炮 20 门防守。白彦虎、马人得逃到南疆后，阿古柏又派其加强吐鲁番防御。托克逊形势最胜，又坚筑两城于此，由阿古柏次子海古拉（即哈克·胡里）率步骑 6000 人、携炮 5 门防守。阿古柏亲自坐镇喀喇沙尔指挥。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构成鼎足之势，而以托克逊为重点，总兵力约有 2 万余人。①

左宗棠根据敌人的部署，判断“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者拒乌垣官军，皆所以护托克逊坚巢也”②。他针对敌人的企图和设防情况，决定首先攻克三城，打开南疆门户，而后长驱西进，并于 11 月初制定了三路并进、两翼夹击的作战方案。具体部署是：令刘锦棠部从乌鲁木齐南攻达坂。令张曜部从哈密西进。令徐占彪部从巴里坤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张、徐两部会师于盐池后，协力攻取七克腾木、辟展和吐鲁番，得手后立即指向托克逊。届时如达坂未下，即配合刘锦棠部会攻达坂，以收夹击之效。对于各部开进的顺序，左宗棠规定：张曜部待金运昌部过巴里坤时开始西进；徐占彪部待金运昌部过古城时再进；刘锦棠部待金运昌抵乌鲁木齐酌商后再行南下。同时，左宗棠强调：“察酌彼己情形，仍非缓进急战不可”③。他屡屡告诫刘锦棠等决不可轻举妄动（早在攻克玛纳斯以后，刘锦棠就曾要求进攻达坂，被左宗棠劝阻）。经过半年准备，诸事齐备，但是金运昌部因远道奔驰，未能及时赶到乌鲁木齐。而刘锦棠考虑到“南路天气炎热甚早，麦秋收割每在春夏之交”，部队可以就地因粮，认为“机有可乘，时不可失”，遂决定提前进军，并约张、徐两部于 4 月中旬开始行动。

---

① 库罗巴特金著《喀什噶尔》一书中说：阿古柏在吐鲁番、达坂、托克逊部署的兵力有步兵 7000 人、骑兵 7500 人及东干（指回族）兵员 1 万人。后又从库尔勒增调骑兵 1500 人，从库车增调骑兵 1000 人。总兵力约 2.7 万人。

② 左宗棠：《搜剿窜贼布置后路进规南路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9，第 36 页。

③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7，第 31 页。

三、连下三城，打开南疆门户

1877年4月14日，刘锦棠率主力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离乌鲁木齐南下。16日进至达坂西北20余里的柴窝铺（今柴窝堡）时，侦知达坂守敌尚以为官军仍在乌垣未动，立即派余虎恩、谭上连等率马步13营“径趋达坂，期以五鼓会集城下，立合锁围，杜贼窜逸”①。达坂城附近有草泽，敌人引放湖水自卫，形成一片泥淖，深及马腹。清军涉水而进，将达坂城四面包围。次日黎明，守敌发觉被围，连放枪炮，至午不止。清军虽有一定伤亡，但阵容屹立如故。刘锦棠赶到后，令各营加紧构筑工事，防敌突围，并作好攻城和阻援的准备。18日，清军炮队抵达，立即赶修炮台。当天，海古拉派来增援的骑兵五六百人接近达坂，刘锦棠派马队将其击退。继来增援的1000多敌骑也掉头狂奔。守敌见外援断绝，妄图突围逃窜。维吾尔族人民冒死出城报告清军。刘锦棠立即命令各营严加防范，夜间遍燃火炬，监视敌人动向。19日，清军炮兵在城东修筑的炮台竣工。当夜，以3门开花大炮连环轰击，先后将城中大炮台、月城及城垛炸塌。后又击中敌之弹药库，引起爆炸起火。时值大风骤起，火势甚旺，敌人死伤惨重。清军乘势喊话，敌军大小头目俱降，遂克达坂城。是役，总计毙敌2000余人，俘敌1200余名（其中包括阿古柏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等安集延人213名），缴获战马800余匹、枪炮1400余件。清军仅伤亡100余人。围攻达坂之战，敌军无一漏网，是一次极为漂亮的歼灭战。达坂既克，刘锦棠下令宽待俘虏，并将俘虏中的南疆回民全部释放，“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②。

---

① 左宗棠：《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33页。

② 左宗棠：《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36页。

经过4天的安置整顿，刘锦棠于4月24日夜率军继续前进。次日上午到达白杨河后，分兵两路：罗长祜等率步骑6营助攻吐鲁番；刘锦棠亲率步骑14营直捣托克逊。行90里至小草湖时，得知托克逊的阿古柏军正四出抢掠，焚烧村堡，准备逃窜，刘锦棠立命骑兵先发，步兵继后，奔袭托克逊。在城郊经过一场激战，重创敌军。26日上午，海古拉等慌忙烧毁存粮及火药，仅率2000余骑逃往喀喇沙尔，余部俱降。是役，清军又歼敌2000余人，缴获战马数百匹、枪械2000余件，己方伤亡仅90余名。

在刘锦棠部进军达坂、托克逊的同时，张曜和徐占彪部分别从哈密、巴里坤西进。两军会师盐池后，4月21日攻克七克腾木，22日占辟展，25日占领胜金台，26日直抵吐鲁番城下。这时，罗长祜等亦率部抵达。在清军到达之前，艾克木汗与白彦虎已闻风先逃，将防务交给了马人得。马不敢负隅顽抗，开城乞降，清军顺利地收复了吐鲁番满汉两城。

清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连下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使南疆门户洞开，为收复南疆八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迭遭阿古柏匪帮暴虐压迫的南疆各族人民也纷纷起来反抗侵略者，使阿古柏完全陷于绝望境地。他由喀喇沙尔退到库尔勒后，于5月29日凌晨暴死①。恰在这时，海古拉从喀喇沙尔赶到库尔勒。他将军务交给艾克木汗，自已携其父尸西窜喀什噶尔，中途被其兄伯克·胡里所杀。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自立为王，企图进行垂死挣扎。在海古拉离开库尔勒的第二天，艾克木汗自立为王，随后西窜占领了阿克苏。不久，伯克·胡里与艾克木汗发生火并，艾克木汗战败，投入沙俄怀抱。在敌人“树倒猢狲散”的形势下，本是清军收复南疆八城的极好机会，然左宗棠考虑到要进军喀喇沙尔，途中粮食缺乏，必须靠随军携带，而吐鲁番地区存粮甚少，需从哈密、巴里坤转运，一时不能筹集，加之他当时尚不知阿古柏

---

① 阿古柏之死因，其说不一：有说病死者，有说被部将杀死者。左宗棠则认为阿系“仰药自毙”。

已死，对爱伊德尔胡里曾表示愿意派人劝降一事心存幻想，遂决定暂缓进兵。直至7月下旬，左宗棠确知阿古柏已死、敌军余部西逃后，才决定一俟新秋粮食采运充足，立即向西进军。

四、收复东四城

1877年8月10日，清廷谕令左宗棠："刻下已届秋令，著即檄饬各军克日进兵，节节扫荡"①。当时，白彦虎已由喀喇沙尔退守库尔勒，并下令决开开都河，以阻清军前进。开都河自北而东南注入博斯腾湖，洪水期（5～8月）水宽达数百米，是一条障碍性河流。白彦虎决河之后，使喀喇沙尔至库尔勒之间形成100余里的泛区，深者过顶，浅者亦及马背。此时，刘锦棠向左宗棠禀报：大军进逼，白彦虎有可能翻山北窜伊犁、玛纳斯一带。经过分析，左宗棠认为，敌军屡败，已在溃散之中，残部中主要为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两股，前者善于据守，后者长于流窜。并指出，白彦虎"悍鸷不足，狡猾有余。现虽偷息开都河西岸，一闻官军进逼，其避兵鼠窜，自在意中"②。而其流窜方向，一是西窜库车、阿克苏一带；二是由西转北，绕道伊犁边境回窜昌吉和玛纳斯；三是往东南罗布淖尔（罗布泊）取道吐鲁番边界，东窜敦煌，入青海。左宗棠认为，敌若回窜昌吉、玛纳斯，对清军威胁最大，它会牵动后路，且该方向地势平衍，道路纷歧，难于遮截。为此，他一面通知金顺等"远发侦探，加意防范"，一面告知新任乌鲁木齐都统英翰饬令金运昌部"加意侦探防剿，毋稍疏忽"。③

左宗棠预计到，收复南疆八城将是一次远程奔袭的追击战，因

---

① 《清德宗实录》卷53，第2页。

② 左宗棠：《官军克期进剿应防贼踪纷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1，第2页。

③ 左宗棠：《官军克斯进剿应防贼踪纷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1，第3页。

而决定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由刘锦棠率马步32营为前队，作为“主战”之军，长驱西进；由张曜率马步16营为后队，作为“且战且防”之军，稍后出发，主要负责接防已克之城，并兼筹粮运和处理善后。刘、张两部总兵力约2万余人。为了保障后路安全，调记名提督易开俊率马步7营进驻吐鲁番一带，徐占彪部则回扎巴里坤、古城一带。

1877年8月25日，刘锦棠派提督汤仁和率部由托克逊进扎苏巴什、阿哈布拉两处；续派总兵董福祥、张俊率步兵3营由阿哈布拉、榆树沟一带进至曲惠安营；派提督张春发从伊拉湖小道至曲惠与董、张等部会合，搜集柴草，开挖泉井，以备大队继进。9月27日，刘锦棠率大队出发。他令步兵走大道，自率马队走小道，于10月2日同抵曲惠。翌日，刘锦棠命余虎恩、黄万鹏等率马步14营取道乌什塔拉，沿博斯腾湖南岸指向库尔勒侧背为奇兵；5日，自率主力沿大道进逼喀喇沙尔为正兵。由于开都河决口泛滥，行军异常艰难，直至10月7日，刘锦棠部才抵喀喇沙尔，结果是一座空城。城内“水深数尺，官署民舍，荡然无存”①。9日，刘锦棠与余虎恩、黄万鹏会合，进入库尔勒，同样是空城一座。白彦虎等早已西逃库车。此时，清军军粮已断，刘锦棠立即发动士兵觅掘窖粮，获数十万斤，得解一时之急需。12日，后路粮运至，刘锦棠决定乘胜追击。他从各营挑选健卒1500名和精骑1000名，先行出发；命罗长祜率后队各营及辎重继进。清军3昼夜疾驰400余里，于10月15日追至布古尔（今轮台），始见敌人后队1000余人。刘锦棠立命所部发起攻击，毙敌100余名。次日，又西追40里，遥见前方敌人甚众，但用望远镜观察，其中持枪者不过1000余人，余皆被裹胁西行的民众。刘锦棠立即传令：“执械者诛，余勿问！”② 顿时号鼓齐鸣，马步并进，敌弃难民而逃。刘锦棠命陶

---

① 左宗棠：《进规新疆南路连复喀喇沙尔库车两城现指阿克苏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1，第28页。

② 王定安：《湘军记》，卷19，第22页。

生林等护送难民回后方安置，亲率主力继续追击，18日进抵库车城外，立即作出三路进攻的部署：黄万鹏等率马队7营从右路进击，谭拔萃等率步兵3营继进；章洪胜等率马队4营从左路进攻，张俊等率步兵3营继进；自率马队从中路进攻，罗长祜率后队马步跟进。战斗打响后，敌人虽遭重创，仍负隅顽抗，直至罗长祜率后队赶到，敌始溃逃。清军乘势收复库车，并追杀40余里，毙敌近千人。19日，刘锦棠部继续西进，21日抵拜城，得知白彦虎于20日过此西逃，便决定穷追不舍。22日追至铜厂，趁敌正在渡木杂喇特河（今木扎提河）之机，猛烈攻击，斩杀甚众。白彦虎与伯克·胡里率部列阵于上铜厂，“枪炮环轰，连珠不绝”①。清军张开两翼包抄，奋勇冲杀。副将夏辛酉跃马突入敌阵，生擒敌右路指挥官，敌军顿时大溃。清军乘胜追击，敌人惊魂未定，只顾狂奔，不复拒战。10月24日，清军收复阿克苏城。据俘虏供称：敌人为分散清军兵力，自阿克苏以后分两路窜逃，阿古柏军残部逃往叶尔羌，白彦虎率余部逃往乌什。刘锦棠决定暂舍阿军而专追白彦虎。他命黄万鹏、张俊马步两营直捣乌什，命谭慎典、夏辛酉各率马队从翼侧迂回截击。26日，清军收复乌什。翌日，黄万鹏等率队西追90里至阿他伯什地方，只见一片戈壁，并无敌踪。其时，白彦虎已从间道逃往喀什噶尔。黄万鹏等乃率军返回阿克苏。

清军于一个月内驰驱2000余里，经过两次较大战斗，收复了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解救出被敌裹胁的难民10万人。左宗棠遣员设置善后抚辑局，进行妥善安置，从而进一步争取了民众。

五、收复西四城

刘锦棠进入阿克苏后，一面下令分兵搜山，肃清余孽，一面

①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3，第12页。

部署收复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什噶尔）的战斗。这时，敌人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和阗叛军头目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当闻知清军攻克库车后，即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伯克·胡里闻讯，令其头目之一阿里达什留守喀什噶尔，自率骑兵5000人，前往增援，击败呢牙斯，并占领和阗。当伯克·胡里率兵进攻呢牙斯时，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率数百满汉兵民占据喀什噶尔汉城，阿里达什据回城自保。11月初，败逃的白彦虎率残部窜至喀什噶尔，阿里达什约其进攻汉城，伯克·胡里也赶忙回救喀什噶尔。何步云等急忙派人向刘锦棠乞援。刘锦棠原来计划先取叶尔羌，再攻其余三城，得此消息后，断然改变初衷，决定分三路进军：一路由余虎恩等率步骑5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直趋喀什噶尔为正兵；一路由黄万鹏等率步骑9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为奇兵（约定两路于12月18日同时抵达，围攻喀什噶尔）；刘锦棠自率马步各营，经巴尔楚克直捣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攻取喀什噶尔。

12月17日，余虎恩、黄万鹏等按约同时抵达喀什噶尔，当晚一举收复该城。伯克·胡里与白彦虎分别率残部逃入俄境。余虎恩、黄万鹏分途追击，至边界而止。12月21日，刘锦棠亲自率领的清军收复叶尔羌（守敌已于先一日逃窜）。刘锦棠派罗长祜等搜剿余孽，自率主力进击英吉沙尔，于24日收复该城，随即派董福祥率部东取和阗，自己轻装赶赴喀什噶尔处理善后。1878年1月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董福祥部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敌侵占之地全部为清军光复。

清军收复南疆西四城的作战，以破竹之势，横扫敌巢，毙敌千余，生俘数千人（内有阿古柏子女8人、阿古柏军头目多人及反动封建主金相印父子等），缴获各种开花炮百余门、战马万余匹、枪械数千件，取得了巨大胜利。

第五节　以武力为后盾，索还伊犁

在收复新疆的战争进程中，清政府多次与俄国交涉，要求归还伊犁。沙俄政府以种种借口，拒不交还。阿古柏侵略势力被消灭后，清政府乘胜向俄国索还伊犁，并要求引渡白彦虎等。沙俄政府一面答称，如果赔偿俄国占领伊犁之军费，可以交还；一面又唆使白彦虎、伯克·胡里残部等多次回窜新疆，骚扰边境，企图借口边境未靖，缓交伊犁。清军粉碎了敌人的骚扰，予敌以歼灭性打击，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

1878 年 7 月 20 日，清政府派吏部右侍郎、署盛京将军崇厚赴俄国进一步交涉收回伊犁问题，并授以全权便宜行事。12 月 31 日，崇厚到达圣彼得堡。这时，俄土战争（1877～1878 年）已经结束，沙俄政府利用清政府深恐与俄国作战的心理，趁机敲诈，并千方百计笼络崇厚，诱使其上当。谈判过程中，清政府训令崇厚“必当权其轻重，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①，并告诫他对于割地“断不可许”②。但是，崇厚在沙俄的威胁讹诈下，竟于 1879 年 10 月 2 日在黑海岸边的里瓦吉亚与俄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吉亚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归还伊犁东部地区，中国赔偿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各费 500 万卢布（合银 280 万两），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领土，修改《塔城界约》③ 所规定的斋桑湖地区国界，增辟由新疆到西安、汉口、天津的通商路线，允许俄国在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 7 处增设领

---

①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下同），卷 15，第 36 页。

②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 16，第 10 页。

③ 1864 年 10 月 7 日，中俄签订《塔城界约》，俄国把中国西部三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伊塞克湖及周围 44 万平方公里土地割去。

事馆，并给予俄商在新疆、蒙古免税贸易的特权。这样，伊犁虽然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变成一座三面临敌、险要皆失的孤城。俄国从这一条约中“所得到的东西，已经超过了甘愿冒战争的危险来保持的东西。”①

消息传来，激起朝野上下的极大义愤，以致“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②。左宗棠更是痛心疾首，上奏痛斥沙俄的侵略行径和崇厚的卖国行为。他提出解决伊犁问题必须坚持“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③的方针。刘锦棠亦认为“非决之战阵，别无善策”④。清政府内部多数大臣都主张改约，而李鸿章则别有用心地说：“此次崇厚出使，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⑤他主张履行崇厚所订的卖国条约。但清政府慑于全国的舆论，最后终于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正式照会沙俄政府，指出崇厚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并以“荒谬误国”罪将崇厚逮捕下狱。同时，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授权谈判改约问题。

沙俄图谋未逞，恼羞成怒，一面令其驻华使馆代办凯阳德到总理衙门进行恫吓，扬言“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⑥；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大搞军事讹诈。它在与中国毗连的地区集结了数万军队，仅伊犁地区兵力就增加了六七倍，达到1.2万余人、火炮50门，在斋桑湖一带布置了步兵1.2万余

---

① 查尔斯和巴巴拉·耶拉维奇合编：《俄国在东方（1876～1880）》（1959年版中译本），第100页。

② 奕譞：《请乘英法调停之际以赦崇厚为条件挽回俄约折》，见《清季外交史料》卷21，第10页。

③ 左宗棠：《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38页。

④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24，第21页。

⑤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5，第15页。

⑥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18，第11页。

人、骑兵6000余名、火炮62门，还有一支准备由费尔干省入侵喀什噶尔的部队（约5000人，拥有火炮30门）；同时，又在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增加兵力，并以20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由黑海驶往日本长崎，准备封锁中国海面。一时阴云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清廷为了自卫，也在中俄边境和沿海地区采取了防御措施，并命左宗棠部署新疆防务，准备用武力收复伊犁。

1880年3月，左宗棠拟订了一个三路进军伊犁的计划：东路以伊犁将军金顺率步骑25营1.2万余人，扼住晶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西路由刘锦棠率步骑28营1.1万人，取道乌什，从冰岭以西经布鲁特游牧地区直指伊犁；中路由张曜率步骑19营8500人，从阿克苏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指向伊犁。此外，以6000人分屯阿克苏、哈密为后应，以3000人增强塔尔巴哈台的防务。准备参战的部队共约5万余人。5月26日，左宗棠率亲军1000余人离开肃州，出嘉峪关向哈密进发。他“亲自舆榇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①。6月15日，左宗棠抵哈密，积极部署防务。但是，腐朽的清政府对用武力恢复失地心存疑惧，仍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同年7月底，曾纪泽从伦敦抵达圣彼得堡，8月4日与沙俄代表举行第一次谈判。他深知此次谈判任务艰巨，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②。在半年多的谈判中，曾纪泽充分显示了外交才能，与沙俄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俄国驻华公使毕佐夫曾无理地宣称：如果这样拖延时间，还不如打仗合算。曾纪泽毫不示弱地说：“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

①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43页。

② 曾纪泽：《巴黎致总署总办》，见《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70页。

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① 当时，清政府已在李鸿章等妥协派的压力下，将左宗棠调回北京。但是，沙皇政府并不知道清政府的意图，以为中国"有动兵之意"，因而有所顾忌。12 月 11 日，俄方首席代表、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就曾询问曾纪泽："我风闻左中堂现在进京，恐欲唆使构兵，不知确否?"② 一个多月后，格尔斯、毕佐夫再次提及此事说："皇帝谓有传闻左相奉召入京，务须及早定议，免生枝节"③。显然，左宗棠的积极备战，对支持曾纪泽索还伊犁的谈判起了巨大的后盾作用。

1881 年 2 月 24 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曾纪泽与沙俄代表正式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以代替崇厚所订的条约。根据新约，沙俄同意交还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约 1.9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放弃了俄国货物由嘉峪关进入内地的要求。但是，中国"赔款"增加到 900 万卢布，且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1 万多平方公里）仍归沙俄占领。新约还规定，中俄已定的西北边界有"不妥之处"，应重新"勘改"，为沙俄下一步继续侵占我国西北领土留下了伏笔。随后，沙俄根据这个条约的原则，于 1882 年和 1884 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伊犁界约》等 5 个子约，分段勘定新疆的中俄边界，把 7.1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正式并入了俄国的版图。

《中俄伊犁条约》与崇厚所订条约相比，中国虽然收回一些权益，但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尽管如此，改约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时人赞扬曾纪泽改约谈判系"夺肉虎口"④。

1882 年 2 月 17 日（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升泰抵达伊犁，与俄方代表会商收交办法。3 月 22 日，双

① 曾纪泽：《奉使俄罗斯日记》，光绪六年十月初三日。

② 《全轺筹笔》，转引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3 帙第 379 页。

③ 《全轺筹笔》，转引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 3 帙第 394 页。

④ 俞樾：《曾惠敏公墓志铭》，（见《续碑传集》）。

方换文，伊犁将军金顺随即带兵进驻。至此，被沙俄强占达11年之久的伊犁，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第六节　清军胜利的原因

清政府派兵驱逐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粉碎了俄英勾结阿古柏妄图肢解我国领土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的领土完整与统一。它是我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最伟大的胜利，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群众的支援

收复新疆是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左宗棠当时就指出："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①。因此，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特别是受到饱尝阿古柏荼毒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皆日夜延颈，拭目盼望"清军的到来，"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② 有的百姓据城闭门，不许敌人进入；有的拒绝随敌逃窜，严守以待官军；有的协助清军肃清残敌，搜捕叛乱分子；有的送粮劳军；甚至一些民族上层分子也亲至军营，领受机宜，并面陈地势险夷和贼情虚实。清军官兵则在爱国主义思想支配下，士气高昂，勇于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奋勇击敌。由上可见，战争的正义性和人心的归向，是这次战争取胜的根本原因。

---

① 左宗棠：《复陈借用洋款并催解协饷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37～38页。

② 左宗棠：《新疆缠回打仗出力请酌量奖叙并委署各城阿奇木伯克等职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1，第74页。

二、清政府决策正确，选将得当

战前，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清政府毅然摈弃了李鸿章等人的主张，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正确意见，决定进军新疆；战争过程中，又据理批驳英国的干涉与阻挠，将战事进行到底；战后，基本上做到了以武力为后盾，配合外交斗争，索还伊犁。这些，都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正确决策。

为了保证决策的坚决执行，在选将问题上，清政府以力主进军西北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并在战争准备和实施过程中给以大力支持，无论在用人、调兵、财政支援及战争指挥上，都授予应有的权力，使其事权专一，能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左宗棠对前敌指挥刘锦棠亦能做到充分信任，不加遥制，使其有机断行事之权。这些，对保证战事顺利进行，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三、战略方针正确，作战指挥机动灵活

正确的方略和灵活的指挥，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左宗棠提出的“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体现了因地制宜、稳扎稳打、积极主动的思想。他根据作战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地形复杂、供给困难等特点，强调“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把后勤保障工作提到战略高度，并贯彻于整个战争的全过程，是非常正确的。实质上，“缓进急战”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求每战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进军新疆，清军花了一年半时间准备，才发起进攻。整个战争历时一年半，而实战时间不过半年多，大部时间也是用于战争准备。左宗棠多次强调“担迟不担错”，用意主要在于做好粮运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左

宗棠的慎战思想。他曾说:"慎之一字,战之本也"①。有备而后动,才能百战不殆。新疆之战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先北后南"的方针,无疑也是左宗棠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对各种方案的利弊反复比较之后作出的正确决策。"新疆贼势,北路轻而南路重",如果先攻南路,势必遇敌主力,有可能造成清军顿兵坚城、兵疲意沮、粮草难继的结果,且无法充分利用清军在北疆尚控制许多城镇的有利条件,反而给敌以窜扰后路的可乘之机。如果南北两路同时进击,势必分散兵力,达不到急战速决的目的。正由于正确地选择了突击方向,加以战前准备充分,清军首战告捷,取得了主动,由北而南,节节深入,不断予敌以歼灭性打击。

在正确战略方针指导下,刘锦棠在作战指挥中,能审时度势,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灵活使用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对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进军北疆,攻取古牧地时,佯示敌以从大路进攻,实则从小路奇袭黄田,打乱了敌人部署;而后以优势兵力攻占古牧地,动摇了敌在北疆的防御。在进攻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时,则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使贼备多力分,不至为所牵缀"②,取得了决战胜利,歼灭了阿古柏主力,为收复南疆八城奠定了基础。他还十分注意侦察敌情,抓住有利时机,大胆实施机动。如攻占达坂、吐鲁番、托克逊后,发现敌人企图逃跑,随即挑选精壮,跟踪追击,不顾疲劳,敢于以少胜多,勇猛冲杀,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四、纪律严明,宽待俘虏

良好的军纪和正确的瓦解敌军政策,是战争得以胜利的重要

---

① 左宗棠:《魏道光焘禀驻军板桥转递湘军文报由》,见《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3,第1页。

② 左宗棠:《汇保嵩武军蜀军出力员弁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2,第1页。

保证。在进军新疆过程中，左宗棠三令五申，要求部属要“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只打真贼，不扰平民”。① 他还把严整军纪，提到了保证新疆“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要求部队务使人民认识到，“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②。他对于不守纪律的部队，一经发现，即严肃处理。由于左宗棠治军较严，而且出师正义，出现了新疆各族人民“携酒酪，献牛羊，络绎道左”，拥护和支援清军反击侵略者的动人景象。

左宗棠不仅注意整顿军纪，还能采取正确的俘虏政策。他对达坂之役的1200名战俘，除将200多名安集延人送往肃州监禁外，其余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俘虏们“皆惊喜过望，踊跃欢呼而去”。③ 事实证明，这样做，对于瓦解敌军，保证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

① 左宗棠：《答刘毅斋》，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62页。

② 左宗棠：《答张朗斋》，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22页。

③ 左宗棠：《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36页。

第十五章　清后期海防

清后期海防，是在西方殖民者和东邻日本的不断威胁侵略下被动地发展起来的。尽管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沿海各省特别是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地区建立起了多层次的（即海上有舰队，海口有炮台、炮艇和水雷，海口陆上有驻兵，纵深有机动部队）较为完整的近海防御体系，加强了御外能力，但由于海防指导思想消极保守，以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时，便又全面崩溃而惨遭失败。

第一节　近代海防筹建背景

一、近代海防思潮的萌发

我国东滨太平洋，海岸线长达 1.8 万多公里。在古代，由于生产水平和航海力低下，海洋系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故我国边防多在西北陆上边境，海岸一般不予设防。直至明代，由于受到倭寇的严重威胁，才在沿海建立起卫所和水师巡哨制度，并在重要海口兴筑炮台，驻兵防守，开始重视海防。此外，明朝统治者为防止倭寇的侵扰，还实施“禁海”政策，严禁濒海居民私通海外。清初，由于郑成功在收复我国领土台湾后据台反清，清廷于 1655 年（顺治十二年）颁布“禁海”令，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各省，一律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后又下令迁徙沿海居民，形成 30 里宽的隔离地带，以杜绝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郑成功势力范围的往来。郑成功据台反清失败后，清廷取消禁海令。并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各设一个通商口岸，发展对外贸易。但

由于西方殖民者无视中国主权，擅自闯入中国境内之事时有发生，于是从乾隆中期开始，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只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贸易，又实行消极保守的闭关政策。而这一时期清朝的海防，只是为了“缉私捕盗”，而无防外御侮的意识。所以，《清史稿》指出：“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①。正因为如此，当1840年英国发动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时，清军在东南沿海地区丢城失地，无法阻挡英军的坚船利炮，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耻辱的《南京条约》而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但英国的大炮也震醒了中国人民。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和魏源，面对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响亮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主张造船铸炮，编练水军，“战洋夷于海上”，成为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肇始者（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与林、魏同期倡导近代海防思想的还有林福祥、梁廷枬、俞昌会、夏燮等人。尽管他们对海防的具体主张各不相同，但在加强海防建设、反对外来侵略方面是共同的。

上述爱国知识分子倡导海防，不仅著书立说，而且走出书斋，用实际行动对船炮进行改革和创新。早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在浙江就与嘉兴县丞龚振麟等人一起研制战船，其中仿制的车轮战船，连英国人也感到吃惊。绅士潘仕成捐造的战船系仿照外国战船样式，主要特点是船大、炮多，能载300余人，出洋对阵，“轰击甚为有力”。尤其值得称赞的是，绅士潘世荣雇请外国工匠制造小轮船一艘，虽“不甚灵便”，但进行了中国制造蒸汽轮船的有益尝试。有关人员在火炮、火药的制造和改进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如浙江铸造的黄铜大炮，“益工益巧，光滑灵动，不下西洋”②，连英国人都认为“铸得很好，金属很厚，炮口平滑”③。

---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095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1，第16页。

③《鸦片战争》（五），第273页。

监生丁拱辰在广东铸炮，很有研究，著有《演炮图说》一书。他还制造了象限仪，提高了火炮的射击精度。龚振麟、丁拱辰等还模仿西方火炮样式，先后制造出既能进退、又能旋转的磨盘炮架，受到清政府的称赞，并推广到其它省份。潘仕成除制造新式战船外，还自制水雷，放置水中轰破船底，"尤为精巧利用"①。他还著有《水雷图说》一书。所有这一切，对于促进以后的海防建设起了先导作用。可是，腐朽的清王朝对萌芽中的近代海防思想不但不积极支持，反而任用守旧派主持海疆事务，反对制造新式战船。他们仍贯彻其"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认为"防夷一时之事耳，捕盗则无时可置为缓图也"②。鸦片战争后，道光帝也说："外患固属堪虞，内变尤为可虑"③。于是，海防又旧态复萌，仅为捕盗而已。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建立新式水军，加强海防的思潮，从此便又沉寂下去。

二、盲目购舰筹建海军受挫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使清政府中某些主持朝政的王公大臣如奕䜣、文祥等认识到，亟宜力图振兴，不能"再事因循"，因而主张购买外国船炮，以为"自强之计"。④他们郑重指出："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⑤ 一些地方要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也积极主张"力图自强"。

---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410页。

②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138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六），第3174页。

④ 《奕䜣桂良文祥奏折》，《洋务运动》（二），第221页。

⑤ 《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洋务运动》（三），第467～468页。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迅速掀起了一场旨在挽救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自强活动。向外国购买船炮，建立海军，加强海防，则是这一活动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自强活动之初，太平天国正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与清军对峙，因此，清政府当时购买船炮，筹建新式水师，其目的主要在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1861 年（咸丰十一年）7 月，奕䜣、桂良、文祥联衔奏称：太平天国起义与外国侵略互为表里，“其事若不相属，而其害则实相因”。并且认为：“外忧与内患，相为倚伏。贼势强，则外国轻视中国，而狎侮之心起；贼势衰，则中国控制外国，而帖服之心坚”。他们支持曾国藩“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但认为“造船必须先设船厂，购料兴工，已非年余不成，自不如火轮船剿办更为得力”。① 为此，他们还向署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了解购买外国船炮的情况。赫德见有利可图，便极力怂恿清政府购买。奕䜣等人的建议，立即得到清廷的批准。上谕称：“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国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②

同年年底和 1862 年初，太平军先后攻占宁波、杭州，转兵进攻上海。清廷以“事机尤迫”，并闻太平军有向美国购买船炮之事，遂一面令沿海各省督抚加意防范，一面令总理衙门咨会两广总督劳崇光与已赴粤的赫德赶紧商办购买外洋船炮事宜。劳崇光与赫德议定购买中号兵船 3 艘、小号兵船 4 艘(共需银 65 万两，后又增至 80 万两)，一年内造成送来中国。赫德不但主张在英国购买兵船，而且提出就近在英国招募舵工、炮手、水手及看火人等，并由英国武员一名“管带前来，以资训练钤束”③。随后，赫德写信给正在英

① 《奕䜣桂良文祥奏折》，《洋务运动》（二），第 221～222 页。

② 转引自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洋务运动》(二)，第 224 页。

③ 《两广总督劳崇光片》，《洋务运动》(二)，第 237 页。

国休假的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托其代为办理。李泰国认为这是进一步控制清政府的极好机会，便委托其好友——英国皇家海军军官阿思本具体承办，并获得英国政府的批准。由于英国政府大力支持，李泰国和阿思本较快地完成了购置船炮的计划，并自作主张，招募英国海军官兵600余名，组成舰队，由阿思本任司令。这就是所谓的“阿思本舰队”，亦称“李泰国——阿思本舰队”。

1862年10月，赫德告知总理衙门：所购船炮，英国“现已开造，明春即可驶到中国”。奕䜣等立即上奏清廷，请旨饬令曾国藩等“将应用将弁、兵丁、水手、炮手等人，于该船未到之先，一律配齐，一俟驶到，即可上船演习”。奕䜣等还指出：若待船到再行商办，则恐停泊过久，无人管带，“彼又自出主见，据为伊等保护口岸之计，不受中国调度，此等流弊，亦当预防”。① 可见，奕䜣等对于防止英国的控制，还是有所警惕的。曾国藩为控制这批新式兵船，使其成为湘军势力，接旨后立即推荐统带楚军水师巡湖营的提督衔记名总兵蔡国祥统辖7船，向归蔡节制的副将衔参将盛永清等7人各带一船，与长江水师“联为一气，不过于长龙、舢板数十营中，新添轮船一营而已”②。曾国藩还申明前议：“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其余即用楚勇，由蔡国祥预为派定”③。

尽管奕䜣等人有防备英国控制之心，曾国藩也想使这批船只成为湘军势力，但他们对李泰国在英国的所作所为却无从知晓。1863年5月，李泰国先于阿思本舰队返抵上海，不久即与赫德同到北京，向总理衙门报告购买船炮和组成舰队的情况，申明除购兵船7艘外，又购买趸船1艘，加上其它器物，共用银107万两（比原定80万两多出27万两），并提出此后每月用项，约需10万两，按3个月报销一次。不仅如此，李泰国还声称，他曾以中国全权代表的身份，与阿思本签订合同13条，其中规定：舰队由阿思本任总统，任期4

① 《总理各国事务奕䜣等奏》，《洋务运动》（二），第242页。

② 曾国藩：《预筹选派员弁管带轮船折》，《洋务运动》（二），第245页。

③ 《曾国藩来函》，《洋务运动》（二），第267页。

年，“除阿思本之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总统”。“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这就是说，阿思本除了皇帝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即使皇帝的命令，也要征得李泰国的同意才能执行。合同还规定：“所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须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并且规定：4年中各船所需经费和舰队官兵薪俸都要预先支取，“以安阿思本及各外国人之心”。① 照此办理，则中国以高价买来的新式兵船和组织的舰队，自己却无权调度指挥，而且，阿思本不仅是新建舰队司令，还要担任中国所有水师的总司令，有权指挥一切，岂非咄咄怪事?!因此，奕䜣听后不胜诧异，认为“所立合同十三条，事事欲由阿思本专主，不肯听命于中国，尤为不谙体制，难以照办”②。双方争议一月之久，最后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即《轮船章程五条》。协议规定：舰队由中国派武职大员为汉总统，阿思本为帮同总统，用兵时听从所在地方的督抚节制调遣，中国可随时派人上船学习。每月拨银7.5万两，作为舰队所需粮饷、军火、煤炭等费用，统归李泰国经理。③ 清廷批准此项协议，随即通知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轮船驶抵上海后，即节制调遣。同时，清廷指定蔡国祥为舰队“汉总统”。同年8月底，总理衙门又通知曾国藩：“蔡国祥仍须另带中国师船，与轮船同泊一处。其轮船水勇已在外国雇定，毋庸添募。”曾国藩意识到，所谓归其节制调遣，纯系虚文，眼看自己的希望将成为泡影，便致函总理衙门，指出《轮船章程五条》“已与奏准配用楚勇之案不相符合”，而蔡国祥“不得为轮船之主”，“则更与购船之初意自相违戾”。曾国藩建议：“不如早

①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一），第158～159页。

② 《总理各国事务奕䜣等奏》，《洋务运动》（二），第247页。

③ 参见《洋务运动》（二），第248页。

为之谋，疏而远之”，“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是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也”。①当时，湘军曾国荃部已进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不再需要轮船协同进攻，因而曾国藩的意见又受到前线要员曾国荃、李鸿章的支持，清政府更不能不予以重视。

1863年9月，阿思本率舰队抵达上海。李泰国、阿思本又重新要求执行已经作废的“合同十三条”。阿思本还声称，如不满足其要求，他将解散舰队，企图要挟清政府。与此同时，阿思本又请求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出面干涉。奕䜣等将计就计，以普鲁斯照会内有“阿思本愿将弁兵遣散”等语为由，提出遣散弁兵、留用船炮的解决方案。普鲁斯声称，此项船炮乃英国朝廷之物，非买自商人可比，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交还英国。奕䜣乘机提出“买价亦应由英国交还中国”，普鲁斯不得不予以同意。11月2日，清政府正式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决定遣散这支舰队，由阿思本率领驶回英国，船炮变价出卖。清政府还承担英国人回国时的费用和9个月的工薪共银37.5万两，又单独赏给阿思本本人银1万两，“以酬其劳”。随后，清政府趁势将李泰国革职，由赫德接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这样，清政府第一次筹建近代海军宣告失败。此后，清政府接受教训，在相机购买外洋船舰的同时，注意加强本国的轮船仿制工作。

第二节　设厂造舰，筹办海防

一、方略的转变

1864年以后，随着太平天国起义被清政府残酷镇压下去，国内阶级矛盾逐渐缓和，局势相对稳定。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员更加注重对外御侮，自强活动的目的也由开始时的主

① 《曾国藩来函》，《洋务运动》（二），第267～268页。

要对内而转向主要对外了。

1865年5月，李鸿章指出："外海藩篱尽撤，门庭堂户，我已与人共之，岂可一日以为安哉！"① 左宗棠更是看到中国海口"番舶鳞比，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乃于1866年11月发出了"居今日而论驭夷之策，要在内外一心"的呼声。② 其他当政要员中也有不少人意识到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③，而且，"其势日逼，其患日深"④，纷纷要求加强海防，以御外侮。当时，一些在华外国使节，纷纷以各种手段对清政府进行威胁、挟制。如总税务司赫德、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先后呈递了《局外旁观论》和《新议论略》，名义上建议清廷"借法自强"，实际上不怀好意，要求清政府进一步顺从外国侵略者的意志。诚如左宗棠指出的那样："此次威妥玛、赫德所递论议说帖，悖慢之词，殊堪发指。……彼固英人耳，其心唯利是视，于我何有！？"⑤ 清政府对赫德等人挑衅性的行为，也不无警惕。总理衙门奏称："窥洋人之立意，似目前无可寻衅，特先发此议论，为日后借端生事地步。若不先事通筹，恐将来设有决裂，仓卒更难措置"。清廷也认为"有不能不预为筹画者"，便于1866年4月颁布上谕，指出"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要求各省督抚加紧设法自强，"实力讲求，随时整顿，日有起色，俾不至为外国人所轻视，方可消患未萌，杜其窥伺之渐"。⑥ 因此，清政府在外购舰只筹建海军受挫之后，海防建设便转变为御外为主，海军的创建也由外购舰只转变为设厂自造舰只与外购舰只相结合的方针了。

---

①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20页。

② 《闽浙总督左宗棠片》，《洋务运动》(五)，第19页。

③ 《监察御史陈廷经奏》，《洋务运动》(一)，第13页。

④ 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见《洋务运动》(一)，第303页。

⑤ 左宗棠：《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见《洋务运动》(一)，第17页。

⑥ 《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一)，第15～16页。

二、设厂造舰

在提倡设厂造舰、建立海军以加强海防的洋务派官僚中，江海关道丁日昌算是较早的一员。1864 年 9 月，他就向江苏巡抚李鸿章提出："古来中国所以能自强者，大抵制人而不受制于人"。"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之计也"。他认为中国水师船炮，在内河浅港尚属得力，但置于汪洋大海则茫然无措，因此建议"咨商总理衙门，筹储经费，择一妥口，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令中国巧匠，随外国匠人，专意学习，核其巧拙，以为赏罚。并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调遣。将来元气固，则外邪自不能侵"。① 李鸿章随即将丁日昌的密禀转给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予以认可和肯定，复信说："寄来丁观察密禀一件，识议闳远，迥非睹之目前可比，足为洞见症结，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②。但当时李鸿章考虑到筹款困难，又没有驾驶人才，因此未敢轻易举办，而是于 1865 年 6 月购买美国人在虹口的旗记铁厂，与以前创办的上海洋炮局归并一起，创立了江南制造总局，首先制造枪炮洋药，以应急需。

曾国藩也是较早倡导设厂造舰的要员之一。早在 1860 年，他就建议"师夷智以造炮制船"，"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更锐意另求造船之方。1864 年，他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曾试制成一艘小轮船，但行驶迟钝，不甚得法。1866 年底回任两江总督后，他见左宗棠在福州建立船政局，认为"制造轮船，实为救时要策"③。后奏请将江海关洋税应解户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一成为军饷，一成专造轮船，得到清廷的批准。在曾国藩促进下，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到上海城南黄浦江畔的高昌庙镇，不久设立了轮船厂，并

①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 4～5 页。

②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 6 页。

③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 33 页。

修建船台、船坞，正式开始制造轮船。1868年8月，该局生产的第一艘木壳兵轮（炮舰）在黄浦江下水，曾国藩命名为“恬吉”（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在试航中，由吴淞口驶至浙江舟山，顺利而返；复由金陵上驶，曾国藩亲自登舰，试航至采石矶，认为此船“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他高兴地预言：“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① “恬吉”（后改名“惠吉”）兵轮的建成下水，尽管其主要部件购自外国，性能也无法同外国先进舰只相比，但它毕竟是中国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轮船，在建立近代海军和海防近代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其意义和影响是很大的。

捻军被镇压下去后，清政府将二成洋税悉数拨归江南制造总局，从而加速了该局轮船的制造。1869～1875年，该局轮船厂又续造了“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5艘兵轮。其中，“海安”、“驭远”两炮舰规模最大，其排水量为2800吨，马力1800匹，航速12节，安炮20门，载兵500人。1876年，又建成“金瓯”号铁甲舰一艘（以前6艘均为木质）。上述情况表明，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舰技术在不断进步和提高之中。

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兵舰逐渐增多后，海防布置、操演训练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870年10月，曾国藩上奏清廷：“目下沿海防务，亟宜筹备。闽沪两处铁厂，成船渐多，而未尝议及海上操兵事宜”。“须求之文员中，得一素谙戎机、讲究地图、兼明洋务而又不惮风涛者综理其事。始则博求将才，探访可为船主之员；继则出洋督同操练，稽其勤惰；终则遍询外国水战事宜，暗师其法，而取其长，乃可日起有功”。② 他认为前任台湾道吴大廷“熟悉船政，于兵事洋务，讲求有素”，将他调至江南，综理轮船操练事宜，“于整顿海防，实有裨益”。③清廷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嗣后，中国制造的兵舰，遂游弋于江苏等省海面上。

---

①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40～41页。

②③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77页。

然而，由于管理不善、耗资甚巨等等原因，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业务从1876年以后，就开始停顿下来，后于1885年造成过一艘排水量1477吨的钢板船（“保民”号）。其后，该局轮船厂负责修理南北洋各省兵轮、商船，仅造过几艘较小的炮舰。

闽浙总督左宗棠是设厂造舰以加强海防的最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1866年夏，他在《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指出：“西洋各国，外虽和好，内实险竞”，“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① 他坚决要求在福建设厂造舰，并指出：设立船厂，“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②。左宗棠的主张，得到清廷的批准。同年秋，正当左宗棠加紧筹建福州船政局之际，清廷改任他为陕甘总督，负责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军。左宗棠以创办船厂“事关至要，局在垂成”，恳请清廷允其暂缓赴任，以便同法人日意格、德克碑等将有关事宜“在闽定局”。同时，推荐他认为“久负清望”、“虑事详审精密”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总理船政，并建议“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③。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令其“遵奉前旨，将设局造船事宜办有眉目，再行交卸起程”，并称赞他“不以去闽在迩遽行搁置，实属沈毅有为，能见其大”。④ 同时，同意由沈葆桢总司其事，并准其专折奏事。

1867年7月，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大臣。在他率领下，福州船政局的基础建设进展顺利。经过中外员工一年半的努力，该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于1869年6月建成下水，沈葆桢取名为“万年清”。9月下旬，沈葆桢亲督各员绅将领登船出港，径出大洋。“随于大洋中饬将船上巨炮周回轰放，察看船身，似尚牢固，轮机似

---

① 《洋务运动》（一），第17～19页。

②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44页。

③ 《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第15、16页。

④ 《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五），第17页。

尚轻灵，掌舵、管轮、炮手、水手人等亦尚进退合度”①。10月下旬，“万年清”号轮船驶至天津，“华夷观者如堵，诧为未有之奇”②。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验收后称赞道：“闽省新造轮船，经沈葆桢悉心讲求，一切轮机器具，教习驾驶，实能集外国之所长，得其窍妙。从此精益求精，续造大小各号轮船，自必更臻妥善。”③同年底，该局又建成第二号轮船“湄云”号。1870年，第三号“福星”、第四号“伏波”相继建成下水，生产逐渐步入正轨，造船技术不断提高。1871年下水的第五号轮船“安澜”号，所配轮机、汽炉，“均由厂中自制”④，从而结束了全赖进口的历史。1872年建成的第七号轮船“扬武”号，马力加大，航速提高，排水量达1560吨，所装大炮“多英国之前膛炮，摧坚及远，迥异寻常”。⑤由于该船工程浩大，故原定5年内生产16艘轮船的计划改为15艘。截止1874年，上述计划顺利完成，沈葆桢随即奏请“准将闽厂轮船续行兴造，以利海防”。清廷批准该厂“续行兴造得力兵船，以资利用”。⑥其后的生产情况，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有关内容。

三、设厂造舰过程中的中外阻力

清政府在外购舰只受挫后决心设厂造舰，建立近代海军以加强海防的“自强”举动，引起西方殖民者的注意和暗中阻挠。正如左宗棠于1866年秋所指出的：“现在洋人闻有开设船厂之举，明知无可阻挠，多谓事之成否尚未可知，目前浪费可惜者，实乃暗

---

① 《沈葆桢折》，《洋务运动》（五），第87页。

② 《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第110页。

③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199页。

④ 《文煜等折》，《洋务运动》（五），第102页。

⑤ 《沈葆桢折》，《洋务运动》（五），第134页。

⑥ 《洋务运动》（五），第149、163页。

行阻挠之意”①。赫德即曾放出“造船不如买船之省费”的冷言。福州税务司法人美理登也声称中国自造舰只，“势将徒糜巨款，终无成功”，并要其公使写信给法国海军部，建议革去日意格的官职，不准其来中国，企图以此阻挠中国的造船业。此事没有成功，后又在法国管理通商事务署领事巴世栋勾结下，就福州船政局按照合同由日意格提出、经沈葆桢批准解聘不遵约束的洋匠白尔思拔一事进行干预，对日意格处以 3500 元罚款，“必欲日意格惧而自退，使船政一步不可行”②。西方殖民者为搞垮船政局，已不择手段，但其阴谋终未能得逞。

在国外势力阻挠中国设厂造舰的同时，国内保守势力也“处处阴起而为难”③。在船政局开办之初，继左宗棠之后担任闽浙总督的吴棠就不但不积极支持船政建设，而且极力反对设厂造舰。他刚到福州，就公然声称：“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对船政官员周开锡、叶文澜等受人陷害，吴棠明知其诬，亦不予纠正，以致“共事者遂有波及之惧”，有的不敢到职，忧谗畏讥，观望徘徊。④为此，左宗棠不得不向清廷指出：“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⑤清廷将吴棠调离福建，船政局才安定下来。但此波刚平，彼波又起。1871 年，内阁学士宋晋以制造轮船“糜费太重”为由，建议清廷命令闽浙和两江总督将福州船政局和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船厂暂行停止，以致在清政府中形成一场关于是否继续自制轮船的大辩论。由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洋务派官员极力争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等最后上奏清廷：“臣等溯查同治五年六月，左宗棠首建设局造船之议，前两江督臣曾国藩、直隶督

① 《闽浙总督左宗棠片》，《洋务运动》（五），第 20 页。

②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 202 页。

③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 103 页。

④ 《总理船政沈葆桢折》，《洋务运动》（五），第 58 页。

⑤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洋务运动》（五），第 64 页。

臣李鸿章等又均以力图自强非讲求机器、制造轮船不可，臣等意见亦复相同，是以先后议准，期于事之必成。朝廷行政用人，自强之要固自有在，然武备亦不可不讲，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虽将来能否临敌制胜未敢预期，惟时际艰难，只有弃我之短，取彼之长，精益求精，以冀渐有进境，不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① 清廷同意上述意见，于是船厂得以继续坚持办下去。

当然，在设厂造舰中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一，不论是福州船政局，还是江南制造总局，所造轮船多是小型木胁炮舰或运输船，而这些兵船又多是仿制西方老式船样，且兵商不分。1879年，李鸿章曾指出：“至于木壳轮船，如闽沪各厂所制者，系西洋旧式，只可作无事巡防，有事时载兵运粮之用，实不宜于洋面交仗”。② 奕䜣等也于1880年指出：福州船政局“当初雇募洋人日意格等本非精于造船之人，所募洋匠帮办艺亦平平，所造之船多系旧式”③。其二，由于中国当时没有基础工业，所造兵船，部件大多依靠从外国进口，这必然使产品的造价昂贵。李鸿章说：闽厂、沪局“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④。郑观应也说：“中国造船无论木、铁、钢、铜等料，无不购诸外洋，纵使价不居奇，而远载有费、行用有费、奸商之染指有费，其成本已视外国悬殊”⑤。其三，闽、沪船厂内部封建落后的管理方式和日益滋长的腐败现象，也严重影响其自身发展与生产的正常进行。尽管如此，清后期近代造船工业的兴办，毕竟开创了前人未有之事业，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诚如郑观应所言：“自闽、沪设厂仿造轮船，华人颇能通西法、造机器、充船主，

① 《总理各国事务奕䜣等折》，《洋务运动》（五），第127页。
②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折》，《洋务运动》（二），第421页。
③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等片》，《洋务运动》（五），第247页。
④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洋务运动》（一），第47页。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见《洋务运动》（一），第558页。

日进不已，创始之功甚伟。”① 也正因为中国有了自己的新式造船工业，制造了近代军舰，培养了科技人才，为近代海军的产生和海防的加强奠定了基础。有人把福州船政局视为中国近代海军之摇篮，认为船政的创办，“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②，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节 “海防议”和四洋海军的初建

一、1874至1875年的“海防议”

清政府设厂造舰，主要是为了建立一支新式水师，以加强海防。但刚开始起步，便遇到了日本侵略中国台湾的事件（参见第十四章第一节）。

日本曾被人认为是个“蕞尔小国”，竟敢借端发兵侵台，这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因而大受震动，认为加强海防，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与日签订《台事专条》之后不几天，便上奏清廷：“窃查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虽累经奉旨严饬各疆臣实力筹备，而自问殊无把握。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为了统一认识，总理衙门就海防紧要应办事宜拟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建议清廷“饬下南北洋大臣，滨江沿海各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奏复，再由在廷王大臣详细谋议”。③这时，在家养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亦拟有《海洋水师章程》六条，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代为陈奏，清廷令总理衙门与其所拟六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见《洋务运动》（一），第558页。

② 池仲祐：《海军大事记》，见《洋务运动》（八），第481页。

③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洋务运动》（一），第26～27页。

条一起筹议。于是，在清政府中从地方到中央掀起了一次十分热烈的海防大讨论，即“海防议”。

这次海防大讨论，围绕总理衙门提出的六条和丁日昌所拟《海洋水师章程》，首先由滨江沿海各督抚将军以及诸如左宗棠等留心洋务、熟悉中外交涉事宜的地方大吏进行筹议。他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根据各自的认识水平和实践，充分发表意见和提出自己的主张。筹议中涉及范围较广，下面仅就海上、海口、陆地设防问题予以归纳叙述。

关于海上设防方面 督抚将军们较为一致地认识到，加强海防，必须建立近代化的海军，然而在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主要有如下三种主张：一是主张设防于外海。如章京周家楣认为：“各海口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屹然重兵可迎堵，可截剿，可尾击，则防务难于得力”。为此，他主张另立海军，“简派知兵大员帅之”，下分 5 军，每军 2500 人，配铁甲舰 2 艘、兵船若干，各以得力提镇大员分统之。①浙江巡抚杨昌浚、湖广总督李瀚章等也赞同设防于外海。杨昌浚认为：“海上宜专设重兵”，即南、北、中三洋宜设水军三大枝，“外洋有此三大枝水军，练习三数年后，海上屹然重镇，可分可合，可战可守，近则拱卫神京，远则扬威海面，不惟内地之奸匪敛迹，外夷之要挟，亦可渐少矣”。② 二是主张设防于近海。丁日昌提出的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实际上就是主张近海防御。他在《海洋水师章程》中指出：“查直隶至粤东，洋面南北五千余里。沿海要害，互有关涉，宜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以山东益直隶而建阃于天津，为北洋提督；以浙江益江苏而建阃于吴淞，为东洋提督；以广东益福建而建阃于南澳，为南洋提督。其提督文武兼资，单衔奏事。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钵轮船十号。”③ 李鸿章基本同意丁的

①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 7 页。

② 《浙江巡抚杨昌浚奏》，《洋务运动》(一)，第 61～62 页。

③ 《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洋务运动》(一)，第 32～33 页。

近海防御主张，但其总的对外防御思想是陆主海辅，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他重视海上设防，更重视海口防御。他认为防海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①。三是主张设防于海口。左宗棠、李宗羲等属于海口设防论者。左宗棠说：“就海防分言之，闽、粤、吴、越、燕、齐及孤悬各岛，凡可收船寄碇之处，均宜逐加察勘而预为之防”。“轮船之造，原以沿海防不胜防，得此则一日千里，有警即赴，不至失时，可以战为防”。② 他不赞成丁日昌关于设立三洋海军的意见，强调“洋防一水可通，有轮船则闻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③。李宗羲也说：“大沽、吴淞、直东、闽广等口，各驻铁甲一二只，蚊子船三四只，佐以兵轮，安配重大击远之炮，与炮台相辅，便可屹成重镇，以戢戎心。”④

关于海口设防方面　督抚将军们均主张沿海各口择要修筑炮台，重点设防，并认为旧式海岸炮台已不适应近代作战，必须仿照西法，重筑新式炮台，以资抵御。同时认为，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城镇防卫，而忽略以炮台捍蔽各城的防御思想。此外，不少人和李鸿章一样，强调海口设防必须水陆相依，除了炮台而外，应有水师舰船作为水上屏障，换言之，主张炮台要与海军“相为表里，奇正互用”⑤。这些观念的转变，有助于海防的加强。

---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洋务运动》（一），第 43、47 页。
② 《陕甘总督左宗棠复函》，《洋务运动》（一），第 109 页。
③ 《陕甘总督左宗棠签注丁日昌条陈单》，《洋务运动》（一），第 114 页。
④ 李宗羲：《复奏总理衙门六条疏》，见《洋务运动》（一），第 73 页。
⑤ 《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洋务运动》（一），第 32 页。

关于沿海陆地设防方面　督抚们均感到营汛之制，分散而不集中，难于形成大枝劲旅。如左宗棠指出："绿营积习最深，水师尤甚，一在饷粮太薄，一在书识、号令、看管军装、军火、分拨塘汛，不能入操之兵太多，一在千、把、外、额至参、游、都、守层层管束，十羊九牧，额数多归私役，气势不能整齐"①。督抚们大都认为，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丁日昌建议"减额优饷，严加选择"，于沿海水师中精练陆兵10万人。②李鸿章则主张对沿海各省陆军进行认真选汰，并一律改装洋枪炮队，分驻紧要口岸附近之处，"有事时专备游击，不准分调"。③

从督抚将军们对海防问题的筹议中可以看出，当时不少人认识到必须建立海军，加强海上设防，以增加防御层次，并注意到各层次的互相配合，奇正互用，从而增强了整体防御意识。但必须指出，这次海防筹议，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尽管有的督抚主张设防于外海，但并不等于他们具有近代海权思想。他们注意海上设防，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个防御层次，以便更好地保卫海口或沿海重要陆地，而不是为了拥有制海权。其次，在筹议中，督抚们未能对周家楣所提关于另立海军，"简派知兵大员帅之"，下分5军，"各以得力提镇大员分统之"的意见予以重视。尽管这一提案没有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海军或海防领导机构，但已注意到要把海军独立出来，由知兵大员进行统一领导，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而丁日昌所提"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也未得到多数督抚的赞同。正因为这样，中法战争中各洋海军出现了各分畛域、不能协同作战的严重后果。即使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成立了海军总理衙门，也无济于事，因已积重难返了。所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海军照样各守疆域，见危不救。再次，在造船和买船问题上，有些督抚过分强调以买为主。如李鸿章就说："中国造船

---

① 《陕甘总督左宗棠复函》，《洋务运动》（一），第106～107页。

② 《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洋务运动》（一），第32页。

③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洋务运动》（一），第43～44页。

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而中国船厂仍量加开拓，以备修船地步”。①总理衙门在其决议性奏折中也说：“所有新立外海水师，应用枪炮、水炮台、水雷等项，现当开办之始，亟于成军，应由督办海防大臣会商画一，随宜购办。以后由各该大臣饬令船厂、机器局精心制习，期裨实用”②。于是，李鸿章便不惜耗银上千万两购买外国兵舰，建立北洋海军，以致后来江南制造总局因经费问题而停止制造兵轮，福州船政局也因资金不足而未能拓展。

沿海督抚将军的筹议经历一个多月后，“海防议”转入由王公大臣等“会议”阶段。王公大臣们除了对“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等问题与督抚将军们有些不同看法外，对建立海军、加紧沿海设防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醇亲王奕譞说：“夷务为中原千古变局，海防为军旅非常创举，今日立办，固非先著，若再因循，将何所恃？”③礼亲王世铎也说：“窃思庚申以来，夷人恣意横行，实千古未有之变局，亦天下臣民所共愤。正宜卧薪尝胆，精求武备，为雪耻复仇之计。况上年倭人构衅，有事‘生番’，虽暂就和局，难保必无后患。故筹办海防一事，实为今日不可再缓之举。”④然而，通政使于凌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等人却极力反对筹办海防。他们认为：防夷之事，“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⑤。铁甲船、大兵轮及水雷等“不但毋庸购买，亦不必开厂制造”⑥。他们还指责洋务派“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声称“毋庸日思变法，失我故步也”。⑦总理衙门认为于凌辰、王家璧等人的上述意见“与诸议均

---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洋务运动》（一），第47页。

②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等奏折附单》，《洋务运动》（一），第147页。

③ 《醇亲王奕譞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16页。

④ 《礼亲王世铎等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18页。

⑤ 《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22页。

⑥ 《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附片》，《洋务运动》（一），第133～134页。

⑦ 《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附片》，《洋务运动》（一），第134～135页。

相隔阂”，建议“无庸置议”。①

经王公大臣们“会议”之后，“海防议”进入最后决议阶段。1875年（光绪元年）5月30日，总理衙门奕䜣等根据王公大臣以及沿海督抚将军们筹议的情况，“折衷拟议”，报请清廷批准。于是，在海防方面作出了如下决定：1、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2、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3、陆军酌撤分汛，汰弱练强，逐渐改练洋枪洋炮，合营并操，划一训练；4、铁甲船需费极巨，只能先购一两只，以后再行陆续购办，并由各局悉心仿造备用；5、每年提取粤海等关四成洋税和酌提江苏等南方六省厘金共银400万两为南北洋海防经费。至此，历时9个月的“海防议”宣告结束。

“海防议”是清政府商讨国防方略和政策的重大事件。它是在中国受到西方侵略势力和东邻日本的严重威胁，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不论是地方封疆大吏，还是中央的王公大臣，都较为一致地认识到加强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促进了自强活动的开展，加速了军事近代化的进程，特别是对建立海军、修筑沿海炮台和训练洋枪炮队等边海防建设，起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二、沿海炮台的修筑

鸦片战争前，沿海各省主要口岸关隘就已修筑不少炮台，但都是比较简陋的砖石结构，式样陈旧，火炮不能旋转，难以抵御近代军舰炮火的攻击；而且，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破坏，这些炮台大多已不能使用。所以，在海防大讨论中，许多督抚将军都要求仿照西法改筑新式炮台。湖南巡抚王文韶指出：“防海之要，以守为体，以战为用。守之所恃者，重在炮台；战之所恃者，重在

---

①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等奏折附片》，《洋务运动》（一），第152页。

轮船。二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① 基于这一认识，“海防议”后，沿海各省督抚在造船购舰建立海军的同时，纷纷择要修筑新式炮台，添置新式海岸炮，并在主要海口增设水雷营，以加强海防力量。

（一）北洋各口炮台的修筑

北洋包括直隶、奉天、山东三省。“海防议”后至中法战争，北洋沿海主要口岸的设防主要是津沽和烟台。旅顺口虽也开始了修筑炮台，但由于主要工程是在中法战争后完成的，故放在下节与威海等基地的建设一起叙述。

1、*津沽海口*。大沽系我国北方重要海口，向为海防重镇。它既是天津的海防前哨，又是北京东出海口的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鸦片战争以前和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大沽和与其相邻的北塘均筑有炮台，但由于结构陈旧，又是一线防御部署，未能起到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1870 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十分重视大沽、北塘等海口的设防，并赞同其部下周盛传的如下看法：“海口炮台，但求土木兴筑均宜，不在兵数过多。而后路数百里间，必须重兵坚垒，巨炮相望，节节布置联络，乃可自立不败之地，而争胜于人。若置重兵于海口荒滩咸水之区，后路声援不厚，稍有蹉跌，误事甚大。”② 为此，他一方面令所部淮军重筑大沽、北塘两处炮台，另方面汲取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侵略军从北塘登陆抄袭大沽炮台后路的教训，对后路进行重点设防。在大沽、北塘炮台修筑方面，采取西法三合土结构重新修筑和加固原有炮台，并增筑小炮台。建成之后，计有：大沽南北两岸大炮台 6 座，小炮台 46 座，大小火炮 99 门（其中添置外洋火炮 4 门、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火炮多门），驻兵 6 营；北塘南北两岸大炮台 4 座，小炮台 14 座，火炮数十门，驻兵 1000 人。在后路设防方面，

---

① 《湖南巡抚王文韶奏》，《洋务运动》（一），第 83 页。

② 转引自李鸿章：《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7，第 51 页。

李鸿章原拟在天津郡城运河北岸建筑新城，后因南北运河之交市廛栉比，征地需费甚巨，又鉴于大沽海口后路30里之新城地方形势扼要，且系旧建城基，便决定改在该处圈筑土城，参用西法，以三合土加糯米夯筑新式炮台。1875年11月，新城炮台全部竣工，计有小炮台71座，大炮台3座，装备火炮百数十门。李鸿章奏称："从此海口孤台可得犄角之势，于防务大有裨益"①。据称："城台竣后，各国洋人往来查探，争相传播新闻纸，于北洋海防声势增壮。"② 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之后，在进一步加强津沽至山海关各海口布防的同时，又在津沽海口设水雷营，并购进"龙骧"等4艘英国炮舰，与炮台相依护，以加强防御能力。同时，在大沽、北塘后路之小站、马厂、兴济镇等处部署由周盛传、刘盛休两提督分统的淮军马步27营，"总视海口何处紧急，即调赴驰援，专为游击之师"③。

2、**山东烟台海口**。鸦片战争前，山东主要设防于登州（今蓬莱）、文登、宁海、荣成、黄县、海阳等地，共筑有旧式炮台13座，墩台56座，由于承平日久，长年失修，台墩均不能使用。丁宝桢任山东巡抚后，随即着手整顿海防。开始，他认为山东沿海设防，重点应放在登州和荣成二处。1875年"海防议"后，他派道员张荫桓赴天津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讨山东防务，并同意张荫桓等提出的山东海防应以烟台、威海、登州为重点的意见，决定采取先兴办烟台炮台，次及威海，再次登州的方针，"如此次第以图，庶北洋缓急可备，且不致绌于饷力"。④ 于是，在烟台通伸冈修筑炮台，安放走轮大炮。1876年竣工后，丁宝桢奏称："臣详细察勘，

---

① 李鸿章：《津郡新城竣工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6，第41页。

② 李鸿章：《新城工程请奖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6，第42页。

③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228页。

④ 丁宝桢：《筹办海防折》，见《洋务运动》（二），第342页。

东北一台可以顾海口，东南、西南两台可以顾后路，西北一台可以顾沙堤及芝罘陆路，四面辅以护台，核与臣原奏为陆师屯扎之区，诚为得地”①。此外，他还奏请于北面垛山山腰及八腊庙、芝罘东庄等处修筑炮台，以便与通伸冈炮台互相应援。

（二）南洋各海口炮台的修筑

南洋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四省海防名义上由南洋大臣统辖，实际上由各省督抚分别负责。南洋大臣一般由两江总督兼任，通常只管江苏一省海防而已。为什么北洋大臣能统辖北洋三省海防，而南洋大臣却徒拥虚名呢？主要由于北洋海防围绕津沽设防，互相关联，需要由北洋大臣统筹规划和部署；而南洋海防范围甚广，海口众多，难以统一规划和部署，因而四省海防各自独立，海口炮台的修筑也由各省督抚自行统筹安排。

1、长江下游各口。江苏海防与江防联系在一起，向来海江防一起部署。鸦片战争以前和鸦片战争期间，江苏沿江各口就修筑有炮台、土垒、堤塘等防御工程，可是非常简陋，难以御敌。1873～1874年李宗羲任两江总督期间，重新布置江苏江海防。他认为：“目前统观地势，论苏、松之门户，以吴淞为最要；论长江之关键，以江阴为最先。……镇江府属之焦山、象山，对岸之都天庙，江宁府属之乌龙山，均为长江险要之区。又江宁省城外下关地方，为内河门户，亦宜略壮形势”②。遂于吴淞至南京之间沿江各主要口岸修筑炮台，派兵驻扎。计有：乌龙山炮台16座，安巨炮21门，驻兵3营；下关炮台4座，安巨炮11门，驻兵1营；都天庙炮台6座、象山11座、焦山8座，共安巨炮25门，驻兵1营；江阴炮台15座，安巨炮29门，驻兵3营。此外，江阴北岸的浏闻沙、乌龙山北岸的沙洲圩也添筑炮台，以成犄角之势。吴淞口则修筑了少北、南石塘、东岸等处炮台，由提督吴宏洛率部驻守。1875年，刘坤一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又在江阴等处增筑炮台，加强犄

---

① 丁宝桢：《查阅海防炮台折》，见《洋务运动》（二），第344页。

② 李宗羲：《遵旨筹办防务情形疏》，见《洋务运动》（二），第325页。

角之势。1887年，曾国荃又扩建吴淞、江阴两地炮台，各设新式后膛大炮，并分别增驻兵勇，以加强长江口的防卫。

2、浙江沿海要口。1729年（雍正七年），浙江沿海开始修筑炮台，由于迭经战火破坏，多已坍塌，不能使用。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历任巡抚多有修建。至19世纪80年代后期，计乍浦口有天后宫、西山嘴、观山麓、陈山嘴等处炮台。澉浦有头围口、小海塘炮台。镇海口北岸招宝山有威远、定远、安远炮台，南岸有笠山（宏远）、小浃江口（镇远）、沙湾（靖远）、大金鸡（平远）、小金鸡（绥远）和拦江炮台，另有天然、自然两台。舟山有竹山（定远）、獭山（振威、永靖）、青垒等炮台，此外东岳宫、土城各有旧炮台。温州口有东门外、状元桥、茅竹岭、龙湾、盘石卫、天妃汛等炮台。

3、福建沿海要口。福建与台澎要口众多，历来“用兵海上，较他省为多”①。闽江口为省城海防要地，布防由外而内，主要有长门、闽安、马尾三处。长门是由海入江的第一重门户，长门、金牌两山隔江相峙，水路较窄，两山均筑有炮台，附近还有电光山、七娘湾、射马、划鳅山、划鳅港、獭石等炮台。闽安南北岸对峙，为第二重门户，筑有北岸、南岸炮台，附近还有沪屿和田螺湾等炮台。马尾是船政局所在地，系闽江下流第三重门户，筑有上坡、中坡、下坡等炮台。厦门口与台澎相望，也是福建海防重地，筑有武口、盘石、鸟空园、胡里山、白石头及屿仔尾、龙角尾等炮台。台澎与内地相表里，“为中国海南右臂”②。1874年日军侵台时，负责台湾防务的沈葆桢便在澎湖、安平、旗后等处海口修筑炮台，布设水雷。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筑有基隆、沪尾、安平、打狗港、旗后等处炮台共12座，澎湖有西屿、大城头、金鱼头等炮台3座。南澳为闽粤两省共管之地，也是海防要冲，在福建辖区内筑有深澳、草寮尾、云澳、太子楼、青澳、长山尾、腊

---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111页。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114页。

屿、交窑头等炮台共12座。

4、广东沿海要口。广东海岸线最长，港口众多，历来将海防划分为中、东、西、南四路。中路之虎门海口最为重要，是广州的天然屏障，素称“金锁铜关”。早在康熙年间，横档、南山（即武山）就开始修筑炮台。直至鸦片战争前，虎门三道门户共筑有大角、沙角、威远、靖远、镇远、横档、永安、巩固、大虎山、蕉门、新涌等11座炮台，鸦片战争中全被英军摧毁。后虽有所修复，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破坏，加之年久失修，不少炮台已不堪使用。第一次“海防议”后，两广总督瑞麟“奉旨筹办海防，始议于省河及虎门，并潮州之汕头，参酌中西之制，另筑炮台”①。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虎门共有炮台50余座。从虎门至广州沿珠江两岸亦筑有炮台，其中黄埔为广州第二重门户，有长洲炮台共15座。广州及其近郊则有保厘、保极、拱极、耆定、永康、得胜等旧炮台10座。东路主要是汕头海口，其北岸有崎碌炮台，南岸有苏安山炮台，东北之韩江口有南、北港炮台，东面有放鸡山等处炮台。西路主要是北海口，筑有地角炮台3座，但均地低台小，不足以安大炮。南路主要指海南岛之海口、榆林两海防要口，两处均筑有海岸炮台多座。

三、四洋海军的初建

“海防议”后，清政府笼统地制定了“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的海军建设方针，并委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受命后不久，即奏请以10年时间建成南洋、北洋、粤洋海军三大支。②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沈葆桢竭力统筹包括“粤洋”（辖闽、粤两省海域）在内的整

① 刘坤一：《筹办海防事宜并请截留饷项折》，见《洋务运动》（二），第409页。

② 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034页。

个南洋海防事宜，但由于各省督抚各自为政，实际上形成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至中法战争前夕，这四支海军初具规模，虽然即使按当时标准也不能称为正规化的海军，但都有一定的海上防御能力，并与海口陆地防御相结合，初步形成了适应近代战争的防御力量。

在这四支海军中，广东海军筹建较早。早在1867年，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即以“粤东洋面，近年盗案叠出，必须置买轮船，以资巡缉”①为由，先后向英法两国购买了“绥靖”、“澄靖”、“镇海”、“飞龙”、“澄波”、“镇涛”等兵轮。1874年，瑞麟在广州设机器局，又制造了内河小轮船16艘，分拨东、西、北三江巡缉之用。刘坤一督粤后，认为办理海防必须水陆相依，在机器局又续造了“海长清”、“执中”、“镇东”、“缉西”等4艘轮船。“惟虑有警之时，尚属不敷调遣，更须得三四大号兵轮船，庶可陷阵冲锋”②，他开始考虑外购或自制大号轮船，以加强广东海防。1877年，刘坤一购买了英国在黄埔设置的船澳，机器皆全，便又制造了“海东雄”兵舰。张树声继任两广总督后，更为重视海上设防。他认为：“粤东地极南海，为泰西各国东道首冲，居今日而驭外之略，固圉之谋，非有横海轮船，无以折冲四境”。广东虽有大小轮船20余艘，但只是为本省捕盗缉私而设，“船炮俱小，皆不能驶行重洋，捍御大敌”。可是要建立一支近代海军，“粤之财力，万不能及”，遂计划建立一支规模较小、“有铁甲快碰船二艘，大根拨二艘，护岸铁甲大蚊船四艘”的近代海军。“内以严卫粤中各口，北与南北洋三军相应，南以游徼交州，庶声势较壮，不致为敌所轻”。③ 于是，在他任期内，向英国购买了一艘炮舰“海镜清”号，在机器局制造了“肇安”、“南图”2艘轮船。他还准备通

①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105页。

② 刘坤一：《筹办海防事宜并请截留饷项折》，见《洋务运动》（二），第410页。

③ 张树声：《筹办粤省边防折》，见《洋务运动》（二），第518页。

过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船厂订购2艘穹面钢甲巡洋舰。他认为"粤洋有此两船，合之闽厂拨来两船，辅以本省缉捕轮船之较大者，由水师提督督饬合队操练，择要驻巡，可以为经营水军之权舆"①。但张树声不久被调任署直隶总督，在德国订购穹面钢甲船之事便未能实现。至中法战争前，广东共有中小兵轮25艘，虽没有铁甲舰和巡洋快舰，不能成军，但与炮台相结合，已具有一定的海口防御能力。

广东海军主要舰船表

舰　名	舰种	排水量（吨）	马力（匹）	航速（节）	炮位（门）	下水年代
澄靖	炮舰					1867
绥靖	炮舰					1867
镇涛	炮舰	450	265	7	7	1868
恬波	炮舰	150	100	6	2	1868
安澜	炮舰					
海长清	炮舰	320	200		4	1872
执中	炮舰	500	300		6	1879
镇东	炮舰	170	170		3	1879
缉西	炮舰	320	200	8	6	1872
海东雄	炮舰	350	200		5	1882
海镜清	炮舰	450	310		6	1882
肇安	炮舰					
南图	炮舰					
靖安	炮舰					
横海	炮舰					
宣威	炮舰					
扬武	炮舰					
翔云	炮舰					

福建海军因有船政局制造的舰只，发展较快，首先形成一支

① 张树声：《遵议添练水师事宜折》，见《洋务运动》(二)，第522页。

近代海军。在“海防议”前，福建船政局就已制造了15艘舰只。到中法战争前，又先后制造了9艘。由于福建船政局制造的舰只逐渐增多，质量不断提高，加上又向外国购买了“长胜”、“海东云”、“福胜”、“建胜”4艘炮舰和一艘练习舰（“建威”），从而加快了新式海军筹建的步伐。早在1870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就以“轮船号数渐多”为由，奏请清廷“简派熟悉海疆、忠勇素著之大员一人，以为统领”①，以便统一管辖，借资训练。清廷旋即任命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第一任轮船统领，是为福建海军建置之初始。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清政府为加强台湾、福建的海防，令曾一度调任长江水师提督的李成谋“即赴福建厦门、台湾一带总统水师，并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备不虞”②。这是清廷正式命令福建建立海军。至中法战争前，船政局共造兵商轮船24艘，其中除2艘在台湾海面失事、10艘分拨沿海各省外，留在福建的仍有12艘，加上购买外国的4艘和拿获充军的一艘，共有舰只17艘（见下表），在沿海各省中首先初步建成海军。

福建海军舰船表

舰　名	舰　种	排水量（吨）	马力（匹）	航速（节）	炮位（门）	下水年代
靖海	轮船					1865
万年清	运输船	1370	580	10	6	1869
长胜	轮船					1865
建威	练船				5	1870
福星	炮舰	550	320	9	4	1870
福胜	炮舰	250	400	8	1	1871
建胜	炮舰	250	400	8	1	1871
海东云	轮船					

① 沈葆桢：《请简派轮船统领折》，见《洋务运动》（二），第278页。
② 转引自《督办福建船政吴赞诚奏折》，《洋务运动》（二），第403页。

舰　名	舰　种	排水量（吨）	马力（匹）	航速（节）	炮位（门）	下水年代
伏波	炮舰	1258	580	10	7	1870
飞云	炮舰	1258	580	10	7	1872
扬武	炮舰	1560	1130	12	11	1872
振威	炮舰	572	350	9	6	1873
永保	运输船	1353	580	10	3	1873
海镜	运输船	1358	580	10	3	1873
琛航	运输船	1358	580	10	3	1874
济安	炮舰	1258	580	10	7	1874
艺新	炮舰	245	200	9	5	1876

南洋海军是在自制和购买外国舰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江南制造总局于1868年制成“恬吉”号轮船，至1876年又制造了6艘。由于经费支绌等原因，其后便暂停造船，而主要制造枪炮、子弹、火药。“海防议”后，沈葆桢开始筹办南洋海军，负责江苏、浙江两省沿海的防务。1876年时，驻扎于江浙各海口的兵轮有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恬吉”、“测海”等6舰和借调福建船政局的“元凯”、“登瀛洲”两舰。这是南洋海军最早的组成部分。1878年，沈葆桢以南洋厘金日减，税课日绌，海防无款可筹为由，要求改变原先为使北洋尽快成军而将海防经费400万两统解北洋的成议，仍照最初定议分解南北两洋，“拟各治一军以求速效”①。1879年，沈葆桢于1875年向英国订购的4艘炮舰“镇东”、“镇西”、“镇南”、“镇北”抵华，被李鸿章留在北洋，次年才将已使用多年的同型炮舰“龙骧”、“虎威”、“飞霆”、“策电”拨归南洋使用。1881年，福建船政局制造的“澄庆”舰调归南洋。同年秋，左宗棠接任两江总督，又在闽局订造巡洋舰一艘（“开济”号），并从德国订购“南瑞”、“南琛”两艘巡洋快舰。这样，至中法战争时，南洋海军共有舰船17艘（见下表），规模初具。

① 池仲祐：《海军大事记》，见《洋务运动》（八），第483页。

南洋海军舰船表

舰　名	舰　种	排水量（吨）	马力（匹）	航速（节）	炮位（门）	下水年代
测海	炮舰	600	431	9	8	1869
威靖	炮舰	1000	605	10	14	1870
靖远	炮舰	572	350	9	6	1872
驭远	炮舰	2800	1800	12	18	1875
元凯	炮舰	1258	680	10	9	1875
金瓯	炮舰	195	200		5	1876
登瀛洲	炮舰	1258	580	10	7	1876
龙骧	炮舰	319	310	9	5	1876
虎威	炮舰	319	310	9	5	1876
飞霆	炮舰	400	270	9	6	1877
策电	炮舰	400	270	9	6	1877
南瑞	巡洋舰	2200	2400	15	18	1883
南琛	巡洋舰	2200	2400	15	18	1883
开济	巡洋舰	2200	2400	15	13	1883
超武	炮舰	1268	750	12	7	1878
澄庆	炮舰	1268	750	12	6	1880
福安	运输舰					

北洋海军的筹建动手较晚，与李鸿章认为筹办海防必须先从陆防开始有关。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不久，就曾写信给同僚说："早为自强之策，大沽海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处应驻重兵……动辄弹压。海外我与彼族共之，缓图可也。"① 1874年海防大讨论时，他更明确地提出了以陆为主的设防方针，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②。此外，北洋没有制造轮船的机器局，尽管李鸿章从江南制造总局和闽厂分别调来了"操江"、"镇海"，并向英国船厂订购了"龙骧"等4艘炮舰，但是这些舰只只是为北洋巡哨之用，或结合陆路防守海口，还没有建立海军控制海权的思

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2页。

②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洋务运动》(一)，第43页。

想。李鸿章真正重视海军建设，实际上是在 1879 年日本吞并琉球后才开始的。当时，不少文武官员奏请清廷采取有效措施，以对付日本的侵略扩张，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也认为“现在日本恃有铁甲船，狡焉思启，则自强之策，自以练兵购器为先”①，遂令南北洋大臣购买铁甲舰，组建海军。另一方面，李鸿章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政治、经济的进步发展和军事力量的日益壮大，也感到不安，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②。因此，认为中国筹购铁甲舰，加强海上设防，已不可或缓。他强调指出：“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又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奕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③李鸿章决心建立近代海军后，便积极展开筹款购舰活动。由于他认为“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便采取向外国购舰为主的创建海军方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即向英国订购“超勇”、“扬威”两巡洋舰，又代山东订购了“镇中”、“镇边”两炮舰。1880 年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和“济远”3 艘铁甲舰，并聘请英弁葛雷森为总教习，后又聘英人琅威理为总教习。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开始了北洋海军的组织建制工作。1879 年，“镇东”、“镇西”等 4 艘炮舰抵华，加上“操江”、“镇海”和驻牛庄的“湄云”、驻烟台的“泰安”，北洋已有兵舰 8 艘，李鸿章便奏留记名提督丁汝昌统带操练。1880 年，沈葆桢卒于两江总督任所，“海军之规画遂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董之”④。1881 年，“超勇”、“扬威”

---

① 《清实录》(五三)，第 413 页。

② 李鸿章：《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第 26 页。

③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折》，《洋务运动》(二)，第 421 页。

④ 池仲祐：《海军大事记》，见《洋务运动》(八)，第 484 页。

两舰抵华，李鸿章即奏请清廷令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为保养和维修舰只，李鸿章在大沽设立船坞，订购铁甲舰后，又选择旅顺为基地建设大型船坞。对海军人才的培养，李鸿章更为重视。早在筹建海军前，李鸿章等就曾派幼童和船政学生留学美、英、法等国，认为此乃“海防自强之基”。北洋筹建海军后，李鸿章即奏请创立天津水师学堂，强调“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于闽省，往返咨调，动需时日。且南北水土异宜，亦须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北洋现筹添购碰快铁甲等船，需人甚众。……应就天津机器局度地建设水师学堂”。①此外，他还在大沽设立水雷学堂，并继续派遣福建船政学生出国留学。1884 年，因中法战争爆发，在德国船厂订购竣工的“定远”等 3 艘铁甲舰受德国当局阻挠未能抵华，但这时北洋海军已有 14 艘舰只(见下表)，规模初具，并成为当时中国四支海军中从建制、装备、设施到训练均较完备的一支，大大增强了北洋海防实力。

北洋海军舰船表

舰　名	舰　种	排水量（吨）	马力（匹）	航速（节）	炮位（门）	下水年代
湄云	炮舰	550	320	9	6	1869
操江	炮舰	640	425	9	8	1869
镇海	炮舰	572	350	9	6	1871
泰安	炮舰	1258	580	10	7	1877
威远	炮舰	1268	750	12	7	1877
康济	炮舰	1300	750	12	15	1879
镇东	炮舰	440	350	8	5	1879
镇西	炮舰	440	350	8	5	1879
镇南	炮舰	440	350	8	5	1879
镇北	炮舰	440	350	8	5	1879
镇中	炮舰	440	750	8	5	1881
镇边	炮舰	440	840	8	5	1881
超勇	巡洋舰	1350	2400	15	12	1881
扬威	巡洋舰	1350	2400	15	12	1881

① 《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二)，第 460～461 页。

第四节　北洋近代海防体系的形成

一、第二次“海防议”和海军衙门的建立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清军在陆路战场取得了最后胜利，而海战却受到挫折，特别是马江海战，初建的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灭，损失惨重。鉴于陆胜海败的经验教训，战后，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又一次展开了振兴海军、加强海防建设的大讨论。1885年6月21日（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日），清廷发布上谕：“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乃令李鸿章、左宗棠等沿海督抚就海防和海军建设等问题，“各抒所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①实际上，早在朝廷颁布上谕以前，一些亲临中法战争前线参加过作战指挥的督抚大臣如左宗棠、张佩纶等，就已针对海防出现的种种问题，向清廷提出过建议和意见。朝廷下旨后，他们更加积极地与其他督抚一起进行商讨。这次“海防议”突出的特点是讨论的问题较为集中，针对性较强。总的看来，这次大讨论主要是围绕加强海军建设和建立全国海军事务机构两大问题进行的。

（一）关于加强海军建设问题

督抚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必须加强海军建设，特别是要建立拥有铁甲舰的海军，才能抵御外来侵略。两广总督张之洞说：“战守两事，义本相资，故必能海战而后海防乃可恃。……自去年用兵以来，海上攻守得失之故，中朝士夫、边疆将帅皆已晓然”。并且指出：“今虽越事略定，而外患方殷，法逼滇桂，俄窥珲春，且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943页。

俄与倭争朝鲜，英与俄争印度，英与德又复分踞朝鲜各岛，伺便攘臂于其间。四夷斗争于中华洋面，而我亦将受其敝，故海防诸大端，天时人事，无可再缓”。① 李鸿章也说：“以大治水师为主，洵为救时急务”②。然而，究竟如何加强海军建设，诸如需要建立多少支舰队、每支舰队需要多少舰只、舰只是购买为主还是自造为主、饷项如何筹措、海防炮台怎样修筑、海军人才如何培养等问题，督抚们见仁见智，各有自己的主张。

中国海疆万里，究竟应建立多少支舰队？每支舰队配备各种舰船以多少为宜？督抚们众说纷纭。但面对当时业已存在四支舰队的既成事实，不少人主张建立四支。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的意见较有代表性，他说：“中国七省洋面广袤万里，南须兼顾台湾孤岛，北须巡护朝鲜属邦，非有四枝得力水师，万不敷用。北洋合直、东、奉为一枝，南洋苏、浙合为一枝，闽、台合为一枝，广东自为一枝。每枝必有铁甲船两艘，快船四艘，捷报舸两艘，鱼雷艇二十只，运兵轮船两只，以先立根基，徐图充拓”③。穆图善关于“海军宜区四部”④的意见，与李鸿章的上述主张颇为一致。

究竟是造舰还是买舰，督抚们对此也有不同主张。左宗棠向来是主张以自造为主的。他强调说：“海防以船炮为先，船炮以自制为便，此一定不易之理也。”⑤李鸿章则一直坚持以购买为主，但在这次“海防议”中，却也不忽视发挥闽厂自制舰只的作用。他说：“铁舰工程较大，中国铁矿尚未兴办，钢面铁甲西洋各国现只有两厂能造，欲以大件运华合拢殊不合算。捷报舸机灵行速，在洋厂定造为宜。其穹甲快船及鱼雷艇等，则可令闽厂妥觅图式，次

---

①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51页。

②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565页。

③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566页。

④ 参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60页。

⑤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39页。

第仿造”①。两江总督曾国荃等，也认为中国船厂不能制造铁甲舰，主张“先从购买入手”②。

在筹饷问题上，督抚们也绞尽脑汁，多方设法，提出各种方案。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澂主张“陆军裁八留二，所节之饷，半归户部，作为水师经费”③。他说：“陆军十营之费可抵头等铁甲船一船之用。……七省各裁十营陆军，并不见少，巨舰骤添七号，水师颇觉可观”④。张之洞提出洋药（鸦片）税厘并征，认为除正税30两外，计每箱征并厘80两，每年入口中国的洋药约8万箱，计可征并厘640万两。“此等洋关巨款，正宜作洋防之用”⑤。李鸿章则建议由户部发行钞票，并“酌提各关洋药加税岁二三百万，专作购船之需”。他强调指出：“总之，无论如何开源节流，每岁须另筹提银五百万两以为大治水师之需，约计十年当可成军。光绪元年奉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名为四百万，大半无著，岁各仅得银数十万，只能备养船购器零用而已”。⑥

此外，在这次“海防议”过程中，督抚们对沿海炮台的修筑也非常重视。李鸿章说：“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有兵船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之子药、煤水一罄，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械而无前后炮台，亦必为敌所夺，故炮台极宜并举。”⑦吴大澂则认为保护后路之炮台十分重要，提出对“从前不甚得力之炮台皆当改造”⑧。张之洞也说：“台船相辅，其功乃彰”⑨。他认为海军与炮台密不可分，互为作用，强调必须仿照西法修筑炮台。

---

①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566页。
②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43页。
③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64页。
④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46页。
⑤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53页。
⑥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570页。
⑦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568页。
⑧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48页。
⑨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55页。

（二）关于建立海军衙门问题

建立全国海军事务领导机构，是清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酝酿和讨论的问题。早在 1874 年第一次“海防议”时，总理衙门章京周家楣就提出另立海军，“简派知兵大员帅之”的设想。1879 年，两江总督沈葆桢也认为需要有个“威望素著之大将”统一领导各省舰只的操练，使号令划一。同年，英籍总税务司赫德为统一南北洋海防事宜，乘机提出设“总海防司”，由其本人自兼。赫德的建议显然有控制中国海军之嫌，当即遭到沈葆桢等人的极力反对而未被清廷采纳。1880 年，内阁学士梅启照提议仿长江提督之例，设立外海水师提督，节制沿海各镇。1881 年，中国驻日本长崎领事余乾耀首先提出建海军衙门，总理全国海军事务，受到清廷的重视。次年，翰林院侍讲学士何如璋就海军发展问题上疏六条，其中提到，海军巡防布置必须联络一气，始无兵分势散之虞，故“请旨特设水师衙门，以知兵重臣领之，统理七省海防，举一切应办之事，分门别类，次第经营”①。由于朝鲜发生兵变，清廷忙于交涉，无暇顾及。1883 年，清廷接受都察院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建议，在总理衙门内添设“海防股”，迈出了统一全国海防事务的第一步。翌年初，中法战争不断扩大，海防日趋吃紧，张佩纶再次建议设外海水师及水师衙门。恭亲王奕䜣等决定于烟台设“海防衙门”，由李鸿章出任海防大臣。李鸿章对这一责重权轻的职务不感兴趣，乃复信总理衙门，称应参照西方国家外部、海部并设衙门于都城的做法，“请径设海部，即由钧署兼辖，暂不必另建衙门”②。奕䜣坚持己见，仍奏请在外设海防衙门。不料朝局忽变，奕䜣遭慈禧罢黜，此事遂寝。同年 5 月，张佩纶被任命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赴任前再次奏称：“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船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③。慈禧令李鸿

---

① 《翰林院侍讲学士何如璋奏》，《洋务运动》（二），第 534 页。

②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 31 页。

③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 37 页。

章、曾国荃“先行会议具奏”，后因战事频繁，此事又被搁置起来。

第二次“海防议”中，督抚们较为一致地认识到必须尽快建立海军衙门，统一领导全国海军事务。李鸿章再次强调应仿照西国添设海部或海防衙门，俾得“有专办此事之人，有行久之章程，有一定之调度，而散处之势可归联络”①。左宗棠更是认为“海防无他，得人而已”，乃专折奏设“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悉由该大臣统筹全局，奏明办理。畀以选将练兵、筹饷、造船、制炮之全权，特建衙署驻扎长江，南拱闽粤，北卫畿辅。”② 张之洞则主张分海军为四大支，虽仍受各省节制，但应统隶于京师，由总理衙门总统，“以便通计度支，权衡缓急，整齐规划，选择人材”③。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澂也认为，中国应仿照各国海部之例，“在京城添设总理水师衙门，特派公忠体国、晓畅戎机之亲王，总理水师事宜，沿海各省督抚均归节制”。又于疆吏大员中“钦派威望素著、熟悉洋务之大臣一员督办水师，加总理水师衙门大臣衔，各口分驻兵轮均归调遣”。吴大澂强调："此为整顿水师之根本"④。

在沿海各省督抚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慈禧于1885年9月底下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以及应召来京的李鸿章等就海防善后事宜“妥议具奏”，并令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⑤随后，由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汇总，归纳出关于练兵、筹饷、用人、制器等方面的意见，而且特别指出："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⑥。鉴于筹饷、选将不易，各洋难以全面铺开发展海军，总理衙门奏请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此后分年筹款，次第兴办。这一方针，基本上是10年前制定而未得到认真贯彻的

①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570～571页。

②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57页。

③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51页。

④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46页。

⑤⑥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58页。

"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方针的翻版。关于设立海部或海军衙门问题，总理衙门建议钦派王大臣综理其事，并责成派出之疆臣专主其事。10月12日，慈禧赞扬"所筹深合机宜"，随即颁布懿旨："著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①10月24日，奕譞等奏请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获准成立。至此，历时4个多月的第二次"海防议"结束。

二、北洋舰队发展成军

第二次"海防议"后，清政府建立了海军衙门，并再次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海军，这样，海防建设的重点便进一步转移到了北洋。除广东增加了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广甲"、"广乙"、"广丙"3艘舰船外，南方三洋海军再无发展，海防建设只是在沿海主要口岸修筑一些新式炮台，装备一些外洋先进火炮而已。北洋海防建设则由于受到海军衙门的直接关心和支持，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舰船也得到调整和加强。

起初，醇亲王奕譞将海防经费收归海军衙门，北洋仅给"定远"、"镇远"、"济远"3舰薪饷，其余各舰及海防费用由北洋自行筹集解决。对此，李鸿章及北洋官兵均一致反对。李鸿章复函海军衙门指出："今海防经费拨归钧署，别无常款可指，来示仅准给三舰薪饷，此间文武将弁一闻此信，惊惶无措，不啻婴儿之失哺，必致诸事废弛，不复能军。三舰现赴厦门操巡，已预支四个月薪饷煤费。超勇等四船分防朝鲜要口，当该国危疑（难）之际。岂可因饷缺罢防？诸如此类，皆有不能中止之势。明年确需数目务

①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66页。

求慨允，如数筹给，鸿章方敢勉任其事。"①李鸿章的强硬态度，使奕譞不得不改变初衷，表示"除署存洋款照数拨往外，其外解常例海防经费，亦拟随到随拨"，从而满足了李鸿章的要求。

李鸿章争取到海防经费后，为进一步取得海军衙门的关心和支持，又以验收"定远"等铁甲舰为名，请求奕譞视察北洋海防。奕譞为了表示重视海防，经慈禧批准，于1886年5月率文武随员30余人，在李鸿章的陪同下，先后巡阅了旅顺、威海、烟台、大沽等地的驻军、炮台、学堂、基地设施以及北洋海军和南洋3舰（"南琛"、"南瑞"、"开济"）的会操与实弹打靶等。6月2日，奕譞奉慈禧懿旨："海防关系紧要，必须逐渐扩充，历久不懈。……经此次巡阅之后，醇亲王奕譞务当会同李鸿章等物色将才，实力整理。并督饬现在管带各员，认真练习，力求精进。应如何筹集巨款续添船炮之处，并著随时会商，奏明办理。"②此后，李鸿章便加速北洋海防近代化的建设，积极发展北洋海军，并加紧建设海军基地，使北洋形成"重门叠户"的防御体系。

1888年春，李鸿章于第二次"海防议"后向英国订购的"致远"、"靖远"巡洋舰和向德国订购的"经远"、"来远"巡洋舰抵达天津大沽。这些舰只与1885年11月抵华的德制"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和"济远"号穹甲巡洋舰一起，构成了北洋舰队的主力阵容。至此，北洋海军拥有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炮舰6艘，加上鱼雷艇、练船和运输船等，共有25艘（见表），基本上达到了近代海军成军的标准。

北洋海军发展成军后，制定《北洋海军章程》和确定舰艇编队，自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实，在此之前，随着北洋海军主力舰只逐步齐备，海军衙门和李鸿章就已开始考虑这一问题。1886年夏奕譞巡视北洋海防后，即在奏折中提到："将来船只成军，自

① 李鸿章：《请拨海军的饷》，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1，第12页。

②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247页。

应请专设提督等额缺，妥定章程，以专责成而固军志。”①李鸿章更是早就注意到北洋海军各项制度的制定，并阅读了一些外国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成军后，他即将由北洋海军副将刘步蟾等草拟的《北洋海军章程》送呈海军衙门。1888年10月初，章程经慈禧批准，由奕譞颁布实施。李鸿章称："查各国水师，惟英最精最强，而法德诸国后起学步，其规模亦略相仿。吾华船政学堂本袭英国成法，故北洋现在办法及此次所拟章程，大半采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处，或参仿德国初式，或仍遵中国旧例"②。

《北洋海军章程》的内容相当丰富和详细，主要有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铃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14款。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海军章程。它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奕譞奏称：北洋海军成军后，"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③。据《北洋海军章程》规定，经李鸿章提议，清廷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刘步蟾、林泰曾分别为右、左翼总兵兼"定远"、"镇远"舰管带。其余官员的定额是：副将5员（分别委带"致远"、"济远"、"靖远"、"经远"、"来远"各舰）、参将4员、游击9员、都司27员、守备60员、千总65员、把总99员、经制外委43员。全军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节制。船制方面，将能出洋作战的铁甲舰、巡洋舰9艘编为中军和左、右翼3路，每路3船；将只能防守海口的炮舰6艘编为后军；将鱼雷艇及练船、运船等10艘另编为左、右、前、后队，不与战船中军、左、右翼相混。全舰队共有官兵4000余人。北洋舰队成军后，按李鸿章的计划，准备再向外国购买几艘巡洋舰和通讯舰，但由于清政府将海防经费挪作他用，至甲午战争前，除增加一艘由福州船政局

---

①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252页。

② 李鸿章：《议拟海军章程奏底》，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第7页。

③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下），第470页。

北洋海军成军后实力表

舰名	舰种	排水量(吨)	马力(匹)	航速(节)	武器		乘员(人)	下水年代	制造地
					火炮(门)	鱼雷管(枚)			
定远	铁甲舰	7335	6000	14.5	22	3	331	1882	德
镇远	铁甲舰	7335	6000	14.5	22	3	331	1882	德
经远	巡洋舰	2900	5000	15.5	14	4	202	1887	德
来远	巡洋舰	2900	5000	15.5	17	4	202	1887	德
致远	巡洋舰	2300	5500	18	23	4	202	1887	英
靖远	巡洋舰	2300	5500	18	23	4	202	1887	英
济远	巡洋舰	2300	2800	15	18	4	204	1883	德
超勇	巡洋舰	1350	2400	15	12		140	1881	英
扬威	巡洋舰	1350	2400	15	12		139	1881	英
镇东	炮舰	440	350	8	5		55	1879	英
镇西	炮舰	440	350	8	5		54	1879	英
镇南	炮舰	440	350	8	5		54	1879	英
镇北	炮舰	440	350	8	5		55	1879	英
镇中	炮舰	440	750	8	5		55	1881	英
镇边	炮舰	440	840	8	5		54	1881	英
威远	练习舰	1268	750	12	7		117	1877	闽
康济	练习舰	1300	750	12	15		137	1879	闽
敏捷	练习舰	750					60		英
左一	鱼雷艇	108	1000	24	6	3	32	1887	英
左二	鱼雷艇	108	600	19	2	2	32	1887	德
左三	鱼雷艇	108	600	19	2	2	32	1887	德
右一	鱼雷艇	108	600	18	2	2	32	1887	德
右二	鱼雷艇	108	597	18	2	2	15	1887	德
右三	鱼雷艇	108	597	18	2	2	15	1887	德
利运	运输舰								

说明：在向国外订购的舰艇中，有个别的舰名与晚清自造的舰船同名，但性能不同。

造的巡洋舰“平远”号外，未再增添一舰，以致停止了发展。

三、北洋海军基地建设

海军基地主要为海军舰队提供战斗保障和后勤保障，应具有指挥、通讯、后勤、岸防等功能。营造海军基地主要包括港口、码头、船坞和炮台等工程。北洋海军基地建设是从京津门户大沽开始的。中法战争前后，为了增加京津门户防御的稳固性，又在旅顺、威海等处兴建较为近代化的海军基地。

（一）旅顺海军基地的兴建

由于大沽船坞无法驻泊和修理铁甲舰，早在北洋舰队成军以前，李鸿章就不得不着手选择其它地区修建新的海军基地。开始考虑在大连湾兴建，但经派人实地考察，发现大连湾口门过宽，非有一支强大陆军难于防守。最后经他亲自勘察，决定先经营旅顺口。他认为该口形势实居险要，是直、奉两省海防的关键，决定将其建设成为“北洋第一重捍卫”。

旅顺口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港湾群山环抱，口小腹大，口门东西两侧分别有黄金山、老虎尾山，两山紧锁港门，形势险要。港内分东西两澳，东澳面积较小，水位较深，西澳面积较大，水位略浅。旅顺口终年不冻，系优良天然军港。不但如此，它与山东半岛的登州、烟台、威海遥望相对，紧锁渤海海峡，成为进出渤海的咽喉、京津的海上门户，因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旅顺孤突于海，没有广阔的腹地，南关岭一带蜂腰部易被敌人切断，威胁后路安全，这也是天然的缺陷。

旅顺口海军基地工程的兴建，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自1880年冬开始至中法战争期间）除疏浚口门、船澳，修筑石坝，添建库房外，主要依旅顺口临海一侧的山形地势，修筑了东西两岸炮台，装备各种新式火炮60余门（内有24厘米口径的克虏伯后门钢炮11门）。东岸有黄金山、摸珠礁、老砺嘴炮台；西岸有老虎尾、威远、蛮子营、馒头山、城头山炮台。这些炮台均

仿照德国新式兴建，由德国人汉纳根监造。各台配置的火炮能交叉射击，封堵港湾口门。李鸿章于 1884 年 9 月奏称：旅顺口“炮台高踞山顶，筑造精坚。上有巨炮可击来船，其近山要路数处，多设行营炮垒，并于口内密布水雷，沿岸多设地雷。派四川提督宋庆统毅军等十一营驻守，已革江西南赣镇总兵王永胜带护军营八哨协守台垒，天津镇总兵丁汝昌，带蚊船两号、快船两号，并道员刘含芳带鱼雷艇弁兵，与宋庆等表里依护。如敌船游弋外海，可相机伺便狙击，冀以牵制其北攻津沽，且借卫奉省门户。”①

1885 年 11 月“定远”、“镇远”两铁甲舰抵华之后，急需兴建大型船坞，于是旅顺海军基地的建设转入后一时期。海军衙门成立不久，李鸿章即致函奕譞，强调“船坞一项为水师根本，必不可省之工。凡各国有铁舰快船者，皆必先立水师口岸，先修大石坞”。并说：“铁船易积海蠹，或偶损坏，无坞可修，便成废物，此为至要至急之举”。②经批准后，李鸿章将船坞营建工程包给法国人德威尼，派直隶按察使周馥等督同办理，并添筑拦潮石坝。工程进展顺利，于 1890 年秋竣工。李鸿章奏称：“今据验收，各工均属相符”。“嗣后北洋海军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洵为缓急可恃，并无须糜费巨资。从此……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裨益于海防大局，诚非浅鲜”。③在兴建船坞的同时，为了弥补旅顺后路的天然缺陷，李鸿章派宋庆等部在旅顺至金州大道的两侧山地修筑陆路炮台。东侧筑有大小坡山、东鸡冠山、望台北、二龙山、松树山等炮台；西侧案子山筑有东炮台、西炮台、低炮台。东西两侧各炮台彼此以高 2 米、厚 1 米的长墙连结，形成东西两个炮台群。两炮台群火力交叉，能封

---

① 李鸿章：《遵呈海防图说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1，第 23 页。

② 李鸿章：《复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 1，第 2～3 页。

③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 267～268 页。

锁金州至旅顺的大道。此外，李鸿章还令河北镇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于大连湾修建炮台 6 座，其中有和尚岛（中、东、西台）、老龙头、黄山海岸炮台 5 座，徐家山陆路炮台 1 座。李鸿章称：各台“仿照外洋新式，曲折坚固。后面兵房、子药库，纯用条石砌成，前墙厚培素土，宽至十数丈，足御敌弹。老龙头一座，轰山拓地以作台基，用力尤巨”①。这样，旅顺、大连湾互为犄角，既可巩固旅顺海军基地的后路，且可兼防金州城。

（二）威海海军基地的兴建

威海位于山东半岛北海岸东部，与辽东半岛的旅顺隔海相望，共扼渤海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威海有三面环山的天然港湾，且有刘公岛横卧湾口，形成天然屏障，并将港门分为南北两口。刘公岛稍南有日岛，西面有与之相连的黄岛，另有里岛、青岛、外岛等岛屿分布海中，更增添了威海的险要形势。

李鸿章鉴于威海水深地阔，自 1881 年开始，即以之为北洋海军舰只停泊之地。1883 年，由候补道刘含芳主持，在威海建立鱼雷营，并征购民地以备建港。由于经费不易筹措，直至 1887 年，清政府才决定正式经营威海。于是，李鸿章奏派绥、巩军各 4 营前往该处，以道员戴宗骞为统领。次年，又调派护军 2 营驻刘公岛，以总兵张文宣统之。自此，威海海防工程全面展开。至 1891 年夏，主要项目基本竣工，威海已成重镇。

威海基地工程除了在刘公岛上修建北洋海军提督衙门和大批营房以及铁码头、屯煤所、弹药库、机器厂、水师学堂、医院等设施外，主要是修筑南北岸和刘公岛等处海岸炮台，共计 13 座。北岸有北山嘴、黄泥沟、祭祀台，统称北帮炮台。南岸有灶北嘴、鹿角嘴、龙庙嘴，统称南帮炮台。刘公岛有东泓、东峰、南嘴、旗顶山、麻井子、黄岛 6 座炮台。另有日岛炮台 1 座。其中，刘公岛岛北和日岛炮台为地阱炮台，安设 24 厘米口径后膛炮，用机器升降，非常灵速，“能狙击敌船，而炮身蛰藏不受攻击，为西国最新之式”。李鸿章于

①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 274 页。

1891年5月巡阅威海卫后奏称：各炮台“均得形势，做法坚固，足与大连湾各台相埒”①。为了防止敌人从陆路绕攻基地，海岸炮台竣工后又续造陆路炮台4座，即南岸后路之所城北、杨枫岭炮台和北岸后路之合庆滩、老母顶炮台。此外，李鸿章还奏请在威海南北两岸各设水雷营一处，并在南岸水雷营附设水雷学堂。

（三）营口、烟台、胶州湾海口炮台的兴建

在兴建威海海军基地的同时，李鸿章奏请在营口兴筑炮台。他认为，营口系通商码头，与陪都最为切近，为奉省沿海紧要门户。虽于东岸筑有5座炮台，置炮30余门，并设有水雷营，“无如该处岸阔水深，潮落时轮船亦可行驶，若遇敌船窥伺，无险可扼，仅一炮台孤悬东岸，旁无接应，殊为兵家所忌”②。便在西岸添造炮台，配置克虏伯后膛钢炮10门，于甲午战争前竣工。

在烟台方面，李鸿章认为，该口水深口宽，尚无建置，实不足以壮声威，而且烟台与威海相距百余里，系其后路，不能有空虚之处，遂在该口进行设防。烟台早在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期，曾筑有通伸冈大炮台3座、小炮台6座。由于该炮台距口门过远，即使置巨炮亦难遥击。于是，李鸿章决定在舰艇出入必经之路的岿岱山修筑炮台，配置巨炮，同时在与之相连的玉带山添筑炮台，以便策应。后以玉带山“形势过露，易为敌乘”，改在通伸冈旧炮台之下添筑。甲午战争前，烟台新建各炮台工竣。李鸿章称：“所修炮台，纯仿西式，曲折通灵，与威、大两处台工一律坚固。”③

在胶州湾方面，早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时，就曾有人向清廷提出应先建港于胶州湾。李鸿章不以为然，认为胶州湾距天津1300余里，“实属鞭长莫及”④。“自来设防之法，先近后远。旅顺

---

①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274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9，第7页。

③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282页。

④ 李鸿章：《议复朱一新条陈》，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1，第28页。

与大沽犄角对峙，形胜所在，必须先行下手”①。于是胶州湾海防工程遂缓行兴建。直至威海基地工竣，李鸿章才奏称：“胶州海澳宽深，口门紧曲。……现在威、大各口修筑炮台，水师相依，俱成海防重镇。若有敌船远来，必求一深水船澳停驻之处；至于乘隙登岸，陆路内犯之说，尤可虑也。是胶澳设防，实为要图”②。但正当李鸿章在胶州湾沿岸之青岛、坦岛、团岛等处修筑炮台，督饬将弁“认真合力工作，以期早日告成”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至此，北洋海防建设遂告中辍。

四、北洋海防体系评析

北洋海防，自始至终由李鸿章一手经办。起初，李鸿章仅是率领淮军驻扎于津沽一带，与直隶练军一起修筑大沽、北塘炮台，并选择新城、军粮城筑台建垒，为该两海口炮台的后路。后又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修筑炮台进行设防，严密防守进京之路。这时，李鸿章的设防思想只是“以陆为主”的“凭岸固守之计”，认为只要把守陆路和海口炮台，敌必不敢轻视。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认识到，为了抵御从海上入侵之敌，必须采取“守定不动之法”和“挪移泛应之法”两种手段，以便水陆相依，密切结合。这表明李鸿章的海防思想有所发展，即不但注重海口设防，而且开始注意海上设防了。1879 年日本吞并琉球后，海防形势日趋紧张，李鸿章决心组建海军，并于旅顺、威海等处兴建海军基地。至 19 世纪 90 年代初，北洋三省初步形成了陆地、海口和海上相结合的近代化防御体系。李鸿章颇为得意地说：“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③

---

① 李鸿章：《筹议胶澳》，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 1，第 23 页。

②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 276 页。

③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 283 页。

又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① 其言不无言过其实和自我吹嘘之处，但应看到，这一防御体系对于北洋三省海防尤其是捍卫京津要地，增加了防御层次，拓宽了防御领域，加强了防御的稳固性。李鸿章没有忘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由于津沽失守，英法联军很快侵入北京的惨痛历史教训，曾深刻地指出："咸丰十年，夷兵犯津通，而根本遂危。彼族实能觇我要害，制我命脉。而我所以失事者，由于散漫设防，东援西调，未将全力聚于紧要数处。今议防海，则必鉴前辙。"② 其实，李鸿章早在清廷任命他担任直隶总督时，就认定必须坚决捍卫京畿重地，并把其所部最精锐的淮军调至津沽一带驻防。他向清廷表示："臣既奉命移督畿疆，义应竭力捍卫，自须酌留劲旅，以固门户。"③ 他兼任北洋大臣经管洋务、海防各事宜后，再一次上奏清廷："窃维天下大势，首重畿辅，中原有事，则患在河防，中原无事，则患在海防"，"整顿海防，洵属未雨绸缪之策"。④ 于是，便竭力经营津沽以及山海关等渤海湾一带的海口，后又积极筹建北洋海军和兴建北洋海军基地，延伸防御纵深，"使渤海有重门叠户之势，津沽隐然在堂奥之中"⑤。不难看出，李鸿章对于北洋三省海防建设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也无可否认，李鸿章筹办海防有很大的局限性，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防御思想保守落后。尽管李鸿章积极提倡采用近代化的武器装备，但对西方的近代战争理论，并没有很好研究。他认

---

①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 275 页。

②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第 17 页。

③ 李鸿章：《复奏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7，第 3 页。

④ 李鸿章：《裁并通商大臣酌议应办事宜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7，第 10～11 页。

⑤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2，第 30 页。

为除枪炮轮船外，“中西用兵之法大略相同”①。在筹办北洋海防之初，李鸿章根据当时中国经济困难、技术人才缺乏，难于迅速组建海军的情况，确定着重加强重要海口和陆上设防，并注意向近代化方向迈进，无疑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然而，其海防思想未能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在建立北洋舰队和修筑旅顺等处海军基地的过程中，虽然他也讲了“决胜海上”、“以战为守”、“筹防守之法，但当以战为防，不能以守为防”② 之类的话，但从全局观察，其“以守为战”的消极防御思想始终占居主导地位。他根本没有让北洋舰队与侵略军在海上鏖战的思想，这就为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彻底失败埋下了祸根。

其次，缺乏全国一盘棋的战略防御思想。中国面临广阔的太平洋，海岸线甚长。奉、直、东、江、浙、闽、粤七省一水可通，战略地位均十分重要。日本侵台事件后，清政府积极筹集资金，加速建设近代化的海防。由于财力有限，不得不作出首重北洋的抉择。而负责北洋海防建设的李鸿章，没有从全局出发，过多地考虑北洋一隅的防范，缺乏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协同思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最突出地表现在海军基地的选择上。北洋天然良港甚多，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如同两条巨臂伸入海中，共扼渤海海峡。李鸿章依据这一天然形势，先则设防于大沽、北塘、山海关等海口，继则设防于旅顺、大连、威海。这是不无道理的，然而不够全面。他没有认识到山东半岛另一个天然良港胶州湾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不但天然形势优于旅顺、大连湾，甚至威海卫，而且其地理位置也利于从南面控守北洋。尤其是北洋舰队驻守胶州湾，可与南洋舰队联为一气，互相支援。当李鸿章选择旅顺为海军基地不久，不少人士就纷纷提出倾向于胶州湾或威海卫建立海军基地的意见。北洋海军总查英人琅威理把

---

① 李鸿章：《武弁回华教练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5，第 34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2，第 30 页。

胶州湾当作北洋之要口，而把旅顺、威海作为北洋之隘口。① 他认为胶州湾“实为海军之地利，南北洋水师总汇之区”②。而李鸿章则认为胶州湾过于偏南，嫌其太远，鞭长莫及，实质是他畛域门户之见过深，缺乏全局观念的表现。其实，李鸿章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胶州湾形势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并在该口修筑炮台。不过，他始终没有把胶州湾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予以设防。

第三，海陆分家，没有建立起军兵种合成统一的指挥机构。1885 年以后，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统一领导全国海军。尽管如此，不论陆海军，仍然没有与旧军制决裂，依然以营为基本单位。这种体制不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尤其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不但各军种之间难于合成统一，就是本兵种之间也难于协同作战。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新型海军，有各种先进舰艇和近代化程度较高的海军基地，但其编制体制照样新旧搀杂，不管舰艇大小，一舰为一营，直辖于提督。尤其是舰队与基地之间，舰队与陆上驻防军之间，基地与驻防军各部队之间，都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在平时训练中，也不进行必要的协同演练。李鸿章两次大阅北洋海军时，都是各练各的，从未有过水陆联合进行的演习。军事实践表明，新的武器装备的出现，必然带来军队编制和作战方式的变化。而李鸿章不懂得这种变化的必然性，既没有主动改变军队的编制体制，也没有建立起统一协调的指挥机构，这就给后来的实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以致造成战争的失败。

第四，旅顺、威海等基地的防御工程不够完善，后路出现空虚。尽管旅顺基地炮台、营垒林立，工程建筑坚固，部署也比较合理，不易被海上来敌击破，可是由于旅顺地形本身的天然缺陷，如果敌陆军从远滩登陆，卡住北部蜂腰部的金州，旅顺就将成为绝地而不攻自破。中日甲午战争的实践完全证实了这点。为此，李

---

① 参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下），第 792 页。

②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第 258 页。

鸿章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臣查旅顺一岛孤悬海中，所筑炮台专为备击洋面敌船而设，若论防守周密，必须于后路金州一带设立重兵，当无事时莫以为过计"①。威海海军基地同样存在后路空虚问题。英人泰莱就曾指出，威海基地"南部之内陆炮台，其内向一面，并无保障，敌人可从此面来攻"②。此乃建设过程中的疏漏之一。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9，第34页。

② 《中日战争》(六)，第55页。

第十六章　清后期边防

清朝前期，重边防，轻海防。“中国边防，东则三省，北则蒙边，西则新、甘、川、藏，南则粤、湘、滇、黔，而沿边台卡，亦内外兼顾，盖边防与国防并重焉。”① 从康熙年间起，清政府就在东北、西北地区屯田实边，设置驿站、军台，建立边防哨卡，并实行定期巡边制度。历经雍正、乾隆、嘉庆等朝，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和防守措施逐步发展。但是，自道光朝起，由于承平日久，边务多有废弛。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把主要军事力量用于抗御海上来敌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更使三北地区和西南各省武备渐衰，边塞寂寥，以致列强乘虚而入。俄犯西北，日图辽东，英窥西藏，法逼滇桂，边疆危机四伏。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清政府着手加强边防建设，但由于财政拮据、政策多变和疆臣无能等多种原因，陆疆除个别省份外，一直未能摆脱外敌侵凌的局面。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70年间，中国陆路边疆一直动荡不安，险象环生，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形势。

第一节　边防军队

一、边防军队的衰败

清朝没有专门的边防部队，各边省的驻防军队，一般同时担负设汛驻守和戍边卫境两项任务，故驻扎边疆各省的军队，同时也就是边防武装。各边省军队因历史条件、地域情况和清统治者

---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063页。

重视程度的不同，其官兵成分和编制体制也各不相同。

东三省是清朝的发祥之地，一直被视为防卫重点。在东北地区驻守的只有八旗，而无绿营，这是东三省驻军与其它省不同的地方。三省均以将军为最高军政长官，所辖军队，在鸦片战争前，奉天约 2 万人，吉林约 1.1 万余人，黑龙江省约 6400 余人。① 主要兵种是骑兵。

蒙古军队亦均为旗兵。蒙古八旗仿满洲旗制，系军政合一组织。外蒙古分车臣汗、土谢图汗、三音诺颜和札萨克图汗 4 部。每部设若干旗，旗长称扎萨克。蒙古旗兵主要驻守沿边卡伦，巡查边界。此外，蒙古各部还要轮流派出“备操兵”，自备口粮、马匹、火药、铅丸，前往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一带常川操练，每期 4 年，受定边将军随时调遣。

新疆军队建置庞杂。自前清至同治初年，一直实行“驻防”与“换防”制。所谓“驻防”，即伊犁、乌鲁木齐等冲要地区，分调旗、绿各营携眷永驻；“换防”则指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和南疆各城的防兵，更番轮戍，3 年一换。新疆军队既有旗营又有绿营。旗营含旧满营、新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多是在乾隆年间陆续从东三省、张家口和热河、凉州（今武威）等地调驻新疆的。绿营一般调自陕甘。总兵额不固定，少时约 1.9 万余人，多时约 2.3 万人。② 新疆最高军政长官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设军府于伊犁，节制南北疆驻防官兵。

云南、广西方向军队，主要是绿营。由总督、巡抚总揽军政，下有提督、总兵，统率弁兵，设汛驻守。

由于各边省部队营制不一，饷章各异，部队的建设和训练受到严重影响。除东北八旗尚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他如蒙古、新疆等地部队，只能从事一般的戍守缉查活动，无力独立遂行作战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得不把注意力较多地移向海防。与

① 参见《盛京通志》，清咸丰二年刊本，卷 27，第 23、28、38 页。

② 参见曾向吾：《中国经营西域史》，1936 年版，第 266 页。

此同时，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清政府为维护其封建统治，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置西北、东北边防于不顾，不断抽调边省部队入内地镇压人民起义，以致边防军队数量大减，边境防御作战能力急剧下降。

据统计，仅 1852～1857 年间，清政府从吉林、黑龙江两省先后调往内地“助剿”的马队，就达 1.3 万余人。这些内调部队分布在江、浙、鄂、皖、豫等广大地区，他们“与南方水土本不相习，出征日久，不免疲劳患病”，“且南省又多水田港汊，马队难于施展”。① 当时，清政府几乎抽空了东北边境的旗兵。在黑龙江的爱珲，“有能容纳几千名士兵的造得很好的营房，但没有看到一名士兵，甚至岗亭也是空的”②。就在清政府频繁地从吉、黑两省抽调兵力的时候，沙皇俄国的军队正在向黑龙江流域调动。仅在 1857 年（咸丰七年）一年中，沙俄穆拉维约夫将军就率领一个哥萨克步兵旅和一个骑兵联队（共约 3000 人），开到了黑龙江下游，并沿着江的左岸建立了许多栅卡。③ 俄国人急欲在黑龙江流域确立自己的统治④，以便进而要求中国割让东北三省。但是，“清政府显然把征剿汉人的内地看得比防卫满洲边境更重要”⑤。它明知沙俄军队已经屯集国门，却仍顽固地认为那不过是“肘腋之患”，而“发捻交乘”，才是“心腹之害”，继续将边省军队源源调向内地。“结果，在黑龙江下游和满洲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十分虚弱，已经无力阻止穆拉维约夫为所欲为了”⑥。

---

① 《吉林通志》，1900 年版（下同），卷 51，第 19 页。

② 科林斯：《西伯利亚之行》，转引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985 年中译本（下同），上卷，第 373 页。

③ 〔英〕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第 115 页。

④ 参见〔俄〕P·马克：《黑龙江旅行记》，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下同），“序言”第 1 页。

⑤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371 页。

⑥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369 页。

同治初年，清政府以“剿捻事务紧急”，继续将东北军队抽调到内地。1865 年（同治四年），吉林将军景纶忍无可忍，专折泣请同治帝对吉林军队“勿再征调，勿轻换防”。他指出：“吉林通省额兵本止一万一百五名。自军兴以来，各省征调络绎不绝，计已数十次矣。出征者多，留营者少。现查所存兵数不过四千余名，而又散在各城，不能屯聚一处。珲春、三姓、宁古塔三处防兵二千余名，已去存营之半。各该处地临滨海，界近俄夷，必须重兵分防，势难一日遣撤。其余各属，或百余名，或数十名，为数本已寥寥，而况撤回残伤几居其半。……即以拔补阵亡兵额计之，十余年来，数已逾万。户口有定，生齿无多，尤况民生拮据，困苦万状。”① 此后，清廷征调边兵的诏书才略有减少。

衰败得最严重、最迅速的要算外蒙古军队。清统治者入关后，对蒙古军队“患其强”，恐难驾驭，一直采取削弱政策。蒙古军队的军费、武器均由各盟旗自筹，中央不予支付。即使边塞有事，征调蒙兵，其薪饷粮秣等项也由各部旗分摊。各旗力薄难支，兵丁“穷苦异常”，“苦累难堪”。②蒙古地区盛行喇嘛教，各旗壮丁十有三四托迹教门，以致“游惰众而赋役微，箭丁少而军籍敝”③。1865 年，清政府曾调喀尔喀蒙古兵镇压新疆回民起义，但这些蒙兵“纪律毫无，缓急难恃”，清政府只好将其悉数撤回，“责令防守各该游牧边界，不必再行征调，免致有名无实”。④

新疆军队也同样将弱兵疲，百弊丛生。驻疆军队不仅满、汉、蒙兵杂处，各分畛域，而且分别隶属于各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建制混乱。“所称马队、步队，既罕能战之兵，而办事、帮办、领队各员，又非尽知兵之选，徒糜饷粮，无济实用”⑤。驻防

---

① 《吉林通志》卷 51，第 23～24 页。

②④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 9571 页。

③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 9573 页。

⑤ 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7，第 8 页。

兵皆是携眷移戍，远居边要，需饷浩繁。为解决官兵生计困难，不得不采取“且耕且战”政策。规定除定期操练外，主要以屯垦游牧为业。久而训练荒疏，战力下降，“调赴期会，则彼此观望，数日不能取齐，麾令前驱，则勇怯杂糅，气势不能完整”①。新疆兵多由内地征调而来，无论战否，按制皆发行饷。每年需拨饷银400余万两，俱由内地各省协解。这对于清政府和内地协省来说，一直是个沉重的包袱。在兵力分布上，由于清政府重北轻南，驻防兵多配置在天山北麓哈密至伊犁沿线各城，约占新疆总兵力3/4以上，南路除驿站、卡伦驻兵外，各城防军极其单弱，一般只调派少量绿营轮番屯戍，无力应付较大的边境冲突。

道光、咸丰年间边省军队的衰落，是清政府国防政策混乱、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必然结果。由于这一严重战略错误，不仅被沙俄趁火打劫，于咸、同年间割占了我国东北和西北约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导致了普遍的边海防危机。1865年，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侵入新疆，建立起所谓“哲德莎尔汗国”。1871年，沙俄又趁机强占了伊犁地区。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东南沿海防务重新紧张起来。

面对海防、塞防同时告急的严重局面，清政府饬令各督、抚赶紧就国防战略问题发表意见，于是发生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二者并重”的意见，一方面作出收复新疆失地的决策，命左宗棠指挥所部进军新疆，另一方面，决定加强海防建设，命李鸿章、沈葆桢统筹南北洋海防事宜。

二、边省军队的编练

同治年间开展的海防塞防问题的争论，对于清政府认清国际

① 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第8页。

形势，明确国防重点，是有重要意义的。特别是收复新疆广大地区作战的胜利使清政府认识到完善边防建设的必要性，增强了强化塞防、保卫边疆的信心，并采取措施加强边省武装力量建设。

整顿编练东三省军队，是清政府塞防建设的重点。1875 年（光绪元年），清政府在总结国防战略问题大讨论的谕旨中指出："东三省为根本重地，尤宜加意整顿。"①同时决定从翌年开始，每年由户部拨东三省练兵费 70 万两。②这一决策推动了东三省的军事发展。三省都设立了营务处，开始练军编练工作。

1875 年，黑龙江将军丰绅抽调在伍的旗兵 6000 人，又从西丹兵丁中挑选 4000 人，组成黑龙江练军。③ 其训练内容主要是骑射枪箭，效果并不明显。吉林练军至 1877 年才"规制始备"，共计官弁兵夫 3500 余人。其中马队 2004 人，分为 7 起，每起分为 4 扎兰；步队 700 余人，分为 4 扎兰，另洋枪队和抬枪队各一。"吉林练军之兴，专为剿办马贼而设"④，故该军编成后，分驻于吉林、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等 60 多个城镇堡隘处，每地一二十人至数十百人不等，皆零星散布，备多力分，与内地绿营分汛毫无二致，显然不符清政府练兵防边的初旨。

清军收复新疆后，清政府向沙俄索还伊犁。在谈判中，沙俄政府敲诈威胁，迫使崇厚与之签订不平等的《交收伊犁条约》。清政府予以拒绝，沙皇便恼羞成怒，在向伊犁增兵的同时，也向我东北、西北边境调集军队，进行武力威胁。清政府一面派曾纪泽前往俄国进行交涉，一面召集王大臣会议，紧急筹措边防问题，自此掀起了一股编练边防军队的热潮。

1880 年 2 月，清廷发布巩固东北防务的上谕，内称："此次俄国与崇厚所议条约章程，多有要求，断难允准。已改派曾纪泽前

---

① 《清实录·德宗实录》（一），第 178 页。

② 参见《清实录·德宗实录》（一），第 241 页。

③ 参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 101 页。

④ 《吉林通志》卷 52，第 1 页。

往另议。惟该国未遂所欲，难保不伺隙启衅。东三省为根本重地，且吉林、黑龙江两面与俄接壤，俄人近在海参崴地方，悉力经营，已成重镇，其意存窥伺可知，尤应规画防守，备豫不虞。奉天一省，沿海口岸，最关紧要。”① 为此，清政府把每年拨给东三省的练兵费由 70 万两增至 200 万两。② 同年 3 月，派定安署理黑龙江将军，命其全权“筹备黑龙江边防事宜”。同时，饬令吉林将军铭安对吉林军队“实力操练，期有实济”，并命道员吴大澂前往吉林，协助铭安办理吉林边防事宜。定安赴任前，奏请将京畿神机营步队、马队各一部，直隶马队 500 名，以及宋庆所部毅军调往黑龙江省，并改调淮军，前往奉天。此议遭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反对，他认为“征调客军，实不如就地练兵之得力”③。清政府也认为“黑龙江兵丁夙称精锐，自可因地取材”④，遂拨给定安抬枪、劈山炮、子母炮等一批火器，令其仿内地章程，筹办练军。定安从各城额兵、西丹中，选练马队 1000 名，步队 9000 名。马队编为 2 营，常年训练；步队编为 18 营，分两班轮换调操。⑤ 1882 年，将军文绪以分班调操，步队难期精整，奏准裁并一班，合计练军马队 1300 名，分为 3 营，步队 3950 名，分为 8 营，饷仍照旧。⑥

在练兵热潮推动下，蒙古军队也略有发展。1875 年 2 月，清政府为防阿古柏军流窜蒙古，抽调原驻乌里雅苏台的吉林、黑龙江马队共 600 余人，移驻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南之沙孜盖布防。后因解饷困难，将驻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的古北口练军全行遣散，宣化一军酌量改练马队。这样，库伦、乌里雅苏台防务顿显空虚，清政府遂决定从外蒙东三盟各挑蒙古兵 500 名，

---

① 《清实录·德宗实录》（二），第 591 页。

② 参见《洋务运动》（三），第 537 页。

③④ 《清实录·德宗实录》（二），第 623 页。

⑤ 参见《黑龙江志稿》，1932 年版（下同），卷 27，第 2 页。

⑥ 参见徐宗亮：《黑龙江述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下同），第 75 页。

装备火枪、火药，由京畿健锐营、火器营各派熟悉阵式的弁兵 20 名，分别前往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带领训练。练成后“在三盟界内往来梭巡”①。1880 年，因中俄关系紧张，清政府命东三盟每盟再加练蒙古兵 500 名，以资调遣。这样，蒙古练军共达 3000 名，所需武器装备，均由神机营拨给。

这次边省练军，属于调兵集训性质，在编制、装备、饷章和训练等方面，与八旗、绿营相比，并无根本性的改变。时隔不久，练军腐败如初，以致边疆防卫力量并未得到实质性增强。

中法战争促使清廷进一步重视边疆建设。战后，再次催促各边省选将练兵，强化防务。其重点是东北和西南诸省。

1885 年 7 月，慈禧太后命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共商东三省边防事宜。11 月，清廷命福州将军穆图善为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兵事宜。穆图善与三省将军往返函商，仿照吉林“防军章程”，每省挑练马队 2 起，步队 8 营（其中洋枪队 6 营、炮队 2 营），“三省各足成四千五百人之数”。② 为区别于旧式练军，新练军队中奉天军名为“盛字营”，吉林军名为“吉字营”，黑龙江军名为“齐字营”。

新练军属于常备军，各类训练、作战事宜，均由军机王大臣、神机营王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议奏定，非有重大军务奉旨出征，平时不准擅调。以上表明，清政府期望这支军队成为防边卫国的骨干力量。

1889 年，新任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鉴于 1 万新练军集驻齐齐哈尔，归中央直辖，边境防守仍属空虚，遂奏请编练“镇边军”，于次年编成。镇边军主要在归并旧练军（1880 年定安所编）的基础上，增募部分汉民组成。全省总计马队 6 营，步队 10 营，又漠河金矿步队 1 营，共 17 营，总计约 5500 人，分中、前、后、左、右 5 路，分驻于呼兰、绥化、巴彦、铁山包、漠河一带。这样，黑

① 《清实录·德宗实录》（二），第 602 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 2228 页。

龙江省既有中央军，又有地方军，既有重兵屯扎于省城，又有防军分扎于各地，加上一线守卡官兵，形成了有一定纵深和防卫层次的兵力配系，增强了卫国守边的能力。

但是，东北新练军的新气象未能保持多久，又像八旗、绿营和旧练军那样，暮气深重了。加之东三省练军直辖于中央，主持其事的钦差大臣驻于奉天，有关练军的大小事情，均须由各省将军报与钦差大臣，再由钦差大臣报告朝廷，由军机王大臣们会议商定，台传驿递，往返周折，时日迁延。同时，新练军既然不归各省将军统辖，各省将军也就漠然置之，除每年换班之时陪同钦差选调兵丹，以合营则外，余事概不过问。至于练兵大臣，每年赴营巡视一次，不过是按例阅兵，虚应故事而已。① 1889年，清政府在漠河开办金矿，总理衙门拟调齐字营练军二三千人，前往漠河开通山路，营兵闻知，竟"相聚议逃"②。新练军素质之低劣，由此可见一斑。

清政府对增强西南边防力量也颇为重视。1885年8月，清廷令云南及两广督抚通盘筹划兵制，慎固边防，明确指出："镇南、马白两关，为滇桂入越边要处所，现当和议甫成，越南游匪为患，关内亦多伏莽，此后分界通商，中外人民往来尤夥，必须大支重兵，添扎要隘，以戢奸宄而靖人心。著岑毓英、张之洞、张凯嵩、李秉衡悉心会商，将如何添设提镇专官，确核兵勇营数，或留现在得力胜兵以充新额，汰腹地无用常卒以省空粮，何处总扎，何处分防，一切通盘筹画，绘图贴说，缕晰复陈，候旨定夺。其新设各营，尤须选练精实，能战能守，一兵得一兵之用；勿以疲弱应汰之兵，滥竽充额，用副朝廷慎固边防、消弭隐患之至意。"③

遵照朝廷谕旨，两广总督张之洞、广西巡抚李秉衡和广西提督苏元春，经过半年多的往来函商，拟定了统筹广西边防的诸项措施。其中之一，是分路布防，即以镇南关为中心，分中东西三路。镇南关口及关内之关前隘、凭祥为中路，派兵12营防守；镇

---

①② 参见《黑龙江志稿》卷27，第7页。

③ 《清实录·德宗实录》(三)，第978页。

南关以东之油隘（亦作由隘）、罗隘、爱店隘、百仑隘、剥机隘为东路，派兵4营驻守；镇南关以西之平而关、水口关、希局隘、陇邦隘、平猛隘、百怀大隘等为西路，派兵6营防守。另一重要措施是筹集饷项。总计广西边防所需军费，每年至少72万两，而广西地瘠民贫，每年仅可筹集30万两，其余42万两拟请朝廷指派邻近各省分别协解。① 上述筹边计划获准正式实行。此后直至20世纪初年，一直由苏元春任广西提督督办广西边防，边界无事，防军营制和设防布置均无大的变化。

云南编练练军早于陆疆各省。1875年，清政府采纳了内外大臣提出的裁汰绿营、选练陆军的主张，谕令各省督抚"各就地方形势，量更旧汛，合营并操，画一训练，限一年内办理就绪，奏请派员查阅"②。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岑毓英闻风而动，当年就分别从督标、抚标和各驻防绿营中抽调马步兵共7300余名，集中省城训练。以后略有增添，至1883年，已有选练战兵9000余人，守兵7000余人。鉴于塘汛堆卡，零星散布，而地方巡防缉捕，还要专靠练军，故所练战兵集训一年后，又分散屯驻于各提镇驻地，随时整饬训练。中法战争以后，岑毓英遵照清政府关于各直省必须训练五成战兵的规定，在本省边关勇营和内地练军中，择其年力强壮、久经战阵者9669名，严加训练，作为机动作战部队。训练期满后，分归各镇总兵统带，分驻总兵治所及边关重镇要隘地区。不久，岑毓英鉴于云南边境漫长，分防尚属不敷，又从原练军中选练战兵三成。至1888年，统共八成战兵1.5万余人，编为30营，"除分防腾越、开化、蒙自各边外，其余即屯扎于大理、永昌、顺宁、普洱、省城，并分防紧要营汛、通衢道路，以期内外周密，边腹一气"③。同时，岑毓英认为云南沿边口隘甚多，所

① 参见张之洞：《筹议广西边防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5，第2～5页。

② 《军机大臣密寄》，《洋务运动》（一），第154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421～2422页。

练战兵不敷分布，而且诸如河口、三猛等隘卡，烟瘴弥漫，气候炎热，非粤勇不能胜任，故于1885年冬奏请暂留粤勇6000名驻防瘴地。1888年，从中挑选年力强壮者编为"官勇"13营，其他携有家室、能耐烟瘴者，编为"土勇"15营。官勇主守边卡，土勇就近屯垦。1890年时，云南总计有调防八成战兵77营、留防粤勇13营、"猓黑"防勇6营、西南防土勇25营，每营一般为220人左右，共计2万余人。①

新疆军队与东北、西南不同，编练重点不是抽练战兵，而是裁汰冗兵，改革军制。新疆改革军制是与建立行省同步进行的。早在1878年新疆失地（除伊犁地区外）收复后不久，左宗棠就指出：在新疆建立行省，不仅有利于朝廷对该地区的管辖治理，而且可以永停由内地拨兵换防之制，改行饷为坐饷，节约军费。② 1882年，帮办新疆军务张曜呈递奏折，提出变通新疆营制的三条措施：其一，减步增骑，以适应新疆广川大原间以戈壁的地理环境；其二，减养兵之资为购器之费，增加新式火器，改善部队武器装备；其三，设立游击之师，居中驻扎，统以知兵大员，一旦某城有事，则快速支援，机动作战。张曜强调："边域要地，治兵为先，兵强则边固，边固则民安"，而只有"变通营制，方能永固边防"。③鉴于收复新疆之战后驻疆部队总数达5万余人，需饷甚巨，清政府难以负担，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会同金顺、张曜等人于1884年春向朝廷提出一个裁减军队与改革军制同步进行的方案。主要内容有三：一为"留兵勇以定饷数"，拟定全疆旗绿兵额3.1万人，兵力配置南北并重；二为"改营制以归实用"，除对原有军队归并改编，重定归属外，再从各部营旗中抽选精壮士兵组成马步游击兵，择驻险要，分隶将军、参赞、巡抚，作为机动部队；三为"定官制以一事权"，按郡县制体制设置官员。④1886

① 参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715页。

②③ 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9586页。

④ 参见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军制二》第10～11页。

年11月，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会同布政使魏光焘正式拟定新疆军制，经兵部核准实行。新军制实行营、旗制。步队以498人为一营，367人为一旗，官弁火勇在内；马队以250人为一营，126人为一旗，官弁在内，火勇在外。总计全疆军队3.1万人，分抚标、喀什提标、阿克苏镇标、巴里坤镇标、伊犁镇标、塔城协标6大部，统由新疆巡抚节制。

综上所述，清政府汲取了绿营化整为散和旧练军选调训练失败的教训，自1884年以后，大胆改革兵制，采取了化散为整、精练战兵的军事政策，无疑是一大进步。把战兵与守兵分开，使各边省都有一支装备较好、训练有素的常备部队，增强机动作战能力，对于提高边省自卫能力，加强边境军力有重大意义。

三、边防力量的再次衰弱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加速编练新军，改造旧军，但一直注重京畿地区，忽视边防建设，以致边防军事力量又进入急剧衰弱时期。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清王朝已经苟延残喘，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

东北边防在1896年就已遭到破坏。是年6月，沙俄政府诱迫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不仅攫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经营等特权，并可随时利用这条铁路运输军队，在中国领土上横行无阻。由于清政府开门揖盗，使东北边防军队形同虚设，以致1900年俄军大举入侵时，不到3个月就占领了东三省各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之后，沙俄侵略者强迫三省将军解散军队，只允许组织维护地方秩序的“捕盗队”。1904年10月，黑龙江将军利用日俄在旅顺酣战之机，收罗旧有散溃制兵，改编为巡警军，共计马步10营（3300人），散驻省内各城。盛京将军也改巡捕队马步数千名为游击队，派赴各路驻防。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陆续撤兵，东三省才着手改造旧军队，建立新式陆军。三省新军编练情况参见第二十三章第三节。

新疆军事力量自1900年以后也有些衰落。由于各省协饷积欠甚多，新疆各营旗寅吃卯粮，饷项无着。1902年以后，新任巡抚潘效苏决定对新疆军队汰弱留强，以节饷需。基本措施是：原步队营400余人者裁减一半，挑留正勇200人；原300余人的步队旗，挑留正勇160人；原120余人的马队旗，挑留正勇50人。这样，全疆军队仅存1.3万余人。1906年，联魁任新疆巡抚后，立即着手编练新军，同时遵照陆军部颁布的《巡防队暂行章程》，将原有各军统改为巡防队。至1908年冬，完成新军一协（暂编陆军第三十五协）和巡防队马步队共49营的编练；此外，伊犁将军长庚又从天津、湖北、甘肃和伊犁等地招募新兵2400余人，于1909年编成伊犁混成协。至此，总计新疆军队共2.1万余人。其中新军两协分驻乌鲁木齐和伊犁；巡防队分为5路，中路归巡抚直辖，前后左右路分隶于喀什提督、阿克苏总兵、伊犁总兵和巴里坤总兵，分扎于南北疆各主要城镇。

相对而言，滇桂两省的军事力量在甲午战争以后变化不大，两省军队正常驻防训练，未出现大的波动。

1904年，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准按部章将云南防军土勇一律改称巡防队，共编成40营（每营官兵360人），分南防、开广边防、普防、江防、西防、铁路等6个防区驻防。1909年初，云南编成新军一镇（暂编陆军第十九镇），驻省城。除上述武装力量外，云南各厅、州、县还分别编练了“团哨”和“团营”。分班调练、事竣归农者为团哨；编练成军、分扎各处者为团营。1906年，改团哨为巡警，次年又将团营改为保卫队（实际上与旧日团练相同）。

广西提督苏元春督办边防十余年，因“纵兵殃民，缺额扣饷”①，1903年被革职治罪。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认为广西边防部队纪律败坏，已无力承担防边任务，奏请朝廷另行简派督办广西边防大臣，并借调湖北武建军至广西换防。同年8月，清廷命江苏候补道郑孝胥办广西边防事务，令其统领湖北武建军2400余

---

① 《清实录·德宗实录》（七），第840页。

人，前赴广西筹办边防。郑孝胥鉴于所带兵力过于单薄，奏准将广西原防军中陆荣廷所统荣字军5营（旋扩编为6营）拨归边防，自率武建军4营驻于龙州，以策应各路。郑孝胥在广西驻防两年，深感诸事掣肘，加上饷项困难，所部不服水土，病亡颇众，乃于1905年3月以病重为由，奏请卸任。清政府命梧州知府庄蕴宽暂行接办广西边防事务。同时，决定改照云南边防办法，将边防事务统辖于巡抚，以一事权。并且规定：广西巡抚自此次改章以后，每隔一年巡边一次，实地考察边界防务和民间疾苦，便于随时整顿，消除隐患。1907年，广西巡抚张鸣岐遵照练兵处和兵部会奏，将全省防军改为巡防队，共编成中路、左路、右路和前路巡防队72队，其中前路巡防队8700余人主守边防。由于经费困难，广西编练新军进展很慢，到辛亥革命前，仅编成一混成协，其中陈炳焜之步兵第二标驻龙州，含有支援边防的意图。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国防建设重心是编练新军，整编巡防队，而对于海防和边防军队建设，则采取了听其自然的政策。在边境地区保持一定规模的军事实力，是守边卫国的物质基础。在某些重要地区和战略方向，则应保持总体数量优于对方可能入侵的军力，才能应付边境突发事件，阻敌入侵。由于种种原因，清政府无力顾及边防建设，以致边防军事实力趋于衰弱。以东北地区为例，1907年清军整编后的三省巡防队仅有步队60营、马队40营，总数不足5万人，即使3镇新军编练完成，亦不足8万人。与当面俄军相比，依然相去甚远。故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忧心忡忡地说："三省幅员辽廓，两强交伺，胡匪蚁聚蜂屯，随时窃发，安内攘外，全资兵力。今八旗制兵久已有名无实……奉天八路马步四十营，新改步队一营，炮队一营，新安军四营，盛军二营，吉林新立常备军一协……总计三省兵额除八旗制兵不计外，奉天、吉林各不及二万名，黑龙江不足四千名。且其兵或收纳降队，或抽拨旗营，人类不齐，营制饷章不一，器械衣服淆杂，欲以绥边固圉，建威消萌，难矣！"他认为，东三省"非实有精兵十余万，不足以资防守"。他希望"奉吉黑三省每年逐渐增添兵数，

期以五年后，务令奉天、吉林各有精兵三镇，黑龙江有精兵两镇，庶可稍纾东陲之患，不致为强敌所凌”。①徐世昌关于建设精兵10余万，编练新军8镇的设想，尽管与当面俄军相比，在兵力上仍居劣势，但较之陆军部的练兵计划，还算比较接近东北的军事实际，其见识要比其前任略高一筹。清政府忽视边防建设，还表现在削减边防经费方面。这固然由于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库空如洗”所致，但与其轻边防重京畿的国防政策也不无关系。1907年，清政府在颁布全国编练新军计划中强调：“畿辅拱卫京师，宜宿重兵，以操居中驭外之势”②。早在1904年，练兵处一成立，就向全国各省（包括新疆、广西、云南、吉林诸边省）摊派练兵费总计1653万两③，拟汲取全国的财力，以充北洋军饷。1905年各省实解军费总计901万两，其中600余万两用于北洋各镇，而各省所练新军，“均责成该省将军、督抚就地筹款，悉心经画”④。内地和沿海各省物产富实，尚可罗掘款项，边疆各省则筹措无术，叫苦连天，因而到武昌起义前，各边省都未完成陆军部规定的编练新军计划。

第二节　边防设施

清代的边防设施主要有：卡伦、炮台、驿传和交通等项。这些设施与边防军队一起，构成了当时的边疆防卫体系。鸦片战争

---

① 徐世昌：《上政府条议》，见《退耕堂政书》，中国书店1985年版，卷33，第6～7页。

② 《军机处录副档》，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4页。

③ 参见《大清光绪新法令》，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下同），第10册，第88页。

④ 《军机处录副档》，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6页。

后，随着列强的入侵，边防设施有的遭到严重破坏，有的进行了重建或修整，形成了新旧并存，参差不齐的局面。

一、卡 伦

卡伦，又称“喀伦”、“卡路”、“喀龙”，亦即边省军事哨所。清政府最早是在东北、蒙古地区设立卡伦。18世纪中叶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后，开始在西北地区设置卡伦。由于气候环境、地理特点不同，各边省卡伦的形式和制度也各不相同。

新疆卡伦分南北两路，有常设、移设、添设三种。“其在内者为常设卡伦，在外者曰移设卡伦，最在外者曰添设卡伦”①。常设卡伦为永久驻守之地，一般设在城镇附近和隘口要地，主要任务是保卫城镇，管理禁地；移设、添设卡伦随气候变化而变化，“气候和暖则外展，寒则内迁，进退盈缩，或千里，或数百里不等”②，主要职能是管理游牧，稽查逃人和监察贸易，也有防止外敌入侵的任务。新疆卡伦由各领队大臣分管。卡伦官兵驻守执勤，称为“坐卡”。相邻两卡伦间，定期按规定路线巡查，并在适中位置“会哨”，互换木质戳记信牌，谓之“递筹”。两卡伦递筹巡查之路，名为“开齐”，亦即卡伦路。

外蒙古疆土广袤，边界漫长，由于军队单弱，卡伦和军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蒙古卡伦由车臣汗、土谢图汗、三音诺颜和札萨克图汗4部共同管理。每两部设一总管卡伦扎萨克，每部设一专管卡伦扎萨克。每卡设一蒙古台吉主持卡务，每3～4卡伦设一协理台吉总管。守卡兵丁由各部轮派，一般每卡30名左右，一年一换。清政府为加强对边界卡伦的管理，还在外蒙设“守卡伦侍卫”，由中央委派，3年一换。每一守卡伦侍卫一般与协理台吉共管3～4个卡伦。

---

①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092页。

黑龙江边界卡伦分外卡伦、内卡伦。1727 年（雍正五年）沿额尔古讷河设置的 12 处卡伦为外卡伦，由呼伦贝尔副都统派兵戍守。每卡设驻防官 1 员、兵 30 名。两卡间隔 40～80 里不等。卡伦之间“有垒石以为封识者，曰鄂博”[①]，作为国界标志。守卡兵按日巡查，3 月一换。另设总卡官 1 员，统管 12 卡伦，每月巡查卡伦一次。1733 年，鉴于外卡防守多有疏虞，常有俄人越境，遂在外卡以内又并行设立一道卡伦（共 15 处），以加大防卫纵深。内卡伦一般与外卡相距一二百里不等。1857 年，黑龙江将军奕山鉴于内卡与外卡相距过远，奏准将内卡向外推移，与外卡各相距三四十里，以便内外卡互相联络，协同稽查。内卡由呼伦贝尔副都统派兵轮班驻守，两月一换，每月派佐领一员往巡一次。

各地卡伦都有较严格的巡查制度。新疆每年春秋两季，伊犁将军委派参赞大臣巡察各所属卡伦，及卡伦以外所辖地区。巡察官兵分别从伊犁、塔尔巴哈台出发，按规定路线巡察，在指定地点交换表报和信牌。外蒙古卡伦巡查制度初为每 3 年一次，乾隆年间改为每年一次。1888 年，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等以蒙古“频年灾沴，差务难支”为由，奏准将巡查卡伦制度改为每 10 年一次[②]，实际上等于对边界卡伦放任不管了。黑龙江边境巡查制度，在康熙、雍正年间，还只是在西边格尔必奇河和额尔古讷河地段实行。每年五月，由齐齐哈尔、墨尔根和瑷珲三城各派大员，率 100 人分路向西巡查，直至额尔古讷河边。1765 年（乾隆三十年），清政府根据黑龙江副都统富僧阿的奏请，确定了外兴安岭沿边的巡逻制度，分每年巡逻和每 3 年巡逻一次两种。直到 1860 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前，始终贯彻执行，从未间断。

清政府虽然在边省地区建立了卡伦和巡查制度，但是一些具体措施和做法并不完善，在边界防守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疏漏。清前期

---

① 《黑龙江志稿》卷 33，第 1 页。

② 参见邢亦尘编：《清季蒙古实录》，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研究所 1981 年版（下同），下辑，第 190 页。

设置卡伦的目的多是为了对内，而不是对外。如新疆的 250 多处卡伦，除北部塔尔巴哈台个别卡伦设在边界线上外，绝大多数设在内地城镇周围，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民。正如嘉庆年间伊犁将军松筠记述的那样："新疆南北各城皆设卡伦，而伊犁为最多。伊犁境内，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其禁在于私越；又有铜厂、铅厂、屯工、船工、安置发遣罪人，其禁在于逋逃；至于境外，自北而西则有哈萨克，自西而南则有布鲁特，壤界毗连，其禁在于盗窃。故设卡置官，派兵巡守。"① 外蒙、唐努乌梁海卡伦也多设在各部盟分界线和通道关口之处，主要任务也不是防边。黑龙江省所设 12 处外卡伦，虽主要用于防备外敌越界，但由于卡伦间隔太远，也很难完成防敌任务。清政府制订的定期巡查制度，固然有明确的巡视边界的目的，特别是黑龙江省，把这项活动称作"察边"、"巡逻"，主要任务是勘察界碑，修整鄂博和缉捕越境俄人，具有明显的防边意图。但是，仅靠 1～3 年一次的巡察，根本无法防堵外敌渗透。此外，在有的边界地带，清政府并不派兵戍守，仅垒若干个石堆或插木牌作为国界标志，形同儿戏，并无封疆价值。如吉林省东部边境地区，清政府于 1861 年与俄国划分疆界，共立界牌 8 处，至 1886 年，所立界牌"不知何年毁失，遍询土人，无从查究"，"自珲春河至图们江口五百余里，竟无界牌一个"。②沙俄军队正是利用清政府疏于边守的弱点，自道光朝以后，不断向我国境内侵逼，拆移界碑，平毁封堆，并在我国境内偷立界牌，袭击巡边部队，使清朝边疆危机逐年紧迫。随着大片国土的丧失，清政府不得不依据新的边防形势，对卡伦和巡边制度进行部分改订和修补。

在新疆，清军逐灭阿古柏侵略军后，刘锦棠鉴于帕米尔地区卡伦多被阿古柏所毁，遂于 1879 年在旧卡之外增设 7 座卡伦。③

---

① 松筠：《钦定新疆识略》，清道光元年刊本，卷 11，第 1 页。

② 《吉林通志》卷 55，第 37 页。

③ 参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55，第 5～6 页。

1889年，又于伊西洱库尔淖尔北10里乾隆纪功碑（1759年立）处设立苏满卡伦，距喀什噶尔城约1600里，是南疆最远的一所卡伦。① 这时，英属阿富汗和沙俄为争夺我帕米尔地区，不断派兵前往侦察挑衅。为保卫祖国疆土不受侵犯，1891年5月，署新疆巡抚魏光焘派旗官张鸿畴率马队30人，由喀什赴苏满卡伦设防；同时于帕米尔沿边要隘增设外卡，不能设卡之处概行封禁；并于莎车、叶城各属边境地带筑立墩堡。② 1892年，沙俄密谋侵占帕米尔，派军队向该地区秘密开进。与此同时，沙俄副外交大臣基斯敬却对中国大使许景澄说："如中国士兵一撤，俄国必立即派员与中国会勘"③。清政府轻信其言，竟于当年5月下令将派驻苏满卡伦的马队全部撤退，其他各守卡兵也一律撤退。沙俄军队随即乘虚而入，占领了帕米尔苏满地区，毁掉中国卡伦，强占了萨雷阔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伊犁方向，伊犁将军金顺于1882年8月依据《中俄伊犁条约》派哈密帮办大臣长顺与俄国钦差大臣会同勘界，自伊犁西南天山北麓那林喀勒噶山口起，至伊犁东北喀拉达坂止，在长约1300余里的地段内，共立牌博33处；在其中重要地段隘口，金顺重新安设卡伦，并派兵驻守。④ 当然，鄂博和卡伦以外的7万多平方公里的肥美土地又全部被俄国吞占。

在东北地区，自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中俄划黑龙江为界，黑龙江城（今爱辉）所署的江北精奇里河等5卡伦悉归俄属。驻黑龙江城副都统遂在该城以东右岸地区重设8个卡伦，在该城以西地段重设3个卡伦。⑤ 每卡设卡官1员，卡兵9～15名不等。此后十余年中，黑龙江边防重点着眼于瑷珲城以东地区，对西部边界则疏于戒备，"西至额尔古讷河一千七百里，如入无人之

---

① 参见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国界四》，第8页。
② 参见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国界四》，第1页。
③ 《许文肃公遗稿》，民国七年八月初版，第7卷，第10页。
④ 参见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国界二》，第15页。
⑤ 参见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36～37页。

境"①。1882年，鄂伦春人在漠河日勒特河谷发现金矿，消息传开，俄人纷纷越界盗采，不到3年，众至万人。1885年秋，黑龙江将军文绪派旗兵前往驱逐盗金俄人。翌年，为保护漠河金矿，由大黑河屯、奇拉、瑚玛尔各卡伦沿江而西，增设了西尔根、土哈达等23个卡伦，直与呼伦贝尔城境的珠尔特依卡伦相接。同时，又增设东南卡伦5个。② 吉林省自1861年与俄国沿乌苏里江分界后，也在沿江地带设立了卡伦，驻兵防守疆界。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虽然在沙俄的逼迫下重新划分了疆界，并依据新的疆界重新设置了边界卡伦，但是在卡伦的兵员数量、武器装备和防卫设施等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加强和改善。卡伦，不过是一所有人看守的鄂博，不仅没有独立作战的能力，甚至有些卡伦连巡查边界、看守界牌的能力也不具备。首先，卡伦分布格局不当。以黑龙江省而言，边界线长达3500余公里，只设置卡伦51处（或谓71处），平均每两卡间隔约70公里，防卫间隙过大。而且许多地方卡伦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据聂士成1894年考察东北边防时所见，沿边"增设卡伦，具见奏报，例载一卡伦设官一员、兵十名，大抵皆虚额耳。沿江仅见房屋，且无烟火，遑云兵防。"③ 不仅如此，从瑷珲至漠河漫长地段，虽有卡伦，但既没有横向巡逻通路，也没有前后方纵向道路，"旷野深山，渺无人烟"④，不仅卡兵难以走边巡逻，即使由漠河递送公文，也要绕道对岸。吉林省沿边卡伦更为稀少，其中蜂蜜山地区（今黑龙江省密山西北）周围1000余里，仅有乌札库卡伦一处，驻旗兵19名，"巡边有事，无能过问，以致青山一带时有俄人侵越开道之事"⑤。其次，卡伦设施简陋，卡兵素质低劣。边境卡伦是清

---

① 《李鸿章奏折》，《洋务运动》（七），第322页。

② 参见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37页。

③ 聂士成：《东游纪程》，清光绪二十一年刊本，卷1，第42页。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927页。

⑤ 聂士成：《东游纪程》，卷3，第6页。

朝边省一线防卫设施，理应作为边防建设的重点，派驻精干的守卡官兵，装备精良的武器，构筑坚固的防卫工事，使其有一定的自卫和抗击能力。但事实并非如此，清朝边境卡伦构筑之简陋，士兵生活之清苦，军事素质之低劣，是甚为惊人的。据一个潜入黑龙江地区“考察”的俄国人记述，他在1855年见到的中国设在江边的一个最大的卡伦，只有“三栋不大的住房，按照满人习惯，用纵横木杆和泥建成，每栋住房均开有几扇糊纸的大窗户”①。30多年后，清军卡伦的构造样式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据1892年入侵我帕米尔地区的一个俄国军官记述，他当时在帕米尔见到的清朝卡伦，“是个简单的、正方形的空间，四周用滑秸泥墙围着，沿墙从它里面伸展出一个箭形的阶梯。这里同样设置了驻防军和马匹的房子”。这位俄国侵略者还写道：“中国的边防军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名义上是士兵，实际上是不顶用的”。②聂士成也指出：吉、黑两省防兵，“兵骄将弱，调用实难，且技艺生疏，无论以之防俄，即使剿内地土匪，尚恐不足”③。毫无疑问，这样的边境卡伦既不能守边，也不能自卫，无怪乎1900年俄军入侵时，不费吹灰之力就突破清军防御，占领了东北三省。

二、炮 台

炮台，是防守边关险隘的重要军事设施。由于没有统一的部署和规划，概由各省督抚自定，因此，清后期边防炮台的布局和构筑，都存在许多问题。沿边各省建设边防炮台的时间和质量也不一。

广西沿边炮台，无论是设置布局、构筑质量，还是火炮性能，

---

① 〔俄〕P·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146页。

② 〔俄〕鲍里斯·塔格耶夫：《在耸入云霄的地方》（1975年中译本），第128页。

③ 聂士成：《东游纪程》，卷3，第4页。

都居各边省首位。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不断督饬两广督抚对边界加意探察，严加防范。广西巡抚李秉衡和边防督办苏元春于1885年提出在广西沿边“择地筑炮台军垒”，“严锁钥以扼要冲”的设想，得到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赞同。张之洞奏准以广东续借洋款余存的10万两白银，拨充广西订购克虏伯炮费用，主要用于镇南关和龙州城外诸山的炮台建设。1890年冬，广西巡抚马丕瑶会同苏元春查勘沿边形势后，认为平而、水口两关及中路地带也应增筑炮台，张之洞又奏准以广东应解广西协饷银18万两，向德国订购口径为120毫米的加农炮20门，同时敦请户部拨银18万两，用以兴建大炮台20座。户部对筹集巨款修筑广西炮台犹豫不决，马丕瑶遂会同苏元春及新任两广总督李瀚章，于1891年7月复奏朝廷，再次陈述了增建沿边炮台的军事意义，指出：“广西边防一千七百余里，处处紧连越壤，三关百隘，防不胜防，全赖扼险凭高，多置炮台。必一台足顾数隘，层层联络，节节应援，防务庶有把握。详察二十台处所，无非要害之区。不乘此海疆闲暇之时，早为严备，一旦有事，岂能猝办。”① 户部议分4年筹拨，广西炮台建筑费用终于得到解决。1892年4月，广西边防20座大炮台正式动工。苏元春鉴于各台相隔遥远，又在险要处所添筑大炮台14座。1896年5月，34座大炮台全部建成。与此同时，苏元春为安置1885年间由广东订购运到的各式中型洋炮，又在各大炮台附近扼要处所，添筑中炮台48座，碉台83座，以与大炮台配合防守。所有中炮台一律与大炮台同时完工。广西沿边炮台，一般都用大石砌筑。台外圈筑石城，内设兵房及弹药库，堑壕网联，明暗相通，既可以藏身，也可以观察敌情。每座大炮台一般派巡防队一哨驻守。

吉林省沿边炮台的建设实际上要早于广西。1881年，吉林边防督办吴大澂鉴于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总扼松花江与牡丹江交汇处，是吉林防卫要地，遂奏准在三姓东35里之巴彦通地方

---

① 《马中丞遗集·奏稿》卷3，第2页。

筑炮台 1 座①，1884 年竣工。上面安设大炮 3 尊，意在封锁沙俄由黑龙江口进犯来路。此炮台为暗台形式，内衬木架，外堆夯土，台周筑环形土墙。1888 年，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仿照巴彦通炮台构筑形式，又在珲春城西南之外郎屯和城东南之阿拉坎两地各筑炮台 1 座②，每台置 150 毫米口径加农炮 3 尊，用以拦阻由岩杵河入珲之敌和可能由黑顶子入珲之敌。吉林边境炮台，虽然采取了暗台形式，利于隐蔽炮位和避免日晒雨淋，但在炮台位置和构筑设计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1894 年聂士成在巡视了吉林边境形势和巴彦通炮台后认为：巴彦通炮台应移设在黑河口，与其拦阻水上来敌于三姓，不如阻敌于松花江口外。其次，巴彦通炮台所置大炮均有半周（180°）旋转轨道，而该炮台却设计为暗台，大炮只能从前面暗洞向外射击，最大射界只有 15°。因此，他建议该处炮台改为明台形式。

黑龙江省边境原无炮台，1894 年聂士成视察东三省边防，认为瑷珲是黑龙江省的扼要之地，应该在该城和迤西 30 里处之卡伦山修筑炮台，以扼守要路并防备对岸海兰泡之敌，黑龙江城副都统（驻瑷珲）景祺接受了聂士成的意见，从次年起，才在卡伦山修筑炮台和战壕，安设克虏伯炮 8 尊，在瑷珲安设大炮 3 尊。

在新疆塔尔巴哈台，1888 年开始修筑城墙、城楼，3 年后完工，同时修筑大炮台 1 座，腰炮台 6 座，安设格林炮 2 尊、开花炮 5 尊，从防兵中挑选 120 人组成开花炮队，专门从事炮兵训练。③

然而，晚清的边防炮台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是有些炮台的位置和设计不合理。如广西边境的炮台筑在山顶，死角较大，

---

① 《吉林通志》卷 53 第 7 页称有炮台 5 座。此处从聂士成《东游纪程》卷 2 第 8 页。

② 《吉林通志》卷 53 第 9 页称各筑炮台 3 座。此处从聂士成《东游纪程》卷 1 第 85 页。

③ 参见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 2943、3004 页。

影响射击效能，且都系明台，平时雨淋日晒，炮件容易锈损。吉林炮台虽取暗台构式，但所用炮的方向射界大受限制，不能充分发挥火炮的作用。二是炮位稀少。如偌大的吉林省，仅有炮台3座，各设炮3尊，显然无济于事。三是清军技术素质低。平时不懂得维护保养火炮，战时不能熟练操作，及时、精确地进行射击，使炮火威力大大降低。1900年俄军入侵东北时，瑷珲卡伦山炮台等地守军不战而逃，使耗费巨资构筑的边境炮台，未放一炮即落入敌手。

三、通 信 设 施

通信联络是边防设施的重要方面。建立快速通畅的通信联络，保障边疆军事情报的及时迅速传递，是提高国家军事反应能力的重要条件。

清代的边疆军事通信，向由驿站或军台进行。人马转递，时日迟缓，即便是紧急公文以日行四五百里的速度驰递，从远疆到北京亦需10余日至20余日，甚至月余。有的军事情报由边省传到京师，往往时过境迁，贻误大事。如此落后的通信手段，显然远远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而边境事件动辄牵涉到疆土国界，将军督抚无机断处置之权，事事都要呈请朝廷定夺，故通信联络的顺畅迅速，就显得尤为重要。

1870年前后，列强在中国沿海各口岸间开设电报通信，使清政府中热心洋务的大臣们大开眼界。他们认识到电报通信迅捷，不仅利商利民，而且便于快速传递军情、调遣军队，于边海防建设大有裨益。经沈葆桢、李鸿章等人不懈努力，中国电线终于在大沽至天津间首先架通，并逐步向沿海和各边省推广发展。

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经两广总督张树声建议，清廷急派盛宣怀兴建广西至广州的前线电线。至1884年6月，由广西龙州达广州的2000余里电报线路全部架通，大大加快了战场军情的传递速度，提高了清廷指挥中枢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效能。通信联

络的改善，对清军取得中法战争陆路作战的最后胜利，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广西电线在中法战争中所显示的巨大效能，使清政府和洋务大员们进一步看清了现代通信手段对国防战备的保证作用，决心在边疆各省迅速推广。1885 年 12 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吉林将军希元联名奏请在吉林架设电线。内称："电线之制，始自泰西。近年来风会所趋，几遍天下。而中外之军情商务，瞬息可通。去岁法夷肇衅，借电报之力，以速戎机，此其效之已著者也。查吉林珲春地方，逼近俄疆，距省较远，驿递文报，动辄经旬，设遇边情紧急，深恐贻误事机。现在津沪电线已由营口设至奉天，如再由奉天迤东设至吉林省城，直达珲春，非特边务文报无虞梗塞，即南北消息亦较便捷。"① 朝廷当即允准。至翌年 10 月，吉林电线已经吉林延设至宁古塔。

1886 年初，会办东三省练兵大臣穆图善鉴于东三省地方广大，"边防倘有缓急，文报稽迟"，奏请在黑龙江省架设电线，"以通边报而备缓急"。②光绪帝责成李鸿章筹款派员，经理其事。1887 年 10 月，黑龙江省电线架通。此线起自吉林省城，经茂兴、齐齐哈尔、布特哈、墨尔根至瑷珲、黑河镇，全长 1800 余里。于是，黑龙江省军事通信随之大大改观。

云南电线创设于 1886 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为解决边防文报迟滞问题，首先兴建滇南电线。1886 年 12 月自蒙自开工，次年春架设至滇东北可渡河，与四川电线接通。1887 年底，又开始架设剥隘、百色至南宁线。1889 年 6 月架通腾越至省城线。1890 年 5 月，又将滇线向外延伸，与保胜电线相接。由于云南历任督抚的努力，滇省电线发展迅速，成为各边省中通信最为发达的省份。

创设新疆电线之议，始于 1889 年，但因距离遥远，需费过巨，只能分段接办，先将西安电线延至肃州（今甘肃酒泉）。1892 年，

---

① 《吉林通志》卷 57，第 36 页。

② 《洋务运动》(六)，第 374 页。

李鸿章以“新疆远处边防，遇有紧要文报，由肃州转递，动需时日，声息迟滞”①，建议迅将肃州电线延设到新疆。1893年夏，架通嘉峪关至乌鲁木齐电线；1894年3月，南路吐鲁番至喀什噶尔电线亦告竣工；同年5月，北路电线展设至伊犁；同年底延伸至塔尔巴哈台。至此，新疆南北各路电线构通，并与内地联为一气，使最远省份的边防通信也得到了根本改善。

第三节　边疆建设

清代边疆辽阔，地多人少，开发和建设边疆，就成为边防建设的根本性任务。聂士成在1894年巡察吉林边防时认为：“吉林边要，惟有广招民垦以固本”②。后又指出：“设防之要，首在开荒。否则地旷人稀，千余里设防，需兵甚众，军粮转运，劳费万端。荒土既辟，则穷民得所，而兵饷有资”③。但是，清朝的开发边疆政策的实行，却经历了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

一、东 三 省

屯田实边是清政府的重要边防政策，然而，如此简单易行的开发政策，却不适用于东三省。东北向被清廷视为“龙兴之地”，长期实行封禁。虽在康熙年间就于黑龙江省设立军屯、官屯，但只限于驻防八旗官兵耕种，严禁平民垦荒。这种长期封禁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东三省的开发建设。

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鉴于该省地处极边，官兵困苦，地阔人稀，俄人窥伺，奏请在呼兰地方开禁招垦。他认为“前因招

---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3175页。

② 聂士成：《东游记程》，卷2，第20页。

③ 聂士成：《东游纪程》，卷3，第7～8页。

垦，恐与防务有碍；今因防务，转不能不亟筹招垦者也”。并指出黑龙江省“地方既属拮据，私垦之民，一时又难驱逐，与其拘泥照前封禁，致有用之地抛弃如遗，而仍不免于偷种，莫若据实陈明，招民试种，得一分租赋，即可裕一分度支。且旷地既有居民，预防俄人窥伺，并可借资抵御，亦免临时周章”。[①] 清廷允准，于是黑龙江省开禁招垦。

但是，当时开放荒禁，还只限于省城附近地区，对于与沙俄接攘的边境地区，仍然泥守旧制，继续封禁，甚至有意推行虚边政策。对此，许多有远见的疆臣大吏进行了坦率的抨击，并提出了移民实边的主张。如 1880 年春，道员吴大澂奉旨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吉林边防，目睹吉林边守废弛，边地空虚的景况，便提出加强边防的三条措施：一购利器以讨军实，一招屯户以实边土，一通道路以便商旅。所谓实边土，就是移民垦荒，推行实边政策。吴大澂认为，推行实边政策，“近可为边氓生聚之计，远可备岩疆捍卫之资”[②]。1882 年，吴大澂在珲春设立招垦总局，决定以珲春和三岔口为中心进行垦殖开发。数年后，吉林边境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据统计，仅宁古塔境内，自建立招垦总局后，开垦荒地达 1.2 万余垧，聚成村屯 10 多个，为加强边区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在吉林垦殖实边政策的影响下，黑龙江边垦工作也有了长足的进展。1904 年，黑龙江将军达桂、副都统程德全奏请将黑龙江荒地全部开放，招民垦种，以兴地利，并在省城设垦务总局，总管其事。1905 年底，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鉴于墨尔根、齐齐哈尔一带旧设 660 所官屯中，屯丁不知稼穑，招佃开垦，转卖渔利等因，奏请将屯官暨领催即行裁撤，并将屯丁改归民籍，对沿袭了 200 多年的官屯制度进行重大改革。1908 年秋，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认为：虽然多年来招民垦荒，但全省开放面积还不及 1/5，而且

① 《黑龙江志稿》卷 8，第 13 页。

② 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哈佛燕京学社 1935 年版，第 96 页。

“放荒速而收价迟，领地多而开地少，阻碍垦务，损害边务”。他强调指出：“实边之方，必以辟地聚民为先务。自来策边事者，或主徙民，或主屯兵。顾徙民则患其费多，屯兵则患其食少，求其兵农合一，防守兼资，舍屯垦无他道矣”。① 为此，他主张“以兵务农”，即指拨荒地，招工开垦成熟，并建置庐舍，然后以各镇陆军退伍兵丁自愿务农者，分年拨令到段，每兵授与熟地100亩，并给牛、粮、种籽银62两。俟收成后，垦丁第一年交回租费银31两，其后逐年增加。此外，在沿边地区安设卡伦，每卡设卡兵30名，其中以10名巡查边境，20名开垦荒田，定期轮替。但是，“以兵务农”政策推行未及3年，即以失败而告终。据周树模于1910年4月奏称：“所有退伍各兵，类多游惰自安、菽粟不辨者流，欲其从事耕凿，日习极苦之劳动，岁纳倍称之息金，势既不行，力亦未逮”②。他透露，上年应拨1000名退伍兵赴垦，但实到者仅200余名，又因先后潜逃和因事革除，一年后仅存100余名。为此，他只得取消兵垦政策，仍然施行“招农民承佃”之制。此外，鉴于黑龙江沿江地带“极边荒塞”，“食货奇艰”，按既定租价，几无人前往开垦，而对面俄国“岁迁民至十数万，布满沿边，建筑兵屯，修通道路，大有日进无疆之势”③，故从开边兴利着眼，奏请将呼伦贝尔至瑷珲沿线荒地全部开放招垦，同时将原垦荒章程变通办理，每垧只收经费银400文，不收押租，以广招徕。这一奖励措施颇有成效，从1910年至1914年，沿边荒地共放出7万余垧，加快了边疆开发速度。

二、蒙古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闭关自守政策被打破，列强竞相在中

① 《黑龙江志稿》卷8，第51页。

② 《黑龙江志稿》卷8，第62页。

③ 《黑龙江志稿》卷8，第58页。

国划分势力范围，东三省和蒙古地区也成为俄日争夺的肥肉。由于北部边疆危机日益加剧，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相继有不少大臣疆吏们提出筹边改制、放垦蒙地的建议。1880年，内阁学士张之洞就提出："俄人叵测，意在蚕食蒙疆"，应立即激励蒙古各盟"讲求牧政，简练成军"①，以增强实力。清政府也认为"俄人伺隙蹈瑕，狡焉思逞"，"边外转运维艰，刍粮不裕，应及时讲求屯垦，以足兵食"。② 故饬令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各将军、大臣查勘屯田，择地开垦。但基本原则仍是"官屯"、"兵屯"，不向平民开放。

1887年，山西巡抚刚毅等奏请开放蒙禁，放垦蒙地，以"兴屯利而固边防"。但由于事关改变沿袭200余年的治蒙政策，清政府未敢遽下决心。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边疆危机更加严重，清政府为维持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在各行省倡行"立宪新政"。张之洞、刘坤一等又趁机提出由内地移民到蒙地开垦定居，以充实边疆的主张。晋抚岑春煊还呈递了《筹议开垦蒙地》的奏折。清政府很快接受了这些建议，于1902年宣布取消其奉行数百年的蒙古"封禁政策"，开始推行移民实边的新方针。然而，清政府在蒙古实行的"新政"，并没有把巩固边防放在首位，而是通过放荒招垦，注重收取押荒租银，以敛财济困为主要目的。由于主要着眼于经济效益，加之没有统一的领导，缺乏与"实边"相联系的周密计划，致使这次移民成为无组织无计划的盲目活动。不仅因滥放滥垦使蒙古农牧业遭到很大破坏，而且由于蒙民不堪其扰，纷纷逃避，使蒙古兵役大受影响。1911年夏，沙俄政府以清政府"在蒙古办理移民、练兵、整顿吏治等事，蒙民深滋疑虑"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照会，声称"俄蒙连界休戚相关，俄断不能漠视，势必至在交界等处筹对付方法"，公然干涉中国内政。③ 11月，沙俄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9572页。

② 邢亦尘编：《清季蒙古实录》下辑，第105页。

③ 邢亦尘编：《清季蒙古实录》下辑，第465页。

政府利用中国内地发生辛亥革命之机，唆使外蒙封建王公在库伦策划“独立”。30 日，外蒙王公在俄国军队的配合下，强行驱逐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12 月 1 日，发表“独立宣言”，成立了所谓“大蒙古国”。以后虽经民国政府严正交涉，外蒙由“独立”改为“自治”，但中央政府在那里既不能设治驻军，又不能移民，实际上已处于沙俄的控制之下。

三、新 疆

新疆屯田初有兵屯、回屯和户屯，后又增加犯屯和旗屯。清前期在新疆屯田重北而轻南，北路屯田 28 万余亩，而南路还不及其 1/5。“其官兵则北路驻防，而南路仅换防；商民则北路挈眷，而南路不得挈眷”①，严重阻碍了南疆的边防建设。魏源指出：“诚使仿伊犁、乌鲁木齐移眷驻防之例，以回疆戍兵改为额兵，屯田裕饷，并许内地商民挈家垦种，以渐升科，计喀城、叶城以东两河沿岸原隰膏沃各数百里……卤莽为之，事半功倍，不数年兵民愈衍愈炽……今回疆各城官吏已许挈眷，而戍卒、商民挈眷之例尚未推广。夫家室不成，则生聚不盛，人心不固，垦辟不富。”② 魏源所论，切中新疆屯田之弊，体现了他非凡的卓识远见。就在魏源编写《圣武记》，并发表上述议论之时，受到革职处分而被遣戍伊犁的林则徐到达新疆。他细心观察边界形势，考查西北防务，认识到“俄国势日强大，所规画布置，志实不小……将来必为大患”③，因而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实边，严防沙俄侵犯的主张。布彦泰非常器重林则徐，积极支持他的屯田建议。在布彦泰的推荐请求下，道光帝同意“委林查勘办理”。于是，林则徐协助布彦泰办理惠远城东阿齐乌苏废地垦务。从 1843 年至 1844 年，共

---

① 魏源：《圣武记》上册，第 190 页。

② 魏源：《圣武记》上册，第 190～191 页。

③ 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38 页。

开垦荒地19.4万余亩。[①] 清政府还接受了林则徐的建议，把垦地全部拨给维吾尔族人民耕种。1845年，林则徐又奉命会同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勘垦南疆。他们先到库车、阿克苏，旋往乌什、叶尔羌、和阗和喀什噶尔，往返行程2万余里，但见南疆回民"生计多属艰难，沿途未见炊烟，仅以冷饼两三枚便度一日，遇有桑椹瓜果成熟，即取以充饥"[②]，认为如不尽快改变边疆的落后状况，所谓巩固边防就是一句空话。在勘办过程中，林则徐和全庆每到一地，都注意结合当地的实际，研究屯田的方式，注重屯田的实效。他们认为："巴尔楚克为回疆扼要之地，道光十二年已奏开垦屯田，未种者尚多，应先尽安插民户，俾成重镇"；伊拉里克垦地"东西两面，以'人寿年丰'四字分号，各设正副户长一，乡约四，择诚实农民充之，承领耕种"；"吐鲁番为南北枢纽，应安置内地民户，户领地五十亩，农田以水利为首务"。所请皆获批准，"自是回疆南路凡垦田六十余万亩"。[③] 林则徐等人的基本思想是：扩大民屯，刺激边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改屯兵为操防，加强军事训练，做到屯田与实边紧密结合，促进西陲的开发和军防。

阿古柏入侵新疆之后，边屯随之荒废。1876年，清军开始进行收复新疆失地的作战，左宗棠为解决军食问题，一面进兵，一面组织屯田。左宗棠认为，解决军粮的有效办法，主要不是靠兵屯，而是靠民屯。他抨击以往的屯田政策说："从前诸军亦何尝不说屯田，然究何尝得屯田之利，亦何尝知屯田办法？一意筹办军食，何从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④] 为杜

---

① 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8册，总第11640页。

② 林则徐：《遵旨将与布彦泰详议新疆南路八路城回民生计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892页。

③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8册，总第11724～11725页。

④ 左宗棠：《与总统嵩武军张朗斋提军》，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6页。

绝以往屯田弊端，左宗棠多次指示负责在哈密组织屯田筹粮的提督张曜，对民屯、兵屯提出具体办法。关于民屯，他指示应先发给当地垦民赈粮，壮丁能耕者，每人每日给粮一斤，老弱者数两，“俾免饥饿”。尔后按耕垦地亩多少发给种籽耕牛，使其安心耕作。收有余粮，则照时价收买，以充军食。他认为如此则“缠头既得稍延残喘，且有利可图”，而“官军能就近买粮，省转运之费不少”①，岂不利国利民？关于兵屯，他指示应挑选好营官、哨长，多方激励劝督，每日出队耕垦，均插旗帜区分勤惰。每哨须雇请本地人一二名，以便随时请教土宜物性事宜。秋后收获“照粮给价，令勇丁均分”。他认为如此，“则各营勇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外又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②左宗棠还主张兵民分开。以前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曾模仿古人徙民实边的做法，从关内移民到新疆开屯，谓之“且耕且战”。左宗棠则认为，令兵勇屯田可以，从屯户中挑练兵勇也可以，但令屯户“且耕且战”却不可行。他指出：“取土著兵民及各处就食兵民授地耕垦，一备军食，一备战守，无事则驱其尽力农亩，有事则调其效命锋镝，谓之且耕且战，事非不劳，谓之即兵即农，名非不美，然调赴期会，则彼此观望，数日不能取齐，麾令前驱，则勇怯杂糅，气势不能完整，其何以战？且既挂名武籍，又令其从事耕耘，譬犹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两者相兼，必致一无所就。是且战之兵不能战，且耕之兵不暇耕也。”③他认为，寓兵于农思想已成过去，不能简单泥古套用。他主张划兵农为二，择其精壮有胆之兵编入营伍，进行正规操练，羸弱不任战者则散之为农，按户口拨给荒地，

---

① 左宗棠：《与总统嵩武军张朗斋提军》，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7页。

② 左宗棠：《与总统嵩武军张朗斋提军》，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7～8页。

③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军制二》，第8页。

令其承垦。如此“简其精壮，营伍可得而实，散其疲弱，屯垦可得而增，两利之道也”①。经过左宗棠的整顿改革，又使新疆屯田迅速复兴，并得到飞快发展。

综上所述，新疆屯田之所以在林则徐、左宗棠二人主持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是因为二人都采取了新型屯垦政策。清政府原举办屯田，主要为了解决军食问题。尤其是新疆，远离中原，交通不便，驻兵就要解决粮饷问题，而解决粮饷的最好办法就是屯田。正因为清政府把屯田仅仅局限在解决“军食”这样一个狭小的目的，所以往往不顾人民死活，采取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政策，对屯民“勒派取盈”，“追呼迫索”，逼得垦民或造反起义，或弃地逃匿，致使边地随垦随荒，垦务滞缓。林则徐、左宗棠则与以往不同，他们把屯田看成是繁荣边疆经济、强化边防武备的重要措施，把屯田与边疆的开发建设、繁衍边疆人口和促进民族团结紧密结合起来。前者主张在兄弟民族聚居的地方扩大民屯和回屯，刺激边民的生产积极性。后者则看到了垦民疾苦，主张爱护老百姓，先给民食，后买军食。他们倡导的边垦政策，符合边疆各族人民的意愿，受到人民的拥护，促使边垦事业快速发展。

遗憾的是，清朝的边防建设始终没有一个稳定持久的政策，常常是一个将军一个令，变化无常。继左宗棠之后，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曾大力发展兵屯，发给营兵牛羊种籽，令广开屯牧，但因管理不善，徒滋耗费，旋办旋止。继任巡抚饶应祺又派兵开垦罗布淖尔，拟就此安插无地回民。但因未搞清地性，盲目上马，历时数年，糜款巨万，而该地仍旧荒芜，所迁民户也纷纷逃散。1903年，新任巡抚潘效苏为了裁兵节饷，推行“遣散内地客勇，改练土著世袭兵”的新政策，强征当地垦户壮丁入伍，按户派充。每步兵1名，拨给土地10亩、牛马各5头、羊10只，令其边屯牧，边操练。其结果，垦民视当兵为畏途，应征者大半逃亡，剩余者勉强承垦，但“与民争地争渠，营兵惮于垦荒，攘夺熟田，迫令

---

①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军制二》，第8页。

迁徙，并减价派羊，硬占民间草湖牧地，民怨渐腾”，以致“屯牧两事，费帑不资，利未见而害先形”，实行不久就被迫停办。①

新疆屯田经如此反复多变，大受损伤，直至清末，再未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①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军制三》，第12～13页。

第十七章　中法战争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①。由于法国武装入侵越南，并企图以越南为跳板进窥中国而引起的 1883～1885 年（光绪九年至十一年）的中法战争，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夺取殖民地大高潮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序战

一、法国入侵越南，企图进窥中国

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中南半岛）东部，东南两面临海，北面与中国云南、广西两省邻接，西面与老挝、柬埔寨为邻。南北长约 1600 公里，东西最宽处（北部）约 600 公里，最窄处（中部）仅约 50 公里，总面积约 32.9 万多平方公里。19 世纪 80 年代初，人口约 2300 万，军队约 7 万人。越南全境 4/5 为山地和高原，北部和西北部为高山、高原，红河以北地区海拔 500～1500 米。中越边境有的山峰海拔 2000 米以上，山间谷地较宽，高平、那岑、谅山等处的谷地为中越间天然通道。由于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气温高（年平均 24℃以上），湿度大，风雨多，雨季（5 月至 10 月）、旱季（11 月至次年 4 月）明显，属于热带季风气候。19 世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 卷，第 798 页。

纪时，越南划分为南圻（南部 10 省）、中圻（中部 4 省）、北圻（北部 16 省）三部分，国都为顺化。北圻北部山区交通条件极差，行军不便。1884 年秋，为打击法国侵略军，清军某部由广西龙州出牧马（越南高平省城），经太原省之苏街前往宣光时，一路深林密箐，羊肠一线，“尝行数十里不见一人，不睹一舍。军行须节节备粮，采之数百里外”①。“宣光一带，荒僻无路，但随象迹以行。野象百十为群，夜行触之则毙”②，间有露宿草丛而死于虎者。

法国觊觎越南，由来已久。早在 17 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就来到越南，大搞间谍活动。18 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势力被英国排挤之后，越南更成了法国向东方扩张的重要目标。它企图在印度支那建立强大据点，阻拦英国进一步向远东扩张，以便自己更多地夺取在远东（主要是中国）推行侵略政策和殖民主义的利益；同时，企图以越南为基地，开辟一条通向中国西南和中部地区的侵略道路。法王路易十六（1754～1793）曾根据百多禄主教（在越南等地传教的法国殖民主义者）1787 年的奏议，制定了未来“法兰西东方帝国”的庞大计划，并采取了侵略越南的实际步骤。

19 世纪下半叶，法国统治者拿破仑第三（1808～1873）继承路易十六的衣钵，加紧对越南推行炮舰政策。1856 年，法国远东舰队炮轰土伦港（今岘港），揭开了武装侵越的序幕。1858 年，法军于土伦港强行登陆，一度占领。次年，又攻占西贡（今胡志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随即从侵华法军中抽调 3500 人进攻南圻，先后占领嘉定、定祥、边和、永隆等省和昆仑岛，于 1862 年 6 月强迫越南阮福时封建王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即《柴棍条约》），把越南南方以西贡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割归法国。

---

① 唐景崧：《请缨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二），第 152 页。

② 唐景崧：《请缨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二），第 201 页。

1863年，法国又强迫越南承认柬埔寨受其"保护"，进一步控制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湄公河下游广大地区。

1871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堵布益①以帮助云南清军采购军火为名，对红河进行了实地考察，证明溯红河可以航抵中国，保胜（今老街）以下可通汽船。从此，占领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由红河直达中国，便成为法国殖民者在亚洲扩张的主要目标了。

1873年11月，由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出的一支侵略军在安邺率领下侵占河内，接着组织上万雇佣军，连陷海阳、宁平、南定等城。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驻在中越边境保胜地区的黑旗军帮助抵抗法国侵略者。

二、黑旗军援越抗法与纸桥大捷

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活动于中国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其领袖刘永福，字义，号渊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雇工出身，早年参加天地会起义。1867年（同治六年）因受清军逼迫，率众数百，进入越南北部，后以保胜为根据地，聚众耕牧，势力逐渐壮大，队伍发展至2000余人。与越南人民休戚与共的黑旗军，对法国侵略者十分痛恨，因而接受了越南政府的邀请，由刘永福率领千余人，配合越南军民抗战。1873年12月21日，黑旗军于河内近郊"设伏以诱斩安邺，覆其全军"②。可是，越南阮氏封建王朝害怕黑旗军的胜利招致法国的更大报复，急忙与法议和，于1874年3月15日签订了第二次《西

---

① 堵布益本法国商人，英法联军侵华时侨居上海，后移居汉口，1869年春经西安、汉中、重庆抵达昆明，劝说云南巡抚岑毓英等沟通滇越交通，采购西方军火镇压回民起义。1871年，堵布益以通过红河向云南当局运送军火为借口，探航红河。其后，他回到巴黎，向海军部汇报情况，得到法国当局的赏识和重用。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2册，总第12736页。

贡条约》，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另一方面，越南政府授予刘永福“三宣副提督”之职，由他管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以便利用黑旗军阻止法军对红河上游的侵略。

驱逐黑旗军，占领北圻，是法国侵略者的既定方针。1879 年 6 月，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公开叫嚣：“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① 1881 年 7 月，法国议会通过了 240 万法郎的侵越军费。1882 年 3 月，法国西贡殖民当局派海军上校李威利（又译为李维业）率军数千北上，再次发起对越南北圻的武装侵略，4 月占领河内，次年 3 月又占领南定。法国侵略者还不断溯红河向上游进犯，并“悬赏格万金购刘永福，十万金取保胜州”②，气焰十分嚣张。

刘永福深知“法鬼贪心无厌，非武力不能解决”③，因而又一次接受越南政府的邀请，发兵近 3000 人，会合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所部军队，向法军发起反击。1883 年 5 月 19 日（光绪九年四月十三日）拂晓，黑旗军右营管带杨著恩得悉河内法军将倾城出战，“全营不造饭，骤率驰去”。刘永福急令左营“伏道左为奇兵”，前营“扼大道迎敌为正兵”，自率亲兵在后督阵。杨著恩营进至河内城西之纸桥，列阵刚毕，法军已布满桥东。经激战，法军依仗武器精良，冲至桥西，杨著恩壮烈牺牲。法军随即直趋大道，进攻黑旗军前营。埋伏于道左的黑旗军左营突然杀出，与前营夹击敌军。刘永福率亲兵冲上前去，右营溃兵亦“折回愤战”。经过一场激烈的肉搏战，“法尸山积”，李威利亦当场毙命。④ 此次战斗，黑旗军再次重创法军，这便是通常所说的“纸桥大捷”，亦即中法战

① 依罗神甫：《法国－东京回忆录》，转引自〔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 1 卷（1960 年中译本），第 41 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 1346 页。

③ 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法战争》（一），第 261 页。

④ 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 77～78 页。

争之序战。纸桥战后，越南政府任命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

法国不甘失败，立即以西贡法军司令波滑为北圻法军统帅，除增派陆军外，并成立北圻舰队（驻东京海军分舰队），由海军少将孤拔指挥。1883 年 8 月，法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波滑率领，沿红河进攻黑旗军；一路由孤拔率海军进攻越都顺化。由波滑率领的法军在怀德、丹凤等地屡遭黑旗军和越南军民的痛击，损失惨重。但是，由孤拔率领的海军却攻入顺化，趁越王阮福时病死、政局不稳之机，强迫越南政府于 8 月 25 日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变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便肆无忌惮地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

第二节　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以越南为跳板，侵入中国云南等省，是当时法国政府的既定方针。1883 年 2 月，法国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忠实代理人、残酷镇压过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并由一贯蔑视中国的沙梅拉库担任外长，更加加紧了侵华步伐。侵略者供称：“我们在东京（越南北部）的行动所能获得的利益，主要将由中国领土的开放得来”①。同年 5 月 15 日，法国议会通过增加新的军事拨款 550 万法郎，并决定派遣军队 1800 名，配以各种舰船 12 艘，前往越南，支援驻越侵略军。第一次《顺化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便威逼清政府撤退所有应越南政府之请驻在北圻的中国军队，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占领，并要求中国和它签订不平等的商务协定和国境条约。清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法国便决定诉诸武力。

1883 年 12 月，法国议会通过 2900 万法郎军费以及派遣 1.5

---

① 〔法〕沙梅拉库：《致法驻伦敦大使瓦定敦》，见《中法战争》（七），第 178 页。

万名远征军的提案，决定夺取山西、北宁，迫使清朝政府让步。12月中旬，法军悍然向驻扎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清军被迫应战，中法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883 年 12 月到 1884 年 5 月，战争主要在越南北圻红河三角洲内的山西、北宁等地进行；第二阶段从 1884 年 8 月到 1885 年 4 月，战争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越南北圻两个战场上同时进行（参见附图 20）。

一、法国远征军的编成、作战方针和部署

在发动中法战争时，法国已从普法战争（1870～1871 年）失败所造成的窘境中摆脱出来，军事力量有所恢复。普法战争前，法国有步兵 376 营，加上其它部队，约有常备军 60 万人。普法战争失败后，为了适应殖民战争和对付普鲁士军事威胁的需要，法国加紧进行军事制度的各种改革。废止代役兵制度①，恢复 18 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期首创的国民义务兵役制，规定 20～45 岁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一律不准替代赎免。这样，每年可招新兵 15 万人，保证了充足的常备军现役兵源和战时大量扩编部队的需要。根据 1875 年通过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法国总统为全军最高统帅。有关国防的重大事项，由高级国防会议决定。高级国防会议由内阁总理主持，有外交、财政、陆军、海军、殖民等各部部长参加。法国陆军分本国军及殖民地军两种。本国军由步、骑、炮、工、宪、辎重、经理、卫生诸兵种组成，殖民地军只有步、骑、炮、工、经理、卫生诸兵种。

在武器方面，法国在弥补了普法战争的损失之后，从 1875 年

---

① 法国长期盛行代役兵制度，每个应服兵役的人，都可缴付一定钱款雇人代服兵役。18 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期，代役制遭到禁止，但拿破仑重新在法律上加以承认。1855 年起，代役者由国家代雇，赎金则归入“军队补贴”这项特别基金中。1868 年的法令对当时的代役兵制度加以肯定。

开始，又逐渐依靠自己生产的新式枪炮把军队重新装备起来。到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能生产37～320毫米口径的各种火炮，其性能与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及德国的克虏伯炮不相上下。法军轻武器主要是夏什普式后装线膛枪，口径11毫米，射速为每分钟7发，射程1800米。此外，还有克罗帕契克连发枪和哈齐开斯机关枪等。普法战争后，法国海军舰艇工业也有较大发展。1873年，法国首建钢甲舰，至1881年，便能建造万吨级军舰，装甲最厚处达15英寸，航速达14节。舰艇主要装备100～190毫米口径的中重型火炮和37、57毫米口径速射炮。速射炮的射速为每分钟40～60发。

法国扩军备战的军费开支是相当惊人的。据统计，1883年法国陆军经费为5.84亿法郎，海军经费为2.05亿法郎，共7.89亿法郎，占国家总开支的22%强。正因为这样，法军有恃无恐地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

但是，法国为巩固和扩大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占用了不少兵力，加上财力毕竟有限，又要防备德国的进攻，不可能派出大量军队远涉重洋来远东作战。因此，中法战争过程中，法国远征军的兵力是逐次增加的，总兵力最多时也只有2万余人。在大举进犯北宁中国防军时，法国远征军司令部下辖2个旅和1个内河舰队。每旅辖3个步兵团和炮兵、骑兵、工兵、电信兵等部队。步兵、骑兵全部装备后装线膛枪以及少数机关枪。炮兵每连有火炮6门，射程最大的可达10公里，有的是连珠炮（机关炮）。

法国远征军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本国兵约占1/3；雇佣兵（由欧洲其它国家招募来的流氓打手）为数不多；附庸兵（阿尔及利亚和越南人）数量最大。这几种成分的军队待遇各不相同，装备、补给也不一样，因而互有矛盾。

法国用兵北圻，其目的在于变整个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然后以之为基地，进窥中国。其作战方针是：先攻山西，再取北宁，进而完全占领北圻。

1883年10月25日，法国以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统一指挥

在北圻的海陆军队。在待援过程中，法国在河内、海防、海阳、嘉林、丹凤等地不断增筑炮台，加强防卫，同时，加宽河内至丹凤的道路，以便向山西发动进攻。12 月初，北圻法军已增至 9000 余人，大部分集中于河内地区，作战准备基本就绪。

二、清军的作战方针及防御部署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彼此之间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越南统治者与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历史关系①，其国王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清王朝对越南则负有保护之责。正是根据这种特殊的历史关系，所以当越南遭受法国侵略时，其国王一方面邀请黑旗军协助越南抗法，一方面派遣使者向清朝政府告急，要求中国派兵前往救援。

当时，由于洋务运动已开展 20 年，中国军事实力较前增强，加上收复新疆战争的胜利和伊犁的收回，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因此，统治集团中有不少成员（特别是湘系将领）较积极地投入了反对法国侵略者图越窥华的斗争。早在 1881 年（光绪七年）9 月，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就指出：“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② 总理衙门也认识到法国侵占越南，必然危及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不得不于同年 12 月奏称：“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且红江为云南澜沧江下游，红江通行轮船，则越南海口旬日可至云南。此事关系中国

---

① 1882 年，法军攻破河内后，越南国王在乞援咨文中称：“下国久赖天朝封殖，豫列职方，二百余年，尺土一民，皆天朝隶属。”（《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 3 第 37 页）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写的《越南历史》（越南科学出版社 1971 年版）也指出：“阮朝诸王对清朝仍然一贯保持臣服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越南历史》第一集中译本第 458 页）

② 曾纪泽：《巴黎致总署总办》，见《中法战争》（四），第 257 页。

大局。"① 两江总督左宗棠更是一意主战，严正指出："法人垂涎（越南）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迨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𦓤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② 前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指出："越南积弱，若不早为扶持，覆亡立待。滇、粤藩篱尽失，逼处堪虞。与其补救于后，曷若慎防于先？此不可不明目张胆以提挈者也。"③ 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彭玉麟等为代表的主战派的抗法主张，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清军中爱国官兵对法国侵略者的义愤和对中国西南边境危机的深切关注。

可是，当时的清政府在慈禧太后的把持下，为了维护其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继续实行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是恭亲王奕䜣，而一切重大外交事宜，实际上经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办理。他们俯首听命于慈禧太后，对外推行妥协退让政策。李鸿章为其主和论点辩解，说什么法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无非胁越以必从，非志在全吞越境也"④。并声言，"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⑤。1883 年（光绪九年）春，清政府命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他极为恼怒，声称"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同时，乘机攻击左宗棠，说什么"闻有请恪靖（指左宗棠）南征者。此老

---

①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法人谋占越南北境并欲通商云南现拟豫筹办法折》，见《中法战争》（五），第 87 页。

② 左宗棠：《时务说帖》，见《中法战争》（四），第 321 页。

③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 39 册，总第 12049 页。

④ 《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密陈越南边防事宜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故宫博物院 1933 年铅印本，下同）卷 4，第 4 页。

⑤ 李鸿章：《论海防兵单未可轻言战事》，见《中法战争》（四），第 45 页。

模糊颠倒，为江左官民所厌苦，移置散地固得矣；然夷情大局懵然，必有能发不能收之日”。① 由于李鸿章等人的阻挠破坏，清统治者虽然从1882年起，应越南政府之请，陆续增派了一些军队驻扎于越南北圻（仍以剿办土匪为名），但一再交代“不可衅自我开”，对黑旗军的抗法斗争也不予公开支持，仍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在此之前，清政府驻英、法、俄等国公使曾纪泽，从1880年起，就曾多次抗议法国对越南的侵略。1882年，曾纪泽又主张利用当时国际间错综复杂的形势，废除越、法之间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李鸿章的拒绝。李鸿章的妥协退让态度，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并被指派对法交涉。同年11～12月间，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达成初步协议：法国表示“无意”侵占越南，中国驻北圻军队适当后撤；开保胜为商埠。1883年2月，法国内阁改组，茹费理重新上台。他召回宝海，另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同年6月，脱利古抵上海，随后与李鸿章重开谈判。他按照茹费理指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李鸿章仍然委曲求全，建议总理衙门让步接受。由于遭到清政府中另一部分人的反对，迟未达成协议。谈判过程中，法国已进一步武装入侵越南，并于8月25日逼签第一次《顺化条约》，完成了变越南为殖民地的一个重大步骤，于是法国政府于10月下旬命令脱利古中止谈判，返回日本任所。清廷外受法国的逼迫，内有抗法舆论的压力，从其切身的统治利益出发，最后不得已还是对法国的侵略行径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特别是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以后）。1883年9月22日，清廷命兵部尚书彭玉麟前往广东，会同两广总督张树声办理海防。10月底，清政府在给前敌将领的谕令中明确提出：“北宁为我军驻扎之所，如果法人前来攻逼，即著督饬官军极力捍御，毋稍松劲”，山西“与北宁相距较近，必应固守以成犄角之势”。② 同时，公开奖励黑旗军的抗法斗争。

---

① 李鸿章：《复张黄斋署副宪》，见《中法战争》（四），第8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604页。

清政府对法国武装侵略的态度虽已转趋强硬，但统治集团内部在作战方针上存在很大分歧。主战派鉴于黑旗军屡创法军，越南义军也在红河三角洲地区纷纷响应，而法军增援部队又未赶到，极力主张采取攻势。兵部尚书彭玉麟建议由广西、云南“各派骁将，率领精兵数千，督同刘永福所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疾捣顺化河暨西贡敌营，覆其巢穴”①。内阁学士周德润等建议迅速调回在德国定购的两艘新式军舰，会同广东水师，“突入越洋，直泊海防，封住海口”，然后以滇桂之师，由北宁、山西会攻河内法军。②清朝最高统治者排斥了上述主动进攻的主张，决定采取保守的方针。即：在越南，“保守北圻，力固滇粤门户”③；在中国，扼守沿海各海口与长江沿江一带。总的指导思想是希图“久与相持”，使敌“情见势绌，自愿转圜”。④其实质依然是以军事上的防守达到政治上求和的目的。基于上述方针，作了如下防御部署：

北圻方面——以北宁为重点，山西为犄角，分别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驰赴前敌，督率各营，严密防守，以固门户。鉴于“保全北圻，总以克复河内为要著”，决定“激励刘永福整顿队伍，联络越南义兵，相机进取，力图恢复”。⑤

沿海方面——鉴于广东当南洋首冲，天津为畿辅重地，确定以天津、广东为重点，在沿海各省海口择要布置，以防法国海军袭扰；同时，命令长江中下游各省察看沿江形势，分布扼守，防

---

① 彭玉麟：《拟疾捣顺化等处敌营片》，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7，第18页。

② 周德润：《越南边患愈滋请妥速密议以定大计折》，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7，第11页。

③ 《军机处密寄广西巡抚倪文蔚等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7，第27页。

④ 《军机处密寄署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8，第3页。

⑤ 《军机处密寄广西巡抚徐延旭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8，第5页。

敌兵船沿江内犯。

在法军即将大举进攻之际，负责北圻东线防务的广西巡抚徐延旭托病滞留谅山，所部桂军计30余营，主要集结于北宁及其附近地区，由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担任前线指挥。① 负责西线指挥的云贵总督岑毓英虽奉命力保山西②，但尚未启程；革职留任的云南巡抚唐炯也远在云南边境。驻守山西的部队只有黑旗军3000人，以及12月初才赶到的滇军3个营、桂军2个营，共计5000人左右。

三、山西、北宁之战

（一）山西保卫战

1883年12月11日，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按照先攻山西、再取北宁的作战方针，率军6000人，分水陆两队，由河内向山西进发。其部署是：第一队，以大炮舰3艘、小炮舰10余艘和民船数十只，载兵3300余人，溯红河西上；第二队2600余人，由陆路进至丹凤后，沿红河南岸向山西推进。

山西位于红河南岸，是控制红河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城周长约20里，有砖石内城和土质外城。黑旗军进驻后，进一步加强了这里的城防工事，并在红河上设置竹筏阻塞航道。刘永福鉴于山西的存亡关系重大，而协助防守的滇桂军队为数既少，斗志又不高，因而决心发扬黑旗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依托城垣及外围

① 广西边防各军赴越后，分左右两路驻守北宁、太原。左路统领为广西提督黄桂兰，右路统领为广西候补道赵沃。开始每路12营（每营420人），后陆续有所增加。1883年12月初，徐延旭出关驻谅山，令左右两路统领同驻北宁一城。

② 1883年11月28日，清廷根据云贵总督岑毓英“自请统兵出关筹办”的奏折，命其统带所部20营，克日出关，前往山西，择要驻扎。（参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8第10页。）

工事粉碎敌人的进攻，并以确保河堤和城北市区为防御重点。在获得河内法军倾巢出动的情报后，刘永福和唐景崧（清政府派至黑旗军的官吏——吏部主事）立即巡视阵地，激励将士，准备痛击来犯之敌；同时，函请北宁清军会同越南义军乘隙进取河内，或于新河、嘉林方向佯动，牵制敌人。

山西守军5000人的防御部署是：黑旗军6个营加桂军1个营扼守城北河堤；黑旗军5个营扼守城东；黑旗军、桂军各1个营扼守城南；滇军3个营扼守城西。此外，北圻统督黄佐炎等率领的越军约2000人驻扎于南门外村落中。

12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法军发起攻击，以舰炮和哈齐开斯机枪掩护其步兵展开，并摧毁了山西城东北的扶沙要塞。防守城北堤岸的黑旗军奋起还击，竭力迟滞敌军的行动。与此同时，刘永福命令东门外的黑旗军5个营利用地形秘密地向法军侧后机动，以便配合堤岸守军夹击敌人。约12时许，迂回敌后的黑旗军突然出现于陆路法军及水路舰队之间，从翼侧攻击向西运动之敌，使法舰炮火无法发挥威力。孤拔立即命令进攻部队转入防御，并集中炮火还击。黑旗军迂回部队伤亡较大，被迫撤退。下午4时，法军重新发起攻击，城北黑旗军顽强抵抗。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法军以死伤士兵200人、军官22人的代价，夺取了河堤阵地。

15日凌晨1时，守军一部乘夜发起反击，冀图夺回河堤阵地，未获成功。刘永福、唐景崧知沿河阵地难保，便将守军撤至外城，分段固守。当日上午，双方调整部署，法军不停地进行炮击。下午，孤拔以主力向西机动，企图夺取扶里炮台，从西门攻入城内。刘永福判明情况后，亲率黑旗军主力增援西门，并加强防御工事。

16日拂晓，法军猛攻北门和扶里炮台。北门守军沉着应战，连续向城下投掷火药包，顶住了敌人的进攻。防守扶里炮台的滇军也奋起还击，但因炮台设施陈旧，被敌突破，撤入外城，以致敌人得以进逼西门城垣。当日上午，法军炮兵配合舰炮以猛烈炮火将西门城楼轰塌，并摧毁全部防御工事。守军伤亡较大。下午，法军由西门突入城内，守军依托市区建筑物顽强阻击，激战至夜。为

了保存有生力量，黑旗军和清军乘夜从南门和东门撤出山西城，经不拔县向兴化集中。城南村落中的越军随即溃散。

山西虽然失陷了，但守军在伤亡逾千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浴血奋战，毙伤法军近千人，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黑旗军，在刘永福“纵敌入我重地，始能痛歼”① 的思想指导下，敢于以劣势装备和优势装备之敌拚杀。山西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驻守北宁的桂军无所作为。他们临战观望，既不增援山西，又不乘隙向河内方向出击，给敌军以必要的牵制，致使法军得以集中兵力西上，而山西守军则得不到友军支援，陷入孤军作战。同时，由于云南巡抚唐炯消极避战②，以致滇军主力推进迟缓。直至战斗前夕，才有少量部队进至山西、兴化，起不到有力支援山西作战的作用。

山西保卫战是清廷被迫应战后的首次作战。首战失利，丢掉了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不但失去了对河内法军的威胁，而且使东西两线的联系增加困难，对尔后的北圻作战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二）北宁等地的失陷

山西失守后，清廷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严守北宁，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即出关，加强兴化方面的防御，并令两广总督张树声“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劲旅，驰赴镇南关（今友谊关），以实后路”③。

1884 年 2 月 22 日（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岑毓英进抵兴化前线。这时，黑旗军经过休整补充，编为 12 个营，共计 4000 余

---

① 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 99 页。

② 唐炯一到越南，就声称“出境兴师，甚非长算”，“务一时主战之虚名，贻将来全局之实祸”。（见《中法战争》（二），第 231 页。）早在法军向山西进攻之前，他就擅自撤走原驻山西的滇军，并一度“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 13 第 3 页。）

③ 《军机处密寄两广总督张树声等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 8，第 44 页。

人。滇军调至兴化、临洮、端雄、宣光一线的兵力已逐次增至20余营，约1万人①。鉴于东线军情紧急，岑毓英遣唐景崧偕同刘永福率领全部黑旗军赶赴北宁。当时，岑毓英被指定为北圻东西两线军事总指挥，但他以两线阻隔，不便指挥为由，不愿挑此重担，加之鞭长莫及，以致东西两线军队实际上始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负责东线作战指挥的徐延旭，拥兵50余营，2万余人②，却不亲临前线积极部署作战。他一面向清廷吹嘘"北宁守御，固可无虞"③，一面借故留在谅山，将前线指挥权仍委诸左右两路统领黄桂兰和赵沃。黄桂兰虽为淮军"宿将"，但有勇无谋；赵沃则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二人又彼此不和，对战守之策，并无通盘谋划，只注意沿北宁至河内的大道布阵设防，正面防守，不注意翼侧掩护。

法军在攻占山西之后，由于伤亡较重，后方又不时受到越南义军的袭扰，无力继续发展进攻，只能固守山西、河内一线，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1884年2月，由法国陆军部派来的一个步兵旅和两队炮兵、一队工兵到达北圻，使远征军总兵力达到1.8万余人，炮舰20余艘。根据法国政府的指令，新到的米乐（又译为眉胪）将军于2月12日接替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孤拔重返舰队，指挥海上作战（同年6月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升为中将）。米乐接任后，将法军分为两个旅，分别由副司令波里也和尼格里二将军指挥，又以莫列波约统率北圻江防舰队。米乐按照原定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驻守山西，牵制兴化方面的清军，主力

---

① 岑毓英奏称："臣所部万人，计出关到兴化，由保胜、河阳两路皆有一千五六百里，不能不留兵四千分布后路，同臣到前敌者，前后不过六千余人。"（《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2第11页。）

② 山西失守后，广西又添募兵勇20余营，使北圻东线清军由万余人增到2万余人。

③ 徐延旭：《北宁守御尚可无虞及调派勇营西联滇军东防江口情形折》，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1，第39页。

则集中于河内、海阳两处，以便大举进攻北宁。

北宁西接山西，东临海阳，南拒河内，北蔽谅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驻越清军全力经营的军事重镇。它的得失，对北圻全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1884年3月7日下午，法军开始行动。米乐、波里也率第一旅由河内出发，于当夜渡过红河，扬言由嘉林渡新河沿大道向北宁前进。实际上，法军决定避开清军设防坚固的正面，从翼侧进攻北宁。

8日晨，法军从两个方向同时进军：尼格里率第二旅从海阳出发，乘船沿太平江北上；米乐、波里也则以一部兵力佯攻新河，主力沿新河南岸向东疾进。水陆两路各6000人左右。同日上午，法军第二旅主力在舰炮掩护下，由扶良两侧登陆，围攻驻守该处的4营清军。当地的一些天主教民也四出响应，为虎作伥。守军凭借炮台工事抵抗，终以寡不敌众，向西撤退。当退至桂阳时，黑旗军一部赶到，并力堵截法军，使其前进受阻。黄桂兰调扼守三江口一带的党敏宣所部8营回防北宁，党敏宣避战自保，拒不执行命令。

3月11日，法军第一旅在北宁东南方向渡过新河，与第二旅会合，准备次日从北、东、南三面会攻北宁。

3月12日，法军第二旅一部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向桂阳、春水等地进攻；第一旅迅速向西机动，从北宁南面发起攻击；第二旅另一部由水路绕至城北，夺占涌球（今答求，北宁东北4公里），切断清军后路。“敌夺涌球，曳炮阜顶，俯击北宁城。弹三落，城市哗奔，越官张登憻等开城遁。”① 正在城外督战的黄桂兰、赵沃见情况紧急，竟放弃指挥，分别向谅江、太原方向逃跑，清军顿时全线溃散。黑旗军及少数清军试图抵抗，但因大势已去，不得不撤往太原。黑旗军不久又从太原返回兴化。

3月15日起，法军分路追击清军。至19日，谅江、郎甲（今

① 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115页。

盖夫)、太原相继失守。东线清军被迫退至山区，大部溃散，余部集结于谅山、镇南关一带。

4月初，法军为转移兵力夺取兴化，主动放弃太原，仅以少数兵力在郎甲一带筑垒防守，主力经河内向山西集中。岑毓英闻风丧胆，随即将滇军主力后撤至保胜、河口一带，于是，兴化、临洮、宣光一线不久就被法军占据。至此，法国侵略军达到了占领红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的战略目的。

北宁作战，是双方在第一阶段中的主力决战。清军东路主力2万余人，全聚于此，其所以一触即溃，主要是由于清廷墨守其消极应付的战争指导造成的。山西失陷后，清廷仍只是要求前敌将领“严饬各军力保完善之地，毋使再行深入”①，以致在山西战后至北宁作战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东线清军竟无所作为，坐视法军增兵进攻，被敌军各个击破。其次，作为东线指挥官的徐延旭，“平日既无调度之方，临事复无应变之策”②，“督办广西关外防务，始终株守谅山，迁延不进，所统各军毫无纪律，又复任用非人，相率溃败”③。此外，桂军临战扩兵，缺乏训练，纪律涣散，也是北宁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

山西、北宁之战以后，清廷下令将徐延旭、唐炯等人革职查办，以署湖南巡抚潘鼎新为广西巡抚，以贵州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以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署理广西提督，并命原广西提督冯子材速赴前敌，接替黄桂兰统率关外各营。慈禧太后还乘机把战

① 《军机处密寄两广总督张树声等上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8，第44页。

② 志锐：《徐延旭败师辱国请革职治罪折》，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2，第5页。

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二)，总第1884页。

败的责任推到和她有矛盾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身上，更换全部军机大臣，命礼亲王世铎管理军机处，并让她的妹夫、光绪帝（载湉，谥德宗）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会同商办军机处要政”，又任命贝勒奕劻（后封为庆亲王）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但是，清廷关于中央和前线人事方面的变动，并不意味抗战决心的加强；相反，前线的军事失败，给了主和派以可乘之机，李鸿章等又加紧进行妥协求和活动。为迎合法国侵略者的意图，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任命淮系的李凤苞接替湘系的曾纪泽为驻法公使，以便为和谈铺平道路。当时，法国也希望有一段休整时间，因而趁北圻取胜的有利形势，一面扬言进攻广州，一面加紧向清廷诱和。

1884 年 5 月 11 日（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二）中国将驻北圻的军队调回边界，并对越法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三）法国不索赔款，但商品可从云南、广西输入中国内地；（四）法国答应在与越南订约时，决不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五）三个月后，双方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制定详细条款。6 月 6 日，法国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以确定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第三节　法国扩大侵略战争

一、观音桥事件

清廷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完全屈从了法国侵略者的讹诈，因而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在举国舆论的压力下，清廷只得命令驻北圻的军队仍扎原处，不得撤回。

法国侵略者急欲占据整个北圻，在《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的第6天（5月17日），福禄诺就向李鸿章提出：法军将于6月5日进据高平、谅山，7月1日进据保胜。李鸿章并未答应。可是，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米乐竟令陆军中校杜森尼率军北上，企图以武力强占谅山。

6月22日，法军900人（一说700人）行抵北黎（观音桥，即今北丽），接近清军阵地。清军前敌将领通知杜森尼说，没有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请暂缓进兵，"并非常合理地请求他通知法国当局转递必要的命令"①。23日，杜森尼扬言"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②，随即指挥法军炮击清军阵地。守军被迫还击，将法军击退。此次战斗，清军伤亡300人，法军死伤近100人，并丢弃大量军用物资。这就是法国侵略者蓄意挑起的"观音桥事件"（西方称"北黎事件"）。接着，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乘机扩大事端。茹费理命令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暂缓讨论条约细节，要求中国立即从北圻撤军，并索取2.5亿法郎的巨额赔款。

6月26日，法国政府将其在中国和越南北圻的舰队合编为远东舰队，孤拔为司令，利士比副之。7月1日，巴德诺致电茹费理："我们欲获取赔偿，必须据地以为质。"③ 13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海军中将裴龙电令孤拔遣派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前往福州和基隆。孤拔随即率领法国远东舰队驶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准备直接进攻中国本土，扩大侵略战争。但由于茹费理考虑到法国占领越南后，"与中国将成为直接邻邦"，彼此造成太深的仇恨，于法国不利④，因而法军这时的作战意图，主要在于"踞地为质"，迫使清廷就范。

---

①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91页。

② 潘鼎新：《法人扑犯官军迎击获胜折》，见《中法战争》（五），第422页。

③ 《巴德诺致茹费理》，《中法战争》（七），第218页。

④ 参见《茹费理致巴德诺》，《中法战争》（七），第239页。

清政府在敌人的威逼下，一面立即下令撤回北圻清军，一面以新任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代表，与法使巴德诺在上海举行谈判，并呼吁美、英等国进行“调解”。与政治上向敌屈服相适应，清廷在军事上并不做认真的准备。虽曾电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密饬各军，严阵以待”，但同时又束缚军队手脚，告以“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①，继续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二、法军进犯基隆失败

法国侵略者一面与清政府举行谈判，一面加紧推行炮舰政策，企图“踞地为质”，索取赔款。孤拔等人狂妄主张派舰队前赴江宁（今江苏南京）、福州，或北上直隶湾，袭取旅顺、威海卫，威胁京师。茹费理认为法舰过于北上会引起其它列强的疑忌和干涉，不得不将法国远东舰队的攻击目标暂定为福州、基隆两处。

我国领土台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诚如左宗棠所言：“台湾为南北海道咽喉，关系甚大，倘有疏失，不但全闽震动，即沿海各省隘口不知何时解严。”② 正因为这样，茹费理认为“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③。在侵略者眼中，孤悬巨浸的台湾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占的。夺取了台湾，不但“担保政策”得以实现，而且有了新的前进基地；同时，占据基隆煤矿，军舰燃料供应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台湾防务，初由兵备道刘璈主持，他将全台40个营的兵力分驻各地，台北仅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所部3营、总兵曹志忠所部

① 《军机处电寄各省将军督抚谕旨》，《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9，第3页。

② 《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折》，《中法战争》（六），第78页。

③ 〔法〕罗亚尔：《中法海战》，见《中法战争》（三），第539页。

6营。1884年7月16日，奉命督办台湾军务的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新授巡抚衔）率亲兵100余人抵达基隆。刘铭传系淮军将领，虽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但有民族气节，勇于任事。他一到台湾，即加紧设防练兵，增筑炮台。当时，法舰“费勒斯”号已在基隆附近进行侦察活动。刘铭传根据基隆地形和当面敌情，重新组织海岸防御：以新从台南调来的总兵章高元部两个营扼守八尺门高地和东岸炮台；以曹志忠部6个营的主力扼守田寮港附近高地，一部扼守八斗子附近海岸；由杨洪彪率1个营扼守西岸仙洞山高地。淡水方面，则由孙开华部防守。

8月4日，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海军少将率军舰两艘（“拉加利桑尼亚”号及“鲁汀”号）和法军400余人闯进基隆港，与原在该处活动的“费勒斯”号会合。当日，利士比发出“劝降书”，要守军交出基隆地区所有防御工事。守军置之不理，一面加紧备战，一面飞报尚在淡水的刘铭传。

5日晨，法舰逼近基隆港东海岸，上午8时开始炮击，守军奋起抵抗。炮战约一小时，守军炮台、工事大部被毁，弹药库也中弹起火，被迫后撤。法军陆战队约200人先后换乘小艇登陆，占领大沙湾附近高地后，进行整顿巩固，准备次日继续进攻。

刘铭传赶回基隆后，鉴于法舰火力较强，决定让登陆法军脱离舰炮火力支援后，再行反击。6日下午2时，法军一部沿滨海道路向基隆城前进，另一部在大沙湾附近进行掩护。扼守田寮港西侧高地的曹志忠部给前进之敌以迎头痛击，迫使其后撤。曹志忠率200余人乘势追击。为了围歼敌人，刘铭传立即命令章高元率100余人向敌人左侧反击，复以游击邓长安率亲军小队60人迂回敌之右侧，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法军节节败退，最后在舰炮火力的掩护下，狼狈逃回军舰。利士比无奈，率舰队退走，法军第一次进犯基隆宣告失败。

8月10日，清政府就法国在谈判期间突袭台湾提出强烈抗议，并呼吁各国“秉公评论”。可是，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反而借口“基隆事件”，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继续要求对“北黎事

件”进行赔款（此时已由2.5亿法郎减为8000万法郎），勒索未遂，便于21日下旗离京。与此同时，中国驻法公使李凤苞也离开巴黎去柏林，中法外交关系完全破裂。

三、马江海战

进犯基隆失败后，法国政府感到力量有限，难以在台湾、福建两处同时得逞，便决计先攻马江军港，毁坏福州船政局，然后并力谋占台湾。“毁闽以为‘报复’，占台以图索费，必要时更可调舰北上骚扰，此巴德诺之计也。”①

马江又称马尾，位于福州东南，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系福建海军驻泊之处。马江港是一个河港，四周群山环抱，港阔水深，可泊巨舰。从闽江口至马江，距离约50公里，沿岸形势险峻，炮台林立，仅马江附近就有7座炮台，并有部分克虏伯大炮，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

从1884年7月中旬起，法国军舰就以“游历”为名，陆续闯入闽江口，进泊马江，伺机挑衅。当时，负责福建军事指挥的要员有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等。张佩纶等风闻“法人欲取福州为质”，深感法舰驶入闽江居心叵测，“阻之则先启衅端，听之则坐失重险，实属左右为难”。②他们电询总署，不见明确答复。7月17日，张佩纶不得不上奏指出：“熟审彼己利钝之势，不在敌强而我弱，实在敌狡而我迂；既让以要害，复让以先机；彼处处攻心，我种种掣肘。兵机止争呼吸，臣固非畏其船炮之坚利，而实惜我虞备之略、谋断之歧也。”③他们在奏折中

---

① 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清华大学1935年版，第160页。

②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侍讲学士张佩纶等奏法人入口窥伺现筹省防布置情形折》，《中法战争》（五），第489页。

③ 张佩纶：《防护船局并省防情形折》，见《福建文博》1985年第1期。

表达了愤懑和忧虑心情，但还是根据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指令，对法舰的侵入非但不敢阻止，反而给孤拔以友好款待；同时，命令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于是，法舰在马江者日或四五艘，或五六艘，出入无阻。它们与中国军舰首尾相接，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海军，不许其移动，前后为时月余。

8 月 17 日，清政府见和谈无望，不得不撤回上海谈判代表，令沿海沿江各省极力筹防，严行戒备。但对马江方面，仅指示“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①，并未解除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而几乎与此同时，茹费理致电巴德诺：“上下两院散会以前，给我必要的全权，得在中国沿海作战，并攫取担保（即踞地为质），现在已是最后向中国要求履行契约义务的时候了。”“我们刚发电致海军提督（指孤拔），如你接到中国否定的回答，他应于知照外国领事及船舰后，立即在福州行动，毁坏船厂的炮台，捕获中国的船只。福州行动后，提督将即赴基隆，并进行一切他认为以他的兵力可做的一切战斗。”② 显然，法国政府已向其远东舰队下达了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的命令。

当时，马江一带清军水陆防军的兵力已有所加强：海军舰只 11 艘，江防陆军逐次增加到 20 余营，还有大量自动参加战备的民众武装。清军的部署是：以 11 营兵力扼守马江和船厂一带江岸；11 营守长门、琯头等炮台，又以民壮近 2000 人协守闽安至琯头沿江两岸；11 艘舰只与法舰相持于马江江面，另以旧式战船及渔船各 20 余艘分泊于罗星塔两侧。还有满载石头的帆船 30 余只，停泊于金牌、长门附近，以备堵塞航道，断敌退路。张佩纶、何如璋负责指挥马江一带水陆各军（指挥部设于船政局），穆图善驻长门，何璟、张兆栋驻福州。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前敌将领怯懦无能，水陆各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的周密计划，加之装备不良，弹药不足，因此，马江一带清军人数虽然与当面法军相比占

① 《军机处寄福州将军穆图善等电旨》，《中法战争》（五），第 503 页。

② 《茹费理致巴德诺》，《中法战争》（七），第 249～250 页。

有优势，而战斗力却很弱。

8月22日，即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下旗离京的次日，孤拔奉命消灭中国的福建海军。他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决定于次日下午退潮时开战。当时，泊于马江的法国舰队有军舰7艘，另有鱼雷艇两艘，还有两艘军舰（“梭尼”号和“雷诺堡”号）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阻止清军塞江封口，保障后路安全。此外，马祖澳（今定海湾）附近尚有法舰数艘，控制闽江口和准备机动。在马江，参战的法舰共计1.4万余吨，炮72门（口径均在10厘米以上），有不少射速为每分钟60发的机关炮，兵员约1700余人。福建海军的11艘舰艇（其中9艘为木质）共约万吨，炮55门（大口径炮很少），没有鱼雷艇和机关炮，兵员约1200人。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比较，法国舰队显然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孤拔决定“只在退潮时方攻击”①，对法舰非常有利。因为当时用船首的绳锚系泊，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落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孤拔选择落潮时开战，可使大部分中国军舰位于法舰之前方（因当时有8艘中国军舰位于法舰之上游），从而暴露于敌人主要炮火之下，而清军舰船却无法用舰首主炮进行有力的回击。

参加马江海战的法国舰艇

舰艇名称	种　类	排水量(吨)	马力(匹)	人数	火炮(门)	备　注
窝尔达	轻巡洋舰	1300	1000	160	6	旗　舰
杜居士路因	巡洋舰	3189	3740	300	10	受轻伤
费勒斯	巡洋舰	2258	2790	250	15	受轻伤
德斯丹	巡洋舰	2236	2790	250	15	受轻伤
野　猫	炮　舰	452	不详	120	5	
蝮　蛇	炮　舰	471	不详	120	4	
阿斯皮克	炮　舰	471	不详	120	4	

① 〔法〕罗亚尔：《中法海战》，见《中法战争》（三），第549页。

舰艇名称	种　　类	排水量(吨)	马力(匹)	人数	火炮(门)	备　注
凯　　旋	装甲巡洋舰	4127	2400	410	13	
45号雷艇	鱼雷艇					受重伤
46号雷艇	鱼雷艇					受重伤

参加马江海战的中国舰艇

舰艇名称	种　　类	排水量(吨)	马力(匹)	人数	火炮(门)	备　　注
扬武	轻巡洋舰	1560	1130	200	11	旗舰,中鱼雷沉没
伏波	炮　舰	1258	580	150	7	驶向上游搁浅
济安	炮　舰	1258	580	150	7	中弹着火沉没
飞云	炮　舰	1258	580	150	7	同上
福胜	钢铁炮艇	250	389	26	1	中弹沉没
建胜	同　上	250	389	26	1	同上
福星	炮　艇	550	320	70	4	中弹着火沉没
艺新	炮　艇	245	200	30	5	驶向上游搁浅
振威	炮　艇	572	350	100	6	中弹着火沉没
永保	运输舰(商船)	1353	580	150	3	同上
琛航	同　上	1358	580	150	3	同上
合计	11艘	9912	5678	1202	55	

8月23日上午8时，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向何璟投递最后通牒，限福建海军于当日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何如璋得知后，竟然对福建海军将士封锁消息，并企图要求法方把开战日期改在8月24日，遭拒绝后，才匆忙下令进行临战准备。

当日下午1时56分,孤拔趁落潮的有利时机,指挥法舰突然发起攻击。福建海军舰只未及起锚,就被击沉两艘(“琛航”号和“永保”号),重创多艘。仅有的两艘钢铁炮艇“福胜”号和“建胜”号,由于船头朝向上游,不能以其装于舰首的25厘米口径大炮打击敌人,受伤后随波漂流,一沉一毁。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海军下层官兵英勇还击。旗舰“扬武”号(福建海军唯一的一艘轻巡洋舰)用尾炮准确地还击在它下游的法军旗舰“窝尔达”号，首发命中

舰桥，击毙其引水和 5 名水手。正在这时，敌 46 号鱼雷艇击沉了“扬武”号旗舰，但该艇也被清军岸炮击中，锅炉爆炸。“扬武”号沉没时，管带（舰长）兼舰队指挥张成泅水（一说乘小舟）登岸，擅离职守。炮艇“福星”号离敌舰最近，在开战时就受了重伤，但它立即断锚转向，冲入敌阵，瞄准敌旗舰猛烈射击，后遭敌舰三面围攻，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艇官兵壮烈牺牲。在罗星塔下游，炮艇“振威”号被刚从闽江口外赶来的一艘法国装甲巡洋舰“凯旋”号击穿，首尾均已着火，船身失去控制，随波漂向下游。但艇上官兵仍英勇奋战，直到最后被敌鱼雷击中沉没前的一刹那，还发射了最后一发炮弹，重伤一敌舰舰长和两名士兵。

江面战斗仅进行了约半小时，福建海军 11 艘舰艇除“伏波”号、“艺新”号驶向上游搁浅外，全部被法舰击沉，将士阵亡 796 人，还损失了数十艘商船。法军仅死伤 30 余人，有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余为轻伤。

24 日上午，法军部分炮艇乘涨潮上驶到福建造船厂附近，用重磅榴弹轰击船厂，“对凡力所能及的东西，均予摧毁”①。与此同时，法舰继续对马江附近的帆船、舢板进行毁灭性的破坏。

25 日，法海军陆战队一部在罗星塔登陆，夺去 3 门克虏伯大炮。此后几天，法舰驶向下游，逐次轰击闽江两岸炮台。由于炮台口门朝向下游，不能掉转炮口回击从后方攻击的敌舰，因而全部被毁。这样，法舰得以鱼贯而出，退至马祖澳。

马江战后，清廷撤销了张佩纶、张兆栋、何璟、何如璋等人在福建的任职，以前两江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以福州将军穆图善和漕运总督杨昌浚为帮办大臣（改任闽浙总督），闽中防务逐渐恢复。

马江海战的惨败，固然有舰艇“我小彼大，我脆彼坚”② 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清廷妥协求和政策造成的。很明显，法国利用谈

---

① 〔法〕罗亚尔：《中法海战》，见《中法战争》（三），第 557 页。

②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奏折》，《中法战争》（五），第 523 页。

判麻痹清政府，以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清廷却一味求和，在军事上丧失警惕，致使马江守军仓促应战，措手不及。诚如张佩纶在战前指出的那样：法舰陆续进口，“蒉拟塞河，而旨不允。使敌船排重险而入腹心，犹有彼不动我亦不发之命。以此求制胜得乎？”①事后，清廷也不得不承认：“法人专行诡计，数日来我军未经先发，适堕术中。”② 其次，前敌将领畏葸无能，也是招致马江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佩纶等明知敌人“有密据要害先发制人之意”，却“不敢事先张皇”，不做认真的应敌准备，甚至将舰上的炮弹也控制起来。23日，当战云密布、端倪尽露之际，仍不利用早晨涨潮移转船身的有利时机，先发胜敌，而这点正是孤拔所非常恐惧的。侵略者自供：“如果他们（指福建海军）于潮水来时进攻，那地位便完全倒转，提督（指孤拔）所打算可得到好处的所有优势，都将转到他们手中去，反而对我们不利。”③ 此外，北洋、南洋海军各分畛域，不予支援，对马江战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淮系、湘系都把自己掌握的舰队当作巩固个人权势的资本，彼此之间倾轧摩擦，势如水火。福建海军受优势装备之敌直接威胁，一再吁请支援，李鸿章竟以“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敌法之铁舰大兵船”，“若一抽调，旅顺必不能保”④等等为由，拒绝派舰前往马江，曾国荃控制下的南洋海军也拒不支援。结果，福建舰队孤军苦战，全军覆没。

第四节　清军调整战略，扭转战局

一、清廷对法宣战及双方战略方针

法国远东舰队偷袭马江，清廷深感有损“天朝”尊严，在主

① 张佩纶：《涧于集》，见《中法战争》（四），第377～378页。

② 《军机处寄福州将军穆图善等电旨》，《中法战争》（五），第513页。

③ 〔法〕罗亚尔：《中法海战》，见《中法战争》（三），第549页。

④ 《北洋大臣李鸿章来电》，《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20，第9页。

战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于8月26日（七月初六日）发布宣战诏旨，命令前线海陆各军准备对法作战。鉴于法国侵略者已把战火引向中国本土，清廷认为："惟当一意备战，应以进兵越南，规复北圻，俾彼族不敢悉众内犯，为制敌要策"①。根据"牵制以战越为上策"②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在战略上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为此，下令"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著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毋任蔓延。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同时，公开表示支持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③

清廷宣战后，法国为了能够继续利用香港等"中立"口岸作为基地，并取得英、美等国的煤和食品等物资供应，因而没有正式宣战。同时，法国再次从政治上对清政府进行诱降活动，由总税务司赫德为拉线人，大搞幕后外交，以此作为它在军事上暗中积极部署的烟幕。早在马江海战之前，孤拔和巴德诺就极力主张法舰北上袭取旅顺和威海卫，威胁清朝京畿重地。马江偷袭得逞之后，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此次完全失败"，但"福州距离北京太远，不足使帝国朝廷获得教训"，因而"复又坚决主张将战争移至北方"。④ 茹费理政府曾一度赞成孤拔等人的侵略计划，并令其立即在北方各海口行动，但不久又改变了决心。其所以如此，一则担心北上扩大战争，可能招致其它列强的干涉，而当时法国正对由于埃及问题同英国的矛盾尖锐化所造成的欧洲局势颇为不安；一则担心北上与北洋舰队交锋，影响李鸿章的地位，而他正是法国政府"应该尽量宽待"的未来谈判的极好对手。于是，夺取台湾北部，又成了法国侵略军的战略目标之一。茹费理希图通过

---

① 《军机处寄前两广总督张树声等电旨》，《中法战争》(五)，第511页。

② 《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等电旨》，《中法战争》(五)，第520页。

③ 《清实录·德宗实录》(三)，第650页。

④ 《巴德诺致茹费理》，《中法战争》(七)，第289页。

“继续执行报复”的军事行动，迫使清朝政府屈服，允许赔款，或将基隆、淡水两埠口让给他们，以“提供同等价值的赔偿”①。北圻方面，法国政府鉴于谅山为中国军队入越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决计于雨季过后占领谅山，并相机进犯广西边境，与孤拔舰队的海上进攻遥相呼应。所以，法国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东攻台北，踞地为质，西取谅山，占领北圻。

二、台湾清军反击获胜

法舰退出闽江之后，集结于马祖澳休整待援。1884年9月中旬，法军由越南调来3个步兵大队，使海军陆战队增至2000余人，军舰增至20多艘。根据法国政府的指令，孤拔立即准备进攻台北。他决定自率5舰进攻基隆，派利士比率3舰进攻淡水，得手后，两路向台北府发展进攻，进而占据台湾北部。

台湾守将刘铭传在击败法军对基隆的第一次进攻以后，认为“法人自入中国以来，未经此败，势岂能甘？必将增兵增船，一雪斯耻”②。并判断法军“不得基（隆）煤，万难用兵中国”③。于是，一面下令拆移煤矿机器设备，“并将煤矿房屋一并烧毁，以绝敌人窥伺之心”④；一面进一步加强战备。鉴于基隆炮台已被击毁，驻军“离海过近，难支敌炮”，刘铭传下令移驻基隆港后山，准备以山为屏障，抗击敌之再次进攻。他决心亲率主力扼守基隆，而以孙开华率部防守淡水。当地民众也积极参加战备，保卫海防。

9月29日和30日下午，孤拔和利士比分别率舰自马祖澳出

---

① 《茹费理致顾赛尔》，《中法战争》（七），第260页。

② 刘铭传：《敌陷基隆炮台我军复破敌营获胜折》，见《中法战争》（三），第145页。

③ 转引自《直隶总督李鸿章电》，《中法战争》（五），第531页。

④ 刘铭传：《请将曹志忠移扎山后并拆移煤矿机器片》，见《中法战争》（三），第146页。

发。9月30日上午9时，孤拔率领的“胆”号等5艘军舰到达基隆港口海面，连同先期到达的“梭尼”号等3艘军舰，共计8艘。孤拔立即进行侦察，连夜部署，准备次日于港湾西海岸登陆。其登陆部队共约千余人。孤拔的企图是：首先从仙洞山脚登陆，并抢占仙洞山顶，以便安设炮位，配合舰炮掩护步兵沿岸边的山脊路线绕袭基隆守军翼侧，控制通往台北府和淡水的大道，夺占狮球岭和基隆城，尔后向台北府前进。

当时，基隆清军共有9个营，以曹志忠部6营防守港湾东岸，章高元部2营及陈永隆部1营防守西岸，以民众武装数百人防守基隆城。

10月1日晨6时，法军一个海军步兵大队在舰炮掩护下，换乘小艇向仙洞山海岸前进，陈永隆、章高元部坚决抵抗。经过4小时战斗，法军夺占仙洞山，炮队在山顶展开，轰击清军阵地。清军坚守二重桥一带，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中午，法军另两个海军步兵大队相继登陆，准备次日继续发起进攻。

在基隆交战的同时，利士比率领的“拉加利桑尼亚”号等3艘法舰到达淡水。刘铭传被淡水前敌营务处李彤恩夸大该地敌情所迷惑，强调“沪尾（淡水）为基隆后路，离（台北）府城只三十里……该口除沉船外，台脆兵少，万不足恃，倘根本一失，则前军不战立溃，必至全局瓦解，不可收拾”①，便不听曹志忠等人的劝阻，连夜率主力往援淡水，仅留300人守狮球岭高地。于是，法军于次日轻取基隆和狮球岭。

刘铭传到达台北府后，发现淡水情况并不紧急，即以章高元部援淡水，曹志忠部仍折回基隆。但由于法军已占据基隆和狮球岭，曹部只得扼守台北府东面的水返脚一带，以防法军南下。在前敌指挥官的错误决心下，基隆轻易弃守。清廷认为，“基隆要地，岂容法兵占据”，乃命令刘铭传乘法军喘息未定，“联络刘璈，同

① 《督办台湾事务刘铭传奏折》，《中法战争》（五），第563页。

心协力，合队攻剿；并募彰、嘉劲勇助战，将敌兵悉数驱逐”。[1]同时，命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向福建增调援兵，“设计渡台”，以增强台北防御力量。

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见法军在台湾进展顺利，便狂妄地声称：“我们有希望很快地把整个台湾北部，不可动摇地置于我们统制之下”[2]。他还再次向茹费理建议，让孤拔舰队北上进攻旅顺等地。巴德诺没有想到，他所得到的下一个信息便是法军在淡水的惨败。

淡水港位于淡水河口，沿河可达台北府，是台北清军仅次于基隆的防守重点。1884 年 8 月下旬以来，淡水守军即以木船满载石块沉塞港口，并敷设电力操纵的水雷，封锁航道；又在北岸（北岸滨海沙滩便于登陆）构筑两座炮台（法军称之为红炮台、白炮台），封锁港口及海滩。

10 月 1 日，利士比率领的 3 舰到达淡水海面，与原在港外活动的炮艇会合后，决定于次日上午 10 时开始攻击。利士比企图以舰炮火力摧毁岸上炮台和军营，打开港口，尔后登陆占领淡水街，策应基隆方面法军主力的作战。

当时，淡水守军由于从大陆增援的刘朝祜部两个营的到来而有所加强。章高元部两个营由基隆赶来后，总兵力增至 9 个营。守将孙开华判断敌军无法突破港口障碍，必然由北岸海滩登陆夺占淡水街。因此，他决心在北岸浅近纵深内利用丛林和高地预伏一部兵力，歼灭登陆之敌。

2 日晨 6 时 30 分左右，守军趁法军逆着阳光不便瞄准之际，先敌发起炮击，打乱了利士比的进攻准备。当夜，利士比派舰侦察港口航道，接着又派炮舰及小艇前往侦察和排除水雷，其中一艇中雷受伤。利士比判明水雷为电发火式，而且点火站在白炮台附近。于是，他决定派陆战队由北岸海滩登陆，避开丛林，经红炮台山坡绕到白炮台东侧，夺取点火站，引爆水雷。为完成这一

---

① 《军机处寄督办台湾事务刘铭传电旨》，《中法战争》（五），第 576 页。

② 《巴德诺致茹费理》，《中法战争》（七），第 264 页。

任务，利士比报请孤拔由基隆增派登陆兵力前来淡水。

4日，法军援兵200余人、军舰3艘，由基隆赶到淡水海面，连同原有兵力，共拼凑了军舰7艘、登陆部队600余人，准备在大风浪停止以后立即行动。

10月8日，海面风平浪静。淡水守将见法舰忽然散开，知其意在登陆，便督令各营按预定计划分散隐蔽。上午9时，法军舰炮以榴弹向北岸海滩及守军营地猛烈轰击，掩护其登陆部队换乘小艇分三路上岸。约一小时后，法军登陆完毕，开始向目的地前进。他们因没有遇到抵抗，便不再绕经红炮台山坡，直向白炮台扑去。孙开华待敌兵逼近丛林，立率两营从正面拦击，并命令埋伏于红炮台山后的章高元部和刘朝祜部从右翼出击，围歼登陆之敌。双方展开激战。12时许，孙开华亲率卫队奋勇直前，各路合力齐进，与敌短兵相接，加上爱国艺人张李成率领的民兵从敌人侧后阻截，法军溃败，纷纷向海边逃窜。守军追至海滩，敌兵争渡，溺死者数十人。

此次战斗，法军被歼百余人。侵略者哀叹："这次的失败，使全舰队的人为之丧气"①。孤拔也惊呼："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②。此后，法军除以部分舰只对港口进行监视封锁外，直至战争结束为止，再不敢贸然进犯淡水。

淡水战后，基隆法军向南进犯，清军由水返脚北上阻击，在暖暖附近展开激烈争夺，战事呈胶着状态。后来双方又陆续增加兵力，并相持于暖暖、八堵、七堵地区。

三、镇海清军击退孤拔舰队

淡水清军获胜，粉碎了法军以钳形攻势一举占领台北的企图。

① 〔法〕罗亚尔：《中法海战》，见《中法战争》（三），第572页。

② 转引自《巴德诺致茹费理》，《中法战争》（七），第266页。

为了孤立台湾守军，法国侵略者于10月23日宣布封锁台湾海峡，由利士比率领一支分舰队，沿台湾西海岸海域进行巡逻截击，并以3～6艘军舰在马祖澳附近海域游弋，控制南北海运和截断闽台间联系。为保卫祖国领土，全国各地掀起了支援台湾的运动。福建前线军民利用夜雾偷渡等办法进行反封锁斗争，有的胜利到达彼岸，将一批批物资和兵员送到台湾，不断加强守军的防御力量。但是，偷渡援台毕竟缓不济急，且损失过重。有鉴于此，新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等纷纷建议由南、北洋海军各派军舰数艘，组成援台舰队，打破敌军封锁。清政府也以“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紧”① 为虑，经过多次催促，最后由南洋派出“开济”、“南琛”、“南瑞”、“驭远”、“澄庆”5舰，交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统领，执行援台任务。舰队从11月起在上海进行准备，添置炮位，迟至1885年1月18日才出发南下。孤拔早已得知这一消息，他决定亲率法舰7艘，拦击中国援台舰队。

1885年2月8日，孤拔率舰队自马祖澳出发，北上搜索中国援台舰只。13日上午，双方舰队于浙江石浦檀头山附近洋面遭遇。吴安康不敢与敌交锋，率队逃跑。帆舰“驭远”和通讯舰“澄庆”航速较低，被迫驶入石浦港隐蔽。法舰追赶“开济”等3艘巡洋舰未及，便返回封锁石浦港。15日晨，“澄庆”被敌鱼雷艇击毁，“驭远”则遭己方炮火误击而沉没（一说两舰均自沉）。之后，孤拔得知“开济”等3舰躲避在镇海口内，便又率队进犯镇海。

镇海位于甬江海口，北岸为沙滩，敌舰不能靠岸，易于防守，南岸港汊较多，便于登陆。法舰侵扰东南沿海以来，浙江提督欧阳利见认识到镇海系“浙东之咽喉，防浙以防镇为急务”②，便以南岸为重点，进一步加强镇海的防御。其主要措施是：充实兵力，调整部署，以1000人驻金鸡山，5000人分守南北两岸，另以2500人为后应，分扼镇海至宁波沿江各隘；在甬江口钉桩沉船，堵塞航道；在金

①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等电旨》，《中法战争》（六），第94页。

② 欧阳利见：《金鸡谈荟》，见《中法战争》(三)，第284页。

鸡山险要处修筑暗炮台，安设进口大炮，台上覆土一丈，护以毛竹、草皮，又在高阜显露之处筑假垒10余座，只插旗帜，不设一兵，以迷惑敌人，并在沿岸险要处加修围墙、长堤，挖掘壕沟，密布地雷、障碍物等，从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此外，在各乡组织民团，盘查奸细，把法国教堂的传教士全部迁至后方，派兵监护，以切断敌之内应，并高价收买外国引水人员，使其不为法军所用。

当时，镇海口北岸之招宝山有威远、定远、安远炮台，南岸之金鸡山有靖远、天然、自然炮台，在小港有镇远炮台，还有南、北拦江炮台各一座。①

2月28日夜间，孤拔率法舰4艘侵入镇海海面。欧阳利见下令沉船堵口，命各营严阵以待。援台3舰和原在港内的“超武”、“元凯”两舰也都做好战斗准备。

3月1日下午，一艘法舰企图进港侦察，被北岸招宝山炮台炮火击退。接着，4艘法舰合力来犯，守军岸炮和舰炮一齐轰击，击穿敌先头一舰。法舰不支，施放烟幕逃走。当夜，法军以两小船于乾口门靠岸，企图登陆偷袭，被守军击退。2日，受伤法舰驶离镇海，其余3舰仍泊原处。入夜，法以两鱼雷艇进行偷袭，又被守军水陆炮火击退。3日上午，孤拔再次率领舰队进攻，同样遭到守军的猛烈炮击，其中一舰烟筒中炮受损，各舰掉头逃跑。此后，法军又数次利用夜暗进行偷渡和鱼雷攻击，均遭失败。

此次镇海作战，由于守军预有准备，水陆防守严密，伤亡甚少。法军则有两艘巡洋舰负伤，两只舢板沉没，并死伤不少官兵。孤拔本人也中弹受伤，同年6月11日病死于澎湖岛上。

四、北圻西线清军围攻宣光与临洮败敌

清廷于1884年8月26日被迫正式对法宣战以后，虽然确定

---

① 据杜冠英《威远、靖远、镇远、定远炮台碑记》、欧阳利见《金鸡谈荟》、民国《镇海县志》等。

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命岑毓英催促刘永福赶紧督军进取，又令岑毓英、潘鼎新率滇、桂各军速赴北圻战场，尽力反攻。但是，究竟如何实施陆路反攻，开始并不明确。后来根据前方奏报，才逐渐确定：东线桂军进攻谅江、太原，西线滇军和黑旗军进攻宣光，并推进到白鹤、永祥附近地域；两军在太原、永祥一带会师后，合力进攻北宁、河内。10月初，清廷鉴于基隆失守，更急于攻法之所必救，乃电令北圻各军力图进取，“直逼西贡等处，庶使（敌）分兵西援，台湾乃可稍松”①。

法军方面，因米乐回国养病，由波里也于9月8日接任远东军总司令。当时，北圻法军计有第一、第二两旅及内河舰队等共约1.8万余人，分守陆岸（今陆南）、谅江、太原、宣光、馆司等前沿要地，兵力比较分散。波里也根据法国政府东攻台北、西取谅山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北圻采取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坚守宣光、兴化，东线集中兵力夺取谅山，得手后，再转兵西向。

清军北圻西线总指挥岑毓英接受再度督师出关，与东线桂军合力规复北圻各城的命令后，迟至9月28日，才命令原留在文盘、大滩一带的黑旗军10个营（约3700人）、滇军张世荣部5个营（约2500人）分道前进：黑旗军黄守忠、吴凤典两部由山路绕赴陆安，出馆司之后；刘永福、张世荣率部沿红河直下，期收夹击之效。岑毓英企图先后夺取馆司、宣光，并以集结于云南边境的滇军主力6000余人沿红河逐次进占夏和、清波以及临洮等地，得手后，再与东线桂军会师，并力进攻北宁、河内。北圻法军为贯彻其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于10月11日撤走馆司守军，以便缩短防线，固守兴化、端雄、宣光，保证河内以西地区的安全。岑毓英鉴于馆司之敌自动撤离，便将黑旗军及滇军张世荣部集中指向宣光。

10月20日，岑毓英由保胜移驻文盘，并调原驻扎于云南边境地区的记名提督吴永安、邹复胜所部4000人和记名总兵覃修纲所

① 《军机处寄云贵总督岑毓英等电旨》，《中法战争》（五），第573页。

部 2000 余人进扎馆司、夏和、清波一带，伺机向兴化等地进击；同时，令宣光清军加紧围困敌人。

宣光城筑有石墙，依山傍水，“向称天险，城内一山耸峙，悬炮可击外军，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难破入”①。岑毓英强调必须先取宣光，滇桂各军联为一气，才能相机进取，因而使黑旗军和大量滇军长期顿兵于坚城之下，不能东进，坐视法军集中兵力专注谅山。12 月，清军围城部队又得到补充。月初，唐景崧在龙州招募的 4 个营（2000 人）经牧马进抵宣光城外（后又扩编为 6 个营）；月底，记名总兵丁槐所部 13 小营（共 3000 人）出马白关，经河阳（今河江）进至宣光。1885 年 1 月中旬，岑毓英由文盘进扎馆司，随即派兵 3600 人由记名提督何秀林率领前往宣光方向，进一步加强围城兵力。

波里也为解宣光之围，亲率由谅山方向撤回的法军第一旅（约 3000 人）由河内溯河而上，于 1885 年 3 月上旬进抵宣光。岑毓英见宣光法军兵力大增，随即命令围城部队撤至宣光附近山区休整，唐景崧所部 6 营则经占化撤往牧马。于是，西线滇军围攻宣光的目的未能达到，东下河内的意图也随之落空。

法军既解宣光之围，即以第一旅留守宣光，其余部队撤回端雄、河内等地。接着，波里也企图向兴化以西红河两岸滇军发动进攻，进一步改善法军在北圻西线的态势，保障主力继续在东线发展进攻。岑毓英获此情报，即令覃修纲部（此时约为 4000 人）严守夏和、清波、锦溪等红河两岸要点，令云南农民军竹春、陶美等部千余人及越南义军一部，与滇军李应珍部共同防守临洮府以东村落，刘永福则率黑旗军进驻临洮。

3 月 23 日，法军非洲兵千余人及越南教民一批，由兴化渡红河，进攻临洮东南的山围社。在此防守的中越军民联合部队坚守地营，沉着应战。待敌接近时，枪炮齐鸣，并引发地雷，打退了进攻之敌。法军连续几次冲击，守军均依托工事，发挥近战火力，

---

① 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 152 页。

顽强奋战，毙伤不少敌人，守住了阵地。傍晚，正当法军进退维谷之时，与刘永福有联系的越南义军在村落四周遍插黑旗，用中国话齐声喊杀。法军以为突遭黑旗军包围，惊魂落魄，纷纷脱掉军服，乘夜从附近的河沟泅水，偷偷向越池方向逃窜。守军没有发觉，未予追击。

中越军民在临洮附近大败法军，毙伤敌军数百人①，缴获法军红白衣裤、军帽等千余件。这是北圻西线战场上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这次战斗的主要特点，是中越两国军民紧密配合，英勇战斗。另外，守军充分利用地形，构筑了比较适应当时作战情况的野战工事——地营，减煞了敌人的火力优势，弥补了自己火力不强的弱点，也是这次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景崧对清军构筑地营一事，作了相当详细的记载。② 据称：滇军很注意挖掘地营，“扎营之处，兵卒均荷锄铲刀锯之类，掘地锯木”③。黑旗军同样非常重视这一作战手段，并在各次战斗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五、北圻东线清军反攻与镇南关—谅山大捷

（一）北圻东线清军反攻失利

东线桂军奉命再度开赴北圻战场后，开始进展顺利，至 1884 年 9 月中旬，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领的桂军主力 13 个营（约 4800 人）进抵船头（今陆岸），10 月初曾一度攻占陆岸；与此同时，记名提督方友升及总兵周寿昌等所部 9 个营（约 3200 人）进占郎甲及其以北地区。上述东、西两路桂军“互相犄角，自为战

① 据岑毓英奏称：临洮之战，“阵毙白帽法匪二百余名、红衣鬼四百余名、教匪千余名。”（《中法战争》（六），第 369 页。）但刘永福称，这是岑毓英邀功谎报战绩。（参阅《中法战争》（一），第 281～282 页。）

② 参见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 106 页。

③ 何慧青：《援越抗法光荣史》，见《逸经》第 35 期，第 38 页。

守”。潘鼎新率淮军5营及道员赵济川1营驻谅山“整理操练，以备两路策应”①。此外，副将马盛治所部6个营驻于牧马、新街一带，牵制太原守敌。东线清军兵力共约1.2万人，然而，“营哨各官大半代理，精壮能战者仅十之二三”②。

当时，法军已在河内、北宁集结完毕。波里也为粉碎东线清军的反攻，进而夺取战略要地谅山，以第二旅编成两个纵队，分别进攻郎甲、船头，以第一旅一部兵力配置于谅江附近，准备随时机动。法军主力于10月初自河内出发。10月8日，尼格里率领第二旅主力约3000人攻占谅江北面10余里的郎甲，清军伤亡惨重，余部向观音桥、屯梅方向溃退。尼格里在这次战斗中受伤，暂时返回河内，由波里也兼统第二旅。波里也以一部兵力守郎甲，其余撤至谅江，后又向东增援船头。进犯船头的法军第二旅一部1000余人，由端尼埃上校率领，于10月2日离北宁，经七庙，沿陆南江（今陆岸河）前进，6日进至船头西南20里的尼村，遭到苏元春部桂军的竭力抵抗。10日，法军在得到增援后发起猛烈进攻。守军英勇反击，歼敌200余人，士气为之一振。但是，株守谅山的潘鼎新未能及时调部增援，苏元春在获知西路郎甲失守、后援无望的情况下，便于11日夜间率部撤回谷松。

郎甲、船头既失，桂军东、西两路的形势为之大变，战局开始陷入被动。清廷力促滇、桂两军联成一气，规复北宁、河内，甚至直捣西贡的战略意图，随之成了泡影。但是，这时法军对台湾淡水的进攻遭到失败，士气为之沮丧。同时，波里也鉴于援兵未到，加之后方受到越南义军的牵制，无力继续发展进攻，不得不暂取守势，于是将主力撤回北宁、河内，以一部兵力在船头、郎甲一线巡逻警戒。12月以后，法国陆续增兵远东，1/3赴台，2/3赴越，并将北圻战场的法军改归陆军部指挥（原由海军部指挥）。在待援期间，波里也积极进行攻取谅山的各种准备，以船头为基

① 《广西巡抚潘鼎新奏折》，《中法战争》（五），第561页。

② 李鸿章：《寄译署》，见《中法战争》（四），第196页。

地，修筑工事、道路，屯积作战物资。清军方面，东线桂军也陆续补充了兵力，调整了部署：以驻谷松的苏元春、陈嘉所部 18 营为中路；以驻观音桥的杨玉科、方友升所部 9 营为西路；以驻车里、那阳一带的王德榜所部湘军 10 营为东路；另以叶家祥所部淮军 5 营、董履高所部桂军 5 营驻谅山为后应。此外，马盛治所部桂军 6 营仍驻新街一带。以上共有兵力 50 余营，约 2 万人。年底，东路湘军进至船头东面的丰谷，准备配合中路进攻船头。1885 年 1 月初，丰谷清军突遭法军 4000 余人猛烈攻击，“王德榜督军苦战，死伤颇多，因少后门枪，且子药已尽，势难抵御”①，被迫丢弃大量物资，撤回车里。潘鼎新恐法军由那阳迂回苏、王两部之后而攻取谅山，急忙从谅山调淮军两营守那阳，并要求清廷迅速增援。在此以前，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认为法军专注谅山，“桂军各道分防，兵力尚薄，必应由东路再增劲兵，以收犄角夹击之效”②，于是命冯子材率粤军 10 营、总兵王孝祺率淮军、粤军共 8 营，分别由钦州、梧州起程，经由广西赴越。由于谅山吃紧，冯子材以 8 营由上思州直接入越，协同王德榜部守东路；自率两营赴龙州筹办粮饷军械和招募新兵。王孝祺部中途哗变，溃散近半，到龙州时不及 2000 人。

1885 年 1 月底，法军第一、第二旅主力 7000 余人，在船头一带集结完毕，准备转守为攻，向广西边境大举进军。法军扬言分两路前进：一路攻谷松，一路攻车里。实则全军指向谷松，并力进攻中路，于 2 月 6 日占领谷松。2 月 12 日，法军攻占委坡，潘鼎新于当夜逃离谅山入关，苏元春随之率部退入关内。13 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战略要地谅山。至此，法军在北圻东线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波里也随即于 2 月 17 日率领第一旅离开谅山，以便经河内赶赴西线，解救被围于宣光的法军。

谅山弃守后，冯子材毅然以守关自任，亲率一营从龙州赶到

---

① 《督办军务广西提督苏元春等奏折》，《中法战争》(六)，第 445 页。

② 张之洞：《照会右江镇出关援剿》，见《中法战争》(四)，第 439 页。

镇南关（今友谊关），和王孝祺部一起拦截溃散兵丁，并急调协守东路的粤军8个营回守镇南关。可是，潘鼎新竟“告以守关无须该军，令仍顾东路”①。

2月19日，西路杨玉科部自观音桥、屯梅绕道撤至文渊（今同登）。杨玉科以主力防守文渊两侧高地，自率一部驻镇南关。2月23日，尼格里指挥法军第二旅进攻文渊，守军浴血奋战，节节抵抗。杨玉科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阻止了敌人的前进。午后，杨玉科中炮牺牲，守军随即溃散，退入关内。法军乘势侵占镇南关，前锋一度进抵我国境内十多里的幕府附近。

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加之不时受到当地群众武装的袭扰，法军于25日炸毁镇南关城墙及其附近工事，退回文渊、谅山。

冯子材闻镇南关失守，立即疾驰200余里，由东路统兵回援；王德榜也率部赶回，驻于镇南关东面的油隘（由隘）一带。潘鼎新则畏敌如虎，在文渊战斗之前，即由镇南关继续后逃至幕府。2月23日，正当文渊前线激战之际，又经凭祥连夜逃向海村。

（二）镇南关—谅山大捷

在潘鼎新不战而逃、东线法军直逼广西国门的情况下，龙州等地商民惊徙，游勇肆掠，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形势十分严重。清廷以关外各军迭次失利，于2月17日电令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由于潘鼎新远离前线，前敌将领公推冯为东线总指挥。② 冯子材决心“保关克谅”，并相机收复北圻各城。他一面调整部署，一面整顿军纪，安定民心，迅速稳定和改善了防御态势。

根据当面敌情和广西中越边境的地形条件，冯子材选定关前隘（今隘口）附近的有利地形构筑防御阵地。关前隘在镇南关内约8里处，是镇南关通往龙州官道之要冲，地势险要。东西两面

---

① 《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中法战争》（六），第453页。

② 《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六载：“李秉衡集诸将举前敌主帅，孝祺曰：‘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并受冯公节度。’秉衡称善。”

高山夹峙，中间为宽约 2 里的隘口。东面的大青山高 800 余米，向南倾斜与小青山相连，再南为马鞍山，一直延伸到镇南关的东面。西面的凤尾山高 700 余米，同样向南倾斜，直至龙门关（一东西向峡口，有小路可通扣波），然后经一座大石山延伸到镇南关的西面。关前隘南面的谷地宽 2 里多，谷地南端有几座小石山，往南直至镇南关都是起伏不平的山丘，统称横坡岭。冯子材命令部队在关前隘附近筑起一道土石长墙（长 3 里多，高约 7 尺，宽约 4 尺），横跨东西两岭之间，墙外挖掘 4 尺宽的深堑，以利坚守，并在东西岭上修筑堡垒多座，构成一个较完整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

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亲率所部萃军①担任关前隘正面防御，扼守长墙和山险要地；王孝祺部勤军 8 个营屯于萃军后面半里处，作为正面防御的第二梯队；王德榜所部湘军 10 个营屯于油隘，保障入关旁路的安全，并相机袭击敌后；苏元春及陈嘉所部桂军 18 个营屯于幕府（关前隘之后约 6 里），作为总预备队；魏纲所部鄂军 8 个营驻平而关，控制由艽封（今七溪东北）至龙州的水道。此外，蒋宗汉部（杨玉科阵亡后，所部由蒋统领）及方友升部共 10 余营屯于凭祥，潘鼎新率淮军 5 营屯于海村，以镇后路。加上驻龙州、新街等处部队，东线清军总兵力约达 80 余营，3 万余人。这是东线清军最盛之时。

3 月 9 日，尼格里曾派北非骑兵和越伪军各一部，企图由文渊经扣波进占艽封、牧马，绕出镇南关之北，摆出一副威胁龙州、切断唐景崧部（当时已由宣光撤至占化）和马盛治部（驻新街）归路的架势。冯子材根据越南人民提供的情报，立即派驻龙州的萃军 5 个营前往扣波，苏元春则率桂军暨魏纲部前往艽封。13 日，法军进至艽封，见清军已先期到达，便掉头南撤。到达扣波的萃军奋力拦击，法军败回文渊。尔后，苏元春部仍回幕府，魏纲部 8 营和萃军 5 营则分别留守艽封、扣波。

---

① 冯子材原有粤军 10 营，后在龙州等地增募 8 营，共计 18 营，统称“萃军”（以冯子材号“萃亭”之故）。

当时，清政府通过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代表金登干① 在巴黎与法国政府之间的秘密谈判正在加紧进行。由于法军在北圻东线占领谅山之后，接着于3月3日在西线解了宣光之围，法国政府急于趁胜迫和，以缓和国内人民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所表现的强烈不满。为保证自己在和议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法国政府要求东线法军继续发展进攻。波里也随即于3月16日电告尼格里：现在正与中国进行谈判，若能对龙州有所动作，将大有裨益。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中国人相信我们不久就要向龙州进攻。② 接着，波里也向谅山方面增派援军。尼格里认为威胁龙州是“玩一种危险的把戏”③，但还是积极备战，待命行动。

3月21日，冯子材为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不顾潘鼎新等人的阻挠，决定先发制敌，毅然率王孝祺部出关夜袭法军前哨据点文渊，一度冲入街心，毙伤不少敌人，并毁炮台两座后主动撤回。由于清军的主动出击，尼格里感到自己已处于被动地位，为争取主动，他不待援军到齐，决定提前发起进攻。

23日晨，法军第二旅主力千余人趁大雾偷偷进入镇南关。10时30分，大雾开始消散，法军便分两路进攻：主力沿东岭前进；另一路沿关前隘谷地前进，企图在主力夺取大青山顶峰大堡之后，两路前后夹击，攻占关前隘清军阵地。此外，法军一部近千人配置于镇南关东南高地，作为预备队，并向油隘方向担任警戒。冯子材立即商请驻于幕府的苏元春部前来接应，又通知王德榜部从侧后截击敌人。冯子材自率所部和王孝祺部奋力迎击当面之敌。法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经过几小时的拼死争夺，占领了尚未完工的东岭5座堡垒（分别构筑于小青山5个相连的山峰上）中的3

---

① 金登干，英国人，1862年进中国海关，1873年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成立，就以驻外税务司资格主其事，一直到1907年死去为止。

② 参见〔法〕黎贡德：《远征谅山》，见《中法战争》（三），第434～435页。

③ 〔法〕黎贡德：《远征谅山》，见《中法战争》（三），第439页。

座。冯子材见形势逐渐危急，激昂地高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① 冯、王两军将士在爱国热情激励下，誓与长墙共存亡，个个奋不顾身，英勇抗击，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下午4时许，苏元春、陈嘉等率部自幕府赶来增援。不久，蒋宗汉、方友升部也闻讯赶来。各部奋力抵抗，战斗甚为激烈，彼此势均力敌，死伤相当。当天，王德榜部自油隘出击法军右翼，牵制了敌预备队的机动，并一度切断敌人运送军火、粮食的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东岭的战斗。入夜，清军进一步调整部署，由苏元春部协助萃军守长墙，王孝祺部守西岭，陈嘉部守东岭，蒋宗汉、方友升部扼守大青山顶峰。冯子材还派人持大令飞调驻扣波的5营萃军前来抄袭法军左翼。附近群众连夜挑水送饭，赶运弹药。将士们磨刀擦枪，修补工事，严阵以待。经过一番整顿，前线军民更加同仇敌忾，决心与侵略者血战到底。

24日晨，尼格里指挥法军分三路再次发起冲击。在侥幸取胜的心理支配下，尼格里首先派其副手陆军中校爱尔明加率兵一部，利用大雾偷偷向大青山顶前进，企图突然夺取大堡，控制东岭制高点；但由于地形险峻，道路难行，法军偷袭未逞，不得已沿原路退回。上午11时许，尼格里见山顶久无动静，以为偷袭部队已不战而占领了山顶大堡，便命令以猛烈炮火轰击清军正面防御工事，企图掩护沿谷地前进的法军接近长墙，配合东岭法军一举突破关前隘阵地。当敌人接近长墙时，冯子材持矛大呼，率领两个儿子及所部将士跃出长墙，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当地人民群众和部分散兵游勇也主动前来助战。中午，从扣波赶来增援的5营萃军在游击杨瑞山、都司麦凤标等率领下，由摩沙村（龙门关西口）冲进龙门关，突然出现在法军侧后，给进攻之敌以意想不到的打击。经过殊死战斗，中路法军狼狈退回谷地。在关前隘长墙激战的同时，陈嘉、蒋宗汉相继率部反复争夺被法军占领的东

---

① 转引自《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中法战争》（六），第455页。

岭 3 座堡垒。直到傍晚，王德榜部在击溃敌之增援部队及消灭其运输队后，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东岭守军夺回了全部敌占堡垒。这时，王孝祺部也已击退沿西岭进攻之敌，并由西岭包抄敌后。法军三面被围，死伤甚众，后援不及，弹药将尽，开始全线溃散，最后丢下数百具尸体狼狈逃回文渊。（参见附图 21）

冯子材指挥东线清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共毙伤敌军精锐近千人，大大鼓舞了中越两国军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气焰。这是中法战争中关系全局的一战。它不仅使北圻东线反攻转败为胜，而且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人自谓入中国以来，从未受此大创。”① 3 月 27 日晚，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立刻在法国统治阶级中引起巨大的震动和恐慌。他们害怕因此而动摇法国在远东初步建立起来的殖民统治，因而群起抨击茹费理的远东政策。3 月 29 日，法军在谅山惨败的消息接踵传至巴黎，茹费理内阁随即于 31 日在一片责骂声中垮台了。

东线法军经镇南关惨败之后，已不足 2000 人，在文渊稍事休整，主力即仓卒撤至谅山，和已经到达那里的援兵会合，总数增加到 4500 人左右。冯子材为了不给溃败之敌以喘息机会，于 3 月 26 日亲率所部及王孝祺部出关进攻文渊，并通知王德榜部由小路抄袭敌之右翼。文渊守敌倾巢出战，清军“分路四面环攻，枪炮雨密”②。战不多时，守敌头目中弹落马，余众溃逃，清军立将文渊收复。

这时，越南义军已在谅山通往那阳、屯梅等交通线上加紧袭扰，给法军后方以很大威胁。尼格里企图坚守谅山，等待更多援兵到达后再次进犯镇南关，做了如下部署：主力扼守驱驴北面的一个高地，以确保驱驴，屏蔽谅山；一部兵力配置于淇江（今奇穷河）南岸，分守通向谷松、屯梅的交通要道；将老弱残兵编成“城堡班”，驻守谅山城垣碉堡。

---

① 李鸿章：《寄译署》，见《中法战争》（四），第 240 页。

② 冯子材：《军牍集要》，见《中法战争》（三），第 94 页。

冯子材鉴于谅山为越南北部军事要地，“若不急先攻取，实难成破竹之势”。并且认为，法军连战皆败，心胆已寒，“与其明攻多损士卒，不如暗取更易见功”。因此，与苏元春等密商，“以正兵明攻驱驴，出奇兵暗取谅山”。① 3 月 27 日，冯子材派杨瑞山率所部绕道而进，乘夜渡过淇江，于次日黄昏潜至谅山，散伏城外各处。

3 月 28 日，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王孝祺各部次第向前挺进，分三路逼攻驱驴：冯子材、苏元春率主力进攻正面；王孝祺部和萃军一部进攻西面；王德榜部进攻东面。法军依托驱驴北面高地的坚固工事，负隅顽抗，阻止了清军的进攻。尼格里鉴于其左翼和正面阵地工事坚固，而东面地形较难防守，决定由爱尔明加率军一部，向东面的王德榜部发起反击。下午 2 时许，冯、苏两军趁敌调动兵力、正面防御力量有所减弱之机，再次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中，尼格里胸部中弹重伤，接替指挥的爱尔明加随即下令向淇江南岸撤退。谅山守敌在慌乱中砍断浮桥，致使部分法军在溃逃中落水溺死。之后，法军退入谅山城，并立即部署分两路向南撤退。

29 日拂晓，清军主力徒涉淇江，向谅山挺进。在此之前埋伏于城外的杨瑞山部乘法军熟睡之机，突然发起攻击。城中法军仓皇应战，一片混乱。杨瑞山等“督率各营员弁、勇丁，蚁附而上，劈开城门，兵刃交下”②。法军死伤累累，残部向南逃窜。清军追击 20 余里，并边进边搜山，从山谷中俘获不少敌人。

清军在克复谅山的过程中，共毙伤法军近千人，并缴获大量军械物资，仅杨瑞山部就夺获大小火炮 30 余门。

谅山既克，清军乘胜分东西两路向南追击。31 日，东路陈嘉部及王德榜部攻克谷松，西路萃军一部克复屯梅，进逼郎甲。法军犹如惊弓之鸟，一口气逃到郎甲、船头一带。

在这大好形势鼓舞下，越南义军活动更频繁。北宁总督黄廷经集合各路义民 2 万余人，义民“建冯军旗号，自愿挑浆饭，作

---

① 冯子材:《军牍集要》,见《中法战争》(三),第 95 页。

② 冯子材:《军牍集要》，见《中法战争》(三)，第 96 页。

向导，随军助剿，或分道进攻”①。河内、海阳、太原、西贡等地人民也纷纷酝酿起义，盼望清军早日挥戈南下，赶走法国侵略者。冯子材决定于4月中旬亲率东线全军进攻北宁、河内；唐景崧军也准备出牧马，攻太原；广东方面，准备派兵出钦州，沿北圻东海岸进攻广安；会办云南军务鲍超所部30余营生力军正向龙州前进，随时准备入越；西线滇军也已克复广威等地，正向兴化发展进攻。但就在这时，清廷下达了妥协议和的停战撤兵令，彻底破坏了前线军民乘胜进军的作战计划。

第五节　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奇异结局

中国军队在北圻的军事胜利，为中越两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带来了光明的前景。然而，本来就是被迫宣战的清朝政府，这时不仅没有利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去争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反而把军事胜利当作求和的资本。李鸿章在谅山大捷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叫嚷：“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② 清朝最高统治者立即采纳，表示仍然愿意按照金登干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已经谈妥的条件恢复和平。法国方面，因军事失败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局混乱，迫使它同样急切地希望按已经谈妥的条件终止战争，所以不待新内阁成立，便由总统授权毕乐于1885年4月4日与金登干匆促签订停战协定。

4月7日（二月二十一日），清廷向前线各军下达定期停战撤兵令，规定：越南宣光以东，4月15日停战，25日中国军队撤回，5月5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4月25日停战，5月5日撤军，6月4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于4月15日停战。

---

① 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见《中法战争》（三），第80页。

② 罗惇曧：《中法兵事本末》，见《中法战争》（一），第26页。

6月9日（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即《中法新约》），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二）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法国可在此设领事馆；（三）法国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减轻；（四）中国日后修筑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五）法国撤退其在基隆和澎湖的军队。显然，法国侵略者利用清廷的昏庸怯懦，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基本达到了它发动这次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这就是当时人对中法战争结局所作的评价。这种奇特现象，无疑是中外军事史上所罕见的。

中法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深恐卓有功勋的黑旗军以越南西北部为根据地，继续抗法，或联合滇、桂人民反抗清廷；法国侵略者对黑旗军更是又恨又怕，声言黑旗军一日不离越境，法国就一日不交还澎湖。于是，清廷诱之以官禄，接二连三地催刘永福率部回国。在法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威逼与利诱下，刘永福终于在1885年9月率3000人入关，次年被委派为广东南澳镇总兵。他所带回的黑旗军战士，最后仅剩下300人，90%被逐次解散了。

中国为了阻止法国吞并越南和保卫中国领土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完全是正义的战争。从军事上说，中国军民在这次规模远比两次鸦片战争为大的战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取得了胜利，使法国在“北黎事件”后一直坚持的“踞地为质”、索取赔款的企图终究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可是，由于清朝政府怯懦妥协，最终造成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首先，清政府在战争中所表现的软弱态度，进一步助长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以致边境危机愈益加重。其次，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扩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了。但另一方面，中法战争的结局，促使中国的许多志士为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而寻找新的出路，于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开始汇合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为后来的变法维新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第六节　中法战争中双方战略战术评析

在晚清历史上，除收复新疆之战以外，历次反侵略战争均遭失败，但就中法战争来说，作战中虽互有胜负，而军事上最终胜利却属于中国军民。这一胜利的取得，决非偶然，而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和发展变化的结果。其中，作战双方在战略战术运用方面的优劣得失，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一、战 略 方 面

中法战争，法国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中国是被迫应战的被侵略者，因而从总体上讲，法军采取的是进攻战略，清军实行的是防御战略。然而，在战争进程中，由于战场情况不一和战况的演变，双方战略运用的具体内容是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特色。

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的态度虽已转趋强硬，但最高统治当局意志不坚，决心不大，终于排斥主战派主动进击的种种建议，决定采取保守求和的方针，一方面设法“保守北圻，力固滇粤门户”，一方面寄希望于敌人“情见势绌，自愿转圜”。虽曾考虑到“保全北圻，总以克复河内为要著”，但唯恐“有碍和局”，因而只是密饬前敌将领激励刘永福整顿黑旗军，相机进取。对此，当时就有人指出：“中国之畏外洋久矣，苟可相安，断不先发。故法据西贡姑听之，法据河内亦姑听之。迨顺化已降，滇粤难固，不得已而兴戎，犹曰侵我山西、北宁则与开仗，至于进战，仍任刘团。”① 此语道破了清廷在战

① 《工科给事中秦钟简奏中法兵端已启利在速战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 8，第 42 页。

略指导上“似战非战，实为无策”[①] 的窘况。

法军针对清军实行消极被动的防御战略，以及当时的布防情况和地理特点，决定集中兵力，先发制人，次第夺取北圻战略要地山西、北宁，进而占据整个北圻。第一阶段的战争实践表明，法军采取上述方针比较地符合客观实际，不但实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而且震撼了全部驻越清军，很快占领了太原、兴化等重要城市，迫使渴望“保全和局”的清政府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基本上达成了驱逐清军、占领越南的战略目标。

本来，法军虽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它所发动的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政治上不得人心，加之远隔重洋，补给困难，而且与英德等国矛盾重重，时有掣肘，因而并不具备必胜的条件。它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建立在清王朝不敢打、清军不能打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军事冒险配合政治讹诈的强盗政策。《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刺激了茹费理政府的侵华胃口。它见公开以武力占领越南红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后，清政府非但不图恢复，反而屈辱求和，便肆意制造事端，扩大侵略，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明显的军事赌注是将大量舰只驶入闽江口，长期与中国福建海军舰只同泊一处。倘清政府稍有胆识，敢于关门打狗，选择有利时机先发制敌，则全军覆灭的很可能是孤拔舰队而不是福建海军。正因为马江偷袭得逞，因而当战争转入第二阶段以后，法军在战略上仍然采取进攻态势，并实行东攻台北，踞地为质，西取谅山，占领北圻的战略方针。法军由于在越北和中国沿海地区两个战场上同时发起进攻，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兵力不足与野心过大的矛盾，并在作战指导上出现逐次增兵和分散兵力的错误。法军占领基隆后在台北与清军长期对峙，也反映出战略指导上的失策。由于力不从心，始终未能达成踞地为质、索取赔款之目的。至于第二阶段中法军在北圻战场上的一时得势，主要是利用了清军前

① 《内阁学士周德润奏越南边患愈滋请妥速密议以定大计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 8，第 11 页。

敌将领的无能，一旦清军加强了前敌指挥，法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致命弱点便无从克服，难免连战皆败，狼狈溃逃。

清政府在对法正式宣战后采取的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与第一阶段实行全面消极防守的单纯防御方针相比，在战略指导上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总体上讲，这一方针是比较地符合当时主客观情况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积极防御的意义。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沿海防务尚虚，虽早在光绪初年即有加强海防之议，“然购船购炮所费不下数千万，而临事仍无甚把握”①。“沿海各口，绵亘万余里，在在有瑕隙可乘”②。特别是福建海军覆灭之后，闽台海防尤为吃紧。海军既居劣势，自难与法舰争夺制海权，只能加强沿海防御，力保海疆安全。陆路情况则有所不同。其时，北圻法军近2万人分驻于数十个据点，兵力相当分散。中国军队不但数量居于优势，而且比较适应越北恶劣的自然条件；同时，背靠滇粤，人力物力易于补充，无后顾之忧。加之北圻系法国觊觎的主要目标和进攻中国本土的战略基地，反攻北圻，正是指向敌人的要害，亦即批亢捣虚，攻其所必救，不仅可以牵制进攻中国本土的法军兵力，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而且易于使战争全局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转化，较快地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战争实践表明，清军实行东南沿海防御、北圻陆路反攻方针的结果，虽然迭经挫折，但最终效果还是相当可观的。东南沿海方面，尽管法军第二次进攻基隆得逞，但随即受挫于淡水。清军不仅粉碎了敌人以钳形攻势一举夺占台北的企图，而且击退了进犯镇海之敌，使孤拔舰队计穷力竭，无所作为。北圻战场方面，东线桂军反攻开始进展顺利，只因潘鼎新调度乖方，以致郎甲、船头等地得而复失，并于1885年2月丢失了战略要地谅山，法军一度闯入

---

①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海防紧要宜毖近患而豫远谋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8，第28页。

② 《江西巡抚潘霨奏海疆事亟宜设立屯堡团练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8，第37页。

镇南关内。其后，在冯子材的正确指挥下，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不仅使东线反攻转败为胜，而且扭转了整个战局，大有指日可下北宁、河内之势。由此不难看出，战略方针的正确与否，固然是胜败攸关的重大问题，而方针一经确定，前敌将领是否得力，能否正确贯彻既定方针，便成为影响战争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了。西线滇军反攻的情况也不例外。滇军再度入越后，由于岑毓英强调“图越牵敌，必须先取宣光，使粤滇各军联为一气，并力扫荡，方易得手”①，以致滇军、黑旗军及唐景崧所部粤军长期顿兵坚城，徒伤精锐。直到滇军和黑旗军于临洮等处大败法军，与东线镇南关大捷相辉映，西线局势才出现转机。当然，围攻宣光毕竟沉重打击了法军的嚣张气焰，“法人守城与援宣之兵受创过甚，力敝气沮，故仅解宣光之围，不能上犯馆司”②；同时，围宣之举还迫使北圻东线法军于攻占谅山之后，立即大队西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东线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条件。然而，这一切均不足以补偿北圻东西两线清军未能及时联络一气，达成直捣北宁、河内的战略目的所造成的损失。如果西线滇军和黑旗军避坚攻瑕，避实击虚，不专注宣光，而以主力直趋太原，及时与东线桂军联络，则北圻陆路反攻很可能出现另一种更为有利的局面，即取得的战果更大，而付出的代价更小。

二、战术方面

中法战争时期，西方军队由于武器从前膛枪炮完全过渡到后装线膛枪炮，战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纵队战术已被屏弃，而广泛采用散兵战术。中国军队也由于经过了20余年的洋务运动而改善了军事技术，基本上不再使用弓箭、刀矛、鸟枪、抬炮之类武器，

① 《云贵总督岑毓英奏折》，《中法战争》（六），第129页。

② 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203页。

装备了相当数量购自外洋或自行仿制的洋枪洋炮，并学习德国的战斗经验，开始打破陈规陋矩，注意改进战术。因此，交战过程中，清军和法军在战术运用上各有短长，瑕瑜互见。

集中自己力量，利用和打击敌人的弱点，这是适应于一切战争的普通原则，战略上如此，战术上亦然。中法战争中，法军注意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战争初期先攻山西，再取北宁，后期在北圻战场上东攻西守，集中力量夺取谅山后，再抽兵西解宣光之围，均系力避分散兵力。相形之下，清军对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则比较地注意不够。以北圻反攻为例，1884 年 9 月中旬东线桂军进抵船头、郎甲一线后，仍然“互相犄角，自为战守”，未能形成拳头，集中对敌，加之株守谅山的潘鼎新又未及时向前线增调兵力，以致旋即为敌所败，退入越北山区。之后，桂军实力有所加强，但没有改变分兵把口、被动挨打的态势，以致当法军集中兵力指向谷松，专攻中路时，又节节败退。

除注意集中兵力外，法军还很重视战术机动。北宁之战，是法军避开坚固防御正面而从防守薄弱的翼侧发起进攻的典型战例。由于具有船坚炮利的优势，法军更重视海上机动作战。他们对基隆、马江、淡水、镇海等地的袭击和长期封锁台湾海峡，都体现了这种战术运用的优长。清军则多习惯于机械呆板的防堵战术，不善于通过战术机动来调整自己的战役战斗部署，以改变主要防御方向的兵力对比，使战场态势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潘鼎新指挥的北圻东线作战的失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当然，不是所有的清军将领都不懂得战术机动。镇南关—谅山大捷过程中，清军截敌扣波，夜袭文渊，关前隘大战时除正面顽强抗击外，还成功地运用了侧击、夹击、打敌预备队、断敌供应等战术手段，就体现了冯子材等活用战术，机动灵活地实施作战指挥的卓越才能。

“野战工事能对战局的结果起重大影响。”① 19 世纪中叶以后，线膛炮和爆破弹的大量使用，不仅促使炮台式要塞筑城体系

---

① 恩格斯：《筑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352 页。

进一步演变，而且使由散兵壕发展起来的野战筑城工事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中法战争时，清军武器虽有较大发展，但仍远不如敌。如北宁之战中，法军“枪炮总远及数十步于我，两军相望既可见，我施枪炮犹未及彼，而彼之枪炮弹已先及我，军心遂惊”①。战争实践迫使清军将领进一步重视野战筑城的作用。镇南关大捷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冯子材能够正确选择关前隘有利地形，构筑较为完善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减煞法军赖以制胜的大炮的威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针对法军枪炮火力较强而构筑的地营，在左育阻援、临洮败敌等战斗中，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实践证明，滇军的地营战术较之东线桂军广筑垛墙的办法要好得多。正因为这样，唐景崧才敢于直率地向徐延旭指出：“粤军垛墙虽厚，巨炮一轰，实不足恃，亟应仿滇军地营。”②“地营一夕可成，胜于垛墙，军心较固。”③法军对修筑野战工事亦颇为重视，如困守宣光过程中，为防止清军冲入城内，“于缺口立木栅、土垒，排列开花炮，伏地窖以守”④。除野战筑城外，清军还加强了永备筑城。不少人认识到，法国“枪炮之精，迥非中国所能及，无论为战为守，总以开挖地沟先行避其枪炮为要”，并明确提出“万不可狃于从前击‘粤匪’、击捻、击回之成法”。⑤镇海修筑的包括暗炮台、长堤、战壕、隧道等在内的海岸防御永备工事，对于成功地粉碎孤拔舰队的连续进攻，起了不少作用。可惜的是，当时中国并未从整体上改变沿海地区炮台式要塞筑城体系的落后状态，多数沿海炮台工事暴露，抗力不强，守军活动范围太小，易为敌军迂回包抄，特别是沿江炮台口门朝向单一，“敌由旁击，炮

① 无名氏：《关外随营笔述》，见《中法战争》（三），第66页。

② 《徐延旭来往函稿》，《中法战争》（二），第319页。

③ 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111页。

④ 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202页。

⑤ 《陈士杰复陈沿海要隘妥筹备御情形片》，《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5，第32页。

即不能旁攻”①，以致法舰于马江偷袭成功驶向下游时，得以从侧背逐个击毁闽江两岸清军炮台，扬长而去。

实行机动灵活的作战指挥，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歼灭敌之有生力量，是作战原则的核心。中法战争中，部分清军将领表现出较好的指挥才能，除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谅山大捷外，台湾保卫战也是“在刘铭传能干的指挥下进行的”②。刘铭传抵达基隆后，“以台湾无兵舰，不可与海战，乃移军基隆山后以诱之”③，待敌登陆并脱离舰炮强大火力支援后，再行反击，从而首战告捷。法军第二次犯台时，刘铭传仍采取诱敌登陆的战法，并向淡水守军提出了“待敌薄我而后战”④的战术原则，结果又取得了淡水歼敌的巨大胜利。在北圻陆路反攻作战时，西线滇军还注意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手段。在围攻宣光的同时，以战斗力较强的黑旗军于左育一带专司阻援。清廷也注意到了围城打援的重要性，曾电令岑毓英“力扼援寇”，“使彼族不能联为一气，攻剿自易得手”。⑤然而，清廷和岑毓英等均未将通过打援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视为主要目的，没有处理好围城与打援的关系，始终把重点放在围攻宣光坚城，而不是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特别是当东线法军大队西援时，岑毓英不能作出灵活反应，及时增加打援兵力，而法军却非常重视先破阻援，后解宣围，致使左育黑旗军“弹尽援无”，“力竭败退”。左育既破，围宣清军“腹背受敌，不能当新寇”，“实有不得不退之势矣”。⑥

纵观中法战争全局，清军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是战略指导还是战役战斗指挥方面，虽然有得有失，但和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后来

---

① 《刘壮肃公奏议》，《中法战争》（三），第144页。

②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98页。

③ 《刘壮肃公奏议》，《中法战争》（三），第151页。

④ 《刘壮肃公奏议》，《中法战争》（三），第152页。

⑤ 《军机处寄云贵总督岑毓英电旨》，《中法战争》（三），第330页。

⑥ 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179页。

的中日甲午战争相比，却是得大于失。与法军相较，亦不逊色，甚至略胜一筹。对此，法国军方也时有流露。特别是对于清军围攻宣光之战，法国人在惊恐之余，于河内法文报纸上公开登载："以今日之华军较二十五年前大相悬绝。……围宣光城之法，甚合欧洲军政书院所教习者。""观华军围攻形势，布置极善，想华人必有曾往欧洲军政书院练习战法者。"①正是由于清军在主观指导上得分较多，加上由于20多年来的洋务运动使中国国防实力有所加强等等客观原因，保证了中国军民最终在中法战争中军事上取得了胜利。

---

① 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二），第206页。

第十八章　中日甲午战争

19世纪末，随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大部分土地都被分割完毕。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一面要求重新分割殖民地；一面与老牌殖民强国一起，争先恐后地向不发达国家扩张。

在这种形势下，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的中国，自然更加成了列强激烈争夺的主要对象。

当时，在所有企图瓜分或鲸吞中国的国家中，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其统治阶级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非常狂妄，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发生于1894～1895年（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中日战争，就是后起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在完成其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中图谋瓜分中国的前奏。因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这次战争叫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史学界则称“日清战争”。这次战争影响十分深远，在中日两国近代军事史上，以及远东国际关系史上，都具有划时期的转折意义。

第一节　日本蓄谋发动侵华战争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日本原是一个如同中国一样的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自1854

年美国用武力强迫它打开门户之后，德川幕府①相继同美、英、俄、荷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促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连绵不断。据统计，仅1866年一年之内，日本全国各地共发生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等185起②。与此同时，日本各藩先是“尊王攘夷”、后是“尊王倒幕”的武士阶层，在全国各地积极开展讨幕运动。1868年1月，日本倒幕派发动政变，迫使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还给睦仁天皇（1852～1912年）。10月，睦仁改元“明治”，称明治天皇。接着，明治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近代史上发生的这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和中国截然不同的自强道路，不仅较快地摆脱了半殖民地化的危机，而且由封建社会迅速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明治维新毕竟是一次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以致在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仍然保留大量封建因素。明治政权实际上是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从而具有特殊的反动性和侵略性。它对内残酷压迫劳动人民，对外疯狂扩张掠夺，使日本很快走上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道路。

早在开港初年，当西方殖民者大举向日本侵略的时候，一些武士阶层如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极力鼓吹军国主义。他说：“现在要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即北海道），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一如古时强盛之时。北则割据中国东

---

① 德川幕府（1603～1867年），也叫江户幕府，系日本德川家康打败丰臣秀赖一派后在江户（今东京）建立的政权。它对内抑制藩侯，集大权于幕府。

② 参见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以及菲律宾群岛”。还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① 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集团继承了吉田松阴等人的军国主义政策，并以之为最高国策。明治天皇即位当年，在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就声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炮制了一个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即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乃至全世界。尽管这时日本与西方殖民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没有废除，欧美各国还享有治外法权，并在横滨驻有军队，但明治政府认为只有向外侵略扩张，才是“兴国之远略”。

日本政府为实践其“大陆政策”，首先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

明治初年，日本统治集团中就有人借所谓朝鲜拒绝国书事件②，掀起了“征韩论”。日本外务省随后拟定了对朝问题三方案：一是断绝交往；二是派使节乘舰赴朝“问罪”，要求开港通商；三是先派使节与清政府订立条约，以取得同中国一样的“上国”地位（长期以来，朝鲜和越南一样，与清朝保持着封建的藩属关系），然后借中国之力迫使朝鲜与日订约。明治政府采纳了最后一条“远交近攻”的迂回政策。此后，日本政府便先后派遣使臣同清政府进行谈判，并于 1871 年 9 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个条约基本上是按对等原则签订的，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可是，日本政府签约的意图不是建立两国友好邦交，而是“为了达到日本

---

① 转引自〔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中译本（下同），第二册，第 7 页。

② 明治元年 12 月（1869 年 1 月），明治政府令对马藩主派人携带“王政复古”通知书前往朝鲜，由于通知书中出现“皇”、“敕”等字样，朝鲜政府拒绝接收，日本统治集团便借机鼓吹“征韩”。

也成为朝鲜的上国”①，以便吞噬朝鲜。恰在这时，日本士族由于明治政府实行废藩置县、征兵、整顿身份制等改革，不满情绪加剧，广大人民则由于遭受压迫和剥削更加严重而不断举行起义，“达到日本历史上采取起义方式的人民斗争的最高峰”②。以陆军大将、近卫都督西乡隆盛为首的内阁，为转移人民的视线和士族的不满情绪，“征韩论”又甚嚣尘上。1873 年 9 月，正当西乡隆盛内阁寻找侵朝借口，准备行动的时候，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为首的出国考察团先后返回日本。他们认为“征韩”时机尚未成熟，主张以内治为急务，于是，征韩派西乡隆盛退出政府。1874 年 1 月，岩仓具视遭征韩派击伤，之后，大久保利通转而主张立即“征韩”。1875 年 9 月，日舰闯入朝鲜江华湾，制造江华岛事件。日本政府以此为借口，于次年 2 月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大门。1882 年，汉城发生“壬午兵变”③，日本又乘机胁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取得了在汉城驻军的特权。1884 年 12 月，日本统治集团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机，在朝鲜制造“甲申政变”④，次年 1 月胁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4 月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这个条约肯定了日本有向朝鲜派兵的特权，为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出兵朝鲜提供了借口。

日本统治集团在侵略朝鲜的同时，积极筹划侵略中国。1872 年，日本政府无视琉球主权以及中国和琉球的历史关系，擅自宣布

---

①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下同），上册，第 95 页。

② 〔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第 99 页。

③ 1882 年 7 月 23 日，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大院君等利用人民反日情绪发动军事政变。政变中，朝鲜士兵和市民数千人袭击王宫，击杀亲日的闵妃集团大臣多人，并焚烧日本公使馆。因 1882 年系农历壬午年，故称“壬午兵变”。

④ 1884 年 12 月 4 日晚，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驻朝公使馆的策动下纵火起事，与日军一起占领王宫，劫持国王，并于次日宣布建立开化党政府。因 1884 年系农历甲申年，故称“甲申政变”。

琉球为其“内藩”。1874 年,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出兵侵袭中国领土台湾(参见第十四章第一节)。1885 年中法战争结束以后,日本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鉴于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怯懦表现,主张“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一部分人则认为日本实力尚弱,有待加强,同时,深恐战争一起,俄国趁机南进,夺占朝鲜,坐收渔利,因而主张继续积蓄力量,“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三五年后,“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① 明治天皇采纳了后一种意见。1887 年 2 月,日本参谋本部提出了《清国征讨策》,拟定了战略进攻重点和兵力部署,以及战后割裂中国、分而治之等具体方案,并强调要先于欧洲强国占领中国,声称“若彼(指中国)万一为他国所蚕食,本邦命运亦无可为计”②。1889 年,日本军事头目山县有朋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更是提出了一套侵略理论,说什么“方今介立于列国之间而维持一国之独立,不可仅以守御主权线为满足,必须同时致力于利益线之保护”③。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其吞并朝鲜和侵略中国的狂妄野心。

1890 年,日本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眼中,为了摆脱危机,除发动侵略战争外,似乎再没有其它可供选择的余地。于是,1892 年组阁的伊藤博文(1841～1909 年),便抓紧进行侵华战争的临战准备了。

二、日本侵华军事准备

为了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政府在军事上进行了长期的准备。

---

① 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 年铅印本,卷 10,第 2～3 页。

② 转引自梁嘉彬:《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下),《大陆杂志》1975 年第 51 卷,第 5 期,第 227 页。

③ 转引自梁嘉彬:《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下),《大陆杂志》1975 年第 51 卷,第 5 期,第 230 页。

（一）改革军制，扩充军备

日本明治政府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加紧进行军制改革，建立和扩充适应近代战争的军队。早在 1871 年，明治政府从原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部队中挑选精壮兵士 8000 人，编成天皇的“御亲兵”（后改称“近卫兵”），然后整顿和解散原属各藩的军队，并实行中央集权的“镇台”制①，在全国设立东京、东北（今仙台）、大阪、西海（今熊本）四个镇台（后因建军港，又增设名古屋、广岛两镇台）。1872 年，为适应武装力量的发展，撤销 1869 年设立的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 年初，颁布《征兵令》，用义务兵役制取代职业兵役制，正式着手建立拥有现役和预备役的近代常备军，分为炮兵、骑兵、步兵、工兵和辎重兵等兵种。1878 年，设立与内阁平行、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由它掌管用兵作战等军事大权，政府无权过问。不但这样，参谋本部决定的某些军令事项，可以下令陆军卿施行，于是政府机关之一的陆军省，也隶属于参谋本部了，从而为参谋本部通过陆军省干涉政治开辟了道路。② 这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强化。此外，日本还陆续创办各种军事学校，制定各种军事条例、章程、官制等，并多次修改陆军编制和《征兵令》。

为了适应对外战争需要，日本统治集团大力扩充军备。早在 1880 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就以其详细论述中国军备情况的《邻邦兵备略》呈于天皇，力言为了准备日中战争，扩大军备是当务之急。并说：“财政困难不能成为反对扩充军备的理由，因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③1882 年朝鲜“壬午兵变”之后，日本参谋本部便着手制订具体的对华作战方案，变本加厉地进行扩军备战活动。至 1890 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 30%，1892 年高达 41%强。自 1883 年至 1895 年，共开支陆

① 镇台系日本师团的旧称，1889 年废止，陆军改为师团编制。

②③ 参见〔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第 100 页。

海军费近 2.7 亿日元。①

19 世纪 70 年代前期，日本陆军兵力按平时编制为 3.1 万余人，战时编制为 4.6 万余人；海军只有 17 艘军舰（大部为木制舰），总排水量为 1.38 万吨。经过大力扩充，至甲午战争时，按新的战时编制进行动员，陆军 7 个师团（含近卫师团），加上屯田兵团和对马警备队等，总兵力可达 22 万余人。② 海军则拥有军舰 31 艘，鱼雷艇 24 只，加上 4 艘代用军舰（武装商船），总吨位达 7.26 万余吨。③ 其中一部分舰只编成常备舰队，其余分属于横须贺、吴、佐世保三个镇守府。

按照新的战时编制，日本陆军每个野战师团的兵力编成为：2 个步兵旅团（每旅团辖 2 个联队，每联队辖 3 个大队，每大队辖 4 个中队）、1 个骑兵大队（辖 3 个中队）、1 个炮兵联队（辖 2 个野炮大队、1 个山炮大队，每大队辖 2 个中队）、1 个工兵大队（辖 2 个中队）、1 个辎重兵大队（辖 2 个中队）。7 个师团总计将佐以下 12.3 万余人、马 3.8 万余匹、野炮 168 门、山炮 72 门。根据战时需要，可将若干师团合编为一个军，军配有野战电信队和军兵站部等。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到 24.0616 万人，其中 17.4017 万人在国外参战，6.6599 万人留守本土。

在扩军备战过程中，日本当局还抓紧军国主义教育，对士兵灌输绝对尊崇和效忠天皇的思想，培养封建的“武士道”精神。1878 年以陆军卿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和 1882 年以天皇名义发布的《军人敕谕》，都是强调军人应该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等，使之成为穿军装的奴隶，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盲目地为统治集团卖命。

（二）发展军工，改善武器

---

① 参见〔日〕松下芳男：《近代日本军事史》，日文版第 154～155 页。

② 参见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日文版第 1 卷，第 63 页。

③ 参见〔日〕松下芳男：《近代日本军事史》，日文版第 140 页。

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集团为实现其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在接收幕府和各藩的军事工厂后，随即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大力发展军事工业。至19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军工生产已具有相当规模，生产了一定数量的枪炮弹药和舰船，为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初步的物质保证。同时，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为军事服务的铁路、电信以及航运等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明治初年，日本大多使用从英、法、荷等国购入的旧式枪炮。1880年（明治十三年），日本陆军中佐村田经芳对“施涅德”、“李·恩飞”等后装线膛枪作了改进，制成“村田十三年式”单发步枪（口径11毫米、最大射程2400米）。随着无烟火药的使用，1885年又对村田十三年式步枪进行改进，加大初速，缩短枪身，定为“村田十八年式”。1889年，又制成口径为8毫米、最大射程达3100多米的“村田二十二年式”连发枪。

日军装备的火炮，最初主要由法国和德国进口。1881年派人赴意大利学习制造青铜炮的技术，后由大阪炮兵工厂仿造口径70毫米、最大射程为5000米的青铜野炮，和最大射程为3000米的青铜山炮。野炮以6匹马拖行；山炮炮身和炮架可以分解，用3匹马驮载。1885年，上述火炮定型大批生产，1894年装备全国炮兵。中日甲午战争时，日军即使用此种火炮。

日本着手自造军舰，虽开始于德川幕府末年，但那时只能制造小型舰只。明治政府成立后，为改变日本海军落后的局面，便大力发展造船工业。1873年开始建造896吨的“清辉”和1450吨的“近鲸”两舰，分别于1875、1876年竣工下水。1877～1884年，共自造600～1500吨的军舰6艘，并基本掌握了英法造船技术。以后执行新的造舰计划，在1887～1893年间，造成钢骨铁皮舰和钢质舰共8艘，总排水量为1.325万吨。与此同时，又从英法等国购入军舰8艘，总计2.7万余吨。① 它们编入舰队以后，使日本海军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

---

① 参见〔日〕林克也：《日本军事技术史》，日文版第103页。

（三）实地侦察，战备演习

在扩充军备的同时，日本当局还不断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和朝鲜进行实地侦察，搜集有关情报。早在参谋本部成立的第二年，就以“武官”、“留学生”等名义派遣官员来华，刺探清朝政府各方面的情况。1880 年山县有朋上呈天皇的《邻邦兵备略》，就是根据派遣人员的见闻与调查编撰而成的。1893 年 4～7 月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又亲自溜到朝鲜釜山、仁川、汉城和中国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重点窥探中国的军备、士兵训练、军队装备、地形等等。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早就绘好了包括朝鲜和中国东三省、渤海湾在内的详细军用地图，上面标明了这些地区的地形和道路。

为做好实战准备，日本还多次进行各种军事演习。1889 年 2 月，专门制定了《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条例》。在次年 3 月举行的陆海军联合大演习（“尾参大演习”）中，共动员官兵 3 万余人、军舰 20 艘、运输船 3 艘。1892 年 10 月，又举行有 2.7 万余人参加的陆军特别大演习，除检验一般内容外，还特地演习了预备役的动员、军队的铁路输送等项目。

1893 年 5 月，日本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至此，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第二节　战争爆发和双方战略方针

一、战争的导火线

1894 年春，朝鲜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东学党即东学道，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秘密反抗组织，信奉儒、佛、道的教义，因为“指外教为西学，因此命名东学”①。起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 218 页。

义军以“尽灭权贵”、“逐灭洋倭”为号召，反对国内封建压迫，反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起义势力很快遍及朝鲜南部的全罗、忠清、庆尚等道地区。6月初，起义军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封建统治者惊恐万状，束手无策，便通过清政府委派的办理朝鲜通商事务全权代表袁世凯向清政府乞援。6月4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酌遣数队，速来代剿”的正式请求，一面报告清政府，一面命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两舰赴仁川、汉城护商。随后，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2000余人，由海道赴朝，驻汉城以南的牙山。与此同时，按照《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①，由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外务省，声明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赴朝，待镇压东学党起义后，随即班师回国。

其实，日本政府已先于清政府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东学党起义后，日本政府就非常注意朝鲜事态的发展，并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如指使其驻朝官员对袁世凯说：“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② 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清政府拖入预设的战争陷阱中去。6月2日，日本政府接到其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关于朝鲜政府正式请求清政府出兵的电文，首相伊藤博文立即召开内阁会议，断然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并立即下达秘密动员令。6月5日，日本政府成立战时大本营。为了先发制人，日本命正在休假的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立即返回朝鲜，并带领海军陆战队400余人，由横须贺乘坐“八重山”号军舰，直入汉城。接着，又派出一混成旅团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赴朝，占据汉城至仁川一带战略要地。海军则派出“松岛”、“筑紫”、“千代田”、“大和”、“赤城”、“高雄”等军舰，控制海港釜山和仁川，监视海面。

6月7日，日本政府接到中国的出兵照会后，亦于当天向清政

① 1885年4月订立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规定：朝鲜今后若发生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时，必须事先相互通知。

② 《北洋大臣来电》，《中日战争》(二)，第546页。

府发出日本派兵前往朝鲜的照会。李鸿章得知日本出兵的消息，虽然据理驳斥，但只是请求日本政府不要出兵过多，不要进入朝鲜内地。日本既决心与中国一战，自然无视李鸿章的请求。它在复照中声称：此次派兵去朝鲜，"系根据天津条约，帝国派遣军队多寡，由帝国政府自行裁决，其进退行止，毫无受他人掣肘之理"①。

6月12日，朝鲜农民起义军因与政府达成协议，主动退出全州，停止军事行动。朝鲜政府随后分别向中日两国提出撤兵要求。李鸿章准备撤兵回国，并要求日本政府同时撤兵。日本不仅不撤，反而继续增兵入朝，同时玩弄新诡计，无理提出干涉朝鲜内政的所谓"改革方案"，蓄意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在日军剑拔弩张、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向李鸿章提出："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②。清政府也提醒李鸿章：如果日本添兵不已，我是否亦应多拨以助声势。李鸿章明知"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却又强调"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③ 他一方面命令驻朝清军静守牙山，另方面徒劳地奔波于俄英等国驻华公使之间，乞求西方列强出面"调停"，结果四处碰壁。而日本政府却以默许英俄等国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列强在中日两国冲突中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场。

日本统治集团见其阴谋外交得逞，而且军事上已占先著，便决计挑起战争。7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电告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④ 14日，日本政府反诬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声言"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⑤，企图

---

① 〔日〕伊藤博文：《机密日清战争》，东京原书房1967年版，第15页。

② 《中日战争》（二），第558页。

③ 《北洋大臣来电》，《中日战争》（二），第563页。

④ 〔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34页。

⑤ 《日本使臣小村照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32页。小村，即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

把中日开战的责任归咎于清政府。15日，日本海军主力舰艇于佐世保军港集结，成立联合舰队（由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编而成），伊东祐亨任司令长官，下分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20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走中国驻朝军队，废除中朝间一切条约。23日，日军闯入朝鲜王宫，发动政变，非法囚禁国王李熙及闵妃，诱胁大院君李昰应主持国事。与此同时，日本大本营下达出动海陆军的作战命令，准备正式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二、战争序幕

（一）丰岛海战

由于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衅，清廷不得不责成李鸿章速筹战备。一意避战求和的李鸿章，见乞求列强调停无望，加之“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①，才不得不派出四支援军。这四支援军是：从天津出发的盛军统领总兵卫汝贵率领的盛军6000余人；从旅顺出发的宋庆所部总兵马玉昆率领的毅军2000人；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练军统领总兵左宝贵率领的奉军3500人；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盛军统领丰升阿率领的吉军、盛军1500人。上述各军共约1.3万人，均取道辽东过鸭绿江进军平壤。对于牙山清军，李鸿章本打算用轮船送至平壤，与各军会合，后认为“运兵回与运兵去同一担险”②，遂决定以驻防天津一带的总兵江自康等部2000余人由海道增援牙山，“合叶原队共五千人，可当一面”③。因轮船招商局船只正在运载盛、毅两军赴大东沟（今东沟），只得雇英商船“爱仁”、“高升”、“飞鲸”3轮应急。为保证登陆安全，李鸿章令

---

① 《翁文恭公日记》，《中日战争》（四），第480页。

② 陈旭麓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以下简称《盛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③ 《北洋大臣来电》，《中日战争》（二），第631页。

丁汝昌派副将方伯谦率军舰“济远”、“广乙”、“威远”自威海卫开赴牙山。24日，“济远”等3舰及“爱仁”、“飞鲸”两轮先后抵牙山内岛，部队登陆。

当时，在天津、烟台等地的日本情报人员活动相当猖獗，当获得中国派兵援牙的情报后，立即密告日本大本营。日军决定采取偷袭手段，不宣而战。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启航，次日到达牙山以南的群山浦。由于情况不明，伊东祐亨命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率军舰“吉野”、“浪速”、“秋津洲”向牙山湾搜索前进，伺机攻击。24日这天，停泊在仁川的英舰透露，日舰将要截击中国舰只。这时，北洋舰队主力远在威海卫，“高升”号和运送饷械的“操江”号已离开大沽，正在赴牙途中。当日20时和21时15分，“爱仁”、“威远”先后离牙返航，“济远”、“广乙”两舰继续帮助“飞鲸”赶卸兵马。25日晨4时，“飞鲸”驳卸将毕，“济远”、“广乙”两舰离牙，拟于途中告知“高升”、“操江”两舰掉头西归。上午8时许，行抵丰岛西南时，突遭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的袭击，“济远”、“广乙”被迫还击。两舰爱国官兵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视死如归，沉着应战。“广乙”号是福州船政局自造的排水量仅有1030吨的炮舰，火力不强，交战不久即受重伤，退出战斗，后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焚。“济远”号是一艘2300吨的德制钢甲巡洋舰，配备有舰炮18门，并有鱼雷发射管4个，但由于受敌围攻，伤亡甚众，且船舵被毁，不得已全速向西退走。日舰“吉野”尾追不舍。

9时许，正当“济远”向西退走时，“高升”号向东驶来，日舰“浪速”号鸣炮令其停航。在后面不远的“操江”号见状即调头西返。坪井航三命“浪速”号俘虏“高升”，令“秋津洲”号追赶“操江”，以自己乘坐的“吉野”号继续追击“济远”。“济远”管带方伯谦下令悬白旗示降（一说诈降），并继续疾驶。约12时38分，“吉野”追至距“济远”2000米时，复发炮轰击。“济远”号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毅然发尾炮击中“吉野”，使其不敢再追。

“济远”向西退却途中，曾赶上调头西返的“操江”号（因

"操江"时速只有8海里)，但未予以救援，以致"操江"号被日舰"秋津洲"号掳去。

"高升"号上清军面对日舰"浪速"号的威逼，宁死不降。下午1时许，日舰"浪速"号鱼雷、舰炮齐放，清军以步枪还击。不久，"高升"号沉没，船上清军950人除250余人后来得救外，其余全部死难。

丰岛海战，日军首战获胜，掌握了朝鲜南部海域的制海权，不仅增兵朝鲜畅通无阻，而且海陆两军得以相互策应。清军则断绝了增援牙山的海道，使驻牙清军处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不利境地。

（二）成欢之战

在日舰进行丰岛偷袭的同时，日大岛旅团长率主力约4000人，携山炮8门以及辎重、电信、野战医院等，自汉城向南开进，企图消灭牙山一带清军，以解除尔后北进时的后顾之忧。

驻守牙山一带的清军（加上新到的江自康等部援军，共4000余人），势孤力单。鉴于牙山滨海地形开阔，不利防守，由总兵聂士成率军3营，于7月26日移驻牙山东北50里的成欢驿。聂士成得知日军已进至距成欢仅40里的振威，立即请援于叶志超。27日，叶志超派江自康率部前往增援。次日晨，叶志超也赶到成欢。聂士成鉴于海道已阻，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再守，而公州背山面江，形势险要，建议叶志超马上前去占据。并且说："幸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出。"① 这时，日军已进抵素沙场，离成欢仅10里。于是，叶志超率叶玉标营进据公州，由聂士成率6营扼守成欢，另留1营守牙山。

成欢驿东西皆山，北通汉城，南达公州。北面临河，南北两岸皆水网沼泽地，有桥一座名"安城渡"，为南北往来隘道。清军在成欢驿东面山顶筑垒自固，西面山顶则设有炮兵阵地，控制日军必经的驿道。

---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18页。

7 月 28 日夜，日军自素沙场分两路进犯：一从大道进攻，钳制清军主力；一从东面迂回，进攻清军右侧。当夜，武备学堂学生于光炘等冒雨侦察敌情，发现日军偷袭，立即报告聂士成，并率兵一部预伏安城渡桥侧，控制要点。半夜，日军右路前锋进抵安城渡桥北，于光炘等奋力阻击，杀伤日军数十人，使其前锋败退。可是，聂士成未能及时增援，而日军后队又至，于光炘等力战牺牲。29 日黎明，日军攻占成欢西北面山坡，聂士成率主力抵抗。经过激战，清军不支，退往公州。这时，叶志超已放弃公州向北逃跑，于是两部合军北走。

日将大岛原来判断清军必退牙山，因而率队向牙山追击；及抵牙山，不见清军踪影，便留一小队驻防该处，自率大队返回汉城。

成欢之战后，清军绕道远离汉城的朝鲜东部山区，抵达平壤，途中历时近一个月。时值炎夏，“残军饥疫死者相属”，而叶志超竟无耻地向李鸿章谎报战功，诡称“沿途叠败倭兵”。① 于是清廷“论功行赏”，提升叶志超为驻平壤各军总指挥。

日军丰岛偷袭，并进犯驻朝清军，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但是，李鸿章不但不积极准备抗战，反而认为“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②，幻想英国出面干涉。可是，随着后来战事的发展，英国见日方处处居于优势，竟然不顾事实和国际公法，声称责任不在日方。清政府不敢抗争，最后竟由出面租船的轮船招商局赔偿英商损失。

三、中日宣战和双方战略方针

清政府见日本侵略者已公然揭开战幕，被迫于 8 月 1 日对日

---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 19 页。

② 李鸿章：《寄译署》，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 16，第 32 页。

宣战，日本也于同日宣战，于是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参见附图22）

早在宣战之前，日本即已成立战时大本营，统一筹划和指挥陆海军作战事宜。大本营首席长官由参谋本部总长陆军大将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1895年1月炽仁亲王死后，由陆军大将小松宫彰仁亲王代理），由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和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7月17日，中牟田仓之助免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接任）二人共同辅佐。在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等的亲自参与下，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战前已制订好侵略中国的"作战大方针"，即：以主力在山海关附近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第五师团进占朝鲜，钳制和击败在朝清军；海军则以联合舰队击破中国北洋舰队，迅速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下一步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第一，如海军主力决战获胜，则将陆军主力输送至渤海湾（以山海关为主）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第二，如果海上决战胜负不分，中日双方均未掌握制海权，就用陆军主力侵占整个朝鲜；第三，如果海上决战失败，清军控制了制海权，本国又受威胁，则尽力援助在朝陆军，而把陆军主力留守本土，以防清军反攻。① 日军这一作战计划的核心是，消灭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进而与清军进行直隶平原决战。

清军方面，事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为"后党"和"帝党"两派。一般说来，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由于政治腐败和内部纷争，清廷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全局，因而事先既未组织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又未能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开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所谓"调停"。当朝鲜形势极度紧张，全国舆论和清军某些爱国官兵强烈要求积极抗战时，主和派既不敢公开反对，又不愿认真备战。直至战争爆发之后，清王朝为形势所迫，才临渴掘井，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

---

① 参见〔日〕誉田甚八：《日清战史讲授录》，中译本第7～8页。

攻的战略方针："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①。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与驻牙山清军形成夹击之势（当时尚不知牙山清军已经败退），驱逐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内的海口，北洋舰队即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策应在朝清军，并确保京畿门户的安全。

第三节　平壤之战与黄海海战

一、平壤之战

（参见附图23）

（一）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中日宣战后，日本大本营立即命令联合舰队搜索并击破中国北洋舰队，以求年内实施其"作战大方针"的重点——直隶平原决战。伊东祐亨随即于8月7日率舰队从隔音岛出发，驶至黄海西部海域，甚至闯到威海卫和旅顺军港，进行搜索和挑战。8月14日，日本大本营根据其联合舰队未能与北洋舰队决战，并为检修舰只而移泊朝鲜半岛南端的长直路等情况，确认年内已无法实行直隶平原决战的原定计划，必须等到来年解冻之后再作考虑，于是重新制定冬季作战方针，即：命令第五师团的其余部分立即赴朝，并增派第三师团（先编成混成第五旅团）与第五师团合编为第一军，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官，执行北攻平壤，相机进攻奉天，吸引直隶清军主力出援的任务；同时，准备组建第二军，以待机攻占辽东半岛，为将来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建立进军基地。

---

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2～3页。

9月12日，山县有朋于朝鲜仁川登陆，14日到达汉城。在此之前，驻朝日军由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统率。他决定以第五师团及第三师团之一部，共约1.5万余人，分四路进攻平壤。其部署是：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混成第九旅团（步骑约5000人、炮20门）由汉城出发，沿大道指向平壤东南，从正面进攻，牵制清军。野津道贯自率步骑约5000人继后，渡大同江之下游，进攻平壤西南。第十旅团长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步骑约2000人，自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江东，渡大同江进攻平壤东北，称“朔宁支队”。陆军大佐佐藤正率步骑约3000人，自朝鲜东部的元山登陆（称“元山支队”），经文川、阳德、成川（今新成川南）、顺安，绕至平壤北部，以一部截断清军后路，一部与朔宁支队共同进攻平壤北部。

日军根据这一分进合击的作战计划，预定9月15日包围平壤，发起总攻。

早在8月上旬，清政府派出的四支援军先后抵达平壤。丰升阿、卫汝贵等以兵力不足、后路空虚为由，要求“先定守局，再图进取”①，李鸿章也认为“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难操胜券”，“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② 尽管清廷急于要按原定方针向南进军，多次电催李鸿章饬令各军“相机进取”，“直指汉城”，李鸿章总是借故延宕，以致前敌各军既不南下进攻汉城，又不于日军可能进犯的方向择险据守，互为策应，“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余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③，坐待日军来攻。8月下旬，叶志超抵达平壤。这个败军之将被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一军皆惊”，进一步破坏了士气。9月5日，叶志超与诸将议定，以一部兵力监视元山方向之敌，以主力南下迎击自黄州北进之日军。6、7两日，部队已按计划出发。

---

① 《北洋大臣来电》，《中日战争》（三），第29页。

② 李鸿章：《寄译署》，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第48页。

③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19～20页。

此时，叶志超得知日军一部已抵成川，因顾虑平壤后路发生危险，突然改变决心，忙将部队调回，仓卒作出防守平壤的部署。

平壤是朝鲜的旧都，北通义州，南达汉城，东至元山，西南通大同江口，为朝鲜北部水陆交通枢纽。平壤又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军事重镇，北枕崇山，东南临大同江，山环水抱，形势险要。其城墙高达10米，墙基厚7米，顶宽2米，南北绵亘10余里。大同江经城东向西南流过。城有6门：南为朱雀门，西南为静海门，西北为七星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长庆门，东南为大同门。长庆、大同两门紧靠大同江。玄武门跨牡丹台山修筑。由于牡丹台紧靠城墙，因而成了守卫平壤的命脉所在。

清军依城划分各军防区：城北方面，由左宝贵所部奉军、丰升阿所部盛军及江自康之仁字两营防守；城西方面，由牙山军（即叶志超原来所部）防守；城南方面，由卫汝贵所部盛军及马玉昆所部毅军之一部防守；城东南大同江东岸，由马玉昆所部毅军防守（有浮桥一座沟通两岸联系）。叶志超坐镇城内，居中调度。

（二）作战经过

9月12日，日军混成第九旅团的前锋部队首先到达平壤大同江东岸，开始与马玉昆部毅军“开枪遥击”。同日，日军朔宁支队也到达大同江岸，正准备由麦田店渡江时，与前往探敌的3营奉军相遇，彼此交火。正激战中，叶志超以东路日军进逼，将3营奉军调回，日军遂得以渡过大同江，从北面包围平壤。13日，日军元山支队进至顺安，切断了清军退往义州的后路。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也到达大同江下游。至此，日军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

14日清晨，担任主攻的日军元山、朔宁两支队一齐发起攻击，占领了城北山顶数垒。左宝贵亲自督队争夺，未能取胜，便率部入城，用大炮轰击敌人。日军坚伏不退。当晚，叶志超主张弃城撤退，遭到左宝贵的坚决反对。左宝贵派亲兵监视叶志超，防其逃跑。

15日拂晓前，日军发起总攻。大同江东岸的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分三路进攻平壤城东南。扼守大同江东岸的马玉昆所部毅军奋

力抵抗，与敌展开肉搏战，自清晨激战至午后，终于打退了东路日军的进攻。北路日军朔宁、元山两个支队也于当天拂晓向牡丹台发起进攻，左宝贵亲自登玄武门指挥，兵士拚死拒敌。战至上午，日军先后攻破玄武门外的5座堡垒，并向玄武门猛烈突击。11时，左宝贵中炮阵亡，守军士气大挫，玄武门遂被日军攻占。叶志超随即悬白旗乞降，并下令撤军。当时，马玉昆部正与东路日军相持于大同江东岸，偷袭平壤西南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也被卫汝贵所部击退，伤亡惨重。

正当东西两路清军准备乘胜出击的时候，忽闻北路失利，并接到叶志超的撤军命令，马玉昆、卫汝贵只得率部回城。日军准备宿营，未再前进。当晚，叶志超率守军乘夜暗仓皇逃出平壤。日军于城北山隘堵截，清军伤亡2000余人，被俘数百人。途经顺安时，又遭日军拦击，死伤枕藉。

9月16日，叶志超等逃至安州，始与吕本元、聂士成等部会合。安州距平壤90公里，北倚清川江，南有群山依托，城垣高大，是平壤以北的第一重镇。聂士成建议叶志超凭借安州有利地形，阻敌北犯。叶志超不同意，继续率军向义州狂逃。19日，李鸿章曾电告叶志超驻守义州，不准退往鸭绿江以西。3天以后，李鸿章又认为与其株守义州孤城，不如全线撤回，于是，清军万余人于22～24日放弃了义州等战略要地，退过鸭绿江。

平壤之败，主要是李鸿章消极避战方针造成的恶果。本来，清军云集平壤，意在南北对进，夹攻汉城一带日军，而李鸿章却一再抗拒光绪帝关于“迅速进兵”、“直抵汉城”的谕令，先则同意丰升阿等“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主张，继则称赞叶志超“拟俟兵齐秋收后合力前进，自系老成之见”①，致使平壤清军“束手以待敌人之攻”。当然，四路援军抵达平壤之际，牙山清军已战败北走，南北夹击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但当时日军除大岛混成旅团外，其余部队正在赴朝途中，清军在朝兵力数量超过日军，如能

① 《北洋大臣来电》，《中日战争》（三），第80页。

当机立断，一面继续增兵，一面长驱南下，在朝鲜人民的支援配合下，予日军以重大打击，不是不可能的。日军分路进犯平壤时，每路为数不多，清军如能集中兵力，主动出击，打敌一路，则减煞敌之进攻势头，甚至歼其一路，也是可能的。对于清军应主动出击问题，连日本军界人士也认为，当时日军包围攻击平壤，殊为危险，如果清军“拒止一方”，集中兵力向某路日军“转取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① 梁启超亦曾指出：“日兵之入韩也，正当溽暑铄金之时，道路险恶狭隘，行军非常艰险。又沿途村里贫瘠，无从因粮……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云。当此之时，我军若晓兵机，乘其劳惫，出奇兵以迎袭之，必可获胜。乃计不出此，惟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之策，恃平壤堡垒之坚，谓可捍敌，此失机之大者也。李鸿章于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② 上述评论都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其次，平壤之所以轻易陷落，在于前敌总指挥不得其人。叶志超于成欢之战打响时，立即弃军逃奔平壤；惊魂未定，又以慌报战功而被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由于不孚众望，“各将领均不受节制”③。他庸懦怯敌，既不敢驱军南下，也没有保卫平壤的决心，一经接战，再次率先逃跑，致使军心大乱，“凡有大小炮四十尊，快炮并毛瑟枪万数十杆……尽委之而去”④。此外，清军纪律甚差，非但不能与当地人民呼吸与共，而且扰害百姓，这也是平壤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

---

① 〔日〕誉田甚八：《日清战史讲授录·附录》，中译本第21～22页。

② 梁启超：《李文忠公事略》，见《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六辑，第48页。

③ 《军机处寄帮办北洋军务四川提督宋庆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1，第33页。

④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23页。

二、黄海海战

丰岛海战以后，日本海军增强了战胜中国海军的信心。8月5日，联合舰队接到大本营关于击破中国舰队的命令，便加紧海上搜索，随时准备与北洋舰队进行决战。7月27日至8月上旬，北洋舰队虽曾三次出海巡弋，但由于受李鸿章“保全坚船为要”指示的束缚，始终未敢远巡，更不敢寻敌决战。正当北洋舰队第三次出巡时，8月10日黎明，日舰20余艘突然出现于威海卫港外，当晚又窜至旅顺口外。清廷闻讯，急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速回北洋海面，跟踪击剿”①。8月23日，清廷进一步指示：“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②。此后，北洋舰队再未远巡，不出北洋一步。这样，日本海军便完全控制了朝鲜仁川、大同江口等重要港口，占领了从海路进攻中国的有利前进基地。由于丁汝昌多次率队出巡无功，受到朝野不少人的攻击。8月26日，光绪帝下令将丁汝昌革职，但仍“戴罪自效”。李鸿章不得不上奏为丁汝昌辩护，同时乘机正式提出“保船制敌”的方针，进一步强调“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建议清廷放弃争夺制海权。他认为，“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因而主张北洋舰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③ 从此，北洋舰队更加陷入了消极自保的被动局面。

9月上旬，清廷鉴于平壤将有大战，拟派兵增援。为了及时到达前方，决定将驻防大连一带的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8营4000人

①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中日战争》（三），第35页。

② 《军机处电寄丁汝昌谕旨》，《中日战争》（三），第51页。

③ 《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折》，《中日战争》（三），第72～73页。

由海道运至大东沟，然后转由陆路赴朝。这样，海军掩护，责无旁贷。李鸿章乃令丁汝昌率舰队护航。9月15日上午，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抵达大连湾，当时的实力如下表所示。

舰名	舰种	排水量（吨）	航速（节）	武器		管带
				炮	鱼雷管	
定远	铁甲舰	7335	14.5	22	3	右翼总兵　刘步蟾
镇远	铁甲舰	7335	14.5	22	3	左翼总兵　林泰曾
来远	巡洋舰	2900	15.5	17	4	副将　邱宝仁
经远	巡洋舰	2900	15.5	14	4	副将　林永升
致远	巡洋舰	2300	18	23	4	副将　邓世昌
靖远	巡洋舰	2300	18	23	4	副将　叶祖珪
济远	巡洋舰	2300	15	18	4	副将　方伯谦
广甲	巡洋舰	1296	15	10	0	都司　吴敬荣
超勇	巡洋舰	1350	15	12	0	参将　黄建勋
扬威	巡洋舰	1350	15	12	0	参将　林履中
平远	巡洋舰	2100	11	11	1	都司　李和
广丙	巡洋舰	1000	17	11	0	都司　程璧光
镇南	炮舰	440	8	5	0	游击　蓝建枢
镇中	炮舰	440	8	5	0	都司　林文彬
福龙	鱼雷艇	115	23	2	2	都司　蔡廷干
左队一号	鱼雷艇	108	24	6	3	守备　李仕元
右队二号	鱼雷艇	108	18	2	2	守备　刘芳圃
右队三号	鱼雷艇	108	18	2	2	守备　曹保赏

9月16日凌晨2时左右，铭军搭乘招商局“新裕”、“图南”等5艘轮船，在北洋舰队的护卫下，由大连湾出发，午后抵大东沟。“平远”、“广丙”泊于港口担任警戒，由“镇南”、“镇中”两炮舰和两艘鱼雷艇护送运兵船进港，“定远”、“镇远”等10舰则泊于港外12海里之大鹿岛东南，遥为掩护。铭军连夜上岸，安全到达目的地。不过，此时平壤已失，铭军无法起到应援的作用。

日本联合舰队得知中国北洋舰队将护送陆军赴朝，于9月14日从仁川驶向大同江口。15日到达后，因不见有中国舰船，伊东祐亨命部分舰只溯大同江支援第五师团进攻平壤，其余舰只暂泊于小乳纛角东北。伊东判断北洋舰队有可能护送陆军往鸭绿江口一带，便不待全舰队集中，立即率舰12艘，于16日下午5时出发，向黄海北部海洋岛方向航进，17日晨抵达该岛附近。其战斗序列如下表：

舰名	舰种	排水量（吨）	航速（节）	武器		舰长
				炮	鱼雷管	
松岛	海防舰	4278	16	29	4	海军大佐尾本知道
严岛	海防舰	4278	16	31	4	海军大佐横尾道昱
桥立	海防舰	4278	16	20	4	海军大佐日高壮之丞
扶桑	巡洋舰	3777	13	21	2	海军大佐新井有贯
千代田	巡洋舰	2439	19	27	3	海军大佐内田正敏
比睿	巡洋舰	2284	13.2	18	2	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
赤城	炮舰	622	10.25	10	0	海军少佐坂元八郎太
西京丸	代用巡洋舰	4100	15	4	0	海军少佐鹿野勇之进
吉野	巡洋舰	4216	22.5	34	5	海军大佐河原要一
高千穗	巡洋舰	3709	18	24	4	海军大佐野村贞
秋津洲	巡洋舰	3150	19	26	4	海军少佐上村彦之丞
浪速	巡洋舰	3709	18	24	4	海军少佐东乡平八郎
其中“松岛”（旗舰）、“严岛”、“桥立”、“扶桑”、“千代田”、“比睿”、“赤城”、“西京丸”为本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为第一游击队。						

9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北洋舰队正准备起锚回航旅顺时，发现日本舰队自西南驶来，丁汝昌随即命令舰队起锚迎战。战斗之前，丁汝昌曾规定三条训令：“1、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2、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

战术；3、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之。”①

北洋舰队开始成“并列纵阵”（“定远”、“镇远”两舰居前），以每小时5海里的速度向西南方向航进。日舰则以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艘速率最高的巡洋舰为先锋，伊东祐亨自乘旗舰“松岛”，率领本队“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等舰跟进。12时许，又将武装商船“西京丸”及小炮舰“赤城”移至本队的左侧（非战斗一面）。丁汝昌、刘步蟾及总查德国人汉纳根等在“定远”舰前方的飞桥上，见日舰成“单行鱼贯阵”（单纵阵）扑来，决定采取以主舰居中的“夹缝雁行阵”（交错配置的双横队）应战②，以便充分发挥后续各舰舰首重炮的威力。由于阵形尚未完全组成，旗舰即以每小时8海里的速度前进，“济远”、“广甲”、“超勇”、“扬威”等舰斜行追赶不及，以致形成半月形而类似“后翼梯阵”（又叫“燕剪阵”）。因此，日方认为，北洋舰队当时所列队形“似为不规则之单横阵，又似后翼梯阵，而‘定远’、‘镇远’居中……”③。

日舰第一游击队开始指向北洋舰队的中央，约距离1.2万米时，稍向左变换航向，然后又按原方向前进，准备首先进攻北洋舰队的右翼。本队也取大致相同的航向继进。

17日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约6000米，日舰继续北驶，“定远”首先发主炮攻击，其余各舰亦相继开炮。时值微弱东风，硝烟弥漫于北洋舰队之前，日舰趁机以每小时14海里的速度向前急驶。当前出到离北洋舰队右翼约3000米时，日第一游击队4舰陆续以其右弦速射炮猛轰“扬威”、“超勇”。13时5分，彼此仅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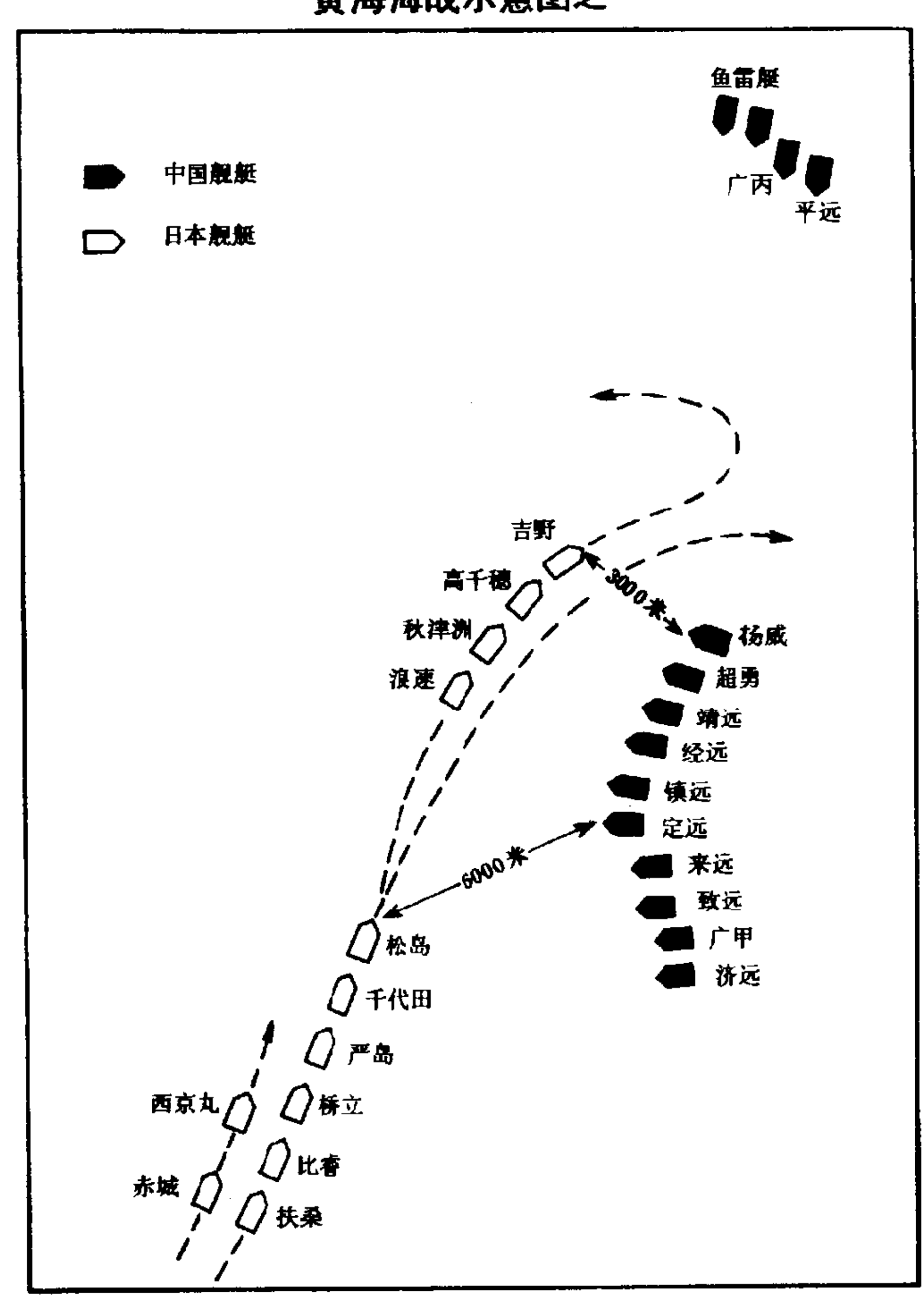
---

① 《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致北洋大臣报告》，转引自《海事》月刊第8卷，第5期，第63页。

② 关于北洋舰队应战队形问题，历来其说不一，诸如“夹缝雁行阵”、“犄角雁行阵”、“后翼梯阵”、“后翼单梯阵”、“相并横列”等等。此处采用丁汝昌致李鸿章报告的说法。

③ 《伊东祐亨致大本营报告》，转引自《海事》月刊第8卷，第5期，第60页。

黄海海战示意图之一



1600 米，日舰以低弹道向“超勇”、“扬威”实施抵近射击，两舰相继起火，退出战斗。约 13 时 30 分，“超勇”开始沉没。这时，“平远”、“广丙”和两艘鱼雷艇已赶到，但因火力均不强，未能改善右翼态势。

当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炮击。北洋舰队虽然阵形已被打乱，但各舰随时变换方向，力求使舰首对敌，以充分发挥主炮威力。“‘定远’猛发右炮攻倭大队各船，又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①。日舰“比睿”、“赤城”因速度迟缓掉队，正好被北洋舰队所截击。13 时 10 分，“比睿”突然改变航向，向右急转舵，冒死从“定远”、“来远”之间窜逃。“定远”、“来远”以及“经远”等舰乘机夹击，重创“比睿”，迫使其向左转舵，追赶本队。“赤城”企图营救“比睿”，受到“来远”等舰的猛烈炮击，其舰长坂元八郎太等多人毙命。“西京丸”也受重伤，“舵已轰断，舟中观战之大吏（按：即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几被华军连船擒去”，“后遁至济物浦（仁川），丸中人如已赴法场重邀恩赦者然”。②

日舰第一游击队掠过北洋舰队右翼以后，又向左作 180 度回航，企图利用其速度快、便于机动的特点，配合本队作战。但本队旗舰“松岛”发信号令其归队，便又向左作 180 度回航。于是，北洋舰队主力舰只对准第一游击队右侧后方，猛烈炮击。14 时 15 分，第一游击队刚刚追上本队的最后一舰“扶桑”，又见“西京丸”发出“‘比睿’、‘赤城’危险”的信号，只得再次向左作 180 度回航，继而驶向北洋舰队西侧。与此同时，本队已绕至北洋舰队的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这样，北洋舰队便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队形更加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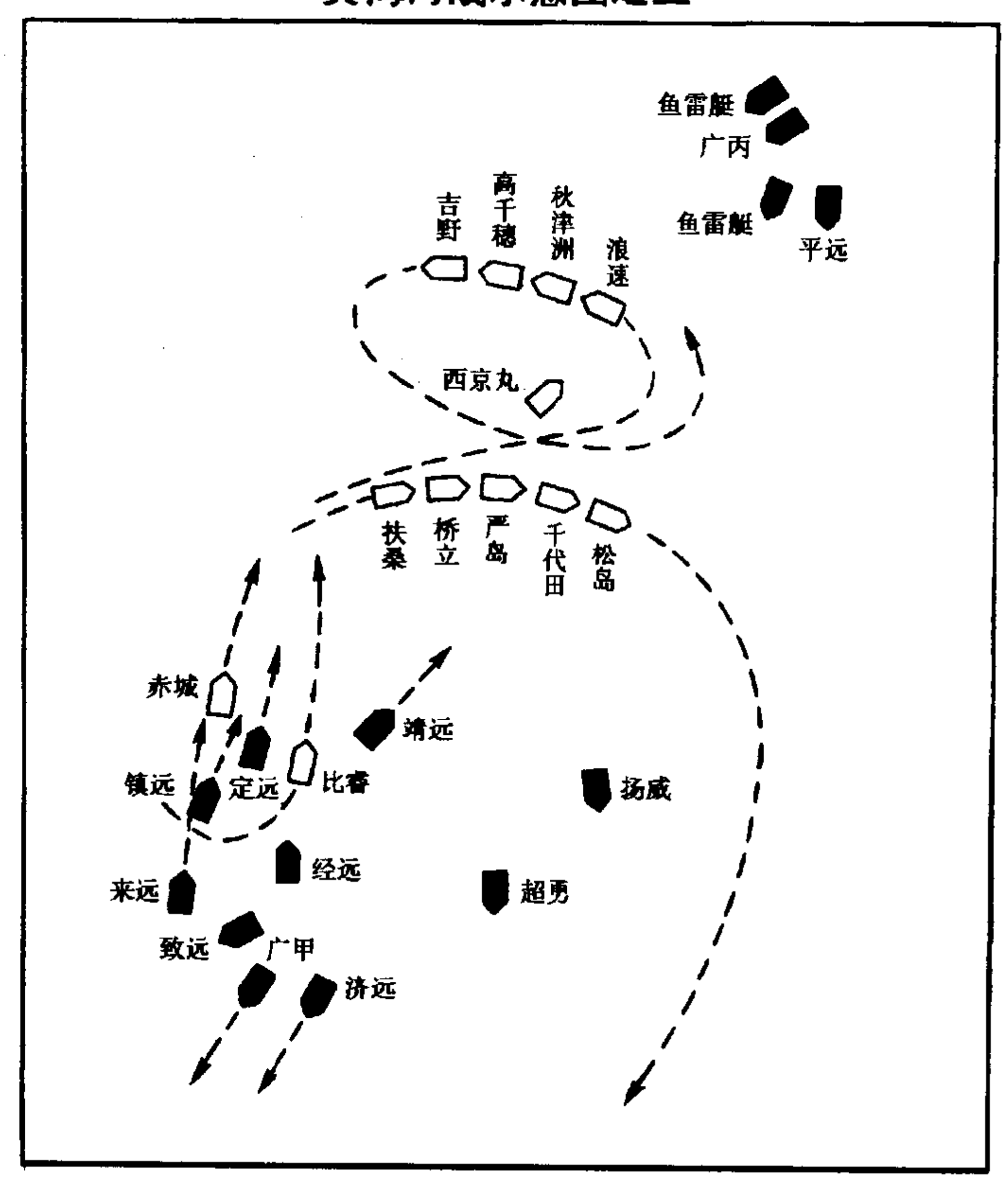
战斗过程中，丁汝昌身负重伤，由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替指挥。北洋舰队大部分官兵都能英勇战斗，奋不顾身。“致远”管带邓世昌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致远”舰多处受创，船身倾斜，弹药将尽。邓世昌见日舰“吉野”十分猖狂，毅然下令

---

① 李鸿章：《大东沟战状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79，第 7 页。

② 蔡尔康等编译：《中东战纪本末》，新春图书集成局 1897 年铅印本（下同），卷 4，第 13 页。

黄海海战示意图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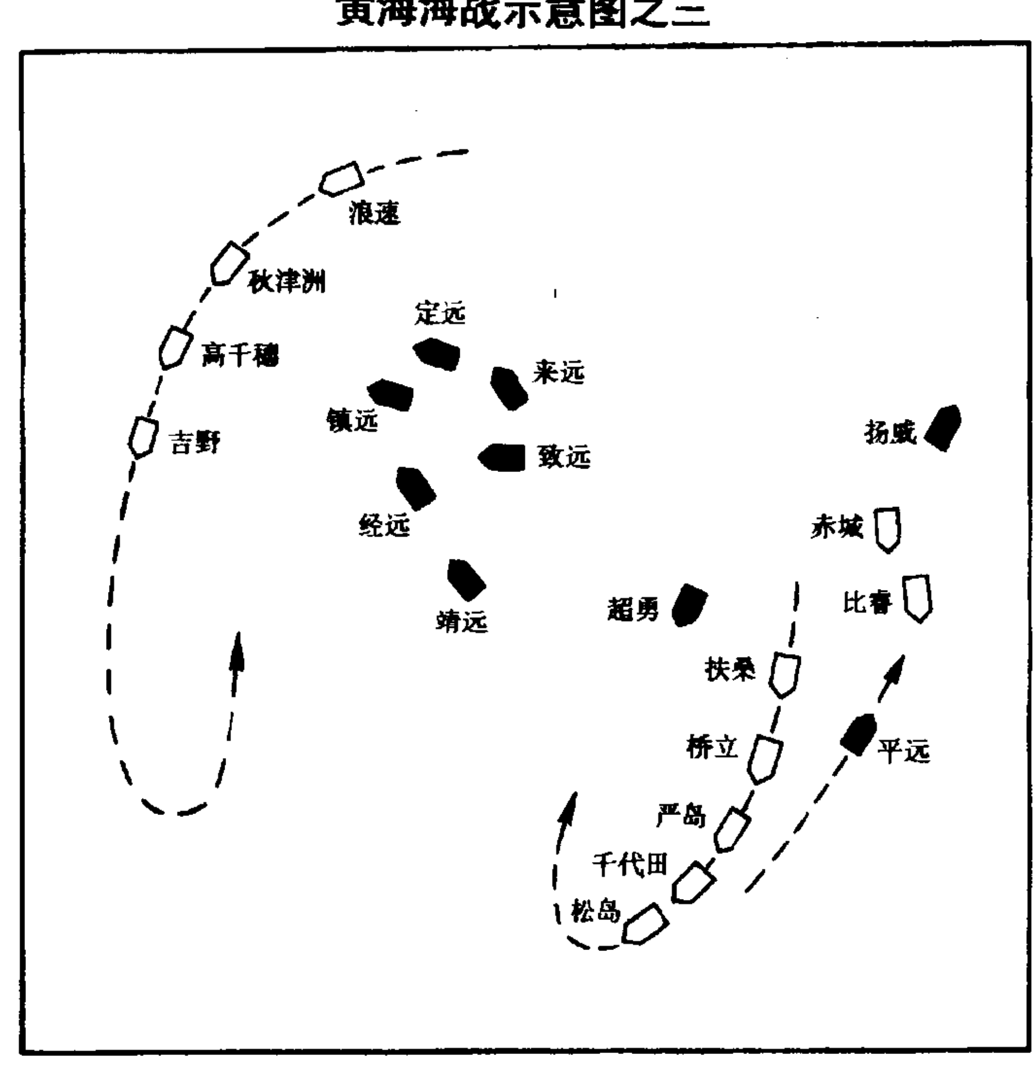


开足马力，准备用冲角撞击“吉野”，与敌同归于尽。“吉野”慌忙规避，并发射鱼雷。“致远”不幸中雷，锅炉爆炸，约于 15 时 30 分沉没，邓世昌等 250 名官兵壮烈牺牲。“经远”也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浴血奋战，不幸阵亡。

“致远”沉没后，“济远”和“广甲”见处境孤危，相继脱逃（一说“广甲”先逃）。日第一游击队尾追不及，又折回猛攻已受重伤的“经远”。约 17 时左右，“经远”沉没，全舰 270 名官兵除

16 人获救外，余皆殉难。“广甲”仓皇逃跑时，“避大洋，傍岸行”，以致在大连湾的三山岛外搁浅（23 日遇日舰“秋津洲”、“浪速”巡航，便自行炸沉）。

黄海海战示意图之三



“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力不能支，也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平远”、“广丙”及“福龙”鱼雷艇也因尾追单独逃跑的“西京丸”，而为敌第一游击队所断，未及归队。

在“致远”、“经远”等舰同敌第一游击队激战的同时，“定远”、“镇远”两舰正同联合舰队本队鏖战。两舰以寡敌众，始终保持相互依恃的距离。虽中弹甚多，几次起火，全体官兵仍然坚持奋战，一面救火，一面拚死抵抗，并重创敌旗舰“松岛”。日方承认：“（午后）三点三十分，‘镇远’所发的三十公分半巨弹……

命中了我旗舰‘松岛’下甲板炮台的第四号炮，放在近旁的十二公分炮的装药因此爆发，霹雳一声，船舢倾斜了五度，冒上白烟，四顾黯澹，炮台指挥官海军大尉志摩清直以下，死伤达一百余人，死尸山积，血流满船，而且火灾大作，更加困难。”① 由于无法继续指挥，伊东不得不下令各舰自由行动。

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靖远”帮带大副刘冠雄知“定远”号旗桅杆断裂，不能升旗指挥，建议管带叶祖珪代悬信旗集队，指挥各舰绕击日舰，并调出泊于港内的“镇南”、“镇中”等前来助战。于是，“平远”、“广丙”及各鱼雷艇也都折回。这时，日旗舰“松岛”已经瘫痪，“吉野”只剩下一具躯壳，失去战斗力，其余日舰官兵也伤亡惨重，不能再战。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伊东便于 17 时 40 分左右下令各舰向东南方向遁逃。北洋舰队稍事追击，由于时已日暮，加之炮弹告罄，于是收队返回旅顺。

这次海战，历时 5 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所罕见。战斗中，日海军“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 舰受重伤，共死伤约 600 人。北洋舰队“致远”、“经远”、“扬威”、“超勇”被击沉，“广甲”自毁，“来远”等舰重伤，共伤亡近千人。北洋舰队的损失虽然大于日军，但亦给日舰以重创，并迫使其率先逃跑。因此，当时中外舆论对于谁是这次海战的胜利者，众说纷纭。从客观效果看，经过黄海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未能达成“聚歼”北洋海军的目的，但由于北洋舰队嗣后不敢再战，日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为下一步实施花园口（今旅大市庄河西南 90 里）登陆进攻辽东半岛创造了条件，对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显然是中方失利了。

黄海海战之所以失利，原因是多方面的。

李鸿章保船避战、消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是海战失利的关键

---

① 《中日战争》(一)，第 241 页。按：一说重创日方旗舰“松岛”者系“定远”舰。

所在。李鸿章不愿“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然更不愿意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喋血一战，因而一再强调“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①，实际上将黄海制海权拱手让与日本。不难看出，李鸿章提出的“保船制敌”方针，其实质是“保船避战”，从而完全陷入了消极防御的被动地位。日本论者指出：日军“在联合舰队的护卫下，直接从海路送往仁川，在当时北洋舰队主力完整无缺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一种赌注。但是，受命保存兵力、停止索敌活动的北洋舰队没有出动”②。并指出：“清国在使用舰队的方法上有错误”，“清国当局不用舰队去获得制海权”。③ 可见，李鸿章的保船避战方针不仅适应了日军当时的需要，而且造成了战略上的极端被动。而在日本联合舰队已经驻泊朝鲜西海岸港口，并急于寻求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之际，李鸿章等又令北洋舰队在思想和物质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执行护航任务，结果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邀击，损失惨重。

丁汝昌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方面的失误，是导致海战失利的直接原因。丁汝昌以陆军将领担任海军提督，指挥海上作战，自难得心应手。由于缺乏海战经验，不善于根据敌我舰船的技术战术特点，采取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灵活战法。黄海海战开始时，北洋舰队以夹缝雁行阵对付敌人的单纵阵，这种战斗队形诸多不利，如最难维持阵形，不便自由行动，不易发挥全舰队炮火之威力等等，因而颇遭后人责难。当然，黄海海战中丁汝昌等决定采用横阵应战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北洋舰队的中坚是“定”、“镇”两舰，各有 30.5 厘米口径的主炮 4 门，它们不是安装在中心线上，而是位于军舰前部的两侧，只有基本上保持舰首对敌，才便于充分发挥其威力。因此，丁汝昌在战前训令中规定“始终以

---

① 李鸿章：《据实陈奏军情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78，第 61～62 页。

② 〔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 103 页。

③ 〔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 107 页。

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在海战报告中，也有“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① 的说法。北洋舰队战术运用上的错误，主要在于把速度不同的军舰混合编组，并驾齐驱，致使“致”、“靖”、“经”、“来”4舰徒具高速而不能充分发挥其战术性能，丧失了巡洋舰应有的机动攻击作用，而陷于被动。相反，日方却根据战舰速度不同等特点，将4艘高速舰单独编队，加之采用便于机动的单纵阵，因而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不受本队航速的限制，进行机动突击，而居于主动地位。其次，北洋舰队在编队上置弱舰于两翼，当敌舰迂回包抄其侧翼时，侧翼无强大炮火对付敌舰。正是由于这一错误，一开始就造成“扬威”、“超勇”两舰中弹起火的恶果。此外，旗舰“定远”在战斗开始后不久就中弹负伤，失去升旗指挥的能力，而事先又没有指定当旗舰失去指挥能力时由何舰接任指挥，这对于整个舰队的作战极为不利。《冤海述闻》指出：“督船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无号令。……督船帅旗于第三次排炮时即被敌炮击落，便不再升。……督旗不升，各船耳目无所系属；督船忽左忽右，亦无旗令，而阵势益散漫，丁提督之不谙战事可知也。”② 所以，北洋舰队在战前未能指定代理旗舰，以致战斗中中断指挥，乃是丁汝昌的又一严重失误。

实力居于劣势，也是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黄海海战，双方参战力量对比如下表所示：

国别	参战军舰	装甲情况		总排水量（吨）	平均航速（节）	鱼雷发射管数	火炮			鱼雷艇数
		装甲	非装甲				总数	21厘米以上	20厘米以下	
中国	12※	5	7	34466	15.33	27	195	23	172	2
日本	12	3	9	40840	16.33	36	268	11	257	0
※包括后来参战的“平远”、“广丙”2舰。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9，第7页。

② 《中日战争》（六），第88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日本联合舰队吨位总数大，航速快，机动性好，火炮多，攻击力较强；北洋舰队虽有两艘巨型装甲战列舰，重炮较多，但总的实力毕竟居于劣势。军舰的速度是关系海战胜负的重要条件，在战斗过程中，日舰（特别是第一游击队）正是利用其速度快、便于机动的特点，始终居于“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的有利地位；北洋舰队则处处显得被动，“惟随敌队之运动以为运动”①。在当时条件下，舰队的攻击力主要在于火炮，日本联合舰队不仅火炮总数大大超过北洋舰队，而速射炮更是众寡悬殊。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的火炮发射力超过北洋舰队 6 倍，以致“日军以其胜利归功于速射炮”。② 除此以外，北洋舰队虽有巨炮 8 门，“惟清廷怠忽无状，平时不事补充，战时全舰队中，仅有榴弹数发而已，瞬息之间，榴弹告罄”③。更有甚者，有的炮弹实以泥沙，有的弹丸火药内掺有水泥。因此，尽管战斗中命中弹丸不少，却未能击沉一艘日舰。

黄海海战虽然失利了，但在力量对比居于相对劣势和指挥失灵的情况下，北洋舰队大部分官兵仍能奋勇拚杀，开创了海上鏖战 5 个多小时的纪录，其英烈精神和光辉事迹，是值得后人称颂的。

第四节　辽东半岛之战

（参见附图 24）

一、平壤、黄海战役后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一）日军方面

平壤、黄海战役之后，日本大本营认为进行直隶平原决战的

---

① 《北洋海军总査汉纳根致北洋大臣报告》，转引自《海事》月刊第 8 卷，第 5 期，第 63 页。

② 《海事》月刊第 10 卷，第 2 期，第 33～34 页。

③ 《海事》月刊第 10 卷，第 2 期，第 31～32 页。

条件基本成熟，但因冬季逼近，故决定继续执行其冬季作战方针，首先实施辽东半岛登陆战役，以夺取旅顺、大连。9月21日起，大本营即着手组建由第一师团、第二师团（预备队，后未参战）和第十二混成旅团（第六师团的一半）编成的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为了隐蔽攻占辽东半岛的企图，大本营命令第一军在鸭绿江东岸义州一带集结，以牵制对岸清军，届时向九连城（今丹东市东北25里）发起进攻，掩护第二军的登陆作战。

（二）清军方面

黄海海战后的第三天（9月19日），李鸿章根据“各国探报，倭人将以大股图犯北京，又云谋袭沈阳”的紧急形势，在《军事紧急情形折》中提出了“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的方针，同时强调，必须“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①李鸿章还要求指派大臣专门督办奉天军务。清廷基本上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同时，令宋庆帮办北洋军务，火速由旅顺驰赴九连城一带，督率前敌各军合力严守鸭绿江西岸。除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一军外，均归其节制。不久，又将从平壤溃退过江的叶志超、卫汝贵撤职，所部交由聂士成统带。

清廷采纳李鸿章的建议，意味着战略方针有所转变，即由海守陆攻的方针转变为全面防御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清廷命北洋舰队尽快修复受伤各舰，不时巡弋于大连、旅顺、威海之间，扼守渤海门户；为力保沈阳，以东三省军队之大部集结于沈阳、辽阳之间，并增强鸭绿江一线的兵力；为保卫北京，在天津、大沽间，山海关与秦皇岛间，以及通州（今通县）附近，厚集外省兵力。

---

①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军事紧急情形折》，《中日战争》（三），第111～113页。

二、鸭绿江防线的溃败

鸭绿江一线的清军以九连城一带为防御阵地。九连城南依鸭绿江，东枕叆河。叆河东面的虎山，是屏障九连城的要塞。再东至安平河口，逾安平河而东为苏甸，再东为长甸。九连城西南为安东县（今丹东市），再西为大东沟，更西为大孤山（今孤山）。

10 月中旬，帮办北洋军务、四川提督宋庆，和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先后到达九连城。宋庆以“沿江地段绵长，节节可虑”①，决定分段防守，并建议依克唐阿“移防北路”。清廷乃电令依“即于长甸、蒲河一带酌度地势，移军驻扎，所有倭恒额、聂桂林两军，均归节制”②。至 10 月下旬，集结于九连城附近鸭绿江西岸的清军兵力共约 70 余营，2.3 万余人，分中、东、西三段进行防守。

中段：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专守九连城；总兵聂士成率芦山军驻守栗子园至虎山（虎耳山）一线；总兵马玉昆、宋得胜等率毅军 9 营驻九连城北面的榆树沟、苇子沟一带为机动；宋庆率亲兵 400 人设司令部于苇子沟。

东段：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齐字练军（副都统倭恒额统领）及镇边军共 18 营分守安平河口至长甸河口一线。

西段：丰升阿、聂桂林率奉天盛军和原左宝贵所部奉军共 12 营分守安东、大东沟、大孤山各城邑；总兵吕本元、孙显寅率原卫汝贵所部盛军 18 营驻守沙河镇（安东县）一带。

鸭绿江沿线清军虽有 70 余营，但因是一线设防，兵力分散，纵深内没有强大的预备队可供机动，加之宋庆与依克唐阿互不统属（中、西段归宋庆指挥，东段归依克唐阿指挥），因而总体防御能力是脆弱的。

---

① 《北洋大臣来电》，《中日战争》（三），第 147 页。

② 《军机处电寄依克唐阿谕旨》，《中日战争》（三），第 149～150 页。

1894年10月22日，日第一军2.5万人于朝鲜义州一带集结完毕，准备渡江攻取虎山，进而夺占九连城。为了牵制对岸清军，24日以一部兵力故意在义州作出渡江的姿态，暗地则命第三师团的佐藤大佐（第十八联队长）率领一个支队于义州东北的水口镇附近徒涉过江，向倭恒额防区安平河口、鼓楼子一带发起攻击，企图由东而西，绕攻虎山清军，袭击九连城的侧背。驻守该处的倭恒额部清军纷纷向宽甸方向逃走。佐藤支队轻取安平河口等处，随即向虎山方向前进。在佐藤支队过江的当天上午，日军还派遣奥山少佐率领一个支队沿鸭绿江东岸向西南行，屯于安东对岸的麻田浦，炮轰安东，牵制该处清军。

义州日军在佐藤支队过江的当夜，利用夜暗在虎山附近江面架设了浮桥，清军竟然没有发觉。25日凌晨，日军第三师团在炮火掩护下首先过江，第五师团之第十旅团继进。战斗开始后，宋庆急调苇子沟、栗子园、九连城的清军进行拦击，一度迫使日军不能向纵深发展，后续日军无法通过浮桥。战至上午10时左右，沿岸清军及守备炮台的铭军不支，相继溃逃，只有聂士成部仍坚守虎山阻击日军。由于各路清军溃退，日军（包括由安平河口西进的佐藤支队）得以集中兵力围攻虎山。聂士成部终以寡不敌众，不久亦退往叆河以西。宋庆不敢继续抵抗，于当夜率部退守凤凰城（今凤城）。26日，日军进占九连城，随即分兵一部占安东，丰升阿、聂桂林率部西奔岫岩。仅3天时间，鸭绿江防线即被突破。此后，日军向我东北境内步步进逼。

三、辽东半岛的失陷

辽东半岛面临黄海，不仅是日军从海上进攻东北的主要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与山东半岛遥望相对，共同封锁渤海海峡，因而也是保卫京津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辽东半岛正面的沿海陆地，西起老铁山，东至鸭绿江口，整个地形前低后高，山地重迭，本是组织抗登陆的良好战区。但是，

当日军攻占平壤进逼鸭绿江时，李鸿章等不了解日本大本营的战略意图，错误地判断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加之沈阳是清王朝的陪都，以致陆续把长期守备旅顺、大连之兵（宋庆所部毅军和刘盛休所部铭军）调赴鸭绿江前线。为了填防，李鸿章令宋庆所部的分统姜桂题新募桂字4营、提督程允和新募和字3营调赴旅顺，后又令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6营及所部马队2营，正定镇总兵徐邦道新募拱卫军3营并所部马队2营、炮队1营，由天津调赴旅顺协防，而以铭军分统赵怀业新募怀字6营，代替铭军防守大连湾。日军进攻时，旅大地区清军的部署是：

金州大连地区：金州副都统连顺率捷胜营步队1营守金州城，以马队2哨驻皮子窝（今皮口）监视附近海岸；总兵徐邦道以拱卫军步队3营守徐家山，以炮队1营驻金州城南，马队2营巡防金州东北一带；总兵赵怀业亲率步队2营守大连湾和尚岛，另以2营守老龙头及黄山，1营守南关岭，1营2哨守苏家屯。连顺受盛京将军裕禄遥制，徐邦道、赵怀业受李鸿章节制，彼此互不相属，而无统一的指挥。

旅顺地区：总兵张光前率亲庆军4营守西炮台；总兵黄仕林率亲庆军4营守东炮台；毅军分统姜桂题新募桂字4营、提督程允和新募和字3营、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6营，均依陆路炮台分守旅顺后路。凡无炮台处，则配置野战炮，野战炮间的空隙，则配置步兵，依托山地修筑临时工事。

在日第一军向鸭绿江西岸发起进攻的同时，其第二军在联合舰队的护卫下，分批由朝鲜大同江口渔隐洞出发，10月24日起陆续在花园口登陆。登陆部队总数约2.5万人，前后达半个月之久。

10月26日，金州副都统连顺等通过审讯两名日本间谍（在皮窝子一带捕获），得知登陆日军将进攻金州、大连，急电李鸿章，希望旅顺分兵北援，并要求速令北洋舰队（已修复的“定”、“镇”等6艘军舰于10月中旬由旅顺口驶回威海）赴援大连。北洋前敌营务处龚照玙也发电向李鸿章请援。李鸿章一面令由营口方面增援旅顺的山西大同军2000人（由总兵程之伟统领）兼程前

往金州，一面以责备的口气复电赵怀业等前敌统领："倭匪尚未过皮子窝而南，汝等只各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同一吃紧，岂能分拨过湾？可谓糊涂胆小！"①金州守军多次催促程之伟部南下增援，程之伟竟逗留复州（今复县）、熊岳不进。

11 月 3 日，日军第一师团由皮子窝出发，向辽东半岛蜂腰部的重镇金州进犯。5 日，日军先头部队遭到大和尚山（金州城东）徐邦道部炮击，不能前进。师团主力便由石拉子（亮甲店西南）折向金州北面的三十里堡一带，进攻金州守军的左侧背。6 日，徐邦道部溃败。接着，日军攻破金州城。连顺早已逃走，其余清军向旅顺方向溃退。

11 月 7 日，日军在联合舰队配合下，分路进攻大连。由于赵怀业已于前一日弃大连炮台逃跑，兵勇溃散，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大连。当天，发自仁川港的日混成第十二旅团亦在花园口登陆完毕。

日军占领大连湾之后，休整旬日，于 11 月 17 日开始向旅顺进犯。大山岩决定，除以 2000 人留守金州、1000 人留守大连外，将其余部队分为搜索骑兵、左翼纵队和右翼纵队，沿旅顺北面大道展开进攻。

当时，旅顺清军共计 30 余营，1.2 万余人（含金州、大连溃兵）。但是，作为旅大前线总指挥的龚照玙，在金州失守之后即乘鱼雷艇经烟台逃往天津，其余大小官员也纷纷抢掠财物，准备逃走，以致旅顺军心涣散，人心惶惶。11 月 18 日，日军控制了旅顺陆路咽喉南关岭，前锋进至土城子。

旅顺危急，诸将互不统属，由姜桂题担任临时指挥。姜桂题无所作为，坐待敌攻。这时，只有徐邦道率领残军主动迎战。11 月 19 日，徐部在土城子南面同敌人先头部队遭遇。徐邦道挥军奋

① 李鸿章：《寄大连湾赵统领等》，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 18，第 22 页。

击，重创日军，并追击至双台沟。由于日军不断增援，徐邦道兵力薄弱，又无后援，整整激战了一天，士兵饥饿疲乏，只得退回旅顺。此时，驻防旅顺的8艘鱼雷艇已逃往威海，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等统领也仓皇乘船逃跑。21日，日军舰队在港外游弋，借以牵制旅顺东西炮台的清军。陆军则集中兵力猛攻可以瞰制各台的椅子山炮台。22日，椅子山炮台为敌攻占，接着，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等各炮台相继失陷，守军溃散，旅顺随即陷落。

就在日军占领旅顺当天，奉命由摩天岭一带南援旅顺的宋庆所率援军约7000人（含刘盛休所部铭军）进抵金州城北，与日军激战半天，未能越过金州赴援旅顺，于当晚退至三十里堡，后又向盖平（今盖县）退却。

日寇陷旅顺后，对旅顺人民（2万余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①

辽东半岛之战，为时不足一月，清军就彻底失败了。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指导。平壤、黄海战役之后，清廷根据李鸿章的建议，企图从水陆两个方向阻止日军入侵中国本土。可是，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分兵把口、单纯防守的消极防堵方针，纵深缺乏强有力的机动部队，以致鸭绿江防线一触即溃。北洋海军则在李鸿章“保船避战”方针指导下，坐视陆军孤立作战。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时，“以浮码头运炮马登岸甚艰阻”，进展缓慢，而“我海陆军无过问者”。② 10月底，丁汝昌曾率舰队由威海抵旅顺，但不敢前往近在咫尺的日军登陆地点进行任何袭扰。11月6日，光绪帝下谕：“现在贼逼金州，旅防万分危急。其登岸处在皮子窝，必有贼舰湾泊及来往接济。著李鸿章即饬丁汝昌、刘步蟾

---

① 〔英〕胡兰德：《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转引自〔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63～64页。

②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37页。

等，统率海军各舰，前往游弋截击，阻其后路。”① 李鸿章明知敌人“水陆全力专注此路”，“湾旅情形万紧”，却强调北洋海军“力量夙单，未便轻进”，拒不执行命令。② 11月7日，大连失陷，丁汝昌竟以“旅顺后路警急，各舰在口内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为力，有损无益”③ 为由，于8日率队返回威海。11日，丁汝昌奉命率舰队抵大沽，并前往天津与李鸿章等面商援旅事宜。④12日下午，北洋舰队由大沽开赴旅顺，稍事游弋，13日晚即离旅折回威海，此后再未北巡。北洋舰队的避战自保，无疑加速了辽东半岛的陷落。

其次，战略防御重点选择不当。清军最高当局忽视战略战役侦察，以致对敌人的战略意图缺乏了解，不能正确地判断其主攻方向，造成战略防御重点的选择不当。日军进攻中国本土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夺取辽东半岛，可是，清军在兵力部署上却以鸭绿江一线为第一重点，京津榆一带为第二重点，而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旅大地区却被忽视。那里的防御非但未得到加强，反而将驻军主力调往鸭绿江西岸，正中日军下怀。敌人在花园口登陆后，不少人认为敌人意在骚扰安东、九连城后路，而不是指向旅大。盛京将军裕禄接到连顺关于登陆日军将攻金州、大连、旅顺的告急电时，仍判断敌人不过是“分兵窜扰”，“明系包抄前敌（按：指鸭绿江防线）各军后路”；“目下九连城既被抢渡，难保不合谋北犯”。⑤ 因此，没有及时分兵援救金州。李鸿章虽看出辽东半岛“情形万紧”，可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当金州危急时，他不仅不

---

①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中日战争》（三），第190页。

② 《北洋大臣致督办军务处电》，《中日战争》（三），第192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4，第37页。

④ 11月11日，李鸿章、丁汝昌、汉纳根等在天津商议援旅事宜。汉纳根认为“旅顺日船游弋，运兵船断不可往”。丁汝昌也认为若令北洋舰队护送陆军援旅，“适以资敌”，主张即率6舰由大沽开赴旅顺口外巡弋，“遇敌即击，相机进退”。李鸿章表示同意。（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8，第41页。）

⑤ 《盛京将军来电》，《中日战争》（三），第170页。

派兵往援，反而令距离金州最近的赵怀业等部“只各守营盘……并无守城之责”。结果，徐邦道部孤军苦战，终以众寡悬殊而失败。金州既破，旅大后路被卡，势必陷入绝境。

此外，清军前敌将领怯懦无能，指挥乏术等等，也是辽东半岛迅速失陷的重要原因。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大连失陷的当天，慈禧竟若无其事地在北京庆祝其 60 岁大寿，置前方军情万紧于不顾。清朝最高统治者如此昏聩，自然不可能对战事实施正确有力的指导，其结果只能是一败再败。

11 月 23 日，清廷以辽东半岛溃败责怪李鸿章“调度乖方，救援不力”，下诏“革职留任”，并令其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周历巡阅，严密布置”①，以防日军直逼京畿；与此同时，进一步开展求和活动，准备屈辱投降。

第五节　山东半岛之战

（参见附图 25）

一、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一）日军方面

日军攻占大连、旅顺之后，适逢冬季，大本营对是否按照作战大方针进军山海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迟疑不决。12 月 4 日，伊藤博文为反对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提出的进攻山海关的意见，向大本营递交了《应攻打威海卫、占领台湾的方针策略》的长篇意见书，指出冬季进行直隶平原作战，从军事策略和政治策略上说，对日本都是不利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即将天寒冰凉的渤海，运输来往是难以顺利进行的”；另方面，即使在直

---

①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24，第 31 页。

隶作战获得成功，"清国将是满朝震惊，暴民四起，土崩瓦解，并陷入无政府状态"，日本不但会失去和谈的对手，而且会"自己招致各国的干涉"。① 12月6日，日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联名向日本大本营提出建议：鉴于渤海湾封冻，登陆困难，若欲继续作战，不如出兵山东半岛，海陆夹攻，歼灭北洋海军，以保障来年从渤海湾登陆的安全。②日本大本营采纳了上述建议，随即任命大山岩为"山东作战军"司令官。其军队编成为：第二师团（辖步兵第三、第四旅团）及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加上骑、炮、工兵等其它部队，共计2.5万余人。1895年1月中旬，上述部队自日本广岛航运至大连湾集结，待机进发。与此同时，日本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负责护送山东作战军的登陆兵团，并与之相配合，攻打威海卫军港，消灭北洋舰队。

日本联合舰队经过多次侦察，确知北洋舰队仍在威海港内。但威海军港正面设防坚固，不易夺取，因而日军决定把登陆场选择在清军防御薄弱的荣成湾龙须岛地段，登陆后再西进，从侧后夺取威海卫。登陆时联合舰队负责海上警戒，并以主力封锁威海港，以防北洋舰队出击或逃离。

（二）清军方面

旅大失守之后，清政府判断，日军第一、第二军将并力攻取沈阳，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别遣一部从渤海湾登陆，会攻北京。基于以上判断，"调兵多往顾辽沈"③，并以重兵严防山海关至天津一线，关内外总兵力共约10万人以上。由于专注京津方向，忽视了山东半岛的防务。

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与渤海之间，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半岛北岸东部的威海卫，北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相对，共扼渤海海

---

① 转引自〔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29页。

② 参见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日文版，第6卷，第2页。

③ 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见《中日战争》（一），第157页。

峡，系保卫京畿门户的锁钥要镇。威海卫的防御，海军由丁汝昌负责，英人马格禄为帮办（原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于黄海海战后辞职）。海岸炮台分别由绥巩军统领道员戴宗骞统绥军 4 营驻北帮炮台，分统总兵刘超佩统巩军 4 营驻南帮炮台，记名总兵张文宣统北洋护军 2 营驻守刘公岛。上述各部由北洋大臣李鸿章直接指挥。山东半岛沿海其它地段的防守，则由山东巡抚李秉衡负责。李秉衡对东起成山角西至登州（今蓬莱）500 余里的漫长防线，不是集中兵力重点防御，而是把兵力分散在各个方向上，其中荣成方向兵力最弱，仅 1400 余人。整个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防守兵力共约 1.7 万人。李鸿章曾指示威海前敌各军："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挖地沟为要。"① 丁汝昌坚决执行这一消极防御方针。他认为"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②。因此，北洋舰队自始至终蛰居威海港内，不敢与敌争锋。戴宗骞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的教训，提出"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建议。③ 李鸿章不予采纳，仍坚持其"扼要埋伏地沟为妥"④ 的错误指导。

二、作战经过

（一）荣成湾抗登陆战斗

1895 年 1 月 19 日，集结于大连湾一带的日本山东作战军在

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 19，第 1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 19，第 38 页。

③ 《戴道来电》，《中日战争》（四），第 304～305 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 19，第 6 页。

联合舰队 25 艘军舰护航下，开始分批向荣成湾航进。为了隐蔽自荣成登陆的企图，1 月 18 日和 19 日，日舰“吉野”等向登州连续轰击。坐镇烟台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果被日军的佯动所迷惑，于 19 日奏称：“前荣成之成山岛、宁海之金山寨均有倭船窥伺，昨登州又有倭船开炮一时之久。由登州至威海、威海至成山，共五百余里，处处吃紧”①。由于他不明敌军将从何处登陆，于是采取应付态度，强调“明知兵分则力单，而地面太长，有不能不分之势”②，结果处处兵力薄弱。

1 月 20 日，日军第二师团开始登陆。这时，北洋舰队尚堪一战，本应出击，但丁汝昌“震于倭舰声势，坚匿坐毙”③。日军在龙须岛登陆后，守军不支，向西败退。驻守荣成一带的副将阎得胜所率 4 营清军多系新兵，又少枪械，因而一触即溃，荣成旋即被日军占据。

（二）威海南北两岸炮台的陷落

日军于荣成湾登陆之后，李秉衡仍然错误地认为，日军“又难免不从西面乘隙上岸”④，因此，集结在威海、宁海、文登一带的 35 营清军基本上按兵不动，只抽出总兵孙万龄所率嵩武军 1000 余人自旧馆前往增援。由于未能集中兵力对从荣成方向登陆之敌进行反击，日军得以在荣成从容地进行了两天休整。

1 月 25 日，日军分左右（南北）两路西犯威海：左路（南路）为第二师团，自荣成经桥头、温泉汤、虎山，指向威海，负责切断南帮炮台清军退路；右路（北路）为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自荣成经三官庙、崮山后，直扑南帮炮台。

孙万龄部于 1 月 22 日到达桥头，收集了从荣成败退的阎得胜部。次日，戴宗骞所派知府刘树德率领的两营绥军亦抵桥头一带。26 日起，孙、刘两部清军在桥头附近奋勇阻击南路日军前锋，使

①② 《山东巡抚来电》，《中日战争》（三），第 326 页。

③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 70 页。

④ 《山东巡抚来电》，《中日战争》（三），第 341 页。

敌人接连两天不得西进。但北路日军由于清军阻击不力，较快地进抵鲍家村、崮山后一带，严重威胁着南帮炮台的安全。

28日，李秉衡命孙万龄、戴宗骞夹攻北路日军。但是，戴宗骞违令不至，而阎得胜又不战而退。孙万龄部孤军力战，终因众寡不敌，退回桥头。此时，驻守桥头的刘树德所率绥军竟被戴宗骞调回威海，孙万龄左右无援，亦弃桥头西去。南路日军遂占桥头，并向温泉汤方向逼进。

30日晨，南北两路日军分别进攻凤林集东南高地和威海南岸堡垒群。南帮炮台官兵英勇抵抗，港内的“定远”、“镇远”、“来远”等舰也驶至东口南岸助战，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并击毙敌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当日军尚未逼近时，丁汝昌曾建议戴宗骞事急时卸掉南帮炮台的大炮炮闩，以免日军利用，但戴宗骞不同意。后来果如丁汝昌所料，日军从南帮炮台发炮轰击港内舰船，使北洋舰队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当南帮炮台战斗激烈时，巩军统领刘超佩临阵脱逃，乘小轮渡奔北岸，南岸士兵各自为战。30日下午，南帮炮台全部陷落。

南帮炮台失守后，驻守北岸的绥军望风溃退，刘树德也仓皇逃命。戴宗骞无奈，移驻祭祀台，从者皆散。2月1日，丁汝昌乘小轮将戴宗骞接往刘公岛（戴至岛即自杀），并炸毁北帮炮台及弹药库，以免资敌。于是，日军不战而占领威海北岸。至此，威海陆上据点尽失，北洋舰队和刘公岛陷入重围。

（三）北洋舰队的覆没

1月30日，一直停泊在荣成湾的日本联合舰队于凌晨2时启航开向威海，7时抵达百尺崖南，先后配合其陆军轰击杨峰岭、所前岭炮台。南帮炮台陷落后，北洋舰队因威海港东口暴露在敌军陆路炮火之下，遂移至西口。于是，日鱼雷艇得以破坏东口障碍物，且入港袭击北洋舰只。

在此不利情况下，北洋舰队本应冲破敌之封锁，出港拼力一战。清廷早在1月23日即曾电谕李秉衡:“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

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① 李鸿章于同一天电告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② 但是，丁汝昌却表示：“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③ 他决定株守港内，既不出战，又不转移。1 月 30 日，李鸿章再次电告丁汝昌、戴宗骞：北洋舰队应冲出威海，“设法保船”。“万一刘(公)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否则，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贻后患。”④ 但是，丁汝昌仍迟不执行。

2 月 3 日，日舰及占据南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陆合击刘公岛及北洋舰队，双方相持竟日。刘公岛清军伤亡甚众。2 月 4 日，日鱼雷艇队乘夜暗闯入东口袭击北洋舰只，“定远”中雷重伤，不久自毁，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5 日，日军又水陆一齐发炮轰击，炸毁日岛弹药库及地阱炮。清军发炮还击，击伤日舰 2 艘。当夜，日鱼雷艇又入东口，袭沉“来远”、“威远”及“宝筏”号。7 日，日舰分别于东、西两口向刘公岛、日岛发起总攻击。丁汝昌命王登瀛率鱼雷艇队袭击日舰，不料，王率队向烟台窜逃，遭日舰追击，全部被俘。此时，刘公岛电讯已中断，形势岌岌可危。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唆使极少数的民族败类公开要求投降，引起军心涣散。9 日，“靖远”被敌击沉。当天，刘步蟾自杀。10 日，丁汝昌命令沉船，由于洋员的阻挠，无人执行。

11 日，丁汝昌得到烟台密信，知李秉衡远逃莱州，陆路增援已无希望，才召开会议，研究突围，当即遭到洋员瑞乃尔（德国

---

① 《军机处电寄李秉衡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29，第 36 页。

② 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 19，第 43 页。

③ 《丁提督来电》，《中日战争》（四），第 316 页。

④ 《复丁提督张镇》，《中日战争》（四），第 320～321 页。

炮师)、马格禄以及民族败类营务处道员牛昶炳等的坚决反对，迫使丁汝昌、张文宣等相继自杀。12日晨，一群贪生怕死之徒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本舰队投降。于是，北洋舰队尚存的“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艇以及刘公岛炮台和军资器械，全被日军所掳。

日军攻陷辽东半岛之后，实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进一步丧失积极抗击侵略的意志，着意求和，这是山东半岛之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军事指挥上，由于李鸿章仍然采取消极防御的被动挨打方针，因而和辽东半岛之战一样，存在着一连串的失误。首先，对日军攻占旅大之后的战略企图判断错误，在战略防御部署上重奉天而轻山东，山海关内外重兵云集，山东方面则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抽兵（总兵章高元所率嵩武军8营）北援辽东，以致日军由荣成西进时，山东清军无足够数量的预备队可供调遣，不得不从威海附近分兵堵截，造成顾此失彼的被动态势。其次，山东清军在部署上分兵把口，以致处处兵单，尤其是没有汲取辽东半岛之战中日军于花园口登陆从侧后进犯、旅大迅速陷落的教训，对敌人从远处登陆进行侧后攻击的可能性缺乏预计；当得知日军已从荣成方向登陆后，又未能及时集中兵力，组织有力的反击，致使登陆之敌得以两路并进，直扑威海。再次，李鸿章强调其保船避战的错误方针，既规定北洋海军“不得出大洋浪战”，又不准陆路各军乘日军半渡而击，主观地认为只要“固守大小炮台”，依仗“能击四面”的新式大炮，即可使日军“断不敢近”，这无异于把战场主动权拱手授之于人，而使自己立于未战先败之地，加之丁汝昌认为海军如败，“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拒不执行出口决战和突围退却的指示，终于酿成北洋海军坐以待毙、全军覆灭的可悲结局。

第六节　辽东之战

一、摩天岭、赛马集等地的战斗

越过鸭绿江之日第一军继1894年10月26日占领九连城、安东之后，接着又于27日占领大东沟，31日占领凤凰城，11月5日占领大孤山。其后，日第二军攻占了金州、大连湾。于是，第一军受领的牵制辽东清军、掩护第二军由花园口登陆的任务基本完成，大本营令其在九连城附近布置冬营，以待来年参加直隶平原决战。然而，日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求功心切，决心继续扩大战果，“欲进逼辽阳、奉天”①。他将第一军兵力分为两股：第五师团以九连城、凤凰城为依托，向驻守摩天岭一线的清军进攻；第三师团则由安东经岫岩西犯析木城、海城，出辽阳之西，断摩天岭清军后路。

11月9日，奉命率部越摩天岭西进的日第五师团之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令少佐今田唯一带领1个大队由凤凰城出发，进犯摩天岭东面的连山关，以探虚实。

当时，连山关、甜水站诸处由吕本元、孙显寅所部盛军驻守，摩天岭由聂士成等部驻守。由于宋庆奉命率所部毅军并铭军南下救援旅顺，连山关、摩天岭一带防务由聂士成统管。

11月12日，今田唯一所部日军陷连山关，直趋摩天岭。聂士成部顽强抵抗，“扼隘路，以巨炮当其冲，张旗帜丛林间，鸣鼓角为疑兵，时出截杀，而露宿以守”②。日军不得逞，撤回连山关。

在西犯摩天岭的同时，日军一个小队由叆阳偷袭赛马集。该处东近叆阳，西接连山关，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部弃守宽甸之

① 《中日战争》（一），第251页。

②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29页。

后，即退驻于此。日军以小股部队侦察依克唐阿部虚实，遭到依军痛击，死伤惨重。日军西则受阻于摩天岭，东则败于赛马集，不得已于11月24日撤离连山关，集结于连山关、赛马集之间的草河口一带，阻隔聂、依两军通道。26日，聂、依两军东西夹击，大败草河口日军。29日，立见尚文以大队来援，分犯赛马集和草河口。清军竭力抵抗，战事呈胶着状态。日军前进受阻，又恐凤凰城空虚，后路危险，便于12月5日弃草河口，返回凤凰城。此时，聂、依两军声势相通，拟合力南下，收复凤凰城。依克唐阿并分兵一部绕道叆阳指向凤凰城侧背。立见尚文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队北上迎击自通远堡南下的清军。9日，双方激战于通远堡南面的金家河，彼此伤亡甚众。12日至15日，清军连战皆败，终未能收复凤凰城。这时，日军第三师团已陷海城，辽阳危急。依克唐阿奉命西援辽阳，与宋庆及吉林将军长顺会合，以固沈阳门户。此后，辽阳以东防务主要由聂士成部承担。聂部以摩天岭阵地为中坚，长期与敌相持，日军始终未能越岭西进。

二、海城、盖平等地的陷落

当日军第五师团进犯摩天岭一带之时，其第三师团之第五旅团长大迫尚敏少将率领的一个支队（步骑约3000人）出大孤山，指向岫岩之南。11月18日，在第五师团派出的少佐三原重雄所率大队（14日由凤凰城出发）的配合下，南北夹攻，夺占岫岩。

日第二军攻陷旅顺之后，其第一军司令野津道贯① 即建议大本营准其进军海城，以利旅大方面日军的行动。日第一军既不能越摩天岭西犯，则由岫岩经海城而进逼辽阳，必要时与第二军会师北上而威胁沈阳，自然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海城实为

---

① 1894年12月上旬，日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大将“因病”免职，奉召回国，由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继任其职（不久晋为大将）。第五师团长则由原近卫旅团长奥保巩中将担任（12月中旬离广岛来华）。

中日两军必争之地。

12月上旬，日第三师团于岫岩集结，准备进军海城。当时，由摩天岭奉命回援旅顺的宋庆所部毅军和铭军屯于盖平；由岫岩败退的丰升阿、聂桂林所部10余营驻海城东南的析木城一带。12月10日，日军第三师团全队西犯：先以佐藤大佐率兵一部指向盖平，牵制宋庆军；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自统师团主力扑向析木城。11日，清军屡战皆败，丰升阿、聂桂林夜奔海城，析木城遂于12日被日军侵占。13日，日军乘势进攻海城。防守该地的奉军等17营清军稍事抵抗，即退奔辽阳。海城既陷，辽阳、盖平、营口（今营口市）、牛庄等处告急。清廷深虑奉天省城势危，急令依克唐阿、长顺各率所部西援，以护辽阳，令宋庆率所部自盖平北上，以护营口、牛庄，防敌西窜。

宋庆在盖平闻日军由岫岩长驱北进，已于12月10日亲率毅军、铭军等20余营移驻于大石桥（今营口县），拟救援海城。但由于海城旋即陷入敌手，宋庆便改变计划，拟与北面诸军取得联络之后，再共图收复海城，于是全军屯于距离海城20余里的缸瓦寨，未能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发起攻击，丧失了战机。12月19日，海城日军大股来袭，宋庆军与敌激战半日，终不支，被迫由缸瓦寨退往营口、田庄台一带。

日军攻占海城后，以孤军（约6000人）入重地，力单势危，于是，野津道贯率第一军司令部和军预备队由安东移驻岫岩（1895年1月5日到达），同时，请求第二军分兵一部协攻盖平，以便两军声势相通，使海城日军摆脱孤立窘境。1895年1月初，日第二军派遣第一师团之混成第一旅团① 约8000人由普兰店（今新金）北上。当时，驻盖平之清军尚有章高元所部嵩武军8营、徐邦道所部拱卫军11营、张光前所部亲庆军5营。1月10日黎明，日混成第一旅团分三路发起进攻。章高元部奋勇迎击中路日军，"鏖战

① 日第一师团之第一旅团（旅团长为乃木希典少将）奉命北上时，会诸队而编为混成旅团。

甚猛，倭不得逞”①。敌之右路集中火力进攻东门外的凤凰山，张光前部与敌展开激战，“炮声喊声相应，仿若天地即将崩毁”②。后因分统李仁党等阵亡，张光前惊恐，率军溃退。日军终于占领凤凰山，一部乘势攻入东门，然后出南门，从背后攻击章高元部。清军不支，各部齐退营口。盖平既陷，日第一、第二军声势联络，辽东清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三、反攻海城屡遭失败

自平壤之战以后，清廷以淮军不可恃，便起用湘军旧将魏光焘、李光久等，令其募兵北援。1895 年 1 月，光绪帝又召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入京，授为钦差大臣，令湖南巡抚吴大澂、毅军总统宋庆共同帮办刘坤一军务。

1 月 14 日，清廷以海城、盖平相继失守，关外军情更紧，乃令刘坤一迅赴山海关驻扎调度，节制关内外各军；并令自动请缨的吴大澂统率新疆布政使魏光焘及总兵刘树元、吴元恺等部“即日拔队出关，分起进发，会合宋庆等军，相机进剿”③。于是，宋庆于田庄台坐待援军。

这时，奉命扼守辽阳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吉林将军长顺深感责任重大，一致认为，与其坐待日军来攻，不如乘其占领未固之际，先发制胜，于是商定，以集结于腾鳌堡、鞍山站一带的 50 余营约 2 万人的兵力，“分左右两路，步步前往，相机规海，兼可顾辽”④。1 月 17 日，依、长两军已前进至海城北面，距敌人前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 43 页。

② 《中日战争》（一），第 266 页。

③ 《军机处电寄吴大澂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28，第 17 页。

④ 《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27，第 38 页。

沿阵地仅 2 里许。西路依军包抄至二台子，东路长顺军包抄至头河堡，东西绵亘近 30 里。日军扼守城北欢喜山和双龙山（山上均筑有炮台），并有步、骑、炮兵列阵以待。当清军发起攻击时，日军步骑数千人在炮火掩护下蜂拥齐出。清军大半使用土枪，射程小，射速慢，加之“旗汉兵团心志不齐”，相持不久，西路依军先退，东路长顺军继之，第一次反攻海城遂告失败。

1 月 22 日，依、长两军又分左右两路会攻海城。依军自长虎台向欢喜、双龙两山之间的三里桥突击，为欢喜山日军炮火所阻，又折而北，经沙河沿绕出欢喜山之西，拟攻海城之西北角。长顺军则从头河堡向双龙山发动进攻，终因日军炮火猛烈而不得进。下午，日军发起反击，依军大量伤亡，经大富屯向西北方向退走。东路长顺军亦退，第二次反攻海城又归失败。

此后，山东半岛军事形势日趋恶化，清廷主战派为了从辽东战场捞回一点面子，急欲一举收复海城。2 月 7 日，军机处电谕长顺和依克唐阿：“此时各军俱到前敌，亟宜克期合剿。著长顺与依克唐阿同心协力，严饬诸将奋勇进战，务期一举攻拔，再向南路与宋庆会合，节节扫荡，军事当大有转机矣。”① 依、长二将鉴于前两次攻海失败，深感兵力尚单，商请宋庆出兵会攻。2 月 11 日，吴大澂到达田庄台，其所部除道员李光久军（老湘军 5 营）已先期出关屯于牛庄外，总兵刘树元所率亲兵 6 营亦已到达牛庄。又总兵梁永福所率凤字军 5 营，也于前一日由田庄台开入牛庄。于是，依克唐阿、长顺与宋庆商定，于 2 月 16 日以 90 余营 3 万余人的兵力，再次反攻海城。进攻部署是：依军自北面进攻大教场为中路；长顺军进攻玉皇山为东路；李光久和徐邦道各率所部从柳公屯进攻唐王山为西路。当天，东西二路进逼颇紧。日军先则坚伏不动，继则步、骑、炮兵一齐出击。东路长顺军伤亡甚众，中路依军亦受阻于欢喜山日军炮火，相继败退。西路李、徐两部见

① 《军机处电寄长顺依克唐阿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31，第 25 页。

势不妙，也纷纷西走。这样，第三次反攻海城又未成功。

2月21日，清军上述各部再次会攻海城失败。在第四次反攻海城的同时，宋庆依约率所部毅军、铭军（统领刘盛休已撤职，改由姜桂题接任）及嵩武军（总兵刘世俊统领）等50余营近2万人进攻盖平北面的大平山日军，一度占领大平山，并与敌人相持3日。24日，日军三面来攻，宋庆军大败，退回营口以东地区，防敌西犯。

清军四次反攻海城，虽不是决定性的战役，但其持续时间之长、动员兵力之多、涉及地区之广、战斗规模之大，在整个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是仅有的。清军总的战略方针是消极防御，然就反攻海城来说，则属于具体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固然是由于海城战略地位的重要，它的得失，关系到清廷“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方针能否实现，但主要还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当时的战略重点是海陆进攻山东半岛，全歼北洋海军，而在辽东战场上基本上取守势的缘故。

四、辽东清军全线溃败

清军第四次反攻海城失败之后，还准备进行第五次反攻。日军方面，为了扭转局面，决定趁冰冻未解之际，由盖平、海城、凤凰城分路进攻：一由盖平北趋营口；一由凤凰城赴鞍山站；一出海城北攻依克唐阿和长顺两军，指向鞍山站之南。鞍山站系牛庄至辽阳之孔道，日军欲夺此要隘，示形逼攻辽阳，实将袭取牛庄。因为牛庄一旦有警，海城西面的湘军将由于退路受到威胁而停止攻海。

2月28日凌晨，未等清军发起第五次反攻，海城日军第三师团便分路出击。激战约3小时，中路依军败退。恰在这时，辽阳南90里之吉洞峪被出凤凰城的日军第五师团袭占，辽阳大震。辽阳知州徐庆璋请援于依克唐阿，依便托词援辽，率部北走，长顺军也随之而去。日军跟踪追击，一举夺占鞍山站。不久，第五师

团也间道来会。除留兵一部控制鞍山站外，日第三、第五师团合军西指牛庄。

3 月 2 日和 4 日，魏光焘、李光久先后率部回援牛庄。两部新老湘军共 11 营，均困守市内。4 日，日军三路围攻牛庄，李光久等弃军而逃。军士们深陷危地，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殊死搏斗，与敌相持竟日，最后伤亡近 2000 人，被俘 600 余人。日军也死伤近 400 人，其中有今田唯一等将佐 15 人。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巷战。参战清军英勇拚杀，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牺牲精神。

牛庄失守后，吴大澂率部由田庄台退往双台子，宋庆则连夜率全军主力退扎田庄台，只留少数兵力守营口。3 月 7 日，由牛庄出发的日军轻取营口，并与盖平北上的日军会师。

田庄台四面平坦，加之当时辽河仍然封冻，更是无险可守。3 月 9 日，日军第一、第三、第五师团分路来攻，宋庆军大败，伤亡枕藉。被围于田庄台内的清军被日军纵火焚烧，死者 2000 余人。

田庄台陷落后，宋庆、吴大澂等率残部退往石山站（锦州东）。从此，自田庄台沿辽河而东，自鞍山站而西，皆为日军所占。清廷以淮军既溃于先，湘军复败于后，北洋海军亦已覆没，日军海陆交乘，畿疆危逼，于是束手无策，屈辱求和之心更为迫切。日本方面，则认为“作战的第一期已经结束，因此令‘征清大总督府’进驻战地，即将开始第二期作战”①。

五、《马关条约》的签订

早在平壤、黄海两战之后，清王朝内部的主和派就企图借战

---

① 《中日战争》(一)，第 281 页。按：日军为实行第二期作战，以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清大总督”，以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任总参谋长，置“征清大总督府”于旅顺，并增调近卫师团和第四师团来华，准备参加直隶平原决战，后因《马关条约》签订而罢。

败重开和议。不久，慈禧起用中法战争时被她罢职的恭亲王奕䜣主持总理衙门。奕䜣随即请求各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英国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目的，向美、俄、德、法等国提出联合调停的建议，因未得到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而无任何结果。

日军侵入辽东半岛以后，清朝政府中的主和派又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美国政府看到，如果日本继续扩大侵略，可能引起列强干预，因此，通过其驻日公使谭恩向日本政府提出议和建议。日本虽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但已出现兵力财力不足的困难，并预见到列强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而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因而表示不反对美国“友谊的仲裁”。不久，旅顺陷落，清廷大震。在美国的“斡旋”和操纵下，几经磋商，清政府被迫答应派总理大臣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于1895年1月31日到达日本广岛。此时，日本“山东作战军”正在猛攻威海卫，气焰甚为嚣张。日本政府为迫使清政府接受其全部侵略要求，并在和议达成之前将阴谋霸占的地区拿到手里，便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拒绝与之谈判。伊藤博文竟指名要奕䜣或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赴日乞和。

2月中旬，清政府迫于威海失守、北洋海军覆没的紧急形势，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转告日本政府：中国政府已任命内阁大学士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授与一切全权。3月上旬，辽东清军惨败，京津危急，清廷更急于求和。13日，李鸿章与其儿子李经方等由天津启程赴日。20日，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与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开始谈判。当时，日本大本营虽已任命“征清大总督”和决定以其全部野战师团（包括以北海道屯垦兵为基干组成的第七师团和近卫师团在内，共计8个师团）侵略中国，准备进行直隶平原决战，但首相伊藤博文等毕竟看到了日军“大举出征，防卫几乎撤尽”，是无视列强干涉的危险行径，因而极力主张在充分攫取侵略利益的情况下媾和。① 经过反复争议，李鸿章于4月17日与

① 参见〔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日文版第181页。

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银 2 亿两，分 8 次交清；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 4 个商埠，日船可以任意航行各口；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工厂，装运进口机器；允许日军暂驻威海；定于 5 月 8 日在烟台换约。

《马关条约》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激怒了俄国。它立即联合德国和法国警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三国的军舰纷纷在日本附近海域游弋，并保持战备状态。面对三国的干涉，日本政府十分恐慌，终于被迫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但向清政府又勒索了 3000 万两银的所谓"偿金"。辽东半岛表面上是"赎"回来了，但不久即被俄国以"租借"的名义霸占了主要港口旅顺、大连。这是俄国妄图霸占中国东北的一个严重步骤。

第七节　台湾军民的英勇抗战

（参见附图 26）

台湾为中国第一大岛，面积约 3.6 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约占 2/3。台湾岛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相望。它北临东海的舟山群岛，南临南海的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共同组成一条海上长城，捍卫着祖国的东南海疆，因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有鉴于此，清政府于 1885 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将台湾改为行省（原隶属福建省），以淮军名将刘铭传为巡抚，率所部淮军 40 营驻守。刘铭传一面进行开发性的建设，一面进一步加强台湾的军事设施，增筑了基隆、沪尾（今淡水）、安平、旗后（今高雄市）、澎湖等处炮台。1890 年刘铭传称病去职后，继任巡抚邵友濂大量裁撤驻台淮军，仅存 20 余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以台湾孤悬于海，命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兵 2 营、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率兵 10 营渡台，加强台湾防御。刘永福率部抵台北后，又增募 6 营，共 8 营，仍号"黑旗军"。1894 年 11 月，清廷调邵友濂署湖南巡抚，以布政使唐景崧署台湾巡抚。唐景崧派人回广东招

募散兵游勇，作为亲军，驻守台北；令道员林朝栋率部驻守台中；命刘永福率黑旗军驻守台南。当时，台湾驻军共有3.3万人左右，其中驻台湾北部者约1.3万人，中部约1.2万人，南部约8000人。唐景崧将刘永福、林朝栋等具有反侵略战争经验的部队调离台北，而由临时招募来的毫无纪律、难于统驭的广勇驻防，为后来日军顺利登陆和占领台北提供了可乘之机。

清廷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界群情激愤，纷纷谴责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主张迁都继续抗战。台湾人民更是义愤填膺，纷纷举行罢市，有的拥入巡抚衙署，有的呈递血书，抗议割让台湾。但清政府根本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和台湾人民誓死抗战的要求，竟电告唐景崧："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①。5月2日，清廷批准了《马关条约》。在清廷决意弃台、日军即将入侵的危急时刻，台湾爱国绅士丘逢甲等集众商议，决心"死守不去"②。他们坚决表示："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③ 清廷不敢支持台湾人民的正义斗争，竟无耻地向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董保证："中国和议既定，断无嗾使台民自主之理"④。同时，令唐景崧等台湾大小文武官员内渡。5月下旬，清廷委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特派全权委员，赴台与日本委任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商办割台事宜。他们畏惧台湾人民的反对，到达基隆港后不敢上岸，于6月2日在一艘日本军舰上匆匆办理交接手续。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一场英勇悲壮的抗击日军侵台的正义战争。

---

① 《中日战争》（六），第385页。

② 《中日战争》（六），第393页。

③ 《中日战争》（一），第203页。

④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13，第9页。

一、台湾北部之战

日本政府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要夺占台湾。早在3月下旬，日本大本营即已派遣由大佐比志岛义辉率领的混成支队在联合舰队的配合下，侵占了澎湖列岛。《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其近卫师团和常备舰队便杀气腾腾地向台湾岛扑来。

台湾以台北为政治、经济中心，而基隆、淡水又是台北的门户。日军经过侦察，发现基隆、淡水都不易攻取，最后确定以基隆东面的三貂湾为登陆地点。由于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已于5月26日撤兵内渡，基隆防兵甚单，其东路之三貂岭及澳底诸处，更是无兵防守，仅有少数新募成伍的“土勇”。5月29日，日舰佯攻基隆西面的金包里，近卫师团主力则于三貂湾澳底登陆，次日即占领三貂岭。6月2日，日军进占瑞芳，3日，海陆进攻基隆。守军顽强抗击，但因兵力薄弱而被迫退守狮球岭，基隆随即失陷。6月4日，台北要冲狮球岭也为日军所占。

其时，在台刑部主事、全台营务处俞明震力劝唐景崧退守新竹，联合林朝栋、刘永福等部，以图再举。但唐景崧已无心抗战，竟携带库银由台北逃往淡水，按清廷“着即开缺，来京陛见”的电谕精神，于6月6日乘德轮返回厦门。日军不知虚实，不敢轻进，后经外国商人报信，才于7日派出80人的先遣队，占领了台北，接着大举入城，并于9日攻占淡水。驻守彰化的林朝栋等得知台北吃紧，连忙发兵增援，行至新竹，闻台北已失，便步唐景崧后尘，逃回了大陆。6月14日，以桦山资纪为头目的所谓“台湾总督府”进驻台北。

工厂、矿山和武器库比较集中的台湾北部地区为日军所占，给日后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抗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二、台湾中部之战

唐景崧等官绅内渡之后，台湾军民推举曾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奇勋的刘永福为统帅，指挥各路抗日义军。刘永福在爱国军民的拥戴下，决心誓死保卫台湾，表示“愿合众志成城，制梃胜敌”①。他以黑旗军为骨干，团结各路义军，肩负起抗击日军的神圣使命。

鉴于台北陷落，台中空虚，台南孤立，刘永福作了如下部署：以知州刘成良（刘永福之养子）及提督陈罗、游击李英、都司柯壬贵等分别率部防守旗后、大坪山炮台及四草湖、白沙墩、安平等台南海口，是为台南海口之防；以副将袁锡中率部防后山埤南等处，参将吴世添率部巡守台南府城，是为台南内地之防；各部勇营和各路义军则分别派员联络和统带，布防各地。

当时，台湾西北部的新竹、苗栗一带义军云集。生员吴汤兴在台北陷落前，就被唐景崧任命为义军统领，台北失守后，即在苗栗列营祭旗，号召“各庄各户，立率精壮子弟，须修枪炮戈矛，速来听点，约期剿办倭奴”②，随后率领义军奔赴新竹一带抗击日军南犯。此外，新竹生员徐骧、姜绍祖等也分别组织了民团和义军，在刘永福统一组织指挥下，开展抗击日军侵略的武装斗争。

6月中旬，日军分东西两路南侵：东路循山路经三角涌（今三峡西南）、大科嵌（今大溪）、龙潭坡，西路沿大道经桃仔园（今桃园）、中坜、大湖口（今湖口），合击新竹。东路敌军进入山海镇附近的竹林时，原淡水县吏胡嘉猷率义军死拒，由于众寡悬殊，被日军包围。当时，大科嵌人民正举义起兵，徐骧率领的民团也已赶到龙潭坡，军势甚锐，于是三角涌、三峡庄一带人民群起响应，对敌军进行反包围。日军樱井大佐等60余人被歼。台北日军

① 蔡尔康等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4，第59页。

② 《吴汤兴布告》，转引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后保卫台湾之战》，《东岳论丛》1984年第4期。

为探听东路日军被围情况而派出的 20 名骑兵，也被歼灭，仅一人逃脱。最后，东路日军残部逃向大湖口，与西路日军会合。

西路日军于 6 月 13 日进犯大湖口，遭到吴汤兴、姜绍祖所部义军的阻击，退回中坜。19 日，日军再次进犯，又遭吴汤兴部义军和徐骧民团的夹击。但义军饷械缺乏，不能久支，遂撤出大湖口。23 日，日军自大湖口攻新竹，义军为避开敌人主力，事先已主动撤出新竹城。

6 月 25 日，日舰两艘驶至台南安平海口，傍英、德两国军舰停泊。刘永福“亲登炮台，连放二炮，轰断倭船桅杆，倭兵落水者十余人”①，日舰随即狼狈逃离。此后，日舰又多次来袭，一方面侦探义军虚实，伺机发动进攻，另一方面牵制义军北上。但由于义军防守严密，日军均未能得逞。

7 月 9 日晚，义军分三路反攻新竹，由于反攻计划被汉奸侦知，以致日军预先于新竹四郊设下伏兵。攻西门的陈澄波部遭敌伏击败退。吴汤兴部攻南门不利，会合攻东门的傅德星部，与据城东二三里之十八尖山的敌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义军既无大炮，又缺子弹，因而十八尖山得而复失，终未能攻克。姜绍祖率部支援十八尖山战斗时，遭敌截击，不幸被俘，后自杀。义军反攻新竹失败后，退往苗栗以北的尖笔山部署防御。

日本大本营对台湾的抗日事态甚为吃惊。于是，决定除业已派出增援的混成第四旅团外，再增派第二师团的余部和第四师团所属的后备步兵 28 个中队。同时，命令臼炮队、工兵队、要塞炮兵队、宪兵队等也一齐出征台湾。“这些兵力超过了从平壤战役到海城进攻战时的第一军的兵力，用兵规模很大。”②

8 月 9 日，日军第二师团之混成第四旅团在基隆上陆完毕。8 月 12 日，近卫师团能久亲王即率所部日军自新竹南犯，分路进攻

---

① 吴质卿：《复日本国桦山氏书》注，《近代史资料》1962 年第 3 期，第 101 页。

② 〔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 177 页。

尖笔山。义军不支，撤出了尖笔山一线。这时，刘永福已派营务处吴彭年率黑旗军700人北上助战，未等赶到，苗栗已失。吴彭年会合徐骧等部义军退守大甲溪。

大甲溪是一道天然的屏障。8月22日，日军步、骑各一中队侵占大甲镇后，继续南犯。吴彭年率黑旗军埋伏于大甲溪南岸，乘敌刚过溪岸不备，发起猛攻，敌兵大败溃退。正当敌回逃半渡时，徐骧民军伏兵又大呼而出，堵截敌军。日军大乱，纷纷落水，死伤数十人。日军大败后，不久又增调兵力来攻。当时，吴彭年已率部回守彰化，大甲溪一带由黑旗军管带袁锦清部与徐骧所率民团共同防守。由于日寇收买汉奸从后面偷袭，义军被敌包围。袁锦清力战阵亡，徐骧率民团冲出重围，退往彰化，大甲溪一线遂落入敌手，台中亦旋即陷落。

大甲溪失守后，刘永福令各军在彰化境内择要扼守，并派守备王德标带亲兵七星营300余人前往增援。彰化城东的八卦山，形势险要，义军以重兵防守。8月27日，日军近卫师团主力自大肚分路进犯八卦山。28日，义军与敌人白刃相接，展开了日军侵台以来最大的一次肉搏战。义军伤亡惨重，吴汤兴和吴彭年先后英勇牺牲，仅徐骧率20余人突围南走，日军遂占领八卦山和彰化县城，并抢占了鹿港。29日，日军继续南犯，云林（斗六）、斗南、大莆林（今大林）相继失守。

彰化失守后，日军逼近嘉义，台南为之震动，加之饷械不济，守军士气低落。刘永福一方面令王德标率七星营守嘉义，令副将杨泗洪率兵5营赴前敌作战，另方面派人联络大莆林一带地方武装首领黄荣邦、林义成、简成功及其儿子简精华等投奔义军，于是军威复振。

8月30日夜，杨泗洪乘日军散居民家，警戒疏忽，率所部进攻大莆林，简精华、林义成等也率义民数千人助战。日军突遭袭击，仓皇逃窜。杨泗洪乘胜追击，中炮身亡。管带朱乃昌率所部继进，激战良久，日军大溃。朱乃昌挥军急进，与抄敌后路的黄荣邦、林义成等部民军前后夹击，杀敌数百，一举收复大莆林，但

朱乃昌也中炮身亡。之后，刘永福令都司萧三发统领前敌各营，令简成功总统民军。9月1日，义军收复云林县城，日军被迫退回彰化。黑旗军和民军反攻获胜，极大地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杀敌决心。

9月4日，义军和民军乘胜包围彰化城。但由于彰化地势险要，日军兵力集中，炮火猛烈，义军几次攻击均未能得手，只得就近择地屯驻。彰化日军也由于连遭打击，无力继续南侵，唯有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台湾军民抗战局势虽有好转，但台湾孤悬于海，守军饷械得不到补充。刘永福曾派文案吴质卿回到内地向各省督抚请求接济，由于清政府严令禁阻，均遭拒绝，致使抗日义军在兵力、物力、财力特别是武器弹药供应等方面遇到极大困难。

由于饷械不继，彰化围城义军首领萧三发与简精华等商议，认为“相持非久计，不如并力前进，夺回彰化，或可驻足”①。9月23日，义军发起总攻，敌军负隅顽抗。24日，黄荣邦率部进攻，中炮身亡。25日，林义成率部再次进攻也受重伤。其后，敌军大队反攻，萧三发指挥部队力战，受创甚重。徐骧、简精华率民军往援，敌军始退。此时，前敌诸军需饷更急，刘永福束手无策，万分忿懑地说：“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②

三、台湾南部之战

日本侵略军自南犯以来，受到抗日义军的节节阻击，付出了很大代价，进展迟缓，因而“求救甚急”③。9月中旬，日军向台湾大量增兵，使侵台总兵力累计达到八九万人。日军随即在台北组成“南进军司令部”，由率领增援部队来台的“台湾副总督”高

---

①②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106页。

③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六），第432页。

岛鞆之助中将任司令官，大岛久直少将任参谋长，由近卫师团和第二师团共约4万兵力分三路进攻台南：陆军中将能久亲王率领近卫师团（约1.5万人），自彰化经嘉义顺大路直指台南；陆军少将贞爱亲王率领第二师团之混成第四旅团（约1.2万余人），在嘉义西部布袋嘴登陆，向台南翼侧推进；陆军中将乃木希典率领第二师团之第三旅团（约1.2万余人），于台湾南部的枋寮港登陆，经凤山（今高雄县）北指台南。

台湾抗日义军忍饥受饿，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仍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抵抗。

10月初，自彰化出发的敌军大举南侵，各路抗日义军英勇阻击。战斗中，萧三发中弹阵亡，黄荣邦等受伤。敌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其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少将受了重伤，不久丧命。

10月7日，敌军开始进攻嘉义，被王德标部诱入城郊地雷区，半夜雷发，死伤数百人，能久亲王也受重伤，不久死去。次日，敌军集中巨炮猛攻嘉义城，协同王德标防守该城的民军领袖徐骧亲上城楼持刀指挥作战，大量杀伤敌军。但义军也伤亡甚众。午后，敌人冲进城内，经过激烈巷战，嘉义县城失守，王德标、徐骧等率队退守曾文溪。不久，日军进逼曾文溪，炮火齐发，马步并进。义军既无炮队、马队，又乏粮饷，但士气激昂。徐骧奋勇当前，王德标等率队跟进，在炮火连天中驱杀敌人。徐骧、王德标等先后英勇牺牲，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0月8日，日侵台南进军司令官高岛鞆之助乘“东京丸”到达澎湖，与已经抵达该地的第二师团会合。10日和11日，其混成第四旅团和第三旅团分别在布袋嘴和枋寮开始登陆。15日，日舰“吉野”、“秋津洲”、“浪速”、“八重山”、“大和”等炮轰旗后炮台，守将刘成良亲自登台拒守。“奸民夜引倭由僻径登岸，突入大营陷之，进围炮台”①。守台将士喋血奋战，死伤枕藉，不得已乘间突围，退守台南。16日，由枋寮登陆北进的日第三旅团占领凤山，台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一），第107页。

南处于日军南北夹击的危险境地。

10月18日，南北敌军兵临台南城下。城中粮食断绝，守军开始溃散。早在8月23日，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曾托英国领事持书劝刘永福投降。刘永福严词拒绝和驳斥，表示“义当与台湾共存亡”。但时至10月中旬，刘永福面对嘉义等地相继失守，抗日义军领袖陆续牺牲，军粮弹药已告断绝，“台南已成孤注”① 的困难局面，抗战决心开始动摇，于是，向日方提出了厚待百姓、准许官兵内渡的“建议”，遭到日方拒绝。10月19日晚，刘永福在形势十分危急情况下，违背其“万死不辞”的誓言，离开正在与日军殊死搏斗的抗日军民，与其僚属10人从安平乘英国商轮“爹利士”号返回厦门。

10月21日，敌军进入台南城。11月18日，日军在占领台湾重要城镇之后，宣告“全台平定”。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与侵台日军“不共戴天”的誓言下，坚持了长达7年之久的游击战。

台湾爱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继续，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次抗战由于清朝政府的卖国政策，最后归于失败，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辉篇章，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台湾抗战证明，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在整个抗战的过程中，台湾人民参加之踊跃，动员之广泛，斗争之英勇，战果之显著，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虽然武器简陋，缺乏训练，但有着宁死不屈的决心。“日军被困于‘有全台皆兵之势’的猛烈的游击活动和疟疾之中，投入了五万兵力、两万六千名杂役人员以及联合舰队的大部分，对居民进行了无区别的屠杀，结果反而加剧了居民的反抗”，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付出了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以下四千八百名死亡和两万七千名负

① 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六），第346页。

伤的巨大代价”。① 台湾军民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悲壮诗篇。

---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日文版第 189 页。

第十九章　李鸿章、左宗棠的“自强”、“御侮”思想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师夷长技”为核心的“自强”活动，是洋务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林则徐、魏源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战略思想的具体实施和进一步发展。这一活动，对中国国防建设的近代化和进行反侵略战争，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消极的影响和失败的教训。李鸿章不仅自始至终参与这一活动，而且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左宗棠虽然参与这一活动的时间较短，但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并具有不同于李鸿章的特色。据此，本章着重探讨李鸿章、左宗棠的“自强”、“御侮”思想，对其他有关人员的思想活动仅在有关部分附带提及，不作专门论述。

第一节　李鸿章的“自强”、“御侮”思想

李鸿章系晚清军政重臣，其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本节主要叙述他从1862年（同治元年）指挥淮军镇压太平军至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反对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期间与“自强”、“御侮”活动有关的问题及其指导思想。

一、关于练兵制器、自强御侮的指导思想

（一）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力图自强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积极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

求“自强”，强调“百年之计在于自强，固未可忽而不讲”①。他主张自强的目的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1862 年 4 月，当新建的淮军由安庆搭轮驶往上海，尚未全部到达之际，驻上海租界的英国侵略军头目便迫不及待地要淮军“协剿”嘉定太平军。李鸿章以“新军路径生疏，须令探熟再进”为由，予以拒绝。他致函两江总督曾国藩说：“鸿章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鸿章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处，专剿一路，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掺杂”。② 显然，他当时所说的“自强”，只是在执行清廷“借师助剿”方针过程中，不愿受洋人操纵而已。

李鸿章抵沪后，随着对西方列强侵略本质的了解不断加深，逐渐确立了抵御外侮的思想。1863 年 4 月，他在《复罗椒生尚书》中指出：“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目前小有裨益。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痛改数百年营伍陋习。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③。同年 11 月，在《复徐寿蘅侍郎》中明确指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④。这表明他主张自强之目的，眼前为了镇压太平军，长远则是为了抵御外侮。

1864 年 7 月，湘军攻占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国内矛盾暂趋缓和。李鸿章于同年 10 月在致以通洋务、敢直言而名重京师的御史陈廷经的信中指出：“粤逆流毒几遍天下，幸赖宗社之福，群帅之力，渐次芟除。兹余氛逸入楚粤边界，有健将数人，劲兵数万，当足了之。惟鸿章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

---

① 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6，第 36 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第 15 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3，第 12～13 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4，第 17 页。

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又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可恃。”①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李鸿章主张自强的目的，此时已转变为“御外侮”为主了。他所提出的“变易兵制，讲求军实”的方针及具体措施，除绿营军制由于清廷“狃于祖宗之成法”，未能彻底变革外，其它如“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和制造巨炮兵船等，均逐一得以实施，并循着上述方针，将中国的国防建设逐渐推进到近代化阶段。

诚然，李鸿章“自强”、“御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强化千疮百孔的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而且认为只需在封建专制的躯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就能达到自强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鸿章有此认识，并响亮地提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长，夺其所恃”② 的主张，仍不失为具有开拓思想和爱国激情的表现。那些把学习西方“长技”视为“用夷变夏”，竭力鼓吹“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顽固派，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在 1870 年指出：“中国不亟图强兵经武，徒纷纷遇事张皇，事后苟且粉饰，必至失国而后已，可为寒心。”③此语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切中时弊的忧国

---

① 李鸿章：《复陈筱舫侍御》，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5，第 34 页。

②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9，第 45 页。

③ 李鸿章：《复杨礼南学士》，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第 25 页。

之论。

（二）军实以简器为先，置利器应讲求操法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主持总理衙门的奕䜣等即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① 次年，便在驻京八旗中抽选120人赴天津，聘请英国教习，专习洋枪洋炮与步法阵法。奕䜣的建议及八旗兵的操练洋枪洋炮，对于改变清军落后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起了倡导和催化作用。而大张旗鼓地装备洋枪洋炮和改用西式训练，淮军实居其首。

李鸿章率淮军抵沪后，遵循曾国藩"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决定"以湘淮纪律参用西洋火器"，建设淮军。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数万淮军基本上用洋枪洋炮代替了刀矛和鸟枪、抬枪，营下各哨设洋枪队和劈山炮队，并成立了新的兵种炮营，使部队的装备大为改观。正如王闿运所说："淮军本仿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② 李鸿章之所以决定淮军换用西式装备，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他亲眼见到了英法侵略军和雇佣军"洋枪队"的武器装备，确实比中国军队的土枪土炮精利，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二是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太平军，因为在苏南的太平军中，已先于淮军装备了洋枪。同时，也是为了将来能有效地抵御外侮。他说："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③

武器装备发生变化，训练方法亦应随之变化。李鸿章在淮军换装过程中，就对此有所认识。他说："洋枪实为利器，和、张营

---

① 奕䜣：《奏请八旗劲旅训练枪炮片》，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270页。

② 王闿运：《湘军志》第159页。

③ 李鸿章：《上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第16～17页。

中（注：即清军江南大营中）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① 他意识到淮军换装以后，必须雇请西人充当教习，改习洋操，但又担心洋人借此操纵兵权，所以迟至 1863 年 3 月，才下令由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同时规定所雇洋将只负责训练，“中国军令不容外人把持”。当时，除了在淮军中雇用洋人充当教习外，还应洋人的要求，从原江苏巡抚薛焕的旧部中拨出 1000 人，从当地练勇中拨出 600 人，分别交给英国和法国军官进行训练。同时，派记名总兵郑海鳌兼统以上各部。

李鸿章本着“军实以简器为先”的指导思想，始终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淮军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换装时，均为前装枪炮。迨至 70 年代，李鸿章发现“西洋火器愈出愈精”，许多西方国家的军队均已改用后装枪炮，便立即购买士乃得、林明敦、温切斯特、哈齐开斯、毛瑟等后装枪 2 万余枝装备淮军，并采用德国的编制、装备，组建克虏伯炮营 19 个，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完成了第二次换装。此后，仍不断从国外购买和由机器局仿制先进枪炮，并进行必要的储备。他认为：“与洋人争衡，尤以购备西洋精利军器为第一要著。”“军无利器，实不足以御强敌。”② 与此同时，他本着“多置利器，更要讲求操法”③ 的指导思想，在淮军中继续雇请少数洋人充当教习，进行技术战术训练。至于由绿营改编的直隶练军，则从淮军中挑选技艺娴熟的军官充当教习，以便既有裨于训练，又能节省经费。

李鸿章还主张“与其多增无益之军，不如多置有用之器”④。这可以说抓住了使落后的清军迈向近代化的主要环节。但是，他过

---

① 李鸿章：《复曾沅帅》，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2，第 26 页。

② 李鸿章：《拟请收捐购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1，第 14 页。

③④ 李鸿章：《论购新式火器》，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5，第 24 页。

分夸大了武器装备的作用，如说西方制造的后膛枪炮，“其速率之猛，准头之远，几于无坚不摧”①，“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② 等等。正因为如此，他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面对武器装备居于优势的外国侵略军，便产生了畏敌怯战情绪。例如在甲午战争中，他就散布“倭兵全用西洋新式枪炮，精锐无前，非有利器，断难制胜”③ 的悲观论调。

（三）觅制器之器，以为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李鸿章“觅制器之器”，建立近代军事工业的思想，萌芽于淮军装备洋枪洋炮之后。他于 1864 年 9 月奏称：“臣军先后购觅西洋炸炮，每月操练攻剿，需用炸弹甚多，不能不添设制造局，分济应用。”④

李鸿章深知，引进西方机器，建立近代军工企业，必然会引起拘泥“祖宗成法”的顽固派的反对。于是，他于 1864 年 5 月致函以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阐述了引进外国“制器之器”和培养“制器之人”的必要性。他的主张得到了奕䜣的支持。在获得清廷赞许之后，李鸿章便与曾国藩于 1865 年筹建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70 年又接管了天津机器局。以上三局，加上左宗棠于 1866 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干。在此期间，他继续阐述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与自强的关系。江南制造总局建立之初，为了镇压太平军，他指令该局学制“最利陆军攻剿”的洋枪、炸炮，而在 1865 年 9 月的奏折中则称：“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

---

① 李鸿章：《借款购备枪炮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49，第 4 页。

② 李鸿章：《上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3，第 19 页。

③ 李鸿章：《筹款购备新械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78，第 56 页。

④ 李鸿章：《京营弁兵到苏学制外洋火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7，第 17 页。

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① 由此可见，李鸿章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具有“靖内患”与“御外侮”双重目的，而御外侮的思想，早在1863年就已形成。当时，两江总督曾国藩派遣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容闳（字醇甫）赴美购买“制器之器”，让李鸿章拨款万两，“交令速往”。李复信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② 所谓“海疆自强”，无疑是为了抵御外侮。

李鸿章创办军工企业，虽未见到他明确表述关于生产武器的总体构想，但从其奏稿和函稿中，可以看出如下具体方针、原则。

“穷年积岁，取精用宏”，跟踪仿制外国先进的枪炮。江南制造总局初期仿制林明敦、马梯尼、士乃得步枪和前膛炸炮，当李鸿章发现步枪以奥国的曼利夏、德国的新毛瑟为“最后出而最精”，火炮以英国40磅炮子的阿姆斯特朗快炮“为各国所推重”以后，便命该局悉心仿制。他发现水雷为“江河防险秘器”，便命天津机器局设法仿制，并于该局设水雷学堂，从事水雷的研制和敷设训练。在火药方面，他令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研制栗色火药和无烟火药，追赶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诚然，由于自身缺乏独立设计能力和技术条件不足，新仿制的产品远逊西洋产品，但是，这种不甘落后、努力追赶先进的精神还是应当肯定的。

制造武器的原材料和机器，力求改变依赖进口的状况。李鸿章鉴于制造枪炮的钢材购自外洋，价值既昂，运费又贵，因而同意由江南制造总局“添购机器，增置厂屋，就中产之煤铁，炼西式之钢料”，并称此举“实为自强根本至计”。③ 另外，在天津机器局制成能够自造电线、电机、电引的机器。据称，自制的康邦汽

①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34～35页。

② 李鸿章：《复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4，第29页。

③ 李鸿章：《上海机器局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7，第2页。

机，“所省煤斤甚巨”。尽管这方面的成效并不显著，但毕竟体现了自力更生的思想。

不以仿制外国的枪炮战船为满足，还应掌握其制造的原理。为此，李鸿章在江南制造总局开设翻译馆，用洋人与华人相结合的办法，翻译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开矿等西洋书籍。这一措施，不仅有利于“学其制造之本原”，而且在传播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所聘洋员只负责技术工作，不能让其把持局务。李鸿章在《筹议天津机器局片》中说：“查有湖北补用道沈保靖，前经臣委令督办上海机器局，事事皆赖其创制，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①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尽快培养出自己的科技人才。他在同一奏片中说：“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则器必无成。”“窃谓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瞻军。”②他还希望内地员匠也能学其器而精其意，久而自能运用，转相传习，而不仰赖洋人。

枪炮继续向国外购买，弹药必须自己制造。李鸿章鉴于制造局仿制外国枪炮，不仅在技术性能方面难于在短期赶上外国，产品数量也远满足不了装备部队的需要，因而主张在仿制的同时，继续向西方国家购买。但是，他强调弹药为“军火大宗”，必须自己制造，“断无仰给外国人之理”。他在1878年7月的奏折中称：“惟子弹一项，实枪炮之命脉，无子弹则枪炮虚设。后门子弹工繁费巨，遇有战事，十年之蓄，尚恐不敷数月之需。现查津沪两机器局所制子弹，数非不多，而以之应操则有余，以之备战则尚少，亟应及时设法添制，以防未然。”③ 为此，决定扩大天津机器局生

---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第16～17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第16页。

③ 李鸿章：《军火画一办法并报销口令事宜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2，第7页。

产火药和枪弹炮弹的规模，以适应训练和战备的需要。李鸿章从国内生产力低的情况出发，实行上述方针，本无可厚非，但他对进口武器不但没有听取应注意统一规格的正确意见，反而认为“各省军械似乎难过求一律”，这就使清军的武器装备规格不一，种类繁多，给弹药的生产和供应造成很大困难。

（四）先富而后能强，富强方能居中御外

李鸿章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意识到，“中国之弱在于贫”。当他创办以“求强”为目标的军工企业以后，进一步认识到“强与富相因”，“必先富而后能自强”。他在1876年给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信中指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富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① 这表明他已确立了军事必须以经济为基础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倡办了一批民用工交企业，同时阐明了民用企业对于利国、利军、利民和与外人“争利权”方面所起的作用。

随着军工企业的建立，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原材料供应问题。李鸿章在1872年就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夥，中土所产多不合用……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② 于是，他决定购买西洋机器，创办近代采炼企业。他认为开发矿藏，可以解决以下问题：一是直接为军事服务。他在《直境开办矿务折》中称：光绪三年招商购器，办开平矿局，用机器挖煤，“从此中国兵商轮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

---

① 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25页。

②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9页。

为嘴矣。”① 二是开发财源，富国强兵。他说：“近来西人屡以内地煤铁为请，谓中土自有之利而不能自取，深为叹惜。”“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② 三是可以兴利实边。他认为创办黑龙江边境的漠河金矿，能起“商贾骈集，屯牧并兴”，“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植百年根本之谋”的作用。③ 所有这些，都具体地反映了他的“富与强相因”和“寓强于富”的思想。

李鸿章在购买“制器之器”，创办军工企业时就指出：“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④ 1890 年他创办机器织布局，就是上述思想的实践和发展。他在《试办织布局折》中指出：“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⑤ 他办织布局的目的，在于抵制洋布向中国倾销，减少银钱“耗入外洋”和“稍分洋商之利”。他提出“尤必富在民生”，是其“寓强于富”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李鸿章认为，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不仅于“富国”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强兵”的必要手段。他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

---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40，第 42 页。

②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9，第 50 页。

③ 李鸿章：《漠河金厂章程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61，第 47 页。

④ 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9，第 34 页。

⑤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43，第 44 页。

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① 基于以上认识，他积极创办轮船招商局和电报、铁路等业。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奏办的第一个交通运输企业。1872 年，他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非但反对停止制造兵轮船，而且倡议兼造商轮船，“以资华商领雇”。同年底，他主持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鉴于“商务兴废，关系国计强弱”，故对该局实行“官为维持”的方针，在财政、税收、漕运等方面予以支持，使其在与外商竞争中，非但没有被挤垮，而且逐渐有所发展，基本上起到了“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② 的作用。

电报局是李鸿章倡办并取得较大成绩的通信企业。他认为“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于 1879 年首先在大沽、北塘海口间架设电线，以通天津，结果“号令各营，顷刻响应”。1880 年完成津沪陆线，使“南北洋消息往来，瞬息互答，实于军务、洋务大有裨助”。③ 此后，又设沿江沿海各省电报，从而使“筹商军国要事、调兵催饷，均得一气灵通”，既利于海防，又便商民贸易转运之用。他还指出，在沿海沿边和全国各省设置电报，不仅“于洋务海防实有裨助”，而且能“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④ 实践使他不断加深了对使用近代通信工具重要性的认识。

李鸿章在修筑铁路方面，遇到的阻力最大。唯其如此，他在奏陈建设铁路的必要性方面，也就显得议论周详，淋漓尽致。他认为铁路为中国富强之根基，御侮之要图。他指出：“中国土壤之

---

① 李鸿章：《请设南北洋电报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8，第 16 页。

② 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5，第 4 页。

③ 李鸿章：《创办电线报销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44，第 23 页。

④ 李鸿章：《商局接办电线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45，第 32～33 页。

博，物产之丰，人才之盛，十倍于西洋各国，而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船兵器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夫中国有可富可强之资，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亦必富强而后可以居中驭外，建久远不拔之基。”① 又说：倘中国海多铁舰，陆有铁路，这便是“真实声威”，外人也就不敢轻易称兵恫吓。他还详尽论述了铁路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指出：“从来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② 他对铁路为“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等方面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也作了具体阐述，并强调指出，无论是建设边防海防，还是开拓商务，都应以“兴修铁路为根基”。由于阻力重重，李鸿章只修筑了开平煤矿至天津、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难能可贵的是，他关于修筑铁路与富国强兵关系的论述，超出了当时所有士大夫的认识水平。

李鸿章创办的军用民用企业，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对于刺激和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他在倡办近代企业过程中，处处受到拘守“祖宗成法”的顽固派的掣肘，因而颇为感叹地指出：“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成法，恐

---

① 李鸿章：《复醇邸论铁路》，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2，第2～3页。

② 李鸿章：《妥议铁路事宜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21页。

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①这表明他已意识到要求强、求富，首先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来一个破旧立新的转变。但是，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由于李鸿章自己始终被中国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大潮中，对于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一味“弥缝补苴”，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重视研究西方“政治之本原”，“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② 所以自强的理想终难实现。

二、关于加强海防建设的指导思想

加强海防建设，抵御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是洋务派自强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李鸿章为此花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有明显的失误。

（一）建设方针由以陆为主发展为以海为主

李鸿章于1870年任直隶总督后，便着手筹建津沽海防。1875年又奉命督办北洋三省海防，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为止。在此期间，他的海防建设方针经历了以陆为主到以海为主的发展变化。

李鸿章筹办海防伊始，即确立了以陆为主的方针。1870年8月，他在给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信中指出：“大沽海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处，应驻重兵。长江以炮台为经，轮船为纬，无逾尊议之善。……海外我与彼族共之，缓图可也。”③ 他正是本着上述方针，加强津沽海口的设防。其一，仿照洋式，改建大沽、北塘海口炮台，添置西洋新式火炮，并于主炮台周围增筑小炮台，形成炮垒群。其

---

① 李鸿章：《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28页。

② 梁启超：《李鸿章书后》，一新书局1902年版，第3页。

③ 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2页。

二，在大沽之后30余里的新城修筑台垒，驻屯重兵，“扼由津赴京水路”，与大沽、北塘炮台相互援应。其三，于海口设水雷、蚊船，与岸上的炮台相依护。其四，前沿部队区分为固守炮台与支援掩护两部分，另于后路屯扎重兵，以为游击援应之师。上述设防部署，较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设防无疑有了明显的改善。

李鸿章积极宣传他的以陆为主的海防建设指导方针。在给两江总督李宗羲的信中说：“水路主守，陆路主战，两语实为中国御侮救急良法。然水路何以守？曰扼险炮台、守口炮划、拦路水雷而已。”① 在给江苏巡抚张树声的信中说：“洋人最长水战，海上备预，除铁炮船、水雷可量力筹办外，仍以练陆军、筑炮台为根本。”②

1874年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更系统地阐发了以陆为主的设防方针。他进一步强调：“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③ 他除主张在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和江苏之吴淞至江阴一带进行重点设防外，还提出了两种防守方法：一是“守定不动之法”，要求口内炮台壁垒能抵御敌船之炮弹，炮台之大炮能击破敌之铁甲船，守口的巨炮铁船能阻遏水路。二是“挪移泛应之法”，要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从沿海登陆。他据此指出：“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④ 由此可见，尽管李鸿章当时基本同意丁日

---

① 李鸿章：《复李雨亭制军》，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3，第14页。

② 李鸿章：《复张振轩中丞》，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第25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3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7页。

昌提出的组建三洋海军的主张，但仅仅把它作为辅助陆上防御之用而已。这表明他对海军的特点和作用还缺乏认识，因而其海防指导思想不可避免地偏于保守。

另外，李鸿章在这次海防大讨论中，反对出兵收复新疆失地，主张“暂弃关外”，专顾海防，也是一种偏颇之见。然而，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所说的如下一段话却相当精辟。他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 他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外国侵略者主要来自海上，而且往往是互相构煽，“协以谋我”。二是作战对象已不像过去那样强弱相当，而是拥有先进武器、明显强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因此，国家的主要战略防御方向应从内陆边境转向万里海疆，且不能“以成法制之”，而必须讲求新法，力图自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变局”和对付“强敌”，否则，“战守皆不足恃”。这种针对国际形势变化所进行的战略分析，实际上成了嗣后加强海防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巨大动力，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后，军事上师承曾国藩务求“稳慎”的李鸿章，在海防建设方针方面经历了一个犹豫徘徊时期。他一方面认为如能添购铁甲船两艘，“纵不足以敌西洋，当可与日本决胜海上”；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海洋万里，仅有一两艘铁甲舰，难于往返扼剿，又不能进入海口之内，如“先为敌人所攫，转贻笑于天下”，故“每悬想海上战事，辄用危心”。② 他的海防建设方针由以

---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第 11 页。

② 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7，第 31 页。

陆为主转变为以海为主，则是在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以后。他在给驻英公使李凤苞的信中指出：日本既吞灭琉球，恐其坐恃强大，渐有窥伺台湾、朝鲜之意，“中国须亟购铁甲数船，伐谋制敌”。是年底，根据留学回国的刘步蟾、林泰曾的建议和他自己的认识，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明确指出：“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① 这无疑是李鸿章的海防思想转向以海为主的重要标志。

1880～1885年，李鸿章继续阐述他的以海为主的设防思想，其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建设海军可以“制驭日本”，“建威销萌”。他认为日本依仗其铁甲战舰，侵台湾，占琉球，“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为了“制驭日本”，中国亦应购置铁舰，建立海军。同时，有了海军，还可“渐弭各国轻侮之心”，以为“建威销萌之策”。二是可以水陆相依，相机作战。他认为“北洋果有铁舰四只，辅以快船水雷艇十余只，以大连湾、旅顺口等要隘为驻扼之所，相机出入拦截，敌船必多狼顾，不敢径入辽海，此上策也”②。三是可以拓展防御纵深。他说：“此项水师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布势之远，奚啻十倍陆军。”③ 四是实行以战为防。他认为，烟台与旅顺间相距240余里，其中岛屿星罗棋布，敌船处处皆可闯入，须有大支水师，方可阻遏敌船。具体办法是：“以战为防”，“以铁舰御敌之铁舰，以快船御敌之快船，再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5，第28页。

② 李鸿章：《复张幼樵侍讲》，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29页。

③ 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34页。

以鱼雷艇数十艘，密布各岛，伺便狙击，方可制胜”。①

综观李鸿章这一时期的海防建设思想，尽管只含糊地谈到有了铁甲舰，“庶不致弃洋面于域外”②，对于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而且不切实际地认为，有了大支水军便可“潜消”侵略者觊觎中国之心。但其以海为主的海防方针的确立和“以战为防”的战略防御思想的提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二）组建海军以购船为主

组建海军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以购船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李鸿章明显地倾向于以购船为主，但也不反对自造。1863 年，用银子买回的“阿思本舰队”成为画饼，其后，曾国藩令江南制造总局试造轮船，左宗棠则创办福州船政局专造轮船。李鸿章认为轮船“体大物博”，中国的财力和技术力量不但远逊西洋，而且赶不上日本，所以对造船“未敢附和”。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时，他公开提出：“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③所以，北洋海军的主要舰艇，绝大多数购自英、德两国。但是，李鸿章并不反对自造舰只。1871 年，内阁学士宋晋认为“制造轮船糜费太重”，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停造船时，他曾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一起，反对宋晋的意见。他指出：“左宗棠创造闽省轮船，曾国藩饬造沪局轮船，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惟以有开必先不敢惜目前之费，以贻日后之悔。”④他在给闽浙总督何璟的信中称：“现造兵船，虽未能即云御

---

① 李鸿章：《复陈海岸不能遏敌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2，第 30 页。

② 李鸿章：《议造铁舰并留戈登》，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1，第 13 页。

③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第 17 页。

④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9，第 45 页。

侮，而规模已具，门径已开，数十百年，中国御侮必兼赖之。"[①]1890年，由闽厂制造的双机铁甲兵船"平远"号编入北洋海军序列时，李鸿章在《查验平远兵船折》中，一方面指出该舰吃水过深，行驶稍缓，比不上从外国购买之舰，另方面又肯定闽厂试造铁甲兵船，"有此规模，已属难得"，如果"遽绳以万全无弊"，则"人才何由振兴，制造何由精进"。由此可见，李鸿章从急于成军出发，主张购船，但从长远利益考虑，则支持造船。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这样做似乎无可指责。

李鸿章在组建北洋海军过程中，除了受经费不足的困扰外，还明显地受到他的海防建设方针的影响。在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时，他除同意丁日昌三洋兵船共需48艘外，还建议三洋各购铁甲大船两艘，以便"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后因铁甲船耗费太巨，一些王公大臣反对购买，加上当时他的海防建设方针还停留在以陆为主的阶段，所以自1875年至1879年委托总税务司赫德从英国购买的主要是供守口之用的小型炮艇。1879年，他的海防建设方针转向以海为主后，便在是年冬向英国订购"超勇"、"扬威"号巡洋舰。1880年在德国订购能"在大洋御敌交锋"的"定远"、"镇远"号铁甲舰和"济远"号巡洋舰。另外，他发现委托赫德所购之船质量低劣，便派遣专员和生徒到外国船厂边学习造船技艺，边检查督造，以收一举两得之效。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于1885年6月决定"以大治水师为主"，并重申先就北洋尽快成军。李鸿章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又先后订购"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巡洋舰和6艘鱼雷艇。1888年9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同时颁布了系统反映西方组织编制的《北洋水师章程》。由于李鸿章在购舰过程中提出了"各国铁舰之式日新月异，与其价廉而得已旧之船，临事难操全胜，

① 李鸿章：《复何筱宋制军》，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15页。

不若价昂而求最新之式”① 的购船方针，同时派专人督造，因而这些舰船的质量，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此后，于 1890 年、1891 年先后建成“出可截剿敌船，退可扼险自守”的旅顺、威海卫海军基地，并构成了控扼渤海门户的“锁钥”。至此，就北洋而言，已形成部署较周密、配套较完善的近代设防体系，成为中国海防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应当指出，李鸿章虽于 1879 年确立了以海为主的海防建设方针，提出了“以战为防，不能以守为防”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认识到近代海军是机动性大、突击力强的一个军种，在实行战略防御即使是近海防御时，应以战役、战斗的进攻战为主，力争挫败敌方舰队，控制局部海区的制海权，才能充分发挥海军的作用，掌握战争主动权；加上他把海军视为个人的政治资本，害怕舰艇受到损失，因而北洋海军成军以后，其“以战为守”的战略防御思想非但没有坚持和发展，反而倒退为“以守为防”的消极防御了。1891 年他第一次检阅海军以后，便提出：“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②。进而又提出：“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③。这既反映了他的近海防御的思想，更反映了他企图将北洋海军限制在渤海门户进行守势作战的思想。

李鸿章在保守、自满思想支配下，已不像以前那样千方百计地争取经费，购买战舰，相反，为了取悦于慈禧，竟挪用巨额海军经费去修颐和园。由于北洋海军建设处于停滞状态，以致原来先进的军舰逐渐变得落后了。直至 1894 年 5 月，李鸿章在第二次

---

①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见《洋务运动》(二)，第 510 页。

② 李鸿章：《巡阅海军竣事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72，第 4 页。

③ 李鸿章：《复奏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72，第 37 页。

《巡阅海防折中》才提出：日本岁添巨舰，而中国自北洋海军成军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战船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接着奏请购买速射炮21门，改装“定远”、“镇远”等军舰，结果因经费支绌而未能实现。7月16日又致电驻英公使，议购新式大快船，而这时离丰岛海战只有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却以超过北洋舰队为目标，大大加快了发展海军的速度。从1889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共添置了配有100余门速射炮、速率较高的新式战舰12艘，不仅总吨位超过了北洋海军，而且舰炮火力也大大加强了。种种事例证明，战略防御思想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海军建设的发展还是停滞。

（三）加强海防，首在育才

李鸿章把培育人才视为自强、御侮的一项根本措施，积极倡导，躬行实践。1863年，他仿奕䜣办北京同文馆之例，在上海设立外国语文馆，培养外语人才，充当沿海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的译员，并翻译西方的测算、格致、制器等书籍，以裨助“中国自强之道”。负责筹办北洋海防以后，他便响亮地提出：“海防根本，首在育才”①。他在培育海防人才方面，除继续“借材异域”，雇募洋员充当教习外，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建议变通科举制度。李鸿章认为靠八股取士，不可能造就能办实事的有用之才。所以，他于1864年致函总署，指出：中国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另设一科取士”。1874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他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人才。同时建议凡海防省份均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如有成效，授以实缺，使其“与

① 李鸿章：《议复朱一新条陈》，见《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1，第29页。

正途出身无异”。① 由于“学制”与“官制”关系密切，因此李鸿章的建议当即受到“习为章句帖括”的士大夫和极端守旧势力的斥责，朝廷也因害怕不利于大清“社稷”而未予采纳。

选送学生赴美欧学习。李鸿章等考虑到，欲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应该派人出国学习。因为，“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②。据此，他与曾国藩于1871年联衔上疏清廷，建议选派聪颖幼童120名，分4批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以培人才而图自强”。尽管这批学生未经毕业即被清廷于1881年撤回，但仍然在制造局、船政局、电报局以及鱼雷、水雷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开了中国近代选派出国留学生的先河。此后，李鸿章发现，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国所能及，而“德国陆军枪炮操法，最为擅长，近来水师铁甲兵船亦日新月异，与英相埒”③，乃于1876年派游击卞长胜等人赴德国军校学习水陆军营各种技艺。其后，为适应福州船政局造船和组建海军的需要，李鸿章等把选派留学生的重点逐渐转向学习轮船制造和驾驶技术方面。1877年初，他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指出：“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叠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如驾驶之法，近日华

---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23～24页。

② 李鸿章：《论幼童出洋肄业》，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第19～20页。

③ 李鸿章：《议派弁赴德学习》，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4，第39页。

员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①是年，经清廷批准，由福州船政学堂派出学生26名、艺徒4名，分赴英、法学习轮船制造和驾驶。要求在3年之内，学制造者，对"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学驾驶者，"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甲船于大洋操战"。此后，又于1881年和1886年续派两批学生赴英法学习，前后共79人。这些学生回国后，大多成为战舰设计制造的骨干和舰艇的主要指挥员。除派遣留学生外，李鸿章还采取选派管驾、掌轮机、操舵等人员，随同丁汝昌、邓世昌等前往英、德等国接运所订购的舰船，在大洋巨浪中"随船历练"，熟悉风涛沙线，学习"驾驶要诀"，待船接回后，即可"驾轻就熟"，少雇洋员。

创办学堂。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初期，所有舰船上的管带、轮机长、炮长等人员，大部为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这使他认识到，海军人才的"作养造就之法，以练船为基址，尤必以学堂为根源"②。于是，除继续派遣留学生外，又于1880年创办天津水师学堂，作为培养北洋海军人才的摇篮。他在1884年给清廷的奏折中指出："伏思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材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材之所自出。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③ 天津水师学堂的创建，确实开了风气之先。至甲午战争前，又先后创办了威海水师学堂、大沽水雷学堂、旅顺鱼雷驾驶学堂、管轮学堂、水雷学堂、威海枪炮学堂、山海关武备公所以及天津总医院附设西医院等，使海防人才必须出自学堂

---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8，第20～21页。

② 李鸿章：《吴仲翔办理学堂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第47页。

③ 李鸿章：《水师学堂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2，第8页。

的指导思想得以逐步实现。

无论是派遣留学生，还是自己培养学生，李鸿章都贯彻“中体西用”的方针。如规定留美学生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时，仍“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①。在自己办的学堂中，则“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瀹其灵明，即以培其根本”②。由此可见，李鸿章所主张的“变法”，主要是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落后的育才制度，至于封建伦理纲常，则是绝对不能越轨的。正因为如此，当请廷见驻美公使陈兰彬等关于留美学生“言行举止受美人同化而渐改其故态”的奏辞，决定将留学生提前调回国内时，李鸿章虽作了某些抵制，但也感到“无从捉摸”而予以同意。

（四）海防大权不容洋人染指

为弥补中国技术水平落后和技术人才贫乏，李鸿章重视“借材异域”，雇请具有不同技能的洋员，帮助筹建海防。同时，他又抵制了洋员的窃权企图，捍卫了海防的自主权。

1879 年，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署呈递《试办海防章程》，提出由他总司南北洋海防，由南北洋各派监司大员，与他所选洋将会同督操。总署对这种明显的篡权行为竟认为“意在必行”，函商南北洋大臣沈葆桢和李鸿章。沈葆桢“以中外人员共事不易，且以赫德揽权为虑”，表示反对。李鸿章开始倾向于同意总署的意见，认为“兹急求制胜，派西人为总海防司等名目，举船以听其所为，亦系不得已之办法”，同时又指出：“诚如尊谕，不免揽权。”③ 李鸿

---

① 李鸿章：《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19，第 9 页。

② 李鸿章：《水师学堂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2，第 7 页。

③ 李鸿章：《议赫德海防条陈》，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9，第 38 页。

章的表态遭到幕吏薛福成的反对。他上书李鸿章，陈述了“赫德不宜总司海防”的理由，并提出了巧妙的处理办法：“若谓总理衙门已与定议，不能中止，宜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遥制，须令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其总税司一职，则别举人代之。赫德贪恋利权，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则其议不罢亦罢矣。”① 李鸿章踌躇旬日，终于摘举薛书中的要语函达总署。总署见两洋大臣均持反对态度，便“以专司练兵开去总税司一缺之说告赫德”。结果，正如薛福成所料，赫德宁愿放弃总海防司的要职，而不愿丢掉总税务司的肥缺，中国的海防大权也就没有旁落。

赫德的篡权图谋被挫败后，1890 年又发生英国军官、北洋海军总教习琅威理的窃权事件。是年，北洋海军驶抵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总兵刘步蟾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琅威理提出：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何撤提督旗？刘步蟾答以“水师惯例如此”。琅威理不服，发电请示李鸿章。李回电称：“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② 琅威理愤而辞职，英国政府出面要挟。驻英公使薛福成来电询问内情，李回电称：“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③ 就这样，李鸿章又一次挫败了英国的篡权图谋。

其实，李鸿章早在 1862 年率淮军抵上海，与英法侵略军和洋枪队共同镇压太平军时，就已注意到军队不能听从洋人指挥。当清廷用银两购买“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他在给总署薛焕的信中指出：“李泰国为人本不平正……此项兵船若令李泰国一人专主，要求胁制，后患方长。”④ 由上可见，李鸿章在反对洋人篡权

① 薛福成：《上李相伯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见《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6 页。

② 李鸿章：《香港交水师总兵林泰曾等》，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下同），第 205 页。

③ 李鸿章：《复伦敦薛使》，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 272 页。

④ 李鸿章：《致薛觐堂》，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3，第 18 页。

斗争中虽有时态度暧昧，但总体上还是重视海防大权不容洋人染指的。这毕竟是捍卫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

三、关于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

（一）明是和局，阴为战备，以保和局为关键

早在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时，李鸿章就主张以武力作为外交的后盾，提出“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他进一步提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① 他认为，“洋人论势不论理”，中国只有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能与外国侵略者抗衡。他虽然认为“和局”离不开“战备”，但却主张力保“和局”。其理由是：一旦与外国侵略军开战，“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②。所以，当中国的武备未得到切实加强以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③。只有力保“和局”，利用和平环境整军经武，“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④。1881年，他把上述指导思想概括为：“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⑤

上述“外和”、“内变”的指导思想，就其主观愿望而言，无可挑剔。但是，残酷的现实是：西方列强正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其侵吞殖民地和分割世界的野心与日俱增；“蕞尔小

---

① 李鸿章：《论台湾兵事》，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第33页。

②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3页。

③ 李鸿章：《议酌允威使各节》，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4，第3页。

④ 李鸿章：《复议梅启照条陈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30页。

⑤ 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43页。

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已成为极具侵略性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处于强邻四迫、危机日深的险恶环境，已不可能有较长的和平环境“徐图自强”。最紧迫和必须抉择的问题，乃是当帝国主义国家把战争强加于中国时，是坚决抵抗，还是屈膝求和。李鸿章选择的是后者。他认为宁可让国家丧失局部权益，也应忍辱求和，以便“稳慎徐图”。

正是依循这种逻辑，李鸿章在反侵略战争中消极抗战、积极求和。中法战争时，他声言“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1884 年 4 月又提出“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①，主张早签和约。中法战争之所以出现“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奇异结局，主要由于慈禧推行妥协政策，而李鸿章在这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日甲午战争时，李鸿章开始把希望寄托于英俄等国调停，不积极筹备战守，尽失先机之利，继而在海上陆上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以致水陆均遭惨败。在准备赴日议和时，他还老调重弹，声称：“但能力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② 1900 年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他指责主战派“庸谬误国”，“造孽大矣”。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的境况下，李鸿章仍然认为只要“外修和好”，尚可“内图富强”。③这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李鸿章之所以坚持反战乞和政策，主要基于以下认识根源。其一，对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认识不深。他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④ 由此认识出发，他在办理涉外

---

① 李鸿章：《述德璀琳条陈》，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5，第 32 页。

② 李鸿章：《预筹赴东议约情形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79，第 47 页。

③ 李鸿章：《和议会同画押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80，第 69 页。

④ 李鸿章：《复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第 27 页。

事件时，大多采取“委曲就全”政策，在“不大碍国体”的前提下，对外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均“酌量允行”，避免矛盾激化，引发战争，影响中国的“自强”进程。殊不知侵略者欲壑难填，委曲求全，最多只能延缓战争，而绝不能制止侵略。其二，对敌情我情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李鸿章只看到侵略军武器精良、技艺高超，而看不到他们在侵华战争中所存在的困难和弱点，从而丧失了战而胜之的信心和决心。其三，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他说：“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① 这样，他就把“羁縻”变成了实事，而把“御侮”变成了空话。更有甚者，他公然诋毁林则徐等抵抗派，胡说什么“此事一误于林文忠，再误于僧邸，今已不可收拾”②。他还颠倒是非，把法国增兵越南，说成是由于黑旗军反攻河内所致。似乎抗战有罪，屈辱求和反而有功。李鸿章的上述见解已与投降派的逻辑毫无二致，自然从根本上背离了“自强”的宗旨。

（二）陆军株守营垒，海军不在海上鏖战

当太平军、捻军等被镇压以后，清军面临着两个重大转变：一是作战对象由农民起义武装转为外国侵略军；一是战略方针由进攻转为防御。实践表明，李鸿章对于前者，认识比较明确，也作了些物质准备；对于后者，虽有所认识，但处理失当，并突出地反映在由他参与组织和指挥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固然，甲午战争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清朝政治的腐朽和经济落后，但就战略决策失误而言，李鸿章负有重大责任。

早在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就表露出畏敌怯战、消极应敌的思想。1894 年 6 月下旬，光绪帝鉴于外交谈判毫无进展，而日本不断向朝鲜增兵，谕令李鸿章“妥筹办法，迅速具奏”。李在 6 月 30

---

① 李鸿章：《复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0，第 27～28 页。

② 李鸿章：《复金眉生都转》，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1，第 7 页。

日的复奏中称："北洋铁甲各船，堪备海战者只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军兵力不厚，"一经抽调，则到处空虚，转为敌所乘，有碍大局"。① 在7月4日的复奏中，则明确提出：现有海陆军，"守"尚有余，而"攻"则不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于战争爆发后顽固坚持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突出地表现为：陆军株守营垒，不主动出击；海军不在海上鏖战，放弃制海权。结果，处处被动，终遭失败。

陆军株守待敌，始自平壤战役。1894年8月初，清政府派出的4支援军抵平壤后，李鸿章电告卫汝贵："汝等队初到，必须先据形胜坚扎营垒，勿为所乘"②。拒不执行光绪帝要平壤清军星夜前进，与由成欢北撤的叶志超部夹击汉城日军的指示。8月15日，光绪帝指示李鸿章：一面布置后路，一面令平壤清军实行攻势作战。次日，李鸿章称："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难操胜算"，"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俟各营到齐，后路布妥，始可相机进取"。③ 这实际上是反对攻势作战的一种借口。9月，日军分4路进攻平壤，平壤守军如能集中兵力，先击其一路，予以重大杀伤，再转击他路，战事尚有可为。但李鸿章却指示："如平壤被围，只有令中和各队乘夜拔回，以顾根本，勿致两失。"④ 于是，叶志超即撤外围之兵，龟缩于平壤城内，结果被日军击破，导致平壤失守。当清军从鸭绿江防线溃退后，于摩天岭阻遏日军的聂士成曾建议由他率800骑兵，潜至敌后，截其运道，使敌首尾难顾。李鸿章却复电说：日军防范严密，恐不易攻。由于李鸿章的反对，加上前敌总指挥宋庆亦不支持，抄袭敌后之举未能实施。在山东半岛防御作战中，守卫威海北帮炮台的绥巩军统领、道员戴宗骞接受旅顺、大连守军只

---

① 《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李鸿章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李鸿章：《寄平壤交盛军卫统领》，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51页。

③ 李鸿章：《寄译署》，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90页。

④ 李鸿章：《寄叶总统》，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968页。

知株守营墙以致失守的教训，于 11 月 30 日致电李鸿章，主张抽调部队于远处迎击进攻之敌，并说："倭避台炮并知威近处海岸防守严密，故注意在空远处上岸包抄。若纵令抄近台营，我所设之旱雷并山岭行炮，均无所用。台势依山，前高后低，专避击防之用，若自后来犯，药弹等库，皆孤露无藏，颇不易固。"①李鸿章当即回电称："炮台依山，前高后低，诚虑自后来犯，然炮可回击。再于营内多掘地沟，藏人避枪炮，兵房任其攻毁，不必顾惜，亦能死守。"②次日又致电丁汝昌、戴宗骞："戴前请抽行队赴远处迎剿，我极不谓然"，"若再师心自用，以浪战取巧侥幸，即令战殁，亦不请恤，为不遵军令者戒"。③ 戴不顾李以势压人，再次申辩说："威城西地势散而分道多，纵寇入腹地，防不胜防，可为下策"，他要求李鸿章准其"因地审势，自酌战守"。④李固执己见，回电说："仍以扼要埋伏地沟为妥。"威海卫南、北帮炮台的失守，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与李鸿章的单纯防御思想关系极大。

日军侵华，其兵员和军械物资依靠海上运输，离不开舰队护航保驾，因此，清军能否击败日本的舰队，切断其供应线，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可是，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不让北洋海军在海上寻机攻击敌舰，以致最终出现了与他的愿望完全相反的结果。

当日本拒绝从朝鲜撤军，蓄意挑起战端之际，丁汝昌电告李鸿章，拟带"镇远"等 8 舰往汉江、大同江口一带游弋。李复电说："此不过摆架子耳"。"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⑤ 这无疑给丁汝昌泼了一头冷水。丰岛海战以后，李鸿章公开提出"保船制敌"之策，强调"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主张北洋海军只游弋于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不"驰逐大洋"。上述方针的提出，不仅放弃了争夺黄海制

---

①④ 《戴道来电》，《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 229、238 页。

② 李鸿章：《复戴道》，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 229 页。

③ 李鸿章：《寄丁提督戴道》，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 233 页。

⑤ 李鸿章：《复丁提督》，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 748～749 页。

海权，使援朝清军陷于孤立境地，而且把战火引至北洋沿岸，造成战略上的极大被动。9 月 17 日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之所以被动应战，并遭受很大损失，与李鸿章坚持“保船制敌”（实质是保船避战）的消极方针是分不开的。此后，日军从辽东半岛的皮子窝登陆，历时半月之久，丁汝昌曾率舰船抵旅顺港，对于皮子窝的日舰竟视若无睹。当日军进迫金州之际，光绪帝命李鸿章即饬丁汝昌率舰前往皮子窝游弋截击，阻敌后路。李鸿章以“力量夙单，未便轻进”为由，拒不应命。大连失陷后，丁汝昌慌忙率舰队逃回威海，于是，“在山猛虎”变成了“丧家之犬”。之后，北洋舰队根据李鸿章“不得出大洋浪战”的指示，龟缩港内，把“活”的军舰变成“死”的水上炮台，完全被动地与围攻威海的日本陆海军作战，最终落了个“船没人尽”的可悲下场。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① 这是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遵循这一规律，在反侵略战争中，必须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力求在防御中伺机进攻，寻歼敌人，以求致人而不致于人。否则，不仅达不到消灭敌人的目的，而且无法保存自己的力量。李鸿章捧着消极防御当法宝所得到的船毁人亡的结果，即是最好的证明。

（三）内外同心，与敌久持

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都提出过以持久战对付敌之速决战的方针。1883 年 12 月清军弃守越南山西以后，李鸿章于《妥筹边计折》中提出：“惟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制胜之要道矣。”② 1894 年 9 月平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二卷，第 482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48，第 19 页。

壤陆战和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于《据实陈奏军情折》中提出："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① 从李鸿章两次提出持久战方针的时机来看，前者有堵塞清流派指责其"一味议和"之口的意图，后者有推脱平壤败绩、海军受损之责，和不愿将被他视为私人政治资本的北洋陆海军全部拼掉等个人考虑。然而，如若综合考察，他提出这一方针，毕竟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

李鸿章提出与敌久持的方针，基于以下认识：一是清军的武器落后于外国侵略者。中法战争时，李鸿章认为"法人长于水战，又多浅水轮船"，而清军"无得力兵船，无善用水雷"，"法兵人持一后膛枪，操练熟悉，药弹备齐，兼有轻炮队相辅而行"，而"滇、桂各营，后膛快枪既少……徒以肉薄梃击取胜"。在这种情况下，"若攻坚则徒损精锐"，只能"多方扰之，乘虚袭之"。②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认为战争初期清军从平壤败退，"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③。这种说法，虽然回避了清军素质低劣、指挥笨拙等因素，但武器装备差确是事实。二是中国有地大物博的优势。早在 1874 年处理日本侵台事件时，李鸿章就质问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说："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④ 1882 年清政府平息朝鲜"壬午政变"后，国内清流派主张远征日本，责其擅灭琉球之罪。李鸿章认为海军尚未练成，未便跨海出征。同时又说："中国地大物

---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78，第 62 页。

② 李鸿章：《复陈法越兵事》，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5，第 26～27 页。

③ 李鸿章：《据实陈奏军情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78，第 62 页。

④ 李鸿章：《与东使柳原前光郑永宁问答节略》，见《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2，第 38 页。

博，但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① 正是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对比，李鸿章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持久战的思想。

总的说来，李鸿章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主导思想是避战求和。因此，他所说的“持久以困之”，并不意味着通过持久战彻底打败侵略者，不过是其“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思想的延伸而已。他的根本思想是，战争既已爆发，就应坚持一下，争取在战场上创造一些有利于己的条件，以便谈判时“和款可无大损”。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向中国本土进攻时，他致电辽东前线指挥官宋庆等人说：“德国武员论，日饷内绌，人不习寒冷，利悉锐速战。中国宜先守后攻，以持久困之。尤应多设马探，防日分兵包抄等语。颇合机宜。”② 其目的就在于希望清军能够顶住日军的进攻，以便增加一些谈判“筹码”。中法战争时，当清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后，他马上提出这时与法国议和，“和款可无大损”，更是反映其上述指导思想的典型例证。

另外，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真正的持久战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举其要者而言：第一，实行持久战，统治集团内部必须意见一致，具有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共同决心。而事实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为了个人私利，专意主和，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虽然主战，却手无实权，即使发布抗战旨令，也难贯彻实施。依附后党的李鸿章，就带头抗旨违令。第二，实行持久战，必须对全国军队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协调一致地作战。而事实是，清军各分畛域，即使同一战区，也是隶属关系各异，彼此观望。新建的海军，正如李鸿章所说：“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

---

① 李鸿章：《议复邓承修驻军烟台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4，第19页。

② 李鸿章：《寄九连城宋宫保凤凰厅周臬司》，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49页。

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①海军衙门成立以后，也未改变上述状况。第三，实行持久战，必须动员全民抗战，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事实是，清朝统治集团“防民甚于防寇”，不愿也不敢发动和依靠民众。李鸿章就说：“道咸年间，粤民有自结队攻夷者，皆受害最深之处。……非有重兵利器，仍不足固结人心。”②这表明他公开反对群众参战。由上可见，李鸿章所称“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尽管如此，实行持久战，符合大而弱的中国战胜小而强的外国侵略者的客观规律，李鸿章能提出“与敌久持”的方针，确是难能可贵的。

李鸿章指挥反侵略战争之所以显得软弱无能，惨遭失败，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又有军事方面的原因。从与战争胜负密切相关的战备角度观察，主要有两大问题处理不当。

一是重军事技术，轻军事学术。李鸿章在用先进武器装备陆军、组建近代海军、改善军事设施和后勤保障等方面费尽心机，成绩显著。但是，他忽视了对外国军事学术的研究。就他本人而言，对外国枪炮、战船的研制情况了解较多，而对欧美战争史和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知之甚少。以机构设置为例，北洋系统有海防支应局、军械局、船械局、储医施医局等保障机构，却没有研究作战的机构，致使战略问题长期处于无人研究的状态。他虽重视创办军校，培养人才，可是教学内容偏重于军事技术，虽有战术和战略的课程，但未摆到应有的位置，特别是没有组织中高级将领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海军将领中，虽有刘步蟾、林泰曾等留学生，但也只能驾铁甲船于大洋接战，没有掌握指挥整个舰队作战的能力，何况还有不懂海战的丁汝昌充当他们的顶头上司。虽然

---

① 李鸿章：《议复邓承修驻军烟台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4，第18页。

② 李鸿章：《复宋雪帆侍郎》，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第27页。

在上海设立了译书馆，但所译西书大多只与制器有关。李鸿章之所以忽视高层次的近代军事学术的研究，与他所说的“中西用兵之法大略相同”①的盲目自满情绪有很大关系。所以他在战争指导上抱残守缺，因袭镇压太平军、捻军时所用的“以主待客”、“以守为战”之类的老套套，远远落后于反侵略战争的实际需要。

二是重筹饷筹械，轻部队的组织建设和管理教育。例如，淮军早就组建了步营、骑营、炮营，并有类似工兵的长夫，但受“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② 的狭隘认识所束缚，始终没有采用外国军队的先进编制，组建以步兵为主，骑、炮、工兵为辅的合成军队。又如，淮军镇压太平军、捻军以后，军中的腐败现象和厌战离队情绪与日俱增，李鸿章对此虽有所察觉（如 1869 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近来淮将暮气颇深，纷纷乞退。……旧部日渐零落，势难再兴，致负期许。”③），却未抓紧进行教育和整顿，而是一味姑息迁就。1889 年，光绪帝命令对防营中存在的虚冒额数、克扣饷银，统领、营官养尊处优，并不时时操练等弊病严加整顿，李鸿章不但不认真执行，反而谎称北洋各军“讲求利器，勤加操练”，“均知廉洁自爱，习劳耐苦，尚无骄惰积习，虚冒情弊”。④ 由于他包庇纵容，讳疾忌医，加上任人唯亲，庸碌贪黩之辈充斥军中，因而军纪废弛，士气涣散。实践证明，单纯着眼于改善部队的给养和武器装备，而不注意对官兵进行严格的管教，是无法提高其战斗力，并在抗击强大的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夺取胜利的。

---

① 李鸿章：《武弁回华教练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5，第 34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第 9 页。

③ 李鸿章：《复曾相》，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9，第 16 页。

④ 李鸿章：《复奏各军营规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66，第 42 页。

第二节　左宗棠的“自强”、“御侮”思想

左宗棠指挥湘军血腥镇压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起义，用农民军的鲜血染红了顶戴。但是，当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时刻，他能够把对君主的忠诚扩展为对民族的忠诚，积极投身于以学习西方“长技”为中心的自强活动，致力于加强国防近代化建设，并挺身而出，坚决抗击外国侵略军，救亡图存，从而成为洋务派的重要成员和著名的爱国将领。

一、关于自强活动的指导思想

左宗棠认为，中国只有自强，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他曾说：“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我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① 1866年春，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广东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回到福州，立即着手筹建福州船政局，作为其投身自强活动的肇始。此后，又在兰州创办制造枪炮的机器局。对于电报、铁路和其它民用企业的建设，也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他的这些活动，宗旨十分明确，就是贯彻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他在《艺学说帖》中作了比较明确的表达。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②左宗棠从事自强活动的内容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① 左宗棠：《与两江总督沈幼丹制军》，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64页。

② 《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下同），第575页。

（一）制造海战利器，实中国自强要著

左宗棠认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①。早在1864年1月，他就指出："轮舟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当时，他在浙江镇压太平军，所以造船有"防洋"和"缉盗"双重目的。1866年6月，他上疏清廷阐述制造轮船的必要性时，则已表明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洋"。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他还指出，西方各国制造轮船，"互相师法，制作日精"，连岛国日本也在学习仿制，"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面对这种形势，中国不能安于现状，必须急起直追。他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② 此后，他又强调："轮船之造，原以沿海防不胜防，得此则一日千里，有警即赴，不至失时，可以战为防。"③

另外，左宗棠还把建立造船厂作为发展近代工业的起跑点和利国利民的重要措施。他在《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指出："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④ 在《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则指出："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⑤ 从中可以看出，左宗棠对自

---

① 左宗棠：《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31页。

② 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4页。

③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51页。

④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2页。

⑤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5页。

强活动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然而，最能体现其自强活动深邃思想的，莫过于他为筹建福州船政局所确定的方针了。

1、轮船立足于自造，庶为中国永远之利

1866年，正当左宗棠筹建福州船政局之际，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和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署建议，通过借、雇、购外轮的办法改善海防。总署要左宗棠等“公同酌议”。左宗棠在复函中阐述了借、雇、购外轮的种种弊病，明确指出：向外国借用轮船，“调遣不能自由，久暂不能自主”，“虽可偶一为之，究非妥便之策”。同时指出：雇赁外轮，虽比借用稍胜一筹，但“船主居为奇货，索价不啻倍蓰”，且“未能即换中国旗号，舵水人等不肯尽听中国管束，调停驾驶甚费周章”。购船虽比借雇省事，但也有许多难处：一是洋人贪利，出售的船只，“必先其旧者敝者”，买来以后，请他们改装修理，又必任意索价，“以彼之长傲我之短，以彼之有傲我之无”。二是购船之后，仍须雇用洋人管驾，“另雇更换，均难由我”。三是轮船行驶一年半载以后，需进行修理，又得央求外国船厂，他们故意刁难，“我欲贱而彼故贵，我欲速而彼故迟”。基于以上原因，他提出了“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① 的方针。以后又指出：福州设船政局，“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虽然自己造船，“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巨”，但“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所以，“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② 由此可见，左宗棠倡议建厂造船，诚如他自己所说，系经过多年深思熟虑以后才提出的，绝非轻率之举。

建厂造船，白手起家，本非易事，何况清廷又于当年9月将左宗棠改任陕甘总督，令其前往陕甘镇压西北回民起义。面对这

①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46～47页。

② 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3页。

突然的变化，左宗棠上疏清廷表示："臣维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①。他日夜筹划，迅速完成了择定厂址、推荐总理船政大臣、筹措开办经费、购买机器、聘请洋员诸事宜，并获清廷批准和赞许。清廷还规定，有关船局问题的陈奏，"均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始终其事"。

左宗棠离闽后，"身虽西行，心犹东注"，始终关心船厂的建设。1871 年，他向清廷表示，如造船经费不足，可从福建所解西北饷银 5 万两及甘捐项下改拨 2 万两给船政局，以免造船中辍。并说："缘西事安危，尚不过一时之计，而轮船则控驭四海，实国家久远之规，彼此相形，情形迥异也。"② 当他得悉船政局按约辞退洋员，制造轮船已经依靠本国师匠时，十分高兴地说："现在学徒匠作日见精进，美不胜收，驾驶之人亦易选择，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③。1872 年，内阁学士宋晋以船政局"糜费太重"，建议暂停造船。左宗棠针锋相对，除奏明费用超过原计划的原因外，还列举事实说明建厂 3 年多来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并指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求达到西方国家的造船水平是不现实的。他再次强调："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窃维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④ 由于沈葆桢、李鸿章等人也反对停止造船，清廷否定了宋晋的建议，使船政局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

① 左宗棠：《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19，第 27 页。

② 左宗棠：《请敕闽省酌拨轮船经费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2，第 40 页。

③ 左宗棠：《答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1，第 55 页。

④ 左宗棠：《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1，第 31～34 页。

2、有自造、自驾之人，方免受人挟制

福州船政局筹建之初，左宗棠就明确指出："夫习造轮船，非(徒)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①又说："所以必欲自造轮机者，欲得其造轮机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而纾目前之患耳。""惟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方不至授人以柄。"② 正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他决定在船政局中设立"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培养制造和驾驶人才。考虑到学堂需5年之后才能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为使造成之船有人驾驶，做到"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左宗棠命统带捕盗缉私轮船的贝锦泉充当新购轮船"华福宝"号的船主，令其招募宁波少年，在船习练。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当闽厂造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时，全船没有用一个洋人。为使课堂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左宗棠专门设立"练船"，供学员实习。他还赞同沈葆桢的建议，从学堂中选派学生分赴英、法学习，以便"精益求精"，使"我之神智日开"，"彼之聪明尽为我有"。同时，建议清政府派人赴德国学制水雷、后膛炮。

左宗棠对船政局设艺局培养制造、驾驶人才，颇感自豪。他在给浙抚杨昌浚的信中说："闽中艺局学徒，精进殊常，外人亦自谓不逮。……东南之有船局，惟沪与闽，沪非洋匠洋人不可，闽则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③ 在给总署的信中说："闽中艺局学生，均民间十余岁粗解文义子弟……均甚聪明，易学易晓。……可见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

① 左宗棠：《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见《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42页。

②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55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2，第39页。

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①左宗棠有此自豪感，实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为中国近代海防事业开创了“两个第一”：一是培养了第一批用近代科学技术设计、监造轮船的专门人才，其中汪乔年、罗臻禄、吴德章、李寿田、魏瀚、陈兆翱、郑清濂、杨廉臣等，在船政局先后自行设计、监造了多艘军舰和鱼雷艇，包括排水量2100吨的钢甲舰“平远”号。陈兆翱等还被派往国外，监造订购的军舰。二是培养了第一批掌握近代航海技术的管带（舰长），其中著名的有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黄建勋、林履中、萨镇冰、程璧光等。另外，他在培养海防建设人才方面，要比李鸿章“先觉”一些。李鸿章虽然在60年代初就提出“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但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时，只办了个译书馆和规模很小的工艺馆，而没有开办学校。所以，北洋海军成军时，舰船上的管驾人员，大部分来自福州船政学堂。李鸿章在80年代创办水师学堂，既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也受福州船政局的启发，并参考了该局的办学章程。

（二）造枪炮、兴电报、开矿藏，不使外国挟其长以傲我

左宗棠自强活动的其它内容，一是在兰州创办机器局，制造先进枪炮，改造旧式枪炮，二是兴办长江沿岸电报，再就是倡导开发矿藏，发展冶炼业。

左宗棠在1866年的《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就指出：如船厂办成，“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他在西北发现遗存的外国火炮后，颇为感慨地说：“尝叹泰西开花炮子及大炮之入中国，自明已然。现在凤翔府城楼尚存有开花炮子二百余枚，平凉府西城现有大洋炮，上镌‘万历’及‘总制胡’等字，余皆剥蚀。然则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9，第59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页。

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①为便于供应入甘部队所需的枪炮弹药，他于1872年在兰州创办小型机器局，派精于兵器制造的总兵赖长总理其事，从广东、浙江等地招聘熟练工人到该局工作。

兰州机器局规模虽小，但成绩比较显著。1874年，该局已能制造铜引、铜帽、大小开花炮子，仿造德国的线膛炮及后膛七响步枪。左宗棠认为，“纯用洋枪，终失长短互用之妙”，便命“精造短劈山（以洋匠作之），用架揞放，不用人扛……较长劈山尤轻便适用”。② 另外，改造了广东无壳抬枪，使三人管放两杆变成一人管放一杆，“较洋枪有准而更可致远”。1875年，该局制造工艺又有所改进，仿制了德国后门线膛炮20尊，后膛七响枪数十杆，并仿制成马梯尼步枪。时上海运来一尊田鸡炮，炮弹自空而下，“以打马队之成团者最妙”，可惜只有300发炮弹，左宗棠命赖长赶造200发，解赴前敌军中。这些武器，在收复新疆失地的作战中发挥了作用，如攻克古牧地和达坂时，就充分发挥了火炮的威力。左宗棠对机器局的成就深表赞许，他说：“若果经费敷余，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③。

1882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他十分关心上海和金陵机器局的军火生产以及金陵洋火药局的扩建工程，强调“总期精益求精，以为自强之计”④。1885年3月，督师福州的左宗棠，鉴于海口大炮均购自外洋，火炮和炮弹形制各异，战争发生后，“各国既守公法，一概停卖”，火炮“由杂而少，由少而无”，后果不堪设想。据此，他向清廷提出：“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

---

①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40页。

② 左宗棠：《答浙抚杨石泉中丞》，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8页。

③ 左宗棠：《答胡雪岩》，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42页。

④ 《左宗棠未刊奏折》，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15页。

因陋就简，彼挟所长以凌我，我必谋所以制之。”① 他建议于福州船政局旧址扩建炮厂，仿制德国克虏伯厂和英国法华士厂新造的后膛大炮，以为亡羊补牢之计。

设厂制造轮船、枪炮，需要大量煤、铁等燃料和原料，如果购自外国，则价格昂贵，造成大量白银外流。有鉴于此，左宗棠与李鸿章不谋而合，积极倡议购买机器，雇请洋员，自己挖煤、冶铁。1882年底，左宗棠在奏折中指出：“南北洋筹办防务，以制造船炮为第一要义，而各省所设机器、轮船等局制造一切，又以煤、铁为大宗。”② 他建议减轻税率，以利开发徐州利国驿的煤、铁矿藏，供轮船等局使用。1885年，他在奏请清政府在福州船政局扩建炮厂的同时，建议开发福州穆源铁矿，以供造船、制炮之用。他说：“如能筹得二三百万金，矿炮并举，不惟炮可自制，推之铁甲兵船与夫火车、铁路，一切大政，皆可次第举办，较向外洋购买，终岁以银易铁，得失显然。”③

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期间，由于消息闭塞，对于发展与军事密切相关的近代交通、通讯事业的必要性缺乏认识，曾在给总署的信中说：“至铁路、电线，本由泰西商贾竞利起见，各岛族遂用以行军，一似舍此别无制胜之具者，实则生计之赢绌，兵事之利钝，不在乎此。”④ 调任两江总督以后，他的认识有了飞跃。在《筹办沿江陆路电线片》中指出：“电线兴自泰西，无论水陆程途千万里，音信瞬息可通，实于军情商务大有裨益。即如法国之于越南，俄国之于珲春，日本之于朝鲜，皆设电线。盖有事呼应灵捷，无事可便商贾，故凡用兵要地，通商码头，彼族无不谋占设

①③ 左宗棠：《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4，第7页。

② 左宗棠：《开采徐州铜山县境煤铁援案请减税银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72页。

④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2，第20页。

电线。”① 为此，他建议从南京至汉口自行架设沿江陆线，经费由华商自筹，以杜洋商添设长江水线之狡谋，“以保中国自主之权”。这条全长1600里的电报干线，终于在1884年竣工。

左宗棠除了创办军工企业和建议大兴采掘、冶炼工业外，在西北还先后购置挖河凿井机器，开办兰州织呢织布厂；在福州建议开办机器制糖厂，作为“利民实政”。他办船政局，也有振兴商务的目的，希望“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以敌洋商垄断海上运输。对于民用企业，他不同意李鸿章所采用的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办法，主张“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他说：“西法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故所为多成，国计亦裕。若由官先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②这种主张，有利于商办企业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综观左宗棠的自强活动，洋溢着民族自强、自信、自尊的可贵精神。他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却不迷信洋人而妄自菲薄，一再指出中国人的智慧不逊于洋人，只要重视学习技艺，便会赶上甚至超过外国。他创办军事工业，既“借材异域”，又不受洋人控制，强调自管、自造、自驾；主张“学重于造”，着意培养自己的制造、驾驶人才，使西法得以“衍于中国”，并概括地指出：“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之己。”③ 他重视创办军工企业，又支持发展民用企业，以便既加强国防建设，又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了“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的名言。所有这些思想和实践，生动地体现了他的振兴中华、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

---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1，第8页。

② 左宗棠：《答何小宋制军》，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第7页。

③ 左宗棠：《会商海防事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51页。

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军政重臣，他从事自强活动的终极目的，与其他洋务派头面人物一样，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而不是削弱和推翻这种统治。另外，他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不了解，只看到其技艺优于中国，因而不遗余力地主张学习制造枪炮、轮船和建设电报、铁路等西方“长技”，并且不恰当地认为掌握了这些“长技”，就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他把福州船政局制造轮船说成“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就是明显的例证。左宗棠的这些看法，有其合理的部分，即学习西方的“长技”。但是，在腐朽、专制的封建统治下，即使掌握了西方的某些“长技”，也不能使国家真正富强。他把先进的近代化工业，建立在腐朽没落的封建政治制度和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这就产生两大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是由于缺乏完整的近代工业生产体系，不但机器购自外国，原材料和零部件亦需从国外进口，所以虽欲不受洋人挟制而却事与愿违。加上自然科学的基础很差，设计能力十分薄弱，设备也不能及时更新，因而生产的武器很难赶上外国的先进水平。正如他自己所说，船政局“所制各船多仿半兵半商旧式，近年虽造铁胁快船，较旧式为稍利，然仿之外洋铁甲，仍觉强弱悬殊”①。二是在管理企业和组织生产时，难以摆脱封建制度带来的诸如贪污、浪费、机构臃肿、官僚习气严重、办事效率低下等弊端，以致最后发展到无法维护下去的局面。

二、关于设防指导思想

在左宗棠的军旅生涯中，经历了先筹海防（创办福州船政局）、后筹塞防（收复新疆和改善新疆的防务）、再筹海防（加强

---

① 左宗棠：《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4，第6页。

长江口和福州沿海设防）的过程，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塞防指导思想

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左宗棠集卓越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于一身，一方面指挥清军按照他所确定的战略方针，追歼阿古柏匪帮和白彦虎叛军，一方面制定改革和建设新疆的方针政策，并逐一付诸实施。后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塞防指导思想。就其要者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安辑流亡，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阿古柏匪帮的残暴统治，使新疆各族人民备受摧残。战争期间，阿古柏匪军与白彦虎叛军沿途烧杀抢掠，胁迫各族人民随其西逃，致使大批民众颠沛流离，田园荒芜，生活无着。为此，左宗棠责令暂时行使地方政府职权的善后局官员把遣返难民、恢复生产作为首要任务，认真抓好。西征军每攻克一地，立即将救出的难民资遣回乡，不分民族界限，一律发给赈款、口粮、种子、耕畜（游牧部落则发给帐房、种羊），使他们安定下来，迅速恢复生产。鉴于新疆水源缺乏，他令各地组织军力民力开辟水源，疏浚水渠，引水灌田，同时解决饮水困难，并在哈密、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吐鲁番、喀喇沙尔等地兴办屯田（军屯与民屯并举，以民屯为主），对于改善人民生活，保障军粮供给，加强边防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2、改革田赋促进生产，兴办义学振兴文化

左宗棠认为新疆实行的税随丁征，田多丁少者税轻、田少丁多者税重的赋税制度很不合理，便按照内地的赋税制度，规定税随田征，摊丁入田，十取其一。他原计划先丈量土地，再按地亩肥瘠、水分赢绌，分九等科赋，后因办理此事相当繁杂，便按上中下三等征收田赋。同时，改革徭役制度，严禁头人苛索平民和军队随意拉差。此外，还改革了“民以为苦”的货币制度。

左宗棠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在新疆也不例外。他指令各地兴办义学，用内地学堂所用的课本教育儿童，改变只学宗教经文的教育内容，以利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振兴当地的文化事业。

3、修路、筑城、建碉，改善防务

在收复新疆失地过程中，军行所至，即沿途整修道路、桥梁、驿站。凡道路险窄、车驮难行之处，驻军便“缒险凿石”，设立护栏，使之“化险为夷”；凡“泥淖纵横，人马多苦陷没”之处，则“垫以巨木，杂覆树枝，平铺山石”，使积淖变通途。南疆西四城收复以后，南北路的交通要道，直至甘肃嘉峪关，全都得到了修整，既利部队调动，又利物资转运。同时，还修筑了安西、乌鲁木齐、玛纳斯、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各城的城墙和炮台，并重点修筑了地处“南疆冲要”的喀喇沙尔城和年久倾圮的库车城。另外，还于边境按照卡伦界址，改筑边墙，间筑碉堡，开挖壕沟，安设大小炮位，挑选劲兵驻防。这些工程，主要由军队在操防护运之暇，逐一完成，尽量“不资民力，不耗官帑”。即使雇用民工，也发给工钱，不采取服徭役的形式。

4、新疆开置行省，画久安长治之策

自乾隆初期戡定西域，更名新疆后，即实行“军府制”：在伊犁设伊犁将军，节制全疆军事，另在南、北疆各重要城市分设参赞大臣、都统、办事大臣、领队大臣，领兵驻扎，实行军事统治。当时因新疆初定，仍保留原有的伯克（意为“老爷”、“长官”，均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制度。由于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只管军事，不理政务，所以地方的行政大权实际上仍掌握在伯克手中。这些伯克们不仅依势勒索平民，残暴成性，而且也是英俄诱骗拉拢、唆使其背叛、分裂祖国的主要对象。此外，新疆还存在来自沙俄的严重威胁。左宗棠指出：“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① 由于军府制不仅不利于新疆的建设，而且不利于边防的巩固，左宗棠先后五次上奏清廷，建议新疆“设行省，改郡县”，以革除将军、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久

① 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6页。

握兵符”，“各不相下”，不知民隐，不习吏事，形成“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以致地方民政、财务等大权为伯克所掌握的弊端，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领导。同时，建议新疆的军队改换防制为驻防制，以节省军费和强化戍边卫国的思想。1884 年 11 月，清廷宣布新疆开置行省，以在收复新疆之战中立有大功的刘锦棠为首任巡抚。于是，左宗棠所提出的对于建设新疆、巩固西北边防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主张终于变成了现实。

左宗棠为建设新疆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体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起抓，建设和改进同步进行，互相促进，从而提高整体实力的思想。而归结到一点，就是“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①。这是他加强塞防建设颇有特色、难能可贵的指导思想。

（二）海防指导思想

左宗棠认为：“江海筹防未固，户牖绸缪宜勤。”② “先事不忘战，以备临事之一战，幸而可以不战，而我可战之具自在。”③ 他在立足于战、有备无患的思想指导下，着意加强海防建设。他的海防建设指导思想有以下特点。

1、海口设防，近海御敌

在 1874 年讨论海防问题时，左宗棠在海防部署方面，主张沿海七省应统筹兼顾，分清“要处”和“非甚要处”，“要处宜防宜严，非甚要处防之而不必严”。他把天津比作头项，大江入海之口比作人之腰膂，台湾、定海比作可护头项腰脊之左右手，认为这些地方均“亟宜严为之防，以此始者以此终，不可一日弛也”。④在

---

① 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50，第 77 页。

② 左宗棠：《与船政局黎召民星使》，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26，第 8 页。

③ 左宗棠：《遵旨布置海防并办理渔团详细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61，第 73 页。

④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4，第 51 页。

海防机构设置方面，他同意北东南三洋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认为如此“自有常山率然之势”，但不同意丁日昌提出的建立三洋海军的建议。他认为“若划分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另外，“分设专阃，三提督共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而且，“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① 对于应否配备铁甲舰，他没有表示明确态度，主张等买来以后“再为察验”。

应当说，左宗棠当时的海防指导思想虽有保守的成分，但也有积极的方面，如认为有了海军就可以“以战为防”。遗憾的是，当他于1881年冬出任两江总督以后，其海防思想非但没有向建立强大的海军，与敌决胜于海上，争夺制海权的方向发展，反而过分强调“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②。1882年，他在《会商海防事宜折》中提出：“与其购铁甲重笨兵轮争胜于茫茫大海之中，毫无把握，莫若造灵捷轮船专防海口扼要之地，随机应变，缓急可资为愈。”③ 他在写给奉命简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字雪琴）的信中也说：“合肥（指李鸿章）欲得快船，并购铁甲轮船，与岛族角胜大洋，则诚非计也。”④ 他多次提出，水雷乃是制铁甲船的利器，价又不贵，主张多购多造，敷设海口，以御敌舰。他也不同意魏源提出的诱敌深入内河而歼之的方针，而是主张严防海口，近海御敌。他说：“江海防务，以布置海口为要。盖御敌于庭除堂奥，不若御之藩篱之外，其理易明也。”⑤ 本此方针，他在彭玉麟提出的制造小轮船10艘，加强长江海口防务的基础上，奏请添造大轮船5艘，作为机动力量，一旦有警，及时支援南洋各口。旋因中

---

①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56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52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51页。

④ 左宗棠：《答彭雪琴》，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19页。

⑤ 左宗棠：《创设渔团精挑水勇以资征防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1，第10页。

法战争爆发，他又奉命调京任职，上述计划未能实现。

左宗棠的海防指导思想之所以偏于保守，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主要由于以下原因：一是他在任两江总督期间，虽开始向国外订购战舰，但仍坚持以自造为主，而当时福州船政局的设备和技术力量，要制造巨型铁甲舰，尚有不少困难。二是由于他长期在西北用兵，对于世界海军的发展情况知之甚少，甚至得到一些不确切的资料。例如，他在给总署的信中说："且铁甲本英国废弃不用之船，阅西国近事汇编，英人所谈英事，尤为明晰。"① 三是对元世祖等出海征战招致失利的情况心有余悸，因而指出，如"以海战为海防"，将"袭历代覆辙，贻异日之悔"。②

中法战争结束前夕，左宗棠的海防指导思想因受战争实践的影响，有所发展。他在1885年3月写的《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中说："此次法夷犯顺，游弋重洋，不过恃其船坚炮利。而我以船炮悬殊之故，匪独不能海上交绥，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及时开厂制办，补牢顾犬，已觉其迟，若更畏难惜费，不思振作，何以谋自强而息外患耶！"为此，他建议扩建福州船政局，并在吴楚交界处择地设厂，专造铁甲舰和新式后膛巨炮，并认为此"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③。这一思想，与稍后清廷提出的"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是完全吻合的。可惜数月之后，他就撒手尘寰了。

2、海防与江防兼筹，实行纵深防御

左宗棠认为，应在加强海口设防的同时，加强与海口相连的内江的设防。他之所以如此主张，既为了抵御外敌内犯，也为了镇慑"伏莽"内乱，避免出现"内忧外患"的不利形势。1882年，他在《会商海防事宜折》中用转述彭玉麟意见的方式指出："至谓此时江防缓而海防急，宜先筹海而后防江，亦非确论。长江各省

---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28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29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4，第8页。

伏莽甚多，历年窃发有案，倘海疆有警，则乘间揭竿而起，势所必然。腹地多虞，防剿之军时被牵制，适足启盗贼之心而张寇仇之焰。"①

尽管如此，左宗棠的侧重点还是放在抵御外侮和海口设防方面，并对以往长江海口设防"莫不以吴淞口为总要"，提出了异议。他说：吴淞实为进黄浦江之口，为苏松扼要门户。如外轮不进黄浦江，即不必由吴淞入口，可从崇明北绕白茅沙，顺抵狼山、福山，径趋长江。据此，他提出："长江海口（设防），应以狼、福山为重，兼顾吴淞口，庶期周密。"② 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便积极加强吴淞口与狼山、福山前的白茅沙两处的设防。在吴淞口，以吴淞炮台为中心部署兵力：调大兵船泊于炮台的侧翼和对面，如敌船进犯，即与炮台合击之。调太湖水师分守各港汊，防敌舰分散窜扰。派陆师 2 营驻于川沙厅之高行镇，防敌于浦东黄家湾一带登陆；另 2 营驻于宝山县之罗店镇，为炮台之声援；还有 2 营驻上海西门新泾市，以防驶入黄浦江之敌船袭击上海。在白茅沙，根据洋面虽宽却多暗沙，中泓狭窄而曲折的特点，实行"先有水雷、鱼网以阻之，蚊船及水炮台攻其前，兵轮艇师继其后，若敌船退至海口，我师即绕北面出而尾追"③ 的作战部署。此外，他认为"江阴尤为长江门户"，除调长江水师战船密布江面外，还将福州船政局新造的兵轮"开济"号调往该处，两岸炮台 49 门巨炮备足子药，以便水陆协同，打击敌舰。如白茅沙有警，亦可相机援应。另外，溯江阴而上的圌山关、象山、焦山、乌龙山等处守军，也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节节御敌。

左宗棠督师福州时，也实行纵深设防：以闽江口的长门、金

---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59，第 51 页。

② 左宗棠：《会商海防事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59，第 50 页。

③ 左宗棠：《遵旨布置海防并办理渔团详细情形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61，第 71 页。

牌为第一关键，将在马江作战中被击毁的战船上的18门火炮移往该处，加强炮兵火力。以闽安南北两岸为第二重门户，重新修筑被击毁的炮台。同时，拆去海口水道标志，于沿海遍设水雷，宣布封港，以防在台湾水域的法舰声东击西，偷袭福州。

3、沿海沿江组织渔团，配合正规军作战

早在鸦片战争时，左宗棠对广州人民英勇抗击侵略军深表赞许，称他们为“义民”。在中法战争中，他先后在江苏和福建的沿海沿江广办渔团，精选水勇，进行训练，准备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建议督办台湾军务的刘铭传访求本地忠勇明干绅士，激以义愤，劝令倡办团练，抗击入侵台湾的法军，以弥补渡台清军水土不服、地形不熟等弱点。

左宗棠曾说：“募海上各岛渔户强壮者为勇丁，既可收熟谙风水沙性勇敢之人才，为将来推广之用，又可免敌人招此等渔户作奸细，为害内地。”① 由此可见，他组织渔民抗战，并非出于完全信任群众，这是由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境界，还是比“防民甚于防寇”的封建官僚高得多。

“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而就三者言之，亦有次第，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斯固古今不易之局也。”② 左宗棠的上述论述，无疑具有积极御敌的含意。但是，从他的海防指导思想和具体部署来看，则偏重于海口设防和被动御敌，缺乏建立强大海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然而，他的海防指导思想还是立足于水陆协同、军民结合，坚决抗击外国侵略者，与李鸿章的畏敌如虎，消极避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

① 左宗棠：《会商海防事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52页。

② 左宗棠：《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0，第36页。

三、关于抵御外侮的指导思想

左宗棠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对入侵中国的侵略者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屈辱求和，从而被誉为“绝口不言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的著名爱国将领。

（一）坚持抗击外国侵略，救亡图存

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伊始，左宗棠便萌发了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思想。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他的上述思想日益鲜明，抗敌御侮的态度愈加坚定，与李鸿章的消极抗战、忍辱乞和，形成强烈的反差。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还是一个僻居湖南山乡的塾师，但他“心忧天下”，关注着抗英战争的胜负。他一方面指出：英国对中国“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必须认真对待，不可等闲视之。一方面又认为“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① 他把希望寄托在林则徐等抵抗派身上，对投降派琦善之流十分愤慨，痛切地指出“洋事为琦督所误”，以致不可收拾。他认为：“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不耸，主威不振，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为守，有人民而不能为强，而国事乃不可复问矣。”② 他用“和戎自昔非大算，为尔豺狼不可驯”的诗句表达对外国侵略者必须坚决抵抗，绝不能妥协求和的思想；用“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③ 的诗句，表明其投身反侵略战争，救亡图存的意愿。当得悉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以后，他在书信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时事竟已至此，

---

① 罗正钧著：《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 1983 年版（下同），第 21 页。

② 左宗棠：《上贺蔗农先生》，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第 18 页。

③ 左宗棠：《感事四首》，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9 页。

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① 忧国之心跃然纸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他得悉广东人民痛击进攻省城的侵略军时，表示“殊为快意”。他得知英法联军进犯大沽，威胁天津时，主张派“一枝劲旅护天津，尔后与之死战”。并认为只要“勋旧诸公勿参异议”，不动摇抗战决心，便有可能战胜侵略军。

对于处理涉外事件，左宗棠主张加强战备，据理力争，不为帝国主义的威胁恫吓所屈服。1870 年，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发生后，他致函总署指出：法国“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因为“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值此办理善后之际，“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未可以仓卒不知谁何之人论抵，致失人和”。②他的意见，旨在维护民族尊严，与李鸿章说的教案事件“其曲在我”，以及曾国藩屈从洋人意旨，捕杀无辜群众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 1874 年的日本侵台事件，远在西北的左宗棠甚为关注，他致函总理海防大臣沈葆桢，询问台湾战备情况，并指出日军既已入踞牡丹社，则必需“水陆协剿”，“乃可制此凶锋”。他还建议清廷由沈葆桢统一节制援台各军，以一事权。1875 年，“马嘉理案”发生后，左宗棠在给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中说：英人欲以此为借口，侵占我西南领土，“危证迭出”，但“天下无不办之事，无不可为之时，朔雪炎风，何容措意”，显示出不怕侵略者的英勇气概。他批评妄自菲薄的李鸿章之流，“实则明于权而未达于理，不可语于谋国之忠”③。

左宗棠反帝爱国的突出表现，在于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积极参加反侵略战争。1875 年，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时，明确表示“自古立国有疆”，新疆自汉朝以来即为中国领土，绝不容许外人侵

---

① 罗正钧著：《左宗棠年谱》，第 22 页。

②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1，第 14 页。

③ 左宗棠：《与两江总督刘岘庄制军》，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15，第 21～22 页。

占。他殚精竭虑，研究制定入疆作战的战略方针，积极整训部队，筹款、筹粮、筹运输，终于在1876～1877年顺利收复了被阿古柏匪帮侵占达13年之久的北疆和南疆广大地区。当沙俄拒绝交还伊犁时，左宗棠严正指出："伊犁我之疆土，尺寸不可让人"。他表示虽已"心力交瘁"，但为了收复伊犁，"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他亲赴哈密，进行作战部署，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即用武力收复伊犁。

中法战争初期，身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认为，"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①。于是缜密布置长江下游防务，悬以重赏，示以严罚，并立誓一旦敌舰来犯，即亲临前线，与阵地共存亡。他对视察江防的将领们说："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借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② 与此同时，命部将王德榜回湖南招募兵勇，组成恪靖定边军，开赴越桂边境前线。同时，调拨枪炮、水雷、火箭、弹药，支援抗法部队。与李鸿章抗拒督办抗法事宜的态度相反，左宗棠一再请求到前线指挥作战，并立下"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③的军令状。1884年9月，清政府任命73岁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不顾病魔缠身，义无反顾地披挂上阵。他到福州后，一面加强闽江口和福建沿海的防务，一面派"恪靖亲军"3营，不顾法国舰队的封锁，巧妙地渡过海峡，赴台湾支援刘铭传部抗击法军。1885年9月5日，为抗法战争昼夜操劳的左宗棠于福州病逝。他在临终时口授的遗折中说："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④ 这铿

---

① 左宗棠：《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0，第38页。

② 左宗棠：《与孝宽孝同》，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1页。

③ 左宗棠：《时务说帖》，见《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8页。

④ 《左文襄公实录》，第8页。转引自杨东梁《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锵悲壮的遗言，闪耀着左宗棠反帝爱国思想的夺目光芒。

（二）反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与军事实践

左宗棠坚决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像某些论者所说的为了猎取个人名利，而是有着比较厚实的思想渊源，并以他自己所具有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为基础的。

首先，左宗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这些国家入侵中国蓄谋已久，"贪而无厌"，由"只索埠头"进而"索及疆土"，而且"素性叵测，反复无常"。在这种侵略者面前，"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如果一味忍让，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力图自强，立足于战，与侵略者针锋相对，"使其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中法战争时，李鸿章声称"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主张以退让妥协换取"和平"。左宗棠却指出："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① 他认为法国侵越，"不仅以夺越疆为止"，而是将越南作为入侵中国的基地，掠夺滇、黔的五金矿产。如果越南被占，"我之外藩尽撤"，不仅法国会"捷足先登"，侵入中国的桂、滇、黔省，英国等国也将"接踵而至"，则"西南之祸岂有穷期？"他的结论是：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只有战而胜之，才会出现不损害国家主权的体面的和平。

其次，左宗棠通过对敌我情况的分析对比，认识到外国侵略军虽然船坚炮利，但也有弱点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关键在于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针对英国凭借数十艘舰船，游弋无定，牵制我沿海七省之兵，形成彼逸我劳的被动态势，提出了具体制敌之法：改抽调"客兵"为编练本地之兵，使一省之兵足当一省之用，以免征

①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6，第41页。

兵调饷，疲于奔命；沿海各省应“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讲求火器之应用，实行坚壁清野，断敌接济，“为固守持久之谋”。① 他又针对“敌之所恃专在火炮”，提出“制其所长”的具体战法：选募勇丁组成小队，选募疍户乘船绕至敌后，实行水陆夹攻，轮番袭击，使侵略军整夜不得安宁，数旬以后，必知难而退。作为一个僻居山乡的塾师，竟能提出与林则徐、魏源不谋而合的战略战术，无疑是认真研究敌我情况的结果。

在索还伊犁过程中，左宗棠以敏锐的眼光分析了中俄双方的情况，指出：沙俄的军事实力虽与英法等国大体相同，“然亦非不可制者”。其理由是：俄国地广民少，加上频年黩武，仇衅四结，与土耳其交战，“勉以和议敷衍了局”。最近德国又支持奥国对抗俄国，如果俄国在东西两线同时开战，形势对它十分不利。俄军占据伊犁，去其国界已千余里，后方补给不便；伊犁附近的游牧部落，因不堪忍受其横征暴敛，颇有急盼清军前往之意。而清军已经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失地，士气正旺，人民拥护。伊犁本为中国领土，“论理固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只要实行“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② 的方针，收回伊犁是有把握的。后沙俄被迫交还伊犁的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判断是正确的。

中法战争时，左宗棠反对妥协，力主抗战，也是建立在对法中两国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基础上的。他指出：法国国内政党纷争，意见不一，又与欧洲其它国家屡开兵端，仇怨四结，因而不可能大量出兵侵越。这种情况已为驻法公使曾纪泽所证实。即使增兵越南，也是悬军深入疫病流行的烟瘴之地，非战斗减员必然增多，难于持久。中国方面则不然，刘永福援越抗法，已获初步胜利，只

---

① 左宗棠：《上贺蔗农先生》，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第11页。

② 左宗棠：《复陈交收伊犁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38页。

要给予支援，再接再厉，相机用兵，不难挫法军凶锋。滇、桂两省如能增调陆师，添造水师船只，稳扎稳打，持久作战，不难痛予剿办。战争的结局证明，他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和颇有远见的。

再次，左宗棠认识到战争的胜负“不专于械”，还决定于其它因素。在对付日军侵台、索还伊犁和抗击法国侵略时，他都讲到“论理固为我所长”和“与正义有合”，也就是说，中国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而义战是赢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另外，如前所述，他注意借用民力，组织渔民参加抗战。他还本着“保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① 的思想，主张整饬吏治，修明内政，兴修水利，振兴农业，减轻赋税，革除陋规，使人民“耕足食，织足衣”，安居乐业。这样，一旦外敌入侵，民众便会“一心敌忾”，勇赴国难，“不用征调而兵力有余，不用转运而军粮不缺”。他的这些观点，与李鸿章只见武器不见其它，公然反对人民参战的思想，自有霄壤之别。这也是他敢于坚持抗战的重要原因。

左宗棠认识到战争胜负“不专于械”，但也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例如，1879 年在交涉索还伊犁的过程中，沙俄派出一支由 20 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从黑海驶往日本长崎，准备封锁中国海面，大搞军事讹诈时，他毫不畏惧地指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视昔为强”，“船炮亦与泰西相埒，以之战于海外，胜负尚未可知，若以之固疆宇而张挞伐之威，则主客劳逸之分，自操胜算”。② 无可否认，左宗棠对当时中国海军的实力估计偏高，但是随着清军战舰的增多，增强了他的抵御外侮的信心，则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左宗棠敢于身先士卒，勇抗外国侵略者，与他本身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也是分不开的。他早年受到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林则徐、魏源、陶澍和贺长龄兄弟的“经世

---

① 左宗棠：《与周荇农阁学》，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26，第 9 页。

② 左宗棠：《与胡雪岩》，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24，第 70 页。

致用”思想的影响，喜欢阅读与济世有关的“有用之书”。当他进京考进士名落孙山以后，就专门研究地理学与军事学。他对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很感兴趣，认为该书“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又广泛收集和细心阅读唐宋以来有关海防方面的书籍，“揆度今日情形”，研究“御夷”方略，写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论文。这些功夫，为他以后制定反侵略战争的方略，增强反侵略战争的信心，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从1860年至1875年，左宗棠统率湘军先后镇压太平军、捻军和陕甘回民军，犯有不可宽恕的罪行，但同时也丰富了他的作战指挥经验。他曾提出只有“知己知彼”、“谋定而后战”，才能致人而不致于人，他强调“慎之一字，战之本也”。① 并用古人说的“每发一兵，须发皆白”这句话警惕自己，教育部属。左宗棠在制定收复新疆的战略方针时，充分体现了上述指导思想。战前，他一方面为军队出关作战进行了一系列充分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了解阿古柏军队的武器装备、兵力部署和新疆的山势、交通、水源、居民点分布以及粮食收获季节情况，力求详细准确，然后进行综合分析，权衡利弊，制定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入疆作战的清军忠实执行了上述方针，终于以破竹之势击败阿古柏匪军，为祖国“收拾金瓯一片”。以上事实表明，西方列强的入侵，促使左宗棠关心军事问题，而他军事素养的提高，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对反侵略战争的信心。

以上几个方面，反映了左宗棠研究战争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点，从而成为他的反帝爱国思想历久不衰、老而弥坚的渊源所在。诚然，左宗棠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思想必然打有忠于封建王朝和封建君王的烙印，反映出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就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而言，完全符合人民的愿望

---

① 《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68页。

和利益。因此，对于这种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颇为罕见的赤诚炽烈的爱国精神，还是应该持肯定、赞赏的态度，并从中吸取教益的。

第二十章　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

19世纪末叶，中国北方地区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并图谋乘机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于1900年6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发动了一场英、美、俄、日、德、法、意、奥等八国联合侵华的战争。为了保卫家园，中国军民在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牺牲，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

第一节　民族矛盾激化与义和团的兴起

一、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速了侵略和争夺中国的步伐。它们在中国竞相掠夺，建立特权，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德国于1897年11月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派舰队侵占胶州湾。次年3月，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胶澳租界条约》，以“租借”的名义强占了胶州湾，并把山东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俄国于1897年12月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随后又以重金贿赂李鸿章等人①，诱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和5月分别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及其《续约》。俄国于强租旅大后的第二年，竟擅改租借地为“关东省”，不仅霸占我辽东半岛，而且把东

① 参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二卷，第62页。

北全境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于 1898 年 4 月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湾，不久便划两广和云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则趁机于同年 6 月强租九龙半岛北部地区（“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周围的 230 多个岛屿（此前，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已被英国侵占），接着又强租威海卫为军港，并宣布广东和云南的一部分地区及长江流域部分地区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于 1898 年 4 月胁迫清政府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当时正忙于向中南美洲扩张，无暇东顾，但它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于 1898 年秋提出了一个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保护其在华利益。

帝国主义在华夺取势力范围，强租海港，构筑炮台，建立军事基地，控制了北自旅大南至广州湾的许多沿海战略要地，并可将军舰驶抵渤海湾内各重要港口，从而使中国门户洞开，京畿腹心要地也处于侵略者的军事威胁之下。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首先，它们趁清政府无力筹付对日战争赔款之机，三次强迫清政府以高息向外国银行借了约 3.1 亿两白银的外债①，加上其它各项债款，共约 5 亿两白银。清政府无法偿还外债，只得以关税、厘金、盐课作抵押，同时用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内债等办法，把财政赤字转嫁给人民群众。其次，各国还从在中国攫取的铁路修筑权中获取高额利润。据不完全统计，自 1895 年至 1898 年，被它们攫取的铁路修筑竟达 1.02 万公里之多。同时，各国还通过在华开矿设厂和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中国市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和摧残，

---

① 据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载，上述三次外债是：1895 年 7 月向俄、法借款，折白银 9896.8 万余两；1896 年 3 月向英、德借款，折白银 9762.2 万余两；1898 年 2 月向英、德借款，折白银 1.1277 亿余两。

广大农民、中小商人、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大批破产和失业。

在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自19世纪中叶开始，外国传教士即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进入我国的通都大邑和僻野乡村。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等，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约40个教区，60多个教会，有外籍传教士3300余人，中国教徒80余万。许多传教士和一些教徒，利用清政府给予的各种政治特权，为非作歹，欺凌百姓。还有不少传教士，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他们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甚至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活动。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①]供认，他对中国内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于天主教牧师的帮助[②]。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许多教堂都拥有武装，有的教堂内甚至藏有数门大炮和几百支步枪。对于这些无恶不作的传教士，中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不断掀起反洋教的斗争，并逐步汇集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自戊戌变法[③]失败后，中国的朝政大权再次被泥古守旧、妥协媚外

---

① 瓦德西（1832～1904），普鲁士波茨坦人。1888年继毛奇（1800～1891）为德军总参谋长，1900年升德国陆军元帅，同年8月启程来华，后任八国联军统帅。

② 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三），第45页。

③ 戊戌变法，亦称戊戌维新，系1898年（农历戊戌年）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派发起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运动。1895年清政府被日本战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政治要求的康有为等，在北京发动参加会试的13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主张变法图强。其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在各地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和报馆，大造变法图强舆论，影响遍于全国。1898年，光绪帝接受变法主张，起用维新派人士，从6月到9月陆续颁发各种维新法令，推行新政。9月21日，握有军政实权的守旧派头目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史称“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6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变法运动失败。

的慈禧集团所控制。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不可能指望这样的政府抵御帝国主义的瓜分和侵略，只有自己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才能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波澜壮阔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是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又一高潮。

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矛盾的加剧，特别是德、英两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威海卫并不断向内地扩大侵略以后，山东地区的反帝斗争日益高涨起来。在斗争中，大刀会、红拳会等秘密组织逐渐与义和拳结合，广泛开展毁教堂、逐教士、斗教民等活动。帝国主义及教会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极力予以镇压，甚至滥杀无辜，进一步激起了群众的无比憎恨，反帝浪潮更加高涨。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高唐、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均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在山东反洋教斗争影响下，直隶（今河北）人民也纷纷组织起来，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也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是教派（主要是白莲教）和军事合一的组织。其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少则几十人，多则100人以上，甚至上千逾万。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每哨50～100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10人，设班长（或称

什长）。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①。有的义和团组织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②。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木棍，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③、“毋贪财，毋好色”④ 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兴起后，提出了“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⑤等战斗口号，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曾先后多次下令对义和团“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⑥，“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⑦。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

---

① 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下同），上册，第93页。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59页。

③ 《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义和团》（四），第148页。

④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42页。

⑤ 包士杰：《拳时上谕·杂录》，见《义和团》（四），第147～148页。

⑥ 《军机处寄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页。

⑦ 转引自：《山东巡抚张汝梅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页。

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的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①，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②，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被迫接受这种改“剿”为“抚”、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清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控制义和团，但也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和不法教民的凶焰。

1899 年 10 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 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 18 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 11 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由于帝国主义进一步施加压力，清廷终于决心“剿除”山东义和团。1899 年 12 月，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指挥装备精良的武卫右军进行镇压。至 1900 年夏初，山东“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③ 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当义和团在山东蓬勃发展时，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大名府、河间府等地区的义和团也积极开展斗争，其活动迅速遍及直隶东南各州县。1900 年春季起，又向冀中地区迅速扩展。至 4、5 月间，保定、清苑、定兴、涿州（今涿县）、新城等地，已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同年 5 月中旬，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围攻正在添枪增炮、扩大反动武装的教堂，邻近的定兴、涿州、新城、易

---

① 《御史黄桂鋆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45 页。

② 《山东巡抚张汝梅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5～16 页。

③ 《山东巡抚袁世凯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94～95 页。

县各地义和团也纷纷前来相助，将教堂焚毁。清廷命直隶总督裕禄派兵镇压，迫使义和团向定兴县撤退。下旬，义和团又击败前往镇压的清军，并于 5 月 27 日攻占涿州城。随后，义和团乘胜北上，迫近清王朝的心脏北京。清廷急命裕禄等在各要道布兵防堵。但是，清政府的重兵防堵，阻止不了义和团进入北京的势头。

早在 1900 年初春，北京城内就有了义和团的活动。6 月上旬，京郊各县义和团分批涌进北京，城内居民积极参加。至 6 月下旬，北京城内的义和团"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①。北京城内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清政府极为不安，唯恐祸起肘腋，危及其统治地位，不得不采取"因而用之，徐图挽救"②的控制利用政策，派庄亲王载勋等总统义和团事务。

在北京义和团迅猛发展的同时，天津义和团运动也在蓬勃兴起。6 月初，静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新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和女首领林黑儿等，率领团众先后进入天津。旬日之间，神坛林立，参加者达 5 万之众。裕禄慑于义和团的声势，不敢再以武力镇压，转为采取笼络手段。他对义和团首领以礼相待，请张德成当军师，给曹福田"大令一支，使掌生杀之权，并可调用各兵队"③。这样，天津义和团得以在 6、7 月间用合法身份参加围攻天津租界内的侵略军以及抗击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的战斗。

第二节　帝国主义合谋侵华与清军作战部署

一、列强合谋武装侵华与八国联军的组成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即以此为借口，合谋

①②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87 页。

③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 17 页。

武装侵华。早在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公使即联衔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①。5月20日，英、美、俄、法、德、意、奥、西、葡、比、日等11国驻京公使举行会议，正式建议共同调兵来京，保护使馆和教堂，并于次日向清政府发出要求严禁义和团的联合照会。5月30日，英、法、俄、美公使又至总理衙门进行威胁，声称“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②。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的威逼，同意各国调少量兵员来京“保护使馆”。5月31日和6月3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奥等国先后两次共派官兵400余人进入北京。后又不断增兵，至6月8日，进京的侵略军（名为“使馆卫队”，实为八国联军先遣部队）已近1000人。③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各国还分别从在华军事基地、殖民地国家和国内抽调兵员，由军舰和运输船载运至大沽、塘沽，并进入天津租界。6月6日前后，驻华公使们议定的关于联合侵华的政策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至6月10日止，进入天津租界的日、英、俄、法、德、美、意、奥八国陆海军达3000余人。此后又陆续增兵。战争期间，列强在华联军最多时总兵力达12万余人（实际参战兵力约三四万人），装备火炮270多门。各国在华军队最多时的数额及编成情况大致如下：

英军2万余人（司令为盖斯里少将），共编4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随带火炮14门。

法军1.5万余人（司令为福里少将），共编2个旅，随带火炮60门。

德军2.3万余人（司令为瓦德西元帅），编成3个步兵旅、1个骑兵营，随带火炮62门。

---

① 〔日〕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169页。

② 转引自胡绳：《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112页。

③ 参见《义和团》（三），第174页。

俄军 2 万人（司令为李涅维奇中将），共 8 个步兵团、9 个骑兵连、6 个炮兵连，随带火炮 44 门。

日军 2.2 万余人（司令为山口素臣中将），共有 5 个步兵联队、1 个骑兵联队、1 个野战炮兵联队和 1 个大队、1 个工兵大队和 1 个辎重兵大队，携带火炮 58 门。

美军 5800 余人（司令为沙飞上校），共有 3 个步兵团、1 个骑兵团、1 个炮兵营及 1 个炮兵连，携带火炮 30 门。

意军 2000 余人（司令为伽略尼大校），由 3 个步兵营、1 个炮兵连、1 个工兵排、1 个辎重兵排组成，携带火炮 4 门。

奥军 300 人，主要是海军陆战队 1 个营。

八国联军中，日军是整建制（以第五师团为主），其余多系临时抽调编成。出兵较多国家的军队，一般均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铁道兵、舟桥兵等兵种，还有电信队、汽车队、医疗卫生队（或野战医院）、野战兵工厂、粮秣供给队、氢气球队（英军和法军）、杂役队等勤务分队。

八国联军开始没有联合指挥部，作战时通过司令官联席会议分配任务。联军在北犯之前就酝酿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因各国为争夺司令一职相持不下，一直拖到 1900 年 8 月 17 日才勉强同意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迟至 9 月 25 日才到达天津。

二、清军概况及战前部署

戊戌政变后，慈禧为了加强京畿防御，委派前兵部尚书、大学士荣禄节制北洋各军。荣禄即奏请编组武卫军：以聂士成所统武毅军驻芦台为前军，董福祥所统甘军驻蓟州为后军，宋庆所统毅军驻山海关为左军，袁世凯所统新建陆军驻小站为右军，别练万人驻南苑为中军（荣禄兼统）。武卫五军共约 6 万人，编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各兵种，初具合成军队规模。此外，清政府还命湖北提督张春发招募 10 营，编成武卫先锋左翼，江西按察使陈

泽霖招募 10 营，编成武卫先锋右翼，以便有事时声援京师。

战前，在直隶、京津地区建筑的津榆、京津（芦津）、芦保等铁路已经完工，可以用来调运军队。此外，从通州（今北京通县）至大沽，还可以经北运河、白河（今海河）运输兵员、军械、粮饷。同时，这一地区各府、州、县城之间，都有有线通信线路，并可与全国不少省城联系。全区各地还普遍设立了邮政局。所有这些，对于清军的兵力机动和改善作战指挥提供了条件。

战争爆发前夕，在直隶、京津地区的清军（包括武卫军和直隶淮军、练军、八旗兵、绿营兵以及京城禁卫军神机营、虎神营等）共有 11.4 万余人，其配置情况大致如下：

北京地区约 6.5 万人。荣禄自统武卫中军 30 余营 1.3 万人驻南苑；尚书衔武卫后军总统董福祥部 20 营 6786 人原驻丰润、玉田一带，6 月 10 日后调驻北京东南郊；庆亲王奕劻所统神机营 25 营 1.4 万余人、端郡王载漪所统虎神营 14 营 8640 人分守北京各城门；此外尚有八旗、绿营兵 2 万余人驻北京城内。

天津地区约 2.7 万人。直隶提督、武卫前军总统聂士成所部 34 营 1.5 万余人驻芦台、开平一带；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淮军 10 营 4750 人驻大沽、天津等地；总兵李安堂部淮军 5 营 2318 人驻北塘、圣头沽一带；总兵何永盛部练军 6 营 2500 人驻天津；工部侍郎、武卫右军总统袁世凯率 7000 余人去山东后，余部 3000 余人驻小站。

山海关地区约 1.4 万人。总统武卫左军、四川提督宋庆及会办武卫左军、浙江提督马玉昆部 25 营 9806 人驻山海关内外（6 月 17 日后，宋庆、马玉昆部奉命陆续赴津）；总兵吕本元部淮军 5 营 2500 人驻山海关一带；八旗兵马步 1000 余人守山海关城。

保定、正定、大名府等地驻有练军 16 个营，约 5500 人。

宣化、永宁、古北口、热河（今承德附近）一带，驻有练军 11 营 3200 余人。

此外，清廷又于 6 月中旬谕令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星驰赴京，听候调用，并令张春发、陈泽霖等迅速统兵来京；同

时，招募民团、乡勇及一部分精壮义和团员，编练成军，以增强北京和天津的防御力量。但是，各省督抚接到谕令后，或借故推诿，或行动迟缓，真正应命前来参加勤王作战者寥寥无几。

第三节　大沽、天津之战

一、阻击西摩尔联合部队

列强于1900年5月底6月初派兵进入北京后，6月9日，驻天津各领事又开会决定，立即派一支联合特遣部队乘火车前往北京，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美国海军上校麦克卡拉分别担任正副统帅。当晚，西摩尔等率领由当时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八个国家的军舰上抽调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联合部队，分乘炮艇和鱼雷驱逐舰溯白河而上，于次日凌晨在塘沽登陆，转乘火车到达天津。

6月10日上午，西摩尔率军2100余人强占火车多列，分批自天津出发，向北京逼进。（参见附图27）

当时，京津铁路有些地段已被义和团拆毁，西摩尔派兵边修边进，次日下午方抵廊坊。12日，正当西摩尔督队抢修前方铁路时，附近的义和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冲上前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迫使侵略军逃向廊坊车站。义和团紧追不舍，将侵略军围困于廊坊。14日晨，侵略军正欲继续向北京逼进。义和团300余人大声疾呼，冲向廊坊车站，毙伤敌兵多人。当日下午，义和团还对留守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袭击，西摩尔不得不派兵回救。

鉴于前进无望，西摩尔于16日率部撤至杨村。18日14时30分，义和团2000余人及从北京赶来的董福祥部武卫后军3000余人，向尚留于廊坊的侵略军两列火车发起进攻。经过80多分钟的激烈战斗，毙伤敌50余人。侵略军撤至杨村车站后，又遭义和团包围袭击，死伤近40人。

19日，西摩尔率领的联合部队已处于缺粮少弹、被动挨打的窘境，遂决定抢夺附近民船，运载伤兵、军械，顺北运河撤回天津，部队则沿北运河东岸步行。侵略军从杨村撤退后，由于途中不断遭到义和团及清军聂士成部的袭击，受创甚重，行动迟缓，直至22日2时左右方抵近天津西北郊的西沽。

西沽有清军的武库（军械局），内贮大量枪炮弹药，周围墙垣甚厚，防御条件较好。但由于守军疏于防范，武库于22日凌晨被侵略军攻占。西摩尔部得到了粮弹补充，获得了喘息机会，于是暂驻西沽，并秘密派人前往租界求援。26日，侵略军摧毁西沽武库，在2000余名援军的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

这次阻击西摩尔联合部队之战，共击毙侵略军62人，击伤228人，粉碎了敌人进犯北京的计划，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义和团的勇敢精神，使侵略军受到很大震惊。战后，西摩尔心有余悸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①

二、大沽口保卫战

正当西摩尔侵略军在廊坊一带受到义和团及清军阻击时，联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占了大沽。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该处炮台进行了修复和改建。八国联军进犯前夕，大沽口南北两岸有4座炮台：主炮台在白河口南岸，安设各种火炮56门，并有发电所、电信局各一处，探照灯两具；主炮台之南建有一座炮台，安设各种火炮20门。白河口北岸建有西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74门，并有电信局一处；北炮台之北建有西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20门。这些火炮大部是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式和国内仿制的产品。

---

① 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辛丑年正月。

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有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淮军6营3000人及1个水雷营。此外，还有北洋海军统领叶祖珪所率"海容"号巡洋舰1艘和"海华"、"海龙"号等鱼雷艇4艘，泊于白河口内。

根据以往的不平等条约，列强的舰船可以出入白河口而不受任何阻拦。1900年5月底，大沽守军拟增兵驻守大沽火车站，控制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并在白河口布设水雷，阻遏外舰出入。帝国主义者得此消息，决定先发制人，遂于6月15日在俄国旗舰"俄罗斯"号上开会，研究确定了从水陆两路攻取大沽的作战部署，当即令先已驶入白河的10艘吃水较浅的舰艇做好战斗准备，并派遣日军300名（随带火炮两门）于当晚至塘沽登陆，占领塘沽火车站，另由250名法军和俄军强占军粮城火车站，控制津沽铁路。16日，各国海军头目又开会精心策划，并令已在白河内的各舰驶泊各自的作战位置。当日，又有英、德、俄等国军队约600人，由德国海军大校波尔指挥在塘沽分批登陆（连同15日晚登岸的日军，共有900余人），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至此，联军的作战部署已基本就绪。

这时，大沽守军也加强了炮台的守备，并于16日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阻止敌军舰船出入。联军即以此为借口，于16日20时给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守军于17日凌晨2时前交出炮台。驻天津各国领事也将同样内容的通牒递交裕禄，但实际送交时间是17日10时以后。罗荣光严辞拒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并立即传令各炮台准备战斗。

17日零时50分，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70分钟，侵略军便开始进攻大沽炮台。泊于白河的联军舰艇首先发炮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守军被迫还击。这时，集结在塘沽的联军分左中右三路直逼西北炮台。在敌军猛烈攻击下，西北炮台于5时左右失守。6时许，联军未遇抵抗便占据了北炮台。之后，陆路联军从北炮台协同军舰向南炮台猛烈轰击。同时，俄、德、法军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过白河，由海神庙船坞登岸，从侧后抄袭南炮台。南炮台守军腹背受敌，弹药库又中弹起火，被迫撤退。至6时50分，大

沽炮台全部失守，清军残部向新城方向退走。此次作战，清军阵亡七八百人，由于叶祖珪贪生怕死，拒不参战，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及4艘鱼雷艇也被联军掳走。联军死58人，伤197人，另有4艘战舰负伤。

联军夺占大沽炮台后，控制了大沽口和大沽火车站，于是海上援兵得以顺利地运往天津，使津京、直隶地区军民的防御作战增加了不少困难。同时，联军分兵占领了附近的塘沽、北塘、新河等村镇，大肆烧杀。

大沽炮台的失守，与清政府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轻大沽、天津的方针有很大关系。6月上旬，各国军舰云集大沽，侵略军大批登陆之际，清政府仍未增派军队加强大沽、塘沽、北塘的守卫，致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车站、海关等地的3000名清军，在毫无后援和不能互相策应的情况下，被侵略军各个击破。

三、清廷的宣战

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主战派与主和派进行了激烈争论。慈禧举棋不定，时而想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对抗，时而急令袁世凯、马玉昆统兵来京剿团，时而电召李鸿章由广东晋京商讨对策，以避免联军大举进犯北京。6月16至19日，慈禧连续4次召开御前会议。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她再次宣布暂时停止镇压义和团，如外国继续进兵，就与之开战。会后，又根据各国公使的要求，派兵严加保护使馆，希图以此换取外国停止进兵。

17日，慈禧接到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同时又接阅端郡王载漪等人伪造的列强勒令她归政光绪的假照会①，便

---

① 1899年，慈禧太后经与载漪、刚毅等人密谋，决定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即皇储），准备废掉光绪帝。此举遭各国公使反对，慈禧等人十分恼怒。为进一步激怒慈禧，载漪等人伪造一个所谓“各国照会”。其中“太后归政”一条，对慈禧决定宣战起了关键作用。

怒不可遏，决定利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义愤，与列强一战。19日，大沽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照会各国公使，限24小时内离京赴津。20日下午，北京义和团及部分清军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21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谕旨"。然而，这个图谋利用义和团，同时也为了发泄私愤的"宣战"，不久就变成了屈膝投降，义和团也很快被慈禧集团出卖了。

四、天津之战

（参见附图28）

八国联军攻占大沽之后，其后续部队即由此大批登陆，大规模地向北京的门户天津进犯。联军的战略意图是夺取天津，保证紫竹林租界的安全，并以天津为根据地，进而占领北京。

早在大沽失守和清廷发布宣战《上谕》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已与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6月15日前后，天津的义和团激于义愤，焚烧马家口及三岔河口望海楼等地的教堂。联军开枪镇压，义和团奋起还击。17日，联军攻占大沽的消息传到天津，义愤填膺的义和团和聂士成部清军便开始反击老龙头车站及违约擅自进入紫竹林租界的联军，揭开了天津军民反侵略战争的序幕。

当时，驻守天津的清军有：总兵何永盛部练军6营2500人驻天津城东侧、东机器局（东局子）、马家口及西沽武库至三岔河口一带；水师营驻三岔河口北岸炮台及金钟河火药库；罗荣光部淮军4营1750人驻城东及紫竹林租界西侧；聂士成部武卫前军10营约5000人驻城西南的广仁堂、南门外海光寺、南机器局（西局子）、紫竹林租界东北侧及老龙头车站北部一带。总兵力约1万人左右。租界内的联军约有2100人。

从当时的兵力数量对比看，天津地区的清军和义和团居于绝对优势。如果彼此密切配合，实行分割包围战术，有可能将分兵把守租界的联军各个歼灭。但由于清军天津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裕

禄根本没有决心真正同联军作战，以致丧失了战机。

至6月下旬，双方在天津的兵力都发生了变化。这时，武卫前军杨慕时部3营1000余人已抵北郊西沽、红桥一带；聂士成已率参与阻击西摩尔侵略军的武卫前军5营2000余人回师天津；又有从大沽撤至津郊的淮军6营约2000人，其中一部驻租界西面的马家口附近。义和团主要有：曹福田部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韩以礼部在天津西南郊一带，被称为"天下第一团"的张德成部5000人在马家口一带。

联军则于6月21日由俄国少将斯捷谢利率领2800余人从大沽乘火车增援天津。这股侵略军行至军粮城车站时，因铁路被毁，改为步行，后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遭到义和团曹福田部及部分清军的猛烈阻击，死伤500余人，第二天才进入车站。23日，又开来一部分联军，在租界内联军的接应下，进入租界。至26日，连同从西沽武库撤回的西摩尔侵略军，租界内的侵略军增至1万余人。

联军的兵力虽然增加了，但处于义和团和清军的包围之中，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联军各军司令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万不能向北京进发，只得暂在天津，以图自保"①。于是决定采取固守措施，由各军分区防守。

紫竹林租界位于天津城东南，东临白河，北面隔河紧靠老龙头火车站。6月23日，联军各司令官会议决定：俄军防守老龙头火车站至租界东面的武备学堂一线；法军防守租界西北部；美军防守租界西南部；日、英、德、意、奥各军分守自租界西南端沿墙子河至梁园门一带。除加强租界区防守外，还分兵控制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

6月22至29日，围攻租界的清军约有1.6万人，义和团3万余人。但是，由于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致使联军能不断得到兵力和粮弹的补充。27日，联军集中近3000人的兵力，

---

①〔法〕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93页。

攻占了天津城东面的清军主要军火补给点东机器局。联军夺占该局后，既可免遭该处清军对租界的炮击，又可保证租界与大沽“联为一气”，改善了防御态势，因而“视为极大之幸事”①。

6月30日，裕禄向清廷提出一个“先将紫竹林洋兵击退，然后会合各营，节节进剿，直抵大沽……迅将大沽炮台恢复，以固门户”②的作战方案。这一方案，是以清政府调赴天津的援军陆续到达为前提的。6月29日，浙江提督马玉昆部武卫左军15营6000余人，已由山海关进驻白河东岸陈家沟、老龙头火车站附近；6月底7月初，聂士成部武卫前军除留5营驻守芦台外，共25营1万余人陆续齐集天津，分驻于海光寺及盐坨、陈家沟等地；宋庆部武卫左军13营正在增援途中。同时，清政府又从天津水会各局中招募精壮万余人，成立芦勇、保卫军、安卫军，并将南门外数十个打雁户组成排枪队，驻守南门附近。至此，在津清军已增至2.4万余人，各种民众武装约万人。此外，又有义和团2万余人从青县、静海、沧州、南庆、庆云等地纷纷来津。曹福田、张德成等趁机整顿队伍，使能参战的义和团增至5万人。

此时，从大沽登陆的联军约有1.4万人③，进入天津紫竹林租界者近万人。

7月5日，裕禄、聂士成、马玉昆等同义和团首领商议，决定对租界内的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其部署是：由义和团曹福田部及武卫左军马玉昆部继续从北向南进攻老龙头火车站，夺回东机器局，控制附近铁路线，切断联军至大沽的交通，并相机从北面进攻租界；驻盐坨的武卫前军前路统带周鼎臣部3营助攻车

---

① 〔法〕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94页。

② 《直隶总督裕禄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9页。

③ 截止1900年6月30日，从大沽登陆的八国联军总计达14002人(其中德军1344人，英军1884人，日军3828人，俄军5934人，法军404人，美军349人，意军120人，奥军139人)，共携炮53门、机枪36挺。

站及租界。由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罗荣光部、练军何永盛部，在马家口一带从西面进攻租界。由驻南门外海光寺一带的聂士成部武卫前军，从西南面进攻租界。武卫前军后路统领胡殿甲除派一部助攻东机器局外，率领各营四面游击，进行机动作战。其余练军各营、水师营、盐坨各营仍继续炮击租界。

三面进攻开始后，天津之战进入了更加激烈的阶段。

在租界北面，马玉昆部在周鼎臣部配合下，继续炮击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义和团多次勇猛冲杀，迫使俄军一度退出车站，联军增派日、英、法军前往死守。马玉昆部还与胡殿甲部一起先后5次猛攻东机器局，虽未夺回该局，但杀伤不少敌人。

在西面，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蒋顺发、周行彪部于7月5日晚在靠近租界的马家口同联军激战。张德成事先将义和团群众埋伏起来，然后出其不意地发起围攻，歼敌甚众，并乘胜进抵租界边缘。6日，张德成部以火牛数十只为前驱，踩爆联军埋设的地雷，一度冲进租界。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也积极配合清军及义和团打击敌人。

在西南面，聂士成部于7月6日在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安置火炮，轰击租界。联军五六百人被迫退至跑马场地道内潜藏，稍后复出，又被清军炮火击散。当晚，聂士成部进驻八里台、跑马场等地，次日又攻至租界南部外侧的小营门一带。

联军为了解除南机器局、跑马场、八里台等处聂士成部炮火的威胁，决定向城西南发起反击。7月9日凌晨3时，联军步兵1000人、骑兵150人、炮兵两个连（携带火炮9门），出梁园门，分左右两路进犯。左路为日军（500人），向南进攻纪家庄一带的韩以礼部义和团；右路为英、俄、美军，向跑马场、八里台、南机器局发起攻击。法军炮队自租界西南发炮助攻。5时半左右，联军逼攻跑马场，该处清军退往八里台。聂士成闻讯，从小营门率部往援。7时左右，联军夺占跑马场后，即涌向八里台围攻聂士成部。攻占纪家庄的日军也北上协攻。激战中，聂士成重伤多处，仍挥军奋战，终因伤势过重而阵亡。日军趁势攻占南机器局。因该

局离租界太远，不便驻守，联军将其烧毁，于午后撤回租界。聂士成牺牲后，在津武卫前军余部归马玉昆指挥。

义和团及清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使联军进一步陷入“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疲惫已极”① 的境地。但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激励军民继续奋勇杀敌，扩大战果，反而急于求和。7 月 8 日，任命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至津前由裕禄署理），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为求和作准备。害怕财产和商务毁于战争的天津缙绅，趁机奔走相告，一时和议之声传遍前线，加上聂士成部作战失利，大大影响了军民的抗敌意志。武器简陋的义和团，在连日进攻作战中，被清军胁迫“充先锋当前敌”②，伤亡很大。7 月 10 日，宋庆（从山海关来）率部到达天津，驻于西门外。他见慈禧已由“主战”变为投降，抵津不久便借故下令屠杀义和团，“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③，大大削弱了抗击联军的力量。联军则由于大沽援军不断到达，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于是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7 月 12 日，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 1.7 万余人，大炮 40 余门。侵略者见清军的进攻业已停止，便准备进攻天津城。当日，联军指挥官会议决定分两路攻城，由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任总指挥。其部署是：阿列克谢也夫率俄军 2600 名为前队，德军两个步兵连、法军一个炮兵连为后援，共约 3000 人，从白河东岸向北进攻三岔河口水师营炮台及天津城东北，切断河东清军及义和团与城内的联系。由英军少将陶白率英军 700 人，美将白勒率美军 600 人，日将福岛率日军 2400 人，法军大校派拉克率法军 800 人，共 4500 人，携火炮 24 门，进攻天津城南门。

当时，清军水师营守三岔河口炮台，马玉昆部 15 营驻老龙头

① 〔法〕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 299 页。

② 佚名：《遇难日记》，见《义和团》（二），第 171 页。

③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 156 页。

车站北侧地区，聂士成部25营由周鼎臣、胡殿甲等5个统领率领驻广仁堂、海光寺、南机器局一带，罗荣光（7月9日已亡）余部驻城东南至租界西侧一带，练军何永盛部、淮军其余各部及水会等民众武装，守南门及分驻南门外各村落，宋庆部驻西门外，义和团则分散于城内外各地。从兵力部署看，清军建制杂乱，没有统一指挥，而且大部分驻守城外各地，城内驻军很少，没有坚守防御的准备。

12日夜，白河东岸的俄军向北进攻，13日黎明炮击马玉昆等部阵地。7时左右，法军炮击城东北壕墙外的火药库，引起爆炸。俄军乘机强攻清军各阵地，并向水师营炮台进攻。至13日中午12时，军心业已涣散的宋庆、马玉昆等部清军纷纷向北郊溃退，联军乘胜进抵东北城下。

白河西岸的英、美、日、法各军，以法军为右路，日军为中路，美、英军为左路，于13日凌晨出租界南面土墙，经海光寺向天津城南门进逼。英炮兵则在租界南面壕墙上炮击天津城区。南门外清军奋起抵抗，正西门附近的武卫前军炮兵开炮轰击海光寺附近的联军。此前，城门外居民已挖开河堤，使联军被阻于海光寺附近一带。日、英、法军指挥官决定架桥强攻。14日，日军过护城河，直抵南门城下，然后派工兵用炸药轰破城门，乘机攻进城内。义和团及民众武装同侵略军展开巷战，毙伤敌人数百名，终因火力悬殊，被迫后撤。

联军从南门入城后，便配合城东北的联军夹攻水师营炮台。该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虽腹背受敌，仍英勇作战，在毙伤敌人200余名后撤离。当日下午，联军占领天津，洗劫全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城内抗击联军的义和团大部惨遭杀害，退出城外者又遭宋庆军屠杀，伤亡数千人。

在联军攻城时，驻扎于城外的宋庆、马玉昆部70余营2万多人，不但不迎击敌军，反而临阵脱逃。天津前线最高指挥官裕禄，于城破前即同宋庆所部一起逃往杨村，马玉昆则率部逃往北仓，只有部分装备简陋的义和团以及练军、水师等万余人始终英勇顽强

地坚持抗战。

这次作战，八国联军死伤900余人（其中校以上军官25名），是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伤亡最多的一次。

天津之所以迅速失陷，主要是由于慈禧集团推行以战求和政策和一些前线指挥官畏敌怯战造成的。天津的义和团及部分清军官兵，在围攻紫竹林租界时，杀敌热情很高，多次给联军以沉重打击。但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慈禧等人转战为和的态度日趋明朗。她派宋庆帮办北洋军务，率部前往天津，名为加强防御，实为媚外求和。宋庆对慈禧旨意心领神会，故当即表示："中东之役，仅与日本开衅，尚不能支，何况今拒八国？"① 在作战过程中，裕禄、马玉昆等人驱使装备简陋的义和团群众充当先锋，让清军殿后。义和团既遭外国侵略者的轰击，又遭清军的枪杀，伤亡极大。如在7月9日夜进攻租界的一次战斗中，义和团民阵亡2000余人，而清军伤亡甚少。对此，当时就有人披露，"是夕'团匪'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②。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无疑会使义和团这支真正的反帝爱国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加上裕禄等人害有"恐洋病"，既未及时切断联军后路，又没有坚守天津的决心，遭敌进攻便弃阵西撤，以致本可固守的战略要地天津城，两天内即被联军攻占。

联军攻占天津后，使津沽之间完全连成一片，有了可靠的基地，军械、粮饷得到了补充，摆脱了被动局面。清军则失去了重要军火供给基地和拱卫北京的主要屏障。事后，清政府给裕禄以"革职留任"、宋庆"交部议处"的处分，令其戴罪"联络各军，并将水会民团重加整顿，克期规复天津"③。实际上，裕禄、宋庆等人已畏敌如虎，"坐困偏隅，一筹莫展"，根本没有收复天津的决心。

---

①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35页。

② 佚名：《遇难日记》，见《义和团》（二），第171页。

③ 转引自《直隶总督裕禄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6页。

第四节　北京之战

一、清军在津京间的防御部署

天津失陷后，清廷一面令从天津撤退的部队在北仓、杨村等地设防，一面调派其它部队增强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防御，总计京津间兵力不下10万人①。此外，还有义和团7万余人，其中北京城内约有5万，另2万余人分散在津京间的交通沿线。

为阻止联军沿北运河北上，退至北仓一带的清军万余人在马玉昆的统率下，于北仓以南横跨运河构筑了两道防御阵地。第一道由刘家摆渡（今刘家码头）、韩家树（今韩家墅）、火药局（今杨家咀附近）、刘家房、唐家湾、穆庄（今天穆村）等据点组成，构筑了火炮阵地，埋设了地雷，由武卫左军、武卫前军及淮军、练军等9000人防守。第二道以北仓南的王庄为中心，构筑向左右各延伸3公里的垒墙，并在各要隘埋设地雷。在北仓东南和西北构筑了火炮阵地，分别配置10门和14门火炮。北仓东南地势空旷，于马家庄筑坝开沟，引水淹灌。第二道阵地由武卫左军四五千人防守。此外，北仓附近尚有一二千人作为预备队。

宋庆以杨村车站为中心，跨北运河构筑了正面约5公里长的垒墙，由5000人驻守；并沉大船二三十只于运河中，以堵塞水道。

7月18日，清廷派翼长长麟、文瑞分统北京义和团2000余人

---

① 其时，马玉昆部15营、聂士成余部4营、吕本元部5营、何永盛部5营、安卫军2营，共约1.5万人退至北仓；宋庆部13营退至杨村。芦台有武卫前军冯义和部17营、胡殿甲部5营。此外，部分勤王之师也陆续到达：杨柳青有记名总兵蒋尚钧部豫军5营，北京附近有湖北提督张春发部武卫先锋左翼10营，江西按察使陈泽霖部武卫先锋右翼10营，登州镇总兵夏辛酉部嵩武军6营，前曹州镇总兵万本华部晋威军4营，陕西布政使升允部陕军8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部甘军6营。北京城内有驻军六七万人。

前往通州及其以南地区，挖壕筑垒，令其“扼要助剿，勿任敌兵北犯”①。

二、联军北犯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立即派兵占据各要隘、炮台，修整工事，防御清军及义和团的反攻，并成立“都统衙门”②，以维护其侵略秩序。同时，继续调兵遣将，准备进犯北京。

7月底8月初，联军在天津的兵力已增至3.4万人，北上作战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8月3日，召开指挥官会议，协调了彼此间的意见，拟定了进攻北京的计划，准备集中兵力，攻占北运河两岸各战略要点，最后夺取北京城。

8月4日下午，联军集中1.9万余人③及81门火炮，从天津出发，沿北运河两岸向北仓进犯。运河右岸为日、英、美军，共计1.3万余人，携带火炮53门；左岸为俄、德、法、意、奥军，共5900余人，携带火炮28门。5日2时许，联军接近并进攻清军第一道防御阵地的刘家摆渡、韩家树、火药局等据点。清军稍事还击，即溃散撤退。5时左右，第一道防御阵地被敌攻占。之后，日军从西侧，英军从中部，美军为后援，进攻清军的第二道防御阵地。日军由西侧“绕道十余里，出马军后”，马玉昆部“尽失其险”。④ 在联军前后夹击下，清军腹背受敌，且战且退。当清军同联军接战时，附近义和团数千人赶来助战，虽然给联军以不小的打击，但也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日9时，北仓防线及北仓据

---

① 参见《步军统领载勋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48页。

② 都统衙门，系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共管天津的临时殖民机构。

③ 其中：日军8000人（山口素臣将军统率）、俄军4800人（李涅维奇将军统率）、英军3000人（盖斯里将军统率）、美军2100人（沙飞上校统率）、法军800人（福里将军统率）、德军200余人、奥军58人、意军53人。

④ 胡思敬：《驴背集》，见《义和团》（二），第497页。

点全被敌人攻占。北运河左岸的联军因徒涉水淹地，行动迟缓，战斗结束后才赶到北仓。

6日晨，联军乘胜分路进攻杨村的清军阵地。俄、法军攻清军右翼，美军攻左翼，英军从正面进攻，日军为后应。宋庆军一触即溃，与马玉昆残部一起，向通州方向败退。直隶总督裕禄逃至南蔡村后，自杀而死。8月8日，南蔡村失守。

在清军丢失北仓、杨村前，清政府命李秉衡统率"勤王师"前往河西务一带御敌。李秉衡曾任山东巡抚，奉命进京前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7月25日陛见慈禧时，他自动请求赴前线杀敌。次日，清政府即任命他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所有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均归该大臣节制"①。8月6日，李秉衡离京，8日抵河西务。他见北仓已失，决定在河西务布防迎敌，随令张春发部10营、万本华部4营驻守河西务；陈泽霖部10营驻守河西务西侧；自率夏辛酉部6营驻守河西务西北8里之羊房。9日晨，清军防御阵地尚未构筑完毕，两路联军即已包抄河西务。战斗打响后，张春发部稍战即退南苑，陈泽霖部也大部溃逃。万本华部虽同联军接战多时，但因兵力不足，无法击退联军的进攻。李秉衡督率夏辛酉部迎敌，升允也率马队两旗助战，经激战后均退马头。当天，马玉昆率败退的清军路过河西务，竟遇敌不战，一直溃逃到南苑。该部同宋庆败军一起，沿途焚掠洗劫，人民深受其害。李秉衡目睹数万清军不战而逃，颇为愤慨，但又无法阻止。10日，李秉衡由马头退至张家湾，次日即吞金自杀。联军随即夺占张家湾，并派兵袭击通州。该城守军有险不守，弃城逃京。

12日晨，联军不战而据通州后，尽获库中军械、粮饷。除留德、法军一部驻守外，主力直扑北京。

从8月5日至12日8天之内，不足2万人的侵略军竟然连续攻占了数万清军防守的北仓、杨村、河西务、通州等战略要地，直接威胁北京。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清军已被恐敌和失败情绪

---

① 《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5页。

所支配；战术上又采取了分兵守点的单纯防御，各要点未构筑起足以阻敌前进的坚固阵地，结果在敌人并力猛攻下全线崩溃。李秉衡虽请缨上阵，无奈军心已散，所统各军又皆临时应命之师，不能同心协力御敌，以致无法挽回败局。

三、北京的陷落

通州失守后，清军七八万人齐集北京：宋庆、马玉昆部万余人驻南苑；董福祥部25营驻广渠门、朝阳门、东直门；荣禄部30营驻西华门、棋盘街；八旗、绿营2万余人驻内城9门、外城7门；虎神营、神机营等39营驻守各门城楼；八旗前锋和护军守紫禁城。义和团5万余人分别守卫东西河沿、东西珠市口、菜市口、花儿市等处。全部城防由军机大臣荣禄负责，与大学士徐桐、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等共商重大事宜，实际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

8月13日夜，联军1.5万余人携火炮100余门，分三路冒雨进逼北京：日军7200人，携火炮54门，从通州出发，经八里桥、定福庄、红庙、关东店，先头部队于14日7时半抵达朝阳门外东岳庙附近；俄军3480人，携火炮22门，沿通惠河北岸经八里庄、八王坟、郎家园，于14日黎明前抵近东便门；英军2250人，携火炮13门，沿通惠河南岸经苏家沟、关厢附近，于14日11时抵近广渠门；美军1820人，携火炮6门，随英军后开进；法军400人，携火炮18门，循俄军路线开进。另有3000名联军从天津出发，以为后援。

俄军先头部队于13日午夜到达东便门，因途中未遇任何抵抗，认为可以轻取城门，遂立即攻城；讵料清军和义和团"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①，只得向日军求援。日军于14日上午8时在朝阳门、东直门外1500米处开炮轰城，遭清军炮火还击。董福

① 〔法〕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308页。

祥在得知上述三门受到攻击后，即调广渠门守军往援。11时左右，英军抵广渠门，乘虚攻城，下午2时进入城内，随即占据天坛。由于事先接到情报，英军得知水门处河道枯涸，便涉淤泥进入内城，下午3时左右首抵使馆区。随英军之后的美军，也于下午5时许进入使馆区。进攻东便门的俄军在部分美军配合下，一部于14日午后从城门洞隙处匍匐而入，一部攀上城墙，打退守军，进入城内，随后进攻内城建国门。进攻东直门的日军，不断以炮火猛烈轰城（发弹万余发），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炮；然后派两个工兵队携带炸药包，于晚9时许对第一、第二门连续爆破，晚9时40分占领东直门。接着，日军北占安定门，南破朝阳门，于晚10时许进入城内。法军也于14日午夜入城。

8月14日，在京城即将被联军攻陷时，慈禧欲召集六部九卿议事，但无一人应召，只得同入值大臣载澜商量出走事宜，并令载澜负责护卫。载澜借口无兵而推辞，并建议张白旗投降。15日晨，当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挟持光绪帝，同载澜、载漪、奕劻、刚毅等王公大臣仓皇出西华门和德胜门，经颐和园、居庸关等处，往太原方向出走。

联军进城后，清军大部溃散，仅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筑起街垒，继续同侵略军战斗。15、16日，联军攻占了各城门和紫禁城，17日占领全城。

此役，联军死伤450余人，内有校以上军官25人。清军伤亡4000余人，义和团民牺牲甚众。

联军攻陷北京后，纵兵抢劫3天，皇宫、官邸、商店、富家民宅无一幸免。“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①。尚留在城内的义和团及不少无辜百姓，惨遭屠杀。“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经是乱，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肩摩毂击者，如行墟墓间矣。”②

---

① 柴萼：《庚辛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16页。

② 印鸾章：《清鉴纲目》，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04页。

像攻占天津一样，联军成立军事殖民机构“北京管理委员会”，将京城划为11个区，分别由各国侵略军占领。同时，联军继续增兵，加强京津间战略要地的守卫，并对北京周围50公里内的重要村镇巡回扫荡，沙河、八大寺、玉泉山、芦沟桥、良乡、庞各庄、礼贤镇等地先后被占。

9月25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到达大沽，10月17日进京，设总司令部于紫禁城的仪銮殿。此时，联军在华兵力已逾10万，驻北京部队超过3万人。

北京守军数倍于敌，之所以迅速沦入敌手，除了清廷政治腐败，军队士气不振这一根本原因外，从防御部署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没有在联军进攻方向的正面和两侧集结必要兵力，阻击和侧击敌人，而是将七八万兵力密集于城区，使联军得以长驱直进，迅速兵临城下。其次，清军虽然装备了不少近代枪炮，但其守城战术仍然是过去的一套旧法，以8000名士兵分别守卫各城门的城楼和城垛，将近900门新旧火炮配置于城上，冀以居高临下的炮击，阻止联军的进攻。结果，城上火炮被敌炮击毁，城墙遭敌工兵连续爆破，无险可守。城内各区守军，也因没有在主要通道口构筑巷战工事，以致东三门被联军突破后，全城很快沦陷。此外，北京的失守，还在于缺乏有权威、会指挥的最高统帅，以致各部分区防守，互不统属，互不策应。结果，东城各门被联军分别攻破，其它各门、各区的守军也很快不战而散。

第五节 《辛丑条约》的签订

慈禧携光绪帝等离京出走后不久，马玉昆、董福祥、宋庆等人相继率部赶往山西护驾，荣禄等则南逃保定。为防联军进犯山西，清廷在北京的北、西、南三个方向部署兵力：北面的南口、居庸关、宣化、张家口等处，由马玉昆部驻守；西面的飞狐岭、紫荆关、灵丘等关隘，由升允所统陕军8营驻守；南面的保定、正定、井陉等地，由荣禄率武卫中军及从北京败退至此的80余营清

军驻守。张春发、陈泽霖部则撤回南方整训。

早在8月7日，清廷即以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令其“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①。北京失陷后，慈禧继续加紧进行求和活动。8月27日，清廷令庆亲王奕劻（正在西撤途中）即日回京议和，令李鸿章迅速赴京“会同妥商办理”。为了向各国表示求和诚意，又于9月7日发出了一个对义和团毕露杀机的上谕，声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②。从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合流，共同镇压义和团。

然而八国联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占领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各国提出的各种“赎罪条件”，以“直隶一带，尚有华兵固守之要区，拳匪聚合之党队”③ 为借口，继续从京津出兵四向攻掠。至1901年4月，联军控制了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直隶四周要隘。他们在占领区内往来巡梭，横行无忌。凡有义和团活动之处，均遭焚掠。

1901年9月7日，清廷以奕劻、李鸿章为钦差全权大臣，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及荷、比、西等11国全权大臣，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通过此约，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逼迫清廷向其“谢罪”，惩办主张抵抗的大臣与官吏，并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会社，“违者皆斩”，官员对此镇压不力者，“即行革职，永不叙用”。④ 在经济上，勒索战争赔款4.5亿两白银，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连本带息共9.8亿余两。在军事上，强迫清廷允许各国在使馆区驻军；将大沽及北京至大沽沿路的各炮台一律拆除；各国可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的

---

①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6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468，第18页。

③ 〔法〕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311页。

④ 《辛丑和约条文》，《义和团》（四），第498页。

军事要地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今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12处留兵驻守。条约签订后，各国于9月17日撤出在京兵员（驻使馆区兵员除外），22日开始撤离直隶（驻兵留守地除外）。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武力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它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造成了更深重的民族危机。但是，慈禧却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①。从此，清朝统治者完全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的彻底失败。这场战争，虽有慈禧集团受权力欲的驱使而轻率“宣战”的一面，但实际点燃战火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军民来说，完全是一场被迫进行的、民族自卫的正义战争，虽然失败了，仍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义和团以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或者独立作战，袭扰和伏击敌人（如廊坊阻击战）；或者根据统一的计划，同清军并肩作战（如三面进攻天津紫竹林租界）；或者接受清军将领调遣，“挑选精壮，编列成军”，遂行战斗任务。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推动和支援了清军的作战。然而，由于义和团是由民间秘密结社转化而来的自发的反帝爱国组织，始终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发展成为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能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武装集团，更没有产生具有统帅才能的领袖人物，所以尽管在反侵略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却不能发展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起不到主力军的作用。同时，由于义和团受宗教迷信束缚，无视近代枪炮的杀伤力，不注意讲究战术，使自己遭受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加之义和团在政治上提不出科学的斗争纲领和口号，并把某些并不妥当的做法视为勇敢行为，对清政府顽固派的奸诈行径又

---

①《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缺乏应有的警惕，以致最终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历史再一次证明，单靠农民自发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尽管如此，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毕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打乱了帝国主义的侵华计划与步骤。它使帝国主义者看到，在中国除了软弱可欺的统治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不畏强暴、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这种"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① 的亿万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迫使侵略者放弃直接瓜分和统治中国的罪恶企图，转而实行"以华治华"，即采取扶持和利用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其在华代理人的政策。但是，不管帝国主义如何变换侵略手法，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征服的。同时，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也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促进了人民大众的进一步觉醒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孙中山曾概括地指出："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② 随着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日益高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终于在神州大地上蔚然兴起，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1955 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指出："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③ 这无疑是对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历史功绩的进一步肯定。

---

① 〔德〕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义和团》（三），第 86 页。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74～175 页。

③ 周恩来：《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55 年 12 月 12 日。

第二十一章　抗击俄军入侵东北的战争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夏，沙皇俄国在积极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同时，又单独出兵侵入我国东北黑龙江、吉林、盛京（今辽宁）三省，推行其罪恶的“黄俄罗斯”计划。面对沙俄的疯狂侵略和俄军的种种暴行，东北军民和义和团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热爱祖国并且非常痛恨外国人对他们祖国的蹂躏”①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气概。

第一节　沙俄的“黄俄罗斯”计划

占领中国东北广大地区，是沙皇俄国梦寐以求的既定国策；而趁火打劫，则是它得心应手的惯用伎俩。早在1858年和1860年（咸丰八年和十年），它就借助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炮火，强迫清朝政府分别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先后占领中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我国的东三省便成为沙俄进一步推行其向远东侵略扩张政策的主要目标。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沙俄政府以联合德、法干涉日本还辽“有功”，诱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攫取了西伯利亚大铁路重要支线

---

①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9卷，第764页。

中东铁路[①] 长春以北段的占地权、建筑权和经营权等项特权。这条铁路贯通黑龙江、吉林两省，不仅便于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意义。当时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就露骨地宣称：有了这条铁路，俄国就能在任何时间内，通过最短的路线，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从而大大增加俄国在中国和整个远东地区的影响，并促使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②] 另一个沙俄侵略者则更加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希望远东铁路的建设不为所阻，这样，"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满洲将如已熟之果，落在我们手中"。[③] 正由于这条铁路如此重要，沙俄于获得修筑权的次年就立即开工。1898年3月，沙俄通过《旅大租地条约》侵占旅顺口的同时，又取得了从哈尔滨经奉天（今沈阳市）至旅大的铁路修筑权。于是，大批铁路员工进入我国东三省，并廉价雇用20余万中国民工，分19个工区，全线修筑中东铁路。通过筑路，沙俄得以派遣各种人员，搜集我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同时，又以"护路"为名，向铁路沿线地区派遣了6000余名以"中东铁路公司"名义招募的特种军队——武装"护路队"，并在哈尔滨设立有2500余人驻守的铁路警备司令部。

沙俄侵略者在筑路过程中，肆意践踏中国主权，不仅掠夺各种自然资源，还大量霸占民田，巧取豪夺，为所欲为。他们的侵

---

① 中东铁路亦称"东省铁路"、"东清铁路"，系我国东北地区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旅大的铁路旧称，由沙俄于1897～1903年建成。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本占领，称南满铁路。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合办，仍称中东铁路，"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所占。抗战胜利后，南满铁路复与中东铁路合并，改称中国长春铁路。

② 参见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9页。

③ 转引自〔德〕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义和团》（三），第12页。

略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1900年夏，当直隶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的时候，东北义和团运动也发展到高潮。义和团员们号召群众拆铁轨、毁桥梁、烧教堂，狠狠打击沙俄侵略者。

当欧洲列强决定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合谋武装侵华时，沙俄政府立即决定对中国采取一箭双雕的政策：一方面伙同日、德、英、法、美等国出兵津京，乘机取得"共同利益"；一方面独自出兵"满洲"，以便取得"单独利益"。正是在这个时候，"俄国资产阶级拟定了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①，妄图变中国的东三省为俄国领土的一部分。

第二节　双方战争准备和作战部署

为了实现其变中国东北为俄国的"黄俄罗斯"的美梦，沙皇政府从1900年6月初开始，加紧进行武装入侵的各种准备，密切注视着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狂妄地声称："我很高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② 6月中旬，库罗巴特金命令驻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阿穆尔省总督格罗杰科夫中将制订进攻中国东三省的具体作战计划。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后，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随即于6月23日宣布，统辖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地区的阿穆尔军区进入战争状态，加紧集结兵力，并立即编组入侵中国东北地区的先遣军。紧接着又在其亚洲部分的西伯利亚军区、土耳克斯坦军区以及欧洲部分的某些军区进行战争动员。7月6日，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俄军总司令，库罗

---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页。

② 〔俄〕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译本，第83页。布哈拉系16世纪初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建立的封建汗国，1868年成为俄国的保护国。

巴特金为参谋长。不久，沙俄陆军部下令将原驻阿穆尔地区的西伯利亚军改编为西伯利亚第一军，并将新调来的部队进行统一编组和部署：

西伯利亚第一军：作战部队约 3.4 万余人，集结于旅大、海参崴地区。

西伯利亚第二军：作战部队约 3.6 万余人，集结于伯力地区。

西伯利亚第三军：作战部队约 3.1 万余人，集结于赤塔、涅尔琴斯克（原尼布楚）等地。

登陆军：作战部队约 3.7 万余人，集结于海参崴、双城子（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

以上共有作战部队 13.8 万余人，装备火炮 334 门。此外，沿边各要塞和阿穆尔军区尚有留守部队 4 万余人。

7 月 14 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清廷因京畿危急，已无力顾及东北三省的危局。沙俄陆军部抓紧这一时机，分别于 7 月 18 日和 22 日（俄历 7 月 5 日和 9 日）致电在伯力的阿穆尔省总督格罗杰科夫和在旅顺的“关东省”总督海军中将阿列克谢也夫，指示俄军分别从北部（铁岭以北，含吉林、黑龙江省）和南部（盛京省）两个方向，进攻中国东北地区。北部由西伯利亚第二军、第三军及登陆军一部担任主攻，司令部设于伯力，格罗杰科夫中将任总指挥；南部由西伯利亚第一军及登陆军一部担任主攻，司令部设于旅顺，阿列克谢也夫任总指挥。沙俄陆军部作战指示的要点是，多路出兵，攻取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长春、奉天等重要城市，以实现分进合击，速战速决，迅速夺取东北三省的战略目的。经格罗杰科夫和阿列克谢也夫建议作某些调整，沙俄陆军部最后决定按下述五路部署进攻（参见附图 29）：

西北路：以集结于赤塔、涅尔琴斯克的西伯利亚第三军一部为主力，越过阿巴该图，向东南进攻呼伦贝尔（今内蒙海拉尔市）、齐齐哈尔，尔后会同北路俄军及东北路俄军一部，向吉林、奉天推进。

北路：以集结于海兰泡（今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西伯

利亚第三军一部为主力，渡过黑龙江，向南进攻瑷珲（今黑河市南）、墨尔根（今嫩江）、齐齐哈尔，尔后会同西北路俄军及东北路俄军一部，向伯都讷（今扶余市）、长春推进。

东北路：以集结于伯力的西伯利亚第二军为主力，沿黑龙江、松花江向西南进攻三姓（今依兰）、哈尔滨，与"护路队"里应外合攻占哈尔滨后，分兵一部向东进攻宁古塔（今宁安），另一部向西助攻齐齐哈尔，尔后会同西北路和北路俄军，向吉林、奉天推进。

东南路（分两个方向进攻）：一路以集结于双城子、海参崴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及登陆军为主力，向西进攻牡丹江、叶河、宁古塔；另一路从克拉斯基诺出发，向西进攻珲春、鄂摩和。尔后合力向吉林、奉天推进。

南路：以集结于旅大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和登陆军一部为主力。一路从水路进攻营口（今营口市）；另一路从陆路进攻熊岳、盖平（今盖县）。尔后向辽阳、奉天推进，并在铁岭同北部战场的四路俄军会合。

在部署上述五路进攻的同时，沙俄政府又向我东北三省铁路沿线增派"护路队"。至 7 月上旬，武装"护路队"已由原来的 6000 余人增到 1.1 万人①，并组成了附属于"护路队"的炮兵部队②，借以牵制东北三省清军的行动，策应各路俄军的进攻。

正当沙俄剑拔弩张，准备向我东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之际，关内战事十分吃紧，因此，东北三省只能依靠原有驻军和防御设施，抗击入侵之敌。至 1900 年 6 月止，东北三省共有防、练军 117 个营（其中盛京省 52 营，吉林省 29 营，黑龙江省 36 营），实际人数不足 5 万。以后各省又进行扩兵，人数稍有增加。此外，东北地区尚有 4 万余名战斗力很低的八旗兵。这些清军除装备一部分

---

① 〔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 年）》1958 年英文版第 137 页称："这些人是从后备队和最近退伍的士兵中征募来的。"

② 参见〔苏〕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1980 年中译本），第 218～219 页。

由国外进口、内地拨给和吉林机器局仿制的毛瑟、曼利夏步枪及克虏伯、格鲁森火炮外，还有不少抬枪、抬炮等旧式火器。

在如何对待沙俄入侵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东北三省的军政要员们存在着根本分歧，因而严重地影响了战争准备。

黑龙江将军寿山，在沙俄重兵压境，形势危急之际，多次上奏朝廷，历陈沙俄“乘我畿辅危急，日为增兵之谋”的种种事实，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提出了“不得不战”、“不可不战”、“不可失机”的抗战主张。① 他还分析了抗战的有利形势，认为：甲午战争以后，人们“负痛方深”；义和团的兴起，足见民心对外敌入侵之忿恨。在军事上，他认为可扼守陆路要地，以静待动，截击深入我境、前后不能相顾的俄军。为了能集中力量守卫边防，他建议朝廷“先清内患”，对沙俄“护路队”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盛京副都统、育字军总统晋昌，积极支持寿山的主张。他建议三省联为一气，并力抗战。伯都讷副都统嵩昆，也赞同寿山等人的抗战主张。但是，吉林将军长顺和盛京将军增祺，却极力反对寿山和晋昌等人的正确意见，认为“当此各国合谋，何可再树一敌”②，主张对沙俄的进逼实行不抵抗主义。

由于各省将军意见不一，三省无法实行统一部署。主战的黑龙江将军寿山，只能调派本省的力量，加强战略要地的防御。他奏请清廷分别委任瑷珲副都统凤翔、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通肯（今海伦）副都统庆祺为北、西、东三路翼长，分别指挥三路战守；委任安徽候补知县程德全掌行营营务处，负责往来联络。此外，还向清廷请求调拨粮饷，商请盛京、吉林两省匀拨枪械弹药等物，准备抗击沙俄的进攻。

---

① 《寿山折》，《义和团运动史资料丛编》，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二辑，第 273～274 页。

② 《吉林将军长顺电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248 页。在同一电报中，长顺极力推崇李鸿章关于“各国开衅，若再与俄决裂，全局皆危”的谬论系“深谋远虑”之见。

畏敌怯战的吉林将军长顺则根本不进行临战准备。练军6个营约3000人仍然分布在各城镇；新募5营散驻于铁路沿线；主力靖边军18个营分布在三姓、宁古塔、珲春等7处。同时，长顺还在6月底7月初以“奉旨招练”为名，对伊通、宽城子、伯都讷、哈尔滨一带的义和团进行严密控制，并遣散铁路沿线的大量民工。此外，对哈尔滨等地的沙俄“护路队”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任其在哈尔滨至双城子的铁路以及松花江沿线自由往来。

妥协投降的盛京将军增祺从一开始就是亲俄的，但由于副都统晋昌的积极主战及义和团斗争的影响，盛京省还是进行了一定的防御准备：西部由仁字军、奉军共8个营驻守锦州、山海关一带；北部由仁字军、奉军共6个营驻守开原、铁岭一带；东部有4营清军驻守凤凰岭、岫岩一带；南部由晋昌自率育字军10余营驻守熊岳、海城一带。

第三节 战争简要经过

1900年7月下半月，俄军作战准备就绪，即以“护路”和帮助中国政府“平定叛乱”为名，悍然对我国东北三省发动全面进攻。东北三省军民和义和团，为了保家卫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同侵略军展开了顽强的战斗。(参见附图29)

一、黑龙江省的作战

东北军民抗击沙俄侵略军的战争，是从瑷珲方向开始的。瑷珲位于黑龙江中游右岸，与它隔江相望的是江东六十四屯①，由瑷

① 根据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沙俄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但条约规定江东六十四屯内的满汉民户得永远居住，归中国政府管辖。

珲副都统管辖。瑷珲北面的黑河屯（今黑河市），则同沙俄边城海兰泡隔江相望。瑷珲方向驻有清军步骑兵16个营，由黑龙江北路翼长、瑷珲副都统凤翔指挥，守卫着南至富拉尔基屯、北至五道霍洛卡之间约75公里的江岸。守军装备有钢制火炮8门、旧式火炮16门，水师营有小船10余艘。

俄军在海兰泡集中了步兵3个营又3个连、骑兵7个连、炮兵2个连，加上地方部队及其它武装力量2000余人，共约7000余人，配有28门火炮。由阿穆尔省驻军司令格里勃斯基中将指挥。

7月15日，海兰泡俄军企图从黑河屯偷渡过江，被清军击退。16日，俄军大肆搜捕海兰泡中国居民。① 次日上午，俄军将3000余名中国居民赶至黑龙江边，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这样的大屠杀先后4次，至21日，共有五六千中国同胞惨遭杀害，以致“骸骨漂溢，蔽满江洋”。② 与此同时，俄军马队在格里勃斯基亲自指挥下，焚烧江东六十四屯，并将7000多居民驱入江中溺死。列宁曾在《火星报》上发表文章，强烈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③ 等野兽般的暴行。

沙俄侵略军的兽行，激起了瑷珲人民和清军官兵的无比义愤。凤翔于17日晚曾派船接运难民，并令清军1000余人从下游过江，抄袭俄军后路。18日凌晨，渡江清军袭击俄军博尔多屯哨所，同500名俄军激战4个多小时，毙伤敌人100余名，焚毁弹药库1座。当晚，清军撤回瑷珲。

为了保证黑龙江的航运和加强进攻瑷珲的俄军兵力，阿穆尔

---

① 海兰泡原为中国居民村，1858年俄国强占黑龙江左岸地区以后，在此建筑城市，并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至1900年，海兰泡已有3万余人口，半数以上为中国人。

② 《瑷珲县志·武事志》第165～166页。

③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5页。

总督格罗杰科夫按照原定方案，于7月下旬从伯力和斯特列津斯克两地，调遣步兵9个营、骑兵3个连、炮兵1个连，携各种火炮40门，组成两支增援部队，沿黑龙江两岸西进。这些俄军沿途捣毁清军哨卡，于8月初抵达海兰泡。

8月2日，海兰泡俄军在格里勃斯基指挥下，开始进攻瑷珲。为迷惑清军，俄军一部由瑷珲对岸渡江佯攻，主力则由苏鲍齐奇少将率领，从黑河屯上游偷渡过江。驻守黑河屯一带的3营清军凭壕坚守，同上岸俄军激战4小时后，退守瑷珲。4日晨，俄军1.4万余人经过激战，越过瑷珲北面的卡伦山，从北、东、南三面进攻瑷珲城。守军3000余人顽强抵御，城内的义和团及居民也奋起参战。俄军以优势炮火猛轰城垣。激战一日，守军不支，由凤翔率领撤至城西南40余公里的北二龙和额雨尔(驿站)一带的山口。8月5日，俄军入城，城内居民同侵略者逐屋争夺，1500余人英勇战死。俄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侵略者供称：瑷珲军民的抵抗非常顽强，“几乎每幢房子都是经过战斗取得的。……如果他们的长官不是这样贪赃枉法和颟顸无能……那么俄国人攻克瑷珲所付出的代价远非如此便宜，可能不是攻克瑷珲，而是布拉戈维申斯克被消灭。”①

俄军攻占瑷珲后，即调整部署。苏鲍齐奇被晋升为中将，并奉命前往旅顺，负责指挥奉天方向的作战，同时调一部分俄军随同前往，以增加南战场的兵力。其余俄军由伦年卡姆普夫少将指挥，继续追击清军。8月6日，伦年卡姆普夫率领4个半连骑兵组成的“快速支队”，直逼额雨尔。其余俄军除守城者外，随后跟进。

退守额雨尔的清军，依山挖壕筑垒，凭险坚守。俄军逼近后，清军突然发炮轰击，毙伤敌40人。俄军正面进攻受挫，便派1个连从右翼迂回至清军侧后。凤翔见两面受敌，又见俄军援兵赶到，乃率部退守北大岭山口（今大青山）。

---

① 〔俄〕A.B.基尔希纳：《攻克瑷珲》，布拉戈维申斯克《阿穆尔报》印刷所1900年版，第4章。

北大岭山口森林密布，地势险要，是小兴安岭的重要隘口，通往齐齐哈尔的咽喉。凤翔率部退守该地后，又从省城开来2营援军，兵力增至5000人，并有火炮10门。当地鄂伦春族人民，也组织骑队约500人，自动前来参战。8月13日（一说10日），伦年卡姆普夫率领俄军“快速支队”进入北大岭山口，埋伏在两侧的清军，出敌不意，枪炮齐发，猛击敌军，迫使其仓皇后撤。凤翔督军趁势追击20余里，杀敌甚众，但他自己不幸中弹牺牲。其后，由镇边新军后路统领恒玉署理北路翼长，率领清军继续构筑工事，扼守北大岭山口。

伦年卡姆普夫鉴于“快速支队”两次受挫，认为“以现有骑兵部队的兵力不可能在山地作战”①。8月15日，其后续部队到达后，便调整部署，改变战术：先以炮兵逼近北大岭山口，用20余门火炮轰击山口两侧的清军阵地；同时利用山林和夜暗，派出两营步兵迂回至清军侧后，攻击清军的辎重队。清军腹背受敌，被迫于16日撤往墨尔根。此时，该路清军仅剩700余人，由恒玉率领退守讷谟尔河南岸。17日，俄军占领墨尔根后，暂停进攻，等待西北路俄军到达后，再会攻齐齐哈尔。

正当黑龙江省北部清军在瑷珲一带抗击俄军时，西北部呼伦贝尔一带的清军也展开了抗击俄军的作战。

西北部的清军由呼伦贝尔副都统兼西路翼长依兴阿指挥，共有步骑10个营，装备克虏伯炮4门、小钢炮2门。

7月25日，西北路俄军步兵4个营又1个连、骑兵1个团又3个连、骑炮兵1个连，随带6门火炮，在奥尔罗夫少将指挥下，越过阿巴该图进犯完工车站。依兴阿闻讯，急派统领全德率步骑5个营驰往完工迎战。该部于29日出发，次日同敌军遭遇，仓卒接战，伤亡900余人。呼伦贝尔城一带的守军纪律松弛，且有不少新募之兵，当得知完工战败的消息后，即“漫散逃走，衙署官

① 〔俄〕瓦西里亚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中译本，第370～371页。

兵亦皆因之逃窜一空”①。31 日，依兴阿放弃呼伦贝尔，率部退守雅克岭，“以为省城西路之藩篱”。

雅克岭原有义胜军左路 5 个营防守，加上从完工撤退的清军，共约 9 个营。8 月 3 日，俄军先头部队约六七个连追至岭前，见地势险峻，未敢进攻，就地停止待援。10 日，清军各路统领会商，决定由统领保全率镇边陈军 4 营、统领吉祥率义胜军 2 营，出岭截击孤军深入的俄军。11～13 日，出击的清军三战三胜，“踏破俄营九座，压追二百余里”②。14 日晨，清军紧追至呼伦贝尔附近的小桥子、黑山嘴一带。由于同样犯了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错误，被俄军大队四面包围，死伤甚众，保全中弹阵亡，吉祥被迫督队后撤。不久，奥尔罗夫率俄军主力向雅克岭发起攻击，并派兵一部从火燎沟口抄袭清军后路。清军不支，雅克岭被俄军侵占。

小兴安岭的要隘北大岭山口和大兴安岭的重要据点雅克岭阵地的失守，使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失去了两大屏障，俄军遂从北路和西北路长驱直入。8 月 21 日，北路俄军进入博尔多（今讷河），抵达讷谟尔河北岸。在此严重形势下，寿山指令恒玉坚守讷谟尔河南岸，令副都统萨保在齐齐哈尔挖壕固守，同时还加紧操练义和团，“恃为长城”。正当寿山准备继续抗战时，接到了清廷于 8 月 7 日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八国联军求和的上谕。鉴于“朝廷业已遣使求和”，东北亦不能例外，寿山遂派程德全赴讷谟尔河北岸俄军军营与伦年卡姆普夫议和。25 日，双方议定：俄军不得进入齐齐哈尔城内，只驻于城外。28 日，俄军抵达城郊时，竟背信弃义地炮击后撤的清军。寿山见大局已不堪收拾，于 30 日自杀身亡。北路俄军于当天占领齐齐哈尔，清军南撤至伯都讷。西北路俄军在越过大兴安岭后，于 30 日占富拉尔基，9 月 4 日与北

---

① 《齐齐哈尔副都统萨保折・又片》，《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697 页。

② 《盛京将军增祺折・附黑龙江将军寿山遗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896 页。

路俄军会师于齐齐哈尔。9月6日，伦年卡姆普夫又率突击队由齐齐哈尔出发，向伯都讷、长春、吉林方向进犯。

二、吉林省的作战

当北路俄军准备进一步血洗海兰泡中国居民时，东北路俄军步兵4个营、骑兵4个连、炮兵2个连及1个工兵排、1个电信排、1个医疗救护队，随带火炮26门，由萨哈罗夫少将指挥，分乘22艘江轮和56只拖船，从伯力出发，溯黑龙江西进，于7月22日到达吉林省松花江口附近的拉哈苏苏（今同江）。驻守该地的清军稍事抵抗即行撤退。俄军占领这一要点后，随即溯松花江进犯三姓城。三姓副都统农英阿率靖边军8个营（有火炮22门）驻守该地，沿江还有松花江水师营。7月27日，俄军攻占了城外北面和西面的清军阵地，接着于28日上午9时水陆两路夹攻三姓城。守军英勇抵抗，终因俄军炮火猛烈，被迫撤退。俄军随即占领三姓，枪杀居民，焚烧房屋，然后登轮向哈尔滨进犯。

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原驻有沙俄"护路队"2500余人，因受义和团的攻击，各地"护路队"陆续向哈尔滨集中，此时总数已逾4000人。寿山在部署黑龙江战守时，奏请清廷委任通肯副都统庆祺为东路翼长，率领6营清军驻扎于松花江口至呼兰沿线各站。鉴于哈尔滨为三省腹心之地，该处之沙俄"护路队"严重威胁黑龙江省的后路，寿山曾于7月初约请吉林清军会攻哈尔滨，先清除该处"护路队"，然后专注北方边防。由于吉林将军长顺极力阻挠，此计未能实现。

7月26日，当俄军逼近三姓，形势极为严重时，寿山毅然命令庆祺等率军进攻哈尔滨沙俄"护路队"司令部。因敌人已有戒备，清军遭到伏击，伤亡300余人，退守呼兰。8月3日，萨哈罗夫所部俄军进入哈尔滨，同"护路队"会合。

东北路俄军夺占哈尔滨后，迅速沟通了与双城子方向东南路俄军的联系。9月1日，又派遣一个支队乘坐满载粮食、弹药的列

车，前往齐齐哈尔，以加强该处俄军。9月12日，俄军一部从哈尔滨北攻呼兰，清军弃城退走。

在萨哈罗夫率东北路俄军向哈尔滨方向进犯的同时，集结于双城子、克拉斯基诺的东南路俄军南北两个支队，分别向宁古塔和珲春发起进攻。

北支队由奇恰戈夫少将率领，于7月中旬从双城子向宁古塔进犯。宁古塔是牡丹江畔的历史名城，吉林东部的重要屏障。清军10余营，连同杨玉麟的民团组织镇东军及义和团，共约六七千人，分守叶河炮台、牡丹江渡口和宁古塔城。18～19日，俄军进攻叶河及牡丹江渡口，被清军击退。时值雨季，山洪暴发，俄军骑兵行动受阻，加之兵力不足，便于铁路附近“坚筑高垒”，等待援军。

南支队由艾古斯托夫少将率领，于7月27日从克拉斯基诺出发，向珲春进犯。珲春西濒图们江，北倚大盘岭，由清军帮办英联率靖边军6个营驻守，并有刘永和率领的群众武装忠义军协守。清军重点防守城南90里图们江口的黑顶子和城东南8里、城西南10里的三处炮台。7月30日，俄军首先炮轰黑顶子炮台，接着进攻其余两座炮台。清军及忠义军发炮还击，毙伤俄军200余人。激战至下午2时，城外炮台相继被毁，同时，城内外国商民趁机纵火作乱，英联被迫率部退至城外。俄军占领珲春后，因进攻宁古塔的兵力不足，艾古斯托夫即率部折往双城子，旋即西向增援宁古塔方向的俄军。

进攻宁古塔的俄军得到增援后，于8月26日夜逼近叶河。次日晨，控制了清军阵地对面的高地，同时，其骑兵直插叶河至宁古塔的大道。叶河守军恐后路被断，便主动退往宁古塔。

当清军和刘永和的忠义军在叶河、宁古塔坚守时，躲在省城吉林的长顺却加紧进行投降活动。他派员向侵略者卑屈求和，于8月25日签订“和议”，接着下令部下不许抵抗。消息传至宁古塔，守军即退至鄂摩和。俄军于8月29日进入宁古塔，9月7日又占鄂摩和。9月22日，俄军先头部队进入吉林城。与此同时，伦年

卡姆普夫率齐齐哈尔的北路、西北路俄军南下，于9月23日进入吉林城。30日，进占宁古塔的东南路俄军大队也赶至该处。侵略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厚颜无耻的长顺，竟备牛羊以犒俄师，并令吉林所属各府厅州县，“遇俄兵至，均照和约款接”①，充分暴露了卖国贼的可耻嘴脸。

三、盛京省的作战

在北路、西北路、东北路、东南路俄军大举进犯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同时，南路俄军也从旅顺出发，向盛京省发起猛烈进攻。

八国联军于7月14日攻占天津后，沙俄陆军部即于7月22日命令驻旅顺的俄军暂停向直隶增兵，迅速前往营口，攻击清军和镇压铁路沿线的义和团，占领辽东半岛。“关东省”总督阿列克谢也夫立即集中步兵20个营、骑兵16个连、炮兵5个连，由弗列舍尔少将率领，分两路向北进攻：一路沿中东铁路支线北上，一路由水路增援营口、大石桥（今营口）的俄军。尔后进攻海城、辽阳、奉天。

盛京省邻近直隶，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声势较大，7月初就拆毁了海城至开原的铁路桥，并经常成群结队同沙俄“护路队”交锋。7月中旬，辽阳、鞍山一带的义和团及清军，将辽阳的“护路队”200余人围困三昼夜，迫使其向营口逃窜。7月15日，驻大石桥的“护路队”在米辛克上校率领下反扑海城，夺占唐王、亮甲各山，接连向城内开炮，击毁城楼。义和团及清军奋力抵抗，毙伤敌70余人，并乘势追击，迫使沙俄“护路队”龟缩于大石桥、营口一带，不敢轻易出动。

7月25日（一说27日），沿铁路北进的俄军占领熊岳，8月1日占领盖平。8月4日，沿水路向北进攻的俄军在营口登陆，占

---

①《吉林将军长顺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4页。

领营口。

主张抗战的盛京副都统晋昌，见形势危急，于8月上旬亲赴海城指挥作战。该处驻有育字军、奉字军及县属地方武装4000余人、义和团1000余人，共有火炮8门。晋昌抵达后，决定依托城西南10多里的唐王、亮甲等阵地抗击敌人。8月9日，俄军少将弗列舍尔率步兵2个团又2个连、骑兵4个连、炮兵5个连，从大石桥出发，分三路进攻海城。10日，俄军炮击虎獐屯（今虎庄屯），清军退守邓家台，11日又退守唐王、亮甲等山。俄军追至唐王山，集中炮兵火力轰毁清军各阵地。晋昌率部退守城东北的双山。8月12日，俄军夹攻双山。晋昌恐后路被断，即撤向辽阳，俄军乘势占领海城。盛京将军增祺急忙派员至营口向俄军乞降，遭敌拒绝。

俄军进占海城前夕，正是八国联军向北京大举进犯之时。沙俄为在关内攫取更大的利益，决定抽调辽东战场的部队，迅速“从营口或经旅顺投向大沽口”①。这样，俄军侵占海城后，只得屯兵等待，不敢继续北犯。清军也未乘机反击，与敌处于相持状态。

9月初，俄军从欧洲调来的2个步兵团、1个炮兵连抵达旅顺。9月21日，曾率领北路俄军进攻瑷珲的苏鲍齐奇中将由旅顺到达营口。旅顺俄军遵照沙皇8月6日发出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旅顺俄军的“主要任务将是攻占奉天，并征服盛京全省”② 的指令，加紧进行北犯的各种准备。

至9月下旬，集结于营口、海城一带的俄军已有步兵11个营、骑兵4个连、炮兵10个连，共约2万余人，随带火炮40门。侵略军分左、中、右三路向北进犯：弗列舍尔少将率左路进攻牛庄；苏鲍齐奇亲自指挥中、右两路进攻鞍山。

---

① 俄国陆军部学术档案馆：《1900～1901年对华军事行动资料汇编》，俄文版第二部分，第2册，第38页。

② 俄国陆军部学术档案馆：《1900～1901年对华军事行动资料汇编》，俄文版第二部分，第2册，第136页。

当时，驻守牛庄、鞍山、辽阳一带的清军，除晋昌的育字军外，还有全营翼长寿长率领的奉字军、仁字军等，共约 50 余营，加之义和团踊跃参战，兵力尚属可观。但因增祺一再鼓吹停战议和，并多次调兵回保省城和北援，因而削弱了辽阳方向的兵力。

9 月 24 日，左路俄军攻牛庄，寿长率清军 10 余营及部分义和团进行还击。由于俄军以速射炮连续轰击，守军不支，退守大望台，旋又退守刘二堡。俄军于当日占领牛庄后，将数千名中国居民围住，挥舞马刀来回砍杀数小时。这就是沙俄侵略者吹嘘为“赫赫武功”的“牛庄战役”。

9 月 26 日，中、右路俄军从海城出发，占领鞍山，接着向辽阳进攻。27 日，从牛庄逃出的寿长收集溃军，在沙河南八卦沟一带与俄军“复决死战”。但俄军炮多力猛，清军伤亡惨重，不支而散。当时，辽阳一带尚有清军步兵 2000 人、骑兵 600 人、火炮 3 门，但在增祺的不抵抗命令下，城内遍插白旗。28 日，俄军穿城而过，越太子河，直逼奉天。

这时，从黑龙江、吉林南下的各路俄军也已逼近开原、铁岭，对奉天形成南北夹攻的态势。奉天军政官员惊慌失措，争相逃命。增祺携带将军印，偕左右逃往新民厅所属的广宁一带。寿长、晋昌则收集溃军退往法库门（今法库）一带。10 月 1 日，俄军不费一枪一弹，在苏鲍齐奇率领下，进入奉天。6 日，南北各路俄军于铁岭会合。至此，我东北三省各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全被俄军侵占。

在占领奉天前夕，沙俄从旅顺派出 2 个团又 1 个连，乘军舰 4 艘，于 10 月 1 日（一说 9 月 30 日）在山海关登陆。接着，这支俄军沿铁路北上，于 10 月 4 日占领锦州，中旬占领新民厅，控制了直隶通往东北三省的铁路交通，切断了关内外的联系，以便实现其独吞中国东北三省的目的。

11 月 11 日，增祺派出的代表与沙俄侵略者于旅顺签订了由俄方一手炮制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其中规定：东北地区清军一律遣散，交出军火，拆毁炮台、营垒及火药库；俄军驻奉天及

盛京各地；奉天设俄国总管，与闻重要公事。《章程》名为俄军向清政府“交地”，实则是在俄军控制下，让盛京各地官僚返回任所，充当对沙俄负责的傀儡，使盛京省成为沙俄的殖民地。这是库罗巴特金使我国东北变为“第二个布哈拉”方案的具体化。无怪乎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新时代报》对此兴高采烈，竟狂妄地把我国东三省公开地改称为“黄俄罗斯”。①

东三省虽被沙俄侵占了，但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被侵略军的淫威所屈服。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在北起大小兴安岭，南至黄海、渤海之滨的广阔地域内，进行“御俄寇，复国土”的武装斗争。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中也说到：“俄国占领满洲一事，曾遇不少困难”，中国东北地区“常有武装完备之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宁”。② 正是由于东北三省人民的英勇斗争，加以其它帝国主义出于自己的侵略目的，反对沙俄独吞中国的东北，才迫使它在1902年4月8日，同清政府签订《中俄收交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俄军于18个月内分3批撤出东三省。于是，沙俄企图把我国东北三省变为“黄俄罗斯”的梦想终于未能实现。

---

① 参见〔俄〕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中译本序言”，第5页。

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三），第140页。

第二十二章　抗击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趁俄日两国激烈争夺我国东北地区权益之机，急欲侵入我国西南边陲。1903年12月至1904年9月（光绪二十九年十月至三十年八月），英军大举入侵我国西藏，并闯入拉萨。西藏爱国军民为反抗外敌入侵，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留下了悲壮篇章。（参见附图30）

第一节　西藏的地理特点与设防情况

一、西藏的地理特点

西藏位于我国的西南边陲，是向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的主体，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全境为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唐古拉山所环抱，岭谷并列，湖泊众多。由于地势高，空气稀薄，缺氧严重，日照强烈，昼夜温差大（达30℃以上）。西南部边缘的喜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大的山脉，主脊海拔达6000～8000多米（8000米以上高峰有10座），为一大天然屏障。东南部为高山峡谷密林地区，山高坡陡，沟谷深窄，原始森林密布，荆棘丛生，河谷海拔多为2000～3000米，岸陡流急，难于舟楫、泅渡，夏季多雨水，山洪、塌方、雪崩、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严重，加之道路稀少，交通极为不便，且多云雾，通视不良。全境属典型大陆性气候，气温较低，且随海拔升高而下降，如海拔4000米的地区，年平均气温为0℃，一年中平均气温在0℃以下的月份有7个月；而海拔5000米以上地区，年平均气温低于－9℃，平均气温

在0℃以下的月份长达11个月。

西藏自古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属高原高寒地区，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它北接新疆、青海，东连四川、云南，西面与克什米尔接壤，南面与印度、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布鲁克巴（不丹）、缅甸等国毗邻，边界线近4000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二、西藏的设防情况

西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条件，对军事行动有着广泛的影响，无论进攻和防御作战，都有很大困难，相对而言，对防御作战较为有利。但由于清政府和多数驻藏大臣忽视边防建设，致使西藏防务长期废弛，不仅军队的数量少、装备差，更缺乏整体防御部署和防御计划。自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福康安奏请建立常备军，申定兵制、兵额以后，至抗英战争为止，军队的数量一直保持在三四千人左右。其组成和驻防情况大致如下：

绿营兵有步骑600余人，由四川派遣，随同驻藏大臣每3年更换一次。大部分驻于前藏，充当驻藏大臣的卫队，小部分驻于日喀则、江孜、定日等地，协助西藏地方军进行训练和驻防。遇有战事，由驻藏大臣奏请清廷令川、滇派兵支援，事平之后回防。绿营兵装备有亨利——马梯尼、斯涅德等线膛步枪及部分火炮，平时训练多为应付校阅考核。此外，拉萨至四川打箭炉（今康定）一线尚驻有绿营兵800余人，主要任务是保护粮台和运输的安全，战斗力较弱。

西藏地方军（亦称藏军），定额3162名。其编制：25人为1定本，5定本为1甲本，2甲本为1如本，2如本为1代本。6个代本直接听命于西藏地方政府和驻藏大臣。藏军平时的驻防部署是：拉萨、日喀则各1054人，定日、江孜各527人。除定额外，尚有守卡兵312人，分守各关卡。藏军的装备，定本以上军官配有线膛步枪，士兵中一半使用土枪，三成使用弓箭，二成使用刀

矛。1847年起，改为鸟枪、刀矛参半，废弓箭。[1] 部队受宗教影响大，战士多佩有“护身符”，出征作战时求佛保祐，虽战斗勇敢，但军官指挥能力低，战术落后。

在战时，除绿营兵和藏军以外，还可由西藏地方政府向各地征集民兵。民兵自备武器口粮，由营官[2] 率领，前往指定地点参战。他们熟悉地形，能吃苦，善骑射，服从性强，作战勇敢，但装备差，缺乏训练，进攻时无一定队形，撤退时不易管束。

在工事构筑方面，除边防哨卡预先设有拦阻墙外，多以自然地形和房屋、寺院为依托，组织防御。

第二节　英俄争夺西藏及英军入侵西藏的准备

一、英俄两国对西藏的争夺

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由来已久。从17世纪开始，英国为了打开西藏的大门，便不断派遣特务潜入藏境，搜集情报，密绘地图，调查习俗。至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已先后将尼泊尔、哲孟雄、克什米尔、不丹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哲孟雄境内的大吉岭设立军事基地，修筑通往西藏的道路。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其后，便以条约中有允许英人入藏“游历”、“探路”等条款为依据，多次派人以合法身份窜入西藏搜集情报，收买上层分子，进而要求入藏“通商”和常驻“使节”，结果遭到西藏僧俗大众的坚决反对。西藏地方政府为防备英国的

---

① 参见《清实录·宣宗实录》卷446。

② 营官，属地方官，亦称知事、郡长，受西藏地方政府和驻藏大臣领导，战时受代本直接指挥。营官数额，依地方大小和人口多少而定，有大营官、小营官、边营官之别。其职责，平时主管民政、税收等，战时管军务。

武装入侵，派兵200名在南部边境要地隆吐山（龙头山）修筑堡垒炮台，设卡戍守。英国为侵占该地，竟声称隆吐山系哲孟雄领地，无理要求限期撤卡，讹诈未遂，便于1888年3月（光绪十四年二月）悍然派兵向我隆吐山守军发起进攻，挑起战争。3月24日，英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攻占隆吐山，接着又侵占纳汤。其后，英军一面整修道路，一面增调部队，准备继续北侵。为了组织反攻，西藏地方政府下令征调各地民兵，开赴前线。不久，集中于亚东（今老亚东）一带的民兵和藏军约有1万余人，与英军形成对峙局面。可是，清政府缺乏抗战意识，不支持乃至阻挠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严重挫伤了前线士气。至9月下旬，英军2000余人向捻纳发起进攻，藏军不支，被迫后撤。其后，英军又相继占领了则利拉、亚东等地。在清政府不愿扩大事端的妥协思想指导下，西藏军民第一次抗英战争终于失败了。然而，英国侵略者毕竟看到了西藏军民的抗敌意志不可侮，不得不暂时放弃深入西藏内地的企图，同意举行"和谈"。1890年3月，驻藏大臣升泰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与之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承认哲孟雄为英国的保护国，并以则利拉一带山顶为藏哲边界，使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1893年底，中英再订《续约》，清政府同意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用武力撬开西藏大门后，一面疯狂进行贸易侵略，一面不断勒索新的权益。其目的在于完全占领西藏，使之成为印度那样的大英帝国殖民地，进而把侵略魔掌伸入四川，顺长江而下，直出东海，以便把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

和英国一样，沙皇俄国对西藏也久存觊觎之心。早在1721年（康熙六十年）初，彼得一世（1672～1725）就下达过伺机占领西藏的诏令①。此后，俄国便日益重视对西藏的研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有关情报。19世纪70年代以后，俄国见英国染指西藏的阴谋得逞，为了"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蒙古和西藏等

① 参见张广达：《沙俄侵藏考略》，见《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55～956页。

等)”①，进一步加紧了窥藏活动，各种名目的俄国“考察队”接二连三地出现在青藏高原上。在英国第一次武装入侵西藏时期，以“游历”为名混进西藏的俄国间谍竟向某些西藏地方官员声称：“我国与英世仇，我们久思攻取印度，未得其便。今印度（指英国）无故欺负尔国，我等闻之，甚为不平，是以不辞数万里远来……”。西藏官员告以“藏印之案，现蒙大皇帝派驻藏大臣为我等解和，现已无事”。俄国间谍便进一步挑拨说：“英国人最无信义，不久定有反复。我等去后，你们尽可与之决裂。”同时，留下密函两件，声言以后若有战事，可致函俄国，“我们即有兵来相助”；“你们缺乏军火，我必能接济”。② 显然，俄国企图以“助藏抗英”为幌子，从中渔利，进而达到控制和侵占西藏的目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统治者采取联俄拒日的方针，引狼入室。1896 年，俄国诱迫李鸿章缔结《中俄密约》得逞，侵华野心急剧膨胀。20 世纪初，它不但派兵参加八国联军攻占津京，而且单独出兵霸占东北。在列强瓜分中国之议盛行，中国处于千钧一发的形势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更是渴望把包括西藏在内的尽可能多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版图。除继续派遣武装“考察队”外，俄国特别加紧了对西藏地方当局的渗透活动。1901 年 7 月 6 日(俄历 6 月 23 日)，尼古拉二世无视我国主权，隆重接见了以特务阿旺·德尔智③ 为首的所谓“西藏代表团”。俄国借此大造舆论，声称达赖与俄国结成了最友好的关系，“俄国为唯一能破英国阴谋的强国”。随后，俄国派出两支全副武装的队伍，分别以“科学探

---

① 列宁：《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28 页。

②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 83，第 30 页。

③ 阿旺·德尔智，俄籍蒙古人，俄名德尔捷耶夫。1885 年前后，他被俄国间谍机关收买，携带大批经费，以“学经”为名，打入西藏上层，后来爬上了达赖十三世侍讲（副经师）的高位，乘机挑拨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极力唆使达赖叛国，投靠沙俄。1897 年，达赖竟违反清政府有关规定，委任德尔智为正式的外事秘书。1900 年和 1901 年，德尔智接连两次受命率“西藏使团”赴俄，均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

险”和“经商”的名义，取道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青海前往拉萨。从此，“俄商及军队潜踪入藏者络绎于途”①。

沙俄与西藏地方当局的频繁往来，加剧了英俄之间本已十分尖锐的矛盾。1903年2月，英国外交部提出警告："俄若派兵西藏，英必效之"。俄国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该地方现状发生变乱，则俄国政府不能置之不理"。② 于是，英俄为争夺中国领土西藏的斗争达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但是，当时俄国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我国东北地区，且与日本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拖住了它的手脚。英国趁此机会，利用1902年与日本缔结的反俄军事同盟，怂恿日本进攻俄国，自己则加紧准备再次武装入侵西藏。

二、英军入侵西藏的准备

英军入侵西藏，是打着“谈判”的旗号进行的。早在1903年6月，英国就借口两名间谍被西藏地方政府扣押和要求通商、划界等等，派少校荣赫鹏为“谈判使节”，率兵200名，由哲孟雄强行进入西藏，于7月7日进抵干坝。荣赫鹏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名为“谈判”，实为下一步有计划的武装侵略寻找借口。为了阻止英军进一步深入，西藏地方政府不顾驻藏大臣裕钢等人的阻拦，毅然发布动员令，抽调藏军700人赶赴干坝一带，修筑工事，加强防御。荣赫鹏等在干坝纠缠数月之久，未敢轻进。

英国为了解除大规模入侵西藏的后顾之忧，极力拉拢尼泊尔和不丹。尼泊尔与西藏地方政府早在1856年（咸丰六年）即定有条约，规定西藏遭到外敌入侵时，尼泊尔有援助的义务。因此，英

① 朱锦屏：《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民国二十年铅印本，第7页。

② 《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致英国驻俄大使斯科特电》，转引自《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75年第4期第98页。

政府认为，要入侵西藏，必须“与尼泊尔宫廷一致合作”①。英国驻印总督寇松邀请尼泊尔首相至德里“会谈”，迫使其同意与英合作。英国为消除不丹与西藏联合抗英的可能性，还专门派大吉岭道尹（英人）到不丹活动。在英国的压力下，不丹终于断绝了与中国的正常关系。

为了解决高原运输问题，英印政府动员了巨大人力物力，抢修尼泊尔、不丹、哲孟雄至西藏边界的公路；对工兵进行驾驶双轮牛车和轻便马车的训练；在尼泊尔征用牦牛四五千头和相当数量的骡马，并进行了现地驮载试验。另外，英印政府还在加尔各答一带组织了骡马后备队，以应付紧急运输任务。

英国为了组建其侵藏部队，从印度等地大量抽调军队，计有：第23锡克步兵营700人，第32锡克步兵营700人，第8廓尔喀步兵营700人，骑兵100人，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工兵各1队，以及野战医务队5队和其它后勤保障部队，另有大批随从人员，总计1万余人②。共配有步枪2800支、火炮6门、马克沁机枪若干挺。全军由少将麦克唐纳负责指挥，易喀尔丹为参谋长，布雷哲尔负责后勤运输。英军计划分兵两路：一路由荣赫鹏率领，进攻干坝，直趋江孜；一路由麦克唐纳亲自率领，越过则利拉山口，占领春丕谷后继续北犯，在江孜与荣部会合，再向拉萨进攻。1903年10月初，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了进军江孜、拉萨的计划。此时，麦克唐纳等鉴于干坝方向藏军有了戒备，如按原定计划分兵两路出击，“将冒不必要之危险，且运输接济之部署，亦感困难”③，于是决定改变原来计划，并作了如下部署：在此以前已经进至干坝

① 《印度政府外务部致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弥尔顿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版（下同），第184页。

② 据〔英〕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和坎德勒《拉萨本来面目》载，第23、第32锡克步兵营为工兵，并称“队”或“团”，而不是“营”。

③ 〔英〕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下同），第124页。

一带的英军暂留该处，继续牵制中国守军，荣赫鹏（已晋升上校）则和麦克唐纳一起率主力越过则利拉山口，攻占春丕，尔后干坝英军转移，在春丕与主力会合，向江孜进攻。

第三节　曲眉仙角之战

1903 年冬，日俄战争迫在眉睫，英国决定趁此有利时机，抢在俄国之先占领西藏。同年 11 月 6 日，英国政府命令英军开始从则利拉方向入侵，经春丕谷直扑江孜。① 12 月 10 日，英国侵略军在纳汤集结完毕，12 日即越过则利拉山口，13 日进驻仁进岗。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军入侵方向判断错误，主要兵力仍部署于干坝一带，致使英军又于 14 日兵不血刃地占领春丕谷，控制了通向江孜的门户。此时，西藏地方当局才急忙调兵前往帕里一线防堵，但为时已晚。12 月 18 日，麦克唐纳率轻装纵队 795 人急趋帕里，20 日即占领该处，夺取了宗政府② 储存的大量火药和武器。由于时值寒冬，朔风刺骨，道路难行，补给困难，英军无法继续前进。麦克唐纳只得留两个连的兵力驻扎帕里，自率其余部队于 23 日返回春丕。1904 年 1 月 6 日，麦克唐纳又率轻装纵队赶到帕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噶丹）代表要求英军退至亚东，然后举行谈判，遭到拒绝。1 月 8 日，英军竟推进至帕里以北的堆拉地方。其后，荣赫鹏率部分侵略军留守堆拉，与拉萨派来的代表进行“谈判”，麦克唐纳则再次率部返回春丕，进行休整和筹措给养。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从各地征调的军队已有 2000 余人赶到堆拉以北的曲眉仙角和古鲁一带，构筑了两道石墙。3 月初，守军又增至 3000 余人，共有 6 个代本（拉萨和日喀则各两个、江孜和定日各 1 个），由莱丁色任前敌指挥。而堆拉之

---

① 参见〔苏〕B. П. 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中译本，民族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68 页。

② 宗，相当于内地的县。宗政府相当于县政府。

英军仅是一支力量不大的先遣队（有步枪 400 支、火炮两门、机枪两挺），因不适应高原缺氧和风雪严寒的气候，处境极为不利。由于受驻藏大臣裕钢下达的“沿途地方文武官，只能理阻，不准与英兵生事”① 的命令约束，加之受敌“和平解决”的欺骗，藏军长期与敌对峙，并未及时组织反击，失去有利战机。

1904 年 3 月中旬，英军完成了进军江孜的各种准备，荣赫鹏便致函新任驻藏大臣有泰（升泰之弟），诡称“行将移节江孜开始谈判”，并托其代邀西藏地方全权代表同赴江孜，同时声称：“如欲抵抗吾人使节之行程，其影响必更为严重”。② 3 月 28 日，麦克唐纳率主力自春丕抵达堆拉。31 日，英国侵略军 1300 余人在麦克唐纳、荣赫鹏率领下分三路向北推进。当接近曲眉仙角藏军阵地时，由荣赫鹏出面佯装“谈判”，拖住藏军前敌指挥莱丁色等人，麦克唐纳则暗中调动兵力，抢占山头，迫使藏军放弃山上阵地（因奉命不得首先开火），退至拦阻墙内。随后，英军于山头架好机枪和火炮，骑兵则在平地展开，从三面将 1500 余名藏军包围。此时，荣赫鹏原形毕露，勒令藏军缴械投降。莱丁色严词拒绝，麦克唐纳便突然下令开火。藏军虽然措手不及，但毫不畏惧，用手中的长矛、大刀、铁叉等武器，与敌展开殊死搏斗，“没有一个向敌人屈膝投降”③。荣赫鹏供称：“藏军同时集中力量向我冲锋，此一瞬间几将我单薄之阵线冲破而俘我使节与军官”④。然而，刀矛毕竟敌不过枪炮，在很短时间内，前敌指挥莱丁色、副指挥郎色林及 700 余名藏军相继牺牲，余部退往古鲁，守卫第二道防线。英军追至，藏军再次奋起抵抗，终因伤亡过大而后撤。

英军在曲眉仙角一带的血腥屠杀，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侵略

---

① 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裕钢奏牍》，第 8 页。

② 〔英〕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 144 页。

③ 魏克：《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调查记》，《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 1 期，第 30 页。

④ 〔英〕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 148 页。

者的虚伪狡诈和凶残本性，进一步激起了西藏僧俗大众的抗敌热情。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决心为保卫家园而血战到底。

第四节　江孜保卫战

1904 年 4 月 5 日，英国侵略军从古鲁出发，向江孜进犯，沿途不断遭到藏军和民众组织的小分队的抗击和袭扰。藏军于康玛附近的峡谷两侧预设阵地（康玛河左岸山上设有土炮阵地，河右岸布有散兵阵地）。4 月 9 日，英军途经峡谷时，几次冲锋均被击退，最后不得不在炮火的支援下，以一部兵力仰攻山头，一部兵力绕至河右岸藏军背后袭击。藏军被敌包围，经英勇搏斗，伤亡 150 余人，被迫后撤。次日，英国侵略军乘势占领绍岗，11 日即进迫江孜。

江孜为宗政府所在地，西北通日喀则，东北越卡罗拉山通往拉萨。宗政府设在城区最突出的宗山顶上，是个坚固的堡垒。宗山西北有全城最大的寺院——白居寺。由于驻守江孜的军队大部分调往南面各隘口防守，交战失利后又未及时收拢，民军数量也有限，与英军相比，力量悬殊。在此情况下，江孜守军遂主动后撤。4 月 13 日，英军占领江孜，获得了大量粮食和火药。其后，为了减少运输的压力，麦克唐纳留兵 500 余人（配有机枪 2 挺、火炮 2 门）随同荣赫鹏驻扎于年楚河畔的江洛林卡，自率其余部队再度返回春丕。

江孜失守后，达赖十三世紧急动员各地民军向江孜一带集结，共约万人。其部署是：江孜附近 2500 人，绒谷 1500 人，浪卡子 2500 人，热隆 1000 人，日喀则 1500 人。另在卡罗拉修筑了一道横跨山谷的 500 米长的拦阻墙，由民军 2000 人把守。由于驻藏大臣有泰不支持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反而横加指责和阻挠，进一步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4 月 28 日，荣赫鹏派骑兵一连至卡罗拉侦察，被守军击退。5 月 3 日，荣赫鹏以留守江孜的 2/3 兵力向卡罗拉进犯。英军企图抢占藏军两侧制高点，因岩石陡峭，攀登困难，未能实现。7 日上午，英军从正面发起强攻，西藏民军依托

有利地形，顽强抗击。英军龟缩在山峡之中，“已到绝望之境地”①。当日下午，英军再次发起进攻，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占领了卡罗拉。守军丢失了重要阵地，退往浪卡子。

在英军分兵东犯卡罗拉时，仅剩170名士兵留守江孜。日喀则一带的西藏民军得此情报，立即于5月4日晚出动1500人，直插江孜，很快控制了市区各要点，并包围了荣赫鹏驻地江洛林卡（参见附图31）。次日黎明，民军高声喊杀，冲向敌营，抢占围墙枪眼，向敌营房射击。敌人遭此突袭，慌作一团。可惜民军未能及时冲入围墙，近战歼敌，致使英军得到了喘息时间，组织抵抗。其后，民军几次攀越围墙，均遭敌火力杀伤而未成，天明后被迫后撤。在以后几天的战斗中，民军主要依靠宗政府的堡垒火力对敌营地进行封锁，而未乘敌孤立无援之机，再次组织进攻。

5月9日，进犯卡罗拉的英军返抵江洛林卡，江孜地区英军防御能力有所加强，但仍未摆脱被围的困境。5月24日，从春丕来援的英军先头部队200余人，冲过乃尼寺（江孜东南11公里）的火力封锁，抵达江孜地区。当时，对英军威胁最大的是距其营地约2公里处的帕拉村民军据点。该村房屋坚固，利于防守，且可直接攻击英军工事薄弱的营地翼侧。26日，英军以步兵3个连及工兵一部向该村发起进攻，几次冲击均被民军击退，遂采取爆破的办法，企图突破民军的防御。西藏民军与英军展开逐屋逐院的争夺，毙伤敌官兵20余人，最后被迫后撤。英军占领帕拉村后，防守态势虽有改善，但兵力单薄，不敢向宗政府发动进攻。为摆脱被动，荣赫鹏不得不于6月6日晨率骑兵40名，绕道驰回春丕求救。

江孜战局的发展变化，使英国政府手忙脚乱，英印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声称：“政府业已决定，不管什么生力军，只要印度政府认为必要，均可调往江孜去”②。6月上旬，英军增援部队在春丕集结

---

① 〔英〕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157页。

② 俄国《新时代报》1904年5月4日（17日）。转引自〔苏〕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中译本第79页。

完毕，计有：4个土著士兵营①2800人，英国皇家步兵连400人，英国山炮连250人，土著山炮连100人，土著山地步兵连200人，民夫及运输人员7600人和其它配属的小分队，总计在1.15万人以上。6月13日，麦克唐纳、荣赫鹏率军出发，中途不时遭到西藏民军的阻击，直至26日，才在江孜地区英军的接应下抵达江孜地区。英军的首要任务是解除藏军对营地的威胁，先后派兵夺占了江孜西、北两面的12个村庄，6月28日又攻占了翟金寺，断绝了至日喀则的交通。至此，英国侵略军从三面包围了江孜宗政府。

7月1日，西藏地方政府派去的代表与英军谈判，荣赫鹏无理要求西藏民军于7月5日正午前撤出宗政府，致使谈判破裂。7月5日下午，英军发起攻击，一路攻占江孜街，一路猛攻宗政府。宗政府为民军指挥部所在地，由民军五六千人驻守。正面筑有坚固的炮台，翼侧多悬崖绝壁，形势险要。英军先以一部兵力从正面佯攻，牵制民军主力；入夜，集中步兵12个连、骑兵1个连、工兵半个连，携炮12门，从翼侧发动猛攻，在付出重大代价后，进抵宗山脚下。次日天明，双方暂停射击。当天下午，英军集中炮火猛烈轰击，将围墙炸开缺口，步兵乘机涌入。西藏民军先以火力封锁，继以巨石投向缺口，仍未能阻止敌人前进，终于被迫突围，向拉萨方向撤退。之后，白居寺等民军据点亦相继陷落，江孜陷入敌手。

江孜之战，是英军大举入侵西藏以来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西藏爱国军民在江孜抗击英国侵略军达3个月之久，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侵略者供称："西藏人的英勇是无可争辩的。当我们的榴霰弹在他们头顶上爆炸时，他们勇敢地守住阵地，沉着地向我们的大炮一枪又一枪地进行还击，一点钟又一点钟地支持下去，尽管他们的子弹是射击不远的，而我们的炮弹却使他们蒙受惨重伤亡"②。通过战争实践，西藏军民不断总结经验，在作战

---

① 指廓尔喀、锡克士兵。

② 《英国侵略军军官华达尔的记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07页。

方法上也有不少改进。事实说明，尽管藏军武器低劣，但只要坚持斗争，充分利用天时地利，是可以予英国侵略军以有力打击的。

江孜失陷后，西藏抗英斗争形势急转直下，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妥协势力抬头，竟发出了停止抵抗的命令。8月3日，英军侵入拉萨。在此以前（7月25日），达赖十三世见大势已去，偕德尔智等人出走青海。侵略军进入拉萨后，大肆进行抢掠，布达拉宫的珍宝文物被洗劫一空。侵略者的罪行，进一步激起西藏人民心中的怒火，各大寺的喇嘛及撤至拉萨郊区的藏军不断给侵略者以打击，使其不敢越出拉萨。其时，英军面临冬季大雪封山，补给更为困难的威胁，急于谋求谈判。驻藏大臣有泰一意妥协，不仅亲到英军军营慰问，并向荣赫鹏表示愿意“协同工作，迅速努力于条约之完成”①。9月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军的威胁下，在布达拉宫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条约规定：开江孜、噶大克（今西藏噶尔雅沙）、亚东三处为商埠，向英国赔款50万英镑，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的炮台、要塞一律拆除，西藏内政、外交都要请示英国，他国不得干涉。这个条约实际上是把西藏变成英国的殖民地。但由于有泰未敢在条约上签字，因而无效。

条约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清政府亦感有损主权，提出改约要求。英国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放弃立即占领西藏的企图。1906年4月27日，中英双方在北京重新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续约规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②，从而使英国变西藏为殖民地的阴谋未能得逞。

---

① 〔英〕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译本第217页。

②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29页。

第二十三章　清末新军的编练与军制的进一步改革

清政府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的军制初步改革，其实质是在肯定湘淮勇营制度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改善清军武器装备来达到自强图存的目的。由于只偏重于器用方面的变革，而没有注重军事体制的根本改造，因而成效甚微。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朝野痛感旧军之不足恃，才真正认识到进行军事体制改革的绝对必要，从而进一步借鉴西方，编练新式陆军，逐步掀起了晚清军事历史上军制改革的高潮。军制改革涉及的内容很广，本章主要就清末军队体制编制方面的重大改革进行探讨。

第一节　新式陆军的早期编练

清末新式陆军的编练，始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防练各军在甲午战争中屡战屡败的惨痛教训，使清政府中不少人认识到西方和日本军事力量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军事技术先进，还在于有良好的官兵素质，以及先进的军事制度和科学的训练方法。于是，内外臣工纷纷奏请仿照西法，改革军制，创练新军。督办军务处王大臣指出："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①。张之洞奏称："愤兵事之不振，由锢习之太深，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

① 转引自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光绪二十四年九月版（下同），卷1，第19页。

御侮之资。”①盛宣怀、胡燏棻等人在中日甲午战争尚未结束之际，即提出了改革旧制、编练新军的具体方案。清廷也认为日本“专用西法制胜”，认识到改革军制，编练新军，确系燃眉之急，刻不容缓。然而，一则困于经费不足，二则对改定兵制“主持慎重，不敢动议辄更”②，故当时未在全国普遍推行，只让胡燏棻和张之洞分别在北洋和南洋试办，“是为创练新军之始”③。

一、胡燏棻编练定武军

1894年中日黄海海战之后，充任北洋舰队总教习的德国军官汉纳根，向清政府提出延聘洋将、仿照德国军制“加练新军十万”的建议，清廷鉴于清军“新挫之余，难期振作”，乃于11月中旬谕称：“前据汉纳根呈递练军节略，意以倭氛甚炽，非赶募新勇十万人，选派洋将，用西法认真训练，成一大枝劲旅，不足以大挫凶锋。……其说颇多中肯。……实为救时之策，着照所请”④。同时，责成当时主持“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与汉纳根“悉心筹画”，共同办理，“一切教练之法，悉听该员约束”。⑤清廷一时忘却阿思本舰队事件的历史教训，企图完全借材异域，一切仰赖洋员，无异于画饼充饥，自难奏效。后果因汉纳根“拟办各节事多窒碍”⑥，加上经费难筹等原因，汉纳根的建议旋即中止施

---

① 张之洞：《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40，第1页。

②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9655页。

③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总第9509页。

④⑤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4，第6页。

⑥ 《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原奏》，《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第19页。另据胡燏棻称：汉纳根要求“自命为军师、总统并设军务府，一切兵权饷权均由伊主政，即招募事宜，亦须会衔出示，并不以派员四出招募为然”。参见《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7页。

行。为应付战争急需，清政府命胡燏棻自行编练新军。拟先练 10 营 5000 人，以后“徐图扩充”。

胡燏棻受命后，派人分往天津、山东、河南等地募兵。选募时，务择年力精壮，不以老弱充数，以确保兵员质量。募足后，编为 10 营，号“定武军”，初屯天津马厂，1895 年 10 月中旬移驻津南小站，开始了所谓“小站练兵”。

定武军有步、骑、炮、工各营，“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武器装备也“按照西法购备”。①步兵营伍仍按旧制，分前、后、左、右、中营，每营 500 人，设管带、帮带各一人。虽然胡燏棻坚持按西法练兵，而且重用熟悉西方兵制的武备学堂学生，但他并未看清清军营伍旧制已成为新军发展的桎梏，加之他本人出身进士，实际上并不知兵，因而练兵年余而无显著成效。1895 年 12 月上旬，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以“胡燏棻奉命督造津芦铁路，而定武一军接统乏人”为由，推荐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接练该军，改称“新建陆军”。

二、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到处钻营，结交权贵，并积极陈述练兵之法，受到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赏识。刘、张竭力向清廷保荐袁，谓其“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建议调袁世凯“专意练兵事”。② 与此同时，袁世凯遵照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关于“详拟改练洋队办法”的指示，很快拟定了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聘请洋员合同等文件，督办军务处王大臣看后大为赞赏，于 1895 年 12 月 8 日据实入奏，并“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③。不久，袁世凯正式奉旨督练天津新建陆

---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 3536 页。

② 张之洞:《荐举人才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38，第 15 页。

③ 转引自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 1，第 19 页。

军。

（一）新建陆军营制

袁世凯认为，甲午战争中清军之所以屡屡败北，“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新军既按西法操练，就“必须参用泰西军制”①。为此，他仿照德国陆军编制，制定了新建陆军营制，对旧的营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新建陆军设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 4 个兵种，各自独立成营，合成作战。袁世凯曾设想以 1.2 万人为一分军，辖步队 8 营（每营 1000 人）、炮队 2 营（每营 1000 人）、马队 2 营（每营 500 人）、工程队 1 营（1000 人）。步、骑、炮兵每两营设一分统，由统带（营长）兼任；步兵分为左右两翼，各设统领一员，由分统兼任。使用时，“步队为主，炮队辅之，马队巡护，工程队供杂役”。袁世凯认为，这样，“部署可期周密，临敌亦鲜贻误”。②

新建陆军各营和新建陆军总部具体编制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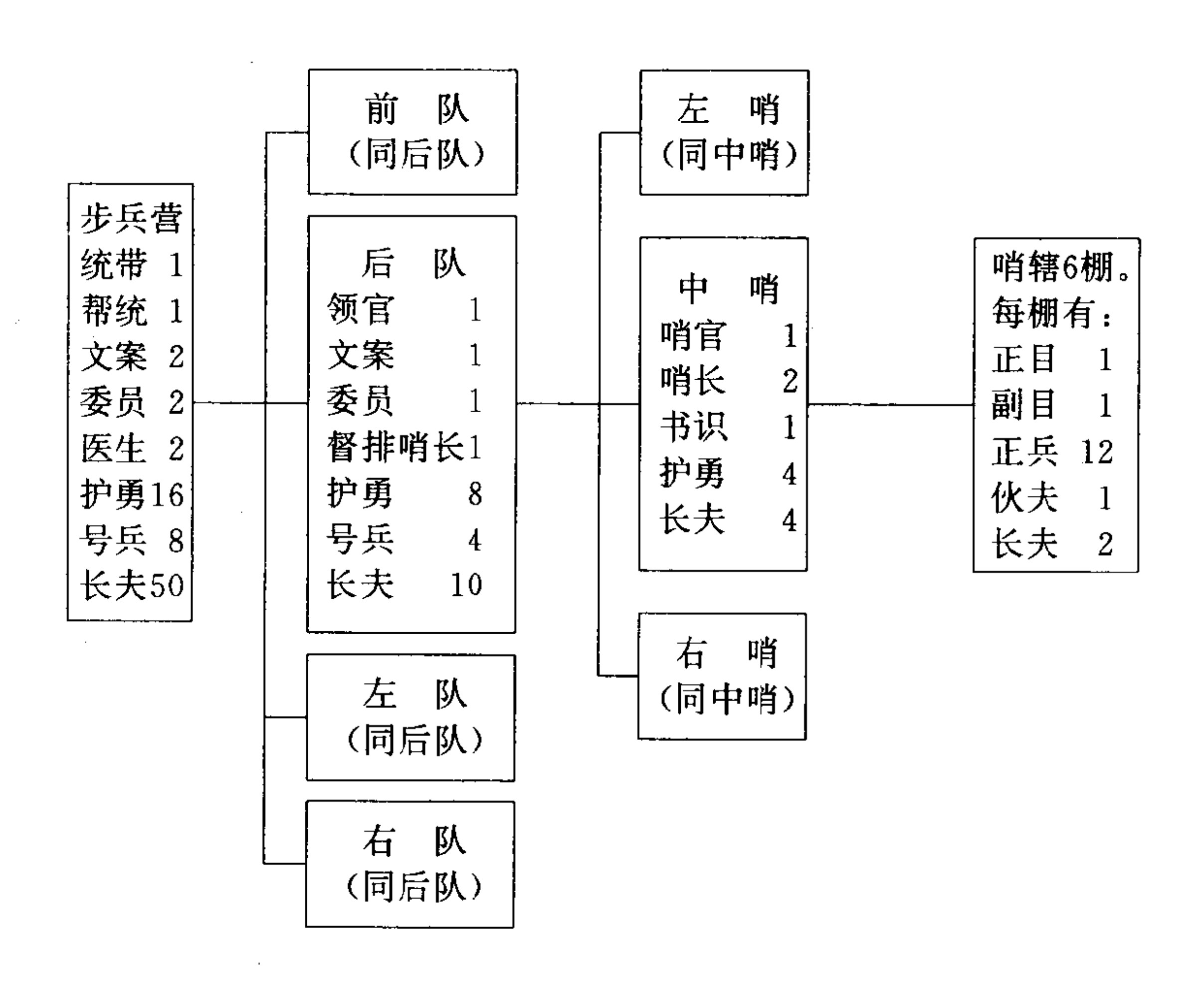
步队营制　步队每营 4 队，每队 3 哨，每哨 6 棚，每棚正兵 12 人。全营计有统带、帮统各 1 员，领官 4 员，哨官 12 员，哨长 24 员，督排哨长 4 员，正副头目各 72 名，正兵 864 名，护勇 96 名，号兵 24 名，伙夫 72 名，长夫 282 名。加上文案、委员、医生、书识，全营总计官弁兵夫 1554 人。（详见表一）

炮队营制　炮队每营设统带 1 员，下辖左、右翼炮队及接应炮队（每队设帮统兼领官 1 员），每队 3 哨（各设哨官、哨长），左翼队每哨 9 棚，右翼队每哨 8 棚，接应队每哨 6 棚（棚设正副头目）。全营计有统带 1 员，帮统兼领官 3 员，哨官 9 员，哨长 30 员，管查炮马哨长 3 员，正副头目 138 名，正兵 828 名，正副医生和马医生各 1 员，号兵 24 名，护勇 94 名，伙夫 69 名，长夫 272 名，马夫 158 名，加上文案、委员、书识，共计 1651 人。全营配马 474 匹。（详见表二）

---

①② 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 1，第 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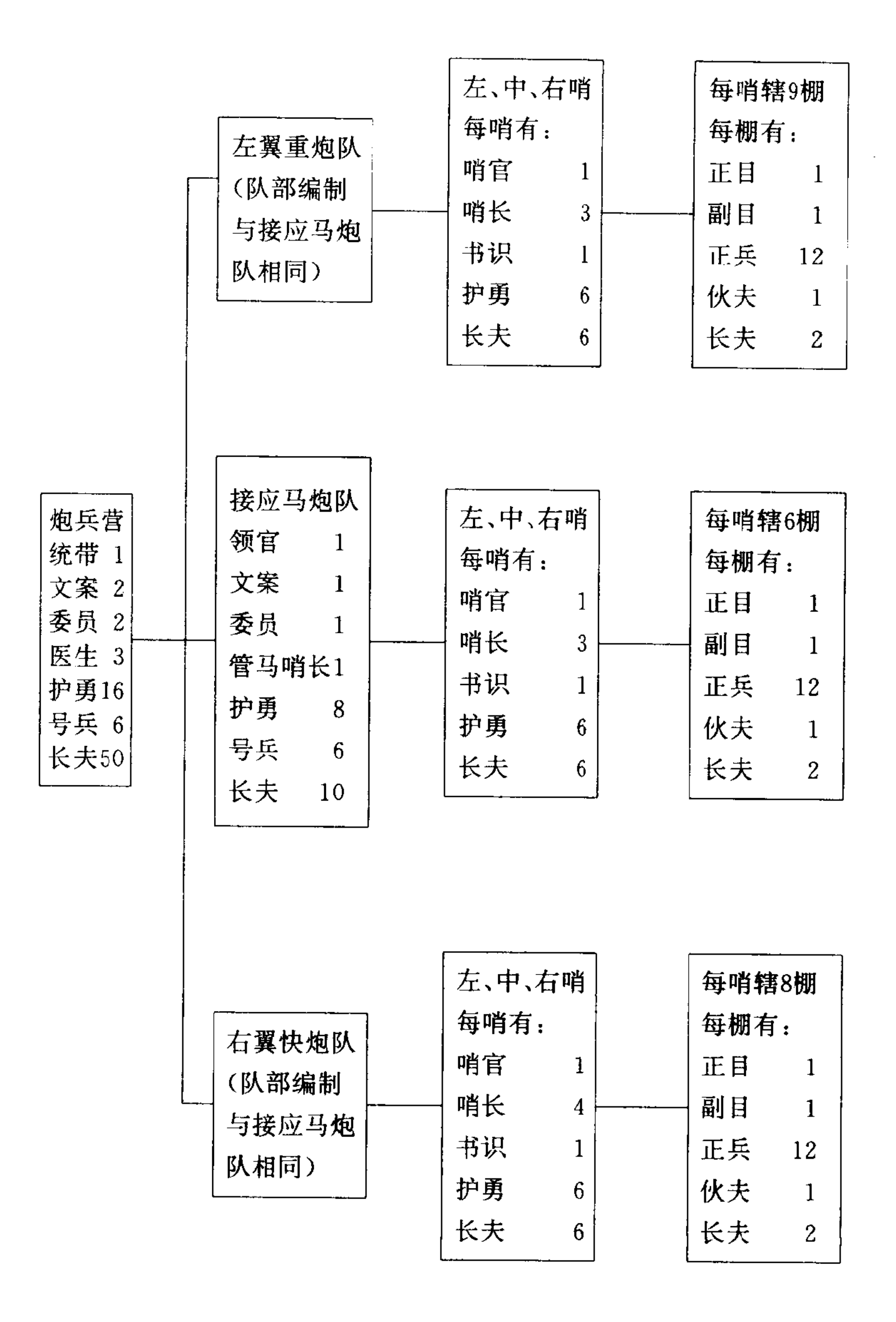
表一　新建陆军步兵营编制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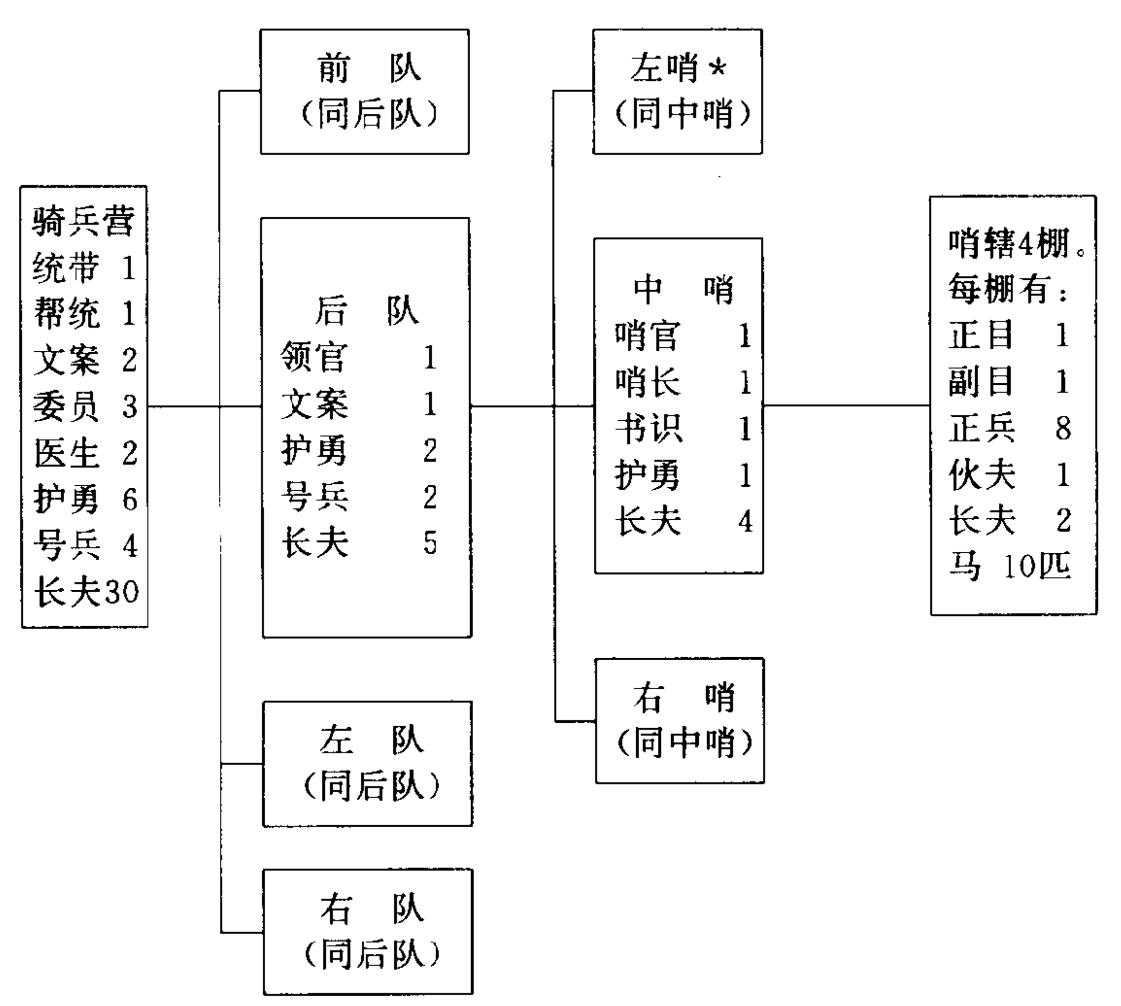
马队营制　马队（骑兵）每营设统带1员，下辖前后左右4队（队设领官），每队3哨（哨设哨官、哨长），每哨4棚（棚设正副头目）。全营计有统带、帮统各1员，领官4员，哨官8员，哨长12员，正副头目96名，正兵384名，号兵12名，护勇26名，伙夫48名，长夫194名，加上文案、委员、医生、书识，共809人。全营配马556匹。（详见表三）

工程队营制　工程营设桥梁、地垒、电雷、修械、测绘、电报各司。营设管带，司设队官，司下按工种分队，各队专业正兵人数不一。全营计有管带、帮带各1员，队官6员，队长7员，正副头目45名，各类司事及正兵共249名，学兵24名，号兵6名，护勇24名，伙夫27名，长夫及土夫114名，加上文案、委员、书识共6名，总计官弁司事兵夫510人。（详见表四）

表二　新建陆军炮兵营编制表



表三　新建陆军骑兵营编制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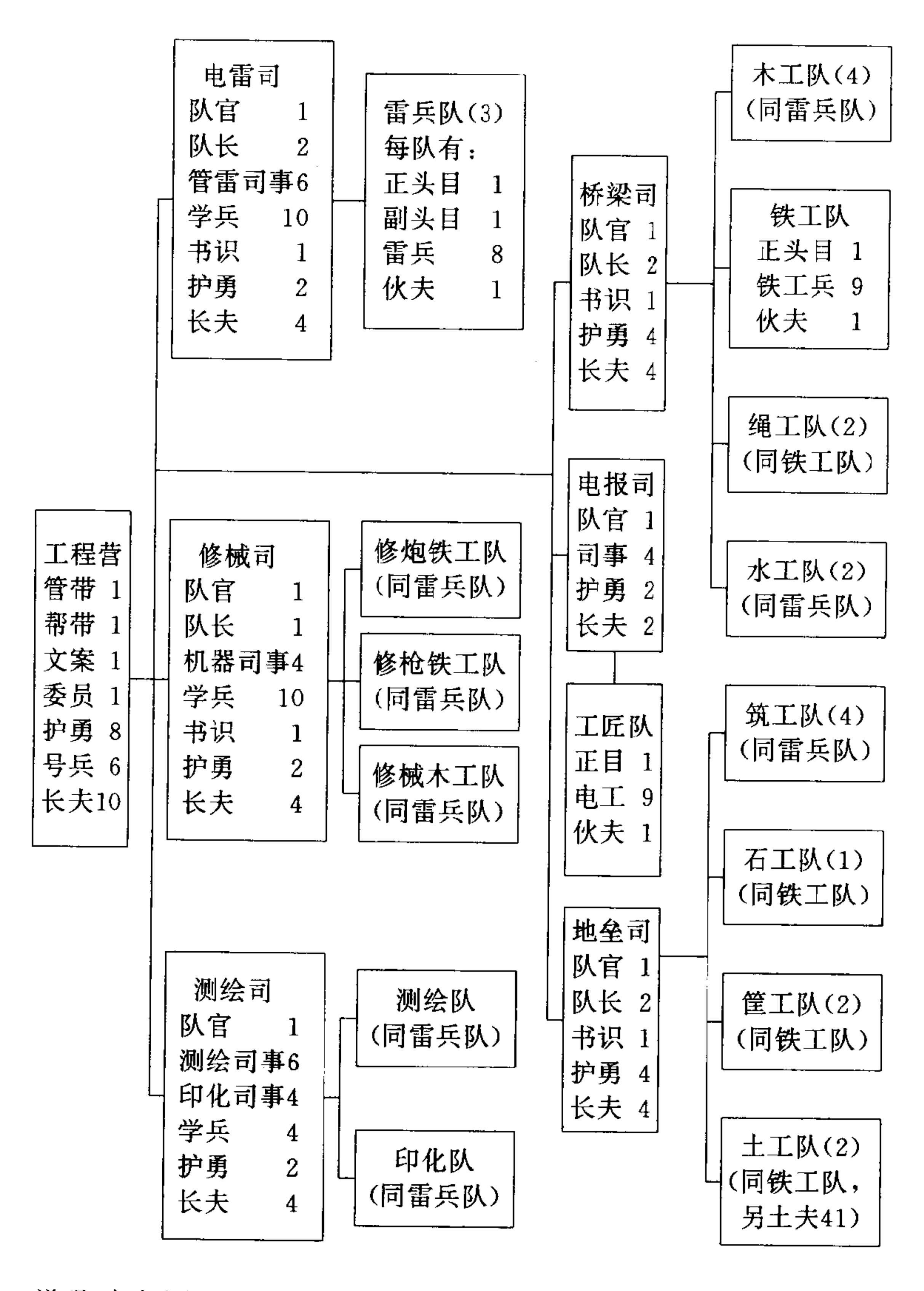
*左哨哨官由领官兼充。

新建陆军总部编制　新建陆军总统由督练官(时为袁世凯)兼摄，下设督练处、教习处、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转运局和侦探局，总计官弁兵夫400余人。(详见表五)

袁世凯接练新军之初，“先就定武军步队三千，炮队一千，马队二百五十，工程队五百，照新军章制归并编伍，并加募步队二千、马队二百五十，合为步队五千，炮队一千、马队五百、工程兵五百，先行试练”①，按袁世凯设想的分军编制人数计算，实际上当时仅有步兵5营、炮兵1营、骑兵1营、工程兵半营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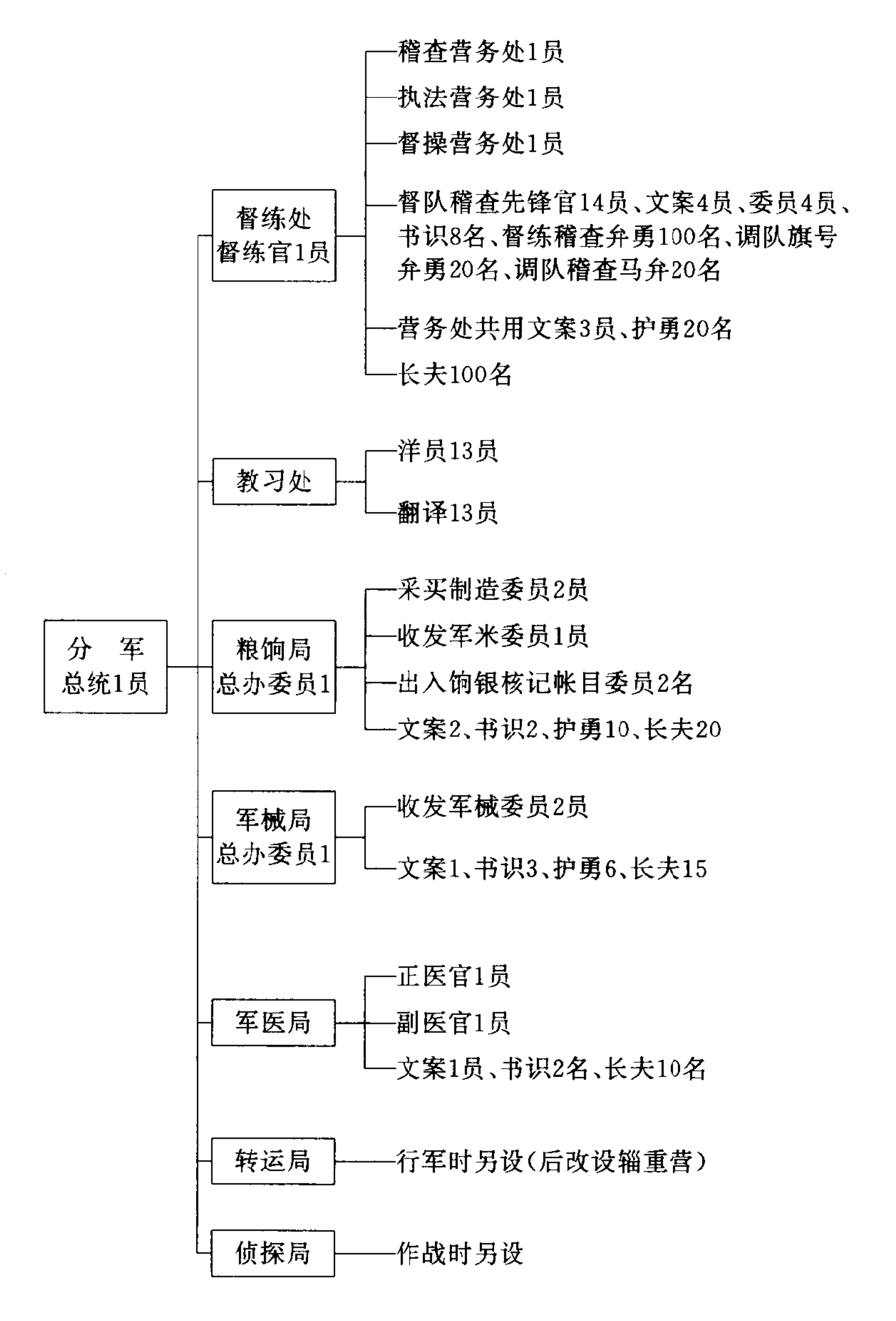
① 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第2页。

表四　新建陆军工程营编制表



说明:表中所注(同雷兵队)、(同铁工队),均指官兵人数。

表五　新建陆军总部编制表



（二）新建陆军饷章

新建陆军的饷章，亦由袁世凯自行制订，清廷于 1895 年 11 月谕准施行。新军饷章各级官兵参差有别，内容复杂，大致情况如下。

总部饷章　督练官月支薪水银未定，公费银每月 1000 两，营务处各员月支薪水银 80 两、公费银 80 两，先锋官月薪 40 两。粮饷局总办月薪 50 两、公费银 80 两。军医局正医官月薪 80 两、公费银 80 两，副医官月薪 40 两。教习处洋员 13 人每月薪水房租各项约需 4000 两，翻译 13 人每月薪水银约需 1000 两。各处、局其他人员的薪饷也多寡有别，督练处的文案月薪 50 两、委员 40 两、书识 12 两，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的文案、委员、书识则分别为 20 两、30 两、7 两。

步队饷章　步队统带月薪 100 两、公费银 300 两，帮统月支薪公银 100 两，领官月薪 50 两、公费银 100 两，哨官月薪 20 两、公费银 10 两，哨长月薪 15 两，正头目月支工食银 5.5 两，副头目 5 两，正兵 4.5 两，号兵和护勇 5.5 两，伙夫 3.5 两，长夫 3 两，正医生月薪 40 两，副医生 20 两，文案和委员 22 两，书识 7 两。

炮队饷章　统带月薪 150 两、公费银 300 两，帮统兼领官月薪 100 两、公费银 100 两，两翼队哨官月薪 20 两、公费银 20 两，接应队哨官月薪 20 两、公费马干银 26 两，两翼队哨长月薪 20 两，接应队哨长薪水马干银 26 两，正头目月支工食银 6.5 两，副头目 6 两，正兵 4.8 两，文案和委员月薪 22 两，正医生 40 两，副医生 20 两，马医生 30 两。其他如号兵、护勇、伙夫等皆与步队饷章相同。

马队饷章　统带月薪 100 两、公费银 200 两，帮统月薪 60 两，领官月薪 50 两、公费马干银 60 两，哨官月薪 20 两、公费马干银 10 两，哨长月薪 15 两、公费马干银 5 两，正头目月支工食马干银 11 两，副头目 10 两，正兵 9 两，文案和委员月薪 20 两，医生月支薪水马干银 40 两，马医生 30 两，书识 12 两，护勇、号兵月支工食马干银 11 两，伙夫、长夫月支工食银与步队同。

工程队饷章　管带月支薪公银300两，帮带140两，桥梁、地垒、电雷、修械各司队官60两，测绘和电报司队官50两，各司司事、学兵、正副头目、专业兵丁因工种不同，饷银各有差异。以司事为例，最高者如机器司事每名月薪26两，最低者如印化司事只有22两；正兵最高者如修械兵月支工食银8两，最低者如土工兵仅有4.5两。护勇、号兵、长夫则与步队同。

由上可见，新军薪饷格外优厚，各级薪饷都超过旧式清军1～2倍。加之袁世凯严格禁止“吃空额”、“冒领”等军营流弊，每月按时把饷银发到士兵手中，故新军士兵所受待遇比旧军士兵优越得多。

（三）新建陆军武器装备

袁世凯接练定武军后，决心改变以往枪炮种类纷杂的状况，以求军用器械归于一律。他决定一律使用奥制8毫米口径的曼利夏步枪、马枪和六响左轮手枪。新建陆军各兵种武器配备情况如下。

步兵　军官配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正副头目、正兵、号兵、护勇各配曼利夏步枪1支、子弹50发。

骑兵　军官配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正副头目、正兵、号兵、护勇各配马刀1把、曼利夏马枪1支、子弹50发。

炮兵　炮兵每营3队，各队装备不同。左队装备克虏伯75毫米口径过山轻炮18尊（每哨6尊），每尊配马7匹，共126匹。右队装备格鲁森57毫米口径过山快炮24尊（每哨8尊），每尊配马7匹，共168匹。接应队装备格鲁森57毫米口径陆路快炮18尊（每哨6尊），每尊配马5匹、骑马5匹，共180匹（行军时酌增）。全营炮兵“分三成，一成用炮，一成备补，一成持枪护炮”。①

工兵　各队工作性质不同，配备不同的装备和工具。

新建陆军在编制上采用了资本主义列强军队的组织结构，设立了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后来又增设辎重兵），成为能适

---

①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第5页。

应近代战争要求的多兵种合成作战单位，较之绿营、勇营是个巨大的进步。在募兵条件、装备训练、营伍管理诸方面，新建陆军也都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较之淮练各营，呈现“壁垒一新”的气象。

三、张之洞编练自强军

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是编练新军的积极倡导者。早在1895年初，张之洞即指出，日本早有觊觎东南数省之心，必须在南洋精练新军一支，方可以备缓急而维远局。同年7月，张之洞奏呈编练新军计划，同时指出：日本军队是一支“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弁兵皆有地图”的近代化军队，而清军“向来各省所习洋操，不过学其口号步伐”，若不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则中国永无战胜之日。① 1896年初，张之洞又呈递江南新军编制设想及编练步骤，内称：“现拟先练二千数百人为一军，照洋法分为十三营，即名为自强军”。他决定以德国军官35员为营哨各官，“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②同年3月，自强军在江宁（南京）正式建立。

张之洞为了摒除旧军诸弊，建立一支“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③的新型军队，不仅部伍人数俱照德国营制，而且在招兵、训练、饷制诸方面，都采取了与旧军根本不同的新办法和新措施。

在兵员条件方面，张之洞规定，各营招募的士兵，必须是距南京不太远的“土著乡民”，而且要“年在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体气精壮向不为非者”，此外还须年籍身家易于清查，并有族邻乡

---

① 张之洞：《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8，第2～3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711～3712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711页。

绅做保者，“凡城市油滑、向充营勇者一概不收”。① 同时规定，兵丁加入自强军，必须声明情愿效力 10 年，只准开革，不准辞退，以确保部队的稳定性。

自强军营制基本仿照德国陆军编制，有步兵、骑兵、炮兵和工程兵，各以营哨为基本建制单位。步兵每营 250 人，分为 5 哨；骑兵每营 180 骑，分为 3 哨；炮兵每营 200 人，分为 4 哨；工程营 100 人。而德制 1 营辖 4 连，每连 3 排，加上其他人员，全连约 250 人，因而自强军步兵 1 营仅相当于德军 1 连，4 营才相当于德军 1 个营。按张之洞计划，自强军先设步队 8 营、马队 2 营、炮队 2 营、工程队 1 营，共 13 营，实数勇丁 2860 名，大抵相当于德国每军人数的 1/4。张之洞设想，“俟成军半年以后，操练已有规模，即行推广加练，酌增人数一倍，统以增至万人为止。如届时饷巨难筹，则至少亦必须增至五千人”②。

为了使自强军“一人必可抵旧日营勇两人之用”，其官兵薪饷也普遍从优。“正勇饷银每名每月给官铸银元五元，合库平银三两六钱，勇目递加，其官给饭食衣履等费在外。”营哨各官亦“酌量优给薪水，俾足自赡效力”。③

张之洞尤其注重选拔和培养懂得近代军事知识的军官。自强军中，营哨主官均由洋官担任，“选武职中壮健有志不染习气者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两处武备学堂出身之学生为副哨官”④。为了在江南自行培养新式军官，张之洞还创建了江南陆军学堂，“慎选年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聪颖子弟文理通顺能知大义者一百五十人为学生”，以德国军官为教习，“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台炮各门，研习兵法、行阵、地理、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学问，操练马、步、炮各种阵法”。⑤ 学生毕业后（学制 3 年），择优分派各营任用。

---

①②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 3712 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 3712～3713 页。

⑤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 3753 页。

张之洞本欲“督率华洋官弁认真训练”，使自强军成为“有用劲旅”，实现其“奋武自强”的宿愿，但未能如愿以偿。1896年初，张之洞奉命回湖广总督原任，自强军交两江总督刘坤一接办。

刘坤一接办自强军后，认为洋员教习在省城督军操练，难免妨碍督署公务，遂将该军迁移吴淞，后又迁至江阴。在编制体制上，刘坤一“以工程队未经募练，改归陆师学堂办理，马队二营并为一营”①，并根据自强军统领来春石泰（德员）的建议，将自强军步兵分为左右两翼，每翼4营，设翼长一员。这样，自强军实有步骑炮兵共11营，总计2588人。此外，刘坤一认为自强军原定兵丁饷数太优，略予降低。为了“钤束”洋员，防其擅专，还设立了“总理自强军营务处”，派候补道沈敦和前往总理营务，督率全军，改变了自强军督率大权悉归洋员的局面。

1898年4月，来春石泰等洋员合同期满，按期回国，刘坤一咨委署江南提督李占椿接统自强军。1901年7月，清廷调自强军前往山东，归袁世凯节制。其后不久，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袁扩建北洋新军时，自强军被并入北洋军序列。

四、荣禄编练武卫军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废新政，并下令搜捕维新派和帝党人士。随后，简派大学士、前兵部尚书荣禄为钦差大臣，令“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禄节制，以一事权”②。同年12月7日，荣禄奏称：“查北洋除淮练各军而外，有毅、甘、武毅、新建四军，分之各有自主之权，合之实无相维之势，一遇战

---

① 刘坤一：《江南防军改练洋操折》，见《刘坤一遗集·奏疏》，中华书局1959年版，总第1059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222页。

阵，仍形孤立，欲求制胜之方，必使各军联为一气，然后可期指挥如意”①。因此，他建议将上述各军统一编为“武卫军”，以统一号令，集中指挥。其基本设想是：武卫军设前、后、左、右、中五军。“聂士成一军驻扎芦台，距大沽、北塘较近，扼守北洋门户为前军；董福祥一军驻扎蓟州兼顾通州一带为后军；宋庆一军驻扎山海关内外，专防东路为左军；袁世凯一军驻扎小站，以扼津郡西南要道为右军”；荣禄另募亲兵万人为中军，扎南苑集中训练。②慈禧立即照准。武卫军共约6万人，成为拱卫京师的基本力量。从此，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

荣禄设想，武卫军营制悉仿德军编制，每军辖8营，其中步队5营，炮队、马队、工程队各1营，另设一学兵营。步兵每营4队，每队250人，全营共1000人。但结果只有新组建的武卫中军按章编就；武卫右军原来编制基本符合新章，不再更动；前、左、后三军虽都准备按新制编改，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被迫中止。

武卫军组成前，毅、甘、武毅、新建各军饷制参差不一，以新建陆军饷银最高。荣禄认为：“各军饷章，必使划一，万众乃能齐心”。因此，决定以新建陆军饷章为基准，适当增加毅、甘、武毅各军饷银，“使与新建一军相同，免致士卒借口”。③至于饷项来源，荣禄主张：武卫中军年需饷约120余万两、武卫右军（新建陆军）年饷90余万两，统由户部拨付；毅、甘、武毅各军饷银除仍由原各省协解外，不足部分，以裁并直隶淮、练、绿营腾出之饷填补。此项筹饷措施，得到清廷批准。

对于武卫军的武器装备、训练操法和协同作战等问题，荣禄没有认真进行统一筹划和切实整顿，以致武卫军并没有形成一支有统一的指挥机构、统一的号令和统一的作战思想的具有整体威力的新式武装力量。

---

①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265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266页。

五、袁世凯增立武卫右军先锋队

袁世凯有着强烈的政治野心，他不甘局促于小站一隅操练军队，时思出任封疆大吏。1899 年 5 月，武卫右军奉旨“开赴山东德州一带操演行军，借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①，袁世凯趁机呈递奏折，建议“先以通国之全力，增练精兵”，并指出：“惟是练习洋操，备极繁难，约而计之，其端有四：一则陋习必痛予扫除；一则将弁必讲习韬略；一则士卒忌惰游充数；一则器械忌参差不齐”。②慈禧立即补授袁世凯为工部侍郎，同年 12 月上旬又令其署理山东巡抚（次年 3 月实授），并召其入京，先后两次面授机宜。

在山东期间，袁世凯根据清廷关于“著将该军平日训练情形，详悉陈奏”的谕旨，命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人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一书，于 1899 年 8 月下旬“进呈御览”。这是一部集袁世凯练兵思想和新军训练操法之大成的法规性军事著作，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系统的军事操典。此外，在残酷镇压义和团的同时，袁世凯积极整顿山东勇营，并增编武卫右军先锋队。山东原有绿营、练军共约 34 营，袁世凯到任后，认为“营制纷杂，号令不齐”，“散漫无纪，有类乌合”，而且“军械窳敝，名目繁多”，乃于 1900 年 4 月奏请“汰其疲羸，去其冗碎”，并添募归并，集成新兵 20 营，“依次编伍，增立一军”。③慈禧批准袁世凯所请，并将增立之军命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于是，袁世凯“抽调东省营队十三营及嵩武全军七营裁汰归并，作为新增之武卫右军先锋队”④。该队仿照武卫

---

① 袁世凯：《请饬拨款添办行军车辆折》，见《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下同），第 24 页。

② 袁世凯：《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见《袁世凯奏议》第 28 页。

③ 袁世凯：《遵旨筹饷练兵酌拟办法折》，见《袁世凯奏议》第 88 页。

④ 袁世凯：《划拨东省旧营底饷接济新军折》，见《袁世凯奏议》第 113 页。

各军营制，设步、马、炮各队。步队分左右两翼，共 16 营，下分前、后、左、右 4 路，每路辖前、后、左、右 4 营，派统领一员督率。另有炮队 2 营、马队 2 营，各派统带一员督率训练。武卫右军先锋队饷章另订，官兵薪饷略低于新建陆军。

武卫右军先锋队系武卫右军和自强军之外的又一支新式陆军，由袁世凯兼任总统官。从此，袁世凯所统新军由原来的 8 营猛增到 28 营，加上武卫右军赴山东时增设的辎重队，共约 1.8 万人。

1900 年 6 月，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当月 17 日即攻陷大沽炮台。清廷以天津防务紧急，命袁世凯火速派兵北援。但袁世凯以“东省防务日紧，兵力难分”为借口，拒不发兵。后经清廷严辞催促，始派登州镇总兵夏辛酉率所部 6 营嵩武军（属武卫右军先锋队）北上应援，以应付慈禧太后，自己则拥兵济南，坐观成败。同年 7～8 月，津京先后失陷。武卫各军损失惨重，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地保存下来，后来成为京畿地区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第二节　军队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一、武装力量体制的变化

经八国联军的打击和义和团运动的震撼，清政府更加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为了摆脱危机，维护反动统治，清廷被迫于 1901 年初颁布推行“新政”的上谕，并于同年 4 月设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具体负责“新政”事宜。在连续颁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改革军制被列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从而推动清末军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开展。

1901 年 9 月，清廷颁布了改革军队体制的上谕，内称：“前因各省制兵防勇，甚为疲弱，业经通谕各督抚认真裁汰，另练有用

之兵。……著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同时强调指出：“朝廷振兴戎政，在此一举，各该将军督抚，务当实力整顿，加意修明，以期日有起色”。① 督办政务处旋即发出指示：“现行营制饷章，不合时用，亟宜通盘筹划，大加厘订，俾各省均归一律”②。很明显，清政府这次在全国范围进行军事改革，不仅仅限于营制饷章的改变，而是对整个武装力量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虽然它来得很迟，而且是清政府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但它毕竟冲破了旧的军事体制的束缚，开始以西方军制的新理论为依据，朝建立一支更能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新的国家武装力量的道路迈出了极重要的一步。

二、设立练兵处

1901 年 11 月 7 日，李鸿章病亡，慈禧令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 6 月实授）。不久，袁世凯率武卫右军和江南自强军（同年 7 月奉旨调赴山东）进驻直隶和京畿。由于捕剿义和团、部署京畿防务和迎接两宫还京“有功”，袁世凯进一步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和信任。1902 年 2 月，袁世凯以“直隶幅员辽阔，又值兵燹以后，伏莽未靖，门户洞开，亟须简练师徒”为由，奏请在直隶裁冗勇，练精兵，并提议“在顺直善后赈捐结存项下，拨款一百万两，作为募练新军之需”。③ 经慈禧谕准后，袁世凯开始在直隶编练常备军。与此同时，全国各省也陆续开始编练新军，因缺乏统一领导，出现了“各省兵制不一，军律不齐，饷械则此省与彼省不同，操法则此军与彼军又不同”的混乱局面。袁世凯指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 4718～4719 页。

② 转引自：《袁世凯奏议》第 509 页。

③ 袁世凯：《拟拨顺直善后赈捐存款募练新军片》，见《袁世凯奏议》第 428 页。

出：这种军制、操法、饷械未能一律的状况如不予以纠正，则清军“平居而声息不相通，应调而指臂不相使，临敌而胜败不相顾，如此虽岁糜巨饷，广募劲卒，将安用之？”① 他建议朝廷设立专门机构，统一领导督练全国新军，集中军政军令于朝廷，以便战时能够进行统一指挥下的协同作战。

1903 年 4 月，庆亲王奕劻继荣禄为军机大臣，掌握朝廷实权。在奕劻的支持下，慈禧太后采纳了袁世凯的建议，于 12 月 1 日诏命特设“练兵处”，为全国练兵总部，以随时督导、考查、组织全国新军的编练。并派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青年贵胄铁良为襄办。12 月 24 日，清廷颁布练兵处分设司科管理章程，不仅将编练新军一项从兵部分出，而且有关新军的人事、经济、训练、指挥等也完全独立，仅备册咨送兵部存查。练兵处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三司，下辖十科。袁世凯身为直隶总督，不能常驻北京，遂推荐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为军政司正使，袁嘉谷为副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副使，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为副使。不久，奕劻以自己“衰迈多病”，奏请慈禧“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自己不理常务，这样，练兵处实际由袁世凯及北洋系统所控制。

练兵处成立后，根据改革军事、革除锢弊的目标，主要确定如下权限和任务：

（一）整顿军纪。练兵处将严格军政，对全国军队认真整顿，切实纠察。凡提镇以下各武职，遇有玩抗号令，训练不力，或狃于积习，纪律不严者，均由练兵处查明，先行撤差，一面奏参惩办。

（二）监督地方。各省地方官员与军事关系极大，不仅平时筹饷造械、招募卒伍、购运粮食、安扎营盘、操演行军等事均与各地方官时有关联，而且一遇战事征调军队，尤须地方协助。倘地

① 袁世凯：《遵旨训练各省将目拟订简易章程折》，见《袁世凯奏议》第 719 页。

方督抚以下各文员遇事掣肘，迁延贻误，或别存意见，有意阻挠，均足败坏戎政。遇此情况，练兵处有权据实奏参。

（三）选拔将才。创练新军，极需将才，练兵处对于才能出众、足堪大用之人，可不拘资阶，奏请破格擢用。

（四）整饬员缺。新军各级官员，一律改为实缺武职，除提镇大员仍请旨简放外，守备以上各缺，练兵处有权根据才具资格，奏请升调补署，千总以下，练兵处酌情随时叙补，并设册报兵部立案。

（五）统管饷项。原拨新练各军饷项和续筹专饷，均由练兵处粮饷科统一收拨，不再由各部核销，以一事权。

（六）督造军械。各省原设制造军械各局厂，统由练兵处接管，随时委员督办考查，计划生产。

（七）派员视察。每年秋届，由练兵处选派大员，前往各省考察督练新军。

（八）选充将弁。嗣后新军凡有添派将弁之处，均由练兵处严格把关。凡“未经学习，毫无历练者”，一概不准补充。

（九）人员交流。练兵处“所设各司科，均在曾历营务人员中选补，各军营遇有将领缺出，亦可在司科中酌选接替，以期内外接洽，不至捍格”。①

练兵处在改革军事方面的确做了不少工作。首先，于 1904 年 9 月 12 日会同兵部奏定陆军学堂办法二十条，敦促各省设立各级军事学堂，为普练新军培养干部。同时制定了全国常备军营制、饷章和官制，把全国的军队体制改革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其次，练兵处还先后奏定了《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考验水陆人员画一章程》等等，为统一清末军队各类章制和在全国范围普练新军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然而，当时兵部与练兵处同时并存，于军政统一毕竟大有妨碍，同时袁世凯控制练兵处，北洋势力日益扩大，

---

① 《练兵处简要章程》，《东方杂志》第一年，第四期（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发行）。

也使清廷惴惴不安，于是慈禧太后于 1906 年 1 月 6 日谕称："兵部著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①。陆军部成立后，由铁良出任尚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袁世凯的权势。

陆军部的设立，使清末军事体制更趋合理与正规，便于清政府对全国军队实行集中领导，并使中央管理军队的多头机构归于统一，便于裁减政府冗员，提高指挥效能。总之，设立陆军部，使清末武装力量的领导体制更接近于西方国家，标志着晚清军事改革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统一全国营制饷章

全国军队统一营制饷章的制定和颁行，是由袁世凯领导下的练兵处完成的。

1903 年 12 月，清廷在关于设立练兵处的谕旨中指出："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迭经降旨饬下各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划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②。1904 年 9 月，练兵处拟定了《陆军营制饷章》和《陆军军事学堂办法》呈报朝廷，当即获得批准。这两项军事章程的颁行，标志着清末军队全面改革的开始，对清末以至民国的军事产生了重大影响。

《陆军营制饷章》是在原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基础上修改制定的，同时也参考了日本军制。早在 1902 年春，袁世凯即曾指出："今中国兵制，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能得其奥妙。欲求因时之宜，以收折冲之效，自非派员出洋肄习不为功。顾欧美远隔重洋，往来不易，日本同洲之国，其陆军学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 5579 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 5108 页。

校于训练之法，备极周详”①。因此，他极力主张派员去日本留学。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更使中国朝野为之震动，认为日本能打败欧洲强国这件事，更能说明它的军事制度优于欧洲各国，因而进一步倾向于师法日本了。

《陆军营制饷章》规定，新军由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三部分组成。常备军士兵应征入伍后，屯聚操练3年，发给全饷，3年期满后返归原籍，充当续备军；续备军分期调操，减成给饷，3年后再编入后备军；后备军分期应操，饷又递减，4年后退为平民。常备军“平时编制以两镇为一军。每镇步队二协，每协二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马、炮队各一标，每标均三营，每营马（标营）四队、炮（标营）三队；工程队一营，每营四队；辎重队一营，每营四队。步、炮、工每队皆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二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二排，每排三棚。各种队伍每棚目兵十四名。计全镇官长及司书人等七百四十八员名，弁目兵丁一万零四百三十六名，夫役一千三百二十八名，共一万二千五百十二名”②。（下附陆军镇编制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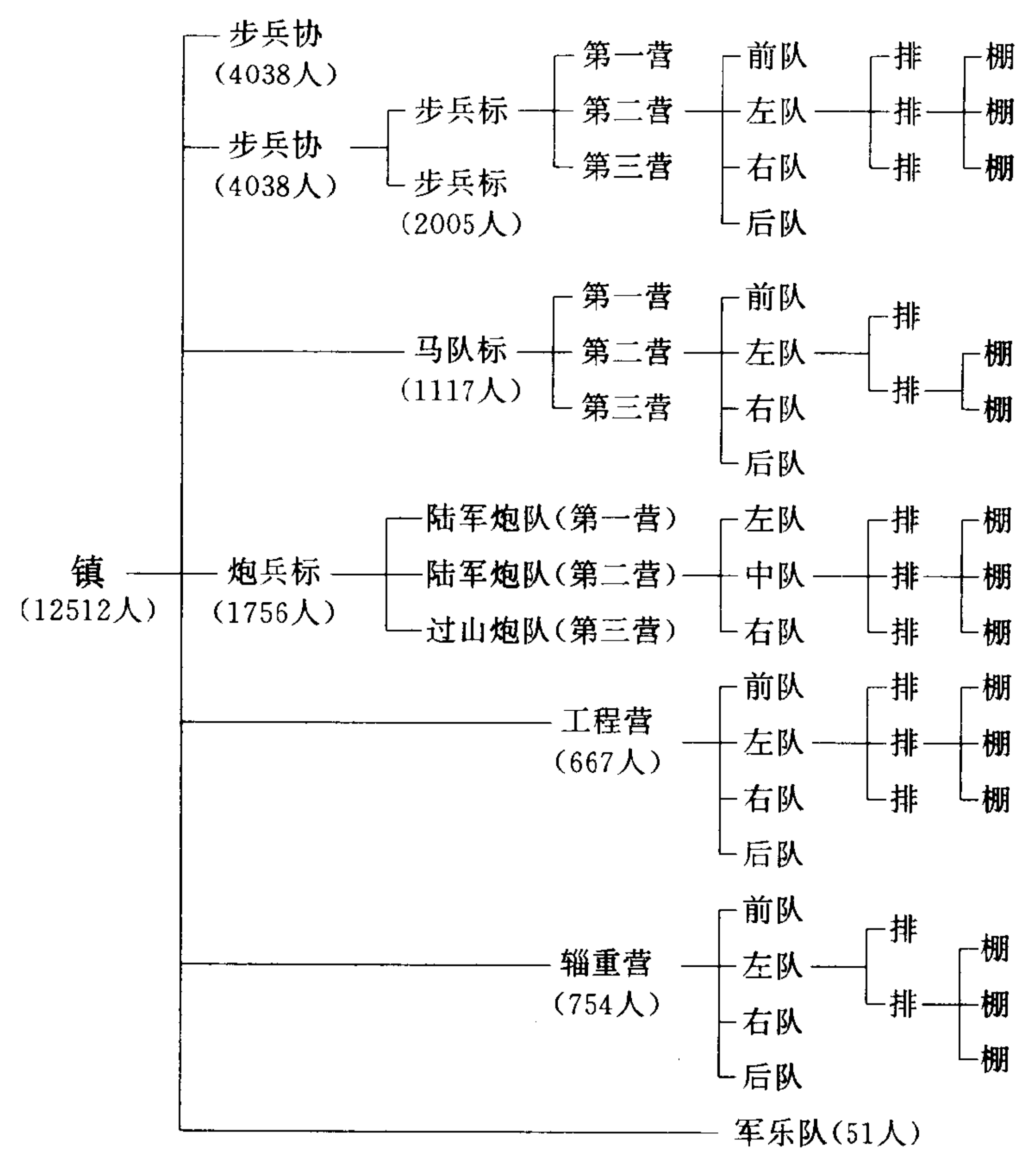
常备军的编制与日军师团编制基本相似，但由于常备军配备的护兵、夫役等非战斗人员较多，故一镇总人数要比日军一个师团多3000余人。无论如何，常备军的编制已经完全超脱了清军的传统营制，完成了向步、骑、炮、工、辎多兵种合成作战单位的转化，是一个比较符合当时军事技术发展和作战需要的近代化的军事编制。

常备军的饷章是在新建陆军饷章的基础上制定的，总趋势是标准降低，各级薪银都比新建陆军减少。如新建陆军步兵营统带的薪公费为400两，而常备军的步兵营管带的薪公费仅为240两；

① 袁世凯：《遵旨遣派武备学生出洋游学片》，见《袁世凯奏议》第487页。

② 《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东方杂志》第二年，第二期（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行）。

陆军一镇编制序列表



注:各兵种每棚有:正副头目各1名、正兵4名、副兵8名，共14名，另有备补兵1名。

新建陆军步队领官薪公费为150两，常备军步兵队官仅为60两。其他如司书、护兵、号兵等的饷银也都比新建陆军略为降低，只有正兵饷银未变，仍为4.5两。不难看出，常备军饷章有缩小官兵差距的意向。

此外，《陆军营制饷章》还就常备军的官制、退休、募兵、训练、装备、供给、纪律、军令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关于“设官”。《陆军营制饷章》中提出，由于“近日军器猛烈，最易伤亡”，而且战时多以散兵队作战，战线绵长，难于联络，“我国旧制官弁不能敷用”，确定于基层单位“酌添官弁，以厚战力”，如步兵每队除设队官、排长外，增设司务长一员，“专理本队庶务”。①

关于“补官”。《陆军营制饷章》确定：此后新军所有委用人员，应首先从武备学堂学生或曾带过新军之官弁中选用。新军成军后，遇有官弁出缺，也要先从学堂毕业生中选充，“概不得在学堂、新军以外随意任用”。②

关于“募兵”。《陆军营制饷章》吸取了西方征兵制的一些做法，确定一种“征募制”。其中规定：“由各督抚察度该省各州县民户之多寡，幅员之广狭，道路之远近，往来之通塞，酌订开招日期，并先设选验处所，预期示谕”。同时规定，招募时，“由各该村庄庄长、首事、地保等各举合格乡民，开具名册，偕赴该选验处所，听候验点。毋许滥保游民溃勇，亦不得将应募合格之人瞻徇隐匿。并严禁吏胥、庄长、地保等借端勒索摊派”。③显然，这与传统的募兵方式有所不同，改变了自愿投效的方式，掺杂了某些征兵制的做法。此外，为了保证兵员质量，《陆军营制饷章》还规定了募兵标准：一是年龄限20～25岁；二是身高4.8尺以上(南方人可酌减2寸)，五官不全、体质软弱和有目疾暗疾者不收；三是膂力须能平举100斤以上；四是来历必须土著，均有家属，应募时须报明三代家口及住址，入行会、吸洋烟、有犯案前科者一律不收。这4条标准与10年前新建陆军的募兵标准基本相同，略有区别的是特别强调“兵必土著”，另外还仿照外国军管区的制度，规定各省新军必须在本省征兵。

---

①②③《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东方杂志》第二年，第二期(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行)。

此外,《陆军营制饷章》还参照外国军伍条例,修订了新军军官退休制度。其"退休制略"指出,"军营最贵朝气,最忌暮气",而原先"自副将以下年六十者概予罢斥"的规定,"似觉过宽"。"盖官秩愈小,则职务愈劳。至于都、守、千、把,上承命令,下赖指挥,按日督操,更非精力稍衰者所能胜任"。① 因此,重新规定退休年限:除提镇不限年岁外,副将限 65 岁,参将、游击限 60 岁,都司、守备限 55 岁,千总以下限 50 岁,超龄者皆令退休。

1904 年 12 月,练兵处和兵部还"参仿八旗官员之秩序,旁采各国军营之规制,拟定新军官职,区为三等,析为九级"②,从而结束了新军军官沿用绿营官阶,或身任武将却取用文职官阶的杂乱状况。

清末新军官制表

军官等级		军衔	任职	秩位	品级
上等	第一级	正都统	总统(军)	提督	从一品
	第二级	副都统	统制(镇)	总兵	正二品
	第三级	协都统	统领(协)	副将	从二品
中等	第一级	正参领	统带(标)	参将	正三品
	第二级	副参领	教练官	游击	从三品
	第三级	协参领	管带(营)	都司	正四品
下等	第一级	正军校	队官	守备	正五品
	第二级	副军校	排长	千总	正六品
	第三级	协军校	司务长	把总	正七品

1905 年 9 月,练兵处会同兵部又补充奏定《陆军人员任职等级及补官体制》,划定军官等级与军队中的对应职务,使军官升迁调补制度趋于完善。

---

① 《练兵处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东方杂志》第二年,第二期(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行)。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 5255 页。

（一）陆军正都统：任总统官（军）。

（二）陆军副都统：任统制官（镇）。

（三）陆军协都统：任统领（协统）官、总参谋官、炮队协领官。

（四）陆军正参领：任统带（标统）官、正参谋官、工队参领官、总军械官、护军官；陆军同正参领①：任总军需官、总理医官、总执法官。

（五）陆军副参领：任教练官、一等参谋官、正军械官、中军官；陆军同副参领：任正军医官、正军需官、正执法官、总马医官、一等书记官。

（六）陆军协参领：任管带（营官）、二等参谋官、副军械官、参军官；陆军同协参领：任副军需官、副军医官、正马医官、二等书记官。

（七）陆军正军校：任督队官、队官（连长）、三等参谋官、查马长、军械长、执事官；陆军同正军校：任军需长、军医长、稽察官、军乐队官、副马医官、三等书记官。

（八）陆军副军校：任排长、掌旗官；陆军同副军校：任司事生、医生、司号官、军乐排长、马医长、书记长。

（九）陆军协军校：任司务长；陆军同协军校：任司号长、医生、司书生等。②

新军官制是与新军编制相适应的近代化官制。它虽然采用了八旗官制的名称（如都统、参领、军校等），但在等级划分、官佐设置诸方面更多地仿照了日本陆军官制。新军官制各与对品文职体制相仿，同过去相比，军官的地位有了较大提高，有利于改变社会上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于是，“秀才当兵”成了司空见惯的

---

① 正参领以下各官冠以“同”字者，系指经理饷械医务法律等军佐人员。（参见《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398页）

② 《练兵处兵部奏续拟陆军人员任职等级及补官体制摘要章程折》，《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一期（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发行）。

现象，新军军官成为与文职官员等量齐观的体面职业。

第三节　北洋军的形成及各省新军的编练

一、袁世凯创练北洋常备军

清廷于1901年9月下达编练常备军的谕旨后，首先响应并付诸行动的，是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

1902年2月，袁世凯即奏请在直隶募练新军，旋又拟订《募练新军章程》19条，均获批准。袁世凯随即命武卫右军营务处王英楷、王士珍等分赴各属，会同地方官员，精选壮丁6000人，由王英楷、王士珍分领训练。

袁世凯募练新军的基本要求是“兵必合格、人必土著”，“断不可以游惰之人滥竽充数”。为此，他改变了过去的募兵方法。第一，招募士兵“由各府、直隶州督同各州县查明所辖村庄若干，每村庄户口若干，责令各该村庄庄长、首事、地保等酌量公举乡民数人。必须确系土著，均有家属，方准举充”。第二，将应募兵丁，按名注册，交地方官分存备案，以便稽考。同时，每月扣除正兵薪饷银一两直发家属，并照绿营马兵例，每兵准免家属差徭30亩，以“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其有入伍尝试私自脱逃者，则责成地方官分行查缉”。① 上述募兵方法，既有别于以往传统的募兵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征兵制，而是具有半征半募的性质。这是袁世凯在兵役制度上的一次改革，它为1904年全国新兵役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1902年6月，袁世凯就厘订营制饷章及北洋创练常备军情形，再次呈折具陈。北洋常备军基本上采用日本陆军的编制，以

---

① 袁世凯：《拟定募练新军章程请敕部立案折》，见《袁世凯奏议》第436～437页。

镇为基本作战单位。每镇辖步兵2协，每协辖2标，每标辖3营，每营辖4队，每队分为3排，每排计兵3棚，每棚计兵目14名。每镇另有炮队1标3营，马队1标4营，工程队和辎重队各1营。全镇步、骑、炮、工、辎共计21营。两镇合一军，“总计全军兵丁，共一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名，文武员弁、医生、书、役、匠、夫共七千九百九十六员名”。① 常备军制以辎重兵取代了过去的长夫，护勇数量也大大减少，与新建陆军的编制相比，更趋合理，更符合近代战争的要求。北洋常备军的营制饷章，实际上为1904年全国统一的营制饷章提供了蓝本。

袁世凯认识到：“整顿戎行，以遴选将才为急。”② 他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头面人物一样，认为培养武备人才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派员出洋留学，二是兴办军事学堂。为此，他一方面奏请从武卫右军行营武备学堂中选拔55名毕业生赴日本陆军学堂学习，一方面奏请建立北洋行营将弁学堂，“以雷震春为总办，选带兵员弁入学肄习，八个月卒业，酌委军事，为训练将才之基础”③。

为加强对常备军训练的领导，袁世凯在保定创设直隶军政司，自任督办。军政司下辖三处：兵备处——设考功、执法、筹备粮饷、医务等股，以刘永庆为总办；参谋处——设谋略、调派、测绘等股，以段祺瑞为总办；教练处——设学务、校兵等股，以冯国璋为总办。此外，袁世凯还高价延聘日本军官为军政司各处的顾问，各种军事学堂也以日本同类军校为楷模，不但聘请日本教官，所用军事教材亦大多来自日本。1903年12月练兵处成立后，袁世凯保举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等到练兵处任职，直隶军政司也遵章改为“直隶督练公所”，仍在日本顾问的指导下，负责北

---

① 袁世凯：《北洋创练常备军厘定营制饷章折·附件》，见《袁世凯奏议》第533页。

② 袁世凯：《遵旨遣派武备学生出洋游学片》，见《袁世凯奏议》第487页。

③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3，第6页。

洋常备军的编练工作。

在训练北洋常备军的同时，袁世凯还奉旨训练一批京旗常备军。1902年12月6日，袁世凯奉上谕："现因八旗挑选兵丁，著先派三千人交袁世凯认真训练，期成劲旅。"① 他不敢怠慢，立即照办，但提出京旗常备军的一切军规营制，均应仿照北洋常备军奏定章程办理。此外，他担心娇生惯养的旗兵不听指挥，遂奏派青年贵胄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北洋常备军自创练之日起，不断扩充，发展很快，到1904年，已先后编足三镇。1905年2月25日，袁世凯根据练兵处有关规定，奏请将北洋常备军一律改为陆军各镇。

二、北洋六镇的形成

袁世凯编练北洋军，虽然起自1895年，但北洋六镇的形成，则在20世纪初年日俄战争期间。

北洋军最先成立左右两镇。左镇系以1902年初王英楷、王士珍招募的6000名常备军为基础，另增募两营，共12营，分为4标，续添马、炮队各1标，工、辎队各1营，于1903年7月在保定成镇。它是全国最早成立的以镇为单位的新式陆军，共有步、炮、马、工、辎25营。年底，左镇一部移驻迁安、山海关一带。右镇开始仅有马队4营，后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招募新兵，添足步队两协、炮队1标、工程和辎重各1营，于1904年3月成镇，分驻小站和马厂。同月，袁世凯奏定将左、右镇改称为第一镇、第二镇，并奏请添练第三镇。

第三镇系由"巡警营北段"扩编而成。1902年8月，袁世凯在保定地区招募3000人，编为巡警，派往天津及天津至山海关铁

---

① 转引自袁世凯：《遵旨训练旗兵拟订开办章程折》，见《袁世凯奏议》第704页。

路沿线，“以靖地面而清盗源”。1904年，袁世凯趁日俄战争机会，扩大北洋军，遂将“巡警营北段”1500人调回保定进行训练，并以此为基础，添募新兵，编为第三镇。第一、二、三镇每镇有步、马、炮、工、辎21营，3镇共63营，近4万人。

1905年2月，袁世凯又将分驻天津马厂和北京南苑的武卫右军主力和自强军主力，及第三镇步队各标的第二营，合编为第四镇。

1905年5月，由驻扎于马厂的第四镇拨出步队4营、马队1营、过山炮队1营，与原武卫右军先锋队步队7营、炮队1营，加上由山东招募的新兵，合编为第五镇。

同年秋，驻保定南关外的“京旗常备军”，续添骑、炮、工、辎各营，编成一镇。与此同时，北洋常备军按新制改称陆军，统一编号。因“京旗常备军”系“京师禁旅”，虽然成镇较晚，练兵处认为其“编列号数宜居各镇之先”①，遂被定为陆军第一镇，驻保定。北洋常备军第一镇（原左镇）改称陆军第二镇，驻迁安。北洋常备军第二镇（原右镇）改称陆军第四镇，驻马厂。北洋常备军第三镇称陆军第三镇，驻保定。北洋常备军第五镇称陆军第五镇，驻山东。北洋常备军第四镇改称陆军第六镇，驻南苑。至此，北洋六镇全部编成，实力八九万人，成为新式陆军的主力。不久，陆军第一镇由保定移驻京北仰山洼（今北苑），接替第六镇执行“宿卫宫禁”的任务。

袁世凯为了把北洋六镇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北洋军事集团，六镇中的统制和协统等重要将领，均由他亲自选定。第一镇统制先为凤山，后为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为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为段祺瑞，后为曹锟；第四镇统制为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先为吴长纯，后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为王士珍，后改赵国贤。当时担任协统的雷震春、陈光远、李纯，担任标统的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田中玉等，担任管带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9667页。

的何丰林、李长泰、李厚基、阎相文等，都是清一色的小站出身，以后都成为民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1905年10月，北洋军在河间府举行秋操，这是创练新军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北洋军抽调2万余人，分成南北两军，由王英楷、段祺瑞分任统帅。南军由山东北上进攻，北军由保定南下组织防御，旋在河间会合，举行阅兵典礼。清廷派袁世凯和铁良为阅操大臣。各国驻华武官、记者和各省代表也被邀请观操。事后，清廷谕称：此次会操，“南北两军部署之宜，攻守之术，颇为完密。袁世凯、铁良督率将士简练有方，深堪嘉许”①。从此，袁世凯和北洋军声名大噪，传扬中外。翌年10月下旬，袁世凯的北洋军又与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及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于河南彰德府举行著名的彰德秋操。南北两军分别由张彪和段祺瑞任总统官。此次会操规模更大，南北两军共计3.3万余人。仍由袁世凯、铁良为阅操大臣。演习历时6天，中外观操者多达四五百人。

袁世凯编成北洋六镇，权力大增，引起清朝皇族亲贵的妒忌和猜疑。对清末新军颇有研究的美国人鲍威尔曾指出：“从政治观点看，1905和1906年的操演是有损于袁世凯的最高利益的，因为它进一步地说明，在帝国中指挥着最强和最有效率的军队的不是朝廷而是他。……就连慈禧太后也显然愿意让袁世凯的敌人来削夺他的权力”②。事实上，早在彰德秋操之前，即1906年9月，铁良等少数贵胄就奏请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使军权“集于中央”，借以削弱袁的权力。11月6日，慈禧太后谕准政府各部新官制，其中采纳了铁良的建议，合兵部、练兵处为陆军部，以铁良为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虽不忍释权，但畏惧皇族威势，不得不自请开去各项兼差，并主动要求交出陆军

---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9758页。

②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2～193页。

第一、三、五、六镇，归陆军部直接统辖，自己只保留驻于直隶的第二、四两镇。慈禧太后迅即谕准袁世凯所请，同时指出，第二、四两镇也只是“暂由该督调遣训练”，意即随时可以收归陆军部直辖。于是，袁世凯筹练新军的活动，至此告一段落。

三、各省新军的编练

1904 年 9 月，练兵处在奏定《陆军营制饷章》和《陆军学堂办法》的同时，提出了全国约需编练 36 镇常备兵的设想，并规定应依照成镇先后，统一编定全国军队的番号序列。1907 年 8 月，陆军部正式提出了《全国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方案》，得到清廷的批准。方案将编练任务分配到各省区（近畿 4 镇，直隶、江苏、湖北、广东、云南、甘肃各 2 镇，山东、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浙江、福建、贵州、山西、陕西、新疆、热河、奉天、吉林、黑龙江各 1 镇，四川 3 镇），计划到 1912 年全部完成。但到辛亥革命爆发为止，远没有达到预定指标。各省新式陆军编练的大致情况如下。

湖北 1896 年 2 月，张之洞由署两江总督回湖广总督本任，将操练德操颇有成效的江南督标护军前营 500 人带赴湖北。次年，将此练熟勇丁分为前后两营，募勇添足两营额数，以便“转相传习”。后又不断扩充，到 1902 年，已编成洋操护军 11 营、武建军 8 营、武恺军 4 营、武防军 4 营、护军铁路营 4 营，共计员弁兵夫 9500 余人。同年 10 月，张之洞仿照日本陆军师团兵制，将湖北新军编作常备军左右两翼，每翼员弁兵夫 3516 人。1904 年，又参酌北洋军制，将常备军两翼改为常备军两镇（各欠 1 协），并设湖北督练公所。1906 年 4 月，将常备军两镇改编为暂编陆军第八镇（1908 年考验合格，钦定为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张彪为第八镇统制，黎元洪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按 1907 年陆军部拟定的全国编练新式陆军计划，湖北应编两镇，但直至武昌起义爆发，仍为一镇又一混成协。

江苏　1895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编练自强军，是为江苏编练新军之始。1901年，自强军11营奉旨调赴山东，归袁世凯统辖，江苏只得抽调部分防营续练德操。1902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改各防营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巡警军。1904年，两江总督魏光焘续募江南武威新军和武威新军左右翼。同年底，又奏请将江苏新军编成两军四镇，练兵处认为不合陆军新章，未予同意。1905年1月，两江督练公所成立。同年8月，署两江总督周馥奏准在江宁先成一镇，练兵处授予“暂编陆军第九镇”番号。同年11月，周馥保举苏松镇总兵徐绍桢为第九镇统制。1907年，江苏巡抚陈夔龙将自1904年端方开始编练的常备军数营，添募补充，编成陆军混成协，以补用守备刘锡钧为协统。1910年，江苏混成协改编为暂编陆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田中玉为协统。

直隶　直隶原有北洋六镇。1906年和1910年，清政府先后将北洋六镇划归陆军部直辖，直隶遂无直辖陆军。按陆军部1907年拟订的编练计划规定，直隶应练两镇。从1910年开始，直隶总督陈夔龙着手在直隶另行筹练新军。次年，从直隶各属续备、后备各军中择其年力精壮者先行调集归伍，拟凑成步队6营，马炮队各一营，编为一混成协，由张怀芝兼任协统，驻于廊坊。但直至武昌起义爆发，直隶实际上仅编成步队两营而已。

河南　1903年夏，河南巡抚张人骏奏请添练常备军，拟先招步队3营，驻省城训练。同年秋，继任巡抚陈夔龙选派将弁10员、兵丁50名赴北洋学习操练。翌年春，对原有常备军认真淘汰，选拔年力精壮者按北洋章程编练成新式陆军。初为3营，后续编6营，至1906年，河南新军计有步、马、炮兵共10营1队，总计5900余人。① 因不足一镇，练兵处令暂编为混成协，称陆军第二十九混成协。1907年秋，陆军部拟订36镇计划时规定：“河南已

① 《清史稿》“兵三”载：1907年时，“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驻省城，官三百三十八员，兵五千六百十八名”。（《清史稿》总第3946页）

编步队一协、马炮队各二营、军乐一队”，应限四年编成一镇。①但因财力不足，迄未实现。

奉天 1907年，徐世昌调任东三省总督，除将北洋陆军第三镇调往东北外，又从北洋第五、六两镇中各抽调一部兵力，组成第一混成协，从北洋第二、四镇中抽调步、马、炮兵共8营、工辎各1队，编为第二混成协，带往奉天。同时，还由民政部（原巡警部）调拨协巡队600余人带往东北，与盛京将军赵尔巽组建的协巡营合编，成立奉天陆军第一标。同年，徐世昌又将旧奉军之新安军和盛军，改编成五路巡防队，旋调其中路、前路巡防队组成奉天陆军第二标。1909年，锡良接任东三省总督，在原第一混成协和第一、二标的基础上，选将增兵，于次年1月编练成陆军第二十镇，以陈宧为第一任统制官。

吉林 1906年初，吉林将军达桂奏请编练常备军，由本省旗营制兵内挑选精壮5000人，于同年7月组成步队一协。1910年，东三省总督锡良奏请将吉省巡防营五路② 中的左、右、后、中四路，连同原有的步队一协，合编为陆军第二十三镇，以提督孟恩远任统制官。

黑龙江 黑龙江于1909年冬创立教练处，并招募壮丁，先练陆军模范队一营，计划以此为基础，编练一镇。但“江省终岁所入不过百余万两，不足以抵陆军一镇常年所需”③，所以直到1910年秋，仅编练步队3营、马队1营、过山炮1队，暂设一协司令部，以副都统寿庆为协统。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此一协亦未完全编成。

山西 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仿照武卫右军营制饷章，招募本省壮丁编成常备军步队6旗、马队1旗，共2000余人，分为常备军左、右翼，是为山西编练新军之始。但因饷银短绌和抚臣

---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9671页。

② 吉林省巡防营五路，系1907年由原“捕盗队”1.3万人改编而成。

③ 《宣统政纪》卷31，《清实录》（六〇），第552页。

屡易，编练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07年春，始凑足一协新军。1909年2月，该协编配足额，正式成立协司令部。是年冬，陆军部授予番号，名暂编陆军第四十三协，补用道员姚鸿法为协统。

陕西 陕西裁旧练新始于1898年。当时，巡抚魏光焘于本省防军内挑选步队5旗、炮队1旗、马队2旗，改练洋操，编成新军。1902年夏，陕抚升允从新旧各军中挑选精锐，共成步队6旗，称常备军，其余编为续备、巡警等军。1906年，陕抚曹鸿勋增募本省壮丁3营，编为新式陆军第一标，将原常备军6旗改编为3营，作为第二标，将炮队两哨编为一队，勉强凑成一协规模，但直到1910年4月才禀报成军。不久，清政府派毛继成署理该协协统，于1911年初成立协司令部。按规定，陕西应编练新军一镇，但因财政拮据，毛继成到任后只能勉强维持，直到清王朝覆亡，亦未成镇。

新疆 新疆由于地广兵单，饷项奇绌，有关编练新军等事，曾获谕"展缓举办"。迟至1904年，甘新巡抚潘效苏才开始筹练新军。1906年，继任巡抚联魁，在原新省续备队5营和马队6旗基础上，挑选裁并，改编成步队1标、马队2营、炮队1营，计官弁兵目共2841人，暂名"新疆陆军减成协"。1908年，清政府给予新疆陆军以暂编陆军第三十五协番号，以周德金为第一任协统。此外，伊犁将军长庚在袁世凯等人的支持下，1906年从北洋第三、四、六镇中挑选官弁目兵共238人，调赴新疆，名伊犁新队，作为改练新军之基础。同时，商请张之洞从湖北新军中挑选官兵400人（另募新兵200余名，共643人），编成步、炮、工程4队，亦于1908年1月调赴伊犁，加上本地合格壮丁，凑成一协之数，于1909年1月正式成军，暂名伊犁混成协，以记名总兵陈甲福署理第一任协统。1911年11月，新任伊犁将军志锐到任后，认为伊犁新军名实不符，缺饷潜逃甚多，将其解散，遣回关内，激起兵变。变兵杀志锐，响应武昌起义，推广福为都督。

湖南 1903年初，湖南开始裁改旧军，编练新军，于1905年6月练成第一标，9月编成第二标，同年勉强成协，协统为姚广顺。

1907年，又编炮队一营。1909年，按陆军部所授番号，湖南新军改称暂编第二十五混成协，协统为杨晋。按计划，湖南应编练一镇，但直到1911年，该协数易协统，不仅未能成镇，就连维持原额训练都很困难，徒有混成之名，而无混成之实，一切敷衍了事。

福建　福建向来兵勇冗杂，旧军总数多达近3万人。1901年11月，闽浙总督许应骙根据清廷筹练常备新军的谕令，将闽省防勇、练军等统一整顿编组，编成常备军5700人，其余编为续备军和巡警军。继又仿新建陆军营制，拟编练一军两镇，但进展迟缓。至1905年，两镇各仅编成一协，实际尚不敷一镇之数。经练兵处复核，饬令闽省将两镇并为一镇，并授予“暂编陆军第十镇”番号，以道员孙道仁为该镇统制。

浙江　浙江编练新军始于1902年。当时，浙江巡抚任道镕从旧巡防营、缉捕营中挑选精壮兵勇，编成“浙江武备练军第一营”，共932人。其后长期进展缓慢，直至1909年，仅编成新军4营，建立一混成协。由于清政府频频催促，最后于1910年10月勉强编成陆军第二十一镇，以提督吕本元充任第一任统制。

广东　1903年6月，署两广总督德寿和调补广东巡抚李兴锐开始编练新军。他们将广东原有陆勇3.7万余人裁并精选，编成常备军3军15营，续备军7军35营，每营300人，合计1.5万人。另选熟于缉捕之勇，编为巡警军。1906年初，两广总督岑春煊将广东常备军和亲军营再次裁减精选，加上新从皖北等地招募的新兵，按陆军新制编成步队6营、炮队2营、工程和辎重队各1营，凑成一混成协，请调北洋教练处总办田中玉为协统。1907年初，两广总督周馥认为岑春煊原练10营新军“非尽土著”，饬令归并淘汰，结果仅剩3营，田中玉因此愤而去职。同年底，新任两广总督张人骏复对广东新军进行整顿扩充，很快又编足步队7营、炮队2营、工程和辎重队各1营，共计11营。1910年初，广州新军起义，旋即失败。事后，两广总督袁树勋遣散新军7个营，旋又补募兵丁，恢复为一混成协。1911年7月，在新任两广总督张鸣岐迭电奏请下，朝廷准予广东新军成镇，定名“陆军第二十

五镇”，派广西提督龙济光为该镇统制。原广东混成协依序改称第四十九协，以广西兵备处总办蒋尊簋为协统。实际上，直到辛亥革命，广东新军仅此一协，非但未按规定编练两镇，连一镇也未真正编成，“第二十五镇”统制官龙济光也未曾到粤视事。

广西 1901 年，新任巡抚丁振铎将亲军卫队挑练西操，是为广西编练新军之始。1903 年，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改任广西巡抚，由江西带去常备军两营。至 1905 年，广西练成常备军中、后、左、右 4 营。按清政府计划，广西应编一镇新军，但直到 1910 年，仅龙州、南宁各成步兵一标，且不足额。1911 年 4 月，广西巡抚沈秉堃奏请成立混成协，但实际兵力只有步兵两标(每标 2 营)，马、炮、工兵各 2 队，辎重兵 1 队，军乐半队。清政府虽有“新军不及一协者不得设协司令部”的规定，但鉴于广西边防重要，勉强准予成协，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胡景伊为协统。另外，由陆军部拨款在桂林编练一混成协，也只有步队 2 营、马炮工各 1 队，徒拥虚名而已。

云南 1902 年，云贵总督魏光焘于云南始练新军，由于饷项不充，成效甚微。丁振铎接任云贵总督后，于 1905 年编组步队 3 营、炮队 1 营。1906 年初又将广防游击前后左右 4 营并改为新军 2 营，同时派员赴广南挑募土著团丁编成 1 营，凑成步队两标 6 营之数，于同年 5 月奏请编为一协。9 月，练兵处认为云南新军兵力太薄，且多不合章制，不同意草率成协，并促其遵照定章，练足一镇。1907 年，锡良任云贵总督，对云南原有新军严加整顿，重新编成步队 2 标、炮队 1 营。至 1908 年，发展到步队 3 标、炮队 2 营、工程队 1 营。1909 年初，陆军部准予成镇，定名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派陆军一等检查官崔祥奎前往充任统制官。崔祥奎到任后，赶速募足兵额，共计 21 营，使暂编陆军第十九镇成为各边省中唯一满编的新军镇。1911 年，崔祥奎奉调回部，经云贵总督李经羲保奏，清政府任命原协统钟麟同为第十九镇统制。其时，蔡锷为该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曲同丰为第三十八协协统，唐继尧为步兵营管带。同年 10 月 30 日，云南爆发反清起义，蔡锷统率之第三十七协成为起义的主力军。

四川　四川编练新军始于1902年。是年8月，新任署四川总督岑春煊由山西赴川时，随带山西常备军两旗和150名卫队，后以此为基础，扩编常备军4营。翌年，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又将该4营常备军全部带走。与此同时，锡良继任四川总督。他重新募练新军，至1904年6月，已编练常备军步队5营、工程队1营。次年又添募步队1营，合前共7营。因其营制系照直隶常备军章程减半募编，故7营兵额实仅2580余人。此外还编练续备军6军，每军5营，共30营，计目兵1.2万人。至1907年，四川新军已扩充到10营，清政府准予编成一混成协，后定名为陆军第三十三协，以练兵处中书陈宧为协统。同年，陆军部按全国编练新军计划，命四川编练3镇，遭到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婉拒。1909年，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请调奉天候补道朱庆澜为四川混成协协统。1911年初，赵尔巽调回边军3营，又在省城巡防军中挑选数营，凑成1协，加上原混成协，勉强符一镇之数，于当年4月成镇，名暂编陆军第十七镇，以朱庆澜为统制。

江西　1902年，江西巡抚李兴锐开始编练新军，将原省巡防营改编为常备军1军、续备军4军，每军1500人，共7500余人，参用德日操法，进行训练。1903年，巡抚夏时又添募常备军5营，合原常备军5营，共计10营。1905年，护理江西巡抚周浩按照新军统一营制，将原常备军10营整编为步队6营，分为2标。年底又编练马队2队。1907年，巡抚瑞良对原有新军切实整顿，简汰外籍兵丁，征募土著青年，挑选识字官弁入速成学堂肄业，使江西新军素质得到明显改善。至1910年初，终于编成步队2标、马队和过山炮队各一营、工程和辎重各一队、军乐半队，正式组成一协，番号为暂编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一任协统为商德全。

在各省编练新军的同时，甘肃、热河、贵州等省也曾开展这项工作，但由于地瘠民穷，财政困难，进展甚为迟缓，或仅练成一标，或一标也未练成，有名无实，成效甚微。

除各省编练新军外，清政府还于1911年在北京编练一支禁卫军。禁卫军属皇室亲军，执行宿卫宫禁的任务。该军兵力相当于

新军一镇，直接归监国摄政王统辖调遣。冯国璋为第一任禁卫军总统官。

综上所述，清政府于1901年开始改革武装力量体制，倡练常备军，1904年令全国普练新军，并以北洋营制饷章为基础，制订并推行全国统一营制饷章，这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军队开始向现代军制转变，成为中国军队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由于当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各省筹饷练兵，多名实不符。1907年8月，清政府虽然制订了全国编练36镇的计划，但除北洋编成6镇外，各省很少按期如数编成。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总共只编成14镇①、18个混成协，又4标，和一支禁卫军（辖两协）而已。

第四节　巡防队的编练

清政府下令在各省编练新军的同时，本欲大力裁减旧军，以便集中更多军饷用于编练新军，最后达到以新军代替旧军的目的。但是，由于各省财政困难，不能如期完成新军编练任务，加之已编成的新军集中训练，不敷分防，各省督抚“深以地方治安为忧，率请酌留旧营，以防内患，于是部臣始有改编巡防队之请”②。在这种形势下，清廷决定对旧式防军进一步汰弱留强，统一编制，更新装备，以便建成一支与新军互为声援的地方武装。

1905年10月，练兵处正式呈递改革旧防军的奏折，内称：“各省防营，名目错杂纷歧，拟令改正，统名为巡防队，自第一营起次第排列。其零星队伍，并宜归并成营，纵使随地分防，制度总须一律。仍将旧立营制照章逐渐编改，以示区别”③。翌年，练兵处又奏请将各省续备军一律改为巡防队。1907年6月，陆军部

---

① 即：近畿6镇和湖北、江苏、福建、四川、云南、奉天、浙江、吉林各一镇。

②③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9685页。

根据原练兵处奏议，拟定了《巡防队试办章程》。在呈递朝廷时奏称："旧有之防练各营以及杂项队伍，原定规制彼此纷歧，积习相沿，殆非一日，而各该省防务紧要，原设营队大都分扎已久，一时未便议裁，前经练兵处奏明，统改为巡防队，使其名实相副，与新军有所区别"①。至于巡防队的职责，陆军部规定："无事之时，可以缉获盗贼，为地方捍卫，有事之时，可以协力守御，为陆军声援，于军事防务两有裨益"②。同时，陆军部特别声明，此项改革措施是"一时权宜，总须新军日增，旧营日减，方属合宜"③。此奏议得到了清廷的批准。稍后，陆军部又制定了逐年"裁撤绿营归并防营"，"至宣统七年，绿营防营一律裁撤，改编陆军"④的计划。可以看出，建立巡防队不过是清末军队体制改革的一项过渡性措施，是企图用这支武装取代绿营、练军和防军，以解决当时由于新军初建、旧军糜烂而出现的青黄不接的军事状况，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裁尽所有旧军，全部建立新式陆军。巡防队的这种过渡性质，决定了它在编制、训练等各方面与旧军、新军既有许多联系，又有诸多不同的特点。

营制 各省巡防队一般按前、后、中、左、右五路区分。路设统领和帮统。每路统辖若干营，营官称管带。步队每营分左、中、右 3 哨，每哨 8 棚，每棚什长 1 名、正兵 9 名，全营官弁兵夫共 301 人。马队营下亦分 3 哨，每哨 4 棚，全营官弁兵夫共 189 人，马 135 匹。

饷章 巡防队《章程》对官兵饷银数未作明确规定，只提出由各省照原有旧军饷数酌量改定，以致各省巡防队饷银多寡不一。光绪末年，清政府财政更加拮据困窘，除北洋新军外，各省军费主要靠本省田赋、厘捐、盐课等项维持，而且主要用于编练新军，

---

①② 《陆军部奏拟订巡防队试办章程折》,《大清光绪新法令》第 14 册，第 74 页。

③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下同），（七），第 267 页。

巡防队经费得不到充分保障，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巡防队的风气和战斗力，而且势必造成他们与待遇较优的新军士兵之间的矛盾，成为两个系统。

官兵来源　《章程》规定，巡防队挑补兵丁的条件比挑选新军兵丁大为放宽。实际上，由于巡防队系由旧军编成，其兵士多为编新军时筛选下来的剩余人员，素质自然不高。至于各级军官，《章程》规定："该队之官长，应以曾带勇营立有战功者酌量委充，其绿营裁缺各员，资望较深或年富力强者，亦准酌量借充斯职"①。很明显，照此办理，充任巡防队官佐者，多为旧军官弁。他们不易接受新技术、新思想，以致不少人成为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的骨干力量。

武器装备　《章程》对巡防队武器配备未作统一规定，因此各省巡防队所用武器杂乱无章。以江西为例，巡防队"或用毛瑟来复等枪，或仍用旧式鸟枪、抬枪、铜炮，参差不一"②。到辛亥革命前，虽然许多省份巡防队的武器装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仍比新式陆军的装备落后许多。

清政府改各省防练军为巡防队，本想借以加强中央控制权，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财政困难，加之中国幅员广大，交通不便，巡防队不得不沿袭勇营旧制，归地方督抚管辖。各省督抚或设立巡防营务处，或通过新军督练公所，对巡防队加以节制。于是，这支虽改变了编制体制但仍完整地承袭了旧军封建劣根性的地方武装，后来除极少数投身反清起义外，大多成了镇压革命的忠实工具，最终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消亡，一部分被北洋军阀集团完整地接收下来，又成为维护袁世凯反动统治的工具。

---

①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75页。

②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三），总第9846页。

第二十四章　张之洞、袁世凯的军事思想

第一节　张之洞的军事思想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先后任两广、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系晚清重臣，是清末有影响的军事思想家之一。

从 1882 年（光绪八年）出任山西巡抚开始，他便大力倡导改革军事。后鉴于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更感革旧练新、进行军制改革之急迫，从而积极投身自强活动，从事编练新军、创办近代军事学堂等军事改革实践，为中国军事近代化做出了贡献。张之洞的战争观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所阐释的“中体西用”理论，不仅是颇有影响的政治纲领，同时也是清末军事变革的基本原则。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为倡导军事制度变革而发出的各种呼唤，以及为军制变革所设计的蓝图，对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年清政府新军制度的推行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一、张之洞军事思想的发展与特点

张之洞以文官终身，一生未曾躬亲战阵，但他生活在战火纷飞、兵连祸结的年代，时代的特殊需要使他对军事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反中国封建社会许多文人耻于谈兵的风尚，将练兵论武之事视为自己的“身心性命之学”①，对晚清军事问题做过认真的探索，并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

① 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精华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65 页。

张之洞军事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形成，大体可以甲午战争为界，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甲午战争以前，是他由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官员，由文及武的时期，也是他的军事思想萌生和初步发展时期。

张之洞少时饱读经史，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史学以及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1863 年，他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被授职翰林院编修。当时，正值清朝内忧外患交加、民族灾难深重之秋，自小深受经世之学影响的张之洞，从其入仕之日起，便对军国大政极表关切。他“究心经世之务，以天下为己任”①。1875 年在四川学政任内，即撰《书目答问》，对中国传统兵学，开始采取一种谨慎的批判态度。他说:“兵者，人事。《太白阴经》、《虎钤经》之属，诡诞不经，不录;《登坛必究》、《武备志》多言占候，所言营阵器械，古今异宜，不录;《握奇经》、《三略》、《心书》、《李卫公问对》伪书，不录;《武编》、《兵法百言》之属，多空谈，不录。”而另一方面，对当时刚刚翻译出版的《克虏伯炮说》、《水师操练》、《防海新论》等西方兵书，却给予高度重视，特别注明“皆极有用”。②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和清流派都很活跃。洋务派主张练兵自强，清流派则放言时弊，对军事多倾向保守。张之洞虽也跻身清流，并以敢言而声誉远播，但他与其他清流人物相比，又存在明显的差别。由于他另有一番实学功夫，故能将清谈的批判精神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尤其是对军事变革持积极态度。只是他从未领兵临阵，缺乏军事实践的体验，对清朝军事的落后性一时还认识不深。1879～1881 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间，他屡次上奏，力主加强战守，以为和议的支撑。他认为清军与列强军队比较，主要是武器落后，“土枪土炮万不如洋枪洋炮，

---

① 《张文襄公传》，《张文襄公全集》卷首下，第 1 页。

② 张之洞:《书目答问》卷 3“子部”兵家第三，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208，第 12～13 页。

旧式炮台万不足以资捍御，木质兵船万不如西式裹铁诸兵船”①。因此，他当时的军事变革主张还仅仅触及学习西方“船坚炮利”这一表层，其认识水平与其他洋务派官绅基本处于同一层次上。

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官任两广总督，身处抗法前线。他力主抗法，并直接参与后路清军调度，而他用心最多的还是武器装备的更新。他筹借外债，购买洋枪洋炮分发前敌各营。战后他曾感叹道：“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② 由于在战争期间感受到武器采购的艰难，以及清军官兵使用近代枪炮之不得力，战后他在广州设立了枪弹厂，并决定建造浅水轮船，还创设了广东水陆师学堂。但对于西方军队的战略战术，他当时认为不在清军应学之列。他声称“将帅之智略，战士之武勇，堂堂中国，自有干城腹心，岂待学步他人，别求新法?”③ 因而对于洋操阵式之类，认为“断宜弃之不学”④。

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的军事思想有了明显的深化和系统化。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溃败，充分暴露了清朝军事的陈腐落后，种种痼疾一一展现在张之洞的眼前。而战后接踵而来的列强欲瓜分中国的狂潮，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张之洞感到必须对传统军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一次又一次地上奏清廷，发表自己的军事见解，提出自己的军事变革主张。他按西法编练的自强军，与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一样，同为中国新式陆军之滥觞。1898 年春，正当戊戌维新运动进入高潮之际，他在湖广总督任内撰成《劝学篇》。尽管这篇论文的主旨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

---

① 张之洞：《请修政弭灾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3，第 30 页。

② 张之洞：《筹议海防要策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11，第 16 页。

③ 张之洞：《筹议海防要策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11，第 17 页。

④ 张之洞：《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11，第 25 页。

法思想相悖，但却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张之洞本人的爱国思想。他首次将东西古近兵学进行了大跨度的纵横比较，得出了必须学习西方近代兵学文化和军事制度，改造中国传统军事观念和制度，以知识建军，以科学建军的结论。他强调要以“中体西用”作为政治、军事变革的基本原则，在主张进一步变革军事的同时，又明确地限定了军事变革的最后范围。这实际上隐含着张之洞对军事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论概括，是他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传统军事与西方近代军事之关系的阐释，同时也是他为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所设计的战略走向。至此，张之洞的军事思想发展成熟，基本定型。

此后，经过八国联军之役，清朝军事更是败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张之洞在“中体西用”原则指导下，积极地推出了他改革清朝军事的全盘计划。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三次联衔上奏，即闻名遐迩的《江楚变法三折》，就改革教育、破除封建弊端、学习西法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并就清军体制编制、兵役制度、学堂教育、部队训练与管理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变革主张。这些主张实际上都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具体化，展示了张之洞军事思想的丰富内涵。

纵观张之洞军事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轨迹，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始终是促进张之洞军事思想发展的主动力。他改造中国军事的种种主张，也始终是与如何自强御侮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高举起“保国保教保种”的旗帜，认为要达到“三保”的目的，就必须强兵，必须振兴中国的国防力量。应该说，从张之洞军事思想的出发点看，是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激情的。其次，中国传统军事与西方近代军事之间的较量及其结局，是张之洞思索中国军事变革问题的主要依据。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张之洞将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军队建设方面，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以缩短中外军事之间的差距。这就决定了张之洞军事思想的中心内容主要是有关军队建设和军队近代化问题。再次，张之洞的官僚兼学者身份，以及他特

有的政治军事生涯，对他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他对中国传统哲学、兵学等具有较为深厚的理论素养，他对近代军事发展问题的思考最终能够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理论色彩较浓，层次较高。在这方面，他明显地超出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前辈，并达到了洋务派军事思想的顶峰。更因为他是由清流转化而来的洋务派官僚，既有类似于御史言官敢想敢说的性格，又吸收了洋务派官僚注重实际的作风，所以他的军事论述一方面有明确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融思想性与实用性于一体。

二、积极、理智的军事价值观

军事价值观是人们对军事暴力的基本价值判断，它决定着人们对军事的根本态度。张之洞处于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时代，既受到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濡染，又受到西方近代军事文化的刺激，因而其军事价值观既带有中国传统的痕迹，又兼有西方近代的斑彩。

他在《劝学篇》中说道："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① 又说，"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② 在他看来，武力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武力虽然是一种暴力，意味着争杀残忍，但是人们应在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中谨慎地接纳它，给予它相应的地位，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对待它。

基于这种认识和观念，张之洞大声疾呼，清廷上下要有"发

①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49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2，第2～3页。

愤求战之心”，必须振奋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提高军队官兵的社会地位，以使练兵自强这一国策真正落到实处。他非常羡慕近代西方各国的尚武风气。1898年夏，他在奏折中写道："近年东西洋各国，精研兵事，最重武职，其国君即服提督之服，邻国之君互相赠送以将官之衔。故人人以当兵为荣，以从军为乐，以败奔为耻。"他直率地批判了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文化心态："中国有曰'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之谚，稍有身家，咸所鄙弃，贵贱之分，强弱之源也。"他尖锐指出：士可以徒步而至公卿，所以人贵之，兵荷戈而常流为佣丐，所以人贱之，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是中国沦于文弱的重要根源。他主张大力提高清军官兵的社会地位，使"凡为兵勇者，俨然又列士流"，"世族文儒皆肯入伍"，"人人有执干戈卫社稷之心"。他认为，"欲求中国士气之奋，军实之修，转移微权，必在于是"。①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就甲午战争后一部分人对国际公法和"西国弭兵会"所存有的幻想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各国"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因而主张与东西方列强角力角勇角智。他批评希图通过加入西国弭兵会以达弭兵目的的主张，指出这只能是"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咥人"，必定徒劳无功。他强调指出："苟欲弭兵，莫如练兵"。② 这些说明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权政治逻辑已有相当的认识，并且是与他对军事的根本态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张之洞的这种军事价值观是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尚文轻武的文化心态的部分否定。中国在先秦时期出现了文武分离，"五才"（士、农、工、商、兵）并立之后，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形成了"以德治天下"的政治理想，许多人对军事暴力往往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军事暴力是一种不祥之物，是在德治失败情

---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114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49～50页。

况下无法逃避的一种灾难。正如《老子》所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在这种军事文化氛围中，人们对武力的价值判断即使不是完全否定也是偏向于否定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大量封建文人耻于谈兵，都是与这种军事价值观有着一定联系的。张之洞作为一员受过严格正统教育的文官，他的军事价值观本来也带有消极色彩。中法战争时，他曾宣称："古训有云：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日用兵，事非得已。"①反映出他原来带有消极色彩的军事价值观和严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在他内心所造成的失衡。甲午战争日本大败中国，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成为张之洞军事价值观发生明显变化的契机。他感到与东西方列强相处没有公理和信义可言，唯利与力是尚，和局不可靠，条约不可信。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之林，必须像德国、日本那样，崇尚武力。要以武力对付武力，而不是以信义对付武力。他不再认为"用兵如吃药"，而多少接受了"兵如人之手足"的观念。他对胡林翼"兵事为儒学之至精"的说法推崇备至，认为此乃"胡文忠阅历有得之格言也"。②

当然，张之洞对武力的崇尚并不是绝对的，与西方近代军事价值观也只是在某些方面趋同，而并未归于同一。他并不认为军事暴力是万能的，也不主张黩武。在临终之际，他还上奏清廷，指出"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③。他一方面主张尚武，另一方面又反对黩武。应该说，张之洞的军事价值观是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重文轻武的文化心态和西方近代军事价值观两方面的扬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渴求自强自存，而又反对侵略

---

① 张之洞：《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18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39页。

③ 张之洞：《遗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70，第26页。

和强权政治的一种积极的、理智的心态。

张之洞的军事价值观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和需求，有利于对中国某些传统军事进行改革。张之洞能够在军事理论上有较多的建树，能够提出比较深入的军事变革主张，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三、军事变革与“中体西用”原则

甲午战争后到戊戌维新时期，张之洞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和系统的理论阐释。至此，“中体西用”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变革的最高纲领和基本原则，最终被确立起来。

根据《劝学篇》的表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原则就是要以中国旧有的封建纲常伦纪为本体，而辅以包括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练兵之法和军事技术在内的西政、西艺等“西用”。用张之洞自己的话说，亦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①。“旧学”的核心不可变，“新学”则可有条件地接受。“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② 他还特别申明：“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③就军事方面而言，张之洞认为中国的传统军事除了专制君主对军队的统率权不能变，军队的服务宗旨不能变，军人的忠孝意识不能变外，其它各个方面都在可变之列，都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在这里，他提出了对中国传统军事和西方近代军事的扬弃原则，阐述了二者在中国近代军事中的各自地位及其结

---

①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203，第 9 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203，第 47 页。

③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203，第 19 页。

合方式。因此，可以说是就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提出的一项基本原则。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军事变革基本原则，最早并非出之于张之洞。自从中国传统军事与西方近代军事在19世纪中叶开始碰撞之后，孰优孰劣，何取何舍，便始终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两种不同的主张应运而生。一是封建顽固分子死抱传统，反对学习西方军事的任何东西；另一种人则主张有条件地学习西方军事。后者的典型主张便是“中体西用”。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首先提出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此后，李鸿章、丁日昌、左宗棠等人都将“中体西用”作为军事自强活动的理论基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体”和“西用”的具体内容上，张之洞的主张是明显不同于李鸿章等人的。李鸿章等人的“中体”是包括中国传统军事制度在内的，而“西用”则主要是指西方的军事技术。只学西方的军事技术，不改革中国传统的军事制度，是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军事自强活动归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前也是主张只学西方军事技术的，甲午战争后则将军事制度划到了“西用”的范围之内，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同样是“中体西用”，应该说甲午战争以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原则代表着洋务派军事自强理论的较高发展阶段。

这种变化的发生不是突然的。当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将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嫁接于中国封建军事制度的主张后，70年代中期便有人对此提出批评。郭嵩焘、马建忠、曾纪泽等都曾指出，中国的军事改革仅仅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乃是务末不务本的皮毛之举。80年代中期以后，张树声、钟天纬的批判更为尖锐。①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对洋务派的军事自强理论进行了反省，多次批评此前之军事改革仅及皮毛，而且言辞颇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自然地将西方军事制度也列入了“西用”的范围之

---

① 参见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内。唯其如此，这就使得他在清末军制改革中变成了一个自觉者。他和刘坤一合奏的“变法三折”，有关军事变革的建议都是从制度的高度着眼的。清政府在20世纪初年所推行的军制改革，也正是以张之洞的这种“中体西用”为指导原则的。

四、关于军制改革的具体主张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张之洞主张从制度入手，对清朝军事做比较系统的改造。这种改造涉及清军的体制、编制、兵役、教育、训练和管理等各个方面。

（一）适应近代军事需要，采用新的体制编制

首先，他主张对清朝的武装力量体制进行改革，仿效西方常备军与预备军（即续备军）、后备军相结合的体制。一方面，他感到清朝贫穷，财政困难，平日无力赡养数额庞大的常备军。另一方面，他又对清军往往临战招募，仓促成军，无暇训练，一无纪律、二无技术战术，等于驱市人入战阵，遇敌辄溃的情况亟思改变。他认为近代西方的常备军与预备军、后备军相结合的体制正好可以克服上述两方面的缺陷。他希望通过这种改革达到“举国之人，无不习战”的目的。鉴于中西国情不同，他还提出了不同于西方预备兵的训练、待遇和管理办法。

关于清军的统领体制，张之洞大胆地主张学习日本和西方新的统一的最高军事统率机构，以统一全国兵权。他羡慕日本和西方各国皆设专管筹划兵事之大臣，设立参谋本部或类似机构，专掌全国陆海军之军政、军令的做法，提出要改变清政府兵部“只司册籍”，只有不完全的军政权，而军机处却又内外文武大政无所不统的现状。他认为只有实行这种改革，才能真正做到“诸事预筹则军储备，专官经理则考核精，全国之军归一衙门综理则饷械、操法事事画一，大臣督察则外省废弛不办者不能隐饰”。因此，

“中国欲练精兵，非设此衙门不可”。①

至于部队编制，他更是主张师法西方。他说，“营制操法，欧美各洲各国大率相同”，“良由各国相尚以兵，故推求极精，不能改易”。② 例如陆军之兵种，西方皆将步、马、炮、工、辎五个兵种合编于一军之内，各有所专，各取其长，“如四体具而后为人”，完全是与近代武器装备和战术特点相适应的。因而，张之洞力主清军采用这种新的全面的合成编制。

（二）推行新的军官制度，发展近代军事教育

张之洞有一句名言：“国必有兵而后能存，兵必有学而后能精”③。他主张适应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势，用知识来改造清军。他说：“西国自百年以来，日与群强相角，故兵事讲求最精，一一著有成书，迥非前代外国之比。纪律既肃，火器尤精，至于测量绘图，人人通晓，工辎医药，事事周祥。”所以“欲求实用，必须将东西洋武备诸书详切讲明，一一照办，断无卤莽捷获之方”。④

以知识建军，首先就须改造军官队伍。张之洞指出：“整军御侮，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故将材称盛。”⑤ “今日练兵最急，练将尤急。”⑥ 张之洞认为，清军军官素质低劣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军事教育的落后。他抨击旧有的

---

① 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4，第8～9页。

② 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4，第6页。

③ 张之洞：《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饷章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7，第23页。

④ 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4，第5～6页。

⑤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3753页。

⑥ 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4，第8页。

武举制度丝毫无补于国家武备人材，主张废除武举，大量创设军事学堂，并希望逐步实行“非武备学堂出身者不得为将弁”的制度。他认为军事教育必须系统化，应该像日本和西方那样，初、中、高三级正规教育与专门、速成教育相结合，国内教育与出洋留学相结合。在教学方法和内容方面，更应适应近代军事特点，创立一套新的规定，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尤为可贵的是，张之洞不仅注意到军官教育，而且对军队普通士兵的教育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对推行“学兵制”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力图“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

（三）改革兵役制度，改善兵员素质

张之洞认为，改善清军士兵素质的关键在于改革旧的兵役制度，开辟新的兵源。他指出清代的募兵制有四弊：来历不明，良莠不齐；朝秦暮楚，兵无常主；战时溃逃，无从查拿；年老力衰，难以遣散。为了克服这些弊病，最好采用近代西方的征兵制。考虑到清末的种种特殊情况，他主张暂时在募兵制与征兵制之间实行折衷，推行征募制。用他的话说，叫做“寓征于募”。即尽量招收各省土著士农工商之安分子弟，且要求有一定的文化，并取具绅邻保结。他主张士兵退伍后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地位有如文武生员。他希望通过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以吸收社会中的优秀分子从军，从而达到改良军队士兵成分，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目的。

（四）变革训练制度，提高训练水平

张之洞坚持官兵必须训练有素，而后方可用之于战，反对临战招募，不教而战。他主张改变过去由教官训练部队的办法，确立由营哨官亲自带兵操练的制度。而且要明确规定训练的时间、科目，以及训练所必须达到的标准，特别是要建立严格的部队训练考评制度。他沿袭中国古人将“训”与“练”分开的主张，以“训”正心术，以“练”精技艺。他重视“训”，在“训”的内容方面除了强调封建纲常伦理外，还提出要培养官兵的爱国之心。至于“练”，他指出清军“操练旧法，理虽具而法较疏，且于炮械、

工程、测算、绘图等事未能讲求，施之今日御侮，断不可恃”①。因此，“必须扫除故套，参用西法，参用各国洋弁教习，讲求枪炮理法，兼习营垒测绘”②。他为此专门组织人力译编了《自强军西法类编》、《湖北武学》等兵书。

（五）改进管理制度，惩治旧军恶习

清军旧的管理制度落后，管理水平低下，以致饷多克扣，器多混杂，兵多缺额，官讲应酬，士应闲差，纪律荡然。张之洞对这些现象极感厌恶，认识到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惩治各种旧军恶习，而惩治恶习又有赖于对清军管理制度的改弦更张。为此，他借鉴近代外军管理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清军管理制度的意见。如设立会计官，专理军械、粮饷、服装、车马事宜，一则可使军中主官专心训练，二则可防军官克扣粮饷。又如实行军营生活正规化，讲究营舍整洁卫生，军官待兵以礼，武器装备推行制式化等。

综观张之洞上述变革主张，应该说，确实涉及了清朝军制的各个主要方面，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军制变革思想体系。

五、张之洞军事思想的时代价值

中国军事近代化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半个世纪，军事变革的重心是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技术。甲午战争以后，开始注重军事制度的改革。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军事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机，从此由第一层面进入了第二层面。中国军事能够实现这次深变，有外因更有内因。张之洞作为清末军政重臣，他对军事变革认识的深化，他的军制变革理论和主张，就是中国军事变革内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戊戌维新

---

① 张之洞：《裁营腾饷精练洋操片》，见《张文襄公全集》卷49，第12页。

② 张之洞：《请添练精兵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46，第27页。

运动中，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得到光绪皇帝的肯定，并将其上升为国策。20世纪初年，清政府据“江楚变法三折”以推行“新政”，其军制改革完全不出张之洞的主张范围。

张之洞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主张上是有实质性分歧的，但二者的军制变革主张则往往同大于异。康有为主张“练兵强天下之势”,至于改革军制的具体内容却并不比张之洞的主张更有新意。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尽管在政治上坚决主张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但就提倡尚武，倡导一种新的军事价值观而言，他们与张之洞也是基本相同的。而且，张之洞的尚武思想还曾对革命党人的“军国民主义”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张之洞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尚文轻武的心态的反省与批判，触及了军事文化观念这一层面，它实际上是军事近代化中的第三层面，也是最难改造的层面。张之洞在这方面打开了一个小缺口，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当然，上述这一切并未使张之洞摆脱他的军事思想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他以为可以避开西方政治制度而专学其军事制度，而实际上军事制度最终是不可能脱离政治制度而单独存在的。中国封建军事制度的长期存在，正是适应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需要，因此，要想将西方近代军事制度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充分地嫁接在一起，只能是一种幻想。张之洞始终强调皇帝对军队的统率权不能变，军队的服务宗旨不能变，军人的忠孝意识不能变，这与他的军制改革主张不可能并行不悖。首先，专制君主集权的目的和实质，必然影响和制约军队体制编制的进一步变革，甚至以牺牲军队战斗力来换取军队对专制君主的驯服。其次，军人的封建忠孝意识往往与军人的愚昧相结合，而要在近代条件下改造军人的素质，提高军人的文化水平以适应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便势必淡化军人的封建忠孝意识。任何一种军事制度也很难使二者兼得。清末新军一代有文化的官兵纷纷走上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自然也是张之洞始料不及的事。因此可以说，张之洞的军事变革

思想在理论上是很不彻底的，在实践上最终也难以全部实现。

第二节　袁世凯的军事思想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祖籍河南项城。他是清末迅速崛起的封疆大吏，也是名噪一时的新建陆军统帅和北洋军阀首领。他既有投机钻营、野心勃勃的一面，也具有机智果敢、勤奋练达的特殊性格。他在编练新军、统筹国防等方面表现出的军事才能，曾受到清末官僚权贵的普遍推崇。他的军事思想，也主要蕴含于创练新军、运筹防务和广办学堂三个方面。

一、参用西法编练新军

严格地说，袁世凯非战阵之将，而是教练之才，他在清末的主要实绩，就是治军。

袁世凯治军，主要始于1882年。是年，他随淮军统领吴长庆赴朝鲜，参与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崭露头角。当时，淮军骄纵懈弛，漫无纪律，吴长庆无计可施，遂请袁世凯设法整饬。袁不辱使命，大胆稽查，对严重违纪者立斩示众，即使是吴长庆的亲信将弁也严惩不贷。于是“将士慑服，不敢犯秋毫，军声乃振”①。继而，袁世凯又奉命帮助朝鲜国王训练新军。他亲自“草创章制，编选壮丁，先立新建亲军，继立镇抚军”，“未及期年，成效大著”，朝鲜官员及外国人“均深赞其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②

但是，由于袁世凯当时对西式操法尚无认识，故协助朝鲜训

---

①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1，第5页。

②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1，第7页。

练军队时不得不“一切从湘淮军制”①。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才萌发参用西法练兵的思想。是年秋，他见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接连败北，乃电告盛宣怀：“西人用兵，大概分为四排，队前一排散打，败则退至第三排后整队，以第二排接应，轮流不断。后排队伍严整，亦以防包抄旁击。又队后数里驻兵设炮，遏止追兵，掩护残卒，虽败不溃。今前敌各军，平时操练亦有此法，乃临阵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飞奔直前，宛如孤注，喘息未定，已逼敌军，后队不敢放枪，恐误击前队，只恃簇前数十人拥挤一处，易中敌弹，故难取胜。后队又不驻兵收束，一败即溃。请告统帅，饬各军照西法认真练习”②。翌年，袁世凯又接连数次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陈述清军失败的原因和西法练兵的必要性，进而阐述他改革军事的基本构想，强调必须编练一支新军，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李鸿藻、翁同和等中枢大员终为所动，遂奏请将其调京，派充军务处差遣。

袁世凯进京后，一面广交权贵，扩展仕途，一面邀集幕友，翻译有关各国兵制的书籍，加紧学习近代军事知识，进一步系统和深化了改革军事的构想。他积极宣传参用西法练兵的好处，并把翻译的兵书呈送掌握军务处实权的荣禄等人，于是不仅得到李鸿藻的器重，也得到了荣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赏识。刘坤一上折保举袁世凯时，称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为方面中出色之员”，要求朝廷“擢以不次，俾展所长”。③张之洞则认为“若使该员专意练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时局”④。

其时，适逢胡燏棻编练“定武军”成绩不佳，督办军务处认为须“变通兵制”，悉仿西法练兵。李鸿藻便乘机推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他说：袁“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

---

① 周家禄：《恺寿堂集》卷10，第14页。

②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2，第2页。

③ 刘坤一：《密保贤员片》，见《刘坤一遗集》第二册，第874页。

④ 张之洞：《荐举人才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8，第15页。

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①。荣禄也表示赞同，并令袁先拟练兵办法进呈。袁世凯参照曾国藩、李鸿章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和德国军制，于1895年11月拟就《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洋员合同》等文件呈报军务处。12月8日，军务处王大臣联名奏举袁世凯接练定武军，并更名为新建陆军。同日，清廷发布上谕，告诫袁世凯："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②。12月21日，袁世凯肩负朝廷重托，踌躇满志地赴小站接练定武军。到任后，"日与诸将领悉心讨论，相期扫除积习，凡军中之一号一令，无不心摩手订"③。他参用德国陆军编制操法，吸取中国古代治军经验，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制订出一系列有关操练的规条、律令、要则和章制，体现了较为科学的治军思想。

袁世凯认为，新军建设概而言之有两大内容，一是"道"，二是"法"。所谓道，即是"忠爱、谋勇、节制、方略"；所谓法，即是"束伍、练技、简器、习阵"。养道靠训，成法靠练，即"远揽成规而训迪不厌详尽，近采长技而练习不避勤劳"。基本思想是"道必师古，法必因时，二者交资，而后无弊"。④这反映了袁世凯练兵的根本指导思想，其实质仍然是"中体西用"基本原则的延续。

袁世凯非常重视训"道"，即注重对兵将进行精神教育。由于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呼声遍于全国，所以在练兵伊始，他就以"强兵御侮"、"明耻教战"为口号，反复要求官兵"存雪耻之心"，"上为国家御侮，下为生民除暴"，并区别不同层次，分别编写了《训将要言》、《训哨弁要言》、《训兵要言》和《训学堂员生要言》

---

①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2，第5～6页。

② 转引自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首。

③ 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序"，第1页。

④ 袁世凯：《训练总说》，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印本（下同），第1册，第2～3页。

等，对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

对于训将，袁世凯要求为将者“首在植品节而矢忠诚，任国家之事权当思所以称职，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继而要求他们善于治兵。他认为“治兵之道，宽与严而已。宽则情志相孚，甘苦与共……而非放纵以为宽也；严则法立知惧，令出惟行……非残酷以为严也”。① 此外，他要求为将者平时要注意“爱民”和“自爱”，强调“不知爱民者不足与言公忠，不知自爱者不足与励廉耻”；战时则应“有谋亦贵有勇”，“尤贵身先士卒”。这就要求“平时训练如当大敌，最忌侥幸无事，苟且偷安”。他还指出：“为将者任巨责艰，军士之性命系之，国家之休戚同之，讨论戎机，考究方略，上宣力于王室，下自奋于功名，与尔诸将有余望焉”。②

对哨弁的教育，袁世凯更为重视。他认为下级军官与士卒朝夕共处，“情志可以不隔，气息可以相通”，其素质之高低，直接关系到新军建设的成败。因此，他要求哨弁对士兵要像父兄对子弟那样，“士卒之疾病必躬亲省视”，“士卒之衣食必悉心料检”，“士卒之技艺使之必精必熟”，“士卒之器械使之必洁必新”。此外，贯彻条规，宣讲训词，维护军纪，也均为哨弁应尽之责。总之，“平时之教诲、体恤、约束、训练，临阵之奋身率先，发纵指示”，皆惟哨弁是赖。当然，袁在对哨弁的教育中也少不了以功名利禄作为诱饵，告诫他们如果“恪遵训诫，日起有功”，则“高官显秩，无难拾级而升，厚禄重糈，可以操券而获”等等。③

对士兵的精神教育，是军队教育的根本。袁世凯要求新军士兵努力做到如下十点：一是“励忠义”，强调士兵应募而来，坐食厚饷，就应知恩图报，效忠朝廷；二是“敬官长”，“平居事之宜如子弟之敬父兄，临事卫之应如手足之捍头目”；三是“守营规”，

---

① 袁世凯：《训将要言》，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3～4页。

② 袁世凯：《训将要言》，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5页。

③ 袁世凯：《训哨弁要言》，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6～8页。

强调“兵无纪律，势同乌合，众志不肃，安能御侮?”因而必须“各怀廉耻，谨守法度”；四是“勤操练”，对战阵攻守等技艺，练之必精，操之必熟；五是“奋果敢”，临阵杀敌，勇猛向前；六是“卫良民”，“民纳税以养兵，兵出力以卫民”，严禁侵扰；七是“怀国耻”，“宜时时切同仇之念，存雪耻之心。待奉令而出征，即奋力以图报”；八是“惜军械”，强调枪炮用以护身克敌，必须加意珍惜；九是“崇笃实”，必须忠诚老实，不可欺下罔上；十是“知羞恶”，知过图新，振作向上。① 当然，其中仍少不了“博功名，致富贵”之类的诱引说教。

此外，还有《训将弁勤学说》、《训将弁躬亲教练说》、《训将弁慎号令说》、《训行队爱民说》、《训将士和衷说》、《训将弁须知敌情说》等等，其内容多为以古喻今，纲常为本，束之以法纪，励之以功名，基本上是历代封建治军思想的延续和发挥。

为了保证上述精神训练的贯彻落实，袁世凯采取了各种措施。一是设立听令公所，经常集将弁于一处，分类宣讲训令，然后让其回营逐级演讲；二是将各种训条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四类，编为四言歌词，印发各哨，令兵丁背诵，随时考查；三是针对兵卒文化程度低的特点，创办白话《训兵报》，使士兵增长学问和见识。

在练兵方面，袁世凯“专仿德国”，大胆创新，果敢地把清军建设引向近代化。

袁世凯鉴于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②，因此，他编练新军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军制。他进一步突破绿营、勇营的编制体制，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组织结构。新建陆军设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诸兵种，形成

---

① 袁世凯：《训兵要言》，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10～12页。

② 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第1页。

了比较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多兵种合成的军队体系。这对于充分发挥武器威力，完善作战指挥，提高军队战斗力，无疑有着重大作用。

新建陆军饷制也有了很大改进。袁世凯深知，虽然要求士卒“感将领之恩施，弗忍背弃，明国民之义务，乐效驰驱”，但是普通卒伍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觉悟，“质言之，人之当兵者，亦为糊口赡家来耳”。① 若想固结兵心，必须优厚饷项。因此，袁世凯奏定的新建陆军饷章，较之绿营、练军优厚得多。而且，新军薪饷按月由粮饷局派员会同各营主官及营饷委员在操场点名发放，从而基本上杜绝了旧军官长“吃空额”和层层克扣的陋习。另外，还实行“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的政策，“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②

和张之洞一样，袁世凯很重视新兵质量。他认为“近来武备愈弛，疲弱冗杂，比比皆是，固由于训练之无法，实始于选募之不精”③。因此，他所拟定的募兵标准中，既沿用了旧湘军的某些规定，坚持“兵必合格，人必土著”的原则，又采用了欧洲征兵制的某些做法。如“取具邻右保结”、“报明家口住址”两条，与曾国藩制定的募兵规条基本相同，而规定“年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力限平托一百斤以外；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步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④，则显系吸收了欧洲征兵制的一些标准，比湘军募兵规条更加具体和科学。袁世凯还规定：中选的兵丁“有能粗通文意者，口粮照头目例”⑤。这种鼓励文人当兵的措施，有利于改善军队的成分，改变人们鄙视当兵的传统看法，对新军以后

① 袁世凯：《北洋陆军第二四镇请仍照扣赡饷折》，见《袁世凯奏议》，第1501页。

② 袁世凯：《拟订募练新军章程请敕部立案折》，见《袁世凯奏议》第436页。

③ 袁世凯：《拟订募练新军章程请敕部立案折》，见《袁世凯奏议》第435页。

④⑤ 袁世凯：《募兵告示》，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第30页。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袁世凯特别注重营伍纪律，强调“治兵之道，纪律为先”，故将申明军律列为《练兵要则》的第一条。其中指出：“军律不明，则赏罚倒置，纪律亦因以废弛，故节制之师，必以申明军律为第一义”①。袁世凯制定的《简明军律》20条②，其中处斩者18条，责罚和记过2条。“临阵失火误事”、“临阵奉命怠慢”、“结盟立会”等等，皆在斩首之列，可见军律之严酷。此外，袁世凯还拟定各种禁令37条，各种营规、章程共18种，对士兵作息时间、出操、打靶、行军、作战、请假、就医、驻地警卫、枪械维护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对于整肃军纪，清除军队陋习，保证西法练兵的顺利进行，是非常必要的。但律令过繁，刑罚过严，动辄得咎，也会压抑将士的练兵热情，同样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当时有人参劾袁世凯“办事操切，嗜杀擅权”③，并非无的放矢。

在军事训练方面，袁世凯参考中国古代兵学和戚继光的《练兵实纪》，规定了基本训练内容，即：练规矩，练号令，练身体，练步伐，练器械，练阵式六条。至于训练步骤、程序和方法，则由德国军官仿照德国陆军操典施行。袁世凯还规定，每隔8天全军会操一次，合练各种队法、阵法和诸兵种合同作战方法。此外，还经常把队伍拉到野外，进行行军、驻扎和实战性演练。

为了提高部队的训练效果，袁世凯特地创办随营武备学堂，以培养训练有素的基层军官。同时，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前者培训在职哨官、哨长，授以行军攻守各法；后者短期培训由各营选拔的正副头目或正兵，主要学习步兵操法。此外，袁世凯认为“练兵之道，贵乎集思广益”，因而号召各级军官在军事训练过程

---

① 袁世凯：《禀呈督办军务处练兵要则》，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第26页。

② 参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3，第1～2页。

③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2，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1978年版（下同），第21页。

中注意开展军事讨论，“如有所见，皆可具单呈请核定，发交讲堂宣讲”。①

“练为战”，是袁世凯练兵的立足点。他曾指出：“练兵者，本为用兵之地，而转以寓弭兵之机”②。因此，在军事训练中时刻注意从实战需要出发，重点训练军队的“战阵之术”。从各兵种的具体战术，到全军的攻守战法，力求精益求精，次第演练。为改变中国各省军队向来畛守域分，素质参差，遇有战事，则统帅无方，战法各异的状况，从1905年起，袁世凯会同奕劻等人奏请每年秋季举行一次大会操，以“详求赴机应变之方，实行攻守战阵之法”③。当年10月由北洋军在河间府举行的第一次秋操，开创了近代中国军队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先例。次年10月由北洋军、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在彰德府联合举行的更大规模的野战演习，进一步反映出袁世凯和新军将领已初步具备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其军事训练水平已颇为可观。

然而，袁世凯也仅仅是把新军军事体制推向了近代化，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丝毫改变新军的封建属性。他是个野心勃勃的新军统帅，始终把个人野心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一起。因此，他统率的新军尽管在编制、训练、装备、知识结构诸方面超过了旧式军队，但在根本性质上不可避免地仍步湘淮勇营的后尘，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武装，而且变本加厉地使之成为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

二、着眼全局运筹防务

云谲波诡的清末社会和与世沉浮的官宦家庭，造就了袁世凯迎合时势、善于权变的性格，反映在军事方面，则表现出窥察全

---

① 袁世凯：《详求演队利弊》，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4，第4页。

② 袁世凯：《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见《袁世凯奏议》第27页。

③ 《军机处朱批奏折档》，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80页。

局、运筹谋划和相机应变的特点。

1894年春，朝鲜国王因无力镇压声势浩大的东学党起义，拟请求清军“代为戡乱”。李鸿章恐日本乘机出兵，举棋不定。时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的袁世凯，受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的怂恿和欺骗，电请清政府派兵赴朝，李鸿章乃决计出兵，日本亦乘机派兵入朝。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朝鲜国王要求中日撤兵，遭日方拒绝。李鸿章拟添兵，袁世凯竟电称日方不愿生事，建议李勿添兵，容其与驻日公使“推诚商办”，李乃放弃添兵之念，正中日方暗中备战之计。尽管如此，及日军大举入朝之后，袁世凯见外交解决确已无望，乃翻然改图，急忙致电李鸿章，指出日本无和意，“非口舌所能争”，“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但同时又建议“由总署酌请驻华各国（公）使调处，或不至遽裂”。① 其时，袁世凯和李鸿章均主张力求与日和解，反对仓促宣战。不同的是，袁已看出日本绝无和意，两国交兵很难避免，因而主张一方面与日交涉，一方面在军事上速筹战守，并请求添拨重兵赴朝，以备不虞。李鸿章则强调日军既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②。因而坚主不再添兵。不久，朝鲜局势进一步恶化，袁世凯为了保命，亟思脱身，一再发急电要求归国，终于在7月中旬获准离朝，返回天津，结束了在朝鲜的生涯。

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后，李鸿章命袁世凯仍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赶赴平壤一带，协助前敌营务处、直隶臬司周馥办理东征转运事宜。直至9月上旬，袁才随周出山海关。由于踌躇不前，未及入朝，日军已过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根据当时战争态势和东北地形，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说：“新民厅在榆关至凤凰城中间，东扼辽河，水陆通衢，奉北杂粮辐

---

① 《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710页。

② 《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18页。

辏，于此宜设粮台，厚储粮饷，按前后要站，分设官车，随时协雇民车，分段转运。盛京以东，亦有数处，尚可采买，拟于驻兵处就近买存，总以新民厅为根据地”①。此设想获准后，遂于前敌至辽阳分设12站，较好地保证了沿线部队的饷械供给。这期间，袁世凯与前敌将领聂士成、宋庆等“时常接晤”，研究军事，指陈方略，因而其军事思想和组织指挥能力有所提高。

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重大军事事件中，袁世凯多次显示了统筹全局，谋划方略的才干。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于1897年借口“巨野教案”侵占了胶州湾，继而强占土地，修筑胶济铁路，将山东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场反抗外国侵略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在山东兴起。为了尽快扑灭日益猛烈的反帝风暴，清政府于1899年12月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督率所部武卫右军（即新建陆军）控制山东局势。袁世凯一面残酷镇压义和团，一面整顿军队，筹划山东防务。他在翌年5月呈递的《通筹东省防营布置情形密折》中，向慈禧太后陈述了山东设防计划。他指出：“御侮先期固圉，固圉不外设防，而设防之道，必全局通筹而后能择要布置。言兵者所以贵明乎形势也”。他认真分析了山东的军事形势和地理特点后认为：“查东省海防，备他国似不如专备德人，防他口似不如专防胶澳”。在德国已侵占青岛，英人租占威海，外国侵略势力已渗透到山东腹地的情况下，前任抚臣仍把海防重点放在登州（今蓬莱）、宁海（今牟平）、烟台一带，袁“殊觉轻重失宜”，认为“使德人由胶澳分兵据莱以扼东路要害，即将登州一带隔绝海中，断其援应，纵有重兵，而接济无路，输运不通，必成釜鱼坐困之势”。因此，他认为山东布防应与胶澳未失以前迥不相侔，宜“厚集兵力扼要屯扎”，即：登州一带不宜屯扎重兵，而应把防御重点放在青州（今益都）。青州地处山东腹地，中扼胶济铁路，“洵为适中吃紧之地”，因而决定以武卫

---

①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2，第1页。

右军主力驻青州，“以遏敌人之来路”；另以步兵两营屯驻莒州（今莒县），“阻德人南图之道”；另增募万人于济南省城“居中训练，策应四方”。他认为进行如此“犄角错崎”、“直窥胶澳”的布置，德人“断不敢分胶澳之洋兵，轻图进步。即使分兵另据他口，而我之大队直趋胶澳，正可覆其巢穴，自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也”。①

袁世凯提出的上述以侵占青岛的德军为主要作战对象的布防计划，是袁世凯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次用兵尝试。虽然其后未经实战检验，但就其设防构想而言，还是比较适应当时军事形势和实战需要的。

1904 年初，正值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而剑拔弩张、清政府“势处两难”之际，袁世凯于 1 月 19 日和 20 日两次上奏朝廷，强调在日俄战争中，中国应采取“严守局外中立”和“练兵筹饷，扼守边要”两条基本方针，马上被清廷纳为国策。这两篇奏折再一次集中体现了袁世凯“详查形势，扼要设防”的军事思想。他指出：“两大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即使是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② 而当时在京师周围的可以出防之兵不过 2 万余人③，显然不敷分配。因此，他与庆亲王奕劻、

---

① 《袁世凯奏议》第 118～120 页。

② 袁世凯：《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见《袁世凯奏议》第 876 页。

③ 据袁世凯奏称：直省淮练各营迭经裁汰，仅可巡缉地面；京旗 3000 人甫经成军，只可调防京师；自强军 2000 余人，亦分布巡防；袁本人所部大枝战兵，只武卫右军 7000 人，常备军 9000 余人，此外有马玉昆之武卫左军 1 万人，姜桂题所部毅军 5000 人，遇有征调，除去看守营房、护运粮械者外，应战之兵，不过 3 万，仍须分兵留驻京城，巡防近畿，计不过 2 万余人可以出防。（参见《袁世凯奏议》第 876 页）

贵胄铁良密商后认为："我宜速筹大批的饷，计添募兵丁三万，正饷杂支以及购械转运各事，至少需款六百万"①。他尖锐指出："及今募兵购械，已觉为时甚迫，如再延宕时日，待至俄日兵连祸结，虽有巨款，而乌合之众不足防御，远购之械难应急需，势将束手坐困"②。慈禧太后终为所动，谕令户部"迅速筹拨的饷"，放手让袁购械扩军。仅年余时间，袁世凯就编练新军4镇，连同原有的两镇，使北洋新军达6镇8万余人。

袁世凯在日俄战争时期大力扩军，当然有扩充北洋军事实力的个人目的，但面对日俄战事日急，中国地阔兵单的形势，他极力主张筹饷扩军，加意布置防守，为未雨绸缪之计，显然也有为国防着想的动机，未可全部否定。

三、广办学堂发展教育

自古以来，凡稍具远识的军事统帅，无不激励部属学习文化，攻读兵书。孙权鼓励吕蒙发奋读书，被人千古传颂；项梁劝导项羽学习兵法，也成为历史佳话。袁世凯同样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理论视为军队建设的头等大事，积极创办各类学堂，开设武备研究所，编撰翻译各类兵书和选送将弁出国留学，系统地进行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教育。袁世凯认为，国家自强的根本办法在于练兵，练兵的首要任务在于储将，而储将的主要途径在于兴学。他指出："各国士农工商兵，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③"练兵之道，教将为先。教将之方，劝学为亟。"④ 又说："治兵者，苟欲胜敌，

① 袁世凯：《复陈言官奏请整军节饷折》，见《袁世凯奏议》第881页。

② 袁世凯：《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见《袁世凯奏议》第877页。

③ 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见《袁世凯奏议》第275页。

④ 袁世凯：《遵旨训练各省将目拟订简易章程折》，见《袁世凯奏议》第718页。

安可无谋？苟欲能谋，安可废学？”① 袁世凯之所以对兴学有较深刻的认识，一方面是从古时将帅读书的故事中得到启示，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有读书睿智的切身体会。

袁世凯出生于官宦世家，自幼有优裕的生活学习条件。但他“不喜为章句之学，潜求经史大义，尤好读兵书。师禁之，乃昼习词章，夜究兵书”②。甲午战争结束后，袁世凯邀集幕友，翻译和阅读各国有关兵制的书籍，更是大开眼界。他深刻认识到：“诸国兵学，具有根柢，武备学堂，遍国林立，兵皆入学，将皆知兵，临敌决战，理精法密，又非仅资火器之猛、机变之巧也”③。于是，他更加坚定了学习西方军事科学知识的思想。

兴学劝读的基本途径，袁世凯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创办学堂，二是出国留学。他在1895年接统小站新军之前，就向督办军务处王大臣提出：“各国兵学甚精，中国将领习者极少，亟宜创设学堂造就，分班出洋游历”④。小站练兵伊始，他就创设了德文、炮队、步队、马队4个随营武备学堂和1个学兵营，从正兵中挑选粗通文字者230余人入堂学习，分别学习德文、武备、测算、绘图、炮法、攻守、汉文等课程。袁世凯劝导学堂学生说：“余莅军之初，即创设德文、步、炮、马队各学堂，期为国家培人才，为天下开风气……兵法、战法，尔所专主，宜精心以研之，图算、测绘、格致、制造，尔所旁及，宜并力以赴之。……且尔试思，中邦之弱，非由于我武不扬乎？则当知耻。外国之强，非由于彼学日盛乎？则当知奋。知耻知奋，乃能力学，能力学方能成材，能

① 袁世凯：《训将弁勤学说》，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16页。

②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1，第2页。

③ 袁世凯：《训学堂员生要言》，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13页。

④ 袁世凯：《禀呈督办军务处练兵要则》，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第27页。

成材方能致用，能致用方能建功立业，雪国耻，纾敌患”①。为了进一步深造，袁世凯还从第一期学员中挑选学生55名去日本留学，其他毕业学生或派充新军营官，或派往外省新军充当教习、营弁，成为清末普练新军的骨干。

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在不断扩充北洋新军的同时，又相继创办了北洋将弁学堂、武备速成学堂、讲武堂，以及陆军师范和宪兵、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各专科学堂。在此前后，袁世凯还奏请朝廷通饬各省广设武备学堂，继而提出在全国确立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三级军事教育体制设想，均被朝廷采纳，从而为发展清末军事教育，推动军事改革做出了贡献。

由上可知，袁世凯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建军治军方面。他的治军思想，在清末乃至民国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有着重大影响。袁世凯的治军思想，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并没有多少个人的发明创造。训兵方面，主要是借鉴中国古代治军经验，更多的是继承戚继光、曾国藩的治军思想；练军方面，先则学习德国，继又学习日本，基本上是依照外国操典进行操练。可以说，袁世凯的治军思想，实际就是古代之“道”与近代之“法”，中国之“体”与西方之“用”的混合物，较充分地体现了“中体西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

① 袁世凯：《训学堂员生要言》，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14页。

第二十五章　清后期军事教育

第一节　概述

一、清后期军事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清后期中国的近代化军事教育，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时期。按照传统惯例，将领的选拔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军功，二是武举。后者系通过考核弓矢、刀石、兵法等，从民间挑选武艺高强者，充实军队官弁队伍。这种选拔方式，是与古代以冷兵器为主进行战争的时代特点相适应的。时至近代，随着科学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军事也进入了火器为主的时代。这样，传统的战略战术、军队的内部构成和成员的军事素质，越来越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于是，学习西方科技，兴办学校，实行近代化的军事教育，以培养具有近代战争意识和军事技能的新型军事人才，就成了必然的历史趋势。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鉴于英军船坚炮利，便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并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可以说，林、魏等人是倡导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先驱者。19世纪60年代以后，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了培养自强御侮人才，积极推动近代军事教育，并把它作为“师夷长技”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代军事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含派遣出国留学生）和部队教育（训练）两个方面。本章所述晚清军事教育的历史，主要是采用西学、学习西艺的近代化军事学堂的发展史。从1866年至1911年，清政府和洋务派先后创办了80余所大大小小的军事学堂，其

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866～1895 年为初创和初步发展时期；1896～1911 年为发展高潮期。

在第一阶段，清政府的军事教育，主要以培养近代海军人才为重心。这种状况，是与清政府当时（特别是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①的国防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增强海防，发展海军，成为强兵御侮的"应办急务"，而创办海军学校，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讲究"选将储才之法，尤为至要至急"②。1866 年，左宗棠在福州船政局创设福州船政学堂（初为"求是堂艺局"），意在培养造船和驾船的海军人才。1880 年，李鸿章也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其后，虽然又开设了两所陆军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74 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 年）和一所水陆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 年），但军事教育的重点，主要放在海军方面。詹事志锐 1889 年的一封奏折，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阶段的军事教育思想。他认为："治陆军者仅足以自防，治海军者则可战可守"，"近者急求武备，造船购舰，而督率驾驶之人，仍不能不借材于异地。万一争战事起，皆守局外中立之公法，解约而去，仓卒遣将，能不寒心？方今教练将材尤为海军先务。船即未坚，炮即未利，一旦购之他国，尚可咄嗟立办。若将材则必须月省岁试，宽以时日，乃能有成。及今为之，收效已在十年之后；若不亟图，不且委船舰于无用之地乎？拟请旨饬下沿海督抚，多设海军学堂，或于承袭难裔，或于驻防兵丁，聪颖能通汉文者，厚其薪水，责令练习。其有举、贡、生员愿习海军者，学能有成，请勿拘常格，优加拔擢"。③ 志锐的奏折，受到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等人的赞赏，认为"多中窾要"，

---

①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旨会议海防折》，《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 58 页。

②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 568 页。

③ 《詹事志锐奏》，《洋务运动》（三），第 120～121 页。

于是请朝廷“饬令沿海闽、粤、江、浙各省广设水师学堂”。① 在此情况下，沿海诸省水师学堂纷纷兴办，仅1890年一年中，就有江南水师学堂（后改名南洋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3所海军学校创办招生。1894年又创设烟台海军学堂，专办航海科。然而，上述各类海军学堂主要是培养了一些驾驶、管轮、制造、鱼雷等专业技术人材，而没有造就出多少熟悉海军战法的高级指挥人员。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固然有李鸿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等原因，但丁汝昌等海军将领军事素质不高，临战指挥失措，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经甲午战争，清政府创痛深巨，已无力重振海军，遂把军队建设的重点转移到陆军。以袁世凯小站练兵和张之洞南京练兵为起点，开始实行编练新军的计划，近代军事教育也随之转入第二阶段。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一致认为，设立学堂，造就将材，是编练新军的先决条件。张之洞指出：“整军御武，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②。袁世凯也强调：“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③。1895年12月，张之洞奏请创建江南陆军学堂，延请德国军官为教习，挑选13～20岁的识字聪颖青年为学生，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队、炮台各门，研习兵法、行阵、营垒、测量、绘图、算术等学问。同年5月，袁世凯奏请设立的新建陆军行营武备学堂开学，内分德文、炮队、步队、马队4科，分请德人为教习。1897年，张之洞又奏请于湖北武昌设立湖北武备学堂，聘德国军官为教习，“专选文武举贡生员及文监生、文武候补候选员弁以及官绅世家子弟”入校学习。④

① 《总理海军事务奕劻等奏》，《洋务运动》（三），第124～125页。

② 张之洞：《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41，第8页。

③ 袁世凯：《请设学堂禀》，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第62页。

④ 张之洞：《设立武备学堂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45，第14页。

随着改革军制和编练新军的逐步展开，一些有识之士和内外权臣纷纷奏请改革陈旧的武科考试制度。光绪帝也有同感，遂于维新变法期间发布上谕，规定“各直省武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科为始，会试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为始，童试自下届为始，一律改试枪炮，其默写武经一场，著即行裁去”①。戊戌政变后，各项变法措施几乎全被推翻，武科改革也不例外。1898 年 11 月，慈禧下令：“所有武场童试及乡会试，均著仍照旧制，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当然，慈禧也清楚地知道传统的武科考试已无用处，所以在同一道懿旨中又规定：“至于训练操防，尤以营伍学堂为储材之根本”，“各省武备学堂，应由各督抚酌量建设，所有未经入伍之武举武生等，均就近挑入学堂，学习格致、舆地等学及炮队、枪队、马队、工程队诸科，以备折冲御侮”。②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军再次惨败。将弁的无能给了清廷惨痛的教训，清廷不得不加快军事改革的步伐。1901 年 9 月中旬，清廷宣布：武科“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自应设法变通，力求实用。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③。同时，要求在各省省会建立武备学堂，以广储将材。《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 年）明确指出：“环球各国，合上下之精神财力，尤注重练兵；兵之所以精，则以通国皆兵，又无一不出于学。中国陆军、海军，应请广立专门学堂……”④。

清廷废止武科，倡设学堂，以及各省因编练新军对新式军官的迫切需要，刺激了近代军事教育的飞速发展。据统计，从 1896

---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二），第 14 页。

② 《戊戌变法》（二），第 111 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第 4697 页。

④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45 页。

年到1904年，共建立各类军事学堂20所，其中有12所是1901年以后建立的。这些军事学堂大都参照北洋武备学堂章程，聘请德国或日本军人为教官，或委任留洋回国人员执教，所设专业和课程，一般能紧密联系新军建设和军事技术发展的实际，为各省新军培养了不少人才。但由于各省重视程度不同，办学条件差异较大，故教学质量也参差不齐。

1903年3月，北洋大臣袁世凯鉴于朝廷下令全国各省筹建武备学堂，便呈递奏折，建议统一全国军事学堂章程，建立分级军事教育体制。他指出："各国兵学，考求至精，学堂有等次高下之不同，学业有课程浅深之互异，必须层次递进"。中国应效法西方体制，将军事学堂分为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三等。但当前中国风气初开，根柢尚浅，大、中学堂难于普遍设立，"惟有赶紧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区，以为救时之用"。① 此折受到慈禧的重视，交由政务处议奏。

同年12月，清廷设立练兵处，统一领导全国新军编练工作。袁世凯充练兵处会办大臣，实际上掌管该处大权。于是改革军事教育体制，统一全国军事学堂章程，被列为练兵处的重要任务。1904年9月，练兵处会同兵部奏定《陆军学堂办法二十条》。该章程规定，全国军事学堂分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四等。其主要内容是：

（一）陆军小学堂"教以普通课及军事初级学"；陆军中学堂"教以高级普通课及紧要军事学"；陆军兵官学堂"教以实行兵学，分讲堂、校场、野外教授演习，为造就初级武官之所"；陆军大学堂"教以高等兵学，统汇各科，淹通融贯，具指挥调度之能，为造就参谋及要职武官之所"。

（二）陆军小学堂三年毕业，挑入陆军中学堂。中学堂二年毕业，分入步、马、炮、工、辎重各队，服正兵、弁目（班长）四

① 袁世凯：《遵旨建立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拟订章程呈览折》，见《袁世凯奏议》，第749～750页。

个月，名曰陆军入伍生，再挑入兵官学堂，一年半毕业，仍入原队半年，名曰学习官，练习官弁职司。期满后，由该管官出具考语，回堂复试，具武官资格者，才正式派补各军队官排长等职。其在营两年以上，核其最优者，选送大学堂，二年毕业，备充参谋等官。

（三）陆军小学堂为武备之根本，京师、行省及各驻防地均应设立。京师及各大省学生定额为300名，小省210名，各驻防地90名。全国陆军小学堂共约额定学生6000名，每年招生2000名，分三年招齐。三年之后，按九成折计，每年约有1800名小学堂毕业生升入中学堂。

（四）京师陆军小学堂专考收京旗顺天各高等小学堂毕业学生，及满汉官员子弟有相当体格学力者。各省陆军小学堂专考收各属高等小学堂学生，及良家子弟有相当体格学力者。各驻防陆军小学堂专考收各驻防官兵子弟。另在京师设立蒙古陆军小学堂一所，专收蒙古子弟；俟学堂造就人多，再于蒙古、青海、西藏各处扼要分设。

（五）全国共设陆军中学堂四所。在直隶设第一陆军中学堂，收京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及东三省并察哈尔驻防各陆军小学堂毕业生；在陕西设第二陆军中学堂，收陕西、甘肃、四川、新疆各陆军小学堂毕业生；在湖北设第三陆军中学堂，收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西并荆州驻防各陆军小学堂毕业生；在江苏设第四陆军中学堂，收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暨驻防各陆军小学堂毕业生。

（六）在京师设陆军兵官学堂和陆军大学堂各一所。前者收四所陆军中学堂毕业入伍生，后者收各军“材具优长、志学纯粹”的任职二年以上的队官长。

（七）先在近畿开办速成陆军学堂，暂以800名为定额，由练兵处、兵部从各省武备学生中考选年在20～28岁、体格健壮、有志兵学者入堂学习。二年毕业后分派京畿附近军队充学习官半年，再回校参加考试，优良者回原省以队官排长备用。

（八）由练兵处、兵部先在直隶武备学堂内挑选优等学生100名，成立陆军速成师范学堂，加习师范课程，为各省陆军小学培养师资。

（九）各省于省垣设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堂内分上下两级，“上级自营官以上至统将，下级自营佐以下至官长。全省带队各官均须分班轮流到堂讲习武备各学。此为带兵官实验之地，其课程参照直隶、湖北将弁学堂办法，一切闲散武员均不得入”。

（十）待新军办有头绪后，由练兵处、兵部择地分设步、马、炮队专门学堂各一所，“立订期限，抽调各军队官以下之员，入堂研究新学新理及实在用法，期满回营，转教本队，使全国军队进境程度均归一律”。①

《陆军学堂办法二十条》的颁布，标志着清后期军事教育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它正式确定了军队的四级教育体制，明确了各级学堂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详细规定了各类学员入学考核和晋升的办法，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军事教育的发展。颁布上述章程后不久，清政府鉴于各省编练新军普遍展开，“非于二三年内造就多数初级军官，无以供任使之资”②，遂又制订了《陆军速成学堂试办章程》，以期在短期内造就大量初级军官，供各省军队之用。从1905年起，各省按照陆军学堂统一章程，纷纷办起了陆军小学堂。四所陆军中学堂也相继设立。有些省还开办了讲武堂和速成学堂。据统计，从1905年至1907年，各省开办的陆军小学堂、中学堂和讲武堂共30余所。1905年2月和1908年12月，清政府又相继颁布了《陆军小学堂章程》和《陆军中学堂章程》，使初级军事教育规章更臻完善。这期间，袁世凯还于直隶创办了军医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学堂、信号学队和电信学队等，练兵处

①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1～3页。

② 《军机处录副档》，转引自近代史所编《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1978年版（下同），第311页。

开办了陆军测绘学堂和“专为王公大臣子弟肄武之区”①的贵胄学堂（北京）。此外，袁世凯鉴于北洋军急剧扩充，人才甚缺，还于1906年，奏设军官学堂一所（保定），其性质大体相当于《陆军学堂办法》中设想的陆军大学堂。

二、清后期军事教育的主要特点

清后期军事教育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兴起和发展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等外敌入侵战争，大大刺激了它的发展速度；而清末自强活动的深入展开和军事改革的实际需要，则是军事教育快速发展的直接动力。由于清后期军事教育是在中国军事由封建传统型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中建立的，教育对象文化水平低和办学条件落后，与新型的军事技术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等近代化的教学内容发生强烈的撞击，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古代和西方国家的种种特点。

（一）在课程设置方面，根据本国各个时期国防建设的实际需要，重点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兼学中外战史和陆海军战略战术。在军事教育发展初期，主要进行基础科学知识的教学，强调学生掌握新式武器装备的性能和操作技术。无论是水师学堂还是陆军武备学堂，都相应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并普遍开设了外语课。李鸿章在《水师学堂请奖折》中指出：“欲其于泰西书志能知寻绎，于是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欲其于凡诸算学洞见源流，于是授以几何、代数、平弧三角八线；欲其于轮机炮火备谙理法，于是授以级数、重学；欲其于大洋驾舟测日候星、积算晷刻以知方向道里，于是授以天文、推步、地舆、测量。其于驾驶诸学，庶乎明体达用矣”②。“明体达

---

①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28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2，第7页。

用”，表达了初期军事学堂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1895年以后，随着西方军事理论的传入和中国军事改革的深入开展，军事学堂的课程设置也逐步系统化、科学化，除少数专业技术学堂外，多数学堂都增设了兵法史略学、战法学、兵器学、军制学、卫生学、筑城学等课程。光绪末年又增设了战略学课程，加强了军事理论教育和兵法战法研究，使一般军事教育由传授科学技术知识为主，向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发展。

（二）在教学方法方面，强调课堂和实践的结合，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在普通陆军学堂里，把教学内容分为“学科”与“术科”。“学科”包括战法学、军制学、筑城学、军器学、经理学等理论课程；“术科”一般指操场和野外训练，包括操场操术、野外战术、剑术、柔术（体操）等课目，目的是加强学生的实际作战能力和身体素质训练。在专门学校，如轮船、鱼雷学堂，比较注重实际操作。福州船政学堂除专备供学生实习的“练船”外，还规定每造一船，即由学生随同教习出航实习。陆军学堂一般都要设置野外实习课目，每年两次，每次2～4星期。如讲授战法学时，则到野外进行模拟战术演习；讲授地形学、筑城学时，则让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测绘，构筑各种工事。每期学员毕业前，还要到部队代职实习，参加各兵种军事演习等。为了考察学员水平，检验教学效果，晚清军事学堂普遍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考试一般分课试、月考、期考、年终考、毕业考和录用考。考试内容通常总其所学，无所不包。如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一次学员毕业考试，涉及战术学、图上战法、军制学、兵器学、卫生学等17门课程。毕业考试合格者，再分派入京畿附近军队充学习官3个月，由协、标、营官出具考语，送交陆军部复核，然后择优照章补授军官，派赴部队任职。晚清军事学堂考核之严格，由此可见一斑。

（三）大量聘用洋人充当学堂教习。晚清军事学堂虽然纷纷创立，但是懂得西方技术和军事知识的师资却非常缺乏。为解决这个矛盾，洋务派大员纷纷雇请外国军人充当学堂教习。这样不仅缓解了师资匮乏的矛盾，也大大加快了军事教育的近代化步伐。请

洋人担任军事学堂教习，始于福州船政学堂。1895年以后，随着各类军事学堂的广泛设立，外国军事教员也急剧增加。最初多为德国教师，以后则多为日本教官。1901年至1911年，全国军事学堂聘请的日本教习达190余人次。其中，北洋各学堂共聘日本教习约50人，湖北各学堂共聘日本教习39人。① 在聘用的外国教习中，难免有滥竽充数之辈和心怀叵测之徒，但多数人尚能信守合同，勤奋工作，在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节　从福州船政学堂到陆军军官学堂

一、福州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中国第一所近代化的军事学堂。它的创建人是闽浙总督左宗棠。

左宗棠是较早地认识到创办近代学校对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有着决定性作用的洋务大员。早在1866年6月，他在奏请募雇洋匠设局试造轮船时，就流露出创办船政学堂的意图。同年12月，在《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中则明确提出了创办“求是堂艺局”的计划。他在奏折中指出：在开办船厂的同时，“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习”②。他对艺局学制、培养目标、学生待遇及课程设置等作了初步筹划，并拟定了具体章程。其主要内容是：

（一）学制。学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每逢端午、

---

① 参见〔日〕南里知树：《近代日中关系史料》，1976年版，“中国政府雇聘日本人人名表”。

② 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0，第62页。

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① 显然，由于该局系中国首创，无先例可循，故左宗棠拟定的学制还较粗疏，与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相去较远。

（二）考试制度。开学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洋教习评定成绩。“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②。这种考试制度，体现了奖勤罚懒的原则，对促进学生奋发进取，颇有积极作用。

（三）学生待遇和培养目标。左宗棠认为：“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非厚给月廪不能严定课程，非优予登进则秀良者无由进用”③。因此，对艺局学生给予优厚的待遇。《艺局章程》规定，学员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发给。此外，每月给银四两，以赡养其家。当时的社会风气是重科举，轻技艺，视猎取功名为正途，把近代科学技术看作奇技淫巧。左宗棠给予船政局学生以优厚待遇，对封建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个巨大冲击。求是堂艺局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兵舰的建造者和驾驶者。《艺局章程》规定：“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④。“左宗棠建议：“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如系文职生入局学者，仍准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水营”⑤。学员学有所用，可免后顾之忧。

求是堂艺局于 1866 年 12 月在福州城内白塔寺开办招生，先习英语。次年迁至马尾新校舍，开设造船专业和设计专业，并增开法语。求是堂艺局迁至马尾后不久，改名为前学堂，另增设后

①②④ 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20，第 67 页。

③⑤ 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20，第 64 页。

学堂。前学堂包括造船专业、设计专业和学徒班①，以法语授课；后学堂有驾驶和轮机两个专业，以英语授课。辛亥革命后，前学堂改为福州制造学校（也称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为福州海军学校。

福州船政学堂由福州船政局直接领导，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由于左宗棠、沈葆桢等洋务派官员的不懈努力，该学堂稳步发展，人才辈出。据统计，从 1867 年至 1911 年，先后培养出毕业生 600 余人②。前学堂毕业的学生，曾多批被选派到法国留学，回国后参加制机、造舰的领导工作；后学堂毕业的学生，亦多次被选派留学英国，回国后在海军舰队供职，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海军高级将领，有的则在反侵略战争中英勇杀敌，献出了宝贵生命。

福州船政学堂不仅为中国近代海军培养了各级将领和造船、驾驶等专业技术人员，而且造就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成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科技人才的重要来源。此外，福州船政学堂开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先河，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继它之后陆续兴办的天津、黄埔、昆明湖、南京、旅顺口、威海卫等地各类海军学堂，更是无不受其启迪与影响。

二、天津水师学堂

在筹办北洋海军过程中，李鸿章深感“人材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材之所自出”③。随着进口船舰不断增多，急需大批海军骨干，单靠福州船政学堂分配来的毕业生已不能满足需要，乃

---

① 设计专业即 1867 年添设的“绘事院”，学徒班即 1868 年添设的“艺圃”。

② 参见张墨等著：《中国近代海军史略》，海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7 页。

③ 李鸿章：《水师学堂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2，第 8 页。

于1880年秋奏请在天津创设北洋水师学堂，就地培养人才，“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①。次年8月，学堂落成，以“留心海防，通晓洋务”②的道员吴仲翔（久任福州船政局提调）为总办，以留英归国学生严宗光（严复）为总教习。学堂设驾驶、管轮两班，课程有英文、几何、代数、三角、级数、重学、天文、推步、地舆、测量，兼习操法，并课以经书及国文等。③

天津水师学堂的办学方针和教学方法，基本上效法福州船政学堂，且有一定改进。学堂对学生要求严格，“月校季考，以稽其知能”。李鸿章于1884年底奏称：“盖自开堂以来，一日之间，中学西学，文事武事，量晷分时，兼程并课，数更寒燠，未尝或辍。迭经季考，诸生课业月异而岁不同。今年春秋两季，经臣饬派委员罗丰禄邀同英俄两国水师兵官到堂会考，该兵官等佥谓欧洲水师学堂所留以俟上练船后指授之学，此堂均已先时预课。罗丰禄亦谓堂中所授繁难诸学，多为从前闽厂驾驶学堂洋教习所未及课。”④

1900年，天津水师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炮火而停办。自建校以来，该校培养驾驶、管轮学生共6届，约210名，绝大部分被派往北洋舰队供职。

三、天津武备学堂

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创立于1885年2月，是

---

① 李鸿章：《水师学堂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2，第8页。

② 李鸿章：《奏保吴仲翔片》，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2，第9页。

③ 参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④ 李鸿章：《水师学堂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2，第7页。

晚清第一所规模较大的新式陆军学堂。

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在积极筹办北洋海军的同时，倡建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型陆军人才。他认为："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其于战阵攻守之宜，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朝夕研求，不遗余力。而枪炮之运用理法，步伍之整齐灵变，尤为独擅胜场。我非尽敌之长，不能制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为此，李鸿章批准其部下周盛波、周盛传等关于"仿照西国武备书院之制，设立学堂，遴派德弁充当教师，挑选营中精健聪颖、略通文义之弁目到堂肄业"之请，于天津设立武备学堂。①

天津武备学堂开设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课程，要求学生通晓西洋后膛各种枪炮、土木营垒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各法。学堂主要采用德国的教学方法，强调实践演练和考核。学生每日进堂听讲，夜晚温习功课。每隔三五日，"由教师监率学生，赴营演试枪炮、阵式及造筑台垒之法，劳其筋骨，验其所学"②。考试分月考、季考。李鸿章不仅屡派大员前往督考，有时还亲自前往检验甄拔。学年期满后，将考试合格学生派回本营，由各统领量材使用，不合格的学生留堂继续学习。学堂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学规》达41条之多。其第10条规定："学生一日不到，即少一日之课程，倘有托病及借故不到者，记过一次。"第29条规定："功课毕后各归卧室。就枕尚早，应温日间功课……闲书小说，除《三国演义》外，一概不准偷看"。③

---

① 李鸿章：《创设武备学堂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3，第42页。

② 李鸿章：《创设武备学堂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3，第43页。

③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298页。

天津武备学堂虽然吸取了西方某些先进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但在思想教育上仍然灌输旧的封建伦理。如《学规》规定；“每日由汉教习摘录经史一则，书于黑板，令诸生照录，讲解透彻，感发忠义之心”；每晚除温习日间功课外，还要“记诵古训，日扩良知”。① 因而，天津武备学堂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李鸿章所期望的德国式的军事学校，而是成了不少封建军阀的摇篮。据不完全统计，到 1900 年，天津武备学堂已有毕业生七八百人，多数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骨干。其中有号称“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曹锟、段芝贵、陆建章、李纯、李长泰、鲍贵卿、陈光远、王占元、何宗莲、张怀芝等人。这些武备学堂毕业生在袁世凯的收买拉拢下，组成北洋军阀集团，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给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局造成深重的灾难。

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在残酷屠杀义和团的同时，放火焚烧了武备学堂。该学堂从建立到结束，虽然只经历了 15 年时间，但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较完备的近代化陆军学校。它的办学经验和方法，对清末军事学堂的广泛兴办，起了先导和推动的作用。

四、北洋行营将弁学堂

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是袁世凯创办的短期培训性质的陆军学校，成立于 1902 年 5 月。

1901 年秋，慈禧鉴于清军在反对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全面溃败，发布了改革兵制，精练常备军和广建武备学堂的上谕。袁世凯认为：“武备学术，途径纷繁，须学习四年始可毕业，既毕业后，又须入营历练二年，再入大学堂肄业三年，综计须八九年乃能成材，缓不济急。”因此，他奏请于保定建立行营将弁学堂，

①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 298 页。

“遴选曾经带兵员弁粗识文字、有志上进者作为学员。酌订章程，选择各种切要学术，督饬肄业。以八个月为卒业之期，业成考选优等，即可酌委军事”。他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虽不若由武备学堂出身者学博诣精，根柢深厚，然曾经阅历戎行，而所学又皆切要适用，亦堪备目下将弁之选”。①

将弁学堂以冯国璋为督办，雷震春为总办。总教习为日本步兵少佐多贺宗之（贺忠良），副总教习为日本工兵大尉井上一雄。学生员额初定120名，其中将领20名、哨官长40名、弁目60名。《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章程》规定：“本学堂教授将弁，以军制、战法、击法为主，并随时就地实演。有时需用兵队，准就近酌调。”②为此，开设以下课程：

（一）军制门：建军要说、兵学总论、战争原理、军务总汇机宜、地方军务机宜、步马炮工各兵编伍说、陆军饷务论、制造军械及摊分子弹法、造就武官说、补充军马法、陆军卫生论、陆军筑城法、将领等次责任、执法事宜。

（二）战法门：编成步马炮工各兵详论、各兵操法教法规则、就地绘图演习战事。

（三）击法门：用枪原理、用炮原理、教枪兵击法、教炮兵击法、枪炮兵合用击法、子弹线路及初步火药学。

（四）演练门：操场练兵指挥法、原野指挥兵队法。

（五）实练门：估计远近测绘形势、就地讲解兵理、就地布置战法。

（六）试击门：独立击法、指挥队伍击法、交战击法。

除上述功课外，还可由总教习视情况添加战学、兵器学、架桥学、通信学、测绘学和数学、化学、物理等课程。③

由上可知，将弁学堂课堂所学内容，较之天津武备学堂更为系统丰富。当然，学员在短短8个月时间内要学完并掌握上述课

---

①②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总第8682页。

③ 参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总第8682页。

程，学习任务是相当繁重的。故学堂章程规定：每日授课不得少于4小时，操场演练不得少于2小时，“学员无论官职大小，均听教习训示，不准抗违”①。由于将弁学堂由日本军官担任总教习和各科教习，故所用军事操典和教材，大都是翻译日本的课本，或是由教习根据日本军校教科书编撰的，因此可以说，自北洋将弁学堂开始，晚清军事教育已开始由学德转变为学日，日本的一些军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自此开始大量渗入中国新军。

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共办4期，毕业生总数达545人。1904年秋，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新校舍落成，其后，袁世凯为节约经费和改变各类学堂零星散处的状况，将将弁学堂和学兵营等并入北洋速成武备学堂。

五、北洋速成武备学堂

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创办于1903年10月，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所军事学堂。

1903年3月，袁世凯在奏请赶紧兴办武备小学堂的同时，建议别设速成学堂，“以为救时之用”。同年7月，奉旨“依议”。“当即慎遴文武各员，考选合格学生，查照章程，于是年九月在保定省垣开办”。②

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督办先为冯国璋，继为段祺瑞；总办先为郑汝成，后为赵理泰；监督先为曲同丰，后为吴纫礼、何绍贤。学堂分步、马、炮、工、辎重、经理、测绘等科，学制两年。该学堂建成后不久，将原将弁学堂附入其中，又将已经裁撤的原参谋、测绘、师范等学堂的人员、教具等择优选用，故规模居全国同类学堂之冠。该学堂共办3期，毕业生达1400余人。其中不少人受到

---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总第8683页。

② 《军机处录副档》，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307页。

具有强烈个人野心的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的赏识和重用，成为北洋军阀的骨干力量，组成了“速成武备”派的军事集团。①

1906 年 11 月，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其后，北洋除陆军小学堂以外的军事学堂由陆军部接管②，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随之更名为陆军速成学堂，又称陆军通国速成学堂，直属陆军部。招生范围由北洋各省扩大到全国，员额大增。

陆军速成学堂《试办章程》规定：每年招收学生 1140 名，“专收各省旗未毕业武备学生，及按选验格式考取文理清通良家子弟”。“学生分为两班。凡考选各生，如有普通学程度者，归第一班，习军事专科一年半毕业；如普通学未全及全未肄习者，归第二班，先习普通学一年，再习军事专科一年半，共二年半毕业。两班毕业后，均入队充学习官三个月”。章程还规定，以后各省选送留学生，必须从上述充学习官期满后的优秀学生中选派，“不得另自选送。”③

陆军速成学堂章程大体参照日本振武学校（专为中国学生而设）章程制定，因而无论在学堂管理、学员条件、学堂条规，还是教学考试等方面，都比以往军事学堂章程更加规范。如“学堂条规”第 23 条中规定：学生犯有一般过失，酌情给予罚站、罚津贴或记过处分，稍重者罚进思过室，再重则开除学籍，追缴在堂经费。只有“聚众胁制官长”或“横起风潮”等，才按军律治罪，而且明确规定，“其旧日军营棍责等刑一概禁用”。④ 该“条规”第 26 条规定：“堂内设立饭厅数所，自总办以下均分赴各厅与学生同食，不得自食于私室，亦不得同席异餐”⑤。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清末军事学堂中已渗入更多更新的近代文明。

---

① 参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 页。

② 参见《南洋兵事杂志》1907 年第 9 期，“见闻”第 8 页。

③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总第 8687 页。

④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总第 8690 页。

⑤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总第 8691 页。

陆军速成学堂的办学规模是空前的。部拨常年经费约 20 万两，列全国军事学堂之首。① 到 1909 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已有 2000 余人毕业。其中不少毕业生担任北洋各镇军官，后来跻身于北洋军阀行列，如王承斌、齐燮元、刘汝贤、孙岳等。蒋介石和张群等也是由这里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

六、陆军军官学堂

陆军军官学堂相当于陆军大学堂，1906 年由袁世凯创办于保定。

按 1904 年练兵处制订的《陆军学堂办法》，陆军大学堂是最高军事学府，须待小学堂、中学堂、兵官学堂先行设立后，方于京师兴办。为了争取将最高军事学府设在保定，袁世凯于 1906 年 6 月奏设军官学堂，以暂代陆军大学堂。其理由是："近值朝廷振兴戎政，屡下明诏，殷殷以储才为急。上自贵胄学堂，下至小学堂，皆已次第开办，惟此项大学堂尚属阙如。论其章制，仍应设于京师，惟按照定章，必俟中学堂及兵官学堂次第设立，再行兴办，诚恐缓不济急。而高等教习急切尚难多选，仍不能不借才异地，在京延订亦多未便。臣谨遵照练兵处、兵部奏定办法，略事变通，名曰军官学堂，即在保定省城设立"②。

清廷本来一直坚持陆军大学堂必须在京师开办，由于袁世凯抢先下手，以原将弁学堂校舍先行开课，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但仍强调一俟京师设立大学堂，保定军官学堂即行停办。

军官学堂分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额设学员 40～60 名；深造科 3 年毕业，额设学员 50～80 名。学员均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教授各种高等兵学。故此学堂"虽

① 当时北洋各学堂常年经费，未有超过 8 万两者。参见《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 318 页。

② 《军机处录副档》，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 305 页。

不居大学堂之名，而已著大学堂之实”①。

1907年9月，袁世凯被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免去直隶总督之职，交出北洋兵权，军官学堂也被陆军部接收。之后，陆军部以军官学堂“原定章程专为养成北洋各镇将材，势难推及于各省”为由，将其“稍事变通”，正式奏定《陆军军官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在陆军大学堂正式建立之前，军官学堂“暂为造就高级军官总汇之所”。“学员以品学超卓、才识优异、充当军官已能称职者为合格。教以高等兵学、行军奥义，务期各科统汇融贯淹通，调度指挥机宜悉协，俾足膺上级参谋之选，以蔚成他日将帅之材”。② 学堂仍分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以半年为一学期；深造科三年毕业，以一年为一学期。“年限虽有多寡之殊，学问虽有详略之别，而课程名目则大致相同”③。

第一学期课程：各国历史、各国地理、卫生学、马学、教育军队法、各队战法、军制学、军器学、筑垒学、地形学、交通学、混成协标图上战法、就地讲演战法、野外战术实施、指挥各种队伍法、马术。

第二学期课程：陆军经理、军政、战史、混成一协图上战法、一镇图上战法、兵棋、野外讲演战法、参谋旅行、出师计画、辎重勤务、兵站勤务、输送学、地形侦察、兵要地理、要塞战法、海战要略、战略学、教育军队法、国法学、指挥各种队伍法、马术、见学旅行。

第三学期课程：野操计画、秋操计画、出师计画、作战计画、兵站勤务、创设军队计画、战略学、战史、一镇及一军图上战法、运用国军法、海战要略、兵要地理、教授兵棋法、参谋旅行、要塞战法、各队新战法、指挥各队伍法、国法学、国际法学、见学旅行。

---

① 《军机处录副档》，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305页。

② 《奏定陆军军官学堂章程》，清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第1页。

③ 《奏定陆军军官学堂章程》，清光绪三十三年石印本，第7页。

《章程》还规定："就地讲演战法及一切旅行，系赴野外实地考究，每年概行两次，每次以二星期至四星期为度。""课程积累皆须考试。约分四等：曰月考，曰期考，曰年终，曰毕业。约分三类：曰问答，曰笔答，曰命题作文。……而毕业中最要之事，则为参谋旅行。"①

不难看出，要求学员在一年半时间内学好上述数十门课程，任务相当繁重；即使是3年毕业的深造科，教学压力也非常之大。而且，学习内容包罗万象，没有紧紧围绕教育目标区分教学重点。仅此一点，就与日本陆军大学存在明显差异。当时日本规定，作为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陆大，以战略战术、战史、战争指导和参谋要务为主要教学内容，其它均为辅助课程。即使在重点课程中，其教学时间比例也不一样。战略战术教学约占69%，战史（含战争指导）占24%，参谋要务仅占7%，重点非常明确。② 清政府陆军部奏定的《陆军军官学堂章程》虑不及此，说明对学堂培养目标还不十分明确，对高等军事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的了解还比较肤浅，因而在办学宗旨和课程设置诸方面，还有较大的盲目性。

军官学堂是清末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高等军事学堂。随着全国4所陆军中学堂学生毕业，军官学堂改变了从现职军官中选拔学员的办法，而直接从陆军中学毕业生中招考学员。至此，基本实现了从小学堂、中学堂到大学堂的逐级递进的军事教育体制。

辛亥革命爆发前，军官学堂共办3期。第一期学生中后来较著名的有陈调元、吴光新、张敬尧、师景云、陈文运等；第二期有胡龙骧、孙岳、何遂、王承斌等；第三期有齐燮元、李济深、钟体道、周凤岐等。1911年，军官学堂改称"陆军预备大学堂"，总办改称堂长。1912年（民国元年），又更名为"陆军大学"，迁北京。原址开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

① 《奏定陆军军官学堂章程》，第11页。

② 参见〔日〕高山信武著、上法快男编：《陆军大学校》（续）第15页。

清后期主要军事学堂一览表

创办年代	学　堂　名　称	地　　点	创　办　者
1866	福州船政学堂	福州	左宗棠
1874	操炮学堂	上海	江南制造总局
1880	天津水师学堂	天津	李鸿章
1885	天津武备学堂	天津	李鸿章
1887	广东水陆师学堂	广州	张之洞
1887	昆明湖水操学堂	北京	奕　譞
1890	江南水师学堂	南京	曾国荃
1890	威海水师学堂	威海	丁汝昌
1890	旅顺鱼雷学堂	旅顺	北洋舰队
1894	烟台海军学堂	烟台	北洋舰队
1895	江南陆军学堂	南京	张之洞
1897	湖北武备学堂	武昌	张之洞
1899	练将学堂	南京	刘坤一
1902	北洋行营将弁学堂	保定	袁世凯
1903	北洋速成武备学堂	保定	袁世凯
1905	陆军贵胄学堂	北京	练兵处
1906	陆军军官学堂	保定	袁世凯

第三节　派遣留学生

派遣留学生赴外国学习军事，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派遣留学生，分为两个时期：中日甲午战争前主要留学欧美，其后主要留学日本。

一、早期军事留学生

近代官费留学生的出现，发轫于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第一批幼童留学生。派遣留学生的最早倡导人是容闳。容闳原籍广

东，早年留学美国，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学士学位后于 1855 年归国。容闳认为，必须尽快选派一批优秀青少年到美国或欧洲留学，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日趋富强文明之境。1870 年，他利用随同曾国藩、丁日昌等去天津处理“教案”的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他的教育设想。曾国藩当即采纳，并与李鸿章于 1871 年联名奏请清政府选送学生赴美国留学，同时，保荐容闳等主持此事。朝廷正式批准了此项奏折，同时规定：留学生年龄限 12～20 岁，学习年限为 15 年，总名额为 120 人，分 4 批送往美国。1872 年秋，詹天佑等 30 人首批出国；其后 3 年，每年送出 30 人。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颇能刻苦学习，小学毕业后依次考入中学、大学及各类工业专科学校。他们大都成绩优良，受到美国有关人士的称赞。美国《纽约时报》赞扬说：中国留学生“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的”①。但是，由于清政府中顽固派的造谣中伤，这批留美学生没有完成原定 15 年的留学计划，被迫于 1881 年 7 月前全部辍学回国。

上述留美学生回国后，不少人被分配在军事部门工作。他们“造诣有得，足供任使”，使李鸿章进一步认识到：“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②

赴美国留学生虽然半途撤回，但“挑选学生出洋肄业，固属中国创始之举”③，开了风气之先。就在首批留美学生启程后的第二年底，船政大臣沈葆桢便奏请派遣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后因台湾事件发生，未及实现。④ 迨至 1875 年，终于派出魏瀚、陈兆翱、陈

---

① 转引自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5 页。

②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 167 页。

③ 《总理各国事务奕䜣等折》，《洋务运动》（二），第 160 页。

④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 33 页。

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 5 人，随同福州船政局技术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前往英、法参观学习（这实际是派遣留欧生的先导）。其中魏瀚、陈兆翱、陈季同主学机器制造，刘步蟾、林泰曾主学舰船驾驶和水师兵法。后者是中国首次派出的军事留学生。次年春，李鸿章也趁洋员李劢协任满回国之机，奏派天津武弁卞长胜、朱耀彩等 7 人随同赴德学习军事（3 年为期）。

其时，李鸿章等正在积极筹建近代化海军，因而尤为重视海军人材的培养。1877 年 1 月，李鸿章在奏折中详细陈述了派员出国学习军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议由福州船政学堂选派数十名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他指出："查制造各厂，法为最盛，而水师操练，英为最精。闽厂前堂学生本习法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甲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如此分投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① 李鸿章与丁日昌、沈葆桢等还共同拟定了《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对留学生的选派方法、条件、生活待遇、留学年限等有关事宜，均作了具体规定。依照此项章程，福州船政学堂于当年 3 月正式挑选 30 名优秀学员，由李凤苞、日意格等带领，分赴英法留学。其中制造业学生 14 名、艺徒 4 名，赴法国学习舰船制造；驾驶业学生 12 名，赴英国学习驾驶兵船。同年 12 月，又增派艺徒 5 人留法，从而使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出洋留学生达到 35 人。留英学生中，刘步蟾、林泰曾等人分上英海军铁甲船，跟船学习驾驶、施放鱼雷、枪炮和海战方法；严宗光（严复）、方伯谦等人则入格林尼次海军学校，学习航海理论。

1879 年，刘步蟾等开始陆续归国，李鸿章于当年 11 月会同沈葆桢上奏："闽局出洋生徒，应予蝉联就学，以储后起之秀而备不

---

① 李鸿章：《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8，第 20～21 页。

竭之需。"[①] 1881 年，李鸿章经与督办船政黎兆棠往返咨商，又从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第二批留洋生 10 名分赴英、法、德学习，1886 年以前全部学成归国。

1886 年 4 月，清政府第三次派遣福州船政学堂学生 24 名（其中有前学堂学生郑守箴、林振峰等 14 人，后学堂学生黄鸣球、罗忠尧等 10 人），另从北洋舰队及水师学堂中挑选刘冠雄、陈恩焘等 10 人，共 34 人，分赴英国和法国，学习驾驶和制造等，其中大部分于 1889 年学成返国。

综上所述，从 1877 年起，至 1886 年，清政府共派出 79 名青年前往英、法等国学习军事。这些留学生肩负重任，学习刻苦，归国后尽力尽职，为中国的近代化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英国留学时成绩优异的刘步蟾，后升任北洋海军右翼总兵。由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乃行伍出身，未涉海军门径，凡关操练及整顿事宜，悉委步蟾主持"[②]；林泰曾也是留英学生中的佼佼者，后升任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对北洋海军建设也有很大贡献。北洋海军 12 艘主要舰船的管带中，有 7 人是留欧学生。他们训练有素，作战勇敢，在甲午海战中，大多表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学习制造的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回兵器制造局工作。回福州船政局工作的留学生魏瀚等人成立了一个工程处，负责全厂技术指导，"以代洋员之任"。他们废寝忘食，历四五年如一日，终于造出了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当时最大的一艘巡洋舰——"开济"号，受到中外人士的交口赞誉。后来又造出了性能更优的"镜清"号、"寰泰"号等军舰。其主要设计者魏瀚、郑清濂和制造师陈兆翱、李寿田等人，"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③]，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有造诣的造船专家。

但是，清朝统治者由于对近代科学技术和留学人员存有偏见，

---

① 《李鸿章奏续选学生出洋折》，《清末海军史料》第 392 页。

② 《陈兆锵所记中日战役情形》，《清末海军史料》第 349 页。

③ 《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片》，《洋务运动》（五），第 381 页。

致使某些留学生回国后未得到适当安置，造成人才浪费和流失。对此，一些朝政大臣猛烈抨击道："日本现在执政大臣，多与我第一届出洋学生同堂肄业，岂中国学生资质尽出人下哉？盖用之则奋发有为，人人有自靖自献之思，不用则日就颓落，人人有自暴自弃之心"①。然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清王朝政治衰败、制度腐朽，是造成留学生人才浪费、用非所学的根本原因。

二、军事留学高潮的出现

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朝野震惊，人心激愤。一些疆臣大吏鉴于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福州船厂凋敝废弛，极力抨击洋务运动，对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政策也发生了怀疑。1896年7月，闽浙总督边宝泉奏称："从前出洋学生，期限大蹙，初无心得，经费又太巨，财力未逮，不如延致教习在厂督课"。他反对福州船政学堂再派学生出国。对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予以坚决驳斥，指出：在留学生的选送和使用问题上，的确存在许多问题，"若以此而并废出洋之举，是因噎废食，从此更难储上品之才矣"。因而主张：在堂学习的学生中，"其尤为异等者，仍照成案络绎出洋，俾后出更新之法不至绝无闻见。至学成回华之学生，如所造尚浅，仍令再行出洋；其业有心得者，应令分别有差无差，咨报臣衙门听候调取考验，咨送各督抚酌量位置，以昭激劝"。②总理衙门尽管未能对留学生的社会地位和使用问题提出具体办法，未能有效地解决人才浪费和用非所学诸弊端，但毕竟压制了顽固势力的守旧谬说，保证了赴外留学这一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新生事物得以延续和发展。

在总理衙门的坚持和敦促下，福州船政学堂又于1897年夏选派6名勤奋好学的学生赴法国留学，主要学习舰船制造新法，期

①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第3823～3824页。

限6年（后提前3年返国）。此为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四批出洋留学生。

在甲午战争后的二三年中，人们对留学的观念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仍然把西欧各国看成主要学习对象。如张之洞在1895年奏称："乃择其才识较胜者，遣令出洋肄业。如陆师则肄业于德，水师则肄业于英，其他工艺各徒，皆就最精之国，从而取法"①。德国的陆军，英国的海军，是当时中外臣工崇拜的偶像，尤其认为"泰西陆军之精，推德意志国为最"②。因而无论是延请训练新军的教习，还是派遣军事留学生，多注重德国。

从1898年开始，清朝学习外国军事的目标，逐渐转向了日本。张之洞认为，"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③，因而断言，"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④。不久，张之洞率先派遣志愿学习陆军者4人去日本留学。⑤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出于控制中国的野心，也不断地派遣文武大员来华游说，劝清政府派员留学日本。在日本的鼓动下，湖北、浙江、江苏、直隶、湖南等省，纷纷派遣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据1899年秋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的四川提督丁鸿臣等记述：是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100余人，其中仅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军事预科的即有40余人。⑥ 著名爱国将领蔡锷就是当时赴日本自费留学的。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挽救封建统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也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准备"变法"。1901年9月，清廷发布上谕，认

---

① 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第29页。

②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总第9509页。

③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两湖书院1898年版，第6页。

④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两湖书院1898年版，第14页。

⑤ 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第24页。

⑥ 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第29页。

为“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① 于是，去日本的留学生猛增至 280 余人，其中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的 46 人，成城学校 2 人。② 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即于是年被派送成城学校学习的。

1902 年 4 月，北洋大臣袁世凯指出：“今中国兵制，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能得其奥妙。欲求因时之宜，以收折冲之效，自非派员出洋肄习不为功。顾欧美远隔重洋，往来不易，日本同洲之国，其陆军学校于训练之法，备极周详。臣部武卫右军学堂诸生……自应及时派往东洋肄习，庶学成返国，堪备干城御侮之资，似变法图强无有要于此者。”③ 当年春，他就从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中选派 55 人赴日留学。

为了接纳与日俱增的中国军事留学生，日本当局于 1903 年 7 月在成城学校武科基础上，又创立了振武学校，作为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专门招收中国学生。振武学校的经费由清政府支付。

1904 年初，为了加速国内新军的编练，袁世凯主持的练兵处决定扩大派送日本军事留学生的规模，并专门奏定了《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其中规定：陆军留学生将分年派往，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 100 人；军事留学生均由官方派遣，不得私自往学，已在日本习武之自费留学生，经过考察，其志趣向上、学业精勤、年限未满者，则贴给旅费，改为官费生；凡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者，经练兵处考核，根据优劣分别授予守备、千总、把总等武职。④ 同年 9 月，练兵处依照新章程，从各省军事学堂挑选 108 名学员派赴日本学习。此后每年派遣，到 1908 年夏，

---

①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第 4720 页。

② 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第 31 页。

③ 袁世凯：《遵旨遣派武备学生出洋游学片》，见《袁世凯奏议》第 487 页。

④ 参见《大清光绪新法令》第 14 册，第 3～5 页。

中国赴日陆军留学生已达1000余人①。

清政府派遣青年出国学习军事，本意是为了培养一批忠实于它的“干城之选”。但是由于这些留学生出身、阅历、志向的不同，归国后却出现了多极分化。他们中间，有的（如蒋百里、杨杰等人）热心兵学，钻研军事学术，成为爱国的军事理论家；有的顽固守旧，倒行逆施，成了镇压革命的干将或祸国殃民的军阀，如孙传芳、吴光新、卢金山、张树元、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等。但是，更多的人接受了军国民主义教育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加上旅居日本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教育，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深切地感到，中国要富强，必须推倒清室。许多陆军留日生秘密参加了同盟会。他们毕业归国后，一般都得到各省督抚的重用，或充任各省新军的协统、标统、管带乃至镇统，或任教于各省陆军学堂。辛亥革命爆发，他们大都闻风而起，成为革命志士。清政府意在培养一批维护其统治的军事人才，结果多数成为它的掘墓人。这种适得其反的结局，是清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① 参见《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342页。

第二十六章　清后期兵书和军事刊物

第一节　清后期兵书

一、概　述

清后期兵书是指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产生于中国的各类军事著作。①它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军事学说，与中国古代兵书相比，具有卷帙更浩繁、结构更科学、内容更实用、语言更通俗的鲜明特征，因而是中国军事理论宝库中的重要遗产。

清后期兵书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五类：一为包含战争原理、战略战术和军队建设等内容的综合性军事理论著作；二是有关武器制造和操作使用的论著；三是有关海防、边防建设的呈文或专著；四是有关兵制、兵略和训练等的军事著作；五为各类军事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清后期兵书多达千余种。此外，尚有大量翻译出版的外国军事著作（约六七百种）。

由于列强环伺，外患频仍，战争连绵不断，国人中自强御侮的思想日益发展，从鸦片战争爆发到清王朝覆灭的72年间，中国在军事领域，无论是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除旧布新，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兵学著作也在思想内容、数量种类、出版形式诸方面呈现出变革递嬗、日新月异的景观，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长河中，卷起一股颇为壮

① 有的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虽然不属兵书，但其中含有军事方面的重要内容，本章亦加以论述。

观的新潮。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兵学家逐步接受西方的某些军事学说，将兵学分成若干学科，每学科又包含若干分支学科，于是反映兵学各分支学科的军事专著（包括译著）应运而生，如武昌质学会刻刊的《战法学》（1897 年）、应雄图编写的《战略学》（1908 年）、陈庆年编纂的《兵法史略学》（1899 年）、北洋武备研究所编印的《军器学》、《防守学》、《测绘学》、《地舆学》、《炮学》、《军刀操法》等等。这反映了清后期兵学研究向多学科、多层次发展的趋势。此外，包容多门学科、多类著作的综合性兵学丛书也颇为流行。较著名的有陈龙昌等汇辑的《中西兵略指掌》、南洋公学所编《南洋公学兵书五种》、张之洞所编《西洋兵书十种》、江南制造局所编《克虏伯炮类编》、两湖译书学堂所编《中西武备新书》等等。

清后期兵书区别于古代兵书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它蕴含着反映近代军事特点的深刻思想内容。可以说，清后期兵书的撰述出版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潮的兴替演进情况。其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不少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落后，遂在总结鸦片战争教训的基础上著书立说，提出学习西法，发展中国军事技术的倡议，部分著作（如魏源《海国图志》的论兵部分）还针对作战对象的改变而探讨新的作战方法。但从总体上说，这个阶段中以传统军事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兵学著作仍占统治地位。其代表作有璧昌的《兵武闻见录》（1853 年）、朱璐编《防守集成》（1854 年）、恒伶编《韬钤拾慧录》（1863 年）等。上述兵书虽一改某些古兵书“半多空谈，不切实用”① 的状况，但基本系模仿明代《纪效新书》的体例，重复戚继光等历史名将的作战思想，在思想内容上没有重大创新。尽管如此，这期间的兵

① 徐建寅：《兵学新书·凡例》，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下同），第 1 页。

学著作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倾向：一是探讨兵制的著述陆续面世。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表明国家经制之兵已经腐败，不少人转而寄希望于乡兵和团练的建设。1849年，许乃钊编辑《武备辑要续编》，搜集唐宋以迄前清有关“乡守”的言论、奏疏、章程和法规，为团练建设搜寻历史借鉴。王鑫的《练勇刍言》(1857年)、朱孙贻的《团练事宜》(1863年)，则是刚刚兴起的湘淮军编练初期的经验总结。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军推出了《太平军目》、《太平条规》、《行军总要》这样完整的农民军制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二是有关兵器制造、设防备战的著作激增。在“制夷以利器为先”的思潮影响下，丁守存的《用地雷法》(1842年)、龚振麟的《枢机炮架新式图说》(1842年)、潘廷辉的《铸炮图说》(1845年)、叶世槐的《空心炮楼图说》(咸丰年间刊)等纷纷面世。有关设防备战的兵书，则有魏源的《海国图志·筹海篇》(1843年)、林福祥的《平海心筹》(1843年)等。它们具体反映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防建设和备战指导思想的发展和新趋向。

第二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军事著作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军事技术和某些军事理论，摇撼了某些传统军事思想的根基。大规模翻译西方军事著作，首推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该馆由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建议，于1867年创办。初时国人鲜谙外语，便聘请傅兰雅、金楷理、林乐知等懂中文的外国传教士协助工作。到1907年，共翻译西书160余部，其中军事书籍（外国兵器、军制、战法、战史等）有三四十部。除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外，这期间积极承担翻译出版西方兵学的还有天津机器局、京师同文馆、广学会、天津水师学堂、淮军天津军械所等。

19世纪70年代中期，清政府决定加速海防建设。为适应这一需要，有关人士对海防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撰写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论著。其中，光绪元年前后出版的《易言》三十六篇

（郑观应撰），不但强调“广造水雷，多制铁舰，训练水师，以资战守”① 的重要性，而且倡言“以水师为折冲之用，以陆兵为守御之资”，主张不能“但言海防”，而要“今日当言海战”。② 这对于加速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阶段是甲午战争结束至辛亥革命前。中国在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先后失败，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仿西法，进行全面军事改革。随着这种军事改革高潮的出现，兵学界也空前活跃起来，反映德、日军事思想的各类操典、专著和教科书大量涌现。据《武备杂志》前三期广告公布，至 1904 年，仅北洋教练处、将弁学堂两家编印的各类军事教科书即达 50 种之多。此外，《战略学》、《军制学》、《兵学教科书》、《战法学教科书》等基础军事理论著作也相继问世。随着军事改革的步步深入，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照搬外国的军事理论，力图在吸收外国军事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建立中国近代军事理论体系。1898 年徐建寅编成《兵学新书》，就是这种努力的良好开端。陈龙昌的《中西兵略指掌》和易熙的《中西兵法通义》等，也都试图融合中西军事思想，以推进军事改革的深入发展。

二、清后期主要兵书简介

清后期兵书汗牛充栋，种类庞杂。其中固然多为古代兵法之纂辑，但也不乏结合晚清武备实际，特别是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从全新的角度阐发军事见解的军事理论著作和应用性较强的军事典籍。魏源《海国图志》的论兵部分、林福祥的《平海心筹》、王鑫的《练勇刍言》、徐稚荪的《洋防说略》、徐建寅的《兵学新书》、郑观应《盛世危言》中有关军事的部分，以及袁世凯组

① 郑观应：《易言》，见《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5 页。

② 郑观应：《易言》，见《郑观应集》上册，第 128 页。

织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聂士成的《东游纪程》等，都是清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兵学著作，反映了清后期的军事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海国图志》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一部较详尽地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并针对西方列强入侵引起的海防危机，谋划整军经武方略的巨著。作者在"原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因此，《海国图志》虽然不是一部专门的兵书，亦非单纯的一般性的史地论著。

"悉夷"、"师夷"、"制夷"，是《海国图志》的主要内容，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则是它的核心思想，也是对整个近代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战略主张。这一主张，实际上成了近代中国整饬武备和改革军事的先声。通过鸦片战争，魏源不仅看到了中西军事方面的差距，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呼喊，并且在如何学习和运用西洋"长技"方面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对整军饬武和军事改革提出了具体的途径和措施。他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① 把了解世界形势和熟悉敌情作为抵御外侮的首要条件，显然是非常正确的。

关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阐发的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的战略思想，以及以守为主、寓攻于守的战略防御思想等，本书第四章已作了阐述，这里不再重复。

（二）《平海心筹》

《平海心筹》是一部探讨"御夷"之策的军事论著。作者林福祥（1814～1864），字亮予，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出身世家巨族。鸦片战争爆发后，林福祥于1841年谒见广州知府余保纯，陈述战守方略，未被采纳，旋投效新任两广总督祁𡎴，受命招募水勇，组成"平海营"，任管带，积极参加抗英作战。同年5月，林

---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第4～5页。

率水勇参加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战斗。经过战争实践，他认识到，水战出奇制胜，火攻居多，而火器尤为重要。“因取火器而悉心考校之，其宜于古而不宜于今，宜于陆而不宜于水者，概置而弗录”①，最后编成《平海心筹》一书，于1843年问世。

《平海心筹》分上下卷。上卷主要以绘图贴说的形式介绍“神火飞将军”、“水底雷”、“毒烟喷筒”、“火龙刀”等13种火器的构造、功能、制造和使用方法；同时，详细记载了“神火药”、“毒火药”、“烈火药”、“火种”等28种火药的配方和用途等。作者指出，“试之又试，精益求精，呕尽心血，而后得此”，而“夷患固未有艾”，故“笔之以为临事之一助耳”。②下卷包括“防夷十八论”、“三元里打仗日记”、“上制军祁宫保乞收复香港书”、“谕林家义勇文”、“上云舫夫子书二叩”等内容。其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作者抗敌御侮谋略思想的是“防夷十八论”。在“防夷十八论”中，作者针对英国侵略者的作战特点，根据广东沿海地形和清军的实际作战条件，并结合自己的战斗经验，阐述了对海上来敌作战的基本方针、原则和作战方法。

关于战略方针，作者认为：御英之法，于战、守、和三策，“必能战能守而后可以言和”。至于战、守二策何者为先问题，作者承认能守而后能战乃兵法之常，然而，“唯今之计，则必能战而后能守”。之所以强调“以战为守”，作者解释说：“盖自英夷入寇以来，官兵望风披靡，其心已寒，而逆夷自恃累胜，其气正盛，所以必得奋勇之士决一死战，以折逆夷之气，以安我兵之心，然后守乃得而固”。③

在具体战法方面，《平海心筹》既探讨了在敌舰船侵入内河时的作战方法，并提出了“埋伏守险”和“防后路”等战术，又提倡“发兵出迎”，甚至主张在海上歼敌。作者认为，英国侵略者虽

①② 林福祥：《平海心筹·自序》，1960年12月广州古籍出版社复印（下同），第2页。

③ 林福祥：《平海心筹》，卷下，第2页。

然船坚炮利，不可与之硬拚；但只要采取有效办法，“则彼之大船无可遁，而大炮无所施矣”。① 在“防夷十八论”中，作者提出了如下三种办法：一是“以众击寡”。即“他用大船，我用小船，他一只大船，我用一百只小船，如蜂如蚁，四面八方……飞棹而进，使他应接不暇”②，伺机靠近其船，施放火器。二是“善占上风”。作者认为，海上作战，必须占有顺风之势，以利火攻。三是“扎强营、打死仗”。作者认为，出洋作战，须用木排水寨。“其法，以厚木扎成一大排，四面有门户，而空其中，一出大洋，将小船尽藏在大排之内……前后左右，安放大炮。打仗时，即以大排为炮台，为正兵，而小船四出，施放喷筒火箭，抄后旁击，为奇兵。而每一木排，又用快蟹四只以夹辅之。……是为扎强营、打死仗”③。上述以多制寡、奇正相辅等作战方法，反映了作者从中国当时的军事实际出发，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的军事思想。然而，作者过分迷信中国传统火器的作用，设想用木排小船和喷筒火箭即可摧毁敌之坚船利炮，显然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表现。

此外，《平海心筹》还阐述了沿海作战宜用“土兵”而不宜多调“客兵”、海口炮台应建于山顶、须广招“海盗”、“汉奸”以为我用，以及抚绥澳门、袭取香港等军事主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多有迂阔之谈。

总的看来，《平海心筹》对于反侵略战争的方针、原则等重大问题的论述，远不如《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那样深刻、全面和系统。其次，由于知识结构和思想水平的差距，《平海心筹》的作者也未能像魏源那样，突破陈腐观念的束缚，努力倡导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而是囿于传统战法，并迷信业已过时的旧式火器。正因为如此，这部兵书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三）《兵镜类编》

---

①② 林福祥：《平海心筹》，卷下，第 24 页。

③ 林福祥：《平海心筹》，卷下，第 26 页。

《兵镜类编》系以史为镜的军事类书。作者李蕊，字奎楼，曾从戎于秦陇，并游历过东南沿海。他耳闻目睹西方列强“逼人太甚，有不胜流涕痛憾者”，乃于1880～1883年间辑录春秋至明代军事史料1471条，分为68类（诸如知人、用人、选兵、练兵、将将、将本、卓识、智术、料敌、诱敌、水攻、火攻、战守、执法等等），共计40卷，以成是书。所辑史料全部出自正史，每条均加简短按语，“于关切时事处尤触类引伸，以达其所见”①。其主旨在于“考古成法，变而通之”②，并便于“随事随时抽查，以资谋略”③。书末附有“臆说十种”及其“补遗”，系作者以时势立论，针对西方列强一再侵扰中国沿海的形势及其船坚炮利的特点，在守城、海防、练兵、用兵、避炮、用炮等方面提出的见解和主张。作者认为：“兵事，争短不如避长”。敌之所长在海，我之所长在陆，“竭天下之精华以防于海，是极力以争所短也”。因而主张，“防水不如防陆”，“据海口以争之，而寇盛，弃海口以避之”，“结人心，据险塞，运以精兵，寇必危，出奇计以歼灭之……是避之正所以破之也”。④ 基于这种扬长避短、歼敌于陆的战略思想，作者强调加强城市和险要之处的防御，提倡多筑碉堡、地营，讲究避炮用炮之法。同时指出：“船炮水雷等项皆可恃而不可恃，最足恃者唯练兵”⑤。并强调兵贵精不贵多，练兵必先选将等等。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兵法与近代军事学说相结合，以及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变化的某种趋向。

（四）《洋防说略》

《洋防说略》系中法战争时期湖北荆州知府徐稚荪所著，分上下两卷，1887年雕版印刷。作者自称：“癸未（1883年）冬，服

---

①② 李蕊：《兵镜类编·自序》，清光绪九年宝庆务本书局刊本（下同），第1页。

③ 李蕊：《兵镜类编·凡例》，第1页。

④ 李蕊：《兵镜类编》，卷40，第33～35页。

⑤ 李蕊：《兵镜类编》，卷40，第35页。

官来鄂。适海疆事起，复佐督帅卞公（卞宝第）筹办江防。乃取沿海沿江形势，详记道里，考校中西各图，附载岛屿沙线，分衍为说；并次古今兵防利钝，参以管见，而列于篇。”① 因此，它是一部重点论述江海防建设，探讨海防作战方法的军事著作，是一部颇有实用价值的兵书。

作者认为：“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不失地利，是地利固行军所最要者。”② 故上卷主要论述奉天至广东的海疆舆地，综述沿海沿江的地理形势。下卷则分述“防海说”、“防江说”、“地营图说”、“润土炮台说”、“开地隧伏炮说”和“陆战宜先避敌枪说”等问题。作者从当时海防建设的实际出发，参考中西海防精论，阐述了加强海防、江防建设和抵抗海上来敌的方法。通篇内容言而有据，贯穿了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作战思想。

关于海防布局，作者认为，海疆七省，自以直隶、江苏为重，然奉天、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省，亦不可不防。“奉天之旅顺，山东之登州，交相拱卫，实为直隶藩篱，防旅顺，防登州，是即助直隶之声威矣。江苏据大江门户，为安徽、江西、湖北之屏蔽，合安徽、江西、湖北之力以共固门户。而以浙江防浙江，福建防福建，广东防广东，斯乃为折冲之长策。援东调西，顾此失彼，亦筹防之拙也。”接着指出：“沿海万有余里，城镇林立，处处设防，力何以逮？”因而主张重点设防，重点守备。他比喻说：“地之要害，犹人有六尺之躯，护风寒者只此数处。”诸如奉天之旅顺，直隶之天津、北塘，山东之登州，江苏之江阴、龙华镇，浙江之定海，福建之福州、台湾，广东之广州、琼州，均系要害之处，“是宜驻军严备”。“其余海口边境，可以略为布置，或即责成提镇派兵守御”，亦可借资民力，举办团练，“以济兵力之穷”。③

关于对付海上来敌的作战方法，作者认为，外洋是敌之所长，

---

① 徐稚荪：《洋防说略·叙》，清光绪十三年刊本。

② 徐稚荪：《洋防说略·叙》。

③ 徐稚荪：《洋防说略》，卷下，第9～10页。

海口亦非其所短，因而主张“诱敌登陆，要于险阻而出奇以制之”①。基于以上认识，他认为魏源关于“御外洋不如御海口，御海口不如御内河”的提法并不正确，而应为之续曰：“御内河不如御陆地”②。为了阐发上述主张，作者在“防海说”中列举了诱敌深入、因险设伏、枪矛配合、接敌近战等多种“避其所长，攻其所短”的陆战方法，并以三元里人民抗英、刘永福援越抗法等战例，证明其确属行之有效的良策。

《洋防说略》虽强调与敌陆战，但并不排除水战取胜的可能。作者指出：与敌水战，“战之有法，亦何不可战也。”③ 不过，作者笔下的水战，并非堂堂正正的海战，而是类似魏源提倡的战法，即引敌舰于近海、江口，用铁链水雷等阻断船路，然后用炮台巨炮轰其要害，或以小舟装载火药，乘风顺驶近敌舰，俟其不备，药轰火烧，以收水陆夹攻之效。至于海军装备，作者不主张购造铁甲巨舰，认为铁甲舰运棹不灵，且耗资巨大，一舰有失，即难为继，不如多备小型兵轮，分布海口，为炮台陆军之助。从当时的经济状况着眼，上述主张不无积极合理的一面；但过分否定购造大舰的积极意义，则是片面的。

《洋防说略》下卷以绝大部分篇幅论述了海防问题，其主旨是：对于洋寇之窥伺，“我惟专守陆地，而以兵轮相辅，即足立于不败”。而要确保海疆安全，“则惟择地利，守要害，坚炮台，修军械，养精卒，操陆战，备火攻，设奇伏。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则守可也，战可也，以守为战，以战为守，亦皆无不可也”。④ 此外，作者还就长江防务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心思想是：“惟取其江面之窄者，分布扼守，即足立于不败。”对于防止法国侵略军沿江入寇，作者认为，如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之力“共置之鹅鼻嘴以守第一重门户，仍分设圌山、蒋山之防，以

---

①② 徐稚荪：《洋防说略》，卷下，第 11 页。

③ 徐稚荪：《洋防说略》，卷下，第 19 页。

④ 徐稚荪：《洋防说略》，卷下，第 31～32 页。

壮声威而严锁钥，敌即以铁甲船来，亦不能越门户而过”。[①] 同时，主张裁并水师，添设兵轮，平时沿江游巡，“讲求乘风打炮避浅制敌诸法”，“一旦有警，即并驻江阴为鹅鼻嘴炮台之助”。[②] 对于中法战争时期黑旗军和滇军普遍采用的地营，《洋防说略》也作了记述，其详细程度与唐景崧《请缨日记》中所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中西武备新书》

《中西武备新书》系湖北两湖译书学堂编辑，湖北武备学堂刊印，时间约在1901年前后。该书为汇辑性军事著作，内含兵书7种：日人石井忠利的《战法学》，湘军将领王鑫的《练勇刍言》，冯国士的《操练洋枪浅言》，葛道殷的《用炮要言》，德人来春石泰的《借箸筹防论略》、《炮概浅说》，德人康贝的《西洋练兵新书》。其中虽有数种为外国人所撰，但也为针对中国的军事改革而作，为当时军界所推崇。两湖译书学堂汇编的《中西武备新书》，主要是作为湖北武备学堂的教科书，当然也有敦促朝廷反省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促进军事改革的意图。

《战法学》是迄今所见最早向中国系统传述近代兵学理论的军事著作。作者石井忠利，日本陆军炮兵大尉，1895年随日本驻华公使林董来华。时值中日甲午战争，作者“有感于时事，著本书以赠王大臣等诸公”[③]。1897年，武昌质学会获《战法学》副本，当即镌刻付梓。[④]1899年，日本东京善邻译书馆正式铅印出版。作者在该书“自叙”中称：“善邻译书馆谋多编新书，输诸清韩，以资其文化。因想此书幸流传两国，其于厘革兵制，或有少补焉，则余素志亦得以酬乎？因订正原稿以托之云。”该书的第一个特点，

---

① 徐稚荪：《洋防说略》，卷下，第34～35页。

② 徐稚荪：《洋防说略》，卷下，第35～36页。

③ 〔日〕石井忠利：《战法学》，日本善邻译书馆明治三十二年版，“自叙”。

④ 质学会刻本现存江西省图书馆。

是作者第一次对中国展示了人类军事活动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并对这门科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作者认为，战法学分为两种，一为高等战法学，一为初等战法学。高等战法学含战略学和军制学；初等战法学亦称战术学（“谓讲究行军、战军、驻军三者之学也”），含军纪、教育、训练等。该书第二个特点，是博采当时东西方先进军事思想，同时较自然地融合《孙子兵法》中有关论述，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军备实际，阐述军备理论原则，因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

《练勇刍言》是一部记述王鑫所部湘军编制、营伍法规和训练方法的军事著作。作者王鑫，字璞山，湖南湘乡人，秀才出身，1853年（咸丰三年）奉湖南巡抚张亮基令，与同乡罗泽南率湘乡团丁防守省城长沙。是年冬在曾国藩率领下训练“湘勇”（初仅中、左、右三营），任左营统领。不久，“诸友请集平日所以教者为书，俾营官以下皆有所从，乃得营制、职司、号令、赏罚、练法五篇，刻诸木”①。1854年，王鑫被太平军大败于湖北羊楼司，旋与曾国藩反目，自立一军。1857年，王鑫于江西行营对原书粗加订正，正式刊行于军中。该书面世，对湘军的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定安《湘军记》称：“湘军规制，多采之王鑫《练勇刍言》”②。曾国藩于咸丰十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中饭后，核楚军（即湘军）营制，至夜二更核毕，以左季高、王璞山、胡宫保、李希庵诸人所定之制参考之”③。可见，王鑫所部湘军虽与曾国藩之湘军分道扬镳，但两部的建军治军思想互有借鉴。因此，《练勇刍言》是研究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借箸筹防论略》是一篇谋划中国军事建设的呈文。作者为德国军人来春石泰。1895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创练自强军，聘洋员35人指挥操练，而委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赴任时，来春石泰

① 王鑫：《练勇刍言·序》，清咸丰七年星沙刊本。

② 王定安：《湘军记》，第359页。

③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38页。

以是文进呈张之洞。文中指出了当时中国军事的主要弊端，并提出了改革军制、加强边海防建设的基本设想。作者开宗明义指出："窃维中国之病，在重文而轻武。"中国之所以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败北，"非尽将士不善战之过，乃火器不能胜人之过也；非尽火器不能胜人之过，乃不先时多屯精兵，令处处可以却敌，而临时用新集之众之过也"。而面对强邻逼处、虎视鹰瞵的国际形势，中国武备的出路，在于"勤求智勇之将，遍戍精粹之兵而已"。作者主张，在铁路极少的情况下，中国应仿照德、法等西方国家之募兵制度，按"每民百人抽一人，或二百人抽三人为兵"的比例扩充军队。即使按1%抽兵，则18省[①]共计可得346.25万人。"有此兵数，便成无敌之势。遇有军事，即不增兵，而外国当不敢轻犯"。如若铁路修成，则兵数可减至34.6万人，"择要防守，遇变由铁路征调……似可无虞强敌矣"。作者进而剖析了沿海、沿江和西南各省的地理形势，提出了防守要点和配置兵力的方案。他"统筹十八省通力合作之方"，建议分南、北、江三军，即："立北军一支，以保畿辅而固边防；立江军一支，以防江海要口而保腹心之地；立南军一支，以保东南沿海及各边陲"。三军各有经略，均由钦派陆军总帅节制，以此克服中国"兵力分、人心涣"的弊病。此外，作者还建议："每军须仿德制，设总参谋军务处，罗致奇才异能之士，以资运筹"；"陆军必与水师相辅而行"；"各省宜早设武备学堂，教习韬略，以储将领之才"。"各省宜早修大路、铁路，以利转输"等等。不难看出，作者在这篇呈文中所提各项军事改革建议，有不少切中时弊之处，显示了一定的军事才干。

《中西武备新书》中的《西洋练兵新书》，是指驻德公使李凤苞于1883年译成之《陆操新义》。该书介绍了普法战争时期德军的军制、操法和战法，1884年在中国出版。冯国士的《操练洋枪浅言》和葛道殷的《用炮要言》则分别介绍了新式后膛枪炮的操作要领，均为当时较好的军事技术书籍。

---

① 不含蒙古、新疆及东三省。

（六）《兵学新书》

与《中西武备新书》同期刻刊问世的另一部军事著作，是徐建寅编著的《兵学新书》。这是一部综合当时西方的先进军事思想，较系统地阐述军事领域各个学科问题的军事著作。

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江苏无锡人，清末科学家徐寿之子。初供职于江南制造局，与李善兰、华蘅芳等共事，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后供职天津机器局，继任山东机器局总办、福州船政局提调。1878年任驻德使馆参赞，"历观轮船军械各厂，探讨政治风俗，访其议院，及其军操诸程式"①，并利用机会赴英法等国考察。他认为列强之所以敢于"挟其所长，伺瑕抵隙，威力胁制，割地攘利"，侵凌中国，主要是"窥我兵学之未习，兵力之积弱"。而某些当事者却误以为"彼兵之强，在其军火之利"，以致主张用巨金多购外洋军火，"殊不知用其军火，在乎人之精讲兵学，乃为根本"。或谓"召募外洋将弁以教我兵士，冀以得其心传"，亦由于"语言不通，情意未达，学其外貌，遗其精义，知其一而漏其万"，"徒费巨款仅得粗浅皮毛"。因此，他认为"非集中国有志之士，自行讲求兵学之精义，必不能训练兵士使成劲旅"。②鉴于"二千年来无人以兵学渤为成书者，即有古兵书，亦皆模糊影响，罔切实用"③，他决心"揭各国新法之精理，辑泰西诸书之菁华"④，编著一部既详尽又实用的兵学著作，取名《兵学新书》。1898年，是书终于刊刻出版。

《兵学新书》的最大特点是："采集各国军政，实事求是，择精语详，自募选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至军士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需与一切有关于军者，无不绘图系说……无法不备，无备不精，不载吉凶占验诸异说，可谓集近时兵学之大成，得古今教民

---

① 张岷远：《兵学新书叙》，第2页。

② 徐建寅：《兵学新书·后叙》，第3～4页。

③ 徐建寅：《兵学新书·后叙》，第4页。

④ 徐建寅：《兵学新书·凡例》，第1页。

之深意”①。该书共16卷，第1～5卷详论步兵之制，分别叙述了旗、营、军的编制、营规、操练方法和战法运用，小到持枪、列队，大到行军战阵，绘图贴说，详辟得失。第6、7卷分别讲述马、炮兵旗、营编制，操练方法和作战阵形。第8卷详述步、马、炮兵合同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其中指出：“步马炮三兵合用，须求各尽其长，要在善择妥便地势，以得展布所长”。“战阵始终专以步兵为主，马炮二兵，仅以为辅助”。“今时两军初接，必先多放炮聚击，以乱敌阵线，然后步兵乘势速进，必能获胜”。因而特别强调：“在战场须马步炮会合，炮兵在前先放，步兵跟随保护，继而前进冲攻，马兵在后更远，见敌败溃，赶进冲追，炮兵亦随进追击”。② 当然，上述合同作战思想，早在19世纪初叶的拿破仑战争中就有所实践。1873年德人斯拉弗司在其所著《临阵管见》中，也用一定篇幅专门论述了步、马、炮兵合用之事。但是，由中国人自己编写，并用整整一卷篇幅详述近代各兵种合成作战方法原则者，《兵学新书》应是首次。第9卷阐述了选兵筹饷之制。作者尖锐地抨击了传统募兵之法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一种新的选兵方法，即“抽丁之制”。主张各州县按丁口实数册，选“身家清白、准应童试”之壮丁，每200人中抽1人为兵③。其他及岁壮丁（年19～44者），“每人日输制钱一文”，以充当兵之人军饷。这样，全国22个省，共可得兵40余万人。遇战事“则将已经在营训练三年遣放回家之人，按籍召募，又可得数十万精练之兵”。如此，“国家防御有资，民间治生不害，烦苛免而民乐从，国用充而精锐成矣”。④ 此法亦称“二百壮丁共养一兵之法”。实际是一种半征半募的制度。该书第10卷论述粮饷衣食之制及辎重转运之法。第11卷讲述新式枪炮之构造及保养、使用方法。第12卷论述修筑沟墙及

① 张岷远：《兵学新书叙》，第2页。

② 徐建寅：《兵学新书》，卷8，第1～2页。

③ 或自愿报名，或抽签以定。残疾、独子而父逾60岁者免抽。

④ 徐建寅：《兵学新书》，卷9，第2～4页。

防守攻取之法。第13卷讲宿食。第14卷论述筑造军路。第15、16卷分别论述筑造铁路之法和铁路军运章程。

《兵学新书》一问世，立即引起较大反响。陕西按察使端方根据徐建寅所说的“抽丁之法”，拟定了《抽练陆军办法》一折，连同《兵学新书》一并进呈朝廷，引起慈禧的很大兴趣。1898年11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命裕禄先在直隶试办“抽丁之法”，“一俟办有成效，次第推行各省，以期悉成劲旅”。① 但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以及此后发生种种社会动荡，徐建寅设想的“抽丁之法”根本无法试行。1901年，徐建寅在湖北试制无烟火药时失事身亡，他企求使《兵学新书》成为“救世真经”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七）《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是袁世凯组织编纂的、反映新建陆军训练情况的法规性军事著作。

1898年，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次年5月，清廷令袁世凯“将该军平日训练情形，详悉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贴说，进呈备览”②。袁世凯随即组织段祺瑞、冯国璋、王世珍等40余人，将新军平日训练情况，详晰汇辑，绘图立说，共编成12册，附阵图1本，于同年8月“恭呈御览”。1902年3月，由昌言报馆正式将此书出版。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汇辑了新建陆军的全部训练操典、条令和规章，贯穿着袁世凯“训必师古，练必因时”的治军思想。该书第一册辑录了袁世凯对新军各类人员的精神训词，反映了他训练新军的指导思想。他在“训练总说”中强调指出：“自古节制之师，存乎训练，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兵不训罔知忠义，兵不练罔知战阵，权其轻重，训为最要”。③ 在“训为最要”的思想指导下，作者对将、弁、兵进行了不厌其烦的精神训导。在“训

① 《御览兵学新书·上谕》(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② 袁世凯：《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奏折》，第1页。

③ 袁世凯：《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1页。

将要言”中强调：为将者“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并指出：“为将者，任巨责艰，军士之性命系之，国家之休戚同之。讨论戎机，考究方略，上宣力于王室，下自奋于功名”。在“训哨弁要言”中，要求他们懂得“职分虽微，程途自远。但使恪遵训诫，日起有功……高官显秩无难拾级而升，厚禄重糈可以操券而得”。在“训兵要言”中，要求士兵懂得“兵也者，所以捍疆圉、戢祸乱者也。……将帅多起于行间，提镇每兴于卒伍。”并做到“励忠义”、“敬官长”、“守营规”、“勤操练”、“奋果敢”、“怀国耻”、“惜军械”等等。袁世凯还极力宣扬“人之生死，皆由命数”等唯心主义思想，竭力以功名富贵为诱饵，激励士兵为统治者卖命，并以封建家长制为绳索，维系北洋新军的内部关系。

在军事训练方面，新军“专仿德国章程”。《图说》第二册“练兵总说”强调，练兵之法，更仆莫数，而综其要旨，计有如下几个方面：一练规矩（即熟悉和恪守各种营规）；二练号令（即熟悉各类号音、口令，“一闻令下，勃然改观”）；三练身体；四练步法；五练器械；六练阵式。同时强调：平日之练法，即临阵之机宜，因而必须以战法为练法，精益求精，进而益上。

值得指出的是，《图说》所述各项训练操典，虽主要仿照德国，但并不是简单照搬，而是根据清军的实际需要多有变通，并注意了以步队为主，炮、马、工程各队为辅的联合兵种的演习。至于营规、饷章，更是参照传统章程改订，并未照搬西法。总之，《图说》贯彻了“道必师古，法必因时”的思想，训之以封建宗法，练之以外国技艺，并参酌古今，“舍短取长”，因而是一部较鲜明地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和探求中西军事思想融合的军事著作。

（八）《战法学教科书》

从1902年起，清末军事改革开始由仿德转为学日，随着大量日本军事教习和顾问的到来，日本的军事著作和操典等也蜂拥而入，从而对晚清军事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北洋将弁学堂（后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贺忠良（即日本步兵少佐多

贺宗之）编写的《战法学教科书》，便是一部内容丰富、影响较深的传播日本近代军事思想的军事著作。作者在书前“例言”中说：“战法学一书，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创始北洋将弁学堂时，采据原本改订。……光绪三十年秋，再取近时战法之进步，酌乎北洋之军情，悉改窜增补重订成书。……光绪三十二年秋，仆也不敏，鉴日俄战争与中国军情之进步，再增删”。显然，1906年出版的《战法学教科书》，既吸取了日本同类书中的基本内容，又根据各个时期“战法之进步”，并“酌乎北洋之军情”，鉴“中国军情之进步”，几经修订而成，因而书中有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军事学术的实际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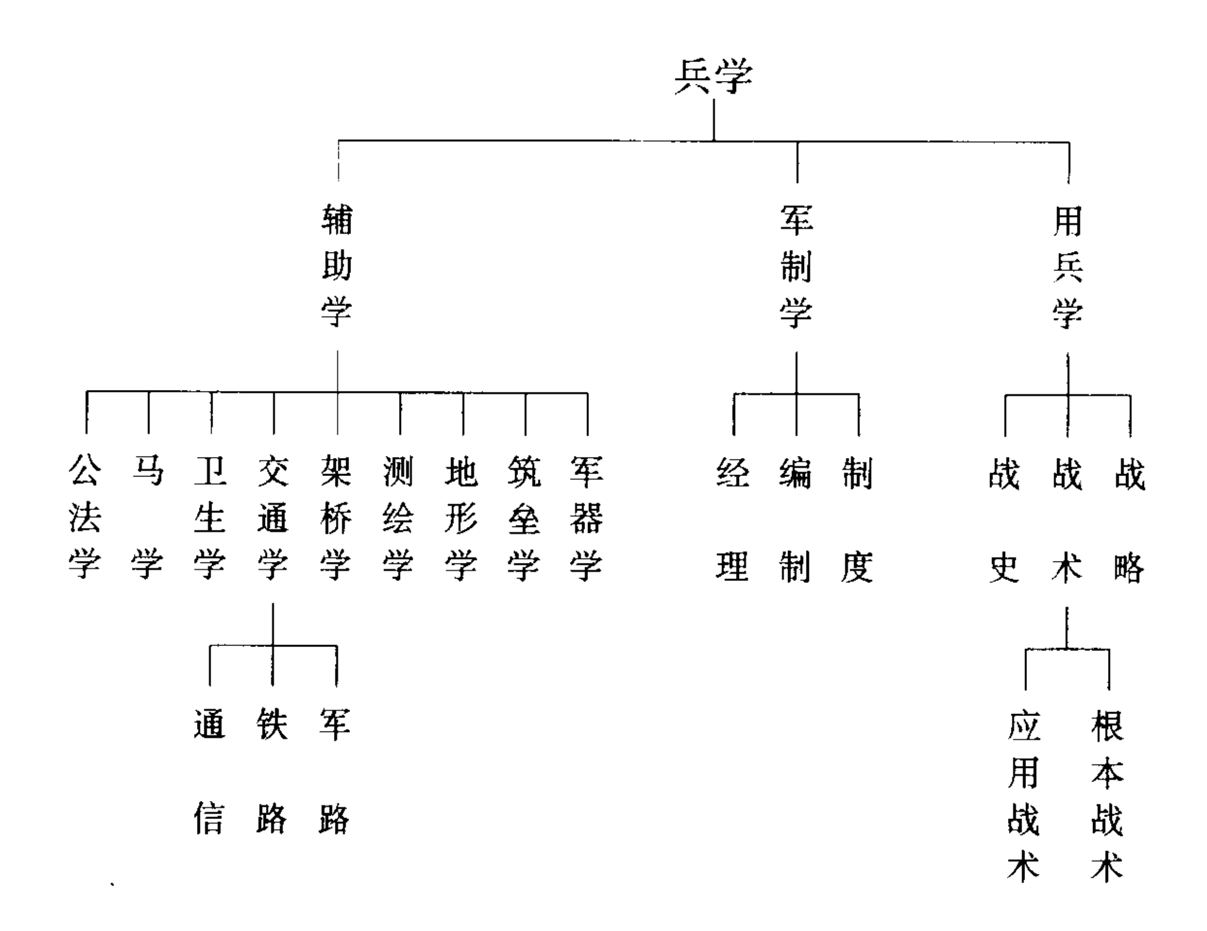
按作者解释，战法即是战术。而“战术为交战之法，系战斗之时，在战场指挥操纵各兵之术”①。但是，《战法学教科书》的实际内容并不局限于战术范畴。在第一编中，作者用了五章的篇幅，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兵学的分类，阐述了战争的定义、宗旨等基本理论问题。同时，对战争与战斗之区别、战略与战术之区别作了初步的探究。作者认为，兵学（或称兵法）是武备之总称，下分用兵学、军制学、辅助学三大部类。其中用兵学则包含战略、战术（战法）、战史三项。其基本框架见下图。

关于战争的定义，作者解释为“判决各国所生歧略纷议，为控诉威力之策”。他承袭帝国主义的理论，鼓吹战争“能启人智，且振国威”，“在国家实获利无穷”。最后得出结论：“故曰战争者，实国家致富强之要旨也”。②关于战争与战斗、战略与战术的关系，作者认为：“战争依政略宗旨而起，战斗为达战争宗旨而起”，因此，“战争属战略，用兵之谓也；战斗属战术，交战之谓也”。“战略与战术互相关系，彼此相辅而行者也”。③ 如此清楚地阐明战略与战术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尽管还不很科学），在中国近代兵书

① 贺忠良：《战法学教科书·总论》，第3页。

② 贺忠良：《战法学教科书·总论》，第5～6页。

③ 贺忠良：《战法学教科书·总论》，第7～8页。



中实属首次。

在其余各编中，作者分别论述了“战斗分别及各队（步、马、炮、机关炮、工程、辎重各队）本领”、“各队战法”、“诸队连合”、“出师”、“军中要务”、“搜索勤务”、“警戒勤务”、“行军”、“宿营”、“行李及辎重”、“司养”、“普通战斗”、“局地战”（高地战、谷地战、林战、居民地战、隘路战、河川战）、“小战”等问题，反映了当时世界兵学的新观点和军事技术发展的新成就。

（九）《战略学》

1908年由应雄图编著①、陆军预备大学堂印行的《战略学》，是从最高层次论述军事战略理论的著作。

关于战略的概念，中国自古有之。《孙子兵法》就是我国也是

① 是书署名为：任衣洲译，应雄图编，雷启中修。“应雄图”疑为日本步兵大尉樱井文雄的化名。樱井文雄于1907年来华，被聘为北洋陆军军官学堂兵学教习。

世界上最早论述军事战略的著作。公元3世纪末，晋代司马彪著有《战略》一书，正式出现了“战略”一词。但是，真正把军事问题进行科学分类，并把战略作为一门区别于战役、战术的独立学科加以研究探讨的，还是近代的事。在西方，首先把战略与战术加以区分并赋予定义的是被称之为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基人的海因里希·迪特里希·比洛（1757～1807）。目前所见到的世界近代较早的、系统地论述战争与战略问题的专著，则是瑞士安东·亨利·约米尼编著的《战争艺术》，和德国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81年，法国将军贝尔特的《战略原理》问世，此后又有德人伯卢麦的《战略论》出版。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陆续翻译出版西方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其中1886年译出的贝尔特的《战略原理》，被当作日本陆军大学校① 的教科书。1904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被译成日文。应雄图在中国任教时编撰的《战略学》，自然吸取了西方战略理论特别是上述译著的许多重要内容，因而具有资产阶级军事著作的性质。

是书共分17章，内有“战争之定义及其价值”、“政略与战争之关系”、“近世战争之特性及战略上之倾向”，以及“战略攻势”与“战略守势”的基本战法和原则等。在“战争之定义及其价值”一章中，作者认为：“凡战争者，为一国对于他国维持贯彻其国是起见，最后所行之威力手段也”。这与克劳塞维茨“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② 之说，大同小异。在“政略与战争之关系”一章中，作者指出：“战争为政略攸关最后之强硬手段”。这也与克氏“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③ 的著名论断基本一致。在战略指导方面，作者融合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贝尔特《战略原理》的基本思想，把战略区分为攻势

---

① 日本陆军大学校于1882年（明治十五年）创立，为日本最高军事学府。

②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第1卷，第22页。

③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第1卷，第50页。

战略和守势战略。在讲到“战略上当服膺之原则”时，作者特别强调：战略之第一原则是寻求敌之主力决战；战略之第二原则是实行决战“务集结国军之全力”。这些战略指导上的基本法则，同样体现出近代军事思想的时代特点。

此外，作者在该书“绪言”中指出：“向者欧洲各国陆军大学堂本以战略学为特别功课，今则渐改旧章，专令学生考究战史，或视察规模宏大之演操，或讨究战略之原则，使因此能自发明应用之术”。“然按中国现时之情势，各种战史未甚完备，即如大操亦未得谓之完全无缺，使当此而欲以欧洲之学制施之于今日，则其不蹈躐等之弊也，几希矣”。因而要求中国高等军事教育仍以战略学为基本课程，从中推究原委，“则亦不难超登彼岸也”。此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

（十）《曾胡治兵语录》

1911年春，前广西兵备处总办、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字松坡），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召，到达云南。在正式就任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之前，受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的委托，编写“精神讲话”，乃从曾国藩、胡林翼的奏章、函牍及日记中摘取较有价值的“治兵言论”，“分类凑辑，附以案语”，而成语录体兵书，取名《曾胡治兵语录》。1917年，此书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1924年，蒋介石将其列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名之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

《曾胡治兵语录》共12章（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4万余字。在各章“按语”中，蔡锷结合曾、胡论兵言论，阐发了自己对治军、作战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反映了他当时的军事思想，并体现了当时中西军事思想的初步融合。

该书前10章所辑内容主要是治军问题。蔡锷十分赞赏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尤为扼要探本之论”。（“将材”章按语）他提倡尚志，指出：“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

国家于坦途”（“尚志”章按语）。他主张严明、仁爱，一方面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严明”章按语），一方面赞赏曾国藩“吾辈带兵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句话，认为此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仁爱”章按语）。他强调练兵务求严格，“欲其效命于疆场，尤宜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临事之际，乃能有恃以不恐”（“勤劳”章按语）。

该书后两章所辑内容为作战问题，主要精神是讲究持重稳慎。主张“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临敌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等等（“兵机”章按语）。同时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利便，四者均可有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作者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正确设想。他指出：“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战守”章按语）。

曾、胡军事思想主要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封建糟粕所在皆有，须予以批判。而蔡锷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觉者之一，在编辑《曾胡治兵语录》时，对曾、胡治兵言论一概推崇备至，并在该书“序”中称曾、胡为“中兴名臣中铮皎者”，“其所论列，多洞中窾要，深切时弊”，显然是不妥的。

三、清后期兵书的主要特点

通观清后期兵书，多数作者由于抱有改革军事、强兵救国的强烈愿望，因而能够立足现实，着眼世界，不断吸取国外最新军事成果，使推出的兵学著作既有新鲜内容，又有相当实用价值。归

纳起来，清后期兵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多变性**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伏跌宕，复杂多变。这种社会的剧变性、复杂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也表现在军事方面。作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的兵书，同样鲜明地体现出多变性特点。

中国自古是军事理论非常发达的国家，堪称兵法之国。据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自先秦至明清，共有兵书 3380 部（其中存世兵书 2308 部、存目兵书 1072 部）。然而，长期封建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力，大大禁锢了军事思想的发展。从本质上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兵书虽然丰富多彩，但其中所阐发的作战原则和方法等，基本上都是冷兵器时代的，因而从思想内容到版本形式，陈陈相因，甚少突破和创新。特别是清王朝建立后，对民间兵器和兵书严厉查禁，焚毁甚多。以后随着封建统治日趋衰败，兵学研讨和军事著作愈加稀少，间或有之，不仅在内容上多辑录古训，但求注疏，绝少创新，甚至连署名也多伪托古人，且有津津乐道于八卦占候、奇门遁甲之类玄虚不经之谈的现象。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18 世纪时的欧洲，在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方面都出现了飞快的发展。该世纪末，法国人民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废除了战争方面的一切陈旧规章，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废除了旧军队，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①，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并促使整个欧洲的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至 19 世纪上半叶，由于无烟火药等大量应用于军事，线膛枪炮大批装备军队，战争的样式、规模和实施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一大批具有新型军事思想的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脱颖而出，一些阐发资产阶级军事学说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约米尼的《战争艺术》，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军事

---

① 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2 页。

学术水平，成为19世纪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代表作。

近代欧洲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学说，在鸦片战争以后陆续传到了东方，引起中国某些传统军事思想、理论和技术的剧烈震颤。这种震颤波及到兵学著作方面，则表现出思想内容上的多变性，即内容杂、思想新、门类多、变化快，博采古今，融合中外，展示出一种五光十色、目不暇接的景观。

魏源《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开了这种变革之先河。作者在书中注入了新见识、新思想，摒弃了"天朝无所不有"和"华夏夷狄"之类的陈腐观念，坦率承认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该书所介绍的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对于引导人们睁眼看世界，克服盲目自大情绪，贯彻知己知彼的军事原则等，也起了积极作用。

同治年间开始的洋务运动，使古老中国传统的军事观念进一步地卷入世界军事发展的潮流之中。于是，古朴的中国军事学说，开始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近代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的发展变化，而不断递嬗演变。反映在兵学著作上，从思想内容到著述方法和版本形式，均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超过了鸦片战争以前的任何时代。

(二)实用性 与古代兵书相比，近代兵书的实用性明显增强。产生这种进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严重威胁着古老中国的独立和生存；反压迫的农民战争风暴，不断摇撼着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这种内外夹击的严峻形势，迫使某些士大夫放下程朱理学和八股词章，转而面对现实，寻求救国的"御夷之策"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剿匪之方"。第二，随着洋枪洋炮等西式兵器陆续装备部队，作战方法也逐步发生变化。古代那些主要指导冷兵器作战的兵学著作，除某些反映战争和作战指导一般规律的理论原则外，许多具体论述大多已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形势逼使人们不能停留于对《三略》、《六韬》等的注释、考证，而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如何适应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变上。《兵学新书》的作者徐建寅，在叙述其撰书动机时指出："泰西各

国讲求兵学，久有成法，愈新而器械愈利，兵学愈精。其书有兵部之章程，有各家之著述，门类纷繁，新旧杂出，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中国士子，素未讲求此学。古来兵书，半多空谈，不切实用。戚氏《纪效新书》，虽稍述实事，而语焉不详，难以取法。有志之士，欲讲兵学，莫得门径，无从探讨”。① 其言虽有偏颇，但基本反映了近代兵学家们不迷恋往古，开创新之风，主张撰著对现实有“补救之方”的军事著作的思想倾向。正因为如此，同治以后的兵学著作大多具有不尚空谈、讲求实用的特点。

（三）科学性 同古代兵书比较，近代兵书所论述的军事问题更能反映或接近战争的客观规律和客观实际，因而更具有科学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兵书的内容看，中国古代一些兵学典籍尽管揭示了人类战争的某些基本规律，提出了不少久盛不衰的军事原则，但由于受生产水平和时代的限制，许多军事学说多为当时作战经验的总结，有些理论思维还停留在古朴直观的阶段，有的内容陈腐，甚至荒诞不经，有的则带有神秘色彩。在西方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兵学家开始摆脱认识和思维方面的某些局限性，表现出思想更辩证，更注重实际，更尊重科学和探求规律的特点。如姚锡光在写《长江炮台刍议》前，随洋员“自吴淞历崇明，循江阴抵镇江，凡山川形势新旧各台，得详审周视”②。上书张之洞时，力排洋员空谈，抒发独立见解，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徐建寅为撰《兵学新书》，“采集各国军政，实事求是”，“不载吉凶占验诸异说”，也体现了近代兵学家博采众长、摒弃糟粕的科学思维特点。科学性的第二点，表现在近代兵书的分类更加精细，用语更加准确。在古代，由于兵种的单一或为数较少，以及当时军事学术水平的限制，兵书的分类并不十分精细。《汉书·艺文志》把古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到了近代，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和作战方

---

① 徐建寅：《兵学新书·凡例》，第1页。

② 姚锡光：《长江炮台刍议·叙》，己亥夏五月刊于京师。

式的不断改变，军队内部分工越趋复杂，这就决定了军事科学必须向多学科、多门类方向发展。19 世纪 30 年代，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一书中已把军事科学划分为战略学、大战术学、阵中勤务学、工程学、战术学五大学科。其后，分类进一步发展完善，又出现了更科学的划分方法。中国近代兵学家也逐步接受了这种学科变革，各类专门性军事著作应运而生，战略学、战法学、军制学、兵法史略学、炮学、测绘学等新的军事学术领域不断被开拓出来。与此同时，兵学家们在军语运用上更加准确和规范，从而对近代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表述更加完整和贴切，大大增强了近代兵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综上所述，清后期兵书的多变性、实用性和科学性诸特点，与近代中国的开放性和国人自强御侮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封闭的中国被列强打开了大门，封建士大夫们有机会领略外国的新技术、新思想，看到清政府的腐朽和某些传统军事理论的落后。为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兵学家们不得不放眼世界，在继承和发展某些传统军事理论的同时，努力吸取西方最新军事成果，从而产生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军事著作。当然，清后期兵学著作在吸收外来军事学术的问题上，也存在良莠不分、盲目照搬的倾向。如沈敦和纂辑《自强军西法类编》时，力求一字一句“务与西书吻合”，不敢丝毫走样；陈凤翔编的《战法学》，不仅章节层次悉仿日人编写的教程，就连所谓战争能“启人智”、“振国威”，“战争者，国家致富强之要点也”等观点，也照搬照抄。此外，清后期兵书由于注重实用，以致具有理论升华的著作并不多见。

第二节　清后期军事刊物

一、概　况

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失败后，中国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为

了挽救危亡，举国上下纷纷要求清政府振兴武备，进一步训练新军，于是，“尚武”之风在全国盛行起来。与此同时，各类以研讨军事学术、介绍军事知识为内容的军事刊物也应运而生。

20世纪初各类军事杂志、报刊的出现，对活跃当时军事思想，传播先进军事技术，交流军事学术观点，振作新军士气，促进军事改革的进一步开展，都起了重要作用。通过近代军事杂志，可以管窥清末新军的建军思想、训练内容及其方法，可以了解外国军事思想对中国军事的渗透和影响，还可以看到清军在军事改革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由北洋武备研究所编纂发行的《武备杂志》，是中国近代创刊最早的军事杂志。1903年12月，直隶总督袁世凯认为“保定将弁、武备各学堂创办未久，所有一切课程亟须随时会议，互相讨论”，故奏请在保定设立武备研究所，以冯国璋为该所总理，并规定每星期各学堂总办教习前往会议一次，“各抒所见，集思广益，俾群策之兼资，补现行之未逮”。①《武备杂志》是该所创办的专门研究军事教育、部队训练和战略战术的军事月刊。由将弁学堂总教习贺忠良兼任总编纂，下设编纂等50余人。该杂志于1904年4月发刊，每期印数不超过1500本，只在军界内部发行。该刊宗旨是：“以希望军队之进步为第一要义，与各军互相联络，从事研求”，“以期集思广益，启迪新知”，达到“以武立国，精练军旅”之目的。围绕这一宗旨，该刊内设“谕牍”、“论说”、“学术”、“叙事”、“格言”、“问答”、“汇录”等栏目，主要刊载清廷谕旨、武臣奏折、新军法规、将弁论说，以及外国战史等内容。有关新军教育和训练的论述，集中登载于“论说”和“学术”两栏。到1906年3月，《武备杂志》共出25期，主要撰稿人多为日本教习、顾问和北洋军官，集中反映了北洋军的教育、训练和治军思想，因而是研究北洋军事史的重要历史资料。

1905年4月创刊的《训兵报》，是北洋督练处编辑出版的通俗

---

① 《督宪袁谕军政司教练处设立武备研究所札》，《武备杂志》第1期。

军报，每月仅出3期。该报“专为训兵而作”①，发行范围为北洋军排、棚等基层单位，供排长以下官兵阅读，因而全用白话编写。它以对士兵进行精神训导和讲解营伍法规、步兵操典为主要内容，间或介绍中外战史知识和古代名将事略，一般不刊载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文章，体现出通俗活泼的特点。

1906年9月创刊的军事月刊《南洋兵事杂志》，是继《武备杂志》之后发行的另一份重要军事刊物。该刊由南洋督练公所出版，每期100余页，分“诏令”、“公牍”、“通论”、“学术”、“经历”、“问题”、“见闻”、“通信”等栏目。“通论”栏主要刊登有关国防建设、军事体制和部队精神教育的文章。“学术”栏主要刊载部队训练、营伍条令和战略战术的研讨等文章。该杂志系普及性军事刊物，“凡在南洋之陆军将校，自排长以上各员，皆定为义务购读”②。该刊认为：南洋自创设新军以来，各级将校“程度既难一致，而经历亦各有不同”，极需借杂志统一思想，交流学识；此外，“征兵为我国创举，教育训练布置之方，目前宜如何入手，将来宜如何改良，尤非集思广益未易收效”。因此，创办军事杂志，“诚今日当务之急而不容稍缓者也”。③从刊物特点看，《南洋兵事杂志》较之《武备杂志》，内容更为丰富多彩，论说敢于针砭时弊，鲜明大胆，研究战术注意结合南洋实际，极富地方特色。从1906年到1911年，《南洋兵事杂志》共出版了59期，是清末办得最好、坚持时间最长的军事杂志。

继以上几种刊物之后创办的军事刊物，还有《武学》、《军学季刊》、《海军》、《军华》等。这些多为留日学生或国内学社团体所办，稿源狭窄，时间短暂，发行面小，影响不大。

《武学》系1908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的军事月刊，为留日陆军学生所组织的武学编译社④所办，设“社说”、“教育”、“学

---

① 《训兵报例言》，《训兵报》第1期。

②③ 《南洋兵事杂志简章》，《南洋兵事杂志》第1期。

④ 该社发起人有刘宗纪、蒋荫曾、王天培、孙传芳、李根源、唐继尧等85人。

术”、“海军”、“传记”、“文苑”、“军事小说”、“调查”等栏目。其宗旨是：详议征兵办法，鼓吹尚武精神，研究兵科学问，补助军事教育，讨论各国军备，振兴海军计划。该刊受到清政府驻日公使的监视，故声明只论学术，不问政治。但所刊文章，几乎无不洋溢爱国的政治倾向。

《军学季刊》1908年9月于上海创刊，由留德陆军学生陈宗达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内设“军政”、“兵法”、“地势学”、“军器学”、“工程学”、“战务”、“军志”等栏目，偏重于军事学术，以翻译介绍西方军事文著为主。

《海军》是1909年6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的军事季刊，由留日海军学生所组织的海军编译社编辑发行。该社“以讨论振兴海军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①。《海军》设有“图画”、“论说”、“历史”、“地理”、“学术”、“小说”、“文苑”、“海事新报”等栏目，提倡重振中国海军，探讨海上作战方法，介绍海军知识，报道国内外海军时事新闻等等。

《军华》是1911年7月创刊于北京的军事月刊，由军国学社编辑发行。该社以“研究军事学问，鼓吹军国主义”为宗旨。《军华》宣扬忠君、爱国、御侮，颇受朝廷军事要员们重视。军谘府大臣载涛、毓朗，陆军正副大臣荫昌、寿勋，以及军谘使冯国璋，江北提督段祺瑞等，纷纷赐赠照片或题字以示祝贺。该刊设“谕旨”、“奏折”、“论说”、“学说”、“章制”、“调查”、“军事要闻”等栏目，以鼓吹“军人”、“军备”、“军国”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发表了大量军事学术论文，刊登了一些国外军事动态和军事技术发展的消息。该刊仅出3期，即逢武昌起义而停刊。

此外，还有《广西军国指南》等一些地方军事团社出版的刊物，多创刊于宣统年间，主要反映本地区军事动态和新军编练情况，其栏目设置与其它军事刊物大同小异。

---

① 《海军编译社简章》，《海军》第1期。

二、清后期军事刊物的主要特点

清后期军事刊物内容丰富，涉及到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其中，鼓吹尚武精神，主张加强军队精神教育，和注重军事学术研究，是贯穿所有军事刊物的主要内容。

（一）整军经武，富国强兵，是清后期军事刊物的中心思想和一致呼声

甲午战争以后，人们目睹山河破败、列强宰割的危难景象，深感非振兴军事不能救中国，于是，鼓吹尚武精神，主张军国民教育的呼声，激荡于各类地方报刊和军事刊物，形成了举国皆言武备的局面。

为什么要武备？贺忠良在《武备杂志》发刊词中作了回答。他说："窃维环球以武立国，精练军旅，所以固疆圉保利权也。……旷观宇内大势，列强角逐，其军事之进步，骎骎无分秒之停"，"中国时局阽危，忧患日迫，自非共策群力，加意研究，作日新月盛之想，焉能尽军人之责任，壮震旦之声威耶？"① 覃鎏钦在《论今日当贵军人》一文中指出："甲午、庚子以来，一败再败，不能自振。而环球各邦，奋其野心，逞其蚕食，于是日占我台湾，俄据我旅顺，德拥我胶州，英窃我威海，法夺我广州。……今日五城，明日十城，危机甚于危卵，四百余州无一片干净之国土矣"②。作者认为：之所以如此，固然由于当局奉行投降媚外的外交政策，但主要还是无武力以为后盾的结果。为了拯救危亡，收回利权，必须建立强大军队，非此无以立国。另一作者撰文指出："处今日而言立国，不以治兵为第一着，则下手无从。……近世之号文明称强国者，虽不可尽归功于治兵，而其实又何尝不可归功于治兵。"③

---

① 《武备杂志》第1期。

② 《武学》第1期。

③ 杨集祥：《军国建议一》，《武学》第3期。

显然，强兵立国，是这些作者要求加强武备的基本出发点。

如何加强武备？许多军事刊物刊文指出，强化武备，必须对整个民族进行尚武教育，提倡军国民精神。黄瓒在《军国民书》一文中称："军者，国民之负债也；战争者，国民之义务也。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思想，军人之身干，国民当具之要素也。故其国有尚武之精神，其国民即能具此数者之性质。如日本之'大和魂'，其国民皆以此三字自居，此其最也。"① 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这说明，清末论者在强调实行军队军制、兵器改革的同时，也认识到精神武器的极端重要性。当然，军国民教育的主张并非始于军事杂志，早在1902年2月，正在日本留学的蔡锷就曾发出过同样的呼吁。他在《军国民篇》中指出：中国"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因此，"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②

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和中国留日学生的增加，人们对日本的尚武教育愈加推崇，有关奋发中国武学和实行军国民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刘基炎在《武学》第一期撰文认为："现今世界，苟非最低等不能自振之国，即断无不实行此军国主义，以立此天演竞争之场者"③。《军华》杂志也认为，人类进化是弱肉强食，优胜劣败，"诘戎兵以扬武烈，稽古已然；堆炮弹方竖国徽，当今成例。此非实行军国主义决不容建国于兹地球上者也"④。

显然，晚清军事杂志无论是宣扬尚武，倡导军国民教育，还是鼓吹军国民主义，无不与日本的影响密切相关。廖宇春在《论中国武备》一文中指出："今者幡然变计，始恍然于兵事之不可不

---

① 《南洋兵事杂志》，第2期。

② 蔡锷：《军国民篇》，见《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③ 刘基炎：《武学发刊之意见书》，《武学》第1期。

④ 《祝军国学社出世词》，《军华》第1册。

讲，练兵练将，惟日孳孳，大抵以日本为效法。自日俄启衅，日军渡鸭绿江以来，战胜攻取，其士气之充，兵力之强，战术之变幻，尤足动吾人之观感”①。许多人认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它崛起亚洲的根本，“足以代表日本之特色”，因此，各军事刊物发表了不少多方论述日本尚武精神的文章。他们中一些人当时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初叶的中国，已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摆在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是深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彻底推翻顽固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创立民主共和政体。避开当时的革命主流，单纯地宣扬尚武精神和军国民主义，难免南辕北辙，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响应。

（二）注重军队精神教育，是清后期军事刊物的又一特色

许多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推行军国民教育，应从军队教育抓起，“军队者，固国民之代表，而军队教育，尤国民教育之代表者也”②。军队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对将士的精神教育。这种观点的形成，主要受日本治军思想的影响。他们认真研究了日俄战争，认为日本战胜沙俄，最根本的因素是精神。有的论者指出：“以睥睨一世之强俄，岂不以练兵兴学称？而今也反蹶于东邻蕞尔之岛国。谓日军之数多于俄乎？非也。谓日军之器械精于俄、猛于俄乎？亦非也。然则俄败而日胜者，此何故欤？说者谓日军勇于战而不畏死。顾日本何以能勇于战不畏死乎？吾可以一言决之曰：日本战胜于俄者无他，精神也。”“缺此精神，虽百万之师，无异乌合之众，利兵良械，直枯木朽株耳。盖精神者，军人之生命也”。③

关于军队精神教育的内容，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何谓精神教育？曰尚武，曰名誉，曰忠节，曰信义”④。有的认为，军人精神，“即忠节、礼仪、信义、武勇、质素五者是也”⑤。有的认为，

① 《武备杂志》第4期。

② 雨人：《军队教育》，《南洋兵事杂志》第2期。

③④ 廖宇春：《论精神教育之基础》，《武备杂志》第13期。

⑤ 剑飞：《论军人之精神》，《南洋兵事杂志》第1期。

所谓军人精神，“分而言之则甚繁，合而言之则甚简，惟智、仁、勇三者可以赅之”①。另一说更简单：“军人之道德，大纲有二：曰勇，曰仁。”②

至于教育的方法，许多杂志均刊文指出：将校教育为军队教育之根本，军队精神教育应首先从将校抓起。“军队教育之如何，当即以将校之良否为之标准；而将校之良否，又当视将校教育之如何为之比例”③。作者认为，作为将校，除应具备普通军人所应具备的智、仁、勇等精神外，还应该才识兼备。有人以赵括为例，指出：“无识之士，固不可与言为将，然有识之士，亦未必即可为将也”④。像宣扬尚武精神一样，各家杂志在论述将校教育时，一般都介绍日本的情况，推崇日本的经验。

（三）清末军事刊物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学术论文，并介绍了许多国内国外军事动态和军事技术发展信息

在军事学术研究方面，清末军事刊物经历了一个由介绍国外军事为主到着眼于研究国内军事问题，由介绍军队一般军事技术知识到注意探讨国家战略问题，由围绕谕令循规蹈矩到针对时弊直率陈词的发展过程。如最早的军事刊物《武备杂志》，其“学术”栏中大量刊载的主要是对步、炮、骑、工、辎各兵种基本条令、条例、技术和战术方面的介绍性文章，而且多为仿日之作或出自日本教习之手。而《南洋兵事杂志》创刊后，其军事学术文章数量之多，针对性之强，都超过了《武备杂志》，论述问题的方法和深度也有了较大提高。比较集中的议题，是评述日俄战争的经验教训，以及由此推论中国的军备建设。在《日露战役炮兵用法之决论》一文中，作者认为：“炮兵者，军队之骨干也”。对炮兵的使用不当，是导致俄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作者指出：俄国往

---

① 《武备精神教育大义》，《武备杂志》第 19 期。

② 徐绍桢：《精神讲话》，《南洋兵事杂志》第 6 期。

③ 四毋：《将校教育论》，《南洋兵事杂志》第 1 期。

④ 武士：《说将才》，《武学》第 2 期。

往将炮兵分散配置，虽利于隐蔽，但指挥联络困难；日军则多集中火炮形成炮兵集团，火力猛，且便于统一指挥。所以，俄军“终归于败者，非炮兵战之罪也，无联络焉，无掩护焉，若之何其不败？”①《武学》杂志发表的《呜呼战败后之俄罗斯》一文，则从政治和战略角度分析了俄国战败的原因。作者认为，18世纪以来，俄国不断向外扩张，三割波兰，威迫土耳其，席卷西伯利亚，攫我旅顺，占我东北，又窥伺我内外蒙古。然而正当它锐意经营“满洲”之日，即日本用心计算俄国之时。日政府不惜巨资派遣间谍，侦察敌情，对俄国政治腐败状况和军队之弱点了如指掌，并进行了充分的有针对性的战争准备。俄国则恰恰相反，政治腐败，军事落后，既不懂现代复杂技术，又暗于各兵种战略战术，因而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②

日俄战争后，俄国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扩张，其矛头从我国东北转向西北。各家杂志纷纷刊文，分析沙俄动向，并为西北边防献计献策。《军华》杂志指出：“俄国自战败后，上下惊惧，知徒大不足以为强，虚威不足以致胜，尽其全力而图振作。首改君主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以融和国民之心，其他如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均从事于根本改善，以企达祖先所传来侵略政策最终之目的”。作者对俄中两国作了比较后指出：俄国重视总结战败的经验教训，而中国战败后却无人过问；俄人战败后知耻而图振作，中国任人宰割却毫无感触。故作者断言：“俄国人虽为败军之将，然犹未可以轻视之也。将来侵我边疆，蹂躏我西北者，即此败军之将，未可知也。”③ 另有《对于西北边防之研究》一文，则更尖锐地揭露了沙俄侵略我国蒙古西藏的阴谋。指出：自近东问题解决后，沙俄南下以出黑海之策受阻，因波斯问题与英国冲突，中亚方面又不能得逞，而日俄之战，通过中国东北东出太平洋的企

---

① 陶叔懋：《日露战役炮兵用法之决论》，《南洋兵事杂志》第7期。

② 参见杨曾蔚：《呜呼战败后之俄罗斯》，《武学》第1、2期。

③ 何澄：《战败后之俄国近状》，《军华》第3册。

图也成了泡影，于是“不得不转其锋于蒙古，是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沙俄苟攫蒙古而有之，则东可抗制日本，南可越长城而席卷我中原。此外，俄国“窥伺西藏、印度之心犹炽，尤不得不预植其势力于西蒙古新疆各处以为将来之地”。于是作者疾呼：“今而后，大漠南北，行见哥萨克马蹄之蹂躏不远矣！”① 果然不久，沙俄便趁中国“内乱”，策动外蒙实行“独立”，把外蒙古实际上从中国版图上割离出去。

有的文章还对近代中国的一些战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各个侧面总结失败的教训。如对中日甲午战争，何澄撰文指出：许多人把失败“归罪于筹备之不善，命令指挥之不统一，将帅士卒之不用命”，实际都没有点到问题的实质。“盖战争之胜败，纯以学术优劣为标准。我国昔时筑垒购舰，固不遗余力，然运用纯物质之学术，未能深于研求。故舰垒虽称坚固，而深通学术之将帅竟乏其人”。作者还尖锐批评水师学堂“教育偏重于形质，故出其门者，虽航海、测量、天文、气象等学尚有心得，至于指挥舰队战斗之术，乃未之多闻而熟习”。②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技术领域也有了许多重大突破。飞机、潜艇、坦克、新式重炮等新式兵器的相继问世，使战争的样式大为改观。因此，介绍新兵器的运用和研究新的作战方法，成为各国当务之急。清后期军事刊物也适应这种形势，注意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军华》第一期就以相当篇幅详细介绍了美、英、法、德、日等国研制出的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飞机，并展望飞机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最后指出：“我国军事之不进步，由于无潜心军事之学子，往往人弃我取，瞠乎其后。今飞行机之新术出现，直可谓军界之新纪元。”③ 这表明当时军事学术的研究已经着眼于世界，着眼于发展，出现了积极

---

① 镇仑：《对于西北边防之研究》，《军华》第 2 册。

② 何澄：《新海军基本战术》，《军华》第 2 册。

③ 军华记者：《空中战斗之将来》，《军华》第 1 册。

探索未来战争的新现象。

此外，各刊都开辟了“军事调查”或“军事要闻”之类的专栏，分国内和国外之部。国外之部主要介绍俄、德、日、英、意、美等国军事动向、军队编制、军事演习、军事将领的更迭、各类新兵器的发明和运用情况等。国内之部主要介绍各省新军的编练、旧军的改编、政府军事计划及中央、地方军事将领的变动等。这对于清军将领及时了解国内外军事形势，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思考学术问题，都有很大帮助。

第二十七章　辛亥革命战争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和发动的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战争。这次战争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纪元，影响极为深远。本章着重就起义的特点和战争指导方面的得失加以探讨。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武装斗争

一、民族危机加深，阶级矛盾激化

经过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图谋。于是，列强转而扶植清廷，行“以华治华”之策。它们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以扩大在中国开辟商埠、增加投资、开矿设厂、修筑铁路、内河航行等特权。与此同时，为了划分势力范围，列强之间的争夺更加激烈。1904年，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英国为与沙俄争夺中亚，派兵入侵我国领土西藏；德国为向长江流域扩张，提出了“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一带的要求，并从青岛派遣炮舰经长江口驶入鄱阳湖，鸣炮示威，英舰亦接踵侵入长江。其后，欧洲列强为了准备重新瓜分世界的大战，不得不调整彼此间的在华关系。1907年，日法、日俄、英俄相继订立协定，其中贯穿着暗中瓜分中国若干地区的阴谋。深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爱国热忱。

然而，在民族危机面前，腐朽的清政府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

支持，竟任其驱使，实际上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为了抑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清廷自 1901 年发布所谓“变法”上谕之后，又接连颁布推行所谓“新政”的法令。“新政”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练兵。为了编练一支数目可观的新式陆军，清政府将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于广大人民群众身上，名目繁多的税捐不下百数十种，结果更加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如火如荼的群众反抗斗争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尤以两广、两湖、川、浙等省为烈），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及其政党的成立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独立的阶级，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一大批先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向西方学习，创立报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并纷纷成立革命团体（政党），比较著名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①。它们主张用暴力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拓道路，反映了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上层因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密切，虽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但不愿与清王朝彻底决裂，希望实行君主立宪，以取得参政权。

1905 年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把革命运动推向高潮，急需将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恰在这时，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东京，经与黄兴等人共同协商，促成了兴中会、华兴会与其它革命团体的联合，于 1905 年 8 月 20 日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

---

① 兴中会于 1894 年由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于 1904 年分别在长沙、上海、武昌创立，主要负责人分别为黄兴、蔡元培、吕大森等。

兴为庶务，并决定暂设总部于东京，国内外分设支部，支部之下设各省区分会。会议还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和共同纲领，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和黄兴都组织和领导过反清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后，除了发展组织，建立宣传阵地与改良派论战外，立即把发动武装起义列入最重要的议事日程。组织武装起义，首先要确定发难的地点和指导战争全局的军事战略。由于同盟会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对起义地点的选择存在较大分歧，黄兴和孙中山曾为此进行过争论。黄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孙则主张以广东为首义地。最后终于统一了思想，即从两广发难，先建立根据地，而后挥师北伐，推翻清王朝。孙中山认为，发难地点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①。选择两广为发难地点，基本上符合上述要求。

第一，广西在1902年爆发过声势浩大的群众武装起义，持续三四年之久。最后虽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但斗争火种并未熄灭，不少起义队伍退至中越边界和越南境内。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清情绪，是同盟会可以利用的一支现成的武装力量。

第二，广西军界中有一些革命激进分子担任了重要职务（如蔡锷任随营学堂总办），其中有的人与黄兴不仅是同乡，而且是旧交，便于联络内应。

第三，两广与港澳、越南毗邻，便于得到众多华侨的支持，利

---

①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下同），第一卷，第184页。

于人力、物力的接济。

发难地点确定之后，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决定以夺取城市为目标，以运动会党为重点，积极开展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首先派人在香港建立同盟会分会，具体负责两广边界起义的组织工作。接着，他又亲赴越南从事筹饷活动，并会见了广西游勇起义领袖王和顺，将其吸收为同盟会会员。黄兴则潜入广西，进行武装起义的具体策划。

在同盟会的领导和政治号召下，从1906年起，各地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斗争。

萍浏醴起义 1906年底，正当同盟会在两广积极筹划武装起义的时候，湘赣边界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萍浏醴起义。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势力雄厚，清朝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当年，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回到湖南，联络会党，宣传革命。刘留在长沙进行活动，蔡前往萍乡，策动哥老会首领龚春台等成立“洪江会”，设总机关于浏阳麻石，势力迅速发展到萍乡、宜春、万载、浏阳、醴陵各县，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底清朝官府封印后发动起义。后因清军突袭麻石，起义总机关被抄封，会党首领李金奇等多人先后遇害，形势十分紧急。12月2日，龚春台、蔡绍南召集各路首领于萍乡高家台商讨对策。龚、蔡等认为军械不足，主张稍缓起义，等待外援，一部分人则认为会众已有10余万人，完全可与清军决一胜负，双方争执不下。次日，会党二三千人于麻石宣布起义，迫使龚、蔡二人不得不通知各路同时举事，于是，从12月4日开始，萍、浏、醴起义全面爆发。旬日之间，起义武装发展到3万余人，声势浩大，屡败清军。清政府急调湘、鄂、赣等省军队数万人四面围剿。起义武装与敌奋战近月，终以寡不敌众而失败。加之这次起义举事仓促，思想分歧，各股蜂起，号令不一，事前既无周密统一的计划，举义后又没有提出继续战斗的明确目标，而且武器严重不足，又缺乏训练，因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这次起义对革命党人是个极大的鼓舞，对清廷是个极大的震动。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东京得知此次起义消息后，

立即派出一批同盟会员赶回国内，在湘、赣及其相邻各省活动，企图扩大起义成果。但在清政府的严密戒备下，不少革命党人被捕下狱，不少革命组织遭到破坏，使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一时难于迅速恢复和发展，从而更加促使革命党人加强经营两广的决心，以推动武装起义高潮的到来。

钦廉潮惠起义 萍浏醴起义后，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遂在河内设立机关，加强在华南组织武装起义的领导。他计划于广东钦州（今属广西）、廉州、潮州、惠州等地同时举义，以成浩大之声势。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实际上只形成几次旋起旋落、互不联系的孤立起义。1907 年春，同盟会会员许雪秋派人在饶平县联络三合会众，于 5 月 22 日夜攻入潮州黄冈（今饶平），不久失败，是为潮州黄冈起义。同年 6 月初，同盟会会员邓子瑜和会党首领陈纯等于惠州七女湖率众起事，以响应黄冈起义。起义军与清军激战旬余，使敌疲于奔命。由于黄冈起义失败，钦廉各处又未响应，且缺乏弹药，起义队伍不久被迫解散，惠州七女湖起义宣告失败。之后，孙中山仍寄希望于钦廉起事。当年春，钦州三那（那黎、那彭、那桑）地方人民开展抗捐斗争，遭清军血腥镇压，群情激愤。三那人民派代表前往河内，请援于孙中山。孙派同盟会会员王和顺深入该地进行策动。王和顺一心指望时已移驻钦廉地区的清军郭人漳部反正，于三那附近徘徊数月之久。直至当年 9 月，王才率领 200 余人起义于钦州王光山，并攻占防城，旋进军钦州，因郭人漳变卦未能入城，便临时决定袭取灵山。结果猛攻灵山不下，防城反被郭人漳部清军夺占，加之饷械不继，这次钦州防城起义又告失败。起义军一部解散，一部退入十万大山。

皖浙起义 在同盟会领导钦廉潮惠起义的同时，1907 年 7 月，在安徽发生了光复会会员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同盟会成立后，作为原光复会领导人之一的徐锡麟因意见分歧，未加入同盟会，仍以光复会名义进行革命活动。为打入清政府内部，他纳粟捐官，以道员分发安徽候补，充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与光复会和同盟会会员、浙江绍兴大通学堂（时为光复会据点）

督办秋瑾约定，于浙、皖两省同时起义。1907 年 6 月，绍兴等地会党暴露目标，徐锡麟乃于 7 月 6 日仓卒起事，借安徽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并率学生军 30 余人夺占安庆军械所。后失败被捕，英勇牺牲。随后，清政府派兵包围绍兴大通学堂，秋瑾和少数学生持械抵抗，失败被捕，于 7 月 15 日凌晨慷慨就义。

镇南关、上思、河口起义　钦廉潮惠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仍未放弃原来计划，并将策动起义重点转向广西和云南。1907 年 12 月 2 日，孙中山任命的镇南关都督黄明堂（同盟会会员）等率乡勇 80 余人，在守兵内应下，一举夺占镇南关炮台。次日晚，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亲临炮台巡视。起义军本以为夺占炮台后可以获得大量军械弹药，结果成为泡影，最后在优势清军围攻下，退到越南燕子大山。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当局不允许孙中山继续在越南活动。孙中山离越前命黄兴深入钦廉地区再次策动起义，令黄明堂规取云南河口。1908 年 3 月，黄兴率旅越青年 200 余人（号“中华国民军南军”）进入钦州地区。3 月 29 日和 4 月 2 日，于小峰、马笃山等地连败清军。不久，起义队伍发展到 600 余人。钦廉道龚心湛率郭人漳部数千人进行堵截。起义军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 40 余日（故称“钦廉上思起义”），终因弹尽援绝而败退越南。同年 4 月 30 日，黄明堂、王和顺等率领的会党群众 200 余人（一部分人参加过镇南关起义）由越南进入云南，在清军反正部队配合下，一举攻克河口，收降兵数千人，缴获大批枪械。起义军乘胜分兵北上，连克南溪、新街，直逼蛮耗、蒙自。但由于粮饷不济，士气动摇，势难继续发展进攻。孙中山派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赶到河口指挥，仍无法挽回局势。清云贵总督锡良调兵三路反扑，起义军与敌相持 20 余日，终以弹药告罄，先后败退。5 月 26 日，河口失守，黄明堂等率 600 余人退入越南，后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送往新加坡遣散。

至此，1907 年 5 月至 1908 年 4 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这些起义共同的特点是主要依靠会党力量，而没有深入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

长期艰苦的战斗。会党群众大多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因而容易接受革命党人的反清宣传。可是，会党成分复杂，纪律松弛，缺乏真正的革命觉悟和明确的政治方向，加之饷械不足，缺乏训练，在武装起义中虽然可以造成一时的声势，但难以持久，一遇挫折，往往各行其是，不服从统一调动，甚至发生打家劫舍、战场哗变等现象。通过实践，许多革命党人认识到依靠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器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①。因此，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把组织武装起义的重点转向运动军队，特别是运动新军。新军士兵多数来自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接受民主革命的思想。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为武备学堂毕业生和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薰陶，有的还加入了同盟会或其它革命团体，以合法身份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加上新军是仿西方军制组建的一支新型武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具有较好的组织纪律性，而且多数集中驻扎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中城市，他们如投身革命，将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主力军。因此，革命党人把组织武装起义的重点从运动会党为主转为运动新军为主，这不能不说是革命方略的一大进步。

1908 年 11 月 19 日，安徽岳王会② 骨干、新军炮营队官熊成基，利用慈禧和光绪帝新丧之机，发动马、炮营新军千余人起义。因进攻省城安庆一昼夜未能得手，伤亡甚众，便转趋庐州（今合肥市），未至而部众渐散，起义归于失败。安庆新军起义虽然未获成功，但以铁的事实证明，新军是完全可以为革命所用的，从而使同盟会和革命党人增强了运动新军的信心。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不久即出现了一个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

广州新军起义　1909 年（宣统元年）秋，黄兴等在香港设立

---

① 李廉方：《辛亥革命首义记》，湖北通志馆 1947 年铅印本，第 3 页。

② 岳王会系清末安徽的秘密革命组织，1905 年 2 月由芜湖安徽公学教员陈独秀、柏文蔚等人发起成立，以反清为宗旨，以军事学堂学生及新军官佐为主要联络对象。

领导机关，准备于广州发动起义。当时，广州新军中加入同盟会者已达3000余人，计划于翌年元宵节后起事。1910年2月，因军警冲突，风声日紧，广州新军炮兵排长、同盟会会员倪映典恐起义消息泄露，遂于12日击毙管带齐汝汉，提前宣布起义。13日晨，倪映典等率起义新军千余人向广州城进军，行至牛王庙时，遭敌暗算，倪中弹牺牲，起义军伤亡百余人，终因缺乏子弹而失败。

黄花岗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不少同盟会会员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孙中山却仍然满怀信心，于同年11月在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召集会议，决定在广州再次举义。会后孙中山立即派人分赴海外各地筹款购械；着手组织“选锋队”（敢死队）；在香港设立统筹部，由黄兴、赵声任正副部长；在广州建秘密据点，以策动新军、防营和会党，积极进行起义准备。1911年4月上旬，各项准备即将就绪，统筹部召开会议，制订了十路进攻方案，由赵声任总司令，黄兴为副，并定于4月13日发难。后因饷械未齐，且突然发生了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清方有了戒备，起义被迫延期。4月25日，黄兴赶至广州，于小东营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决定于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晚正式起义。这时，传来新军枪机被缴、清军源源调来省城的消息，接着广州多处秘密机关遭破坏，许多革命党人要求改期，黄兴只得“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被捕之祸”①。旋得知新调防营中潜有革命党人准备响应起义，又决定按期举事，但人员已无法集齐，遂将十路进攻计划改为四路：黄兴负责攻总督署，并拟生擒两广总督张鸣岐，用其名义号召两广清军反正；姚雨平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防营入城；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守大南门。27日傍晚，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从小东营出发，攻入总督署，因张鸣岐已逃，遂纵火焚署，率队出东辕门，恰与水师提督李准的卫队遭遇。黄兴右手两指被敌击断，仍坚持指挥战斗。随后，黄兴将队伍分为三部，分别

---

① 黄兴：《致海外同志书》，见《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同），第41页。

前往配合其余三路作战。然另三路根本没有发动，胡毅生、陈炯明已逃出广州，姚雨平因未领到枪械藏匿未出，实际上只有黄兴一路孤军奋战。经一昼夜英勇战斗，起义军大部牺牲，黄兴、朱执信等化装逃往香港，起义遂告失败。这次起义先后牺牲80余人，后有72具遗骸被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起义尽管存在不少弱点和错误，但在民族危亡关头，革命党人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们的英雄事迹，对全国人民起到了极其巨大的激励作用，从而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它如一声春雷，预示着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辛亥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第二节　武昌起义与汉口、汉阳保卫战

一、起 义 准 备

新军的接连起义，引起清廷的极大震惊，乃严令各省督抚加强防范。各省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工作最有成效的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逐渐演变，于1911年初正式成立的。其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①。文学社成立后，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在新军中有社员约3000人。共进会为同盟会的派生机构，系由原籍长江中下游的同盟会员组成，早年成立于东京，后在汉口设立机关，发展组织，先以联络会党为重点，后转向新军，到1911年会员已发展至2000余人。文学社和共进会在策动新军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长期深入士兵之中，以各种形式（如秘密散发革命书刊、组织讲演会、个别谈心、编唱歌曲等）宣传革命道理，揭露清廷黑幕，启发新军官兵的爱国思想。在组织工作中，注意严

① 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回忆》，见《辛亥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下同），第一辑，第119页。

格手续，保证组织纯洁；按新军建制，各级推选代表参加会议、研究情况、部署工作，既加强了领导，又便于起义时指挥战斗；平时进行活动，均按秘密工作原则，实行单线领导，防止敌人破坏。经过湖北革命党人的长期努力，革命力量日益壮大，该省新军1.7万余人中约有1/3参加了文学社或共进会，但两个革命组织之间存在着门户之见，急待联合。

黄花岗起义后，全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裁撤军机处，成立了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大权集中于皇亲贵戚手中，引起汉族官僚的普遍不满，各省督抚日益离心。资产阶级立宪派要求参政的希望成为泡影，许多人转而同情和支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皇族内阁”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商办铁路公司，准备将筑路权重新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卖国行径，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四川同盟会与哥老会组织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攻占州县，形成群众大起义。吴玉章（吴永珊）、王天杰等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揭开了辛亥革命战争的序幕。清政府为扑灭四川革命火焰，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一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在四川保路斗争的鼓舞下，各省革命党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准备武装起义。宋教仁、谭人凤、陈英士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推动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运动。1911年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在中部同盟会的促进下联合，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由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任总指挥，共进会会长孙武任参谋长。由刘公任总理，负责文告、印信、旗帜、符号及制造炸弹。同时，派人往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等来汉主持起义。黄兴在香港得知湖北形势后，立即致电在国外的孙中山，提出了“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的起义方针，认为如此则“大事不难一举而定”①，并

①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46页。

请求迅速筹款接济。

经过紧张的筹备，起义准备工作很快基本就绪。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联合召开骨干会议，决定于中秋节（10月6日）举行起义，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并给各标、营规定了任务：

（一）混成协辎重队和工程队负责在塘角放火作为发难信号，并掩护该协炮营占领凤凰山炮台及青山，拦击清海军舰船。

（二）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负责攻占中和门内楚望台军械库，并占领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

（三）第八镇二十九标和三十标一、三营以及测绘学堂学员见信号后立即赶赴楚望台，会同工程第八营进攻总督署。

（四）第八镇炮兵第八标在三十二标（留守部队）掩护下，从中和门进城，在楚望台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署轰击。

（五）第八镇及混成协的骑兵，负责城外警戒和通信联络。

（六）第八镇三十一标和混成协四十一标（留守部队）负责攻占蛇山，掩护炮队占领发射阵地。

（七）混成协四十二标驻汉口的部队负责攻占武胜关，驻汉阳的部队负责控制兵工厂和占领龟山炮台。

（八）宪兵营的起义者负责侦察官方情报及军事要点情况，随时报告起义总司令部。

同时，派人通知湖南的焦达峰，请他按成约响应。

不料，会议当天发生了南湖炮队少数革命士兵反抗长官压迫的暴动，湖广总督瑞澂因不明底细，未敢深究，但引起了警惕。这时，革命党将要起事的浮言四起，瑞澂也得到革命党人潜行来鄂的消息，心中甚为惶恐。10月3日，瑞澂召集首县（即督抚衙门所在县）及管带以上文武官员紧急会议，部署防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两个营已随端方入川，第四十一标及二十九标的几个营又调往宜昌、襄阳、郧阳、岳阳等地驻防，留防武汉的新军仅有一半。瑞澂预感到新军不稳，严令第八镇统制官张彪、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督率所部日夜巡逻；急

调巡防队3营来省协防，驻守督署与附近街道；任命前标统李襄邻为督署稽察官，统一指挥卫队及增防部队，保卫督署；加派人员对楚望台军械库进行监守；取消中秋假日，严禁士兵出营，并收缴士兵子弹；命军舰升火游弋江面。

鉴于"南湖事件"之后清军加强了戒备，湖南策应起义准备工作尚未就绪，黄兴来汉尚无定期，孙武等人决定延期起义，并派人催促随队前往岳阳的蒋翊武速回武汉。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入医院，其他人员仓促转移。俄国巡捕闻声赶到，搜去名册、文告、印信等物，并转交总督署。瑞澂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搜捕革命党人。当天，蒋翊武从岳阳赶回武昌起义总机关，在得知宝善里出事后，决定当晚12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发动起义，并按原计划重新下达了命令。不料，杨宏胜在往工程第八营运送炸弹时被捕，傍晚，起义总机关被军警包围，刘复基、彭楚藩被捕，蒋翊武乘隙逃脱，潜离武汉。由于敌人戒备森严，负责向南湖炮队传递命令的邓玉麟亦未完成任务，结果炮声未响，各标营均不敢贸然行动，当晚起义的计划遂告流产。

10月10日清晨，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被害，不少革命党人相继被捕，武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二、武昌首义及各省响应

瑞澂于10月9日晚采取镇压措施后，急忙电奏清廷，称他"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①] 他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由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工作比较扎实、隐蔽，组织未遭破坏。

---

①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广总督瑞澂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请代奏电》，《辛亥革命》（五），第289～290页。

在生死存亡关头，工程第八营党代表熊秉坤与各队代表商妥，约定于10月10日晚点名时，以鸣枪三声为号，按计划发起武昌起义。（参见附图32）

当晚，熊秉坤将收集到的数盒子弹分发各同志，击毙了反动军官，随即连放三枪①，并急率数十人直奔楚望台军械库。该库不仅集中存有从各标营收缴的子弹，还储有从国外购买的步枪两万余支、汉阳造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军一举夺占该库，对保证武昌起义的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工程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后，陆续集合200余人。因熊秉坤缺乏指挥经验，遂举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立即部署了军械库的防务，并派兵夺占中和门以迎接炮队入城，切断敌人的电话线，分占四周要道。与工程第八营同时举义的还有驻塘角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其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并按各自的任务积极行动起来。先后参加起义的约有3000人，但大多分散于各地，到楚望台集中的仅有七八百人。吴兆麟与熊秉坤、蔡济民等商议，决定趁夜分三路向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以防清军于天明后反扑。起义军的进攻部署是：第一路从紫阳桥经王府口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侧后；第二路经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翼侧；第三路从津水闸经保安门正街进攻督署前门。同时，传令炮兵迅速占领中和门及蛇山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击。预备队在楚望台待命。

瑞澂得知起义消息后，急调辎重第八营入城加强督署的守卫，加上原有的巡防队、教练队、武装消防队、骑兵队、机关枪队（4挺）及督署卫队、警察等，总兵力约3000人，主力布防于长街及保安门正街，前沿伸至南楼、阅马场、紫阳桥、津水闸一带。

晚10时30分，起义军开始进攻。由于兵力有限，加之不明敌情，炮队尚未进入阵地等原因，部队在紫阳桥、津水闸遭敌火力猛烈射击，伤亡较大，前进受阻。一部起义士兵退回了楚望台。

---

① 一说是士兵程正瀛（共进会会员）放的首义第一枪。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起义军大炮突然开始射击，士气大振。晚 12 时后，起义军发起第二次进攻。第三路一部士兵转至大朝街，威胁紫阳桥守敌侧后，迫使敌人退却。第一路乘势突破敌人防线，向督署进逼。这时，第二路也进至水陆街西口，接近督署。第三路战斗最为激烈，起义军进至恤孤巷时，遭敌伏击，前进受阻。张彪又亲自指挥辎重第八营进行反攻，起义军处境十分危急。率领第三路的熊秉坤组织 40 余人的敢死队，向前猛冲；另一部攀登保安门城墙，沿墙西进，配合敢死队上下夹攻，迫使保安门正街守敌节节败退。敢死队冒死冲入督署大堂，并纵火焚烧。这时，第一、二路已占领第八镇司令部，包围了督署，并在王府口、小都司巷等处放起熊熊大火，使炮兵射击更加准确。企图顽抗的清军见大势已去，纷纷投降，起义军遂占督署。张彪率残部逃往汉口刘家庙。在此之前，瑞澂已从后墙凿洞逃至“楚豫”号军舰，驶往下游。次日黎明，武昌城内各官署、城门均为起义军所控制，革命党的十八星大旗飘扬在黄鹤楼上，宣告武昌首义胜利。

10 月 11 日上午，驻汉阳的混成协第四十二标一营革命党人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立即与驻汉口的二营取得联络，约定于当晚 8 时 30 分同时举义。是晚，一营起义者未遭任何抵抗，迅速占领了汉阳兵工厂，并拖炮布防于龟山，控制了整个汉阳。与此同时，二营革命党人亦率众起义，并向刘家庙发起进攻，后得知河南清军援汉部队已抵郊外，遂退守大智门。至此，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占领。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政权，以推动革命继续前进。10 月 11 日上午，革命党人聚集于咨议局，讨论建立军政府，由于起义领导人不在场，黄兴等又未来汉，到会者都资浅不孚众望，因此，当有人提议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时，被革命党人一致通过。黎出任都督，改变了起义队伍群龙无首的局面，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作用，但也埋下了旧势力排挤革命力量的隐患。军政府成立后，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帝年号，发布檄文，声讨清廷罪行，号召各省人

民起义，并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法令，要求外国政府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同时，电催黄兴等赶紧来鄂，并请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湖北各地革命党人纷纷举兵响应，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各州县几乎全为起义的新军和会党势力所控制，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武昌起义的成果。武昌起义在全国各地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形成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最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10 月 22 日，焦达峰按约发动新军和会党攻占长沙，成立湖南军政府。随即下令扩军，并先后派王隆中、甘兴典各率步兵一协赶赴湖北，支援武汉革命军，使首义地区增强了抗清实力。同日，陕西新军和哥老会发动起义，占领西安，建立了陕西军政府。接着，江西、山西、云南、贵州、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先后宣布独立。然而，在已独立的省份中，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有的是投机革命改换门庭，有的由立宪派掌握实权，有的虽为革命党人掌权，但其中一部分人很快又变成了争权夺利的政客。尽管如此，各省的独立，毕竟极大地孤立了清政府，壮大了革命声势，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

三、汉口、汉阳保卫战

（一）双方作战部署

瑞澂逃离督署后，慌忙电奏清廷："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①。清政府得知武昌起义消息，极为惶恐，立即宣布将瑞澂革职，命陆军大臣荫昌为钦差大臣，率北洋陆军两镇星驰赴援，并节制湖北各军。同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率

① 转引自《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上谕》，见《辛亥革命》(五)，第 291 页。

领舰艇十余艘驶赴武汉江面，配合陆军作战。在河南信阳设立总粮台，负责后勤补给。因铁路运输能力有限，清军从10月13日起分批南下。清政府深恐北洋军不听荫昌指挥，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令其为湖广总督，负责“督办剿抚事宜”。与此同时，清政府决定将北洋六镇及禁卫军编组成三个军。第一军以荫昌为军统，由赴鄂之陆军第四镇及第二镇的混成第三协、第六镇的混成第十一协编成，遂行南下作战任务。第二军以冯国璋为军统，由陆军第五镇及第三镇的混成第五协、第二十镇的混成第三十九协编成，随时听候调遣。第三军以载涛为军统，由禁卫军及陆军第一镇编成，负责守卫京畿。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为了保卫新生政权，迅速进行扩军，数日内即编成步兵5个协、骑兵1个标、炮兵2个标、工程和辎重各1个营、敢死队4个大队，总兵力达2万余人（以后随战事的发展，又续招步兵3个协、骑兵和炮兵各1个标、工程和辎重兵各1个营）。革命军的作战部署是：吴兆麟的第一协驻守汉阳；何锡藩的第二协驻守汉口；成炳荣的第三协驻守武昌城外两望山至青山一带；张廷辅的第四协驻守武昌；熊秉坤的第五协驻武昌为预备队。骑兵、炮兵分隶各协指挥。军政府得知清军南下消息后，决定在其主力未到达前，“先击攘汉口之敌，逐次向北进攻，以阻止清军南下”①。

位于汉口市区以北5公里处的刘家庙，是京汉铁路上的一个小镇。它右临长江，左边为洼地及大赛湖，是清军沿铁路进入汉口市区的唯一通道，也是革命军保卫汉口的前哨阵地，因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双方必争之地。据守刘家庙的清军有张彪残部及前来增援的湘、豫两省巡防营，共2000余人。清军企图固守既有阵地，配合南下清军反攻汉口。军政府令步兵第二协担任主攻，另配属骑兵1营、炮兵1标（欠1营）、工程兵1队、敢死队

---

① 《湖北军政府都督命令》，《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版，第122页。

2 个大队，共 4000 余人。以第五协为预备队，并将步兵第一协的 1 个标移驻汉口，负责弹药接济。争夺刘家庙的战斗揭开了汉口保卫战的序幕。

（二）保卫汉口之战（参见附图 33）

10 月 18 日黎明，革命军在炮兵支援下，从汉口大智门向刘家庙发起进攻，与清军展开肉搏。因后续部队遭到敌舰炮火拦击，未能及时投入战斗，以致进攻受挫。上午，第一协的一队士兵突然发起攻击，冲入敌阵，迫使守军一部动摇后撤。该队乘胜追击，孤军深入，遭敌前后夹击，被迫后退。午后，革命军调整部署后再次发起进攻，因新兵不善利用地形，进展迟缓。敢死队立即投入战斗，炮兵一部则向敌右翼阵地猛烈轰击。南下清军先头部队派步兵 1 标、炮兵 1 队乘火车急赴刘家庙增援。预伏于铁路两侧的工人、士兵立即将路轨拆毁，使列车倾覆。革命军乘势冲锋，重创敌军。清军立即派兵一部，从姑嫂树迂回革命军侧后，妄图阻止革命军前进。

19 日晨，革命军派兵一部阻击敌之迂回部队，以 3000 人从正面发起进攻。清军依靠舰炮支援，顽强抵抗。战至中午，清舰弹尽，革命军乘机加强两翼攻势，清军弃阵窜入棚户顽抗。革命军敢死队立即组织火攻，清军无法立足，向三道桥退却。革命军占领刘家庙，并追至三道桥而止。

刘家庙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革命军的士气，同时也助长了轻敌情绪。当夜，军政府调第四协增援汉口，令第五协接替武昌防务，并决定继续发起进攻，击退滠口之敌，直取武胜关。前线指挥官何锡藩根据南下清军逐渐向祁家湾、滠口集结的情况，主张利用三道桥以南有利地形设防固守，结果被少数人斥为胆怯。10 月 22 日，敢死队副队长徐少斌自告奋勇率队向三道桥进攻，结果中弹牺牲，部队伤亡惨重。第二天，革命军以第二协担任主攻，第四协助攻，对三道桥再次发起攻击。第二协第四标统带谢元恺率队冲至三道桥北端，突遭敌机枪猛烈扫射，进退维谷，伤亡甚众。于是，军政府决定暂取守势，令部队在三道桥以南加紧构筑工事，转

入防御。由于何锡藩引咎辞职，军政府任命张景良① 为汉口前线指挥官，给尔后的作战带来极大的损失。

这时，清军主力已到达前线，共约1.5万人，准备夺占刘家庙，向汉口发起进攻。革命军在二道桥一带以第二、第四两协担任一线防御，总兵力约1万人。10月23～25日，双方积极进行战前准备，未发生大的战斗。

10月26日晨，清军水陆协同，发起大规模进攻。潜至谌家矶的数艘军舰突向三道桥以南革命军阵地实施火力急袭，革命军猝不及防，牺牲500余人。清军乘机越过三道桥向前猛攻，革命军退守大智门。正当激战之际，张景良不知去向。下午，谢元恺主动组织部队反攻，与敌展开肉搏，夺回刘家庙，追至造纸厂而止。军政府命新编第六协接管武昌防务，以第五协及第一协一部增援汉口，拟于次日乘胜前进。

27日凌晨，清军以更大兵力先期发起进攻，革命军依托阵地顽强抵抗。但张景良既不亲临前线指挥，又不给部队及时补充弹药，以致伤亡过大，刘家庙得而复失，清军逼近汉口市区。这时，清廷已召荫昌回京，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指挥汉口战事，以冯国璋接任第一军军统，赴汉口督战，以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

28日上午，清军继续沿铁路向大智门猛扑，革命军与敌反复争夺，终因后援不继，退守歆生路一线。在激战中，谢元恺及敢死队队长马荣先后牺牲。前线指挥乏人，革命军士气开始涣散。军政府几易前敌将领，均未就任，情况十分危急。当天下午，黄兴、宋教仁等抵武昌，会晤黎元洪，毅然应承指挥汉口军事。

29日，黄兴率老兵及青年学生1000余人渡江，在汉口满春茶园设总司令部，并亲赴前线视察，革命军士气为之大振。当时，在汉口的革命军尚有6000余人。黄兴组织部队分路反击，但未能阻止清军攻势。革命军依托歆生路一带房屋和树木，与敌反复争夺，

① 张景良原系第八镇第十五协二十九标统带，军政府成立时任参谋部部长，因策动黎元洪叛变，被革命党人拘留，后被黎保释。

使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

31 日，冯国璋下令焚烧歆生路一带房屋，繁华市区顿成一片火海。清军在优势炮火掩护下，逐次推进。革命军虽经顽强奋战，终于无法挽回败局。

11 月 1 日，汉口失陷，革命军退守汉阳。此次争夺汉口之战，双方各死伤 2000 余人。

（三）保卫汉阳之战（参见附图 34）

清军攻占汉口后，一时无力渡江，形成两军隔水对峙的局面。战事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双方的备战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黄兴从汉口返武昌后，受命担任战时总司令①。他立即赶赴汉阳，在昭忠祠组织司令部，部署防务。当时，从汉口退守汉阳的革命军不足 5000 人，遂将第六协调赴汉阳。不久，湖南王隆中、甘兴典二协先后抵达，防守汉阳的兵力增至 2 万余人。革命军从南岸嘴沿汉水至琴断口及三眼桥，划区组织防御。而在蔡甸方向，仅派少量部队担任警戒。由于设防没有重点，处处显得兵力薄弱。

冯国璋攻占汉口后，一面巩固阵地，一面要求袁世凯增派援军，同时筹备渡河器材，补充弹药。他决心先取汉阳，再攻武昌。这时，清军第一军主力已驻汉口，第二军主力正在孝感集结，总兵力共约 3 万人。其部署是：第四镇从正面渡汉水直攻汉阳；混成第十一协分甲乙两支队迂回汉阳翼侧（甲支队从新沟渡河，经蔡甸向三眼桥进攻，乙支队从舵落口渡河，向琴断口进攻）。为了掩护迂回部队顺利渡河，清军在汉水正面强索民船，实施佯动。经过十多天准备，清军逐步完成了进攻部署，但未敢马上发起进攻。

这时，全国形势越来越对清政府不利。在清军急攻汉口之际，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协统蓝天蔚等联名电奏“政纲十

---

① 对黄兴的任职，在军政府内曾引起一场激烈争论。同盟会及文学社一些革命党人主张黄任两湖大都督或南方民军总司令，但遭到旧官僚及共进会一些人的反对，最后达成妥协，由军政府黎元洪登坛拜将，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二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驻兵石家庄，拟与张配合起事，危及京城。清廷连忙下“罪己诏”，开放党禁，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令其立即回京组织内阁。袁世凯为了稳住北方，消除北上组阁的威胁，派人刺杀了吴禄贞，旋又解除了张绍曾的兵权。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深知，单靠武力镇压革命党已不可能，便在攻取汉口以后，立即派亲信赴武昌向军政府进行“和平”试探。袁世凯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结果被革命党人拒绝。谈判虽未成功，但袁世凯摸清了革命党人的底细。当时不少革命党人表示，只要袁世凯反正，即可得到拥戴。袁世凯为了使革命党人就范，决心进一步加强军事压力，遂令冯国璋积极准备进攻汉阳。

革命军方面，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汉阳防务的逐步加强，黄兴产生了急于规复汉口的思想。军政府内不少人认为新兵太多，缺乏训练，机枪和管退炮数量有限，敌我力量悬殊，不如以守为攻。黄兴则认为清军一部已移向蔡甸，汉口兵力单薄，正是出其不意反攻汉口的大好时机。他决心先发制人，打乱敌之进攻计划。其部署是：以湖南援军两个协及革命军第五协携炮队从琴断口渡河，攻击清军右翼，担任主攻；以革命军第四、六两协从南岸嘴渡河，攻击清军左翼，为助攻。同时派兵一部从青山潜渡长江，袭击清军后路。

11 月 16 日下午 5 时，革命军工程营在琴断口架桥完毕。当晚 10 时，主攻部队过河，分三路向汉口玉带门方向发起进攻，清军逐步后撤。次日上午 9 时，革命军推进至居仁门、王家墩一线。清军急忙派队增援，在火炮、机枪火力掩护下，向革命军发起反攻。湖南援军第二协及革命军第五协的新兵首先动摇溃奔，全线牵动。与此同时，助攻部队在敌火力封锁下，抢渡未成，青山潜渡部队也贻误了战机。黄兴只好下令撤退。这次作战，革命军损失惨重，士气受到极大的挫伤。

革命军退回汉阳后，黄兴认为清军的主攻方向仍是汉水正面，因此尽管在调整部署时增加了兵力，基本上还是沿汉水南岸设防，

分兵把口，对迂回蔡甸的清军未予足够的重视。这一错误判断，给汉阳的防御作战带来很大的影响。

11 月 20 日，清军按既定方案发起进攻。甲支队约 2000 人从新沟渡河，攻占了汉阳门户蔡甸，直逼三眼桥。次日，乙支队从舵落口浮桥渡河，很快攻占了琴断口。革命军在三眼桥连续数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敌未能前进。清军遂集中兵力于琴断口方向，向美娘山发起猛攻，于 11 月 23 日下午占领该山。革命军趁其立足未稳，实施反击，使美娘山失而复得。此时，汉口清军企图从正面强渡汉水，被革命军炮火击退。黄兴为减轻汉阳所受的压力，令步兵第三协派兵一部从青山渡江，袭击汉口敌后，结果在清军增援部队反击下，被迫退回，未能收到预期效果。24 日，清军在炮兵支援下复占美娘山，继占仙女山。黄兴令预备队陆续投入战斗。均未奏效，锅底山、扁担山、磨子山相继失守。25 日，革命军敢死队百余人乘夜进行反击，夺回磨子山。刘玉堂率领的湖南援军一标赶到汉阳，也立即投入战斗，夺回扁担山。清军集中炮火射击，刘玉堂不幸中弹牺牲，二山复失。至此，汉阳周围制高点均被清军控制，革命军已无力反击。26 日，清军进攻黑山至十里铺防线，汉口清军也渡过汉水，侧击黑山，迫使革命军纷纷退却。27 日，汉阳失陷。

汉口、汉阳保卫战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敌对双方力量悬殊，但革命军在作战指挥上亦有不少失误，诸如：胜利后未能乘胜夺占要地；占领刘家庙后轻敌冒进；临战易将，任用内奸；冒险反攻汉口；对敌主攻方向判断失误；对汉阳侧翼及制高点部署兵力不足；未能掌握足够的预备队等。尽管如此，革命军在 40 多天的浴血奋战中，表现了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为各省起义赢得了时间。

第三节　苏浙联军合攻南京

（参见附图35）

一、联军力克南京

江苏、浙江独立后，清廷仍控制着南京，危及邻省。江、浙革命党人为减轻武汉方面革命军所受的压力，发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决定联合攻取南京。

南京城内，原驻有新军第九镇7000余人，统制为徐绍桢。另有江南提督张勋统率的江防军20营，赵会鹏统率的江宁巡防军5营，王有宏统率的新防军10营，由未裁绿营及饥民临时编成的巡防军10营，江宁将军铁良新练的步兵1标及炮兵1营，分驻城内外。总兵力约2万人。

新军第九镇在革命党人的运动下，许多官兵具有民主革命的思想。武昌起义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和铁良认为新军不可恃，多方进行监视，10月31日，张人骏令第九镇限期移防秣陵关，并不予补充弹药，而对新调入城内的江防营及巡防队，则每人补充子弹500发。新军官兵愤愤不平，纷纷要求起事，但无弹药，未敢轻动。第九镇移驻秣陵关后，张勋派人刺杀徐绍桢未遂。于是，徐绍桢决心起事。他与城内巡防营及督署卫队约定，于11月8日以演习为名，同时行动，袭取南京城。由于联络不周，内应党人于前一天仓促起事，被张勋调兵镇压。徐绍桢得知城内起事消息后，于11月8日率队进攻南京城，终因弹药不足、步调不一而失败。后起义军被迫退往镇江，徐绍桢则前往上海。

这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正与江、浙军政府筹商进攻南京方策，经多方协商，决定组织苏浙联军，推徐绍桢为总司令，设司令部于镇江，设总兵站于上海。

至11月20日，参战各军已集结于镇江及其西南地区，计有：

刘之洁统率的江苏军约3000人；朱瑞统率的浙军3000余人；黎天才统率的淞军600人；林述庆统率的镇江军3000人；洪承典统率的沪军1000人。此外，还有前来会师的其它零星部队及起义海军舰艇14艘。联军总兵力约1万余人。在部队集结的同时，徐绍桢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确定了进攻南京的方针和部署：即先扫外围，夺占炮台，再攻南京城。以淞军为右翼，攻取乌龙、幕府两山炮台；浙军为中路，由麒麟门进占紫金山，向朝阳门进攻；江苏军为左翼，攻占雨花台，向聚宝门进攻；镇江军为预备队，随中路前进，攻占天保城，向太平门进攻；沪军担任警戒；海军配合陆军进攻，负责掩护、运载部队登岸；另以镇江军一部及扬州军徐宝山部进攻浦口，断敌退路。

11月24日夜，淞军配属浙军1个营，乘舰抵乌龙山，攻占炮台。次日晨，又乘胜攻下幕府山炮台，革命军当即发炮轰击敌北极阁司令部及狮子山炮台，清军慌作一团，水师营参将率战船40艘归顺，下关东西炮台守军亦降。同日，浙军在马群连续突破清军防线，毙敌将王有宏，重创敌军，继占孝陵卫，前出至紫金山一线。26日，清军数千人向幕府山、孝陵卫反扑，均被联军击退。当天，江苏军亦进逼雨花台。28日，浙军在火力掩护下，向朝阳门发起攻击，多次掷放炸药轰城未果，并遭到天保城清军炮火袭击，伤亡多人。江苏军进攻雨花台亦失利。联军吸取第一次攻城的教训，决定集中兵力先取天保城。天保城位于紫金山半山腰，地势险要，有炮10余门、机枪4挺，由江防兵1个营及旗兵400人防守。30日，联军向天保城发起攻击，遭敌火炮和机枪射击，伤亡众多，无法前进。随后，联军组织敢死队从东、西两侧同时发起进攻，清军不支，假示投降。联军被骗，死伤百余人。革命军官兵愤极，冒死前进，经一夜激战，全歼天保城守敌。与此同时，江苏军亦攻占雨花台，于是南京城郊制高点全为联军所控制。12月1日晨，联军用缴获的大炮向朝阳门、富贵山、太平门等处轰击，清军顿形动摇。张人骏、张勋等连夜逃遁。12月2日，联军进据南京城，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与北伐的夭折

武昌起义后，全国响应，形势发展迅猛，急需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然而，由于革命党内派系分歧，形成了湖北与江浙两大集团，为了争夺权力，对临时政府人选和所在地问题彼此争论不休，互不相让，致使临时政府难产。

北洋军攻占汉口、汉阳后，已师老兵疲，一时无力发动进攻。袁世凯为了达到扑灭革命的目的，便施展诱和伎俩，通过英国驻汉领事戈飞出面调停，提出停战议和的建议。湖北军政府竟然接受。当时在国内的某些革命党领导人，对袁亦心存畏葸和幻想，在妥协势力包围下，表示同意和谈。多数革命党人则反对议和，主张组织北伐军，用武力统一南北，但他们的意见不占主导地位，无法阻止和谈的进行。12 月 18 日，南北双方代表于上海开始和谈。在袁世凯的胁迫和帝国主义的干预下，南方代表表示，只要袁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就可推举他为大总统。恰在此时，孙中山于 12 月 25 日从海外回到国内，29 日即被独立各省代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确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对袁世凯虽然有所戒备，但在妥协势力已占上风的情况下，不得不致电袁世凯，作了“暂时承乏”，“虚位以待”的承诺。然而，袁世凯仍不放心，通电指责南方先组政府，选举总统，破坏和谈协约，并唆使北洋将领扬言以武力相威胁。孙中山针锋相对，激励各地军民积极准备北伐。他指出：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1 月 11 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为参谋长，并制定了六路北伐的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第一、二、三、四

军既达第一步目的后，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扑虏廷”①。

1月13日，北伐军第二军在津浦铁路线上首先告捷，败清军于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下。鄂军则由襄樊东下随、枣，并北出河南唐河、邓州，威胁南阳、洛阳。段祺瑞害怕后路被切断，忙将大营从湖北孝感撤至河南信阳。

当时的形势对北伐十分有利，仅聚集在江苏准备北伐的军队就有10万余人，援鄂之师亦近10万，加上各独立省的军队，总数不下三四十万人。而袁世凯所控制的北洋军总数不超过10万人，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意志消沉，实际战斗力并不强。革命军尽管武器较差，但士气旺盛，如果坚持北伐，是完全有可能取胜的。但就在这时，帝国主义为了给其代理人袁世凯撑腰，声称只有由袁世凯统一南北，才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从舆论、财政、军事各个方面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在临时政府内部，旧官僚、立宪派故意制造种种困难，迫孙中山妥协。有的独立省份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有的人争权夺利，不仅极力主和，甚至暗中与袁通气。由于内外交迫，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表示，只要得到清帝退位的确切消息，袁世凯公开宣布赞成共和，就立即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北伐立即偃旗息鼓，半途而废了。

三、清帝退位与袁世凯掌权

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的许诺后，加紧了逼宫步伐，各国使节也纷纷电请清廷采用共和政体。在此情况下，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养心殿下诏宣布退位。次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假惺惺地声称“共和为最良国体”，并作出了“永不使君主政体再现

---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306页。

于中国”的虚假保证。同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不久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为了防范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孙中山在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曾提出如下条件：（一）临时政府的地点为南京；（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老奸巨猾的袁世凯自然不愿做离山之虎，便制造各种借口，拒不南下就职，并请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当南方派出的迎接专使蔡元培到达北京时，袁世凯故意制造兵变进行恫吓，帝国主义列强也立即调兵入京配合，并专电请求南京政府“许袁世凯在北京履任”①。软弱的资产阶级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压力下，节节退让。民国元年（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在新成立的内阁中，内政、外交、陆军、海军等重要部门均为袁世凯爪牙所掌握。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终于被扼杀了，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辛亥革命战争，是由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战争。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对亚洲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所以能取得胜利，是无数爱国志士为拯救民族危亡而英勇献身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结果。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审时度势，从屡次起义失败中汲取教训，及时由运动会党为主转为运动新军为主，并深入基层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奠定了武昌起义成功的基础。起义过程中，在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的情况下，革命党人仍能发扬革命的主动精神，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一举取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继而各省响应，迅速结束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加上民族资产阶级

---

① 《时报》，1912年3月6日（壬子年正月十八日）。

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加之同盟会本身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意见分歧，有的人认为“革命成功，革命党消”，遂热衷于追名逐利，互相倾轧，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不少人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事前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起义成功后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部署；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当时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和帝国主义的本性认识不足，又未广泛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结果，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的压力下，革命以妥协而告终，被迫把政权让给了袁世凯。

第二十八章　孙中山、黄兴的军事思想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旗手，为推翻封建帝制，争取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奋斗了一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推翻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斗争过程中，他与黄兴领导和指挥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和讨袁战争，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军事活动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为叙述方便起见，本章将分别探讨他们的军事思想。

第一节　孙中山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曾经指出："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①通过战争实践，孙中山经过反复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如战争观、武装革命思想、建立根据地思想、建立革命军队思想、战略战术思想和国防建设思想等。

一、战争观

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对国内外战争问题有过许多论述，反映了他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研究他的战争观，对于

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5页。

理解其军事思想体系是有帮助的。

（一）关于战争与国家的关系

1916 年秋至 1917 年夏，北京政府内部在是否对德宣战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孙中山以在野的身份发表自己的意见，反对参战，主张严守中立。同时，他对战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亲自口授要点，由朱执信执笔，写了《中国存亡问题》一书，从理论上论述了战争与国家的关系。孙中山当时认为：国家与战争紧密相关，战争是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手段。他说："论国家之起原，大抵以侵略人之目的，或以避人侵略之目的而为结合。其侵略人固为战争，即欲避人侵略，亦决不能避去战争。战争不能以一人行之，故合群。合群不能无一定之组织，故有首宰；首宰非能一日治其群众也，故成为永久之组织而有国家。故论其本始，国家不过以为战争之一手段，无战争固无国家也。"① 孙中山在上述论述中，谈到了战争对国家的作用和与国家的紧密关系。他还认为国家的存在不单是为了战争，而是战争服从于国家存在的需要，即为达到"国家存立发展之目的，而后以战争为手段"。因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所以必须慎重对待，"以一国而为战争，万不得已之事"，只有在"舍战争以外别无可以求其生存发展之途"和涉及全国人民利害的情况下，才可进行战争。而这样的战争，必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国人乐于从事战争，进战不旋踵，伤废无怨言"。②

（二）关于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③，而政治又与经济密不可分，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观察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时，有许多颇有见地的认识。他说："国与国遇，用外交手段与用战争手段，均为

---

① 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 39 页。

② 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 39～40 页。

③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626 页。

行其政策所不可阙者”；“凡国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① 以上论述，体现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思想。

孙中山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力与经济力视为帝国主义的左右手，在经济力达不到目的时，即用政治力帮助经济力，“好比左手帮助右手一样”②，强行发动战争，迫使对方屈服，以达到侵略之目的。中国甲午、庚子战争以后的大量赔款，即属于受列强“政治上武力压迫的范围”③。他还具体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参战国的动机，指出：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在向外扩张时，必然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英国为了维护殖民地利益和霸权地位，遂“弃法、俄不以为敌，而转搂诸国以敌德，然后造成此次之战争”。④ 至于美国参战，“在其国之工业状况。英、法自开战以后，自国军需品已苦不给……故不得不乞助于美国。美国应协商国之求，以扩张其工业”。由于德国以潜艇封锁海洋，“美国及其他中立国船，皆有中止之惧。于是美之工业为之大摇。美国为保护此种利益，乃欲打破德之潜艇势力，而继续其通商。此其宣战之本意也”。⑤

孙中山在论述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时，还谈到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和经济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早在武装反清革命时期，他即认为“中国今日之革命，纯视经济力为转移，经济力大，则成功速，经济力少，则成功迟；若无经济力，则直不能革命”⑥。他在发动武装起义时，一直把筹粮、筹款和购买武器放在重要位置。在进行北伐战争时，他之所以把广东作为根据地，经济条件是一个重要

---

① 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0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25页。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08页。
④ 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73页。
⑤ 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56～58页。
⑥ 孙中山：《复南洋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82页。

因素。因为“广东这个省分是很富的”①，只要恢复从前的财政状况（年收入3000多万），即可养十几万兵。他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原因时指出：“德国之所以失败，就是为吃饭问题。因为德国的海口都被联军封锁，国内粮食逐渐缺乏，全国人民和兵士都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终归失败。可见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的。”② 孙中山的上述论述，说明了战争的胜负与经济确实有着紧密的关系。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③。

（三）关于战争的性质和对待战争的态度

孙中山从民族平等的认识出发，把民族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弱肉强食”、“祸害人类”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一类是“为人道作干城，为进化除障碍”的民族自卫战争。这显然表明了他对战争性质的一些看法。即为“公理”、“文明”而战，为民族的独立和生存而战，是正义战争。反之，为推行“强权”政治，采用“野蛮”手段压迫弱小民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他从维护民权出发，以是否维护民权为标准区分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在中国，他分析“二次革命”性质时指出：“二次军兴，吾党早揭破袁氏之隐衷，而借债、杀人之罪状，尤为国人所共弃者，故癸丑一役，例以民史正名之义，不得认为南北之争战，而当认为共和与帝制之争战之发轫也。”④这就从性质上指明了革命党人领导的“二次革命”，是反对袁世凯实行专制统治，妄图复辟帝制的革命战争。他说：“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进行革命

① 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74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94～395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1页。

④ 孙中山：《致南洋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94页。

战争是“以杀人为救人”。① 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必须进行革命战争。

战争的性质是决定对战争态度的前提。孙中山对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主张给予热情的支持与帮助。他多次赞扬布尔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勇敢精神，称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争独立求平等的战争，“是世界历史中的大光荣”②。他还一再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援菲律宾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他怀着满腔热情歌颂列宁站在12.5亿弱小民族一边，为反抗压迫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不难看出，孙中山对待不同性质的战争，具有鲜明的立场和爱憎分明的态度。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态度，孙中山庄严宣称：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③。他还表示：即使将来中国强盛以后，也不能走帝国主义压迫别的民族的老路。他说：“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④。

孙中山酷爱和平，厌恶战争，但又认为在当时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说：“有时国家不能不战争者，为达其国家存立发展之目的，而后以战争为手段耳”⑤。他认为当时中国“有亡国灭种之虞……有不得不以战止战者也”⑥。孙中山认为：对帝国主义“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

---

①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03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92页。

③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53页。

⑤ 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39页。

⑥ 孙中山：《战学入门·序》，《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5页。

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①。因此，他主张用革命战争制止反革命战争，用正义战争去战胜不义战争。孙中山提出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武装斗争提供理论的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战争消亡问题，孙中山认为世界“群雄争逐”的原因，是由于人类还未进入“大同时代”，只有进入“大同时代”，才能没有军队，没有战争。

（四）关于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认识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原料、市场和殖民地，相互间展开了激烈争斗，战火几乎遍及世界。这使孙中山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是导致战争的根源。1904年，孙中山即指出:“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因为，“欧洲人在非洲的属地……现在大体上已经划定了，因而必须寻找一块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② 这里，孙中山不仅揭示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且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峻形势。此后，他又指出:“什么是帝国主义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欧洲染了这种主义，“所以常常发生战争”③。再次说明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

孙中山还揭露了帝国主义鼓吹“世界主义”的虚伪性，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们鼓吹世界主义的目的，是“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这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

---

①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408页。

②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8页。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21页。

相的侵略主义”。① 而“侵略主义”必然引发各民族用武力来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革命。他预测，将来的革命不是人种之间的战争，而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他还指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上各受压制的弱小民族“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暴的国家”。② 现在世界上还有 12.5 亿人受压迫，我国 4 亿人要与世界上受压迫者联合起来，“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③。孙中山关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压迫、侵略的思想，对中国革命和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孙中山不仅看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互相争夺是世界战争的根源，也看到了帝国主义是中国军阀混战的祸根。他指出：“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④ 1924 年 9 月，孙中山在《北伐宣言》中指出：“反革命之恶势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所以“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⑤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把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革命战争推向新的阶段。

---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223～224 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192～193 页。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220 页。

④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115 页。

⑤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 76 页。

孙中山还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贫富差别而造成的阶级对立，并由此而导致战争。他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一级是极大的富人，一级是极苦的穷人。富人的财产过多，总是用资本的势力操纵全国政权，来压制穷人；多数穷人不情愿受少数富人的压制，便想种种方法来反抗富人。那种穷人反抗富人的举动，便叫做社会革命。”① 孙中山还说：“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② 孙中山开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战争，是其战争观的一大进步。

应当指出，孙中山虽然论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是战争的根源，但在一段时期里，他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缺乏足够的估计。在反清时期，他曾认为“列强各国对中国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政策：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另一种是拥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③。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希望通过妥协让步，换取某些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当然，这并不排除他当时出于斗争策略的某些考虑，但事实与他的意愿相反，帝国主义不但不支持他主持的临时政府，反而支持袁世凯篡夺革命政权。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和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帮助，使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化，终于成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这在他的晚年表现尤为突出。这也反映了他在战争观上的深化和发展。

另外，他曾认为“阶级战争”只发生于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国“尚未流入阶级战争之中”④。因为中国是个穷国，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的资本家。中国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别，中国资本家“实在没有压迫工人的大能力。现在中国工人所

① 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70～471页。

②④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397页。

③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4页。

受的最大痛苦，是由于外国的经济压迫”①。孙中山的上述论述，虽然反映了当时中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还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当时把“阶级战争”局限于发达的工业国家，这就否定了在不发达的工业国家或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存在“阶级战争”，并且与当时中国业已出现的阶级战争的客观实际相矛盾。这反映了当时孙中山对阶级战争认识的局限性。

总之，孙中山的战争观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已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帝国主义之间瓜分世界的斗争异常激烈，它们把侵略矛头对准中国，先是控制垂危的清朝政府，后又分别支持各派军阀，借以实现其控制和掠夺中国的野心。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孙中山逐渐加深了对战争的认识，作了许多正确的阐释，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虽然他在战争认识上曾表现出某些局限性，但随着革命和战争的实践，他对战争的认识不断深化、发展，他的许多论述，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战争，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武装革命的思想

孙中山在青年时深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称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表示要向洪秀全学习。但是，他的武装反清思想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一段曲折过程的。

（一）武装反清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最后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情况下，清政府仍丧权辱国地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

---

① 孙中山：《在广州市工人代表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148页。

使孙中山感到非常愤慨，“始有志于革命”①。但是，究竟采取什么手段，走一条什么道路，尚未得到解决。在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盛行的情况下，孙中山曾对清政府中一些洋务派头面人物抱有幻想。1890年，他曾写信给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了兴农桑、禁鸦片、普及教育等建议，主张效法西方，实行改良。1894年6月，他又到天津，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的主张，结果碰壁。这对促使孙中山思想的转变颇有影响。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以后，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认为“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②，于是决心用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孙中山早期的暴力革命思想，含有强烈的反满意识。他曾认为，针对清政府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高举“反满”的旗帜，确实“最易发常人之感情”，“最合群众心理”③，对于动员群众，特别是对具有反清传统的会党群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当然，把满族人民和满族统治集团混同起来，是不妥的。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等立即着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并计划于10月26日在广州发难，后因谋事不密而流产。尽管这次起义未发而败，但毕竟迈出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步。此后，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戊戌变法的失败，更坚定了孙中山武装反清的思想，并与流亡日本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接触，希望他们“改弦易辙”，“实行革命的办法”，终因康有为顽固坚持保皇立场而未果。1900年10月，孙中山组织了惠州三洲田起义，屡败清军，

---

①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一集，第915页。

②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2页。

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1页。

后因援绝而败。孙中山没有为两次广州起义失败而灰心。他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努力研究军事，并在越南、泰国、日本等地的华侨中宣传革命，组织兴中会分会。1903 年，在日本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创办军事学校，聘请日本教官，传授军事知识和制造火药、炸弹等技术，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打着“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旗号大肆活动，欺骗了不少革命党人，许多地区兴中会的组织被其瓦解。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先后发表了《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书》等文章，给保皇逆流以有力的驳斥。他尖锐地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①，揭露保皇派所说的“爱国”，其实质是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非爱国也，实害国也”②。从而使更多的人提高了觉悟，为武装起义高潮的兴起做好了舆论准备。1905 年孙中山、黄兴等在组织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时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更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次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定的《革命方略》，则为各地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原则。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等在制定起义计划的同时，立即着手进行起义的组织工作。1907 年至 1911 年，孙中山和黄兴等先后发动和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尽管都失败了，却给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以后的起义成功奠定了基础。在改良主义风靡一时的情况下，孙中山坚持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和实践，是符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革命的客观规律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武装起义的特点

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武装起义，具有如下特点：

---

① 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231～232 页。

② 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233 页。

1、从借助会党发难到依靠新军暴动

清代的会党多以“反清复明”、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因而是一支现成的反清力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在寻求支援时，自然首先注目于会党。孙中山曾说：“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言之，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① 许多革命党人也认为“联络会党为运动革命之捷径”②。孙中山所以把海外和南方会党作为武装革命首先联络的力量，与其所处的环境有直接关系。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他熟悉当地的会党情况，并早与广东三合会首领郑士良等相识。华侨中的会党也较多，如南洋的义兴会，美洲的致公堂等，其中有的人还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外渡的“洪杨部将”。因此，孙中山在动员海外华侨时，也注目于会党。1902 年广西会党大起义给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他说：“从最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他们的武器弹药供应非常困难，但是，“他们业已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战斗，并且一再打败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军对他们的屡次征讨。他们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末，如果给以足够的供应，谁还能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的势力呢？”③ 不难看出，在当时孙中山的思想上，认为依靠会党的战斗力，给以充足的物资供应，就可以推翻清政府，打出一个新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先后吸收了不少会党的成员和领袖，更为孙中山联合会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基于上述思想和有利条件，所以从 1894 年的第一次广州

---

①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 63 页。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史编辑社 1928 年版，上册，第 161 页。

③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255 页。

起义至 1908 年的河口起义，都主要是借助会党发难的。

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他们身受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在反抗现存社会制度方面，与革命党人是一致的。但他们缺乏民主革命的思想和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强烈要求，加之纪律松弛，在没有改造之前，是不可能成为革命中坚的。为此，孙中山在发动会党过程中，即注意用民主主义思想教育会党群众，使其步入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鉴于秘密结社的会党领袖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孙中山特别注重对他们进行工作。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即责成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为他们演讲革命宗旨，指导各种任务。当然，孙中山对会党改造的范围和深度都是很有限的。孙中山在组织领导武装起义的前期，偏重于做会党的工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以致在一段时间对运动清军倒戈未予足够的重视，并曾一度认为官府“军队不能革命”①。

从军事角度而言，临时招募的会党群众，因缺乏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加上武器装备低劣，因此用以对付正规军，是很难完成起义任务的，即使一时取胜，也不易巩固和扩大战果。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一支新由平民组成的军队，假如它得不到比较强大的正规军的巨大精神资源的陶冶和物质资源的支持——主要是正规军的基本要素即组织的陶冶和支持，就永远也不会有战斗力”②。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在一段时间内缺乏足够的重视。早在 1905 年，湖北革命党人朱和中就曾建议孙中山采取争取新军的策略，当时他未予重视，认为仍需依靠会党暴动。1908 年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会党的弱点，并指出，会党“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③

孙中山在借助会党发难的同时，也曾运动过一些旧式军队反

---

①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 5 页。

② 恩格斯：《美国战争的教训》，《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 1982 年版，第五卷，第 19 页。

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233 页。

正，甚至多次想用金钱收买这些军队归降，后因巨款难筹等原因而未实现。随着各省普练新军的开展，革命党人在南方各省新军中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特别是1908年冬熊成基在安庆发动新军起义后，使孙中山看到了希望。他同意胡汉民关于应全力注重于正式军队（指新军）的建议，指示革命党人"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多与（新军）联络"①。新军虽然是维护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支柱，但其士兵成分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相当一部分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易于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当时不少革命党人认为，"得新军则他军无难制驭"②。经过1910年在广州发动新军起义，孙中山运动新军起义的思想更加坚定。他指出："广州新军之失败，虽属不幸之事，然革命种子早已借此而布满南北军界。因新军中不乏深明世界潮流之同志，且极端赞成吾党之主义。在今日表面上视之，固为满廷之军队；若于实际察之，诚无异吾党之劲旅。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③。并表示"刻下再举，自当多赖新军之助"④。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由主要依靠会党发难到注重运动新军倒戈的思想转变，是武昌起义获得成功，进而形成全国响应局面的关键所在。

2、进行城市起义或以夺取城市为目标

孙中山进行武装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城市起义。他曾指出："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

---

① 孙中山：《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38页。

②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31页。

③ 孙中山：《在槟榔屿筹款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94页。

④ 孙中山：《复王月洲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93页。

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①。他和黄兴等人领导和发动的10次起义，有3次是在中心城市广州，其它则在大中城市周围，并以夺取这些城市为目标。为什么要以夺取大中城市为主要目标呢？这不仅因为举行城市起义，能产生较大的影响，能给敌人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而且与当时的某些社会情况和自己的力量直接相关连。

首先，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十分弱小，但它主要集中于城市，特别是上海、武汉、广州等沿江、沿海城市。据1895～1911年统计，全国新设商办企业共460家，而在上述地区的即占总数的60%。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也不断扩大，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由此可知，孙中山选择南方一些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的。

其次，清末废科举后，为寻求就业和升学机会的知识分子，云集城市，他们在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不仅同情革命，有些人还成了起义的领导和骨干。随着农村自然经济的日益解体，大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以及秘密会党，也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无业游民、清军士兵“私会之人居其大半”②，甚至“通商大埠之劳力者莫不入党”③。另外，作为运动对象的新军主力，一般也都驻扎于大中城市。正是由于反清的社会力量和动员对象正向城市集中，而当时革命党许多领导人还认识不到广大贫苦农民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有的则对发动农民投入革命存有疑虑，所以举行城市起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次，城市往往是爱国运动的爆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拒法

---

①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70～71页。

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下同），第一卷，上册，第302页。

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191页。

拒俄运动、反美拒约运动、收回权利运动、立宪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工人罢工等，都是首先从城市爆发的。城市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是孙中山实行城市武装起义的有力政治支柱。

此外，清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削弱，也是举行城市起义的一个客观有利条件。1908 年光绪帝和慈禧相继去世，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集团”把持朝政，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皇族内阁”出笼后，引起汉族官僚强烈不满，地方封疆大吏离心倾向日益严重。他们对朝廷多采取推诿伎俩，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因害怕激成大变而不予深究，从而为革命党人在城市组织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向重视欧美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法。不少革命党人曾认真研究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孙中山等人认为，法国革命于巴黎，英国革命于伦敦，是最理想的方案，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北京是清廷的权力中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无法与法、英相比，所谓实行“中央革命”一说是不现实的，但坚持城市武装起义则是完全可行的。

孙中山武装革命的思想，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对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有过一段曲折的过程。但是，他能及时汲取教训，在实践中不断加深认识，并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继续坚持了武装革命的思想。

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孙中山走上武装反清道路以后，就确立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并始终把建立革命根据地放在重要的位置。他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深化的。

（一）武装割据思想的确立

早在1895年，孙中山就提出“袭取广州以为根据”① 的主张。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又提出动员革命党人“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②。对于割据地点，孙中山认为应“攻取粤桂滇三省为革命根据地”③，其中又以“广东为最善”④。他先后在两广和云南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以实现武装割据的愿望。

孙中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国土的辽阔为实行武装割据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成功的希望就愈大。孙中山在领导武装革命中，决定开辟遂行战略任务的革命基地，这是他领导的革命战争区别于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战争的显著标志。

（二）在广东等地建立根据地的思考和实践

孙中山之所以决心在粤、桂、滇三省特别是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他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一次笔谈中说：“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又说：“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别处虽有形势，虽便接济，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⑤ 这里所说的“吾人”，主要是指广东的会党和革命党人。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一部分会党经过革命派的活动，即已隶于兴中会旗帜之下，其中一些头目还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对孙中山十分崇敬。如郑士良表示：我不但愿为他效犬马之劳，甚至把生命献给他也在所不惜。孙中山当时认为，会党是一支强大的反清革命力量，而

---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0页。

② 〔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版（下同），第55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47年版，第五集，第118页。

④ 〔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第55页。

⑤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4页。

“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①。当孙中山从发动会党为主转为运动新军为主以后，广东新军亦是他主要争取的对象。尽管广东新军成立较晚，编制较小（只有一个协），但革命党人仍在其中积极活动。

关于利于接济问题，粤、桂、滇三省也较其它省份有利。由于同盟会发端于海外，骨干多侨居于南洋、日本、越南和香港、澳门地区。广州靠近南洋和香港、澳门地区，便于得到海外人力物力的支援。广西、云南则与当时法国殖民地越南相邻，而当时法国对中国革命采取首鼠两端的政策，对革命党人在越南的活动一般予以宽容，从而使旅越同盟会的组织得到较大的发展，加之当地华侨热心革命，所以越南成了孙中山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的一个较理想的国外支点和策划地。

关于快于进取问题，因粤、桂、滇三省位于中国边陲，清政府的统治相对薄弱，利于发动起义。孙中山在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时，即看到广州驻军有名无实，防范松懈，有机可乘。起义失败后，又把目标放在夺取南宁。他认为，“南宁为广西之中心点，得南宁则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革命之基础可固”，“南宁既得，则两广易定”，“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文明之政体”。②

孙中山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着眼点放在两广和云南，除上述原因外，还有经济力和历史经验方面的考虑。两广地处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孙中山认为：“夺取广州后，我们至少可获得十万支新式步枪、充足的弹药、数百门新式大炮以及兵工厂。此外，还可获得大量现款和物资补给”③。另外，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的

---

① 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见《辛亥革命》（二），第210页。

② 孙中山：《致邓泽如等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46～347页。

③ 孙中山：《致咸马里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1页。

经验，对孙中山的影响是很深的。他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喻，并认真研究过洪秀全、冯云山等在紫荆山创建根据地，而后挥师北上，在金陵建立革命政权的历史。因此，后来他筹划革命时，借鉴太平天国的某些经验，是毫不足怪的。

孙中山主张在南方边远省份建立革命根据地，还有一个因素是，孙中山避免引起欧洲列强的干涉。他对宫崎寅藏等说：“且数处齐起者，不只惊动清虏，且震恐天下。则不只俄人力任救清之责，吾辈亦恐蹈纳波伦（即拿破仑）之覆辙，惹欧洲联盟而制我也。盖贵国维新而兴，已大犯欧人之所忌矣。中国今欲步贵国之后尘，初必不能太露头角也”。虽然“欧洲联盟制我之事，或未必有，然不可不为之防”。① 起义之初不要引起清廷太大的震惊，起义后不要引起帝国主义列强“联盟制我”，在什么地方起义才能适合这种考虑呢？东北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京畿是清政府的权力中心，长江流域是列强利害相关之地，自然只有粤、桂、滇一带才是发动起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最为理想的地方了。

（三）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渐趋成熟和完善

武昌起义成功后，长江以南各省均为革命党人所控制，形势非常有利。但革命党人未能使其得到巩固与发展。“二次革命”失败，几乎将全部地盘丧失。护国战争中，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军东南军、西南军、东北军、西北军在各地发动起义，但其战略重点仍在西南。他曾主张“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认为只要“闽、粤一下，与云、贵打成一片，南方局势，已足自活，沿江各省，自然动摇”。② 由于护国战争很快结束，故未实现建立西南根据地的设想。护法战争中，孙中山受西南军阀的排挤，被迫辞职离粤。寓居上海期间，不断有人劝其放弃广东，先图湘赣，孙中

①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1～182页。

② 孙中山：《致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37页。

山不为所动。他说："兵家之所忌，最在后顾之忧"①，要完成护法目的，必"先灭桂贼，以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出师北上，力争中原"②。此后，孙中山经过驱逐桂系势力，平定沈鸿英、陈炯明叛乱，镇压商团叛乱，几经波折，至1924年终于在广东站稳了脚跟，为北伐扫除了后患。

孙中山为了创建和巩固广东革命基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把建立革命政权作为根据地巩固与发展的"第一问题"③，并提出要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④，从而把军事斗争与政权建设统一起来。他认为广东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要以"有组织的民众为后援"⑤，强调"用广州做策源地，从新建设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必要同力合作"⑥。他说："人心一失，这个地盘便要归别人所有"⑦。因此，他做了许多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为了保证革命政权得到财力、物力支持，他根据当时广东驻军庞杂、各自为政、强占财税等情况，从整顿军队入手，统一了财政。这些，都对广东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标志着他的建立根据地思想的趋于成熟和完善。

由上可见，孙中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历程是艰辛而曲折的。他虽然一开始就认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但对于如何建立根据地尚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经过曲折和不断探索，才终于在广东打开

---

① 孙中山：《致王文华电》，《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35页。

② 孙中山：《复伍毓瑞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63页。

③ 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02页。

④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27页。

⑤ 孙中山：《与国闻通讯社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474页。

⑥ 孙中山：《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61页。

⑦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83页。

了局面，实现了他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如果以建立革命根据地首先要有一支具有相当力量的革命武装，其次要发动群众，配合革命武装消灭反动武装，第三要建立革命政权，使革命武装在人力、物力上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这三个条件来衡量，孙中山在建立广东根据地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是解决得较好的，有些问题则不尽人意。如在教育党员、发动群众和建立政权等方面显得乏力，在基层政权建设中，不适当地寄希望于地方士绅的合作，结果，某些地方军阀、土豪劣绅横行乡里，骄兵悍将割据一方，成为发动群众的严重障碍。尽管如此，孙中山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四、建立革命军队的思想

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的实践，也经历了不少的曲折。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的建军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找到了正确的建军途径。

（一）同盟会成立时的建军蓝图

1906 年，同盟会在制定《革命方略》时，即提出了建立中华革命军的方案，并规定了一系列建军方针和原则。关于军队的性质，《方略》指出：国民军是国民革命的武装力量，以国民组织而成，一切军人应“遵守国民军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①。这就是说，国民军必须为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服务，并为之奋斗。在军民关系上，《方略》强调军队要“发表国民之心理，肩荷国民之责任”，“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方略》特别强调军队要服从纪律。其中规定了军律 22 条，除要求军人听从号令、不得泄漏军情、在战场上勇敢杀敌外，还强

---

①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302 页。

调对人民不得烧杀淫掠、强买强卖，军队内部严禁赌博、吸食鸦片，还规定一切缴获要归公。为了激励士气，《方略》规定了战士赏恤制度。为了减少革命阻力，瓦解敌军，对清朝兵勇归降者制定了特别优厚的条件。关于兵役制度，主张实行募兵制。为扩大募兵范围，《方略》在招军章程中规定："凡有志愿充当国民军军人者，通常以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者为合格"。关于国民军的组织，《方略》规定以排、列、队、营、标编成。8人为1排，3排为1列，4列为1队，全队共108人。4队为1营，全营共448人。营为基本战斗单位。4营为1标，全标共1816人。另有骑、炮、工、辎重、医务各1队。还设立了类似司令部的机构。军官军阶划分为都督、副督、参督、都尉、副尉、参尉、都校、副校、参校9级，并规定了各级饷额。

由上可见，《方略》所描绘的是建立正规军的蓝图，但当时正处于联络组织松散的会党进行武装起义时期，起义旋兴旋灭，因而正规军队的建设未能实现。

（二）临时政府成立时期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实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孙中山关于军队建设的一些设想，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很好落实。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明确表示："本总统就任后，首谋统一军队"①。临时政府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不久又成立了陆军部和海军部。1912年1月16日，经孙中山批准，颁布了陆军编制表，将清末新军建制名称军、镇、协、标、营、队、哨、棚改为军、师、旅、团、营、连、排、班。虽在编制形式上与清末新军基本相同，但火器有了加强，每师增编5个机关枪连和1个重炮兵连。在临时政府期间，共整编陆军21个师，并加强了海军建设，整顿了长江水师。

孙中山在整编军队时，强调精简指挥机构，力戒兼职和人浮于事，达到"事权统一"，"责有专属"，以提高指挥效能。为了有利于军事指挥、维护军纪和激发军人的进取精神，在军队中实行

① 孙中山：《复南京市民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0页。

了军衔制，规定从军官到士兵分为6等16级。军官和士兵一律按劳绩战功、学术才具选拔晋升，并规定了晋升年限和各级军官的服役年龄。孙中山还主张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军事人材，提高军官的素质。同时，他认为军人必须研究军事学问，“中国在前清时代，对于日、法战后所以失败者，在军事学问之不足”①。随着世界科学的不断进步，军队武器装备日新月异，给军队的组织编制、战场指挥和战略战术都带来深刻的影响。孙中山总结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教训，提出军官要学习和研究军事学问，是颇有见地的。

孙中山在整顿军队编制、制度的同时，还注意从政治上建军。他要求：军队要以“共同的目标”（即“拥树民国”）来统一思想，从而达到“共同的行动”；军队要养成爱国之精神，具有保卫共和制度之思想，并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和任务。孙中山还强调指出：“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然后能保军人之名誉，作民国之干城”②。

（三）护国、护法战争时期的建军思想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以后，下令裁撤革命军，孙中山、黄兴等由于客观上筹措军费十分困难、主观上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和个人野心认识估计不足等原因，将南方的革命军大量裁撤，以至军心涣散。由于军队实力大减，元气大伤，加上对保留的军队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其他原因，以致在发动“二次革命”战争时，无力抵御北洋军的进攻，所剩军队丧失殆尽。“二次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建立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强调“没有不可侮之实力”，是无法达到倒袁目的的。他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时，专门研究了组织革命军问题，强调

---

① 孙中山：《在山西军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75页。

② 孙中山：《命陆军部颁行军令整顿军纪令》，《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8页。

政治建军，特别强调军队必须接受革命党的领导，并亲任中华革命军大元帅，设立大本营，作为革命军最高统率机关。在军兵种建设上，提出要发展海军和空军。但由于在建军和护国战争中未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华革命军在护国战争中只搞了一些武装暴动，未造成大的声势。

袁世凯病死以后，继任的黎元洪重新挂起了拥护《临时约法》的招牌，孙中山发表《中华革命党本部通知》，指出："推翻专制、重建民国"之目的已达。于是各省革命军停止活动，重蹈辛亥革命后放弃兵权的覆辙。在护法战争中，由于无强大实力作后盾，孙中山不得不走上依靠西南军阀反抗北洋军阀的道路。而滇系的唐继尧、桂系的陆荣廷，都是打着"护法"旗号以达到割据的目的，根本不听孙中山的指挥，以致大元帅有名无实，"命令不能出府门"。在此情况下，孙中山更感到迫切需要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1917 年，他将粤省省长朱庆澜手下的 20 个警卫营（约 8000 人）交给陈炯明组建一支粤军，并从人力物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以期建成为一支"可资依靠"的力量。不料陈炯明回师广州驱除桂系后，在北洋军阀收买下，公开背叛孙中山，于 1922 年 6 月炮轰总统府，变成了新军阀。1923 年 1 月，孙中山依靠滇桂联军和粤军许崇智部将陈炯明部驱逐出广州后，各派军阀争权夺利，为所欲为，有的在北洋军阀收买下，进行倒戈。无情的现实，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①。

（四）改组国民党后的建军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孙中山开始重视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后来的苏联红军的建设经验。1921 年至 1923 年，孙中山经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先后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代表越飞，听取了他们关于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等建议，受到重大影响。

---

① 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 292 页。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下令筹建黄埔军官学校，聘请苏联军事顾问，训练革命的军事干部。在此前后，孙中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军队建设问题的论述，反映了他在建军思想上的发展与成熟。

在建军宗旨方面，孙中山强调要以俄为师，以革命主义建军。他说：“俄国革命的兵士都是明白革命主义的”。他们不仅打败了英、美、法、日联军，具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可以用主义感化敌人，瓦解敌军。① 为此，他强调对军队要做好宣传工作，使每个军人都知道三民主义（指新三民主义），使他们的精神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使他们的能力同俄国革命士兵一样。他要求军队必须与国民相结合，真正成为“国民之武力”。他指出：“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②。为了保证军队真正成为“国民之武力”，孙中山十分注意改变军队的成分。在黄埔第一期学员毕业后组织军队时，他指示“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③。

为了保证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孙中山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在中国军队中第一次设立了党代表及政治机关。孙中山自兼黄埔军校总理，另委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军校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与此同时，决定在学校专设政治部，负责日常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后来国民革命军也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一制度的确立，是孙中山建军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国民革命军有别于旧式军队的

① 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77～478页。

②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31页。

③ 孙中山：《致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170页。

重大标志。

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搞好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孙中山强调要紧紧围绕三民主义这个核心，对军人进行革命精神教育。他把革命精神具体分为智、仁、勇三要素。他认为："军人之智，在乎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又说："军人之智，须以合乎道义为准"，军人要"为人民为国家负责"。而军人之仁，"其目的在于救国"，并且"须有一定主义，始可以成仁，始可以成功"。"而军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义"，把勇和理想联系起来，成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勇，知道"为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为国家效死，死重于泰山"。①

孙中山强调军人必须有奋斗精神，而这种奋斗精神，首先来自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他说："革命军的责任，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够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义，才可以做革命军。革命军是为三民主义去奋斗的。""有了奋斗精神才能够牺牲，才不怕死"，"军人到了不怕死，还怕不能打胜仗吗？"② 在黄埔军校中，孙中山积极倡导"团结、牺牲、奋斗"的精神。他亲自制定了"精诚团结"的校训，要求全校师生"同道共赴生死"，"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终身为救国救民事业奋斗"。③ 在课程设置上，除三民主义外，还开设了社会主义运动、苏联研究、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等课程，以提高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觉悟，使他们"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不仅明了怎样遵守纪律，而且明了为什么要遵守纪律"。④孙中山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机关以及在政

---

①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7～34页。

② 孙中山：《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501～503页。

③ 《黄埔军校名人传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④ 《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6页。

治教育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和原则，表明他已找到了政治建军的正确途径。

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方面，孙中山强调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要充分发挥精神的作用。他说："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专恃物质，则不可也"；"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若无精神，子弹虽多，适以资敌；一旦临战，委而弃之，非为敌人运输战利品乎"。① 孙中山与当时某些资产阶级唯武器论者有明显的不同，他看到了士气在战场上的作用，为了战胜敌人，首先要在精神上压倒敌人。这一点，对于建设革命军是十分重要的。

在严格军队纪律和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方面，孙中山强调指出："军令之下尤贵服从"②。在战场上，即使命令错了也必须服从，"如果一部的军队，看出了命令不对，便单独行动，以致牵动全军，不能一致前进，弄到结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顾，自乱阵线，便要被敌人各个击破，或全军就要覆灭了"③。他认为，"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④，部队只有经过训练，才能"合群"，搞好战场协同。他要求军人懂得审时度势，谙于战术，能知彼己。在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中，强调对学生要"严格管理，严格要求，提倡身先士卒，吃苦耐劳的精神"。强调理论学习要结合实际，注重实用。他"对于野外演习尤为着重"，"对于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二项更为认真"。⑤鉴于军队装备新武器后，很多人忽视了体质和技能的训练，他着重指出：战斗最后决定胜负，"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

---

①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3～14页。

② 孙中山：《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2页。

③ 孙中山：《党员之奋斗同于军队之奋斗》，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400页。

④ 孙中山：《复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07页。

⑤ 《黄埔军校史料》第143～144页。

时”，在一定条件下，“技击术（肉搏的一种技能）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千万不可“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①

关于兵役制度，孙中山主张“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②，把国民当兵“定为义务，两年一易”③，使每个国民不仅能享受权利，也为国家尽义务。为了减少国家和人民对军队的负担，他主张实行精兵政策，以节约军费，并在军队中实行“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④，使士兵退出现役时有就业的机会，以利社会的安定。他还主张在全国的中学、大学中普及军事教育，以适应战时扩大兵源的需要。

在改善军队武器装备方面，他认为“军械不足”是军备中之最大缺点。为此，他力主扩大兵工厂，并极力倡导仿制先进武器。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不仅注意陆军的建设，也注意加强海空军及特种兵的建设。

孙中山在建军问题上有过曲折，但他能总结教训，认真学习和借鉴苏军经验，终于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建军方针和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1937 年 10 月，毛泽东对这支军队曾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

---

① 孙中山：《精武本纪·序》，《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 150 页。

②④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124 页。

③ 孙中山：《工兵计划宣言》，《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146 页。

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①

应该看到，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提出的有些方针、原则是难于完全实现的。例如，由于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存在着矛盾，要完全实现"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方针，自然难以做到。又如，虽然在军队中设立了党代表及政治工作制度，开创了中国建军史上的先例，但是一些刚刚形成的革命武装，还是被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变成了新军阀统治的工具。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时，真心实意拥护他的主张的只有少数革命左派，因此，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迅速抬头，加之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幼稚，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下，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斗争不力，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引诱、支持下，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阴谋终于得逞。

五、战略战术思想

孙中山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在战争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体系的。

（一）战略思想的演变

在反清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基本战略思想是：以武装革命为指针，策动内地会党、新军起义，先据南方一二省，以为割据之势，尔后兴师北伐，长江南北齐起响应，达到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目的。但是，由于孙中山等一些革命领导人对革命形势的估

①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0页。

计过于乐观，革命力量准备不足，在建立革命军队问题上当时又未能找到正确的途径，致使南方的武装起义屡遭失败。最后，还是武昌起义成功后，才出现“长江南北齐起响应”的大好局面。

代理国民党党务的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后，孙中山主张“从速起兵”，武力讨袁。与“法律倒袁”相比，孙中山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因为，消灭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实行专制统治，是袁世凯的既定方针，革命党人如不奋起抗争，等于待毙。况且，国民党还占有南方七八个省的地盘，拥有十几万军队，在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具有某些有利条件，如果战略指导正确，是可以和袁世凯抗衡的。但是，由于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间意见纷歧，丧失了宝贵的战备时机，在缺乏准备和统一作战计划的情况下，仓促起兵，加上未经整顿改造的部队战斗力不强，各省作战又不协同配合，“武力讨袁”很快以失败而告终。这表明缺乏准备的“速战”，是不可取的。另外，孙中山当时提出“联日”的方针，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日本当局支持的不是革命党人，而是袁世凯。

护国战争时期，孙中山以其所建的中华革命军东南军、西南军、东北军、西北军，发动进攻，四面打击敌人。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部队可以起到牵制和分散敌人，配合护国军作战的作用。但是由于各部临时组建而成，又未注意广泛动员和依靠群众，因而难于取得影响全局的战果。

护法战争中，孙中山的基本战略构想是利用矛盾，组织联盟，打击主要敌人，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和改变战略方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当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破坏国会，实行专制独裁的面目暴露后，孙中山决心武装护法，保卫民国。但数量有限的中华革命军业经解散，已无革命武装可作依靠。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决定利用滇桂军阀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联合南方军阀的军队讨伐北洋军阀的军队。这种战略和策略，在护法战争初期曾起过积极作用，不但造成了护法声势，而且在湖南、湖北、福建等战场先后取得过对北洋军作战的胜利。但正如孙中山后来所说的，南北军

阀"如一丘之貉"。南方军阀并不真心实行孙中山的战略意图，护法战争最后不得不半途而废。

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及时改变战略，决定先灭桂系军阀，统一南方，尔后北伐。他利用与桂系军阀有矛盾的滇、黔、湘系军阀势力，达成讨桂统一战线，命令新组建的亲军陈炯明部一举击溃了桂军，结束了桂系势力统治两广的历史。这时，孙中山根据北洋军阀内部矛盾加剧的情况，改变了联南攻北战略，决定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实行联合奉皖军阀讨伐直系军阀的战略。不料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迫使孙中山不得不集中精力先平定陈的叛乱。

以上事实表明，孙中山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打击主要的敌人，反映了其战略策略思想的灵活性。但是如果自己不掌握真正忠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仅仅借用军阀的势力，是绝不可能实现为恢复民国而战的政治目标的。而1924年及其以后，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建了新的革命军队，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使东征和北伐战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形势。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建立和掌握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二）战略战术原则

孙中山在组织武装起义和反对北洋军阀的作战中，提出了许多方针、原则，体现了他的战略战术思想。

*以勇克敌，以少胜多。*这是孙中山多次强调的作战原则。他在1895年第一次组织广州起义时，即主张"发难之人，贵精不贵多"，"若得敢死者百人，则事便可济"。①1900年组织惠州起义时，亦强调"所恃者人心勇敢而已"②。1911年发动黄花岗起义时，仍认为"选敢死之士八百人入城劫督署、占军器，为打开城门俾新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56页。

② 孙中山：《致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0页。

军入城取回子弹枪械，则必能制巡防营及旗满兵之死命矣”①。他强调：革命军队要“以一当百，百当万”②。他高度赞扬观音山作战③的勇士。当时，总统府的卫士只有50多人，面对叛军4000人的围攻，毫无惧色，浴血奋战，终于保护孙中山脱险，所以他说：“我理想上的革命军，只有这次观音山的卫士足以当之”④。组织武装起义，起义军的力量在开始时一般都处于劣势，为了鼓舞士气，强调要发挥勇敢精神，敢于以少胜多，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进行革命战争，应该动员和组织尽可能多的群众和武装力量，投入对反动武装的作战，特别是在具体的进攻战斗中，应力求形成兵力的优势，一举歼灭敌人。从孙中山的有关论述看，他认为，在局部战场上，集中力量，造成对敌人的优势，对于保障作战的胜利，也是很重要的。

“游勇战术”。这是孙中山颇为欣赏的一种作战方式。游勇战术相当于通称的游击战。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努力攻读西方军事著作，特别重视英布战争中布尔人所采取的散兵战术。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结识了以研究布尔人的散兵战术而闻名的军事学家日野熊藏，聘其任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校长，传授枪炮、火药制造方法和布尔人的散兵战术。孙中山认为：“此法最适用于揭竿起事之中国革命军”⑤。并提出采用“游勇战术”，必须学会五种技能：一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粗。在护法战争中，孙中山主张正规军队亦应运用游勇战术。他说：“昔日安南中之黑旗，法国患之；南

---

① 孙中山：《复谢秋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18页。

② 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77页。

③ 指1922年6月16日反击叛军陈炯明部围攻孙中山住所的战斗。观音山即今广州越秀山。

④ 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之役颁奖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页。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初集，第134页。

非洲杜国之农民，英国患之。彼之所用战术，皆为游勇战术，最能制胜。余亦主张此战术颇适用于中国，若与北方交战，尤为相宜”①。

分进合击。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曾指出："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②。为了完成倾覆清廷的大业，孙中山亲自制定了六路北伐作战计划（参见第二十七章）。这一计划实际上是以北京为目标，实施分进合击的进攻作战，趁敌惊慌失措之际，利用革命的威势，使敌顾此失彼，达到一举歼敌的目的。依据当时的情况，实施多路进攻，可以调动敌人，分散敌人的兵力。但在自身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分进合击如部署和相互配合不当，很容易遭敌各个击破。

正面牵制，翼侧攻击。1912 年，在革命军筹备北伐的过程中，孙中山得到情报，清政府以"假议和而集重兵，力图取江淮"，一由亳州，一由徐州，一由颍州，分三路南下。他便一面令南京之兵开赴前敌，一面电令黎元洪率军"紧逼敌军，以牵制其兵力"，同时调"黄州及阳逻各军，抄击其左侧"。③ 这一正面牵制、翼侧攻击的部署，是符合一般战术原则的。无论是从防御或是从进攻的角度来看，都是积极主动的行动。它也是我国传统的奇正结合战法在作战中的灵活应用。

及时机动，以众击寡。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积极致力于我国的铁路建设。他认为铁路的多少，不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实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防建设和战时军队的输送。孙中山认为，在战争中，必须及时机动兵力，这样做不仅可以弥补兵力之不足，而且可以在局部造成对敌的兵力优势。同时，他也认为，集中兵力、以众击寡，是取得作战胜利的重要条件。这反

---

①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31 页。

② 孙中山：《致陈炯明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7 页。

③ 孙中山：《复黎元洪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15 页。

映了孙中山在作战指导思想上的发展。

冒险进攻，速战速决。“冒险进攻”是孙中山作战指挥的一个重要特点，并在反对军阀的战争中，取得过某些战役战斗的胜利。1918年粤军援闽之役，即是一例。当然，对冒险进攻、速战速决的作战思想应作具体分析。一般意义上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但是，如果不考虑主客观条件，特别是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一味强调进攻，就会使自己遭受巨大损失，导致作战的失利。

六、国防建设思想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特别强调应加强国防建设，以御外侮。他指出："民国正当草创，欲中国成为强固之民国，非有精强陆军不可。……今日要务在乎扩张军备，以成完全巩固之国，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①又说："我国之兵船，不如外国之坚利也，枪炮不如外国之精锐也，兵工厂不如外国设备齐完也。故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现在强邻如虎，各欲吞食我国，若我国不有相当武械自卫，则我国必为虎所食也。故我国须改良武器，然后能自卫也，不为虎所食也"。② 在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孙中山不得不以极大的精力领导反对军阀的斗争，始终没有获得和平建国和从事国防建设的环境，但他仍十分关心国防问题。1921年，孙中山在给廖仲恺的信中再次指出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他说："予鉴察世界大势及本国国情，而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也"③。他还拟就了《国防计划》一书

---

① 孙中山：《在广州军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5页。

② 孙中山：《复陈其美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0页。

③ 孙中山：《致廖仲恺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72页。

的纲目，其中反映了他对我国国防建设的宏伟设想。

（一）国防建设的总方针

自卫，是国防建设的总方针。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中公开声明："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①。又说："唯吾意中国无侵略志，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而非攻人"②。民国初年，当沙俄侵略外蒙，策动所谓"库伦独立"，向我节节进逼之际，孙中山坚决主张抵抗。他说："与其俯首而听人之瓜分，何如发奋一战以胜强俄，而固我国基于万代之为愈也"，"与其屈于霸道强权而亡，不如一殉人道公理而亡。一战不独不亡，而更可扬国光，卫人道，伸公理于世界也"。③ 孙中山把自卫作为国防建设的基本方针，并在建国大纲中规定："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④，在《国防计划》中亦列有"抵御各国侵略中国计划之方略"、"收回我国一切丧失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让地之计划"等纲目。⑤这些，都反映了孙中山以反侵略为目的的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

（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结合，是孙中山国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说："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⑥ 保就是自卫，即建设强大的国防。养就是要解决吃饭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认为国防与民生紧密相关，必须相互兼顾，不可偏废。而两者相较，他认为民生又是国防之母，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前提，足食才能足兵，民富才能国强。他

---

①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8 页。

② 孙中山：《在香港与〈南清早报〉记者威路臣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389 页。

③ 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549 页。

④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127 页。

⑤ 孙中山：《致廖仲恺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 571 页。

⑥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255 页。

说："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①。因为没有强大经济为后盾的国防，就如无源之水，很快就会枯竭。早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即主张"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他说："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如"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② 后来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又将上述思想予以深化和发展。《实业计划》虽然讲的是经济建设，但同时着眼于国防建设。如计划建设的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渔港等，既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通道，也是未来的军港。至于铁路、公路、水运网的修建，除了繁荣经济外，也是为了战时机动兵力之需。矿产的开采、钢铁工业及机械工业的兴建，也无不与加强国防相联系。

经济建设必须贯彻军民两用、平战结合的原则。孙中山指出："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辘压，以治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自动车之厂，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③。不言而喻，一切民用工交企业，战时也可为战争服务。孙中山在 1912 年指出："至强国一节，譬如中国有二百万兵，分布二十余省，平均不过十万耳，人以三十万兵，可以制胜而有余。盖人以三十万兵敌十万，非敌二百万也，其制胜可断然矣。其故皆由交通不便，运兵运饷，非数月不能到，及其到时，则大事已去矣。则名为二百万兵，与无兵同。今若铁路交通，不过百万兵已足。盖运输便利，不过数日可到，分之虽少，合之则多。以百万兵敌三十万，加以主客异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248～249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8、15 页。

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251 页。

势，蔑不胜矣。故鄙人以为欲谋强国，亦必自扩充铁路始也。”① 又说：“现在以国防不固，俄在北满及蒙古进行，日本在南满洲进行，英国在西藏进行。我国兵力若能保护边圉，断无此等事实。”所以，“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② 可见，孙中山不仅把铁路建设作为发展经济的突破口，而且作为保卫国防的一项举足轻重的措施。军民两用，平战结合，反映了孙中山深远的战略眼光，把握了国防建设的发展规律。

（三）国防建设的蓝图

孙中山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孙中山认为：无武力之国家，必至灭亡。他在《国防计划》纲目中，把充实军备作为立国之策，把建立强大的陆海空军作为充实军备的基础。其中除列有“发展陆军建设计划”、“发展海军建设计划”、“发展航空军建设计划”外，对军制改革、卫生建设、部队教育训练、军事人才培养、军工厂的扩充、改良武器装备等，都有详细纲目，几乎包括了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考虑得十分周到。

*依靠科技，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孙中山认为科学技术对建立强大国防极为重要，为了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性能，他在《国防计划》纲目中，专门制定了“奖励国民关于国防物质科学发明之方略”一条。为了给制造发明提供条件，他积极主张购买各国军用书籍、军用品、军用科学仪器、军用交通工具、军用大小机器等，以为整理国防建设之需，并聘请外国技术专家来华执教。他强调要积极发展我国国防工业，并认为“方今为钢铁世界，有铁有钢可以自制武器，即能争雄于世界”。他计划“扩张汉阳兵工厂，如德国克鲁伯炮厂”，“向列强定制各项海、陆、空新式兵器，如

---

① 孙中山：《在北京全国铁路协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1页。

② 孙中山：《在北京报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33页。

潜水舰、航空机、坦克炮车、军用飞艇、汽球等，以为充实我国之精锐兵器和仿制兵器之需”等等。①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促进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使我国的武器装备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移民实边，巩固边防。孙中山重视加强边防建设，在《国防计划》纲目中列有“移民于东三省、新疆、西藏、内外蒙古各边疆省计划”②，并把它作为《实业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强调：“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③。他认为筑路与移民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国民之需。过去由于交通缺乏，丰富地域变成荒壤，铁路开通以后，就可以使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之区的无业游民移往新地，开发富足之地。修筑蒙古、新疆等铁路，不仅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孙中山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屯田实边的政策，并且注入了新鲜内容。他认为移民实边，屯田垦荒，还可使百万裁余士兵得到妥善安置，避免流离失所，沦为盗贼。

争取海权，巩固海防。长期在海外进行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对海洋和海军的重要性有着深切的体会。他在组织内地武装起义时，在地点选择上无不虑及便于海上接济。武昌起义的成功，清朝海军反正起了积极作用。在反对袁世凯及北方军阀的斗争中，海军是孙中山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他认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④。但是，“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⑤ 为此，他在《国防计划》中制定了“发展海军建设计划”和“各地军港、要塞炮台、航空港之新

---

① 孙中山：《致廖仲恺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71页。
② 孙中山：《致廖仲恺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70页。
③ 孙中山：《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34页。
④ 孙中山：《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64页。
⑤ 孙中山：《复陈其美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0页。

建设计划”①，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以掌握制海权，抵御敌人的海上入侵。他曾指出：“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② 这里，孙中山不仅把制海权作为巩固国防的门户，而且认识到海洋也是国家的重要财富。争夺制海权，不仅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亦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没有制海权，开发海洋，发展海外贸易，就无从谈起。明确提出制海权思想，是孙中山国防建设思想远比李鸿章等洋务派高明的一个明显标志。

普及国防教育，加强全民国防观念。孙中山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明了他撰写《国防计划》一书的目的就是“以为宣传，使我国全体国民了解予之救国计划”③，使人民认识加强国防的重要，积极参加国防建设。他在书中专门列有“发展国防教育计划”纲目。对人民进行国防教育，包括精神与军事两个方面。精神教育方面，主要强调两点：一是使人民了解国防建设是革命的事业，而“革命事业是大家的事”，必须“大家同心协力才可以实行”。④二是要使人民树立民族精神，对国家所处的地位有危机感、责任感。他说：“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精神”，“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

① 孙中山：《致廖仲恺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70～571页。

② 孙中山：《战后太平洋问题·序》，《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19页。

③ 孙中山：《致廖仲恺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70页。

④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78页。

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①]不难看出，孙中山倡导的民族精神，就是要人民牢记国耻，关心国家的兴衰，为国家的富强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军事教育方面，主要强调“指导国民研究军事学问”[②]。他指出：“近代科学大明，武器进步，治军之复杂，迥非前代所可比拟。昔有不读兵书，而可以为名将者，今则非深造乎学问，不足以临阵图敌矣。”[③]

此外，在国防领导体制方面，孙中山要求建立“国防本部”，统一负责管理国防建设事宜，并由中央政府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国防建设会议”，“以为整理国防建设”。国民代表大会可以修改国防计划或对国防建设提出意见。为借鉴外国经验，他还建议“组织考察世界各国军备建设团”，认真总结欧洲战后之经验，加强对各国富强之研究。为了检验军备效果，他在《国防计划》中还拟定了“举行全国国防总集员令之大演习计划和全国空、海、陆军队国防攻守战术之大操演”等。[④] 由于《国防计划》未能成书，许多细节尚不能全部了解，但也可以看出孙中山国防思想的概貌。

孙中山国防思想，是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个领域的整体国防思想，其中许多设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孙中山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是一个军事家。他在长期从事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能认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他的军事思想，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也吸取了世界战争的经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军事遗产，因而值得认真研究。

---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242 页。

② 孙中山：《致廖仲恺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 572 页。

③ 孙中山：《战学入门·序》，《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96 页。

④ 孙中山：《致廖仲恺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 571 页。

第二节　黄兴的军事思想

1898年起，黄兴被保送入武昌两湖书院，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国家民族危机日益关注。1902年被张之洞派往日本留学，次年即参加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旋回国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与陈天华、宋教仁等于长沙组成华兴会，任会长，决定组织长沙起义，未发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和孙中山一起领导和指挥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黄兴先后担任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兼参谋部总长和南京留守府留守。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他又和孙中山一起领导了“二次革命”战争，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虽身居国外，仍为后来的反袁护国战争出谋划策。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军事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但由于革命斗争任务艰巨，工作繁忙，加上英年早逝，黄兴未能撰写出专门的军事论著，因此，仅能从他的军事活动和有关文电中约略地看出其军事思想的概貌。

一、武装起义思想的形成

黄兴生活在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年代。空前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要挽救民族危亡，只有推翻腐败反动的清王朝统治。中国资产阶级走改良主义道路失败后，其中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开始选择革命道路，黄兴就是其中之一。他自1902年东渡日本后，很快成为东京留日学生中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杰出代表。他极为留意军事技能的学习，并延请日本军官

讲授战略战术，参观日本军事操练，参加神乐坂武术会的骑马、射击等军事训练，为后来从事武装斗争准备了必要的军事知识，同时也使他成为革命青年中文武兼资的著名人物。1903 年 4 月，沙俄拒绝从东北撤军，留日爱国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黄兴是义勇队的重要成员。他说："中国之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① 拒俄义勇队解散后，黄兴又参与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并和一部分军国民教育会成员组成暗杀团，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1903 年 7 月，黄兴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的身份回国策划反清活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酝酿成立革命小团体。同年 11 月，黄兴召集有志于革命的青年 20 余人商议成立华兴会，以便领导和组织国内的反清革命活动。在筹备会上，黄兴发表讲话，第一次较系统、较全面地阐发了他的武装起义思想。他指出："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②不难看出，这段话主要包含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

① 《黄克强先生荣衰录》第 26 页。

②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第 277 页。

其一，对革命形势的分析。黄兴通过对湖南一省社会情况的分析，预感到当时革命形势正在到来。湖南地处中南，近代多次重大社会变动均以这里为舞台。太平天国时期，湖南是太平军和清军争夺的重要战场之一。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再次成为新旧矛盾交汇的重点，维新派著名人士梁启超、谭嗣同在此积极传播改良思想，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官绅则大肆反击。到20世纪初，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抗清的会党活动更加频繁。这些客观情况，使湖南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加上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形势已逐渐明朗。为此，黄兴将湖南地区的形势比喻为一桶炸药，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发生爆炸。湖南的形势如此，全国也大体一样。这正是革命派从事革命活动并夺取革命胜利的前提条件。

其二，对革命道路的选择。黄兴以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为参照系，研究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他认为，英法革命是市民革命，可以从首都开始。而中国是国民革命，不能以北京市民或清朝禁卫军搞首都革命，只能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搞地方武装割据。这一战略构想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辛亥革命的实践已证明了它的正确。

其三，武装起义所依靠的力量。黄兴提出，发难所依靠的力量是会党和新军，但他对新军的注意更多一些。他鉴于新军中的多数中下级军官或为新式学堂培养，或为留日归国学生，士兵也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倾向革命，加上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更为利用新军进行发难提供了可能，从而得出了"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判断，黄兴才明确提出了可由军学界首先发难的主张。

其四，武装起义应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妥为筹划，联合行动。黄兴认识到，武装起义可以在某一省份首先发难，据为根本；然而，一省起义如果得不到其它各省的响应和声援，就不能实现"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的目的。因此，他希望华兴会的会员们

"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以期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互相应援，达到一省发难，各省纷起，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目的。

黄兴的上述武装起义思想，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方式。黄兴的革命军事实践，大体上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当然，这一思想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那就是没有将最广大的农民群众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加以考虑。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没有认识到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二、关于起义地点的选择

早在筹备成立华兴会时，黄兴就首先提出："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从 1904 年到 1911 年，黄兴在参与领导反清起义的过程中，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对于起义地点的选择，先后有四次变化。

第一次选择湖南。在筹备成立华兴会时，黄兴选择湖南为发难地点，理由是湖南会党力量雄厚，军学界思想日益趋向革命，华兴会成员中的骨干大多数是湖南人，熟悉本地情况，便于活动。1904 年 2 月，华兴会正式成立后，决定于同年 11 月 16 日（农历十月初十，慈禧虚年 70 岁生日）在长沙起义。起义的计划是：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进行发难，城外会党立即响应，由华兴会会员负责指挥，分五路会攻长沙。起义之前，黄兴按日本军队编制编组革命军，自任主帅，华兴会会员刘揆一、会党首领马福益为副帅；同时，派人前往四川、江西、上海、武昌等地活动，以期长沙起义爆发后及时得到声援。但由于事机不密，起义尚未爆发，清政府即四处抓捕革命党人，以致起义流产，黄兴被迫逃亡日本。同盟会成立后，黄兴认为湖南地区革命力量仍然较大，乃于 1906 年派刘道一等回国运动湘军，重整会党，再谋

湖南起义。同年底，萍浏醴起义失败，黄兴才不再将湖南作为首先发难的突破口，而把视线转移到两广和云南边远地区。

第二次选择华南边境地区。同盟会成立后，黄兴协助孙中山领导革命，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方面。鉴于长沙起义的流产和萍浏醴起义的失败，又鉴于同盟会骨干大多在海外活动，起义所需经费主要依靠海外接济，因而黄兴和孙中山都主张将起义地点选在两广和云南边境地区，并于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上述地区连续发动了6次起义。由于各次起义大多以会党为主力，没有进行长期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因而规模均不大，持续时间也很短，旋起旋落。在华南边境地区进行的多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黄兴对发难地点的选择又有新的考虑。

第三次选择广州。广州靠近海边，兴中会时期即在此发动过起义。20世纪初年，广州新军倾向革命的越来越多，形势令人鼓舞。有鉴于此，黄兴提议将起义地点改在广州。1909年10月，他受孙中山委派，在香港建立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积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黄兴鉴于广州新军中的基本革命力量仍然存在，便力主继续在广州发难。1910年5月，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指出："弟与伯先（赵声）意，以为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故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边远虽起易败（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省会一得必成。事大相悬，不可不择。"① 孙中山接受了黄兴的建议，确定于广州再次起义，这就是1911年4月爆发的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起义前夕，黄兴还在《致居正书》中说："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② 黄花岗起义由于计划不周、组织不力而失败，但烈士们的勇敢牺牲精神却震动全国，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由于起义一再失败，特别是黄花岗

---

① 黄兴：《复孙中山书》，见《黄兴集》第17～18页。

② 《黄兴集》第34页。

起义牺牲了一大批革命精英，黄兴深感悲痛，一度产生了失望情绪。正在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以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两湖地区为发难地点，黄兴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表示赞同，并指出尤以武昌为宜。

第四次选择武昌。这一选择，主要是两湖地区革命党人作出的，而黄兴则对长江流域特别是武汉的革命形势及时作出了正确的分析。他在1911年10月《复同盟会中部总会书》中说："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① 在给冯自由的信中也说："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即以武汉之形势论，虽为四战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视其治兵之人何如。……今汉阳之兵器厂既归我有，则弹药不忧缺乏，武力自足与北部之兵力敌，长江下游亦驰檄可定。沿京汉铁路以北伐，势极利便。以言地利，亦足优为。前吾人之纯然注重于两粤而不注意于此者，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后来输运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欲令为主动耳。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前本有陕西人井勿幕君在此运动，今已得有多数，势亦足自动，熊克武君已驰赴该处为之协助）、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② 不难看出，黄兴对选择武昌为突破口是十分赞成的，并对起义的胜利前景充满了信心。其实，早在1906年前后，黄兴即注意到了两湖地区尤其是湖北地理位置之重要。他认为湖北为全国枢纽，是四战之地，"惟须有正式军队为主力，取汉阳兵工厂而有之，始足

① 《黄兴集》第63页。

② 《黄兴集》第66～67页。

以言战守"①。经过湖北革命党人的努力，湖北地区的新军日趋革命化，具备了以正式军队为主力的条件，因此，黄兴对两湖地区革命党人的选择很自然地表示了赞同和支持。

由此可见，黄兴关于武装起义地点的选择，是基于对当时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分析研究作出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并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武装起义的战略战术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辛亥革命时期武装起义的主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之一，黄兴十分重视对武装起义艺术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战略战术思想。

（一）武装起义应有全局观念

黄兴在领导武装起义过程中，始终坚持"各省纷起"、全国各地有计划有组织地联合行动的思想，胸有全局观念。他在 1910 年 5 月给孙中山信中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即是各省的联合协同问题。他说："联合他省之军队及会党，此最宜注意者。"他举例说："今满洲之马杰及渤海之海贼，去岁萱野返日已带有二三人来，均有势力者。伊等只要求费用，即可活动。至少可集合三五千之众，扰乱满洲方面，趋近杀虎口、张家口一带（口外无兵，可随意越过），以惊撼北京，此则为出奇者也。……长江一带之会党，久已倾心于吾党，一有号召至，可助其威焰。尤以浙江一部为可用，王金发君等可得主动之。至三江之陆军，其将校半多同志……若事前与之联络，择其缜密者为之枢纽，势不难与两粤并。"② 通过分析，黄兴得出结论：如果事先联络策应工作做得好，巨款募集成功，"择其紧要、办其缓急以图之，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③，

---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第 284 页。

②③ 黄兴：《复孙中山书》，见《黄兴集》第 19 页。

亦即一省首义，很快就会得到各省响应。武昌首义爆发前，黄兴特地致信武汉革命党人，指出："此次经营武汉，要格外慎重。各省没有打通以前，湖北一省千万不可轻举。必须迟至九月初旬，与原定计划中之十一省同时举义，方可操必胜之券。"①

为了协调各省之间的关系，黄兴还主张起义指挥机构应由各方面的人才组成。他指出："组织总机关之人材，弟意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若我辈能虚怀咨商，不存意见，人未有不乐与共事者也"。②这也是黄兴胸怀全局的反映。正是由于黄兴坚持联合协同、互相策应，从起义全局考虑问题，与各省的革命党领导人经常取得联系，才使他成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的军事活动家和领导人之一。

（二）起义应有集中统一的指挥

武装起义应实行集中统一的指挥，这是黄兴总结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教训时得出的一个结论。1911 年 10 月，他在给陈其美等人的信中说："广州之败，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纯慕文明参议体制，所以有廿七忽而解散、廿八忽而集合之活剧。不知发难之事，非专断不可，一容异议于其间，立可见其破败。拿破仑谓：'一军之中，情愿有一劣将，不愿有两良将'。以言夫将虽劣而号令得专，军犹不至于溃散；若有两将，必各有主见，互相争议，军情必因之散漫，欲求制胜，何可得者？此言深得治军之理。吾党发难时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行之。……计画一定，只有命令，不得违抗，如此庶可收指臂之效。若欲缩短革命时期，以速其成功，即军政府初成立时，亦当如是。"③ 这表明黄兴对厉行军律、统一指挥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三）必须善于把握起义时机

黄兴是一个注重实际的革命家，作风笃实。他注意分析形势，

---

① 黄兴：《致武汉同志书》，见《黄兴集》第 62 页。

② 黄兴：《复孙中山书》，见《黄兴集》第 20～21 页。

③ 黄兴：《致陈其美等书》，见《黄兴集》第 68～69 页。

把握最有利的起义时机。武昌起义前夕，清朝的立宪骗局破产，某些曾受立宪骗局迷惑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开始脱离清政府，加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导致四川保路风潮高涨，清政府的统治陷入全面危机。黄兴敏锐地预感到革命时机已经来临，便积极支持武汉革命党人适时发动起义。他在《致冯自由书》中指出：“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若强为遏抑，或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① 他认为，“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即抓住有利时机，适时发动起义。起义前夕，他还以“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② 的诗句激励武汉革命党人。

（四）积极争取外援

辛亥革命时期历次武装起义，除了得到华侨大力支援外，还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国际友人的支援和帮助。孙中山和黄兴曾选择边境和沿海地区作为起义地点，就包含了争取外援的考虑。在组织 1910 年广州新军起义过程中，黄兴感到人才缺乏，曾致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请他“速招集步炮工佐尉官多名前来援助”③。黄花岗起义前夕，日本政府为了探视中国革命力量的虚实，曾派人到香港找黄兴了解情况，黄兴即“稍夸张出之，略言法、美国民皆表同情”④，以期影响日本政府，使之不干涉中国革命。争取有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这也是用灵活的外交手法争取外援的一个方面。不过，黄兴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不够深刻，以致临时政府成立之初，他对帝国主义仍抱有某些幻想。

（五）重视饷械的作用

黄兴很重视武器的重要作用。黄花岗起义前，他在《致邓泽

---

① 《黄兴集》第 66 页。

② 黄兴：《和谭人凤》，见《黄兴集》第 71～72 页。

③ 黄兴：《致宫崎寅藏书》，见《黄兴集》第 15 页。

④ 黄兴：《复孙中山书》，见《黄兴集》第 22 页。

如书》中指出："缘此间选锋效死之士甚多，专备发动时之冲锋陷阵，非有多少利器以资之，不足制胜。且不忍让其血肉相搏，损锐气而多失我人才也。"① 由于环境的特殊，黄兴对武器的重视主要通过筹措经费、购置军械表现出来，因为起义所需武器多数购自海外，必须经费足才能多得武器。黄兴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并把它作为每次起义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强调指出："能多得一分之财力，即多得一分预备之实力，所谓多多益善者也"②。

（六）以暗杀辅助起义

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暗杀作为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曾多次被采用，当革命处于低潮时，更是如此。黄兴也主张在起义过程中辅以暗杀，认为"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③。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曾派人暗杀两广总督张鸣岐等人未遂。他后来回忆当时情形说："弟自广州事败，愤同志死事之惨，即组织实行队，先为狙伏汉奸之计，以助革命大军之进行。盖二者相辅而行，乃能有济"④。护国战争前夕，黄兴又主张"广设暗杀机关，造起种种恐慌"⑤，将暗杀作为正规军事行动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

以上六个方面，大体上反映了黄兴在参与领导武装起义过程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其主导方面是积极可取的。还必须指出，黄兴领导历次武装起义，明显的优点是英勇果敢，不畏强敌，但在作战指挥方面，表现为不够审慎，不够灵活，有时带有相当的冒险性和侥幸心理。以黄花岗起义为例，当广州地方当局已侦悉起义消息，实行严密戒备，而起义准备又不充分的情况下，黄兴竟同意少数同志不可改期起义的意见，仅率少数人孤军进攻督署，结

---

① 《黄兴集》第 33 页。

② 黄兴：《致邓泽如书》，见《黄兴集》第 25 页。

③ 黄兴：《致伍平一等书》，见《黄兴集》第 70 页。

④ 黄兴：《致美洲筹饷局同志书》，见《黄兴集》第 69 页。

⑤ 黄兴：《致张孝准书》，见《黄兴集》第 411 页。

果伤亡惨重，起义遭到失败。这便是恩格斯曾批评的“玩弄起义”的冒险行为。

四、建军思想

黄兴的建军思想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建军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和章太炎协助孙中山一起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核心是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必须建立一支中华国民军。后期建军思想主要体现在临时政府建立后，他和孙中山一起领导制订的一系列军事法规性文件中，核心是建立一支旨在维护共和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化军队。

黄兴等认为，要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必须有一支革命的武装，并要掌握兵权，否则，“不能秉政权”。为此，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制订了建立中华国民军的计划，内容包括军队编制体制、军队纪律、战士赏恤标准、军需制度以及瓦解敌军政策等。按黄兴等人的设想，中华国民军由国民组织而成，“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①。国民军的宗旨，就是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在军民关系上，强调军队肩负着国民的责任，“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只要“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则革命可成，民政可立”。② 这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军队和人民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国民军的编制体制方面，主要是依照日本军制。在军队纪律方面，他们为国民军制订了22条纪律，要求官兵听从命令，遵守纪律，努力完成任务。国民军的后勤补给主要依靠募捐筹款、缴获、向境内人民有家产者借用现银和发行军事用票等方法来解决。在瓦解敌军方面，黄兴等人充分估计到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情

---

①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1页。

②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298页。

况下，清朝官兵反戈一击的可能性，因此提出："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须以大义自持……际此国民军大起之日，正当倒戈以向满洲政府，而与我国民军合为一体"①。同时规定，对转向革命的清军士兵，保证"论功行赏"，"量才器使"。② 这一政策在辛亥革命中被付诸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中华国民军建军方案的提出，反映了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的建军思想。在后来的武装起义中，多次打出了中华国民军的大旗，但由于起义屡遭失败，迄未建立起统一的、正规的中华国民军，因此，上述建军思想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理论上而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可能运用国家的力量建立一支资产阶级近代化的军队了，于是，黄兴和孙中山一起，在短短的 3 个多月时间里，领导制订了一系列有关军队建设的法规性文件，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建设一支维护共和制度的近代化军队的思想。

在军事领导体制上，黄兴等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军事制度，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规定国家政体为总统制，临时大总统有统率海、陆军之权，下设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部。陆军部、海军部掌管军事行政事宜，参谋部谋划国防用兵事宜。战时成立大本营，由大总统直接实施军事指挥。南北议和后，《临时约法》改政体为总理制，陆军部、海军部改隶国务总理。

在军队编制体制上，主要是仿照日本军制。1912 年 1 月黄兴任陆军总长后，随即领导制订了《陆军暂行编制》，规定中华民国军队各级建制单位的名称为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军、师两级建立司令部，同时，在陆军中增编机关枪分队。同年 3 月，黄兴电令各省都督："现今军队林立，名目繁多，亟宜编定序列，以谋统一。现已经本部编列二十一师外，其各省军队未经编列者，

---

①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312 页。

②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315 页。

应请贵都督转饬各军，以按次编列”①。由于条件所限，这次整编只完成了名称的统一，装备、兵员、训练等项均未完成。即使如此，它在推进中国军事近代化、正规化方面仍然起了重要作用。

陆军人事制度方面，黄兴也领导制订了相应的条令条例，如《陆军官制》、《陆军暂行给予令》、《勋章章程》、《陆军军人补官任职令》、《陆军官佐免官免职令》、《陆军官佐暂行补官简章》等。但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短暂，起义各省政令尚未统一，因而上述条令条例并未得到完全执行。

黄兴很重视军队的制度建设和正规化建设，并且进行了一些实践，这是他建军思想积极的一面。但是，黄兴曾一度忽视了用革命思想统一军队的思想，也没有特别强调资产阶级政党必须牢牢掌握军队领导权的问题。孙中山尚未正式交权之前，黄兴就致电袁世凯，要袁“速简贤能接充（陆军部长），以重军务”②。任南京留守期间，他未能在裁减军队过程中，着意经营，编组一支精悍的忠于民主革命的军队，以致在尔后的讨袁战争中造成极大的困难。当然，这与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实行的政治路线有关。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曾抱有幻想，将政权转让给他，军事上也就服从于“调和南北，破除猜疑”的目的，主动放弃了对南方军队的领导权。黄兴建军思想的缺陷，是由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妥协性、软弱性和革命不彻底性所决定的。

五、治 军 思 想

黄兴在组织和领导武装起义过程中，依靠的多是会党和新军。如何管理参加起义的队伍，是革命党人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黄兴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的治军思想于此也可见一斑。

---

①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二辑，第 258 页。

② 黄兴：《致袁世凯电》，见《黄兴集》第 133 页。

治军首重纪律，黄兴等对此非常重视，在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即列有军纪22条。黄花岗起义之所以失败，和一些革命党人无视纪律不无关系，黄兴对此感受尤深，认识到只有令行禁止，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在汉口汉阳保卫战期间，黄兴一再重申战场纪律，对违犯纪律的军官和士兵坚持执行军法。担任南京留守期间，曾有部分赣军索饷哗变，黄兴坚决予以平息，并赔偿商民经济损失，使整个南京地区军纪肃然。

黄兴注意身先士卒，并以革命党人的勇敢与牺牲精神教育会党和新军。1907年钦廉防城起义时，黄兴曾冒险亲自潜入清军郭人漳部军营，策动该部起义，虽未达目的，但其英雄行为却使众人为之感动。1908年3月钦州马笃山起义期间，黄兴亲率旅越青年200余人组成的中华国民军南军，在40多天时间里，转战广东、广西边境的几十个村镇，大小数十战，先后击败万余清军，使敌人闻风丧胆。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前，黄兴写下了“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① 的悲壮绝命辞。在战斗中，他亲率“选锋”猛攻两广总督署，虽被敌人打断手指，仍坚持战斗。汉阳保卫战期间，黄兴把司令部设在前线，在强敌进攻面前毫无惧色，表现了一个民主革命家的英雄气概。

用同盟会的纲领教育会党和新军，使之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这也是黄兴治军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1906年秋，湘赣边区会党反清活动活跃，时在日本的黄兴，派刘道一等人回国对其进行指导。他对刘道一等人说，现在倡义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古代的英雄革命，而“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②。刘道一等按黄兴的要求进行活动，使会党首领龚春台等人受到很大教育。因此，萍浏醴起义爆发后，龚春台发布的檄文中出现了“奉中华民国政府

① 黄兴：《致梅培臣等书》，见《黄兴集》第40页。

②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第284页。

命”字样，并宣称“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① 另外，黄兴还根据会党山头林立、组织松散等特点，用太平天国领袖们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被清军打败的教训，教育会党“一要服从首领，二要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②。这些内容，也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黄兴一生戎马倥偬，没有来得及系统总结其全部军事活动的经验教训，因此，只能根据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函电等资料及其具体军事活动进行综合分析，勾勒其军事思想的大致轮廓。尽管如此，在不甚发达和繁荣的中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园地中，黄兴有关武装起义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建军、治军思想等内容，仍不失为值得珍视的宝贵军事历史遗产。

---

① 《辛亥革命》（二），第477页。

② 黄兴：《与李贻燕等的谈话》，见《黄兴集》第212页。

后　记

《清代后期军事史》是在《中国军事通史》编委会的指导下，由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第三研究室并约请部分同志集体编写而成，初稿的撰写分工是：

施渡桥：绪论，第三、四、九、十九章。梁巨祥：第十七、二十一章。谢健：第一、二、六、七、十四、二十二、二十七章，第十、十一、十二章一部分，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十八章第一节。王楚良：第十、十五、十八章，第十一章一部分。毛振发：第十二、十六、二十、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章，第二十四章第二节。黄水华：第二十八章第二节。另聘请张一文同志撰写了第五、八章；陆方同志撰写了第十三章第二节；皮明勇同志撰写了第二十四章第一节。王式金、邱心田同志也为本书提供过部分初稿。

本书上下两册由施渡桥、梁巨祥同志分别统改，并共同审定。谢健同志协助施渡桥、梁巨祥同志进行组织协调工作，并与王楚良、黄水华同志负责图表绘制和文字校对。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虽然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广泛占有资料，借鉴吸取新的研究成果，着力探索晚清军事的发展进程和经验教训，力求客观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军事特点和规律，但受学术水平所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